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汉、唐、宋、元、明、清）

（全六册）





團结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汉、唐、宋、元、明、清）

（全六册）





團結出版社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1
胡马阴山
——汉匈五百年战争史
（公元前209年—公元329年）
顾晓绿｜著
大漠烽烟
唐帝国战争史
苍狼逐鹿
蒙宋百年战争史
纵横塞北
东海博弈
八旗狂飙

一口气读完的中国战史

（含汉，唐，宋，元，明，清六朝战史）

顾晓绿　郭强　赵恺　著



團结出版社

目录

一口气读完的中国战史
胡马阴山
序
第一章 飞鸣镝
白登之围
简答于书
中行之说
甘泉闻警
马邑之谋
第二章 胭脂山
飞将末路
鏖兵漠北
角逐西域
贰师兵团
北海之滨
第三章 青冢怨
丧师于野
五王并立
故剑情深
康居城下
仰人鼻息
第四章 玉门行
南北分治
良弓利剑
兵出玉门
以夷制夷
归玉门
第五章 铜驼街
汉匈联军
浑水摸鱼
芒刺在背
五部司马
荆棘铜驼
大漠烽烟
序

前记
第一章 渭水之盟
1．府兵卫国
2．玄武惊变
3．贞观破局
第二章 天可汗
4．秣马厉兵
5．雪满弓刀
6．长安西望
第三章 夷平四海
7．储君之争
8．百战金甲
9．东征朝鲜
第四章 鏖兵白村江
10．倭国介入
11．大化革新
12．当头棒喝
第五章 落日怛罗斯
13．经营西域
14．女皇时代
15．盛极而衰
第六章 塞外余晖
16．暗流涌动
17．安史之乱
18．日薄西山
苍狼逐鹿
前 言
序章 海陵野望
完颜崛起
战争迷雾
五强并立
第一章 金莲川上
隆兴北伐
尧舜之治
草原危途
第二章 肯达山南
继承者们
成败两难
驱狼饲虎
第三章 斡难河源

        追亡逐北
        决战杭爱
        开禧北伐
    第四章 界壕内外
        窥测中原
        叩关中都
        分崩离析
    第五章 玉龙赤杰
        大纛西向
        裂土封疆
        狼王之死
    第六章 黄河彼岸
        新生时代
        东征高丽
        忠义两失
    第七章 多瑙河畔
        群狼咆哮
        端平入洛
        摄政皇后
    第八章 钓鱼城下
        血沃宫闱
        国土防线
        上帝折鞭
    第九章 和林临安
        大宝之争
        打算之法
        李璮变乱——
    第十章 襄樊之间
        公田买卖
        襄阳之围
        大厦将倾
    尾声 镇压和怀柔
纵横塞北
    楔子 皇子复仇记
        西道诸王
        海都之叛
        大宝之争
        武宗海山
    第一章 两都故事（1328—1332）
        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旺忽察都
第二章 天威如狱（1333—1340）
天降皇冠
伯颜专政
脱脱内阁
第三章 开河变钞（1341—1351）
奇后母子
长堤鼠穴
白莲石人
第四章 百万红巾（1352—1355）
元朝军制
星火燎原
脱脱南下
第五章 群雄并起（1356—1361）
三路北伐
鏖战江南
“天完”变迁
第六章 鼎足之势（1362—1365）
闽中风云
决战鄱阳
东西吴王
第七章 洪武北伐（1366—1369）
翦平江南
南征北伐
最后一击
第八章 拉锯漠北（1370—1378）
争夺辽东
岭北折戟
西域得失
第九章 次要战线（1379—1382）
一统金瓯
属国之争
远征云南
第十章 捕鱼儿海（1383—1398）
明初政治
名将末路
北元崩溃
后记：
东海博弈

前言
序章 从白村江到博多湾
大和与百济
白村江口
平氏崛起
元寇神风
第一章 不征之国
天皇倒幕
二元政治
倭扇行歌
半济之法
猿犬英雄
第二章 勘合银符
龙兄虎弟
艰难破冰
宣德钱来
土木之变
天子性情
应仁之乱
第三章 大倭寇
争贡之刃
朝贡断绝
五峰徽王
鏖战闽浙
桶狭之间
第四章 援朝战争
本能之敌
天下狂猿
昏君之名
次要战线
半岛破竹
第五章 辉煌与落寞
明军入朝
碧蹄踏血
釜山之围
人间关原
神州陆沉
尾声
八旗狂飙
第一章 统一女真

第二章 萨尔浒
第三章 决战辽东
第四章 宁远之战
第五章 大清帝国
第六章 战松锦
第七章 八旗入关
第八章 定鼎中原
第九章 灯灭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1

胡马阴山

——汉匈五百年战争史

（公元前209年—公元329年）

顾晓绿 | 著



胡马阴山

—汉匈五百年战争史

（公元前209年—公元329年）

顾晓绿 著

团结出版社

序

作为曾经雄踞欧亚大陆的草原霸主，匈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游牧民族之一。但是关于这个如西伯利亚寒流一般定期袭扰东北亚，甚至深入西欧腹地的马背文明，我们却知之甚少。即使其与汉帝国有过漫长的交锋史，留在世人记忆中也不过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辉煌，却往往忽视了为孕育这一幕的高潮，汉、匈两大帝国之间曾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拉锯。而随着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将星的逝去，沿着漫长的国境线，游牧民族和中原帝国之间是否又重复了往昔的故事？

本书将首次采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对汉帝国及其继承者们与匈奴之间五百年的交锋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全面展示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对抗和博弈，为读者深入解读期间种种高层决策背后的考量。

以“鸣镝弑父”宣告自己“横空出世”的冒顿单于是否真的如《史记》中所表述的那般在草原上演了一场“王子复仇记”？曾被李牧、蒙恬等战国名将击败的匈奴部又如何在其领导之下完成了绝地反击？在白登合围汉高祖刘邦所部主力的情况，匈奴帝国是否真的因为女人的嫉妒心而放松了紧绷的弓弦？

继承其父之志的老上单于为何选择重用一个跟随和亲公主陪嫁而来的阉人？堪称“汉奸始祖”的中行说对匈奴帝国的内政、外交又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险些在马邑遭遇汉军合围的军臣单于是否曾有过一举倾覆汉帝国的计划？而随着其弟伊稚斜的自立为王，强盛一时的匈奴帝国为何逐渐步入了下滑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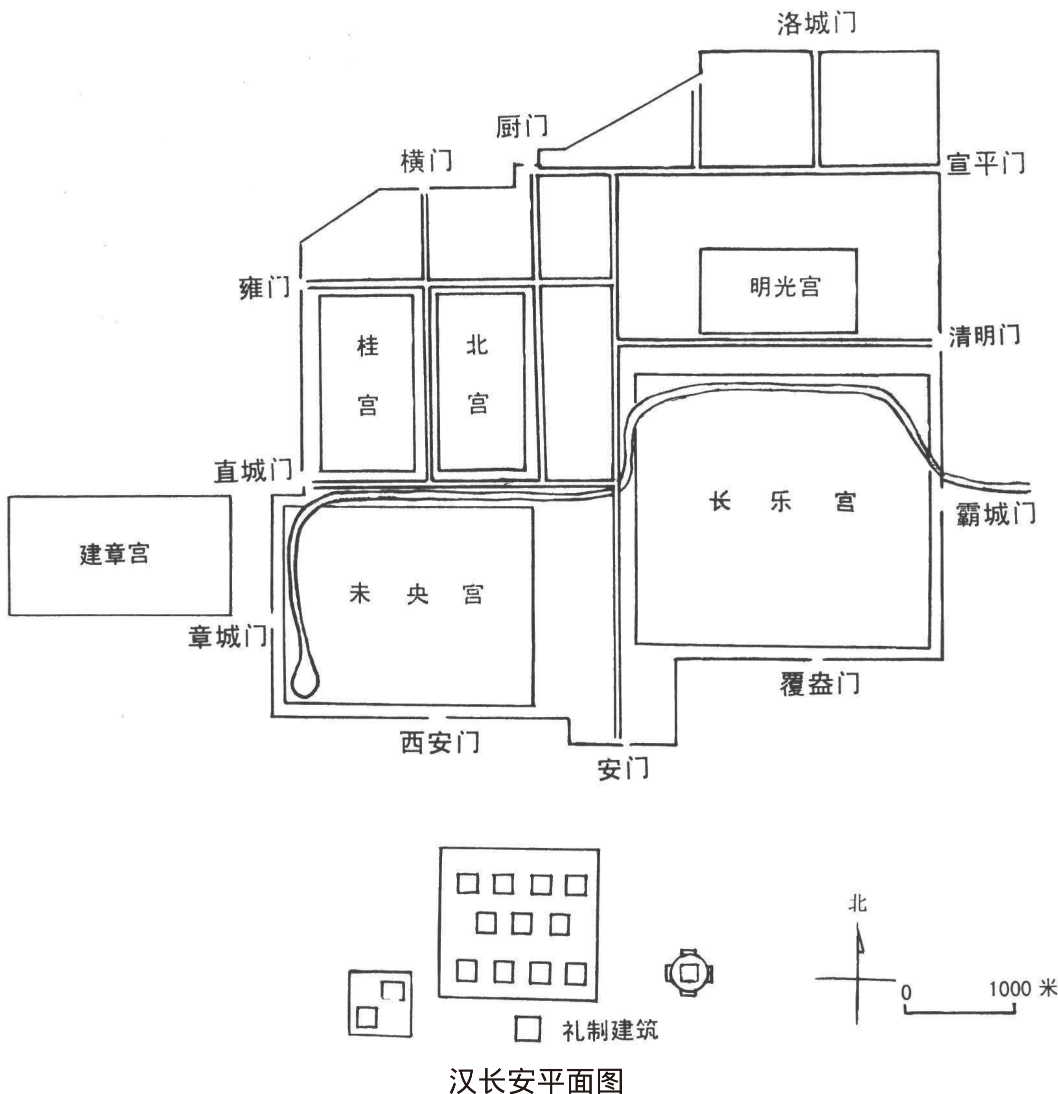
经历了一系列血腥的内部整合之后，匈奴帝国在且鞮侯单于手中实现了短暂的复兴，但重用汉帝国叛将卫律所展开的一系列改革却为何在匈奴帝国内部埋下最终导致分裂的种子？李陵、苏武、李广利，那些留在青史之上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凭借着宫廷阴谋上位的握衍朐鞮单于又是如何一手将草原推入了九单于对立的混战之中？

因迎娶王昭君而颇具知名度的呼韩邪单于为何在屡战屡胜的情况下选择了南附汉朝？而实力远胜于其的郅支单于又为何选择了放弃王庭远走西域？名义上重新统一草原的呼韩邪单于及其子孙们又是否真的满足于仰人鼻息的生活？王莽对匈奴的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是否真的属于无事生非？南北匈奴的正式分裂背后又是否有光武帝刘秀的暗中推手？

在班超“以夷制夷”的指导方针之下，东汉政府如何确立起了对北匈奴的压倒性优势？[illegible]大军出塞的外戚窦宪、窦武父子最终为何倒在了宦官集团的刀下？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南匈奴单于于夫罗、呼厨泉兄弟又与袁绍、曹操等中原群雄上演了怎样的斗智斗勇？随着魏晋更迭，在八王之乱的余烬之中，厚积薄发的匈奴大军最终如何突入洛阳？而以汉帝国继承人自居的匈奴刘氏集团又因何在部下石勒的叛乱中陷入崩溃？

第一章　飞鸣镝

白登之围
——汉匈初次交手背后的隐忧



汉长安平面图



汉高祖

简答于书



汉代武士



中行之说

——老上单于时代的汉匈外交和军事冲突

吕后死后，吕后一族外戚欲图作乱，为陈平、周勃和宗室刘章等诛杀，此后群臣欲立齐王，然而琅邪王刘泽却说"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而使齐王刘襄无缘皇位。当初刘襄在其舅父驷钧的支持下起兵反吕时，派使者到齐国以东的琅邪国，请琅邪王赴齐都临淄面商大事，而琅邪王至临淄却被齐王软禁，而后齐王遂使尽征琅邪国兵，与齐军合兵，以伐众吕。刘泽见自己无法归国，便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提出让自己前往长安，游说众臣立齐王为帝，刘襄不知是计，反倒是深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谁知刘泽到长安后，却以"齐王舅夫驷钧非善类"为借口，反对立齐王，若齐王为帝，那么"吕氏当国"又将复演。众臣忧心外戚干政再次出现，于是以"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而乃谋迎立代王，此后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刘襄罢兵返回齐国后，众臣决议勤杀汉惠帝之子汉后少帝刘弘，迎代王刘恒入京继皇帝位，是为汉文帝，由此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刘恒是汉高帝刘邦的第四子，母薄姬。其乃吴郡人，其父薄氏在秦与从前魏国宗室之女魏媪私通，生下薄姬。秦末，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魏王，薄姬入宫，为魏王豹妾。史载有一次，魏媪到许负那里看相，卜算女儿薄姬的命运，许负称薄姬将生下天子，而实则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相持于荥阳天下大势尚未分明，魏王豹听到此言后，心里很是高兴，于是背弃高祖，并与楚霸王和议，高祖大怒，以曹参攻魏国，魏豹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而在将魏国改置为郡时，薄姬也被汉军所俘，此后被送入宫中织室织布，某日高祖至织室，见薄姬颇是有些姿色，故而诏令纳入后宫。

不过自入宫以后，薄姬却是"岁馀不得幸"，倒是当初薄姬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亲，曾有约定说："先贵无相忘。"后来管夫人、赵子儿先受到刘邦的宠幸。高帝四年，汉高祖携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于河南成皋灵台，二人说笑当年与薄姬的相约，高帝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相告，听闻之后，高帝心惨然，怜悯薄姬，于是"召而幸之"，风流之间，薄姬说："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笑着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于是不久之后，薄姬就有了身孕，于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生下刘恒。但自有刘恒之后，薄姬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汉高帝了。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陈豨叛乱后，年仅八岁的刘恒被立为代王，都于晋阳。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去世，那些受到汉高帝宠幸的爱姬如戚夫人等，吕后都怨恨她们，都被幽禁起来，不能出宫。而薄姬因为极少被汉高祖宠爱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儿子刘恒前往封地代地，作代王的太后。薄姬的弟弟薄昭也跟随到代地。史载，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当初吕后在杀赵戚夫人和其子赵王如意后，曾要议代王刘恒出任赵王，然而却为刘恒婉拒，故而刘恒才能够在吕后专权时得以保命。

文帝素来谨慎，以至于众臣以其"宽厚仁慈名声较好"为由，派使其赴长安继承皇位时，非但不喜，反而心有疑心，最后是占卜来决定吉凶后，才决定赴京。入京时，其以舅父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而离长安京五十里时，又以属下宋昌先行入城观察情况，最后才在陈平等众臣的拥簇下，入未央宫。当夜，刘恒又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而以张武为中郎将，掌领卫士。此后，在有司衙门分别诛杀汉后少帝刘弘及其三个弟弟于各自府第后，皇帝方才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然而文帝登基之初，其自知在汉廷并无雄厚的势力，宗室亦不服他，故而面对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文帝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其首先则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此外，在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文帝又新封了一批诸侯王。是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此后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以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并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又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当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在群臣的建议下，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又立窦氏为皇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因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而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此外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文帝下诏让列侯返回自己的封邑就藩，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刘恒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封王反抗汉廷之先例。刘恒当即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其后，又有淮南王刘长举起叛旗，但其尚未行动时，就被扑灭，文帝派使传讯刘长入京，废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不久之后，因征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文帝开始着手削藩，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齐王刘则死，因无子嗣位，于是文帝下诏，分封地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从而削弱了各诸侯王的力量。

漢文帝像



此后，中行说还教给匈奴人计数方法，以及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核算记录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当时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臣曾讥讽匈奴的风俗轻视老者，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却反问汉朝使者："按照你们汉人的习俗，凡是家中有准备参军、守边屯戍的年轻人，他们年老的父母难道不省下暖和的衣物和肥美的食物送给他们享用吗？"汉使以为然，但中行说又说："匈奴人都知道战争的重要性，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要把肥美的食品让给壮健的人吃喝，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然后才能让父子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能说是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此后，汉使又称匈奴人缺乏基本的伦理，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却反驳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匈奴人生活简单，在急迫的时候，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宽松的时候，人们欢乐无事，受到的约束很少。君臣关系简单，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随意自如。至于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继承人一定是本族的子孙。如今汉人佯装正派，不娶他们父兄的妻子做老婆，致使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相互残杀、改朝易姓。汉人的礼义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修造宫室房屋耗尽了民力。百姓努力耕田种桑为求得衣食满足，修筑城郭来保卫自己，所以在急迫时不练习攻战本领，在宽松时又因为辛苦劳作而筋疲力尽。生活在土石房屋里的汉人喋喋不休、窃窃私语，穿得整整齐齐戴着帽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自是之后，对汉使辩论者，中行说就回之以："汉使不必多言，你们只需要想着汉朝进贡给匈奴的缯絮米糵，一定要数量充足、品质良好使我们满意才行。如果品质粗劣、数量不足，那么等到秋天，匈奴人的铁骑就会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而后，其日夜教唆老上单于寻找有利时机进攻汉朝。

也正是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不仅在给文帝的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辄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

针对这一情况，文帝并不仅仅只是以和亲之策相对，而且还通过兵制革新和鼓励发展马政来强军建武，以应对有事。汉承秦制，但却行三公九卿制，丞相率领的外朝官、大将军率领的内朝官以及处理皇帝与皇族私人事务的宫廷官三者结合，其中外朝官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人分掌大权，称三公。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天下大事，御史大夫佐丞相统理天下，太尉为最高武职，掌武事，备皇帝顾问，但不行军令之权，九卿中，光禄勋（郎中令）统领诸郎，卫尉统辖卫士，中尉统率中尉卒，共同负责皇宫和京师治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各种名号的将军，皆掌征伐。

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不过虽然是当时的最高武职，但不常置，而兵权也不在太尉手中。按《历代兵制》记载：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也就是说，当时禁军主要为南军、北军。南军由卫尉统率，因驻京师长安城内的南面，分别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负责守卫两宫，及建章、甘泉等宫，由于皇帝居未央宫.守护未央宫是卫尉的职责.故有时也称未央卫尉，而皇后所居为长乐宫，亦有设长乐卫尉。卫尉率卫士为兵卫，宫内设庐舍以驻扎卫士，卫士昼夜巡警，检察门籍。卫尉主宫门和宫内，与主宫外的中尉，加上郎中令所率郎官为郎卫，拱卫宫廷，二者称为表里。此外，长安还有城门校尉统领京师各门屯卫，分八屯。属官有司马、城门候（每门一人，共十二人），文帝时，将南军、北军合二为一，为"南北军"，与城门校尉统领京师各门屯卫相辅相成，拱卫京师。



甘泉闻警

——军臣单于的野心和“文景之治”的积蓄





匈奴骑兵

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史载景帝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而在边事上，景帝时，大汉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只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又有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发车骑将军、材官将军屯边。

虽然匈奴军臣单于曾经在七国之乱时，试图联合七国，准备攻入长安，但因为七国之乱马上被平息，军臣单于放弃了进攻的计划。随后汉景帝送给匈奴财宝、宫女继续实行和亲政策，故而此后匈奴不再大规模骚扰边境，直至武帝初期，两国方才开始再次兵戎相见。之所以文、景时，大汉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国家从不轻易出兵，主要就是担心兴事免耗损国力。景二帝推崇黄老治术，故而在治国时，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试图使得中原能够迅速恢复，改善先秦以来的兵灾、重赋所带来的弊病。

自大汉帝国建立之初，鉴于民众对秦时酷法的不满，于是高帝顺从民意，而以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拨秦之弊，与民休息”的理念自高帝，历经孝惠、吕后、至文、景，已然成为了大汉帝国的治国之术。所谓“清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这一思想而展开，如《淮南子·览冥》中所说“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所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

此外文、景二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百姓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开荒。而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朝廷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朝廷能够有财力减免田租。

通过“宽刑薄赋、自由工商”等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同时，此外，文、景时候，还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削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规定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资源及有关税收，从而使得百姓赋税减少，国家秩序也日趋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也就是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很显然，“文景之治”所夯实的强大经济基础，才使得此后汉孝武皇帝能够有足够的国力来征伐匈奴。

马邑之谋





张骞

由于一直没有张骞使团的消息，此后汉武帝便也开始不再将希望放在联合月氏的方面，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汉武帝命朝臣讨论对策。大行令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出任边郡官吏，熟悉了解匈奴的情况，他一向反对向匈奴和亲，故而其以匈奴屡次背弃盟约为由建议汉武帝拒绝和亲，其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以匈奴兵强马壮为由劝汉武帝接受和亲，他称："派大军去千里之外作战，不会取得胜利。今匈奴依仗戎马充足，怀禽兽之心，迁移如同群鸟飞翔，很难控制。得其地不足以为开疆拓土，有其民众也不足以为强大，从上古起他们就不属为人。汉军到几千里以外去争利，则会人马疲惫，而匈奴胡虏则就会凭借全面的优势来对付疲惫不堪的大军。况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而是因为末力衰竭的缘故。所以发兵攻打匈奴实在是很不利，不如与之继续和亲。"由于群臣议者多附于韩安国，故而汉武帝最终采纳韩安国的建议，同意继续与匈奴和亲。

然而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有雁门郡马邑豪绅聂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进言：匈奴刚刚与西汉和亲，非常信任边境的居民，故而利用匈奴刚与汉朝修好，信任边民这一点来以财物引诱军臣单于出兵，继而将匈奴击破。汉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率车骑步精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约定在单于进入马邑时纵兵出击，又以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率兵三万自代郡出兵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从而一举全歼匈奴大部，武帝同时派遣聂壹为内应，前往匈奴诱敌。其实从用将这个方面来看，就能够看得出，武帝对于这次马邑之围的重视程度。

骁骑将军李广，其本是陇西成纪人，其先祖是秦时名将李信，将门世家出身。李氏世代为仆射，传习射箭。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而从军，因为精通骑射，故而斩杀匈奴首级很多，此战之后，因功为中郎。李广曾经随从皇帝出行，其有冲陷折关及与猛兽搏斗的事，因而汉文帝颇为感慨："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景帝时，李广任陇西都尉，又改任骑郎将。

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平乱建有军功，史载，在昌邑城下，因其夺取吴楚叛军军旗，而名声显扬。但却因梁王授予将军印，故而还师后，没有给予封赏。后调为上谷太守，时常与匈奴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曾哭着对汉景帝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负，屡次与敌虏肉搏，恐怕会失去他。"于是景帝调他为上郡太守。后来转任边郡太守，曾为陇西、雁门、代郡、云中太守，都因奋力作战而出名。景帝年间，匈奴大举入侵上郡时，汉景帝使亲近的宦官跟随李广整兵，以击匈奴。某日，宦官率从骑数十人纵马城外，见匈奴三人，与之交战，结果三人转马飞射，不仅射伤了宦官，而且还"杀其骑且尽"，此事为李广所知后，其称"是必射雕者也。"于是速率从百骑前去急追，三名匈奴人当时亡马步行，行数十里，与李广遭遇，于是李广命令骑兵散开，从左右两面包抄，而自射三人，结果杀其二人，生得一人，询问，果然是匈奴射雕者。而当李广将俘虏缚之上马时，匈奴数千骑而来，他们看见李广，以为是汉军诱敌的骑兵，皆惊，于是上山布阵，而李广所率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李广却制止了部下的行为，其称"我们离大军几十里，而且只有百骑，此时这样逃跑，那么在匈奴追射之下，很快就会死伤殆尽。而如果我们留下，则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于是令诸骑曰："前进！"而当诸人在其率领下，进至约离匈奴骑兵不过二里时，李广又下令："皆下马解鞍！"其部下不解，称："胡虏人多而且离得如此近，如果有急，该怎么办？"李广说："那些胡虏以为我们会走，现在我们反皆解鞍以示不走，则可以使他们更加坚信我们是大军诱骑这一错误判断。"于是，匈奴骑兵遂不敢击，甚至有一骑白马的匈奴将军还出阵督监他的兵卒，不可轻举妄动，坐镇过李广上马率十余骑奔驰前去射杀了这个匈奴白马将军，然后又返回来，解下马鞍，命令士兵把马放开，随便躺卧。这时天色已暮，匈奴兵始终觉得很奇怪，更加不敢出击。夜半时，匈奴人还以为汉军有伏兵在侧，试图准备夜袭击，故而全部撤走了。天亮，李广回到大军驻地时，甚至众兵将皆不知李广在哪里，所以没有派兵去接应。此事在当时一度为传奇，而李广的名声也更加显赫了。此后，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左右近臣皆认为李广是名将，于是武帝也很是赏识李广的名气，遂其由上郡太守转为未央宫卫尉，而程不识则为长乐宫卫尉。这次武帝以其为骁骑将军，统率骑兵，就是希望这位勇将能够在此战中有所表现。

轻车将军公孙贺，公孙贺是北地义渠人，其先祖为胡人，祖父公孙浑邪于汉景帝时期为典属国、陇西太守之职，汉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公孙浑邪参与平叛，景帝封赏击吴楚有功者五人，公孙浑邪被封为平曲侯。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四月，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公孙贺以"少年即有军功且为平曲侯子"之故而被选为太子舍人。刘彻继位后，太子舍人公孙贺亦被武帝擢升为九卿之位的太仆一职，秩禄中二千石，掌管天子出行的车舆马匹。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卫夫人（卫子夫）盛宠。武帝提拔其弟卫青为建章监，加侍中，赏赐给卫家的赏金在数日之间累积至千金之多。虽此，武帝犹觉不够，后又诏公孙贺娶卫夫人的姐姐卫孺（卫君孺）为妻。公孙贺也由此更加为武帝所宠。皇帝以此宠臣为轻车将军，率军参与马邑之谋，可见重视之度。

材官将军李息少年时从军，初侍奉景帝，亦为一代名将，而王恢久在边地，加之此次马邑设伏也是他所提议的，故而为将屯将军，统率全军的护军将军韩安国，本是梁国中大夫，是梁孝王身边的得力谋士，吴楚七国之乱时，梁王使韩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两位梁将配合默契，史载"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再说，聂壹，其本是雁门马邑一带的豪商，雁门郡在春秋时，为北狄所居，战国时，赵武灵王破北狄，置云中、雁门、代三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在此筑城名马邑，置马邑县，归雁门郡管辖。汉时置马邑、中陵、剧阳、阴馆、汪陶、埒县、楼烦、善无诸县，归雁门郡管辖。聂氏在当地颇有家产，此番他出于对匈奴的熟悉和对西汉王朝边患不息的焦虑而献策，称"和亲之后汉朝已经取信于匈奴，只要诱之以利，必定能将之击溃"。之后，以自身作饵，乘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匈奴军臣单于，诈降称自己能斩杀马邑县令，迫使马邑举城投降，而后马邑城内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以防汉兵。单于贪图财物，信以为真，于是便立刻策划起兵。此后，军臣单于果然统率十多万骑兵，入侵武州塞，并派使者随聂壹先入马邑，等斩杀马邑的官员后再进兵。聂壹返汉后与马邑县令密谋，杀死囚犯割下首级悬挂在城门之上，佯称为马邑长吏之头，以示时机已至，引诱匈奴军深入腹地，于是军臣单于得报后，即率领大军向马邑进军。

然而当单于率大军来到距马邑尚余百里的地方，发现沿途有牲畜，却无人放牧，于是心生疑虑，于是单于转而领兵攻打附近的烽燧，获了汉武州尉史（匈奴传说是雁门尉史），尉史在威胁下，将伏兵实情全部说出，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军臣单于听后大惊之后继而大喜，其对左右说"几为汉所卖！"于是下令撤军，及出塞后，单于又说："我得到尉史不上汉天子的当，真是上天所赐。"于是封尉史为"天王"，下令立即撤军。这时，王恢已抄出代郡，准备袭击匈奴背后，但得知单于退走后，担心匈奴会兵一处，自己所率兵马不足以应对，甚至汉兵势必败，故而没有追击，而韩安国等带领大军，分驻马邑境内数日，不见匈奴兵来，而此时塞下传言单于已率匈奴大军离去，此后追至塞外，但早已不见匈奴影踪，于是乃罢兵。

大军返回之后，汉武帝因马邑之围未能伏击匈奴而失利，而将谋划诱敌却临阵脱逃的王恢下狱。虽然王恢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是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但皇帝还是不依不饶，而廷尉也认为王恢畏敌观望，当斩。后王恢以千金买通丞相田蚡，请其帮忙斡旋，但田蚡虽然是国舅，但却不敢言上，只能转而对王太后说："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而太后也以此言而向武帝求情，结果无法平息汉武帝的愤怒，皇帝认为"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王恢听闻此言之后，乃自杀。

就这样，大汉帝国精心谋划的"马邑之围"以一无所获、提议者王恢自杀而死为结局，草草收场，"马邑之围"之后，匈奴拒绝与汉帝国和亲，而且开始频频出兵四处袭击边郡，以报复马邑之围，所谓"攻盗入边，不可胜数"，于是自此之后大汉帝国也结束了自高帝以来奉行的"和亲"政策，从而也拉开了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第二章　胭脂山

飞将末路



鏖兵漠北

——漠北决战和匈奴帝国的重创



角逐西域

——汉匈帝国眼中的"次要战场"

[illegible]

贰师兵团

——且鞮侯单于时代匈奴的反击

[illegible]

其实武帝登基之后，大汉在不断讨伐匈奴的同时，也曾多次派使节前往匈奴，但匈奴人却往往会扣留了汉使，于是汉朝也扣留匈奴使节以相抵。譬如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统十八万大军到北地，遣使谕告匈奴单于臣服，郭吉到匈奴后，晓谕单于归顺汉朝，单于大怒，遂扣留了郭吉。又譬如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匈奴派遣匈奴中身份尊贵人作为使者出使至汉，在汉突然病故，汉派路充国等送丧到匈奴，单于误以为是被汉朝杀死，扣留了路充国。史载，汉使前后有十余批人被匈奴所扣。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且鞮侯单于嗣位后，恐遭汉袭击，于是称“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尽归还路充国等原拘留之汉使。武帝赞许之，于是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并赠礼于单于，以答谢。苏武同副中郎将张胜及临时委派的使臣常惠等，并士卒、斥候百余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赠送财物给单于。可鞮侯单于却显得很是傲慢，很显然这不是汉所期望的。

此后，单于正要派使者护送苏武等人返回时，适逢缑王与虞常等暗中策划谋反。缑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儿子，曾与昆邪王一起投降大汉，后来随同浞野侯赵破奴讨伐匈奴，兵败而降。缑王与虞常等计划要劫持单于的母亲阏氏返回汉朝，由于虞常在汉时，与张胜有旧，故而他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朝皇帝很恨卫律，我能替汉朝用暗箭射杀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希望他们能得到汉朝的赏赐。”张胜答应了他，并送给虞常许多财物。

卫律，因其父为归顺大汉、居住在长安长水（浐水支流）附近的胡人，故而卫律自幼生长在汉朝，其少年时，与协律都尉李延年交好，受到李延年举荐出使匈奴，等到使团返回时，正逢李夫人死后李延年、李季兄弟因犯淫乱之罪被灭族，卫律怕被株连，便选择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喜爱他，史载，他常在单于左右，是为单于亲信。

趁着单于出外打猎，只有阏氏在，虞常等七十余人试图趁机起事，但事发之前，其中一人晚上逃走，向单于告密，于是事情败露，缑王等战死，而虞常被活捉。张胜听到这个消息，担心与虞常密谋之语被泄，于是就把情况告诉给苏武。苏武说：“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一定会牵涉到我。受到侮辱之后才死，将更加对不

起朝廷了。”于是便想要自杀，结果为张胜、常惠劝住。此后，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此事，众人认为当杀汉使。可左伊秩訾却说：“如果有人谋害单于，那又当如何加刑？不如将他们全部招降。”于是单于便派卫律召来苏武审问。

深陷困境的苏武对常惠等人说：“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有什么面目归汉！”说完拔刀自刺，卫律大惊，抱住苏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单于很是佩服这位汉使的气节，于是派人早晚探问苏武的病情，但也拘捕了张胜等人。

苏武的伤势渐好转之后，单于便开始派使者劝他投降，又以卫律审虞常，试图借此使苏武投降。史载，卫律在亲手斩杀虞常后，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近的大臣，罪当处死，但单于对愿意投降的人，可赦免其罪。”于是张胜请降。此后，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应当与他连坐。”苏武说：“我本来没有参与密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与他连坐？”

卫律说：“苏君，我之前背弃汉朝归顺匈奴，幸而承蒙单于恩德，赐给我王号，使我拥有部众数万，马畜满山，富贵如此。若苏君今日归降，明天也会这样。否则被杀，白白葬身于荒野之中，有谁知道你为汉朝而死？”见苏武不予理睬，卫律又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苏武痛斥到“你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廉耻，背叛君主和父母，投降蛮夷去做俘虏，我为何还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裁决他人的死生，你却不出于公心，主持平正，反而要使两国之主相互争斗，自己坐观成败。南越杀汉使者，被屠为九郡；大宛王杀汉使者，他的头颅已被悬于汉宫之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遭灭国。独匈奴未耳。你明知我不降，如欲令两国相攻，则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卫律知道苏武不可胁迫，于是将情况告知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时天降大雪，于是苏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他是神人，就将苏武迁至北海之上无人处，让他放牧公羊，称直到公羊产乳生崽，才可归汉。同时还把苏武与属吏常惠等分开，各置他所。由此，苏武开始了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生活。

得知汉使被扣押的消息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汉的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一称闿陵侯），率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率数万骑兵来救车师。汉军失利，退回。当年五月，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自酒

泉出发，进击匈奴右贤王。李广利率军前进至天山，与匈奴相遇，得首虏万余级而还。但在回师途中，汉军却为匈奴主力包围，史载，汉军乏食数日，死伤甚众。假司马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阵，贰师将军引兵紧随，最后方得突围。此战汉兵死伤十之六七，赵充国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将军回奏武帝，武帝召见赵充国，亲视其创，并拜为中郎。而同时出征的因杅将军公孙敖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邪山会合，无所得而返。而大军出征时，又有骑都尉李陵自请领五千步兵击匈奴，而由此引发了武帝一朝中影响一时的"李陵案"。

李陵的祖父是汉朝名将，有"飞将军"之称的李广，他的父亲是李广长子李当户，曾为郎官，勇武过人，但李当户早死，李陵为遗腹子。成年后，李陵入宫为侍中建章监，因为善于骑射，且对人有仁爱之心，谦让下士，故而名声很好。武帝因李家世代为将，又认为李陵有其祖父李广的遗风，便是让他率领八百骑兵越过居延海深入匈奴境两千余里，查看地形。尽管没有遇到匈奴，但李陵的初次出征却使得他受到天子的格外信任，武帝随后将他升为骑都尉，率从丹阳郡招募来的五千屯楚兵驻于酒泉、张掖，教习箭术以防匈奴。

太初二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万里长征持续数年之久，汉军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以至于出现了辎重自大宛一路相连至敦煌的情形。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陵接到诏书，天子要求其率五校兵作为贰师将军的后续大军，向西进发。然而当李陵率五千汉军行至边塞时，却得知李广利已经得胜回军，而皇帝又诏令李陵以大军留屯原地，而率五百轻骑出敦煌，至盐水，迎接李广利回师。在接应李广利大军返回后，李陵率部退回张掖，驻屯在当地，训练屯卒。

此番李广利统领三万骑兵出酒泉，武帝在未央宫武台召见李陵，欲使之为李广利大军运送粮草辎重，然而李陵却并不愿意。他称自己所率屯边将士，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可缚虎，射必中的，望能自成一军独当一面，至阑干山南以分匈奴主力，使之无法集中力量威胁到贰师将军所率的大军。汉武帝认为李陵是不情愿担任李广利的裨将，于是推说征发大军太多，没有马匹拨给李陵。可李陵却说"不须给马匹，臣愿以少击多，只用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很显然，李陵的这番表态让武帝很是欣赏，不需要骑兵，用五千材官便横扫单于王庭，虽然李陵的这番话语多少有些自以为是，但汉武帝还是同意了他的出兵请求，并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领兵在途中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曾为右北平太守，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随霍去病北征匈奴，立下战功，官拜邳离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谋反，杀害汉朝使者及南越王、王太后。汉武帝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又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浈水，同时以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越人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同时皆将罪人，江、淮以财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则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军进击岭南，十月，平定叛乱，灭南越国，后将其属地岭南、交趾和海南诸地分置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在海南。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路博德为强弩都尉，筑居延塞，称“遮虏障”。 后沿弱水岸筑长城接酒泉塞，遂成为历代屯兵设防重镇。后置居延县，为张掖郡都尉治所。此番皇帝要求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军，以作侧应。可路博德曾为伏波将军，并且立功封，论资历与经验都在李陵之上，故而不甘为陵之后距，于是其奏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这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刚进秋季正值匈奴马肥之时，不可与之交战，臣希望能等到春天时再与李陵各领酒泉、张掖五千骑从东西并击西浚稽山，到时必将获胜。”

汉武帝见此奏章，“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从这段文字来看，汉武帝见路博德的上表后，心里怀疑李陵是怯战才串通路博德上此奏书的，传诏训斥路博德：“我想给李陵马匹，他却说什么‘要以少击众’，现在匈奴侵入西河，速带你部赶往西河，守住钩营之道。”很显然，皇帝在下诏训斥路博德的同时，明确要求路博德进军钩营，截断入侵西河的匈奴军的退路，而又传诏李陵：“应在九月发兵，应从险要的庶虏鄣出塞，到东浚稽山南面龙勒水一带，徘徊以观敌情，如无所见，则沿着浞野侯赵破奴走过的路线抵受降城休整，将情况用斥候回朝报告。至于你与路博德说了些什么？一并上书说清楚。”也就是令李陵九月出塞至东浚稽山，刺探匈奴的行踪与虚实，然后撤退返回，派遣轻骑汇报见闻，同时明确要求李陵交代所谓的和路博德私下串通之事。

接到皇帝的严旨后，李陵只好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大军向北行军三

十日，到浚稽山下驻营，而后将沿途所经的山川地形绘成地图，派遣麾下部将陈步乐送至长安，回朝禀报。皇帝召见陈步乐，陈步乐称李陵治军有方，将士死力效命，于是汉武帝很高兴，陈步乐为郎官。

可就在这时候，正在浚稽山的李陵所部却陷入到了一场危机之中，其部与匈奴大军遭遇，被三万骑兵所围。李陵率军驻屯在两山之间，以大车作为营垒，随后领兵出营垒列阵，前排士卒持戟、盾，则后排军士手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 匈奴见汉军人少，径直扑向汉军营垒。结果李陵挥师搏击，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死伤惨重，大败之下，匈奴军败窜上山汉军追击，杀匈奴兵数千。

很显然，此战中，汉军的强弓劲弩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弓箭早在蒙昧时代就出现了，是人类渔猎的重要武器，弓必须依靠射手的臂开张，只能即拉即发，而弩由于弩机和弩臂的作用，使开弓和发射程序可以分隔开来，除了臂张之外，还可以用撅张、腰引或多人的力量来开弓，弩弓的射力更大、射程更远，杀伤力也更大，而且射手在捕捉攻击目标时可以借助望山从容进行瞄准操作，故而其命中率也更高。

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古史考》记有“黄帝作弩”的传说，《吴越春秋》则记载了楚琴氏“横弓着臂，施机设枢”，称“弩是羌人攻围赤亭时，虞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夭震，退”。此外为了增强弩矢的杀伤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毒药傅矢”之术，也就是所谓的“毒箭”。自战国以来，由于弩在步、骑作战中的效用越来越大，故而秦汉时候，弩已经成为军中不可缺少的武器。汉时，汉军、郡国兵中的“材官”有设置有“撅张士”、“射士”、“迹射士”，此外还有“强弩将军”、“强弩司马”、“强弩都尉”等职。

史载汉代的步卒多出自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这些地方“多材官”，以擅射、能博而出名，而李陵所率五千材官皆招募自丹阳郡。史载，所谓的丹阳郡，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41年），更秦鄣郡为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郡以境内丹阳县（今安徽当涂县丹阳镇）而名。此谓“汉郡”。领宛陵县（今安徽宣城）、秣陵县（今江苏南京）、丹阳县（今安徽当涂）、江宁县（今属江苏南京）、江乘县（今江苏南京栖霞区大部分）、溧阳县、胡孰县（今属江苏南京）、於賛县（今属浙江）、春谷县（今安徽铜陵）、故鄣县（今浙江安

吉）、泾县（今属安徽）、石城县（今属安徽）、陵阳县（今安徽青阳）、芜湖县、黝县（今安徽黟县）、宣城县（今属安徽）、歙县（今属安徽）、句容县（今江苏句容）等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设刺史部十三州，丹阳郡属扬州。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吴越之地，而吴越又以步兵而闻名天下。三国时，此处以“丹阳兵”而闻名，袁术曾经以“此地精兵辈出而闻名”来评价丹阳，那些出身于丹阳一带的精壮兵士为各路诸侯所竞相招募，譬如长沙孙坚为荆州牧刘表的部下黄祖所杀后，其子孙策就曾在投奔自己的舅父、时为丹阳太守的吴景时，招募五百丹阳兵，继而去依附袁术，后建立功业。三国末年，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曾率丹阳锐卒、刀楯五千，三冲晋兵，可谓是名噪一时。

此番匈奴人在这五千汉军面前自然不占上风了，史载“单于大惊，召集左右地八万多骑合力进攻李陵军”，也就是大惊之下，单于召集左贤王、右贤王部八万多骑兵一起围攻李陵。面对强敌，李陵率部向南且战且走，数日之后被困在一处山谷中，此时由于连日苦战，汉军损失也很大，很多士卒中箭受伤，于是李陵他下令三处受伤者便用车载，二处受伤者驾车，一创者则继续作战。被围之下，李陵发现士气低下，故而心疑军中藏有女人，于是称“吾军士气不如前，又鼓不起来，是何原因？莫非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当初大军出发时，关东群盗妻女徙边者，多随军为卒妻妇，这些女人大多藏匿在车中。于是李陵下令将藏在随军车辆中女子尽皆搜出，全部斩杀。次日再战，汉军果然斩匈奴首三千多。随后李陵引兵向东南而去，大军沿着龙城旧道行军四五日，为大泽所阻，匈奴人在沼泽边上的芦苇地里放火，试图以火攻，而李陵也命令军中放火，烧出一片空地以自救。此后，汉军继续南行，至一山下。单于在南山上，派遣其子亲率骑兵向汉军发起冲击，李陵军利用地形与匈奴人在树林中展开步战，又杀匈奴兵数千，并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山退走。

这一日的苦战后，李陵捕得俘虏，从他口中得知匈奴军中情况，俘虏供称：单于认为这是汉军精兵，久攻不能拿下，却日夜向南退走，定是要把匈奴大军引到塞边，如果汉军设伏，那么匈奴大军将会陷入困境，所以不应该再继续追此路汉军了。但其他匈奴贵族则认为，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无法消灭汉军，那么会使匈奴在周边小国中的威信扫地，也使汉人越发轻视匈奴。所以应在山谷间继续猛攻汉军步军，如果还是不能击溃汉军，那么到那时便只能退兵。因为在此山谷之中，即使不能破敌，返回也来得及，毕竟这里距离平原还有四五十里地。

于是这一日，李陵军处境更加险恶，众多匈奴骑兵猛攻数十次，鏖战彻日，匈

奴兵又死伤二千余人，见不能取胜，匈奴军遂准备撤走。恰逢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被校尉所辱，遂逃出投降了匈奴。此人出卖了李陵及自己的袍泽，其对匈奴单于说，李陵军并无后援，且箭矢已尽，只有李陵将军麾下和成安侯韩延年麾下各八百人排在阵式前列，两军分别以黄白二色作旗帜，只需派精兵射杀旗手即可破阵了。单于得到管敢，大喜，命骑兵合力攻打汉军，同时截断汉军退路。当时李陵所部处在山谷底，于是匈奴军依仗山势，居高临下，一时间矢如雨下。汉军坚持南行，未等冲到鞮汗山，一日之中，便将五十万支箭全部射光，随后汉军便丢弃战车继续南撤。当时，李陵军还有三千余人，但由于缺乏箭矢，于是一些没有刀矛的士卒只能斩断车轮辐条、军中的文吏则手持用来削刮简牍的尺刀，将士抵山入峡谷。匈奴人自在险要处投下垒石，汉军伤亡惨重，很多士卒被砸死砸伤，大军遂不能前进。

日落黄昏后，李陵换上便衣独步出营，拦住左右说：“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过了很久，李陵绝望地回到营中，叹息说：“兵败如此，惟求一死！” 有军吏劝他可以效仿当年浞野侯赵破奴，即使被匈奴俘虏也应先保全性命，然后寻求机会返汉，其称“将军威震匈奴，陛下不会让您死，以后可想别的办法回去，像浞野侯（赵破奴）虽被匈奴俘获，但后来逃回去，陛下仍以礼相待，何况对将军您呢！”可李陵却说“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拒绝之，并下令将旌旗砍断。在长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后，李陵令大军解散，军士人持干粮二升，大块冰，期约定在边塞遮虏鄣会合。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随后，李陵与成安侯韩延年各自上马，率十余名士卒冲出重围，匈奴数千骑兵紧追，韩延年战死。而后，李陵长叹：“我无脸面去见陛下呀！”于是下马投降。而四散逃离的汉军逃回塞内的仅四百余人。

李陵兵败之处离边塞只有百余里，边军很快获得消息并传回了长安。消息传来之初，李陵生死不明，武帝猜测李陵已战死，就把他母亲和妻子召来，便召相士来观察李陵的家人以确认李陵的生死，却发现其家人都没有死丧的面相，这意味着李陵还活着。后来得知李陵已降匈奴，武帝大怒，责问事前称颂李陵的陈步乐，羞愧之下，陈步乐自杀。

当时朝中大臣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解，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

下”。由于当时除了李陵军的东线作战溃败之外，与右贤王交战的李广利军也在回师时，被匈奴大军围困，险些全军覆灭，于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想借李陵之功诋毁贰师将军，是试图以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而在这之前，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不过汉武帝倒也不是仅以怒而判事，皇帝很后悔自己不该催李陵出兵，同时悔悟到李陵军覆灭，是无救援所致，天子称李陵出塞之时，本来诏令强弩都尉接应，只因受了这奸诈老将奏书的影响又改变了诏令，才使得李陵全军覆，于是便派使者犒赏自塞外而回的李陵残部，同时心有不甘的汉武帝又在国内大规模征发，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六万骑兵、七万步兵出朔，又以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领骑步兵三万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军三万出五原，三路并击匈奴。又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领步兵万余人接应李广利军。其中公孙敖所部需深入匈奴腹地“以迎李陵”。

匈奴得知后，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十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十余日，不分胜负，李广利引兵而回，而韩说所部则无所得，至于公孙敖部，则因与左贤王战，损失士卒众多，见战局于己不利，于是收兵而回。

无功而返的公孙敖，为了避免罪责便对武帝谎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这也就是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无法接应他。武帝大怒，下诏夷灭李陵全，其母亲、兄弟和妻子尽皆被诛杀。而李氏本是陇西有名望的大族，此番之后，陇西一带士人都以李陵不能死节而累及家室为耻。

据载，此后汉匈再次通使，有汉使到匈奴，李陵责问汉使“我为汉朝领步卒五千横扫匈奴，因无救援而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为何要杀我全家？” 使者说：“陛

下听说李少卿在为匈奴练兵。”得知缘由后，李陵表示为匈奴练兵的不是自己，而是投降匈奴的汉军塞外都尉李绪，李绪本是率部驻屯奚侯城，后匈奴来攻，因为怕死，故而便投降了匈奴。因为愤恨自己全家因其被杀，于是李陵派人刺杀李绪。匈奴大阏氏震怒之下想要杀掉李陵，单于只好把他派到北方藏起来，直到大阏氏死后方才将之召回。

很显然，当初武帝夷灭李陵全族，是令李陵伤心欲绝的，从此彻底断绝了回归汉朝的想法。单于很看重李陵，把女儿嫁给他，立他为右校王，立卫律为丁灵王。根据《汉书》记载，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二人素来与李陵很好，于是以李陵故友陇西人任立政出使匈奴，试图招李陵归汉。任立政等到匈奴后，单于置酒款待，李陵、卫律都在座。他们虽见到了李陵，但不能私下讲话，便用目光向李陵示意，又几次把佩刀上的环弄掉，趁捡环时握住李陵的脚，暗示他可以归汉。此后李陵、卫律备牛酒慰问汉使，一起博戏畅饮，他们都穿着匈奴的服装蓄着匈奴发式。他们不仅接受了匈奴的官职与婚姻，也接受了他们的文化，改换自己的服装习俗，彻底地融入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之中。任立政大声说：“汉已大赦天下，国内安乐，陛下年少，由霍子孟、上官少叔辅政。”很显然，任立政试图以此言使李陵动心，但李陵沉默不语，而是不经意地摸着自己的头发说：“吾已胡服矣！！”而后，卫律起身更衣，任立政说：“少卿，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让我向你问好。”李陵说“霍公与上官大人可好！”　任立政叹息道：“他们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李陵小声对任立政说：“少公，我回去容易，只怕再次蒙受耻辱，奈何！”话未说完，卫律更衣而回，颇闻余语，于是说：“李少卿是贤能之人，大可不必只在一国居住，当年范蠡遍游天下，由余从西戎到秦国，今日还谈什么故国之类。”说罢告辞了。而任立政目瞪口呆，随即对李陵说：“你也是这个意思么？”李陵言：“大丈夫不能反复无常，再次蒙羞。”于是拒绝归汉。史载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大概是在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时病死。

根据史料的记载，李陵在匈奴时，曾与苏武有过接触。当初，苏武与李陵都为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但一直以来，他都不敢访求苏武，而苏武自到北海后，没有粮食，只能掘野鼠所储藏的果实为食，但就算这样，他也依然不肯屈服。史载，苏武手持汉节牧羊，起居都拿着，以致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数年之后，单于的弟弟于靬王到北海打猎时，见苏武会编结打猎的网，矫正弓弩，于是颇为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品。三年后，于靬王大病，自知不起，乃

赐苏武马匹、牲畜、服匿、穹庐，后于靬王死，其部族便是尽皆迁离。这年冬天，丁令人盗去了苏武的牛羊，于是苏武又陷入了穷困。

也就在这个时期，单于派李陵去北海，为苏武设酒宴和歌舞。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和子卿你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说你，他真心希望你能成为匈奴的臣子。你到死也不能归汉，白白在没有人的地方让自己受苦，即使坚守信义又有谁能看见呢？先前长君（苏嘉的字）做奉车都尉，随从圣驾至雍的棫阳宫，皇帝扶辇下除，撞到柱子折断车辕，被指控为大不敬，伏剑自刎，皇帝赐钱二百万作为丧葬费。孺卿（苏贤的字）随从圣驾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把驸马推到河里淹死了。宦骑逃亡，皇帝下诏让孺卿追捕，没抓到，孺卿惶恐服毒自杀。我来的时候，你的母亲已不幸去世，我送葬至阳陵。你的妻子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只有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从你离家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人生如朝露一般短，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这么久的苦呢！我刚投降的时候，也痛苦的像发疯一样，恨自己背叛了汉朝，你不想投降的心情，难道比得过我当初？况且陛下年事已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被杀、被灭族的有数十家，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你还顾得上别人么？请听从我的建议，不要再说别的了。”

然而苏武不为所动，他称自家历代受国家恩养，都是因为陛下才能位列将帅，获爵封侯，兄弟为近臣，子事奉君主，就如同儿子事奉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遗憾的。此后，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 苏武却说：“我早就已经死了！右校王（李陵在匈奴的爵位）如果一定要让我投降，就请停下今日的欢宴，我直接死在你面前！”李陵见苏武如此真诚，喟然长叹道：“真是义士啊！我和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说着眼泪直流，浸湿了衣襟，诀别苏武而去。此后，李陵自觉无脸亲自送礼物给苏武，让他的妻子送给苏武几十头牛羊，以使之能够不再苦寒。后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区脱地区捕得云中的活口，说太守以下的吏民都穿着白衣，说皇帝驾崩了。”苏武听了，向南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数月之久。

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昭帝即位，匈奴和汉朝达成和议。汉朝寻求苏武等，匈奴谎称苏武已死。后汉使又到匈奴，常惠面见了汉使后，将这十几年在匈奴的情况告知汉使，并对汉使说，只有对单于称“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听后，大喜，照常惠所说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身边的人非常惊讶，向汉使道歉说：“武等实在。” 于是乃放归苏

武。

与苏武相别时，李陵设酒筵以待，他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言罢，李陵起舞，唱道：“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说罢泪下纵横，乃与苏武诀别。

此后，单于召集苏武的属下，除了已经投降匈奴和死在匈奴的，随苏武归国者，仅有九人，匈奴乃使之归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被扣留匈奴长达十九年之久的苏武回到长安。昭帝诏武奉一太守谒武帝园庙，官拜为典属国，俸禄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都官拜中郎，赐丝绸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因年老而返乡，各赐钱十万，终身免徭役。不过苏武却将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于是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刘旦、鄂邑公主谋反，苏武之子苏元因参与阴谋，而被处死，但苏武却并没有被卷入其中。

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宣帝即位，此时苏武年事已高，宣帝怜其无后，于是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苏武通过平恩侯许广汉向宣帝陈述：“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宣帝许之。后苏通国随汉使回汉朝，宣帝命其为郎。从这里来看，苏武在匈奴时，和李陵一样，也是娶有匈奴女，并生子的。

因苏武持节牧羊十九年，而不背汉，故而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而李陵，则以一个悲情人物的形象留名于史书之中。蔡东藩先生曾经评论苏武与李陵，称“苏武去使，已为多事，若李陵部下，只五千人，身饵虎口，横挑强胡，彼即不自量力，冒险轻进，武帝年已垂老，更事已多，安得遽遣出塞，不使他将接应，而听令孤军陷没耶？苏武不死，适见其忠；李陵不死，适成为叛。要之，皆武帝轻使之咎也。武有节行，乃使之困辱穷荒；陵亦将才，乃使之沈沦朔漠。两人之心术不同，读史者应并为汉廷惜矣。”

第三章 青冢怨

丧师于野

——狐鹿姑单于时，匈奴的情况

自漠北之战后，匈奴势力日益衰落，史载漠北之战给匈奴以惨重打击，甚至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并西迁。而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开疆辟土，建城修塞，于是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强大而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而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即印度）、于阗、扜罙、犁轩等诸国，沟通了西域与帝国，而且还使得匈奴进一步被孤立，这种情况下，匈奴虽然有心改变自身的处境，但在大汉的赫赫武功前，却是徒劳挣扎罢了。

汉武帝时，大汉国力强盛，汉军不仅大破匈奴，而且远征大宛，降服西域，在那个时候，汉军所向，尽皆披靡。南越、闽越、夜郎、朝鲜诸国尽皆为汉所灭。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南越内乱，王相吕嘉杀南越哀王赵兴、樛太后和汉使辩士谏大夫终军，破韩千秋军，武帝大怒，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兵分五路沿水道征讨南越，次年亡灭南越，分其土为立南海、儋耳、珠崖、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秦末时由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所建而成的南越，就这样成为了被汉所灭的第一个国家，而同年秋，汉军又出兵讨伐闽越。

其实早在武帝登基之初，武帝就曾遣兵攻闽越，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于是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兵，前去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便撤兵而退。东瓯王因担忧闽越再攻，于是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内附，史载，东瓯四万多人迁移庐江郡后，东瓯之地遂为闽越占有。但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时，闽越王郢又举兵于冶南，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征讨闽越。大军压境下，闽越王派兵扼险抗汉，结果郢弟余善与宗族合谋杀郢，请免交战，于是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于是封余善为东越

王，与越繇王并处。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时，余善亦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于是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各路汉军进至东越境内，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更是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繇王居股遂与建成侯敖合谋，杀余善降汉。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诏命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闽越遂亡。

此后，汉武大帝又将目光投向了川地，建元六年时（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此后，因蜀郡之西的邛、笮（西夷）部纷纷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而又有“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故而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十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时，大汉开始全面开拓西南夷，当元鼎六年，平南越时，汉军趁势“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接着又诛反汉的邛君、笮侯，汉军威势之下，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于是大汉便“以邛都为粤（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之地完全纳入大汉帝国的统治之下。

而后，汉又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激烈对抗，于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下诏，出兵击灭劳浸、靡莫，继而“以兵临滇”，这种情况下，“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大汉王朝基本上将西南夷故地纳入帝国的疆土。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东北方向，汉廷也展开了经略。也就是说，根据考古所得，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原始人类居住，而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五十万年，公元前十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四世纪进入铁器时代。而至于朝鲜族人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目前韩国官方采用传说檀君古朝鲜为韩国与朝鲜历史开端。不过所谓的“檀君朝鲜”其实不过是一个关于朝鲜人起源的神话传说，是后世朝鲜半岛对传说中檀君所建立的国家的一种称呼而已。自从高丽以降，史学家对檀君故事向来持有怀疑态度，普遍认为檀君故事纯系神话传说，不可视为信史，更不可写入正史。因为首先，故事本身荒诞不经，毫无事实根据。而朝鲜半岛的历史大概最早应该从“箕子朝鲜”开始算起，而朝鲜半岛自武王灭商，遗

臣箕子率五千商民东迁，建立“箕氏侯国”以来，便与中国有着割不断、剪不断的联系了。

箕子受封建立朝鲜箕氏王朝后，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转眼八百年过去了，中原已经大乱，经历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统一及二世大乱后，汉高帝刘邦于长安建立大汉帝国，高帝十一年燕王卢绾反，次年，事败，将军卫满出奔“箕子朝鲜”，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汉人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

后来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卫氏王朝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与西汉燕地相邻。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不使汉朝边境受到侵犯；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而卫满对于秦末的中原大战仍然心存余悸，因而在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并不主张重回故里。他选择了亲近汉朝的策略，向惠帝、高后上表，愿意永为外臣，在朝鲜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过自己的日子。

有了西汉藩属外臣的身份和汉廷的军事、经济的支持，卫满便开始不断地侵凌和征服临近小邦，真番、临屯都主动前来归顺，卫氏政权的势力因此迅速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卫满逝世，正当壮年的卫蒙继承了他的位置，此时的大汉朝正是汉文帝当政，政局平和，国力日益强大，而匈奴则出现了不世明君——冒顿单于。此时的汉朝对匈奴采用的是和亲策略，尽量避免和匈奴的冲突，两国尚算得上和睦。卫蒙虽然年

轻气盛且野心勃勃，但是在这两大强大的邻邦的压制下，也只能采取两面交好，从中牟利的策略。每每乘着这两方不注意时，悄悄收服邻近的一些小国。等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成为朝鲜王时，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政权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元朔元年，朝鲜半岛小番君南宫等，因不满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众二十八万归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

元封二年，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卫右渠的具体回复如何不详，汉史称“终不肯奉诏”，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随从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诡称“杀朝鲜将”，并飞报汉武帝以邀功。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嘉勉他的冒险精神，并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这便是著名的“涉何事件”，涉何的荒唐和卫右渠的愚蠢，使之成了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渤海，同时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水陆两路击讨朝鲜，次年，陷其都城王俭城，卫右渠被他的部下所杀，卫满朝鲜灭国。大汉在原来的卫满朝鲜的土地上设立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

至此，帝国疆土东抵日本海，南吞交趾，西逾葱岭，北达阴山，汉地范围囊括千里。这种情况下，匈奴且鞮侯单于虽然一度试图努力复兴匈奴，但显然大汉并不会坐视匈奴复兴。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而大汉为缓和彼此关系，同时着力经营西域，于是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活苏武后，试图招降苏武，苏武不从，于是被流放于北海，十九年方才归汉。此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于是汉因欲借其势慑服匈奴，于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遣李广利将兵三万出酒泉击右贤王。此战，李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回师途中却被匈奴大军围困，险遭覆灭，而配合李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所率五千材官则全军覆灭，李陵兵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7年），复使广利领大军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出五原，公孙敖出雁门，结果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北，自统兵十万列

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十余日，不分胜负，汉军遂退。然而此战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其子继位，是为狐鹿姑单于。

就在此时，大汉帝国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巫蛊之祸”。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正月戊寅时，丞相石庆薨，武帝欲拜公孙贺为三公之首，因自汉高帝以来，丞相皆用列侯任之。故武帝于闰三月丁卯封公孙贺为葛绎侯，并诏其续任丞相之职。然而当时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对大臣的要求及监督非常严格。自丞相公孙弘老死任上之后，李蔡、庄青翟、赵周皆因罪自杀，前任石庆虽秉承其家严谨作风，亦数次受到武帝谴责。公孙贺害怕自己不能担此重任，一旦有所纰漏恐将祸延于身，不肯受丞相的金印紫绶，见武帝生气后才不得已拜受。但公孙贺升任后，太仆之位空缺。于是，武帝又将自己的外甥、时为侍中的公孙贺与卫皇后姐姐卫君孺所生之子公孙敬声擢升为太仆，由此，公孙一氏颇为皇帝所宠。

可是公孙敬声居九卿太仆之高位，但其凭借着母亲卫君孺是皇后的姐姐，行事骄奢不守法纪，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公孙敬声擅用北军军饷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之后，公孙敬声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下诏欲抓捕的阳陵人朱安世却迟迟未能归案，公孙贺便请命此差以赎公孙敬声的罪过。武帝答应此请。

朱安世下狱之后，出于报复，在狱中上书诬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于是公孙贺父子皆下狱死，此事还牵连阳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另一个女儿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平侯卫伉。史载，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其实武帝天汉年间，大汉帝国境内正在流行疫病，而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由于当初大汉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进讨，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巫术。而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而疫病也随得胜归来的王师传回长安。当初冠军侯霍去病在24岁的青壮之年早夭，一种说法也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而从张华《博物志》记载的“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来看，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之下，长安已经不能幸免，乃至于宫中都有疫

病，汉宫之中，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所谓“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了。《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而晋灼注：“搜‘巫蛊’也。”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巫蛊之案。

其实公孙贺家不是第一个倒霉的，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就在太始元年春正月，坐妻为巫蛊，而被腰斩。此后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于建章宫时候，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缉拿。然而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候处死。冬十一月，汉武帝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天后解除戒严。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公孙贺案。

然而公孙贺案发时，由于武帝已染病，史载“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故而皇帝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其为澎侯，让其与御史章赣来处理此事，而参与此案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龃龉，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由于在任上时，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史载当时，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此时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的武帝之所以任用江充等人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是因为当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被杀数百人。而有一次，皇帝在白天小睡时，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

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于是认为自己被诅咒了，而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担心皇帝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根据《汉书·江充传》的记载："（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而江充 "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这些"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史载，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守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对此《汉书》记载为："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祝，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案子越查越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而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于是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地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对此，《汉书》颜师古注引记载：《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醊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想要面见当时正在甘

泉宫养病的汉武帝，但是每次都被江充和黄门内侍苏文的手下挡了回来。苦于无法自辩之时，太子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于是太子刘据亲自监杀江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并将江充手下的巫蛊术士尽皆烧死在上林苑中。

此后太子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禀告卫皇后，又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反"。然而百密一疏，苏文却是侥幸脱逃，其至甘泉宫，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是使者不敢进长安，于是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信以为真的武帝大怒，便派遣丞相刘屈牦发兵镇压。

史载，太子杀江充时，丞相刘屈氂闻变，挺身逃，连丞相的印绶都丢掉了，他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汉武帝。汉武帝问道："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未敢发兵。"但天子却是大怒，称："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于是乃赐丞相玺书，并授意"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长安城内作战，应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兵卒。同时应该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长安城！"

而与此同时，太子在长安城内也宣言告令百官"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但此时，汉武帝已自甘泉宫返回长安，在城西建章宫中诏发三辅附近各县的兵马，部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兼职统辖。而太子则派使者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辖；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此时，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故对胡人们说"节有诈，勿听也！"继而将如侯斩首，又引胡骑入长安，并发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统帅。当时汉节是纯赤色，所以太子持赤节，而

皇帝所发的符节上，则改加黄旄加上以相别。

此后，太子刘据来到北军营门之外，站在车上，将监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协助，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于是刘据带人离去，纠集长安四市数万人，于长乐宫西门外与丞相刘屈氂所率大军相遇，双方鏖兵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由于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人不附太子，而丞相则附兵浸多。

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刘据与汉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刘据得以逃出城外。刘屈氂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刘屈氂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刘屈氂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令，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此后，武帝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亦因不能自明而以死明志。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将卫皇后葬在城南桐柏。

而任安在这次动乱中采取观望态度，既不应太子，也没有出兵平叛，这种对朝廷怀有二心之人不可留，于是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而马通因擒获如侯，被封为重合侯。而众太子宾客一律处死，此外凡是跟随刘据发兵谋反的，全部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

此时皇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这话的意思是说，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又说“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

待罪于建章宫外。）

汉武帝见到上书后有所醒悟，并有悔意，但却未赦免太子。而此时，太子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一户贫穷人家，户主常卖屦以奉养刘据。当时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刘据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县令李寿和官卒张富昌率众前围捕太子，刘据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而户主则与两位皇孙在搏斗中一同遇害。此后，李寿、张富昌两人随后带着刘据尸体进京领赏。汉武帝感伤于刘据之死，便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当时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而且汉武帝也颇知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他意。此时，看守太庙的郎官田千秋正在此时上书讼太子冤，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失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子擅弄父兵器，其罪仅止于笞刑。太子有误杀人，是什么罪呢？臣梦见一白发老人对臣所言）。”武帝大悟，于是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在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的同时，皇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氂全家，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尽皆族灭。

此后，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很显然，戾太子一案极大刺激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平反太子案的同时，转手报复当初参与谋害太子的丞相刘屈牦等人，却也带来了汉军的一场大败。

史载：“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就在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伐匈奴后不久，内侍郭穰密告丞相刘屈牦夫人诅咒汉武帝，并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后刘屈牦被腰斩于东市，其妻则是枭首华阳街，李广利妻子被下狱。

最初，李广利对京中情况并不知，匈奴狐鹿姑单于听闻汉军重兵压进，于是将匈奴的辎重尽数徙往赵信城北面的郅居水，而左贤王也将部落迁徙至余吾水六七百

里外的兜衔山下。单于本人则率精兵在姑且水（乌兰巴托西南）列阵以待。

与此同时，御史大夫商丘成走疾道，未见匈奴军而返。匈奴使大将与李陵率三万余骑追击商丘成军，至浚稽山，与商丘成转战九日，汉兵攻破匈奴，斩首众多。战至蒲奴水，匈奴军见战局于己不利，收兵而回。而重合侯莽通则率四万骑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二万余骑对阵汉兵，但是见汉军兵强马壮，于是收兵避战。莽通无所得失。可是途经车师北时，由于担心车师国阻碍，莽通遂令开陵侯成娩率军中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六国兵，攻车师，以扫除大军前进的障碍。于是六国兵将车师团团包围，车师投降，臣属于汉，此路大军俘车师国国王和大量民众而回。

而李广利亲率的大军则与匈奴主力大战，史载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五千骑兵在夫羊句山狭备战汉军，李广利遣属国胡骑二千与匈奴军接战，匈奴败退，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击至范夫人城，匈奴四散奔逃，不敢与汉军对抗。但也就在此时，李广利听到家中妻儿因巫蛊被捕收监的消息，既忧又怕的李广利出于恐惧，竟以数万汉家儿郎的生命为赌注，盲目进军，以求侥幸，遂挥师北进，深入匈奴，直至郅居水。此时匈奴大军已离去，李广利遂以护军率领二万骑，渡过郅居水，继续向北进军，一日，汉军与匈奴左贤王相遇，两军接战。汉军大胜，杀匈奴左大将，斩首众多。

此时，长史决眭都尉煇渠侯密议，认为李广利不惜全军安危以求立功赎罪，恐怕必然招致失败，于是便暗中策划将李广利扣押起来，以阻止其盲目冒险。李广利觉察了长史的策划，将之斩首，但恐怕军心不稳，发生骚乱，便率军由郅居水向南撤至燕然山。匈奴单于知汉军往返行军近千里，已很疲劳，便亲自率领五万骑兵袭击汉军，汉军死亡甚众。

李广利原想冒进，立功赎罪，却遭此大败，心情自然更沉重，又忧虑着家中老少的性命，一时间更是慌乱。结果匈奴趁汉军不备，于夜间在汉军营前悄悄挖掘了一条壕沟，深数尺，而后自后对汉军急击之。汉军遭匈奴军袭击，想出营列阵抵敌，却发现军营前有一条深沟，进退不得，军心大乱，遂惨败，眼见七万汉家儿郎就这样全部葬送，李广利不得不选择了投降。

史载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狐鹿姑单于知道他在大汉身居高位，便将女儿嫁给他，对他的尊宠甚至超过了卫律。消息传到汉廷，武帝将囚禁的李广利妻儿家人，悉数诛杀，灭其全族。此后，由于卫律见李广利恩宠在自己之上，故而心生嫉

妒，欲加害李广利。一年之后，卫律趁单于母阏氏生病的机会，遂买通巫师，让巫师谎称病因是因为先单于过去出兵攻伐汉时，曾发誓一定要捉住贰师将军李广利用来祭神，而今李广利已在匈奴，为何不杀了祭神？现在先单于正发怒责问此事，故而降罪于阏氏。单于对巫师的话信以为真，便将李广利杀掉，用以祭神。

史载，李广利原以为用屈膝投降可以换一条命，屈辱偷生，苟安于世，结果却遭此下场，因而临死时，怒骂道："我死必灭匈奴！"其死后，匈奴接连数月雨雪不断，家畜死亡，百姓疫病不断，种植的黍稷也无法丰收，心惊不已的单于于是为李广利立祠室以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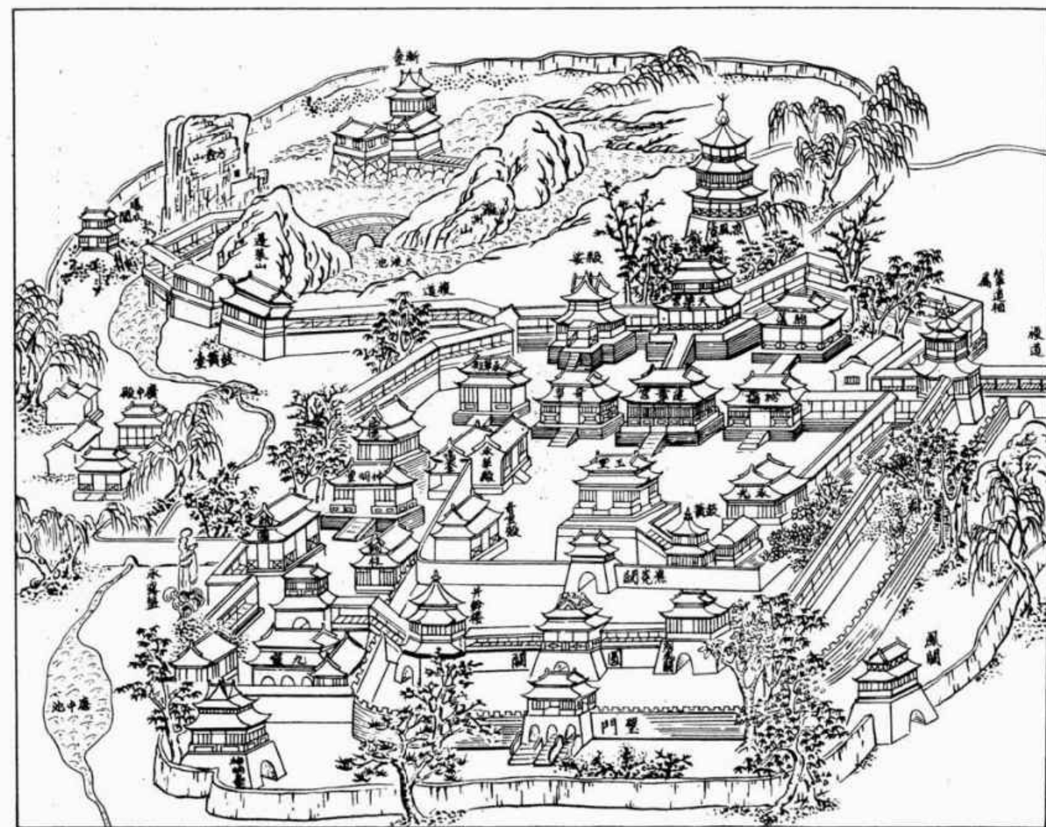
自从李广利兵败投降，汉军丧师七万以来，匈奴的情况的确有所好转，至少匈奴在大汉的咄咄兵锋下，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武帝末年时，匈奴与大汉之间的情况趋于稳定，而西域的情况也有所稳定，当初匈奴闻楼兰降汉，遂发兵出击楼兰。楼兰不敢抵敌，只好分遣王子入质西汉与匈奴，向两面称臣。李广利征大宛时，楼兰受匈奴指使欲发兵袭取汉军后队，被汉军发觉。汉将正任文领兵从小道袭取楼兰，擒楼兰王。楼兰王诉苦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汉武帝体谅其处境，放他回国。以后匈奴不甚亲近楼兰。但在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楼兰国遣使来接在汉为质的王子回国即位。但由于楼兰王子在汉朝时经常触犯刑律，已将其处以宫刑，故而不便送其回国，乃找借口，拒绝楼兰之请。于是楼兰改立他人为王。后楼兰王又死，匈奴抢先将楼兰质子安归送回国即位。朝遣使诏令新王入朝觐见，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同时也是先王之妻妾、王之继母，劝说楼兰王：“先王遣了两个质子入汉都不见回来，你怎么能去呢？”楼兰王听从了她的计策，于是谢绝汉使说：“我新立为王，国家形势尚未稳定，愿待后年入朝拜见天子。”楼兰国的东陲与大汉接壤，有沙漠名为白龙堆，此处，水草匮乏，汉朝便命楼兰负责汉使和途经汉朝商队的粮食和饮水，后来楼兰却仰仗匈奴的支持，数次出兵攻劫、袭杀汉使。楼兰王弟尉屠耆投降了汉朝后，将这些情况都报告给了汉廷。至此，楼兰彻底倒向匈奴，继续拦截攻杀汉使，成为了匈奴的耳目，致使西汉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往来交通受到了很大阻碍。不过大汉帝国并没有出兵征讨，这是因为，此时的汉武大帝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的打击，而心灰意冷。这位皇帝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遂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汉家天下自此又逐渐归于和谐。

而自太子刘据死后，武帝迟迟不立太子，时为武帝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长安（显然意谋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仪之乡！”并惩罚燕王，削其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其实武帝并不是没有心仪的继承人，史载帝有意传位于幼子刘弗陵，但因其年幼母少，恐怕女主垂帘祸害国家，犹豫不决。后皇帝命内廷画工绘制“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奉车都尉霍光，于是左右群臣都知道汉武帝想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数日之后，刘弗陵的生母赵氏死。

传说赵氏天生握拳不能伸展，汉武帝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于是召见

她并将其手展开，展开后掌中握有一玉钩，因此被称为拳夫人，又称钩弋夫人，后被封为婕妤。关于她的死因，《汉书》和褚少孙在《史记》补记中记载的稍有不同。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汉武帝在甘泉宫修养期间，赵氏随侍在旁，因犯有过错，受到汉武帝的斥责，致使赵氏忧郁而死，赵氏死后就近葬于云阳。而褚少孙在《史记》里补记道，为了防止自己死后主少母壮、吕后之事重演，武帝又将刘弗陵的生母赐死，即所谓“防患女主乱政，立子杀母”。



汉 建 章 宫 图 （《关中胜迹图志》）

汉建章宫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笃，正式决定立赵国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命其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辅少主。第三天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而

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共同辅政下，大汉继续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国策，由此开始了中兴。

而就在大汉开始重整频繁的征战所带来的创伤时，匈奴却陷入了内乱中，在狐鹿姑单于在位时，匈奴内部就已经开始日趋腐败，各种内部矛盾开始层出不穷，由此开始分裂。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而废左贤王先贤掸为日逐王所引起，此后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很贤明，匈奴人都很敬佩他，故而担心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私下派人杀了左大都尉，此举致使左大都尉同母之兄对此十分怨恨，从此再也不肯前往单于王庭会盟。

后来狐鹿姑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族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之所以遗嘱如此，是因为狐鹿姑单于认为“我的儿子太小，不能治理匈奴各部”。但等到狐鹿姑单于死后，卫律等人却与颛渠阏氏密谋，先是将单于的死讯隐瞒起来，继而假托单于的遗命，与众贵族暗中盟誓，改立颛渠阏氏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于是，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

匈奴左贤王、右谷蠡王因未被立为单于，极为愤慨，怨恨之下，便阴谋率部投附大汉，但又恐不能达到目的，于是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反而将此时告知单于，单于便派人查问，右谷蠡王非但不认罪，反而把罪名推到卢屠王身上，由于匈奴众人都认为卢屠王冤枉。于是左贤王、右谷蠡王便“俱离开旧游牧地”，再也不肯到单于王庭所在的龙城去了。

由于得位不正，故而壶衍鞮单于在位时，为了能够转嫁内部矛盾，遂开始对外征战。史载，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纷纷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壶衍鞮单于继位后因“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防汉军突然袭击。但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但不久，又发左、右部两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单于因惧瓯脱王率汉军来攻，虽然率众走西北。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右贤王、犁污王将兵四千骑分道侵日勒、屋兰、番和，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三千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壶衍鞮单于大怒，发兵两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范明友遂遵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兵不空

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的筹划，乘乌桓新败，损耗甚大之机，驱兵直奔乌桓，挥师蹴之，斩杀六千余人，得胜还师。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解忧公主及乌孙王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武帝时就与汉朝“结为昆弟”。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大汉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五将军统兵十八余万骑出击，大军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闻汉兵至，纷纷远徙。虽然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但校尉常惠却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七十余万头。壶衍鞮单于怨怒，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大军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此战匈奴遭受沉重打击，自此匈奴一度无力对西域诸国形成威胁。

此战后不久，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虚闾权渠单于即位后，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次年，匈奴爆发灾荒，部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这直接致使匈奴内部的矛盾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奋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匈奴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大汉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遂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此举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虚闾权渠单于在位八年便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生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单于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人，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这使得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而日逐王先贤掸则因为与单于有隙，故而率众数万骑归附于汉，被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遂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并欲杀先贤掸两弟，虽然乌禅幕竭力谏阻之，但单于不听。不久之后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众贵族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大怒之下的握衍朐鞮单于竟遣右丞相率万骑前往追杀，但却被击败。

由于握衍朐鞮单于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故而匈奴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

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族，也深为左地诸部所怨。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时，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单于竟然大怒。于是姑夕王惧怕之下，遂与乌禅幕、左地众贵族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五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予援助。握衍朐鞮惭愤，无可奈何之下，遂自杀，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率两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于是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但其后方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则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于是匈奴一时间竟然有了五个单于。此后，五个单于之间不断征战。

五凤元年八月，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同时遣都隆奇率兵进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战败，退向西北，与呼揭单于合兵一处，拥兵四万人。此后，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而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左大将及都尉分率骑兵屯驻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乘机来袭，而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再次击败车犁，使得车犁单于率部逃向西北。随后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率兵西攻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左大将及都尉为其所败，史载俘斩万余人。屠耆单于闻知后，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与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相遇，双方接战。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率余部则归奔汉朝。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

此后，退向西北的车犁单于见呼韩邪势众，率部归降。但十一月，乌藉复自立为单于，史载，李陵之子时为匈奴左大将，于是拥立乌籍单于。结果为乌藉所败。

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之后，实力强盛一时，兼并匈奴各部的呼韩邪复都单于庭，不过虽然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也只有数万人。

然而这场内乱并没有结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部众，至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其后五凤四年夏，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争斗，实力较强的郅支单于击败并杀死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史载：“（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由此可见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而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人十分迫切的问题。呼韩邪单于在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引众南近塞，遣子入汉，对汉称臣，欲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郅支单于自知实力不敌汉朝，于是开始向西方扩张，匈奴族第一次分裂开始。

其实，高傲的匈奴人低下他们的头并不容易，呼韩邪单于在穷困之下，最初并没有想到臣服大汉，就在呼韩邪左右为难之际，他的亲信左伊秩訾王建议，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不过呼韩邪不敢擅自做主，而是召集各部贵族以讨论此事。不过很显然，多数人并不想降汉，至少在讨论此事的时候，左伊秩訾王的建议是遭到了大多数贵族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匈奴人是以“马上战斗为国”，是狼的子孙，此时不过是“兄弟争国”，胜利者不在兄即在弟，即使战败了战死了，仍然是匈奴人统治匈奴，如果向汉朝臣服，不仅会让汉人由此轻视匈奴人，而且还会让臣服于匈奴的西域诸国、部族看出匈奴的虚弱，会趁机脱离匈奴的控制。所以宁可战死，也不能降汉。

其实客观地讲，这些匈奴贵族们的这些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在此后，也确实出现了。但在当时，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一些人，所想到的不是匈奴的尊严，而是眼前的危局。譬如左伊秩訾王就坚称：“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众大臣以为臣事汉朝，有辱先单于，为诸国所耻笑，从此无法统治依附匈奴的诸国，但最终兵危将寡的呼韩邪还是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计议，选择了投汉。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南下至汉边塞附近，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朝，也就是为人质，同时以其弟弟左贤王到长安，请求内附。郅支单于得知消息后，也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入侍汉朝。呼韩邪唯恐横生枝节，于

是主动提出亲自赴长安觐见汉宣帝。史载“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十二月，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愿奉国珍，于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礼”。宣帝诏有司议论接待单于朝贺的礼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籓，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于是宣帝采用萧望之的建议，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潘，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也就是待匈奴单于以贵宾之礼，地位在诸侯王之上，称外臣。并派车骑都尉韩昌迎接，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朝见宣帝。宣帝遣使者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玉具剑、弓一张、箭四发、启戟十、安车一乘、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七袭、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者迎接单于至长平（泾水南，距长安五十里），宿于此处。此后宣帝自甘泉宫至池阳宫，史载“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



汉长城遗址

由于汉宣帝表示愿意帮助呼韩邪重振匈奴，并赐给“匈奴单于玺”金印一枚以及冠带、安车、金钱、锦绣等财物，故而呼韩邪单于感激大汉的优待，于是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也就是主动表示希望大汉能允许自己率部留屯在光禄塞下，有危急情况时可以保卫汉朝的受降城。汉宣帝表示同意，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一万六千骑兵，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并“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也就是以董忠等人留在那里护卫单于，同时帮助他讨伐叛逆不服的人。此后，汉帝国又前后转运了三万四千斛粮米到边塞，以供匈奴人。此外，为便于监视，汉朝把呼韩邪的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安置在并州北部，另一部分则迁徙到朔方等郡县，与汉人杂居。这样，光禄塞成了呼韩邪的临时单于庭，汉军则成了呼韩邪的依靠。

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史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应该说，与汉武帝采用的连番对匈奴的战争这一方式不同，汉宣帝时，少有劳

民伤财样的对匈奴战争，对匈奴之策，大汉采用的多事持巧之术，也就是军事、政治、经济多管齐下。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使得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此后，当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故而为了减少对匈奴边防驻军的压力，天子下令减少军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而当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方势力多争先试图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时，大汉采取了积极的方式应付。其实怎样对待匈奴对中原的威胁，这件事自商周以来一直是个难题。在秦汉之际，匈奴强大，秦修长城，汉造风火，都实行了防御政策。此后汉武帝转守为攻，先胜后败，伤亡惨重，国力大耗，教训深刻。故而汉宣帝采取了恩威并施、文武双用的政策。当然了，汉宣帝并不是一味防守，他也进行战争，但他强调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在他即位之初，就征集十五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匈奴，但汉宣帝的目的并不是灭掉匈奴，而是援助乌孙。在此次战争中，汉军并没有真正和匈奴接战，反倒是乌孙人重创了匈奴。

其实自昭帝时，大汉主要是采取养精蓄锐之策，宣帝即位后，皇帝更是积极关注民生，注意发展生产，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富庶，中原百姓生活比较安定。相反匈奴方面发生了严重内乱，五个单于争立，内部自相残杀，势力严重削弱。这显然是一个使匈奴臣服的绝好机会。其实，汉宣帝对匈奴采取的策略，其实更像是以静制动，也就是不给匈奴造成外部压力，使得匈奴内部矛盾激烈，各部落互相征战，从而使得匈奴的内乱愈演愈烈。面对匈奴的混乱局面，很多人认为应该趁机灭掉匈奴，但宣帝却并没有这样做，在萧望之的建议下，他采取的是对匈奴的安抚之策。

正是如此，才有了匈奴人的尽皆来降。

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五凤二年（公元前56　年），匈奴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来降，则被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甘露元年（公元前5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于是，“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此后，大汉帝国又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而汉朝则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

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

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大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直到西汉末年，汉与匈奴之间，都是关系友善，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直到西汉末年，匈奴人提及汉宣帝，仍然感恩戴德。

应该说，汉宣帝是大汉帝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宣帝在位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甚至可以说，宣帝统治时期是西汉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而史书中也对宣帝大为赞赏，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

宣帝一朝，大汉的武功也是赫赫，羌人、西域、匈奴，尽皆为大汉所平，宣帝初年，西羌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地。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西羌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部，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另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西羌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

赵充国大军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西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并呈 “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皇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神爵二年（前60　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而终。

而在西域，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两次伐大宛获胜之后，汉在西域的天山山脉南麓乌堡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节制西域诸国。其实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

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宣帝亲政，遣在渠犁负责屯田的侍郎郑吉到，发附近西域诸国兵万余及屯田汉兵一千五百，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此后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郡、酒泉郡的骑兵前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匈奴恐惧，遂退去。后来，郑吉派遣三百汉兵屯驻车师。

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时郑吉尚在北道，而当时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迅速采取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一万五千余，进讨莎车，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传送长安。此后，冯奉世至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并将该国名马“象龙”，赠予大汉。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归降大汉，宣帝以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而后，因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于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宣帝拜郑吉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

此后郑吉遂修筑乌垒城，设置幕府，此处距阳关两千七百余里，统领天山南北，处理西域三十六国事务，至此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西域都护的设置，对于大汉、匈奴来说，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之列，“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所谓“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康居城下
——郅支单于西进的宏略和惨淡的收场

宣帝末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先后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情况，混战不断，最后发展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此后呼韩邪单于附汉，是为南匈奴。而后，康居王因为乌孙所困，欲联合郅支单于的北匈奴击乌孙。郅支单于遂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众，仅余三千余人。此后，郅支单于数击乌孙，又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四方蛮族都来投靠。

实力远胜呼韩邪单于的郅支单于为什么离开蒙古高原，其实根本还是被汉朝大力支持呼韩邪单于的形势所迫。自从当初，卫律和颛渠阏氏合谋改立左谷蠡王壶衍鞮即位单于以后，各地藩王不参加龙城王庭大会，诸部落与王庭相继脱离。此后，五单于争战，确切地说，应该是九单于想斗，一场混战之后，自称单于的九人之中，两人自杀、两人下落不明、四人被杀，唯有依附汉帝国的呼韩邪单于保全了首级。自本始三年，汉和乌孙联兵大败匈奴之后，匈奴大伤元气。加上其后三年乌孙、丁零、乌桓三面出击，属国纷纷独立，加上自然灾害，匈奴人口锐减，再没有恢复到本始三年之前的实力。

当初呼韩邪单于入朝降汉，郅支单于错误地判断呼韩邪再不会回来了，就趁机向右地扩张，打算扫平诸部，然而就在郅支单于吞并了匈右地的伊利目单于所部后，却听说汉朝派遣韩昌、董忠率领一万六千精骑护送呼韩邪单于出塞，并常驻匈奴保卫呼韩邪单于，帮助呼韩邪讨伐叛逆不服的人，郅支单于情知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统一匈奴，更不敢与汉朝为敌，甚至害怕呼韩邪在汉军的帮助下讨伐自己，不敢返回王廷，便采取向西扩展地盘，壮大实力的对策。

而此时，乌孙自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后分裂为两部分，大小昆弥不合，名望极高的解忧公主已经离开乌孙回到汉朝，乌孙大昆弥是解忧公主的孙子星靡执政，郅支单于于是企图利用乌孙大小昆弥的矛盾，拉拢乌就屠吞并乌孙，站稳脚跟，然后既可称霸西域，也可伺机东山再起，夺取匈奴王廷。然而乌就屠却杀匈奴使者，发兵迎战匈奴人，结果为郅支单于所败，不过虽然击败乌就屠，但却不敢久留乌孙边地，而是挥师北上，接连吞并乌揭、坚昆、丁零三国，建都坚昆，远避汉朝锋芒。

而之所以郅支单于要避开汉朝锋芒，原因很简单，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夺取匈奴王庭之后，得知呼韩邪单于南迁汉朝边塞，还

派出儿子右贤王入朝侍奉天子，郅支单于也把儿子右大将送往长安入侍。不过郅支单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附汉，而是惧怕呼韩邪与汉朝联手以攻对方。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向汉朝俯首称臣，受到汉宣帝空前隆重的接待，得知消息后，郅支单于不甘落后，立即派出使者到长安进贡献礼，次年，两位单于都派出使者入朝觐见汉宣帝，贡献礼品，但汉朝对呼韩邪单于使者的礼遇更加优厚。自此郅支单于心怀不满，却不敢与汉朝为敌。汉元帝即位初年，匈奴民众十分困乏，呼韩邪单于求助于汉朝，再次得到汉朝大力支持，郅支单于心中更是十分怨恨汉朝，却不露声色，其上书汉廷，并派使者索要自己在京入侍的儿子，同时表示愿意内附汉朝。于是汉元帝同意放其子回国，特派卫司马谷吉护送，然而郅支单于竟杀谷吉等人，郅支单于情知从此与汉朝结怨，于是率部向西，此时康居王试图借力于匈奴，以抗乌孙，于是，郅支单于乃率部踏上西迁康居之路。

史载，郅支单于与康居国王互相娶对方的女儿，互为翁婿，而康居王很是尊敬郅支单于，因为其想倚仗郅支单于的声威，来达到胁迫各国的目的。而郅支单于则是多次借兵攻乌孙，甚至竟攻至乌孙都城赤谷城下，杀害抢掠百姓无数，匈奴大军退兵时，虽然驱赶畜产返回，但乌孙竟不敢追赶。当时郅支单于自以为武功赫赫，威名尊贵，而且颇为骄傲，甚至开始对康居王无礼，乃至于后来更是发怒杀死康居王的女儿与贵族大臣及百姓数百人，凶残的郅支单于甚至将一些康居王公的尸体剁成几块，然后投进都赖水之中。此外，郅支单于还征发康居人为其修建城池，历时两年才建成。并遣使者勒索阖苏、大宛各国，要求诸国每年进贡，各国不敢不给。而在当时，汉朝先后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寻找谷吉等人，但却为郅支单于刁难羞辱时汉朝西域都护郑吉年老多病，于是告老，汉元帝乃以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骑都尉，陈汤为西域副校尉，出使西域。

甘延寿乃是北地郡郁郅县人，其出身名门，年少时就擅长骑马射箭，最初以良家子为羽林郎，此后又成为期门郎，不久便调升为辽东太守。后在车骑将军许嘉的推荐之下，担任郎中、谏议大夫。

而陈汤则是山阳瑕兵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但因家中贫穷靠乞讨借贷为生，故而不为州人所称道。此后，陈汤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一职。后因富平侯张勃与之交往时，很欣赏他的才能，故而在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汉元帝下诏，要求“列侯举茂材”时，张勃便推荐了陈汤。然而，“待迁”之时，其父死，陈汤听到了死讯，没有奔丧回家，于是司隶奏其不孝、无循行，于是陈汤下狱，而张勃

也因为举荐不当而被削减食邑二百户，死后还被“赐谥曰缪侯”。此后，陈汤又在别人的推荐下，为郎官，但他却是数次求使外国。于是，此番乃以其为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史载，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小野云沟附近），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辖西域三十六国。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也因此，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与陈汤到达西域之后，陈汤深虑郅支单于势力危及大汉对西域的控制，遂向甘延寿建议说：“夷狄畏惧服从大国，这是他们的天性。西域诸国本来臣服匈奴。现在郅支单于威名远扬，侵凌乌孙、大宛，常常为康居出谋划策，想降服这两个国家。如果郅支单于得到这两个国家，势必向北进攻伊利，向西攻取安息，向南排挤月氏、山离乌弋，不出几年时间，西域诸国将尽为匈奴所有。而且郅支单于剽悍善战，如果让他长久发展下去，一定会成为西域的大患。郅支单于虽然居住地很遥远，但是他们没有坚固的城池和强弩防守，如果出动全部屯田官兵，命令乌孙军队跟随，直指郅支单于住地，他们逃亡，无处可逃，防守而不能自保，千年大功可以一朝而成。”甘延寿认同此言，于是准备上奏朝廷，可陈汤却认为如果朝廷与公卿大臣商议，则势必一定不会允许，因为大策略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甘延寿不愿意独断专行，没有马上行动。正考虑上书奏请，恰逢此时突然得病，只好将此事搁置一旁。甘延寿正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陈汤遂矫诏发西域城郭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卒，分六校击郅支单于。甘延寿得知后，大吃一惊，想要阻止，陈汤大怒，按剑叱责甘延寿说：“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于是甘延寿只好听从于他，并统军布阵，新设置扬威、白虎、合骑各三校，汉兵、胡兵合计四万余人。此后，甘延寿、陈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述用兵情状。

当日，甘延寿与陈汤就率部分道前进，分为六校，三校从南道越葱岭，经大宛

至康居；另三校由陈汤和甘延寿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经北道入赤谷，过乌孙，进入康居界，至阗池西。时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千骑袭掠乌孙赤谷东，杀千余人，抢牲畜甚多。陈汤令西域诸国兵击之，四百六十人，夺回乌孙遭抢掠的百姓四百七十人，并获牛、马、羊作为军食，时捕获抱阗的贵族大臣伊奴毒。入康居界后，令士卒不得抢掠。至郅支城（郅支单于在康居所筑城池）六十里止营。得康居贵人，了解城内情况。次日距城三十余里止营。郅支单于派遣使者询问汉军为何而来，答道：“单于上书说现在处境困难，愿意归附汉朝，亲自入汉朝朝见。天子可怜单于抛弃大国。在康居寄身，所以派都护将军前来迎接单于妻子儿女，恐怕您受惊，所以不敢到达城下。” 并斥责单于道：“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单于，但是至今没有名王大人来见将军，接待我们，单于怎么在大计策上这么疏忽，丧失主人接待宾客的礼节！军队远道而来，人畜疲乏到极点，粮食用度也快用完，恐怕没办法自己返回，希望单于与大臣反复考虑定夺。”

第二天，汉军进抵都赖水边，离城三里扎营布阵，郅支单于以数百人披甲守城，向汉军呐喊。百余骑兵在城外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布鱼鳞阵。于是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其骑、步兵皆入城内。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并烧毁土城外木城。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多被射死。半夜，汉军攻入土城。时康居兵万余骑环城十余处援救郅支单于，但惧怕汉军，不敢战。天明，康居兵退却。汉军攻入城中，四面纵火。郅支单于受重伤而死。军侯代理丞杜勋斩取郅支单于首级，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此战，汉军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尽皆分给了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大捷后，两人上疏朝廷，并将郅支单于传首长安，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的首级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上说春天是掩骼埋胔之时，还是不宜悬首示众为好。”而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则以为：“春秋时夹谷会盟，优施笑君主，结果孔子诛之，当

时正是盛夏，首足异门而出。悬首十日方才乃埋之。”于是“有诏将军议是”。此后，元帝按安远侯郑吉旧例，封甘延寿为义成侯，封陈汤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再赐给黄金一百斤。授任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而当郅支单于授首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对手而高兴，又畏惧汉军威武，于是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自请为婿，也就是娶汉女为阏氏。而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昭君）为其妻，此后汉与匈奴四十年余年无战事。

史载，昭君出塞之后，被称为宁胡阏氏。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了三年，生下一子，取名伊屠智伢师，封右日逐王。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死，大阏氏之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单于。依照匈奴婚俗，父死，子可以娶后母，于是昭君又嫁给了复株累单于。而据《后汉书》记载，呼韩邪单于死后，复株累单于想娶昭君为妻。昭君上书汉成帝，欲归汉，成帝拒绝了她的请求，敕令昭君“从胡俗”，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育有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

复株累若鞮单于为呼韩邪单于的长子，母亲是呼衍王的小女儿，号称大阏氏。呼韩邪在死前立他继任单于，“约令传国与弟”。其在位十一年，“约令传国与弟”，死后由同母弟且糜胥继任单于。

王昭君死后，葬于“青冢”（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南）。“青冢”出自杜甫《咏怀古迹》之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明末清初学者仇兆鳌注为“《归州图经》：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也就是北地草皆白，唯独昭君墓上草青，故名青冢。而清代的《筠廊偶笔》则解释为：“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濛作青色，故云青冢。”《塞北纪游》上则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

而当一代佳人香消玉殒，命断异乡，空留下一方青冢在阴山脚下、大漠深处，遥望着南方的故国时，附汉的南匈奴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部众为四五万人，此后，逐渐增加到户口三万四千，人口二十三万多，有兵五万。不过其实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而这些野史轶闻，很多都和汉元帝有关。

汉元帝刘奭，生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也就是说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宣帝重用法家，动辄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于是与宣帝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宣帝顿时变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情，宣帝最终没有更换太子。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次年（公元前48年）改年号为“初元”。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于是，萧望之选举纯宗室明经达学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给事中，同侍中金敞在汉元帝左右提意见，自此萧望之、周堪、刘更生、金敞四人同心谋议，而以古制劝导汉元帝，提出很多匡正的建议，汉元帝多纳用其言。起初，汉宣帝不甚听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当权。中书令弘恭、石显等精通法令条文，与车骑将军史高勾结，论议经常独自坚持旧日的典章制度，于是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萧望之以为中书是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于是试图要元帝更换士人，由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相违牾。

汉元帝时，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另一件便是昭君出塞。这是元帝时，仅有的拿得出手的事情，而这位皇帝毕竟性情拘谨，优柔寡断，虽然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乃至于“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可处理国事之能并不是才艺所能够代替的，于是自元帝时，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朝廷集权逐渐削弱，国内危机日益

加深。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由此开始衰败。甚至可以说，汉元帝在位时，随着陈汤平灭郅支，而使得大汉国威达到顶点，但这也是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史载，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然而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时，司马良娣却因病而故，据史书称，良娣临死前，哽咽着对太子称，她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他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妒忌、诅咒的缘故。于是太子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太子悲愤成疾，闷闷不乐，又迁怒其他姬妾，不与她们接近。关于这段历史，《汉书》中记载为“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怜之，且以为然。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因以过怒诸娣妾。”久而久之，甚至就连宣帝也知道太子怨恨姬妾，于是令王皇后挑选五名出身良家的宫女，供太子选妃，然而由于太子心思司马良娣，故而无心选妃，也因此对这五个女子兴致缺缺，但又不想违逆皇后的心意，于是便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于是众人以为太子属意坐于其身边的王政君。当时王政君坐于太子身边，穿着一件绣着绛色花边的掖衣。虽然相貌平平，但王政君还是被皇后送往太中，为太子妃，然而太子并不喜欢王政君，谁知王政君侍宿一夜之后，竟然怀孕。虽然此后太子刘奭再也没临幸于她，但王政君的命运却因为这个孩子，而彻底改变了，太子原本已有姬妾十多人，但长年以来一直都没有人怀孕，而王政君竟然怀孕了，这使宣帝非常高兴，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王政君分娩生下一个儿子，那年她二十一岁。汉宣帝很喜欢这个嫡皇孙，亲自为他命名为刘骜，时时带在身边。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四月，刘骜被立为太子。史载那时的刘骜爱读经书，喜欢文辞，宽博谨慎。甚至有一次元帝急诏刘骜，他不敢横越驰道（皇帝专用道路），而是绕行一圈迟迟才面见元帝，元帝知道了事情始末之后，非常高兴，下令以后太子可以直接穿越驰道。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刘骜开始终日沉湎于玩乐，加之元帝不宠王皇后，故而事实上这位大汉帝国的皇太子已经是以一个“青春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了。

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中山哀王刘竟薨，太子刘骜前往吊丧。刘竟是汉元帝的幼弟，和刘骜游学相长大。汉元帝见太子，感念刘竟，于是悲伤不能自止，但“太子既至前，不哀”，也就是说，太子丝毫没有哀伤的表情，于是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即皇帝很是恼火，“一个人如此不慈和仁

爱，又怎能奉祀宗庙，作为百姓父母的呢！　　”这意思也就是说刘骜不配人主。而后，皇帝召见史丹，斥责其。当初元帝为太子时，史丹以父高任为中庶子，侍从十余年。元帝即位后，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常骖乘，颇为皇帝有宠，皇帝以其是旧臣，又是皇考外属，故而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此番斥责史丹，很显然是有废太子之意。史载，面对皇帝的怒斥，丹免冠谢上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也就是，史丹对元帝说：“臣的确见陛下哀痛中山王，到了因为感伤而伤身的情况。早上太子准备觐见，臣私自嘱咐不要哭泣，以免陛下感伤。罪在臣下，当死。”汉元帝听后，方才解恨。

此后，元帝曾想改立宠妃傅昭仪之子，“多才艺”的定陶王刘康（汉元帝第二子，哀帝刘欣之父）为太子，根据史料的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王政君和刘骜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趁寝殿中只有元帝一人时，独自闯入室内，伏在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为太子求情。元帝心肠软，“优游不断”，见史丹泣不成声，竟大为感动，长长叹了一口气，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　　元帝才没有废立太子，而刘骜的皇太子之位也得以稳固。

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刘奭崩。六月，皇太子刘骜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刘骜的母亲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从此外戚王氏家族开始崭露头角，史载，由于在还未继承帝位的时候，汉成帝就已经荒于酒色，登基之后更肆无忌惮。汉成帝有一个男宠张放，史书上记载他“少年殊丽，性开敏”。汉成帝对他十分宠爱，平日里“与上卧起，宠爱殊绝”，还将张放提拔成中郎将，两人经常一起微服私访，汉成帝在外出游玩时假称是张放的家人，由此可见张放当时受宠的程度。　　此事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各种言论传到了太后王政君的耳中，于是太后就将张放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汉成帝不堪思念之苦，多次召张放回京团聚，之后又迫于压力把张放放逐，据史书记载，“故常涕泣而遣之”，如此反反复复。除此之外，成帝还“玺书劳问不绝”，千里传递书信。

自汉成帝即位起，就花了大量国帛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淫乐。

其最初专宠于少年结发妻子许皇后，前后二十年，生了一儿一女，皆夭折，这引起了王氏一族的担心，由于忧心皇帝无嗣，故而太后一族让汉成帝恩宠六宫，然而此后，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开始宠爱班婕妤。

史载，班婕妤是楚令尹子文的后人，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班婕妤出身功勋之家，其父班况在汉武帝时抗击匈奴，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而她自幼聪明伶俐，秀色聪慧，工于诗赋，文才出众，读书甚多。刘骜即位后，班氏被选入皇宫，刚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宠，赐封“婕妤”。汉成帝为班婕妤的美貌及文才所吸引，很喜爱班婕妤，甚至为了能够时刻与班婕妤形影不离，皇帝特别命人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车，以便同车出游，但成帝的这一举措却遭到班婕妤的拒绝，她说：“看古代留下的图画，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的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才有嬖幸的妃子在座，最后竟然落到国亡毁身的境地，我如果和你同车出进，那就跟他们很相似了，能不令人凛然而惊吗？”虽然汉成帝认为她言之成理，将同辇出游的意念暂时作罢，但此后皇帝开始逐渐疏远班婕妤。

班婕妤虽然美而不艳，丽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其经常诵读《诗经》《窈窕》《德象》《女师》等，而且每次觐见皇帝，都依照古代礼节，久而久之，皇帝自然厌烦，而当时王太后听到班婕妤以理制情，不与皇帝同车出游，非常欣赏，对左右亲近的人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当初春秋时代楚庄公的夫人樊姬很贤惠，曾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王太后把班婕妤比作樊姬，虽然让班婕妤在后宫中地位得到了无形的提升，但汉成帝不是楚庄王，皇帝所爱的不过是女子的美貌而不是贤德。当初班婕妤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于是李平得到皇帝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这也就是所谓的卫婕妤。不过无论是班婕妤，还是卫婕妤显然都不如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得宠。

《西京杂记》中：“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而据《飞燕外传》的记载，当初汉成帝在太液池作千人舟，号称“合宫舟”，在池中立起四十尺高的瀛洲榭。成帝穿着“流波文縠无缝衫”，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登上了高台。轻歌《归凤送远》之曲，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卷起，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弃笙拉裾，方才将之救回。也因此，皇帝对其甚为宠爱。

由于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天有“异象”，故而众臣以为是后宫荣宠太盛，

意指是许氏的过失。故而此后成帝减省椒房、掖廷用度，而当赵飞燕姐妹入宫后，许氏的地位更是不稳固。许氏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等人行妇人媚道诅咒后宫怀有身孕的王美人和王凤等人，事情败露，皇太后王政君大怒，将这些人投入监狱严刑拷问，许谒等人被处死。十一月十六日，许氏被废黜皇后之位，十年之后，被元帝赐死。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又把昭阳殿赐给赵合德一人居住。史载，当初成帝有意册立赵飞燕为后，但太后王政君以其身世低微、非侯门女为由不许，幸亏卫尉、侍中淳于长从中斡旋，汉成帝封赵飞燕的父亲为成阳侯，使得赵飞燕成了侯门之女，方才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赵氏姐妹此后更受恩宠，但二人相继专宠后宫十年有余，却皆无子嗣，对此，《飞燕外传》中的解释是姐妹二人为驻颜却老使用息肌丸以致不孕。史载，汉成帝结发妻子许皇后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但不久都早夭；之后与班婕妤有一子，也早夭，于是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汉成帝册封异母弟定陶王刘康之子刘欣为皇太子。次年二月，酒色侵骨的汉成帝中风暴死于长安未央宫，因为民间归罪赵昭仪，于是孝元王太后诏大司马、丞相“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因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故而赵合德畏罪自杀。

由于汉成帝长期沉湎酒色，故而当时大汉帝国再次出现了外戚擅政的局面，大政几乎全部为太后一族王氏掌握，从而为此后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成帝死后，皇太子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以次年为建平元年，尊汉成帝母亲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而后太皇太后下诏尊刘欣父亲定陶王刘康为恭皇。同年五月十九日，立妃傅氏为皇后，并下诏说《春秋》有云，母以子贵，于是尊祖母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丁姬为恭皇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初三日，在位仅七年的汉哀帝因贪色纵情而死，年仅二十五岁（另有一说是这位皇帝死于服用春药过量），九月十八日，葬于义陵。

汉哀帝刘欣驾崩之后，因其并未留下子嗣，故而太皇太后王政君至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而后罢大司马董贤，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掌丞相事。同年七月，派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立中山王刘衎。七月三十日，贬皇太后赵飞燕为孝成皇后，退居于北宫，汉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人都被罢免官爵，迁徙到合浦。九月初一日，刘衎即皇帝位，是为汉平帝，晋谒高祖庙，大赦天下。以次年（公元1年）为元始元年。

由于汉平帝继位时，年仅九岁，故而当时是以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

王莽乃是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济北王田安六世孙，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其父王曼便去世，此后，其兄王永亦死，王莽自幼饱读诗书，虽然王氏家族是成帝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史载，王氏多为将军列侯，先后有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极为显贵。也因而族中之人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而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俭朴。史载，王莽为人谦恭，且勤劳好学，曾师事沛郡陈参。因其孝母尊嫂，抚育兄长遗子，对待寡嫂更是行为严谨检点，加之其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因此很快便声名远播。

汉成帝时，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按照史书中的说法是，因为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自己车马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故而三十岁时，就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此时，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其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是年三十八岁。这时，王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请一些贤良为掾史，所得赏赐分给下属，而自己非常俭约，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犹如僮仆。王莽为大司马一年，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公元前7年），外戚丁、傅用事，王莽乃退位，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

而在王莽隐居于新都时，甚至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却没有恢复其官职。此番汉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于是王莽重回帝国中枢，史载，王莽自元寿二年再为大司马至于身亡时，其甚至掌握政权达二十四年。

王莽辅政的前几年，主要就是翦除了丁、傅两家外戚势力，所谓“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同时，拉拢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为其所用。他怕其叔红阳侯王立在元后面前搬弄是非，就让孔光上奏王立“旧恶”，从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国。史载，王莽颇有胁持上下的手腕，于是“阿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譬如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为其所罢，而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人的爵位也被剥夺。一时间，朝中大权尽皆落于其手。

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裳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

便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要求赐予王莽安汉公的称号。于是拜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 此后，平帝又以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次年汉平帝十三岁，立王莽长女王嬿为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就在同一年，陈崇与文人张竦写了一份歌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建议“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公卿方议此事，适值吕宽事起。起初，王莽通过元后，将帝母卫姬及帝舅卫宝、卫玄等排挤出京师。而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长大后怨恨王氏，遂与卫宝通书，试图使其设法还京。王莽不许。故而王宇与妻兄吕宽等人私下商议，用巫蛊之法想令朝廷归政卫氏，但吕宽夜间在王莽门第上洒血时被发觉逮捕，在狱中自杀。而王宇也因吕宽案，被逼自杀，宇妻因怀孕待产后亦被杀。此后，王莽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还株连敬武公主（元帝之妹）、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逼其自杀。“死者以百数”。王莽还为此作八篇诫书，宣扬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以戒子孙；而王莽之同党则奏请将其所作与孝经发行全国，令学官以教授，使官吏能了解此书旨意。

吕宽案之后，王舜又重提陈崇之建议，于是爪牙们煽动“民上书者八千余人”，都要求照陈崇建议办。于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王莽还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为公卿之首，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出入威仪与众不同。

这时，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召经学人才，及懂得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 于是诸侯、王公、宗室，公卿大臣九百人奏请加赏王莽。元后允，诏议九锡之法。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的记载很是详细：元始五年（公元5年），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赐，“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要求加赏王莽。

此后，虽然王莽上书说，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称职，天下“治平”乃元后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绝加赏。但最终他还是受了九锡，权势大异于群臣。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

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也就在这一年，平帝崩于未央宫，时年十四岁，葬于康陵。不过根据《资治通鉴》则记载，平帝之死，乃是王莽在腊日向汉平帝进献椒酒时，在椒酒中下毒，致使汉平帝中毒害病而死。按照史料中的记载，元始五年时，乐陵侯刘庆上书，称皇帝年幼，应让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而群臣也尽皆称当应如此。这时平帝病，王莽作策，愿以身代，藏策于金縢，置于前殿。这是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不久，平帝夭亡， 要选继位者。这时元帝世绝，便在玄孙中选了个最小的刘婴，年仅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这时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公卿上奏元后被呵斥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从中斡旋，向元后解释说，这事阻挡不了，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元后无可奈何，只好应许，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并于次年改元“居摄”。不久，王莽便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一年，王莽五十一岁。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获赦，乃奏颂王莽功德，骂刘崇为乱，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为帅礼侯。这时群臣上奏，称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权轻”，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于是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居摄”。

次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槐里人赵明、霍鸿亦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心中恐惧，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仿《大诰》写文称自己摄位不过是暂时为之，日后定将皇位归还皇帝，但同时，王莽却调动大军实施镇压，在以王邑统军平息叛乱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王莽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又有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摄皇帝当即真”等，称乃是天意所归。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

此后，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于是王莽入高祖庙拜受。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废孺子婴（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也称为“新朝建兴帝”，简称新帝。同时，王莽又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西汉就此灭亡。

王莽篡汉后，首先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由于王莽在始建国元年首先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在建立新朝后，王莽为了宣示新朝的威德，便派遣使者四出，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史载，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以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但王莽建新朝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于是命使臣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质“匈奴单于玺”索回，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显然是蓄意压低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从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新室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室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乌珠留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

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又将“匈奴单于”称号改为“恭奴善于”，后改为“降奴服于”，接着又分匈奴居地为十五部，强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削弱匈奴的势力，此举激起了匈奴的不满，乌珠留单于因此而反，开始侵扰北方边塞，边地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形以至于“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的局面。

王莽派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备足三百日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陆续征调的大军虽已抵达边境，但粮草的征集却十分困难，故而颇受王莽器重的严尤上书谏称，匈奴境内多乏水草，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有无斩获，大军皆需返回，否则大军就要困死在沙漠之中，所以，历来攻打匈奴，没有一次出征超过百日的。而全国各地调集大军，一年尚未集，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因此，他建议遣精兵北入沙漠，对匈奴“深入霆击”，以创艾胡虏。但王莽不听，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并下令将“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发往北方，并以全国吏民三分之一的财产资助军费开支，准备平定匈奴。

新朝的军事制度承袭西汉，但王莽更改官制名称为古称。为了平定叛乱，王莽采取“以军领政”的方式控管地方。他命令原为文官的“七公六卿”都兼称将军，监督地方官吏，以便稳定地方治安。譬如在并州、平州发生民变时，就曾经派著武将军逯并驻守平乱。此后，由于绿林军在荆北作乱，王莽派司命将军孔仁驻守豫州，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平定荆州，此皆为兼称将军的实例。而以军领政的方式还有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驻守大郡，监督地方的做法。而中郎将不仅涉内政，兼有对外职责。此外，王莽所封的太子四友，就有中郎将廉丹。此外还在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二人。至新末民变期间，王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各郡的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然而官军在地方胡作非为，扰乱地方行政，最终以军领政的方式还是失败。

除了这些措施外，王莽还陆续建立猪突豨勇、理军等新军，但无大用。所谓“猪突豨勇”，是为了平定匈奴，王莽招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吏民奴而编成的，并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招募自称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的人，然而大多夸大其词，但王莽仍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并设立捕盗都尉以平定三辅盗贼。新末时，王莽还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率领北军精

兵数万前往关东平乱。



王莽

不过在当时，王莽的大军主要还是以汉制，史载，王莽征发士兵三十万人，大举进攻匈奴。由于战事连年不决，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北方边界，又成了“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的悲惨状况；而北地官民也因为战乱而相聚为盗，于是动乱开始形成。

史载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强令高句丽、乌桓出兵，两国皆不愿而叛变，高句丽叛变后侵扰辽地各郡，新朝辽西太守田谭战死，于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斩其王，从而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但高句丽别种濊貊仍旧屡次寇边。直到新朝灭亡时，还入侵右北平、渔阳、上谷等幽西数郡。而乌桓则与鲜卑连和，投奔匈奴。史载新朝灭亡后，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认为有机可乘，扶持九原卢

芳与渔阳彭宠，其中卢芳还被封为汉帝，并率军东掠并、燕，西侵凉、朔，对边地官民威胁很大。

由于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西域在汉哀帝、汉平帝时，已有五十五国。王莽建立新朝后，西域诸国大多不服统领，故而匈奴反叛之后，其势力也开始进入西域，当时西域已因为诸国互相征伐而大乱，继而亲近匈奴的焉耆就杀西域都护但钦，投附匈奴，在得知攻杀焉耆西域都护的消息后，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李崇与郭钦等人率兵出征西域，但大军却被焉耆率领姑墨、尉犁、危须等联军袭杀，王骏战死，新军几至全军覆没。自此之后，西域与新朝断绝往来。西域北道诸国沦入匈奴势力范围，只有位于西域南道的莎车率领南道诸国抗衡匈奴，此后南道诸国被匈奴所平，于是西域全部被匈奴占领。

此外，由于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新末时，西羌迁入境内掠夺，隗嚣招怀其酋豪，陇西数郡都成五溪羌、先零羌的势力范围。同时，位于四川松番一带的武都参狼羌也被蜀地的公孙述煽动，发起叛乱，一时间，边地尽皆糜烂。

就在北方、西方一片叛乱之际，“西南夷”亦对王莽的不满，史载西南夷句町王因对王莽不满，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攻杀牂柯太守周韶，此后益州蛮夷也攻杀太守程隆。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等西南诸夷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镇压，但始终未能平定叛乱，此后新朝屡次派兵讨伐，但皆无功，宁始将军廉丹率领的大军水土不服，进讨未果。而后以益州文齐为太守，其开垦南中，劝降西南夷，方才稳定局面。

在这种内忧外患相交的情况下，王莽的新朝开始走向了末路。

第四章 玉门行

南北分治
——刘秀和匈奴帝国分裂的背后博弈

按照史料记载，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大地便陷入到动乱之中，而导致这一动乱的根本，便是王莽的所谓“立新”及改制之举。虽然掌权之初，得到了一些朝中大臣、百姓人民的拥戴，但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譬如王莽代汉后，曾派使者召请新都相孔休为国师，但孔休却是“遂呕血托病，杜门自绝，不任新莽官职”。又有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而王莽专权时，大封其亲信，多达三百九十五人，而同时却废黜刘氏宗族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这种情况下，刘氏宗族相继起兵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而失败。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称呼为国讨贼，以安社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大惊，连忙遣关东甲卒前往镇压，一时间，长安周围局势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大军才将翟义等人的举事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时，更是发生了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而拥立楚王的事情，虽然事发后，张充等人尽皆被诛杀，但直至新朝建立，各类反莽之事仍然层出不穷。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不过纵观这些反莽活动，可以看得出，其力量十分微弱，虽然王莽相继将之镇压，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刘氏宗族及贵族、富贾与自己的矛盾此时已经开始激化。而与此同时，平民百姓的反抗也开始出现，甚至到了“此伏彼起，层出不穷”的地步。王莽对这类反对自己的“叛乱”不以为然，因其以新圣自居，故而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意图恢复儒家歌颂的夏、商、周三代盛世。其改制的内容上从典章制度、法律与教育，下到百姓习俗、经济制度等，十分全面。譬如，他依《周礼》改官名为西周官名，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为纳言）、改郡太守为大尹等等。而地方制度也效仿周制，甚至许多地名经过多次改名。由于官员和百姓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恢复原名，平白增加无谓的麻烦，此外，他下令天下农田改称“王田”，耕地收为国有，推行王田制，从而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受田，一户不满八

人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给九族或邻里，由于此举限制豪强百姓只能有一定土地大小，故而从根本上来看，此措施与现实状况差异过大，地方豪强不可能因为一道法令而服从；由于土地过小而不能负担一户生活，连百姓都反对这个改革。于是仅仅三年之后，王莽接受区博的建议取消王田制，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此外，王莽令将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然而既然无意废除奴婢制，却又禁止自由买卖，因此导致豪强在黑市贱卖奴婢，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措施自然到最后也废除了。此外，王莽设立五均六筦与赊贷之政，以管理商业，以公权力管制物价、实施平衡，并加强税收，即以五均官掌管工商业的利得税（类似所得税），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垄断，此外还屡次改变币制，王莽依据古制，陆续推行刀货、贝货等新币，共有黄金、银货、龟宝、贝货、钱货、布货等，这些货币名目繁多，换算复杂，造成新朝的财政极为混乱。此后，又却有尽数废除，于是也就以致农商失业，经济崩溃。很显然，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反而因其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频繁征讨，使得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位置加重，于是天下人皆不满其所为。

新朝时，沉重的赋役征发，残酷的刑罚，不仅使百姓怨声载道，加上连年灾荒，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此后，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没人看出来。史载，自王莽改制革新之初，便不断有大臣进行劝诫，王莽的一系列新政，可谓是乃只求名目复古，常要求恢复周礼，徒增行政困难。实行王田制乃根据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坏乃因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养活各人丁，再实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币制改革不但令货币种类繁多，而且这些货币其实根本无法流通，譬如贝币，乃是古时所用，是因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的，此时再恢复使用自当引起混乱。但是王莽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于是天下皆反，民众起义之火首先于北方边郡点燃，接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尽皆爆发了农民暴动。

史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等边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天凤五年，东海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而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的起义、羊牧在江夏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动频频。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不过对新朝威胁最大的还当属赤眉、绿林两路义军。史载赤眉军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在莒起事，首领为琅琊人樊崇，最初活动在泰山一带，几年之间发展到数万人，乱军由农民组成，大多不识字，因其均将眉毛涂红而得名，赤眉军收编吕母部后，实力大增。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以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出兵讨伐，但征讨大军被赤眉军击溃。此后王莽再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兵东征，所经之路都纵兵掠夺，民众义愤非常，有歌谣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指更始将军廉丹）杀我”，由此可见，百姓的态度。十月，王匡率军进抵无盐，击败据城举兵响应赤眉军的索卢恢部万余人。是时，赤眉别校董宪部正活动在无盐西南的梁地。王匡恃强急战，率大军南下，欲一举击破董宪部。恰在此时，樊崇所率赤眉军主力已进至无盐附近的成昌。莽军出无盐不久，即与赤眉大军相遇于成昌。首次交兵，王匡、廉丹被斩万余，大溃。此后，赤眉军乘胜追至无盐，王匡仓皇逃奔洛阳，廉丹虽然做拼死一搏，但依然大败，史载，赤眉军斩杀廉丹及其部下校尉二十余人，势力扩张到青、徐、豫、兖等州。

而与此同时，因天凤四年（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一带大

饥，众多饥民在王匡、王凤率领下举事起义，占绿林山为寇，有数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新莽荆州军为绿林军所败，王莽遣司命将军孔仁守豫州，派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进入荆州平乱，结果两万征讨大军再次惨败，绿林军部众增至数万人。次年（公元22年），绿林山瘟疫爆发，于是绿林军不得不分兵，王常、成丹率兵向西，转入南郡，称“下江兵”，而王匡、王凤率兵东进新市，称“新市兵”，并北上攻打宛城。途中进攻随县时，有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加入，即“平林兵”，此后，下江兵被严尤击败后，也北上宛地会合新市兵。时有宛地豪强刘、刘秀等人也起兵响应，称“舂陵兵”。

十一月，绿林军新市、平林、舂陵三部合力攻克棘阳等地，但随后，因刘率舂陵兵急欲攻宛，却被南阳郡守甄阜、属正梁丘赐率军击败，不得不退保棘阳。此后，甄阜、梁丘赐留辎重于蓝乡，乘胜率精兵十万南渡潢淳水，临近沘水，在两川间扎营，企图一举扑灭义军。是时，由王常等率领的下江兵五千余，已从南郡转战到宜秋。十二月，新市、平林，下江、舂陵四部合兵，一时间，绿林军士气大振，遂对甄阜、梁丘赐所领新莽军展开反扑。义军兵分六部，乘夜攻袭蓝乡，一举劫获甄阜军全部辎重，并堵住其退路，继而从东南、西南两面展开合击，甄阜、梁丘赐见势不妙，遂率军败逃，此后义军追至潢淳水，斩首两万余，杀甄阜、梁丘赐。

史载，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绿林军大破新莽军甄阜、梁丘赐等将于蓝乡，包围宛城，占领昆阳。此后，绿林诸将拥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将军，后又恢复汉朝国号，以刘玄为帝，建元更始，史称更始帝， 即玄汉。更始帝以王匡、王凤为上公，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决议争夺天下。

刘玄原乃是汉景帝刘启的后代、刘秀的族兄。其祖父为苍梧太守刘利，父刘子张，母何氏。起初，刘玄的弟弟被人杀害，他便结交宾客准备报仇。可不久之后宾客犯了法，刘玄便跑到平阳躲避官府的追捕。官吏抓走了他的父亲刘子张，而后刘玄诈死，让人把他的灵柩运回舂陵，官吏才释放了他的父亲。但刘玄也自此便避居于外。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陈牧、廖湛领导千余人起义，号平林兵，以应王匡，正是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了平林军，担任安集掾。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诸部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后，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这才在淯水边拥其为帝，大赦天下，建元更始。

就在刘玄登基后、大封宗室诸将时，消息传到长安，一时间朝野震动，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

举扑灭义军。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决定着未来历史进程的昆阳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王莽以司徒王寻、司空王邑为大将，征集大军四十多万，号称百万。同时征召通晓兵法的六十三家为军吏，并以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的巨人巨毋霸为垒尉，又驱使诸多猛兽虎、豹、犀、象等助威，其余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史载“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之”。可谓是倾全国之力，试图一鼓而平天下，而绿林军，仅有刘秀率八九千之众，二者军力悬殊。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乃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玄孙，与更始帝有同一个高祖父刘买。史载刘秀的先世因 “推恩令”而从列侯递降，至他的父亲刘钦时，不过为南顿令刘钦，母樊娴都。世代居住在南阳郡蔡阳，属地方豪族。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于济阳，史载他出生的时候，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而当年稻禾（嘉禾）一茎九穗，因此而得名“秀”。元始三年（公元3年）时，刘钦去世，故而年仅九岁的刘秀与其兄妹便只能依赖叔父刘良抚养。不过虽然为庶民，但刘秀勤于农事，天凤年间，刘秀还曾到长安，学习《尚书》，故而略通大义。而其兄刘则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高祖皇帝刘邦的兄弟刘喜。按照史料中的记载，刘秀在新野县时，听闻南阳豪强世家阴氏有女丽华极为美貌，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阴丽华的家族祖先为齐桓公名相管仲，其第七代子孙管修的时候，从齐国迁居楚国，被封为阴大夫，以后便以“阴”氏为姓。秦末汉初，阴家举族迁到了新野，据《后汉书·阴识传》载：“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当时阴家“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所谓“邦君”就是分封的诸侯王。这也就是说，阴家占有巨量的土地，车马和奴仆可以同分封的诸侯王相比。不过在当时，刘秀也就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并没有机会迎娶阴丽华，更无法出仕为执金吾。

然而不久之后，因王莽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上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此时，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故而在刘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时，刘秀

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史载，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不同，刘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避吏于新野，因卖谷而至宛，经李通劝说，方才在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其兄刘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莽。

因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而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多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但因兵少将寡，所以实力不强。甚至在举义之初，刘秀竟无马，只能骑牛，此后杀新野尉，刘秀方才有了自己的战马。此后为了壮大声势，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等绿林军合兵。

当王莽派大司空王邑急赴洛阳，与大司徒王寻调集各州郡兵四十余万南进，号称百万军，企图一举扑灭汉军的时候，其实刘秀手里的兵马并不多。当年五月间，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使刘秀的所部自阳关撤回昆阳。当时昆阳汉军仅九千人，众恐不敌，欲弃城退守荆州故地。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固守昆阳。此时王莽军已逼近城北，刘秀率十三骑乘夜出城，赴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后有步兵、骑兵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

而新莽军锐气正盛，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而后督军攻向昆阳城，面对新莽军挖掘地道、制造云车、大军围城的情况，昆阳汉军别无退路，只能坚守危城。此后，王莽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而刘秀则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史载，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王莽军千余人，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刘秀利用王寻、王邑轻敌懈怠的弱点，以精兵三千迂回侧后，偷渡昆水，直攻王邑的中军。面对汉军的乘锐猛击，王邑依旧轻敌，其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结果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被杀，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亦出城而战。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四十万大军覆灭于昆阳城下，王邑仅与数千人逃回洛阳。于是三辅震恐，海内响应，旬月之间遍于天下。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以求天救。而此时，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急攻武关，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朝牧守，用汉年号，遵服更始政令。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杀死于未央宫的渐台，新朝覆灭。

然而此后当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忙着马不停蹄的攻城略地之时，因刘、刘秀兄弟威望大盛，遭到刘玄的猜忌，不久，时为大司马的刘被更始帝借故诛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同宗刘稷。史载，消息传来，刘秀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饮食言笑如常。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除了不敢为哥哥服丧之外，其还不与刘部将接触，而且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心有所惭，故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是月，刘秀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阴丽华。

新朝亡后，更始帝定都洛阳，但河北（黄河以北）州郡尚未归附，此外赤眉军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然而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王郎在邯郸称帝，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这种情况下，势力单薄的刘秀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刘植、耿纯所拥，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也很关键。史载，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就曾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而刘秀高兴地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过就在刘秀准备在河北招兵买马进攻邯郸的同时，河北三王中拥兵十余万、实力最强的真定王刘杨一直在观望。为了真定府的十万大军为己所用，刘秀遂派部下刘植去真定府游说。最终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以联姻的方式，促成了两家的联合。而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此后，在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刘秀率军攻陷邯郸，王郎亡。而眼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谢躬做幽州牧，接管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

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帝公开决裂。

与此同时，刘秀率吴汉、邓禹等将发幽州十郡突骑平定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河北诸民变军，数十万铜马民军中的精壮之人被刘秀编入军中，因而一时间被关西人号为铜马帝。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时，刘秀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是年六月二十二己未日，刘秀在鄗城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而在此时，更始帝已经迁都至长安，他建国后昏庸无能，滥封诸侯，将政事委托给岳父赵萌，政治混乱，甚至百姓尽皆怀念王莽。当时李轶、朱鲔自立于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而在汝南、颍川的赤眉军，因为粮食不足，加上更始帝分封不给国邑，而由樊崇和徐宣兵拥兵三十万众，分两路进逼长安。进军途中，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史称赤眉汉，建元建世。

更始帝得知消息后，遣诸将讨伐，申屠建、陈牧、成丹等将均死，大军死伤甚重，三辅震动。同年九月，赤眉军攻陷长安，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玄汉亡。而光武帝则乘机南下洛阳，并定都之，此后又改洛阳为“雒阳”。

当赤眉、绿林相互厮杀之，刘秀又以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时，赤眉汉政治混乱，诸将跋扈，加之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再次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换上与赤眉军一样的装束，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伏兵杀出，赤眉大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

崤底之战，使得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

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但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故而早已料到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以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当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时，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六军布阵于宜阳，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和甲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大军，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平定。此后，刘秀先后荡平张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并于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十九己卯日（公元36年12月25日）吴汉攻克成都，至此东汉统一天下。

史载，光武帝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此外光武帝时，汉帝国开始不设丞相，而是“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使三公成为虚位，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又有“自是大臣难居相任”之说。不过，光武帝并没有如同先祖高皇帝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而是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其实，在统一天下之前，光武帝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郡国兵制，罢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导致后来无力抵御外患，而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

史载，当光武帝统一天下后，又厌武事，不言军旅，所谓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有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但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其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

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东汉初年，天下方定，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帝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故而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皇帝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又省刑法，这种情况下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也就自然的了。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东汉初年，位于漠北的匈奴日渐强盛，大汉帝国此时也无力与匈奴战，不过在光武帝“不思进取”的时候，建武二十四年时，匈奴国内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内部为争王位发生动乱。当时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因蒲奴单于被立为单于，而既怀愤恨，于是其秘密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而后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其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于是匈奴再次分裂，彼此相互残杀。史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十二月，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一分为二。后呼韩邪单于率众四万南下，依附东汉而称臣，被汉光武帝安置在河套之地，是为南匈奴，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史载，南匈奴最初建庭于五原，而后迁庭于美稷县，即“南庭”。汉朝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保护其安全，并每年给归附的南匈奴一定的粮食、丝帛等物，而南单于则协助东汉共同抵御北匈奴，一时间，北匈奴竟成为了大汉与南匈奴的共同之敌。

匈奴在东汉初年的确实力强大，当初王莽以三十万大军兵分十路出击匈奴，结果战事连年不绝，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甚至公开宣称匈奴世代受汉朝恩惠，不能遗忘。王莽不是刘氏子孙，没资格做皇帝，匈奴要为汉朝复仇，并遍告匈奴各王，命令他们南下讨伐王莽。于是新莽军接连战败，雁门、朔方太守先后被杀。但不久乌珠留单于死去。其实自呼韩邪单于归汉以来，匈奴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亲汉和反汉两股势力。乌珠留死后，国政由亲汉的右骨都侯须卜所把持，此人是王昭君的女婿。而反汉的势力主要是乌珠留的弟弟右贤王舆等人。在右骨都侯须卜的拥立下，乌累若鞮单于掌握了大权，不过虽然乌累若鞮单于的儿子登因为匈奴入侵而被王莽杀死，但其并没有选择为儿子报仇，而是主动向王莽示好，请求和亲。可是在位仅仅数年，乌累若鞮单于便死，于是右贤王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史载，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性贪婪”，又刚愎自用，其最初也是奉行亲莽政策，但王莽却是不顾大司马严尤的忠告，派和亲侯王歙前往边塞，将右骨都侯须卜夫妇骗到长安，并册立须卜做了所谓的“善于”，准备用须卜取代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虽然须卜不是“挛鞮氏”的成员，但当王莽册立他为“善于”后，其还是得到了很多亲汉的匈奴人支持，于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怒而大举进攻北边。

此后，新朝覆灭，定都长安的更始皇帝刘玄派人送还汉宣帝赐予的玺印，试图修复汉匈关系。但此时匈奴内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于亲汉的须卜此时已死于长安，故而匈奴内部的大权为主战派所掌握。在反汉主战诸王的鼓动下，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要求汉朝“当复尊我”。此时，刚好发生了安定三水人卢芳称帝之事。

当初卢芳自称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与三水县的胡人共同起兵，更始二年（公元24年）时，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曾以卢芳为骑都尉，命他镇抚安定以西。可当更始三年（公元25年），刘玄败亡后，三水的豪杰拥立自称汉朝皇族的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与西羌、匈奴缔结和约。于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派句林王迎接卢芳、卢禽、卢程入匈奴，拥立卢芳为汉皇帝。

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遣无楼且渠王与割据并州的李兴、闵堪和亲结盟。次年，汉皇帝卢芳返还内地，被李兴、闵堪迎入五原郡九原县为都，割据北方边境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但在建武六年（公

元30年）时，卢芳诛杀了事为五原郡太守李兴，于是朔方郡太守田飒、云中郡太守桥扈恐惧，反卢芳而降东汉。

此后，东汉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次讨伐卢芳，但都没有成功。其实，这十余年间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和东汉的几次大战，总体上都是保持着攻势，而东汉朝廷却是疲于应付。不过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当进攻云中郡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育却试图胁迫卢芳降伏大汉，这种情况下卢芳气馁，丢下辎重，只带十余骑逃入匈奴。此后，匈奴听说汉朝以重金求购卢芳，主动把他遣送到高柳，令其归汉。然而卢芳却抢先一步，史载，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卢芳入居代郡高柳县，以闵堪之兄闵林为使者，向光武帝请降，光武帝封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相，闵林为代国太傅，负责汉朝与匈奴修好的事务。然而次年，卢芳入朝，在向洛阳途中，光武帝下诏命卢芳延期至明年（建武十八年）入朝。卢芳疑心皇帝猜忌，在代地再反汉朝，与闵堪、闵林在高柳县互相攻伐数月，匈奴派兵将其与妻室接走，卢芳入匈奴十数年病死。

自从卢芳再反之后，匈奴便是频频入口，史载，在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的率领下，匈奴于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间多次进攻汉朝，逼得东汉不得不频频后退，甚至先后放弃五原等边境郡县。在这个时候，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治下的匈奴似乎重回冒顿单于时期，强盛一时，不仅恢复了匈奴旧疆，而且打得汉军节节败退，使得东汉帝国不敢与之争锋。然而让匈奴人始料未及的是，屡战屡败的汉人屡败屡战，不仅不会向匈奴称臣，甚至连和亲都没有，两国之间虽然使节不断前来，可依然是兵戎不断，但纵观而看，匈奴是进攻方，而东汉则是防御方，由于自从统一天下后，光武皇帝“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故而汉军始终没有出兵塞外，甚至在匈奴的频频进犯面前，有些疲于应付。

而匈奴的情况其实并不好，虽然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一次又一次出兵进犯，但问题是此时的匈奴实力已经无法和冒顿时期相比了，经过汉武大帝时期的多次进攻，此后的五单于分裂，匈奴早就已经实力衰颓了，而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这样的频繁出击，只不过是在“不懈”地消耗着本来就不丰足的国力。不过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倒也不是完全无法对大汉形成威胁，其多次进犯对大汉来说，的确是让边地狼烟不断，此外由于原来臣属汉朝的乌桓也因为王莽的举措失宜而重新投入匈奴怀抱，于是乌桓和匈奴一起骚扰汉境，加之乌桓原来居住在代郡一带，距离汉地最

近，朝发夕至，危害最大。此外，西域也因王莽的愚蠢，而各国怨恨之，诸国合谋杀了西域都户但钦，重新倒附匈奴。于是，匈奴也就得以从东、中、西三个方向对东汉王朝形成威胁。然而就在此时，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却死了。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的死，对于匈奴来说，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史载，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后来又借故杀了知牙斯。于是引起了日逐王比的不满，史载，日逐王比口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其实日逐王比的那番话也没说错，如果兄终弟及，应该让伊屠智牙师即位；如果父子相继，他是乌珠留单于的儿子，更有资格继承。于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知比不服，心疑其有二心，于是遣两骨都侯监领日逐王比所部。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后，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然而当年乌达鞮侯单于便死，其弟被立为单于，是为蒲奴单于。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这种情况下，刚刚继位的蒲奴单于束手无策，加之又害怕汉朝趁火打劫，于是遣使至渔阳求和亲。

而在当时，因宣帝时，匈奴归附后，大汉便是将归顺的匈奴人安置在边境八个郡县，保留他们的部族结构，依旧由其自治，称为属国。王莽新朝末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起兵，汉匈边境再起战火，这些属国便是归顺匈奴，成为匈奴骑兵进攻汉地的先锋。在当时，为便于管理，呼都而尸单于在这里设下八部大人，而以日逐王比统辖，这也就等于是日逐王比的辖区是沿边八郡，拥有着大批所谓"属国"部众。而日逐王早在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在世时就已经心怀二心，多次借故不去王庭。而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也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把南部八郡划给日逐王比管辖，不仅丝毫无助于消解日逐王的不满情绪，反而给其身后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日逐王部和汉地接触广泛，很多部众已经放弃游牧，改为定居农牧。故而遭遇天灾后，日逐王首先便是想到的是向汉朝求援。加之和单于有矛盾，于是日逐王决定先下手为强，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请求内附。负责监视他的两个骨都侯察觉到此事，于是连忙报告单于。蒲奴单于得报之后，大怒，然而其只知动武，缺少智慧，完全没有意料到情况的复杂性，可是大灾之年，匈奴人畜死亡众多，根本派不出多少兵，于是其只带了万人前往讨伐。结果发现日逐王陈兵五万严阵以待，蒲奴自知不是对手，只好撤回单于庭。

这种情况下，八部贵族眼看日逐王与单于为敌，于是共立其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为了借得祖先的荣光，比的称号也取作“呼韩邪”。公开与蒲奴单于决裂后，呼韩邪单于便遣人至五原塞，向东汉表示愿意“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很显然，呼韩邪单于比称自己的同族为“虏”，这是暗示自己和北匈奴的不同。当然了，事实上，八部匈奴因为长期汉化，已经与北匈奴在生产方式、文化形态上已经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不自觉中，亦是接受了汉人的“夷夏之辨”，他们从心里认为自己已经脱离夷的行列，应该属于大汉的臣民。

此后，呼韩邪单于比又派其子至洛阳当面陈说归附之意，并把儿子留下作为人质。呼韩邪单于比称，当初呼韩邪单于临终之时，遗言让诸子依次做单于，于是其死后，诸子依次继承单于位，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为了将单于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乌达鞮侯，就把伊屠智邪斯杀死，而伊屠智邪斯是呼韩邪单于第九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其生母是王昭君，初为匈奴右日逐王，按照匈奴王位继承制度，他应接任左贤王，为单于第一继承人。现在自己内附，便是因为当初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无道，故而希望能够向汉朝称臣，这次进献国宝，派遣侍子，为的就是能够重修呼韩邪时期与汉朝的约定。

史载，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呼韩邪单于比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兵万余人进攻北匈奴，活捉北匈奴单于之弟奥鞬左贤王，又击败北匈奴单于帐下将士，俘获万余人。北匈奴一时间十分震惊，乃至于北部奥鞬骨都侯率部三万余人归顺南匈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光武帝派中郎将段彬前往，助比在五原塞以西八十里处建立单于庭，又仿照宣帝时对待呼韩邪单于的旧例，颁给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锦绣等物及米两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此后，为了便于控制，汉朝又把比的单于庭迁到云中郡。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而呼韩邪单于比在汉文史籍中开始频繁以“南单干”的身份出现。

显然，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使得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而东汉王朝则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此后南单于为表示忠心，此后多次主动出击北匈奴，按《后汉书·南匈奴传》的描述是双方“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乌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不过南单于第一次出讨北匈奴，就被蒲奴单于率军杀得大败。此后，光武帝下诏，又将其单于庭迁到西河郡的美稷县，并派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实则是监视。美稷县地处河套平原，原本是匈奴旧地。

此后，南单于以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侦罗的对象当然是北匈奴。蒲奴单于十分担忧，连忙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并几次遣使请求和亲。然而汉廷为了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予以回绝，但对南单于的请求却几乎是有求必应。史载，此后数年之间，匈奴之地连续发生灾荒，北单于在无奈之下，连续三次派使节到洛阳，请求和亲或开放互市，但汉朝政府不予接济，却在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回赠良弓利剑，令其尽忠孝之义，虽然看起来大汉帝国是要求北匈奴对付西域侵扰，但实则是鼓励匈奴人继续内耗。

很显然，汉廷以“担心南单于误会”为理由，拒绝和亲，并赠给北匈奴良弓利剑，在很大程度上离间了南北匈奴的关系。北匈奴果然迁怒于南匈奴，几次举兵讨伐。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南匈奴单于比死，汉廷以中郎将段彬率兵赴吊，祭以酒米，并分兵卫护。比弟左贤王莫立为单于。光武帝刘秀派使者送玺书抚慰，授玺绶，赐新单于衣冠，并赐缯彩给南匈奴贵族。如此厚爱之下，南匈奴自然更是频频进讨北匈奴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此后七年间，丘浮尤鞮单于、伊伐於虑鞮单于、樞僮尸逐侯鞮单于、丘除车林鞮单于、胡邪尸逐侯鞮单于相继即位，也就是七年之间，南匈奴连续死了五个单于，虽然史籍没有记载他们是怎么死的，但与频繁的征战是显然有一定关系的。

而另一方面，屡次请求和亲、互市得不到回应，北匈奴对汉朝的怨恨也是与日俱增，不时南下侵扰。汉廷在消极应付了多年后，随着国力的恢复，终于开始着手大规模的北征，以重现汉武辉煌。而北匈奴也察觉到风声不对，加之连年遭灾，遂大规模北撤，将单于庭又迁回到漠北。但此时，东汉的大军已经整装待发，不可能撤回，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自王莽篡位后，汉朝在西域的经营成果灰飞烟灭，西域复入匈奴彀中。南匈奴内附后，中线压力基本解除，所以，汉朝的用兵重点选择了西线。双方再次重演旧时的一幕，在西域展开持久的争夺。而此时，已经是汉明帝刘庄在位了。

刘庄之所以能够继皇帝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母亲——阴丽华。

史载，更始帝三年（公元25年）刘秀于鄗邑称帝，改元“建武元年”后不久，最迟于同年十月即派傅俊前往南阳接来姐姐湖阳公主刘黄、妹妹宁平公主刘伯姬，以及原配妻子阴丽华，并封她为贵人。而在之前，为了能够与河北三王中拥兵十余

万、实力最强的真定王刘杨形成联合，刘秀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

阴、郭两位贵人中，因阴丽华“雅性宽仁”，故而光武帝欲封其为后，但阴丽华认为不足以担大位，坚决推辞，并称郭氏与刘秀有困厄之情，并生有儿子，因此固辞后位。考虑到国家形势和朝臣们的不安，刘秀最终不再坚持立阴丽华。

建武二年春正月（公元26年），郭圣通的舅舅真定王刘杨私下与绵曼贼交通，有谋反之意，光武帝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讨伐刘杨，刘杨却闭城门不应。光武帝又派遣前真定大将耿纯，持节杖，名义上去幽、冀行使赦令，劳慰当地王侯。实际上秘密下令：“刘杨若见，因而收之。”耿纯的母亲是真定宗室之女，故而抵达真定后，其只带百余名兵士，住在传舍，邀刘杨相见。刘杨自恃人众势强,便应邀前往传舍。见到刘杨和刘让兄弟两人后，耿纯趁机诛杀二人。“杨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合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杨、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光武帝不计谋逆大罪，复封刘杨之子刘得为真定王，刘让之子为临邑侯。

是年四月，在苏茂杀淮阳太守依附另一位称帝的宗室刘永之后，刘秀开始册封宗室，同年六月，郭圣通被册封为皇后，其子刘彊以“子以母贵”的春秋之义被立为太子，并大赦天下。很显然，真定王的谋反，并未牵连郭氏。而阴丽华以原配名分让出后位，在当时，的确让光武帝很是感慨，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阴丽华的选择显然让新生的东汉帝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建武四年五月甲申，阴丽华在元氏县生下长子刘阳，耐人寻味的是，刘阳出生的时候，刘秀正在率军出征，也不知道其为什么要带怀孕的阴丽华从军，史载，阳在刚一出生时，便得到了父亲的特别喜爱，刘秀见这个孩子颜色红、丰下锐上，认为其像圣君尧，并且以皇朝国运所系的赤色为之命名为刘阳，而阴丽华也因为诞下此子，而被皇帝更加宠爱，其之后又相继生下刘苍、刘荆、刘衡、刘京四子。

建武之初，天下兵戈四起，中原大地治安颇为混乱，建武九年，毗邻京师洛阳的颍川和河东两郡发生变乱，叛军和盗贼四起。此时阴家因为富比王侯而成为了盗贼眼中的目标。阴丽华的母亲邓氏、弟弟被贼人劫持，并在官府的捉拿时，被盗贼杀害。

消息传来，阴丽华甚为悲伤，为了安慰自己的宠妃，光武帝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

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欣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绶，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其实皇妃家眷遇害，皇帝下诏安抚，也在情理之中，但皇帝的诏书却偏重于强调自己不忘与原配的患难之情。最重要的是，在立郭圣通为后七年之后，光武帝再次旧事重提，诏书很直白地说拥有“母仪之美”的阴丽华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而郭皇后能成为皇后，完全是贵人阴丽华“固辞”的结果，很显然，这份诏书的影响是很大的，按照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的说法，光武帝下了这道诏书之后，郭后就无法安于皇后之位了。而且，当时天下未平，很多功臣还没有封地，事实上，皇帝大封功臣外戚是在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而此时，却以阴丽华曾固辞后位的缘由，给阴家兄弟封爵，西汉时，只有皇后外戚才能封侯，而且也不可以太多，王政君为太后时，因其家封了五个关内侯备受诟病，但此时光武帝却将阴丽华的兄弟先于功臣封侯，显然是极大的恩宠。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光武帝对郭后的宠爱渐渐减少，郭后因此屡怀怨言，与此同时，南阳豪强势力渐渐蚕食中央集权。三年之后的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在四海平定四年之后，光武帝决定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丽华为后。而光武帝废去郭后为中山王太后的借口是“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也就是说，刘秀认为郭圣通心怀怨恨，并称其性情如鹰鹯无后妃之德，认为她在自己死后不会善待阴丽华母子，而阴丽华是原配，与自己情深意重，应该侍奉宗庙，居国母之位，于是行废立之事，并册立阴丽华为皇后。翌日，进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东海公刘阳为东海王，余子一一由公进王。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决定改立阴丽华的儿子刘阳为太子，史载，“十七年而郭后废，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乃许焉。”也就是说，自从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废皇后郭氏，立阴丽华为后之后，郭圣通所生的长子刘疆一下子由嫡长子变成了庶长子，而刘阳则由庶子变成了嫡长子。此时嫡庶异位，他在太子位上便名不正言不顺了。故而刘疆不安，多次上书表示要让出太子之位。至建武十九年时，太子刘疆两年以来，一直在辞太子位，而这两年来，东海王刘阳以嫡长子身份在朝堂之上参与政务。由于刘阳在朝堂上具备了足够的资历、声望和参政的经验，可以承担储君的重责。同时，

成为了庶子的刘疆也在太子位上愈发感到不安，这种情况下，光武帝同意了刘疆辞掉太子位的请求，于是皇帝下诏：《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即光武帝立阴后嫡长子刘阳为太子，并改名庄，而封刘疆为东海王。

按照史料里的说法，皇帝对阴丽华极为宠爱，甚至在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八月，郭圣通的前四子刘疆、刘辅、刘康、刘延和许美人之子刘英皆就国后，皇帝却将阴丽华诸子都留在洛阳，直到明帝即位后数年，才陆续就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日，光武帝驾崩于南宫前殿，其后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

汉明帝登基后，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但在永平二年（公元59　年），窦林却“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此外，明帝还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次下诏责罚，将窦融罢官。此后，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皆以有罪而被赐自尽；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由此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于是，一时间群臣震恐，朝廷肃然。史载，明帝在位时，颇为注重整顿吏治，时常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并慎重选举官吏，以对吏治进行整顿。而在永平九年（公元66　年）时，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明确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至于在选官用人方面，明帝还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乃至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此外，明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予或赋予贫民，并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自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于是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加之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一时之间，上行下效。所以，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大汉帝国开始逐渐强盛起来。

而因为国势强盛，故而明帝时，大汉乃改弦易辙，变光武帝时因无力经营边

地，而对匈奴暂时采取的羁縻政策，为开始积极经营边疆，以与北匈奴争夺西域，永平十五年（公元72　年），皇帝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域做准备。

窦固乃是大司空窦融之侄、城门校尉窦友之子。初为黄门侍郎，谦让而有节行操守。好读书，喜兵法。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时，其世袭父亲窦友的爵位显亲侯。汉明帝刘庄即位后，窦固迁任中郎将，监护羽林。

所谓中郎将，乃是官名，秦置中郎，至汉时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属光禄勋。自汉宣帝时，始以中郎将监羽林，东汉立国后，置羽林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掌宿卫侍从。至于羽林，乃是汉代的宫廷禁军，汉初，以卫尉率南军，守卫宫城；中尉统北军，屯卫帝都。

汉武帝时，于南军新设两支天子侍卫禁兵，二曰“期门骑”，一曰“建章营骑”，皆属光禄勋。期门，掌执兵宿卫，因皇帝微行，以之“期诸殿门”故称，汉平帝时更名为“虎贲骑”，取“若虎贲兽”，“贲”者奔也，如虎奔驱攫兽而噬，言其猛烈。而“建章营骑”则因其卫守建章宫，故而得名，后更名为“羽林骑”，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义。对此《汉书》有所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属光禄勋。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

东汉时，“南军”名称已不复存在，但是“光禄勋”和“卫尉”仍然存在。“光禄勋”下设七署，其中两署分别为羽林中郎将所属“羽林郎”为皇帝的宿卫侍从，而又有羽林左、右监所属羽林左骑、羽林右骑，担任宿卫侍从和“出充车骑”。《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羽林郎，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补之。”

窦固能够以中郎将之职监护羽林，显然是因其身份显贵，因为窦固的妻子乃是光武帝女儿涅阳公主刘中礼，刘中礼是光武帝刘秀第二女，母为阴丽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赐公主号，因南阳郡涅阳县为其采邑而号为“涅阳公主”。在光武帝刘秀的五个女儿中，只有身为涅阳公主的驸马窦固得以善终，其他四位公主的驸马均因故遭到诛杀，由此可见，窦固除了其乃出身窦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其为人谨慎，且颇有能力。明帝登基当年，烧当羌侵入陇西郡，陇西郡太守刘盱兵败允街，朝廷深以为患，汉明帝诏命谒者张鸿率兵讨伐，结果于允吾县惨败，全军覆灭，是年十一月，皇帝乃拜马武为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为副，并以窦固为监军使者，率领乌桓、黎阳营、三辅招募而来的兵士，及凉州诸郡羌胡兵、解除刑枷的

犯人，共四万人出兵讨伐。此战，汉军大破之。

然而窦固的战功和谨慎并不能让其免于家族之祸，史载，永平五年（公元62年）时，窦融长子窦穆，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矫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娶其女为妻，结果被人告发，窦穆等免官，家属受株连而归故郡，只留窦融于京师。而窦固也因为这个荒唐堂兄而受牵连，被罢官，被禁锢在家中十多年。此番出征，其实是皇帝使之复出。

明帝以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显然是天下安定之后，皇帝试图效仿汉武之时，征讨匈奴，同时恢复与西域各国的联系，重整大汉之威。事实上，在当时，北匈奴也的确是到了非伐不可的情况。

明帝登基之后，留居漠北的北匈奴，连年遭受严重天灾，且又受到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攻击，加之退居漠北后，各部的社会经济开始萎缩，故而力量大大削弱，这种情况下，北匈奴多次遣使向东汉请求和亲。当然了，匈奴人的所谓和亲请求，目的性是很强的，之所以请求和亲，其一是担忧东汉北伐漠北，亦是想挑拨破坏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还有就是想在西域抬高自己声望，以及试图通过和亲与东汉互市交换所需物资。然而东汉帝国并没有答应和亲，仅同意双方互市，故而这种情况下，北匈奴开始不断入侵东汉渔阳至河西走廊北部边塞。随着东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国力增强，加之明帝登基后，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使大汉帝国与其他胡人、夷人的友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允北匈奴互市之请，却并未能够消弭北匈奴的寇掠，反而动摇了早已归附的南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改变光武时期息兵养民的策略，重新对匈奴采取战争手段，当然了，这个时期，汉廷内对北匈奴采取征伐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谒者仆射耿秉屡次上书请求进攻北匈奴，而后，明帝便让耿秉、窦固和太仆祭彤、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等人共同商议攻打北匈奴之事。史载耿秉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唯有西域，俄复内属；故呼韩邪单于请事款塞，其势易乘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属，北虏未有衅作。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汉明帝对他的建议很是赞同。而又有议者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其众”。 于是汉明帝对这一建议也很是赞赏，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是年十二月，皇帝以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统军，骑都尉耿忠为窦固之副、开阳城门候秦彭为耿秉之副，全都设置从事、司马等属官，出京屯驻凉州。



西方书籍中的汉军

而之所以选择窦固统军，并兵屯凉州，除了因为其曾有战功，且为明帝信赖之外，还因为窦固曾在河西跟随过伯父窦融，熟悉边疆事务，加之窦固对明帝说：“塞外水草丰美，此次出征可以不用带战马的粮草。”故而明帝才使之率军出京屯驻凉州酒泉郡，积极部署对北匈奴的征伐事务。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二月，汉明帝下诏大发边军，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汉军分四路出击，其中：窦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三郡郡兵及卢水羌兵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等三郡募士及羌兵骑兵万人出居延塞；另以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率河东北地、西河羌兵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塞；而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七郡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

从这一部署来看，这次出征，除了汉军之外，还有河西的羌人、胡人和南匈奴单于所部，此外还有乌桓、鲜卑部众，各路大军指向明确，其中谒者仆射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出高阙后，进袭涿邪山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奉车都尉窦固及骑都尉耿忠出酒泉塞，进击白山；驸马都尉耿秉与开阳城门候秦彭出张掖居延塞，向三木楼山进军；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出平城塞，向匈奴水进发。

其实按《史记》的记载，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遗民，西迁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獯鬻、熏育）。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而《山海经·大荒北经》也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也引张晏曰：“淳维（熏育、獯鬻）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獯鬻、熏育）在殷商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淳维又作熏育、獯鬻、熏粥、荤粥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匈奴。）此外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则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譬如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此外，根据史料中记载的“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故而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不过虽然匈奴普遍被认为是蒙古大漠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漠，最初在蒙古高原建立国家，但其势力却从不局限在戈壁大漠间，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着。那时的部落和部族联盟的情况是“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是“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

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此外还有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后来的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此番奉车都尉窦固及骑都尉耿忠出酒泉塞，进击白山，几乎就如同当年李广利率军出酒泉，目标依然是天山一带的匈奴。此番，汉军是以在这个方向活动的呼衍王部为目标。

而谒者仆射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出高阙后，直扑涿邪山，目标是北匈奴的皋林温禺犊王，涿邪山，一作涿涂山。位于高阙塞北千余里，今蒙古国境内满达勒戈壁附近一带，这里历来是匈奴的活动区域，譬如武帝时，曾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

至于驸马都尉耿秉与开阳城门候秦彭出张掖居延塞，所攻向的三木楼山便是今天的蒙古工则克山，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出平城塞，向匈奴水进发，平城塞即今天的山西大同，而匈奴水则是今内蒙古翕金河。从这四路大军的出兵地点、攻向所指来看，此时的匈奴活动地域已经不如从前了，武帝之前，匈奴南下多在右北平、辽东、朔方等地，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北京、河北、山西、陕西一带，而此时，匈奴的活动区域却是在山西、陕西、甘肃以北及新疆地域，可见，自汉孝武、汉孝昭、汉孝宣、汉孝元皇帝以来，匈奴的多次被打击及其内部的五单于争斗及后来的分裂，的确使得其彻底衰落了。

不过虽然四路大军出塞，但汉军进展并不顺利，史载，耿秉和秦彭进攻北匈奴匈林王，横越沙漠六百里，到达三木楼山后，因北匈奴都已逃走，于是不战而还。同样因北匈奴远遁无功而还的还有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所率大军及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一路，其中祭肜、吴棠因没有率军至涿邪山，而被贬为庶人。后世史书中，对于祭肜、吴棠此番出征无功而返并因此而被贬黜为庶人，多持有同情之心，尤其是对祭肜的最终结局更是唏嘘不已。

史载，祭彤早年丧父，以孝著称。因堂兄祭遵的缘故，而被拜任为黄门侍郎，常在光武帝左右。后任偃师县令，任职五年，因县内没有强盗，政绩第一，升任为襄贲县令。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匈奴与鲜卑、赤山乌桓联合，势力很强大，屡次进入边塞杀抢官民。皇帝担忧此事，于是增加边军，又派众将领分兵屯守要塞。光武帝因祭彤很有才能，遂拜任他为辽东太守。祭彤到任后，厉兵秣马，广

设探哨。而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彤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

建武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祭彤率数千人迎击之，其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祭彤遂穷追出塞，鲜卑人皆弃兵裸身散走，此战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而后，祭彤认为匈奴、鲜卑和乌桓“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在二十五年正月，派使者招抚鲜卑，并示以财利。鲜卑大都护偏何遣使进贡，表示希望能够允许他们归顺，于是祭彤慰纳赏赐，使得鲜卑稍复亲附。而后，鲜卑渐渐恢复归顺。满离、高句丽等异族“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光武帝则辄倍其赏赐，于是这些胡虏陆续归降，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全都归顺，并表示愿意为大汉效力，祭彤却说：“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这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想立功，就该回去攻打匈奴，杀了人头送来才是真的。于是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随后便是出兵进击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鲜卑等部年年相攻匈奴，辄送首级受赏赐。从此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由于祭彤为人质朴厚道，庄重刚毅，且体魄相貌超群，加之抚慰夷狄讲恩惠信用，故而夷狄都很畏惧他，但又很爱戴他，“故得其死力”。当初，赤山乌桓屡次入犯上谷，是为边害，光武帝下诏书设立悬赏，严令州郡采取行动，但却是“不能禁”。于是祭彤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也就是利用偏何去讨伐乌桓人，永平元年（公元58年）偏何率军大败乌桓人，斩杀其首领，持首来见祭彤，一时间塞外震慑，乃至于祭彤的威望名声畅于北方，西起武威郡，东到玄菟郡以及乐浪郡，各异族部落纷纷皆来归附，自此边疆不再有烽烟，朝廷乃悉罢缘边屯兵。

永平十二年，祭彤受召为太仆，然而祭彤在辽东将近三十年，极为廉洁，乃至于“衣无兼副”，于是明帝“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约”，在拜其为太仆的那日，皇帝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此后，明帝每次见到祭彤，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祭彤随明帝东巡，经过鲁地，坐孔子讲堂，汉明帝“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很显然，汉明帝是对祭彤寄予很大希望的，也对其颇为欣赏。然而这次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率河东北地、西河羌兵及南单于率兵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塞，攻伐北匈奴，却成了祭彤的人生转折点。史载，十六年，使彤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然而因为左贤王信当初和祭彤有仇，故而出高阙塞

九百余里，见到一座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而祭彤率军至此后，不见匈奴人的影踪，遂率军而还。于是坐逗留畏懦下狱免官。由于祭彤性格深沉刚毅内心持重，故而自恨见诈无功，出狱几天后，便是吐血而死，临终时，其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微绩不立，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赐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也就是说，我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接受使命没有完成，一点功劳都没有建立，即使人死了心中也实在惭愧遗憾。按道义不能没有功接受奖赏，我死后，你把我所得到的赏赐的东西全部登记交给朝廷，你自己到部队去，效力前线，来满足我的心愿。

史载，祭彤死后，其子祭逢上疏陈述父亲的遗言，明帝一向很器重祭彤，正打算重新任用，却听到其已死的消息，于是"闻之大惊"，乃召见祭逢询问祭彤病情疾状，"嗟叹者良久焉。"而辽东乌桓、鲜卑人更是思念祭彤不止，每次到京城朝拜，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而辽东吏人更为祭彤建庙立祠，四时奉祭，追思这位曾经的太守。也正是如此，《后汉书·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中才对祭彤有如此评价：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且临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请符以立信，胡貊数级于效下，至乃卧鼓边亭，灭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谓"必世而后仁"，岂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愤，惜哉，畏法之敝也……史料中说，在将祭彤安葬之后，其子祭参便是按照父亲的遗愿去见奉车都尉窦固，此后随军攻打车师有功，而升迁至辽东太守。

祭彤的一生和其在此次出征中的遭遇及最终的结局颇为让人感慨，但其所率一路汉军未有斩获也是事实。事实上，四路大军出塞，三路皆无获，唯有窦固和耿忠一路大军有所斩获。史载，二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塞后，长驱天山，大破北匈奴呼衍王部，斩杀千余人，随后又追击至蒲类海，攻占伊吾卢城并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吏卒屯田，然后返回。

伊吾卢也就是今天的哈密地区，这里古称"昆莫"，汉称"伊吾卢"，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伊吾卢和蒲类国归西域都护府管辖。在占据伊吾卢城后，窦固又以班超为假司马，使之出使西域，招降西域诸国。此后，班超成功劝说鄯善国归顺朝廷归来后，向窦固讲述了出使经过，窦固十分高兴，将班超的功劳上报，并请求再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任命班超为军司马，让他继续出使西域，终使西域三十六国重新再次归顺。

由于四路大军唯窦固有功，故而窦固被加位特进，祭彤、吴棠因没到涿邪山，

被贬为庶人。次年（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十一月，汉军再次出动，明帝以窦固与耿秉、刘张率军出敦煌郡昆仑塞，征讨西域，同时命耿秉、刘张都交出调兵符，归属窦固。汉军各部共一万四千众，其后大军出玉门，先在蒲类海边击败了盘踞在白山的北匈奴，而后又进军攻打车师。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率军再出玉门后，车师人很是紧张，当时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两个王庭相距五百多里。窦固认为汉军距后王所在不仅路远，而且山谷深险，若是攻后部，则士卒会因为苦寒而士气低落的，故而欲攻前王，然而耿秉却认为应当先去打后王，所谓“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而后，在窦固“计未决”的情况下，耿秉便奋然起身“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于是并进，此战斩首数千级。

耿秉乃是建威大将军耿弇的侄子，大司农耿国的长子，史载其博通书籍，善说《司马兵法》，尤其喜好将帅用兵谋略。初任郎官，因屡次上书谈论军事，常称“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并认为“以战去战，盛王之道”，而当时汉明帝已经有心北伐，因此永平年间，汉明帝征召耿秉到宫中，询问他前后所上便宜方略，而后拜任为谒者仆射，自此耿秉深得皇帝的亲近宠幸，史载每次公卿集会议事，汉明帝常带耿秉上殿，访以边疆之事，而起又大多很对汉明帝的心思，因此皇帝对其颇为信赖。

此番率军突进，且斩首数千，自然使得汉军声威大震，而车师后王安得则是震怖不已，于是率数百骑出迎耿秉，但窦固的司马苏安想把全部功劳都归窦固，故而驰谓安得称“大汉最为尊贵的将领唯有奉车都尉窦固，其乃天子姊婿，爵为通侯，应先向他投降”。于是安得乃还，改派其部下诸将前来迎接耿秉，结果耿秉大怒，披甲上马，率其麾下精骑径入窦固军种，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枭其首。”窦固听闻大惊曰：“且止，将败事！” 耿秉厉声到：“受降如受敌。”遂驰而赴之。安得惶恐，便走到城门，脱帽抱马足而降。耿秉便带着他去拜见窦固。车师前王也随之投降。自此，汉军遂定车师而还。

此后窦固于是上书建议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明帝下诏，拜陈睦为西域都护，又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各自统领数百人，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及前王部柳中城。次年二月，朝廷下诏命窦固罢兵返回洛阳，自此东汉逐渐恢复对西域的控制。

当然了，东汉能够逐渐恢复西域的控制，与此时班超在西域的经营是有着莫大

的关系的。

自汉武帝时，张骞始通西域，而经过长期经营，至孝宣皇帝时期，西域诸国已经臣服汉朝，于是宣帝以郑吉为西域都护，汉之号令颁行于西域。至哀帝、平帝时，虽然帝国因自身内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加之朝政混乱，对西域的经营已经是无暇顾及了，但西域诸国在这个时期还是臣服于大汉的。但而后王莽当政、篡位之后，开始对西域施行错误的方略，不再平等对待匈奴和西域各国，甚至苛刻待之，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又将包括西域各国在内的所谓“蛮夷之国”的诸王称号降为“侯”，从而引起了诸国的极大不满。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车师叛汉，降入匈奴。戊己校尉刁护遣吏属陈良、终带，扼守要害，免得匈奴车师串同入寇。结果陈良、终带及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掠吏卒数百人，共杀刀护，而后遣人告知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匈奴南将军两千骑入西域来迎，于是陈良、终带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两千余人去投入匈奴。史载，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留南将军所，而陈良、终带则径至单于庭，被单于封为乌桓都将军。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地近匈奴的焉耆国亦叛，杀西域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令击焉耆，汉军兵分两路，一路以王骏为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与西域都护李崇率兵经鄯善至尉犁，会莎车、龟兹、尉犁等西域诸国兵，共七千人，于次年击焉耆；另一路是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所率五千兵，经车师趋西南击焉耆。

结果焉耆诈降，王骏将兵分数部入焉耆，姑墨、尉犁、危须国兵倒戈，共击王骏，全军皆没，王骏大败，李崇退保龟兹。而何封、郭钦部军后至，时焉耆兵还未完全撤走，郭钦率兵击杀其老弱后，还兵退守车师。焉耆与匈奴联兵攻车师，何封与郭钦孤军奋战，终因粮尽不能坚守，遂撤回玉门关塞内。此后新莽覆灭，困守孤城多年的李崇全军覆灭，其被杀，自此西域与中原帝国彻底终断联系。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新和县玉其喀特城的于废墟中，发现了一枚铜印——李崇之印。不久，另外一枚印卧羊造型的“汉归义羌长印”也从这里出土。李崇是两千多年前西汉帝国管理西域各国的最后一任西域都护，而“汉归义羌长印”的主人则显然是汉廷所册封的羌族首领，虽然姓甚名谁虽无可考证，然而却能够印证史籍中李崇当年困守龟兹时，时曾有羌人助战的记载。

李崇所部覆灭之后，中原大地正是狼烟纷起之时，东汉王朝建立后，中原帝国才开始与西域恢复联系。史载，莎车王康派使者至河西，表示思慕汉廷。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刘秀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建武十七年，莎车王贤（康之子）遣使至汉请派都护，光武帝初从窦融建议，封莎车王贤为都护，但而后又因为敦煌太守裴遵劝阻，皇帝又收回都护之印，而是改授贤汉大将军印，莎车王贤因此怨恨汉朝，并诈称为汉都护，奴役西域各国。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车师、焉耆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请东汉帝国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当时东汉方立，光武帝正忙于巩固帝位，根本无暇顾及西域，故遣还侍子。莎车王贤见汉朝不派都护，即攻伐西域各国，于是西域大乱。北匈奴趁机而入，于是西域大部遂为北匈奴所得。

明帝中期时，匈奴频频入寇边地，一时“河西郡县，城门昼闭”，为彻底解除边患，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十二月，明帝任命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翌年春，二将与太仆祭肜、骑都尉来苗，率汉军及羌胡、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军，兵分四道出击北匈奴，也就这次出征中，班超开始崭露头角。

史载，班超，字仲升，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生在文仕，乃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虽然自幼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却孝顺恭谨，居家操持很勤苦，而且他也很有口才，能言善辩，博学多闻，史书上说他自幼熟读典籍，常拿着《公羊春秋》阅读。

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召入京任校书郎，班超和其母随之迁居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给官府抄写文书来供养母亲、维持生计。据《东观汉记》载，班超长期伏案挥毫，有一天，他对抄书感到厌烦，便停止抄写，投笔并感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旁人听了都嘲笑他，班超却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后来，他去找相面的人看相，相面的人说：“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班超问其故，相面的人说：“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后班固因其父班彪死，而回乡服丧，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班固发现班彪的《续史记》手稿，于是继续修史，却不想被人告发“私修国史”，故而班固因此被下狱于洛阳，班超得知其兄班固被诬后，上书喊冤，称班固修史书不是“私修国史”，而是要“颂扬汉德”、使人视古鉴今，汉明帝看到班超的陈情之后，下令释放班固，

并使班固官复原职，并准以续修史书。某日，汉明帝问班固：“卿弟（班超）安在？”班固答称：“班超现正于洛阳官府抄书以奉养老母。”明帝遂以班超为兰台令史，掌管奏章和文书。然而没多久，班超就因受牵连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分四道北攻北匈奴，其中奉车都尉窦固率军出酒泉塞，大军进向天山。班超随从窦固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方至军旅中，就初显其能。在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之战中，其斩俘颇多，于是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故而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由此开始了他的西域之行，使之留名于青史。

相较于父亲、兄长的文学成就，班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其以读书人投身军旅，并为汉朝稳固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成为了 “投笔从戎”这一成语的语源，而且还成了此后历朝历代投笔从戎者的榜样。而在当时，班超出使西域，所具有的意义是极大的，西域诸国当时与东汉王朝几乎没有联系，而且被北匈奴所控。而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诸郡，使得边地军民不堪其苦。所以此番出讨匈奴时，能够与西域诸国建立联系也很是重要。

经过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部下向西域进发，他们先到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当时匈奴也在极力争取鄯善王。班超使团初至鄯善国时，鄯善王广对班超等人先是礼敬备至，但不久后却是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粗疏怠慢。班超估计必有原因，于是对部下说：“你们不觉得鄯善王的礼意淡薄了吗？这一定是因为有北匈奴的使臣来，鄯善王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归顺。头脑清醒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班超认识到“必有匈奴使者来”而导致了鄯善王犹疑后，于是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诈问他道：“匈奴使者已经来数日了，现在住在哪里？”侍者很是惶恐，仓促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饮到酣处，班超故意激怒大家：“我等在绝域，欲立大功；而匈奴使者仅来了几天，鄯善王广就开始不再礼敬我们。若将我们送与匈奴，将难于活命，甚至我们的尸骸终究被豺狼吞食，若如此该怎么办？”众人都说：“现在在危亡之地，是生是死，皆由司马你决定吧。”于是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唯有趁夜以火攻匈奴使者，使其不知我有多少兵力，必定震惊害怕，可以全部诛杀他们。只要斩杀匈奴使者，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有部下说：“当与从事议之。”也就是和从事郭恂商议一番，结果班超大

怒，说：“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是个文官俗吏，听说了此时必定恐惧而泄密，不明不白地就死了，不是壮士所为！”部下一致称是。

当夜，班超率手下直奔匈奴使者驻地，时忽起大风，于是班超命将士十人持鼓藏在匈奴人驻地之后，约好一见火起，便猛敲战鼓，大声呐喊，而又以其他人持拿刀戈弓弩埋伏在营门两边，之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惊吓之下，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吏兵斩杀三十多人，其余匈奴百余人均被烧死。

次日，班超才将此事告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着脸色有所变化，班超知其心思，明白此人心存嫉妒，便对他说：“从事你虽未去，但我又怎么会独占功劳呢？”于是郭恂脸露喜色。此后班超请来了鄯善王广，将匈奴使者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于是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大汉，并派王子作质子，自此鄯善国遂归顺汉室，而班超也因此而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名句。

在完成使命后，班超率众回师，并把情况向窦固做了说明，窦固大喜，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明帝选派使者再度出使西域，然而皇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便下诏给窦固说：“有班超这样的官吏，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可以提拔班超担任军司马，令其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 于是班超拜受使命。而窦固以为班超属下人马较少，试图为之增员，但为班超所拒绝，其称“愿领原先所率之三十余众足矣。若有不测，人多反而累赘。有不虞，多益为累”。

此后，班超继续他的西域之行，其率众从鄯善前往于阗国，于阗国是当时西域强国，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杀其国王，于天山南道称雄。加之这时匈奴人正派使者驻在于阗监护其国，名曰监护，实则掌握着于阗的大权。也因此班超至，广德对其不甚礼遇，态度也颇为冷淡，因该国信巫，故而巫风兴盛，有巫师对阗王广德说：“神怒何故欲归汉，汉使有騧马，需取之祠于神”。于是广德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索马，班超暗中早已清楚事情原委，故而声称同意，但却称需巫师来取。待巫师到来后，班超怒斩之，将首级送与广德，并说明利害，以道义责之。于阗王广德早已是耳闻班超在鄯善击杀匈奴使者之事，故而大为惶恐，因而当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汉。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及其臣子们，自此成功镇抚于阗。

此后，班超又带领自己为数不多的手下开始了新的征程。当时，龟兹国王建为

匈奴人所立，其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天山道肆无忌惮，甚至占据西域北道，并派兵攻破疏勒国，杀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也因此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春，班超率所属从小道到疏勒国，行至距离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之处，班超以属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并对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也就是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田虑到后，兜题见田虑只身来见，势单力薄，故而不肯归降。田虑乘其不备，疾步上前，劫缚兜题。事出突然，兜题的部下们意想不到，皆惊惧奔逃，于是田虑派人田虑乘马疾驰，急报班超。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召集疏勒全部将吏，向众人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并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哥哥之子忠为疏勒新王，疏勒人大悦。此后疏勒王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班超却表示了不同意，他从大局出发，试图宣示汉王朝的威德信义，故而称"杀他无益于大事，应该让龟兹知道大汉的恩威"。于是说服众人，释放了兜题，遂平疏勒，但疏勒自此之后却与龟兹结怨。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先后平定鄯善、于阗、疏勒三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十一月，明帝再命窦固、耿秉率骑兵一万四千众出敦煌昆仑塞，攻西域。汉军先在蒲类海大败匈奴于白山，而后攻车师国。当时车师分前后二部二王，前部在南、后部在北，两王王庭相距无奈余里，车师前王是后王之子。耿秉力排众议，先攻位于北方的车师后王安得，迫使后王投降，前王闻之震恐，亦归降，汉军遂平车师。这种情况下，窦固奏请天子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明帝准奏，以陈睦为都护，以耿恭为戊校尉，驻守后王部的金蒲城，并以关宠为己校尉，驻守前王部的柳中城。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八月，汉明帝驾崩，太子（即汉章帝）即位。焉耆国趁汉朝大丧之际起兵攻汉，龟兹等也发兵攻打疏勒，汉西域都护陈睦被杀，北匈奴围困己校尉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国亦反叛，与匈奴合围耿恭。此时孤立无援的班超与疏勒王忠互为椅角，首尾呼应，在盘橐城据守。

汉廷认为陈睦已死，西域大势已去，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遂下诏罢都护官及戊、己校尉，放弃西域，并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疏勒举国忧恐，因为他们知道班超此次一走，疏勒又要陷入被攻伐、臣服于匈奴的处境中了。时有疏勒都尉黎弇说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

不忍见汉使去。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尔归。”说罢，自刎而死。班超虽也不忍，但王命在身，只能继续东行。

此后，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王侯百姓皆都放声大哭，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甚至有人伏地抱着班超的马腿，班超不得前行。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绝不会让他东归。而他也想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定不再返汉，而是重返疏勒。

而在班超返回疏勒之后，才知在自己东归之后，疏勒有两座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联合，意图造成大乱。班超当即遣人捉捕反叛首领捕杀，并率军击破尉头国，杀六百余人，使疏勒复安。

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又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士兵一万众，攻破姑墨国，斩首七百，自此龟兹遂孤立。

龟兹为西域北道诸国之一，当时是西域诸国中最为强大，《汉书》中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酐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汉武帝通西域后，龟兹夹在汉与匈奴之间，多次反复，袭杀汉使。汉昭帝元凤中（公元前78年左右），汉使傅介子出使大宛，途经龟兹，责问其王。龟兹王向傅介子谢罪。待傅介子从大宛返回，龟兹王告诉他，匈奴使乌孙的使者返回也住在龟兹。傅介子率随从吏卒，袭杀匈奴使者。后汉昭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任命入汉为质的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屯田轮台。

之前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军途经扜弥，恰逢赖丹要去龟兹为质。李广利派人责问龟兹王，不许他入质别国王子，并将赖丹带回长安。这次汉使赖丹率军屯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向其王进言：赖丹受汉官，逼近龟兹屯田，一定会对龟兹造成威胁。龟兹王听从姑翼之议，派兵攻杀赖丹，后又害怕，遂上书谢罪，故而大汉没有立即出兵龟兹。

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长罗侯常惠监护乌孙发兵五万大破匈奴后，回朝途中，上书请击龟兹，以偿杀赖丹之罪。大将军霍光令其见机行事。于是，常惠调集龟兹以西诸兵两万，又遣副使调集龟兹东面诸国兵两万人，令乌孙发兵七千，从三面进击龟兹。龟兹王极为惊恐，急忙相告，杀赖丹是前王听信贵人姑翼所干，与己无关，并执姑翼来见常惠。常惠斩姑翼，罢兵。其后龟兹王绛宾娶乌孙汉解忧

公主之女为夫人。绛宾及其后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来朝，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后数来朝贺，学习汉朝衣服制度，归国后，按汉朝制度治理宫室。汉成帝、汉哀帝时，龟兹与汉亲，诚心臣服于西汉。然而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时，因莎车王贤杀龟兹王，将龟兹分为龟兹、乌垒国，并封则罗为龟兹王，封驷鞬为乌垒王。几年后，龟兹国人杀则罗、驷鞬，遣使匈奴，请立新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于是龟兹属匈奴。

建初五年（公元80年），班超在四面受敌的疏勒孤守五年后，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并提出了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其称："窃见先帝欲开西城，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

由于北道诸国多为匈奴控制，而南道诸国，只有龟兹一国与汉为敌。故班超提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并分析西域各国同龟兹的矛盾，认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后，汉章帝览表，知班超功业可成，于是汉廷发兵千人就班超。平陵人徐干也有平定西域之志，主动上书请求奋身异域，辅佐班超，朝廷当即任命他为代理司马，派他众前去增援班超。

就在汉军出塞时，莎车以为汉兵不会来，于是降于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又反叛，正好徐干率兵到疏勒，班超就与徐干一起，杀掉了番辰，斩首千余级，平息了叛乱。而班超在攻破番辰之后，欲图龟兹。因乌孙国兵力强盛，故而班超认为可以借助乌孙之力，于是上书："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章帝采纳了其建议，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天子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借其乐队、旗帜和仪仗。升徐干为军司马，另遣卫

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初到于阗，正逢龟兹进攻疏勒，其竟因惊恐而不敢再向前行，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居然上书给朝廷，称平定西域劳而无功，又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闻之，叹息不已，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于是，毅然让妻子离开，以自明。章帝深知班超公忠体国，故而下诏书切责李邑：“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并命李邑至班超处，接受其节制调度，并让班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让李邑留在西域。

班超当即让李邑带着乌孙侍子回京，虽然徐干劝班超：“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可班超说：“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次年（元和元年，公元84年），大汉帝国又以和恭为假司马，率兵八百，增援班超。于是班超调集疏勒、于阗的兵马进攻莎车。莎车派人私下联系疏勒王忠，用重利贿赂，于是忠背叛班超、归顺莎车，西保乌即城。班超遂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集兵力攻忠。此后，康居国派精兵助忠，班超久攻不下。当时月氏刚和康居通婚，互相亲近，班超便派使者以锦帛厚利月氏王，使之对康居王晓以利害，康居王于是罢兵，扣押了忠，并将他带回国中，于是乌即城降于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6年），前疏勒王忠在说服康居王后，借来了一些兵马，据守在损中，与龟兹勾结密谋，并派人向班超诈降，班超早洞见其计，于是将计就计，佯装答应他投降。忠大喜，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秘设伏兵以待之，并为之设宴奏乐。酒宴中，班超喝令属下绑缚忠，随即斩杀之，并趁机进军击败其兵众，杀七百余人，于是西域南道遂通。

元和四年（公元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卒二万五千众，再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兵五万救援莎车。班超召集将校和于阗国王商议军情，其故意说：“现在兵少不能克敌，为今之计不如各自散去，于阗王从此东归，我也西归。可等到夜鼓声响起就动身。”然而班超暗地里故意放松对龟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报信。龟兹王闻之大喜，亲率万骑于西边截杀班超，并派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在东边阻击于阗王。班超侦知其等已经出兵，于是迅速命令诸部率领兵马，在鸡鸣时分直扑莎车。胡人惊恐，四处逃散，班超追斩五千余人，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国遂降，龟兹王等也自散而去。班超由此威震西域。

此后，因当初大月氏曾经帮助汉朝攻伐车师有功，故而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的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物，欲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个要求，月氏王由是怨恨。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夏，大月氏派其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兵少，众人都很恐慌。班超却向部下解释说："月氏兵虽多，但逾葱岭数千里远来，没有后勤运输，何足担忧？只需收好粮食，坚守不出，其因饥饿困苦自会投降，不过数十日就可以见分晓。"而后，大月氏副王谢统军攻班超，无法攻克，加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疲惫不堪。班超估其粮草将尽，必派人到龟兹求救，故而预先以兵数百在东边埋伏拦截，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贿赂龟兹以求援。班超伏兵大出，杀死了使者，谢大惊，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够投降，于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由是大震，与汉朝和好如初，并且每年向汉朝朝贡。

北匈奴和大月氏的失败，使西域诸国皆为惊恐。次年（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尽皆归降。是年冬十二月，汉廷拜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并拜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送其就国。班超和姚光胁迫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利多，而扶立白霸为王，之后姚光又把尤里多带回了京师。此后班超率众驻扎在龟兹它乾城，徐干驻在疏勒，并复戊己校尉，领兵五百驻车师前部高昌壁，同时设置了戊部侯，驻守在车师后部的候城，与戊己校尉相距五百余里。

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为曾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汉。其余各国，均已平定。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共七万众，并汉军将士及商贾一千四百人，征伐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

听闻消息之后，焉耆王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 班超部下有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其说："这不是你们能考虑到的。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无事，就亲率众臣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珍奇礼物。但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其国境。焉耆国有一处险要之地叫苇桥，焉耆王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毁掉苇桥。然而班超却从别的道路涉水而进，于七月最后一天到焉耆，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大泽中安营。焉耆王见班超率军而来，

出乎意料，大惊，想驱其部众逃入山中。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入质京师，于是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并约定时间宴请诸国国王，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相继来到班超处。而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都逃到海中，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后，众人坐定，班超突然变色，责问焉耆王道："危须王为何不到？腹久等为何逃亡？"喝令武士将广、泛等抓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接着又纵兵抢掠，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之后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安抚之。 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遣使送人质归附了东汉王朝。

永元七年（公元95年），朝廷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班超时年六十三岁。后人称之为"班定远"。班超的封地在今陕西汉中镇巴县，该县在清朝以前隶属于西乡县时曾设"定远厅"即源于此。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即波斯帕提亚王国，今伊朗境内）诸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一说是地中海沿岸。而后因安息人抵谓英："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遂止步而回，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这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原帝国官吏到达的最西之处。

而就在这次出使之后，班超感觉久居在偏远的异地，尤其是其年老以后，逐渐开始思念故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因年老思乡，班超上书请求汉和帝准许其卸任并回到中原，信中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而他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皇帝能够将班超召回国，奏章送达后，和帝被感动，于是召班超回朝。班超在西域共三十一年。两年后的八月，班超回到洛阳后，拜官射声校尉。然而班超的胸胁本来就有病，在回国后，病情加剧，和帝派遣中黄门慰问，并赐给他医药，但皇帝的恩宠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同年九月，班超病死，享年七十一岁。皇帝很是怜悯，特派使者专门吊唁致祭，赏赐极为优厚，并以其长子班雄嗣位。

关于班超的一生，正如范晔在《后汉书》中所称的那样：祭肜、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慬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

一时之士也。

史载班超自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东归后，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继任为西域都护，班超临行前，班超被召还的时候，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交代工作的时候，任尚对班超说："君侯您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惭愧地在您之后，责任重大，智虑浅短，您应该可以教我一些事情吧。"班超说："我年纪大了，变得愚笨了，您出任要职，我班超怎能比得上呢？逼不得已，愿意说几句甚大高明的话。塞外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有罪才被迁徙去充边的屯兵。而蛮夷又怀着禽兽心肠，很难收养而容易坏事。现在您秉性严厉而又有些急躁。水清了就没有大鱼，严于监察就不得下面的欢心。您应该宽容冷静，简易行事，小过失从宽处理，紧紧抓住重要的环节就行了。"

然而虽然班超告诫任尚"水清无大鱼"，为政应松弛简易、"宽小过总大纲"，但任尚不以为然，甚至班超走后，任尚还私下对他的亲信说："我还以为班君有什么奇策，现在他所说的不过平常言论罢了。"其后，任尚为西域都护才数年，西域相继反叛，任尚也因有罪被召还。

史载，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西域反叛诸国围攻任尚于疏勒，任尚上书求救。时朝廷以梁慬为西域副校尉，将河西四郡羌胡兵五千骑救之，未至而围解。朝廷遂罢还任尚，以段禧为西域都护，以赵博为西域长史。时段禧、赵博驻龟兹国它乾城，梁慬以为城小不坚，于是说服了龟兹王白霸，允许他们率汉军进驻龟兹王城。龟兹王属下不满，于是叛变，联合温宿、姑墨，合兵数万，围困汉军于龟兹王城。梁慬等率汉军八九千人守城并出战，持续数月，最后汉军斩敌万余、俘虏数千，联军败走，龟兹乃平。段禧等虽保龟兹，但道路阻隔，檄书经年不通，且朝臣多有徒费兵饷之论。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六月，朝廷下诏罢西域都护，并罢伊吾、柳中屯田，段禧、赵博、梁慬等将士俱还关内。此时距班超之死，仅五年。

其实，任尚不明白的是，班超在西域共达三十一年，不仅善于用武力镇抚各国，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充分利用远交近攻之术，也正是如此，在班超的努力下，西域诸国才得以平定，再现了一百年前，汉孝宣皇帝时的辉煌。任尚对此不能理解，他无视班超离开时留给他的"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劝告，自然引来西域大乱了。

其实西域的这种反复，从车师国的历史便能够"一斑窥全豹"，史载永平十七年

（公元74年），窦固等征讨车师，前、后王俱降，汉朝遂重设戊己校尉，分屯车师前、后国。不久，北匈奴围攻汉军屯田军卒，于是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放弃车师。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窦宪击破北匈奴，车师前、后王重新归降汉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车师后王击破前王，次年，汉朝派兵斩车师后王，车师遂定。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朝再度放弃西域。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汉敦煌太守以索班屯驻伊吾，车师前王复降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车师后王引北匈奴攻杀索班，击走前王。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汉西域长史班勇击败北匈奴，次年，班勇进击车师后国，斩其王军就，再次年立加特奴为后王，屯田于柳中。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出伊吾攻杀北匈奴的呼衍王，安定了车师局势。其后车师仍然存在了数百年。车师前国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被高昌的沮渠安周引柔然兵攻破而灭亡，王族逃入北魏，至此，这个国家才消亡了。而在这之后的两百年后，西域又将面对统一后的中原，而大唐帝国也将在这片土地上重现汉家荣光。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八月，汉明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汉章帝，也就在这一年，一封来自于驻屯于柳中城的汉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关宠的紧急求援文书送到了刚刚继任皇位的汉章帝手里。 情况大概是这年的三月，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两万骑入寇西域，匈奴大军势如破竹，攻破了归附汉帝国的车师后国，招降了西域北部焉耆等小国。

西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因为汉廷收到这封求救信的时候，已经是当年年底了，而匈奴寇入西域，焉耆和龟兹攻伐陈睦，则是六月，毕竟关宠部、耿恭部之汉军合计只有千余人，面对两万匈奴铁骑，显然不能守，所以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派兵救援西域的汉军了。

事实上，匈奴人的这次反击时机选得的确很好，前一年，窦固平定车师之后，奏请明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巳校尉，于是皇帝下诏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附近）；又以谒者关宠为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市附近），各领兵数百人，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诏令窦固等罢兵回京，然而也就在汉军回师后，匈奴大军便南下了。

其实此时，西域的汉军正在耿恭的率领下，还在坚守。史载，耿恭，字伯宗，乃是扶风茂陵人，为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之弟耿广的儿子。当初光武帝起事后，乃赖其麾下众人用事，得以一统天下、中兴汉室，而后至永平三年（公元60年）时，汉明帝刘庄图画开国诸勋于洛阳南宫云台阁，计二十八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范晔的《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也就是说，这二十八人是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战功卓著的将领。而耿弇则为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耿弇自从更始元年（23年）投奔刘秀后，随光武帝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建武元年（25年）拜建威大将军，而其父亲喻糜侯耿况、弟弟耿舒、耿国、耿广、耿举、耿霸，皆为汉之名臣，史称：“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

漢明帝像



汉明帝

翻开东汉的历史来看，耿氏一族在东汉其实是豪门大家，其子弟两人当上了大将军，九人当上了将军，位列九卿的有十三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三人，列侯达十九人，担任过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级别官员的有数百人。自耿弇始，耿氏一家三世用兵，仍立功勋，之前远征西域平定车师的耿秉便是耿氏的第三代名将，其乃是耿国之子、耿弇之侄，史载其为度辽将军，巡视边塞七年，匈奴人感念其恩德。后命其为执金吾，越发倚重。章帝到各地出巡，耿秉常领禁兵随从，死后和帝赐朱棺、玉衣，命五营骑士三百余人为其送葬。匈奴闻秉去世，“举国号哭，或至嫠面流血。”

耿恭虽然此时名声还不如耿秉显赫，但其领兵能力却不下于自己的伯父、堂兄弟。史载，耿恭的父亲耿广很早便已去世了，于是耿恭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但其慷慨多谋略，有将帅才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担任司马，跟随骑都尉刘张、奉车都尉窦固、堂弟驸马都尉耿秉等出征西域，大破车师，此后汉廷在西域恢复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兵后王部金蒲城。耿恭到达任所后，送移檄乌孙，示汉威德，乌孙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并献上汉宣帝时赐给公主的赌具，希望派乌孙王子入朝侍奉。于是耿恭派使者赠赍金帛，迎其王子入朝侍奉。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骑攻伐车师，耿恭遣司马率三百兵救之，结果半途与匈奴大军遭遇，全军覆没。此后匈奴攻杀车师后王安得，进而包围金蒲城。耿恭登城搏战，并用毒药涂于箭矢之上，传语匈奴说：“汉家箭神，中箭者其创口必有异。”遂发强弩射之，匈奴中箭者，伤口皆烂，于是怪力乱神下，竟十分恐惧。正当此时，暴风雨大作，耿恭率部随雨击之，杀伤甚多；匈奴震怖，以为汉家神兵，于是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即撤兵。

五月，耿恭因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边有溪流可以倚险固守，便引兵转而占据该城。其实之所以率军转至疏勒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疏勒城正当山南山北之间的要道，驻军于此，可以与柳中城相互呼应，以绝匈奴攻略山南西域诸国之念。匈奴人很快发现了耿恭部的意图，七月，北匈奴再次前来，耿恭招募先锋几千人直奔北匈奴，北匈奴骑兵逃散，其后匈奴大军复来，将疏勒城围困，并在城下堵绝溪流，使汉军断水。失去水源，耿恭不得不在疏勒城中挖井，然而汉军城中掘井十五丈，仍不出水，吏士渴乏已极，不得不“笮马粪汁而饮之”。耿恭深知无饮水，便只

有死或降两条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耿恭仰天长叹说：“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剌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于是重整衣冠，向枯井虔诚再拜，“为吏士祷”。奇迹发生了，转眼工夫，井中竟水泉涌出，众人齐呼万岁，于是耿恭命人在城上扬水示威，以示水源充足，匈奴见状，大惊，以为有神明在帮助汉军，不得不暂且退去，但却依然试图想要困死汉军。

然而就在此时，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六月，西域的焉耆和龟兹两国率军攻打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其身死。很显然，焉耆的叛乱对于耿恭等汉军来说，是极为致命的。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其位于天山中部的焉耆盆地（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中，环抱在天山、霍拉山和库鲁克塔格山间，东临博斯腾湖、东通高昌、西临龟兹，盛时领地包括今焉耆、库尔勒、博湖、和硕、和静、尉犁等县市。都员渠城，又称河南城（今博格达泌古城，一说今焉耆县城）。

西汉时，焉耆有人口三万二千余，因为在汉开西域之前，匈奴曾为漠北、西域霸主，故而焉耆隶属于匈奴。《汉书》卷96《西域传》记：“西域诸国……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说，焉耆的地理位置最接近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的王庭，故而日逐王设置的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犁间，将诸国置于匈奴的严密控制之下，并向各国征收赋税，转输匈奴。汉武帝初开西域时，主要是争取控制丝路南道，即所谓羌中道，张骞凿空、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其实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此后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汉遣扜弥国太子赖丹率一介偏师，屯田渠犁。史料记载，赖丹为扜弥国太子，扜弥国东北与龟兹接壤。李广利伐大宛还军经扜弥时，闻太子赖丹质于龟兹，派人责问龟兹，并将赖丹带至京城长安。后赖丹被委以重任返回西域领护屯田，不过由于赖丹主持轮台屯田时，西汉在塔里木盆地的势力经营还不稳定，而亲匈奴的龟兹贵族害怕汉朝势力进入其国，因此抵制赖丹屯田，并将赖丹杀害。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遣常惠以校尉出任乌孙监军，发兵攻匈奴，又遣将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东西夹击，车师降汉，夺取了碛口。次年常惠使乌孙还，又征诸国兵围龟兹，责以前杀赖丹事，龟兹王将杀害赖丹的贵族姑翼交给常惠，常惠斩之，自此汉朝控制了龟兹。其后，宣帝又派遣曾随常惠屯田赤谷的辛庆忌，屯田焉耆，初置校尉。《汉书·辛庆忌传》记：“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

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从这里可见焉耆归汉，应该与常惠平龟兹差不多时间，也就是本始三四年间。

至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时，宣帝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所率的一支汉军又进入昔日赖丹驻兵的渠犁，再次经营屯田，此后根据《汉书·外戚传》中记车师降汉后，匈奴发动反攻，召车师王交出太子军宿入匈奴为质，军宿乃焉耆外孙，遂逃亡焉耆避难，车师王也逃亡乌孙，车师另立乌贵为太子，复臣于匈奴。说明车师降汉后又有所反复，而焉耆则已坚定地附汉。其后焉耆又随郑吉所率的西域诸国大军，参加攻讨车师战役，逐乌贵，复立军宿。但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时，汉军又在匈奴的大举反攻下放弃车师，郑吉返师渠犁，军宿也率领一部分车师人随同西迁，并在此屯田积谷，积蓄实力。

其后，西域形势的演变逐渐对汉有利，当时匈奴国中大乱，五单于争立，主政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也卷入了这场政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时，日逐王失势，有意降汉，为郑吉护送入汉，自此，匈奴势力全面退出了西域，僮仆都尉罢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始置西域都护，郑吉被册拜为首任西域都护，驻焉耆西南乌垒城，监护北道诸国，在当时，西域诸国尽弃匈奴符契，改换汉朝印绶，颁行汉朝历法，郑吉还代表汉廷授予西域诸国王汉朝封号，自此包括焉耆在内的西域诸国为汉所有。根据《汉书》卷96　《西域传》的记载，当时“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这就是汉文史料中对焉耆最初的记载，而焉耆国在降汉之后，还新设了　“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等建置，可以说，此时的焉耆不仅是西域大国，而且其对汉颇为亲近。

王莽代汉后，其政策乖戾，举措失宜，与匈奴绝和亲，于是匈奴攻西域，此后焉耆首先响应，攻杀西域都护但钦，一时间西域诸国皆反，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遣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讨焉耆，焉耆诈降，袭杀王骏，不久李崇也殁于龟兹。而戊己校尉郭钦初战小胜，擢为西域都护，后亦败于焉耆，郭钦战殁，西域汉军几乎全部覆灭，自此西汉在西域的一切军政建置全部罢废。唯莎车一国仍与匈奴相抗。

东汉初，焉耆受制于莎车王贤，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焉耆率车师、鄯

善等十八国同遣使入朝，要求重设西域都护，以削弱莎车在西域的影响，但在焉耆向汉遣子入侍并献珍宝，请都护时，汉光武帝刘秀却不出兵，于是侍子留敦煌，后逃归。此后莎车在同于阗的交攻中衰落下来以后，匈奴势力重新支配西域，而焉耆则以西域亲匈奴派势力的角色遂代之而兴。

可以说，此时的焉耆是北匈奴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东汉开西域的主要阻力。自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来，汉明帝两次派遣大将窦固出师，征讨匈奴呼衍王，十六年汉攻匈奴，取伊吾庐，创置宜禾都尉。十七年，汉军又平定车师前后部，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同时遣班超为使，绕行南道，招降于阗，转入中道，平定疏勒，并以此二国为始重树汉帜。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西域的局势逆转，北匈奴包围了天山北麓的汉军，与此相呼应，“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 归属匈奴，而在天山南麓汉兵全军覆没后，匈奴率其攻于阗，可见焉耆王广已成为天山北麓城邦诸国亲匈奴的代表人物。

就在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被焉耆所杀时，北匈奴还在柳中城包围关宠所部，就在关宠向朝廷发出求援信后的不久，柳中汉军全军覆灭。至此时，除耿恭外，大汉在西域仅存孤立无援的班超，可以说，自耿恭、班超所守之处外，西域虽大，却没有大汉的立足之地。

祸不单行，是年八月，汉明帝驾崩，朝廷正是大丧之机，新皇登基，朝事不稳，故而没有理会西域，更没有派出救兵，于是这种情况下，车师再度反叛，和北匈奴合兵攻耿恭，形势十分险恶。这时耿恭仅有的支持来自车师后部王的寡妻，她是远嫁塞外的汉人的后裔，因重耿恭为人，见汉军久久被围，故而想尽办法派人将汉军急需的给养粮饷送到疏勒，又多次将匈奴兵的动向暗中告知耿恭，因此汉军得以多支撑了一些时日。就这样，困守数月之久，城中汉军不断有人战死、病死、饿死，最终只剩下了数十人，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想要投降匈奴。

被困日久，城中汉军粮食耗尽，便用水煮铠甲弓弩，在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煮熟之后，耿恭和汉军将士便是以兽筋皮革为食，吞嚼充饥。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身陷绝境，故而使人招降耿恭，并称可以封他为王，史载“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结果耿恭引诱使者登城，亲手将他杀死，然后就在城上，对着匈奴的大军，将尸体的肉割来烤着吃，匈奴单于大怒，又增派援兵围困耿恭，但仍不能攻破疏勒城。关于这段历史，《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对此记载“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

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宠向朝廷请求救援的上书到了汉廷，面对西域而来的求援文书，刚刚登基的章帝让公卿们讨论这事。司空第五伦等朝臣认为不宜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贸然派军前去，很容易为匈奴击破，而且此时已经是冬季，塞外天气恶劣，路途遥远，加之后勤艰难，此时耿恭等汉军将士也许已经覆灭，故而在西域的失去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何必再去徒劳无功？西域失去，可以日后再行恢复，如果救援大军被击破，则汉军显然白白蒙受损失，很显然，在这些重臣们的眼里，耿恭等汉军将士是可以被牺牲的。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譬如司徒鲍昱就坚决主张救援西域汉军，其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这意思便是如果不救的话，冷了将士之心，而后匈奴得志于西域之后，再来入寇边塞，陛下还能盼望将士们奋力抗敌吗？还有就是耿恭、关宠二部兵不过百，匈奴围之，几个月都不能够攻下，可见他们的确实力不济。鲍昱又称“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

于是汉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建议，派耿恭的堂兄耿秉屯守酒泉，行太守事，自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汉章帝即位后，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使之巡视凉州边境，慰劳赏赐城堡营寨的羌人、胡人。此番，汉章帝在以耿秉屯驻酒泉郡，又派酒泉太守秦彭（一作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征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郡兵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前往救援耿恭。

就这样，汉军在风雪中西出玉门关，去找寻那也许已经覆灭的汉军将士。

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酒泉太守秦彭等人率军向柳中而行，大军首先进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俘虏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匈奴惊慌而逃，车师复降。然而长途跋涉的秦彭大军未至柳中时，就已经听闻关宠已全军覆没，诸将认为更加艰难的耿恭部更不可能存在了，于是秦彭、王蒙、皇甫援等认为不能冒险把全军置于危险之地，故而决议回师。但此时，耿恭的一位军吏范羌当时正在王蒙军中，他坚持要求去援救耿恭。之所以范羌会在军中，是因为头年秋，耿恭派范羌至敦煌为所部领取冬装。王蒙出塞后，范羌就随军返回西域。

虽然范羌一再请求不要放弃固守疏勒的耿恭，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将军会冒险而行，毕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前去救援也许已经不存在的汉军，毕竟是不怎么现实的。关宠已全军覆没，而耿恭距离柳中还有一段路途，也更是深入险境，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在范羌的坚持下，王蒙决定分兵两千，由范羌率领，接应耿恭。

范羌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时天降大雪，天山北坡雪深丈余，范羌所部放弃了辎重，日夜兼程赶往疏勒，不过虽然援军筋疲力尽，但依然勉强到达。耿恭等人夜间在城中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北匈奴来了援军，大为震惊，仅存数十人登城而战，而后范羌隔山涧大呼："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于是城中立时高呼万岁，城门大开，众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

次日耿恭率部东归，匈奴一路追杀，汉军边战边走。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不时有饥饿困顿的军士倒地不起，死于路边，当年三月，至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这十三人史书留名的有：耿恭、范羌、石修、张封，他们无一不是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时人以为耿恭守疏勒，"节过苏武"。史载，中郎将郑重在玉门关迎候耿恭，亲自为耿恭及其部众"洗沐易衣冠"，并倡言，处在"万死无一生之望"的绝境，"恭之节义，古今未有"。此后，郑重上书朝廷，称"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的确，在当时，耿恭等人坚守疏勒城的意义的确很大，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牵制了北匈奴在西域的扩张，也正是如此，《后汉书》作者范晔，才在史书中称耿恭事迹为"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甚至赞以"义重于生"之语。

史载，此后耿恭到达洛阳后，鲍昱上奏称耿恭的节操超过苏武，应当封爵受赏，与皇帝拜耿恭为骑都尉，任命耿恭的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县丞，剩下九人都授予羽林之职。耿恭母亲在此之前就已去世，等耿恭回来，补行丧礼，汉章帝下诏派五宫中郎将馈赠牛和酒解除丧服，可谓是荣誉一时。

建初二年（公元77年），耿恭升任长水校尉，同年八月，金城、陇西的羌人反叛。耿恭上书言方略，谈征羌人之策，汉章帝召耿恭入宫询问详情，此后，皇帝遣耿恭率五校士三千人，与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史载耿恭屯守于袍罕，屡次和羌

人交战。次年秋，羌人烧当部落首领布桥为马防所败，遂降汉，于是汉章帝诏马防回朝，而留耿恭继续击讨其他没有归附的羌人部落。此后耿恭斩首千余，获牛、羊四万余头，于是勒姐、烧何等等十三个部落共数万羌人尽皆向耿恭归降。但由于当初耿恭出陇西时，曾上书奏事，称“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因而得罪了马防，故而马防被诏还京师后，监营谒者李谭按马防之意，劾奏耿恭不忧军事，接受诏书时心有怨望，于是耿恭获罪，坐征下狱，并被罢免其官职遣送本郡原籍，后卒于家中。

其实耿恭率众归玉门后，西域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自永平十八年，明帝死，焉耆与龟兹攻杀都护陈睦及吏士二千余人，归属匈奴，匈奴率其攻于阗后，西域其实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当苦守金蒲城、疏勒城的耿恭也为前来接应的汉军迎还内地后，西域汉军唯剩班超一部，不过虽然班超远在今新疆西端，却凭借于阗、疏勒二国，而一直坚守于西域，使得汉帜不倒。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上书章帝，请求汉廷派遣援军，并重置西域都护。并率领人数并不众多的汉军相继击败了莎车，并驱逐了中亚强国大月氏的入侵，此后使得大汉开始重新在西域恢复支配地位，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北道诸国都向汉朝归降，班超被拜为西域都护，移驻它乾城，此时唯焉耆、危须、尉犁三国不肯降。三年后，永元六年秋，班超亲率汉军，并发龟兹、鄯善等国兵七万人，吏士、商客一千四百余人，讨焉耆等国，史载“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此后，班超斩焉耆王广、尉黎王等，“更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根据史书中记载的俘获人丁一万五千余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见当时焉耆的国势强盛。

而后，班超主政西域长达三十年，直至七十以上的高龄才重返故乡。班超返汉以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6年），西域复乱，焉耆王元孟也叛降匈奴。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率先派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出屯伊吾，车师前王和鄯善王皆降，但时仅数月后，索班就为北匈奴挟同车师后部王攻杀，进而北匈奴又击走车师前王。鄯善王危急，向曹宗求救，于是曹宗上表朝廷力主重开西域，起先各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而班超之子班勇却认为不可。

于是朝廷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不过此番

东汉王朝虽然“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然多次与车师合兵共犯边地，以至于河西大受其害。这种情况下，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四月，汉朝委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塞，屯柳中。次年，班勇至楼兰，鄯善、龟兹、温宿相继附汉，班勇进而发诸国步骑兵万余攻车师前王庭，大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车师前部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此后班勇还师屯田柳中。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七月，班勇率敦煌、张掖、酒泉六千余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击车师后国国王军就，破车师后部，斩首俘获八千多人，马畜五万多头，并将其王军就、匈奴持节使者生擒，带至索班战死处斩之，传首京师。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十一月，班勇以汉廷名义册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遣部将斩杀东且弥王，并另立其本族人为王。于是，车师等西域六国，全都归附汉朝。这年冬，班勇又发西域诸国兵大破匈奴呼衍王，降其众二万余，此战中，班勇还使加特奴亲手斩杀生得的单于从兄，以使车师、匈奴之间从此结下仇恨。不久之后，北单于亲率万余骑来攻车师后部，抵金且谷，班勇遣其将假司马曹俊率军迎战，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此后，呼衍王部迁到枯梧河畔，自此，西域平定。而这时，西域城郭诸国都已降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六月，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攻打焉耆。汉廷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配合班勇，而班勇则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两道进击焉耆，班勇率军走南道，而张朗三千汉军则走北道，约期俱至焉耆。此后，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两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不久，班勇得到赦免，后来老死家中。

虽然元孟向张朗请降时，“元孟竟不肯面缚，惟遣子诣阙贡献”。但焉耆再次归附于汉。后顺帝继立以后，汉朝的势力再次退出西域，此后，因疏勒发生反汉叛乱，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凉州刺史孟佗使从事任涉率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巳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等合西域龟兹、车师前、后部兵共三万余人，进讨疏勒，焉耆也参与了这次征讨。但疏勒王和得率军坚守桢中域（今地不详），汉军连攻四

十余日，城不能下，撤军还。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也不能复治。这种情况下，焉耆也再度叛汉，而这时已进入东汉末世了。

第五章 铜驼街

汉匈联军
——窦氏外戚对北匈奴的毁灭性打击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驾崩于雒阳东宫前殿，年四十八岁。其在位的十八年间，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蛮夷侵扰的威胁，使汉跟周边蛮夷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明帝也一改光武时期息兵养民的策略，重新对匈奴开战，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于是自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以来，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五十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

而根据史料记载，佛教也在这时自西域流入中原，并于大汉帝国得到了发展。通常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天竺经西域传入的，如《魏略·西戎传》《魏书·释老志》等史料中就有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但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时，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至洛阳，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史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夜宿南宫，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轮，飞空而至，光明赫奕照于殿庭。次日晨，汉明帝召集群臣，令占所梦，博士傅毅进奏对称“臣闻昔西方有神，其名为佛。陛下所见，将必是乎？”汉明帝听罢遂“感梦求法”，以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一行十八人，出使西域，赴天竺（古代印度）求佛法。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汉使与来自天竺的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相遇，得佛经佛像，遂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原弘法布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摄摩腾、竺法兰与汉使“相偕同行，以白马驮经”，自西域归洛阳，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后，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鸿胪寺”暂住。此后，为了给两位高僧一个居住和译经之所，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以僧人们暂住的“鸿胪寺”的“寺”字称之，并念白马驮经之功，故而取名“白马寺”，是为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而摄摩腾和竺法兰则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

佛典。而这次出使西域、赴天竺求佛经及沙门之行，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也因此，后世通常以这一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年。譬如韩愈就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称“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根据《后汉书·卷八十八·列传·西域传·第七十八》中记载的“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以及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从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来看，就在“永平求法”汉使归来之前，楚王刘英就开始信奉自西域流入的佛教，而这位皇室亲贵也是目前中国已知的最早的佛教信徒。不过这位虔诚的佛教徒的结果并不怎么好，刘英乃为光武帝和许美人所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为楚公，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楚王，二十八年（公元52年）就国。因为生母许氏无宠，所以在诸兄弟中刘英的封国最为贫小。三十年（公元54年），临淮郡的取虑县和须昌县（一说是昌阳县）归于楚国。明帝为太子时，刘英常独自依附太子，也因此明帝即位后，刘英数受赏赐。永平元年（公元58年），特封刘英舅舅之子许昌为龙舒侯。然而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刘英却坐意图谋反之罪而被废楚王，徙丹阳郡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子女为列侯、翁主的，保留食邑如故。其母楚太后许氏仍保留玺绶，留住楚宫。次年，刘英抵达丹阳后，自杀。汉明帝下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帽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县。



今日的白马寺

后世普遍对汉明帝评价颇高，史载“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可见其颇为勤政，明帝之世，吏治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其用王景治黄河，直到东汉末黄河也没决口，故此举甚是“有惠于民”。史书记载，明帝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大汉帝国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明帝驾崩之后，其子刘炟即位，是为章帝。章帝乃是明帝第五子，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其父刘庄即位，同年，刘炟出生，为汉明帝刘庄第五子。生母贾氏，被册为贵人，因当时明帝宠爱的马贵人无子，于是明帝将刘炟交给马贵人抚养。同时，刘炟生母贾贵人也是马贵人同父异母姐姐的女儿。马贵人尽心抚育刘炟，操劳超过其亲生。刘炟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养母养子之间关系融洽，始终没有嫌隙。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春，马贵人被立为皇后，同年二月十九日，刘炟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岁。史载，刘炟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很受明帝的器重。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其登基之后，尊嫡母皇后马氏（明德皇后）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

应该说，汉章帝登基的时候，大汉帝国的情况并不算好，当时西域大乱，北匈

奴围西域汉军，都护陈睦死，而国内则灾情不断，京师洛阳及兖州、豫州、徐州大旱成灾，以至于章帝不得不下诏免除三州田租、刍藁，并以国家存粮赈给贫民。次年，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山阳、东平等地地震，五月，章帝诏将止林禁苑之地赋予贫民。

当章帝以汉军镇压国内叛乱之时，也就在同时，班超初步平定西域，而与此同时，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还居涿邪山，结果南匈奴单于闻讯后，派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共击北匈奴还居者，斩首数百级，于是北匈奴还居者三四千人投降。很显然，在经过登基时的初步混乱之后，章帝已经完成了自己从皇太子向皇帝的转变，而在他的统治下，汉帝国开始在和匈奴对西域的争夺中，处于上风。

事实上，此时北匈奴的确到了无力与大汉争夺西域的地步了，东汉建初五年（公元80年），班超上疏请兵，谓诸国多愿附汉，欲合力骨定龟兹，开通汉道。在奏书中班超提出，只要消灭了龟兹，就可以稳定西域，斩断匈奴右臂，他称“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而这个“以夷制夷”的主张显然让皇帝很是欣赏，于是章帝以徐干为假司马，率千人前往西域，增援班超。就在班超在西域展开行动的同时，匈奴却是逐渐衰败，在和大汉争夺西域的期间，北匈奴却又几次发生灾荒，天灾人祸，极度困难。单于无奈，再次请求和亲，汉廷不许，此后鲜卑又兴兵击败北匈奴，而南匈奴单于也趁机上书汉廷，希望借此机会北伐，但皇帝不许。不过这不等于是大汉帝国不使南匈奴北上击讨北匈奴，汉帝国采取的策略是，在允许和北匈奴进行互市的同时，又指使南匈奴派兵至匈奴牧地抢掠牛马，从而使得南北匈奴之间征战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不得不转向经营西域，匈奴一度纠集龟兹等十五国兵三万余攻于阗，于阗王被迫投降，纳质子，贡方物。同年，莎车国附于匈奴，一时间，匈奴在西域倒也是攻势连连。然而就仿佛是上天也彻底抛弃了匈奴人那样，就在匈奴人苦苦挣扎的时候，上天却又再一次降下灾难。一场蝗灾席卷，以至于草谷无收，北匈奴部众无以为食，只好大量向南匈奴逃亡乞食，史载，短短数年之间，北匈奴人大批南下附汉，而加上南匈奴的频频进击，一时间北匈奴实力大大削弱，此时蒲奴单于又死，优留单于即位。

然而优留不思整顿国内经济，反而把单于庭西迁到鄂尔浑河以西，希望通过压榨西域各国来渡过难关。这引起了左地贵族的不满，于是北匈奴再次发生分裂。这个时候，鲜卑开始趁势崛起。

关于鲜卑，《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均说鲜卑就是东胡的余部，晋代王沈编纂的《魏书》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史籍也提到，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史记索隐》引东汉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也似乎证明鲜卑来源于东胡。而"鲜卑"的族名来源，史料中记载"鲜卑"族名是"依鲜卑山，以山为号"，而《魏书》记载为"大鲜卑山"，这两者的区别为，鲜卑山即为今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而大鲜卑山则位于发现有嘎仙洞的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北段。不过关于"鲜卑"一词，王国维、白鸟库吉均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祥瑞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另外，有的学者认为"鲜卑"是祥瑞之意，以鲜卑作为族名，符合古代游牧民族命名的习惯方式；还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包含有动物含义，是作为部落图腾的动物或是神兽。

史学界普遍认为，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退保鲜卑山，世属匈奴奴役。汉武帝时，汉军击败匈奴，将乌桓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也开始南下到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前，鲜卑由于在乌桓北方，一直没有同汉帝国产生联系。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犯汉境，鲜卑才开始被中原王朝所知，正式登上历史舞

台。

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其社会组织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由小到大组成。光武帝时，鲜卑首领偏何归附汉帝国，此后，鲜卑首领满头、於仇贲还曾率部到洛阳朝贺，被东汉封为王侯，管辖鲜卑、乌桓各部。此后，随着匈奴分裂，鲜卑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汉辽东太守祭肜收降了部分鲜卑部众。为缓解来自匈奴的压力，祭肜以鲜卑进攻匈奴，并根据斩获的首级数量予以奖赏，而鲜卑若想强大，则也需要击破匈奴，故而连年出兵攻击北匈奴。

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共七十二批入塞降汉。当时北匈奴衰耗，党众叛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人击其左，西域侵其右，实力日趋衰败。也就在元和二年这一年，鲜卑联合乌桓、丁零、南匈奴和西域各国大败北匈奴，北匈奴由此更是势力衰落。而当时南匈奴伊屠于闾鞮单于立，故而此年冬天，南匈奴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相遇，双方发生冲突，南匈奴斩获而还。武威太守孟云奏言，北匈奴前与汉朝和亲，仍不断受到南匈奴抄掠，北单于以为受汉朝欺骗，想入塞侵扰。因此，建议放还南匈奴所掠北匈奴俘虏，以抚慰北匈奴。汉章帝将此事下公卿朝臣议论。太尉郑弘和司空第五伦认为不能放还北匈奴俘虏，司徒桓虞、太仆袁安意见相左。最后，章帝采纳桓、袁建议，诏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加倍偿还北匈奴所失俘虏。但是对南匈奴抄掠斩获俘虏，仍照常制度计功受赏。

很显然，大汉帝国的这种态度进一步鼓励了鲜卑、南匈奴，于是两年后，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攻击北匈奴并大败之，还杀死了北匈奴优留单于，并“取其皮而还”。北匈奴大乱。在大乱中立其异母兄为单于，是为“北单于”。史载，优留单于死，北单于初立，北匈奴大乱，漠北又发生蝗灾，部众饥馑，内部冲突不断，可谓是危机连连。批民众惊慌失措，于是大批南迁，譬如有屈兰等五十八部二十多万人口来降。

面对大好形势，南匈奴趁机向汉朝提出以北匈奴起兵为主，大举进攻、统一匈

奴，对此汉廷内部意见不一，尚书宋意清醒地看到鲜卑人的发展前景，认为其将来必然会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所以坚决反对出击北匈奴，认为应该保留北匈奴，既给鲜卑人保留一个强劲的对手，又能防止南匈奴坐大，尾大不掉。应该说，宋意的建议和当年班超以夷制夷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此时，汉章帝驾崩，临朝称制的章德皇后想的却是借这个机会给自己不争气的哥哥窦宪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于是就有了汉军大军出塞征讨北匈奴之事。

应该说，汉章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从而使得大汉经济、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此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而且因章帝忠厚仁义，笃于亲系，故而章帝时，政令刑罚的颇为宽疏。譬如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罪人可减刑迁到边地，并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但一些政令刑罚的宽厚，却也有弊端，例如依东汉制，官员贪污则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但章帝废除这项制度。此外，汉章帝对官员和勋贵的赏赐，也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章帝对外戚过于宽容，甚至是过于放纵外戚，当初明帝时，一切遵奉光武制度，明帝虽然也热心提倡儒学，但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可章帝却一改明帝时严禁外戚和宦官参与朝政的政策，宠爱皇后窦氏，重用窦后之兄窦宪，又优待宦官，使外戚和宦官这两股腐朽势力从此登上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导致了和帝登基后外戚专权的情况出现，也种下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东汉王朝的开明政治，也从章帝时，逐渐结束，转而进入腐败和黑暗，汉家天下也从此由盛世走向衰退。

史载，章德皇后窦氏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祖父窦穆、父窦勋，皆坐事死。窦勋娶东海恭王刘彊之女沘阳公主，生长女窦氏。幼年时，众人见窦氏，皆言当大尊贵，并非为人臣妾之容貌。窦氏六岁能书写，家人皆称奇。建初二年（公元77年），窦氏与其妹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汉章帝先前听闻窦氏有才色，数问诸位宫人。召见时，章帝觉得优雅而美，马太后亦觉其不凡，因而前往掖庭，于北宫章德殿面见窦氏。窦氏性机敏，倾心承接，称誉日闻。第二年，遂立窦氏为皇后，妹为贵人。建初七年（公元82年），追谥窦皇后之父窦勋为安成

思侯。窦皇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

当初宋贵人生皇三子刘庆，梁贵人生皇四子刘肇。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立刘庆为皇太子。窦皇后无子，疾忌宋、梁二位贵人。后汉章帝宠幸宋贵人而冷落窦皇后，渐渐变成嫌隙。同年，马太后病逝，窦皇后将刘肇养为己子，与其家人谋立废去刘庆，改立刘肇为皇太子，进而控制朝政。窦皇后在建初七年（公元82年）诬告宋贵人挟邪媚道，宋贵人遂自杀，废刘庆为清河王。建初八年（公元83年），又作匿名信以陷害梁竦，梁竦因罪被诛，梁贵人姊妹一同因忧伤而逝。自此后宫皆惧，窦皇后所宠日隆。

窦宪乃是章德皇后兄，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其妹被立为皇后之后，窦宪初为郎，后任侍中、虎贲中郎将。其弟窦笃任黄门侍郎。兄弟二人，同蒙亲幸，并侍宫省，宠贵日盛，王公侧目，所谓“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窦宪于是恃宠欺人，竟至于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畏惮窦宪的势焰，不敢与其相争。一日，章帝车驾经过此地，指问园田，窦宪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同时也暗中呵禁左右不准回答。后来，汉章帝了解到此事经过，大怒，召来窦宪，深加责备。窦宪非常害怕。还是皇后毁服（降低服式等级以示自责）谢罪，一再代为求情，章帝才渐息盛怒，命他把园田归还公主。这次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此后章帝对他再不授予重权。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驾崩，皇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刘肇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称制，尊母沘阳公主为长公主，赐汤沐邑三千户，兄窦宪，弟窦笃、窦景，皆显贵，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内主机密，外宣诏命。加上章帝遗诏，任命窦宪的弟弟窦笃为中郎将，窦景、窦瑰为中常侍，于是，窦宪兄弟都在亲要之地，威权一时无两。

然而窦宪虽然权倾朝野，但其却牵朋引类，因见太尉邓彪为人谦和礼让，委随不争，故而窦宪对其很是尊崇，“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此后窦宪“其所施为”，辄外令邓彪上奏，而内白太后，因此，事无不从。此外，屯骑校尉桓郁，虽累世帝师，但性情恬退自守，故而窦宪“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于是“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史载，窦宪睚眦之怨莫不报复。谒者韩纡当年曾经审判过窦宪的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居然“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家”，都乡侯刘畅来吊章帝之丧，刘畅素行邪僻，其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邓叠母元自通长乐宫，故而得幸太后，

数蒙召见，窦宪担心刘畅分宫省之权，竟然遣刺客杀刘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并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审问刘刚。后来真相败露，太后大怒，把窦宪禁闭内宫之中。

窦宪自知忤怒太后，恐难保全，于是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死。此时正逢南匈奴单于请兵北伐，朝廷于是乃拜窦宪为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征调北军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兵和黎阳营、雍营、边疆十二郡的骑兵，以及南匈奴、乌桓、羌胡兵三万余出征。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郡鸡鹿塞，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及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翩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预定在涿邪山（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大军出塞之后，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骑万余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额布根山），匈奴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乘胜追击，深入瀚海沙漠三千里，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一万三千多人，生擒者甚多，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此后，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并令中护军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燕然山大捷后，因北单于已逃到远处，窦宪以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追寻北单于，企图招降他，同时率军班师回国，驻扎五原。当时，北匈奴人心离散，吴汜、梁讽所到之处，宣明国威，前后有万余人归降。至北海西北的西海，吴汜、梁讽见到了北单于，劝说他仿效当年呼韩邪单于归汉的先例，以求保国安人。北单于喜悦，率领他的部下与梁讽一起回到私渠海。此后听说汉王朝大军已入塞，就派他的弟弟右温禺疑王随梁讽到洛阳，向汉朝廷进贡，并留侍汉和帝。窦宪见北匈奴单于没有亲来洛阳，认为他尚乏诚意，便奏请朝廷遣归右温禺鞮王，同时准备再次出征。因在漠北时，因南单于送给窦宪一只古鼎，能容五斗，上有“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的铭文，窦宪将之献上朝廷。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九月，皇帝下诏，命中郎将持节到五原任命窦宪为大将军，并封其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耿秉也因功而被封为美阳侯，食邑三千

户。然而此时，窦宪却坚决辞去封爵，这是因为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置官属依太尉。然而此时，窦宪权震朝廷，故而公卿迎和其意，遂奏请朝廷，使窦宪位次太傅之下，而在三公之上，太傅之下，其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于是窦宪这才率军“振旅还京师”。大军返还之后，朝廷大开仓府，劳赐士吏，随窦宪出征的诸郡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尽皆升为太子舍人。

是时，窦宪兄弟，窦笃为卫尉、窦景和窦瑰则为侍中、奉车、驸马都尉，一时间窦氏显赫，而其兄弟四人更是大修宅第，争竞豪奢，穷极工巧。次年永元二年（公元90年）六月，朝廷下诏封窦氏四兄弟侯爵，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士。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郾侯，景汝阳侯，瑰夏阳侯，各六千户。”但唯有窦宪拒不受封，当年七月，其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很显然，朝廷拜其为大将军，位高三公，加之燕然山大捷，都使窦宪坚定了其消灭北匈奴的决心。

此时的北匈奴的确处境不妙，当初北单于因为汉王朝遣还他的弟弟，又派车携储王等人居延塞见窦宪，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这一年春，汉与南匈奴兵分二路北击，在黑夜中包围北单于的帐营。北单于大为惊慌，率领精兵千余人迎战。激战之下，北单于身上多处创伤，坠落马下后又再次骑上马，方才率轻骑兵数十人暗夜逃走。其玉玺，阏氏及男女五人为汉所得，汉与匈奴斩首八千人首级，俘虏数千人后返师。

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于是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汉军出塞五千里于金微山大破北单于（今阿尔泰山），斩首五千余级，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其国遂亡。此战之后，耿夔因功被封为粟邑侯。

史载，窦宪既破匈奴，权震朝廷，于是以耿夔、任尚为爪牙，以邓叠、郭璜为心腹，以班固、傅毅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把揽朝政，占据要津。

此后窦氏一族更密谋不轨，阴图篡汉，和帝得知了他们的阴谋，但无法与外臣接触。素知中常侍钩盾令郑众，谨敏而有心机，不事豪党，于是便招来郑众，定计除灭叛党。因虑窦宪驻扎在外，忧其兴兵为乱，故而皇帝谋定后忍而未发。适逢窦宪和邓叠平定匈奴后班师回京，和帝大喜，下诏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并按等级赏赐军中将士，以安其心。永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和帝亲临北宫，命将屯卫

南、北宫，关闭城门，逮捕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等人，并下狱诛死。此后又派人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同时让他和窦笃、窦景、窦瑰皆回封地。窦宪、窦笃、窦景到封地后，都被迫令自杀。永元十年（公元98年），窦瑰也被梁棠所逼自杀。而此案受株连而免官还乡者众多，就连正在编撰《汉书》的史家班固也受窦宪牵连，而死于狱中。至于窦太后则未遭贬黜，但却因此失权，永元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死，未及下葬，当年忧死的梁贵人姐姐梁嫕便上书陈述梁贵人枉殁之状。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汉光武帝废黜吕雉的事例，欲贬去窦太后尊号，不宜归葬先帝。百官亦多附和上言，然而汉和帝却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于是窦皇后得以与汉章帝合葬敬陵。

虽然窦宪伏诛之后，其被公认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倍受贬斥，以至于他的历史功绩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但其实他的历史功绩却是显赫的。范晔在《后汉书》总对窦宪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功绩是超过了卫青、霍去病，所谓"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所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是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事实上，也正是经过窦宪对北匈奴的两次征讨，才使得北匈奴的主力被彻底歼灭，至于其残部的去向，《后汉书》说是"不知所终"。而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说法，当时"这些从获胜的敌人面前逃跑的匈奴人"，采取了"转而向西方进军"的战略。他们先是长途奔袭到欧洲的黑海和多瑙河一带，接着又同这里的原住民哥特人等一起，继续向西侵袭，直到兵临罗马城下，最终导致了这个古老帝国"在众多'蛮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一朝覆亡。从这个角度不妨说，窦宪对北匈奴的作战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间接推动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公元3世纪末，一个草原民族突然出现在东欧大陆之上，他们东征西讨，从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这个草原游牧民族在欧洲文献里被称为Hun，中文译“匈人”或者“匈奴人”。

匈人在西方史书第一次出现是伴随着阿兰国的灭亡这一历史事件而产生的。阿兰，又称奄蔡、阖苏，为古代中亚印欧语系游牧民族，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记载，西汉时，奄蔡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的锡尔河以北的康居西北、里海北部游牧。而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也有所记载，《魏略·西戎传》中称“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

东汉时，北匈奴西迁，而奄蔡也随之逐渐西迁，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在公元350年时，阿兰国在东欧大陆上已经堪称强国了，然而当其倾全国之兵与匈人军战于顿河之畔时，却是惨败，阿兰王被杀，阿兰国灭，阿兰余部最终臣服于匈人，一时间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之而震动。灭亡阿兰国后，匈人在顿河流域附近逗留了几年，然后继续向西。

马背上的匈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而在他们的骚扰之下，日耳曼人不得不南迁，并成为了此后西罗马帝国覆灭的直接因素。不过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9月4日灭亡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匈人帝国的频繁征讨下，面临崩溃了。4世纪时，在被称之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的率领下，匈人帝国强极一时，他们频频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史载，阿提拉曾经两次率领大军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还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虽然最终在沙隆之战被遏止了向西进军的脚步，但此后，他却转而攻向意大利半岛，并于公元452年攻陷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拉文纳，逐走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从而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虽然阿提拉被欧洲人视作是残暴、死神、掠夺者的象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匈人帝国的疆土盛极一时，其领土包括了如今德国大部分、中欧、巴尔干和乌克兰等处，所谓“东起自咸海，西部和西南部和西罗马帝国接壤，东南方与东罗马帝国相邻，而自多瑙河河谷到波罗的海海滨，皆为匈人帝国所有”。也就是说，阿提拉控制着中亚大草原到相当于如今的弗兰德尔这一大片土地，而在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国家、部落，无论是国王还是酋长，皆是平时向阿提拉称臣纳贡，而战时则需出兵参战。不过当阿提拉在公元453年暴毙之后，在帝国

内部围绕着领导权与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下，这个庞大的帝国开始解体，十六年后，曾经让欧洲颤抖不已的匈人帝国土崩瓦解，彻底灭亡。

尽管很多人认为匈人帝国也许就是当初西迁的匈奴人，但从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关于北匈奴在被东汉大军击败之后西迁，其后是否成了入侵欧洲的匈人，目前尚无定论。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时，汉军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之后，北单于率残部西逃乌孙与康居，活动在伊犁河流域。关于康居，按照史料中记载，这个古西域国地处大宛西北，大月氏（即月氏）之北，乌孙以西，奄蔡之东，丁令、坚昆以南，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北部多游牧，南部则以农耕为主，故而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乃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而也由于南部为农耕之地，故而城廓较多，有五小王分治。康居也和一般草原游牧民一样，随季节的变化而迁移牧地，冬季南下栖息于锡尔河一带“乐越匿地”，夏季北上至“蕃内”，两地相距数千里。

其实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朝已传闻遥远的西方有康居人，因为司马相如告巴蜀民的檄文和董仲舒的对策中都曾言及康居。张骞从西域而归后称康居虽然部众不少，但仍然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事实上，康居的确乃是强国，史载，汉初时，康居有控弦之士八九万，及武帝年间，人口已达六十万，胜兵十二万。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出兵伐大宛时，康居曾有意援助大宛，未逞。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始，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至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向西北迁徙，先设王庭于坚昆（柯尔克孜草原），后应康居王之请，西南移至康居领域内，在都赖水（怛逻斯河）上兴建了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扩张势力。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康居王迎匈奴郅支单于居康居东部合力对抗乌孙。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兵西越葱岭进击郅支，杀郅支单于于郅支城，从而稳定了西域形势。但自此之后，康居与汉愈发不和。东汉时，康居强盛，曾威胁其南邻大月氏，但随着贵霜统一大月氏，国势转盛，故而康居则渐趋衰败。康居国一直以来对汉的态度来看，北单于率残部西逃康居之地，的确是个理想的选择。耐人寻味的是，康居在晋武帝泰始中（公元265－274年），曾遣使献善马，此后曾经役属于嚈哒，也就是所谓的白匈奴。至三世纪时，康居人似仍游牧于锡尔河中游，其后益弱，势力远不如两汉时代，前秦还和

康居有过来往，但其后便是如同楼兰一样神秘消失。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北单于率残部西逃，在伊犁河流域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而在他率部西窜之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北匈奴单于。其后，於除鞬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的八部两万众（一作数千人）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湖）安定下来，并派使者前往洛阳，请求归顺东汉。于是大将军窦宪上书朝廷，请立於除鞬为北匈奴单于，朝廷从之。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正月，汉廷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然而就在於除鞬方欲辅归北庭之时，窦宪失势被诛，耿夔受到牵连被罢免官职、削夺爵位。次年，於除鞬率部自畔还北，汉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率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自此北匈奴彻底败亡。

而史料中关于北匈奴此后的记载，是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朝再度放弃西域后，十二年后，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汉敦煌太守曹宗以索班屯驻伊吾，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复降汉，然而次年，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车师后王引北匈奴攻杀索班，击走前王。于是北匈奴在西域复起，此后，匈奴人多次与车师合兵共犯边地，以至于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四月，汉朝委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塞，屯柳中。次年，班勇至楼兰，鄯善、龟兹、温宿相继附汉，班勇进而发诸国步骑兵万余攻车师前王庭，大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七月，班勇率敦煌、张掖、酒泉六千余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击车师后国国王军就，破车师后部，斩首俘获八千多人，马畜五万多头，斩其王军就、匈奴持节使者，传首京师。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十一月，班勇又发西域诸国兵大破匈奴呼衍王，降其众二万余，杀单于从兄，单于亲率万余骑来攻车师后部，抵金且谷，班勇遣其将假司马曹俊率军迎战，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此后，呼衍王部迁到枯梧河畔。

阳嘉三年（公元134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於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次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进攻车师后部。顺帝以车师六国（车师前部、车师后部、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地近北匈奴，为西域国屏障，乃令敦煌太守征发西域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共六千三百骑往救车师，掩击北虏於勒山，汉军不利。当年秋，呼衍王又率兵二千攻破车师后

部，破之。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本郡兵马三千出伊吾大破北匈奴，斩呼衍王。此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北匈奴新的呼衍王率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全军覆灭，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同年夏，汉廷遣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前往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此后，北匈奴继续西迁，自此之后，匈奴人的活动情况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而当北匈奴远去之后，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却是开始内部纷争不断，当初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之地，其借着汉朝的军力多次大败北匈奴。和帝年间，南匈奴与窦先所率汉军合兵击破北匈奴后，趁机接纳大量降众，势力大增，但也因此而导致部族成分复杂，故而单于难以驾驭控制部众，为了防止南匈奴趁机做大，汉朝又利用各种方式分化其部，从而造成内部不稳，时有叛乱。史载，自北匈奴西走之后，南匈奴多次入寇，杀官吏，还与鲜卑多次袭掠遍地，而这期间，更有多位南单于被部属所杀。而最早被杀的单于，那是安国单于。

安国单于是为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之子、休兰尸逐侯鞮单于的弟弟，单于屯屠何死后由他继位，时年为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然而安国单于继位后，因与左贤王师子失和，故而匈奴内乱再起，不久安国即被杀。安国单于死后，师子自立为单于，然而其为单于之后，新降的北匈奴部众却对单于师子不服，于是永元六年（公元94年），匈奴十五部二十几万人皆叛变，胁迫前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之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自此匈奴再次分裂，东汉派遣大军以及乌桓、鲜卑兵共四万人大败逢侯，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军追赶不及。

史载，成为北匈奴单于的逢侯在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趁汉帝国再度放弃西域后的机会，控制西域，对各国进压榨勒索，并胁迫诸国共同骚扰汉之边地十余年，此后在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因为被鲜卑击败，故而逢侯率百余人至朔方郡，请降于汉，汉廷为了防止他再次反叛，将至徙居到远离边塞的豫州颍川郡居住。

事实上，逢侯之所以在北地不能生存，主要就是因为鲜卑势大，自从章帝年间，鲜卑联合乌桓、丁零、南匈奴和西域各国大败北匈奴，北匈奴势弱之后，鲜卑便逐渐强大起来，而后，汉与南匈奴合兵大破北匈奴，使北匈奴被迫西迁后，鲜卑更是趁势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自此，鲜卑大盛。和帝年间，塞外鲜卑逐渐向辽东、辽西、代郡、上谷四郡内迁居，并与原居其地的乌桓杂居，以

便与汉朝进行互市。不过虽然汉廷在乌桓校尉治所宁城筑有南北部质馆，允许鲜卑人在此与汉互市，但自此之后，鲜卑与汉、乌桓、匈奴之间，时有冲突发生。

由于当时，汉朝的政策是依恃乌桓，联合匈奴，共同攻击鲜卑，加之鲜卑内部不统一，故而经常出现“此和彼战”的情况。汉安帝永初年间，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令至宁城通互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时，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至度辽将军邓遵处归附，汉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义侯。未几，其至鞬复叛，不断扰边，于是双方又展开连续十余年的征战。也就在这个时候，鲜卑部落的一代著名统领檀石槐登上了历史舞台。

史载，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起初在匈奴从军三年，而就在此时，他的妻子在家中生了孩子。投鹿侯回来后，感到奇怪，想杀掉孩子。其妻说她曾经在大白天走路，听到雷响，就抬头朝天上看，刚好有冰雹掉进嘴里，她就吞了下去，接着就怀了孕，十个月后，便是生下孩子，并称这个孩子是上天赐予的，其必定有过人的地方，不如暂且抚养他长大。投鹿侯不听，将之弃于野外，后为外祖母家收养。因其少时有勇有谋，长大后，“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故而被推举为部落大人。

东汉桓帝时（公元146—167年），檀石槐建庭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三百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兵强马壮，才智过人，东西部大人皆归附。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扰汉边，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

在统一鲜卑各部后，其分地为东、中、西三部约六十邑，各置大人为首领，归其统辖。史载，各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皆统属于檀石愧，拥兵十万，较匈奴尤盛。正如蔡邕在上疏中所云那样：“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事实上，鲜卑在当时的确威胁很大，东汉桓帝永寿、延熹年间，鲜卑连年侵扰东汉边地，自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檀石槐率军入寇云中郡始，延熹元年（158年）后，更是对联合南匈奴、乌桓多次分道入扰东汉缘边九郡，继而又与上郡沈氐、安定先零羌共攻武威、张掖等处。延熹九年（166年），又招结南匈奴、乌桓、东羌、氐等分骑数万入缘边九郡杀掠居民，汉桓帝忧患，欲封檀石槐为王，并试图与之和亲，并拒受封王号及和亲之议。灵帝后，更是连年扰掠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杀略不可胜数”。

熹平六年（177年），鲜卑再扰三边，汉军出兵三万，分三道出击，以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分别从高柳、云中郡、雁门郡出塞，汉军深入鲜卑境内两千余里，檀石槐命东、中、西三部大人率众分头迎战，结果汉军惨败，辎重全都丧失，汉兵死者十之七八。

光和四年（181年），檀石槐去世，时年四十五岁，其子和连继位，然而和连既无才力，性又贪淫，断法不平，人众叛者居半。灵帝末年，和连在钞略北地郡时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蒲头代立。后蹇曼长大，与蒲头争国，部众离散。蒲头死，弟步度根立，是时代郡以西的鲜卑都已叛离，代郡以东的中东部鲜卑也分裂为三个势力集团，其大人一为步度根，其部众分布在并州的太原、雁门等地；二为轲比能，其部众分布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阙机，部众分布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

鲜卑的分裂和内乱使得南匈奴和大汉帝国都松了一口气，然而此时，东汉王朝和南匈奴也已是四分五裂了。其实自从汉安帝年间，大汉帝国、鲜卑、匈奴三者之间的恩怨便是已经纠缠不休了。史载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洛阳一带大饥，并州、凉州也出现大饥荒，以致人相食。也就在这一年夏天，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人寇掠代郡、上谷、涿郡等地。此年秋天，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鲜卑大人丘伦以及南匈奴骨都侯等合兵七千骑又寇掠五原郡，与五原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郡长吏被杀。汉廷以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率军进讨。乌桓、鲜卑军大败。无何请求投降，鲜卑人逃出塞外。此后，乌桓又稍亲附汉朝，汉朝廷复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

同年，汉人韩琮随南匈奴单于入朝。既还，韩琮探知关东水灾，百姓饥饿而死，就挑唆单于进攻汉朝。南单于听信其言，遂起兵反汉，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同年冬季，安帝以大司农何熙为车骑将军，副中郎将庞雄，率五营及边郡兵二万余，又诏令辽东太守耿夔率鲜卑及诸郡兵共击南匈奴。自从窦宪失势被诛，耿夔受到牵连，被罢免官职、削夺爵位，但不久便被起用，先任长水校尉，又拜为五原太守，其后升任辽东太守。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春天，高句丽王高宫领兵侵入辽东郡（治所襄平，今辽宁沈阳）六县，耿夔率军大破其等。九月，貊人侵犯辽东郡地界，耿夔率军追击，杀死貊人头领。同月，耿夔又率军讨伐高句丽，破其军。此番出征南匈奴，车骑将军农何熙在以耿夔为先锋，并以司马耿溥、刘祉率领两千兵和耿夔一道进军。

这时的南匈奴单于乃为万氏尸逐侯鞮单于栾提檀，其乃为南匈奴湖斜尸逐侯鞮单于之子，单于师子死后由他继位，时年为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听闻汉军前来后，万氏尸逐侯鞮单于大惊，因为至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正月，其所率的南匈奴大军已经围困耿种所部汉军已达数月，但仍未能下，其颇是焦急。而后当耿夔与代理度辽将军梁慬，率军在原先属国都尉治所的旧城与南匈奴军接触之后，万氏尸逐侯鞮单于以薁鞬日逐王三千部众前拦击汉军，史载，梁慬、耿夔击斩其别将于属国故城。南单于亲自率军迎战，结果大败，退守虎泽，又派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三月，庞雄与梁慬、耿种率步军一万六千人进攻虎泽，几路军连营向前。南单于见汉军诸路并进，自知不敌，遣使乞降。汉朝赦免了南单于，待遇不变。于是南单于归还所抄掠及从羌人处转卖入匈奴的汉族男女共万余人。后因何熙去世，朝廷乃拜梁慬为度辽将军，而使庞雄入朝迁大鸿胪。然而此战之中，耿夔虽然率军斩首千余，并杀南匈奴名王六人，缴获毡帐辎重一千多辆，马畜牲口很多，但其后，因鲜卑反叛，耿夔不能独自进军，故而被贬任为云中太守。直至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才得以接替梁慬担任代理度辽将军。

史载，耿夔“勇而有气”，因其数冒犯使匈奴中郎将郑戬，故而在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坐征下狱，并被免去度辽将军之职。不过此后虽然以减死论，但却被笞二百。耿夔被免职之后，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但在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遵免，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也就在耿夔再度出任度辽将军的这一年八月，鲜卑首领其至鞬寇犯居庸关，九月，云中郡太守成严率军击之，兵败，虽然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但二人还是一同战死，于是鲜卑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征发广阳、渔阳、涿郡三郡甲卒前往救之，鲜卑军解围离去，此后，耿夔与庞参“追虏出塞而还”。

延光元年（公元122年）七月，羌族虔人部落与上郡的胡人皆反，攻谷罗城，耿夔率军讨破之。然而在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时，因鲜卑屡次寇边，故而耿夔与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新降者”连年出塞征讨并击之，而大军返回后，则又使之屯列冲要，也就是驻守到各边地要塞，故而“新降者”皆因耿夔征发频繁且很辛苦，而怨恨不已，这种情况下，其大人阿族等遂反。由此，耿夔被免官，最终这位当年平定北匈奴的一代名将死于家中。同年，南匈奴的万氏尸逐侯鞮单于死。

万氏尸逐侯鞮单于死后，其弟栾提拔继位，是为乌稽侯尸逐鞮单于，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在位仅四年，而其在位的这四年间，因为鲜卑势大，而不得不选择依附于

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8年）在位仅四年的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死，其弟栾提休利为匈奴，是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在位期间，南匈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内乱，史载，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叛汉，率三千余名骑兵攻略西河郡，又招引南匈奴右贤王，合兵七八千骑围攻美稷，杀朔方郡、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护匈奴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等人征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鲜卑、羌胡等共二万余人，进兵击破南匈奴。吾斯等人退走，进扰他处。而右贤王抑鞮因度辽将军马续奉命招降匈奴反者，于是率一万三千余人降汉。

这一年五月，因左部句龙王吾斯等人叛汉，故而顺帝使人责备南匈奴去特若尸逐就单于栾提休利，并命其招降反者。休利未参与反叛，于是脱帽避帐，向匈奴中郎将梁并谢罪。时梁并因病免职，继任者五原太守、护匈奴中郎将陈龟以南单于不能制下为由，屡次严词逼迫。南单于休利被逼无奈，与其弟左贤王等自杀，其为南匈奴单于不过十三年。

史载，汉代设置匈奴中郎将或使匈奴中郎将，拥节，秩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故后世又称护匈奴中郎将，而且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其地位当在度辽将军、乌桓校尉之上，行督率之责。其部属还有从事和掾若干人。而陈龟本是上党郡泫氏人，其家世边将，便习弓马，颇有志气。汉顺帝永建年间举孝廉，迁五原郡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将，此番，南匈奴内部出现了混乱局面。陈龟认为，元所以形成这种混乱局面，是由于南匈奴单于无方御下，引起内部不满。因而，他指责单于的无能，在未征得汉廷同意的情况下，就逼迫南匈奴单于自杀，以平定内乱。然而很显然，陈龟的此举却是贸然的，也就自然引起了皇帝及朝中众臣的不满。于是，陈龟因逼死休利事，被免官下狱。

事实上，去特若尸逐就单于栾提休利之死，反而使得情况变得一度失控，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秋，左部句龙王吾斯以单于休利已死，遂改立句龙王车纽为南匈奴单于，并联合乌桓、羌、戎等族数万人，再次攻略汉地。不久，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等人，随之攻略并、凉、幽、冀四州。十月，顺帝以南匈奴势盛，命徙西河等郡　郡治以避之，西河郡治由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徙至离石（今属山西）、上郡郡治由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徙至夏阳（今陕西韩城南）、朔方郡治由临戎（今内蒙古磴口北）徙至五原。此后又在当年冬天，遣匈奴中郎将张耽率幽州、乌桓诸郡营兵讨伐南匈奴。双方战于马邑，汉军大胜，斩首三千级，俘获大批

人口及兵器，牛羊等无数。车纽等人降汉，吾斯退走，率其部下与乌桓联合，继续抄掠它处。

南匈奴的内乱平定之后，南匈奴却出现了单于空位的现象，直到三年之后的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六月，才由汉顺帝册封栾提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史载兜楼储原为匈奴守义王，久在京洛阳，策立之日，顺帝赐以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等物，又赐彩布二千匹。之后命行中郎持节送兜楼储归南匈奴王庭。当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招募勇士将屡次叛汉的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刺杀，传首京师。次年四月，马寔率军击破吾斯余党，斩首一千二百级。于是，乌桓、胡羌等七十余万口皆降汉，而匈奴也得以安定。四年之后，呼兰若尸逐就单于死，居车儿继位，是为伊陵尸逐就单于。

然而伊陵尸逐就单于栾提居车儿在位时，因鲜卑屡次南侵，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认为伊陵尸逐就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上书请求将之废黜，汉桓帝不但没有同意，然而下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事实上，张奂之所以会上疏请废伊陵尸逐就单于，是因为居车儿在位时，匈奴的情况的确很糟糕。永寿元年时，（公元155年）年，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所谓安定属国都尉，乃是汉代管理内附匈奴人之职。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下令将降附的匈奴族安置在沿边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各依本族之风俗而归属于汉，故统称五属国，由汉廷分别派将军治理，称属国都尉。最初，北地属国都尉即设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乡北境之红城水古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将北地郡西部析出另置安定郡，又在属国都尉驻地置三水县隶安定郡，从此改称安定属国都尉，并延续至东汉。

张奂到职不久，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与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起兵反汉，并入寇单于庭所在的美稷，混乱之中，东羌也出兵响应，攻打张奂。时张奂营垒中只有二百多人，听到消息后，其当即勒兵而出，敌众我寡，故而一些军吏以为力不敌众，故而叩头争止之，张奂不听，便率兵进屯长城，并收集兵士，而后遣将王卫招诱东羌，此时，诸豪相继率众降张奂，与汉兵共击薁鞬等所率南匈奴叛军，连战破之。且渠伯德十分惶恐，遂率其众降于汉军，于是郡界以宁。

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张奂任使匈奴中郎将，驻南单于庭美稷，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甚至烧度辽将军门，后又引屯赤坑，张奂率领的汉军，烟火相望。一时间，兵众大恐，各欲逃去，但此时张奂却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

于是军士稍安，此后，张奂暗中引诱乌桓，与其讲和，然后使乌桓等军袭杀休屠渠帅，又袭破其众，于是皆降汉。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奂以南匈奴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请改立南匈奴左谷蠡王为单于。但皇帝不许，仍以居车儿为南单于。当年冬十二月，鲜卑寇边，张奂率南匈奴单于等军出塞进讨，大破鲜卑，斩首数百级。

此后，张奂为度辽将军，数年间幽、并二州，清静无事，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入朝为大司农，鲜卑人得悉，便勾结南匈奴、乌桓等数道入塞，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掠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入塞，并联结东羌、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一时间边地大被其毒。这种情况下，朝廷以为忧，遂复拜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并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匈奴、乌桓闻张奂至，相率还降，张奂诛其首恶，而余皆慰纳之，于是匈奴、乌桓平定，唯鲜卑出塞退走。

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伊陵尸逐就单于死，其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继位，而此时，鲜卑势大，于是在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八月，灵帝以鲜卑连年入塞抄掠边郡，命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分别从高柳、云中郡、雁门郡出塞，分三路进攻鲜卑檀石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率军从臧旻自雁门出征，结果汉军出塞二千余里，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东、中、西三部大人率众分头迎战，大败汉军。夏育等军辎重尽失，战士死者十之七八，三人各率数十骑逃回，皆以败军之罪免为庶人。此后，鲜卑兵势更盛，连年犯汉边境。

就在这次兵败之后的第二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死，其子呼征单于继位，但仅一年之后的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七月，呼征单于便因为与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不和，被张修所杀。史载张修杀呼征单于后，另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后以擅杀之罪，下狱死。

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有十万人反叛，攻杀羌渠，其子左贤王於夫罗即位。国人担心会遭报复，遂不认可於夫罗为新单于，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然而次年，须卜骨都侯便死，故而南庭再次虚位，由老王主持国事。而不被承认的於夫罗则率众赴汉申诉苦情，但很显然，此时的他注定了会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汉帝国正陷入在异常的混乱之中。

其实东汉帝国，自光武、明帝、章帝之后，便开始衰落。光武中兴之后，明、章两帝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得东汉帝国迅速进入繁荣之世，不过虽然和“文景之治”一样，“明章之治”均属王朝初后不久出现的“治世”，但文景之治之后却有“汉武盛世”“昭宣之治”的接踵而来，而“明章之治”虽然前承“光武之治”，使得东汉进入鼎盛时期，然而其后再无盛世之再现，政治即趋向紊乱。虽然究其因是与西汉时社会之弊病并未得到解决有关，而在土地兼并、吏治败坏颇为严重的情况下，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等等弊病接连出现，以至于幼年继位的幼君多需借助宦官才能亲政，于是在所谓的“戚宦之争”下，朝政日益腐败，帝国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为时极短即转入中衰。

其实穷究“戚宦之争”的起因，应该是汉章帝时对外戚的大肆任用。所谓“外戚”又称“外家”“戚畹”，即帝王的母族、妻族。其实自汉以来，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如西汉末的王莽。汉孝武、汉孝宣皇帝都曾对外戚势力实施遏止，但最终西汉王朝还是亡于外戚。

至于宦官，其本是宫廷内侍，先秦和西汉时，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虽然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如《周礼》内有“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而在当时的阉人主被用来作“寺人”“内竖”“阍人”等职，人数不多且地位低下，只是负责杂役、传令等，此后至秦时，因受宫刑的人大量增加，于是宦官多由这些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统管，西汉初年，高祖皇帝刘邦鉴于赵高乱秦的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直到元帝以后，宦官势力才开始复萌，自东汉开始，规定宦官全部要用阉人，故而从那时起，宦官又多被称为寺人、奄（阉）人、俺人、奄官……

其实所谓“宦”者，本是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故而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按照典制，本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宦官，是不得参与国家政务，但宦官却因与皇室朝夕相处，故而也就能博取信赖或有可乘之机，加之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所谓中常侍，本是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中常侍是仅有虚衔的加官。西汉前期只有常侍之名，或称常侍郎，为郎官之一，获此号者多为皇帝爱幸之臣，武帝时东方朔曾为常侍郎。中常侍之名出现于西汉晚期，元帝时有中常侍许嘉，成帝时有中常侍班伯（东汉史学家班彪的大伯、班固的

伯祖）、班稚（班彪的父亲、班固的祖父）。光武中兴后，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执掌的官职。其秩为千石，后又增为比二千石，本无员数，明帝时定为四人。东汉初改变西汉制度，多以宦者担任此职，如章帝、和帝时，郑众、蔡伦都从小黄门迁为中常侍。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从此以后，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权倾人主，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于是宦官势力也就逐渐形成。

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而在外戚势大、太后称制的情况下，皇帝也就不得不常常利用宦官来牵制外戚。由于在政治博弈中，一些宦官拥立皇帝有功，或者是诛杀外戚得力，而"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一旦权力和地位得到提升，也就往往有了宦官专政的出现，于是东汉中后期，宦官们不仅传达诏令，掌理文书，而且左右皇帝视听，利用自己乃是天子身边亲近之人的优势，掌握国家政务大权，

当然了，之所以东汉中后期，会出现"戚宦之争"，还与光武帝时的整治措施有关，其实一直以来，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其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而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此外，光武帝虽然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并未如汉高祖那样诛杀功臣，但却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方式来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也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皇帝下诏省大司马，又置太尉，以太仆赵熹为之，而与司徒、司空为三公。也就是皇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但此时，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权力实际上被皇帝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虽然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也是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在东汉初年也的确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

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同样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于是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才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提供便利的根本，而为了夺取控制权，外戚与宦官往往围绕皇帝而斗争不休，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乃至于废立皇帝。

虽然光武帝在行政制度上通过削弱三公来控制外戚，而且对宗室诸王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时，皇帝更是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此后还曾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而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可至章帝继位，情况却是发生了改变，章帝时，窦皇后受宠，于是窦氏荣耀一时，正如史料中所称的那样“孝章皇帝宏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三十日，汉章帝驾崩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刘肇继位，即为汉和帝，尊嫡母窦皇后为皇太后，因刘肇年幼，由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将其兄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侍中，掌管朝廷机密，负责发布诰命；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帝的侍卫；弟弟窦景、窦环均任中常将，负责传达诏令和统理文书。这样，窦氏兄弟便都在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一时之间，窦氏权倾朝野，由此开始了东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外戚专权时代。



汉和帝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得知窦宪阴谋，与郑众合谋杀窦宪。窦宪自杀后，东汉历史上的第一个外戚专权时代至此结束，而宦官郑众因首功，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其升任大长秋，封鄛乡侯，把持朝政，尽管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信任，但也是他开启了宦官专权，“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同时郑众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收养儿子的宦官。

很显然，章帝、和帝父子为后来的“戚宦之争”埋下了祸种，但章帝、和帝都乃勤政之君，史载，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开始亲理政事，其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而从他亲政后的政绩来看，和帝不失为一代贤君英主。和帝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并多次下诏纳贤，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此外，这个皇帝还体恤民众疾苦所谓“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并多次诏令理冤狱。汉和帝在位时，有蔡伦造纸、班固修成《汉书》、班超平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加之之前窦宪击破北匈奴等，倒也文治武功赫赫。

然而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廿二日，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皇帝却崩于京都洛阳的章德前殿，而其死后，东汉帝国开始迅速衰落，这个王朝也由此开始频频出现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的情况。

汉和帝驾崩之后，按制，本应是其长子刘胜继位，但因其年少时就有痼疾，多年不愈，汉和帝皇后邓绥认为他不适合做皇帝。于是立和帝少子刘隆为皇帝，是为汉殇帝，改年号为“延平”，刘胜封平原王。而这个时候的刘隆方才出生百日。史载，汉殇帝刘隆生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是汉和帝的小儿子，因和帝在位时，所生皇子大都夭折。汉和帝以为宦官、外戚在谋害他的儿子，便将剩余的皇子留在民间抚养。然而就在登基为帝之后，这个自幼养于民间，登基时离出生刚满百天的皇帝却仅仅在位八个月便夭折，因其夭折而亡，故上谥号为“孝殇皇帝”，死后葬于康陵。汉殇帝是自秦汉以来，至大清灭亡，历朝历代中帝王中即位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皇帝，故而也史家称为“八月皇帝”或“百日皇帝”。

延平元年八月，汉殇帝夭折之后，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被太后邓绥征立为嗣皇帝，于是刘安遂即入京即位，时年十三岁，是为汉安帝。安帝登基之后，邓太后总揽政权，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一时间，汉家大权为邓氏戚族掌控。虽然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如反对淫祀，同时以“柔道”制天下，并在宫中宫女众多，以至于“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情况下，一次诏免后庭宫人及羸弱老病即达五六百人，以节省汉宫的财政开支，此外，邓太后还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但与此同时，她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而之所以纵容宦官，是因为邓氏吸取了窦氏灭亡的教训，认为联合宦官，才能够使得族人平安。

然而君权与外戚之间自然是有矛盾的，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二月，邓太后卒，安帝始得以亲政，而其年已二十八岁。安帝既掌权，其乳母王圣、亲信宦官李

闰，遂与邓氏争权，乃诬告邓后兄大将军邓骘、宦官蔡伦等图谋废立，安帝遂下诏查办，邓氏悉灭，蔡伦自杀。此后，邓氏既败，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等，遂即参与朝政，皇后阎氏之兄弟亦封侯拜将，参与朝政。宦官、外戚共掌朝政，自安帝始。史载，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公元125年4月30日），汉安帝在南巡的途中崩于南阳，年不过三十二岁。

从二十八岁亲政，到三十二岁驾崩，安帝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夷灭邓氏一族，而安帝虽灭邓氏，但是尚未制止妇寺干政的局面。再加上安帝年年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当时宦官、外戚遂相互勾结，玩弄权柄，胡作非为，司徒杨震数次上书力谏，请安帝理政，而安帝不为所动。一时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奸佞当道，而有内忧自然也有外患。安帝亲政不过数年，西羌数次进攻金城、武威，鲜卑进攻居庸关，北匈奴和车师进攻河西。大敌当前，而安帝仍不理朝政，将朝中军政交于宦官樊丰。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时，帝国的宫廷内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因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并为她修建豪宅宫殿。司徒杨震上书劝谏，希望安帝罢黜宦官，反而被安帝罢官，杨震不堪屈辱，愤然自杀。其二，因安帝曾在掖庭挑选了一位美人，封为贵人，非常宠爱，未满一年，便立即封她为皇后，即为阎氏，而后安帝本来立后宫庶妃李氏所生子刘保为太子，可皇后阎氏因其未生子，故而惧怕李氏依仗太子夺其地位，遂将李氏毒死，后与王圣与樊丰、江京诬告太子保谋反，于是安帝废黜太子保，贬为济阴王。

次年，安帝在南巡途中，突发疾病于宛城，未几，崩于宛城，而因太子被废，故而阎后遂立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史称汉少帝，而汉少帝在位仅仅半年便病卒。少帝死后，阎氏秘不发丧，密谋再立新皇，于是屯兵宫中自守。而宦官孙程等则联合宫中几大掌权宦官，秘密迎立废太子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而阎后则被囚于离宫，不久死去。此后阎氏一族尽皆被诛杀。史称此事为“夺宫之变”。

因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因拥立有功，故而尽皆被封为侯，而顺帝虽然性情温和，可却也很是软弱，于是大权一时为宦官所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并与宦官勾结，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梁氏专权。由于宦官、外戚互相勾结，弄权专横，故而大汉帝国政治更加腐败，矛盾日益尖锐，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梁妠之兄梁冀更是大权在握，建康元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44年9月20日），汉顺帝刘保在玉堂前殿驾崩，时年三十岁。顺帝既死，其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梁冀乃与太尉李固等录尚书事。

然而数月之后，冲帝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勃海孝王刘鸿之子刘缵即位，是为质帝。刘缵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刘缵曾祖刘伉虽然为汉章帝长子，因其生母地位卑贱，故而并没有皇位继承权，建初四年（公元79年）被封为千乘王（封国在今山东省高青县附近）。史载汉冲帝继位不久便患病，故而大将军梁冀征召刘缵至洛阳都亭，只待汉冲帝驾崩后，立其为皇帝。永憙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初六日，汉冲帝驾崩，梁冀乃与梁太后定策宫中。正月十八日，太后遣梁冀持符节，以王青盖车迎刘缵入南宫。正月十九日，封刘缵为建平侯，当日即皇帝位，是为汉质帝。

质帝承汉顺帝嗣时，不过仅有八岁，因其年幼，梁太后依然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而朝政尽皆为梁冀所掌。史载，梁氏专权，朝政腐败，吏治不修。《后汉书》称梁冀当时权势极盛，威势横行朝廷和宫外，大臣们害怕梁冀的威势，不敢抗命。所谓“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　　帝虽年幼，但却聪颖伶俐，因不堪梁冀的专横跋扈，故曾在朝见大臣时，称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衔恨在心，觉得质帝虽小，但为人聪慧早熟，又是一朝之主，担心质帝年长后难以掌控，便命人暗中将毒药搀在质帝食用的煮饼之中，质帝吃过毒饼，顿觉气闷肚痛，未几中毒身亡，死于洛阳宫中，年仅九岁。

因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时，梁太后征召汉章帝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蠡吾侯刘志到洛阳城夏门亭，试图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志，故而在同年闰六月，大将军梁冀毒死汉质帝后，梁太后遂与梁冀决策宫中，以刘志承汉顺帝嗣，为皇帝，是为汉桓帝，因桓帝年不过十五，故而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桓帝即位之初，梁氏势力几无边界，其陷害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时间海内个个嗟叹，人人自危。

而由于梁冀专擅朝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大肆将官爵给予亲族，故而梁氏一门权倾朝野，然而桓帝从幼就对梁氏不满，故而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借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之力诛灭梁氏，然而就如同安帝那样，外戚被灭之后，宦官却是由此得以当权。史载，夷灭梁氏后，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因谋诛梁冀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倚奉桓帝，

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朝政由此为宦官专断。

史载，桓帝一生崇尚佛、道，沉湎女色。信任宦官，察举非人，时人讥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帝国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时有一些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及郡国士人，以所谓“清议”的形式议论政治，品评人物，由此而引来宦官不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因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因张成为宦官党羽，于是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两百多人，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场浩劫持续了数月之久，直至次年，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表请下，桓帝方才下诏将“党人”尽皆赦归田里，但却是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便是史书中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即在德阳前殿驾崩，时年三十六岁，由于桓帝没有留下子嗣，故而皇后窦妙临朝问政，窦皇后与其父窦武等商议，最终选择了解渎亭侯刘宏继承大统。刘宏乃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曾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灵帝世袭早逝的父亲刘苌解渎亭侯的爵位。于是窦皇后侍御史刘儵守光禄大夫、奉车都尉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刘宏登基。史载，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刘宏随迎驾队伍抵达雒阳城外夏门万寿亭，由窦武率文武百官迎接。次日，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以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三人共参录尚书事，并追尊父亲刘苌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母亲董氏封为“慎园贵人”。

由于大将军窦武因定策刘宏继位有功，故而其族人加官晋爵，从此窦氏外戚权倾一时，窦武依赖太傅陈蕃主持朝政，而陈蕃大量启用在第一次党锢时受处罚的士人，二人在不久后即达成一致意见，密谋铲除宦官。八月，窦武指使尚书令尹勋等弹劾并逮捕黄门令魏彪，为进一步弹劾宦官罗列罪名，由此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先行下手，发动政变，窦武、陈蕃等人均被灭族，未被处死的族人则流放到交州。窦太后也被迁徙到南宫云台居住。

次年，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并拆毁了侯览的房屋甚至祖坟。因而惹怒侯览，指使同乡人朱并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灵帝见到奏章后，问计于曹

节，曹节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灵帝准奏。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灵帝大怒，将曹鸾在狱中拷打致死，并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由此之后，党人与宦官之间，相互不融，而外戚与宦官之间权力斗争也越发尖锐。而皇帝又以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为中常侍，史称“十常侍”，灵帝对其等颇为信赖，甚至将朝政委于其等，于是一时之间宦官权力滔天，而大汉帝国也由此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自安帝起，数十年间，外戚、宦官、党人之间的政争以及频发的天灾使得大汉帝国早已经不堪，而皇帝的昏庸又动摇了汉朝的民生。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帝国内部爆发由太平道教主张角引发的黄巾之乱，史载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号召民众参与，于是天下八州太平道教徒揭竿而起。州郡失守，朝廷震动，灵帝在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及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宣布解除党锢，并组织官军平定叛乱。至年底，由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汉军剿灭各地黄巾军，灵帝为表天下安宁，于是改元中平。但同时，凉州的北宫伯玉、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又起兵叛乱，次年，皇帝以皇甫嵩、张温前往凉州平定叛乱，结果汉军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让凉州叛军越发壮大，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凉州陷落，凉州刺史耿鄙、汉阳太守傅燮先后战死。同年，渔阳郡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这汉家天下此起彼伏的叛乱使得大汉帝国由此崩溃，而为了能够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各地豪强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已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而也就在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这一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国人杀死单于羌渠，子左贤王於夫罗即位，因参与者恐被报复不认可新单于，另立一位单于，於夫罗只得前往洛阳，向汉廷申诉求助，可汉家忙于镇压动乱，自顾不暇，於夫罗的求助自然是无所得了。

自桓帝、灵帝以来，东汉王朝内部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个曾经雄踞于东方的庞大帝国彻底走到了末路。宦戚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使得民众苦不堪言，民变四起。虽然这些举义尽皆被镇压，但百姓在几无活路的情况下，依然毫不畏死，接连揭竿而起，正如当时的民谣所唱到的那样：“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十一月，汉廷遣鲍鸿进讨声势最大的葛陂黄巾军，双方大战于葛陂，鲍鸿军大败，此后黄巾各部此伏彼起，声势颇大，为了有效平灭民变，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改刺史改为州牧，以宗室或重臣为牧，使之集地方军、政之权于一身，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进而有效进剿黄巾余党，史称“州牧出镇”。可也正是因为汉灵帝的此举，使得此后手握重兵的刺史和太守拥兵自重，割据地方，轻视汉廷，于是自此，各路群雄开始相互攻伐，并逐鹿中原，也由此揭开了东汉晚期军阀鏖战的序幕，中原大地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继而走向了三国分立的局面。

也就在黄巾之乱的同时，渔阳郡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为了讨伐叛乱，汉廷向匈奴调兵，匈奴单于羌渠遣左贤王於夫罗出兵讨伐，结果南匈奴内部空虚，于是政变发生，羌渠被杀，此后左贤王於夫罗即位，而参与者恐被报复不认可新单于，而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夫罗率众赴汉申诉苦情，可正值汉末大乱，其只好留在河东。其后於夫罗一直留居汉地。虽然仅仅一年之后，须卜骨都侯单于便死，但汉廷却将单于之位一直悬空，一直没有册封新的单于，而是以南匈奴的老王监国，於夫罗欲回故地，也得不到汉廷准许。



汉灵帝

此时的汉廷正经历一场内乱，於夫罗趁乱独立，并与跟白波贼合流进犯太原、河内等地，并州牧董卓受命前往征讨，可董卓心知天下必将大乱，于是拥兵自重，驻兵河东，静待时机。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刘宏在嘉德宫驾崩，少帝刘辩继位。由于刘辩年幼不晓事，暂时由何太后垂帘听政，大将军何进主持朝政，皇权更加衰微。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少帝登基后不久，何进欲

除宦官，但是为其妹何太后所阻挠，所以请董卓领兵入宫作兵谏，于是。董卓召集人马，连日引军进京，并上书少帝，要求“逐君侧之恶”，“收让军，以清奸秽”。

光熹元年八月廿五戊辰日（公元189年9月22日），何进再次进入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要求何太后同意他尽诛杀诸常侍以下，宦官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张让、段珪等率党徒数十人，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而后，何进部将吴匡、张璋等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更是率虎贲围南宫，焚烧嘉德殿青锁门，欲逼迫宦官段珪出宫，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此后西园八校尉中的佐军校尉袁绍更是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人，又下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搜索宫中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于是死者两千众。

而此时，董卓于城外见京城一片火海，知情况有变，遂引兵急进，随即找到被宦官虏出的少帝和陈留王，因护驾有功，董卓乃得以入京。

董卓入京后，自封为司空，权倾朝野，而后其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逼何太后下诏书废黜少帝，贬为弘农王；另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登基为帝，即为汉献帝。众臣虽然不满，但多慑于董卓的淫威，对他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那些地方诸侯势力却显然并不畏惧，次年正月（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尽管董卓担心诸路豪强以迎废帝弘农王复辟为名起兵，而将弘农王毒杀，但山东各地的诸侯、官吏还是纷纷起兵讨伐。不得已，董卓乃挟持献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雒阳，经营多年的洛阳城自此毁于一旦。而自此之后，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等势力也开始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汉廷的威望荡然无存，而大汉帝国也由此土崩瓦解。

虽然在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唆使吕布杀董卓，并下令大赦，而随着董卓之乱的结束，朝廷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却卷土重来，他们率兵攻入长安，王允被杀，朝廷再度陷入混乱，加之李傕、郭汜率军与韩遂，马腾所部频频交战，于是关中大乱。其实此时大乱的并不仅仅只有关中，这一年内，大汉天下几乎无处不是烽火连连，曹操在武阳之战击破黑山军，又破黄巾军于兖州，加之袁绍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巨马水之战、龙凑之战，还有袁术击袁遗扬州之战，可谓是兵戈不断。三年之后，李傕、郭汜发生内斗，于是献帝乃与群臣逃出长安，时为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献帝东奔之后，途中多次为李傕、郭汜、张济、杨奉等诸路豪强所挟制，于是皇权之威荡然无

存，一年之后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才到达旧都洛阳，然而此时洛阳因为董卓的一把大火早就已经是一片废墟，宫室尽毁，百官披荆棘藏身断壁之间，更加粮草断绝，于是汉献帝陷入窘迫，这种情况下，曹操自洛阳迎刘协到许县，称许昌，于是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史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辛亥，汉献帝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昌。十一月丙戌，汉献帝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于是汉朝廷大权近卫为曹操所有。

而南匈奴在汉末的大乱之中，也趁机崛起了自己的利益，这些内附的匈奴人在董卓之乱中，沿黄河而下，而东汉大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也就是这一时期被掳掠去匈奴的。史载，蔡文姬本名蔡琰，陈留郡圉人，博学多才而又精通音律，先嫁于河东卫仲道，然而卫仲道早亡，二人又没有子嗣，于是蔡琰回到自己家里。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董卓、李傕等作乱关中，匈奴趁机劫掠，蔡琰被匈奴掳走，后嫁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为妾室，蔡琰在北方生活了有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而此时，南匈奴已经占据黄河流域诸多郡县。曹操向来喜爱文学、书法，而在其发迹前已和蔡琰的父亲蔡邕相熟，曹操见蔡邕没有子嗣，于是使以重金将蔡琰赎回，并安排其再嫁同乡陈留董祀，从而有了“文姬归汉”这个著名的故事。

其实史学界对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匈奴王的妻子通常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至今仍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曹操之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是和其对匈奴的打压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的。

当时南匈奴初在於夫罗的统率之下，汉灵帝驾崩后，於夫罗乘黄巾之乱，跟白波贼合流进犯太原、河内等地，本来受命征讨的董卓，却因大将军何进遇刺身亡，兵回汉都。史载，於夫罗曾救护了由长安逃亡出来的汉献帝，而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山东诸侯起兵进讨董卓时，於夫罗曾跟张杨依附于袁绍，屯兵漳水。初平二年，於夫罗欲叛袁绍，而张杨不从，于是於夫罗胁持张杨出走。袁绍派遣大将麴义追至到邺南，大败於夫罗军，此后於夫罗逃往黎阳，后又攻破度辽将军耿祉，

势力得以重整。

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於夫罗又被征讨黑山贼的曹操破于内黄，翌年正月，占据南阳的袁术收得宛城的黑山军余部和南匈奴于扶罗以为己助，继而进军陈留（今属河南），准备进伐位于兖州西北的曹操，时荆州刘表进逼南阳切断袁术粮道。曹操乘机向袁术进攻，袁术军不战而溃，曹操挥师追击，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西）连败袁术。袁术连连败退，至九江郡（今安徽寿县）淮水流域一带。曹操由此解除袁术对兖州的威胁。而於夫罗也自此归顺了曹操。

兴平二年（公元195）七月，汉献帝东归洛阳，郭汜、杨奉等随驾护送。八月，进至新丰（今陕西临潼西北）时，郭汜欲胁迫献帝还郿（今陕西眉县东北）。因谋泄，献帝乃弃军逃走，还依李傕。杨奉、董承等护驾东行，十日，郭汜部将伍习夜烧献帝住所，意欲劫持献帝，被杨奉等击败。进至华阴（今属陕西）。后将军杨定因与宁辑将军段煨素有嫌怨，于是与杨奉、董承等夹攻段煨，两军相持十余日。献帝使侍中、尚书等劝谕，双方才罢兵言和。此后，当献帝东归起程后，李傕、郭汜等随即后悔，于是与张济联兵追赶献帝。十二月，李傕等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追上献帝，大败杨奉、董承等军于弘农附近的东涧，百官士卒死者不计其数。杨奉、董承既败于李傕，伪与其讲和，而暗中至河东（古称，今山西西南部为河东）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辞求救，乃率兵赶来，与李乐、杨奉等大破李傕等军，斩首数千级，献帝才得以继续东进，李傕等整军再来追赶，又大败杨奉等军。杨奉等拥献帝退至陕县（今属河南），结营固守。时献帝身边卫士已不足百人。

根据《北史·破六韩常传》，去卑是呼厨泉单于的叔叔，羌渠单于的弟弟，但根据《通志·氏族略》，去卑是东汉度辽将军刘进伯的后代，刘进伯北伐匈奴被擒，生了尸利，而去卑就是尸利的孙子。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一年，於夫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成为单于，而其子刘豹则被立为左贤王。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当袁绍死去，刘备在博望坡大败曹操所遣的夏侯惇、于禁大军时，呼厨泉单于却在平阳发动叛乱，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于平阳，但久攻不下，而此时，袁尚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正率军抵达河东，且人数众多，诸将议论想要放弃离去，但钟繇说：“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

未济击之，可大克也。”于是乃联合马腾合击郭援，大破之，郭援兵败而死后，呼厨泉单于也不得不选择了投降。

呼厨泉单于的这次叛乱，对于匈奴此后的影响很大。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魏公曹操进封魏王，所任丞相领州牧如故。同月，因代郡乌桓三部大人皆自称单于，专制郡事，故太守不能控制，故而曹操改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欲授以精兵征讨乌桓。裴潜说，代郡户口众多，乌桓骑兵动辄万数，其单于因自己专断郡中之事，心中本就不安，如果率兵至郡，他们一定会起兵阻拦，应该以计降服，不能轻加兵威。于是，裴潜单身至郡，安抚乌桓，三部单于大出意外，将所掠妇女、财物等退还，向裴潜表示服从。代郡稍定，裴潜将郡中大吏与单相勾结者郝温、端等十余人斩首，一郡震惊。代郡随即平定。此战之后，曹操的声名传到了北方，匈奴人都很仰慕他，于是七月间，呼厨泉单于来邺城拜贺曹操。

由于南匈奴久居塞内，人口繁衍，势力渐大。曹操恐其蔓延难制，故而乃将南单于留于邺城，以上宾之礼待之，却另使右贤王去卑居平阳，监其国，同时又分南匈奴为左、右、前、后、中五部，使其分居于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诸郡，每部置帅一人，选尊贵者为之，又以汉人为司马，以监督各部。其左部有众万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其中部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至此，南匈奴，虽然其名义上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灭亡。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即位为魏王，同年十月十三日，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十月十三日，早已徒存名号的汉献帝刘协被迫将象征皇权的玺绶诏册奉交曹丕，宣布禅位，曹丕照例三让之后于同月二十九日升坛受禅，改国号为魏，是为魏文帝，至此，历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名实俱亡。

同年十一月一日，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行使汉朝正朔和使用天子礼乐。同时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且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国玺绶，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等。而随着曹丕篡汉称帝，三国时代也正式开始。次年，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是为昭烈帝，并定国号“汉”。以延续汉朝，史称“蜀汉”，九年之后，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城）正式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史称孙吴，亦称东吴，至此三国鼎立格局正式形成。此后，蜀汉、曹魏、孙吴三方互相征伐不休，这一纷

乱局面延续数十年，直至司马懿夺权，其子司马昭发起“魏灭蜀之战”，平定蜀汉，而后司马昭病死后，司马炎废魏元帝而自立，建国号为“晋”，并平定东吴之后，这种纷乱局面才暂时告一段落。



曹操

而在这天下纷乱之中，外族势力也开始频频参与中原战争，譬如当时天山以北

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乌桓族长蹋顿就因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而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东汉，他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其中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直至后来为曹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暗杀后，其势才瓦解，此外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于是蜀汉、曹魏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

至于匈奴，则在曹魏置五司马后，暂时为曹魏所有，但此后，便是重新崛起。史载，曹操扣留呼厨泉单于，而以去卑监匈奴其国，而后去卑死，其子刘猛继为右贤王，统率部众，但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正月，时为匈奴右贤王的刘猛却是不服晋朝统领，而叛逃出塞。十一月，刘猛攻打并州，被并州刺史刘钦击败。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正月，晋朝监军何桢讨伐刘猛，数次击破之，此后何桢利诱刘猛属下的左部帅李恪，使之斩杀刘猛，而平定叛乱。刘猛死后，其子刘副仑带领部众加入鲜卑拓跋部，成为独孤部的始祖，刘猛的另外一子诰升爰，在刘猛被杀后，继任右贤王，统领其他部众，而成为铁弗部。

至于呼厨泉单于，当初曹操将呼厨泉的兵众分为五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各部贵者为帅，后改称都尉；以汉人为司马以监督，左贤王豹为左部帅。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刘豹去世，西晋朝廷又任命刘豹之子刘渊为代理左部帅。史载，咸熙年间，刘渊曾至曹魏首都担任人质，其多次向晋朝请求回归故地，但皆不被允许。直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刘豹死后，刘渊继为左贤王，方才得以回到并州。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刘渊会在此后给中原大地带来一场浩劫。

曹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公元266年），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改国号为晋，是为晋武帝。自此，曹魏灭亡，西晋开始，由于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泰始元年十二月，司马炎建国，鉴于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才使司马氏得以顺利取代曹魏，于是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而五千户则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史载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而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被破格越制，食邑户数多达四万户。至于武帝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也尽皆被封王，史载，封王者达二十七人。

而跟随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也均加封晋爵，或为公，或为侯，封邑达万户者为大国，五千户者为次国，不满五千户者为下国，如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正是如此，虽然武帝之初，天下平定，所谓“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而河洛之地更是“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语。但好景不长，随着西晋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又有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乃至于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武帝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等弊端，使得西晋王朝很快便陷入了危机之中。

而此时，西晋还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东汉以来，光武帝刘秀打破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后，边民逐渐内迁，而大量游牧民族因此以各种方式被迁入充实边郡。三国时，曹魏又将大批外族迁入关中和凉州等处，以分而治之，这些外族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

定居的农耕生活过渡。晋初，外族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而其中又以匈奴人的人数最多，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由于外族人口数目相当多，以至于与关中一带的汉人相差不远，甚至形成割据势力，故而也就为西晋亡国埋下了祸种。

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人对胡人内迁有所警觉，譬如西晋灭东吴（公元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然而此时，胡人的内迁和发展已成燎原之势，西晋帝国即便想要阻挡也是无能为力了。

此外，由于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而汉人官吏又强迫各族同纳租调，同服力役，所谓“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加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租调负担，故而多数胡人沦为汉人的奴婢、佃客。内迁各族对西晋王朝自然是“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也因此，胡人的反抗不断地发生。而对西晋首先发难的，并不是匈奴人，而是氐族所谓的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反叛。

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原帝国将边疆的北方各族内迁，是为了便于监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劳动力。而朝廷有意识地削弱边疆胡族的势力，降低其地位，则是为了方便控制。可当“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时，加上胡族逐渐成为汉人管辖下的编户，而且需要纳税，并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故而心生不满之下，时有举兵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在晋武帝时，就有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率众内侵，直至九年后始平。而后晋惠帝时，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两年后其弟刘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举兵，晋将周处阵亡，此事五年之后方得以平息。这些叛乱之所以得到平息，是因为中原帝国的实力较强，有能力实施平叛，可一旦朝廷势微，则情况不同了。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病卒，太子衷嗣位，是为晋惠帝。由于惠帝天生弱智，近于白痴，根本无法担当治国重任。之前很多大臣鉴于太子“不慧”希望武帝传位于其弟、素有贤能之名的齐王攸。武帝也一度考虑废黜太子，但在皇后和一些宠臣的劝阻下改变了主意，并勒令齐王攸离京前往封国，攸发愤病卒，于是惠

帝才得以继位。惠帝登基之后，外戚杨骏辅政，由此西晋皇室、宗族、权臣之间的矛盾也开始越演越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史载，惠帝皇后贾南风夙有干政野心，遂与宗室楚王司马玮和谋，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发动政变杀杨骏及其家属亲党，而以宗室汝南王亮辅政。不久，贾后唆使楚王玮杀亮，然后又以专杀之罪杀玮，这样大权就落到了贾后的手中。此后数年，尽管地方上连续出现流民及内迁诸民族的暴动，但朝廷尚相对稳定。可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后废黜惠帝后宫所生的太子司马遹，并于次年将他杀害，此举使西晋宗室内部的冲突迅速被激化。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后，随后又废黜惠帝，自即帝位。赵王伦的篡位引起了宗室诸王的普遍反对，政变开始演变为内战。在外任都督的齐王冏（时镇许昌）、成都王颖（时镇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河间王颙（时镇关中）起兵讨伐赵王伦，拥惠帝复位，随后三王又互相厮杀，而长沙王乂、东海王越也卷入了战火，由于诸王各引效忠于自己的地方官乃至内迁的民族参战，于是北方尽皆陷入动荡，一时间天下混乱。而因自惠帝即位至此卷入政变和内战的主要有汝南、楚、赵、齐、成都、河间、长沙和东海八位宗王，故史籍称这场动乱为“八王之乱”。至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其怀帝。八王之乱遂结束。

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根本，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以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晋书》谓：“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戎兵接而宗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中原之地虽经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民众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两京破坏，令晋室国力大减，胡人遂有机可乘，乃趁机举兵，其中匈奴在刘渊下，更是成了西晋帝国的心腹之患。

史载，刘渊乃是南匈奴单于于夫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其童稚时已十分聪明，七岁时母亲呼延氏死，刘渊伤心得捶胸顿足地号叫，旁人都被其哀伤所感染，以至于宗族部落的人都因此而对他十分欣赏，甚至时为曹魏司空王昶听闻其行为后，也很是赞赏。刘渊自幼生活在汉地，深受汉文化熏陶，其亦十分好学，自幼师从上党名儒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不过刘渊尤其喜欢《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而《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亦熟读。但刘渊自以书传中都因随何、陆贾无武迹；周勃、灌婴没文才而都遭后人看不起，认为文武兼备才能获世人欣赏，因而习武。史载，刘渊臂力过人，所谓“猿臂善射，膂力过

人”。

咸熙年间，刘渊到洛阳作任子，受到时为曹魏权臣司马昭厚待，常邀之入府做客，故而和司马氏一家关系密切。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后，王浑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刘渊，武帝接见刘渊后也对他十分欣赏，更打算任命他参与平灭东吴的事，但因孔恂和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担心一旦向刘渊委以重任并平灭东吴，他会在当地叛晋自立。武帝听后才将搁置这打算。及后秃发树机能先后击败秦州刺史胡烈及凉州刺史杨欣，李熹建议任用刘渊讨伐，但孔恂仍指刘渊可能会作乱凉州，武帝因而又否决了建议。当时在洛阳流浪的王弥正要回故乡东莱，与刘渊饯别时，刘渊泣诉被人屡进谗言中伤，恐怕将会在洛阳遇害而不能再见到他。刘渊于是纵酒长啸，同坐的都因他流泪。齐王司马攸见刘渊后，更建议武帝杀刘渊，以免日后回匈奴五部所在的并州后会祸乱当地，但王浑反对。武帝同意王浑所言，最终没有杀刘渊。

此后，因时为匈奴左部帅的刘豹于当时逝世，刘渊于是回到并州接替父亲左部帅之位。太康末年，武帝司马炎在改匈奴五部巾为五部都尉时，拜刘渊为北部都尉。由于刘渊在当地申明刑法，禁止奸邪恶行，而且诚心与人交往，于是匈奴五部中的俊才尽皆投归刘渊，连幽州和冀州的名儒和寒门秀士都前来与他结交。

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继位，由外戚杨骏辅政。杨骏为了拉拢远人，树立私恩，便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总理南匈奴五部，由此，刘渊实际掌握了南匈奴五部的大权，只不过有单于之实，无单于之名而已。但至元康末年时，刘渊便因部下族人叛变出塞而被免官。此后，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城，将刘渊召到邺城为人质，并封其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监理南匈奴五部。

八王之乱爆发后，右贤王刘宣与族人曾经密议拥刘渊为大单于，但因刘渊滞留在邺城，无法回国，于是不逞，此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颖击败司马乂，成为皇太弟，任命刘渊为屯骑校尉。不久东海王司马越和陈昣等与惠帝征讨司马颖，司马颖又任命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至惠帝兵败荡阴被俘至邺城，司马颖再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但在荡阴大战后不久，东嬴公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安北将军王凌等就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腾不敌，刘渊献计称可回匈奴召集骑兵抗衡鲜卑人，于是司马颖封其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使之回国领五部匈奴来援，故而刘渊得以回到匈奴。然而让司马颖想不到的是，当

刘渊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后，即与匈奴权贵密谋起兵。此后，刘宣为刘渊上大单于称号，二十日之间就聚众五万，定都离石。及后刘渊被司马腾盟友拓跋猗口和拓跋猗卢击败，同时司马颖也因受不住王凌大军的进逼而弃守邺城，带惠帝逃回洛阳。刘渊在刘宣的反对下，最终决定不援救司马颖，迁至左国城，又吸引数万人归附。

当时，并州境内的汉人大多因战祸而迁徙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并州的官吏们还在内争。于是，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一月，刘渊以自己祖先与汉朝宗室刘氏约为兄弟而自称“汉王”，建国号汉，改元元熙，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又设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八位西汉、东汉和蜀汉皇帝的牌位；前三者为三祖，后五者为五宗，以汉室继承者自居。同时自置百官，由此建立“汉赵”。

刘渊称王后，身为并州刺史的司马腾便派将军聂玄讨伐，但被刘渊于大陵所破。司马腾知道聂玄兵败后十分恐惧，率并州二万多户人南下山东。刘渊则遣刘曜率军先后攻陷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地方，扩阔领土。次年（公元305年），刘渊所派将领刘钦再度大破司马腾所派的讨伐军。同年并州爆发大饥荒，离石亦受影响，刘渊于是迁都黎亭。

至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时，刘渊已攻陷并州大部分郡县，并派兵进攻新任并州刺史刘琨。但刘琨击败汉军，成功保住治所晋阳。战后刘琨努力经营并州，更离间收降刘渊部下杂虏，汉军向并州北部扩张的计划因而受阻。刘渊于是听从侍中刘殷和王育派兵进攻其他州郡，南侵进据长安和洛阳的建议；同时，汲桑、石勒、王弥、鲜卑陆逐延和氐酋大单于单征数个在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都相继归降刘渊，刘渊亦一一任官封爵，令汉国力量更为壮大；亦因这些加入者起事和影响的地方在冀州、徐州、青州等地，西晋受汉国侵袭的地区大大增加。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攻破司州河东郡的蒲阪和平阳郡的平阳城，更迁都蒲子，令两郡属下各县抵抗刘渊的营垒都全部投降。同时亦派刘聪、石勒等南攻太行、赵、魏等地。同年十月甲戌日（公元308年11月2日），刘渊称帝，改元永凤。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太史令宣于脩之认为都城蒲子所处崎岖难以久安，建议迁都平阳。刘渊听从并随即迁都至平阳，改元河瑞。刘渊及后又派刘聪、王弥等进攻壶关，先破刘琨所派援军，后于长平击败晋东海王司马越所派的援军，攻陷

壶关。而后于这年秋冬，遣其子大将军刘聪率石勒、刘曜等进攻洛阳，但为晋军所败，于是刘渊唯有撤军。

次年，刘渊病重，命太宰刘欢乐、太傅刘洋等宗室重臣入宫接受遗诏辅政。七月己卯日（8月19日），刘渊驾崩，由太子刘和继位，因河瑞二年（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患病，任命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与太宰刘欢乐和太傅刘洋共录尚书事，并在都城平阳西置单于台，故而刘和即位后，受宗正呼延攸、卫尉刘锐及素来厌恶刘聪的侍中刘乘进言唆摆，决意要消除诸王势力，尤其当时拥兵十万的刘聪。但刘聪有备而战，率军从西明门攻进皇宫，并于光极殿西室杀刘和，又收捕逃到南宫的呼延攸等人，并将他们斩首示众。此后，群臣请刘聪继位，刘聪以其弟北海王刘乂是单皇后之子而让位给他，但刘乂仍坚持由刘聪继位，于是刘聪登基为帝。

刘聪即位三个月后，即派刘曜、王弥和其子河内王刘粲领兵征讨洛阳，时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越病死，于是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大削，而南方诸州的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行动缓慢，故而刘曜得以与石勒于大阳会师，并在渑池击败晋将裴邈，而后匈奴大军直入洛川，掳掠梁、陈、汝南、颍川之间。

永嘉五年，刘聪再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余，并掳怀帝和羊皇后北去，史称“永嘉之乱”。从晋武帝篡曹魏，到晋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晋怀帝被掳至平阳后，被刘聪拜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平阿公，后改封会稽郡公。刘聪曾与怀帝回忆昔日与王济造访他的往事，亦谈到西晋八王之乱，宗室相残之事。刘聪谈得十分高兴，更赐小刘贵人给怀帝。但嘉平三年（公元313年）正月，刘聪在与群臣的宴会中，却命怀帝以青衣行酒，晋朝旧臣庾珉和王儁见此忍不住心中悲愤而号哭，这令刘聪十分厌恶。加之当时又有人流传庾珉等会作刘琨的内应以助他攻取平阳，于是刘聪杀怀帝和庾珉等十多名晋朝旧臣。

同时，事为安定太守的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但此时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然而建元二年（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却引兵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而后，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五十二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而与此同时，随着匈奴人攻占长安，灭西晋，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原，而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也由此拉开了序幕，由于这一时期，胡人各族陆续在北方大地

建立政权，故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史载，刘聪灭晋之后，大行杀戮，又宠信宦官及外戚权臣靳准等人，加之其在位晚期疏于朝政，只顾纵情声色，故而其死后，靳准杀死刘聪子刘粲并屠灭了在平阳的刘氏皇族，此后靳准自立为大将军、汉天王，向晋朝称臣。消息传来，镇守长安的汉中山王刘曜发兵攻靳准，但当刘曜军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市西北的赤石川）时，却即位称帝，改元光初，改国号为赵，并灭靳氏，而当时山西、山东则为羯人石勒所据，其亦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后赵，此后，双方彼此相争。刘曜平定上郡羌、仇池氏等关陇羌氐，威服前凉，雄踞关中，而石勒则派石虎击败晋将段匹磾夺幽州，击败曹嶷夺青州。双方的争斗一直持续到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随着石勒擒杀刘曜，次年在上邽杀其太子刘熙及其将相公卿等三千余人，亡赵，方才结束。

应该说石勒的确是为一时雄才，其得汉人张宾相助，求贤纳谏、安抚世族，并减租缓刑，倒也使得后赵得以安定，由于当时胡汉关系紧张，故而石勒采胡汉分治之策，也就是于皇帝外另设大单于。称胡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未能缓和双方关系，胡汉之间时有冲突发生。此后，石勒病死，其堂侄石虎杀太子石弘，而自立为天王，因石虎奢侈极淫，任意滥杀，又听信谗言，奴役非国人的汉人及“六夷”，故而后赵国势渐衰。因帝位等因素，石虎与其子石邃（太子）、石宣、石韬骨肉相残，以至于宗室之间不断兵戎相见。

太宁元年（公元349年）旧太子党人梁犊于关中叛变，石虎遣羌将姚弋仲及氐将苻洪平定，羌氐二族坐大，但四月间，石虎病重，遂遗命以彭城王石遵、燕王石斌、张豺受遗诏辅政，可刘后因石斌不利于太子石世，遂与张豺矫诏称斌无忠孝之心，将其免官归第，旋杀之。张豺升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汉霍光故事辅政。继而石虎病亡，太子世即兴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张豺为丞相，豺不敢受，请以石遵、石鉴为左相丞相，刘后从之。遵自李城举兵，进入邺城，执斩张豺，废石世，即皇帝位，又杀石世及其母刘太后。尊生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以故燕王石斌之子衍为皇太子；李农、石鉴、石冲、石苞、石琨、石闵均有封赠。但石遵又曹到庶兄沛王石冲反对。冲闻遵杀世自立，遂率军自蓟（今北京南）攻遵，但很快就败于遵将石闵、李农，冲被赐死。至此，后赵政权遂归石遵。

而由于诸子争位，残杀甚烈，故而后赵政权，后为养子冉闵（石闵）夺得，冉闵夺权之后，改国号为魏，是为冉魏。其重用汉人，并以《杀胡令》鼓励诛杀羯

人，从而造成对胡人的大屠杀，并由此引发了之后石祗于襄国称王，号召鲜卑、氐、羌等族讨伐冉闵，而冉闵则欲联合东晋驱除胡族，但晋廷因为他称帝而不理，反而支持向东晋称臣的鲜卑慕容儁，于是慕容儁得以攻破邺都，杀冉闵，冉魏灭亡。史载，永和八年（公元352年）五月初三日，慕容儁把冉闵押至龙城，于遏陉山将其斩杀，其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萎，蝗虫大起，自五月起天旱不雨，直至十二月，慕容儁大惊，遂派使者前往祭祀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天降大雪。

而与此同时，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长安，而当时鲜卑也再次崛起，有慕容氏居于幽州、又有段氏居辽西、宇文氏居辽东，此外还有拓跋氏居漠北。其中慕容鲜卑于晋室南渡后占据辽东，此后慕容皝称燕王，败后赵石虎大军，并攻灭辽西段氏鲜卑，继而重创高句丽，其势壮盛。慕容儁继位后，乘后赵内乱之际发兵南侵，攻灭冉魏，而冉闵兵败被杀后，慕容儁则登基称帝，建国前燕。之前，前燕向东晋称臣，而灭冉魏后，慕容儁则不再对晋称臣，其甚至对东晋使者言道：“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此时前燕据有关东，关中则为前秦据之。之后慕容儁又派慕容垂、慕容虔与平熙等北伐大破丁零（敕勒）。

此后，前秦衰落，拓跋鲜卑崛起，由于建立北魏，由于拓跋氏所居之地乃是原是匈奴故地。当初匈奴族大部西迁和南移，但亦有部分留在原地，这些匈奴人与鲜卑不断混血通婚，是为铁弗人。不过这并不等于拓跋鲜卑能够与铁弗匈奴人共处，拓跋鲜卑崛起之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铁弗匈奴人，当时匈奴有两部，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而人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因刘库仁母便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故而其与拓跋珪相交甚密，而刘卫辰部则与之争锋。

史载，刘卫辰本是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代，与前赵光文帝刘渊同族，其祖父刘虎，在前赵昭武帝刘聪在位时，因是宗室的缘故被封为楼烦公，任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踞肆卢川，此后刘虎被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打败后方才出居塞外，而后其父刘务桓召集部落，其部再次强盛。后赵皇帝石虎曾遣使封刘务桓为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刘卫辰时，其部已经强大一时，不仅入居塞内，而且还被前秦天王苻坚封为西单于，督摄河西各族，屯驻在代来城。到前秦分裂时，刘卫辰更是拥有朔方之地，有兵三万八千。

然而刘卫辰与北魏拓跋珪的争斗显然是失败的，史载，北魏大军克代来，俘获

斩杀刘卫辰，其子刘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而北魏也由此得以“自河以南，诸部皆平，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然而后秦弘始九年（公元407年），刘勃勃又叛离后秦，其自以为是匈奴夏后氏后裔，建国号“大夏”，自立为天王，大单于，国号夏，改年号龙升。此后在凤翔元年（公元413年），刘勃勃下令修筑夏国都城统万城，同时又以其祖辈跟随母系姓刘不合礼，于是改姓赫连，表示“徽赫实与天连”；又将非皇族的其他铁弗部众改姓“铁伐”，以示“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此后，勃勃频频侵袭后秦，其先于凤翔三年（公元415年）攻下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次年又乘后秦与仇池杨盛争战的时机先后攻下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及阴密（今陕西灵台县西），随后又攻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及郿城（今陕西郿县），由于其间有胡俨等人叛乱，并杀勃勃所命留守安定的羊苟儿，转而降秦。故而勃勃不得不退于杏城。然而就在此时，勃勃知东晋刘裕统兵北伐后秦，于是认定此乃夺取关中的最佳时机，并故此秣马厉兵，休养士卒。不久勃勃再引兵占据安定，后秦在岭北的各戍及郡县都向夏国投降，岭北全境尽入夏国。同时，勃勃又先后与北燕及北凉结盟。而后，果如他所料，凤翔五年（公元417年），东晋大将刘裕灭后秦，同年年末班师，留儿子刘义真及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诸将守关中。勃勃闻讯后，派其子赫连璝督前锋攻长安、赫连昌出兵堵塞潼关，又派王买德阻断青泥，然后自率大军在后。次年，赫连璝行军至渭阳时，刘义真慌乱，召集大军入城闭门拒守，于是关中各郡县尽皆降夏。此后，勃勃进据咸阳，使长安城陷入困境。刘裕见此，遂派朱龄石接替刘义真，并命刘义真东归。而由于刘义真东归时，其部众大肆掠夺，故而令关中百姓尽起而逐朱龄石，迎勃勃入主长安。史载，勃勃入长安后大宴将士，不久，其又在灞上称帝，改元昌武。及后群臣都劝勃勃迁都长安，但勃勃忧虑及南迁长安后，北魏会以大军威胁统万，故而认为定都统万才能阻遏北魏侵袭北境，于是在次年（公元419年）于长安置南台，留太子赫连璝留守，而自己则回师统万。

真兴七年（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谥号武烈皇帝，庙号世祖，其子赫连昌继位。然而就次年（承光二年，公元426年），北魏大举攻夏，克长安。次年（公元427年）又领夏国都城统万，赫连昌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承光四年（公元428年），北魏攻上邽，俘赫连昌，而后出奔平凉的赫连昌弟赫连定，即皇帝位，改年号胜光。三年之后，赫连定继位时夏国已局促一隅，情势窘迫，不复当

年，因此欲与正在北伐的南朝宋结盟，北魏得到消息后决定一举灭夏国。胜光四年（公元431年），一路败退的赫连定无路可退，遂向西攻灭为北凉所逼情势更加窘迫的西秦。数月后欲再攻北凉，于半渡黄河时，被吐谷浑首领慕容慕璝派军袭击，赫连定被俘。次年（公元432年），赫连定被吐谷浑送往北魏，北魏将其处死，夏亡。当初赫连勃勃所修筑的统万城也由此成为了游牧民族匈奴在东亚大地上留下的唯一的遗迹。

此外，又有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凉州建立政权，史称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此后，蒙逊子沮渠牧犍继位，但不久为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牧犍弟沮渠无讳西行至高昌，建立高昌北凉。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高昌北凉为柔然所攻灭。

除此之外，还有一小支匈奴进入辽东半岛，融入靠近高句丽的宇文鲜卑部落，此后宇文氏篡西魏而建立北周，之后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并统一中原。匈奴也在这期间融入各民族之中。于是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时期成为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场演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草原民族也就此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2

大漠烽烟

——唐帝国战争史（626—790）

顾晓绿 赵 恺 | 著



團结出版社

目录

大漠烽烟
序
前记
第一章 渭水之盟
1．府兵卫国
2．玄武惊变
3．贞观破局
第二章 天可汗
4．秣马厉兵
5．雪满弓刀
6．长安西望
第三章 夷平四海
7．储君之争
8．百战金甲
9．东征朝鲜
第四章 鏖兵白村江
10．倭国介入
11．大化革新
12．当头棒喝
第五章 落日恒罗斯
13．经营西域
14．女皇时代
15．盛极而衰
第六章 塞外余晖
16．暗流涌动
17．安史之乱
18．日薄西山

大漠烽烟

—唐帝国战争史（626-790）

顾晓绿　赵恺　著

团结出版社

序

突厥、唐王朝，两者在建国之初的联系是什么样的？大唐在立国之初，得到了突厥怎么样的帮助？为何在渭水之耻中，李世民会怒斥突厥人背约入侵？两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往事？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渊退位为太上皇，年轻的李世民登基为帝。然而新皇登基不过数日，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铁骑十万南下，兵锋至长安不过四十余里的泾阳，京师震动。李世民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等六人，骑马驰至渭水上，与颉利隔河而谈，怒斥其背约入侵。由于此时唐军诸军会集渭河之畔，突厥人见唐军旌甲蔽野、军容甚盛，遂请和。数日后，李世民斩白马，与颉利可汗盟于便桥之上，“渭水之盟”后，突厥撤军退走。但“空府库”以抚突厥的耻辱，也为此后两者之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渭水之耻后，李世民积极对付突厥，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以及突厥与周围诸部的关系。贞观元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纷纷脱离，改立薛延陀部为可汗， 次年朔方人梁洛仁杀盘踞夏州的梁师都，归降唐朝。加之又遇到大雪侵袭，突厥的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这种情况下，大唐帝国以兵部尚书李靖出定襄道，李世勣出通漠道，柴绍出金河道，李道宗出大同道，卫孝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共十余万人，统归李靖节度，征讨突厥。在突利可汗、郁射设、荫奈特勤等率所部投唐后，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夜袭定襄，破突厥军，擒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亡。隔年北方各族入贡长安，诸民族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以侯君集率唐军攻克高昌，后又陆续攻取了焉耆、龟兹等地，原西突厥的附属国纷纷脱离西突厥转而归附于唐。在感到威胁之后，西突厥开始对唐发动战争。贞观十六年，突厥以兵侵伊州，被郭孝恪击败，阿史那贺鲁归附唐，被封为左卫将军，并为大唐征讨其他西突厥部落，但不久，阿史那贺鲁趁着李世民驾崩的机会，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夺取西州、庭州等地，统一西突厥部众，同唐对抗。

永徽三年，唐高宗李治以梁建方、契苾何力攻突厥；永徽六年，又以程知节、王文度征讨。显庆二年闰正月二十一日，大唐以大军分南北两路讨伐西突厥，北路苏定方，南路为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和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此一战，突厥

大败，萧嗣业追擒阿史那贺鲁于石国，献俘于长安太庙，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

调露元年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由此拉开了持续数十年的漠北战事。张仁愿趁默啜可汗西征突骑施，在河套北岸筑三受降城，作为打击和防御的壁垒。数十年来，唐与北突厥反复拉锯，各有胜负。唐玄宗天宝四年，在唐朝和九姓铁勒回纥等部长达数十年的联合打击下，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北突厥终于灭亡了。

开元三年，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与吐蕃联合，发兵攻打唐朝属国拔汗那国。监察御史张孝嵩与安西都护吕休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击败吐蕃大食联军，夺得中亚重要的属国拔汉那。两年后，突骑施联合吐蕃和阿拉伯人再次攻打四镇，被唐军再次击败。面对阿拉伯人的步步紧逼，为了对抗他们在西域的扩张，唐帝国利用突骑施，作为打击入侵的主要力量，渴水日之战、隘路战役都是阿拉伯军队损失惨重的战事。

750年，阿拉伯内乱，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这个定都巴格达的王朝同样执意于东进，而此时，安西都护府大都督高仙芝以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无藩臣礼节为由，发动了对石国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怛罗斯之战的起因、过程、争议及后续，这场战争对唐、阿拉伯，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将朔方、河西、陇右边军大量内调，平息叛乱，于是边防力量虚弱，吐蕃趁着唐朝的内乱攻略陇右诸州。东西阻绝，西陲四镇沦为分隔飞地，但与突厥、阿拉伯、吐蕃之间的战争却没有结束。

前记

如今的中国，疆域之广，南北、东西跨度之大，的确让人颇为感慨，然而在近现代之前，燕山往北，便是茫茫草原、荒凉戈壁。对中原来说相对贫瘠的土地，并不适合耕种居住，因此被视作是“非王化之地”，倒是流放罪人的好去处。

然而那里自古便是草原民族的摇篮，先秦时代便有牧民在此间生活、繁衍，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政治制度，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美食和信仰。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这些游牧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三胡、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而这其中，对于世界历史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突厥。

突厥，一支分布于北亚和中亚的游牧民族，其起源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北史》记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似乎突厥本出自匈奴，但西方史学者却认为突厥最早是生活在咸海边的“塞种人”，后东迁至叶尼塞河南方，受铁勒同化而成的。根据《隋书》上的记录，这一点似乎是有依据的，史载“自西海以东，依据山谷，多有铁勒。在独洛河，即土刺河以北，有仆骨（仆固）、同罗、拔也固、韦纥（回纥）、浑、斯结（思结）”，认为突厥和铁勒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塞种人”（saka）的复原想象图

但是关于突厥和铁勒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的认知并非是前者为后者所同化，而是突厥部落首领土门大败铁勒部落，收降铁勒部众五万余户。对铁勒的吞并，可谓是突厥部落成长的开始。在此之前突厥部落游牧于阿尔泰山区，长期归附于柔然，为其“炼铁奴”。

随着柔然在长期与高车的战争中被削弱，突厥酋长土门乃向柔然求婚，要求柔然可汗阿那瑰将公主下嫁，阿那瑰大怒而拒，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其意思是说“你不过是我的一个打铁的奴隶，也敢说求婚这种话语”。正所谓“打人不打脸”，土门大怒之下，杀柔然使者，断绝与柔然的关系，而后遣使向柔然的死对头西魏求婚，并和波斯萨珊王朝通好。在西魏将长乐公主嫁与土门之后，土门起兵东征，于怀荒镇以北击败阿那瑰并杀之。此后自称伊利可汗，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以漠北为中心的奴隶制政权，称为“突厥汗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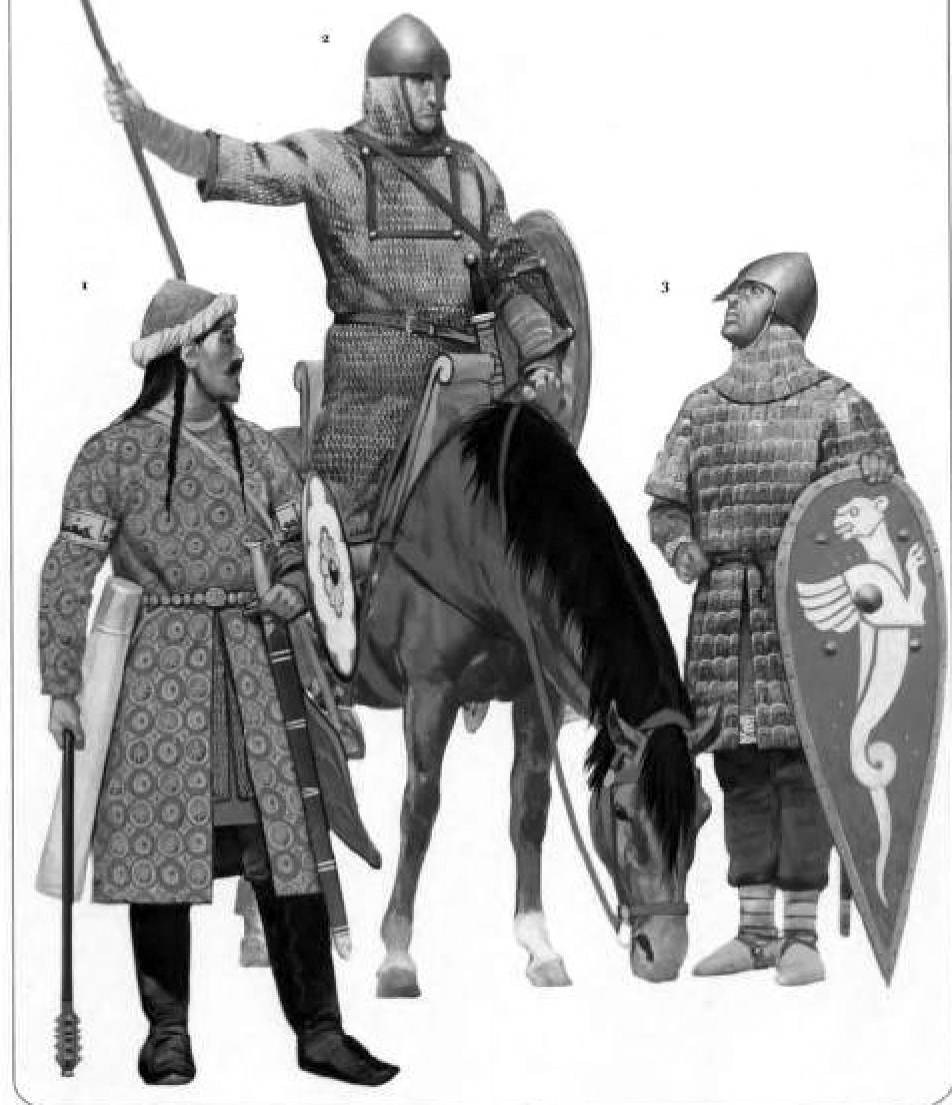
伊利可汗死后，其子乙息记可汗又于沃野北木赖山击破柔然末代可汗邓叔子，彻底灭亡柔然政权，从而一举成为漠北第一大势力。突厥汗国的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由于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故而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土门之次子、第三任突厥可汗木杆可汗的治下，突厥达到了极盛，在《资治通鉴》中被描述为“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的可汗在位期间，突厥疆域东至辽海（辽河上游）， 西濒西海（今咸海）， 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 南临阿姆河南，可谓雄霸一方。

此时，欧亚地区总共有三大帝国，即东亚的北魏帝国、中亚波斯帝国和西亚的拜占庭帝国。刚刚兴起的突厥汗国正处在这三大帝国势力的真空地带，如果突厥想要继续扩张，势必是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突厥人明智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们先与波斯萨珊王朝结盟，从而联手灭掉了位于汗国西部的劲敌哒人，并瓜分其地。但随后，突厥人立即撕毁与波斯的议约，占据了哒故地全部，从而与拜占庭帝国在西亚的边境相连，控制了丝绸之路。

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令突厥收获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在与中原王朝作战时获得的丝绸等财物转手卖到西方，经过拜占庭帝国再入欧洲，一时间获利甚丰。不过一口吞下了哒故地的做法显然很不厚道，面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突厥人知道，他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盟友，才能够确保自己。这种情况下，一个突厥使团来到君士

坦丁堡，觐见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双方结成同盟，以东西对进，联合进攻波斯。在突厥人的挑唆下，三者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年。虽然波斯帝国因此而衰弱，但作为主要出兵力量的拜占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衰落，此时的突厥很是强大，所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甚至后来的达头可汗在给拜占庭皇帝的信中，狂妄而目空一切地自称“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但这位突厥领袖显然是过分自大了，坐井观天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突厥的势力远远不能与高度文明和高度强盛的三大帝国相抗衡的地步，他们注定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拜占庭军队中的突厥雇佣兵（左一）

其实突厥人也明白，虽然控制了辽阔的疆域，但是他们始终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于南方的威胁，汗国兴起之时，正逢中原内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

期，所以他们才得以时时闯入长城以南，劫掠财富人口，而一旦南方中央王朝完成了统一，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原农耕文明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都无非是两种手段，即“怀柔”和“教化”，虽然中原的那群文人平日里把诗书什么挂在嘴上，但内心里却都非常清楚，这些什么礼仪纲常都是虚的，真正算数的还是铁骑刀枪，若游牧民族兵强马壮，那就得“怀柔”、就得“招抚”；若是自己兵强马壮，那就少废话了，直接开过去“教化蛮夷”，告诉他们什么叫作“普天之下”，什么叫作“率土之滨”。所以，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原人，才是最可怕的。

隋帝国建立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因隋朝对其礼薄，打着“为其妻北周千金公主的宗室复仇”的旗号，与前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兵攻陷临榆关，并约同各部落准备大举攻隋。面对强敌压境，隋文帝杨坚不得不下令于北方边地增筑亭障、修缮长城，并加强幽州、并州、乙弗泊、临洮、武威等地的守备。

曾送千金公主至沙钵略可汗处的长孙晟因在突厥留住一年有余，对沙钵略可汗及其叔侄兄弟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他认为突厥大小贵族各统强兵，俱称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所以对突厥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于是上书隋文帝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提议。隋文帝览表后大悦，召长孙晟面语。长孙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

采纳了长孙晟的提议后，隋文帝即遣太仆元晖为使者至西面的达头可汗处，特赐狼头纛，故意表示钦敬，礼数甚优。而达头可汗回访时，隋文帝又故意将其使者引于沙钵略可汗的使者之上。在这套连续的反间计实施后，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之间果然发生了猜疑。此后，文帝又授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携带大量钱财，赐予奚、契丹等部族。

由于隋帝国对突厥汗国采取的分化离间兼以军事进攻等政策，突厥汗国的致命弱点迅速暴露了出来。所谓的突厥汗国，不过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多民族联盟而已，各部落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人口、强弱等参差不齐，这些矛盾表面上被历代可汗的铁腕政策所压制，但其内部的矛盾却是暗流涌动。正是利用对手的这一弱点，隋帝国实现“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最终使突厥内讧更甚，以至于走向分裂。

等到隋帝国“兵强马壮”之时，所谓“教化蛮夷”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在隋帝国的连连反击下，突厥汗国分裂成了东、西突厥的汗国。突厥汗国的分裂，使中原与突

厥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两者彼此相互为敌，但却又同样面临着来自于中原帝国的打击。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接连遭到重创的东突厥选择了归附隋朝。


帝廣在位十三年

此后，数十年间，隋帝国曾几次联合归附天朝的东突厥，出兵对西突厥汗国进行军事打击，这种连续的攻势使得西突厥实力大为衰弱。但很快这种攻守态势便宣告易手，随着604年隋文帝杨坚殡天，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杨广继位，隋帝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北方向的高句丽。

隋大业五年（609），臣服于隋的东突厥启民可汗死，其子始毕可汗立。是年，通晓突厥事务并亲手制定策略毁灭了这个伟大汗国的长孙晟去世，时年五十八。始毕可汗趁机发展壮大，在经过长期蛰伏、养精蓄锐，突厥汗国逐渐复苏，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

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炀帝三次发起对高句丽的战争，劳师糜饷，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争和劳役，以至于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导致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难以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农民起义自然也就发生了。始毕可汗趁着中原内乱这一时机，兴兵反叛。是时天下已乱，正处于崩溃边缘的隋帝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

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率十万骑兵攻隋，当时炀帝正在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时间长达一月余。在感慨“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之时，炀帝发诏要求各地兵马勤王，同时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在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援军相继抵达的情况下，突厥人这才撤围而去。次年，突厥大军再次进犯，大军直扑马邑，但却为唐国公右骁卫将军李渊所击退。

此时突厥虽然是号称“控弦百万”，但始毕可汗也很清楚，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吞下南方那个强大的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已经快要土崩瓦解了。当年始毕可汗随父臣服于隋帝国，亲眼目睹并且亲身经历中央王朝那套 “离强合弱”的外交手腕，因此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策略。大业十三年，随着李密建魏，各路反隋势力相继称王，一时间，中原大地，处处是王，始毕可汗也开始通过出兵相助和册封等手段，来分化操纵中原。

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与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恐事发，集乡闾豪杰，与张万岁、杨伏念、苑君璋等杀王仁恭，据郡起兵，自称太守，开仓放粮，及后依附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与虎贲将王智辩合兵征讨刘武周，困之于桑干镇。

始毕可汗闻讯后，以兵救援，与刘武周合兵，大败隋军，王智辩兵败被杀，陈孝意奔还雁门。刘武周随即依仗突厥人的军势，破楼烦郡，进取隋帝行宫汾阳宫，将俘获的宫女献给突厥，突厥方面则以塞外战马回报，从而使得刘武周的军队兵威益振、气势更炽，先陷定襄，又回军马邑。此后，始毕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并授以他狼头纛，而刘武周也正是在突厥人的撑腰下，才敢自称皇帝，改元天兴。

除了刘武周之外，始毕可汗还扶植了另一位军阀——梁师都。梁师都出身夏州朔方，是当地豪族，仕隋后官拜鹰扬郎将。在杀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称大丞相起兵自立后，他立即联兵突厥攻占弘化、延安等郡，随后称帝，国号为梁，后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封他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的回报是：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刘武周、梁师都等北方势力，都臣服于始毕可汗，这些人的臣服正是始毕可汗那套“离强合弱”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甚至大唐立国之初时，也有突厥的影子，当初李渊诛杀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高君雅起兵之时，就曾经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面对刘文静的许诺，始毕可汗的回应是“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行”，如果“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这个回答倒不是突厥人一心想让李渊当皇帝，当初李渊为右骁卫将军时，其和马邑郡守王仁恭奉诏北击突厥，以擅于骑射者两千，吃住皆仿效突厥，为疑兵，另外选善射者为伏兵，大败突厥，由此可见，其也是有雄心而有才能之人。后隋炀帝被围雁门之时，李渊之子李世民等人更是积极率兵勤王。对于突厥人来说，李家父子皆是“旧敌”，此时始毕可汗许以“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行”，无非是希望中原再多个割据势力，而自己便于掌控罢了。



依附突厥的军阀刘武周



唐高祖李渊

始毕可汗的这套手段，自然瞒不过政治老手李渊，才有了“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的记载，但李渊也深知为保护太原根据地的安全，起兵南下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与突厥的关系，否则突厥包抄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当初在出任太原留守时，他就曾对其子李世民说：“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而如今情况比当初更为复杂，并州的北部已全是突厥的势力范围。为了免除太原的后顾之忧，使突厥的力量不为他人所用而与己为敌，他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

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同时却是决定“尊天子（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之所以这样做，李渊私下曾经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国，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之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怕刘武周勾结突厥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我只是要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几百人也就够了，没有别的用途。”果然，在李渊表示臣服之后，始毕可汗做出了“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的承诺，在仅派遣了数百名士兵之后，突厥人给李渊送来了大批的马匹，唐与突厥之间的盟约初步建立。

不过当李渊于长安称帝之后，突厥方面的政策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武德二年初，刘武周接受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的建议，遂率兵两万南侵并州，始毕可汗以兵马相助。在突厥铁骑的帮助下，刘武周击破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所部，此后接连攻占榆次、平遥、介州。不得已之下，李渊下令太常少卿李仲文为行营总管，与左卫大将军姜宝谊率兵救援并州，然而来援之唐军却被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击败于雀鼠谷。

虽然李渊很快又以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督军抗击刘武周，但大军至介休时，又遭宋金刚据城相拒，双方战于索原度，唐军全军溃败，裴寂几乎只身逃回晋州。此后刘武周势如破竹，进逼晋阳。面对强敌压境，李渊的四儿子——齐王李元吉居然连夜弃城奔还长安，刘武周趁势一举攻占了李唐的起家之地——晋阳。

至十月，刘武周又派遣宋金刚南下攻陷晋州，进逼绛州，攻取龙门、浍州。与此同时，夏县吕崇茂自号“魏王”与刘武周相呼应，而隋朝旧将王行本则据蒲坂与宋金刚相联合。至此，河东大部尽归刘武周统辖，唐在黄河东岸只剩晋西南一隅之地，一时间关中震动，“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的呼声频频出现。当刘武周起兵进攻晋阳之时，始毕可汗也率兵渡过黄河进攻夏州，不得已之下，李渊只得遣右武侯骠骑将军高静带着财物前去面见始毕可汗，可当高静至丰州时，得知始毕可汗已死，于是长安遂“诏留金币”。

眼看着自己的老可汗死了，长安就不给钱了，突厥人自然大怒，欲挥军继续南下劫掠。惊慌之下，李渊只能再次遣高静出塞，送上丰厚的“葬礼礼金”，突厥方才

作罢。仅仅数月之后，八月，突厥人再次入侵延州，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唐帝国不得不“尽发关中兵”，才算是稳定了局面。

因始毕可汗之子尚幼，东突厥改立始毕之弟俟利弗为可汗，是为处罗可汗。这位可汗继位后，先是以义成公主为妻（义成公主在突厥生活近三十年，先后嫁给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而后三个都是启民可汗的儿子），随后又收留了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及齐王暕之子杨政道，并立政道为隋王，还把留在境内的中原人交给杨政道的政权管治。可处罗可汗才继位一年就去世了，在义成公主的干涉下，处罗嫡子奥射设阿史那摸末没有能够继可汗位，而是处罗之弟咄苾得以为可汗，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自为可汗以来，便是一心想要如父亲一样伟大，让南人在铁骑下颤抖，为此，他的军队频频南下侵扰。武德三年九月，突厥入侵凉州，劫掠人口数千，此时因为中原尚未平定，大唐只能通过献礼，以安抚颉利可汗。转眼至武德五年，代州总管李大恩上奏朝廷，言突厥境内受灾、遇有饥荒，请求朝廷派兵攻取马邑。李渊随即令殿内少监独孤晟率兵前往代州，会同李大恩进攻苑君璋，相约会师于马邑。由于独孤晟的大军行动迟缓，李大恩无奈只好屯兵新城。但颉利可汗却先下手为强，派出骑兵数万与逃到突厥的刘黑闼所部一起围攻新城，李渊虽然派出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领兵来救，可援军还未赶到新城，李大恩所部就因粮尽，而被迫突围，结果半道遭到突厥军伏击，唐军大败，李大恩战死。

当年八月，突厥大军再次南下，十五万骑兵入雁门，扰并州，别部扰原州。李渊则以长子李建成出豳州道、二子李世民出秦州道、云州总管李子和出云中，左武卫将军段德操自夏州截断突厥大军的归路。虽已做出部署，但在京都长安，李渊还是招集群臣商议和战。太常卿郑元寿主张与突厥议和，而中书令封德彝则反对议和，主张先战，待取得一定的胜绩之后，再议和，方才有利，李渊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虽然并州大总管襄邑郡王李神符及汾州刺史萧寿分别在汾东等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突厥来势凶猛，先犯廉州，后陷大震关。突厥精锐骑兵十万众，布满从介休到晋州数百里之间，兵锋锐不可当，朝廷不得不遣太常卿郑元寿往见颉利可汗。郑元寿见到颉利可汗后，指责他背信弃义，进犯大唐，并言和亲之利，劝说其退兵休战，两国重归于好。突厥可汗听从了郑元寿的劝说，方才率兵返回。

次年，武德六年，高满政降唐，朝廷遣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协助高满政所部守马邑，不久之后苑君璋率突厥兵万骑，试图夺取马邑，但为高满政所败。颉利闻知

后，大怒，亲率突厥大军围攻马邑。李高迁胆怯避战，率二千部下趁夜出逃，却被突厥军半路截杀，大败，随后突厥军猛攻马邑。长安得知马邑被围后，以行军总管刘世让率兵救援马邑。然而刘世让的军队行进到松子岭时，却因为惧怕突厥大军，而停滞不前，甚至退回崞城固守。此时颉利倒也不赶尽杀绝，他选择了向大唐求婚，李渊虽然诏准，但条件是突厥退兵，从马邑撤走。

可这个时候，义成公主却从中作梗，阻止颉利倒求婚，于是，突厥大军继续围攻马邑。由于城中粮食已绝，加之援兵不至，高满政无奈只好打算放弃马邑，向朔州突围。然而此时军中右虞候杜士远担心城破被杀，于是谋害了高满政，率兵投降突厥颉利可汗。马邑城破之后，颉利可汗继续请求与唐和亲，并同意把马邑归还给大唐帝国。面对突厥人年年南下掠劫，李渊在艰难中做出了选择，他任命秦武通为朔州总管，主管朔州军事。

自晋阳起兵已有近十年，大唐建立也有七年了。武德七年，随着太子李建成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加之刘武周、王世充的败北，出函谷关而入关东的大唐终于平定四方，统一了全国。突厥人自然知道南方中原王朝的统一意味着什么，于是这一年，颉利可汗倾其全部人马，南下入侵。

当年三月二十七日，突厥侵掠原州，随后在五月又扰劫朔州；次月，突厥侵扰武周城，但被代州兵击败。七月初一，苑君璋又引突厥军侵朔州，但被秦武通率兵击退。七月初十，突厥再次侵掠原州，朝廷命宁州刺史鹿大师率军前去救援，同时令灵州总管杨师道出兵大木根山，以截断突厥归路。但十二日，突厥却突然出现在陇州，以至于长安不得不临时抽调尉迟敬德匆匆率兵迎战，可三日之后的七月十五日，突厥却又侵掠阴盘，一时间，关中震动，长安戒严。

面对突厥骑兵的机动灵活，唐军一筹莫展，各地折冲府疲于应付，结果是处处设防而处处不防。当年闰七月，尽管突厥人大军压境，长安城内一场辩论却是热火朝天，辩论的主题是“是否要迁都”。原来在突厥兵锋直指长安的境况之下，朝中有人“突厥之所以进攻关中地区，是因为财富和人口都集中在长安，如果将长安焚毁而不再为都，迁都他处，则突厥的进攻自会停止”。李渊、东宫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尚书省左仆射裴寂都持赞成态度，而宋国公尚书省右仆射萧瑀等人虽然不赞成，但也不敢进谏，唯有天策上将军尚书令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雍州牧、秦王李世民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虽然李渊已经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邓州查看是否可以建都，但被突厥人讥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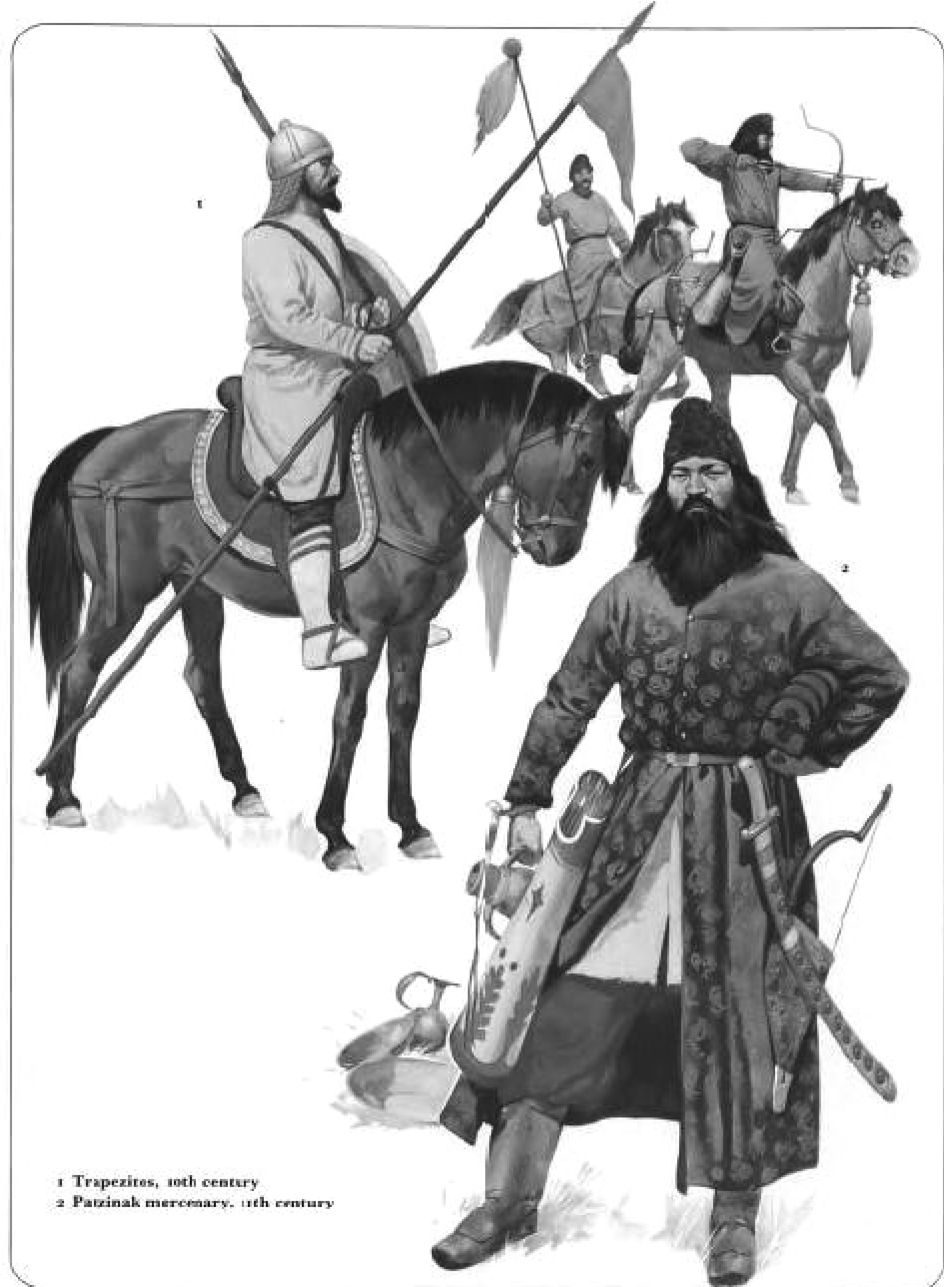
为“唐童”的李世民还是极力劝谏当今皇帝陛下不要迁都。既然不迁都，那么只能和突厥死战到底，是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下诏命李世民出豳州道抵御突厥。

而此时突厥的骚扰也正处于高峰期，八月初一，突厥军侵扰原州；初五，突厥军出现在了忻州；初九，突厥骑兵袭扰并州；十一日，突厥攻绥州，为绥州刺史刘大俱所败。次日，颉利可汗率精骑万人，在豳州以南的五陇坂与李世民所率之唐军主力遭遇。

由于关中地区连日淫雨绵绵，而唐军因连日行军跋涉已疲惫不堪，加之粮道受阻、武器受雨，故而此战无任何取胜的把握，军中将领都很忧虑。然而李世民深知颉利和始毕可汗之子突利之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于是他利用了这一点，乃率百名精骑驰至突厥阵前，厉声指责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实乃背盟失约；而后李世民又策马上前谓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突利亦避而不答。

颉利见李世民百骑出战，又听到他与突利谈到盟约等话，怀疑他们之间早有联系，担心自己被两面夹击，乃遣使劝李世民不要进军，自己亦引军稍却。此时雨越下越大，李世民对诸将说“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于是率军“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虽然颉利一度打算出战，但李世民早派人与突利相会，并晓之以厉害，于是对于颉利的出兵要求，突利居然不从。

无奈之下，颉利只得派突利和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予以了答应，在与突利结为兄弟之后，双方在订立盟约之后，各自撤军。史学界通常都将武德七年看作是唐与突厥的战争开始之年，此后两年间，唐帝国和东突厥在关中、陇右等地多次交锋，而态势多为东突厥进攻，唐帝国采取防守姿势，多轮交锋，双方互有胜负。



西方画家笔下的突厥骑兵

第一章　渭水之盟

1．府兵卫国

自武德七年八月，李世民与始毕可汗之子突利结为兄弟、互立盟约之后，大唐帝国的北方边境稍稍安宁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这种安宁只是因为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已经过去，并不等于是突厥人真的是会来和大唐“和平共处”，毕竟突厥人“时战时和”的做法，也是并不新鲜了。

而对于大唐帝国来说，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突厥人大军压境至长安之北，甚至使得帝国内部就“迁都”问题做出了大讨论。而也就从这次入侵开始，帝国中枢意识到：突厥，这个来自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威胁不仅是巨大的，也是长期的。

然而新兴的唐帝国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虽然每至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之前，帝国便是开始加强塞防力量，但处处设防往往是处处不防，至于外交手段，自武德四年起，那位颉利可汗就几乎是连年用兵，显然并不是一个乐于与大唐之间保持和平的家伙。而他麾下的突厥大军不仅频频侵扰边塞，并且多次南下关陇之地，可以说，颉利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至于军事上，虽然帝国与那些突厥铁骑几次交手结果是双方互有胜负，但总体来说大唐处于劣势。

也因此，虽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被挫败了，但谁都知道，下一次的入侵已是迫在眉睫了，故而为了能够加强防御力量，李渊下诏，恢复十二军建置。所谓的“十二军”，是武德二年时所置设的，史载“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这也就是说，李渊从晋阳起兵时，以最初的三万“元从”作为家底，兵发关中，而至夺取长安时，加上一路上收编、投诚、归降的兵马，他手中已有二十万大军了。

李渊于长安登基称帝之后，这二十万兵马便全部被配置在关中地区，以拱卫京畿。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统辖这二十万大军，帝国还一并将整个关中地区分为了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每道都置有一军，这样总共有十二军。又设立了若干骠骑府、车骑府，统属这十二军。

到了武德三年的时候，十二军又取象天官为名号，即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

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设将、副将各一人，督率府兵且耕且战，以车骑府统之。

可是武德六年二月，皇帝下诏“废参旗等十二军”，而对于当时皇帝为什么要废十二军的原因，史书中记载的很是模糊，根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说是“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也就是因为“天下既定”所以皇帝才决定废除了十二军的。很显然，当时这个举措的错误性，在此后应对突厥大军入侵时，被凸显了出来，以至于李渊不得不又下诏，在被废仅一年多之后，又恢复了十二军建置。

不过当初废止了十二军，不等于是大唐帝国在关中地区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关于这段时间内，帝国在关中地区的兵力，《唐会要》是有记载的：“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也就是说，总兵力是二百六十一个军府、约有精兵二十六万。

唐初实施的是“府兵制度”，而这“府兵制”原是起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也就是所谓“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但北魏在“六镇之乱”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两千万，兵强马壮，而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文昭皇帝大统八年，“军政大事尽出其手”的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之兵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加上贺拔岳的武川镇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所部以及当初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统一编为六军。

次年，实际上掌握着东魏军政大权的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列阵，与宇文泰大军战于邙山，此战西魏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关中军团几乎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故而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在此后几年，宇文泰开始从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至大统十六年时，西魏已经建立起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组织系统。


隋文帝楊堅在位廿

由于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故而这政策明显地带有民族隔离的色彩。为了打破这层壁垒，宇文泰对那些被募充作府兵的汉人给予“赏赐”，令有功的汉人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通过给汉人将佐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的色彩，宇文泰成功地将庞大的汉族人口并入了府兵体系。

可到了北周后期，迫于形势，鲜卑人已经不再占据着统治地位了，而府兵制所存在的那层鲜卑化的色彩也渐渐褪去，大隋帝国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在为北周大丞相时，就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可恢复为汉姓，从而开始彻底破除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旧制。值得注意的是，杨坚之父杨忠早年初随尔朱氏、独孤信征战，后入西魏，并得到宇文泰的重用，因战功赫赫，而不断升官晋爵，而后最大的荣誉便是赐姓“普六茹氏”。

开皇十年，隋文帝再次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等于是让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而变军籍为民籍，兵士本人则由军府统领，这等于是彻底改变了府兵制，使之与最初的“府兵”完全不同。

在西魏、北周时期，府兵被编为二十四军，每军设一开府将军，简称“开府”，全称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开府将军下有“仪同将军”，全称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到了隋初时，掌管军府的军官改名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也被改称“骠骑府”。这个时期，由中央直属的诸“卫府”与“东宫率府”所构成的军府结构体系已经逐步完整，其内部主要职能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晰，即以“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军士也开始编入户籍，从事生产，不过从总体来说，还是继承周制的。

可到了隋炀帝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开始加领府兵，这样领率府兵的就有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共十二卫。而军府也从“骠骑府”被称“鹰扬府”，主官改为“鹰扬郎将”、“鹰击郎将”。这个时候，卫府制度趋于完善，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冲要地区，十二卫的作用是除了临时受命征伐外，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其他军事要

地或重要设施的驻守。府兵也与禁军及地方军等其他力量一起，相互为用，相互钳制，以便皇帝控制军队和维护全国统一。

李渊自晋阳起兵时，最初只是“有众三万人”，而也正是以这些人，这位大隋帝国的唐国公才能够开置“大将军府”。在他起事之时，由于之前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马，先后三次征讨高句丽，而且皆告失败，包括十二卫在内的大隋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在炀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中已是损失惨重，而层出不穷的民变和叛乱更使得帝国仅存的兵力疲于应付，晋阳起兵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在大业十二年初，隋炀帝还曾任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并拥有“黜陟选补郡文武官、征发河东兵马”的特权，加之太原乃“天下精兵处”，大隋自建国以来，对晋阳的军需物资储备就一直十分重视，经多年的积蓄，城中已是“府库盈积”，“太原粮饷可支十年”，正因此，李渊父子才能够盘踞于晋阳，通过“倾财赈施，卑身下士”的方式来交结英俊、密招豪友，发展壮大自身的势力，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在起兵檄文中喊出了“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的口号后，区区三万人便是李渊手里的全部家当，他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以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大都督，督率右三军；第四子李元吉则担负掌管中军的职务，镇守太原。随后，李渊便是携李建成与李世民，率一众“义师甲士”南下，长驱关中，由于进军长安的途中不断吸纳各路义军及“盗贼”，至长安时，总计兵众已达到二十万，也正是依靠这股军事力量，李渊这位前隋太原留守才得以迅速取得了关中地域的控制权，问鼎天下。

而在建立大唐王朝之后，大唐帝国仍是沿用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中央卫府及东宫率府统领地方的“鹰扬府”制度，并从编户农民中征兵，而所有农丁则由保、闾、族、县、州等各级地方政权管理。按照当时的制度，每保五户，而每户成丁以二人计算，则共有十人，也就是从这十人中征二人为府兵，就这样，以此建立了唐帝国最初的“军府”。

此外李渊还颁授军、将、卫、府各级军号并给予实权，如以李神通为右翊卫大将军、窦抗为左武侯大将军、王伯当为左武卫大将军，负责教阅军队；以史万宝以右翊卫将军出镇熊州、刘感以骠骑将军出镇泾州，镇守地方；同时又以秦王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总以领授方面；至于领军将军安兴贵、左武卫将军段德操、骠骑将军魏道仁、车骑将军元韶等人，则是负责统兵以拒突厥。

当然了，武德年间的军制还是有一些调整的，但都是细微的，譬如改“鹰扬郎将”为“军头”，改“鹰击郎将”为“府副”，但很快又袭用隋初的旧制，即以“军头”为“骠骑将军”、“府副”为“车骑将军”，而军府则称为“骠骑府”、“车骑府”，到了武德二年，又以“车骑将军府”隶属“骠骑府”。直到武德五年，天下初定时，李渊才对沿袭的隋时中央卫府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左右翊卫”曰“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曰“左右威卫”、“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曰“左右府”，唯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仍依隋不改。至武德七年定令时，总共置有十四卫府，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同时又改军府名称为“统军府”，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别将”。

从制度上讲，武德年间的府兵既是担负保卫京畿的宿卫军，又是地方戍守军，此外还是野战军，可以说是“一身三任、二位一体”。而那些府兵们则是以番代的形式轮流变换角色，平时是地方军，宿卫京畿时就是卫军，出征边疆时则是野战军。但在实际的军事运作过程中，作为“府兵”这一主流体制的补充，武德年间的唐军其实还有“三位分离体制”，“府兵”之外还有禁军、州兵和镇戍兵这三种军事力量，这些军队相较于“府兵”担负着专门的职务，也由府兵以外的其他兵员所组成。

禁军的来源主要是当年跟从武德皇帝自晋阳起兵的那三万兵卒，由于这些人最早跟随天子“举义”，而且在随后进军关中的战事中出生入死，并立下赫赫的开国战功，加之这些人不仅忠诚，还属于开国功臣，故而武德皇帝自初定天下、定都长安之后，就对这些助其“开国”的将士们重礼优待，这三万兵卒中的多数人除了被赐予关中地区的肥沃粮田外，还被编成了屯驻于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外的“北门屯营”，号为“元从禁军”。而既然作为禁军，这支在北门宿卫的“左右屯营”从设立之初，其目的就不是在外征战，而是作为皇帝的私兵所存在着，所有兵士都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州兵又称兵募、募人、征人，最初只是为了应付临时征行而征集的兵员，所谓“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因此性质和府兵不同，没有番上宿卫的责任，而且这个时期的兵募也不同于此后的募兵，而是由州县强制征发的。征发的过程是中央、州、县、里逐级发传征兵令，然后由里正差发，县主管官员审定。在征发完毕后，兵募要以州为单位集中，统一发放军行器物，然后亦以州为单位实施编组，所以兵募名为“招募”实为“征发”。

镇戍兵也叫边防镇军，主要通过兵募而来，主要负责“掌捍防守御”，其编制包括镇、戍两个不同级别的组织，史载“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镇戍的兵力则为“每防人五百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镇戍兵募的戍期通常较短，“防人番代，皆十月一日交代”，戍期一年。

由于武德年间主要实施的是“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即对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实施重点防御，故而除了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十四卫”及参旗军、鼓旗军、玄戈军、井钺军、羽林军、骑官军、折威军、平道军、招摇军、苑游军、天纪军、天节军这“十二军”之外，其实还有太子东宫诸率府以及秦王、齐王的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府、帐内府等力量。

由太子李建成直接掌握的“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太子左右清道率”。“东宫六率”为太子直属的亲兵，各领军府三至五不等，为太子直属的亲兵，由其直接掌握。此外，李建成在长安及四方招募勇士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于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秦王、齐王则是各有左右六护军府、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左一右一“护军府”设护军各一人以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此外还有副护军各二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事各一人，另有“统军”各五人、“别将”各十人，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而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则是各有“统军”三人、“别将”六人，余职员与左一右一“护军府”相同。左右“亲事府”则是各置“统军”一人以掌率左右别将侍卫陪从，其下各置左右“别将”一人，长史、录事、铠曹、兵曹等参军各一人。至于“帐内府”，其职员品秩与“统军府”完全相同。

当然在武德年间虽然关中是府兵的集中地，但除了关中和京畿之外，河东道由于是“龙兴之地”，加之这里历来也是突厥南侵的要冲地带，故而也是军府的主要部署地，甚至河东的府兵一度占到全国府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仅次于京畿所在的关内道。

武德七年，李渊下诏重新恢复十二军，正是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这一思想下，为了防御突厥进攻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此番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

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并要求十二军必须“简练士马，以备战争之需”。

很显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危机让大唐帝国意识到了突厥的威胁性，而且帝国中枢也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应对突厥的下一次入侵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较大的事情。

武德八年四月，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忽然派遣使节入唐，而此番西突厥使节前来的长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婚”。统叶护可汗其实是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的弟弟，其在继位为可汗后，西突厥依靠武力，在接连开疆辟土，先是北并铁勒余部，继而西南逾过阿姆河，而且还占领了吐火罗故地，并拓境至罽宾北界，武功极盛。《旧唐书·突厥下》这样描述统叶护的全盛时期：“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此外，西突厥汗国的大军还曾多次入侵波斯萨珊王朝，根据东罗马帝国的史料记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弗拉维斯·希拉克略正是设法与统叶护可汗达成同盟，共同向萨珊王朝发起袭击，才使东罗马帝国在尼尼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这位希拉克略王朝的缔造者还曾在第比利斯城下与统叶护为可汗会面过。

不过，统叶护可汗虽然号称“有控弦之士数十万，武功超过历代可汗”，在他的统治下，西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起高昌，南至信度河流域，可谓是强盛无比，可这“强盛”的背后却也是矛盾重重。按照史料的记载，在统叶护为可汗时期，将西域诸国国王纳入突厥的军事行政体制之内，即授予“颉利莈”官号，另派“吐屯”一名驻扎监视，督征赋税，加上统叶护自负强盛，用政苛猛，这也就导致了那些西域小国很是不满，许多部族纷纷反抗，尤其是葛逻禄人最为激烈。对于这些反抗，统叶护可汗采取的是“铁腕”统治手段，而不是“怀柔”抚慰，大军的镇压，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抗，这自然使得西突厥其实在其控制地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此外，统叶护可汗又将汗国的政治重心西移，置新牙于石国的千泉，直接控制战略要地碎叶川和丝绸之路的热海道，这自然会是与同样强大的东突厥发生冲突

了。不过此番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节入唐求婚，倒是给了大唐帝国一个机会。李渊与侍臣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时，面对李渊“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的询问，中书令封德彝、民部尚书裴矩等人的主张或是答应其请婚，以结好西突厥，继而“远交而近攻”，或者是“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在这种意见的左右下，李渊遂派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



尼尼微战役中东罗马帝国军队采用了类似于游牧民族的骑射战术

不过大唐帝国在做和亲准备的同时，也在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在唐帝国的北方边境地区，除了那些东突厥人之外，还有两个割据政权对于大唐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个是占据了河东道北部、据守恒安的苑君璋，另一个则是控制了关内道北部、据守夏州的梁师都。

此二“贼”之中，苑君璋的威胁较小。此人本是朔州马邑人，出生自豪族，因为

娶了刘武周的妹妹，故而与刘武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刘武周被突厥人册封为“定杨可汗”时，苑君璋又被任命为内史令。武德二年，刘武周接受了部下宋金刚的建议，准备“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苑君璋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审时度势，为刘武周分析天下大势，以说明此举不可为，并规劝刘武周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然而对于苑君璋的建议，刘武周并不以为然，他选择了自率大军南下，而留苑君璋守朔州，后来，果然如苑君璋所料。直到大败之后，刘武周方才懊悔，他甚至流着泪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武德五年刘武周逃往突厥被杀之后，苑君璋率余众依附于突厥，突厥人任命其为大行台，还让他统领刘武周的余部，但同时也派兵“协助”镇守马邑，就近对其展开监视。为了自保，苑君璋成了突厥人南侵大唐的先锋。

但在大唐帝国面前，苑君璋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武德四年，苑君璋先是被代州总管李大恩以兵击败；次年三月，当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时，苑君璋又与颉利可汗、高开道合兵攻之，结果不逞；武德六年，其与刘武周旧将高满政率兵夜袭代州，但依然未能攻下……不过虽然苑君璋连连骚扰边境，对于此人，李渊倒也不是没有派人招抚过，可他非但拒不接受，反而再次进犯代州，却被代州刺史王孝德所击败，又一次吃了败仗，这连连的败仗不仅搞得苑君璋灰头土脸，也使得部下们对他越发不满起来，于是高满政站了出来。

本来高满政是劝说苑君璋尽杀城内的突厥，继而内归的，可是苑君璋不从。在当时，马邑早就人心浮动了，因为困于兵祸，不但城内百姓哀怨、人人厌乱，而且军卒们也不想听命于突厥人，于是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准备杀死苑君璋，继而降唐。可谁也没有想到，高满政尽心策划的夜袭计划却走了风声，苑君璋连夜逃奔突厥，但他的一些部下和一个儿子，以及城内的两百突厥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高满政在发难之后，迅速控制了马邑，这些倒霉蛋都被高满政杀死。随后高满政率众投降了大唐，并因为“功劳”而被拜为朔州总管，进封为荣国公。

“杀子夺城之仇”自然要报，苑君璋狼狈出逃跑到突厥之后，首先向突厥人求得援兵，随即率众发起了反扑，武德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苑君璋率部前来攻打马邑，但却是先败于高满政，随后又在七月初二日为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与高满政合兵击

败于腊河谷。

虽然两次进犯皆遭失败，但在当年十月，急于报仇的苑君璋却再次以突厥兵攻打马邑，这一次，突厥大军的攻势更为猛烈，唐帝国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居然临阵脱逃，直接导致了高满政被围困在马邑城内。不久之后，高满政被他的部下右虞候杜士远所杀，随后马邑开城。但苑君璋在率突厥人入城尽杀高满政党羽之后，并没有在马邑继续盘踞，而是退兵据守恒安。

之所以放弃马邑，原因很简单，虽然大仇得报，不过苑君璋却也陷入到了危机之中，由于部下都是汉人，而且他们都不愿为突厥效力，所以此时的苑君璋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局面，他虽然也希望能够归附大唐，可却又担心被诛杀，于是请求李渊，希望能够“献奉北境以为赎罪”，李渊也允诺让其继续在北疆，并派遣雁门人元普送来丹书铁券。可这时，突厥颉利可汗也派人来招降，面对大唐和突厥，苑君璋犹豫不决了。

他的另一个儿子苑孝政谏劝说他道：“父亲大人既答应降于大唐，又要贰于颉利可汗，这是自取灭亡。如今粮食殆尽人心又离，不及时决断，恐怕发生意外变故，孝政不忍见此惨祸！”可儿子的劝说却并没有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苑君璋最终下定决心，他反而是召集众人前来商议。恒安人郭子威建议：“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对此深表赞同的苑君璋此时做了决断，于是立即派人拘捕元普，并将之送到突厥，而突厥的颉利可汗对他的这一选择则是“感其诚义，送以锦裘羊马”。

这个选择却显然导致了他的部下们的不满，甚至竟有人送来“死亡威胁”，在这份匿名信中，赫然写着“不早日降唐，父子诛灭”。对于满门尽灭的死亡威胁，苑孝政害怕了，他倒是想南下去投大唐，可却被自己的父亲所拘禁。苑君璋思考再三之后，也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占据恒安，以观局势。

相比之下，梁师都对大唐构成的威胁要比苑君璋大多了，自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初一，梁师都起兵造反以来，先是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随后又与突厥联手击败了前来镇压的隋将张世隆，派兵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并自行称帝，国号为“梁”，由于他在祭祀上天于城南之时，因掘地埋玉而得印，故而以为符瑞，于是建元年号为“永隆”。在梁师都继皇帝位时，突厥始毕可汗还曾给他送以狼头大纛，并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为了表现他对突厥人的忠心，便引导突厥兵占据了河南之地。

从此之后，梁师都便成为了大唐北方地区的一大“祸患”，而双方之间所爆发的战事也是接连不断，不过显然梁师都并不是大唐的对手。武德元年七月初四，梁师都率部进犯灵州，为骠骑将军蔺兴粲所败；次年三月初一日，他再犯灵州，被灵州长史杨则所击退；当年九月，梁师都与突厥千余骑扎营于野猪岭时，延州总管段德操先是按甲不战，等到梁师都所部士气懈怠时，忽然派兵出击，两军酣战之际，段德操亲领轻骑从其阵旁掩击过来，于是梁师都大败而逃，而唐军则是跟踪追击二百里路，俘获甚多。

不久，不甘心失败的梁师都又一次率军进犯，这一次，他统领步骑五千人，浩浩荡荡南下，可遭受的失败更大，对手依然是段德操，只不过这次这位延州总管下手也狠，不但将梁师都五千步骑俘斩一空，而且招降其堡将张举、刘旻。大败而归的梁师都很不甘心，于是他派遣尚书陆季前去游说突厥处罗可汗出兵，并让陆季转告处罗：“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敌，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亦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

在陆季的摇舌鼓动下，处罗可汗颇为心动，于是他以莫贺咄设侵入五原，又以泥步设与梁师都合兵前往延州，自己则是亲自率兵攻打大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并让突利可汗所部即奚、霫、契丹、靺鞨等一众附庸，由幽州道向南进犯，会同窦建德的大军，自滏口西入，最终多路大军会师于晋、绛地区。

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很是不错，但在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却因为处罗可汗的去世而骤然夭折，突厥兵马未出，而孤军南下的梁师都也就再次倒了大霉了，本想借着突厥人的大军，一雪前耻，结果反倒是自己再次被段德操以兵攻破，一败涂地而归。

武德六年，由于对梁师都不满，其部将贺遂、索周率所部十二州归降大唐，延州总管段德操于是伺机尽起边兵，大举进击梁师都，甚至一度攻拔其东城，使得梁师都只得退保西城不敢出战，所幸突厥颉利可汗同意发兵来援，这才让他避过覆灭之灾。但从此之后，梁师都则是兵势益衰、一蹶不振，只能依附突厥，充当突厥大军南下入寇的先锋。



唐代武士

对于大唐帝国来说，要想和突厥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便是要首先拔除掉苑君璋、梁师都这两个分别楔入在河东道北部、关内道北部的“钉子”，从而打开局面。于是武德八年的正月，李渊便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对梁师都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而西突厥统叶护在武德八年的这次遣使来请婚，无疑给予了大唐趁机在扫荡苑君璋、梁师都势力的同时，联合西突厥打击颉利的最好机会。唐帝国虽然同意与西突厥联姻，不过因为当时颉利可汗频繁入寇，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被阻塞了，故而联姻方案最终不了了之，统叶护可汗也在不久之后死于西突厥内部的政变。

尽管和西突厥之间的联姻及联合进攻东突厥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武德八年正月，当帝国中枢在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的同时，却也在着手应对突厥的下一轮进攻，春节刚过，这一年的备边的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渊数次召开御前会议，与重臣们讨论边防事务。其实对于防范突厥，并没有太好的方案，尽管朝中诸臣是各抒己见，但大多是消极防御。

譬如，将作大匠于筠提出的一个建议“甚妙”，那就是“未若多造舩舰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黄河之中，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而中书侍郎温彦博则提议“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也就是前者建议在灵州造战船，在黄河设置水师，以阻挡突厥入寇，而后者则主张师学魏文帝曹丕挖掘长堑阻遏匈奴的做法，开挖堑壕，以用来隔断北部的重要道路，从而使得突厥大军无法南下。显然，这两个主意都是消极防御，但李渊却对这两个主张都予以肯定，于是派遣右武侯将军桑显和前去北方主持挖掘堑壕以隔断北方要路的工程，同时还开始征募江南习水之士，以在灵武、五原设舟师、造战舰，以扼制突厥南下。

不过正当这一年的备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时候，在京师长安，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却也更紧张了起来。太子李建成乃李渊嫡长子，秦王李世民则为次子，晋阳起兵时，兄弟二人倒也同心协力，但终因权力之争两人还是起了隔阂，一来是秦王自以为功高远超太子，故而觊觎起储君之位，太子也因为秦王的巨大声望而对其戒备有加，兄弟之间的争斗不休。不过这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二人所代表的势力。

2．玄武惊变

李建成宅心仁厚，喜欢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大唐开创之后被立为太子，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时，李建成也是治政谨慎、思虑清明，且知人善用，所用之人如王珪、魏徵之流皆为当世大才，故而深受文官及高门权贵所喜。至于李世民，破薛举，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杲，又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攻灭王世充、窦建德，可谓是战功赫赫。当然了，李渊也没有少“亏待”自己这个能征善战的儿子，刚刚登基称帝，便册封李世民为秦王，武德元年，授尚书令，领右翊卫大将军，掌管尚书省，又加右武侯大将军、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整个关东悉由他做主。

武德二年，以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兼领凉州总管。武德三年四月，又加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次年二月，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又以其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文武显禄尽皆给予，可谓是尊荣无比。只不过，李渊所忽略的是，此时的世民已经不再是他那个乖巧的儿子了，而是武官集团的代言人。

其实在武功方面，从太原起兵到进入长安称帝建唐，李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弟弟。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时，李建成携领家属在河东居住，于是李渊密令李建成在河东秘密结交有才能的人。刘武周据马邑起兵，并破楼烦郡、进占汾源宫之后，李渊迅速以讨贼为名，展开募兵的同时派密使到河东催促李建成来太原商议，正是在李建成、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的多次劝谏下，最终才有了晋阳起兵。

在起兵之后，李建成首先便奉令前去讨伐西河，由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时间城内众人纷纷来投，只有郡丞高德儒不肯归降，郡司法书佐朱知瑾悄然开城，将李建成兵马引进，于是西河被平定。最终李建成只是将高德儒生擒后斩首，其他人等全部赦免，加上在路途中的时间，此战仅仅九天，以至于班师后，李渊非常高兴地说：“用这样的方法用兵，可以横行天下。”而在进图关中时，又是李建成率刘文静、王长谐等人拒守潼关，兼守永丰仓，以防止进攻长安的大军腹背受敌。

除此之外，李建成还有平定山东之功。武德二年，司竹盗贼祝山海作乱，自称护乡公，是李建成率军前往将其平定的；同年四月，安兴贵杀死割据凉州的大凉皇

帝李轨，平定河西，也是李建成前往原州接应的；次年，秦王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李渊以李建成镇守蒲州，防备突厥，保障了李世民通过虎牢关一战，击败窦建德，并最终迫降了王世充；武德四年，稽胡大帅刘仚成拥众数万作乱，又是李建成率军前往征讨。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军作乱山东，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马魏徵认为李建成虽然是太子，但功绩远不如秦王，于是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李建成听从了魏徵等人的建议，请缨去征讨刘黑闼，当年十二月，李建成于魏州大获全胜，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不过，即便是有平定山东之功，但无论是战功，还是在军中威信，李建成皆不及李世民。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帝国的开国基业，这种情况下，太子与齐王李元吉联合，而秦王也与太子、齐王之间猜忌日深，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之间也开始互相倾轧，但总体来说，太子李建成占据着上风，于是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杨文干兵变”。

武德七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于李渊在铜川县北玉华山中的仁智宫避暑时，举兵造反。由于杨文干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故而此事牵扯到太子及许多东宫僚属。李渊命李世民出兵庆州平叛，并许诺废李建成而立其为太子。由于太子听从詹事主簿赵弘智的意见，前往行宫面上，以“自投于地、不能起”方式叩头请死，加之中书令封德彝等人说情，李渊在回到长安后只处罚了太子的幕僚，却没有废掉太子。

此事之后，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完全公开，两者之间各有优势。太子与李渊最宠爱的尹德妃、张婕妤两人关系密切，她们经常在皇帝面前替太子美言，说什么“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臣妾母子定无孑遗”，又说“东宫慈厚，必能养育臣妾母子”等话语，加上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与太子交厚，使得李建成一直保持皇帝对他的信任，此外，太子还获得齐王李元吉的支持。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李渊担心如果“废长立次”，那么以武功见长的秦王李世民会不会如同他的表兄隋炀帝杨广那样穷兵黩武，使得大唐帝国历二世即亡。

其实李渊不是糊涂蛋，杨文干造反，最初是东宫两名卫率统军率先叩报的，一人名叫乔公山，另一人叫尔文焕，本是奉东宫左卫率韦挺之命，给在庆州的杨文干

运送一批甲仗军器的。杨文干虽然是拜庆州兵马总管，兼领本州刺史，可李渊消暑的行宫“仁智宫”所在的玉华山却是位于庆州治下的铜川县，也因此，二人没去庆州总管府驻节的庆阳，而是径直跑来了仁智宫，向李渊奏报杨文干要反。而彭原尉杜凤举也跑来告发，说是杨文干叛乱，这才引得李渊大乱。至于两名职不过七品的卫率统军如何能够直入行宫向皇帝面奏机密，杜凤举又是何人，却被人忽略了。此后，前任庆州刺史司农寺卿宇文颖衔敕离宫，去招降杨文干，却是私下向杨文干泄漏了乔公山尔文焕告密的消息，也正是在他的蛊惑下，杨文干方才公开扯旗造反。

虽说杨文干最终是造反了，并且他也不该越过朝廷兵部直接向东宫行文索要甲仗，此外东宫左卫率违背制度私自调运盔甲兵器给庆州总管府也是实有其事，但此事终究是疑点重重，于是李渊最终是下敕夷杨文干三族，同时严词训斥了李建成，却并未废黜其太子之位，而是将东宫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远发邛州、秦王的腹心幕僚天策上将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杜淹流巂州。就这样，李渊以较为高超的手段，处置了这场惊动天下、震撼朝野的大案，但从此之后，李渊对秦王李世民的猜疑也变得越发加重了。

其实李渊对于太子李建成还是比较满意的，在李渊眼里，李建成不仅宅心仁厚，而且治政谨慎，思虑清明，任何时候都不会意气用事，文官们对其是赞赏有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个很好的继位者。从武德元年开始，这位大唐储君多次以“监国摄政”的名义单独处理朝政事务，不但从不曾出过什么纰漏失误，而且任何事情都是处理得有条不紊，加之儒家本就是主张立嫡以长，故而李建成继位，本是无可厚非。但武德建元以来，民间坊内、朝内朝外，立秦王为太子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从那位瓦岗首领自称“魏公”、后入朝被拜为光禄卿、封邢国公，最终被熊州副将盛彦师斩杀于熊耳山的李密，再到曾为前隋晋阳令、天子故交、力劝皇帝晋阳起兵、后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封鲁国公的刘文静，以及曾是雄霸江南、后为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封楚王的杜伏威，还有李氏宗族的淮安郡王李神通，人人都希望皇帝能够立“二郎”为储君。

李渊也知道秦王功高，若不立李世民为太子，仅以一个“功高不赏”，就足以让他在自己“身后”丢了性命。可最终呢，李渊还是选择了李建成，李世民获得了个“天策上将军”的殊荣，但却是与储君之位失之交臂，说到底，李渊还是认为，皇位的继承人无论是用人，还是行政上，都要老成练达，才华固然难得，心性却更加重要，如果李建成的文治和李世民的武功能够集中于一人之身，那就完美了，可是天下哪

有这么如意的事情？

不过李渊只看到了一面，满朝王公文武，只是钦服秦王东征西讨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武略，却少有人知道这位李二郎的抚民治政之能，秦王不仅有尚书右仆射萧瑀、任城郡王李道宗等人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天策府里聚集了各路人才，文臣有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姚思廉、薛元敬、薛收、杜淹、许敬宗、盖文达、陆德明、蔡允恭、苏勖、颜师古、颜相时、于志宁、苏世长、李守素、阎立本、高士廉、温大雅、刘政会等，而武将则有尉迟敬德、侯君集、段志玄、程咬金、罗士信、长孙顺德、秦叔宝、邱行恭、邱师利、史万宝、刘弘基、柴绍、张亮、刘师立、屈突通、张士贵、独孤彦云、张公瑾、史大奈、公孙武达、杜君卓、郑仁泰、殷开山、长孙安业等人，也正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陕东陇西，其经略数年，百姓生计渐有开皇之初的气象。

说到底，太子和秦王，无论文治武功，皆是治理天下的长才，无论谁克承大统，均能振兴社稷开启一代盛世局面，只是李渊无法去选择……就这样，大唐在内有太子、秦王之争，外有突厥威胁的情况下，进入到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也许注定了武德八年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武德八年六月，进入初夏后，随着突厥传统入侵时节的临近，大唐帝国的中枢也开始更为紧张起来，为了能够在原有备御措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防御，六月十四日，李渊下诏，遣左翊卫燕郡王大将军李艺率天节军出泾州，大军驻屯于华亭县及弹筝峡，随后又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以防止突厥突袭。

其实从这两道命令来看，帝国中枢很显然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来加强关内道和河东道这两个方向上的防御部署，毕竟这两个方向实在太重要了，关内道是京畿所在，而河东道则是龙兴之地晋阳所在，对于大唐来说，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这两个方向，可偏偏这两个方向也是历年突厥进犯的主要方向。

根据《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长安西通凉州的北道”中的记载“（原州）平凉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堡西道入弹筝峡，约尽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泾水河谷而上，至此峡，近水源，群山怒起，路随峰转，绕行涧底”，“形势奇险，为戍守要地”，可以看出，弹筝峡是原州西入豳州、进而到达京师长安的咽喉要道，而对于关内道和京畿的防御部署来说，此峡谷显然是有着很大的军事意义。而华亭县，行政上则属于陇州，不过和弹筝峡一样，这里也是长安西北方向最为重要的军事要点。

在用人方面，李渊选择左翊卫大将军燕郡王李艺，他出镇长安西北的两个要点，也是用心良苦。李艺，本名罗艺，襄州襄阳县人，他的父亲罗荣本是隋代的监门将军，按照史书上的记载，罗艺这个人是“生性刚愎残酷”，使得一手好槊，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加之他作战勇猛，故而很快便是在军中崭露头角，至隋炀帝大业间，便以战功升至虎贲郎将。隋炀帝大业八年发兵征讨高句丽时，曾经敕命罗艺督军北平郡，归属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节度。由于罗艺自幼掌军，故而是号令严整，加之辖下所部战力颇强，因此他深受李景所器重。

后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罗艺也开始在这乱世中进一步得以施展自己的统帅之才。由于罗艺当时率军所驻守的涿郡不仅物产丰富，战略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加之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出征辽东的隋军有大批的器械资储都是留存在涿郡的，可以说是仓廪殷实，大业年间在蓟城所营造的临朔宫也是藏有颇多的珍宝，故而引得涿郡附近的义军蜂拥而来，竞相抢掠，而涿郡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人又都不能抵抗这些前来抢掠的乱军。

这种情况下，罗艺丝毫不惧，他独自出战，却是连战连捷，一时间是威名远扬，以至于附近义军居然没有人胆敢觊觎涿郡。可是罗艺的赫赫战功却也是让赵什住等人产生了嫉妒，很快便企图暗中加害罗艺，而得到信报后的罗艺则索性趁机自立。于是在大业十二年，罗艺公开宣布誓师起兵，他对士卒道：“吾辈讨贼，甚有功效，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无心济贫，此岂存恤之意也！”此话一出，将士纷纷响应。随即罗艺便率军杀回涿郡，面对滚滚而来的虎狼之师，涿郡郡丞慌忙出城相迎，而罗艺在扣押了郡丞之后，随即率军入城。赵什住等人见大势已去，大惧之下，纷纷请求投降，就这样，罗艺夺取了涿郡。

夺取了涿郡之后，罗艺将库存的财物分发给了众将士，并且又开仓赈济饥民，广揽民心，继而又杀了拒不降顺的渤海太守唐祎等数人，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在攻占涿郡不久之后，柳城、 怀远相继归附罗艺。此后，罗艺又罢柳城太守杨林甫，并且改郡为营州，任命原来的襄平太守邓皓为营州总管，而他自己则自称“幽州总管”，统辖幽、营二州，拥兵十万，俨然成为了北方一大割据势力。

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等人于江都谋逆，杀死隋炀帝杨广后，曾经派人去招降罗艺，可是罗艺却回答说：“我是大隋旧臣，今大行颠覆，义不辱于贼。”说完之后，让人斩杀使者，并公开为隋炀帝发丧三日。此后，窦建德、高开道等人也都曾经遣使招降罗艺，但罗艺都拒绝了。当然了，对于前路，他不是没有打算，罗艺曾

经对自己属下的文官部将们说："建德等皆剧贼，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据关中，民望所系，王业必成，吾决归之，敢异议者戮！"

果然当李渊派张道源抚辑山东时，罗艺丝毫不拒，当即奉表归降。武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尚书省正式敕书，任命罗艺为幽州总管。次年，李渊又下诏，将罗艺封为燕郡王，并赐姓李，可见皇帝之恩宠。从此罗艺便改名为李艺，成了大唐在北方镇守边疆的一员大将。

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入寇、作乱山东之时，太子李建成出师讨伐，李艺也奉诏出兵，最终二人会师于洺州，并肩大破刘黑闼军。此战之后，李艺忽然主动请求入朝，李渊不仅应允，而且还待其颇厚，拜他为左翊卫大将军，居家于长安。也就从那之后，李艺卷入了大唐皇室的储位之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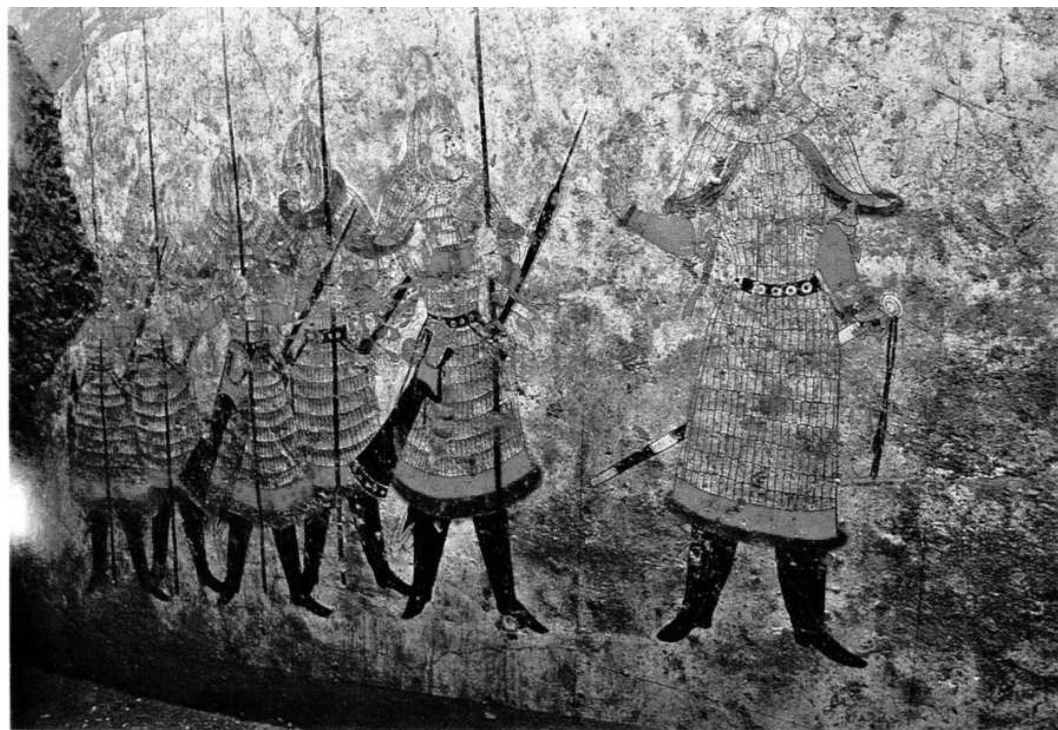
李艺向来自负其功，为人傲慢，但自洺州之战后，这位桀骜不驯的燕郡王却是与太子李建成交好，卷入储位之争倒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毕竟当时朝中文武官员，没有参与到其中的寥寥无几，可这位左翊卫大将军干得也太离谱了，秦王天策府的亲信张士贵到他营中公干，不但被他轻慢对待，而且还给找了个理由，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李渊闻知此事后，大怒不已，敕命将李艺立即逮捕，并关在了大理寺天牢之中，让他好好反思，以警告他不要参与到储位之争中。

再怎么样，太子、秦王之争终究是帝家的私事，李渊不希望有过多的外臣来干涉自家的私事，虽说天子无私事，可无论是太子李建成继续为东宫，还是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储君，那终究是李渊自己心里衡量的事情，不过此时李渊还不想杀了这个能征善战的统兵将才。

此时突厥强横，李渊在慎重考虑之后，认为李艺素有威名，为突厥所惮，故而希望借其威名以使那些突厥人能够有所顾忌，于是这才下诏，让李艺以本官领天节军将，出镇泾州。在让李艺率领天节军进驻弹筝峡、华亭县的同时，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则是李渊为了加强河东道一线的防御，而采取的措施。石岭，位于河东道境内，也是突厥大军南入太原的重要通道，根据《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的记载"太原北行至石岭镇岭上或逾岭置关，隶忻州定襄县……石岭关山势回报，号为险阻，其路仅容单车，故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之乱后，且置军以镇之"，可以看出，这是太原北部的门户屏障，同时也是咽喉之地。

所谓"断道"，其实也就是通过破坏道路的方式，来切断突厥入侵的道路。其

实“石岭断道”这个方略是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所提出的，窦静是根据太原的地理位置和石岭的地形，经过考察之后，认为如果在石岭实施断道，则很显然能够有效地阻滞突厥人南下。自武德初年，窦静受命任并州大总管府长史以来，很是注重北方的军事防御问题，由于北边的突厥多次侵袭并州，加之当时军队粮草供应又是一大难题，为了能够有效地防御突厥南下，并解决军粮问题，窦静曾经多次向皇帝上表，请求在太原附近实行屯田，就地耕种粮食，也正是他的这一主张使得并州驻军通过屯田垦荒的方式，一年收获粮食达十万斛，而他也因功而被升为检校并州大总管，可以说，窦静是很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当他在太原附近组织屯田的同时，便一直注重防范突厥南下，窦静以突厥频来入寇为由，请断石岭以为障塞，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此番姜行本在石岭断道，便是李渊对他的这一建议所给予的肯定。



唐代武士图

不得不说的是，武德八年的上半年，大唐帝国在备御突厥南下入侵的问题上，是比较重视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很多措施，无论是派遣大将军右武侯将军桑显和

前去北方挖掘堑壕隔断北方要路，还是征募江南习水之士在灵武、五原设舟师、造战舰，又或者是遣燕郡王左翊卫大将军李艺率天节军出泾州，屯于华亭县及弹筝峡，或者是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都是一系列的备战手段和措施，效果如何呢？恐怕只有经过战争的检验，才能发现是否有效。而随着夏季的到来，突厥人开始南下了。

武德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随着颉利可汗率军南下进攻灵州，武德八年唐与突厥之间的战争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大幕。灵州位于如今的甘肃灵武地区，由于最靠近突厥所在地，故而往往也是每年突厥南下，首先遭到进攻的州。武德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颉利率军南下，首先进攻的目标依然是灵州，而突厥人所面对的对手，并不是一个“善茬儿”，而是时任灵州总管的任城郡王李道宗。

李道宗为李渊的堂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的陇西郡公李虎在北周受魏禅后，因录佐命功居第一，故而被追封为唐国公，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昞，因为上面的两个哥哥很早就夭折了，故而承袭了唐国公爵位。李昞死后，幼年丧父的李渊七岁便承袭了父亲的爵位，也正是因为唐国公的爵位，因此李渊才在登基称帝后，将国号定为“唐”。李虎的第四个儿子是为李璋，北周时，曾官居梁州刺史，但因为与赵王宇文祐合谋试图谋杀把持朝政，后被隋文帝的北周大丞相杨坚所杀，不过杨坚倒也没有诛其族，于是李璋的后代得以存活了下来。李璋生有两个儿子，一为李韶，一为李孝基，大唐初立时，皇帝大封宗室，很早便将去世了的李韶被追封为东平王，赠户部尚书，而他的长子李道宗则被封了略阳郡公。

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自龙门关渡过了黄河，去征讨割据河北的刘武周，当时大军屯于柏壁，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的唐军形成掎角之势，共同进逼宋金刚军。时年不过十九岁的李道宗随李世民出征，跟着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秦王殿下共同登上柏壁城观察敌军之势时，李道宗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李世民随口询问身侧的李道宗道“贼人恃众想邀我决战，来邀我战，汝谓如何”，李道宗给自己的堂兄做出的回答是：“刘武周乘胜，其兵锋势不可当，正好应当用计加以摧败。况且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如能坚守壁垒以挫折其锐气，待其粮尽力屈，可以不战而擒获其众。”对于李道宗的这个回答，秦王颇为惊奇，赞到“汝意暗与我合”。

当唐军诸将皆请求出击时，李世民尽皆不许，他对众将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

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他的这番分析几乎与李道宗的意见如出一辙。而后正如李道宗所说的那样，宋金刚所部在与唐军对峙一段时间后，因为粮草不济，只能连夜退却，而此时，李世民趁机指挥唐军迅速出击，追至介州，一战而胜，从而夺回河东要地，巩固了关中。这一年，李世民年仅二十三岁，而李道宗比这位后来的李世民还要小上三岁。

然而李道宗可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流，这位年轻的大唐宗室自李渊登基以来，已是屡历战火，他曾经先后在武德三年、四年多次随同秦王李世民进兵洛阳、虎牢关，击破郑帝王世充、夏王窦建德，并参与了征讨刘黑闼之战，可谓多次经历沙场，而且是战功赫赫。武德五年，在李道宗出镇灵州、任灵州总管之初，盘踞朔方的梁师都从夏州南下，派其弟梁洛仁率领几万突厥兵进攻灵州，结果李道宗统军据城固守，然后“待敌懈怠”之际“寻隙出击”，一举大败梁洛仁数万大军。

此后梁师都又勾结突厥人再次南下，军进占五原故地时，年轻气盛的李道宗没有选择固守灵州观望，而是主动率军讨伐，一战将对手赶出了五原，振耀威武，并为大唐向北开拓疆土千余里，而此时的李道宗，其年不过二十二岁。李渊听到露报时，称道不已，并对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言道：“道宗今能守边，以寡制众。昔魏任城王彰临戎却敌，道宗勇敢，有同于彼。” 遂封李道宗为任城郡王。

此后李道宗一直镇守灵州，而之所以将他一直被放在灵州，除了在军事武略方面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宗室内的问题，确切地说，还是太子与秦王的储君之争。自武德二年随秦王出征讨伐刘武周以来，李道宗在心里便只存在一个“神”，那就是仅比他年长三岁的秦王，和多数帝国的统兵将领一样，对秦王，李道宗充满了崇敬，因为这位大唐的秦王的身上不仅有着“天策上将军、尚书令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雍州牧”一系列的封号，还有着“累累战功”所编织起来的夺目光环，谁人不知道，天策上将军、秦王李世民一出，那就是天下震动，秦王就是胜利的象征。

正是因为对于“战无不胜”的秦王殿下的崇敬，李道宗便如同那位桀骜不驯的燕郡王李艺与太子李建成交好那番，心里只认一个秦王殿下，他甚至和淮安郡王李神通、楚王杜伏威三人曾一同焚香洒酒立誓追随秦王，以至于被人称作是“三王拱秦”，而当时李渊正为太子、秦王之争而苦恼不已，“三王拱秦”自然没有什么好结果了，于是楚王杜伏威吃了不是宗室的亏，被诛满门，而李道宗则是被皇帝留置在灵州，以让他远离京师长安。

突厥大军南下，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灵州，而李道宗也丝毫不敢大意，他立即派人将情况上奏朝廷，同时命令部下做好应战准备。对于此番颉利可汗率军南下，再次犯境，李渊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位皇帝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立即下令对突厥降格对待。帝国最初与突厥之间的所有外交往来，都是使用平等国家之间的“敌国礼”，而现在皇帝在盛怒之下发出了“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虏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吼声时，将对突厥的文书改为“敕诏”，这也就是意味着不再视突厥为平等国家，而当作是帝国的属国来看待。

不过这个政治举措显然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毕竟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谁具有力量，谁便是强者，故而对于颉利可汗亲自率军进攻灵州，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中央省部台司都丝毫不敢怠慢。除了要求灵州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率兵抵抗之外，李渊还迅速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部署。在考虑到关内道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很大，而武德七年的入侵所留下的阴影还在，李渊又以淮安郡王李神通、秉钺将军刘弘基率步骑一万，在豳州以北宁州境内的子午岭以及泾州境内的临泾一线实施布防。

也许发现帝国重点加强了关内道的防御，或许是因为在灵州未占到便宜，又或者是突厥在灵州方面的行动本就是虚晃一枪，总之突厥人并未立即在关内道的方向继续展开进攻，而是转而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了河东道的方向。武德八年七月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先是以大军进攻朔州，接着又在二十四日与代州都督蔺謩战于新城，此战的结果是蔺謩大败而回。

新城之战失利后，河东道的情况更加危急，于是李渊诏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率大军进入河东道，并布防在石岭一线防御突厥，同时以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前往大谷一线布防。次日，考虑到情况危急，李渊又遣秦王出长安，以天策上将身份屯兵于蒲州道，提调诸军。一时间，大唐帝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数路大军云集河东之地，大有和突厥决战于太原以北之架势。

其实在这之前，河东之地的唐军势力主要是归属于三个都督府的指挥，分别是代州都督府、并州都督府和潞州都督府。这三个都督府统辖指挥着众多的府兵、州兵，防卫着太原这一大唐龙兴之地为核心的河东道。但问题是，在右卫大将军张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分别赶来之前，河东道驻军已经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位于北部的代州都督府在突厥南下时，首当其冲，而位于河东道中部的并州都督府则

是防御太原的核心，并州都督府虽然是由齐王李元吉为都督，但实际主持军务的却是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突厥人击破了代州都督府之后，南下并州方向，也就使得并州还有至于河东道东南部的以黄君汉为都督的潞州都督府，成了抵御突厥大军的直面力量。

所谓“都督府”其实是初唐时期的一种行政编制，李渊建立大唐后，为了能够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还逐步确立起了适合于当时情况的军事制度。由于隋制从周，而唐初又沿袭隋制，故而李渊登基之后，在边要之地广置“总管”以统军，并加号使持节，总管除了需要指挥驻军之外，一般还兼任着治所州的刺史。武德七年，李渊下诏恢复旧制，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所以“都督”实际上是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所谓的代州都督府、并州都督府和潞州都督府，事实上也就是统领着代州、并州、潞州兵马，并主持当地事务的行政、军事机构。

当蔺謩率领的代州兵马在新城战败与突厥之后，事实上，此时唐军在代州地区的力量已经是比较空虚了，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是根本无力继续阻挡突厥大军的南下，而突厥人自代州向南，必然要进攻并州，唐军要保卫并州，肯定是不会轻视石岭关这个位于并州北部的军事要塞了，此时，石岭关的军事价值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虽然在六月十四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就奉命在石岭断道，但显然大唐帝国对于这个重要的关隘要塞的防御部署还是做得不够，直到代州都督蔺謩于新城战败之后，才匆忙以右卫大将军张瑾率军驻屯石岭关，以进一步加强在这个方向抵御突厥的兵力，

从地图上来看，李渊命令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进入太谷一线，是属于一个无奈之举，也是大唐帝国在以右卫大将军张瑾率军前往石岭关实施部署之后，所做的一项补救措施。太谷虽然是在河东道的并州境内，但确切的位置却是在并州的南部，这个的位置很重要，因为自太谷向东南而行，可至洛阳，而自太谷向西南，则可至京师长安。李渊以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守卫太谷，无非是想在并州以南地区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如果并州一旦有失，则李高迁的大军能够卡住太谷，阻击突厥大军往东南或者西南方向席卷，继而达到保卫洛阳和京师长安的目的。



唐金花银盘，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

至于李渊以李世民出屯蒲州，那用意更明显了。一来，秦王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显示出了帝国对这次突厥入侵的重视，二则因为蒲州位于河东道的西南部，是掩护长安东北方向的重要军事要地。李渊以秦王李世民防守蒲州，显然是加强兵力部署，以构筑抵御突厥的第三道防线，即在太谷有失的情况下，能够依托蒲州方向的防线，来保卫长安，同时在蒲州方向，还能够指挥河东方向的作战。

然而部署虽然看起来完美，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所率大军还没有赶到石岭时，突厥人的大军就已于八月初一攻破了石岭，并随即入寇并州。

石岭失守之后，唐军在并州境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毕竟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手下的兵马并不多，仅够用来固守城池，而根本没有和突厥大军实施野战的能力，于是在没有遭到太大抵抗的情况下，八月初六，突厥向南攻入潞州、沁州和韩州，潞州都督黄君汉不得不率军与突厥大军展开鏖兵。

在接到潞、沁、韩诸州遭到进攻的消息后，为了加强洛阳方向的防御，武德皇

帝又在八月初六日下诏，以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并以邢州都督任瑰为太行道行军总管，屯兵太行，以御突厥。这两个部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挽回局面，夺回因为石岭失守后而丢失的主动权。

以太行道行军总管的身份率军屯于太行一线的邢州都督任瑰，此番被李渊寄予了厚望，少年丧父的任瑰自幼为叔父任蛮奴收养，而任蛮奴本是南陈的镇东大将军，因为这层关系，故而任瑰也是少读兵书，且知兵，十九岁时，就担任了衡州司马一职，而且还受到了都督王勇的重用。后来王勇降隋，任瑰便是罢官回家。李渊于晋阳起兵时，任瑰便投入其幕下，从此平步青云，一度为招抚大使、左光禄大夫、谷州刺史。和多数军中宿将一样，任瑰对于秦王也很是信服，他曾随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王世充，此战中，任瑰见识到了这位大唐天策上将军的统兵水平和指挥能力。在平定辅公祏后，任瑰被皇帝拜为邢州都督，主持邢州一线的防务。此番李渊让其屯兵太行，主要是为了防止突厥大军自太行道东进，从而使得河北之地免遭战火。

而以安州大都督李靖统兵出潞州道，很明显是皇帝为了应对突厥对潞州一带的进攻。按照李渊的诏令，李靖率江淮兵一万自潞州向北，匆匆而行，但李靖大军却并在潞州以北地带没有构筑防线，而是继续马不停蹄地北上，赶赴太谷增援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之所以急着要增援屯兵于太谷方向的张瑾，是因为此时在该方向上，张瑾所率的唐军已经情况很危急了。

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所率大军之所以急需要增援，是因为此时在太谷这个方向上，战局已经恶化，而事情还得从八月初说起。当李渊在八月初六前后，接连下诏实施了一系列的部署调整的时候，突厥大军在大掠朔州、继而突破石岭之后，已经开始集中主力继续南下，并展开了对驻守太谷的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所部的进攻。

史料中关于太谷之战的记录并不详细，仅有《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八月，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又有《唐文拾遗》卷十四“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彦博）墓志”记载如下：“久之，出为行军长史。属胡骑蚁集，穹庐猬起，合围过于百重，在危侔于七日，类回溪之垂翅，若肴陵之丧师。”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所谓“胡骑蚁集，穹庐猬起”，也就是说驻守太谷的张瑾所部先是被突厥骑兵重重包围，继而双方激战数日，最终唐军全军覆灭。

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故而对于太谷之战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了，而关于此战中唐军的参战兵力，也同样是史书记载不详，但“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彦博）墓志”，却能够提供一点线索，从该碑文记载中的“属猃狁纵慝，疆埸受骇……乃以（阙三字）军长史，十万之师，方绝大汉，五饵之术，必系单于”来看，似乎有十万之师，但其实根据当时的兵力结构来看，再考虑到七月二十四日，张瑾赶赴石岭的同时，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也率军前往太谷，而张瑾除了右卫大将军的职务外，还兼羽林军将，此外结合“行军长史、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郓州都督张德政战死，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几乎是只身逃出重围，投奔李靖”这一战局结果来看，张瑾麾下至少还有郓州都督张德政所部，故而大概可以估算唐军参战兵力至少有数万之多。

不过虽然突厥在太谷方向对唐军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让唐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但突厥人的攻势也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在歼灭张瑾所部的同时，潞州方向增援而来的永康县公安州大都督李靖所部、曹国公节度齐州总管李勣所部也陆续进入战场，至于李靖、李勣两部在太谷方向的作战是在张瑾所部覆灭前赶到的，还是战后进入太谷的，由于史料记载不详，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河东道的防御体系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时，唐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终于遏制了突厥的攻势，史载“（唐军）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此后，大批的唐军源源不断涌来，增援到太谷方向，而面对唐军的陆续集中，见已无隙可乘，于是颉利不得不放弃选择这次南下进攻，转而请和。

请和，这是突厥人的常用手段，而唐军虽然在太谷方向阻滞了突厥大军的前进，但也无力将之歼灭，于是李渊只能同意颉利的请和。不过在颉利请和撤退以后，武德八年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唐与突厥在这一年内还发生过多次战事，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当年九月初二，突厥没贺咄设攻陷并州一县，但在初五日，被代州都督蔺謩率军击破。同时突厥再寇灵州，结果被灵州都督任城郡王李道宗所击破。

让人不安的武德八年，是在皇帝的愤怒、大唐丧师数万于太谷的惨败中过去了。转眼一年便是又过去了，面对北方的突厥，大唐帝国依然无法采取攻势，只能采取相对较为被动的防御部署。武德九年刚刚开年，突厥大举南下的消息就在长安城内传开了。最初的时候，这个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还只是在省部台司间传动，但随着朝廷不断发出兵马调动符令，而灵州西南几个州郡南下躲避战火荼毒的流民又

涌入京师长安城，一时间流言纷纷。数个月之前，丧师数万于太谷的那一幕，依然让人记忆深刻，此时京师之内自然是人心不稳了。

由于突厥声言入寇，于是帝国中枢在正月二十二日正式命令各州县修城堡的同时，也开始做积极备战准备。果然，在二月二十八日，突厥大军南下进攻了原州。原州属关内道，是突厥入侵关内道频繁经过的地方。面对突厥入侵，李渊下令遣折威将军杨毛率宁州道折威军出兵迎战，同时加强兵力向太谷集中兵力，并遣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作为统帅，准备应对突厥人的大举进攻。

此番面对突厥人的再次南下，李渊显然是吸取了去年的惨痛教训，虽然突厥首先进攻的方向是关内道的原州，而现在的河东道方向并没有敌情，但李渊却下诏提前先在河东道集结并部署兵力，于是除了河东道当地的各都督府所属驻军进入戒备外，还向太谷集中兵力，以防止武德八年的被动局面再次上演，具体主持并州方向军事防御的是接替张瑾出任并州道行军总管的李勣。

与此同时李渊还以军功卓著的李世民提调河东兵马，而关内道方向则由太子李建成所负责。当然了，这只是纸面上的计划，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该计划的最后结果却是“后竟不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突厥此后并没有在河东道、关内道采取大规模行动，倒是北方的梁师都却蠢蠢欲动，他攻占了静难镇，随后又进攻了灵州方向。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奉命出使突厥的南海公欧阳胤本是去和颉利可汗和谈的，可这位仁兄却打算率领自己的五十名随从铤而走险，密谋趁夜黑风高，突袭颉利牙帐，斩杀颉利，可结果突厥人防备森严，欧阳胤率队还未抵达牙帐，就被执失思力擒获。颉利大怒，命人囚了欧阳胤，随后以大军进攻凉州，不过却被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所败。到了在四月初九，突厥又以部分兵力入侵了朔州，结果被朔州行军总管王孝德、朔州刺史姜世师率军给击退了。

进入四月中旬后，突厥人再次南下，虽然只是莫贺咄设的一路偏师，但却是攻势凌厉，这股突厥人先是在四月十二日进攻了原州，随后又于十五日攻击了泾州。对于突厥对原州、泾州发起的进攻，长安城内可谓是一时震动，因为原州、泾州的位置太过于重要了。



西方人笔下的唐代军队

在武德年间，自长安通往灵州方向，总共有两驿道，史载“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故而从突厥人先是进攻原州，继而进攻泾州的行动来看，这次突厥大军进攻的路线其实沿着灵州、原州、泾州这条线向西安展开向心突击。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灵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原州在京师西北八百里，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而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可以看出，莫贺咄设的人马不仅已经深入到了距离长安不足五百里的泾州，而且其行动速度也很快，十二日还在距离京师八百里之外的原州，但三天之后的十五日，却已经到了泾州，如此计算下去，再有一两日，这股突厥人便是可以长驱直入到长安城下了。

李渊在震怒之余，迅速做出了部署，下诏以安州大都督永康县公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立即对当面的突厥人展开拦截。不过当李渊征召李靖为行军总管率军迎敌的时候，突厥可汗颉利在得知莫贺咄设一支偏师居然已经是孤军深入原州和泾州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亲自率其主力南下，四月二十日，双方在灵州境内爆发

大战。

灵州一战，唐军统帅为一代名将、时为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的永康县公李靖。因用兵神妙，撰有多部兵法著作的李靖，字药师，所以人也称其为“李药师”，他本是雍州三原人，出自陇西李氏定著四房之一的丹阳房，是东晋东莞太守李雍长子李伦的后代。李靖的祖父李崇义在北魏时期担任过殷州刺史，北周时又被封为永康县公，而他的父李诠，在前隋时，曾为赵郡太守、封临汾襄公。至于他的舅父那就更了不起了，乃是前隋文帝时的一代名将，官至上柱国大将军、封寿光县公、食邑一千户，名间传闻死后为十殿阎王之“阎罗”的韩擒虎。

赫赫家世自然让李靖自幼便是耳濡目染官场之事，而舅父的威名又使得他对统兵之事充满了兴趣，因为常常与舅父谈讨兵家之事，并获指点，故而李靖也是受益匪浅，韩擒虎也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外甥，他曾经感慨“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只有李靖一人了”。但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李靖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炀帝年间，李靖先任长安功曹，三十岁，擢升兵部驾部员外郎，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为是“王佐之才”，甚至就连司徒尚书令楚国公杨素也对他很是赏识，甚至有了“红拂夜奔”的野史逸闻。

据说杨素身边有一侍妓，因常执红拂立于杨素身旁，故而得名“红拂”，此女生得是“肌肤仪状、言词气佳，真天人也”。红拂很有见识，识得英雄，而根据《旧唐书》所载，李靖年轻时是“姿貌瑰伟”，对这个翩翩美少年，红拂一眼便是相中，于是她竟趁着李靖再次拜访杨素之机，相约私奔了。得知此事后，杨素非但不追究此事，反而推荐李靖出任马邑的郡丞，从而成全造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

一个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一个是后来的大唐肱骨，于是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成为了千古佳话。其实历史真相是这样的：文帝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文帝以代州总管甘棠县公韩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出征，然而大军在恒安却是遭遇突厥主力，此战隋军大败，将士死伤大半，突围回来的韩洪与李药王被免官，除爵为民，而刘隆坐罪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的李靖因为李药王是他的哥哥，自然受到牵连，被降为汲县（下县）县令。隋炀帝继位后，三十五岁的李靖才因政绩升安阳（中县）县令，大业六年已经是四十岁的李靖因功迁三原（上县）县令，而杨素早在大业二年就死了。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以卫尉少卿李渊为河东抚慰大使，当年八月，隋炀帝巡幸北塞，被突厥围困于雁门，诏天下郡守县令勤王。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年仅十六

岁的李世民在马邑知遇，这一年，李靖四十五岁。由于雁门解围有功，故而李靖被升迁为马邑郡丞、鹰扬郎将，也算是他初步实现将兵愿望。不过就在李靖在边塞练兵以备突厥的时候，天下大乱，而在与李渊、马邑太守王仁恭、郡丞李靖抗击突厥的时候，李靖察觉到了一丝不祥。

时为唐国公太原留守的李渊此时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在察觉到了李渊有“四方之志”后，李靖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伪装成囚徒，秘密潜逃，准备前往江都，去向隋炀帝密告。可当他才走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就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故而他的南下告密之行也就未能成行。不久之后，李渊于太原起兵，随后大军迅速攻占了长安，李靖真的成了阶下之囚。

按照李渊的心思，李靖自是留不得的，可在临斩前，这位后世名将不甘如此而死，故而大呼：“您兴起义兵，本是为了天下，除去暴乱，怎么不欲完成大事，而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此话倒是说得有些道理，加之秦王李世民从中斡旋，李渊便赦免了他。

人生的轨迹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对于李靖来说，都并不算顺利，但从他被派往赵郡王李孝恭麾下任长史时，他的名将之路却悄然开始了。当时割据江南的萧铣试图派舟师溯江而上，以攻取峡州、巴、蜀等地，但却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于是后梁大军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能够削平后梁，李渊调李靖赴夔州至信州经略萧铣。仅率数骑赴任的李靖在途经金州时，刚好遇上了庐江郡王李瑗进讨蛮人邓世洛，当时这股蛮兵虽不过只有数万人，但却因为屯居山谷间，故而唐军接连败北，于是李靖主动为庐江郡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且俘虏甚多，这是李靖第一次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

在抵达峡州之后，李靖再一次遇上了危机，因为他却发现当面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后梁军控制着险塞，故而唐军进攻道路受阻，因此迟迟不能前进，但李渊却误以为李靖是滞留不前，贻误军机，于是秘密诏令峡州刺史许绍将李靖处死。不过由于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干，悄然压下了密令，李靖才免于一死。

正当李靖苦恼于该如何突破后梁军控制的险隘时，开州蛮夷冉肇则叛唐起兵，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初战失利，此时李靖却是趁叛军骄横之时，独率八百精骑冲其营垒，并大破之，后又于险隘处布设伏兵，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多人。此战之时，李靖已是五十之龄了，此战让他一战成名。捷报传到京师时，李渊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

靖，并称“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并亲笔写敕于李靖“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正月，李靖献上平灭萧铣的十策，被采纳，当年二月，李渊在以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的同时，授李靖夔州行军总管，兼任行军长史。李渊很清楚李孝恭的能力，于是以其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为由，明敕“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正是正在李靖辅佐下，唐军开始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训练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

此后，李靖又建议李孝恭将巴蜀子弟召入幕府为官，这是因为李靖发现巴、蜀之地归附不久，情势还不太稳定，而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只要将当地权贵豪族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便能够稳固巴、蜀。

当年九月，李渊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直扑江陵。

时则雨季，江水暴涨，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加之路险难行，唐军必然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而多数唐将是纷纷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但李靖却是力排众议，他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随后亲率舟师，趁江水暴涨之际沿三峡顺水东进，以实击虚，连破荆门、宜都，月余即进抵夷陵城下。

驻守在夷陵附近的是后梁骁将文士弘所率的数万精兵，李孝恭试图迅速进击，以夺取夷陵，但李靖却并不同意，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这个意思是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然而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轻敌大意，并没有听从李靖的劝告，自己亲自率兵出战进击，结果是“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极大”。、



李靖

然而就在此时，李靖见文士弘获胜以后正纵兵四出抢掠，于是趁后梁军忙于劫掠之际率军从侧进击，文士弘一时难以收拢所部，于是大败，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唐军获舟舰四百余艘，夷陵也被攻占。在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直袭江陵，先克外城，复收水城。然而在缴获千余舟舰后，他却命将士弃之江流，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解释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

果然如他所料，舟舰顺流漂下，来援江陵的梁军见之，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

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人在赴江陵的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而割据东南、自称“梁王”的萧铣的坐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得自缚请降。

大军进入江陵之后，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赵郡王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但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他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借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由于李靖的这一做法颇得人心，于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

虽是辅佐赵郡王李孝恭，但伐梁两月，便是功成灭梁，此功让李渊颇为惊喜，于是诏封李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两千五百段，并擢其为检校荆州刺史，后又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渊特敕许承制拜受，以安抚岭南诸州。在招抚了岭南九十六州，将长江中游及岭南地区尽为唐之所有后，李靖又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江南之地尽皆归属大唐。

因李靖功高，李渊专设东南道行尚书台，授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并极口赞叹：“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白卫霍何以加？”又在宴赏群臣时感叹：“大河上下，二郎征讨，江南半壁，药师涤荡；得将如此，朕复何憾？”事实也确如李渊所言，长江以北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平定，主要得益于秦王李世民的征讨，而大唐帝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江南大地则是依靠这个差点被皇帝砍掉脑袋的李药师在几年内的东征南伐。

自武德八年，大唐帝国开始对突厥备战，李渊特命让坐镇江南的李靖调到北方，以对突厥作战，此前太谷之战，李靖便是已有与突厥人交手的经验，而此番，以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的身份出阵迎敌，李靖更是早有准备，面对突厥大军，他已经选好了理想的战场，而这个战场就是灵州的硖石。

硖石位于灵州治所以南，此处两山相夹，黄河经其中，地势比较险要，李靖选中这里为战场，很显然是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地形的优势，在灵州地域，缺乏骑兵的唐军想要在野外击败突厥人，实在太难了。关于灵州之战，记载并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双方激战彻日，“自旦至申”，突厥人在遭到了顽强抵抗之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退却。

虽然此番颉利可汗在关内道，从灵州方向展开的大举进攻，在李靖的反击下，被暂时地遏制住了，但很显然他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突厥人在这一年的入侵中尝

到了甜头，特别是莫贺咄设这支偏师居然能够孤军深入原州和泾州一线，更是让颉利对南下长安充满了渴望，开始寻找其他的入侵途径，他们先后对西会州、秦州、兰州、陇州一线连续发起了多次进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武德九年的五月，朝内和边塞却是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玄武门之变”。这两件事，便是 “太白经天”和“突厥入塞围乌城”。

史载：“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丁巳，经天；己未，又经天。在秦分。”所谓“太白”就是金星，按照天文学的解释，金星的运行轨道是位于地球运行轨道的内侧，也因此通常会在清晨太阳未完全升起前，或者傍晚太阳未完全落下时，才能够观测到金星，这主要是因为太阳自身的光芒遮盖了金星反射的太阳光，故而在白天，肉眼无法看到金星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古人才将在白天看到金星的天文景象称之为“太白昼见”，如果白天在午位（正南方）看到金星，则称之为“太白经天”。而一旦出现“太白经天”的现象，通常是被认为不正常的，甚至是改朝换代、权力更迭的征兆。

史料中所载 “太白昼见，天子有丧，天下更王，大乱，是谓经天，有亡国，百姓皆流亡”，又有“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等说法，故而武德九年三次出现太白经天这一天文现象时候，皇帝李渊自然会异常震惊了。

偏偏此时太史令傅奕又向皇帝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即太白出现在秦地的分野，预示着秦王将获得天下。太史令的这份奏折让李渊当即勃然大怒，《资治通鉴》记载“上以其状授世民”，而为什么李渊让人将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送给李世民，至今是个谜团，李渊的用意是什么？至今都让人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李世民即位后，曾对傅奕说“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由此可见，“太白经天”及傅奕密奏“秦王当有天下”这两件事的确很严重。

且不说李渊让人将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给李世民看的用意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经历了“太白经天”和傅奕密奏这两件事以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已是不再信任李世民了，这件事从“突厥入塞围乌城”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史载“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这就是所谓

的"突厥入塞围乌城"一事。根据《大唐故右屯卫翊府右郎将阿史那勿施墓志》中"父阿史那侦末，单于郁射设，处罗可汗嫡子"的记载，郁射设是突厥处罗可汗的嫡子，郁射设原本有可能继承突厥汗位，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因为"义成公主以其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也就说，处罗可汗的嫡子郁射设亲率数万骑南下，包围了乌城。

关于乌城所在，现在已是不得而知，史载"乌城，盖在盐州五原县乌盐池；或曰，在朔方乌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也就是说是夏州的朔方乌水、盐州五原、凉州（武威郡）的乌城，都有可能是这个"乌城"。

但不管乌城究竟在哪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郁射设这次围乌城，其实威胁并不大，任城郡王李道宗、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李靖，还有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足以应付，但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却推荐齐王李元吉代替秦王李世民去都督各路军马北征以抵抗突厥入侵，而李渊也应允了这一奏请。于是以齐王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援救乌城，而齐王元吉又趁机奏请以秦王天策府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琼等随行，李渊亦无不可。

武德九年五月二十六，尚书省连续发布了两道明敕，明确宣示废山东道行台，设河东道大行台领洛阳以东北至长城南至扬州广大地域内的军政全权，罢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所兼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和陇西道行台尚书令二职，由齐王接任，召原灵州都督任城郡王李道宗回京述职。这道敕旨由中书省草拟，经门下省审核副署，加盖皇帝玉玺后由尚书省发往朝廷六部九卿十二卫御史台大理寺，抄件快马呈送天下四十一郡。这一番也就等于是原本掌军令任征伐的秦王此番不仅未得挂帅，还被削去了陕东陇西两地实权，而齐王李元吉却被委以重任。

数日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初一，李渊在太极殿亲自主持中朝，宣布正式拜四皇子齐王李元吉为扫北行军元帅，当场授以金印、节、符、绶及天子剑，允其节制长安以北的诸州郡驻军及天纪、天节两军，同时宣布调尉迟恭、段志玄、程知节、秦叔宝、刘师立、庞卿恽、公孙武达、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十将于元帅府听调，另敕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长孙顺德率三府禁军出武功卫戍京兆。



唐彩绘侍女俑

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抽空了李世民的秦王府中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太子对齐王说“汝已得秦王骁将，拥数万精兵，来日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汝使壮士拉杀之，天下事可定”这段话来。然而隔墙有耳，这段话被太子率更丞王晊听到了，偏偏这个王晊是李世民在太子东宫中所布下的眼线，听到太子与齐王之间这番对话后，王晊立即驰告秦王。李世民当即与秦王府长史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等近臣商议此事，于是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不能让太子、齐王趁着出兵抗击突厥的机会，瓦解秦王府的力量，更不能让昆明池成为秦王人头落地的地方。

虽然李世民说什么“骨肉相残，古今之大恶。我诚知大祸只在朝夕之间，但我打

算在祸事发生以后，再举义讨伐他们，这不也是可以的吗”，但其实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位后来的太宗皇帝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充满渴望的，否则也就不会有了武德年间的“太子、秦王之争”了。

何况“功高不赏，唯有赏死”也是不少功臣的最终下场，以秦王的性情，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之人，不过既然“李二郎”说出了“骨肉相残，古今之大恶”这样道貌岸然的话语来，这个时候，秦王府幕僚们的意见和态度也就变得极为重要的，时为秦王府左二副护军的尉迟恭对李世民及众人说：“大王是久历兵事的人，当知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情谁不爱其死！而今众人以死奉大王，乃天授大位于大王。而今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而大王犹自犹豫不以为忧，大王纵然不以己身为重，又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只能辞去，归隐山林再为草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还望大王善纳众人之言！”

在尉迟恭这个粗人开口之后，作为李二郎大舅子的长孙无忌也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大王若不从敬德之言，这一场征战不用算也知其败！东宫待大王如寇仇，大王待东宫以手足。如此态势不均，而大王之心又不能定，明知必败之战，敬德等众将岂肯为之？再由于彷徨下去，众将必不复为王所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显然，这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生就是比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将说话有水平，长孙的这番话自然要比尉迟恭的话语更让李世民颇为受用。不过受用归受用，但在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是要做出一种姿态来，于是他说：“你们应当知晓，此番我们所面对之敌，不仅有太子和齐王。只要我们在长安城内动起刀兵，便是父皇之敌，朝廷之敌，社稷宗庙之敌。于天下人眼中，父皇是君，我是臣；父皇是父，我是子，太子是兄我是弟。若不能取得陛下的支持，我们在长安城内所冒风险就是万世之险，故而我才提议待太子不道，我们再起而讨之，这样不仅无亏臣道，也无亏孝道。故而本王所言，未可全弃，其他的诸公再计议一下吧。”

秦王的这番话至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起兵造反乃为不忠，而与父凶为敌，又是不孝，不忠不孝之徒是儒家主导的社会所难以容忍的。然而尉迟恭这个粗人却是以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对二殿下的话语给与了全盘否定，他说：“大王在战场上何等智勇，如今临大事怎么这等糊涂？大王今处事有疑，是为不智；临难不决，是为不勇。况且大王麾下三府军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都已经进入宫中，人人擐甲执兵，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此事关乎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已经

不是大王一人之事了！”

这话说得一众人等是血脉贲张，于是众人纷纷劝说秦王应该当机立断，见李世民还在犹豫，左虞侯天策府骠骑将军侯君集直截了当地问道：“大王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李世民答道：“是圣人。”于是侯君集说：“这就是了，使舜浚落井不出，则不过井中之泥罢了；涂廪不下，则不过廪上之灰罢了，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只有留得有用之身，方可全忠义，尽孝道，施友爱。大王今日被逼无奈先发制人，正是为了日后能于社稷尽忠，于陛下尽孝，于天下子民广施仁爱！”

一旁的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马上接口道：“侯君集此言不确，何须待得日后？大王今日之行，本身就是于社稷尽忠，于陛下尽孝，施天下子民以仁爱！”听取众人意见的李世民这一次没有再犹豫，于是他命人算卦以卜吉凶，可此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见到这一幕，张公谨便将占卜的龟壳夺过来扔在地上，大声喊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了吗？”于是便订下了行动计划。

随后，李世民连夜入宫密奏李渊，告发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亏负，今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辈报仇，臣虽死，实耻见诸贼！”对于秦王的这番密告，李渊颇为愕然，他在震惊之余，说出了“明日朕当鞫问，汝可早至”。说这番话语的时候，显然李渊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儿子会起兵叛乱。

而此时，太子李建成虽然因为与之交好的张婕妤从宫中给他捎来的口信，而已经得到了秦王入宫密报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多想，只是连夜召齐王李元吉商议此事，齐王认为“应该布置东宫宿卫、长林军和齐王府军，继而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太子李建成在犹豫了一番之后，认为“布置就绪，明日应当入朝参见，打听消息”。而太子之所以如此淡然，是因为他认为大局已定，根本没有想到秦王会在长安起兵。

的确，在长安城中造反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自武李渊登基，大唐建政长安以来，当今皇帝陛下便是一改前隋宫城宿卫重南轻北的布置，而是建禁军屯卫于玄武门内，由三万太原元从禁军负责宿卫内宫，这三万元从禁军后虽屡经裁抑，也仍有一万八千之数，而且这支宿卫宫城的禁军在编制上并不属南衙十二卫统辖，尚书省也无权节制。也就是说，秦王虽然是天策上将军、领十二卫大将军，但却根本无权

调动这屯于北门的左右二营的皇帝私兵。

再从地形上来看，玄武门为禁宫北门，紧倚着太极宫的后宫和东宫，加之又是负责内宫宿卫职责的禁军屯署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冲要。虽然禁军统领虽职不过五品，却直接听命于皇帝，而又由于禁军屯署设在北门内，久而久之，形成了与南衙相对的“北衙”之称，一旦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打开了内宫的门户，同时也等于是控制了禁军，若是控制不了玄武门，即便有数万军马也只能是望宫门兴叹。

武德九年时，在玄武门禁军屯署之下，编制有左、右二屯营，其中左屯营统领为黔昌侯云麾将军敬君弘，而右屯营统领为中郎将吕世衡，只不过此二人与身任左右监门卫左翊中郎将和玄武门禁军屯署左右屯营将军二职的常何，却早已经是秦王李世民的人，这一点无论是皇帝李渊，还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都不知道。此外，尚书右丞雍州司马左金吾卫大将军领监察御史任国公刘弘基也早和秦王李世民关系暧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弘基的态度很重要，这一点从他的职务可以看出，尚书右丞是省官，在尚书省内位列第五，仅在令、左右仆射和尚书左丞之后，居于六部尚书之上；其次他还是雍州司马，而雍州又为京兆，雍州牧自李渊建元武德以来，便由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先后兼领，但二人都并非实任，于是一州钱粮刑狱等庶务均由别驾代理，防务则是委诸司马，因而雍州司马一职虽是外官，但却是京兆实质上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三左金吾卫大将军，虽然是隶属十二卫府，且在各卫府中位列第七，然则若论职权，却是极大，因为左右金吾卫府司掌宫中、京城巡警及烽候、道路、水草之宜，而凡是京城内的翊府、外府、夷兵番迎，都是隶属于其管辖统领之下，以至于长安城内除了太极宫内皇城是由玄武门禁军屯署负责之外，外宫城宿卫、南衙宿卫、兴庆宫宿卫、宏义宫宿卫，还有其他各亲郡王府、各公爵府、三司、六部、九寺、京师各衙署及长安十二门城防均在其掌控之中；至于监察御史，虽然是台官，品秩不高，但地位却颇为超然，因为其职在巡视纠察京城百官错失，总朝廷风宪，官位虽列在从八品下，然而其职责行止，虽是政事堂宰辅王公贵戚也不得过问，这样一番来看，刘弘基才是长安城内握有军政实权的关键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此时却是选择了秦王李世民的阵营，而不是皇帝李渊或者太子李建成，颇耐人寻味。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凌晨，在做了一番谋划之后，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等十二将及两百亲兵自宏义门出了宏义宫，并在玄武门禁军

屯署左右屯营将常何亲自率领的北门禁军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了玄武门，并埋下了伏兵。

3．贞观破局

关于玄武门之变，史料中的记载不甚详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肯定不是如同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政变发生时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划船，秦王让尉迟恭入宫担任警卫。而当尉迟恭径直来到李渊所在的船上时，李渊大惊，问道：“今日作乱的人是谁？爱卿到此做什么？”

尉迟恭回答道：“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作乱，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殿下担心惊动陛下，故派臣担任警卫。”大惊失色的李渊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面对皇帝的询问，诸众臣们纷纷表示说：“建成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兵反抗前隋的谋略，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奸邪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大事委托于他，就不会再生事端了。”

于是李渊说：“好！这正是我素来的心愿啊。”遂决定封秦王为储君。此时宿卫禁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依然在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故而尉迟恭请求李渊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李渊接受了建议，并让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这才让双方停止了战斗。而后李渊又让裴寂前往东宫开导太子李建成麾下的诸将士，东宫人马便都弃职而散。在安定了大局之后李渊又召世民前来，并当众抚慰他，而秦王则跪伏在李渊的胸前，号啕大哭良久，此后父子重归于好。

那么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为什么李渊一大早就去划船，而裴寂、萧瑀、陈叔达等相公又都在船上？其实自古以来，皇权都是遭到一定的人为限制的，当时为了能够约束君王的言行，宫中有一种职官专门随侍君王左右，以记录其每天的言论和活动，这些职官在先秦时期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而汉唐以降，则为起居郎，也有叫起居令、起居舍人的，他们每天记录下的内容汇总在一起，则为《起居注》。

《起居注》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除了君王在宫中的私生活之外，其他的种种言行，如朝廷诏令赦宥、礼乐法度、赏罚除授、群臣进对、祭祀宴享、临幸引见、四时气候、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等事项，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不过，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一切仅作为而后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其内容既不能外传，君

王本人也不得过问。

也许玄武门之变，作为一件大事，是肯定要被记录到《起居注》的，而李世民自然也就担心这一点，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九年十月十六日，李世民就急于想看到国史，他提出的理由是：前代的国史藏在史官那里，君主看不到，今天我想看看，为的是能更好地知道我的得失。对此谏议大夫朱子奢说："陛下圣德，从来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自然尽善尽美。陛下想看《起居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若陛下开了这个头，以此传示子孙，我担心数代之后的君主心胸不如陛下，他们一定会隐恶扬善，而忠实记录的史官难免不受到刑诛。这样，史官为了避祸，只好为之文过饰非。那么，千载以下就没有实录了，这就是前代为什么规定君王不能看的原因了。"

这位昔日的秦王殿下也很清楚即便是皇帝，也不能私自翻看《起居注》的，更不能明火执仗地去篡改《起居注》，可是他又对此很不甘心。后来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知起居注，李世民又提出想看《起居注》，然而褚遂良却回答说："君主的言行，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从未听说有哪位君主看过。"很是不甘的李世民问道："朕有过，你也记吗？"对此褚遂良说："我的责任如此，陛下的言行都要记。"而侍立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则干脆插话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要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更是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他一定要一览究竟。贞观十七年，由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撰写的高祖、李世民实录完成，按制，房玄龄等人随即将完稿呈给皇帝过目，然而此时却引来了李世民的不满，据记载，太宗在看到玄武门之变时，发现"语多微隐"，于是下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什么是"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呢？《旧唐书·许敬宗传》也许说得更清楚一些："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由此可见史书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记载，其实是在当年的那位秦王殿下的一手指导下，由房玄龄和许敬宗润色文笔之后所撰写而成的，其可信度自然是可想而知。不过通过正史记载、野史补遗，及逻辑分析，我们还是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场景的：

六月三日，秦王世民夜闯禁宫，密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并称次日太子、齐王将在昆明池谋害自己。李渊遂决定次日召太子、齐王、司空魏国公裴寂、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中书令密国公封伦、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左

卫大将军杨恭仁，门下省侍中江国公陈叔达、检校侍中郢国公宇文士及等一众人至两仪殿，以审断此事。

然而深夜，秦王却秘密带人入宫，发动政变，一方面，以亲信段志玄、周孝范、庞卿恽、张士贵等人接管南衙十卫和内廷三省，在解除了宿卫三省的卫军武备、切断了内廷政事堂和外界的联系的同时，还控制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将诸相一并“留住”，另一方面则是迅速控制了宫中宿卫，并将李渊转移到海池中的龙舟之上，可以说，此时，秦王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到了清晨时分，一无所知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二人骑马入朝，经玄武门进入内宫，从这一刻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直到来到临湖殿时，太子、齐王才感觉不妙，发现形势有异的李建成、李元吉随即调转马头，试图奔回东宫，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身戎装的秦王出现了。史载是李世民在后大声呼止，然而李元吉张弓回射李世民，但仓皇之间，却是怎么也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却是迅速搭箭拉弓，一箭便是将李建成射杀。此时恰好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李世民催马追赶齐王李元吉，却因为马失前蹄而跌下了马来，又因衣袍被树枝挂住，怎么也爬不起来。正在此时，李元吉赶到，夺下李世民的弓，试图想要用弓弦扼死李世民，幸亏敬德及时赶来，慌乱之间，李元吉只得逃奔向武德殿，却被紧追而上的敬德诛杀。

与此同时，在玄武门外，一场混战正展开。在得知情况有异之后，左长林将军冯翊、右长林将军冯立、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等才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二千奔至玄武门外，然而秦王天策府的张公谨力大，竟自门内闭关以拒之，使东宫率兵、齐府护兵不得入。于是东宫率兵、东宫长林军、齐府护兵、宫廷北门禁兵、城防巡兵、天策亲兵、秦府护兵纷纷展开混战，而其中云麾将军敬君弘因为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故而和试图冲入玄武门的太子、齐王亲信打得最为惨烈。

虽然有人劝说敬君弘：“如今局势诡异内情不明，且禁军士卒多还在驻地，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汇集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为时不晚。”可他却是不听，而与中郎将吕世衡死守玄武门，结果双双战死。若不是尉迟恭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前来，使得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顿失战心，恐怕情况还将糟糕。

根据时在赵郡王李孝恭府参与机密的岑文本在《武德贞观杂记》中的记述：“初四日，隐太子谋发，宫府兵逆玄武门，不克，遂复扰西宫。街市翻覆，黎庶不宁，

而京兆守不知踪，举城纷乱世界，至淮安王携敕寻至，乃止。”也就是当时京师长安中是打翻了天，而偏偏又找不到雍州别驾左金吾卫大将军刘弘基了，最终是淮安郡王李神通携敕前来，才平复了京中的战事。

李神通手中的敕从何而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李渊妥协了……可以说，自此时，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内发动的宫变完全成功了，李渊被软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诛杀，太子的五个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成明、巨鹿王李承义，齐王的五个儿子梁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十名皇室成员均被诛戮。而太子、齐王一党也是土崩瓦解，太子洗马魏徵被囚禁，右骁骑大将军东宫左右卫率将军薛万彻、左长林将军冯诩、右长林将军冯立以及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等尽皆逃匿，大唐京师长安，已然完全落入秦王李世民掌控之中。

两天之后的六月六日，李渊下敕罪己，称“朕识人不明，致使上天示警，太白贯日，酿成宫门惨变，使朕几有投抒之感”！随后皇帝又颁敕，宣布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晋位东宫，并明敕文武王公：“自今日始，凡军国庶事无大小盖决于太子，朕不复闻！”

武德九年六月十日，秦王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受百官朝贺，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次日，诏定太子宫属，以原门下省侍中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为太子左庶子，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中允，高士廉为太子右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兼太子舍人，张公谨为太子家令，侯君集为太子左右卫率府将军，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而论及政变的功劳，又以长孙无忌和尉迟恭为第一，故而分别赐绢一万匹，此后又以“爱卿对于国家来说有安定社稷的功劳”为由，把齐王国司的金银布帛器物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恭。

武德九年六月十八日，尚书省发布上敕，废天策上将府建制，原天策府从署除弘文馆外，尽行裁撤。次日，再发上敕，改封原赵郡王李孝恭为河间郡王，改封原任城郡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而在此期间，尚书省还连发数道省文，行文山东道行台尚书令并州都督李世勣，要求他立即将原东宫太子中允王珪“执归长安待罪”，与此同时京兆周围的村县山野间，则是不时可以看到军士们在搜寻东宫及齐府旧人。

其实在政变的当天，按照秦王府诸将领的意思，太子、齐王的一百多名亲信应该全部诛杀，并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但尉迟恭再三争辩说：“罪孽都是两个元凶

所犯，而他们已经伏诛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李世民诸将领停止了对那些“余党”的追杀。而李渊颁布的诏书中，也明文大赦天下，而将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追究。故而在政变后的第一天，右长林将军冯立、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都自动出来负罪，而右骁骑大将军东宫左右卫率将军薛万彻也主动“投案自首”，对这些东宫、齐王旧人，已为大唐储君的李世民只是感慨地说“这些人都能够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人，是义士啊”，继而赦免了他们。

而原东宫太子舍人魏徵更是因祸得福，这位早年在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后又追随李密、窦建德，武德四年方才为建成拜为太子洗马的东宫旧臣曾经不止一次的劝说李建成当先下手除掉李世民，然而终未成事。玄武门事变后，太子被杀，而他也成了阶下之囚，不过这个自称“习得帝皇之术”的儒生，在李世民责备他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间关系时，他却是从容答道：“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对其耿直的气度非常赞赏，乃抛弃前嫌，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不过对于魏徵、冯立、薛万彻等人的赦免并不等于玄武门之变后，就没有人被株连。武德九年六月十七日，庐江郡王幽州大都督李瑗反迹败露，被自己的妹夫右领军将军彭国公王君廓诛杀。此事在六月二十一日便传到京师，随后在被尚书省登于抄报之后，立时朝野震动。

其实这事情的背后与长安的宫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年初，李渊以李瑗任幽州都督，但李渊也知道这位庐江郡王怯懦无能，没有将帅之才，便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佐他。王君廓此人多诡，他自幼孤贫，以贩马为生，因品行不端，经常偷盗，故而乡里都引以为患。前隋末年，天下大乱，于是王君廓聚众为贼，四处劫掠，至李渊起兵之前，王君廓已是占据井陉的一方大盗了。武德元年，归唐之后，王君廓被封为上柱国、河内太守、常山郡公，后改任辽州刺史、上谷郡公。秦王东征王世充时候，王君廓奉命攻打洛口，断绝洛阳粮道，而后又率部攻克辕。武德四年，夏王窦建德出兵援救王世充，与秦王战于虎牢关，王君廓亲率一千轻骑，截取夏军粮草，并俘获夏军大将张青特，因功而被封为右武卫将军，晋爵彭国公。

武德八年，镇守幽州的王君廓曾大破突厥，一战俘斩二千人，获马五千匹。李渊大喜，乃召王君廓入朝，赐其御马，并让他在殿上骑马而出，又赐锦袍金带。皇帝在以庐江王李瑗出任幽州大都督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位堂侄不是将帅之才，于是便命王君廓辅佐他。而由于王君廓骁勇强悍，故而李瑗也非常倚赖他，对

他推心置腹，并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联成亲属，每有所谋，辄为商议。

当初太子李建成图谋铲除秦王李世民，暗中与李瑗相互交结，李世民派人抄捡东宫时，查得庐江王李瑗与建成密通的书牍若干封，其中多数涉及与李世民的储位之争。李世民入主东宫总揽朝政后，立时令中书省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赴幽州召李瑗入京对簿，敦礼至幽州，见李瑗时， 只说是促令入朝，并未明言对簿事。李瑗已自觉心虚，亟召将军王君廓入商。

继而谁知那王君廓在军中从李世民征战多年，已是秦王亲信，此时见状，便以言语试探道："京师事变未知结果，大王是国家宗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难道一介使来，便从他入京吗？况且赵郡王前已交付狱吏，而且太子、齐王身为皇上亲子，尚且遭此巨祸，大王此番入京，观此形势，恐未必能自保呢。"说着，便佯作涕泣状。

李瑗听了王君廓的话说道："公诚爱我，我计决了。"于是遂于当日拘禁崔敦礼，并向他询问京城中的机密要事，然而崔敦礼不肯屈服，李瑗便将他囚禁起来，同时征兵发难，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赶赴蓟州，与他计议起事。

兵曹参军王利涉颇通军事，于是进言道："大王如今无诏而擅自发兵，这是造反！应当权益应变，以结众心。如果诸州刺史召之不来，大王将如何起事？又将如何保全自己？"李瑗闻言，不禁忧惧起来，于是问计："那该如何是好？"王利涉回答说："山东豪杰曾受窦建德所用，如今失职而与编户平民一样，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如大旱之时盼望时雨。大王如能派遣使者，恢复他们的旧职，随其所在招募兵马，诸州如有不从，则立即予以诛讨，那么河北之地就唾手可得。然后派遣王诜对外联络突厥，道经太原南下蒲、绛地区，大王整顿车驾西入关中，两军合势，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李瑗大喜，随即转告王君廓，王君廓道："利涉所言，未免迂远。试思大王已拘住朝使，朝廷必发兵东来，大王尚能需缓时日，慢慢地招徕豪俊，联结强胡么？ 现乘朝廷尚未征发，即日西出，攻他不备，当可成功。君廓不才，蒙王厚待，愿做前驱。"这一席话，又把李瑗哄了过去，便道："我今以性命托公，内外各兵，都付公调度便了。"王君廓索了印信，立即趋出。

王利涉得知李瑗将兵马全都交付王君廓指挥后，大惊失色，他认为王君廓反复无常，不能将权柄交托给他，于是慌忙去找庐江郡王，说"君廓性情反复，万不可靠，大王宜即刻以兵权托付王诜，切不可委任君廓"。一番话说得李瑗又生起疑来，

可当他正在犹豫未决时，那边王君廓拿到兵符却片刻不肯迟疑，竟自调动大军，诱杀王诜，随后又提着他的头颅向众人宣告说：“李瑗与王诜共同谋反，拘敕使擅征兵，叛逆朝廷，现下王诜已死，尔等奈何尚从此贼，自取杀身之祸？快快回头，助我诛逆，可保富贵。”

见此情形，众人自然是纷纷表示说：“我们愿意随从您声讨逆贼。”王君廓便率领千余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直到此时，李瑗还没有发觉情况有变。随后，王君廓率人杀入狱中，将崔敦礼放出来，而崔敦礼一出牢狱，当即在城中尽出告示，晓示大众，说明李瑗造反情事。李瑗闻报，这才知道王君廓有变，登时惊惶失措，遂披甲上马，带领左右数百亲信，疾驰而出，却被王君廓率兵堵了个正着，双方还没交战，王君廓大叫道：“李瑗叛逆朝廷，你们为什么要随他去死？”一番话说得李瑗手下俱奔散，单剩李瑗一人一骑，哪里还能脱逃？当由王君廓指挥众士，将李瑗拖落马下，反绑了去。李瑗骂王君廓道：“你这小人出卖我，你也将会自取祸殃的。”王君廓也不与他多辩，将他勒死。



唐镇墓武士俑

就这样，时年四十一岁的庐江郡王就传首京师，次日，尚书省发布上敕，宣示庐江王李瑗六条违逆大罪，削去其王爵，废为庶人，绝其宗室属籍，并判其子嗣坐诛，其家籍没。 和庐江郡王几乎同时起兵的，还有左翊卫大将军天节将军泾州道行军总管燕郡王李艺。

其实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收拾那位忠于太子的燕郡王李艺。武德九年八月十三日夜，李世民召集文武共议军务，翌日，尚书省发布明敕，宣布废黜燕郡王李艺郡王爵位，罢其所兼天节将军泾州都督职衔，追夺其李姓，复其本名罗艺，同时公布罗艺十二条大罪，其中逆状七条，并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天节

讨逆将军泾州都督，率军征讨。

盘踞豳州的罗艺没有想到，在朝廷大军还没抵达的时候，豳州别驾赵慈皓便与豳州州兵统军杨岌谋议诛除自己了，于是猝不及防之间，罗艺大军遭到了杨岌所率千余州兵的突然袭击，虽然与罗艺所统帅的天节军相比，杨岌所率州兵无论是人数还是战力均相去甚远，但却先声夺人，罗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乱之中，罗艺大败，抛弃妻子儿女，仅带了数百名骑兵夺路而逃，出奔突厥。最终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唐左翊卫大将军天节将军泾州道行军总管燕郡王，竟在宁州乌氏驿站被左右斩杀，还被传首京师，而其弟时任利州都督的罗寿也被牵连，遭到诛杀。

就在刚刚平定了罗艺的叛乱之后，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军报传来，突厥大军的踪迹现于长安以北的高陵、泾阳一带 ；随即，陇州、原州、泾州、岐州附近纷纷出现大队的突厥骑兵，至此，武德九年，突厥人的大规模南下入侵终于开始了。

其实在这之前，李世民便以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为左卫大将军，击突厥于秦州，史载此战是“大破之，斩其特勒一，擒大将三人，斩首千余级”，而通过秦州之战，很显然唐军是暂时遏制了突厥人自秦州道方向对帝都长安的进攻，此番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所展开的行动，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不过这一次入侵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当初稽胡酋师刘屳成率领部众，投靠梁师都，可那位在大唐兵锋下“屡战屡败然而屡败屡战”的定杨可汗，却是听信谗言，将之杀死，此事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梁师都的部下纷纷离心，许多人转而降唐，从此之后，梁师都势力渐衰，不得不完全依附突厥，此番听闻唐室内乱，太子、秦王、齐王三方势力厮杀于玄武门下，禁军、城防军、天策亲军、东宫率兵、东宫长林军、天策亲兵、秦府护兵、齐府护兵，各路人马同顶着一个“唐”字，却厮杀于长安城内，于是梁师都便是力劝颉利可汗出兵……

于是颉利、突利两可汗合兵南下，对于突厥大军的数目，据各地军报，十六卫府和尚书省兵部判断，大概有十余万人之多，面对强敌大军压境，李世民几乎是夜不能寐，每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军事，八月十九日，突厥大军破泾州，刺史刘诚道被俘，突厥人在城中大肆劫掠了一番后，继续南下……次日，李世民连续签发敕命，宣布长安戒严，并将禁军、城防军、天策亲军、东宫率兵及各亲郡王府护军统一归属到江夏郡王李道宗的指挥下，此外，督促各地勤王大军火速进援京师。

此时，陕东道大行台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的玄甲军、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的大军、山东道行台尚书令并州都督李世勣的兵马、太行道行军总管邢州都督任

瑰的人马，都在向长安增援而来，但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武德九年八月廿三日，突厥大军前锋已然出现在长安近郊的武功。一日之间，自北向南，京师城外各处纷纷传来火急探报，大队突厥的骑兵在畿辅之内烧杀抢掠，次日，突厥大军攻高陵，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于突厥人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

不过一次小规模的胜利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突厥大军此时已是进抵渭水之畔，并以其亲信执失思力作为使者，进入长安，拜见李世民。颉利派执失思力名为觐见皇帝，实则是为了查看虚实，李世民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了，于是他当即召集内廷三省重臣在显德殿接见执失思力，并在庭上斥责突厥见利忘恩，自负盟约，恼怒之下，将之禁在门下省。

二十九日，李世民又与高士廉、房玄龄等人轻骑出城，径直来到渭水边上，隔渭水对话，叱责颉利背弃盟约。李世民此举让突厥人大惊失色，纷纷下马跪拜，而此时，大队唐军兵马也纷纷赶到，军旗遍野、铠甲鲜明，见执失思力去而未返且唐军阵容盛大，颇为心虚的颉利可汗见状，不禁面露惧色，遂主动请和。而考虑到刚刚宫变，而政权尚未稳固，故而李世民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同意议和请求。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便桥相会，并斩杀白马、订立盟约，随后，执失思力获释，突厥大军率军北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见突厥大军退去后，尚书左仆射萧瑀颇为不解，这位宋国公问道：“当日突厥大军围城，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允，臣等深以为疑，而今突厥果然不战自退，却不知陛下妙策安在？”

对此李世民回答说：“朕观突厥之兵，虽势众而不齐整，君臣上下，唯财是图，凡前受我恩惠者皆见朕而拜，且于颉利啧有烦言。此等兵虽众，然则不能上下一心，不难破也。况且朕早已命李靖、敬德伏兵于后，倘前后夹击，颉利虽有二十万重，也必败无疑。颉利、突利皆知兵之人，必不肯引兵来战。反观朝廷，此时仓廪未实天下未安，朕即位之初，不欲多有死伤，徒增百姓艾怨。即使一战得利，也不能就此平灭其族，相反使其结怨于我，日思报复，将来为患无穷。休兵再和，而贿以金帛，施以小惠，其必得意忘形，战备松弛，骄横自恣于内，倾轧瓦解，其破亡之渐，必自此始，此之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是也！卿可明白吗？”

不过很显然，这只是后人为了宣传李世民的武功和雄才而已，事实上，真实的

情况是，大唐是以大量金银财帛换取突厥的撤兵，所谓“渭水之盟”更像是一个城下之盟，至于给了多少钱财，史载是“空府库”。不管怎么样，武德九年的这次大规模入侵，是被遏止了，十月，颉利送来三千匹马、一万头羊，但李世民没有接受，只是希望突厥放还掠夺的百姓及被其武德八年太谷之战中被俘的温彦博。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武德时代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一个辉煌的贞观盛世，也随着新年的开始而到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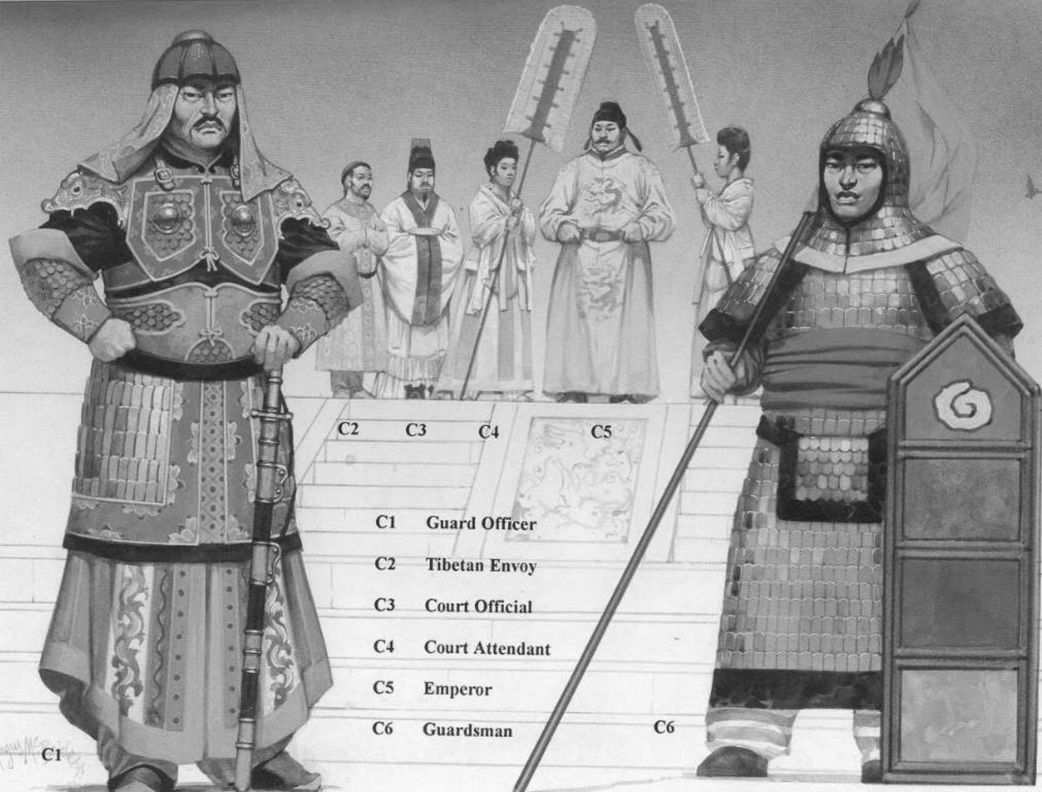
4．秣马厉兵

在渭水便桥盟定之后，从表面上来看，大唐与突厥之间似乎是相安无事，然而“空府库以安突厥”的事实却是让大唐从皇帝到阁臣、从将校到府兵，无一不感到耻辱，这种情况下，较量怎么可能会止歇？

武德九年八月底，突厥大军刚刚退兵，李世民就敕令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玄戈军、醴泉道井钺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豳州道招摇军、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以及南衙十六卫府，各抽调二十名从军三年的兵弁入内廷受训，亲自带领这些诸卫将卒习射于东宫显德殿庭内，并对这数百将士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眼看着李世民每天带着数百人教射于殿庭，还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而如果兵弁获赏，则将领也会在考核成绩时被列为上等……大臣纷纷联名上奏，说什么“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而韩州刺史封同人更是假称有事，直接骑着驿马，跑到长安来直言苦谏……

对诸大臣的劝谏，李世民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宣敕说：“朕待天下臣民以诚，天下人必不负朕；突厥大军南来，掠我州县，虐我百姓，兵锋直抵畿辅，此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也。故朕决意卧薪尝胆、整军经武，岂有惧谋刺而远天下之理？”又说：“王者视四海如同一家，封域之内、大唐辖境，皆是朕的忠实臣民。朕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其腹中，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



西方史学家想象中的李世民和近卫军

武德九年，算得上是一个大灾之年，在突厥入寇的危机刚刚渡过的时候，朝野上下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转移到了赈灾度荒上，这一年，春夏大旱，以至于尚书省不得不不在十一月初，连发三道上敕，免除天下州郡所有赋税徭役，并准许各郡灾民跨郡就食，可就算这样，依然无法遏止灾情，于是李世民不得不要求国范围内所有在建工程一律停建，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衙署大幅裁减开支，并免除所有开国功臣封邑内一切租庸调赋，同时以军粮赈济灾民。十一月十二日，秘书省少监谏议大夫魏徵奏请削减太极宫大安宫宏义宫日常用度三分之一，次日李世民下敕，除太上皇用度照旧外，内宫一切日常用度均削减二分之一。

李渊登基时，曾经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震天下，所以与其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尽皆是被封为王，人数多达数十，李世民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他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回答说："前朝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

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对于这个回答，李世民很满意，他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尚书省颁布上敕，行文天下，除淮安、江夏、河间三王外，余者宗室郡王皆降爵为郡公。



鎏金银茶笼子，法门寺唐地宫出土，为盛装茶饼的茶具

次年正月初三，李世民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李世民颇为感慨，他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

德之乐的温文尔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起身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臣下的一番恭维本是好意，谁知李世民却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

事实上，李世民倒真是试图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均有成就，正月十五，皇帝便是下敕：“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皆命谏官随之，如有失误，谏官应立即进谏，名‘参议得失’。”从此之后，“参议得失”便成了政事堂宰相的代名词。兵部尚书李靖、散骑长侍韦挺、大理寺卿戴胄、秘书少监魏徵皆“参议得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

随后，李世民又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弘文管学士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官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不过皇帝览奏犹嫌其苛刻，言道：“肉刑于前汉文景年间悉罢之，我朝立国已久，不宜复设此刑。”

前隋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大唐兴起后，各路相继归附，李渊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但这样一来，天下州县的数目，也就大大超过前隋开皇、大业年间，李世民认为这样官多民少，乃弊端也，所以召集群臣朝议，商讨对天下各道行台省进行归并之事，贞观元年二月，尚书省下令州县大加合并，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从此天下只有十道，各道分设行台尚书省，各道官员的品级为：行台尚书令正三品下、行台左右仆射从三品上，行台左右丞从三品下，行台尚书正四品上。自此武德年间各道、行台级别不一、官吏品轶不定的情形得到了改观，而各道行台长官略低于朝廷尚书半级，也渐渐成为定制，之前陕东道大行台、东南道大行台等为专人而设，且几乎与朝廷尚书省并驾齐驱的地方行台自此不再存在。

就在李世民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有关军政大员的大事，一件事是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了别人大量的绢帛，结果事情被人捅出来了，可这位李世民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还说什么：“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对此大理寺少卿胡演很不满：“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可李世民却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另一件事则是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谋逆案，李幼良本就性情暴躁，身边自然是依附了一群无赖之徒了，虽然打仗没本事，可侵扰残虐百姓的事情却是颇为拿手，最重要的是，李幼良居然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于是有人上告朝廷，称其存有二心。对此事，李世民还是很重视的，于是他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结果听到朝廷的风声，依附在李幼良身边的那些家伙们居然恐慌了，他们密谋想要杀掉宇文士及，然后占据河西地区，只是这群行事不密之人没等到干出一番大事来，就被人告发了。连自己的亲哥哥、弟弟都能够下手的李二郎又怎么会对这个远房叔叔（其乃李渊的六叔李祎的儿子）客气呢，于是干脆赐其自杀。

此外，平定庐江郡王谋反有功的王君廓也在这一年掉了脑袋，此人自从当了幽州都督后，便自以为山高皇帝远，而骄横一时，做事无法无天，李世民听说了传闻之后，便征召他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于是也就托前往长安的王君廓给自己的舅舅捎封信，可那位都督大人居然私下拆信窥探自己的长史有没有在信中写上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语，结果，本是出身草寇、不认识多少字的王君廓眼看着满纸都是草书字体，竟一字不识，不过他倒是有了主张，他怀疑李玄道在信中是有告发自己的罪行，所以才用自己不认识的字写了信，这样一想，王君廓也就心中不安越来越是不安了，当走到渭南时，他实在忍耐不住心中的恐惧感了，于是杀死驿站吏卒，试图逃亡突厥，可半路就被人砍了脑袋，献首京师。

同样掉了脑袋的还有利州都督义安郡王李孝常。李孝常虽然姓李，封义安郡王，但他却并非李唐宗室，《册府元龟》称，此公本是前隋兵部尚书李圆通的儿子，在隋末担任华阴令，率军驻守永丰仓，在李渊晋阳起兵、进军关中时，他主动献出了永丰仓，故而被拜为左卫大将军，而永丰仓的得失对于刚刚起兵的李渊意义重大，因此在大唐建立之后，李渊念及李孝常的功绩，便封其为义安郡王，并把他纳入宗室，不过李孝常虽然挂着利州都督的官衔，但却多是在长安城内，闲极生事，他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凑一起，成天讨论什么“受命于天的征兆”，还密谋串通禁军实施叛乱。结果事情还没干成，几个家伙就被人举报了，李孝常等人因为谋逆而被处死，而长孙安业却被免死，只被流放。而之所以他被宽大处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皇亲国戚的招牌。

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平日里是嗜酒如命、不务正业，老爹长孙晟死后，这家伙居然将年幼的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赶出家门，辛亏长孙

无忌的舅舅高士廉收养了两个孩子，这才不至于落魄。李世民向来宠爱皇后，而被唐仲友赞为“有古后妃之美，无后世后妃之失，李世民谓内良佐，信夫！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的一代贤后倒也不念旧怨、不计前嫌，对这位这位亲情淡薄的混蛋哥哥依然礼遇，甚至十分优厚。谋逆事发后，正是长孙皇后哭着向李世民请求，说什么“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才使得长孙安业得以免死，仅仅判了个流配。

不过虽然诸多封疆一方的大吏掉了脑袋，可李世民自登基以来，用人的问题上，一贯是唯才是用，他尝与人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夜值。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的原从老人应该全部任命为武官，编入禁军，毕竟这些人都是在六月初四的玄武门立过功劳的，可李世民却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很显然，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免和政治制度改革，都是为了能够以增强国力，同时在军事上，大唐还开始积极备战，以为彻底解除突厥威胁而做好准备，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内。

岭南部落的首领冯盎、谈殿等人长期不朝，而且互相攻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地方州府一连十几次上奏，称冯盎等人谋反，于是李世民命令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可是魏徵却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李世民很是不解，就问：“上告冯盎谋反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

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李世民深以为然，于是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长安，以示诚服，李世民事后评价说：“魏徵让朕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遂下旨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就在大唐积极备战的时候，贞观元年五月，割据恒安的苑君璋忽然上表归附大唐。自从苑君璋拘捕武德皇帝派来的元普并送到突厥后，他便一直依附于突厥，而且数次入侵大唐，可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李世民不仅没有为难他，还封他为隰州都督、赐爵芮国公。



唐代彩塑

的确，此时突厥人靠不住了，当初突厥人风俗淳厚，且政令简质疏略，可自打颉利可汗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个汉人赵德言，并加以重用后，一切都变了，这位赵德言恃势专权也就罢了，把中原的那一套全逮到了突厥来，他除了对突厥旧俗大加变更、使得政令苛刻烦琐之外，还强迫突厥人改变旧有风俗习惯，于是搞得突厥族人从刚开始的“颇有怨言”，很快便是成了“大为不满”。此外，颉利可汗又信重胡人而疏离突厥本族人，可那些这些胡族人又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加之好大喜功的颉利频频对外征战，于是搞得干戈连年不息。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得寒冷，塞外连连大雪，以至于雪深达数尺，突厥人赖以为生的牲畜死亡极多，突厥族人也遭受冻饿之苦。颉利财用不足，于是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纷纷叛离突厥，颉利兵势渐渐削弱。面对这种局势，在议事时，不断有朝臣们纷纷上奏，当在此时趁势出兵击讨突厥，只有长孙无忌独持异议，他认为大唐此时先进攻突厥则为不义，并说：“贞观元年之前，突厥岁岁犯塞，而朝廷未长出兵惩之；而贞观元年，突厥未犯塞，如此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所为也。如此蛮夷之族再不信朝廷，则突厥虽灭，边塞难安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有出兵。

不过大唐不出兵，不等于别人也不对颉利下手，当初突厥强大时，铁勒各部分散，分为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十五部，这些部落中，薛延陀实力最强。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强大的时候，铁勒各部都向他称臣，可曷萨那却对他们横征暴敛，搞得铁勒各部均有怨言，于是这位可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各部的首领招来，一口气杀死各部渠帅百余人，这场大灾难自然是搞得敕铁各部相继叛离了，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后又推选居住在燕末山北的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带领各部“共同发展”。

后来西突厥在射匮可汗大带领下，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的时候，薛延陀、契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带领各部再次向西突厥称臣。而居在郁督军山的回纥等六部，则本是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时，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于是颉利政治混乱时，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部便是趁机相继叛离，颉利可汗大怒之下，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结果在马鬣山被回纥酋长菩萨率领五千骑兵大败，兵败如山倒的欲谷设仓皇奔逃，回纥人则追杀到天山之下，俘虏其大部，从此回纥大胜，而此时，薛延陀也趁

机攻破颉利的四设，使得颉利的势力日益衰败。

贞观元年十二月，奉命出使突厥的鸿鸬寺少卿郑元寿回到长安，上表曰：“突厥之兴盛，以羊马牲畜为标志。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其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渐弱，臣算其败亡，不出三载……” 而且郑元寿还认为突厥内部因受灾更加不稳，颉利的威信和对诸部族的控制力均有所下降，若不出大的意外，这场雪灾将直接导致突厥的元气大伤，甚至可能引起内讧。

对郑元寿的这番奏陈，李世民颇以为然，不过当诸臣劝说皇帝应该趁机突厥时，李世民却在“斟酌再三”之后：“朕与突厥方盟誓不久，而即背约为失信，乘人之危而发大兵征讨为不仁；此时行天罚，虽胜亦非武。纵使其六畜皆亡，诸族皆叛，亦不可攻。非待其有罪，朕不罚也……”

不过这言词凿凿、大义凛然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番考虑，李世民之所以决定不在这个时候发兵，政治考虑明显多于军事考虑，大唐此时对突厥作战的军事准备确实还不够，李世民希望能够准备充分一些再出兵，此外，大唐关注的不仅是突厥人，还有整个西域、南方和北方的夷邦，大唐若是举兵荡平这些外族，则必然损失巨大，消耗相当多的国力，而这与李世民偃武修文的本意也是背道而驰的，他也不想自己成为自己的表哥——前隋炀帝那样的好大喜功之徒。若是宾服四夷，德化怀柔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要保证这样的手段能够有效，就必须注意维护军事行动背后的道义基础。

此外贞观初年时，西突厥再次提出和亲申请，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随同高平郡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大唐公主。可颉利可汗不希望看到大唐与西突厥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于是和西突厥之间的联姻，再次因为突厥人的干扰而没有能够成功。不过颉利虽然干扰了和亲，但却使得自身和西突厥之间的关系也更是紧张了，李世民希望颉利和诸胡之间的矛盾能够更加尖锐一些。

大唐虽然没有趁此时机发兵平灭突厥，但相应的军事行动却一步紧似一步。关于北征突厥的军事方略，李世民早就考虑成熟了，若要彻底解决突厥对大唐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则必须收复朔方和定襄这两个前隋时期的边防重镇，此时，这两个重镇则分别由梁师都和杨政道两股割据势力占据，他们依附于颉利，岁岁南下骚扰大唐边境，若是大唐北进，则这两股割据力量又变成了挡在颉利和大唐之间的一道

天然屏障，故而唐军要实现与颉利进行战略会战的目的，都必须先拔掉朔方和定襄。

梁师都一日不除，突厥的铁骑出陇右、下关中要多方便有多方便。这颗钉子如不拔掉，西域诸国和突利契丹等部纵然对颉利再不满也不敢向大唐臣服。而大唐一旦控制朔方，则也就等于斩断了颉利向西向南的通路，突厥骑兵便再无可能自由往来于陇右关中，而唐军主力则可通过朔方和河东分为东西两路进击漠北。

至于定襄，由于被颉利当作过冬的行营，几乎每年冬季都要率领部众南下来此地就食，而定襄的防务也全然是由突厥军队负责，杨政道虽然在名义上称为大隋正统，基本上是颉利的傀儡。从战略上看，打杨政道实际上便是直接和颉利交兵，但打梁师都，颉利会不会救援却在两可之间。春季正是草原上的牲口马匹交配繁殖生产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突厥移动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突然的手段打击梁师都部，颉利即便想援救也是有心无力。

因此对于李世民在贞观元年岁末派柴绍和薛万钧远赴夏州筹备此事，负责前线事务李世勣虽初时吃了一惊，随即便想通了其中的关节。今年冬季突厥大雪成灾，牛羊牲口被冻死无数，元气大损，只怕要有成千上万的牧民难以活着度过这个冬天，颉利可汗自顾不暇，这时候大唐若还畏首畏尾不敢动手取朔方，待明年夏季一过突厥恢复元气，再想动手就晚了。

所以，李世民希望先西后东，先打梁师都，后破杨政道，先取朔方，再破定襄。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定襄方向虽说是突厥主力所在方向，但要击破其倒也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以大唐的实力和李靖、李世勣等云集的名将，大唐攻定襄，势必一举可破，然而难的是破定襄之后，大唐是否还有深入大漠寻找颉利主力会战的余力。所以，如果选择颉利北还牙帐的时候克定襄，则唐军便要深入漠北数百里搜索敌军主力所在位置，阴山以北的地域实在太过广大，且气候地理均不熟悉，在那个地方作战，唐军是客军，而突厥骑兵的机动速度又优于唐军，一旦陷入颉利彀中，想全军而还都难，即使赢了，也是诸如汉武帝大军出漠北那样的胜利，虽然辉煌，但也损失巨大。

可若选择在定襄与突厥进行决战，则突厥有城池可以依托，且想守就守想走就走，唐军未必能够抓得住。而颉利一旦主动北窜，唐军就算拿下了定襄也还要留大兵驻守。贞观初年突厥遇上了大雪灾，可中原却也四处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事情屡有发生，颉利固然捉襟见肘，唐帝国也并不好过。若两年内国库仓廪没

有明显改观，唐军就算是拿得下定襄也守不住定襄。

所以，李世民才否决了此时出兵，而计划等两年再用兵，以夏州兵驻朔方榆林之地，防颉利西窜，主力则以并州军出雁门、马邑，直逼定襄城下，继而与突厥主力会战于定襄城下。时间嘛，以冬季为宜，因为那个时候，颉利届时必驱部众牲畜南下至定襄过冬，正月用兵，一冬一春，有整整半年时间可用。届时大雪封塞，颉利若率众躲回漠北，则大部牲畜必为大唐所得，连族人的口粮都没有，怎么打仗？而其部即便能够全军回到牙廷，牲畜全失之下，不知有多少人要冻饿而死，那时候恐怕即使大唐不动手，敕勒各部也会动手的。



唐代武士图

果然，大唐没有等待太久，贞观二年年末，突利可汗领地内的薛延陀、回纥两部落再次反叛。其实一直以来，突利可汗都是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而奚、霫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大唐时，他也没有多以为然，反倒是颉利可汗频频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当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时，颉利更是派突利讨

伐，此举显然是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减突利的势力。

不过突利出兵平叛并不顺利，反为薛延陀、回纥所败，几乎是单骑逃回，突利在慌乱之中犯了个大错，那就是他居然跑到颉利牙廷，向颉利请兵。不料听闻兵败的颉利大怒之下，竟将其关押十数日，并加以挞责。突利从此怨恨颉利，这两位冒合神离的可汗终于公开决裂。突利后来回到自己的领地后，暗中便是开始琢磨着背叛颉利，其后颉利数次向其征兵，突利均不加理睬，却暗中向唐廷上表，表示愿意归附。

对于突利的请求，李世民在朝会上对自己的臣子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不久之后，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当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时，李世民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不过李世民并没有打算救援突利，他更希望两大可汗之间能够相互厮杀，以使得突厥人能够在内耗中损失更多一些。

而当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大唐，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李世民不以为然，他对突厥使臣说："契丹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其实这位少年领兵的皇帝早就已经惦记上梁师都了，在此之前，当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突厥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时，李世民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于是李世民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伺机出击。刘旻等数次遣轻骑践踏梁师都屯田所种的禾稼，又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以至于梁师都国势渐衰，降唐者纷纷，甚至还发生了梁师都名将李正宝等密谋捕杀梁师都投唐的事情，虽然事情败露后，李正宝不得不出逃降唐，但从此，梁氏上下更加互相猜

忌，而刘旻等人见时机成熟，于是上表请求出兵。

贞观二年，趁突厥内乱之机，李世民以右卫大将军霍国公柴绍、以右骁骑大将军殿中少监薛万均发马步军八万奇袭朔方，同时命以刘旻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梁师都，在柴绍大军到来之时，梁师都统帅麾下突厥兵试图强攻朔方东城，可刘旻、刘兰成二人却是偃旗息鼓、按兵不动，等到梁师都感觉到自己处于在唐军合围时，这位割据一方的豪强居然半夜逃跑，刘旻、刘兰成则果断率兵追击，一战而大败梁师都。

尽管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师都，但却在距离朔方不过数十里处与柴绍大军相遇，一方面，柴绍统兵奋力拼杀，另一方面，薛万均率万骑迂回统万城，抄了梁师都的后路，一战而大败突厥兵，并切断了突厥大军南援的必争之道，自此包围朔方城。围城二十余日，突厥兵迟迟没来救援，梁师都在外援断绝，加上城中粮绝的困境下，被堂弟梁洛仁杀死，随后梁洛仁献城投降，被梁师都割据了十余年的朔方为大唐所得，随后大唐以该地建夏州，并展开经营，以将之作为反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

此时颉利的确没有能力去救援梁师都，由于突厥内部分裂，加上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使得民疲畜瘦，很多羊、马被冻死、饿死，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而且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也趁机群起反叛，共推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并接受唐王朝册封，突利可汗也因长期受颉利可汗压制排挤，也暗中与唐联络，表示愿意归附。可以说，此时大唐反击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

薛延陀的叛逆，让颉利感到了威胁，而李世民更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对自己得到大唐的册封，夷男十分高兴，他不仅派使臣进献贡品，还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至于觐见大唐皇帝的使臣，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所派之人是他的弟弟统特勒，对薛延陀人进献的贡品，李世民其实看得并不重要，而更多的是处于谋略的考虑，大唐必须要在突厥人的背后敲入一个钉子，于是他赐给真珠毗伽可汗以宝刀与宝鞭，并让统特勒转告真珠毗伽可汗："卿所统属的部族，若是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对此自然非常高兴。而颉利可汗得知此事后，则大为惊慌，开始向大唐派出使者称臣，而且请求迎娶公主，以修女婿礼节。



唐初名将柴绍

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晚了，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表言突厥之可胜，并列举了六条出兵突厥的理由：

“颉利纵欲逞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诸部皆叛，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糇粮乏绝，是其四；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而胡人反复无常，大军北伐之时，突厥内部必然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其众甚多，近来听说这些汉人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

于是在贞观三年九月初一，李世民发布任命敕，以南阳郡公兵部尚书李靖为河西道行军总管、以代州都督张公谨为行军副总管，发兵五万征讨突厥……一代名将李靖出兵，自然是所向披靡了，加上五万兵马又都是精锐之师，自然是“天下莫有能

抗者”，于是突厥人几乎无法能够与之而战，此一战，不仅使得颉利麾下九名俟斤率三千骑来降，而且还使得十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等部落纷纷来降，就这样进击颉利的外围障碍基本上被扫清。

到了这个时候，颉利不可能不做一拼的，于是他以大唐背约为借口，在当年十一月发兵进犯河西，统领犯河西地区的突厥大军者为雅尔金和阿史那社尔，可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及张士贵、张宝等将却在刘弘基节度之下，统兵结成掎角之势，坚壁清野，利用城池做拼死抵抗，鏖兵月余，终于击破了来犯之敌，使突厥人这最后一次挣扎无功而返。至此，突厥牙廷的影响力被压缩在定襄周围不大的一片地域内，而且来自大唐西面、西北、北面等几个方向的军事威胁也均被消除，可以说，此时与突厥决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而突厥人的这次挣扎也让大唐反击突厥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贞观三年十一月十四，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设中朝，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向文武百官宣示颉利十大罪状，并诏命兵分六路出兵剿灭突厥，以：

并州都督英国公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代州都督邹国公张公瑾、岷州都督高甑生为副将，率领东路主力北渡滹沱河，经博陵、雁门、马邑三郡直接进击突厥腹地的襄平；

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鄂国公尉迟敬德、匡道府折冲都尉苏定方为副将，率领中军向云中和马邑挺进；

右卫大将军霍国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胡国公秦叔宝为副将，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负责掩护左翼；

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从灵州往西北挺进，以截断突厥的西逃路线；

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卢国公程知节为副总管，率军进驻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

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并监视和牵制突利可汗。

还有舞阳县男李大亮镇守凉州防备西北，任国公刘弘基镇守河北易州防备东北。除陈国公侯君集任兵部尚书留守都城外，唐军主力以及军中的可战之名将几乎倾巢而出。

同时为保障此次军事行动的后勤粮秣，李世民下敕由尚书右仆射杜如晦领衔组

建了北征行台，专办大军粮秣供给事宜，尚书省户部自尚书以下堂官、兵部自侍郎以下堂官、中书省兵房舍人、门下省兵科给事中均在行台轮值办公，凡涉及北征大军所需人、财、粮、物，一律有求必应。

十一月底，随着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大战随即展开，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先是在榆林以北以优势兵力击破颉利一部，斩首万余，随后又向盘踞在榆林以北的突利可汗发出劝降敕，这位一心早就想要归唐的可汗当即率五万部众自缚请降，听闻这个消息，李世民对众臣们不无改开的说："大唐初立之时，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朕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而与此同时，从东线展开包抄的通漠道行军总管李世勣所部在桑干河北岸一月之内连续击破突厥四个游骑部落，俘获两万余人、羊马近五万头，继而与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所部在定襄以南的马邑会师，大军随即展开。十二月底，由柴绍亲自护送抵京的突利可汗在东宫显德殿向大李世民递交了降表，称："臣本域外之民，自此归服王化，永为天子藩屏，使朝廷不复北忧！"李世民对突利归顺大唐的大义之举大加赞赏，在设宴以叙兄弟之谊的同时，正式以敕书形式册封其为突厥可汗，享郡王俸禄，食邑五千户，赏金千两，帛百匹，牛马三万头，将五原周围方圆三百里赐为其游牧场所。



《王会图》局部

在厚待突利可汗的同时，李世民下敕给前线的李靖、李世勣两位统帅："卿等宜乘胜追击，克复定襄，擒颉利收北地归朝奏捷，天下自此长安！"同时明敕两路大军合兵，则以李靖为总管，李世勣为副总管，薛万均为长史，并授李靖兵符节钺，有便宜行事临机决断之权。

贞观三年，对突厥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取得震慑力是极大的，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纷纷前来归附大唐。所谓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于是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而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也纷纷归附，并进献贡品，李世民诏令在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在归顺之后，大唐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并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在归附后受大唐如此礼遇，其余各部自然相继来降，于是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奉、岩、远四州。

到贞观三年即将过去之时，根据户部上奏称："汉人从塞外归来者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者，共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那些从周边及远方各胡、蛮诸国纷纷而来的向大唐进献贡品的使臣们络绎不绝，以至于长安城内"多奇服怪装者"，对此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兴致勃勃的李世民自然对此应允了。

5．雪满弓刀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轻骑，自马邑出发向北，悄悄绕过了正面突厥大军的防线，在连续行军后，于正月十一突然出现在定襄城南八十里的恶阳岭，并随即乘夜袭占定襄城，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以至于一日数惊，惶恐不安。颉利认为李靖敢孤军深入，定有主力随后，甚至是以倾全国兵力北来，故而慌忙将牙帐撤至碛口。此后，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部众，本是颉利的心腹大将的康苏密，居然趁机裹挟了前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跑到定襄来，表示愿意降唐。

对萧氏及杨政道的处理，中间还有个插曲，康苏密为了表示“忠诚”，居然在到了长安之后，称“大唐有人私下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听到这个“秘密”后，中书舍人杨文请求对此事件进行讯问，可是李世民却不以为然，他说：“大唐未定天下时，突厥正当强盛，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安定，既往的过错，又何须追问呢。”

李世民的宽容，却是颉利的噩梦，那位突厥可汗见康苏密降唐，丝毫不敢再在碛口停留，随即下令向阴山撤退，可部众却在浑河边遭到金河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霍国公柴绍的截击，随后又白道遭到兵出云中通漠道行军总管李世勣所部的打击，损失极为惨重，虽然颉利退屯铁山，收集余众数万，可他与麾下各部之间的联络均被唐军打断。眼见唐军将十余万失去统一指挥节度的突厥大军分割包围在定襄周围逐一聚歼，颉利又是心痛又是恼怒，为了争取时间求得一线喘息之机，他即派执失思力为特使，乘快马星夜向长安发出了求和降表。

其实颉利之所以向大唐谢罪请降，表示愿举国内附，实际上企图待草青马肥之时，再转移到漠北，伺机东山再起。而李世民也看出了这一点，虽然派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去突厥抚慰，但却又令李靖率兵接应。

贞观四年二月，李靖引兵至白道与李世勣会合，相与定谋，李靖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依附于薛延陀等部，则很难追歼；今唐俭在突厥，颉利懈而不备，如选精骑袭之，可不战而擒之。偏将张公瑾怕这么做会使唐俭等人身陷险地，但李靖却认为只要能剿灭突厥，唐俭等人根本不用去考虑，于是李靖决定由李世勣统大军继后，亲率精骑万名，各备二十天口粮，连夜出发，向铁山疾驰。

贞观四年三月初一，李靖亲率一万骑兵越过阴山北麓，星夜北上，当李靖军冒雪至阴山，遇突厥营帐千余，尽俘之。颉利却见唐俭持节钺来使抚慰，以为大唐已中其缓兵之计，因此未加戒备，尉苏定方所率的二百骑兵在浓雾掩护下衔枚疾进，在至颉利牙帐七里，这支前锋才被发现。

待得颉利听闻军报时，李靖大军已将牙廷团团包围，而苏定方所部更是趁着雾气掩护，长驱直入，直冲进了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慌乱之中，颉利及其部下不知浓雾里有多少唐军，仓促之间上马单骑脱围而去，其部众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迅即被唐军击溃，颉利的妻子隋义成公主也死于乱军之中。此战突厥军大溃，被歼万余人，男女部众十余万人及牛羊杂畜十余万头被俘获。而厮杀之间，唐俭、安修仁也趁乱脱险而归。与此同时，李世勣率唐军主力自正面出击，将失却了统一指挥的突厥大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并切断了突厥北窜的道路，迫使那些乱成一堆的突厥部落纷纷来降，再次俘获五万余人。

一路北逃的颉利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停留了，在阴山被击败后，他仓皇由云中向西逃窜，意图投奔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或高昌国王麴文泰。在半路上，部将大多叛逃。这个时候，颉利想到了苏尼失。起初，始毕可汗重用启民的舅父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五万户的部落，建牙帐在灵州西北。等到颉利政局混乱，唯独苏尼失部没有二心。突利投奔大唐，颉利立苏尼失为小可汗。颉利在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兵、其子叠罗施也与之走散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依附苏尼失。可这个时候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却得知了消息，迅速领兵进逼，大军压境，逼迫苏尼失交出颉利。慌乱之间，颉利再次选择了逃跑，他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藏在荒山野谷中。



西方画家笔下夜袭突厥王帐的唐军轻骑

眼看着颉利跑掉了，苏尼失害怕担罪，急忙派骑兵将颉利抓回。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并将之押回京都长安，苏尼失举兵投降，至此，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汗国彻底灭亡。

捷报四月初传到长安，李世民当即前往太极宫谒见太上皇李渊禀报佳讯。太上皇李渊听说擒住了颉利可汗，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一举剿灭突厥，证明我托付的人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发敕，召皇帝及文武百官至凌烟阁夜宴，宴上太上皇亲执琵琶，李世民当庭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相贺，欢愉之情可见一斑，宴会直至深夜方才散去。

定襄之战影响深远，此战之后不长时间，大唐便控制了自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而困扰中原王朝已久的北方威胁冰消瓦解，将东突厥领地被划入大唐版图，朝廷在其上设置了顺州、裕州、化州、长州、定襄、云中等都督府，帝国的疆域由此扩大至阴山以北六百里，势力范围达到北海（贝加尔湖）。

而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大唐天威远播塞外，化外诸族纷纷来降，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并上表请求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对此李世民说：“朕既做了大唐天子，又要做天可汗吗？”于是文武大臣以及四方各族首领齐呼万岁。唐发往域外诸族的敕旨文书上，均署名“天可汗”。

贞观四年五月初五端午日，李靖、李世勣、薛万彻、苏烈诸将率领三千士卒押解颉利等突厥贵族抵达长安，李世民亲率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戚文武百官出城五里相迎，礼部仪仗高奏凯旋乐，迎接凯旋的将士们。当日长安城内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次日，朝廷在承天门外举行献俘大典，颉利可汗被献俘太庙，李世民在顺天楼召见颉利当众历数颉利罪状，不过并没有杀他，反而还归还他的家属，并让他住在太仆寺，以官家供应食用。

“居长安待罪”自然不好受，颉利毕竟是突厥可汗，习于游牧，根本不习惯住中原的房屋，以至于不得不常在廷中设置穹庐居住，每每思及大草原，郁郁寡欢，常与家人悲歌对泣，渐渐地也就形体消瘦了。李世民倒是对他怜惜，于是任命颉利为虢州刺史，之所以这样任命，是因为虢州乃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市，此地靠山，多獐鹿等野兽，可以射猎自娱，但心气颇高的颉利可汗却是推辞不去。于是李世民又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良田美宅。对于颉利，李世民曾经评价所说：“过去启民可汗亡国，前隋文帝不惜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护使之存立，到始毕可汗时渐强，却起兵在雁门围困炀帝，如今颉利可汗的败亡，大概是他背德忘义的报应吧。”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去世，在礼部商议之后，追赠他为“归义王”，谥号“荒”，并诏令其族人前来参加他的葬礼，最后又按照突厥人的礼节，焚尸而葬于灞水之东。

大唐没有处死颉利，让他在长安度过余生，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突厥的名将或首领包括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以及契苾何力等人纷纷归降，而大唐也给与了他们以重用。譬如，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就被封为右武侯大将军，思结俟斤率四万多军队投降后也被重用，突利可汗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当尚书省正式发布上敕，以李靖为尚书右仆射，加封代国公，以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预朝政，加封陈国公，以李世勣为左卫大将军兵部侍郎，加封英国公，而其余北征将士，各有封赏的时候，对于突厥旧部的处置也被提上了日程。

五月初八，李世民在显德殿召集廷议，议处突厥旧部。在东突厥灭亡之后，其属下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大唐的约有十万户，对于这些人的处置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朝堂上，朝臣们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多数朝臣主

张“将其悉数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使之散居各州县，教之耕织，使其逐渐改俗习农，以使塞北地区永远空旷无”。然而也有许多人反对此议，这些人以为，若将突厥迁入内地，改其习俗，非但不能教化之，反倒在中原埋下了祸患之源，得不偿失。譬如中书侍郎颜师古就认为：“突厥、铁勒族自古以来很难臣服，陛下既然使他们称臣，请将他们安置在河北地区。分别设立酋长，统领其部落，则可以永无祸患。”

最终李世民决定将突厥大部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黄河之策，同时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之地，设置顺、化、祐、长四州都督府，又划分颉利之地为六州，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以统治其民众，此外，还任命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当初颉利败亡时，各部族首领纷纷抛弃颉利投降大唐，唯独阿史那思摩跟随颉利，最后与颉利一同被俘，李世民嘉许他的忠诚，拜他为右武侯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旧部。同时还加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并任命他为北宁州都督，此外，还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一干归降的胡族首领，大多被拜为将军中郎将，跻身朝官行列，以至于五品之上多达百人，朝堂之上汉胡皆半，而迁居长安的胡人也因此多了一万多户。

其实当初对于突厥的处置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阴山一战之后，突厥元气已灭，百年之内断难恢复过来，纵有小患，也不伤大局。随后李世民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领各部落官员，对于这位突厥可汗，李世民不无警告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启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为大可汗，疆土覆盖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的祸患，天理不容，所以才有你今天的惨败灭亡。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启民立可汗的前事作为教训。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应当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侵占掠夺，这不只是想要大唐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使你们的种族永远存在下去！

李世民的告诫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果然在贞观十三年四月发生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集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侵袭御营的事情。本来阿史那结社率等是暗地里集结部众四十余人，阴谋利用晋王李治四更出宫的机会，可结果天起大风，故而晋王没有出宫，叛逆的突厥人担心天近拂晓，事情暴露，遂强闯行宫，混乱之中，他们倒也穿过四道幕帐，而且还胡乱射杀了数十名禁军兵卒，辛亏折冲都尉孙武开率众拼死抵抗，眼看不能得逞，阿史那结社率等人居然驰入御厩中，盗走马二十多匹，向北逃走，渡过渭水，想要逃回到本部落，最终还是被捕获问斩。

此事之后，李世民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在内地安置他们的部众，而上书言事者多说突厥留在黄河之南有很多不便，并建议将突厥人全部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于是李世民诏令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给鼓和大旗；突厥以及安置在各州的胡族，均令他们渡过黄河，回到他们的旧部落，使他们世代为帝国的屏障，永保边塞。

由于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不肯走出塞南，李世民又派司农卿郭嗣本下诏给薛延陀："颉利可汗已然败亡，他们的部落都来归附大唐，朕不计较他们旧的过失，嘉奖后来的善举，待其官员皆如朕手下的百僚，视其部族民众皆如朕之百姓。中原王朝崇尚礼义，不毁灭别人的国家，先前打败突厥，只是因为颉利一人有害于百姓，实在不是贪图其土地，夺其牲畜，总想重立一个可汗，所以将投降的突厥各部落安置在河南一带，听任他们畜牧。如今人丁兴旺，户口滋生，朕内心非常高兴。既然已答应另立一可汗，便不能失信。秋天将要派遣突厥渡黄河，恢复其故国。你们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受册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们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疆土，镇抚本族各部落。如有越境劫掠，我大唐就要发兵，各问其罪。"

不久之后，阿史那思摩率领所辖部落建牙帐于河北碛南一带，李世民亲临齐政殿为他们饯行，宴上阿史那思摩泪流满面，他端起酒杯说："我等败军之旅，本当化为尘壤，幸遇陛下保全我们，又立我为可汗，愿千秋万代永远侍奉陛下。"

此后李世民又派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人携带册封文书，就其部落聚居地，在黄河边筑立祭坛而册立他。又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阿史那忠是苏尼失的儿子，一直以来，李世民待他甚厚，将宗室女许配给他。等到他奉职出塞，仍然怀恋大唐，每每见到来使必定流泪请求入朝侍奉天可汗。



除此之外，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也积极展开行动，他派契丹族首领贪没折游说东北各少数族，一时间奚、室韦等十几个部族先后归顺大唐，于是帝国的东北便是得以平定。不过倒不是人人都能够归附大唐的，譬如，康国就主动要求归附大唐，但李世民却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地处遥远的国家，以讨得降服远方的盛名，这毫无益处而只是让百姓受罪。如今康国要求归附，如果他们遇到危急情况，按照道义来讲不能不去救援。士兵们行军万里，岂能不疲劳！让百姓疲劳以获取虚名的事，朕不做。"于是不接受康国的归附。

此外高昌王麴文泰也在此时来到朝中，一时间西域各国都仿效高昌，派出使节进朝贡品，李世民颇为得意，可那位不识时务的魏徵又跳出来劝谏道："从前汉光武帝不允许西域诸王送王子入朝侍奉和置都护府，认为不应当以蛮夷劳顿中原帝国。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先前文泰来朝时，已耗费很多，如今假使有十国来进贡，则随从不少于一千人。边区民众耗费过大，将难以承担。如果允许他们商人间相互往来，与边区百姓互市贸易，这还可以，如以宾客接待，对我大唐没有好处。"李世民听了之后，幡然醒悟。

不过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携王后这次亲自前来长安觐见，并贡献方物时，李世民还是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了他。其实高昌王国也是汉人所建立的，西汉宣帝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至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而东汉、魏晋沿袭其制。这一时期，高昌壁隶属凉州敦煌郡。到了西晋至十六国初期，高昌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是西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了。此后，十六国时期，此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

北凉承平十八年，柔然攻高昌，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为高昌建国之始，历经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氏高昌四代政权，这其中麴氏享国最久。麴嘉王时，恹挞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麴嘉王求救，麴嘉王出兵救援，并委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虽然隋开皇中，突厥曾破高昌城，但后来高昌又渐渐发展强大起来，大业五年间，时遣使朝贡，高昌的国王麴伯雅跟随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回师之后，隋炀帝把宗女华容公主宇文氏嫁给了麴伯雅，做了高昌的王后，麴伯雅的正妻只好退避王后之位。麴伯雅去世后，其子麴文泰继位，

再娶华容公主，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赐华容公主宇文氏花钿一具。贞观四年冬，麴文泰来长安朝见李世民，华容公主宇文氏相随，李世民随即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此后，高昌不仅向大唐进攻玉盘狐裘等物，更时时向大唐上报西域的消息，使得大唐廷得以及时掌握西域的动态。

麴文泰一生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和西去印度取经的“唐僧”玄奘之间的交往了，当年麴文泰听说了玄奘去天竺之事后，热情相邀，玄奘本来没有路经高昌的计划，但实在是盛情难却，于是好改变路线去了高昌。在高昌，玄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麴文泰本人也十分推崇玄奘的佛学，说他从没有见过比玄奘学问更高的僧人，甚至要求玄奘留在高昌做国师，然而玄奘显然不愿意，甚至不惜以绝食相抗，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麴文泰和玄奘结为兄弟，麴文泰支持玄奘西行，玄奘学成归来要在高昌停留三年。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玄奘讲经不止，麴文泰则为他做各种准备。那么麴文泰的准备是什么呢？“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正是由于麴文泰的强力资助，玄奘此后在印度从容专研佛学，不但不为经费问题所困，而且有经济实力保持与佛学界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所谓“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

不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麴文泰还“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也就是说，玄奘此后的西行之路是由高昌专使护送的。

高昌虽然是个小国，但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与西域诸国往来频繁，递送玄奘一行之请求诸国不难办到。由于高昌在西域诸国中享有特殊地位，诸国与中原贸易往来所需高昌的地方很多。现在，高昌王麴文泰派出特使，发出国书，请沿途各国照顾玄奘一行，这对于各国而言实在是太简单了，于是除了焉耆以外诸国对玄奘一行的照顾都很周到。当然除了麴文泰的特使以外，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也派了特使。

而玄奘对麴文泰的恩情是一直记在心中的，他更念念不忘与麴文泰的三年之约。十几年以后，日戒王问玄奘归国是走海路还是陆路的时候，玄奘的回答是：“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

喜，资给丰厚，愿法师还日相过，情不能违，今者还须北路而去。”这个时候，玄奘已经是声振天竺了，他也想到了和麴文泰的三年之约，然而当他归国的时候，西域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初玄奘离开高昌时，麴文泰率领王妃和文武百官率全城百姓全城夹道相送，麴文泰更是亲送奘至百里外的交河城，分别之时，高昌王麴文泰抱住玄奘失声恸哭，两人依依惜别。十七年后，强大的突厥已经土崩瓦解，麴文泰已在几年前亡，而那个所谓的高昌国也已经成了大唐治下的西州……

6．长安西望

当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位时，和大唐的关系还不错，可在贞观二年，他被自己的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可汗，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莫贺咄原先仅为一小可汗，他自称大可汗后，自然是国人不服了，于是弩失毕部共同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可问题是，泥孰不肯就位，而此时有人想到了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勤，当时力特勤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已经逃到了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于是两个可汗之间也就相互攻伐，争斗不息了。虽然双方都有派使臣请求与大唐通婚，李世民不但不应允，还传谕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要求各部各守辖境，停止彼此征伐。

此时在利益面前，"天可汗"的话语显然也没有什么大用，双方依然是争斗不休，原先役属的西域诸国和铁勒各部纷纷叛离，而且开始选择站队。由于肆叶护是前可汗之子，所以西突厥部众大都拥护他，甚至西面的都陆可汗以及莫贺咄部的酋长多数归附肆叶护……到了贞观四年，莫贺咄兵败被泥孰杀死，突厥诸部共推肆叶护为西突厥大可汗，可汗之争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然而好景不长，肆叶护也是一好战之徒，他先是北征铁勒，可结果却被薛延陀打败，而且此人为人多疑狠毒，不仅杀了拥立自己的功臣乙利小可汗，而且还诛灭其宗族，此事自然是引起部下人人自危了，不久之后他又阴谋杀害泥孰，不得已之下泥孰逃往焉耆。贞观六年秋天，肆叶护遭设卑达干与弩失毕部攻击，逃往康居，不久死在了那里，这种情况下，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

咄陆可汗在武德年间，曾到过长安，李世民还曾与他结为盟兄弟。当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这位"天可汗"的兄弟立即派遣使臣至大唐表示愿意内附。第二年，皇帝派遣的使者鸿胪少卿刘善因抵达西突厥，册封泥孰为"奚利邲咄陆可汗"，可仅仅才过了一年，泥孰病死，其弟同娥设继位，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这位新上位的可汗倒也奇葩，他将国土分为十部，每部设首领一人，各赐给一支箭，称为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称五咄陆，设置五大啜，居处于碎叶以东地区；右厢号称五弩失毕，设立五大俟斤，居住在碎叶以西，通称为十姓。此外，他还在贞观九年献马五百匹于唐，上表请婚。不过大唐显然没有看得上他，仅仅对他厚加抚慰，而没有同意他的求婚。

不久之后，因为无道，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便失去了民心，于是突厥再一次内乱，一部分人拥立始毕可汗之子欲古设为可汗，这位欲古设是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奔西突厥的，他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后，便频频与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相互攻伐，由于双方僵持胶着，于是以伊列河（今伊犁河）为界，双方分地而治，伊列水以西属乙毗咄陆可汗，以东属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乙毗咄陆可汗在逐渐坐大之后，开始和大唐发生严重摩擦，而也就在此时，麴文泰依附了乙毗咄陆可汗，他不仅仅阻遏了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大唐入贡，而且还发兵袭扰伊吾。伊吾的确曾臣服西突厥，可如今已经归附大唐，高昌联合西突厥一同讨伐伊吾，也就等于是攻击大唐，不过最让李世民恼火的是，麴文泰此后又与西突厥一同进攻焉耆，连占焉耆五座城池，掠走男女一千五百人，并烧毁所占之地的房舍后才退军离去。

焉耆第一时间上告大唐，但因为焉耆和高昌都是大唐帝国的附属国，考虑再三之后，李世民派使者前往调节，要求高昌把俘获的焉耆人放回去，麴文泰的立场却很强硬。使者问他为什么攻打焉耆，麴文泰的回答是：“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这个回答的意思是谁也管不着谁。当然了，麴文泰所做的还不止这些，这几年以来，不向大唐进献贡品，不行藩臣的礼节，而且所设官职称号均与大唐一样，此外还派使者对薛延陀说：“你既然身为可汗，就应与大唐天子平起平坐，为什么要拜他的使者呢？”这简直就是作死了……

这种情况，大唐不得不考虑战争了，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当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了，他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进行战争。薛延陀人首先表态，上书说：“我等禀受隆恩想要回报，请求征发我方军队为先导进攻高昌。”不过大唐政治中枢，却分为了旗帜不同的两派，彼此各执不同的观点。主战的一派认为，面对高昌人的无礼，大唐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西域的问题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必须要采取行动，而且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出兵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另一种观点则是反对用兵西域，理由很简单，那就是长途出兵，负担太重，为西域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不值得。当初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大宛，不就是一场灾难吗？



高昌国遗址

如果大唐此时出兵西域，那么也将要面临食粮、饮水等后勤问题，大军出师远征，显然困难重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士卒损耗必然巨大，还有就是出兵多少的问题，出兵少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被高昌和突厥人打败，出兵多了，则国家财政显然要承受很重的负担。考虑再三，李世民还是希望麹文泰能够悔过，于是下诏征召他入朝，然而这位高昌国王竟然称病不来长安，李世民恼怒之下，派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前往薛延陀，合谋共同出兵，同时积极准备西征。

其实，这场战争的关键是高昌后面的西突厥，大唐必须认真考虑的是能否坚决与西突厥开战，如果迎战，就必须做好西突厥参战的准备。此时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在西域已经渐渐坐大，对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的战争也取得连续胜利，以至于西域的多数国家都被他征服。大唐若想要平定高昌，势必全面与西突厥开战，所以，李世民知道此番出兵，大唐不战则已，战则必须保证完胜。对于高昌背后的西突厥，尤其不能心存侥幸。这样一来，出战的大军就更需要谨慎了。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四，诏令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

将军薛万均为副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步骑数万及突厥、铁勒之众征讨高昌。关于此次伐高昌的兵力目前仍存在争议，据《新唐书·高昌传》记载是“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似乎汉军并未参战，只有突厥和铁勒等蕃军数万前往。

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不大，唐军出征时，基本都是以汉军为中军，蕃军为前锋当炮灰，少有仅出蕃军的现象。这次西征，的确是有薛延陀人、阿史那社尔率领的突厥兵以及契苾何力统率的铁勒兵，但不会没有汉军。

在《册府元龟》卷一千中，对于出征大军的数量则记载为“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与《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中所述相似，认为汉军亦有参与，不过并未提及汉军数量，只是说汉、蕃军总共只有数万。而在《姜行本纪功碑》出土后，又给出了另一组数据：“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牛进达领兵十五万”……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蕃、汉军共三十万的兵力了。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此番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牛进达、薛万均等为副大总管，还有总管多名，那么参战的兵力应该不会少，毕竟大唐此次劳师动众，并不仅仅是为了攻灭小小高昌，高昌人口只有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人，很显然，其实高昌并不是唐军此番西征的主攻目标，此番大军出征肩负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寻机重创乙毗咄陆可汗，可是考虑到咄陆可汗实力颇强，几万唐军根本不足以与之交手，所以兵力应该不会只有数万，所以西征大军，保守估计应该至少在十五万至二十万之间。

直接统率大军的侯君集乃是李世民心腹，其本为豳州三水人，早年比较浮夸，弓箭都学不会，还号称自己勇武。后来加入秦王府，跟随当今皇帝南征北战，立下军功，逐渐被赏识，得以参与各项事务的谋划，特别是参与玄武门之变，使其在李世民即位后，被封为左卫将军、潞国公，赐邑千户，后又封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此公被迁为兵部尚书，开始参与朝政。侯君集虽出身行伍，没有读过什么书，但获得高官厚禄以后，却能够开始读书学习，参与官员的选拔，而且出为武将征伐，入为大夫参与朝政，倒也一时享有美誉。

除了大唐汉军和薛延陀人马外，由阿史那社尔以及契苾何力统率的北方游牧多民族部队，也是大唐武装序列中的重要力量。

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被任命为拓设，先是在碛北建起牙旗，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据说其施政十年，从不征收赋税。有人劝他收取厚赋以供自己享用，却被回答说："本部落丰盈我就满足了。"诸首领因此对他非常爱戴。颉利可汗多次对中原用兵时，社尔也都是前去劝阻，但他的劝阻未被采纳。武德九年，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反叛突厥，击败欲谷设。社尔奉命出兵救援欲谷设，却也被薛延陀击败。贞观二年，社尔率部西走，从而避免了所部在此后的大唐北伐之战中遭遇覆灭。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西突厥内乱，咄陆可汗兄弟争位。社尔出兵袭击西突厥，一度攻占了西突厥近半的土地，拥兵十余万，自立为都布可汗。颇为得意的社尔有些头脑发热，他对各部落道："最先背叛我突厥的是薛延陀，如今我占据西方，若不能灭亡薛延陀，就是忘掉了先可汗，是为不孝。"众首领劝谏道："我们刚刚占据西方，应当暂且稳住阵脚。如今远攻薛延陀，西突厥必然要来收取故地。"可是社尔不听，于是亲率五万骑兵征讨薛延陀，这个时候，西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已经继位并且平定内乱，而社尔的部下久罹战争之苦，加之与薛延陀的作战并不顺利，于是纷纷逃回西突厥。此时薛延陀趁机发起进攻，社尔战败，不得不败走高昌。

贞观九年，避居高昌的社尔因畏惧西突厥进逼，率部内附大唐。贞观十年，社尔入朝，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在灵州。不久，李世民又将皇妹衡阳长公主嫁给社尔，让他统领屯兵。此番皇帝以其为交河道行军总管，随侯君集平定高昌。

契苾何力，本是铁勒族契苾部人，为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莫贺咄特勒契苾葛之子。契苾何力九岁时父亲去世，便继任可汗之位。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铁勒势力逐渐强盛。贞观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契苾何力与母亲率领本部落前往沙州，归附大唐，李世民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之间，同时封任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并封其母为姑臧夫人，其弟契苾沙门为贺兰州都督。

贞观七年，契苾何力与凉州都督李大亮、薛万均等人跟随李靖征讨吐谷浑。赤水川之战，薛万均与其弟薛万彻率领轻骑兵先行，被敌包围，被吐谷浑军围困，二人的战马都被杀死，负枪伤步战，随从骑兵战死十之六七，契苾何力得知后，率数百骑兵前往救援，奋力死战，救出了薛万均和薛万彻。此后，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军，俘获其著名首领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大败吐谷浑军，李靖率领各路军马途经积石山河源，到达且末，直抵吐谷浑西部边境。听说吐谷浑可汗伏

允在突沦川，将要逃奔到于阗，契苾何力想要乘势追击，薛万均以先前的失败为教训，坚持说不行。

契苾何力说："吐谷浑不定居，没有城郭，随水草迁移流动，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一起时袭击他们，等到他们四处游荡，怎么能捣毁他们的巢穴呢？"于是亲自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直逼进突沦川，薛万均率部随后。沙漠中缺水，将士们抽饮马血。唐军攻破伏允的牙帐，杀掉几千名吐谷浑兵，获得牲畜二十多万，伏允只身脱逃，后为左右所杀。

可以说，此番征讨高昌，大唐除了调遣众多汉军府兵及蕃兵之外，也是名将纷纷出阵。不过麹文泰并没有紧张，他听说大唐已发兵前来讨伐时，居然对其臣僚说："大唐距离我们有七千里，其中二千里是沙漠地带，地无水草，寒风刮起来如同刀割一样，热风如同火烧一般，怎么能派大军呢？"当然，对于麹文泰而言，他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山，西突厥驻扎在可汗浮图城的大军，这支大军与高昌互为犄角，甚至可以说西突厥才是高昌最重要的砝码，是高昌抵抗大唐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实际的情况呢？乙毗咄陆可汗在发现大唐的大军西进之后，立即感觉到了大唐此战的目标其实是自己，于是在侯君集等人的大军到达之前，这位西突厥的可汗就提前跑了，一口气向西跑了一千里，而西突厥驻扎在可汗浮图城的大军也主动投降了。唐军在熟悉当地地形的契苾何力的引领下很快便穿过了大漠，眼看着大唐帝国的远征军已经越过大戈壁出现在伊吾，而西突厥人又不可靠，内心恐惧的麹文泰惶骇无计，这位西域名王每日紧张万分，以至于很快便在忧病交加中，未见唐兵，就把自己活活吓死了。其子智盛在这个时候只能即国王位，等待着来自大唐的最后一击。


高昌国遗址

其实贞观十四年，高昌国中就有童谣被人唱起："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事实上，面对大唐的兵锋，高昌军也的确无法抵抗，贞观十四年八月，大军行至柳谷时，斥候禀报说麹文泰近日即将安葬，高昌国内人士都聚集在葬地，众位将领请求袭击他们，侯君集说："不能这么做，大唐天子认为高昌怠慢无礼，所以派我们讨伐他们，如今要是在安葬墓地袭击他们，不是问罪的正义之师。"于是正面进攻高昌要塞田地城。此时高昌大兵会集于田地城，城坚墙厚，面对大军，高昌人起初还固城自守。然而西征大军自清晨展开攻城，至中午便破城而入，一战而俘获男女七千多口。在夺取了田地城之后，侯君集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直趋高昌城。见唐军先锋人数较少，麴智盛便率军迎战，可却被直逼其都城的辛獠儿所击败，不得不退保都城，随后，侯君集大军赶到，直抵其城下。

困守孤城的鞠智盛无奈，来信乞怜，表示"有罪于天子者乃先王，今已无罚丧身，我本无罪，望侯尚书哀怜"。侯君集则回书："如能悔过，应束手投降！"然而麴智盛不想就这么投降，于是侯君集命令兵卒填堑攻城，随后又造巢车，高十丈，可以俯瞰城内，这样一来，城内动静唐军也就了如指掌了，攻城数日，飞石如雨下，

城抛车砸出的石头让城内人无处躲避，麹智盛无计可施，只能开城投降。

随后侯君集继续分兵略地，占三郡、五县、二十二城得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人，马匹四千三百，占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此外，由于侯君集征讨高昌时，曾派人邀约焉耆与他们合围高昌，焉耆高兴，愿意听命。等到高昌亡国后，焉耆王到军营拜见侯君集，而且说焉耆三座城曾被高昌夺去，侯君集禀报朝廷后，将三座城连同高昌所掠的焉耆百姓如数归还。

听闻捷报，李世民随即将高昌所在地改置西州，同时改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并各设所辖县，此后又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当侯君集俘虏高昌王智盛及其贵族大臣还朝，大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此时帝国地域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达林邑，北抵大沙漠，均设立州县，总共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而且从而以后，帝国在西域拥有决定性地位。

不过，侯君集攻破高昌时，曾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而主将带头行恶，麾下将士自然是竞相仿效了，因此在占领高昌后，唐军争相劫掠，以至于高昌国中十室九空，一时间唐军恶名远播西域。朝中的御史言官们知道此情后，纷纷弹劾侯君集，李世民为维护唐廷声名，下诏将侯君集等人下狱待审。

而对于侯君集案，中书侍郎岑文本则上奏疏，认为："高昌王昏庸腐败，陛下命侯君集等人讨伐并攻克他们，没过十天，又一并宣付大理寺。即使君集等人自投罗网，也恐怕国内人怀疑陛下只知记录其过错而遗忘其功劳。我听说受命出师的将领，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能战胜敌人，即使贪婪也可赏赐；如果战败，即使清廉也要惩罚。所以汉代的李广利、陈汤，晋代的王浚，隋朝的韩擒虎，均身负罪过，君主以其有功于当朝，都给予封赏。由此看来，将帅等武臣，廉正谨慎的属少数，贪婪不检点的居多，所以黄石公《军势》中说：'用将士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勇武，用他们的贪婪，用他们的愚钝，故而有智慧的人乐于立功建业，勇武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急于得到他的利益，愚钝的人不考虑生死。'希望陛下能够记住他微小的功劳，忘记其大的过错，使侯君集能够重新升列朝班，再次供陛下驱使，即使不是清正的大臣，也算得到了贪婪愚钝的将领，这样，陛下虽然有亏于法律却使德政更加显明，君集等人虽然承蒙谅宥而其过失也更加明显了。"于是，李世民选择了开释自己的这位心腹。

但此事却在侯君集的心中埋下了一个钉子，他自以为立下大功却因为贪财而被囚禁，感到非常不快。

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命阎立本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比例皆真人大小，置于凌烟阁，是为《二十四功臣图》，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侯君集位列第十七名。然而不久之后，侯君集便因卷入了皇帝家事、储位之争，并最终参与了贞观十七年轰动一时的“太子谋反案”而被处死了。

7．储君之争

其实与父亲李渊晚年一样，李世民在贞观十四年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子之间相互争斗。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了嫡长子，根据史书的记载，因为这位皇子生于太极宫承乾殿，故取名李承乾，字高明。有人认为“承乾”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承乾，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李渊为这个皇孙亲赐。但这只是一个牵强附会的说法，毕竟那时候，李渊所认定的继承人并不是李承乾。

次年，尚在襁褓中的李承乾被封为恒山王，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李世民还是很重视的，他任命妻子长孙氏的族侄长孙家庆为李承乾的侍读。长孙家庆自幼聪颖，爱好儒学经典，也因此，李世民才会让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长孙家庆“奉教直中山府侍读文馆”。让三岁的儿子开始读书识字，在当时并不为什么新鲜事，但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自己这个儿子的重视，等武德七年李承乾五岁的时候，他又被徙封中山王，这个时候，李世民又让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时又将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玄武门之变后，年仅八岁的李承乾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在册封太子的诏书中称其“早闻睿哲，幼观诗、礼”，这样的话语，倒也不为过，毕竟他三岁就开始读书识字，后又师从诸多儒学大师，同时史书又记载李承乾“性聪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纯深”，因此李世民非常喜欢他，而李承乾作为大唐的皇太子，最初也还是不错的，譬如贞观三年，太子太师李纲因为脚疾只能乘着轿子进宫，于是李承乾亲自将自己的老师引上殿并恭恭敬敬地行礼，又向其虚心请教，态度极为礼敬。李纲病逝后，李承乾又亲自为老师立碑。

贞观四年五月，李世民下诏令李承乾“宜令听讼”，还说“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于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虽然只是“听讼”，仍可见太宗皇帝已经在有意识地锻炼李承乾身为储君的政治能力了，而这时候的李承乾不过十二岁。

贞观五年，李承乾原本定于二月行冠礼，不过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将冠礼改在了十月。同年，李承乾生病，而从来不信佛也不信道的李世民却请了道士秦英来为儿子祈福；等李承乾病愈后，李世民又召度三千人出家，并特地修建了西华观和

普光寺，还将狱中的囚犯减免了罪行，以此为儿子祈福。

贞观七年，李承乾再次生病，李世民下旨请天竺高僧波颇为太子祈福。李承乾病愈后，李世民大喜之下赐了绫帛等六十段与及时服十具给波颇。同时也因为李承乾多病，李世民为了不让他太辛苦，特别准许他不用多读书，只要和孔颖达评说古事即可。不过李承乾并没有借机放纵自己，反而更加展示出了经国安邦的卓越才能，有一次李世民让他试着写一写治国的策略，太子洋洋洒洒，一挥而就，据史料记载，李世民看了后非常得意地向侍臣们炫耀说："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也。"

贞观八年二月乙巳，太子李承乾加元服，李世民因此大赦死罪以下，赐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天下大酺三日，又大宴群臣，赐帛各有差。贞观九年正月甲申，李承乾娶秘书丞苏亶长女苏氏为太子妃，李世民为此大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五月庚子，唐高祖李渊病逝，居丧期间，李世民下诏令太子监国权知军国大事，而李承乾"颇识大体"、"颇能听断"，干得相当出色。六月己丑，朝臣恳请李世民上朝听政，李世民虽然应允，不过"细务仍委太子"，之后李世民每每外出巡幸时，都是由太子留京监国。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渐渐病重，李承乾忧心之下便请求大赦囚徒并度人入道，以期冀蒙福佑，却被长孙皇后断然拒绝。李承乾于是不敢将请求大赦一事上奏，只告诉了自己的太子詹事房玄龄，朝臣闻之纷纷恳请大赦，虽然长孙皇后最终还是拒绝了大赦一事。但李世民却另辟蹊径，下令重修了三百九十多座废弃寺庙以此为爱妻祈福。然而如此感人肺腑的夫妻之情、母子之情，却终究还是没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皇后的生命。六月己卯，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不久之后的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李承乾的嫡长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李世民这才略微缓解了丧妻之痛，诏令天下见禁囚徒都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又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崇文馆，为专为太子李承乾所设置的学馆。不过这时候的李承乾随着年岁既增再加上患了足疾，开始变得叛逆起来，于是李世民"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先后挑选了十余位老臣、名臣出任东宫辅臣，与太子谈论。然而，这些天子重臣们的劝谏却显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效果，于是李世民越来越对太子不放心了，这个时候，他的宠溺也开始逐渐转向魏王李泰。

李泰，字惠褒，小字青雀，武德三年出生，为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次子，史载

因“文德皇后所生”，且“聪敏绝伦”，故而“特所宠异”。他一出生就被自己的祖父高祖皇帝册封为宜都王，次年三月，又进封卫王，并被授予上柱国。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以继李元霸之后，可以说这是对李世民、李泰父子莫大的恩宠。

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改封越王，并受封为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督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军事扬州刺史，又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封地多达二十二州，至于同时受封的皇子李恪，封地只有八州。

贞观五年，李泰在遥领扬州大都督的同时，又兼领了左武侯大将军一职。贞观六年，李泰又受封鄜州大都督兼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余官如故。贞观八年，兼领左武侯大将军的同时，又被授予了雍州牧之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雍州即指京兆府，也就是大唐王都所辖之地，自此李泰又兼任了掌管西京长安的最高长官。

贞观十年，李泰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督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军事，余官如故。然而李世民不仅舍不得爱子离开自己去封地，甚至还一度下诏想让心爱的儿子搬进武德殿居住。但武德殿是极为靠近东宫的宫室，当年的李元吉就是住在武德殿与李建成互通有无的，正是如此，魏徵才会极力谏止此事了。

根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对李泰百般宠爱，经常带着他四处游幸，甚至不过短短一日见不到他，也要派自己养的一只名为“将军”的白鹘去送信，一日之内鸿雁往返数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泰“腰腹洪大”，不过李世民见到爱子如此圆滚滚的模样，担心的却不是太胖会影响身材，而是觉得儿子这样上朝参拜的时候一定会很辛苦，心疼之下特别准许他乘着小轿子到朝所，真是前所未闻。李世民还在东都洛阳“并坊地”以赐魏王大宅，而且合并坊地后李泰的大宅还占了“东西尽一坊”之地，另有“潴沼三百亩”，李泰于此处为池，池与洛河之间修建的堤岸，正是日后堪称“都城之盛”的魏王池与魏王堤二景。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亲临李泰在延康坊的府邸，并因此特别赦免了雍州及长安死罪以下的罪犯，又免去了延康坊的百姓一年的租赋，还给了魏王府的官员以及同住一坊的老人很多赏赐。其实在李泰还没有正式搬进来入府邸前，便因为盛修府邸一事而被岑文本进谏，但李世民照旧是对岑文本的上疏夸奖赏赐了一番，却唯独不

见对李泰的行为有任何的不乐意与制止。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将大名鼎鼎“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的芙蓉园赐给了宝贝儿子。

按照史家所言，有一次，李世民听说朝中那些三品以上的大臣如魏徵、房玄龄之流对李泰不够尊重，居然雷霆震怒之下，将魏、房等人尽皆召进宫来严词质问一番，以至于房玄龄等人被吓得不敢说话，唯有魏徵据理力争，最后才使得李世民承认自己的确因私爱而忘公了。

就连李泰的长子李欣，也因为父亲的原因“特为太宗所爱”，四岁的时候便被接进了宫中抚养。而李欣也自幼聪慧，乖巧伶俐，长孙皇后曾问他刚来这里住的可还习惯，他立马拱着一双小手说道：“孙儿有幸住在皇宫里，已经很开心了。”长孙皇后听了既惊讶又高兴，不仅亲自为他取名为“欣”，还把这个孙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育。李欣也因此得以常常和年岁相仿的小叔叔李治一同玩耍，叔侄二人感情非同一般，所以李欣作为濮王的长子，直到弱冠之年才离开京城去了自己的封地。李世民对李泰这种种逾越礼制的宠爱，就连史官都不得不感慨道：“其宠异如此。”

而对李泰宠爱自然也就对太子有所偏颇了，贞观十四年，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上疏称太子生活过于奢华，引来太子被训斥，后又因为李承乾和宦官玩乐，于志宁又上疏，甚至将太子比作秦二世。而身为太子右庶子孔颖达则更是言辞激烈，每每当面指责李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对此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劝说过孔颖达，认为太子年龄既长，不宜总是当面痛加批评指责，可孔颖达却表示我这样犯颜直谏是“死无所恨”，结果是“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



魏徵

太子李承乾曾宠幸一名“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人，并称他为称心。李世民

闻之大怒，将称心杀死。李承乾非常伤心，在宫中为自己死去的男宠立室，让宫人日夜祭奠，并在宫中为称心树冢立碑，赠予官职，还经常为称心哭泣流泪。李世民对此更为不满，从此之后，太子李承乾与李世民之间的父子隔阂更深了。

不过客观上来说，就算李承乾这样胡闹，李世民也不曾动过废太子的念头，甚至煞费苦心地将魏徵任命为太子太师，此举的目的意在告诉众人，他是绝不会废掉李承乾这个太子的。可人活着，宗室总会有对比的，贞观十五年，由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完稿，史料记载，此书全书按贞观十道排比三百五十八州，再以州来分述辖境各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征引广博，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对此，李世民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不仅将这部著作收藏进了皇家的藏书阁秘府中，还接二连三地大肆赏赐李泰，先是赐"物万段"，紧接着又每月赏赐大量的财物，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惹得褚遂良不得不上疏劝谏，于是李世民干脆下诏取消了太子出用库物的限制。李承乾上表推辞，李世民答道："汝家之冢嫡，国之储两，故有斯命，以彰有殊。……勉思守道，无烦致谢。"而之所以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显然是为了变相地维持李泰逾制的花销。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重，李世民亲自带着太子与衡山公主到魏徵的府邸探望。三月，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称："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李世民则答道：我知道爱卿你的意思，我的儿子虽患脚疾，可依然是嫡长子，我怎能舍弃嫡子而立庶子呢？

李世民并无易储的想法，然而李承乾却因为忌惮同样深得父亲宠爱且怀有谋嫡之心的胞弟李泰，遂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按照史家的说法，是杜荷与李元昌、赵节、李安俨建议太子李承乾实施谋逆的。杜荷对太子说"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是可以得志"，于是太子以为然。只不过，虽然一众人紧锣密鼓地策划谋逆，可还未起事，事情就败露了。

事情败露的原因居然是因为齐王李祐。李祐为李世民第五子，母阴妃，李祐的外祖父阴世师，隋末与代王杨侑留守长安。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幼子李智云被阴世师所杀，年仅十四岁，阴世师、骨仪又让京兆郡访李渊家族的五庙墓葬所在并发掘；李渊入长安后，亦以阴世师、骨仪等拒义兵为由将其杀害，故阴氏与李唐可谓国仇家恨。

李祐正是出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具体的出生年月史书无载，墓志所载享年业已失考。武德八年，李渊诏封其为宜阳郡王，虚封食邑四千户。李世民登基之后，改封李祐为楚王，后又封燕王，并拜为同州刺史。不久，改任都督幽、易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但是，无论是同州刺史还是幽州都督，李祐都没有去藩地。在此后直至贞观十年的八年时间里，又多次担任幽州都督。贞观十年正月，改封齐王，拜为都督齐、青、莱、密等五州诸军事、齐州刺史，但因为生病滞留长安，一直到贞观十五年，才前往齐州封地。

李祐在京养病时，他的舅舅阴弘智以李世民多子为由，劝他招募壮士以自卫，并推荐自己妻子的哥哥燕弘信谒见李祐。李祐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赐给他许多金钱布帛，让他招募死士。李祐喜好游猎，结交奸邪之人。李世民认为长史薛大鼎对其管教无方，而将其免职。权万纪曾经是吴王李恪的长史，为人正直，被李世民任命为李祐的长史。

李世民担心李祐不思悔改，多次写信责备他。权万纪担心一并获罪，就对李祐说："大王是皇帝的爱子，陛下希望大王悔改，所以训诫教导。如果大王能约束自己，承认错误，请让我入朝为大王请说。"李祐于是附表谢罪。权万纪入朝，表示李祐一定会悔改，李世民这才消除了怒意，并赏赐了权万纪以致谢，但是仍然以李祐以前的过错，下诏书责备他。李祐听说权万纪得到了赏赐但是自己却受到责备，以为权万纪出卖自己，心中愤愤不平，大怒道："长史出卖我！劝我却自以此为功劳，我一定会杀了他。"遂射杀了权万纪，并将其肢解，事已至此，其心腹纷纷劝他起兵谋反。

贞观十七年三月，李祐征发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私自任命自己的左右为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职，开府库以行赏，并驱赶百姓入城为兵，布置官署，并封亲信为拓西王、拓东王等。李世民于是诏兵部尚书李世勣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府兵，与刘德威讨伐平叛。然而李世勣等人率兵尚未到达齐州，叛乱就被齐州兵曹杜行敏所平定，此后，李祐被押送至长安，同党四十余人一并被诛杀，其余人等既往不咎。

贞观十七年四月六日，李祐以"谋反罪"被贬为庶人，赐死于长安太极宫内省，同年十月十五日以国公之礼安葬于长安高阳原。然而，历史的玩笑在于，李祐谋反直至被擒赐死，虽然失败，却也间接导致太子李承乾谋反计划被发现。当时太子暗中豢养刺客纥干承基等人及一百多名壮士，想要杀掉魏王李泰。太子听说齐王李祐

在齐州谋反，还对纥干承基说什么：“东宫西墙，距大内正好二十步左右，谋划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李祐谋反的事，牵连到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因此被关押在大理寺的狱中，按罪当处死。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一，纥干承基上书告发太子谋反。李世民心痛无奈之下，只得将其幽禁别室。

李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李世民感到失望，但李世民终究还是不忍诛杀他，于是将难题踢给了朝中众臣，询问众人该怎么处置李承乾。此时魏徵已死，朝中再无那种梗着脖子谏言之人，以至于面对李世民的问题，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那就是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须商讨，按照大唐律法，谋反当诛。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即为善矣。”

于是李世民下《废皇太子承乾为庶人诏》，将李承乾废为庶人，随后李世民亲谒太庙，以谢李承乾之过。九月癸未，李承乾被流放黔州。贞观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李承乾卒于黔州，李世民闻讯后，大为悲伤，史载“为之废朝，并葬之以国公礼”。

至于侯君集是怎么被卷入到此案中的，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贺兰楚石官居东宫千牛。当初李承乾知道侯君集因为其征高昌后被下狱之事有积怨，便让贺兰楚石带侯君集到东宫，向他询问自我保全的策略，而侯君集以为太子愚昧，可以利用，于是就劝太子谋反。而后李承乾事情败露被废，贺兰楚石又至宫阙告发侯君集与李承乾一起谋划之事，李世民于是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吏羞辱你，所以便亲自审问你。”起初侯君集并不认罪。李世民便招来贺兰楚石，使之详细陈述始末原委，又拿出与李承乾来往的书信启给他看，侯君集理屈词穷，只得服罪。

最初李世民觉得侯君集有安定国家的大功，不想治其死罪，但群臣进谏说侯君集的罪天地难容，于是李世民最终决定赐令自尽。史载侯君集临刑前，对监刑的将军说：“君集我一时失足走到了这一步！然而当年在秦王府时即侍奉陛下，又有攻取吐谷浑、高昌二国的功绩，请求保全我一个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祭祀烟火。”李世民便宽宥了他的妻子和子女，将他们迁徙到岭南。

太子李承乾被废后，最初李世民有意立李泰为太子，甚至已经当李泰面许诺了，李泰也表态，自己将来身后将杀掉自己的儿子，传位胞弟晋王李治。李世民很感动，但谏议大夫褚遂良却指出李泰此言有悖常理，说：“过分宠爱李泰是造成李承

乾之祸的根源，要立魏王，就先把晋王处置了吧。”而李世民却不忍处置晋王，此外长孙无忌等人也支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晋王李治为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长孙氏皇后，是嫡三子，贞观五年，封为晋王。贞观七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著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李世民问道：“这部《孝经》说的什么最重要？”对答道：“孝，开始是事奉双亲，长大后是事奉君王，最终是修身。君子事奉皇上，进朝廷想着尽忠，退居在家想到弥补皇上的过错，将顺从其美，纠正其恶。”李世民大喜道：“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等到长孙皇后去世，李治时年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左右的人，李世民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侯大将军。

皇太子李承乾被废弃，魏王李泰也因犯罪被贬，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等人计议，立李治为皇太子。史载李世民以“泰（李泰）立，承乾（李承乾）、晋王（李治）皆不存，晋王（李治）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之理由立李治为皇太子。很显然，李世民之所以最终会立年幼却性格温和的李治为太子，目的就是要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不过太子易立，如何处置李泰这个自己曾经万般溺爱的儿子，李世民是操碎了心。最后，李世民不得不在废黜李泰的诏书中沉痛地说道：“魏王李泰，是我极为心爱的儿子，我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此子年幼的时候就很聪敏伶俐，又十分爱好文学，我对他的宠爱是那么的不同寻常……然而我不能让后世子孙认为皇位是可以通过谋划得到的，所以将魏王李泰降为东莱郡王。”

不久之后，李世民怀疑晋王李治仁弱，便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稚奴为太子，稚奴懦弱，恐怕不能守住国家，怎么办？吴王李恪英武果敢很像我，我想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坚持抗争，认为不可以。李世民说：“你是因为吴王不是你的外甥，所以才反对吗？”长孙无忌说：“太子仁慈厚道，是可以守成的君主；太子的位置这么重要，怎么能随便改变？希望陛下深思熟虑。”李世民这才打消了念头。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为布衣之交，又是皇后胞兄，因此李世民视为心腹，让他自由出入皇宫内室，对他的待遇群臣无人堪比。几度想要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却遭到长孙皇后的反对。她觉得自己身为皇后，家族的贵宠已极，不愿意家族子弟遍布朝廷，于是再三阻挠丈夫授予哥哥大权，之所以如此，长孙皇后是对外戚之事一直

以前代为鉴，临终前仍然不忘嘱托丈夫不要给予她的家族太多。她认为自己的家族有幸结为皇室姻亲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但他们并非都是才德出众之人，如果身居高位，很容易遇到危险，想要长久无忧，就不能让他们担任要职，只需要以外戚的身份觐见，就已经是极大的幸事了。长孙皇后对于家族的看法再联系日后之事，足见她非凡的远见和智慧。

李世民曾得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他把密表给无忌看，道：“你我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可猜疑的。如果我们都把听到的话放在心里不说，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不能得到沟通。”李世民还召集群臣，当众训诫道：“如今我的儿子年纪都很小，无忌为我立过大功，我信任他，就跟信任我的孩子一样。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密的，新朋友离间老朋友，这都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挑拨离间的话，我一律不听。”

后来李世民病重时，将长孙无忌召到含风殿，用手抚摸他的面颊。长孙无忌悲不自胜，痛哭不止。李世民把后事托付给他和褚遂良，又对褚遂良道：“无忌对我竭尽忠诚，我能拥有大唐江山，多亏他的帮助。我死了之后，你要保护好无忌，不要让小人进谗挑拨离间。”不久，太宗李世民病逝于行宫翠微宫，遗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

太子李治悲痛欲绝，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痛哭。长孙无忌请李治处理政事以安内外，李治仍哀哭不止。无忌道：“陛下将宗庙社稷交付殿下，您怎能只知哭泣？”他秘不发丧，并让李治迅速赶回长安。六月，太子李治继位，是为高宗皇帝。长孙无忌进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兼任扬州都督，主持朝政。当时，长孙无忌以元舅的身份辅政，每有进言，李治都优先采纳，曾有洛阳百姓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立即下令将其处斩。

永徽五年（654），李治欲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他担心大臣不从，便与武则天到长孙无忌家中饮宴，赏赐金宝缯锦十车，又任命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以皇后无子来暗示无忌。长孙无忌却假装不明白李治的意思，顾左右而言他，李治怏怏而归。后来，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多次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加以劝说，但都被长孙无忌正色拒绝。

次年李治决定废后，召长孙无忌、李世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商议。李世勣称病未去，于志宁噤不敢言，褚遂良则激烈反对。长孙无忌虽未明言反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褚遂良。但李治最终还是将王皇后废为庶人，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因长孙无忌接受赏赐却不肯支持自己，对他怀恨在心。

显庆四年（659），许敬宗指使人向李治呈奏密章，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造反，李治便命许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一同审查。许敬宗奏道：“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我担心他知道事情暴露，会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同党，必成大患。希望陛下能果断处理，尽快拘捕。”李治再一次落眼泪了，他道：“我怎忍心给舅舅判罪，后代史官会怎么看待我？”就和当初众人劝他杀吴王李恪那样，李治的眼泪并没有什么作用，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李治，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于是李治也不与长孙无忌对质，便下诏削去他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并让沿途州府发兵护送。长孙无忌的儿子都被罢官除名，流放岭南。同年七月，李治又让李世勣、许敬宗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到黔州审讯无忌谋反罪状。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8．百战金甲

不过，对于高宗皇帝来说，贯穿他三十余年在位期的最大麻烦并不是宗室斗争，也不是什么谋反冤案，甚至不是武后专权，而是西突厥的问题。

当初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牙于睢合水北，称南庭，其辖境东以伊列河为界，龟兹、都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等皆受其节度。他屡次向唐遣使朝贡，而大唐也对他颇为不错，在贞观十五年秋七月，李世民还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往授玺书，册立他为可汗，并赐给鼓纛。而乙毗咄陆可汗欲谷设，则是建牙镞曷山西，称北庭，其辖境西以伊列河为界，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触木昆等部附属于他。由于乙毗咄陆可汗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之间互相攻战，所以搞得突厥内乱不已。

当初大唐征讨高昌时，乙毗咄陆可汗避战而逃，不与唐军交手，却集中全部力量攻击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双方连年大战，到了贞观十四年时，其实已经是渐渐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为了给沙钵罗叶护以支持，李世民才遣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去西域授玺书，正式册立其为可汗，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支持姿态。然而册封仅几个月后，兵力渐强的乙毗咄陆可汗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斩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兼并其部众，西突厥旷日持久的内乱结束，完成了一统，自此“西域诸国多附之”，西突厥的国力开始恢复。之后乙毗咄陆可汗又乘胜西征，攻打西域所有不肯臣服的藩国和部落，直至攻克西陲的大国、附唐的吐火罗方才罢兵。

不得不说，因为大唐当初押错了宝，“得罪”了作为胜利者的乙毗咄陆可汗，也因此一统后的西突厥汗国开始与唐交恶，而西域诸国与唐的联系也自此被西突厥所阻断，不过大唐就是大唐，乙毗咄陆深恨之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他最多也就是为害西域罢了，然而自恃强大的咄陆可汗在贞观十六年却做了一件蠢事，他扣留了大唐使者，继而对伊州发起了进攻。



唐初名臣长孙无忌

乙毗咄陆可汗之所以这个时候胆敢和大唐翻脸，是因为他觉得大唐正为北面的薛延陀而头疼。贞观十三年，为了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集中精力对付高昌，加之贞观十三年四月发生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集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侵袭李世民御营的事情，所以李世民将突厥人全部遣返河北，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同时封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泌可汗，赐姓李氏，并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建牙于定襄城。当时随思摩渡河者有帐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李世民诏赐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的整个漠南塞外地区，然而此举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听说李世民将要东去封禅，便借口李思摩

部数次窃取薛延陀的羊马，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部兵，共二十万人进攻漠南突厥，思摩按照事先的安排，诱敌深入，前后辄退，弃白道川，退守朔州，同时派使向大唐告急。这种情况下，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六万、骑一千二屯朔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四万、骑四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配合营州都督张俭率兵策应。

贞观十五年，唐军实施反击，当初大度设率三万精兵追至长城，现在却只能从青山往北而逃，李世勣轻骑直趋白道，在诺真水追及大度设，斩杀三千人，俘虏五万多人，大度设逃回漠北的余部又遇大雪，人畜被冻死十分之八九，大度设仅以身免……

这种情况下，乙毗咄陆可汗进攻伊州本以为大唐没有力量来应对，谁知道却惹来了大麻烦。咄陆可汗自恃兵力强盛，转向东征，与大唐开战，试图击退大唐。对西域这个西突厥传统地盘的蚕食本就不明智，而此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帐下已经暗流涌动，当初西突厥兵在进攻西域时大肆劫掠，而咄陆可汗为聚拢人心，便出面维护军纪，“其部下骁将泥孰啜自擅取物而斩之以徇”，而西突厥又分为左、右两厢，泥孰啜是左厢举足轻重的大将，擅杀自然激发了左厢诸部的不满，于是“众皆愤怨”。其实这事情本来不大，泥熟啜擅取俘虏与获物，被乙毗咄陆处死也不算冤枉，然而乙毗咄陆在攻破粟特人建立的米国后，自身就夺取了大量人口与财富，却不分给部下，自然引起部众怨恨了。

可以说，此时西突厥内部已然离心，部属各怀异志，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咄陆可汗仍未意识到危险，反倒去和大唐开战，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了。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以郭孝恪出任凉州都督、安西都护、西州刺史。西州就是高昌国旧都，属于镇兵与流放的犯人杂居，与中原又有大漠相隔，因此和朝廷音讯隔绝。以郭孝恪镇守此处，显然是李世民的有意安排。

郭孝恪生性奢侈，仆妾器玩，都极尽鲜华，尽管在军中，床帷器物也多用金玉装饰，有一次，郭孝恪把这些东西送给阿史那社尔，社尔拒不接受。李世民闻听后，道：“二将的优劣，由此事便可看出，不用询问别人了。”可这不妨碍太宗对他的信任。

当乙毗咄陆可汗杀死沙钵罗叶护，袭灭吐火罗，又扣押大唐使者，侵扰西域诸国时，郭孝恪迅速做好了讨伐准备，当乙毗咄陆可汗进犯伊州的时候，郭孝恪当机

立断，率二千轻骑自乌骨出击，而此时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诸部围攻天山县，本就分兵，结果为郭孝恪所败，随后郭孝恪乘胜进占处月俟斤所居之城，并一直追至遏索山，收降处密兵众……

一连几场小规模冲突都吃了亏，先是被郭孝恪引两千兵马击败于伊州，之后又在遏索山被斩首千余，咄陆怎么可能不“闻讯大怒”？可当他正欲整肃兵马，以主力与大唐决战，内乱却突然爆发，泥孰啜部将胡禄屋突然联合左厢诸部叛反，“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由于欲谷设当年就是被左厢诸部拥上汗位地，因此左厢诸部是其统治的根基，此刻左厢叛离，咄陆可汗再有本事也无从施展，众叛亲离之下，其统治迅速崩塌，不得已之下，他只能退守白水胡城。

在咄陆可汗逃亡之后，西突厥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五弩失毕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商议之后，派使者请求大唐废黜乙毗咄陆，另立西突厥可汗。李世民遂遣使册立前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将原被乙毗咄陆扣留的大唐使者全部礼送回长安，而乙毗咄陆其间虽然派人招引他原来的部落，部落中的人却都说“即使我们一千个人都战死，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会跟从你”，眼看着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乙毗咄陆只能被迫弃国逃往石国，此时他已经是“左右亡去略尽”。

就这样，此次西突厥的东征因内乱戛然而止，其间并未与大唐爆发大战，只是前锋试探性地与唐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之后便不战而败。据几家唐史记载：“唐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为部下所废。”“众多亡逸，其国大乱。”“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均明确指出咄陆可汗是在被部下所废后才逃往石国地，其统治崩解是缘于杀泥孰啜激发的内乱，而非因被唐军击败才导致政权崩塌，而郭孝恪麾下的那些兵力也绝不可能击败西突厥的主力。不过，这是这些小冲突成为了导致咄陆可汗的统治崩塌、西突厥汗国内乱崩解的导火索。

贞观二十年六月，乙毗射匮可汗遣使朝贡，可以说，从乙毗射匮可汗被大唐册封的那天起，西突厥就再次沦为大唐的藩属。然而，乙毗射匮可汗资历微浅，威望和凝聚力十分有限，又是大唐册封的傀儡，不为众人所喜，因此根本无法服众，基本无法调动指挥西突厥各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空头可汗。大部分西突厥的部族不甘做大唐的附庸，纷纷自立为王，伺机而动。而此时的西突厥其实已经是隐患重重，看似只有一个可汗，实则已沦为一个内部分裂为数支势力，彼此戒备敌视，内乱一触即发的部落联盟。而这种乱局正为大唐所乐见，大唐趁机推波助澜，对诸部

分化瓦解，军事和外交并举，不少部族为求自保而降唐。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大唐逐步侵吞了天山南路地区，势力扩张到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地区。

这段时间内，西突厥汗国几乎没有办法对大唐形成威胁，由于内部分裂，不断内讧，而逐渐走向衰亡。此时，阿史那贺鲁站了出来，他为室点密可汗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匮特勤劫越之子。阿史那步真归附大唐后，乙毗咄陆可汗让贺鲁替代步真担任叶护，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北一千五百里，统辖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等部。

其后，西突厥部众谋废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可汗兵败逃奔吐火罗，大唐册立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派兵追逐贺鲁，贺鲁没有固定的居处，其所部也都散处。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族人认为贺鲁无罪，前往要求乙毗射匮可汗不要攻击他。乙毗射匮可汗怒，要诛杀执舍地等人。这种情况下，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贺鲁率领余部数千帐及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族人内属于唐。李世民对他们抚慰厚待，安排他们住在庭州莫贺城，授予他左骁卫将军之职。

后来，贺鲁听说大唐将讨伐龟兹，于是率随从数十人至长安朝觐，要求担任大军的向导。李世民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在嘉寿殿设宴款待，给予很多赏赐，并且还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他身上，并赏赐给他。大唐大将阿史那社尔平龟兹以后，大唐晋封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给他鼓纛，派他去招抚尚未服从的其他西突厥部落。当大唐在安西部护府下设置瑶池都督府，阿史那贺鲁又被任命为都督。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逝世以后，阿史那贺鲁便琢磨着叛变，这年夏六月李治继位后，贺鲁又被晋升为左骁卫大将军，但他此时已经不满足了。长期以来西突厥在表面上重新对唐称藩，但大唐对其大部分部族并不能实际控制，突厥对西域仍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贞观二十三年（649）时，西突厥国中山头林立，形势更加混乱。而西突厥的乱局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乙毗射匮可汗自身威信不足之外，也与唐廷大肆分封西突厥贵族，不断进行分化挑拨，阻挠其凝聚一统，有意令乙毗射匮可汗无法建立起牢固的中央权威有关。

贺鲁则趁着这一局面混乱之机，秘密招集离散的西突厥部落，其所属庐帐也越来越多，势力逐渐强大。虽然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左骁卫大将军，但名义上受乙毗射匮可汗统辖，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众多被分封者中的寻常一员，毫不出众，然而谁也看不出此人的雄才大略，他认为李世民驾崩是个很好的机会，便阴谋

夺取西州和庭州。

刺史骆弘义将情况上报之后，李治立即派通事舍人乔宝明前往抚慰，并让贺鲁派儿子咥运入朝宿卫。虽然李治任命咥运为右骁卫中郎将，咥运回到突厥后，竟劝说其父率部反唐西走，攻取乙毗咄陆可汗的旧地。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击破了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部众，随即建牙廷在千泉、牙帐干双河，自称沙钵罗可汗。

当初咄陆有五啜，也就是处木昆律啜、胡禄阙啜、摄舍提暾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而弩失毕有五俟斤：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舍处半俟斤。胡禄阙啜是贺鲁的女婿，其中阿悉结阙俟斤最强盛，拥有几十万精兵。由于贺鲁能力出众，加上西域众部落均思联盟抗唐，因此沙钵罗可汗很快就控制住了统摄咄陆、弩失毕等十姓部落和西域各国，在西域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基本上结束了西突厥的内乱。不过西突厥毕竟历经多年内耗，虽然重新一统，但元气已然大伤，远不及分裂前统叶护可汗时代那般煌盛。

西突厥重归一统后，又开始与唐帝国发生边境摩擦。永徽二年七月，贺鲁率部攻掠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掠数千人。李治于是诏令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卫将军萨孤吴仁为副总管，发诸府兵三万人和回纥骑兵五万，实施西征。

骆弘义献计："安抚中国要用信，驭使夷狄则要用权。贺鲁坚守一城，此刻正严寒大雪，他们一定以为唐军不会来，我们应乘此一举歼灭。如果迁延到春天，将会有变，即令他不联合其他各国，也会逃往远处。况且我发兵是为了诛灭贺鲁，处密、处木昆等部也各愿自保。如果现在不打，他们将会与贺鲁联手。虽然现在天寒地冻，会有冻伤，又不能久留耗费边粮，让贼人乘虚牢结党羽苟延残喘。建议宽恕处月、处密等部，专诛灭贺鲁。除祸要除根，不可先斫枝叶。请调发射脾、处月、处密、契苾等部之兵，带足一个月粮草，急速进军攻打贺鲁，我大军则据凭洛水上为之援救响应，这是驱戎狄攻豺狼。况且戎人借唐兵为羽翼，使胡骑在前，唐兵断后，贺鲁就无处可逃。"李治同意了他的办法，诏令骆弘义帮助梁建方策划指挥。

永徽三年春正月，梁建方等大破贺鲁所部处月而还。次年，西突厥内乱又起，由于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颉苾达度设称真珠叶护，招聚亲近部落，并联合五弩失毕，击败贺鲁，大唐见有机可乘，于是撤销瑶池都督府，就处月之地设置金满州，同时派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诸将进讨贺鲁，并诏令丰州

都督元礼臣持节前往册封真珠叶护为可汗，但至碎叶城被贺鲁派兵所阻，未能抵达。

不过，程知节的大军可不是贺鲁所能够阻挡的。大唐兵锋所向，先是在榆慕谷大败葛逻禄及处月，斩杀千人，缴获战马万匹。随后副总管周智度进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攻下咽城，斩首三万级。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两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两万骑余骑继至。面对强敌，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精骑冲乱其阵脚，西突厥大败。唐军追击二十余里，斩俘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军资、马匹漫山遍野，不计其数。此时本应乘胜追击，但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战功，对程知节说："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假传旨意，说程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程知节遂停止了追击，未能取得更大战果。

唐军由于连日征战，士卒终日跨马披甲结阵，不胜疲顿，战马也多瘦死，军无斗志。苏定方对程知节说："本来讨贼，今乃自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絷文度，飞表奏之。"但程知节没有听从。唐军进抵怛笃城，数千胡人归附。王文度认为："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　　。"但苏定方反对道："如此，自作贼耳，何成伐叛？"可是程知节受王文度的蛊惑，不顾苏定方的反对，下令屠城，抢掠城中的财物而去。

此时的突厥几乎没有能力与大唐为敌，由于历经多年内乱，权力屡遭暴力更迭，西突厥王庭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而缺乏一个法统上能够服众的可汗，更是令其统治根基摇撼不稳，加上多年内战导致国中各部相互结下血仇，矛盾深重，难以调和……阿史那贺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无法力挽狂澜，阻挡帝国崩解的潮流。随着大唐不断对诸部族挑唆分化，还大力支持真珠叶护等反叛势力，阿史那贺鲁焦头烂额，统治渐渐难以为继。

到了显庆二年（657）的时候，西突厥的内乱进一步加剧，贺鲁在和大唐敌对的同时，内部已然四面楚歌，人心离散。李治见良机已现，便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首领婆闰等，大军西出，对突厥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同时诏令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头出金山道，招集

其旧部。此次唐军与真珠可汗联军，又与反贺鲁的其他各部族结盟，共同夹击贺鲁，力量是极为可怕的。

是年冬十二月，苏定方军抵达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击败五咄陆之一处木昆部。该部俟斤嫩独禄等一万余帐来降。由于在这以前，五弩失毕之一泥孰部不服从贺鲁的统治，被贺鲁攻破，其首领的家属被俘。这时，唐军从贺鲁的一部分败兵中找到泥孰部首领的妻子。右领军郎将薛仁贵建议，应该将这些家属归还泥孰部，并且赠予财物加以抚慰，使他们明白“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这样的话，他们必将不遗余力地反对贺鲁。唐军按此实行。泥孰部接到获救的家属后非常感激，要求跟随唐军一起进攻贺鲁，随后苏定方率领精骑到曳咥河西，打败处木昆。

眼看着苏定方率军至曳咥河西，贺鲁举西突厥十姓十万骑前来拒战，苏定方以唐及回纥万余骑兵迎敌。贺鲁见唐军少，进兵包围，苏定方命步兵据守南面的高地，持长矛向外，自己领骑兵列阵于北坡。贺鲁的骑兵三次冲击唐军，未能动摇唐军阵脚。

冲击南原的唐军，三战三败，突厥人自然是士气低落了，苏定方乘其空虚，纵骑兵出击，贺鲁大败。唐军追奔几十里，杀死、俘虏三万人，获杀大酋都搭达干第二百人。次日唐军继续追击，五弩失毕都投降。五咄陆听说贺鲁兵败，都奔南道归附唐安抚大使阿史那步真。大胜之下，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前往邪罗斯川追击贺鲁，任雅相则带降兵随后。正遇天降大雪，诸将纷纷请求待雪停天晴后再行进兵，苏定方认为正可趁天雪之机，攻敌不备，他说：“现在雪密风冷，贺鲁一定估计我军不能前进，我可以掩击其不备。若缓几天，他就逃远了。现在追可以事半功倍，是上策。”

于是唐军冒雪前进，昼夜兼程，沿途收降人畜。到双河，与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会合，部队食饱气盛，只离贺鲁二百里时，列阵而进，抵达金牙山，随后纵兵破贺鲁牙帐，俘虏几万人，获鼓旗兵械等不计其数，贺鲁只身渡伊丽水西逃。随后萧嗣业到达千泉，阿史那弥射到达伊丽，唐军平处月、处密各部。此后阿史那弥射又进军双河，贺鲁先让步失达干据栅而战，阿史那弥射猛攻，步失达干溃败。苏定方又追贺鲁直至碎叶水，尽夺其众。

大败之下，贺鲁、咥运准备投奔鼠耨设，到石国苏咄城时，马不肯进，众人也饿，就带宝物入城，准备买马。城主伊涅达干出来迎接，进城后，却将贺鲁拘住，解送石国。眼看着阿史那弥射的儿子阿史那元爽与萧嗣业的兵到，石国国王便将贺

鲁父子交给萧嗣业和阿史那元爽处置，至此，西突厥国亡。

此后，苏定方安排西突厥各部落分别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开通道路，设立驿站，掩埋死者骸骨，慰问民间疾苦，划分牧场，恢复畜牧业生产，并将贺鲁所掠夺的人口，以及牲畜等财物发还各部。从此，西突厥十姓部落在久经内讧和战乱以后，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说贺鲁被擒以后对萧嗣业说："我本是亡虏，先帝待我厚，而我背叛他。现在天怒降罚，我还说什么？听说汉时法，杀人必在都市。我愿在昭陵就死，能向先帝谢罪。"这意思是说，过去太宗皇帝待我很好，我却背叛了他，我愿在太宗昭陵受死，以谢罪于先帝。李治听说以后，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问臣下："先帝赐二千帐给贺鲁统辖，现在已得罪人，能献给昭陵吗？"许敬宗说："古代军队凯旋都到宗庙祭告。诸侯献俘及敌首则献天子，没听说献于陵墓的，不过陛下奉于园寝，是与奉于宗庙一样的，可以这样。"于是将贺鲁押到昭陵，祭告以后赦而未杀。显庆四年，贺鲁病死，被葬在颉利可汗墓旁。

自平贺鲁以后，大唐在五咄陆部设置昆陵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在五咄陆的处木昆部落置匐延都督府，胡禄屋阙部落置盐泊都督府，摄舍提墩部落置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落置鹰娑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落置嗢鹿州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落置洁山都督府。显庆三年，又在葛逻禄三部置三府：谋落部落置阴山州都督府，踏实部落置玄池州都督府，炽俟部落置大漠州都督府。后来又从大漠州中划分出一部分另置金附州都督府，又在五弩失毕部置蒙池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蒙池都护，当时蒙池和昆陵两都护府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一时间，南至于阗，都隶属安西。龙朔元年西域吐火罗款塞来附，大唐又任命"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这十六个新设立的都督府，也隶属安西大部护府，这些地方早先属于西突厥的势力范围，此时转归大唐。

此时西突厥诸部降唐或四散者甚众，已然十去六七，剩余的部族中仅剩两支较大的势力，一个是盘踞于碎叶一带的真珠可汗，另一个则是吐火罗的阿史那叶护可汗。显庆四年，真珠可汗被兴昔亡可汗斩杀，下属的小可汗和部落纷纷降唐，西突厥长期对立的左、右两厢至此已相继陨灭。阿史那叶护可汗独木难支，也被迫于龙

朔元年（661）降唐，西突厥汗国至此彻底消亡。

西突厥东、西两厢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内耗是其亡国的根本原因，由于两厢之争使得西突厥汗国局势混乱、内耗严重，而这数十年的内乱中，大唐不断介入其中，扶持利用，使之内斗，从而消耗西突厥的整体实力，并让其始终无法一统，同时采取瓦解拉拢的手法，趁机蚕食西突厥。由于西突厥的各部落一盘散沙，无力抗拒，于是越来越多的部族背离了西突厥，最终沦为大唐的附庸，而西突厥亡灭之后，其各属国也纷纷向唐称藩。

9．东征朝鲜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半岛”是指陆地一半伸入海洋或湖泊，一半同大陆相连、三面被水包围的地貌状态，而从分布特点看，地球上的主要半岛都在大陆的边缘地带。最著名的莫过于阿拉伯半岛、巴尔干半岛和朝鲜半岛了。只要打开世界地图就可以看出，三个半岛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第一，都是进入亚欧大陆的跳板。朝鲜半岛进入东亚，阿拉伯半岛进入西亚，巴尔干半岛进入中亚。第二，都是占据重要的海上要道。阿拉伯半岛东临波斯湾、阿曼湾与霍尔木兹海峡，西邻苏伊士运河、红海和曼德海峡，向南伸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巴尔干半岛西临亚得里亚海，东濒黑海，南滨伊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东南隔黑海与亚洲相望，沟通地中海与黑海的博斯布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海峡；至于朝鲜半岛，东邻日本海，西临东海，南面是对马海峡和朝鲜海峡，北望鞑靼海峡和宗谷海峡。从这两大特点能够看出，这三大半岛都是战略要地，故而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是与战争和动乱联系在一起的了。翻开朝鲜半岛的历史，最不缺乏的就是战争。

关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其实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现代考古表明，在很早之前，这里便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德川人遗址”（距今10万至4万年前）和“胜利山人遗址”（距今4万至3万年前）。除此之外，1977年在平壤力浦区大贤洞，还发现了“力浦人遗址”，此后在平壤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龙谷人”化石和一些石器，同年又在平壤万达里发现了“万达人”化石。很显然，这片土地在史前并不缺少人类……

也就说，根据考古所得，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原始人类居住，而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50万年，公元前10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4世纪进入铁器时代。至于朝鲜族人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目前韩国官方采用传说檀君古朝鲜为韩国/朝鲜历史开端。不过所谓的“檀君朝鲜”其实不过是一个关于朝鲜人起源的神话传说，是后世朝鲜半岛对传说中檀君所建立的国家的一种称呼而已，自从高丽以降，史学家对檀君故事向来持有怀疑态度，普遍认为檀君故事纯系神话传说，不可视为信史，更不可写入正史。因为首先，故事本身荒诞不经，毫无事实根据，朝鲜半岛的历史大概最早应该是从“箕子朝鲜”开始算起。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是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因封国于箕，爵为子，

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孔子《论语·微子》中有言：“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早年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作为纣王叔父的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癫，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后来周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出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而同去的殷商贵族还有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

据说箕子晚年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朝天子，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箕子受封建立朝鲜箕氏王朝后，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转眼八百年过去了，中原已经大乱，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及二世大乱后，汉高祖刘邦于长安建立大汉帝国，高祖十一年燕王卢绾反，次年，事败，将军卫满出奔“箕子朝鲜”，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

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汉人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

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卫氏王朝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与西汉燕地相邻。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不使汉朝边境受到侵犯；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有了西汉藩属外臣的身份和汉廷的军事、经济的支持，卫满便开始不断地侵凌和征服临近小邦，真番、临屯都主动前来归顺，卫氏政权的势力因此迅速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卫满逝世，正当壮年的卫蒙继承了他的位置，此时的大汉朝正是汉文帝当政，政局平和，国力日益强大，而匈奴则出现了不世明君冒顿单于。此时的汉朝对匈奴采用的是和亲策略，尽量避免和匈奴的冲突，两国尚算得上和睦。卫蒙虽然年轻气盛且野心勃勃，但在这两个强大邻邦的压制下，也只能采取两面交好，从中牟利的策略。每每乘着这两方不注意时，悄悄收服邻近的一些小国。等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成为朝鲜王时，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政权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元朔元年，朝鲜半岛小番君南宫等，因不满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众二十八万归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为沧海郡。

元封二年，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卫右渠的具体回复如何不详，汉史称“终不肯奉诏”，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离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诡称“杀朝鲜将”，并飞报汉武帝以邀功。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嘉勉他的冒险精神，并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这便是著名的“涉何事件”。涉何的荒唐和卫右渠的愚蠢，使之成了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渤海，同时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

东南下，水陆两路击讨朝鲜，次年，陷其都城王俭城，卫右渠被他的部下所杀，卫满朝鲜灭国。大汉在原来的卫满朝鲜的土地上设立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此后，真番郡、临屯郡以及玄菟郡的东部被并入乐浪郡，分别设东部都尉和南部都尉，玄菟郡治所西迁至高句丽县。到了东汉末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析出乐浪郡南部都尉设置带方郡，并为曹魏、西晋所承继。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朝鲜半岛上，开始出现了马韩、辰韩、弁韩三个小部落，合称“三韩”。不过关于马韩、辰韩、弁韩的来源，史书中的记载却比较复杂：有种说法是箕准王与他的拥护者逃到辰国建立政权，是箕氏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延续，其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卫氏朝鲜统治朝鲜半岛北部时，作为箕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延续的马韩政权，以及辰韩地区的古辰国，都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但他们之间“贡藩不相往来”，也就是不存在隶属关系。

不过《三国志·魏书》和《后汉书·东夷列传》都有这样的记载：“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郡，弓为弧、贼为寇，有似秦语，故或名之秦韩、有城栅屋室，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车。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三国志·魏书》还说：“弁辰亦十二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从中韩史籍中可见古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三韩部落，马韩为原住民，辰韩、弁韩来自中国，弁韩臣属辰韩。

但不管怎么样，半岛的历史的确很复杂，原本朝鲜半岛北部及中国东北分布着夫余、沃沮、貊、东等部落，而马、辰、弁三韩之间也是彼此征战不休。此后辰韩也由十二国合并为新罗，而弁韩发展为伽倻，后来被新罗吞并，而辽东的扶余人南下，建高句丽、百济，后来百济吞并了马韩五十四国，自此，半岛陷入到了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之战乱中，朝鲜半岛学者称高句丽、新罗、百济并存时期为朝鲜“三国时代”。

三国之中高句丽实力最强，史书中多记载高句丽为扶余别种。按照《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先后吞并太白山东南人国和北沃沮，王莽曾经强行将高句丽人编入辽西郡进攻匈奴等民族。由于高句丽士卒脱逃，王莽怪罪于高句丽王并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又名乐鲜，仍属幽州。后来，琉璃明王西伐居住在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进而袭取了西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县。王莽部将严尤诱杀高句丽的君主闵中王邑朱，此后高句丽遂意图脱离中原王朝而独立。

建武八年（32），汉光武帝接受了高句丽的朝贡。高句丽遣使朝贡，汉光武帝复令下句丽复名高句丽，并复高句丽国王号。此后，大武神王又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采浪郡。七年后，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后汉书》卷八十五中记载："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而《三国史记》则记载："四年，汉玄菟郡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四年后，高句丽国相明临答夫在坐原战役中大胜东汉玄菟郡太守耿临，再一次开始了扩张……

事实上，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光武帝建武十二年（53）时，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五个部落设为五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此后，太祖王又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大汉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显然是导致与大汉直接武力冲突的原因。在大汉铁骑的巨大压力下，高句丽甚至迁都到丸都城。

东汉末年时，天下大乱，处于在辽东公孙家族控制下的高句丽，还曾经与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结果却是献帝建安二年（197）公孙康大破高句丽军，攻陷高句丽都城丸都城，使山上王改建尉那岩城为新都城丸都城。此后，高句丽与曹魏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史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曹魏太尉司马懿灭公孙渊，设高句丽、高显、辽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魏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破高句丽东川王，东川王败走，毌丘俭又屠杀丸都内官员数千人，之后退兵。不久又再次进攻，东川王逃到买沟，毌丘俭又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到沃沮。

不过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高句丽并没有灭亡，仅仅七十年之后，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辽东成为鲜卑慕容家族的势力范围，于是高句丽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西晋永宁二年（302）美川王率三万大军侵入玄菟郡，俘八千，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八月，高句丽袭取辽东郡西安平。两年后，又入侵乐浪郡，次年，入侵带方郡，至西晋愍帝建兴三年时（315）高句丽又攻克玄菟城。

然而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东晋成帝咸康八年（342）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慕容皝大军侵入高句丽，掳走了高句丽百姓五万多口，最后一把火烧了高句丽王宫，并将新丸都城再次变为平地。次年，高句丽重修由于毌丘俭东征而被摧毁的旧丸都城，并于同年秋天又一次移居丸都城。然而四个月后，丸都山城就再次毁于战火，这一次是百济近肖古王袭击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

王。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统治，以促使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除了将中原引入的佛教奉为国教之外，并依照中原王朝的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此外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至高句丽好太王继位时，高句丽已经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好太王也就是“广开土大王”，谥号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历史上称为好太王高谈德，故国壤王的儿子，是高句丽第十九代君主。在这位广开土大王在位期间，高句丽一度成为东北亚强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土面积占据半岛面积的约四分之三，而北方领土包括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此外还通过与倭的战争，高句丽将百济、新罗变为臣属，使朝鲜半岛形成了相对松散的统一局面，可谓是“武功赫赫”。

虽然好太王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但在他统治高句丽的这二十二年中，高句丽的领土得到迅速的扩张，所以他的谥号为“广开土”。而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正继位之后，高句丽达到了巅峰时期。长寿王，名高巨连或高琏，高句丽第二十代国王。长寿王在位时期是高句丽的全盛时期，他将高句丽的都城迁至平壤，这标志着高句丽将其扩张的方向从中国辽河以东地区转移至朝鲜半岛。



高句丽长寿王陵

长寿王即位初期，主要是巩固和稳定其父好太王迅速扩张后的国家。长寿王为其父修建了宏大的陵墓并立六米多高的好太王碑记录其功绩，长寿王命令三百三十名来自高句丽不同地区和部落的人常年看护好太王的陵墓，以象征高句丽的内部团结和高句丽君主的至高权力。长寿王在位期间，为了避开北魏的威胁，同时巩固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特地将都城从东北的国内城迁至平壤城。迁都平壤后，长寿王继续了好太王的扩张政策，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从而使国家达到全盛局面。

至长寿王末年，高句丽已经十分强盛，人口增加到九万户，疆域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而且这个时期的高句丽还声震中原，甚至能与北魏、陈宋分庭抗礼。不过就在达到鼎盛之后，高句丽开始逐渐地衰落。

长寿王死后，因其王子高助多早亡，故而助多之子高云继承王位，是为文咨

王，北魏太和十八年（494）扶余国王在遭到靺鞨的进攻后，依附于高句丽。此时，高句丽的强盛达到了最巅峰，文咨王继续推行自己祖父的策略，努力向朝鲜半岛扩张，这迫使百济和新罗结成同盟对抗高句丽。于是高句丽在萨水与新罗交战，迫使新罗退守犬牙城，幸亏百济派兵三千人援新罗，高句丽军方才撤退。次年，高句丽包围百济雉壤城，新罗派遣援兵，从这个时候开始，高句丽已经成了百济和新罗联合共同的敌人。

文咨王之后，其子继位，是为安藏王。在安藏王时期，高句丽王室间纷争加剧，朝局不稳。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安藏王被刺杀，因安藏王无子，故而其弟安原王继位。而安原王在位的十多年里，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从此高句丽结束了好太王之后所开创的盛世局面。此时的高句丽因为内部的斗争以及北部的冲突，还有百济和新罗的威胁，逐渐走向衰落。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中也几乎筋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为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7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大唐初立时，曾与高句丽互派使者通好，武德二年、武德四年，高建武两次派遣使臣向唐朝献贡。武德七年，李渊派刑部尚书沈叔安前往高句丽，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还派道士带天尊像以及道法前往，给高句丽人讲道家经典《老子》。高建武非常高兴，带领国民一起听讲，每日都有几千人。李渊对左右说："名实之间应该相符。以前高丽虽然称臣于隋朝，但抗拒隋炀帝，哪里称得上是臣子呢？我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何必一定要他们对我们称臣？"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劝谏说："辽东，周朝时是箕子的封国，汉朝时的玄菟郡，魏晋时犹在故封之内，不可以不称臣。况且中国与夷狄，就好像太阳之与众星，不可以降尊。"李渊想法因此作罢。

武德九年，新罗、百济上书李渊，说高建武封闭道路，使他们不能入朝觐见，而且多次侵扰他们，于是李渊诏令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持节前往调解。高建武上表谢罪，请求与两国和好。贞观二年，唐朝击败突厥，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高建武派使者向唐朝庆贺，同时献上封域图。

贞观五年，李世民下诏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葬隋朝时战死者的骸骨，毁掉高句丽所埋的大坟。高建武担心大唐会攻打高句丽，于是修筑长城，东北起自扶余城，西南到大海，此后在贞观十四年，又派太子高桓权前往唐朝进献特产，李世民赏赐甚厚。次年，李世民诏令陈大德持节前往高句丽答谢慰劳，同时暗察情况。陈大德到高句丽后，对高句丽各官守都有厚赠，因此得以了解高句丽国内的所有情况。见到客居于此的汉人，就一一告诉他们亲戚的存亡情况，以致人人感动得流泪。

不过这不等于李世民不想对高句丽动兵，贞观十二年十月，高建武派兵入侵新罗，攻打其北部的七重城时，大唐就曾经有心对高句丽动武，但后来新罗将军阏川在七重城城外击败了高句丽，此事也就作罢了。

不久之后，高句丽内部就发生了叛乱，高句丽的西部大人渊盖苏文得知荣留王试图除掉自己，于是假称要检阅大军，并在城南陈列丰盛的酒宴，设计杀死众臣，随后又闯入公众，杀死荣留王并分尸。之后改立高建武弟弟高大阳之子高葬为王，史称宝藏王，渊盖苏文自封为“大莫离支”，高藏王形同虚设，兵权国政皆由渊盖苏文独揽。

史载，渊盖苏文“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使贵人伏诸地，践以升马。出入陈兵，长呼禁切”。其出于早期高句丽五部中的顺奴部，渊盖苏文父亲渊太祚为高句丽东部大人、大对卢（相当于宰相），渊盖苏文继承父职为大对卢，仍掌高句丽军政大权。由于他的残暴弑君，所以后世史书对其评价很有争议。

得知这一消息后，虽然亳州刺史裴庄曾建议趁机攻打高句丽，但李世民却说他对荣留王的去世表示悲哀，但以乘国丧攻打高句丽并不合适。同年，高句丽大举攻伐同为唐册封的属国新罗，新罗善德女遣使入唐朝，述说百济攻占其四十余城，并请求唐援助。李世民于是派相里玄奖作为专使携诏书前往高句丽调解制止，让高句丽和百济停止攻打新罗。相里玄奖到达高句丽都城平壤时，渊盖苏文正在与新罗交战。得知相里玄奖的到来，渊盖苏文特地返回到平壤，不过，却拒绝了李世民的要

求。相里玄奘回到长安后将此事禀告李世民，在考虑再三之后，李世民决意要攻打高句丽。于是大唐以渊盖苏文“杀君欺臣，残虐民众，今又违诏，侵略邻国，不可不讨”为借口，发起了征伐高句丽之战。

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东突厥基本被消灭了，四夷威服，李世民一直都想要收拾高句丽，因为他认为高句丽据有的“辽东”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于是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平定辽东的一个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皇帝一直想要为前隋三征高句丽死难的将士复仇，用李世民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先命阎立德到洪州、饶州、江州筹建楼船四百条，继而并将幽州以及契丹和靺鞨部署划拨给营州方面，次年二月，李世民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大军至定州后，太子李治留守，同时留守的还有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而李世民自己则带着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继续前行。与此同时，李世勣和李道宗所率的大军已先与李世民的行驾越过辽河，并在当年夏，攻下盖牟。在海路，张亮率水军越过渤海并袭占卑沙城。此外为了震慑高句丽，张亮派先遣船队到鸭绿江入海口，但并没有按李世民的要求进一步向平壤进发。

不久之后，李世勣和李道宗将炀帝曾久攻不下的辽东重镇辽东城包围，并在李世民到来之前拿下了辽东，斩俘两万余人，白岩城城主孙代音面对兵锋主动请降，随后大军开始向安市城进军。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率十五万高句丽、靺鞨兵前救安市，与大唐在安市城下展开决战。

安市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晚年的得意之作，这位当年的秦王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他充分利用了地形，以蕃骑佯败骄敌，将高句丽援军诱至安市城东南，继而依山为阵，长四十里，以李世勣所部在西岭布阵，吸引高句丽军队的注意力，又以长孙无忌率精兵一万为奇兵从山北穿越峡谷，乘其不备，抄其后路，冲其阵后，李世民则亲率四千步骑兵偃旗息鼓登上北山，敕令诸军以鼓角为号，一齐出击。高延寿见李世勣布阵，便急集部队，准备迎战。此时长孙无忌的奇兵已经突进到高句丽大军的后方，搅起漫天尘埃。李世民在高处见尘烟骤起，遂命擂鼓举旗，唐军各路兵马即鼓噪并进。高延寿惊慌失色，本欲分兵迎战，但其军阵形已被冲乱……擂鼓助威，于是将士奋勇无畏，终于以少胜多，阵斩二万余级，俘虏高延寿、高惠真以下三万余众，缴获大量军资，余皆逃散，高句丽军一战而遭受重创。

李世民欣喜万分，下马感谢上苍，并将所在山岭命名为“驻跸山”。

驻跸山之战后，唐军的下一步如何行动？李世民和众臣展开商议，然而对下一步的行动，显然君臣们意见不一。早在当初攻克白岩城之后，李世民就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但长孙无忌却说:“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李世勣也反对先攻建安，他认为如果先攻建安城，安市城就会切断唐从辽东的供给线使唐陷入被动，于是李世民决定还是先围攻安市城。

其实在攻安市城前，李世民就得知安市城地势难攻，安市城主杨万春颇通谋略，当初渊盖苏文摄政高句丽后，杨万春拒绝承认渊盖苏文的大莫离支的身份，惹得渊盖苏文恼怒之下，发兵前来攻打，可面对安市城，大军却并没有能够攻下此城，因此渊盖苏文在无奈之下，也就只好让杨万春继续担任城主的职务职务。



盛世收藏 www.sssc.cn

由于守军在杨万春的殊死抵抗，唐军多次进攻都没有能够得手，而守城的高句丽人的无礼也显然惹恼了李世民，于是攻城的唐军扬言“破城之日将坑杀城内军民百姓，鸡犬不留”，这显然使得守城将士更加齐心合力，此后安市城也就久攻不克了……

其实唐军攻坚历来不乏手段，《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中“攻城战具”列有“轒帆车”、“飞云梯”、“抛（砲）车”、“车弩”、“土山”、“板屋”等。攻打辽东城时李世勣曾经使用了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虏积木为楼，结短网，不能拒”，又使用冲车和火攻，都颇具威力。然而在攻打安市时，虽然也使用了上述兵器，并“坏其楼谍”，却无法攻破城墙，个中原因除了安市军民殊死力战、善弓弩、应对有方外，地形也是很大的制约因素。

安市城建于山上，东高西低，面西为门，所以唐军“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遥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但由于东面原本地势较高，所以最后土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这种地势对筑土山有利，对抛车、冲车之使用则不然。《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描述的抛车是“以大木为床，下安四独轮，上建双，间横检，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首以案盛石，石大小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逐便而用其旋风四脚，亦可随事而用”。简言之是一座安装于大型木质底盘上的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抛石，那么这种武器使用前提应是底盘稳定、水平，进而也就要求地面平坦，在崎岖山地上，适用的地点有限，故而不能在这场攻坚战中发挥主要作用。

而冲车就是《武经总要》中所图之撞车，在大型木质底盘上安置粗大木架，以木架顶部横梁刚性悬挂巨大木质撞杆，头部为铁质锥型门。而据金毓献先生之踏勘，安市只有一座城门面西利用瞬间冲力以撞破城（高句丽山城往往只有一个城门，例如沙卑城），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李世勣所部正是以冲车在这个方向进攻，这里地形是东高西低，唐军由西向东乃是仰攻，冲车向上推进，其威力当大减，再加上安市有充分的备战时间和实战经验完全可能对城门加固或掘堑阻隔，故也未见冲车充分发挥效能，所以就地势而言，筑土山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其实安市之战都围绕这座土山进行，战况激烈，唐军费工五十万人次，昼夜不停，历时六旬，而安市守军的抵抗也很顽强，甚至攻城指挥官江夏王道宗亦被

伤足。借地势之利，最后唐军还是将土山筑到高于城墙数丈的高度，终至山体意外倾颓，“压城，城崩”，此正是大军一举攻入城中之良机，可是屯守山顶的唐军指挥官果毅傅伏爱山崩前却擅离职守，使得安市守军抢在唐军前占据缺口，“堑而守之”，唐军前功尽弃。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李世民看来不想对这位宗室名将下狠手，只斩傅伏爱以泄愤怒。《旧唐书》卷六十《李道宗传》明言这是道宗“失于部署”，而李世民“归罪于果毅傅伏爱”，唐军接着猛攻土山三日而不克。

至九月，安市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军不得不放弃努力，整个战争在安市城下宣告失败，李世民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句丽的预期目的。于是唐军拔辽东、盖牟、白岩等地户口，班师回国，也就是强迫辽东的居民迁往唐的地域内。据《资治通鉴》和《三国史记》记载，大约有七万高句丽人被迫从辽东迁入唐。李世民在过辽河的时候，遇到了泥沼，动用了一万人填平泥沼后，唐军才通过辽河。由于一些士兵在寒冬等待时被冻死，而在李世民在从定州到并州的路上，还得了病痈，以至于不得不在并州修养了几个月后才回到长安，回到京师之后，也一时萎靡，甚至将一般政事统统交由了太子李治处理。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李世民在攻安市城时受了伤，但具体是什么伤，说法不一，而朝鲜人在18世纪以后的诗文、笔记小说声称李世民眼部受到了箭伤，不过很显然，此说于史无据。

不过这次征讨却也不是一无所获，譬如此战在很大程度上让高句丽几乎是筋疲力尽，而后来的一代名将薛仁贵也是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薛仁贵本名薛礼，山西绛州龙门修村人，字仁贵，隋大业十年生，是南北朝时期名将薛安都的后代，为薛安都的六世孙，属于河东薛氏家族，曾祖父薛荣，官至北魏新野、武关二郡太守、都督，封澄城县公。祖父薛衍，北周御伯中大夫。父薛轨，隋朝襄城郡赞治，其父薛轨早丧，因此家道中落。薛仁贵少年时家境贫寒、地位卑微，以种田为业，娶妻柳氏。

薛仁贵至三十岁时，依然穷困不得志，希望迁葬祖坟，以带来好运，妻柳氏说：“君有出众的才干，要等到机遇才能发挥。如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招募骁勇的将领，这是难得的时机，您何不争取立功扬名？富贵之后回家，再迁葬也不算迟！”薛仁贵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告别妻子，前去投军，到虢国公张士贵军中应募，被收为部属。不久，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张士贵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大军行至安地时，郎将刘君邛为敌军所围，无法脱身，无人能救，薛仁贵闻讯后，单骑前往

营救，击斩敌将，系其头于马鞍，降伏余众，救刘君邛回营，从此，薛仁贵名闻三军。

安市大战中，李世民亲自擂鼓指挥，诸军齐出，张士贵率部首先与敌交战。恰巧此时雷电交加，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着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薛仁贵的表现如此惹眼，山上擂鼓助阵的李世民看到了这一白衣勇将后，询问张士贵白衣先锋何许人也？张士贵据实相告，李世民大喜，遂赐薛仁贵“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职守北门（玄武门）”，由此，薛仁贵脱颖而出……



李世勣

大军征讨高句丽还军时，李世民还特意对薛仁贵说：“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之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并加封薛仁贵右领军郎将。虽然得到了薛仁贵这样的勇将，李世民却显然并没有满意，此次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四万余人，可是战马损失十之七八，而且没有达成平灭高句丽的作战目的。于是李世民回朝后，决定再次东征。之所以决定再次东征，至于理由，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记载，当初唐军撤退时，李世民曾赐

给渊盖苏文弓服，渊盖苏文因高句丽得以保全，颇为傲慢，虽然接受弓服，但是未遣使者谢恩，使得李世民颇为不悦，此外，高句丽还在征讨大军撤退之后，挑起边境冲突，“又令伺我边隙，厥贡疏薄，失藩人臣大国之礼”，最后，高句丽还违背唐朝的命令，侵逼新罗，“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凌不止”，这些理由，都足够了。

然而朝议上，群臣认辽东战场的特点，是“城雉依山，攻之不可卒下”，大军前去征讨，费时费力，不如采取“少兵番次蹂其边场”，派出少量军队轮番袭扰，使国人时刻保持紧张，疲于应付，耽误农时，从而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造成“岛夷之邑，千里荒芜”的局面，在人心离散之后，高句丽会因粮荒而土崩瓦解，而大唐就可以实现“鸭渌水以北可不战而取”的目标。于是在贞观二十一年二月，李世民正式确定了偏师袭扰高句丽的政策。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以李世民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牛进达所部以楼船战舸自莱州出发，走水陆攻入辽东，而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所部渡过辽水，从新城一带攻入辽东。两路大军，水陆并进，袭扰高句丽。

这两路人马数量虽少，但却是精锐，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记载三万大军乃是“两军之发也，并遣惯习沧波、能以少击众者而配隶焉”。当年七月，牛进达、李海崖从莱州出发，由水路在辽东半岛登陆，先攻石城，陷之，虏男女数百人。此后凡百余战，无不捷，至积利城下，高句丽出军万余人拒战，结果大破之，斩首二千级，然而退兵。



唐代武士俑

而李世勣所部则兵渡辽水，进攻南苏、木底等城，高句丽背城拒战，被唐军击败，当年五月克南苏、木底城，焚烧其城郭，然后退兵……很显然，这一年，唐军的水陆并进，并攻入辽东，只是克城破敌，一番抄略之后，便是退兵，目的便是袭扰。第一番攻势刚刚结束，大唐再次出兵，当年八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中郎将丘孝忠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十二州工匠修造入海大船及艓船三百五十艘，将征高句丽。

接连的打击使得高句丽不得不派使者请罪，很显然，高句丽被打怕了，不过李世民虽然接受了高句丽的谢罪和朝贡，可随即在贞观二十二年正月立即就发起了再一次的进攻，正月二十五，李世民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

卫将军裴行方为副大总管，乌胡镇守将古神感为先锋，率三万大军乘楼船从莱州渡海击高句丽，大军入鸭绿水，乌胡镇守将古神感作为先锋率兵浮海直指，高句丽领步骑五千拒战于易山，短兵才接，其众大溃，斩首八百余级。当天夜里，万余高句丽兵试图夜袭唐军船只，结果“神感设伏以待之，贼不觉，奋击大破之而还”。

此后，薛万彻大军入鸭绿水泊灼城南四十里止营，高句丽各城震惧，多弃城遁逃，唯泊沟城主所夫孙率步骑万余来拒官军。薛万彻遣右卫将军裴行方领步卒、折冲尉罗文合为援军继进，自己率其余诸军，在裴行方等军与敌交战之时，突然出击，所夫孙大败，高句丽军混乱溃逃，唐军追杀百余里，斩杀所夫孙，进围泊汋城。该城倚山设险，又以鸭绿山为屏障，易守难攻，唐军久攻不下。高句丽遣将高文率乌骨、安地诸城兵三万余人分两路前来救援，薛万彻亦分兵迎战。双方交战伊始，高句丽军即大败溃退……在击败高句丽援军后，唐军进而攻拔泊灼城，随后于九月初五，薛万彻凯旋还朝。不过薛万彻虽然在此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但是他却因为在军中与诸将不和，而且发言怨望，被人告发，而获罪，被“除名，流象州”。

唐军偏师的连续骚扰，使高句丽已穷困凋敝，而且接连的失败也极大地削弱了高句丽的力量，李世民认为，对高句丽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打击的时机已经成熟，计划在贞观二十三年出兵三十万，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灭亡高句丽。然而发动这样规模的战争需要有一年的粮食储备，并需要建造更多的战船，于是李世民下令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之所以在剑南道造船，是因为“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这些船在造好之后，经长江、东海运到莱州。此外，越州、婺州、洪州也担负着一些造船的任务，史载“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不过剑南造船并不顺利，因为操之过急，甚至引发了不满和骚乱，幸亏及时采取措施，才平定了骚乱。与此同时，李世民还遣陕州刺史孙伏伽招募勇敢之士，以做平灭高句丽最后准备，至于粮草，则是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

然而就在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没有等到这次出兵，当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东征之役遂罢。李治即位后，唐与高句丽表面相安无事，但战争准备却是在积极准备着……

李治年间对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其实相较于李世民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考虑到于辽东攻打高句丽效果不大，故而大唐调整了针对朝鲜半岛的策略。青州刺史

刘仁轨建议："欲吞灭高句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于是大唐确定了"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方针。

显庆四年，当百济出兵攻陷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王金春秋向唐朝连连告急的时候，李治当机立断，以"百济联合高句丽，阻碍新罗和唐朝交通与进贡事宜"为借口，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晓卫将军庞孝泰等，统水陆十万讨伐百济，同时任命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五万与苏定方配合作战。

是年八月，苏定方率唐水陆大军船队从城山启航，横渡黄海，至熊津江口。百济军据熊津江口拒守，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不过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因为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士卒殊死抵抗，最后只是勉强惨胜。不过新罗军毕竟只是偏师，对于大唐来说，神丘道行军才是主力，登陆百济的大军刚刚站稳脚跟，苏定方就立即要求各部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趋百济都城泗沘城……史载，距城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灭国之际，百济义慈王与太子扶余隆选择了逃向北部边境，而以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兵固守。眼看着都城不保，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竟率左右逾城归降，百姓皆从之。于是苏定方乃命士卒登城立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献城请求处置。此后，扶余义慈、扶余隆及各城城主亦相继投降，百济宣告灭亡。

此时李治已于显庆二年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后又陆续平灭其他反叛力量，至此时，西北方面已无战事，完全能够腾出手来，全面对付高句丽了。此外，自贞观十九年征讨高句丽后，大唐一直保持着对高句丽的骚扰性军事行动，以消耗和疲惫高句丽。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即位后，唐军与高句丽的局部作战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永徽六年，以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五月，大军渡辽水，高句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程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第二次是在李治显庆三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于是李治命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句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

余级，捕虏百余人。高句丽遣其大将豆方娄率众三万拒之，史载“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次年，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又和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与高句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此战薛仁贵再次单骑突阵，他手持弓箭，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所射者无不应弦倒地，于是将士用命，大破温沙门之军。

在大唐灭亡百济之后，等于剪除了高句丽羽翼，此时的高句丽不仅失去盟国，而且唐军还能够从南面对高句丽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李治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所谓“发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以每军一万人计算，这次大规模进攻，大唐进讨高句丽的总兵力当在三十万左右。

龙朔元年一月二十二日，又以鸿胪卿萧嗣业出任夫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进军平壤。四月二十九日，唐高宗李治欲效仿父亲率军亲征，被武后谏阻，未能成行。五月二日，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江道大总管”，统率大军及诸胡兵“水陆分道并进”，以讨伐高句丽。

面对大唐的进攻，高句丽做出的部署很简单，那就是主动放弃了大片土地，把战线收缩至鸭绿水和江，并相应集中了兵力，以至于后来唐军在辽东并未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抵鸭绿水，而南线则是几乎没有什么战斗，便顺利挺进到江。之所以高句丽如此部署，原因很简单，贞观十九年驻跸山之战对于高句丽的影响太大了，加上此次大唐出兵如此之多，高句丽自然不敢贸然和唐军野战了，所以他们采取了“坚守待变”的方针，试图在北线死守鸭绿水，在南线固守江，而中间则是依靠平壤坚城，最终拖垮唐军。

龙朔元年七月，苏定方大军在江江口登陆，然后沿江而上，攻向平壤。史载“八月，定方破虏兵于江，夺马邑山，遂围平壤”。而在北面，契苾何力所率的唐军则是直接撕开了鸭绿水的高句丽大军的防线，关于此战，《资治通鉴》的记载为“泉［渊］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句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

然而，正当讨伐高句丽的战争处于关键阶段的时候，铁勒九姓发生了叛乱，回纥、同罗和仆固等部犯边，李治不得不任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

管，出兵平叛，同时将夫余道行军总管萧嗣业所部从高句丽前线撤回，担任仙萼道行军总管，随同征讨。很显然，随着征讨高句丽的北路唐军有相当一部分被立即调去平定铁勒九姓的叛乱，南北合击高句丽的战略部署已经落空了。

与此同时，由于百济旧将叛乱，使得协同作战的新罗军在百济翁山城受阻，故而唐军开始出现了缺粮危机。由于粮草、冬衣的缺乏，秋冬到来的时候，陷身在平壤城下的苏定方大军陷入了困境。虽然含资道总管刘德敏、留镇百济的刘仁愿及新罗人不断向前线运粮，但也只是杯水车薪。龙朔二年二月，江道行军大总管任雅相在军中病死，随后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唐军大败，庞孝泰和他的十三个儿子尽皆战死。

在这种情况下，李治遂于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随着苏定方率唐军撤回国内，至此，规模巨大的三十五军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也由此结束了，唐军未能平定高句丽，无大功而返，但这也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渊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铁腕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

乾封元年，渊盖苏文死去了，他的长子渊男生继任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加大莫离支，然而就在渊男生即位之后，一场内乱随之发生了……

关于这场内乱，《资治通鉴》记载得很是详细："泉［渊］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

在得知渊男建夺权，并杀害了自己的儿子渊献忠这一噩耗之后，渊男生选择了退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同时派大兄弗德到唐朝请求支持。由于渊男建在平壤，手里有高句丽王高藏，占据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所以事实上，渊男生根本不是自己弟弟的对手。这种情况下，困守"国内城"的渊男生做出了无奈的选择，那就是其子渊献诚入唐廷求救……

在接到渊男生的求救后，李治当即任命契苾何力出兵救援。大战随着契苾何力接应渊男生而拉开序幕，由于渊男生困守在鸭绿水畔的国内城，而契苾何力的唐军在辽水一带，高句丽则有十五万大军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在这种情

况下，唐军深入高句丽腹地到国内城接应渊男生也就成了问题。这个时候，契苾何力必须要在辽水一线向高句丽军发动进攻，撕破高句丽的辽水防线，才能够把渊男生接应出来。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道：“乾封元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句丽兵，泉［渊］男生率众与同善合。”而《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则记载为“高句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也就是说，契苾何力占领南苏城以及“乘胜而进，凡拔七城”，一举撕开了高句丽在辽水的防线，救出了困守孤城的渊男生。

在救出泉男生之后，乾封元年十二月，渊盖苏文的弟弟渊净土也向大唐和新罗献地投降。这两大重臣的先后投降，高句丽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大唐开始了全面进攻。这一次进攻，唐军是以主力从辽东方向实施攻击，计划在平定辽东之后，渡过鸭绿水，攻向平壤，此外郭待封从水路取辽东半岛南部，然后扑向平壤，而刘仁愿则从百济故地向北进攻高句丽，此外还有新罗军配合。

乾封二年二月，李世勣大军兵围高句丽军事重镇新城，据《资治通鉴》记载：“勣初度辽，谓诸将曰：‘新城，高句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从这里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实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根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李世勣先是引兵于新城西南，继而依山筑起军栅，且攻且守，以至于“城中窘迫，数有降者”，经过七八个月的反复拉锯之后，最终才拿下这座辽水以东且紧邻辽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城池。拿下的原因是乾封二年九月十四日，新城人师夫仇抓住了城主，主动开城投降的。

占领新城之后，李世勣留契苾何力镇守，继续负责攻略辽东，而其他大军则继续展开新一轮的进攻。在独孤卿云所部，向鸭绿水方向进攻，欲与郭待封、刘仁愿所部及新罗军合击平壤的同时，高侃向金山进发，计划先肃清北面的高句丽军，再向东推进。

然而在金山一线，唐军却遭到了高句丽军的反扑，由于高句丽“鼓而进，锐甚”，所以高侃所部与高句丽军交战不利。高侃也算得上是一员百战宿将，但此番在金山，却遭受大败，而大败的原因，《资治通鉴》记载为“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渊］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也就是说，高侃此时尚在新城，而眼看着唐军在金山之役中初战不利，渊男建以为有机可乘，便派兵袭击庞同善、高侃在新城的兵营，结果在危急时刻，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率军增援而至，按照

《新唐书·薛仁贵传》“击虏断为二，众即溃”，也就是这位猛将率部从高句丽军的侧翼发起进攻，把高句丽军切成两截，高句丽军阵形散乱之后，很快全线溃逃，唐军乘胜追击，大破之。

按照《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唐军在金山大捷中斩首五万余级，李治得知战报后，还写手敕嘉奖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言语之中，表露出喜悦振奋之情。此战使得高句丽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自此唐军在辽东的中部、北部再也没有遇到高句丽的大规模反扑。

金山大捷后，唐军迅速改变了原订的作战计划，不再往北进攻，而是改为向东进攻，“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渊］男生军合”。在进攻这三座城的时候，唐军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当辽东方向取得大捷之时，郭待封率领的唐军也基本完成了对积利一带的攻略，于是在李世勣亲率独孤卿云所部攻向鸭绿水的同时，命令郭待封自辽东半岛出发，直指平壤，不过在鸭绿水畔，唐军却遭到了挫折。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勣在攻克新城后，是立即率军向鸭绿水挺进的，唐军在安市击败高句丽军后，顺利进抵鸭绿水，但是，这时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郭待封带领了一支水军准备从别道直驱平壤，李世勣原本派出了冯师本带着粮仗供应郭待封。结果冯师本船破失期了，眼看着军中士兵饥饿窘困得不行，于是郭待封就想写封信给大总管紧急求援，并说明自己这里的情况，可是他又担心书信落到高句丽人手里，暴露军中情况，于是考虑一番之后，将情况写成了一首离合诗。所谓离合诗，也就是离析字画，合之成文，以见其意。李世勣接信之后，一看是首诗，而且他还没有读出其中的意思，于是大怒，军情似火，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拽文写诗，非杀此人不可。时任行军管记通事舍人的元万顷颇有才华，一看，这是离合诗啊，里面有军情呢，于是为大总管解释一番，李世勣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人给郭待封所部送去粮草，而元万顷也颇为李世勣所看重。

后来，元万顷奉李世勣之命，写一篇征讨高句丽的檄文，可他不知是怎么想的，洋洋洒洒一篇文，虽然把高句丽嘲笑、大骂一番，突出了大唐王师的正义性，可他居然在檄文中嘲笑渊男建“不知守鸭绿之险”。而在当时，高句丽军忽略了鸭绿水的守备，渊男建看到元万顷之文中嘲笑己方“不知守鸭绿之险”时，恍然大悟，也就是元万顷提醒了他，因此渊男建也很有意思地回复说“谨闻命矣”，这意思用今天

的话说，就是“收到！遵命！鸭绿之险已守！谢谢你们的提醒”，于是在高句丽人迅速派兵加强鸭绿水的守备之后，李世勣自然是一头黑线，因为大军在敌人的阻拦之下，暂时无法渡过鸭绿水。当然，元万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治听说此事之后，直接将他流放到岭南去了。

而另一方面，更是让人欲哭无泪，新罗王金法敏在乾封二年八月就率军出征了，九月抵达汉城。但是，新罗军不愿继续孤军前进，想等待各路唐军到达平壤后再前进，在此期间，新罗多次派出细作，探查唐军情况，发现唐军没有到达平壤，因此，新罗军也不再前行，李世勣派人来催促，要求新罗大军赶往平壤，并且向新罗军传达了明确的指示：新罗军不用攻城，不要恋战，应快速向平壤唐军运送军粮。然而新罗军行动迟缓，十月二日在七重城接到指示，十一月十一日才到达獐塞，这直接导致了郭待封的积利道行军因军粮不足而被迫撤退，而李世勣眼看着郭待封的大军撤退，而自己合围平壤的计划也因为鸭绿水受阻而落空，故而也从鸭绿水撤退，而新罗军见唐军已经退走，也就撤退了。

不过李世勣大军也就仅仅是从鸭绿水之畔撤军而已，并没有全部撤军，而在辽东方向，契苾何力的大军正在扫荡残存的高句丽大军，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只带了两三千人为前锋，直冲扶余城，而契苾何力大军则从辽水边上的金山杀到鸭绿水中上游的国内城之后，分兵接应，可没有等到大军抵达，薛仁贵便“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

这个时候，渊男建选择从鸭绿水发兵去救援远在北面的扶余城，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在辽东方向扫荡的唐军几乎就没有遭到损失，这个时候，去救扶余城，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大错误。就这样，北渡鸭绿水、前去救援扶余城的高句丽大军在走到薛贺水的时候，与李世勣军遭遇了，于是薛贺水之战爆发……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此战爆发在总章元年二月初四，其过程据《资治通鉴》记载：“泉［渊］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余城，与李世勣等遇于薛贺水，合战，大破之，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不过参战的大军并不只有李世勣所率的独孤卿云所部，还有契苾何力麾下的大军，因为《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有相关的记载“乃回军会英国公李世勣于鸭绿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

不管怎么样，此战之后，高句丽的野战部队几乎是被一扫而空，在鸭绿水以西、以北的土地也丢失殆尽，其他各路唐军相继前来与李世勣会合，这也就使得北线的唐军力量大为增强，而相较之下，高句丽在经过辽水、新城、金山、安市以及

刚刚结束的薛贺水这几场大战后，能战之兵已经损失惨重，这种对比自然使得此后双方的交兵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当年春夏之间，各路唐军会师后，顺利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二百余里，攻拔辱夷城，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这时，高句丽已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在诸城纷纷投降和逃遁之时，大唐各路兵马开始向平壤进发，史载"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军继之"，而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也就是说，在攻克了辱夷城之后，契苾何力大军率先抵达平壤……

而就在当北线唐军向平壤进军的时候，一度无所作为的南线唐军和新罗军也开始行动了。自从乾封二年秋冬进攻平壤受挫后，南线的唐罗联军在休整之后，完成了整合与协调。据《资治通鉴》记载："总章元年正月，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关于刘仁轨的具体职务，各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刘仁轨在接受任命后，先到达百济故地进行安抚，而在稳定了百济故地之后，又前往新罗开展协调工作。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总章元年六月十二日，刘仁轨到达党项津，新罗王金法敏派金仁问前去迎接。由于刘仁轨到新罗的主要任务是督促新罗出兵，而新罗此时还不敢违逆大唐，加上新罗也一心想要亡灭高句丽，于是在六月二十二日，由金仁问为先锋，率部先行出发了，六月二十七日，金法敏出京向平壤进发，至六月二十九日，新罗大队人马陆续出发…… 至此，南北线唐军及新罗大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平壤推进，并最终完成对平壤的合围。

在完成合围后，唐军随即对平壤城发动了进攻。此后的作战，史料中的记载比较简单，《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渊］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勣以礼接之。泉［渊］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勣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而《金法敏致薛仁贵书》中的记载则较为详细："蕃汉诸军，总集，出兵，欲决一战。兵马，独为前锋，先破大阵，城中，挫锋缩气。于后更取骁骑五百人，先入城门，遂破，克成大功。"至于《新唐书·泉男生传》的记载则又是另外一番："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

征讨大军得胜返朝，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初七，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

外同正。以渊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渊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世勣以下，封赏有差，并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至此，李治完成了征讨高句丽的大业，自贞观十九年开始，至李治总章元年止，大唐经过二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获全胜。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二十七代国王宝藏王高藏也被唐朝俘虏，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如同冰川在海水中消融一样，彻底没有了踪迹。此外，另有部分留在辽东，后来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不再存在于世。

很显然，导致高句丽灭亡的最主要原因是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内斗，这是其灭国的主要原因，然而他这三个儿子的人生结局却颇是让人感慨：

长子渊男生，遣子渊献诚致书附唐后，先是被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安抚辽东大使、持节，随即被征入朝，加辽东大都督、封玄菟郡公。总章元年，随李世勣攻平高句丽，以功进位右卫大将军、晋爵卞国公。仪凤二年，奉诏安辑辽东，颇能安民。仪凤四年卒于任，年四十六。“帝为举哀，赠并州大都督。丧至都，诏五品以上官哭之，谥曰襄，勒碑著功”。

次子渊男建，其与弟渊男产逐兄渊男生而自立为莫离支。总章元年平壤被围后，高句丽王高藏命令渊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白旗向李世勣投降。但是渊男建拒绝投降，紧闭城门坚守，还多次出击，不过屡战屡败。后来他将一部分军事任务交由僧人信诚，但信诚其实是渊男生派遣到渊男建身边的间谍，五日之后信诚大开城门让唐军攻入焚城，渊男建企图自杀但没有成功，被俘虏之后随高藏、同时被灭的百济国王扶余丰等一同被献俘于唐都长安太庙。李治认为他是举兵抗拒的元凶，下令处死，后因渊男产的求情改判流放至黔州，渊男建死于流放地。

三子渊男产，当初与其二兄渊男建逐长兄渊男生，拥立渊男建为莫离支。总章元年，平壤被围，城将破，奉王命持白幡率首领九十八人至唐军前请降。入唐，授司宰少卿，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员外置同正员。圣历二年，授上护军，万岁通天三年，封辽阳郡开国公，迁营缮监大匠员外置同正员。大足元年，卒于第，年六十三，葬洛阳平阴乡。

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和新罗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高句丽将军剑牟岑、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等。唐曾多次试图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督府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唐为管理原高句丽故地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最初是由薛仁贵来管理的，但由吐蕃在西线的压力，唐朝开始羁縻治理高句丽故地，任命高句丽宝藏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后来宝藏王因暗中支持高句丽遗民起义被流放，宝藏王的儿子高德武接管了安东都督府。

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 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 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人。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震国，其国名源于唐朝所册封的“震国公”，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震国接受唐的册封改名为渤海国。此外，在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摩震国，现代的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它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

第四章 鏖兵白村江

10．倭国介入

百济和高句丽相继灭亡之后，新罗成为朝鲜半岛无可争议的地区霸主。但由于新罗奉行的“骨品制度世袭”，严格限制了其他各地权贵加这个新兴政权的机会，因此百济各地的复国运动一度此起彼伏。



新罗国王室图谱

所谓的骨品制，其实就是一种严苛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当初新罗用武力统一辰韩各部后，由于新罗国的统治集团是由三姓王族和六部贵族组成，为巩固其特权地位，于是就制定了等级制度，以森严的“骨品制”来划分血统与身份的阶级地位，而之所以在贵族间实行的这一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的“骨品制”，也就是为了确定朴、金、昔三姓的地位，这三姓是新罗统治集团中最大的贵族，不但可世袭王位，还独占整个官僚体系，拥有无上权力。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是第一等，称为“圣骨”，而其他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四个等级，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此外，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等级还有三头

品、二头品、一头品、平民、奴隶等各个低级阶层，这些阶层属于非骨品。

在那个时期，按血统确定等级身份及相应官阶，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不同骨品互不通婚，而且骨品世袭不变。这一制度按个人骨品即世袭血统决定受尊敬程度，根据不同等级分别制定出担任官职的最高限度，达到一定骨品等级的，才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因此，人的仕途受到个人在骨品制中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的制约，不仅如此，骨品还决定了一个新罗居民可以居住住所的大小。百济被灭国后，百济贵族虽然有一部分归降了大唐，另一部分却仍不死心。而百济被平定后，唐军主力随即回撤，只留下不多的唐军驻守百济王城，也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于是也就有了百济旧将扶余福信看准这个时机，降而复叛的事情。

扶余福信，也叫鬼室福信，至于“鬼室氏”，据日本学者的说法，是百济国的姓氏。日本典籍《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记载：“因鬼神感和之义，命氏谓鬼室。”《旧唐书·百济传》说他本为百济武王扶余璋的从子，义慈王的从弟，而且在《旧唐书·百济传》的记载，贞观元年百济武王曾经派遣侄子信福入大唐贡。“信福”在《三国史记》百济武王二十八年条写作“福信”，所以，此人是百济武王之侄，倒是应该可以确定的。

其实百济败亡的时候，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于是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道琛，《唐书》里作“浮屠道琛”，《日本书纪》里作“僧觉从”，此人和扶余福信迅速起来叛乱，聚众占据了任存山，并在任存山聚百济旧民造反。

百济灭国之后，局势也一直没有稳定下来，百济余部退守南部南岑、真岘等城，佐平正武在豆尸原岳频频袭击唐罗军队，所以刘仁愿所率驻屯百济的唐军主要任务就是清剿这些叛军。这些百济残余势力中，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黑齿常之了。

黑齿常之本是百济西部人，身高七尺多，勇猛有谋略，一度担任达率（相当于大唐刺史的职位），兼任风达郡将，苏定方平百济时，黑齿常之率领部下随百济人投降大唐。当时是苏定方囚禁百济国王义慈王及太子隆等人，纵兵劫掠，成年人多被杀死。黑齿常之感到了害怕，与和沙宅相如等人带着手下十多人逃归本部，收集被打散的士卒，保守任存山，结起栅栏以加强防守，一月之间归附的有三万多人。虽然苏定方一度派兵讨剿，但由于黑齿常之率领敢死之士进行抵抗，所以唐军无法彻底将之清剿干净。

不过史料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矛盾的，根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

是“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鸠集亡散，各据险以应福信”，而《三国史记》记载也是“及苏定方既平百济军回，余众又叛”，似乎是说等苏定方走后，黑齿常之才敢反叛，不过《三国史记》又载，八月二十六日，派遣军队攻任存大栅，兵多地险，不能克，但攻破小栅。

然而不管怎么样，黑齿常之等人似乎只能自保，并没有挑起复兴百济的大旗，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基本上坚守任存山，处于观望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的抵抗，带动了百济全国境内的反抗情绪。当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以任存山为据点开始崛起之时，扶余自进也以熊津城为据点开始起事。不久之后，黑齿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守险要以响应这些叛乱势力。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大唐主力仅仅撤离二十天，叛军开始进攻泗沘城，由于开始的时候武器被唐军缴获殆尽，叛军以棍棒作战，抢挖地道，竟攻破外栅，抢夺兵器物资，逐渐实力强大，鬼室福信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并在泗沘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力图围困泗沘城的唐罗守军。

而新罗方面，一方面要尽量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行事，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防高句丽与靺鞨人的乘虚而入，行动颇为两端。九月二十八日，熊津都督王文度来到新罗的三年山城，向新罗王金春秋传达李治的旨意，当他正准备向新罗王递交圣旨的时候突然发病而死，死因不明。

王文度在两唐书中并无传，只能从史料中理出一个大概，曾在贞观十九年，以水军行军副总管从程名振征高句丽，攻卑沙城有功。永徽六年，唐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王文度任副大总管，讨伐贺鲁，以矫诏及指挥不善获罪，当诛，后除名为民。后为左卫郎将，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承命总兵留镇熊津，渡海，卒。随着王文度死去，百济局势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扶余福信自知仅以自己百济旧将的身份争取不了太多民心，为强化自己的“正统”，于是扶余福信两次派使者前往倭国乞援，并请求放还在倭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回国继承王位。倭国即日本，关于“倭”字，《诗经·小雅·四牡》中有“四牡，周道倭迟”的句子。《毛诗正义》将“倭迟”释作“历远之貌”，《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倭”字：“顺儿，从人，委声”。“顺”在这里有“顺从”的意思。据此，故而有人以为，“倭”在古代本有绵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顺从之意。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开始时，无人知晓这枚金印来历，经

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价值的中国汉印。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绶，倭奴国王视这枚金印为权力象征，十分珍重。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将其埋入地下。再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国也不复存在，于是这枚金印也就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东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这枚“汉倭奴国王”金印，可能就同时表达了东汉朝廷对倭方所寄托的“感其远道而来”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后汉书》中就有关于光武帝刘秀赐予倭国使者金印的记载，记载并不太详细，而在晋代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则对于日本有很多的记载，陈寿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三国时代倭国的情况。书中提到了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女王国叫作“邪马台国”，下属三十多个小国，统治该国的女王就是“卑弥呼”。此外，那些不接受邪马台统治的小国，则认为自己是吴泰伯之后，与吴国亲近。

据记载，238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帝曹睿，魏帝赐予卑弥呼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邪马台国与另一个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向来不和，她特地再次派遣使者来到魏国求助。魏帝派出使者表示支持邪马台国，但是狗奴国对魏帝的檄文却似乎并不在意。在长期的战争中，卑弥呼去世了。邪马台国拥立了一名男性为王，但是国中却引起大乱，只好再度拥立卑弥呼一族的女性“壹与”为女王，这才平息了内乱。326年，壹与再度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此时三国时代已经结束，晋朝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往后，邪马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失去了踪影。

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畿内说与九州说较有力，但因史料限制，尚无定论。不过从史料中记载中，可以对邪马台国有个大概的了解：壹与为王，内乱始定之，其已由中国传入水稻栽种和使用铁器，居民种植禾稻、苎麻，养蚕栽桑，绩麻线，制丝锦、缣绢，武器用木弓铁镞，在交换上已经是“国国有市”。社会已有大人、下户与奴婢、生口之别，大人皆四五个妻子，是上层统治者，下户则有二三个妻子，两者间的地位与尊卑差别明显。但下户并不是奴隶，而奴婢和生口则具有奴隶性质。

邪马台国的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分七级。中央一级官员由大倭、大率、大夫组成，大倭管理市场,大率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大夫是刺史。邪马台国政府收入由下户交上的粮食组成，经济以水田农业与手工业组成。对外，卑弥呼遣使曹魏，两国通过带方郡频繁往来，自魏明帝景初二年后，邪马台国派到魏戍带方郡的使节前后

达四次，同时赐生口、倭锦、珠、弓矢等，魏国也曾两次遣使至邪马台国。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中国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天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小野妹子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寺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很显然倭国在使用国书敬语上，企图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虽则如此，隋炀帝还是决定派遣鸿胪卿寺掌客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裴世清带去的国书敬语是“皇帝问倭皇”。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后来，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原因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华夏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国名为日本，也就是“日出之国”的意思，而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的事件，只知道是7世纪后期，其来历在日本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句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这意思就是李治咸亨元年（670），倭国派使者祝贺李治平定高句丽，因为懂点汉语，所以讨厌“倭”这一名称，故改国号为日本，使者自称这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处而命名的。

其实，“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大唐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大唐的承认，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很显然，虽然倭国很希望自己能够改名，但却并没有能够被大唐所承认，《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依然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的字眼，直到701年，随着文武天皇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大唐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当时，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日本，只有一个“倭国”。

11．大化革新

而在当时，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内变。自从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创立大和国以来，传至武烈天皇，已历二十五代，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武烈天皇是仁德天皇一系子孙在自相残杀之后的唯一余孤，由于这位堪比桀纣的暴君治国无能，所以本就衰微的王室权力愈加衰落，中央对地方政治的约束力日减。

北魏正始三年（506）时，武烈天皇去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且皇族中没有合适的继位人选。之所以武烈天皇并没有留下后代，一方面是当时的日本皇室由于近亲通婚，生育力低下，人丁不旺，另一方面则是皇族近亲之间因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皇室子孙本来就人丁不旺，经过这一番杀戮，更是有断子绝孙之虞。在近亲中已经没有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权臣大伴金村提议道："方今绝无继嗣，天下何以归心？自古迄今，祸由斯起！今仲哀天皇五世孙倭彦王，在丹波国桑田郡。请试设兵仗，夹卫乘舆，就而奉迎，立为人主。"

大伴金村的主张得到了大连、大臣等权臣的赞同，大和朝廷派出兵马欲迎立倭彦王。倭彦王看到前来迎接他的兵马后，大惊失色，逃至山间，不知所踪。大伴金村又建议道："男大迹王性格慈仁孝顺，可承天绪，我们殷勤劝进，男大迹王必能绍隆帝业!"大连物部粗鹿火、大臣巨势男人等都附和道："贤者唯男大迹王也！"于是大和朝廷的人马前往越前，迎立是年五十八岁的男大迹王为大和朝廷的大王。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男大迹王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父亲是彦主人王，在他的幼年时期，彦主人王去世，其母叹道："我现在远离故土，怎么能好好将儿子养育？我只能归宁故土，养育儿子。"于是带着他回到娘家。史载男大迹王成年后，爱士礼贤，性情豁达，倒也是继承王位的不错人选。

男大迹王在第二年行至河内国樟叶宫，大伴金村等向男大迹王行跪拜之礼，并献上天丛云剑、八咫镜、八尺琼勾玉三神器。男大迹王谦让道："治民治国，是国之重事。寡人不才，不足以称。愿另择贤者，寡人不敢当。"大伴金村等伏地固请，男大迹王仍屡次推让。大伴金村等都劝进道："臣等认为由大王来治国是最合适的，臣等为宗庙社稷，乞求大王听纳臣等之愿！"男大迹王道："大臣、大连、诸臣等咸推寡人，寡人不敢不受。"于是男大迹王接受了象征王权的玺、符，于当天即大王位，也就是所谓的"继体天皇"。

继体天皇继位后，继续以大伴金村为大连，巨势男人为大臣，物部粗鹿火为大

连，一如前朝。在大伴金村的建议下，继体天皇立武烈天皇的姐妹手白香皇女为皇后。继体天皇在其任内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割让了任那四郡给百济。

任那，是古代被认为存在于朝鲜半岛的地域，有人说是弁韩旧地，还有人说是加罗各国的别名，又据说4世纪中期倭王权曾派大军占领原弁韩地区，设置官家作为统治朝鲜半岛的军事据点，以日本府为统治机构。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直至今天依然是有着学术上的争议，但不管怎样，任那自古以来就是乐浪和带方两郡的重要中转地。

不过如果综合中、日、朝三方的史料，可以做出一个推论，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部在中国的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那片称“弁辰”的地域，存在有很多小城邦，而为了应对高句丽、前燕等强国巨大的压力而组成了任那联盟。当时尚未统一的日本列岛，很可能只是位于北九州的地方政权，比如邪马台国这样的倭国政权此时就已经将势力渗透到任那。这个时期开始，半岛南部应该很早就有倭人的移民和军事据点，倭国通过从本土派遣官人，来达到将势力渗透到任那的目的，所谓的“任那官家”很可能就是管理倭移民和军事据点的机构。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左右，与以金官为中心的卓淳、安罗等亲倭联盟不同，加罗从“任那”中分离出来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大伽倻联盟。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百济败于高句丽南迁之后，为弥补北方损失的领土，又于南朝梁天监十一年（512）获取了“任那四县”，次年又得到了己汶、带沙之地，大伽倻联盟为此与百济和倭国交恶，转而与新罗接近。

随着新罗的强大，任那被日渐强大的新罗蚕食，虽然此时已经大致统一本土的倭国试图联合百济努力维持自己在任那的势力，然而百济和倭国一直处于僵持状态，百济要求倭国召回亲新罗派的倭府官员，而倭国则一再要求百济任命的下韩郡令及城主听命于任那日本府并支持任那联盟。二者分歧无法弥合，这就导致了联合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也就能阻止以金官为首的洛东江下游流域在北魏中兴二年（532）左右被新罗吞并，随后以加罗为首的大伽倻联盟由于最终选择支持百济，因而在百济被新罗击败后遭到灭顶之灾。随着新罗入侵，大伽倻联盟灭亡，任那官家也被灭亡，至此，任那终于在北齐太宁二年（562）左右被彻底消灭。

由于任那地域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倭国获取铁等珍贵资源和大陆先进文化技术的来源，倭国对其极为重视，一直谋求恢复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所以让任那四郡给百济，似乎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当时，在朝鲜半岛，

随着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任那被百济吞并。

不过继体天皇在位期间，日本也的确卷入到朝鲜半岛的战争中，继体天皇大概在即位十九年后的526年，定都于大倭（日后的大和国）。不久，应百济的请求，从九州北部派援军前往朝鲜半岛。但是此时却爆发了与新罗勾结的筑紫君磐井（北九州的豪族）在九州北部的叛乱，史称磐井之乱，大和朝廷很辛苦才把叛乱平定下来。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继体天皇自507年即位后到定都大和的约二十年里，大和朝廷内部或者说各地区间围绕着大王宝座的争夺而处于混乱状态，也暗示了继体天皇（大和朝廷）无法掌控九州北部地区的豪族。

磐井之乱并不是偶然，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豪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这就使得皇室和豪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上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此外，大和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物部氏和苏我氏两者相互斗争，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

当用明天皇死后，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爆发，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濑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于是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推古女皇继位的翌年，即593年，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句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严重危机之中，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圣德太子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而倭国使节在隋了解到，文帝已革除北周武帝毁佛政策，正致力于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极其相近。因此当倭使回国向摄政厩户太子（圣德太子）汇报后，厩户太子遂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求佛经佛法的名义，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七年之后，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赴隋使节团，携带侯王国书，启程赴隋。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乌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清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诏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与隋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

尽管倭国执政者对隋炀帝不以君主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甚至不赏其使，但是，同隋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一事，对倭国说太重要了。所以，厩户太子与苏我马子决定，不因国书中的礼节问题有碍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当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国时，倭国执政者不仅设宴欢送，而且立即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任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与使节团同路赴隋的尚有八名留学生，其中四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奈罗译语惠明，另外四名为学问僧：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在隋学习很长时间，归国后在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交流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不过有人认为遣使“不单是为交流佛法，更是为了输入大陆文化”。还有人认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倭国来说，尽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交流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然而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销声匿迹， 而且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很有成效，但没有解决日本内部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此外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

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不断发起起义，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部民制因此衰落。

而随着部民制的衰落，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执掌朝廷政权的厩户太子（圣德太子）死后，再没有能压制大豪族苏我氏的人，苏我氏的专横日甚一日，其权势到了欺凌天皇家的地步。

譬如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苏我马子之后病死，其子苏我虾夷继承了“大臣”之位。推古女皇去世之后，虾夷更是独断朝政，由于推古天皇没有指定继承人就去世了，有力的皇位继承者有田村皇子和山背大兄王（圣德太子之子）。虽然山背大兄王有苏我氏的血统（圣德太子之母是苏我马子的姐妹苏我小姊君，山背大兄王之母是苏我虾夷的姐妹），但是山背大兄王贤能，同时有上宫王族（圣德太子一族）势力的支持，这些都是苏我氏专权的阻碍，所以苏我虾夷反而拥立没有苏我氏血统的田村皇子。苏我虾夷消灭了拥立山背大兄王的叔父苏我境部摩理势，拥立田村皇子即位，即舒明天皇。苏我氏的权势日盛一日，豪族们无法在朝廷中出仕，只有苏我氏一党能出仕。

舒明天皇在位时间不长便去世，皇后宝皇女即位，即为皇极天皇，苏我氏的专横更甚往夕。皇极天皇元年七月，因为久旱无雨，苏我虾夷在百济寺祭拜菩萨像、四天王像，众僧诵经、烧香，苏我虾夷进行祈雨。第二日，只下了一点点雨，之后就完全无雨，而皇极天皇在南渊川边祭拜四方，进行祈雨，不久雷雨大作，持续了五日，人们纷纷称皇极天皇为“至德天皇”。

这是苏我氏和天皇家在被认为是古代君主资格的祈祷力方面的较量，很显然天皇家取胜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苏我氏的不满，也加快了皇室和权贵之间的冲突。就在当年，又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为了营造自己的陵墓，势倾朝野的苏我虾夷及其子苏我入鹿下令征调人夫，连圣德太子一族的领民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圣德太子的女儿大娘姬王为此悲愤控诉……这种情况下，皇室和权贵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皇极天皇二年苏我虾夷托病，未经朝廷允许，私自将紫冠授予长子苏我入鹿。苏我入鹿成为大臣，此外，苏我虾夷还以苏我入鹿兄弟的祖母是物部守屋之妹为理由，使得自己次子取得了原属于物部氏的“大臣”之位。不过这并不能够让苏我家感

到满足，当时苏我入鹿欲拥立有苏我氏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为天皇，因此有力的皇位继承权者山背大兄王成了苏我入鹿野心的阻碍。为了清除这一障碍，苏我入鹿派巨势德太、土师娑婆连率军进攻山背大兄王所居住的斑鸠宫。山背大兄王凭舍人数十人，拼死抵抗，击杀土师娑婆连，但最终不得不逃往生驹山。此时山背大兄王的亲信三轮文屋君劝山背大兄王逃往东国以图东山再起，山背大兄王不愿再给百姓带来战乱之苦，又回到了斑鸠寺，和上宫王族的王子们一起自杀，有圣德太子血统的上宫王族就此灭亡。苏我虾夷听说了苏我入鹿灭亡山背大兄王一族的暴行后，也惊呆了，以至于发出了"此举危及了苏我氏"的感慨。

正当此时，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苏我氏专权日益以后，那些遣隋使陆续回国了，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天朝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在日益感到苏我氏骄横益甚，对皇室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最初中大兄皇子只能忍辱，直到有一天他在飞鸟法兴寺大规树下踢球，不意鞋随球落。这时一位有为之士拾鞋跪呈，中大兄皇子对跪敬接，而这位有为之士便是中臣镰足，也就是这个缘分，让俩人亲近起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结识以后，如鱼得水，两人向留唐归来的南渊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并开始密议诛杀苏我氏的计划。

按照中臣镰足的策划，他们首先成功地劝说了苏我氏一族中的苏我石川麻吕加入反苏我入鹿的阵营，为了巩固关系，中大兄皇子还娶了苏我石川麻吕之女作为自己的王妃，此外宫廷警卫佐伯子麻吕，以及海犬养胜麻吕、稚犬养网田等人也陆续参加了这个秘密同盟。

在当时，要想诛杀苏我氏并不容易，苏我入鹿在甘樫丘修建邸宅，并称之为"天子之宫门"、"谷之宫门"，更称自己的子女们为皇子，代替皇室执政，独断专行。苏我入鹿在苏我氏的府宅外修建栅门，旁边建造兵器库，每个门设水槽各一个，木钩数十个，以备火灾，苏我入鹿身边经常有力士持刀护卫。苏我虾夷命人在大丹穗山建造削寺，又在亩傍山之东修筑城池，建造仓库储藏箭支。每当苏我虾夷出入，定有五十位兵士随身保护。苏我氏聚集健儿，号称"东方傧从"，又使各氏族派遣子弟为苏我氏充当侍卫，号称"祖子孺者"。

皇极天皇四年六月十二日这天，皇极天皇在板盖宫大殿接见高句丽、百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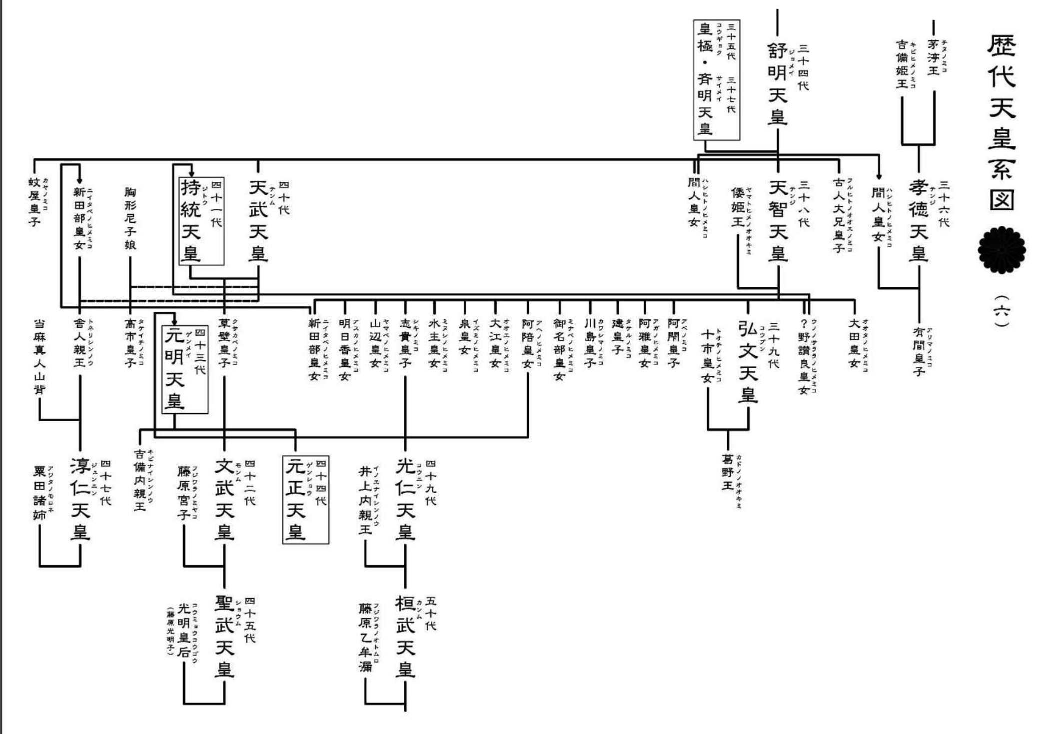
罗三国的使者，古人大兄皇子随侍身旁，苏我入鹿也奉诏入朝。由于苏我入鹿的猜疑心强，日夜剑不离手，辛亏俳优道化的劝说，苏我入鹿才解剑入殿。眼看着苏我入鹿等朝臣均在殿上，中大兄皇子立即命令卫门府紧闭宫门。

趁着苏我石川麻吕宣读上表文的时候，海犬养胜麻吕把两把剑交给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并安排准备行刺的这两人悄然隐藏在暗处，伺机动手，此外，中大兄皇子也持长枪隐藏在殿侧，而中臣镰足取弓矢潜藏在一旁。然而事情远非想象的那样顺利，宣读表文的苏我石川麻吕声音嘶哑，双手颤抖，入鹿感到颇为惊异，本应动手行刺的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也因为恐惧而踌躇不前。

中大兄皇子看刺客佐伯子麻吕等人畏惧苏我入鹿之威，不敢动手，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冲入大殿，佐伯子麻吕等人也飞快杀出，苏我入鹿大惊，站起身来，被佐伯子麻吕砍到一只脚。苏我入鹿倒在皇极天皇御座前，叩首问道："我有何罪？请天皇圣裁。"皇极天皇大惊，询问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答道："苏我入鹿屠戮皇族，意图夺取皇位。"皇极天皇听了后，默默不语，退入后宫，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于是斩杀了苏我入鹿。这日天降大雨，庭院中溢满了雨水，苏我入鹿的尸体只被盖了一层纸障，扔到了庭院中淋雨。

虽然古人大兄皇子逃回自己的宫殿，并说"韩人杀鞍作臣（韩人指中大兄皇子、鞍作指苏我入鹿），吾心痛矣"，但诸皇子、诸豪族却都在第一时间就加入中大兄皇子的阵营，举兵讨伐苏我氏，而苏我氏则在归化人汉直一族的拥护下，纷纷聚集在苏我氏的城寨周围，做备战准备，然而随着中大兄皇子派遣巨势德陀做说客，苏我军不战而溃，纷纷逃亡。次日，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焚宅自杀，就这样，长年权倾朝野的苏我氏宗家灭亡。苏我氏灭族之后，皇极天皇让位于同母弟轻皇子，是为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则向皇极天皇奉上皇祖母尊的称号，并册立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

事实上此时权力都在中大兄皇子的手里，其以皇太子身份掌握着实权，而孝德天皇几乎只是一个象征。在任命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之后，中大兄皇子随即开始了被后世称为"大化改新"的政治改革。



天智天皇前后天皇系图

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 大化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大唐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将土地收归国有，使所有部民成为国有公民，建立户籍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新税法；废除世袭氏姓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等。可以说大化改新是日本由落后的部民奴隶制国家向中世纪封建国家质变的最关键一步，是日本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大唐高宗显庆四年闰十月二十九日（659），以津守连吉祥为首的倭国使者团抵达帝国的东都洛阳准备觐见李治，随行的还有两名虾夷俘虏，一男一女。至于坂合部石布，虽然《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但坂合部连石布所乘的使船遭遇风浪，与津守连吉祥所乘使船失散，流

落到南海名为尔加委的岛屿时遭岛上土人的袭击，大使以下多人遇害，未能及时到达大唐。

在召见倭国使团时，李治还向使者详细询问了关于虾夷的情况，不过虽然在阿倍引田部比罗夫的率领下，大和朝廷对日本北部道奥、越国等地虾夷征讨中取得了值得炫耀的胜利，但大唐皇帝对虾夷人的命运如何并不关心。按照记载，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冬至之会时入朝觐见了皇帝陛下，然而就在一个月之后的十二月三日，却发生一件事，也就是《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中记载的“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大唐，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

西汉大麻吕是韩智兴手下的傔人，按照《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的记载：“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言其为“别倭种”，韩智兴的手下为什么要去“枉谗”津守连吉祥使团呢？这是一个历史谜团，不过从现有史料中可以分析出韩智兴的一些情况。韩智兴很有可能是一个混血的倭人，从其“韩”姓分析，其血统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的可能性很大。

韩智兴的两名傔人之所以“枉谗”津守连吉祥使团，很有可能是与此有关，不管怎么样，虽然在伊吉史博德的极力辩护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免除了流刑之灾，然而大唐政府已经对这批倭国使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李治以“来年必有海东之政”为由，传旨将津守连吉祥一行人羁押在西京长安，“海东之政”也就是李治接受新罗的请求，对百济进行讨伐。

津守连吉祥使团之所以遭到软禁，说明倭国统治者支援百济的政治意图暴露。早在永徽四年的时候，倭国曾经派出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使团，船上还有包括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在内的多名倭国贵族子弟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在此次遣唐使觐见皇帝陛下时，李治向倭国使者下达玺书，命令他们的国家发兵援助受到百济侵扰的新罗，显然倭国并没有理会。



倭国及朝鲜半岛三国人

这是由于倭国亲百济的核心人物是中大兄皇子，而且一直以来，百济和日本之间本来早有关系。佛教文化，大都是通过百济传播到倭国，与此同时，大陆的文化也经由百济流传到倭国，百济与倭国之间交流频繁与密切，当时的倭国十分重视与百济的外交，现今韩国尚留存有前方后圆坟，出土文物与日本畿内的古坟几乎相同，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由当时倭国身居高位的人送给百济的。此外日本的飞鸟川的一个支流取名百济川，百济川边有百济寺，百济寺旁有百济村，专门安置由百济来的技工。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条则记录了当年春正月，高句丽派遣了以乙相贺取文为首的一百余人访问倭国，直到七月十六日此人才离开，而仅仅两天之后，百济就灭亡了，史载，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大唐与新罗联军很快进围并迅速攻克百济都城泗沘，百济的义慈王投降。高宗显庆五年（660），百济灭亡了，从开战到战争结束前后不到十天。消息传来，着实令倭国大感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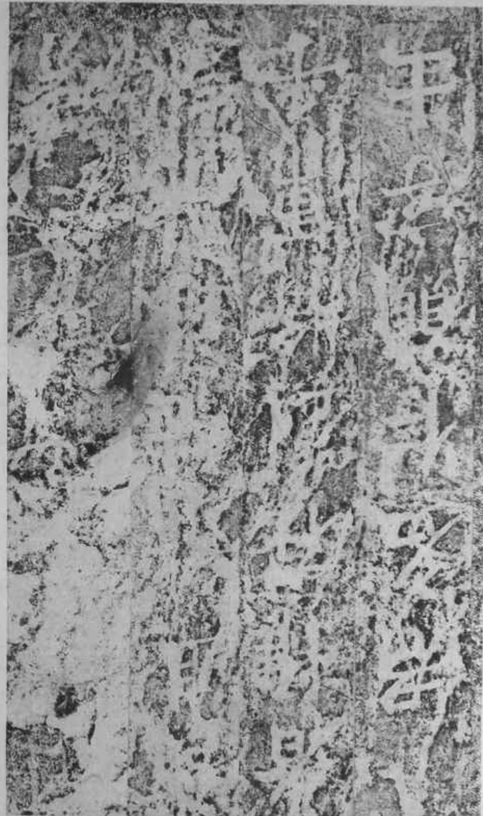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当乙相贺取文访问倭国的时候，其实大唐征伐百济的战争已经接近

尾声。乙相贺取文等人与倭国商谈了什么，无法得知。不过这一年，倭国尚在征讨道奥、越国地区的虾夷，牵制了不少兵力，加之使者被扣留，缺乏足够的情报，自然无所作为。不过，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在骏河国（今日本静冈县中东部）加紧制造船只，以备将来投入大规模水上作战使用。

尽管留守百济的唐军不过一万人，叛乱的百济人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任存、豆良伊、加林、珍恶山、内斯只、雨述一线以南的百济领土，并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于白村江流域的水路，迫使唐军的活动只能限制在泗沘、熊津等百济北方有限的地域之内，但这些乌合之众却没有能力消灭驻屯在百济的唐军。

刘仁愿，在《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其事迹只有从诸如《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等一些史料中得其端倪，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沘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纪功碑的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他的零星记载，可以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做出一些考证。

有关刘仁愿的身世，《纪功碑》记曰：“君名仁愿，字士元，雕阴大斌人。”依据碑文的记载，自北魏末年起，刘氏的先祖就居住塞上，进而成为塞北有名的豪族大姓。

刘仁愿纪功碑

贞观中期，刘仁愿因“地因膏腴，门承勋业,令闻之誉,佥议攸归”，起家为弘文馆学生，随后被选为右亲卫，因“膂力□健，胆气过人”，曾经随李世民出巡外地“手格猛兽”，受到李世民的赏识，特受恩诏“入杖内供奉”。后参与贞观十九年的征伐高句丽战争，因战功受到唐太宗的嘉奖，“超拜上柱国,别封黎阳县开国公，擢受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压领飞骑于北门长上”。贞观二十一年，任行军子总管，随英国公李世勣经略薛延陀，并迎接车鼻可汗，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改授右□卫郎将，　依旧□□供奉”。贞观二十二年，任行军子总管，经略辽东；同年，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永徽五年，任葱山道行军子总管，随卢国公程知节出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军无功而还；此次出讨，苏定方为前军总管，可能因为此次共同出征，加深了苏、刘二人的私人关系，同时，由于刘氏的才干，为此后苏定方选拔刘仁愿随军出讨百济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在这位当年曾经担任过李世民的亲卫，并随同李世勣、程知节、苏定

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大唐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的大唐将领的身上，鬼室福信讨不到任何的便宜，这种情况下，鬼室福信只能向倭国请援，试图借助外来势力改变半岛的力量均衡。

不过无法在刘仁愿那边讨得便宜、没有能力攻占泗沘城，不等于鬼室福信等人无法在唐军那边占点小便宜，譬如鬼室福信遣使要求将当时在倭国为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由日本接回去，以能够拥立其为王，并且请日本出兵相助的同时，还向倭国献上了掳来的百名唐军俘虏。

根据《日本书纪》中的记载："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又有:"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续守言等，至于筑紫。"以及"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被送到倭国的唐军俘虏中其中有一个叫作续守言，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之后，被安置在筑紫，也就是今天的北九州一带，而"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就是说，这些唐俘及其后代在《日本书纪》的编撰时期已经被迁移到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了。

而续守言是何人？又如何被俘的呢？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开成五年，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镌刻着铭文："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铁塔上记录的这件事，大概就是续守言等唐军被鬼室福信军俘虏的经过，可见那被送到倭国的一百零六名唐军是被整船俘虏的，被俘时间大概就在显庆五年九月左右。此外在日本的《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中所记载了那么两条信息，则更耐人寻味，其一"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又有"杨津连，八清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

这个八清水连与杨津连自称是王文度的后代，然而作为第一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是在新罗猝死的，他的后代怎么会到倭国呢？所以显然不太可能，不过从这里可以分析，鬼室福信俘虏的唐军，就隶属于王文度的部下，或者说是他东渡时所率领的船队中的部下，也许是在王文度死后，他们前往被围的泗沘城时，遭到鬼室福信等百济叛军的伏击而被俘的，所以所谓八清水连与杨津连也未必是王文度的直系后裔，但很可能是王文度手下部将的后裔。

有意思的是，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后，后来还和同样是俘虏的萨弘恪出仕于

日本朝廷，并在持统天皇三年（689）获赐稻子。持统五年（691）九月，又获赐银二十两。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续守言和萨弘恪还曾经担任过音博士的职务，也就是在教授儒家经典的时候，教学生正确使用唐语（中国语）发音的官员。持统六年十二月，又因参与“飞鸟净御原令”的编辑和日本国史的编纂，获赐水田四町。萨弘恪更是参与了《大宝律令》的制定，一时风光无限，他的后代此后还继续在倭国的朝廷中为官……至于续守言的后代，史料中没有记录。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多稀奇的事情，譬如在倭国为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扶余丰），也是被作为有识之士为大和朝廷所重用的。如果不是鬼室福信主动向倭国求援，则被扣在倭国为人质的扶余丰大概是此生难以踏上百济的土地，就如同被俘的唐人续守言、萨弘恪那样。

其实由于海岛物产贫瘠且自然灾害多发，日本对于大陆始终没有断过念想，而离它最近的朝鲜半岛显然就是最好的目标，直到现代，日本这套思路也基本没变过，总是想方设法染指朝鲜半岛，一旦成功便可向东觊觎。而在当时，如果强大的唐彻底攻占百济，那就意味着日本在朝鲜半岛将再无半点机会。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乘唐军立足未稳“赌”上一把，主动出击把唐军赶出半岛，那一切便又有了机会。一千多年后，日本人依然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了清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于是，日本人答应了鬼室福信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半岛，不过日本人和鬼室福信都明白，扶余丰是最好的“招牌”，自然都要捏在手里。所以当鬼室福信为了重建百济王朝而对倭国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归还作为人质留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丰璋)，使其继任百济国王，并且希望倭国为了复兴百济派遣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立即给予了回应。

为了积极响应鬼室福信的请求，同时实现对百济的遥控，中大兄皇子策动他的母亲，也就是齐明天皇，立即做出了决断，支持百济。而之所以中大兄如此肯定，是因为之前他所派出的阿倍比罗夫北讨虾夷，几乎是所向必克，自以为武力强大的中大兄此时认为可以西向开疆拓土了，并且他对任那的失陷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可以说，他始终未能忘怀那个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所谓日本府，现在他就是要趁着百济来乞援的机会，利用好这个绝好借口，干涉到战争中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庙议的时候，多数武将都表达了对渡海远征的支持，甚至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正是如此，大和朝廷很快就决定了出兵半岛，毅然慨诺做百济的后盾，加入了这一次的国际战争中，从而争取更大的利益。此外，鬼室福信的请求，对于日本来说，如果

出兵，不仅可以获得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同时也能够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与危机。

12．当头棒喝

虽然是皇太子中大兄实际掌政，但天皇毕竟还在，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动作。于是在庙议既定，齐明天皇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王朝复兴的决定之后，倭国开始动员。他们计划得十分周密，由于有中臣镰足相佐，做得非常彻底，首先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离开飞鸟，浩浩荡荡地兵发难波，直驱筑紫。

当然了除了天皇之外，还有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大海人、大田皇女、额田王、中臣镰足，以及众多宫人、侍从、巫女等随从，一起出征。此外，倭国还在各地筹措武器，征调士兵，集中了所有大小船只，为渡海作战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说，由于这次出兵规模太大，而且天皇、皇太子等众多皇子都随军出征，所以等于是从飞鸟向筑紫迁都。

而就在此时，朝鲜半岛上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显庆五年十月九日，新罗王金春秋率太子及诸军用了九天时间攻取百济尔礼城，并设置官守，有二十余城闻风而降。三十日，新罗军攻泗沘南岭军栅，斩杀鬼室福信军一千五百人，向围困在泗沘城中的刘仁愿部和新罗守军输送粮草，但没能解除鬼室福信设下的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大唐分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等为江、辽东、平壤、镂方等数道行军大总管，开始对高句丽实行新一轮打击，百济战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道。同时大唐政府还启用了一个布衣身份的老人，他就是刘仁轨，然而刘仁轨并非以熊津都督的身份被启用，这一职务暂由刘仁愿兼任，而是以带方州检校刺史的身份接替王文度的职责，同时兼任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处理百济事务，虽然职责相同，但在大唐内部则属于戴罪立功，甚至可以说等同于流放。

消灭百济后，大唐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这个时候，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熊津府城内。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李治闻警，于是“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来救仁愿。也就是说是李治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

刘仁轨别名正则，汴州尉氏县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困，爱好学习。遇上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不能安静地读书，每当劳动之余，就伸出手指在空中、在地上写写

画画，来巩固学得的知识，终于以学识渊博而闻名。武德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几句话。任瑰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异，按照朝廷的授官规定任命他为息州参军。

后来改任陈仓县尉，官署里有个名叫鲁宁的折冲都尉，骄狂放纵违反法纪，县署里没有谁能制服他。刘仁轨警告他不得重犯，但鲁宁凶暴蛮横依然如故，刘仁轨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把这事报告了朝廷，李世民愤怒地说："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能行吗？"把他召进朝廷责问。刘仁轨回答说："鲁宁侮辱我，我因此杀了他。"李世民认为刘仁轨刚毅正直，提拔他任咸阳县丞。

贞观十四年秋，李世民准备到同州设置栅栏圈围野兽打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表劝阻说："臣听说上面屋漏，下面的人知道；愚夫的计谋，可供圣人选择。所以周王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商王和筑墙的傅说谋划，因此得以长久统治国家，传位无穷，功业显于宗庙，幸福流于后世。陛下天性仁爱，亲行节俭，朝夕思念，百姓在心，一人流离失所，救民之心就深切忧虑。臣听说大驾想到同州围猎，臣知四季巡视游猎，是前代帝王的常典，不过事有沿袭改革，不必一定遵循。今年好雨及时，秋天庄稼极为茂盛，田野一片金黄，庄稼才收了十之一二，尽力收割，一个半月还不能结束，贫困无力的人家，谷子收完才准备种麦，就是按照平常的征派，对田家已有妨碍。现在既要供奉承办打猎事宜，又要修理桥梁道路，纵使非常简略，也需动用一两万人工，百姓正忙于收割，实在穷于应付。臣希望陛下少留一点万乘的尊严，倾听一人之言，推迟十天，待收割完毕，就会人人都有空闲，家家都得康宁。车轮慢慢起动，公私都得便利。"李世民下诏书慰劳说："卿职位虽低，竭尽忠诚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都十分赞赏。"不久拜受新安令，累迁为给事中。



刘仁轨

刘仁轨为官清廉刚正，在国臣中颇有威望，但为李义府所厌恶。显庆元年，刘仁轨因处理大理寺丞“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被贬为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刺史。

显庆五年，李治发兵征讨辽东，督海运遇风覆船，所部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你如果能办成这事（陷害刘仁轨），不用担心没官做。”李义府对李治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这不是人力所及。”李治将刘仁轨免去了官职，以普通百姓的身份随军。

刘仁轨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虽然曾经因为督粮，而粮船翻了受了处分，倒过一阵子霉，这时东山再起，自然要有所表现一番，更何况，当他得知自己被派往百济的时候，却看出了其中的机遇，年届六旬的他自信满满地放下“天将富贵此翁邪”的豪言，和儿子刘浚一同踏上了百济的功名之路（刘仁轨尚有一子刘滔，不知是否一同前往）。

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获悉王文度去百济时带了多少兵马，也不知道刘仁轨的兵马是从大唐本土带来，还是王文度的兵马，或者是百济其他地区的唐军，估计不下

万人。总之刘仁轨一踏上百济，就投入了一场恶战。

龙朔元年二月，道琛在熊津江口立起两道大栅，开始对泗沘城发起猛攻，攻杀一千名唐军。刘仁轨即刻整顿手下可支配的唐军，直接与据守熊津江大栅的道琛部展开对战。新罗方面则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为将军的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郎幢五军，按照计划打算从百济南部进发，自古沙夫里北上至豆良尹城，以配合刘仁轨的军事行动。

刘仁轨这边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迫使道琛军向大栅内撤，趁着百济人后退的时候，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造成严重的踩踏，道琛手下淹死者达到上万，道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

而金品日所率新罗五军则先在百济南境受到鬼室福信军的突袭，被迫撤离。十二日，新罗军屯兵古沙比城外，再次北边发起进攻，却毫无进展。四月十九日班师的路上，大幢、誓幢、下州三军在宾骨壤，上州、郎幢二军在角山分别遭到鬼室福信军伏击，前者抛弃大量辎重，后者小胜，但士气皆无，依然决定退兵。

新罗王金春秋在闻听败讯后本想追加金钦纯等将领前去救援，但金钦纯等人在行至加尸兮时得知新罗五军皆已撤返，便索性同其一同从葛岭道撤回。虽然新罗作战失利，不过刘仁轨却击退了围攻的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使得泗沘城的危机暂时解除。泗沘之围失败，道琛和鬼室福信并不甘心，为了抬高身份，二人分别自称领军将军和霜岑将军。刘仁轨写信劝降，却被道琛嗤之以鼻，并向信使表达了不甘亡国就戮、誓死抵抗的决心，之所以这么顽强，很显然，百济人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倭国援军的那个方面。

然而倭国援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大唐龙朔元年（661）正月，倭王齐明帝亲自率领中大兄皇子及数万军队出征，欲统兵渡海西征，结果刚走到九州，就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突然发病，据说由于朝仓宫是用麻弓良布神社的神树所建，所以皇宫遭遇落雷，鬼火使宫中许多人病死，发生了很多鬼怪作祟的事情。就在来到朝仓宫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四日，齐明天皇以六十八岁之龄突然死去了。

其实齐明天皇毕竟年事已高，禁不起舟车的劳顿，早就已经疲惫不堪。况且大军出行，并不会很快，正月初六由难波解缆西征，穿过一平如镜的濑户内海，到达福冈，驻扎在朝仓山下的行宫时，竟是五月了。此时已经夏季了，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不幸的是瘟疫也跟着大军凶猛而来，营中不断有人死亡，终于天皇也感染上了

疾病，到了七月便薨于行辕了。什么据说朝仓山上本来就有鬼，专摄天皇的灵魂，古时仲哀天皇就是被这大鬼吃了，都是鬼话，只不过此时，碰巧齐明天皇死了，于是军心震恐，认为是鬼来作祟，谣言四起，吓得皇太子中大兄不得不将出征计划推迟了，但是出征的大事已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同一天，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的身份居丧于长津宫，史称“素服称制”，他以一日代替一月，将原本应该服丧的十二个月变成了仅仅服丧十二天。此外，为备战，中大兄皇子还打算构筑朝鲜式的山城，并于所在之处建造了木丸殿。后世在木丸殿遗迹上又建造了惠苏八幡宫，祭祀齐明天皇和天智天皇（即中大兄皇子）。

中大兄皇子监国的这段时间内，首先是将倭国最高等级的“织冠”授予在倭国的百济王朝王子扶余丰，并将多臣蒋敷之妹嫁与他，然后派遣将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五千人作为先遣，分乘一百七十艘战船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并留兵支援朝鲜半岛的鬼室福信，准备全面介入到半岛的战争中去。当一船一船的倭兵冒着对马海峡的大风浪被送到对岸去的时候，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远征半岛，除了兵员之外，粮秣武器也都不能缺，据记录，随军前去的第一批箭就有十万支。

倭国先锋部队，前军五千人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到了鬼室福信的据点周留城之后，百济的气势大振，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为百济王，开始全面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据《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记载：“元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支、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三月，庚寅朔癸巳，赐百济王布三百端。”由此可见倭国对百济的支援是颇为尽力的。

再回头看看倭国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情况，他们是在显庆五年的九月十二日，也就是平定百济捷报传至京城的一个月后被解除软禁。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从西京长安起程，十月十六日再次来到东京洛阳，就是路上这段时间，百济局势因鬼室福信等人的抵抗再度紧张。

令他们意外的是，在洛阳他们没想到还能见到阪合部连石布船上的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名幸存者。从他们口中得知，阪合部连石布等人已经在尔加委岛遇难，而阿利麻等五人是偷了岛上土人的船才逃出险境。此后他们暂时滞留在洛阳，以至于赶上苏定方押解百济王义慈等众多战俘班师回朝。

天智天皇

秋乃田の
かりほの
庵の
苫をあらみ
我衣手は
露に濡れつゝ



十一月一日，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城则天门前观看了大唐政府举行的盛大献百济俘仪式。李治在责备百济战俘之后，对其进行赦免，并设宴款待。扶余义慈因不堪劳苦，几天之后就病逝，大唐政府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称号，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孙皓、陈叔宝的陵墓的旁边，暗示其为亡国之君，谥号为“绍王”。这个谥号，《三国史记》无载，以“义慈王”作为扶余义慈的称号。然《旧唐书·东夷列传》有：“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按《逸周书·谥法解》：所谓“疏远继位曰绍”，可以看出这个谥字并不好。

津守连吉祥使团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洛阳，显庆六年（661）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港口城市越州等待季风。显庆六年自三月起改为龙朔元年，四月八日，顺着西南风，他们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旅程。经过九日八夜的航行，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船舶竟然行驶到耽罗岛。耽罗虽是个岛屿，但在当时属于半独立的国家，隶属于百济，耽罗王拥有百济一品佐平的头衔。大唐对百济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不可能不对耽罗国产生震动，那么为了维护势单力薄的小岛国的和平，耽罗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可能出于这一点考虑，耽罗王子阿波伎等九人跟随津守连吉祥使团，前往倭国寻求和平的出路，而这时的倭国，已经是箭在弦上。

津守连吉祥使团与耽罗使者则是在十四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回到倭国，他们的外交使命才告结束。倭国政府此时才获悉大唐平百济的一些细节，不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对百济事务的介入已经开始，但此时，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回国的扶余丰成为百济王，与鬼室福信协力，一度使战况朝有利百济一方的方向发展。可是渐渐地这两个人意见变得不一致，并因此失和。其根本原因是，叛军主将鬼室福信在原百济军中很有威望，如今已经变得愈发飞扬跋扈，而百济王扶余丰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一个树立正统的“招牌”，显然这是扶余丰无法容忍的。因此只要假以时日，百济叛军内部必然要生变。

果然，当年十二月的时候，扶余丰以周留城土地不适合农商为由，要求迁都至避城。鬼室福信以及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认为避城距离新罗只有一天的行程，就在唐和新罗联军的眼皮底下，难以防守，但扶余丰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惜绕过已经处于唐军控制下的几处大栅，迁移至避城。然而结果是“果不出鬼室福信所料”，龙朔三年二月，新罗将领金钦纯、金天存采用火攻，连下居列、居

勿、沙平、德安这四城，对新都避城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以至于扶余丰不得不乖乖迁回周留城。

四月十二日，大唐在新罗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纳入大唐的羁縻州体系之中。在如此形势之下，倭国的中大兄大王再次出手，于三月派出前、中、后三军，这三个军分别由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率领，共二万七千人，从博多湾越过壹岐·对马，向朝鲜半岛进发。这段行程十分艰苦，因为风平浪静的日子比较少，加之逆着海流前进，途中还遇到了风暴，不过总算是成功地到达了。刚刚登陆，倭军就力图从后方牵制新罗的进攻。事实上，他们做到了，由于登上朝鲜半岛的倭军开始先捡“软柿子”捏，进攻新罗的军队，再加上由于有扶余丰这块“招牌”，倭军得到不少百济人策应，新罗人不敌，倭军攻取了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不过倭军的援助，并没能够缓和扶余丰君臣的矛盾，没过多久，百济内部便发生内讧，鬼室福信觉得有必要在他与扶余丰之间做一个了断，于是假装卧病，想诱其上钩，可扶余丰却是将计就计，倭军的协助下首先动手，反将鬼室福信生擒，据载为防止鬼室福信挣脱，在捆绑的时候，还特意用皮绳穿透其手掌。在经过一番犹豫后，扶余丰最终将鬼室福信处决，而鬼室福信手下的亲信也悉数遭到清洗。

飞鸟时代的倭国武士

可是经过清洗，百济的残余力量就此被严重削弱，以至于军中却也找不到几个真正会打仗的将领了。唐军未动一兵一卒，百济叛军就自己把自己打残了，这种情况下，百济王扶余丰又闻唐兵骤至，于是急遣使者到倭国求援。而此时摄政的中大兄皇子正积极营造战争器械，并向全日本岛内发起动员，先后至少派出了三批援军。

最早的一批，就是显庆五年（660）十月到十一月间，护送扶余丰到百济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领的五千人，朴市秦造田来津与狭井连槟榔一直跟随在扶余丰左右，也是扶余丰得以诛杀鬼室福信的依靠。

第二批倭军到来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八月，第二批倭军的具体兵力，《日本书纪》没有记载，而较晚一些的日本史书《扶桑略记》则记为一万七千人，

而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第二批倭军的任务是为百济复兴军输送“兵杖、五谷”，同书天智元年所言为鬼室福信提供十万支箭、五百斤丝、一千斤绵、一千端布、一千张牛皮、三千斛稻种，为扶余丰提供三百端布，当由这一批军士护送。

第三批倭军，就是龙朔三年三月，由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率领的二万七千人。不过这支军队没有直接援助鬼室福信，主要在新罗和百济边境作战，以上三批倭军累计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九千人。

而从倭军将领的出身来看，大抵出自苏我、物部、阿昙、三轮、和迩、吉备这些贵族，但都是失势的贵族，而从其经历上看，都是过去参与朝鲜半岛外交事务的官员、一些能征善战的将领，此外还有受到责罚的官僚和卷入政治斗争的倒霉蛋，成分略显复杂。而作为倭国大王家族的直系成员以及中臣氏却没有人担任将领之位，这一点似乎表明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在安排这场战争的时候可能还有若干政治上的考虑。兵士来源地有骏河、庐原、甲斐、常陆、道奥、但马、播磨、备中、备后、赞岐、伊予、筑紫、丰国、肥国，基本上遍及日本列岛的各个地方，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对于倭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动员的大战。这些士兵的身份可能主要来自大化革新以来的公民，从他们的名字里还可以看到原来部民制的痕迹，大化革新伴随着东国的移民潮而得以贯彻，连白凤四年（653）之后，在占领虾夷土地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道奥国信太郡也派出了兵士参战，体现出一种对海外扩张的强烈渴望。

他们大体上是由郡一级的豪族带领下，先来到九州岛，在中津郡接受中臣镰足的整理。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傍晚左右到达位于玄界滩的中央孤岛——御息岛（冲之岛），在那里进行一夜的休息和祭祀活动。今天的御息岛留下了大量当年的遗物，有“海上的正仓院”之称。在祈求完风浪平静之后，扬帆前往朝鲜半岛，投入军事战争之中。

但是倭国的援兵尚未到达战场，就遇上了大唐孙仁师统率的生力军。

其实当倭国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治当即派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立即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并明确要求统舟七千进驻熊津城，当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的时候，一场战斗随即爆发。《旧唐书》记载“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那么这个“破之”破的是谁呢？由于此时百济叛军尚控制着加林城，扼住了锦江水路通往熊津城的要道。在这种情况下，已达到物德岛的

孙仁师可以选择当年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路线，自熊津城以北绕经党项城进入新罗境内，然后南下至三年山城后，往西挺进熊津城。根据后来大唐将百济的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指出这应当是纪念在此地发生与倭人的交战而改名，由此推定孙仁师并没有走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老路，而是在锦江入海口以南登陆，并与倭军发生交战并取得胜利后才陆路北上到达熊津城。

还有一点是，当初李治“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可是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援军渡海到达熊津，并与刘仁轨会师，却前后历经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这其中为什么时间这么长？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孙仁师大军可能是与倭军在古沙夫里有所交战。第一批倭军属于扶余丰的护卫队，当随其左右。第二批倭军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运送军粮物资，是否被分配分兵把守百济城池无从得知，而第三批倭军的动向，根据《日本书纪》后面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在氐礼城，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孙仁师部应该是与第二批和第三批的倭军有所交战。

不过不管怎么样，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鬼室福信之死与唐军的增援，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朝廷诏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领援军渡海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唐军士气振奋。事实上，这个时候，唐与新罗联军的兵力不算很多，史载是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援助刘仁愿，也就是可以肯定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的唐军只有七千，加上原来的唐军，兵力也就两万不到，而据《册府元龟》卷三百五十八，此时唐军方面可投入的水军人数有两万，至于陆军人数则是不详……

而新罗方面，虽然此时已经开始举国动员，前前后后也就征召了四万兵力，而且由于战斗力有限，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分散驻守各处，七月十七日，新罗王金法敏亲率金庾信、金仁问、金天存、金竹旨等二十八名（一说三十名）将领，与唐军在熊津城会师，从而组成了唐与新罗联军，兵力大概也就两三万人。

在百济的唐军的主要将领，除了刘仁愿、刘仁轨、孙仁师外，还有刘德敏、杜爽以及前百济王子扶余隆。其中刘德敏是三朝老将，而且位阶甚至超过刘仁愿，而杜爽则参加了苏定方平定百济的战争，扶余隆回到百济的时间，则没有确切的记载。至于柴哲威，他是柴绍与平阳公主之子，历右屯营将军，袭爵谯国公，曾任安西都护，永徽四年（653）二月，他的弟弟驸马都尉、襄阳郡公柴令武被卷入房遗爱谋反案，柴哲威亦受牵连，被流放岭南邵州，后再度起用为交州都督。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柴哲威是死在了交州都督的任上，但近年在韩国发现的《柴将军精

舍草堂碑》改变了这种说法。柴哲威于龙朔年间，被授予含资道总管的职务，来到朝鲜半岛，与刘德敏或为上下级，或为前后任，没多久又被改任为加林道行军总管。加林城是百济的水陆要冲之城，也是百济叛乱的重要据点。

这么多战将云集，自然是要开始商议具体战略的，此时摆在唐军面前的有两座城池，首先面对的是加林城，这里是一座水陆要塞，城池坚固，一旦夺取，就可以掌握整个战场主动权。另一座则是前面提到的周留城，包括扶余丰在内的百济贵族都躲在那里。

有人建议先攻打加林城，说“加林城水陆之冲，盍先击之”？也就是先全力打下加林城以获得战场主动，但是刘仁轨则提议先攻打扶余丰困守的周留城，他认为“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自下”。这意思就是用兵的原则是避开坚实部位攻打薄弱环节，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其实之所以刘仁轨主张攻打周留还有一个原因，此时大唐在百济故地最大的问题并非来自军事而在于政治。百济之所以降而复叛，主要原因还在于包括扶余丰在内这些旧贵族，正是他们所谓的“正统”影响到了当地百姓的民心，先打掉周留城，就可以对百济人在心理上实现收服，那么接下来其他各个地方自然会不战自溃。

经过激烈争论，众人决定依照刘仁轨的策略，由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而出，自熊津江进入白村江，从水路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直取周留城，同时留出一部分机动兵力用以监视、威慑加林城。

而百济与倭军方面，由于受到唐军和新罗军的连续打击，扶余丰所部损失很大，从相关的记载来看，百济叛乱早期的首领扶余自进与鬼室福信合作较为紧密，但扶余自进把主要任务放在与倭国的外交联系上，似乎没有冲在战争的前沿，而黑齿常之部在任存山，却并没有与占据任存城的扶余丰所部迟受信联手，由于《黑齿常之墓志铭》甚至抹去了黑齿常之在百济叛乱这四年里的经历，使我们无法得知当时黑齿常之的真实处境，而事实上黑齿常之与他的手下自泗沘城逃至任存山自保之后，便很少有史料记载他的情况，所以，事实上，扶余丰能够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倭军。

如前面所说，倭军前三批的部队早已进入百济境内，总计约四万九千人，这是

主要作战力量。从数量上来看，虽然唐军处于绝对劣势，但事实上对大唐来说，这些兵力已经够用了。当唐军开始向周留城进攻的时候，倭国的第四批军队，即由庐原君臣所率领的人数在一万人左右的大规模船队此时正自锦江入海口逆流而上。

关于庐原君臣，《日本书纪》记载："于是百济之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将军等应预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按照《日本书纪》的惯例，记录将领模式为"官位、姓氏、名"，而"庐原君臣"只是姓氏，所谓的庐原君臣，其实是指庐原国造，《旧事本纪·国造本纪》中记载："卢（庐）原国造…… 《和名抄》云，今骏河国卢原郡卢原乡。"也就是说，早在齐明天皇六年（660），骏河国就开始制造战船，庐原君臣所率的水师其实是倭国花了近四年时间所组建的庞大船队。

龙朔三年（663）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方水军对峙。不久，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领的大军也抵达，双方开始展开对峙。《三国史记·文武王纪》中新罗王金法敏于战后的咸亨二年（671）给薛仁贵的回信中，追述当年的场景时写道："（唐罗联军）行至周留城下，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或为'江'字之误），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很显然，在白江（白村江、白马江）边上停泊的"千艘"倭船，表明倭国水军已经到位，此外岸上则有百济的精锐骑兵守护倭船。

龙朔三年八月十七日，唐与新罗联军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新罗骑兵首先对岸上的百济骑兵发起冲锋，百济匆忙应战，陆上一片混战，外据点被逐个攻克，百济和倭国守军纷纷投降。倭军水师急忙护送扶余丰，抢夺船只，将船全部开到江中，以保存实力，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白村江口不得不面对刘仁轨等人的船队。

白村江，是朝鲜半岛上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白村江口就是中国史料里所称的白江口，也就是白村江下游的终点，汇入加林城与珍恶山的界河古多津，而古多津距离出海口尚有一段距离。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就能得到倭国来自海上的支援，从而继续据险固守，所以，白村江成为周留城存亡的关键。先期到达的唐军预想到倭国援军誓必前来，于是在白村江配备了战船170艘，严阵以待。由于唐军水师阻绝了日本水师对周留城的增援，所以双方的水战是在所难免的。

八月二十七日，倭国援军赶到，此时，大唐水军七千余人，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水兵一万余人，战船一千余艘。倭国水军虽然在人数和船只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大唐水军船只坚固，武器装备也比倭军优良。当时唐军的常备战船主要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同时相关的资料还记载一种被称为“火舰”的战船，可能是装配了火器的斗舰，而倭船体积相比之下要小得多。日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由于唐军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很快败下阵来，但刘仁轨并没有下令追击，而是要求唐军在江上摆下阵势，继续严阵以待，毕竟唐军的优势在质量，倭军则拥有数量优势。

刘仁轨是否精通水战，现有史料无法完全证明这一点，不过，熊津总管刘德敏却是个精通水陆各种战法的老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为其撰写的《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称其“三门五垒，得破敌之奇谋；火舰云梯，总行军之妙法”。若他果然在水军之中，必然成为最可靠的后盾，使唐军的水战在技术上得以保证。

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鲜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日方将领却试图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很显然，倭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的确，两方面军力唐军略逊于日本，可这不等于倭军就一定会取得战斗的胜利。当倭军水师未加整顿部署，便倭军将领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军水师时，决战开始了。这场水战，史称白江口之战，日本则称为白村江之战……

关于这场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颇为简略，《通鉴纪事本末》记道：

龙朔三年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岘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军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降。

《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中仅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

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三·刘裴娄》中的记载则更为简略：“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

与此相反，倭国史籍却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记载：“戊戌，贼将至于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句丽。”

而朝鲜史料也有记载，《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中这样写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综合中、日、朝三国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当时的情形：

八月二十八日，倭国诸将与百济王，水师决定依靠船只数和人数上的优势先发制人，可渡海远来没有休养就与严阵以待、以逸待劳的唐军决战，而且没去考虑风向、潮流等问题，而是心存侥幸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实为不智。最重要的是，向唐军船队发起突击的各船刚开始就乱了阵形，其结果自然是陷入大唐水军的包围了。

由于唐军以楼船、海鹘压阵，以斗舰、走舸分走左右两翼，占据江面两侧，也就是所谓的 “左右夹船绕战”，唐军将倭船辖制在中间，于是冲在前面的倭船便如入彀中，左右被唐船压制，无法回旋，面对唐军的巨舰冲撞，许多倭军士兵被迫跳船，溺水而亡。同时，部分唐军登上倭船与其进行白刃战，保护扶余丰的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嗔”，奋勇击杀数十唐军，但最终还是被唐军斩杀。

此外，先前的回合由于水战爆发地点河道过于狭小，如此众多的船只在拥挤的状态下无法展开，唐军方面可能没有过多地使用火器，但随着后面几次交锋的激烈程度加大，并且战争地点开始向河道宽阔的下游转移，带有火器的斗舰开始作为实施火攻的主力，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于是大

批倭国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此战，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扶余丰脱身逃走，其宝剑被缴获。留守周留城的扶余忠胜、扶余忠志以及倭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于九月七日各自率领残部连同滞留在城中的耽罗使者向唐罗联军投降，周留城不战而下，白村江之战结束。


画家笔下的白村江口之战

九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枕服岐城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倭国残余船队聚集到氐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倭军会合，并随后撤退回国，不敢再与唐罗大军争锋。此时，百济只剩下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还没有攻克，于是在短暂休整之后，十月二十一日，唐罗大军开始围攻百济复国军的发源地任存城，没想到守将迟受信抵抗相当顽强，连续攻打一个月也没攻破。这时，刘仁轨巧妙地招降了在任存山坚守的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并为他们分发粮食武器，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虽然孙仁师说“外族属国心性放纵不可信任，如果给予武器粮食，就是为他们反叛提供条件”，刘仁轨却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后果然如此，黑齿常之很快攻陷任存城，使得迟受信抛弃妻儿，投奔高句丽而去，百济国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至此，历时四年的百济叛乱落下帷幕。

不过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却不仅限于这些，唐与新罗联军在白村江所歼灭的倭军主要是第一批的五千人和第四批的庐原君臣水军，总计在万人之上，而以阿昙山背连比罗夫为首的第二批倭军同周留城的百济残留守军一同向唐军投降，以阿倍比

罗夫为首的第三批倭军则同扶余自进为首的百济军退回到倭国本土。从实力的角度来说，倭国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经营了四年的庞大水师的覆灭，虽不至于有倾覆之危，但足以震慑岛内。

此战不仅彻底粉碎了称制摄政的中大兄所具有的野心，还使得他深恐唐军进攻本土，于是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防线。其中，在九州的太宰府所建的“水城”最大，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一千多，底部宽八十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五米深的水沟。水城下通过木樋相连，从大宰府侧的御笠川取水，使博多湾侧形成宽数十米、深度达四米的蓄满水的堀。严格说来“水城”不是城，而是与我们中国“万里长城”那样的围墙。此外，倭国还修建了大野城，这是一座被长达六公里的土垒所包围的山城，城池位于海拔四百多米的四王寺山上，此外，还有用石头建造的石垒以及众多的分层捣实泥土而成的土垒。在土垒与石垣环绕之中，建造了粮食仓库、武器库、兵营等设施。为固守城池进行防御战，石垣十分坚固。这些为守护“大宰府”而建造的水城和大野城等城，都是来自百济的亡国人士所指导建成的。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这些百济人对于倭国的发展影响很大，然而，大唐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667年（唐乾封二年，天智天皇六年），中大兄皇子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中大兄皇子称制七年后才在次年（唐总章元年，天智天皇七年）正式即位，这时他四十三岁。不过在习惯上，并不把这一年作为天智元年，而把他开始称制的662年作为元年。在即位之后，天智天皇册立同母弟大海人皇子（日后的天武天皇）为大皇弟。中大兄取得政权的过程得到其弟大海人皇子的帮助甚大，也因此封大海人皇子为大皇弟，但即位之后仍难以避免政权斗争与猜忌，与大海人皇子逐渐疏远。

唐总章二年、天智天皇八年（669）天智天皇派东宫大皇弟大海人皇子至内大臣中臣镰足府，赐姓藤原，次日藤原镰足卒。天智天皇十年，又任命长子大友皇子（日后的弘文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太政大臣。同年，大海人皇子辞退大皇弟，大友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也就在这一年，大唐派郭务悰访日。这次访日的人数居然多达二千人，其中唐人六百人，百济送使一千四百人，分乘四十七船，于十一月抵达日本比知岛。如此庞大的访问团，让日本方面惊骇不已，如临大敌。不过，这次访日却未能进京面见天皇，原因就是天智天皇在这年十二月三日，于近江大津宫病死。

天智天皇在迁都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大唐臣服，开始以大唐为师，谋求新国家的建设。在天皇的主导下，倭国制定了被称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地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地导向为律令制国家。接着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在另一方面，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下一个肯定轮到高句丽，唐总章元年（668），大唐以李世勣为统帅，攻陷平壤，存在七百多年之久的高句丽彻底灭亡，李治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大唐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句丽终成大唐治地。

不过另一个人的命运却颇为令人感慨，那就是刘仁愿。

龙朔三年十一月，刘仁愿与孙仁师等人回大唐报告百济战况，刘仁轨则代刘仁愿镇守，为检校熊津都督，镇守百济。刘仁愿回长安后，李治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李治“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句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句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李治深纳其言。

然而在讨伐高句丽的作战中，因为新罗将领金仁泰（就是曾经和刘仁愿并肩作战的那位）的掣肘，身为卑列道行军总管的刘仁愿没有能够及时赶到前线，被朝廷以“征高句丽逗留”的罪名逮捕下狱，本来是要斩首的，因为毕竟还是为帝国立下过很多功劳的，最后被流放姚州了事。此事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总章元年）八月，辛酉（初九），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句丽逗留，流姚州。”而《新唐书东夷传》中也有记载：“刘仁愿与勣会，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

《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七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刘仁愿，贞观中为右威卫将军、卑列道行军总管，与司空李世勣期，会逗留不赴，驿召至京。帝谓曰：“自古军法，后期皆死。”刘仁愿奏曰：“臣前后使四十余人往李世勣处，涂路荒梗，悉皆不达，最后一使始得至大军。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击平壤，李世勣兵马遽以旋归。事有因缘，非臣之咎。”帝曰：“汝领兵万余，咸劲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

此分疏，更为矫诈。”遂令拽出，欲于庙堂斩之，刘仁愿号诉不辍声，帝以其有镇守东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姚州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唐武德四年时，安抚大使李英置为羁縻州，后唐人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二十余羁縻州，上报武陵县主簿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唐李治,请设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大唐廷下诏设置姚州都督府。但是，这里远离唐王朝的中心地，此前担当都督府长史的李孝让、辛文协诸人均被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杀害，以至于武周后期著名官僚张柬之上疏，请求罢黜姚州都督府建制。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之后，有关他的任何蛛丝马迹即不见史载。



遣唐船

第五章　落日恒罗斯

13．经营西域

应该说，大唐帝国的运气相当不错，在此之前，前隋在西域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经营，可以说是铺垫了很好的基础，而当西突厥因内乱而于659年自行崩解时，吐蕃和大食的东进战略还均未展开，一时间，并没有较强的力量来与大唐争抢西域，也因此，大唐帝国得以在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展开经营，施展各种手腕来分化、控制那些游牧部族和其他西域小国，从而扩张势力。在短短十余年内，李世民在位中后期至李治登基之初，大唐相继攻灭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小国，并在其上设立州、县，从而将这些曾经的国家统统纳为本土，此外还迫使伊吾、鄯善等国称藩，最终几乎将整个西突厥汗国之地尽数化为了帝国的羁縻州。此后，大唐帝国又在之前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基础上，继而又夺占了天山北路，使得自身的控制范围一直扩张到了里海，而加上之前已尽得的东突厥故地，可谓是拓疆数万里……

不过虽然帝国先是攻灭了高昌等国，接着是一举平灭西突厥，从而在西域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称雄了十几年，但平心而论，大唐接连几次取得的胜利其实颇有些投机取巧，和攻灭东突厥、薛延陀时一样，在灭西突厥时也基本是依靠对手内乱并自行崩解，然后趁机成事，也正因此，唐帝国在控制了这大块土地之后，需要做的是“经营”，这也正是大唐设立安西都护府的原因所在。

不久后大食势大，尽踞波斯本土，对大唐在西域的地盘构成严重威胁，唐朝迫切需要扶持一股力量以遏制对方，正在此时，显庆五年（660），位于葱岭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降唐，于是在次年，也就是龙朔元年（661），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并在西域增设了一个月氏都护府，以吐火罗阿史那氏叶护可汗为都护，同时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府，统辖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而为了监督、辅助这三个都护府，唐廷还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驻扎了一部分唐军，受安西大都护府直辖。

所谓安西四镇，其实就是于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碎叶）四镇置重兵，称安西四镇，史载：

龟兹都护府　本龟兹国。其王姓白，理白山之南。去瓜州三千里，胜兵数千。贞观二十二年（648），阿史那社尔破之，虏龟兹王而还，乃于其地置都督府，领蕃州之九。至显庆三年（658），破贺鲁，仍自西州移安西府置于龟兹国城。

毗沙都督府　本于阗国。在葱岭北二百里，胜兵数千，俗多机巧。其王伏阇信，贞观二十二年入朝。上元二年（761）正月，置毗沙都督府，初管蕃州五。上元元年，分为十，在安西都护府西南二千里。

疏勒都督府　本疏勒国。在白山之南，胜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贞观九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上元中，置疏勒都督府，在安西都护府西南二千里。

焉耆都督府　本焉耆国。其王姓龙，名突骑支，常役于西突厥，俗有鱼鳖之利。贞观十八年，郭孝恪平之，由是臣属。上元中，置都督府处其部落，无蕃州，在安西都护府东八百里。

十六国都督府则分别为：吐火罗国阿缓城置月氏都督府（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厌哒国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条支都督府（今阿富汗加兹尼）、解苏国数瞒城置天马都督府（今塔吉克斯坦境内）、骨咄施国沃沙城置高附都督府（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罽宾国遏纥城置修鲜都督府（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帆延国罗烂城置写凤都督府（今阿富汗巴米扬）、石汗那国艳城置悦般州都督府（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护时犍国遏蜜城置奇沙州都督府（今阿富汗北境希巴尔干南）、怛没国怛没城置姑墨州都督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西北）、乌拉喝国摩竭城置旅獒州都督府（今阿富汗北境）、多勒建国低宝那城置昆墟州都督府（今阿富汗穆尔加布河流域）、俱蜜国褚瑟城置至拔州都督府（今中亚苏尔哈布河流域）、护密多国摸逵城置鸟飞州都督府（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久越得犍国步师城置王庭州都督府（今塔吉克斯坦卡菲尔尼甘河下游库巴的安），同时在波斯国末代王子卑路斯驻地疾陵城置波斯都督府（今伊朗扎博勒）。按：此时萨珊王朝已被大食所灭。

在此时，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地包括安西四镇、濛池都护府、昆陵都护府（西突厥故地）、昭武九姓、吐火罗乃至波斯都督府，大体相当于今日新疆与中亚五国、阿富汗的总和。然而随着吐蕃的迅速崛起，这块西突厥故地很快便燃起了战火，甚至一度呈现出两家苦苦争夺的态势。

龙朔二年（662），龟兹在吐蕃人的扶助下脱离大唐的羁縻统治，由此拉开了唐、蕃军事冲突的开端。对于龟兹的叛逆，大唐第一个措施就是遣右卫将军苏海政

为风海道行军总管，统军前往镇压，并令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二人率部从征，可苏海政却在途中听信谗言，冤杀了弥射，一时间群情激愤，西域各国、各部尽皆恨怨不平，各部都非常愤怒，鼠尼施（五咄陆之一）、拔塞干（五弩失毕部之一）逃走，虽然苏海政与阿史那步真追击，讨平二部，但平叛归来的大军到达疏勒南部时，弓月部却引来了吐蕃兵马，眼看局面不利，苏海政居然以军资贿赂吐蕃，从而使得双方议和，然而此事之后，大唐的政治威信却是已经不再了。

不久弥射部将阿史那都支率众立反，自封为西突厥可汗，并“收其余众，附于吐蕃”，大唐的昆陵都护府自此废置。同年十二月，阿史那都支出兵为弥射复仇，攻陷大唐的庭州，杀刺史来济。乾封二年（667），阿史那步真死，一时间，十姓无主，其部下李遮匐随即带领部众叛离唐朝，和阿史那都支一样依附了吐蕃，濛池都护府自此亦废。

控制西突厥降部的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的倒戈所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时间西域诸部纷纷叛离唐朝，四镇大半易手，而吐蕃气焰大涨，更不将大唐放在眼中，大唐自此在西域衰落，无力再与吐蕃相抗。大势所趋，很快地处要冲的吐谷浑也易帜投蕃。这种局面助长了吐蕃人的信心，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彻底和大唐撕破脸皮，挥师大举进攻西域，轻松击败边境上与自己对峙的唐军，继而攻陷了大唐十八个羁縻州，又挟于阗一道攻陷了龟兹国的拨换城，从而使得作为大唐在西域根基的安西四镇被迫罢废。

唐廷为了挽回颓势，出动五万大军护送吐谷浑王还青海，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十余万人，以护送吐谷浑王回国的名义征伐吐蕃。八月，唐军进抵大非川，将进乌海，薛仁贵认为乌海险远，军行艰难，辎重难以随军前进，故而留郭待封领两万兵屯于大非岭上保护军需辎重，而自己率军先行，至河口时，遇到吐蕃军，薛仁贵一战而击破吐之，斩获略尽，收获其牛羊等万余头，回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然而郭待封乃是曾任安西都护的郭孝恪之子，此次出征为副，故而一直心中不满，此时他竟是不听号令而提前率领粮草辎重出发，其军进至乌海时，刚好吐蕃二十余万大军来救乌海，郭待封所部战而大败，辎重尽失。这种情况下，薛仁贵只得率军退而屯驻于大非川。吐蕃论钦陵集兵四十万围杀，唐军大败，死伤略尽。薛仁贵无奈，只好与论钦陵约和，仅以身还。



壁画《礼宾图》

唐军之败，将帅不和系原因之一，但主因是两方力量悬殊太大，吐蕃兵力三倍于唐兵。唐军孤军深入，运输艰难，地形不熟，故有此败。消息传到长安，李治大怒，令大司宪乐彦玮至军中查问，将薛仁贵、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押送京师。同时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出击吐蕃，但不久之后，姜恪病死，于是大军不得不班师而回。

大非川之战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此战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失败，大唐十余万大军片甲不回，吐蕃凭此战而名声大震，吐谷浑亦成为吐蕃别部。此外，这场惨败牵连到了西域，使得大唐的威名更是摇摇欲坠。这种情况下，大唐自然需要实施反击了。咸亨四年（673），弓月所部南结吐蕃，攻打疏勒，李治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然而萧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主动入朝请降。李治赦其罪，遣归国。一时间，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也都纷纷重新降唐，大唐由此稳定了西域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到上元二年（675），唐朝已经基本恢复了在天山南路的统治。

然而从仪凤元年（676）三月起，吐蕃频繁对陇右鄯州、廓州、河州、芳州诸州发起进攻，将唐廷的注意力吸引在西北，借以掩护其在西域的行动。仪凤二年（677）吐蕃突袭西域，再次攻陷安西四镇。这种情况下，李治下令以尚书左仆射乐城县公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并诏大发兵讨吐蕃。

仪凤三年（678）大唐再次出兵进击吐蕃，大唐以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之所以选中李敬玄为将是因为这位三年前才升任中书令、封赵国公的书生与刘仁轨不和，当时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关于应对吐蕃的军情，刘仁轨每有奏请，李敬玄都持有不同意见，从中阻挠，二人因此交恶，刘仁轨知道李敬玄没有将帅之才，故意奏请道："镇守河西，非李敬玄不可。"知道刘仁轨这是在害自己，李敬玄自然是极力推辞了，可是李治这个时候却对这位自己曾经的侍读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这意思是说如果"刘仁轨如果需要朕去，朕就会主动前往，卿不得推辞"，于是李敬玄就这样代替刘仁轨成了"洮河道大总管兼镇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李治还命淮安王李神通之子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助战。

这年九月，李敬玄与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统兵十八万进抵青海。然而当刘审礼孤军深入之后，作为统帅的李敬玄却是懦怯不救，致使刘审礼兵败被俘。而听到刘审礼所部战没之后，他更是狼狈而逃，退至承风岭，挖壕沟而守寨。吐蕃大军屯兵高冈以压之，唐寨岌岌可危。后来幸亏左领军员外黑齿常之率五百人乘夜袭击吐蕃营寨，蕃军溃乱，李敬玄才得以率军返回鄯州。此战之后，大唐在西域的羁縻府州统治再次动摇。

调露元年（679），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卒，西突厥部酋、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李遮匐扇动部落，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四月，朝议发兵讨之，秦州右军总管裴行俭以吐蕃侵扰，干戈未息，不可出兵，宜以计取，建议借波斯王卑路斯卒于长安，送其子泥洹师归国之名，道过两蕃而取之。于是李治以裴行俭册立波斯王，为安抚大食使，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检校安西都护。在平定西突厥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后，帝国再次复置安西四镇。四镇几经置罢，此乃第三次置之。此次以碎叶城代焉耆，四镇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其时西突厥十姓部落在西域对唐威胁与吐蕃在河西走廊对唐威胁同，十姓部落中，五咄陆在碎叶之东，五弩失毕在碎叶之西，唐改镇碎叶，其意即在镇抚十姓部落。

然而就在此时，单于大都护府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也就是东突厥降

部却爆发了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都护府所辖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拥众数十万。漠南突厥，自永徽以后近三十年，对唐无侵扰，但大唐利用其东征高句丽，西征中亚，讨叛奚，伐契丹，役使频繁，使得东突厥人才“遂起而叛唐”。唐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率兵镇压，萧嗣业等初战频捷，防备渐懈，后遇大雪，兵士寒冻，列营不整，以至于突厥夜袭其营，萧嗣业等人狼狈拔营走，众大乱而败，死者不胜其数。

同月，突厥扰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开门偃旗，大摆空城计，突厥人疑有伏兵，非但不敢进，反而退军而去。后李治又遣左金吾将军曹怀舜往恒州守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往绛州守龙门，以备突厥。但突厥又扇惑奚、契丹侵扰营州，幸亏州户曹唐休璟率兵击败之。眼看着突厥对陇右、京畿形成威胁，当年十一月，李治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兵三十余万讨突厥。可以说，大唐历次出兵讨伐突厥，军威未有如此之盛者。叛乱很快便被平定了，阿史那泥熟匐被诛。

裴行俭回朝以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却又自称可汗，并同阿史德温傅残部会合。次年，裴行俭重新统率各路军队，驻扎在代州的陉口，大军压境，裴行俭修书阿史那伏念，劝其归降，阿史那伏念果然送来降书，并请求让他亲自捆来阿史德温傅表示诚意。开耀元年（681）阿史那伏念执送温傅请降，自此，东突厥的叛乱全部平定。

不过，虽然在劝降的时候，裴行俭曾向阿史那伏念许诺不杀他们，侍中裴炎妒忌他的功劳，向李治陈述意见：“阿史那伏念被程务挺、张虔曰助威胁追赶，又遭碛北回纥的逼迫，没有办法才投降的。”结果伏念被带到长安后却与阿史德温傅一起被处斩，裴行俭的功劳也不予记载，只是封他为闻喜县公。对此裴行俭颇有怨言，他叹息说：“西晋的王浑忌妒王浚平定吴国功劳的事，从古至今人们认为可耻，只怕杀掉降将以后就没有再愿归顺的人了！”于是托病不出。后来正如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永淳元年（682），突厥吐屯啜阿史那骨咄禄与阿史德元珍纠众七百再次反抗大唐，占领黑沙城，后又在漠北的乌德鞬山建北牙，重建突厥政权，自号颉跌利施可汗，封元珍为阿波达干，专统兵马事，封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分民为突利、达头二区进行治理，很快便聚众至五千，掠九姓铁勒畜马，突厥民来归者数万，势力壮大。十月，颉跌利施可汗攻并州及单于都护府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次年又进攻蔚州，击败唐军。此后，颉跌利施可汗又东征契丹，北征九姓铁

勒，并入犯大唐，扩地甚多，骨咄禄死后，其子年幼，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就这样，所谓的后突厥汗国横空出世。

乱局令西域局势也受到严重影响，西突厥各降部见大唐羸弱，东突厥复国成功，皆蠢蠢欲动。永淳元年，因为安西都护杜怀宝“失蕃戎之和”，西突厥贵族十姓阿史那车薄啜起兵反叛，围攻弓月城，西域局势一片混乱，幸亏庭州刺史王方翼亲率大军急趋危城，双方在伊犁河遭遇，阿史那车簿啜所部人心涣散，大败而逃。是役，斩首千余级，唐军大获全胜，西域局势才暂时安定。

但不久之后，叛乱再起，当时西突厥诸部随唐从征，攻打叛乱的同罗、仆固等铁勒部落，然而功成却未赏，铁勒人因之心怀不忿。此时眼见大唐羸弱，火头四起，各部勇气大增，于武后垂拱元年（685）推他匐为首发起反叛，脱离大唐的羁縻统治。武后闻讯后，以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之子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辖咄陆五部，后又加封为镇国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令其统率三万余众随金山都护田扬名讨东突厥及铁勒同罗、仆固诸部。然而次年，吐蕃攻安西四镇，“元庆丧师辱身，致使四镇尽沦”。这种情况下，帝国擢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濛池都护、右玉钤卫将军，袭可汗号，统率五弩失毕部落，以助唐军。阿史那斛瑟罗不负众望，据《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五中刊载的《达奚思敬碑》记载，“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安西四镇一带重新被唐朝羁縻控制。可不久之后，吐蕃再次出兵安西四镇，大破西突厥降部和大唐援军，于是这一年的十一月，武则天下诏再弃安西四镇。

面对大唐的收缩，吐蕃则乘胜大举东进，河西告急。据《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九记载，“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可知吐蕃军队在攻入西州后，又攻入瓜州常乐县，切断了唐朝腹地与安西四镇间的重要通道莫贺延碛，还兵临沙州敦煌县。唐朝在安西地区的统治至此面临极大的威胁，连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

为了扭转败局，唐帝国又在西域策划了一次大反攻，于武后载初元年集结重兵，永昌元年（689）五月五日，大唐以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出征吐蕃。军至寅识迦河（今新疆霍城以西）与吐蕃战，结果此战唐军初胜后败。战败原因很简单，根据史料记载是“待价无将领之才，不善抚众，时天寒地冻，粮馈匮乏，兵士多冻馁死”，于是引军还屯高昌。十余万大军惨败如此，武则天自然大怒，下诏将韦待价流放绣州，而阎温古则

以逗留不进罪，论斩。

这场惨败之后还只是一个开始，两年之后，后突厥汗国也开始加入了西域争夺，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和处于在安西的唐军更是处于吐蕃和后突厥两大强国的夹击之下，很快就力不能支，于是不得不选择后撤，《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记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也就是说，西域自此为吐蕃和后突厥所瓜分，吐蕃夺占了龟兹、疏勒、于阗三镇，而后突厥则占据了碎叶。不过西突厥十姓之地却未被瓜分，此时仍然在名义上受帝国的羁縻控制，并且这些西突厥人还频频与蕃军和后突厥人交战，使得吐蕃和后突厥并不能够很好地控制西域。大唐此时也决心夺回四镇，试图改变以守为主的被动局面。这也使唐蕃争夺西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自垂拱元年至二年（685 - 686）、永昌元年（689），唐军两次主动出击吐蕃，均遭失败，但对于吐蕃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初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为大论禄东赞所掌。乾封二年（667），禄东赞病死，诸子分掌吐蕃军政大权。垂拱元年，芒松芒赞都松茫保结受尊赞普尊号，是为赤都松赞，可大权仍为禄东赞家族所掌握。随着赤都松赞年龄日增，对禄东赞家族专权日益不满，与唐争夺西域，便成为赞普收回权力的极好契机。

长寿元年（692），唐朝抓住吐蕃内争的有利时机，开始策划新的大规模反攻。西州都督唐休璟请求武则天收复陷于吐蕃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而武则天在考虑一番之后，破例启用了仪凤三年曾随刘审礼西征而被蕃军俘虏、熟谙吐蕃军情的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



西方人笔下的唐与吐蕃之战

王孝杰，生于京师长安附近（雍州，后来的京兆府）的新丰县，年轻时以军功晋级。仪凤二年（677）吐蕃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第二年正月，李治命中书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代刘仁轨镇洮河，又于关内、河东募兵击吐蕃。时王孝杰为副总管，从工部尚书刘审礼领军西行。九月，唐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战于青海，唐军大败，李敬玄按军不敢救，刘审礼与王孝杰被俘。不久刘审礼伤重而死，而王孝杰相较之下就幸运多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赞看见王孝杰，因其相貌与其父亲相似，痛哭一番之后，居然厚加敬礼，并把王孝杰放回去了……

此番起用王孝杰是因为武则天认为王孝杰曾经长期住在吐蕃，知道吐蕃的内情，于是以其为武威道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兵讨击吐蕃。王孝杰倒也不辱使命，大破受吐蕃册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馁子，吐蕃军在大论钦陵率领下前往救援，也被击退。十月二十五日，唐军乘胜一举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等镇。眼看大唐兵锋势不可当，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果断选择助唐，突骑施人自后突厥手中

夺回碎叶并交付于唐后，安西四镇已全部被收复。为了加强西域的统治，大唐除了将安西大都护府还治龟兹之外，还以汉军三万镇守，此举彻底解决了西域的问题。

安西大都护府还治龟兹，显然大唐是彻底摧毁了吐蕃苦心建立的西域统治体制，但吐蕃并不甘心，而雄心勃勃的武则天也同样在积极策划对吐蕃的新一轮打击。收复安西四镇后，武则天曾经对王孝杰大加赞赏："昔贞观中具缓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肯，深是可嘉。"后又说："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很显然，这位战将是武则天在青海方向讨伐吐蕃的最好人选。

长寿三年（694），王孝杰在青海湖附近的冷泉大败吐蕃大将勃论赞刃和吐蕃拥立的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俀子。阿史那俀子本是左玉钤卫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之子，两年前，阿史那元庆被酷吏来俊臣诬杀，于是阿史那俀子逃亡吐蕃，次年，被吐蕃立为十姓可汗。冷泉之战，彻底断绝了吐蕃人染指西域的野心，此战王孝杰因功官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县男。

两年后的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入侵临洮，武则天以夏官尚书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秋官尚书、原武县男娄师德则为左肃政台御史大夫、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出兵征讨吐蕃。三月，唐军在素罗汗山败于禄东赞家族的论钦陵、赞婆兄弟。武则天大怒，将王孝杰削官为民，而娄师德则贬为原州员外司马。

不过就在此时，吐蕃的内乱就轰然爆发了，禄东赞家族的钦陵兄弟在吐蕃执政数十年，权倾当朝，而赤都松赞弄随着年长，与钦陵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就自然越发尖锐了。圣历二年（699）二月，赤都松赞与大臣论岩乘钦陵在外之机，捕杀其亲党两千余人，并召钦陵兄弟来朝。钦陵自知去必死，便举兵抗命。赞普出兵讨伐，结果钦陵兵败自杀身亡。钦陵一死，赞婆在不得已之下，率部千余人降唐，接着，钦陵的儿子弓仁也率吐谷浑七千余帐降唐，禄东赞家族在吐蕃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就此终结。赞婆降唐之后，受封为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官拜右卫大将军，并奉诏率部众守青海洪源谷，而弓仁则被拜为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后累迁至左骁卫大将军、朔方副大使，卒后赠拔川郡王，其子亦在朝中为大将军。

这场内讧虽然使得赤都松赞得以在剪除噶尔家族后，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王权，但也使得吐蕃实力开始衰落。久视元年（700）秋，吐蕃以大将麴莽布支攻打凉州，兵至洪源谷，打算围攻昌松县。司卫卿兼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

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率军迎击，临阵登高，见吐蕃军队衣甲鲜盛，唐休璟笑而对麾下说：“自从论钦陵死后，论赞婆归降，麴莽布支成为新元帅，想要炫耀威武，所以吐蕃国中贵族子弟都跟着他。虽然人马看起来强盛，但不通军事，我为诸君取之。”于是披甲先登，六战六克，斩麴莽布支副将二人，斩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还军。

长安二年（702）十月十四，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率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大胜，斩首千余级。同一年，武则天在天山北路设立北庭都护府，管辖原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东的西突厥故地，安西大都护府只管辖天山南路、葱岭以东的地区，以抵吐蕃对丝绸之路的北侵，可以这样说，安西、北庭、河西、陇右，自此全部处于大唐控制之下，帝国对吐蕃处于绝对的优势。

不过尽管吐蕃的威胁暂时被压制了，唐帝国对十姓的控制却并不成功。帝国始终戒备突骑施坐大，因此一直着力于扶持已经衰弱的阿史那氏一系。武后久视元年（700），大唐任命司礼卿兼蒙池州都护、竭忠事主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屯卫将军，仍立平西军大总管，还镇碎叶。很显然，大唐是试图以扶持阿史那斛瑟罗回西域的方式，来遥控效忠于阿史那贵族的西突厥部落，不过虽然在大唐的支持下阿史那斛瑟罗控制了一些西突厥部落，与十姓中的突骑施和依附的诸部落分庭抗礼，但也使得西突厥十姓自此分裂为两部，最重要的是，帝国扶持起来的这个阿史那斛瑟罗不得人心，《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中就记载其“政残，民不悦”，亦“不为突厥所附”。

事实上，阿史那斛瑟罗长久以来是凭安西都护府的支持，才能够控制局面，以至于在吐蕃支持下的阿悉吉薄露叛乱时，斛瑟罗竟“不能制，赖唐将田扬名、封思业平之”。阿史那斛瑟罗长安三年（703）七月又与乌质勒发生了冲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结果斛瑟罗大败，再度奔唐，不敢还蕃。乌质勒本为斛瑟罗之莫贺达干，史载其“能抚士，有威信，胡人顺附”，由此崛起，置二十都督，各督兵七千，以楚河流域之碎叶城为大牙，伊犁河流域之弓月城为小牙。辖境东邻后突厥，西接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尽有斛瑟罗故地，此时的乌质勒虽未称汗，但其所建政权已发展为真正的汗国规模了。不过乌质勒推翻斛瑟罗仅在于反抗阿史那氏的统治，并非意在大唐，而大唐也逐渐认识到这一异姓突厥政权是强有力的，遂再遣解琬至其牙，晋封为金河怀德郡王。

不过虽然大唐册封乌质勒为王，可这个时期，大唐仍未放弃扶立阿史那氏汗裔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长安四年帝国就曾经又册立阿史那斛瑟罗子阿史那怀道为第三任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而这位“神龙年累授右屯卫大将军、光禄卿，转太仆卿兼蒙池都护十姓可汗”居然是在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的护送下，重返碎叶的。

但西突厥大部分部众都不肯尊阿史那怀道为主，甚至大多都加入了突骑施的阵营，阿史那怀道还封后，则频频插手干预突骑施的内政，也为西域的局势再次动乱不宁埋下了隐患。

当初大唐册立乌质勒为金河怀德郡王，本就是为了拉拢安抚突骑施，然而乌质勒甫受唐封，旋即病卒，时为中宗神龙二年（706）十二月事。史载：“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时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夕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坚卧不动。　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嗢鹿州都督，怀德郡王。”

乌质勒死后，其长子娑葛继位，袭嗢鹿州都督、金河怀德郡王，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卫尉卿，由唐羁縻可汗、漾池都护阿史那怀道持节册立。而娑葛即位第一件大事即击灭阙啜忠节，统一十四姓，称汗建国。阙啜忠节，也称阿史那忠节，“啜”乃五咄陆爵称，以阿史那氏而领啜爵，则必为咄陆诸部监国吐屯之裔，忠节则为降唐后所赐名。史书中对他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称其人曾为“乌质勒部将”，《景龙文馆记》则说“娑葛父子与阿史那忠节代为仇雠”。但不管怎么样，从这里来看，那就是娑葛讨伐阙啜忠节的根本原因就是统一十姓故地。

对于突骑施的这场内战，史书中仅简单地记为“数相攻击，忠节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侍卫”，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最初的时候，娑葛甫袭父爵后，多次表请唐朝“除忠节”，然而兵部尚书宗楚客以为“忠节竭诚于国，作捍玉关，若许娑葛除之，恐非威强拯弱之义”，于是诏不许，从这里可以看出阙啜忠节得到大唐的支持。于是不得已之下，娑葛率部进攻阿史那忠节，结果阿史那忠节获得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的援助，史载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于是娑葛搬来后突厥的援兵，大败阿史那忠节。

娑葛击败阙啜忠节以后，建号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这一称号反映娑葛已有效地控制了原来的西突厥全境，除原有十姓外又增加了四姓。严格意义的突骑施汗国

至此始正式形成，其承袭了西突厥的大小可汗制度与吐屯监国制度，由娑葛及其弟遮弩分疆而治，并遣突骑施索葛莫贺啜及阿利施啜出身的吐屯分赴所属各邦监国。

然而就在此时，大唐却为突骑施的内部事务开始发声了。朝臣、边将两派势力不仅公开表态，并一度卷入了这场冲突。当初阙啜忠节兵败后听从周以悌的建议，遣人厚赂宗楚客，“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并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这显然是北庭都护府的意见，也就是要求册立阿史那弥射系统的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以取代阿史那步真系统的阿史那怀道，继而对付同后突厥结盟的娑葛，这一事的后台则为兵部尚书宗楚客。

而以郭元振为代表的安西都护府，所持政见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册可汗之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反对继续扶立阿史那氏，认为唐之大患为吐蕃而非娑葛，主张承认娑葛政权，此派得到了侍御史中丞解琬，甚至是太平公主等势力的支持。

由于北庭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故而在景龙二年（708），唐与突骑施爆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史载宗楚客“敕书簿责元振”，并遣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同时以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并以牛师奖出任安西副都护，发统领甘州、凉州兵马，联合吐蕃一起出讨娑葛，此外，宗楚客又奏请以周以悌为安西大都护，征召郭元振入朝，并册封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派军进驻焉耆，讨伐娑葛。由于突骑施使者娑腊此时正在长安，闻讯后立即赶回，通报娑葛，“于是娑葛分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而在分别攻打安西四镇的同时，娑葛还趁阙啜忠节迎接冯嘉宾时，派兵偷袭，擒阙啜忠节于计舒河口，并杀死冯嘉宾、吕守素，接着突骑施又击杀牛师奖于火烧城，进陷安西，断绝四镇之路。

大胜之后，娑葛并没有得意忘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力，而且此时大唐正准备册封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派军进驻焉耆，准备进讨，于是他致书郭元振称：“我与唐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一连串的失败和娑葛的态度，可以说明郭元振当初承认突骑施汗国的政见是明智的，也是有远见的。在接到娑葛的书信之后，郭元振“遣其子赍娑葛书间道诣京”，通过太平公主，上诉于朝，史载“时太平公主尤与宗（楚客）不善，故讽（解）琬以弹之”，于是朝议之后，周以悌坐流白州，复以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景

龙三年（709）秋七月，大唐正式承认了突骑施汗国，册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娑葛名守忠，遮弩名守节。娑葛乃与后突厥断绝关系，自此重新臣属于唐，甚至是忠心耿耿地为大唐守卫西疆。

而阿史那氏，由于自垂拱以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其随斛瑟罗父子徙居内地者，不过六七万人。少数残部留西域者，又多为突骑施所并，故而西突厥阿史那氏于是渐绝。

不过不久之后，吐蕃再一次对西域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唐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名将论钦陵攻占了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安西四镇，切断了唐朝到西北一线以至中亚的交通，对大唐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加上在此之前，吐蕃击灭吐谷浑，占据其地，进逼河湟，使得大唐不得不出兵青海，结果有了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大唐以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将兵十八万与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

调露元年（679）二月，芒松芒赞去世，论钦陵拥立都松芒布结为赞普。李治闻信后，认为这是彻底打败吐蕃、使吐蕃真正臣服的时机，于是与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商议，可这位曾任安西都护、吏部侍郎、洮州道左二军总管、秦州右军总管、平灭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及李遮匐叛乱，并以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镇压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叛乱的一代名将却以“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为理由，说明这不是彻底打败吐蕃、使吐蕃真正臣服的时机，从这里可以看出钦陵在当时吐蕃国中的威望之高。

但钦陵兄弟在吐蕃执政数十年权倾当朝，赞普器弩悉弄随着年长，意欲收回旁落的国事大权。圣历二年（699）二月，赞普与大臣论者乘钦陵在外之机，捕杀其亲党两千余人，并召钦陵兄弟来朝。钦陵自知去必死，便举兵抗命。赞普出兵讨伐，结果钦陵兵败自杀身亡。

如此能征善战的家族覆灭了，对于吐蕃来说，也许不算是幸事，尽管其权势滔天，威胁君权。然而赤都松赞在剪除钦陵后不久，在征讨六诏时，病死于军中，其子尺带珠丹继位，是为赤德祖赞。由于当时的赤德祖赞还很年幼，故而政权实际是由祖母没庐氏赤马类执掌。赤德祖赞即位之初，吐蕃没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且内无谋臣，外无良将，因此政局动荡不安。西南的属国尼婆罗、悉立纷纷起兵反抗，此外又有岱仁巴农囊扎、开桂多囊等大臣叛乱于那拉山，可谓是内忧外患。

这种情况下，吐蕃选择了与大唐恢复和平，以解脱为连年战争所困的局面，神龙三年（707）三月，吐蕃摄政太后赤玛类派遣使者悉薰热到大唐进贡，并向李显请求联姻，李显应允。该年四月，李显下旨进封邠王李守礼（李治之孙，章怀太子李贤次子）之女李奴奴为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隶蹜赞，并以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入蕃，于是两国再结“舅甥之盟”。

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至吐蕃，吐蕃赞普为其筑城以居之，并尊称其为“可敦”（赞普正妻），而且金城公主进藏时带去几万匹锦缎，还有许多书籍和乐工杂伎，对唐蕃文化交流影响深远。甚至《旧唐书》记载，李隆基时，吐蕃赞普还曾上表：“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斗乱　，令舅致怪　。伏乞垂察追晋，死将万足……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但实际上，唐与吐蕃之间的战事在赤德祖赞在位期间却是频频发生……

景龙四年（710），就在金城公主和亲这一年，安西都护张玄表派兵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但却未将和亲之事断绝，而是贿赂鄯州都督杨矩，由杨矩上表睿宗将九曲之地赠予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举本是以结盟好，但最后竟是祸患，此后数年间唐蕃在九曲之地征战不断。九曲之地的割让让吐蕃对大唐边境再一次形成了威胁，而此时摄政的没庐氏赤马类已经平定了内外之叛乱，基本巩固了政权，这种情况下，为防吐蕃，景云二年（711）睿宗下诏设置河西藩镇，次年，没庐氏病逝，因赤德祖赞还年幼，故而由大论韦·乞力徐尚年（汉文作乞力徐）摄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唐与吐蕃再起战事……

开元元年（713）李隆基设置陇右藩镇，次年派遣左骁卫郎将尉迟瑰出使吐蕃看望金城公主，尉迟瑰此行同时也是为了窥探吐蕃的情况。然而就在这一年，吐蕃却开始采取攻势，他们先是遣使赴长安，请求大唐派使臣前来会盟，并要求以河源一带为两国边界，于是李隆基遣老臣解琬前去会盟。

解琬被授官左散骑常侍，处理与吐蕃会盟之事，其实所谓会盟之事，主要就是和吐蕃划分边界，兼处理十姓降户等事务。在和吐蕃人接触的这段时间内，这位八十岁的老人认为吐蕃不可信赖，于是“请调兵十万驻守在秦渭之间，严加防范”。

这年冬天，吐蕃果然大举入侵了。开元二年（714）秋，吐蕃以大论乞力徐、

大将坌达延率兵十万兵临洮州、兰州、渭州，夺得大批牧马而还。鄯州都督杨矩想到自己曾请赐吐蕃河西九曲之地，而今蕃军竟然以此为据点，频繁进攻，遂悔而自尽。皇帝下诏，起用老将薛讷，以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晙等率兵邀击吐蕃军。

薛讷乃薛仁贵之子，不过他的官途却是由城门郎而起，后为蓝田县令，李治时因御边有功，官封平阳郡公，圣历元年，后突厥阿史那默啜入侵河北，武则天以薛讷将门虎子，提拔其为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临行前，武则天于同明殿召见薛讷，问计于其，薛讷道："丑虏恁凌，以卢陵为辞。今虽有制升储，外议犹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则狂贼自然款伏。"武则天非常欣赏这番奏对，于是拜其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转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

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李隆基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然而李隆基却为立威，故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幸亏宰相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说："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这才免死，流新州。随后，帝又以制军礼不肃，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一时间，诸军多震惧失序，只有时为左军节度的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人所领兵马岿然不动。帝遣轻骑召之，但因薛讷治军严整，于是"皆不得入其阵"，对此李隆基深叹美，慰勉有加，赞薛讷有周亚夫之风。

其实就在开元二年夏，薛讷刚刚吃了一场大败仗，其受命和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领大军两万，抵御契丹。因军士苦于酷暑，大军行至滦州，不期与契丹军遭遇，诸将统率不协调，交战不利，死者十分之八九。薛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被削去官爵。此番起用薛讷，并让其以布衣摄左羽林军，为陇右防御使，是皇帝考虑到他"资忠报主，见义忘身"，而所谓的"资忠报主，见义忘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中书令姚元崇等皆认为正值酷夏，天气炎热，将士们披甲执戈，携带粮草深入敌境，恐怕很难获胜，于是纷纷认为不宜出兵，而薛讷却说："夏月草茂，羔犊生息之际，不费粮储，亦可渐进。一举振国威灵，不可失也。"李隆基当时即位之初，欲威服四夷，薛讷此言甚合其意，于是诏薛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督兵马征讨奚、契丹。此战之后，皇帝斩崔宣道、李思敬等八人于幽州，但却敕薛讷免死，只将他削官为民。

所谓知耻而后勇，就在李隆基下诏准备御驾亲征，发兵十万、马四万之时，薛讷已与右骁卫将军郭知运率大军至武街驿，面对吐蕃大军，唐军并没有选择固守，

而是实施机动，陇右群牧使王晙率两千轻骑奔袭二十里外之来谷口。此处驻有吐蕃大军十万之众，王晙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七百勇士分为两队，前队杀入营中，后队擂鼓以助威，吐蕃人不明就里，以为唐军主力而来，惊惧混乱，自相杀伤，死者万计，随后王晙又挥兵武街驿，而薛讷则率兵夹击，于是大败之，斩首一万七千，获马羊超过二十万，此后唐军乘胜追击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面对困局，吐蕃军背水而战，围薛讷军先锋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郎将王海宾入其阵，因唐军诸将嫉其战功，故而迟迟不发兵增援王海宾，竟终至其战死沙场。就在王海宾力战而死之时，薛讷率军赶到，大败之，吐蕃军大将六指乡弥洪被擒，兵士死伤数万，横尸遍野，实在“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玄宗听闻薛讷等大获全胜，大悦，于是停止亲征。追赠王海宾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赐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将其子接入宫中抚养，并收为假子，赐名“忠嗣”，同时命紫微舍人倪若水赶赴前线，记录诸将功勋。

武街之战后，唐蕃关系彻底恶化，虽然吐蕃请和，但却要求用与帝国平等的礼节，于是李隆基不许，从此吐蕃岁岁犯边，忽和忽战。开元四年（716）二月，吐蕃围松州，结果在二十六日为松州都督孙仁献于城下大破之。次年七月初五，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在九曲之地大败吐蕃军，献俘于长安。之后，在青海地区战争减少，但为了对抗大唐，吐蕃开始遣使通好于大食、突厥、突骑施。这年八月，突骑施别部苏禄果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拨换及大石城，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发阿史那献与葛逻禄兵击之。

由于自中宗时起，为了抵制突骑施对西域的侵蚀，大唐便册封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献为右骁骑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辖咄陆五部，镇守庭州，并以其为招慰十姓使、碛西节度使，开元三年又加定远道行军大总管，以抵御大食和拔汗那，所以事实上，吐蕃此时染指西域，实际上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大唐的安西大都护府的四镇锐卒，而是突厥、葛逻禄等臣服于大唐的番部。

综观这一时期大唐在西域的战争，主要原因就是吐蕃势力的介入和民族政策的错误，使得西域不宁。唐在西域略占优势，吐蕃则在河陇占有优势。不得不承认的是自李世民、李治至武则天以来，大唐在军事上对周边各族大都占有明显优势，但唯独吐蕃是个例外。这除了军事指挥原因外，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吐蕃国法严整，上下齐力，内部较稳固，民风剽悍尚武，且河陇一带的军事地理形势对其十分有利，因为吐蕃位于青藏高原，攻唐可居高临下，直入平川，而唐击吐蕃却要仰攻

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行军作战十分不便，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唐内部的朝局不稳定。

14．女皇时代

自李治中期以后，帝国的权力逐渐由皇后武氏掌握。史载武氏出生于高祖武德七年，其父武士彟早年从事木材买卖，故而家境殷实，前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任职河东和太原之时，因多次在武家留住，因而结识。晋阳起兵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故大唐建立以后，武士彟曾以“元从功臣”历官工部尚书、黄门侍郎、判六尚书事、扬州都督府长史、利州、荆州都督等职，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其母杨氏乃为隋宗室曾为给事黄门侍郎、吏部侍郎，位受开府仪同三司，任内史侍郎、鄯州刺史、郑州刺史、赵州刺史、工部尚书，加上开府位的遂宁县子杨达之女。

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李世民听闻十四岁的武氏姿色艳美，将她纳入宫中，封五品才人，赐号“武媚”，也因此，武氏才被后世讹称为“武媚娘”。对于武氏在李世民时期于宫中的生活，史书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仅见武氏在晚年时回忆自己为李世民驯马一事。当时，李世民有名马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令李世民不知所措。武氏侍候在侧，对李世民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李世民壮武氏之志。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此后，武氏在侍奉李世民之际和李治相识并互生爱慕之心。数年之后，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驾崩，而被封为才人的武氏也被依唐后宫之例，剃发入感业寺出家为尼。

永徽元年（650）五月，李治入感业寺进香之时，与武氏相遇，二人互诉离别相思之情。此事被因无子而失宠的王皇后知悉后，出于打击当时颇为得宠的萧淑妃的目的，于是主动提出，让李治将武氏纳入宫中，而显然李治早有此意，于是当即应允。一年之后，也就永徽二年（651）五月，李治的孝服已满，于是时年二十七岁的武氏还俗，再度入宫。其实在入宫前武氏便已怀孕，入宫后不久，武氏便生下一子，取名李弘。次年五月，武氏被封为二品昭仪。

永徽六年（655）六月，李治意欲将武昭仪升为一品宸妃（大唐后宫四夫人中本来并无宸妃此封号，而原本的四夫人名额已满，李治为了武氏，才创宸妃封号），但此举立即遭到侍中兼太子宾客韩瑗、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来济的反对，以至于最后不能成事。由此，武氏与韩瑗、来济等朝中重臣结怨，但此时，身处内宫的她，显然手中缺少一个打击外臣的工具，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叫李义府的人主动

投上门来…

李义府，时为中书舍人，此人自小聪慧，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后又得到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的举荐，故而改任监察御史，随侍晋王。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立晋王为皇太子，故而任命李义府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李治继位之后，李义府改任中书舍人并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但表面温和、笑里藏刀，以至于人号“李猫”。

永徽六年（655），李义府因为得罪国舅长孙无忌，而被贬为壁州司马。敕书尚未下达门下省时，李义府已得知此情，于是问计于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王德俭是礼部尚书许敬宗甥，此人虽瘿但却智而善揣事，他给李义府找了一个出路：“皇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但又畏宰相议，所以尚未正式提出。你若能推助此事，定可转祸为福。”于是李义府遂代替王德俭值夜，叩阁上表，请求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李治大喜，召见与语，并赐珠一斗，其后强行推行废否改立之事。

显庆五年（660），李治患上了风疾之症，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武后遂开始代理朝政，然而因武后渐有主导政局的趋势，李治颇为担忧，甚至一度有废后的打算。麟德元年（664），武后引道士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于是李治意欲借此机会将之废为庶人，便密召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商议此事。

因上官仪说什么“皇后专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于是李治便命他拟写废后诏书。这边诏书还没写完，那边武后便得到消息，于是“涕泣陈请”之下，李治不忍废后，事遂中辍，但上官仪却由此为武后所怨。当年十二月，上官仪被许敬宗告发与王伏胜、废太子梁王李忠谋反，因上官仪曾在李忠的陈王府担任咨议参军，并与王伏胜一同事奉过李忠，因此遭到诬陷，最终他被以“离间二圣、无人臣礼”之罪下狱，后与王伏胜一同被诛，家产亦被抄没，其子上官庭芝也同时被诛杀。上官仪获罪遭诛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虽然尚在襁褓之中，但却与母亲郑氏一同被没入掖庭，充为官婢。

虽是在内廷为奴，可婉儿在其母的精心培养下，熟读诗书，不仅能吟诗著文，而且明达吏事，聪敏异常。《景龙文馆记》记载：“（婉儿）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于是免其奴婢身份。”武后称帝之后，诏敕多出其手者，时称“内舍人”，万岁通天元年（696）或圣历元年（698）

后，上官婉儿受命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隆。《旧唐书》所载“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而《新唐书》则说是“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至于《景龙文馆记》中的记载也是如此，所谓“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

自诛上官仪后，武后开始垂帘问政，不过这个原因并不是什么废后失败沦为傀儡，而是因为李治的风疹之疾发作，史载：“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从这里可以看出，让武后摄理国政，加强其权力，是李治自己的意思，而《旧唐书》也记载：“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由此可知，所谓的武氏掌握权柄、以李治为傀的说法，其实是很荒谬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二圣”时期，表面上是李治和武后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李治风眩更甚，实际上是由武后以“天后”的身份来处理大量的国事。而武后也很清楚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实在太难了。

可是当朝中大事不可无人处理，皇太子李弘倒是可以监国，李弘乃是武后长子，永徽三年入宫后诞下，是为李治第五子。由于王皇后没有子嗣，当时的太子是李治的庶长子李忠。永徽六年（655），李治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改立武氏为皇后，李弘由此成为李治的元子（嫡长子）。同年，李弘与胞弟李贤被晋封为亲王，李弘为代王，显庆元年（656），李治诏令废黜太子李忠，改立四岁的代王李弘为皇太子。

这位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以“仁孝”而誉满朝野，史载：“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令取郭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可见其爱民之心，李治倒是想要禅位于太子，可太子却体弱多病，以至于监国政务多由东宫官员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等人代为处理，正如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就在上元二年（675）的四月，李弘随帝后出行洛阳，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年仅二十三岁。时人以为武后所毒杀，但也有说法称李弘本来病弱，故而早夭。前者以为后期李治虑及身体不支，有提前禅位给太子之意，但当时的武后政治得意，李弘因此成为了其总揽大权的障碍。还有就

是咸亨二年（671），李弘在长安监国时，发现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幽禁宫中，二人皆因其母萧淑妃获罪，已是年逾三十而未嫁，李弘悲悯二人，于是奏请出降，李治许之，此举使得“武后大怒”。不过客观上来说，“鸩杀说”很值得推敲，一来，李治在《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中提到，弘自被立为太子后就染上痨瘵，又接受父君之命带病理政，以致操劳过度，使旧病加剧，最终病卒。而根据“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等人”这点来看，也似乎能够印证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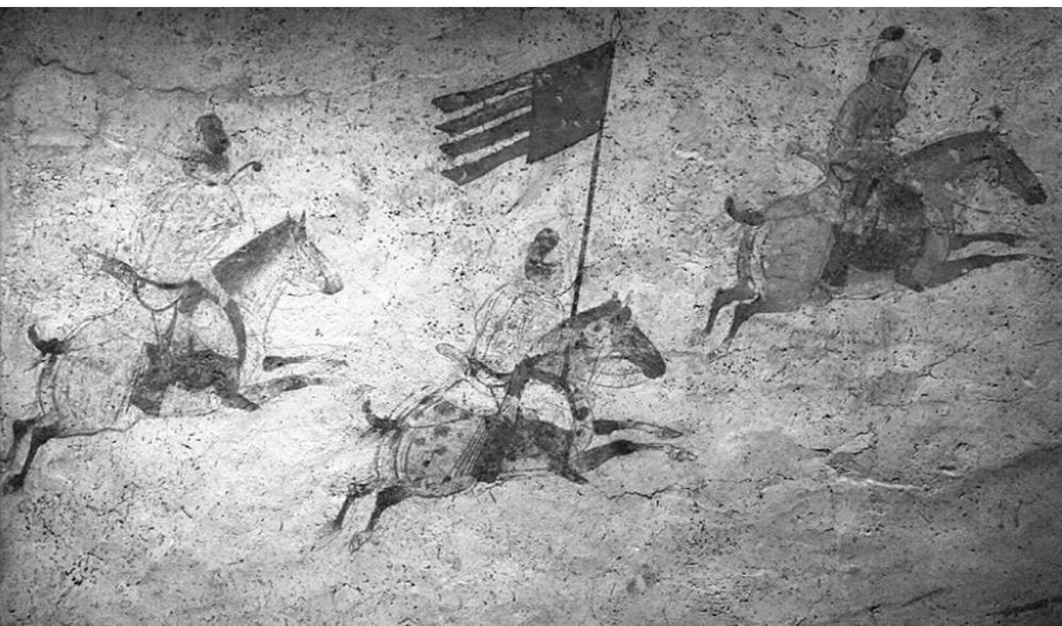
不过不管怎么样，李弘的确是死了，这个时候，对于大唐来说，政权该由谁掌握，的确是个问题，而对于武后来说，如果想要控制朝局，就必须要能够应用信任，于是武后把目光投向了“北门学士”。当初她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以修撰为名” 召入禁中，由于这些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的饱学之士是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故而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制，官衙都在宫城之南，院在银台之北， 从玄武门出入可以不经南门）。武后为了能够在朝中多用自己的心腹，于是密令这批“北门学士”参决朝廷奏议，以分朝中宰相之权。事实上，北门学士在帮助武后分减皇权和相权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治国良策，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其中的范履冰、刘祎之等人更是一代名臣。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武后决定。四天以后，太子即位，是为中宗，武后被尊为皇太后。李显本是李治第七子，武后第三子，初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上元二年（675），太子李弘猝死后，雍王李贤继立，然而这个武后第二子却与其母关系紧张。时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旁门左道、江湖术数而深得高宗和武后信赖，此人曾对武后说“太子不堪承继，英王（武后第三子）貌类太宗”，又言“相王（武后幼子）相最贵”，李贤听闻后深感厌恶。加之当时宫中有流言说李贤不是武后亲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与李治的儿子，于是李贤顿生疑虑，感到恐惧。

此时，武后又送《少阳政范》和《孝子传》给李贤，以责备他不懂得为人子、为太子，还曾亲手书信斥责，李贤越发感到不安，调露二年（680），明崇俨为人所杀，武疑出贤谋，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办理此案，结果在东宫“获甲数百”，此事一出，于是武后以“为人子心怀谋逆，应该大义灭亲，不能赦

免罪行”，太子当即被废。然而《资治通鉴》对太子事发记载了另段插曲：李贤平日颇好声色，养户奴赵道生为男宠，多赐之金帛，曾有东宫官员上书劝谏不听。太子事发后，赵道生供认是太子命他刺杀明崇俨。永淳二年（683），李贤被流放到偏僻的巴州，走时妻儿仆从衣缕单薄，十分凄凉。时为皇太子的李哲（即李显）为此上《请给庶人衣服表》，恳请帝后怜悯，稍赐春冬衣物。

不过这位当年为自己的哥哥上表请赐衣物的皇太子虽然平生庸弱无能，但在继位后，却也是野心勃勃，李治病重，以侍中裴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后李治驾崩之后，裴炎受遗诏辅政，政事皆取决于武太后，李显不满，于是重用韦后亲戚，他将国丈（韦后之父）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拔为豫州刺史，并想要擢升为侍中，又欲任命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裴炎力谏，结果李显大怒说：“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这意思是说朕即使把天下都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还在乎一个侍中吗？武太后得知后，决定废黜李显，于是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率军入宫，宣布废黜李显的懿旨，然后扶李显下殿。李显道：“我有什么罪过？”武则天道：“你欲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怎能说无罪！”于是废李显为庐陵王，改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时李显继位不过五十五天。



嗣圣元年（684）废李显为庐陵王，并迁于房州，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之后武太后开始临朝称制，自专朝政。由于担心李唐宗室谋反，于是太后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查庶人李贤居所，谁知道这位酷吏到巴州后，竟将李贤囚禁于他室，逼令自杀。消息传来，“则天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追封贤为雍王”。

事实上，这个时候武则天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这一年九月，李世勣之孙、承袭英国公爵位的李敬业联合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以扶持庐陵王为由，起事于扬州，自称为匡复府大将军，十多天内竟聚十万部众。消息传来，武则天大怒，下诏剥夺徐敬业赐姓，又以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三十万前往征讨，又以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前往讨伐，当年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自杀。此后，又有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则起兵豫州、其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于博州举兵，一时间，天下似乎动乱不已……

导致这两位李唐宗室谋反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下令制造铜匭，置于洛阳宫城之前，随时接纳臣下表疏，同时，又大开告密之门，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此外，武则天还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宗室频频被卷入所谓的谋反案中。皇亲国戚接连遭到翦除，先是舒王李元名及其子豫章王李亶被诛，后有密王李元晓之子南安王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于是诸王不自安，这才有了“越王李贞与其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元嘉之子黄国公李撰、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密谋匡扶大唐，并命长史萧德琮等招募士卒，分报韩、鲁、霍、越、纪五王，各令起兵应接，以赴神都”之事。然而很显然，叛乱很不靠谱，史载：“初，冲与诸王连谋，及冲先发而莫有应者，惟贞以父子之故，独举兵以应之。”

李冲起兵七日就败死，史载其仅有士卒五千，攻武水，积薪焚其门，结果因为风向不对，于是“火作风反”，破城不得，于是士气低落、众心沮解，其属董元寂诵言：“王与国家战，乃反尔。”冲斩以徇，众惧，遂溃，唯家僮数十从之，乃走博州，为当关刺死。而前来平乱的丘神勣大军到来时，见官吏素服来迎，这位清平道

大总管居然因无叛可平，而挥尽杀之，破千余家，并以此为战功获加左金吾卫大将军。

而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豫州后，武则天当即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十万讨之，仍令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大军进逼之下，李贞饮药自杀，此时距离他起兵仅仅二十日，其次子常山公常州别驾李倩皆被牵连，而第三子李温被流放岭南。至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撰、左散骑常侍范阳王李蔼、东莞郡公李融、霍王李元轨及子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元凤子东莞公李融、常乐公主等尽皆被卷入其中。一时间，腥风血雨，史载“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在平定了李贞、李冲叛乱，并剪除了李唐宗室之威胁后，武则天开始谋求进一步的权力。客观上来说，在武后掌权与称帝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开创出殿试和武举，此举不仅压制了自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还使得帝国能够更多地发现和选拔人才，如张柬之、张仁愿、姚崇等一代名臣将领都是武后年间所出。

又譬如狄仁杰，其人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任大理寺丞间，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竟无冤诉者。他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皆为唐朝中兴之臣，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却说：“举贤为国，非为私也。”就是这种“非为私也”才使得朝中政风为之一变，不过狄仁杰之贤不仅如此，他曾犯颜直谏，力劝女皇续立唐嗣，从而唐祚得以维系，这才是这位“神探”最大之贤。

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当太子，几次使人对武后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而女皇也想立侄梁王武三思为太子，一时间犹豫未决，深谋远虑的狄仁杰却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勿让权予侄。他说：“姑侄之与母子，哪个比较亲近？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祭祖于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祭姑于太庙者。” 女皇颇为不喜，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然而狄仁杰答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女皇由是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此后他又力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东都，并立为皇嗣，从而使李唐得以维系。女皇很是信重狄仁杰，常谓之“国老”而不呼其名，史载“仁杰好诤谏”，但女皇

却是“每屈意从之”。

圣历元年（698）秋，后突厥南下入侵，女皇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迅速恢复了河北的安定。回朝后，狄仁杰迁内史（中书令），但不久之后，他便病倒，久视元年（700），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女皇甚至泣曰：“朝堂空矣！” 并常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正是狄仁杰之贤，他不仅在身故之后，被女皇赠文昌右相（尚书右仆射），谥文惠，而且李显再次继位后，还追赠司空，睿宗年间又追封之为梁国公。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侍女图

有正也有邪，有狄仁杰之贤，自然也有奸臣贼子了。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史载“张易之初以门荫迁为尚乘奉御，武后临朝后，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入宫之后，兄弟二人深得武则天的恩宠，张易之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封恒国公，张昌宗为云麾将军、行使左千牛中郎将、右散骑常侍、春官侍郎、封邺国公。二张年少美姿容，兼善音律歌

词，故而史家多认为这二人的受宠与其美貌有关，例如《唐书》载杨再思对昌宗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张氏兄弟二人在当时被朝内高官、宗室并称为五郎、六郎）。

不过虽然女皇宠爱，赐田宅玉帛无数，二张却专权跋扈，朝廷百官无不惧之，甚至武承嗣、武三思等女皇子侄等亦争执鞭辔，中宗长子邵王李重润（中宗第二次为太子时封为邵王）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婿武延基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任意入宫”，结果张易之控告于武后，武后竟敕李重润、永泰郡主、武延基皆赐死。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笃，卧床不起，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于是在正月廿二癸卯（705年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左羽林将军李兴宗等，发动兵变，称麟台监张易之、司仆卿张昌宗谋反，于是率禁军入宫诛杀张易之、张昌宗，随即包围寝宫长生殿，，要求武氏退位。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禅让帝位于太子，第四天，李显正式即位，是为中宗。二月初四甲寅（3月3日），李显下诏，复国号为唐，武周朝终结，因为有改朝换代的因素，所以称之为“神龙革命”。

中宗继位之后，初是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神龙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705年12月16日），年已八十二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死，遗制去帝号，于是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在神龙二年（706）五月与李治合葬乾陵，耐人寻味的是，至今乾陵前依然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称述圣纪碑）”，是武则天为歌颂李治功德而立的碑，五千余字的碑文由她亲自撰写，黑漆碑面，字填金粉，光彩照人，而东侧则是她为自己留下的“无字碑”，这块无字之碑仿佛是这个在历史上留下深厚烙印的女人为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最后一个总结，那就是：功过是非，任由后人去评说。



无字碑

武周时期结束，李显重祚，唐朝复辟，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并诏以神都为东都，李显同时封其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其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继而又不顾大臣的劝阻，破格追封韦后之父亲为王，并让韦后参预朝政，此举导致了中宗年间大唐内政极为混乱的局面。

延和元年（712）八月三日，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改元先天，不过此时的情况对他来说并不妙，当时朝中宰辅多是太平公主之党，文武大臣也多依附她，于是，除掉太平公主就成了李隆基的当前要务。

史载，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从小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七岁那年，诸王参加每月朔望，金吾大将军武懿宗见李隆基的车骑仪仗威严而整齐，心中不悦，于是呵排仪仗，因欲折之。李隆基怒声叱之曰：“这是我李家的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乎！”随之扬长而去，武则天知道后，非常惊讶，不仅未加罪于他，反而更加宠爱他。长寿初年（692），因李弘无子嗣，武则天命已封为楚王的李隆基作为孝敬帝嗣子，以承继香火。

其实自从景龙四年（710）开始，李隆基就已经开始秘密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他首先将目光放在了北门禁军。李世民时，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成分混杂，统属复杂；唐高宗龙朔二年，改“北门（玄武门）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史载“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至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羽林军正式独立建制，取消了以往以南衙诸卫将军检校羽林军的制度，从而使得羽林军正式升格为行政系统上独立的北衙禁军，定额兵士六千人。

高宗、武周两朝羽林军的建立和官署的完善使北衙禁军在建制上彻底脱离南衙十二卫，这显然与同时期“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以及皇权的强化紧密相连。而也就在这一时期，北衙禁军开始大规模消解府兵的职任和人员，开始在宫城宿卫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而羽林军内部的“万骑”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所谓“万骑”的前身是“百骑”，唐太宗时，选官户及蕃口中骁勇的武士穿虎纹衣，跨豹纹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根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於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又有《新唐书·兵志》记载：“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而《通典·职官十》则记载：“大唐之初有禁兵，号为‘百骑’，属羽林。”　武后时，因崇重内廷，故而增加为千骑，中宗时发展为万骑。李隆基也就在这支亲军万骑中发展势力，聚结才勇之士，所以才有了后来“唐隆政变”的成功。

事实上，从那之后，李隆基就非常重视万骑的作用，而且万骑在“唐隆政变”中的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还极大地影响了李隆基一朝禁军系统的格局，至李隆基登基之后，他更是将左右“万骑”制度化，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将万骑从左右羽林军中分出，置为左右龙武军，兵号万骑，自此也就有了所谓的“北衙四军”。不过由于充任羽林大将军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皇帝最为亲信的将领，故其地位，远在诸卫大将军之上，所以谁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而在当时，左右羽林都在太平公主的手里。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太平公主与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高祖堂弟李德良之孙）、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寺卿唐和胡僧慧范等合谋废掉李隆基，此外还与宫女元氏合谋，准备在

进献给李隆基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

得到消息的李隆基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定计率先下手。他先命王毛仲调用闲厩中的马匹以及禁兵三百余人，亲自率领太仆少卿李令向、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多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先杀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在控制了羽林军之后，继而才擒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及中书舍人李猷，并将此二人与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一起斩杀，窦怀贞虽然暂时走脱，最后自缢而死，但却被戮尸。太平公主见党羽被诛杀殆尽，不得不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乃出，虽然太上皇出面请李隆基能够恕其死罪，但却依然被李隆基拒绝，于是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先天之变”，此变太平公主及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唯有其子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这次血雨腥风的屠杀使得大唐自武则天以来的女主政治至此结束，从此李隆基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李隆基下诏，将年号改为“开元”

其实纵观“先天之变”，禁军的作用依然很大，其一，便是王毛仲，此人乃是高句丽人，年幼时，因父违法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王毛仲成为临淄王李隆基的奴仆，因其“性识明悟”、“骁勇善骑射”，服侍李隆基左右，甚得器重。李隆基离开长安任潞州别驾时，王毛仲身任护卫侍从，与李宜德等“挟弓矢为翼”。当初李隆基为了与韦后、安乐公主相对抗，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对“万骑”中的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王毛仲生性聪颖，深知主子的意图，于是对万骑将士更是“待之甚谨”，亦“布诚结纳”，使李隆基“益怜其敏惠”。相较于韦后令亲信“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押万骑，以苛峭树威”，李隆基的厚赏显然更得人心，于是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诉于王”，这才有了“唐隆政变”中万骑的“皆愿决死从命”。韦后、安乐公主伏诛后，相王（李隆基之父）李旦复位，是为睿宗。李隆基被封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掌管禁军和御马，很快又被立为皇太子。王毛仲虽然专掌太子东宫驼马鹰狗等坊，但却是李隆基的心腹。此次政变，便是他率领三百禁军，假传召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而引禁军诛之，才得以控制了羽林军。

其实对于控制羽林亲军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那就是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与李隆基的对话，史载：“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

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也就是说，荆州长史崔日用认为：“太平公主图谋叛逆，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当初，陛下在东宫做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铲除太平公主，需要施用计谋。现在陛下已为全国之主，只需颁下一道制书，有哪一个敢抗命不从？如果犹豫不决，万一奸邪之徒的阴谋得逞，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而当李隆基说“你说得非常正确，只是朕担心会惊动太上皇”时，崔日用的计策很简单，那就是：“请陛下首先控制住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然后再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

李隆基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他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帝国的元气，而自高宗朝以来，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李隆基首先要做的就是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与韩休等贤臣，此外还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将京官中有能之士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行政能力，又将有为的都督刺史升为京官，从而增加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能力，此外还裁减武周中宗时期的员外官等冗官，精简机构以便节省开支与提升行政能力。



唐玄宗

史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四月，李隆基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东都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能治理国家，朕与诸位合宴，宜更名

曰：集贤殿。”“仙”、“贤”虽一字之差，却由此可见李隆基重视人才的态度。也正是皇帝的励精图治和革新政治，才有了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而在这近三十年的盛世时期，不仅中原地区、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经济发达，连人口较少的陇右河西地区也逐渐繁荣。

15．盛极而衰

客观上说，开元时期是帝国的极盛时期，但就在这“开元盛世”中，危机也埋伏了下来，譬如李隆基采纳张说的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由于唐朝初期沿前隋制度，实行府兵制，但到李隆基登基后，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勇武有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须自己置办各种用具和武器。……固然兵役负担很重，但由于他们尚能分配到足够的永业、口分田（均田制下分配的两类土地），府兵本人也能够免除租庸调，因此他们的经济比较优裕……但随着李治、武后年间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兵士财物，强迫兵士为自己服苦役，而且均田制逐渐破坏，府兵受田很难足额，这样一来也就渐渐没人愿当府兵了，甚至府兵乃纷纷“亡匿”、“耗散”，以致折冲府无兵上番。

这种情况下，帝国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其实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实施了少量募兵，在武后时期，也出现了团结兵制度，至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州兵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而且在开元十年，皇帝更是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作为京师的宿卫。南衙禁军，原由诸州府兵轮番上值，分属十二卫，可由于府兵制被破坏，诸军府番上的卫士（府兵）常不足额，到李隆基初年，十二卫已是力量严重不足了，于是张说建议，请招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免除各种徭役），优为之制，逋逃者争出应募。根据这个建议，帝国开始在两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府兵及白丁中简募强壮者，免除其征镇赋役，作为南衙禁军，称为长从宿卫。十三年，改名“彍骑”，共十二万人，分隶十二卫，替代番上府兵，专任京师卫戍，间或用以出征（开元末，吐蕃入攻剑南，唐曾经派遣关中彍骑远征）。十六年，一部分骑编入左右羽林军，又成为北衙禁军的组成部分。彍骑之制，实际上仅存在于开元中至天宝末，为时甚短，但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代替征兵制，甚至可以说是有唐一代，乃至中国历史兵制演变史上的一件大事。

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为相后，更是接连推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首先就是“长征健儿”制度的确定，“长征健儿”又称长行健儿、兵防健儿，本系由临时招募的自愿留镇者，给以赏赐。开元二十五年，下诏“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军”。于是天下诸军镇所需兵额，一律从即将复员的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

招募。由于“长征健儿”允许携带家口，到军后，给以田地房屋，以便久住。长征健儿终身免除课役，装备、给养全由国家供应，因此，又叫官健。

长征健儿的出现使得府兵制事实上彻底瓦解，原本更替戍边的制度从此不复存在，征募到长征健儿，不再是耕战结合，而是变成为终身职业。此外过去的府兵，因为“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所以不敢“外叛内侮及杀师自擅”，但长征健儿既然是以此职业，“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最为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这些虎狼之兵则完全掌握在藩镇将帅的手中。所谓藩镇，即李隆基在天宝元年（742）于边地设置的“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大兵镇，因以节度使节制，故而统称“藩镇”，此举本是作为威慑异族与边疆防御的措施，但却影响极为深远。

《资治通鉴》记载：“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也就是说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节度使”。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记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由此可见，节度使其实威仪极盛。

虽然景云二年（711），开始设节度大使，但李隆基设立十大兵镇，却显然是等于扩大了节度大使职权。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这种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已远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从此之后，帝国“内重外轻”的布局态势也被破坏，当初折冲府主要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南及邻近诸道，旨在“居重驭轻”而“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但现在，却是“外重内轻”，军力皆集于边地，而非内地。

不过最可怕的还不仅如此，府兵制的“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兵不识将、将难专兵，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将帅拥兵作乱的发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正如《新唐书·兵志》所称

的：府兵之道，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

而且伏折冲府直隶于所属上级卫府，府兵的调遣、征发权在皇帝手中，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商决，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军队的编制、简点和轮番，以及图籍、厩牧、甲仗的管理等。一旦有战事，则由皇帝下敕书，通过兵部传达执行。如有战事，朝廷临时点将，率领从各地征发的府兵出征。可节度使制，却改变了这一根本。

李隆基虽然没有发动过像太宗、高宗朝时那样的大规模的开边军事行动，但他在位期间周边地区与邻近少数族吐蕃、契丹、南诏等的战事连绵不断。

开元十年，吐蕃入侵其西部的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于是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当年，安南贼帅梅叔焉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并围攻州县。李隆基遣骠骑将军兼内侍（宦官）杨思勖讨之，思勖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

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在青海湖西被王君击败。九月，吐蕃攻陷瓜州，河西节度使萧嵩用反间计，使赞普杀死了悉诺逻恭禄。次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被瓜州都督张守圭在城下大破之，随后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湖南），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今青海省龙羊峡），擒获甚众。紧接着，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同年，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斩副将一，上级五千首。吐蕃败兵散乱逃入山中，哭声四合。

开元十七年（729），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同年，信安王李祎率唐军攻占石堡城，分兵据守要害，令敌不得前进。自是唐朝河、陇诸军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余里，李隆基闻之大悦，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军”。

在接连的军事胜利的刺激下，李隆基日益滋长了他好大喜功的思想，宠爱有战功的边将，边将也因此不停对外族开战，以邀功请赏。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入朝为工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侍中，兼兵部尚书之后，更开放了蕃将以边

功为手段，窥伺入朝的机会。于是战事遂起，边地开始战火纷飞。

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李隆基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次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发兵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杀获甚众，吐蕃将领乞力徐只身而逃……

次年，吐蕃进攻河西，鄯州刺史杜希望率众攻占吐蕃新城，以其城为威武军，发兵一千以镇之。其后，杜希望又从鄯州发兵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吐蕃发兵三万反攻。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所部攻击敌军，所向披靡，敌军遂乱，而杜希望也纵兵乘之，于是吐蕃军大败。

开元二十八年（740），金城公主去世，次年，吐蕃再次攻陷石堡城。这种情况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挥兵讨伐，先是击破吐蕃大岭军，又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首级，而河西节度使王倕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王难德更是阵斩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

天宝二年（743）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破洪济城，但没有能够攻占石堡城。天宝五年（746），王忠嗣率军与吐蕃多次战于青海、积石，皆获大胜。又伐吐蕃属国吐谷浑于墨离，平其国，虏其全部而归，然而在次年攻打石堡城时，却未能得逞。此战皇帝本是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的，但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不宜轻举妄动，“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上言切谏。李隆基不听，王忠嗣只得出兵，结果大败而回。败报传来，李林甫又以济阳别驾魏林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李隆基大怒，召见王忠嗣入朝，命令三司详细审讯，几乎被陷害致死。适逢哥舒翰代替忠嗣为陇右节度，舒翰极言王忠嗣无罪并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来赎王忠嗣的罪，李隆基不听，走入内宫，哥舒翰一路追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李隆基深受感动，遂贬忠嗣为汉阳太守。

王忠嗣被贬以后，无人再敢忤逆李隆基开疆拓土的心愿，哥舒翰被委以重任后，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石堡城的问题。他是王忠嗣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战功赫赫之将，史载其初为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幕府将，天宝六年（747），王忠嗣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迁左卫郎将，苦拔海之战中，哥舒翰率军连破三路吐蕃军，所向披靡，而积石军之战，更是全歼五千吐蕃骑兵。

可石堡城并不是那么好啃的，石堡城在日月山以东，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位于三百米之高的绝壁方台上，虽然地处“南丝绸之路”，但却是唐蕃古道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城建于隋代，约为大业五年，炀帝亲自统兵西征吐谷浑时

构筑，因为三面险绝，唯一条石径盘曲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而吐蕃人称此城为“铁刃城”，王忠嗣奏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宝八载（749）六月，李隆基诏命以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石堡城。显然，为了夺回石堡城这个战略要地，就算血流成河，李隆基也在所不惜。吐蕃数百人凭险据守，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却不能拔其城，哥舒翰大怒，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结果如期拔之，然而仅获吐蕃铁悉诺罗等四百人……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但代价却是极为惨烈的，史载“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而从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一诗中的“喷泉诸戎血，风驱死羌魂。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之句可以看出这场战斗之残酷、大唐士卒牺牲之惨烈。

此战使得大唐在青海势力达到顶峰，《册府元龟》卷三百九十八记载：“哥舒翰……筑神威城于青海上，旋为吐蕃所破。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上……名为应龙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复近青海……”不过在青海方面失败之后，吐蕃一面北面与突骑施联合，东南与云南的南诏联合，合兵对唐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又将目光转向了西域。

吐蕃起初是和后东突厥汗国及突骑施等联盟，同大唐多次较量，争夺的重点在安西四镇及北庭一带。这个时候，由于“开元盛世”所积攒下的资本，帝国的国力空前强盛，而国力的增强，自然使唐朝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进而使得大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当吐蕃开始与帝国争夺西域的时候，帝国在西域的战略主要是依托安西、北庭所辖各军镇，并号令各藩国，虽然吐蕃和后东突厥汗国及突骑施等联盟，但实际上并不能够占据优势。

后来东突厥及突骑施衰落后，于是唐蕃争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葱岭以南地区。在当时，葱岭之上有两个小国，即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和大勃律（今克什米尔中部一带，都城巴勒提斯坦）。其实两国本是一国，称为“勃律”，自东晋始，史籍中便对此国有所记载，譬如东晋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惠生的《行记》，史籍之中又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等不同译名。在吐蕃兴起之前，勃律居于巴尔蒂斯坦，该地连接吐蕃、天竺和葱岭，正是如此，吐蕃兴起之后，勃律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先

被侵扰的对象。因不堪所扰，于是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国遂分为大、小勃律，留居原地巴尔蒂斯坦者称大勃律，或曰布露，而向西北迁移至罕札河谷即今吉尔吉特地方的称为小勃律，大勃律位于小勃律的东南，相距三百里。

按照史书记载，则天顺圣皇后垂拱二年（686），大勃律被吐蕃所征服，然而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的记载，也就在这一年，勃律国首次遣使至长安朝贡，不过按照《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的记载，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大勃律首次朝唐，所以由此可见，勃律之分为大、小只能是垂拱二年（686）至通天二年（697）这十年之间的事。事实上，自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至李隆基开元年间，大勃律曾经三次遣使入唐，而帝国也先后册立其君主。至于小勃律，其国位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吐蕃从此西进，可与大唐争夺乌浒河（今阿姆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诸国，东进可控制安西四镇，所以这里也就成了唐与吐蕃必争的战略要地。

事实上，小勃律的位置的确很重要，其位于吐蕃从西道进入葱岭以东的道路上，即从大勃律（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勒提斯坦）经小勃律、播密川（帕米尔），再向东经喝盘陀（塔什库尔干）就可以到达疏勒镇。如果说吐蕃此前尚可以经由其他道路到达葱岭以东，但是大唐收复安西四镇以后派遣汉兵前往镇守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按照史书的记载，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今策勒县东北），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今民丰县东安迪尔/安得悦），南六百里有胡弩镇（地在今赛图拉），西二百里有固城镇（今皮山县桑株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今皮山县西南克里央），而按照大唐的兵制，镇下还有城、戍、守捉等驻防单位。在唐朝如此严密的重兵防守之下，吐蕃很难再从此道直接向北进入西域，于是，向西绕道葱岭便成为唯一的选择，这里也就成了帝国和吐蕃的争夺要点。

而当大唐以重兵防守北道以后，大食势力在河中地区的扩张，又进一步使得吐蕃非从小勃律借道不可了，因此吐蕃力图控制小勃律。

开元初年，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入唐朝贡，李隆基以子相待，并以其地为绥远军，使其防御吐蕃。吐蕃为求向外扩张，向小勃律发动过多次进攻，但均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下，吐蕃赞普曾派人对没谨忙说："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可对大唐忠心耿耿的没谨忙并没有中计，仍勒兵守境，不肯借道。在这种情况下，开元十年（722）吐蕃再次发起进攻，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张孝嵩认为"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于是遣疏勒副使

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见唐军来援，趁机发起反攻，此战“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战后，帝国“诏册为小勃律王”。从此战之后“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的情况来看，小勃律对于吐蕃进攻安西四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小勃律对大唐帝国的重要性，而张孝嵩出兵援救小勃律，实质上也是为了对付吐蕃，保护帝国在西域的统治。

开元二十八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此时没谨忙已死，其子苏失利之继位小勃律王，此次大唐出兵不及，小勃律为吐蕃所击败，于是“苏失利之叛唐而附吐蕃”，同时吐蕃赞普还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从而彻底控制了这个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小勃律国归附吐蕃的影响是恶劣的，这件事的后果是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献贡不通”，也就是说吐蕃通过控制小勃律，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使得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从而中断了对大唐的朝贡，这种情况下，帝国自然不能容忍了，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察等安西节度使数次派兵讨伐，但都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援救，皆无功而返。

天宝六年（747）三月，李隆基再次下诏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内侍边令诚为监军，率军万人，第四次征讨小勃律。

高仙芝，史载其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本是高句丽人，高句丽灭亡后，其父名高舍鸡内迁至中原，在河西军从军，因功累任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少年时即随父亲高舍鸡到安西，二十岁时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与父亲班秩相同，不过他的军旅生涯并不顺利，其先后在田仁琬、盖嘉运等安西四镇节度使手下任职，未受到重用，直至夫蒙灵察担任节度使时，才开始重用他，并很快将他提拔为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此番出征，高仙芝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率部从安西出发，一路西行，经十五日至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又经十余日至握瑟德（今新疆巴楚），再经十余日至疏勒（今新疆喀什），随后挥军南下，踏上葱岭，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行军，在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之后，经过二十余日的艰苦行军，唐军到达了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然后再次向西，沿兴都库什山北麓西行，又经二十余日到达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唐军继续前行，再经二十余日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至此，唐军经过百余日的跋山涉水，已经彻底将葱岭抛于身后。

随后，高仙芝兵分三路，一路由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兵出北谷，一路由

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自赤佛堂路南下，主力则由高仙芝与中使边令诚亲率从护密国南下。三路兵马约定于七月十三日辰时在吐蕃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喷赤河南源兰加尔）下会合，进袭此地。

连云堡所在的巴罗吉勒山口是通往坦驹岭的必经之路，此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关于守军，《旧唐书》中所记载 “（吐蕃军）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新唐书》则记载“城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旧唐书·李嗣业传》中记载：“于时吐蕃聚一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所以综合这些史料来看，吐蕃大军应该有万余人。

当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河水暴涨，无法渡河，高仙芝却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大军必须要尽快渡过婆勒川，否则吐蕃守军一旦发现唐军，势必做好准备，那样一来将大大增加攻占连云堡的困难，于是他“以三牲祭河”，继而将士备足三日干粮，于次日清晨渡河。谁知次日清晨，婆勒川居然河水低缓，于是唐军迅速渡过了婆勒川，以致“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高仙芝显然自己也不相信渡河会如此顺利，以至于在渡河后，他对边令诚那个太监欣喜地说：“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兵贵神速，高仙芝甚至来不及等待疏勒守捉使赵崇玭、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的另外两路大军，遂以李嗣业和田珍为左右陌刀将，率士卒猛攻连云堡。关于此战，《旧唐书·高仙芝传》中的记叙为“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也就是唐军登山攻击连云堡，从辰时直到巳时，大破连云堡中的吐蕃守军。到了夜晚，吐蕃军奔逃被追逐，杀其五千人，生擒千人，剩下的都逃散了，获得敌军战马千余匹，军资器械难以计算。

而《新唐书·高仙芝传》中则如此描写连云堡之战：“遂登山挑战，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斩五千级，生禽千人，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万计。”即：派李嗣业等率军登山挑战，还没有到中午，就攻破了连云堡。拔除其城堡，斩首五千，生擒千余人，获马千余匹，衣服物资数以万计。

两书记载的共同点就是此战从早上辰时（七点）开始，至于巳时（十一点）便结束了，战斗的具体情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有所记载：“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分军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有兵近万人，不意唐兵猝至，大惊，依山拒战，炮檑如雨。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刀将，令

之曰：‘不及日中，决须破虏！’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

此战唐军的死伤人数不详，但根据《新唐书·西域志》中“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禄居簿。知”这段记载，可以得知随同唐军作战的识匿国国王五跌失迦延死于此战，由此可见唐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夺取连云堡之后，高仙芝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准备继续前行，但边令诚就胆怯了，史载“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令诚亦惧”，又有“仙芝欲遂深入，令诚惧，不肯行”之句，于是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尪弱三千余人守其城，遂引师行。疾行三日，大军到达坦驹岭。坦驹岭是今天的克什米尔北部德尔果德山口，在今克什米尔西北境巴勒提特之北、兴都库什山米尔峰东，长约四十里，山口海拔4688米，是兴都库什山著名的险峻山口之一，史载“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三日，过坦驹岭，岭峻绝，下四十里”，由此可见其之难行，虽然坦驹岭下就是阿弩越城，但登临山口，必须沿冰川而上，别无其他蹊径。这里有两条冰川，东面的一条叫雪瓦苏尔冰川，西面的一条叫达科特冰川，冰川的源头就是坦驹岭山口。这两条冰川长度都在二十里以上，而且冰川上冰丘起伏，冰塔林立，冰崖似墙，裂缝如网，稍不注意，就会滑坠深渊，或者掉进冰川裂缝里丧生。这种情况下，高仙芝自然“恐兵士不下”，于是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行潜遣的二十骑来迎，并声称：“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 娑夷水（即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之北的印度河北岸支流）即古弱水，大河之上有一藤桥，乃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之路，断桥则吐蕃不能入援。高仙芝奉迎之语后，假装闻讯欢喜，兵士听后，畏惧心理顿消，唐军于是以迅速下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大军下岭三日之后，阿弩越城守军果然派人前来请降，次日，唐军顺利进入城中。入城以后，高仙芝先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率兵先修桥梁、道路。为了避免强攻造成大的伤亡，高仙芝决定用“假途灭虢”之计智取孽多城。次日，高仙芝令席元庆率一千骑行至府孽多城下，对小勃律王说：“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五六个大酋长，皆赤心为吐蕃，于是仙芝先约元庆：“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高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慌忙逃入石窟躲避，使

唐军一时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高仙芝率唐军主力到达后，首先处死了那五六个首领，然后急令席元庆率军砍断通往吐蕃的藤桥。藤桥离孽多城有六十里，席元庆在日落时终于赶到，并将藤桥砍断。这边藤桥刚砍断，那边吐蕃兵马已至婆夷水东岸，但由于桥已砍断，而且史载：“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于是吐蕃兵马只得隔水观望，束手无策。在断绝吐蕃援救之路后，高仙芝又派人招谕小勃律王，劝其投降，而小勃律王得知吐蕃兵众被隔在水东，援军路绝，生路无望，只得携公主出降，于是其国遂平……

不过就在高仙芝从长安回到安西之后，战事随之又起，这一次是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上表，说“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请求安西兵助讨，而唐军之所以出兵，也是因为事关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唐军声威大震，而帝国重新控制小勃律，显然在西域引起了巨大影响，史载“于是拂、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为了确保此地长为唐所有，唐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这些史实皆说明了小勃律在唐朝西域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控制小勃律对大唐的重要性，可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载：“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个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着羯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唐镇军在勃律地狭无田，只能靠与个失密交易获取盐米。而羯师受吐蕃的唆使，在勃律市易要道上设城堡,阻断唐镇军的后勤供给。唐朝为了保证小勃律镇军的粮食供应，不得不扫清羯师这个障碍。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高仙芝奉命出兵，虽然从安西到竭师国（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的距离还要远于小勃律，但由于有了远征小勃律的经验，高仙芝显然并不在意距离，就这样，唐军的行军虽然艰苦，但却很顺利。天宝九年（750）二月，高仙芝击败了羯师军，俘虏了羯师王勃特没。三月十二日，唐廷册立勃特没的哥哥素迦为羯师王，彻底平定此处。

经过高仙芝的这两次征战，大唐在西域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也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今青藏高原）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不过高仙芝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犯了很大的错误。由于李隆基好大喜功，使得当时的边帅节度使们也纷纷不顾大局，肆意开战，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帝国和周边藩国的关系，从而导致边疆出现

不稳定的局面。高仙芝刚刚升任安西都护，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往上升迁，于是在平定了羯师国之后，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地处中亚的石国（都城拓折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石国，西域古国，昭武九姓之一，最早《魏书·西域传》称为者石。《隋书·西域传》称为石国："石国居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南去 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杜佑《通典》："石国隋时通焉。居于药杀水，都柘枝城，方十余里，本汉大宛北鄙之地。东与北至西突厥，西至波腊界，西南至康居界……有粟、麦，多良马。隋大业五年，唐贞观八年，并遣使朝贡。"石国是唐代高僧往印度取经时必经之地，玄奘在去往印度取经，曾路过赭时国，即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役属突厥"。石国人善舞，有柘枝舞流行唐代长安，此舞到宋代仍流行。

由于石国地处丝绸之路，农业发达，居民善于经商，可谓富甲西方，所以自然引来了各方势力的垂涎了。其实一直以来，对比西域各国，石国国王对唐朝的态度可以说是比较恭顺和真诚的。显庆三年（658），唐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自此石国成为唐朝的属国。从那之后，石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元初，唐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开元二十八年，石国助唐讨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大唐又册其王为顺义王。天宝初，唐还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一直以来，石国都很谦恭于帝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记载，自天宝以来，石国对唐朝一直朝贡不断：天宝二年（743），遣女婿康国大首领泰染缅献方物；天宝五年（746）。遣使献骏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也遣使献方物；天宝六年，遣使献马，天宝八年（749），还派王子远恩入关朝觐。但天宝九载，已是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却以石国无蕃臣礼，率兵讨之。

高仙芝为何要讨伐石国，按照汉文史料中的记载，认为石国王于藩臣之礼有亏，故而高仙芝奏请讨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于藩臣之礼有亏"的石国国王到底是谁，现有史籍中，仅有《新唐书·高仙芝传》提到这位石国王的名字是车鼻施，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高仙芝所讨伐之石国王就是这位车鼻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认为，那就是被擒的石国王是为《册府元龟》所记之石国王特勒（勤）。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高仙芝是在天宝九年，破羯师国回军途中，应拔汗那王之请而击石国的。在石国被大唐平定之后，紧接其后自二月开始，拔汗那就频频派遣

使团远赴长安。从阿拉伯史料的记载来看，拔汗那遣使应该是有酬谢唐廷为己出兵平怨之意。而还有学者认为，讨伐石国的原因是石国与黄姓突骑施相互勾结，触动了大唐在碎叶川一带的利益，因而引起大唐帝国对石国的不满。

综合起来看，似乎是因为石国和拔汗那结怨，或者是其他原因，石国开始对大唐不守藩臣之礼，而且又触动了大唐的利益，所以高仙芝出兵了。不过这次出兵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就是当唐军到来后，石国国王主动请和投降，可高仙芝却是“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也就是说，高仙芝假装和石国和谈，却趁其不备，出兵掩袭，俘虏石国部众。随后高仙芝纵兵杀掠，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肯放过。更恶劣的是，高仙芝性贪，“他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接着高仙芝从石国回军的途中，又称突骑施反叛，攻打了突骑施，俘虏了移拨可汗。

其实讨伐石国的同时，攻打突骑施只是高仙芝此次出兵的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史载：“（高仙芝）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从中可以看出，这说明高仙芝出兵讨伐平石国、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三件事，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举动，进讨突骑施不过是这次出兵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所谓的九国胡，此处的九国胡就是九姓胡，即吐火罗——粟特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石国不仅与反唐的黄姓突骑施纠结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九姓粟特胡支持，严重威胁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因此，高仙芝借讨伐石国，对九国胡及突骑施一并实施了打击。

天宝十年（751）正月二十四日，高仙芝入朝，献其所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一对这次入朝记载很详细：“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帅来献。”虽然这些异邦酋首虽然并不是同时被擒获，但从这里可以见到高仙芝是将他们一并来献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石国国王等行至长安的西北的开远门时，却被李隆基所杀，而突骑施移拨可汗也被处斩，这引来了西域诸国的一片哗然。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仙芝讨伐石国的举动使唐朝在西域的威望大大下降，“由是西域不服”。石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将高仙芝欺诱贪暴之事遍告诸胡昭武。诸胡部落大怒，就暗中联合大食国欲共攻安西四镇，而大食也趁机以此为借口，实施其扩张计划。

大食是唐人根据波斯语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当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麦加

创立伊斯兰教，阿拉伯人遂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逝世时，他们已经实现了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此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四大哈里发（即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开始全面向外扩张。

后一位“纯洁的哈里发”阿里在661年被刺杀后，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压服反对者，成为哈里发。679年，穆阿维叶一世宣布其子叶齐德一世为哈里发继承人，将哈里发的选举制破坏，从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的军事帝国。在汉文史料中，这个帝国被称之为“白衣大食”，而由于这个庞大的哈里发国是由倭马亚家族所统治，故而也被称作“倭马亚王朝”。

倭马亚家族是麦加贵族古来氏族中十二个支系中最强盛的一支，为古来氏族部落首领库赛伊的长子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至于“倭马亚”一名，则得自于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倭马亚·伊本·阿卜杜勒·沙姆斯的名字。早在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身为麦加贵族的倭马亚家族发生了分裂，家族首领阿布·苏富扬以坚决反对穆罕默德闻名，曾迫使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希吉来），而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奥斯曼·伊本·阿凡却是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由于穆罕默德生前并未指示其继承人的产生方式，故而他死后，他亲手缔造的帝国在哈里发的人选问题上发生分裂。奥斯曼·伊本·阿凡于644年成为哈里发，不过这位哈里发却因为大力提拔本家族成员在帝国境内担任要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十二年后，奥斯曼·伊本·阿凡遇刺，他的侄子——阿布·苏富扬的儿子穆阿维叶却在此时攫取了权力，并在此后建立了“倭马亚王朝”。



西方人笔下的阿拉伯武士

在倭马亚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的对外征服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们的疆域最广阔之时，东至中亚和印度、西至伊比利亚半岛。而当大食东向扩张的，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昔日的宗主国萨珊波斯王朝。此时波斯由于连年政争,已走向衰落。大唐贞观十二年，大食攻占波斯首都泰西封，此后又在尼哈温之战中歼灭了波斯的大部分军队。永徽二年（651），波斯王伊嗣俟三世投奔吐火罗，但半道在木鹿被大食兵击杀，萨珊波斯王朝从此灭亡。

史载，波斯曾向大唐求援，其中《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载：“伊

嗣侯（俟）之子卑路期（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之所以不能救，其实不是因为“路远”，而是因为大唐全力平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根本无力支援波斯。波斯王子卑路斯只好以近邻吐火罗国为避难之所，日后又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复国。

此后，波斯又遭到大食的入侵，并再次请求帝国的支援。根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波斯传》载:“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由于当时帝国已平灭阿史那贺鲁的庞乱，并控制了西突厥汗国旧地，因而开始介入波斯事务。史载：“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大唐在波斯置都督府，将波斯纳入帝国的版图，置波斯于唐朝的保护之下。龙朔二年（662）正月，帝国又正式宣布“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开始支持波斯复国。

唐朝对波斯的态度，可以说是对大食入侵的一种对抗，当时大食疯狂向东方扩张，而且征服的对象主要都是西域诸国，此外大食也有染指中国的企图，根据史料记载，雅古比《历史》记载过这样一个说法：总督哈贾吉·本·优素福曾经对他麾下的两名骁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说：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这个许诺虽然诱人，但实际上，大食的铁骑并没有真正到达现在大唐的本土。不过大唐显然对于大食人的野心做出了回应，只是大唐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龙朔三年（663）大食又“击波斯、拂，破之，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万”，于是“波斯俄为大食所灭”。波斯再度失国之后，这一次波斯王卑路斯以帝国避难之所，咸亨元年（670）卑路斯携其子泥涅师辗转来到长安，被帝国授为右武卫将军，但大唐却依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直到调露元年（679），为打击龙朔二年（662）率五咄陆叛唐的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两者于龙朔二年率五咄陆叛唐），大唐才以裴行俭为册立波斯王兼安抚大食使，率兵以护送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卑路斯已死）还国为名，出兵西域。当此次出兵，只是平灭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而没有并没有到达波斯。裴行俭至碎叶擒二蕃而归后，唐军送泥涅师到吐火罗，也再无标识，于是泥涅师客居吐火罗二十年。后大食占据了其波斯都督府所在疾陵城，并入侵吐火罗，臣服康、石诸国，大唐并非不知，但由于此时帝国正全力与吐蕃人在争夺西域，并不想和大食人有所冲突。

直到咸亨元年（670），大食人所到的最东之处还在吐火罗西部和塞斯坦，之所以没有继续东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食人在西域的征服结果多半是“讲和”，尽

管总是在退走之前进行大量的勒索，直到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出任呼罗珊总督后，大食人开始强硬推行征服政策，这使得大食帝国在东面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们一度控制了河中地区、吐火罗，进而北上将乌浒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甚至在开元三年（715），进入了真珠河流域，继而又远达白水城，乃至深入拔汗那地，此外哈贾吉·本·优素福的侄子，也是他麾下的勇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南下攻入印度，迅速征服了如今的信德和旁遮普地区。

可以说，这个时候，大食已经对大唐构成了威胁，河中地区对于大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葱岭以东的四镇，而四镇大军也可以通过这里南下、西进，很显然，在帝国看来大食人在河中地区的行动，就是在帝国的眼皮子底下实施的挑衅，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大唐在这里的权威。

其实这个时候，无论是大唐，还是大食，都很小心翼翼，不想直接发生冲突，按照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713年（开元元年），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的一位特使来到中国，他向中国皇帝傲慢地宣布，如果中国皇帝不向他进贡，他的铁骑绝不会离开中国，而中国皇帝则回应“你已看到我伟大的帝国，回去告诉你们的指挥官，最好在我对自己的军队下令打败你们之前撤退”，虽然大食使臣傲慢无礼，但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也就是说，其实两国都在有意地避免战争。

事实上，大食人也很清楚，此时尽管他们是迅速扩张，但以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达到可以触怒大唐这个庞大帝国的地步，更别说是征服这个拥有广漠国土的帝国了。此后，雄心勃勃的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在大食的内乱中被部下所杀，很显然，他的死无疑使大唐与大食这两大东西方帝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推迟了。

而对于大唐来说，在此时，还犯不着和大食兵戎相见，因为尽管西面有大食的挑战，但西域的这几股势力中，吐蕃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吐蕃是唐朝统治西域的最大威胁。事实上，吐蕃一直认为西域关系到其国的安全，正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吐蕃大论钦陵对唐使郭元振所说的那样：“西十姓突厥，四镇诸国，或时附蕃，或时归汉，斯皆类多翻覆，而十姓中，五咄六诸部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也因此，吐蕃一直试图控制西域，甚至倾全力与唐朝争夺西域。

一直以来，吐蕃都是采取联合西突厥以共同对付唐朝的手段，来拓展自己在西域的势力，而安西四镇自然也是他们进攻的首要对象，所以对大唐来说，吐蕃与西

突厥的南北夹击，才是帝国维持其在西域统治的最大威胁,因此，防范吐蕃进入西域与西突厥联合，继而确保葱岭以东即安西四镇及周边藩国的安全，才是唐朝对西域政策的重中之重。当大食崛起之后，黑衣铁骑逐渐进入葱岭以西时，大唐的确有所顾虑，特别是大食灭亡波斯，占领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之间地区之后。但也正是大食人的势力渗入才使得西域的情况由唐与吐蕃的对峙，变成了唐、吐蕃、大食三国之间的争夺，由于三国势力和利益在这里纠葛，加之彼此之间各有忌惮，所以西域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吐蕃兵力较强且最有侵略性，所以大唐主要防范的是吐蕃，而不是大食。

大唐对西域诸多国请兵讨伐大食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允”与“不允”，而这种“允”与“不允”，并不取决于这些西域诸国上表时的态度诚恳与否，甚至不取决于其与帝国或大食的关系近密与否,而取决于该国在西域的地理位置，甚至可以说是取决于该国的得失对葱岭以东的安西四镇的关系。如果该国地理位置重要，失去其对于安西四镇威胁很大，那么大唐为了保证自身在西域的统治，就算是其国没有主动上表求援，大唐也会出兵实施干预，譬如平定小勃律，譬如讨伐石国。

虽然在“重葱岭以东”西域政策下，大唐对西域诸多国请兵讨伐大食持有“允”与“不允”的态度，却不等于大唐会完全放弃葱岭以西，去放任大食的势力东侵去染指河中，也不是置西域诸国于不顾，而是采取了册封、嘉奖诸国，并利用突骑施等势力对抗大食的方式。根据《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外臣部》的记载:“遣使册立乌长国王、骨咄国王、俱位国王,并降册文，皆赐彩二百段。三国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潜布款诚于朝廷。帝深嘉之。”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更是说得很明确，“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也就是说，开元八年（720）四月，大唐册封乌长国、骨咄国王、俱位国王，从而表明了帝国对于这三国阻挡大食势力东侵的支持，当然了，除了这之外，就是充分利用突骑施来对抗大食在中亚的扩张。

在开元三年和开元五年，大食对大唐的战争均遭到失败之后，大食东侵虽然迟缓了，但他们仍旧执着地向河中进行扩张。不过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更因为大唐这个时期在青海和吐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故而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地体现出来，军事加上宗教的影响使得唐朝原本在西域的属国粟特诸国纷纷倒向了大食一边，此时仅仅依靠册封、赏赐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为了对抗大食在西域扩张，帝国开始利用突骑施。

对于突骑施人来说，他们也不是无所获得，积极抗击大食，他们首先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因为大食的东侵直接威胁到了突骑施，此外，大食侵占的地方原属于西突厥领地，突骑施想通过抗击大食来趁机收复失地。譬如苏禄可汗在击败侵入骨咄的大食人之后就曾说："骨咄属于我，它是吾祖及吾父之土地。"从这话里就可以看出突骑施人的想法。说到底，突骑施人也是为了自己和更多的利益而战。选择大唐作为依靠，不仅能够避免两面作战，而且能够利用帝国在西突厥本土和西域各国的威望和影响，高举着"天子诏令"的大义名分来增强自身的号召力，从而在联合诸国共同抵御大食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很显然，大唐对突骑施的羁縻政策和突骑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想法，确实使得突骑施开始全力向西发展，并遏止了大食在河中的扩张。开元六年（718）大食将加拉赫统兵北征，先于河中北部得胜，并已准备侵入大唐领土，但被突骑施人包围，经过偿付赎金，才好不容易得以脱身。开元八年，苏禄可汗率大军参与粟特反抗大食的叛乱，击败呼罗珊总督，随后，大食兴兵攻东拔汗那，突骑施奉诏出征，大破之。开元十二年，大食再攻拔汗那，围其都渴塞城，从而爆发了渴水日之战，大食军大败，后卫主将战死，导致原已叛附大食的康、石诸国复归于唐。这一挫折使大食向东的扩张不得不暂时中止。此后在开元十四年，苏禄可汗之子西进，然而被大食所击败，开元十七年，"游行之战"爆发，处于大食统治下的粟特发生叛乱，苏禄派军支援粟特，与大食人在阿木勒河对峙三个月，而这期间安国、石国、拔汗那尽皆参战，康国王子、波斯王子更是在突骑施军中，与苏禄可汗一起围攻大食军，此战迫使大食人败退康国，结果康国国王乌拉克亦叛，开元十九年的"隘路之战"更是让大食人尝到了苦头，事实上，"隘路之战"也是倭马亚王朝时期相关史书中，对战斗情况、伤亡人数记载最为详细的战役。

通过这接连的征讨，突骑施不仅深深地渗入粟特，远至康国，而且还一跃成为西域第一强大势力，虽然这一段时间，突骑施在西域是作为唐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但这个时候，苏禄可汗却与大唐开始发生矛盾了。史载，开元十四年 ，苏禄可汗之妻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与都护杜暹发生矛盾，市易未成，马冻死。开元十五年，苏禄怒攻四镇，于是大唐皇帝下诏调杜暹入朝为相，苏禄乃止。

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开元十二年（724），安西都护张孝嵩调任太原尹，安西都护之职出缺。朝廷中便有人推荐杜暹，认为他曾出使安西，深得蕃人思慕。

杜暹当时正为继母守孝，被李隆基夺情起复，擢拜为黄门侍郎，并充任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交河公主派使者到安西互市时，曾向杜暹宣读公主教令，杜暹怒道："阿史那的女儿怎敢向我宣读教令。"他鞭笞使者，将其扣留。于是苏禄可汗大怒，举兵侵入安西四镇，并围困安西。由于此时李隆基召拜杜暹入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安西都护此时是为赵颐贞暂代，面对来势汹汹的突骑施人，赵颐贞只能据城自守，于是"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可汗所掠，仅安西全"。既而苏禄可汗听闻杜暹已入相，才撤军而回，之后又派使者入朝，献方物。

开元十五年（727）闰九月，苏禄可汗联合吐蕃赞普共围安西城，结果此时已经是安西副大都护的赵颐贞为一雪前耻，率军将之击破之。次年正月，赵颐贞再败吐蕃于曲子城，让苏禄尝到了苦头。

开元二十一年，突骑施再次起兵，这一次的原因是阙俟斤驱羊马至北庭互市时，与下属何羯达发生矛盾。何羯达向北庭都护告发阙俟斤密谋叛唐作乱，都护刘涣轻信谗言，误杀阙俟斤。苏禄因此反，朝廷以擅杀罪杀刘涣全家，才得以平息此事。但苏禄仍不肯罢休，联合吐蕃攻安西四镇、北庭，又抢劫商贾，甚至进军护密、识匿，阻碍唐与葱岭以南及各国的交通。这种情况下，大唐不得不与突骑施开战。

由于对大食的作战节节胜利，而这些胜利又助长了苏禄的骄气，所以大唐不得不调集河西军，甚至是发动内地兵力以支援西域，同时向大食、后突厥借兵。最初的时候，大唐是向后突厥发出了征召，甚至李隆基还致信给其可汗，不计较其击奚、契丹的行为，声称只要"儿若总兵西行，朕即出师相应"，并许诺事成之后，"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玉帛，别有优赏"。但突厥人却没有发兵，于是大唐又"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　使张舒耀与大食呼罗珊总督阿萨德议定，大食从吐火罗北上，唐军从勃达岭北上，双方共捣突骑施汗庭碎叶。大食随后出兵攻克吐火罗，并将总督府从木鹿迁到缚喝，为北上做好了准备。

开元二十三年，十月廿六，突骑施攻打北庭和安西拨换城，次年被北庭都护盖嘉运打败。八月初七，在大唐与大食的压力下，苏禄可汗不得不遣使请降。但李隆基以其无真心，不许。不久，突骑施发生内乱。苏禄可汗开始的时候，很节俭，掠夺的财物都分给各部落，但在他娶了唐朝、突厥、吐蕃三国公主之后，开始奢侈起来，晚年更是尽失人心。原可汗娑葛的部落为黄姓，不服苏禄的黑姓。

开元二十六年夏，苏禄可汗被部将莫贺达干、都摩度所杀。其后，二者所辖部

落互攻，都摩度拥立苏禄可汗的儿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占据碎叶和怛罗斯城。开元二十七年（739）莫贺达干联络唐安西都护府破碎叶和怛罗斯城，生擒吐火仙可汗，这才平定了苏禄的残余势力。

应该说，大唐打击突骑施苏禄的势力，对于抵制大食东侵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西方有学者就认为“强横一时的突骑施在中国人的外交阴谋下失败，但也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抵抗大食人的坚固壁垒以致自己直面大食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突骑施人并不总是对唐臣服，他们一再侵扰四镇的行为，使得大唐认为其已经成为了帝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四镇歼灭突骑施便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和大食合兵平灭突骑施虽然使得帝国需要直面大食，但对于帝国稳定葱岭以东的统治来说，却又是必要的。大唐西域政策就是这样，在确保葱岭以东之时，方能力争葱岭以西以南地区，在葱岭以东基本安全的情况下，帝国能够利用突骑施抵制大食军队的东侵，而当突骑施背叛帝国、侵扰四镇及周围地区时，帝国就必须消灭突骑施这个打手。

在突骑施瓦解之后，大食并没有能够继续向东扩张，虽然安国、火寻、戊地、石国、吐火罗等国一度屈服于他们，但大食人让这些河中诸国按时缴纳沉重的赋税的做法却也引来了这些国家的不满，这使得唐与大食在争夺西域的统治地位时能够处于被西域诸国的拥护中，此外大唐在西域实施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也能够有效地遏止大食向东继续扩张的势头。就在大食人试图再次东侵的时候，大食内部发生了动乱……

天宝五年（746），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木鹿城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发起了起义。此后，阿布·阿拔斯的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天宝九年，阿布·阿拔斯在大杰河（底格里斯河支流）一役中击溃倭马亚王朝的大军，从而推翻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由倭马亚家族主导的伊斯兰哈里发，建立了以阿拔斯家族为主导的阿拔斯王朝。由于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几乎全部杀害了倭马亚家族（只剩下最后一个男丁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他逃亡到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后倭马亚埃米尔），而倭马亚王朝势力退缩到伊比利亚半岛，中国称之为白衣大食。

阿布·阿拔斯在军事方面完全仰仗阿布·穆斯林，他是阿布·阿拔斯最杰出的将领，正是阿布·穆斯林天宝五年（746）在莫夫绿洲发动的叛乱揭开了推翻倭马亚王

朝的大幕，阿布·阿拔斯成为哈里发后，首先便是任命阿布·穆斯林为呼罗珊总督，很显然，此举意味着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将开始全力争夺东方。应该说，这个时期大食势力在西域开始膨胀起来，大唐的影响正在衰退，西域诸国夹在大唐和大食两大帝国之间，首先就需要去站队，而大唐势力正处于下降趋势，大食则处于上升趋势的背景下，本身就存在西域诸国倒向大食的可能性，而作为宗主国的大唐要求诸国守“蕃臣之礼”，却不能尽保护蕃臣之责，更使得那些西域小国偏向于大食了。一直以来，大唐认为吐蕃的威胁远胜于大食，因而帝国长期以来将驱逐吐蕃人牢牢控制葱岭边缘之地以保四镇，才是帝国在西域的主要，所以，才有了大食介入西域以来所发生的河中诸国上书天可汗请击大食而唐一直未予答应的一幕，但对于受到吐蕃人攻击的小国的呼救，唐一次次的不惜动用军力。

应该说高仙芝以石国无藩臣礼对石国行诛伐之事，彻底使得大唐与大食两大势力在西域角逐激烈化了，也使得那些西域小国纷纷倒向大食一方，而这种倒向也就使得大食和安西四镇接壤，这就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了。

按照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天宝九年，河中地区布哈拉（即安国）发生一次小规模的什叶派起义，这次起义是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在西域的第一次起义。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派齐亚德·伊本·萨里率军一万前去镇压，而阿布·穆斯林本人则紧随其后，齐亚德·伊本·萨里渡过阿姆河来到布哈拉城下，双方激战数十日，最终齐亚德·伊本·萨里攻入城内，城内守军大部分丧命，被俘虏的人都被吊在城门之上，随后，齐亚德·伊本·萨里又转战撒马尔罕（即康国）进一步剿灭了当地的残余势力，这种血腥的镇压使得河中诸国胆寒不已，但也彻底为大食的兵锋所慑服。

也正是如此，当石国王子逃到中亚诸国，告高仙芝欺诱贪暴之状后，诸国皆怒，但却又知道自身不是大唐的对手，于是乃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而高仙芝获知此事后，当即决定先发制人。按照《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大食攻高仙芝于怛罗斯城，而《资治通鉴》认为是高仙芝在该城与大食遇，那么也就有一个问题，怛罗斯处于谁的控制下。《新唐书·石国传》记载“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显然这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从这里来看，似乎是考虑到一旦大食来攻四镇，很可能会像此前的突骑施一样攻陷安西，故而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成了对深谙兵法的高仙芝的选择，而且之前有过远征小勃律、羯师的经验，远征也似乎成为最佳手段。

按照史料记载：高仙芝亲率蕃、汉兵三万攻打大食。唐军深入大食国境七百余

里，到怛罗斯城（即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江布尔城），与大食军遭遇。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夜间逃跑。由于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又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壅塞道路，幸亏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奋起大棒，为他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逃脱。这次战役，“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

史料很简单，但其实此战背后却有很多地方值得讨论，关于高仙芝大军集结前往怛罗斯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正史并无太多记载，不过，从高仙芝僚属岑参的几首诗来看，高仙芝可能是在献俘后的天宝十年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不过直到五月时唐朝大军还在集结当中，尚未开赴战场，而大军至少计划六月过西州所属之赤亭镇。

关于高仙芝大军的兵力一直以来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杜佑所著的《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序》记载：“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从这里来看，似乎是七万人。

至于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为：“阿布·阿拔斯掌权三年后（751），布哈拉爆发起义，为首的是舒莱克，他率三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阿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阿布·穆斯林前去镇压，派齐亚德·伊本·萨里和阿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舒莱克被杀。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他派遣齐亚德·伊本·萨里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抵达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十万余人。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阿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四万五千人，俘获两万五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掳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当地土著）五万人五万人地渡过河去。阿布·穆斯林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

划，齐亚德·伊本·萨里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阿布·阿拔斯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呼罗珊的总督，阿布·穆斯林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齐亚德·伊本·萨里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阿布·阿拔斯那里。”从这里来看，似乎是唐军损失十万：死四万五千、被俘两万五千，共七万，还有三万人则逃跑了。



画家笔下的怛罗斯之战

另外一部史料则记载：“这一年，拔汗那的伊赫希德与石国国王反目为仇，伊赫希德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十万大军驰援，将石国王包围。石国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五万人，俘获约两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天宝十年（751）十二月。”这里说唐军是十万，死五万，被俘两万，三万人撤出。

不过唐朝在安西的驻军数量，据《资治通鉴》引柳芳的《唐历》记载，唐朝在天宝元年时，十节度使军镇的总兵力是四十八多万；其中安西节度使镇兵两万四千，排名第八；而北庭节度使镇兵两万，排名第九，两个节度使镇兵数量为四万四

千，根本不会有十万人，虽然发拔汗那、葛罗禄，但也不会有十万之众。所以史学界普遍认为，高仙芝的四镇蕃汉兵也就两三万人。

此外，1973年所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提到高仙芝战前曾经分兵征碎叶之事。所谓天威军，也就是哥舒翰于石堡城所置神武军，后更名天威军。天威军征碎叶的时间是在怛罗斯之战前，高仙芝入朝献俘突骑施可汗、石国王之后，碎叶周边的局势并未因此稳定下来，反而可能因为高仙芝此举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因此高仙芝在得知阿拔斯欲攻四镇时，欲却敌于外，但发兵前往怛罗斯，本身就是悬师远征，自然在军事补给方面有所不便，如果突骑施于后叛乱，那么情况自然不堪设想了，于是天威军赴碎叶就是为了避免碎叶一带的突骑施配合大食及诸胡行动，从而使得高仙芝在发汉兵及葛逻禄、拔汗那的蕃兵前往怛罗斯的同时，后方能够安定。不过根据记载，天威军赴碎叶是在七月之前，最迟到八月中完成使命，随后就从碎叶战场返回了。

至于大食人的兵力，史料中同样记载不详，不过通常认为，刚刚在安国平叛完毕的大食军应该不超过五万人，加之阿布·穆斯林的呼罗珊其他兵力，总共应该在十万人左右，但是由于诸胡皆从之，也就是西域诸国纷纷与大食为盟，那这个数字也就不好说了，可以肯定的是，大食及昭武九姓联军的人数远胜于唐军。

如此悬殊的兵力，唐军又如何能够坚持五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唐军无论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能力上，都很强。唐代“重”骑兵，马槊和横刀的使用使得唐军骑兵的冲击力很强，太宗皇帝李世民领军之时，喜选择敌阵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于是“敌无不溃败”。

此外，唐军还多用弓弩，按照记载，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射程三百步（450米）的伏远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的擘张弩，射程二百步（300米）的角弓弩，以及射程百六十步（240米）的单弓弩，在那个时期内，这些弓弩所带来的威胁几乎是可怕的。此外唐军还有车弩，史载车弩是“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支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支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这些致命的强弩硬弓加上可怕的陌刀，应该能够让人想象到当时面对唐军时的场景。

陌刀开始流行于李治调露前后至开元十年之间，开始时使用陌刀是为了对抗突厥骑兵，后来在诸军流行则是为了对付以骑兵称雄的唐之“四夷”，于是陌刀也因此

成为唐军材官（步兵）的主战兵器之一。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如墙而进”，肉搏时候威力不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

至于作战方式，依据唐《李卫公兵法》所记录，唐军作战时，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展开阵形之后，贼在一百五十步时候，弩兵以强弩射之；贼入六十步时，弓箭手以硬弓相迎……疾风暴雨的箭矢洗礼之后，则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短兵相接开始后，奇兵、马军、跳荡军皆不准轻举妄动，如果前方的战况不顺利，跳荡、奇兵、马军方可迎前敌出击， 以掩护前军后退整顿后准备再援， 如果跳荡、奇兵、马军进攻不利，所有的步军必须配合马军同时作战。贼军退却，马军不得轻易追击，必须确认贼军真正溃败后，才能相继掩杀。

也就是说，唐军是步马结合，攻守有职，配以弓、弩、陌刀的步军为正面先锋，也是最主要的正面迎敌力量，而骑兵则为侧辅，通常用于迂回包抄贼军或者迅速冲击立足未稳的贼军阵脚之用。

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天宝十年（751）四月，高仙芝率安西四镇汉番大军从安西出发，在翻过葱岭、越过草原，并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于七月到达了怛罗斯城下，城中是石国大军驻守，于是唐军开始围攻怛罗斯城。据阿拉伯史书《创世与历史》记载，大食在接到唐军远征的消息之后，阿布·穆斯林立即率军赶来增援，双方在怛罗斯城下相遇，唐军虽然人数较少，但步军的强弓硬弩和如墙推进的陌刀阵打得有声有色，然而大食及胡人联军人数众多，战局僵持，到了第五天，情势突变，葛逻禄人忽然叛变发难，趁着唐军因为葛逻禄突然的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时机，大食军迅速展开进攻，于是唐军全面溃败，高仙芝在李嗣业、段秀实等诸将的护卫下，匆匆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此前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的李嗣业恐大食追兵将及，不惜对番兵大打出手，他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拔汗那人，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在收拢残兵之后，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人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回安西，此战数万安西精兵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

此战之中，葛逻禄人是极其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叛变成为了怛罗斯之战的转折点，关于葛逻禄部反叛的原因，可能是和大食人交易的后果，葛逻禄人帮助大食人打败唐军，而大食则默许葛逻禄人在两河流域附近的扩张。怛罗斯之战后，墓逻禄

强盛起来，逐渐取代突骑施，占有楚河流域西突厥故地，其中包括碎叶城、怛罗斯城。

怛罗斯之战中，安西都护府的精锐虽然损失殆尽，但在节度使制下很快便恢复了，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高仙芝败退后，仍被李隆基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天下大乱。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遗憾的是，不久李隆基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也未能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至于大食一方，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呼罗珊的内乱，大食忙于平乱，没有能力再去东进，只能巩固他们在河中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权。这也就使得大唐和大食失去了再次交手的机会，正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他《草原帝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唐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

第六章　塞外余晖

16．暗流涌动

后世普遍将怛罗斯之战看得意义不同，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大唐帝国与大食帝国这两个东西方霸主第一次直面的冲突，但其实这场冲突对于双方的意义都不算很大，西域的政治格局甚至并没有因为此战而发生大的改变。

大食没有能够继续东进,也没有中断一直以来对唐的通使，永徽二年　（651）时，大食开始遣使唐朝,与大唐开始了正式官方交往，此后直基本上保持往来，怛罗斯之战后仍然如此。而西域诸国也没有能够摆脱自身的宿命，他们仍然处在唐朝与大食两大势力之间,这些河中诸国在遭到大食的蹂躏时,仍然寻求帝国的庇护，从“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此外，大唐帝国的势力也没有退出，西域唐朝仍然册封诸国，如“天宝十二载十月,封石国王男邦车俱鼻施为怀化王”。甚至帝国对西域诸国的政策也是依然，那就是并没有因此战而刻意将大食作为一个对手，对于诸国的请求,帝国仍然是“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的态度，很显然，大唐还是将吐蕃作为自己最大的威胁。

天宝十二年（753），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军进讨大勃律国，因为大勃律国依附吐蕃。此战，安西军所向披靡，大军一路至菩萨劳城，因为屡次获胜，上至节度使封常清、下至唐军兵士几乎人人以为贼番不堪一击，此时一扫两年前怛罗斯兵变阴影的唐军试图一举讨平大勃律，可正在封常清欲挥军一战而击灭大勃律时，斥候府果毅段秀实却进谏，认为：“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封常清从之，派兵搜索，果然发现大勃律的伏兵，于是唐军“大破之，受降而还”。

应该说，在历唐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后“贞观遗风”及玄宗“开元之治”之后，大唐帝国不仅国势大增，而且文治武功也在此时达到鼎盛状态，此时的大唐正处于巅峰时期，以至于后人也常常感叹这是史无前例的盛世。

可也就在这一盛世之下，帝国却是隐患重重。武德皇帝立国以来，大唐采取的是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以及府兵制，全国六百三十四个军府，有二百六十一个在京畿及关中，这种布局使得帝国中枢能够牢牢控制全国，而府兵制则是根本，其实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在这

种制度下，府兵的户籍由军府所掌握。平时府兵耕地种田及日常操练，此外每年冬季十一月，由军府统一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战时则由皇帝下诏、兵部调遣。战后，府兵仍归其本来所在的军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客观上来说，府兵制算是一种兵役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东

汉末年以来，经三国、历南北朝，将领兵权在握，从而使得军队成为其私人“部曲”的局面，由于“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优点，故而有利于中央掌握军权，可以防范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展开农业生产，从而极大地减轻国家军费开支，甚至部分解决了一些行军打仗时的后勤供给问题，同时能够保障兵源的稳定。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可是武周之后，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兵士财物，强迫兵士为自己服苦役，也因此一时无人愿当府兵，加上人口流动等因素，就使得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至天宝年间，府兵制已无法维持，加上兵士多逃匿，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根本无兵可交，于是天宝八年五月十日，随着宰相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折冲府至此名存实亡。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然而自府兵制被废之后，募兵制也就成了兵员来源的唯一选择，以至于后来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州兵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称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戍边称健儿，又称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则称团结兵，兵士由朝廷招募而来，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与之所共同产生的，还有节度使制。

最初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而且人选都颇为慎重，并有不久任、不遥任、不兼任之原则。但帝国自唐太宗、唐高宗年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突厥、百济、高句丽等番，朝廷为了能够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于是在开元十年（722）的时候，在边地设十个军镇，分别是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这十个军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所管理，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天宝十节度使”：

其一，安西节度使，又称安西四镇节度使、四镇节度使，本是为防御天山南路安西四镇设置的节度使，开元元年（712）以安西都护领四镇经略大使，治所在安西都护府（龟兹）。后以副都护领碛西节度使，驻西州。开元十五年，改为伊西节度使，开元十九年（731）与北庭节度使合并为安西四镇北庭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再分为北庭节度使和安西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下辖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领两万四千。

其二，北庭节度使，为西防御天山北路部所设置，治庭州，开元元年（712）九月以北庭都护领节度，开元十五年（727）分为伊西北庭节度使，开元十九年

（731）合并为安西四镇北庭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分为北庭节度使和安西四镇节度使。北庭节度使防御突骑施、坚昆，下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西州和伊州，领两万。

其三，河西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以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统辖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等州。

其四，朔方节度使，又称灵武节度使，本为防御后突厥汗国而设，治灵州，开元二十二年（734），朔方节度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

其五，河东节度使，开元十八年（730），更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自后节度使领大同军使，副使以代州刺史领之，复领仪、石二州。治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岁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与朔方节度使互为掎角，以防突厥。辖天兵军、大同军、岢岚军、横野军、云中守捉、忻州、代州、岚州。

其六，范阳节度使，又称幽蓟节度使、燕蓟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卢龙节度使，开元元年（713）所设，初名幽州节度使，以防奚族、契丹，治幽州，统辖幽州、蓟州、妫州、檀州、易州、定州、恒州、莫州、沧州等九州，天宝元年（742），改为范阳节度使。

其七，平卢，开元七年（719）以平卢军使升平卢军节度，治所营州，以防室韦与靺鞨，开元二十八年前后，朝廷敕令平卢军节度使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自此，平卢兵士担负了经略河北之任。

其八，陇右节度使，乃是为了防御吐蕃所置的，开元二年（714）初设，五年后正式设立，驻鄯州，领并七万五千，辖临洮、河源、积石、莫门、白水、安人、振武、威武、宁塞、镇西、宁边、威胜（宛秀）、金天、曜武、武宁、天成、振威等军及绥和、平夷、合川守捉。

其九，剑南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升剑南度支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为剑南节度使，治所在益州（辖益州、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梓州、遂州、邛州、剑州、荣州、陵州、嘉州、普州、资州、巂州、黎州、戎州、维州、茂州、简州、龙州、雅州、泸州、合州二十五州和昆明军），相当于今四川省中部，后增加翼州、当州、柘州、松州、恭州、姚州、悉州、奉州、霸州、保宁都护府，统辖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江南军、

澄川军。

其十，岭南节度使，设置最晚，开元二十一年（733）设岭南五府经略讨击使后，以其治夷。



唐胡人彩绘俑

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但管理军事，而且还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很显然，开元十年所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

边地，以至于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而军事与行政的统合更是使得节度使得以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渐渐也就成为唐室隐忧。

在外的将帅与兵士的关系较密切，是节度使坐大的直接原因，因为府兵制崩坏，故而大唐军制不得不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其实这个时候，此后的军事力量地方化的态势已经形成，因为虽然以节度使统兵虽然使得巩固边地、讨伐番国很是便利，但却也使兵士只知将帅，而不知朝廷，这样一来，招募而来的兵士们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军。此外，募兵的军器衣粮由朝廷统一供给，这也就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朝廷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负担，而节度使则通过掌握驻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从而逐渐脱离朝廷控制，继而能够成长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最初的时候，李隆基并不是没有担心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宦官监军。

宦官监军其实早在东汉之时就已经有过先例，东汉恒帝延熹五年，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西）蛮起兵叛汉，进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望风而走，武陵蛮占据荆州大部，汉廷派车骑将军冯绲率兵十余万进讨，冯绲上书请设监军。史载：“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性烈直，不行贿赂，惧为所中，乃上疏曰：夫势得容奸，伯夷可疑，不得容奸，盗跖可信，乐羊伐中山，反而语功，文侯示以谤书一箧，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此后，冯绲大破武陵蛮，斩首四千余级，武陵蛮降者十余万人，荆州平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冯绲此举不过是为防止遭受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

其实所谓监军都是朝廷临时所遣，以代朝廷协理军务，督察将帅，汉武大帝时曾置监军使者，两汉、魏晋、隋代皆有，省称监军，也称监军事，又有军师、军司，亦为监军之职。唐初，袭前隋制，以御史监军。《通典》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也就是说初期的监军其实只有御史充任，而且不过是执行“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之职而已，既不是常设之职，也不参与军事。

然而李隆基宠用宦官高力士，以至于“每四方进奏文章，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甚至高力士还参与机要，又称“尚父”。而按照武德年间定下的朝章，宦官的职责不过是守御宫门、洒扫内廷、经管内库和皇帝的饮食起居，兼有出入宫掖传宣之事，是无权干预政治的。而大唐初立之时，还明确规定内侍省官不得超过三品，其长官内侍的阶品通常仅是四品。虽然此后不断增加宦官员额，不过这

些阉人一直没有能够获得什么权力，自李世民至武周以来“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流外官服）廪食而已”。然而神龙年间，宫内宦官人数却开始显著增加，时有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但这个时候“然衣朱（四品）紫（三品）者尚寡”，可到李隆基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诸宫品官黄衣（是时为六品官服色）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而宫内宦官员额的迅速增加，也使得宦官的地位得到了相应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监军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开元二十年后，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譬如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时， 就由宦官边令诚以监军身份随高仙芝远征。

不过虽然当时宦官监军已经开始出现，但还属于临时制度而已，所谓“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便是这个意思。但天宝十一年，李隆基曾下诏曰:“诸军节度使等委任尤重,虽奉谋受律,去侧捷归,而甄赏叙勋,率多非实。自今以后，朝要并监军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将行。先在军者,亦即勒还。”从这道诏令中可以发现,由宦官出任监军在这个时候已渐渐普及,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了，最重要的是，宦官在军中的权力也开始愈来愈多、越来越重。

然而，宦官监军在根本上却改变不了问题。唐初，举国共有府兵六十八万，关中便有二十六万，而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有兵五十七万之众，边地竟有四十九万，正如《资治通鉴》记载：“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这倒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帝国的确存在“外重内轻”之一巨大隐患。相较于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这十大边镇，处于在朝廷直接掌握下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而且军士素质也极为糟糕。

不过，作为天子亲军的“北衙四军”其战斗力却很是令人担忧，从北门屯营始置，至左右羽林军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内，飞骑曾经是守卫宫禁的主要力量，而且所有飞骑也都是由元从禁军的子弟和卫士（府兵）中选充。李隆基登基之后，亦有规定，所有飞骑一律从卫士中简补。次年，又从出征吐蕃的兵募中选拔壮勇之士为飞骑。可是随着府兵制的败坏，由于卫士不再上番宿卫，于是飞骑全部出于招募。本来飞骑的任务是宿卫宫禁，但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奉命出征，这也就要求飞骑的身高、体力、弓马技艺都必须要通过严格标准的考核，并且合格的才能选充。可实际上，自从招募之后，开元、天宝间的禁军飞骑多半是出自长安坊市间的商富之家以及无赖游手，他们投充飞骑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获得庇护，再加上平时很少训练，更少实战经验，因此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花架子”。

多是招募市井无赖为兵的镇守京师的彍骑已然不堪，而“北衙四军”则又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地方团结兵则更为不堪，大唐唯有边镇军力强大，这种情况下，帝国军事布局“外重内轻”的隐患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本是守卫边地的军镇，此时竟成了帝国安全的巨大威胁。

17．安史之乱

如果皇帝勤政、宰相用事、朝政清明，倒也能够压制边军可能的叛乱，可偏偏天宝年间，李隆基怠政，李杨用事，更是直接使得本就存在的隐患发酵了。开元末年时，天下承平日久，在盛世之下，大唐国家富庶，地方无事，边地捷报频传，于是李隆基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生活奢华，减少过问政事，而官场则是愈加腐败，朝廷内外一片靡靡之风，而宫内斗争又是一片血腥。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李隆基因听信所宠武惠妃谗言，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旋又将之赐死，同时改立忠王李玙（肃宗李亨）为太子，而颇为有趣的是，作为这场皇室悲剧始作俑者的武惠妃，却在构陷太子、鄂王、光王，并导致三人被赐死后，因“数次见到其鬼魂作祟”故而惊吓成疾，于同年死去。

武惠妃生前颇为玄宗皇帝所宠爱，以至于其死后，后宫虽多美人，竟是没有一人能使郁郁寡欢的李隆基开颜，这个时候，有人进颜，称皇帝第十四子寿王妃杨氏“姿质天挺，宜充掖廷”，李隆基见后，果然以为美貌不凡，堪称绝世无双。

杨氏出自为弘农杨氏，其本是前隋上柱国、吏部尚书杨汪之后，她的父亲杨玄琰，曾担任过蜀州司户，后因丧父，故为曾任河南府士曹参军的叔父杨玄璬收养长大，杨氏自幼天生丽质，而且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李隆基第二十一女咸宜公主下嫁卫尉卿杨洄，杨氏受邀参加婚礼，与公主同为武惠妃所生的寿王李瑁对其一见钟情，于是当年十二月，受封为寿王妃。

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写的那样：“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隆基在一眼看中杨氏之后，便将之召入后宫，但人言可畏，于是李隆基做出了一个过渡之法，也就是《新唐书》记载的那样，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以为李隆基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敕书杨氏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

天宝四年（745），寿王娶韦昭训之女武氏为妃后，杨太真还俗受册封为贵妃，时杨氏二十六岁，而李隆基已是六十岁了。自杨氏入宫以来，备受宠幸。史载，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二人，因献给贵妃的贡品精美，竟得以仕途更进一步，于是，京内境外大小官吏竞相仿效，史载“妃欲得生荔支（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诗人杜牧在他的《过华清宫绝句》曾对此有过

描写："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正如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那样，因为贵妃的受宠，杨氏一门也因此获得"恩露"，其父杨玄琰累次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亲受封凉国夫人。抚养她长大的叔父杨玄珪更是被提拔为光禄卿，其堂兄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居然因贵妃而飞黄腾达，李隆基赐名国忠，甚至一度位居宰相兼文部尚书之位，并身兼四十余职。而杨国忠之子杨昢、杨暄，贵妃弟弟杨鉴，皆娶公主、郡主为妻，史载"杨氏一门尚两公主、两郡主"，此外，贵妃父祖立私庙，李隆基更是御制家庙碑文并书。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也均赐府邸于京师，宠贵赫然，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则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册封为秦国夫人，三夫人都生得貌美色绝，尤其是虢国夫人，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乃为事实之写照。于是"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史载，三夫人凡是有所要求，各级官吏立刻承办所谓"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某年，李隆基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

而李隆基本人显然很享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史载李隆基好诗歌，精音律，多御制曲，又有"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之说，而关于这一点，在《新唐书·礼乐志》更有明确记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也因此后世遂将戏曲界习称为梨园界或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则称为梨园弟子。

生活的奢靡，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腐败。天宝初年，李林甫为相，此人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凭着李隆基的信任，竟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譬如为了掌握大权，他曾训斥诸谏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须多言！"史载，有补阙杜琎上书言事，次日即被降为下邽令，于是自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有谏争之言了。

此外，他对才能功业在他之上而受到李隆基宠信、威胁到他相位的官员，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以文才仕进的。如李隆基曾于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兵

部侍郎卢绚以为李隆基已经离去，便扬鞭策马从楼下缓缓而过，因其风度翩翩，李隆基赞美不已，于是李林甫担心此人会被李隆基重用，于是将卢绚调任为华州刺史，不久他又奏陈李隆基，称其患病不能理事，将他贬为太子员外詹事。李隆基又欲重用绛州刺史严挺之，李林甫竟欺骗李隆基说严挺之年老多病，宜授其散职，便于他养病。于是，严挺之又被送到洛阳养病去了。

此外，李隆基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只要精通一艺，便可到长安备选。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竟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他建议让郡县长官先对士子加以甄选，将其中优秀者送到京师，在御史中丞的监督下，由尚书省复试，将名实相符者推荐给皇帝。最终，送到京师的士子被考以诗、赋、论，于是"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当初唐太宗、高宗、武后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帝国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天宝十年（751），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鉴于开元年间张嘉贞、王晙、张说等文臣以边将入相的先例，故而欲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以巩固自己的相权，李林甫便请辞兼任的朔方节度使之职，继而举荐安思顺继任，并奏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李隆基采纳了他的建议。很显然，他出于一己之私，为了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皇帝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的做法为帝国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谓"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天下倾覆"。

不过李林甫虽然专权乱政，但在位期间，政局尚稳。可当他于天宝十一年（752）死后，情况便不同了，李隆基一方面以擅权弄法的杨国忠出任右相，另一方面则使用胡人为边将，以图左右平衡。可杨国忠本是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得以仕途高进的，此人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而皇帝重用蕃将，虽然使得高仙芝、哥舒翰等蕃将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但也使得安禄山等心怀叵测之徒得以长期控制河北，为日后帝国的大乱埋下了隐患。

由于杨国忠的专权乱政比李林甫更甚，此人只重用亲信，大肆排斥异己，天宝十二年（753）时，关中大饥，因京兆尹李岘不甚顺从，杨国忠竟然以灾气归罪于李岘，贬李岘为长沙太守。后来霖雨成灾，李隆基过问灾情时，杨国忠又掩盖灾情真相，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竟然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琯

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以御史前去审之，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以至于到了后来，面对大权在握的杨国忠，甚至就连李隆基信赖的高力士也不敢声言。

最为可怕的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和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争宠，竟互相诋毁。李隆基对此摇摆不定，认为主要政事交付宰相，边防事务交付诸将，无可忧虑，只是他想不到的正是自己的摇摆不定，导致了安禄山的最终反叛。

安禄山，本姓康，名轧荦山，营州柳城人，母阿史德氏，父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母为突厥巫师，信仰祆教。史载安禄山少孤，因母改嫁突厥番官安延偃，遂改姓安姓，改名禄山。此人通晓六国语言，初为互市马牙郎，后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户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禄山为平卢兵马使，以贿赂交结唐廷派往河北的御史，博得李隆基的称许与宠信。开元二十九年，官至营州都督，至天宝元年（742）时，又升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此后又受封为东平郡王。

此人之所以能够得势，除了熟悉河北军情，能够对不时进扰河北的奚族和契丹进行镇压，以至于被李隆基倚为“安边长城”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谄媚逢迎，因而能够得到李隆基、杨贵妃等人的宠信和支持。据载，安禄山十分肥胖，重三百多斤，某次，皇帝问他为何体肥，其答曰：“唯赤心耳！”还曾经在玄宗面前做胡旋舞，竟然能“疾如风焉”，于是皇帝十分宠信他。

因天宝年间，李隆基对边军管制逐渐松动，而安禄山在各边军中势力最强大，他身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大军，自然遂有轻朝廷之心了。

安禄山平生很是惧怕李林甫，根据记载，安禄山初见李林甫时，仗着皇帝宠信，神色倨傲，李林甫遂当着他的面以事召王鉷。王鉷与安禄山俱为御史大夫，可他虽然权势仅次于李林甫，但却在这位“口蜜腹剑”的李相公面前卑辞趋拜，态度恭谨。从此之后，安禄山便被李林甫的威严所慑服，态度也逐渐恭谨。李林甫每次与安禄山交谈，都能猜透他的心思并抢先说出，这让安禄山惊惧不已，于是平时飞扬跋扈、对朝中公卿多有侮慢的安禄山却唯独忌惮李林甫，以至于“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安禄山返回范阳后，每次刘骆谷从长安回来后，他必会问：“醴陵分说了些什么？”得美言则喜，但如果但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让他须好检校”，则安禄山便会拍着床榻，忧愁惧怕地道：“噫嘻，我死定了！”

尽管安禄山对大权在握的李林甫很是惧怕，而对同样被李隆基所信赖的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也就在朝中失去了忌惮的对象，不过此人感念

李隆基恩德，本想等衰老的李隆基归天之后再行叛乱，然而杨国忠为相后，因不能制服安禄山，便常向李隆基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李隆基之手除掉安禄山。可李隆基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于是杨国忠又奏请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载（754）春，李隆基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可安禄山因为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而向李隆基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从而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最初李隆基是打算让安禄山加同平章事，以为相，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可杨国忠知此事后，却又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皆轻视朝廷。”李隆基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

至此杨、安两人关系交恶，加上安禄山考虑到自己之前又得罪太子李亨，于是精选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为义子，称“曳落河”，皆骁勇善战；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年，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从而完成了叛乱的准备。

李林甫在位时尚可稳住朝政，杨国忠不但没有李林甫的才干，反而纵容贪污腐败，局面遂不可收拾，当时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这种情况下，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联以罗、奚、契丹、室韦、突厥各族，以约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在蓟城南郊誓师，借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于范阳起兵，其后与平卢节度使史思明，挟三镇兵力，直指东都洛阳。

叛乱之初，太原驿站得报，疾驰赶到骊山，当时在骊山华清池的李隆基还不相信安禄山会叛变，此后尽管叛变的消息不断传来，李隆基仍半信半疑，直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派人传来消息，李隆基才如梦初醒。在犹豫之后，下诏以入京朝见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赴洛阳募兵迎战，同时又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命皇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等兵，又出禁中钱招募了关辅新兵，计五万人，率军东征。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出发，李隆基亲自在勤政楼为荣王、高仙芝举行宴会，又到望春亭为他们送行，并命边令诚为监军，进屯陕郡。

面对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所发起的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兵变，承平日久的帝国竟然无法应对，以至于“民不知战，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太守、县令或逃或

降之后，河北诸地很快便沦陷，此后，安禄山大军进逼洛阳。

当初李隆基以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虽得兵六万人，但多富家子弟，更由于承平日久，民不知战，而六军宿卫多市井劣徒，不能受甲，十二月，安禄山率众从灵昌渡过黄河，史载“禄山精兵，天下莫及”，故而虽然封常清善于用兵，但依然三战皆败，十二月十二，安禄山攻入洛邑。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封常清率残部退守陕郡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城中吏民皆已逃散，可谓局势已然不堪。

李隆基听说封常清兵败后大怒，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由于和叛军交过手，故而封常清向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况且潼关无兵，如果叛军攻破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关陕之地就无法防守，不如引兵前往潼关与叛军对抗。”

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建议之后，率军退往潼关，同时打开太原仓，把库中的缯布全部分赐给将士，并放火焚烧了仓库，率兵向潼关方面撤退，中途唐军被叛军追及，官军一触即溃，“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不过虽然如此，唐军还是得以成功退守潼关。此后，高仙芝马上整顿部伍，以据险抗击，安禄山麾下之崔乾祐面对潼关天险，一时不能攻下，只好退居陕郡。

崔乾佑率兵屯于陕郡之后，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等郡都降于安禄山，而皇帝下诏所征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一时间，关中震动。幸好安禄山滞留洛阳准备称帝，没有全力进攻，加之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做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却在此时降临了，当初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高仙芝不从，使边令诚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李隆基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李隆基听信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大怒不已，于十二月十八日遣边令诚赴军中，逮捕高仙芝与封常清。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

史载：封常清临刑前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然后便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李隆基，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

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遂从容就死。封常清被斩后尸体陈放在一张草席之上，此后高仙芝回帐之后，边令诚又以陌刀百人自从，对高仙芝说：“大夫亦有恩命。”高仙芝听后立刻下厅，边令诚遂宣示敕书。高仙芝说：“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又对麾下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士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于是高仙芝又回头看封常清尸体，叹息道：“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言毕被杀。

当李隆基听信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后不久，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镇守潼关，十余日之后，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统军防御此处以来，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刚刚称帝的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叛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主力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

五月，李隆基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消息后，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书称“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做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凭借潼关天险，利在坚守。故主张在潼关据险固守，以打破叛军的速决企图，待其兵力削弱，内部发生变乱时，再大举反攻”。对于哥舒翰的这个建议，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图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同时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李隆基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李隆基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

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

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

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逃回潼关。唐军将近二十万大军，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被部将挟持至洛阳，不得不降于安禄山。

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而在这之前，李隆基已与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御驾行至马嵬坡，途中军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诛杀了杨国忠，并请皇帝诛杀贵妃，以防止日后报复。李隆基言国忠乱朝当诛，然贵妃无罪，本欲赦免，无奈禁军士兵皆认为贵妃乃祸国红颜，安史之乱乃因贵妃而起，不诛难慰军心、难振士气，迫于情势危急，李隆基接受高力士的劝言，为求自保的李隆基不得已之下，以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方才稳住军心，杨氏死时，年三十八岁，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写的那样，“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最初安禄山叛乱时，李隆基本想禅让太子李亨，但此次兵变，太子李亨被认为是主谋，使李隆基大受打击。于是李隆基与李亨于马嵬驿分道，李隆基向南入蜀，而李亨向北收拾残兵败将。此后不久，李亨就在灵武自行登基即帝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封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此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继而会师恒州，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唯有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认为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率兵三千自宁陵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余。

此后，虽然尹子奇率军全力攻城，但在张巡率领下，守城将士坚守孤城，昼夜苦战，有时竟一日之内击退叛军二十余次进攻，就这样连续抗击十六昼夜，杀敌两万余，俘获叛军将领六十余人，就连主将尹子奇也被射瞎一目。这接连的大捷也使得朝廷开始重视起睢阳孤城，李亨下诏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姚訚为吏部郎中，并要求他们继续坚守此处。然而，李亨仅仅只是要求坚守，却并没有给睢阳派来援军，至十月间，睢阳守军已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临淮守将贺兰进明、濠州刺史闾丘晓近在尺咫，却不愿出兵相救，于是在内外交困之下，睢阳陷落，守将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尽皆被杀。

睢阳孤城坚守十月之久，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最后因为守军病饿力竭，寡不敌众，方才城破，此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孤城苦撑，却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在当时，大唐之所以还没有覆灭也就因为江淮赋税的支撑。睢阳乃江淮重镇，一旦失守，则南北运河阻塞，后果不堪，正是因为睢阳守军的坚守，才使得大唐能够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继而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就在睢阳陷落前的一个月，唐军已经收复京师长安，而在睢阳陷落后十天之后，官军又收复了东都洛阳，可以说，帝国江山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十月之久。

唐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收复失地，其原因众多，但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叛军自身内讧。史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正月初一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多是通过严庄转达。而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笞。又有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此外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此子很受禄山宠爱，禄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由于时常担心被废，安庆绪便起了杀父之心，而严庄则担心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便干脆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决心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年（757）正月五日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寝宫。虽有侍卫在场，但因见是严庄和安庆绪，故而也就没有人过问。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而李猪儿手持利直入帐内，一刀砍向安禄山的腹部。虽然安禄山平日间总是把佩刀放在床边以防不备，可此次谋反本就是自己身边之人

所发起，故而事前李猪儿已是偷偷拿走了佩刀，已挨了一刀的安禄山虽知大事不好，可却无法持刀相抗，气急败坏地的他只能摇着帐竿大声呼喊：“贼由严庄。”就在这凄惨而愤怒的喊叫声中，安禄山肠流体外，很快死于非命，时年五十五岁。在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安庆绪草草在床下挖坑数尺，又以毡子裹尸，连夜埋于坑中，随后并诫令宫中，不得外泄。次日，严庄对众人称：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安禄山继承帝位，年号载初，并尊禄山为太上皇，继而发丧。

在杀父自立为帝后，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而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而此时，唐军的反击也开始，叛军内乱之际，急于收复两京的肃宗没有采纳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之建策，先捣范阳叛军老巢、断其归路，而是诏令司空、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进攻长安，五月，唐军在长安西之清渠受挫，退保武功，郭子仪自请处分，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九月，皇帝又以广平王李俶为兵马元帅，郭子仪为中军副将，率兵十五万，并借回纥骑兵四千，再攻长安，二十八日，唐军与叛军安守忠、张通儒等部十万人战于长安以南的香积寺、沣水东，两军激战之时，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击，前后夹攻，叛军全线溃败，叛将张通儒弃城逃往陕州，唐军一战收复长安。

虽然此战之后，唐军乘胜收复长安，但由于李俶未及时遣军追击，故而使叛军得以整队撤退。慌乱之中，安庆绪令其御史大夫严庄率洛阳兵马与退保陕郡的张通儒部会合，共步骑十五万，欲阻止唐军东进。当年十月十五日，郭子仪率军与叛军战于陕郡西之新店，叛军依山而阵，占据有利地形，先以轻骑出战。郭子仪遣军迎击，叛军不战而走，于是唐军趁势追击，此时叛军下山猛攻，并欲包围唐军，于是唐军稍退。就在唐军初战不利之时，回纥骑兵突然从新店之南袭击叛军侧后，叛军惊呼回纥兵至而溃散。唐军与回纥军前后夹击，大败叛军，严庄、张通儒弃陕城东逃。当日，李俶、郭子仪等入陕郡，并以仆固怀恩等率军分路追击。次日，在洛阳的安庆绪杀前所获唐将哥舒翰等三十余人，仅率千余人连夜北逃。十八日，李俶等领军入东都洛阳，但未遣军追击，这也就使安庆绪等得以逃往邺城据守，其部将李归仁等也得以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李光弼

在收复洛阳城之后，唐军分兵攻占河内等地，迫降严庄，随后陈留军民又杀尹

子奇归唐，加上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银青光禄大夫、南阳郡公张镐率鲁炅、来瑱、李祇、李嗣业、李奂五位节度使，陆续收复河南、河东各郡县，情势可谓一片大好。

但此时李亨却忙于迎太上皇还都，而没有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新募之兵，已有约六万之众。由于因契丹、同罗等族精兵大部归史思明，于是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加上对他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于是安庆绪开始琢磨除去史思明，十二月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三人，带骑兵五千至范阳，以征兵为名，实则欲察看情况，准备偷袭，结果事泄，三人尽皆被擒。此时的史思明开始有了想法，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后，他先是被安庆绪封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可范阳本是叛军老巢，当初安禄山从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所掠的珍宝，多半都被运往这里存放，这种情况下，史思明自然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己有，从而不再为安庆绪所节制。

于是史思明向李亨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李亨大喜，当即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肃宗警觉。乾元元年（758）五月，皇帝以乌承恩为河北节度副大使，至史思明军中，以图思明，然而不久事情便泄露，于是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九月，李亨以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二十万，进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唐军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七万援军，克卫州；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庞军，先后共斩其三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于是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万余进驻滏阳，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后，按兵观望。

乾元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叛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近，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六十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之北、县南。史思明亲领精兵五万至，双方激战，伤亡甚重，作为后军的郭子仪刚刚率军赶来，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

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因无统一号令，众节度各自兵退本镇，于是邺城得以解围。此战之后，虽然郭子仪被李亨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山南东道、河南等道行营元帅，但由于鱼朝恩一直妒忌郭子仪，趁机把相州之败的责任推到郭子仪身上，并在李亨面前进谗言。不久，李亨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解除其职务，而是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帅，以统辖诸军。

此战之败，归根结底是李亨之责，李亨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已然是错，虽然诏命九位节度使、合力发兵数十万，但竟不设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以至于数十万大军没有统一节度，此后，唐军久围城不下，后方粮秣供应不继，以致军心不稳，终于酿成这次大溃败。

此战之中，安西名将李嗣业也战死了，李嗣业，京兆高陵人，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他善用陌刀，每为队头，所向必陷，于是初任昭武校尉，后历任中郎将、右金吾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北庭行军兵马使、卫尉卿、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等，封虢国公。天宝六年（747）时，曾随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击讨小勃律，连云堡一战中，“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又有“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天宝十年，李嗣业再随高仙芝讨平石国、突骑施，并以跳荡先锋加特进，面对这位勇将，胡人惊恐，称之为“神通大将”。恒罗斯之战，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已是右威卫将军李嗣业见情况不对，于是劝高仙芝消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于是他“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天宝十二载，加骠骑大将军，入朝，李隆基赐酒，其醉而起舞，于是“帝宠之，赐彩百、金皿五十物、钱十万，曰：为解酲具”。

安禄山起兵，两京陷落，李亨继位于灵武，诏嗣业赴行在。于是李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肃宗大喜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以其为先锋将，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统军平叛，史载“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收复长安的战事中，李嗣业脱衣肉袒，执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史载“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阵乃稍定”，随后其又率前军步卒二千持陌刀如墙而进，此战中，他身先士卒，所向摧靡，一战而

斩首六万级，贼填涧壑死几半，余者东走，遂平长安。

进击邺城，“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然而由于履锋冒刃，终为流矢所中，就他休养数日，伤势即将痊愈时，忽闻金鼓之声，其知这是在和庞均交战，因而大叫“杀敌”，以致伤口破裂，血出数升注地而卒。李亨得知后，甚是震惊惋惜，下诏赐谥号为忠勇，追封武威郡王。

邺城之战，由于李亨的孱弱和猜忌，使得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后安庆绪得史思明之助，大唐九节度使之六十万大军无功而返，此战之后，叛军再起内讧，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上元二年（761）三月，内讧再起，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但此时，大唐内部也祸起萧墙。

李亨信用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等于是得以操纵军政大权，一时间，阉人势力日益嚣张，在宦官们的谗言下，李亨对领军大将颇为猜忌，譬如上元元年时，史思明再陷洛阳，而西戎也趁机入侵之时，李亨虽然任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仍将其留在京师，后在百官的要求下，方命郭子仪出镇。如此信用阉人，而不顾大局，自然使得平叛难以迅速成功了。同时，李亨又宠信张皇后，纵容其干预政事，宝应元年（762）李亨患病，接连几个月不能上朝视事。四月，太上皇（李隆基）归天，李亨更是悲恸不止，以至于病情加剧。李隆基在时，甚是厌恶张皇后与李辅国，常劝李亨不要宠幸此二人，然而李辅国却构谄李隆基，称太上皇预谋复辟，故一直以来，李隆基被软禁于西宫甘露殿，并流高力士于巫州，晚年的李隆基一直忧郁寡欢。

李亨病重之时，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而立越王李系为嗣君，于是发宦官数百人，控制宫闱。李辅国获知此事，以宦官程元振将太子劫持进飞龙殿，随后鼓动禁军攻入宫内，捕杀张皇后、越王，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竟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李亨救命。李亨由于受到惊吓，一时说不出话来，李辅国则趁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随后杀死张皇后、李系等人，李亨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加之无人过问，当天就死于长生殿，时年五十一岁。此后，李辅国立太子李豫为帝，是为唐代宗。

宝应元年（762）十月，李豫继位后，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次年春，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慌乱之中，史朝义仅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又献范阳投降，走投无路的史朝义最终于广阳

城外的树林中自缢而死，就这样，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由于李豫基于迅速结束战争的考量，为了能够早日结束战事，甚至不惜招抚叛军，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同时还允许其保留所据之地与手中兵马，譬如皇帝任命叛军余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于是一时间藩镇（方镇）数量激增，各地均置节度使。这些节度使、观察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所谓“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由于这些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帝国，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从而使得大唐从此之后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至后来这些方镇甚至使得帝国完全分裂，因其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者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更让帝国从此陷入频频内乱之中。

18．日薄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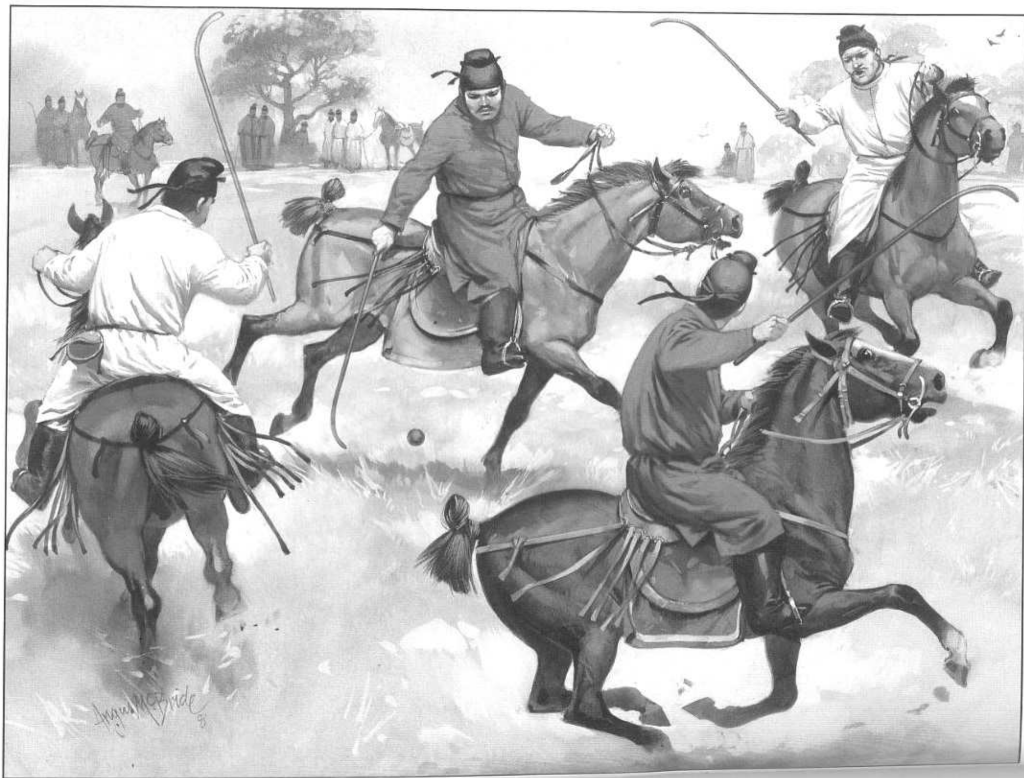
这场战乱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乱使得自武德末年来，百余年来太平没有战事的中原大地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前浩劫，杜甫的一首《无家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黎。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如《旧唐书·郭子仪传》那样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战火蔓延了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经过战乱，本是富饶之地的关中、河东、河南之地一片荒凉。

此外，大唐为了平乱而向回纥借兵，可回纥自持凭平叛有功，却屡屡向大唐勒索威逼财帛，甚至连年地侵扰边境，于是帝国的声威至此沦落，以至于“天可汗”之威竟无法维持。此外，陇右、塞外、西域也相继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从而使得大唐帝国从此无法再去经营、左右西域。

西域的陷落并不是偶然，怛罗斯之战前后，可谓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虽有怛罗斯之败，但大唐并没有伤筋动骨，然而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情况却发生了彻底逆转，安禄山叛军自范阳一路南下，攻陷东、西两京，李隆基仓皇入蜀。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首先便是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于是西域的安西、北庭边兵开始被大批调往内地。仅仅在至德元年（756）安西便先后有李嗣业、段秀实统领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所率七千之众，以及马璘锐卒三千，共计一万五千之众自西域先后进抵凤翔，参与平叛，后来皇帝以此安西兵组成了镇西北庭行营（至德元载安西节度更名镇西）。诗人杜甫于乾元元年（758）秋在华州时，写下了著名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又有“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而杜甫写下此两首诗的背景便是相州之役前，据《资治通鉴》所载：“乾元元年六月，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八月，同郭子仪等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

的确，帝国调河西、陇右、西域等镇边军精锐参与平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压力，但也大大削弱了帝国在西域的控制力，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

食和吐蕃，大批锐卒的调走自然使得大唐在西域的统治失去了支柱，这显然给了吐蕃、大食以机会。不过大食并没有趁机入侵，而是出兵参与了平叛，于大食一同发兵的还有参与怛罗斯之战的拔汗那。其实从一开始，在将大批西域边兵内调的同时，大唐就征发了西域各藩国的军队，以协同平叛，譬如有于阗王尉迟胜所率本国兵马五千，还有乾元元年（758）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时，肃宗当即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



西方人笔下的马球

虽然大食没有趁机入侵，但对吐蕃而言，他们可不会坐失此次良机，这时大唐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诸军，对于吐蕃而言，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域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当即大举进攻河西。

朔方、河西、陇右边军大量内调，以平息安禄山的叛乱使得陇右之地的边防极

为虚弱，以至于吐蕃趁机攻略陇右诸州时，当地守军竟是力不能支，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吐蕃陷陇右所辖的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六军及石堡、百谷、雕窠三城，同时又陷鄯、武、叠、宕四州，宝应元年（762）至广德元年（763），先后取秦、渭、洮、临、成、河、兰、岷、廓九州，至此，河西、陇右之地全部为吐蕃所占。自高宗年间开始的唐蕃战争的主要战场东移到今关中之地和蜀地之间，这也就是说吐蕃能够经常长驱直入唐境，唐都长安也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仆固怀恩反叛之事。

仆固家族是铁勒九大姓之一“仆骨部”，怀恩乃是仆固首领仆骨歌滥拔延之孙，“仆骨”因音讹史载为“仆固”之误。安史之乱初，任朔方左武锋使，骁勇果敢，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振武军及以东连败叛将高秀岩、薛忠义等部。天宝十五年（756），又配合李光弼战于常山南北诸县，数次挫败史思明部。七月，随郭子仪赴灵武，拥立肃宗。次年，因率回纥兵参加收复两京有功，封丰国公。随后在夺取愁思冈等地的作战中，常为先锋，勇冠军中。乾元二年（759），任朔方行营节度，进封大宁郡王。宝应元年（762），任领诸军节度行营，为天下兵马元帅雍王之副，领前锋发兵陕州，再次克复洛阳，随后仅用半年时间，便是悉平河北，可谓说，平定安史之乱，仆固怀恩居功至伟。

史载，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此外，还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也因此，他在安史之乱后，因功升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加太子少师衔，实封一千一百户、大宁郡王。然而平乱之后，当仆固怀恩率朔方兵屯汾州之时，大唐却陷入了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朋党争斗的乱局之中。朝廷对那些平乱中崛起的藩镇骁将们没有办法，却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兴唐名将明升暗降地剥夺了兵权，而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勇将来瑱则干脆因为得罪了宦官被贬赐死。

广德元年（763）仆固怀恩奉命送回纥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女婿和女儿）回漠北，监军宦官骆奉先误信辛云京的谣言，竟向朝廷诬告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仆固怀恩无法自明，于是向朝廷列举了自己的六大罪状：“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又说：“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

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

尽管代宗遣宰相裴遵庆慰问，而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之后，也曾抱着他的脚大哭，但面对裴遵庆让他入朝的建议时，在其副将范志诚的唆使下，仆固怀恩因害怕被杀而最终选择了反叛。当镇守南阳的梁崇义因为来瑱被杀，而襄汉军在襄州反叛之时，仆固怀恩则在汾州引回纥、吐蕃入侵河西，攻陷泾州，进犯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代宗仓皇出奔陕州之时，匆匆以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镇守咸阳。三十万吐蕃大军进入长安，大掠一番，并拥立吐蕃国舅李承宏（金城公主的弟弟）为帝。

此后，由于蕃军不适应长安秋季的酷热，吐蕃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光禄卿殷仲卿率蓝田兵渡过浐水，吐蕃不知虚实，以为郭子仪大军已经到来，故而惶惶不安，加上射生将王甫入城纠集数百少年，夜间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大喊：“唐军来了！”以至于吐蕃军惊惶溃散，于是在占据长安十五天之后，吐蕃退出长安，但至此，陇右道东十三个州已经全陷入吐蕃之手。

当年十一月，吐蕃军在回撤途中围攻凤翔城，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紧闭城门拒守，蕃军攻城数日不下。时任镇西节度使的马璘得知代宗李豫出逃陕州的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率精骑四千余人自河西赴长安救难。正值蕃军围攻凤翔，马璘率众破阵突入城中，随后又身不解甲，出城再战，此战之中，这位安西节度使单骑身先，于是士卒奋击，俘斩蕃军千余，血流于野。次日撤军而走，缩守于原、会、成、渭等州。

史载马璘虽出身将门之家，祖父马正会，为右威卫将军；父亲马晟，为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但少孤无业，整天到处游荡，二十岁时，偶读《马援传》，深为所激，叹道：“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遂入安西投军，此后，以奇劳累迁金吾卫将军。安史之乱时，他统精甲三千赴凤翔，肃宗委以东讨。初战于卫南，马璘即以百骑破叛军五千，后战河阳，又立殊功，战乱平定时，已因功而官至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代宗返回长安之后，于永泰元年（765）正月，以马璘兼南道和蕃使，出访吐蕃。

不过此番马璘出访可不是为了什么和平，自从吐蕃趁帝国内乱之时，不仅是夺取了陇右边、河西诸州，而且还不断侵边犯境，向西攻略。广德二年（764），吐蕃陷凉州，而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则因攻仆固怀恩不成，所部丧失殆半，以孤城无援，只得出奔甘州，却为沙陀人所杀。同年，仆固怀恩引吐蕃攻邠州。这种情况

下，大唐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应。此外，最重要的是，自当年入据长安之后，终代宗之世，吐蕃人每年秋季都要骚扰攻击唐朝，京城每次都要戒严，称之为“防秋”。所谓“防秋”时就是大量从内地调兵到边地以防御吐蕃，因吐蕃多在秋高马肥时进攻，故而这些从内地调来的兵士也被称为防秋兵。这一时期，大唐虽然在整体战略上完全处于防御姿态，但仍力争以有限的进攻来挫败吐蕃，同时采用依托坚固城池来实施机动防御并伺机反击的战略，以应对不利的局面，这似乎就如同当年武德年间应对突厥的入侵那样。

此番，大唐以四镇行营节度使马璘兼南道和蕃使出访吐蕃，也就是为了查探吐蕃虚实。三月十九日，吐蕃以和谈为名，派使臣入长安，代宗皇帝诏宰相元载、杜鸿渐一众接待吐蕃使臣，并在兴唐寺会盟，然而就在同时，代宗皇帝却以名将郭子仪督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很显然，此举是为了提防吐蕃。此外，考虑到泾州离吐蕃较近，为了能够加强泾州的防务，以抗击吐蕃随时可能的入侵，代宗还以马璘镇泾州，并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其余如故，而后又将之擢升为任河南道副元帅，以郑、滑二州隶之。马璘至泾州后，立即“分建营堡，缮完战守之具”。就在代宗皇帝做出这一系列的安排后没多久，当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引吐蕃、回纥、党项羌、奴刺、吐谷浑等三十余万（一说数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南下，其中北路大军由吐蕃大将尚结息、赞摩、马重英率领，与回纥等连兵于自泾州、邠州、凤翔府攻取奉天，醴泉，以进逼京师长安，仆固怀恩亲率朔方兵二十万为后援，而党项帅任敷、郑庭和郝德等自东路攻同州，并计划自华阴攻取蓝田，此为南路，吐谷浑、奴刺等众则为西路。三路大军压境，京师震恐。

郭子仪上书李豫，称仆固怀恩所部皆是骑兵，其来如飞，不可轻视，故请皇帝下诏以诸道节度使分别出兵扼守冲要，以抗吐蕃。同月二十一日，代宗下制亲征，派中使传诏，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驻守东渭桥、检校太子太保李光进驻兵云阳，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驻守便桥，同时以军容使骆奉先及将军李日超驻守敷厘、凤翔节度使李抱玉驻扎凤翔、同化节度使周智光驻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兵坊州，而李豫亲率六军驻屯禁苑督战。

在唐军的节节抵抗下，北路吐蕃军进展极为缓慢，且无进展，尚结息、赞摩、马重英率领之北路大军进至邠州城下时，唐军守将鄜坊、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蕃军攻城数日不下，不得不转而进攻奉天。据守奉天的唐将乃是朔方兵马使浑瑊、讨击使白元光，此二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悍将。

浑瑊出自铁勒九姓中的浑部，世居皋兰州，其高祖浑阿贪支是浑部的大俟利发，贞观年间内附大唐，从此以部为氏。浑瑊的父亲浑释之武艺高强，投身朔方军中，战功赫赫，一路升迁，官至朔方节度留后，开府仪同三司、封宁朔郡王，浑瑊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成为一代名将也就不为奇怪了。

天宝五年（746），年仅十一岁的浑瑊跟着父亲参加例行的冬季边防，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看他一脸稚气，玩笑道“带乳母来了没有”，然而谁也想不到就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却在数年后，参与石堡城之役，此后再战龙驹岛，战功赫赫、“勇冠诸军”，升折冲果毅，此后又受安思顺所遣，领偏师深入敌境，大破反叛的朔方军节度副使阿布思，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凭军功而升中郎将。

安史之乱时，浑瑊随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在河北平叛，后随郭子仪收复两京，与安庆绪的叛军浴血奋战，被提拔为武锋军使，又跟随仆固怀恩平定史朝义，大小数十战，军功赫赫，被授予太常卿，食实封两百户。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连兵入侵，浑瑊之父浑释之以朔方节度使之职镇灵州，战死沙场，于是代宗皇帝诏以浑瑊为朔方行营兵马使。

白元光是突厥人，父道生，历任宁、朔州刺史。元光初隶本军，后补节度先锋。安史之乱爆发后，诏徙朔方兵东讨，白元光遂领所部结义营，随李光弼出征平叛。累迁太子詹事，封南阳郡王，为两都游弈使。当初夺取两京时，长安初平，他奉命率兵清宫，进击余寇，结果身被数创，肃宗大为感慨，躬为敷药。后转卫尉卿，兼朔方先锋，其后历灵武留后、定远城使。此番吐蕃军来找此等勇将的麻烦，那纯粹是自找不快。史载，蕃军刚开始列营，浑瑊率骁勇轻骑二百，趁敌布阵未稳，出其不意地发起冲击，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二百轻骑紧随而后，冲突一番之后，再次杀返城中，此战，浑瑊俘蕃将一人，杀数十人，而从骑无一伤亡。遭到突然打击蕃军自然恼火不已，但他们攻城数日不下，虽伤亡颇多而一无所获，只得收兵回营。此时，浑瑊再次出击，他趁蕃军戒备不严，夜袭蕃军军营，杀千余，生擒五百，吐蕃士气极为低落。

此后浑瑊、白元光在率奉天守军严守城池的同时，又频频利用坚城作为依靠，不断以小股兵马出击，围绕着这奉天城，双方竟是先后交战二百余次，吐蕃大军不但没有能够夺下奉天，反被唐军杀伤万余众。奉天失利，又遇大雨不止，蕃军只好移兵攻打醴泉，同时以党项等西进白水，并分兵东攻蒲津。同月二十八日，蕃军终于决定退兵了，在大掠奉天、醴泉等地百姓数万之后，十万大军逐步西退。所过之

处，焚烧房舍，禾稼被毁殆尽。而此时，也就是在吐蕃大军南下的九月初八日，仆固怀恩已然暴死于军中。

一路西退的吐蕃大军撤退并不顺利，同州守将周智光率兵在澄城以北与蕃军鏖兵，周智光大败蕃军，迫使其在十月初一，退兵邠州，因途遇回纥军，于是双方再次合兵东进，初三攻打奉天。初八，蕃回合围泾阳，统领各部的郭子仪下令要求诸将严守不战，傍晚，蕃回联军退扎于北原。

次日，蕃回联军又到泾阳城下挑战，然而就在此时，传来了仆固怀恩暴死的消息，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吐蕃和回纥为争夺盟军之主而失和，两军分营驻扎。郭子仪借机利用蕃回矛盾而派牙将李光瓒等游说回纥，离间二者的关系，并欲与回纥共击吐蕃，而为取得回纥信任，郭子仪更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见回纥酋长，执酒定约而还。蕃将尚结息得知回纥大将药葛罗被唐所用的消息后，半夜率兵沿旧路西退，结果药葛罗率兵反戈而击，一路追杀吐蕃大军，郭子仪则派白元光率所部精骑增援回纥，两军合力，于十五日，在灵台西原大败蕃将尚结息十万余。此战，蕃军被斩首五万，生擒近万，十八日，唐与回纥又在泾州东部再败蕃军，使吐蕃的这次入侵终于以惨败而收场。

自永泰元年的这场大败后，吐蕃人并没有放弃入侵，大历元年（766），吐蕃攻原州，同时还陷甘州及州境的居延海，并由东而西攻克肃州、瓜州，次年春，代宗派宦官鱼朝恩和吐蕃会盟，然而就在九月，吐蕃却又出兵攻打灵州，幸得郭子仪、路嗣恭率军防守。大历三年，吐蕃又攻邠州、灵州，大唐以马璘、李抱玉、白元光、李晟率军抵御，此役，白元光于灵武外围斩敌两万，而李晟迂回奔袭吐蕃后方，于定秦堡，焚其积聚，迫使吐蕃撤围退走。


唐二十四考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象
道光七年八月之吉
玉壺外史改琦寫

面对此等局面，宰相元载建议以郭子仪率朔方军镇守邠州，而马璘率领安西军则镇守泾州，以抗吐蕃，但这一举措并没有能够改变被动局面。大历四年，吐蕃攻灵州，结果为留后常谦光所击退。大历五年（769），吐蕃攻永寿，次年，又以大军攻青石岭，至大历七年，吐蕃再来，攻灵州。

大历八年，吐蕃以十余万兵入寇泾州、邠州，郭子仪派朔方军马使浑瑊率步骑五千拒之，十月十八日，两军战于宜禄，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大半。十月二十二日，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唯有行军司马段秀实坚守邠州。此战之后，郭子仪召诸将谋说："败军之罪在我，而不在诸将。但朔方兵闻名于天下，现为吐蕃所败，不知诸将有何策略可以雪耻?"众将莫对。浑瑊说："我是败军之将，本不该再议军政大事，但愿进一言，请治我败军之罪，否则就再任用我。"郭子仪赦其罪，并以浑瑊、马璘分别在百城、潘原大败吐蕃军，截其所掠及辎重，杀数千。

大历十年吐蕃入寇，九月十六日攻临泾，十七日，又入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皆遣家属出城躲避。二十一日，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破吐蕃于义宁。此后吐蕃又入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璘破之于百里城。二十三日，代宗命卢龙节使度朱泚出镇奉天行营，以抵御吐蕃人。

大历十一年（776），泾原节度使马璘病死，同年吐蕃攻石门镇。大历十二年，吐蕃攻原州、坊州、盐州、夏州，郭子仪以李怀光率军抵御，吐蕃军退，但随后又寇坊州。大历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回纥入寇太原，河东押牙李自良说："回纥兵精锐，远来求战，难与争锋，不如筑二垒于其归路，以兵守卫。如果来攻，坚守勿与战，等其军疲归去，然后出兵攻之。二垒抗其前，大军攻其后，一定能够获胜。"但留后鲍防不听他的建议，而是派大将焦伯瑜等迎战，结果正月二十六日，两军交战于阳曲，唐军大败，死万余人，回纥纵兵大掠而归。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败回纥于羊武谷，回纥方才暂退。李豫不问回纥入侵之罪，待之如初。七月十四日，郭子仪奏言：回纥兵尚在塞上，随时可入，边人恐惧，请遣邠州刺史浑瑊帅兵镇振武军，李豫从之，回纥于是引退。同年，吐蕃大将马重英攻灵州、庆州、盐州、银州、泾州。



西方人笔下的唐军

纵观代宗一朝，大唐一直是疲于应付吐蕃的扰边，而根本无力处理安史之乱的

善后，这直接导致了河北三镇的坐大，从而使得藩镇割据的局面渐渐形成。也就在这个时期，对西域至关重要的沙洲、北庭之地尽皆易守吐蕃。

大历元年（766），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以来，初徙镇沙州，后有刺史周鼎，大历六年（771），因周鼎欲弃城东奔，而被都知兵马使阎朝杀，此后阎朝便领州人保城抵抗，建中二年（781），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阎朝以勿徙他境为条件而开城出降，沙州遂陷。在夺取沙洲之后，吐蕃西进陷伊州，刺史袁光庭自天宝末年以来，已是坚守累年，后粮尽兵乏，于是袁光庭“城陷而殉”。

780年，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吐蕃开始和唐朝商议会盟之事，建中四年（783）正月十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幕府齐映、齐抗、鸿胪卿崔汉衡、计会使于頔、樊泽、入蕃使判官常鲁在清水县，与吐蕃大相尚结赞、大将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陀、论力徐会盟，厘定两国边界，这次会盟之前，吐蕃已经占领了西自洮州东到陇山西麓，包括大夏河、洮河、渭水上游、西汉水上游的大片的土地，在这一情势下，大唐被迫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于是兰、渭、原、会、成等州尽皆为吐蕃所有。

然而就在清水会盟的同年冬天，建中四年（783）十月，却发生了著名的“泾原兵变”。此事的前因是建中四年八月，叛唐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兵三万，围攻河南襄城，李适为解襄城之围，诏令泾原节度使等各道兵马援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兵抵达长安。这些泾原军士冒雨寒而来，本以希望到长安后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结果一直到离开长安城都一无所得。此外，虽然李适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翔犒赏三军，但那位京兆尹却仅以粗茶淡饭相待，这更加引起了泾原兵的不满，因为“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敌，而食不饱，安能以草命抗白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于是哗然兵变，姚令言虽竭力劝解，并称到了东都洛阳就会有厚赏，但军士不听，眼看情况失控，姚令言当即上奏此事，李适急令赏赐布帛二十车，并让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前往安抚，二人刚到，叛军已经斩断城门，陈兵于丹凤楼。当天，李适带着皇妃、太子、诸王等仓皇出逃，由咸阳至奉天，护驾只有宦官霍仙鸣及窦文场。随后泾原兵进入皇宫，并大肆掳掠京师府库财物，皇叔彭王李仅、皇弟蜀王李溯也于混乱之中被杀。当时，前任泾原节度使朱泚闲居长安，泾原兵于是拥立朱泚为主。

这种情况下，陇右留后韦皋急派亲信求见，建议李适请吐蕃军协助平息叛乱，李适应允，并先后两次派使向吐蕃求助，口头承诺平定叛乱后将安西、北庭之地划

归吐蕃，并每年赠送彩绢一万匹。然而虽然在此后吐蕃派兵以助唐平定朱泚之乱，但事实上，吐蕃仅出偏师二万，而且还趁火打劫，这种情况自然使得大唐不满了。而且叛乱平定后，宰相李泌还明确反对当初决议割地给吐蕃一事，以至于李适想让驻守西域的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割与吐蕃，也被李泌所劝止。李泌进谏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全力东侵，为何拱手让之！且两镇军民，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于吐蕃，必怨朝廷，将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何况吐蕃在平朱泚叛乱中，观望不进，大掠武功，受赂而去，有什么战功呢!"众议也认为不可，李适无奈，于是不再向吐蕃提割地一事，而以满足彩绢需求为酬赏，吐蕃自然恼怒。贞元二年八月二十日，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兵大举攻泾州、陇州、邠州、宁州等地，并毁坏农田禾稼、抢掠人畜，顿时边地骚动，州县纷纷备战守城。

李适诏浑瑊率兵万人，骆元光率兵八千人屯咸阳，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行营副元帅西平郡王李晟遣其将王佖率骁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俟吐蕃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击之，必大捷。"　王佖用其言，果然大获全胜，以至于吐蕃尚结赞感叹道："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

后唐军步骑五千奇袭摧沙堡，途中遇蕃军两万，双方激战，蕃军败退，唐军乘胜追击，攻克摧沙堡，杀守将扈屈律悉蒙等七人，焚其积聚，方才退兵。尚结赞率残军从宁州、庆州北撤，在合水县北扎营。邠宁节度使韩游瓌派部将史履程夜袭蕃军营寨，虽然蕃军早有防备，杀死唐兵数百人，并追击史履程，然而韩游瓌早已在平川列阵，以策应史履程，蕃军见势大惊，丢弃所掠辎重而退。

此后，蕃军攻盐州，唐盐州刺史杜彦光畏而派人送牛酒犒劳蕃军，继而拱手让城于蕃军，并移兵鄜州。十二月，蕃军又进攻夏州，夏州刺史拓跋乾晖率众弃城东逃。此后，吐蕃人又犯银州，直到攻克麟州之后，方才退守鸣沙城。时冬春交季，蕃军粮运不继，羊马死亡严重，驻守灵、夏二州的蕃军供给危机，而大唐则趁机展开反击，李适派马燧任绥银麟胜招讨使，命其和华州节度使骆元光、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和凤翔府各镇大军在河西会合讨伐。当听闻马燧出兵并抵达石州之后，尚结赞遂改变策略，派使臣与唐通好，以归还灵、夏二州为条件，要求重新盟会，修改界约。然而德宗不仅不允，反令骆元光和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领步骑兵万余会合邠宁

守军攻取盐州，又令马燧率河东军攻蕃军腹背。

这种情况下，尚结赞又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并请修清水之盟而归所侵之地，马燧居然信其言，留军于石州，不再渡河，并为之请于朝。贞元三年二月七日，李适下诏，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充入吐蕃使，很显然在马燧的“担保”下，李适动摇了。

虽然李晟、韩游瓌皆认为吐蕃不讲信用，强则入寇，弱则求盟，此时不击更待何时？而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郑国公韩滉也认为：“现在藩镇叛乱已被平定，可以专意对付吐蕃。其所用资粮，臣请主办。”但因为马燧、张延赏皆与李晟有隙，欲反其谋，故而争言和亲有利。而李适则因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好共击回纥，于是听二人言，正合己意，遂以和为计。崔浣既见尚结赞，责其背约入侵，但尚结赞说：吐蕃助唐破朱泚，未获赏，所以来。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逃，并非我所攻占，我们犹望践前言以修好。就这样，在尚结赞的花言巧语之下，大唐决议和吐蕃和议。

当年四月，李适拟遣侍中浑瑊与吐蕃盟于清水，并令吐蕃先归盐、夏二州。但在五月二十二日，尚结赞又遣使来言：清水非吉祥之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盟后再归盐、夏二州，而李适“皆许之”。

虽然神策军将马有麟曾奏言：土梨树地势险阻，恐吐蕃有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而当浑瑊从长安出发前去原州时，中书令李晟也曾告诫“盟所为备不可不严”之说，但没人听从他们的告诫，宰相张延赏就曾说过：“李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浑瑊以严备。互不信任，盟何以成！”因此李适“召瑊，使其推诚以待吐蕃”。

后来浑瑊上奏说吐蕃决定以辛未（闰五月二十日）会盟时，张延赏还召集百官，以浑瑊表称诏示之说：“李太尉说与吐蕃和好必不成，这是浑侍中的表，盟日已定。”听闻这个消息李晟不但没有高兴，反而痛哭失声，他说：“我从小生长在西部边陲，深知吐蕃之狡诈。之所以要论奏，是怕朝廷被犬戎所侮。”

其实这个时候，李晟早已经被明升暗降了，年初时，宰相张延赏屡言于李适，说：“李晟不宜久掌兵权，请以郑云逵代之。”李适遂对李晟说：“朕欲与吐蕃和亲。卿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再去凤翔，宜留在朝廷辅朕，卿可择一人自代。”于是李晟即荐都虞候邢君牙。贞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李适下诏以邢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次日，加李晟太尉、中书令。虽然上柱国、西平王如故，但余官皆罢之，这也就使得李晟的发言权大不如从前了，不过他的提醒还是让李适决定以骆元光率兵屯于潘

原，同时以韩游瓌屯于洛口，以为浑瑊之援。

由于骆元光认为“潘原至盟所平凉七十余里，如果有急，我怎能知之”，于是率兵与浑瑊师团连营相进，至盟所三十余里方止。此后，他又伏兵于营西，而韩游瑰也遣骑兵五百伏其旁，并说：“如果有变，你们就率兵西进柏泉以分敌势。”然而当浑瑊至平凉，吐蕃尚结赞与浑瑊约定时，却是“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盟坛之东西，只准常服者四百人至坛下”。

就这样，贞元三年（787）闰五月二十日，一场灾难降临了，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蕃军游骑贯穿唐军，出入无禁；而唐骑入其军，皆为所擒，对此危机，浑瑊等人还尚不知。后待到使团入幕，换礼服之时，吐蕃擂鼓三声，数万伏兵蜂拥而上，副使崔汉衡、都监宋奉朝等于幕中尽皆被俘，只有会盟使浑瑊从幕后逃出，抢到一匹没有马镫的战马，伏鬣入其衔，驰十余里，突围而出。

三千唐军甲士皆向东而逃，吐蕃纵兵追击，被杀者数百人，被擒千余人，幸亏骆元光早有准备，发伏兵成阵以待之，吐蕃追骑至，见韩游瑰的邠宁军西进柏泉，故而担心被截断后路，遂不再追击。骆元光与浑瑊方才得以收罗散兵，整军以还。

史载，就在当天，李适临朝，对众官说：“今日与吐蕃结盟息兵，真是国家之福！”马燧曰：“然。”兵部侍郎、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宜城县伯柳浑却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李适怒而变色呵斥道：“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耶?”于是柳浑与李晟皆伏地顿首。夜半，邠宁节度使韩游瑰上表飞奏，说吐蕃劫盟，兵已近邠宁镇，李适大惊失色。

这次平凉劫盟事件之后，吐蕃频频入侵，八月二十八日，吐蕃率羌、浑之兵寇陇州。九月五日，李适下诏遣神策军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七日，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对老弱者皆杀之，有的被断手挖目。然后驱赶丁壮万余人送至安化峡西，将万余人分隶于羌、浑之军，民众大哭，自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不久，吐蕃兵又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军副将苏太平出兵击退之。同年九月，吐蕃入寇，陷华亭、连云堡，九月二十四日，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及邠州、泾州人畜万计而去。此外，由于连云堡乃泾州西大门，连云堡既陷，西门外即为吐蕃之境，樵采路绝。每次收获庄稼，必陈兵保之，不则为吐蕃所收割，因此泾州戍卒常缺食。十月四日，吐蕃又入寇丰义城，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击退之。五日，寇长武城，并在原州城的故地上修城以屯兵。

这种情况下，大唐决定改变原有的外交政策，以全力对付吐蕃。之前，回纥合

骨咄禄可汗屡次遣使求和亲，李适因旧恨不许，此时宰相李泌因劝李适结回纥、大食与南诏，共图吐蕃，说：“与回纥和，吐蕃即不敢轻易犯边。招顺南诏，即断吐蕃右臂。南诏从汉朝以来就臣服于中国，因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致臣于吐蕃，现在苦于吐蕃赋役繁重，愿意重新归顺。大食在西域为最强，与天竺皆慕中国，且世代与吐蕃为仇，招之必可。”于是贞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适以咸安公主出嫁，以结好回纥。

史载哀牢王族中的舍龙一族，为避难迁居至邪龙。邪龙本是哀牢国领土，汉时，为邪龙县，划归益州郡管辖，后汉朝衰落，于是被豪酋占据。舍龙一族的到来，很快得到哀牢人的支持，势力不断扩充壮大，逐渐形成以舍龙一族为中心的部落，这个部落开始被称作“蒙舍龙”或“蒙舍”。豪酋张乐为拉拢舍龙一族，将女儿嫁予舍龙之子细奴逻。

贞观二十三年（649），细奴逻继承蒙舍诏（王）。而当时唐初洱海地区部落林立，互不役属，蒙舍诏与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为其中六个较大的部落，也因为被称作为“六诏”。因蒙舍诏位于这些“诏”的南面，也被汉史称作“南诏”。

永徽四年（653），为获得大唐的支持，细奴逻派子逻盛炎来到长安，李适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其他五诏与河蛮部落，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只有南诏始终附唐，因而一直得到大唐的支持。开元元年（713），李隆基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开元二十五年（737），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次年，李隆基以“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为由，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晋爵为云南王。



南诏王室受封图

开元二十六年（738），皮逻阁谋乘胜兼并五诏，张建成建议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显向朝廷代请，得李隆基允许。《新唐书》记载：“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又以破洱蛮功，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钿带七事。于是徙治太和城。”根据记载，李隆基在给王昱敕文里说，蒙归义效忠出力，讨伐西蛮，“彼（指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

于是皮逻阁出兵，大唐还遣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先灭越析，次灭三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六诏，南诏正式立国。

开元二十七年（739）皮逻阁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此时唐朝亦用兵于南诏，《新唐书》记载：“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

确切地说，南诏之所以能够建立，大唐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帝国所以支持南诏，则是源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南诏建立之初，皮逻阁奉行对唐

和好政策，唐朝抵制吐蕃的目的部分实现了，自天宝四年（745）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南郡太守张虔陀狂妄昏庸，无视吐蕃咄咄逼人威胁的存在，一味抑制南诏，更使矛盾激化。

天宝七年（748），皮逻阁死，其子阁逻凤继位，天宝九载（750），阁逻凤路过姚州，张虔陀先是利用阁逻凤是皮逻阁继子，企图在王位承袭上，用皮逻阁嫡子诚节取代，打击亲阁逻凤势力。张虔陀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逻凤，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逻凤妻女。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史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

就这样，双方的冲突爆发了，天宝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戎、嶲州，往击南诏。

阁逻凤本意并非要与唐决裂，于是遣使谢罪请和，甚至表示原因请还其所掳掠，赔偿损失，此外南诏使者还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并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然而鲜于仲通自持兵众，不仅不许，还进军至西洱河，进逼洱海，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以图腹背夹击，以平定南诏。阁逻凤在唐军压境下，派人到浪穹求援吐蕃，并请归附，而这正是吐蕃所期望的。天宝十一年（752），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给金印，号“东帝”。

南诏得到吐蕃支持后，联兵合击，唐军大败，死六万众，云南自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被唐兵破坏，此为南诏与唐间的第一次天宝战争。

时正逢杨国忠掌权，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大唐于天宝十三年（754），命剑南留后李宓领兵七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士兵又不习水土，疾病流行，不战自溃。南诏和吐蕃联军乘机追杀，“兢角兢冲，彼弓不暇张，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汉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李宓战死，全军覆灭，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

两次战争唐军死伤众多，军费耗大，元气大伤。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顾及南诏，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

可以说，天宝战争是大唐错误政策所造成，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大历元年（766）阁逻凤曾在南诏王都太和城所立之德化碑上，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碑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正如宰相李泌劝说李适时所说的那样：“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

至德年间，吐蕃趁安史之乱，频频入侵河陇和蜀地，而南诏受吐蕃役使，曾配合吐蕃夺取巂州、会同、台登、昆明，进据清溪关，直逼川西平原，甚至威胁成都。

史载，至德元年（756）、二年（757），吐蕃联合南诏攻克巂州，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占维州、松州，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夺回二州，此后在永泰元年（765），剑南节度使严武派名将崔宁在西山击败吐蕃军。之后，崔宁接任西川节度使，又多次击败吐蕃军的入侵。

大历十四年（779），代宗李豫驾崩，阁逻凤也死去，于是吐蕃联合南诏发兵十万进攻西川，当时崔宁在朝中未回，吐蕃、南诏一路连克剑南道数城。李适以李晟率军救援，大破吐蕃、南诏联军，追至大渡河外，吐蕃南诏死伤七八万之众，只剩万余残兵逃回。

此后，吐蕃不顾南诏怨恨，借其王位交替，加强控制，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设置营堡，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使双方矛盾加深。南诏王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同意此议，但只在暗中谋划，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恰在此时，大唐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

贞元三年（787），李适开始采取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谋略。李泌虽不久病逝，但其所持的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计划却得以贯彻下去。

贞元三年（787），不堪吐蕃压迫的南诏王异牟寻开始和西川节度使韦皋接触。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通过他们从中斡旋，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其次，又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贞元四年（788），吐蕃出兵十万，再度进攻成都。南诏也被迫从征，但驻兵金沙江北，按兵观望。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吐蕃中计，对南诏的疑虑加深，派兵两万屯会川，阻击南诏，异牟寻怒，而

引兵南归，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

贞元五年（789），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吐蕃战于州台登谷，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史载“乞藏遮遮，吐蕃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于是不到三年，韦皋收复了巂州及周边。

贞元八年（792），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韦皋攻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次年韦皋遣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余。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率众归附大唐。

大唐在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在政治上的劝诱，终使南诏王异牟寻决心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派出三批使者，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均达成都。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污辱先人、孤遗受欠、吞声无诉之“四难忍”，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

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794）正月到达苴羊城，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盟辞互约，唐与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就此，南诏归附唐朝。

随后，南诏与吐蕃激战于铁桥，南诏军在神川大破吐蕃，俘虏吐蕃五王，收降吐蕃兵十余万，攻取其铁桥等十六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四日，南诏遣使献俘于长安，并遣其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献地图、方物于大唐。李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为册南诏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岩为判官，赐异牟寻 “贞元册南诏印”。使者到达南诏，异牟寻离开座位，跪着接受册印，稽首再拜；又接受所赐服备物，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就这样，南诏正式重新向唐称臣，南诏和唐重修和好。

自贞元九年（793），大唐收复盐州、夏州等州县之后，大唐联合南诏、回纥频频实施围剿，吐蕃兵势渐弱，其虽然多次犯边，但都被西川节度使韦皋和回纥多次击败。贞元十三年（797），吐蕃大将尚结赞和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先后死去。

尚结赞很有谋略，他任大相时，不仅于国内屠害异己，独揽大权，对外更是率领吐蕃大军频频征战，开疆辟土。至于赤松德赞，他对吐蕃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位期间，将天竺一系的佛教定为国教，制定每一名僧人由三户属民供养的“三户养僧

制”。为了推行佛教，他甚至制定所谓的“三喜法”，规定赞普杀死属民就像母亲打孩子一样，属民应服从赞普；但如果赞普违背佛法，属民可以抗拒赞普的法律。同时，这位赞普还命令群臣在全国各地广建佛寺、佛塔，要求群臣发誓永远信仰佛教。

过度推崇佛教及频频对外的战争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吐蕃的国力，当南诏归附大唐，同时大唐用和亲政策拉拢回纥，并通好于大食，从而形成对吐蕃的包围网之际，尚结赞和赤松德赞在生前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吐蕃一方面唆使西域的属国抗击大食，同时举力进攻安西四镇，贞元六年（790）吐蕃策反回纥属下的葛逻禄各部，其后尚结赞大破支援西域唐军的回纥大军，使得回纥从此走向衰落。此后，庭州举城降于吐蕃，陇右十八州全境入吐蕃，不久之后，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安西四镇也随之陷入吐蕃。至于贞元十年时，吐蕃已经完全占领了西域地区，将唐朝与回纥的势力彻底驱逐，从而成为了东至陇右以及蜀西，南至印度中部恒河一带，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至天山的强大帝国。

尚结赞和赤松德赞先后死去时，吐蕃依然试图再做一搏，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灵、朔等州。是年七月十八日，吐蕃攻打唐盐州，二十九日蕃军攻克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坏城郭，并掠城内居民及党项部落属民后退兵。李适遣使敕命剑南节度使韦皋以“围魏救赵”之策，从成都西山攻入吐蕃。



吐蕃壁画

韦皋派镇静军兵马使陈洎，威戎军使崔尧臣，维、保两州兵马使仇昱，保州、霸州刺史董振，分别率兵进逼吐蕃维州城中，同时以北路兵马使邢砒并诸州刺史董怀愕等率兵四千进攻吐蕃栖鸡、老翁等城，都将高倜、王英俊等率兵两千进逼故松州，陇东路兵马使元膺并诸将郝宗等复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等路。又令邛州镇南军使、御史大夫韦良金发镇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与三部落主赵日进等率三千进攻吐蕃偏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主郝全信等兵两千过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率兵四千进攻昆明（四川盐源）、诸济城。

韦皋军步骑兵两万九路并进，分别向吐蕃所属维、保、松州、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攻势，转战千里，两军多次交战，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在这

种情况下，吐蕃不得不调派进攻灵州、朔方的蕃军南下往援维州，以内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论莽热前来解维州和昆明城之围。韦皋闻讯派西川兵万余在吐蕃援兵必经之险要地带设伏，论莽热率蕃军经过时，伏兵四出，于是十万蕃军大乱，论莽热被擒获，兵马死亡大半，吐蕃由盛转衰。

宪宗李纯在位时，吐蕃军骚扰泾州、宥州、盐州，但都被大唐击败，譬如元和十四年，吐蕃十五万进攻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敬奉率军绕至吐蕃军背后攻击，大破吐蕃军，杀戮不可胜计，史载“史敬奉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玼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

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唐蕃进行第八次会盟，称为“长庆会盟”（第八次会盟碑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双方在盟文中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叶同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

其后，文宗太和五年（831）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据其城，这引起宰相牛僧孺的不满，牛僧孺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被吐蕃官吏尽杀于维州城下，此次事件只是“牛李党争”中一个插曲而已。

武宗时期，皇帝一度命令准备武器粮草，并派人收集吐蕃情报，准备收复河湟失地，但由于当时朝廷正忙着讨伐昭义，收复失地的事情也就暂时搁置了。至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杀（朗达玛因为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禁绝措施，史称“朗达玛灭佛”）。其死后，王妃那囊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诡称生下了一个“有牙的儿子”，将云丹拥立为赞普，自己摄政。关于云丹的真实身份，《旧唐书》称那囊氏的哥哥尚延力之子，而藏文文献《贤者喜宴》与《西藏王统记》则称云丹是一名乞丐的儿子，被那囊氏收为养子。

然而大臣们对这个刚出生就长了牙的孩子的真实身份十分怀疑，因此不少大臣反对云丹继位。譬如大相韦·甲多热不服，竟被那囊氏逮捕灭族。此后不服云丹统治的大臣退往山南地区，立次妃所生的遗腹子俄松，从此，吐蕃分裂，吐蕃王国名存实亡。



唐代敦煌壁画

时任洛门川讨击使的论恐热趁着讨伐云丹的机会，大败大相尚思罗所率八万大军自称吐蕃国相，因为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显然不服自己，于是论恐热以大军二十万征讨尚婢婢，但却被尚婢婢以四万兵马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论恐热再攻鄯州，还是大败，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屯军河源军的尚婢婢轻敌，才败于论恐热，退往甘州。由于尚婢婢和论恐热的争斗，加上云丹以伍如（逻些小昭寺），和以云如（山南昌珠寺一带）为据点的俄松对立，双方频频交战，一时间，吐蕃分散于各处的将领也纷纷拥兵称雄，彼此争立，过去一些归属吐蕃的部落也相继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席卷了整个高原和西域地区，吐蕃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下轰然崩溃了……

吐蕃内乱之时，自大中三年（849）开始，大唐开始了攻势，凤翔节度使李玭取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取石门等六关，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西川节度使杜奏取维州……

而此时，失陷于吐蕃的大唐陇右等州官民也纷纷奋起反抗，当初吐蕃趁安史之

乱，而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6），鄯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陷落后的河西、陇右之地，为吐蕃所有，当地大唐子民惨遭吐蕃的蹂躏，史载，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唐子弟满门几乎是日夜思归大唐。史载，开成年间（836至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由此可见，尽管陷落于吐蕃几十年，但诸州子民仍念念不忘大唐。

会昌年间，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其后吐蕃内乱，尚婢婢和论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宣宗大中三年，大唐收复了陷于吐蕃的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七关，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河西地区。

不久，论恐热率五千骑至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此举直接导致了沙州归义军的出现。当初吐蕃军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大唐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依然坚守孤城。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纥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出城投降，史载“自攻城至是十一年”。

而自从开成五年（840），回纥汗国灭亡以来，有大批回纥流落河西走廊，这更使得当地的情况复杂化，此时，原陷于吐蕃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站了出来，此人本是沙州豪门首富，因心向大唐，故而暗中结交豪俊，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张议潮等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了沙州之后，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此后一两年间，张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

由于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当初派出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直到大中五年正月，张议潮所遣告捷的使者到达长安，李忱（为宣宗）大喜，当即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而此时，张议潮已先后收复了瓜

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向东直至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使六郡山河宛然如被吐蕃陷没之前一样。

同年八月，张议潮又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至此，除凉州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复归大唐。得知此事之后，李忱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十一月，唐朝令于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不久，又加授左仆射。

懿宗咸通二年（861）三月，张议潮命其侄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人克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并表奏朝廷。史载此战归义军“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两军对阵之时，归义军人人置生死于度外，“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最终吐蕃军终于支撑不住，于是“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攻下凉州之后，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正如史载那样，“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

咸通四年（863），大唐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

宣宗时，大唐的情况也并不比吐蕃好多少，当时官吏腐败，藩镇林立，帝国已经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以官爵羁縻张议潮以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能力，因此“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固然权势巨大，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河西。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纥、西南的吐浑残部也都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国内，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诸州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这些势力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而张议潮经营河西之地的策略就是“耕战”，如同当初的府兵制那样，兵农合一。

史载，大中十年（856），吐谷浑王欲来劫掠沙州，张议潮趁着“吐浑王集诸川蕃人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的时机，率先出兵讨伐，两军在西同附近相遇，张议潮首战破敌，吐谷浑王败逃，张议潮率军乘胜追击千余里，大获全胜，活捉吐谷浑宰相三人，斩首示众，夺驼马牛羊二千头，而后唱《大阵乐》，凯旋而归。

此后，在沙州北约一千里远的伊州城西，有纳职县，聚集着大批回纥及吐蕃残部，他们频频劫掠伊州，俘虏人口，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大中十年（856）六月，张议潮又亲率甲兵，进击纳职。回纥一时无备，措手不及，归义军大军四面围攻，军士奋勇冲杀，“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此战回纥大败，竟“各自仓皇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牢而守”。此战，张议潮再次大胜，收夺驼马之类万匹，再次凯旋而归。

大中十一年，吐蕃将领尚延心以河、渭二州蕃部在张议潮的影响下归唐，唐以尚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吐蕃至此，业已衰微不堪，再也无力威胁河湟之地，但归义军仍然“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后来叛乱回纥劫夺大唐册立回纥使王端章，张义潮闻知大怒，出兵讨伐，显然，此时的归义军是为大唐在河西地区的主要生力军。

懿宗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纥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鄜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了尚延心的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大唐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大唐王朝的势力，再次抵达陇右诸地。

咸通八年（867）二月，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议潭去世，于是已是六十九岁高龄的张议潮入觐长安，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邸。之所以前往长安，这是张议潮决心以“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的气概向大唐的君王证明自己的忠诚。

张义潮入京后，尚遥领河西节度，而以其侄张淮深知留后，也就是说，河西职务实际是由兄长张义潭之子张淮深所掌握。当初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

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之后，张义潮和作为义军重要领袖的兄长张义谭两人经过商议，即遣张义谭入朝为质，而由张义潮主持河西军政大局，张义潮之后，则张义谭之子张淮深继任。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四岁，皇帝下诏，赠官太保。

张义潮入朝之后，安西的回纥再次叛唐，咸通十一年（870）九月，回纥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桐，于西桐海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所败，僖宗乾符二年（875）正月，张淮深又败回纥。大唐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诏赐张淮深，兼重赐金银器皿、锦绣琼珍。

史载昭宗大顺元年（890）二月廿二，张淮深死，而关于他的死，现无定论。几个说法是：张议潮的女婿索勋发动政变，杀张淮深夫妻和六子，自立归义军节度使；归义军内部以张文彻为首的实力派杀死张淮深及其一家，企图夺权。张淮深的儿子张延兴、张延嗣杀死了张淮深和异母兄弟张延晖、张延礼六兄弟及张淮深夫人颍川郡陈氏。还有说法是张淮深的死是其派兵追随静难节度使朱玫拥立李煴之故。


敦煌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朱玫原为徐州叛首庞勋部下裨将，咸通十年（869）降唐，为邠州戍将，后邠宁节度使李侃调任河东，朱玫随行，为马步都教练使。李（僖宗）乾符六年（879），河东军乱，朱玫被任为三城斩斫使，捕杀乱兵，后改河东马步军都虞候。同年十二月，诏以为代州刺史。次年，李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将河东军给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和朱玫以便他们南讨黄巢。朱玫为邠州通塞镇将时，假装效力与黄巢所任邠宁节度使王玫，乘机起兵杀之，而以别将李重古为留后，约定合兵讨黄巢。此战中，袭击黄巢军，战于开远门，被长枪洞穿咽喉，竟不死。以功升晋州刺史、邠宁节度副使，合泾、原、岐、陇兵八万屯兴平，号定国砦，后为黄巢将王播所围，战于涝上，败走邠州，退屯奉天及龙尾陂，诏命灵、盐军相助，同年升邠宁节

度使。

中和二年（882）朱玫被任为河南都统，引兵屯中桥，列五壁，进西北面都统。次年春，僖宗重返长安后，授朱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吴兴侯。李 改邠宁为静难后，其为静难节度使。

中和五年（885）三月，为李 所重新的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交恶。因光启二年（886）王重荣上书列举田令孜十大罪状。于是田令孜调拨禁军，引鄜州、延州、灵州诸道军，及静难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伐王重荣，结果朱玫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李昌符讨伐田令孜。于是田令孜乃纵火焚烧坊市和宫室，挟李逃往凤翔。朱玫拥李煴为帝，改元建贞，他则自任侍中，专断朝政，又派王行瑜率军五万追击李，结果王行瑜倒戈杀朱玫。如果张淮深是被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波及，那么数年前邠宁节度使朱玫叛乱攻入长安，立襄王李煴为帝时，张淮深一定是派兵支持了朱玫的，但目前没有更多的史料能够支持这一点说法。

关于张淮深之死，还有一个说法——张议潮之子张淮鼎杀死了他。当初张议潮入朝，官授司徒，留下侄子张淮深处理归义军军务，张淮鼎随同前往。黄巢之乱后，张淮鼎回到敦煌，担任沙州刺史，得到张文彻为首的归义军实力派的支持，于是张淮鼎发起政变，杀死了张淮深，自立归义军节度使。而张议潮的女婿索勋则因为拥立张淮鼎为归义军节度使留后，而使得次年（891）年底时，张淮鼎死后，他得以继承归义军节度使之职。

但也正是索勋继承归义军节度使，使得他谋逆杀张淮深及其妻儿，立其子张淮鼎为傀儡节度使的说法成了学术界普遍的认识。通常认为是大顺元年（890）二月廿二，索勋发动政变，杀张义潮的侄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夫妻和六子，拥立张议潮的亲子张淮鼎为归义军节度使。两年后，张淮鼎死，索勋没有扶立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而是以张淮鼎子张承奉孤弱，遂自立为节度使，这引起了张议潮第十四女、被朝廷拜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的李明振之妻张氏（索勋的小姨子）的不满，她于乾宁元年（894），派三个儿子率诸将士诛杀索勋，所谓“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而在李氏拥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后，张议潮之祚因而复振。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史家的记载，张氏及其子（又称李氏诸子）在拥立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后，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把持着归义军的大权，成为了另一种意义的夺权者。只不过，李氏诸子小看了张氏在归义军中的影响力，深受

张氏两代之恩的瓜州、沙州豪族们在三年后的乾宁三年（896）发动新一轮的政变，推翻李氏诸子的统治，并将实权交还给了张承奉。光化三年（900）八月，李晔（昭宗）下诏正式册封张承奉，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经过多次内乱的归义军已经是千疮百孔，先前被回纥占了高昌和甘州，高昌回纥又攻占了伊州，历次内乱时肃州的本地家族龙氏也脱离了归义军，而凉州和沙州因为隔着甘、肃凉州，实际上也早失去了控制能力。到了张承奉掌权，只有瓜、沙凉州还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实在是一个烂摊子。张承奉执政的前十年，始终以唐臣自居，未有异心。史载，张承奉至天复年间犹为河西节度使，奉唐正朔，终唐之世，始终为唐经略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祐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大唐名存实亡。天祐二年（905），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此后，张承奉频频领军与回纥交战，但屡战屡败，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号哭之声不止，怨恨之气冲天”，开平五年（911），甘州回纥围攻沙州，张承奉国力衰微、抵挡不住，只得求和归顺，认回纥可汗为父，彻底成为了甘州回纥政权的附庸。

而此时，大唐也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宣宗去世后，相继为帝的懿宗与僖宗皆为无道昏君，大唐的国势一直走下坡。政治败坏，叛乱相继发生，作为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在安史之乱时尚且得以保存，而此时也已经被破坏殆尽，接连的叛乱更是彻底动摇了这个政权。先有王仙芝聚众于长垣起事，隔年攻陷山东西部、流窜于河南淮南一带，声势益盛。后王仙芝战死于黄梅，余部溃散投奔黄巢。黄巢由亳州南下掠夺江南与领南地区，沿路屠杀不断，并且攻陷商业大城广州，华南经济几乎全毁。此后，黄巢率军经桂州、沿湘江北上流窜回江南。隔年，黄巢大军西进，连续攻陷洛阳与潼关，掌权宦官田令孜挟僖宗逃往蜀中，黄巢入长安后建国“齐”。

大唐只能以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沙陀军协助唐军克复长安，与此同时，黄巢部将朱温投降，赐名朱全忠，受封宣武节度使。黄巢东走，包围朱全忠于陈州，但为李克用率军解围，不久之后，黄巢被其甥林言斩杀，于是黄巢之乱平定。而后，黄巢降将秦宗权复叛，甚至一度攻陷东都，一时间“极目千里、无复烟火”，此叛乱直到昭宗时才由朱全忠平定。

平定民变后的唐室，也从此被关中藩镇反噬，而宦官与外廷为了政治斗争又拉

拢藩镇加入战局，最后演变成各藩镇争夺朝廷。这些藩镇以河东李国昌、宣武朱全忠与凤翔李茂贞最强，各路藩镇征战不休，大唐江山一片残破。僖宗死后，其弟李晔被宦官杨复恭拥立，是为昭宗。



朱温

李晔登基之时，所谓大唐仅仅有京师长安还为天子所有，虽然李晔一度建立殿后四军，以图自保，但凤翔李茂贞大军逼近长安时候，昭宗不得不逃往华州，于是殿后四军被废。最后有赖李克用、朱温率军入援，李晔得以于返回长安，而后又有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争权。李晔被韩全诲所幽禁，此后宦官刘季述立李晔之长子为皇帝（成帝李缜，德王），崔胤以朱温入援。而韩全诲则强迫李晔投往李茂贞，于是朱温率军围困凤翔。隔年，凤翔军粮草耗尽，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二十人，与朱温议和。

此后，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李晔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李晔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宦官七百众，自李隆基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此后，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晋

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

眼看局面失控，崔胤后悔不已，有意摆脱朱全忠的威胁，暗中招募六军十二卫，但被朱温在长安的眼线所察觉。天祐元年（904），朱温杀崔胤，然后逼迫李晔迁都洛阳，长安城被毁。史载，李晔“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

此后，朱温把李晔左右的小黄门、打球供奉、内园小儿等二百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从此之后，“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同年八月，朱温弑帝，另立李晔子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即唐哀帝。隔年，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当年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滑州白马驿附近的黄河之中，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史称白马之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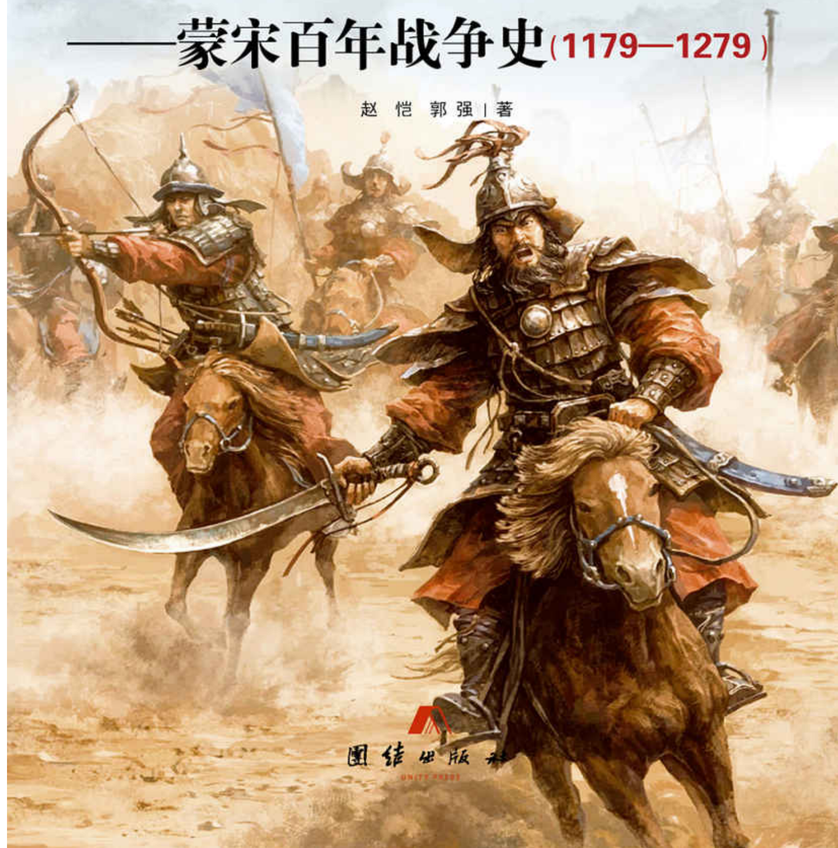
天祐二年（905）十二月，朱温又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不久，宰相柳璨亦被贬赐死，其弟兄也被全部处死。太常卿张廷范被五马分尸，其同伙被除名赐死者若干，此时的朱温已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了。

天祐四年（907），时为天下兵马元帅、梁王的朱温更名为朱晃，逼李柷禅位，自登帝位，改元开平，并建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并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而以大唐之东都洛阳为西都。废十七岁的李柷“禅位”以后，先被降为济阴王，迁于开封以北的曹州，被安置在朱全忠亲信氏叔琮的宅第。但由于当时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等仍奉李柷，废帝的存在使得朱全忠不安，于是在天祐五年（开平二年，908）二月二十一日，朱温派人前往曹州毒死李柷，其死后谥号为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

盛极一时的大唐至此宣告灭亡，历史由此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而西域这片苍凉而又雄浑的土地也在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华夏政权的到来。1757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大清帝国彻底平定了困扰帝国数十年的准噶尔叛乱，完成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两朝来的西域经营大业，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取因“故土新归”之意。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3

苍狼逐鹿



苍狼逐鹿

——蒙宋百年战争史（**1179-1279**）

赵恺　郭强著　 著

团结出版社

前言

蒙元灭亡南宋的历史，其实很多国人都早已耳熟能详。但无论是“大哉乾元”的感叹，还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悯，感性的认知并不能真正诠释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本书将首次运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以空前的“长广角”的视野为读者还原那段百年历史。系统的展示当时东亚大陆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态，以及其兴亡背后的真正推手。

公元1179年，蒙古乞颜部少年铁木真与弘吉剌部女孩孛儿帖正式成婚。这场看似“郎才女貌”的婚姻却似乎注定多灾多难。9年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在提亲的归途，被毒死在世仇塔塔尔的宴会之上，而就在铁木真婚后不久，篾儿乞部又大举杀到，抢走了他的新婚妻子。这一系列看似巧合、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雄踞草原的“五大兀鲁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和利益纠葛？而在当时更没有人能够料想得到这样一起司空见惯的抢亲和仇杀，在浩瀚如海的蒙古草原上投下的小小涟漪，最终将引发一场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风暴。

与此同时，在阴山以南的金中都燕京，金世宗完颜雍正竭力整顿自己堂兄留下的“烂摊子”。对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位自诩要尊行“尧舜之道”的君皇又将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革新？而这些政策又将对未来的蒙、金力量对比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而在和风细雨的临安城内，52岁的宋孝宗赵昚也正在稳步的推进着他的“乾淳之治”，而在这个南宋最为富足的时代，又有哪些创新性制度正默默地为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公元1189年，南北相持的金、宋两大帝国同时迎来了皇位的传承。而在雄伟的肯特山南麓，已近而立之年的铁木真终于夺回了自己父亲失落的汗位。而等待着三位新科领导人的又是一场场伴随着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年轻的金章宗完颜璟采用怎样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彻底灭亡了威胁金帝国北境的塔塔尔部？宋光宗赵惇是否真的如表面上看来的那般畏妻和不孝？而铁木真与自己三结安达的札木合之间又因何反目成仇？改变蒙古草原力量对比的“十三翼之战”又隐藏着哪些内幕？

公元1199年，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王罕挥军西进，征讨乃蛮部。这是两大草原强震继与金帝国夹击塔塔尔部之后，再度联袂出击。但为何决裂的种子却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而就在这个世纪之交，南宋政府的战争机器也在悄然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如何在金帝国的严密监控之下部署完成？又是什么原因让其最终

功亏一篑？

公元1209年，统一草原的铁木真开始频繁的向西夏用兵，并在这一年逼迫西夏国主襄宗李安全献女求和。而沦为蒙古附庸之后，国势日渐衰弱的西夏为什么频繁向金帝国用兵？从自己侄子手中接掌皇位的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又为何昏招迭出，以致强盛一时的金帝国在短时间之内便呈现土崩瓦解的态势，不得不迁都河南？又是否有着自己的全盘考量？

公元1219年。铁木真统率15万精兵正式踏上了“第一次蒙古西征”的漫漫长路。而在中原战场之上，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团却没有停止攻城略地的脚步，正是在这一时期各类汉族武装开始以独立政治势力的面貌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草头王”缘何成为主导中原战事走向的决定性力量？而出任淮东制置使的南宋名臣贾涉其招揽中原义军的工作又究竟功过几何？

公元1229年。蒙古帝国亲贵云集草原，召开关于汗位传承的“库里勒台大会”。身为储君的窝阔台如何从自封“监国”的幼弟拖雷手中夺取军政大权成为了首要的议题。这场看似平顺的继位大典背后掩盖着怎样的明争暗斗？已经风雨飘摇的金帝国又是否能把握这次绝地反击的机会？南宋政府内部关于“联金抗蒙”和“联蒙灭金”的争论又折射出怎样的党派之争？

公元1239年。云集了诸多新生代政治势力代表的“第二次蒙古西征”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拔都、贵由、蒙哥这三位“黄金家族”未来的掌舵者，其品性、思想乃至战术风格又将给这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带来怎样的变革？而在东亚大陆之上，由于“端平入洛”所引发的蒙宋战争也逐渐进入了首轮的白热化阶段。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迂回计划悄然浮出了水面。

公元1249年。被史书描述成“潜在昏君”的贵由莫名其妙的死于西行的途中。而围绕着再度空悬的汗位，蒙古帝国各派势力再度展开了疯狂的争夺。最终成功登顶的蒙哥身后倒下了多少竞争者？这场血腥大清洗的幕后又是否有其弟忽必烈的助力？而刘秉忠等汉族精英陆续加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又将给未来的蒙宋战争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公元1259年。钓鱼城下蒙古军帐之中，大汗蒙哥带着遗憾永远闭上了双眼。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背后，蒙宋两国的强兵悍将究竟展开了如何惨烈的搏杀？忽必烈和贾似道的“鄂州之盟”是否确有其事？身负千古骂名的贾似道究竟是治国良才还是纨绔子弟？堪称南宋版“休克疗法”的“公田法”又是在怎样的考量之下正式出台

的。

公元1269年。守备襄阳的南宋主将吕文德因病去世。而蒙、宋两国围绕襄阳、樊城两座要塞的争夺也由此全面展开。忽必烈究竟为何放弃蒙古帝国执行了数十年的战略大迂回政策，而选择了强行攻坚？南宋政府为了坚守前线的两座要塞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被无限神话的“回回炮”其真正面目又是什么？南宋政府长江一线的迅速崩溃背后是否有着高层内讧的因素？

公元1279年。崖山之战前夕南宋流亡政府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并称为“宋末三杰”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又是否有着各自性格上的短板？长期成为千夫所指的张弘范、留梦炎、叶李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蒙元帝国带给中华民族的究竟是劫难还是财富？本书为您从头梳理。

序章　海陵野望

完颜崛起

——女真帝国的建立及对东亚政局带来的冲击

公元1161年，对于经历了漫长金宋拉锯的中原大地而言还算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来之不易的和平虽然短暂，却已令饱受战乱之苦的苍生黎民沉浸期间。即便是十余年前女真骑兵蜂拥南征的景象，此时已宛如隔世。但苟且偷安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很快便将伴随着时任金帝国君主完颜亮驱策的百万大军所碾碎。

如平静的湖泊般散布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诸部，为何能在11世纪初迅速崛起为一股空前强大的力量，至今史学家们似乎仍未能有一个统一答案。但这股力量在释放之际所造成的破坏，却是有目共睹的。公元1114年，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以女真诸部盟主——“都勃极烈”之名，于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起兵反辽。此后仅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铁骑便吞噬了幅员广袤的辽帝国，令昔日宗主——契丹人屈膝成为了自己的奴仆。

金帝国的横空出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对是足以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件”。但完颜阿骨打的族人们却根本不给瞠目结舌的世人以喘息之机。于公元1125年挥师南下，在短短两个寒暑之间，便将经济、文化独步亚洲的赵宋皇朝驱逐到淮河、秦岭以南。这段历史为后世汉族史学家们称为“靖康之耻”。

面对“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下水如獭”的女真精兵，长期养尊处优的中原士大夫阶层被吓破胆。如张邦昌、刘豫等甘当金帝国的政治傀儡者有之，如黄潜善、汪伯彦等仓皇南逃者有之。即便是力主抗金的吕颐浩、张浚等人，也往往由于短于军略而屡遭败绩。但就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王彦、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璘等一大批年轻的职业军官却逐渐成长为了宋金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拥有近百万军队的辽、宋两国，之所以在相对落后的女真诸部联盟面前表现的不堪一击。除了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外，军事制度上的差异也是引发一系列“化学反应”的诱因之一。首先在动员体制上。女真联盟虽然最初采取的仍是“壮者皆兵……凡步骑之仗糗皆（自）取备焉”的部落形式。但随着完颜阿骨打起兵攻辽，女真军队随即形成了名为“猛安、谋克”的组织体系。虽然从部属的数量来看，“猛安”相当于千

夫长，“谋克”相当于百夫长。但随着在反辽战场上不断的攻城略地，女真诸部联盟迅速将这一单纯的军事编制，转化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制度。

按照《金史·兵志》中的说法，完颜阿骨打以公元1114年首次确立“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后世对这一改革给出的最精准的评价，莫如民国戴锡章先生所谓的“一如郡县置吏之法”。通过将昔日部落时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引入占领区，女真联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高速动员系统。在“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的情况下，金帝国的战争机器以几何倍增的速度迅速膨胀。

特别是在占据富庶的辽西及河北、山西之后，金帝国更以几近竭泽而渔的形式签发当地汉族壮丁从军。对于敌方“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的强行动员模式，赵宋王朝毫无办法，只能指望这种“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或尽取无遗”的制度能激发当地汉族百姓群起抗暴。但女真大军推进的过程中展开了疯狂的劫掠：“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河北、山西等地的汉族百姓自发的抵抗在血腥的镇压下被一一扑灭，面对生存的压力，无数汉族壮丁只能选择为虎作伥，成为“冲冒矢石，枉遭杀戮”的“剃头签军”。

当然，对于金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大量被裹挟的契丹、汉族壮丁只能是扩大战果的有益补充和血腥拉锯的消耗品。在与辽、宋交战的过程中，女真诸部联盟始终维持着一支颇为精锐的重装骑兵作为撕裂对手防线的矛尖。公元1140年的顺昌前线，一个名为杨汝翼的南宋随军文人曾如此记述他所目睹的女真重装骑兵：“甲兵铁骑，阵列行布，屹若山壁”，而其中最为精锐的莫过于被南宋军民称为“四太子”的完颜宗弼的近卫牙军。这支由三千名“皆重铠全装”的骑兵所组成的部队，据说在金帝国内部被称为“铁浮图”和“拐叉千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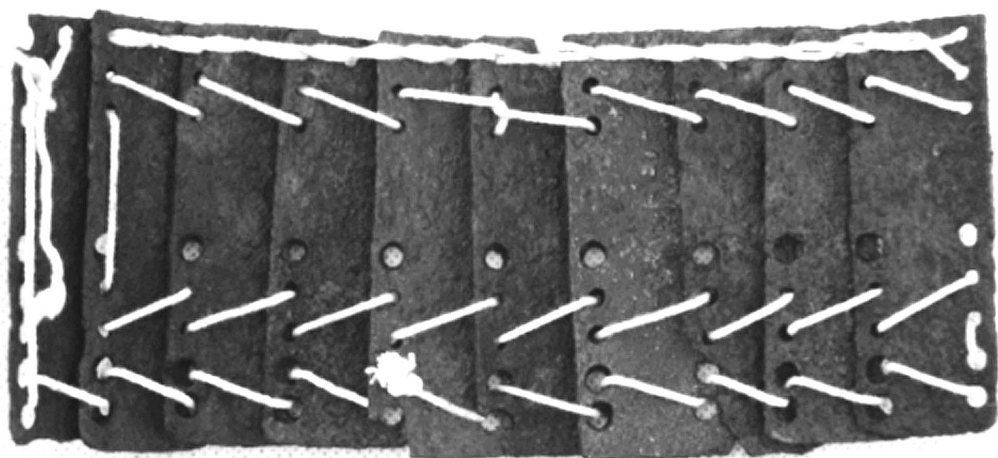
南宋画家笔下的女真重甲骑兵：铁浮图

借助传统评书《说岳传》的口口相传，至清康熙、乾隆年间，“铁浮图”和金帝国部署在战场两翼的“拐子马”已经成为女真铁骑家喻户晓的代名词。不过由于其艺术形象与现实差异太大，甚至连乾隆皇帝都要出面“辟谣”。但世人或许无法想象，日后在战场上能够轻易投入数千重甲骑兵的女真人，早年曾为了获得一套铠甲而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根据《金史》的记载，由于冶炼技术方面的匮乏，被归入“生女真”的完颜部曾长期为缺铁所困扰。直到完颜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出任部落酋长，才将收购铠甲、兵器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来抓：“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或许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辛酸的过往，金帝国对铠甲数量和质量上的追求呈现几近病态的程度。在攻城战中甚至出现了“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的超级重甲步兵，堪称“人肉铁塔”。

以披坚执锐的精甲铁骑为突击力量，续而投入“汉儿签军”等廉价炮灰来扩大战果或相持拉锯。女真族的战术一度令辽、宋两国军队很不适应，投身于西夏战争的宋军名将吴璘便曾感叹说：“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

面对“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的无奈现实，吴璘等宋军将帅所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利用“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的优势，通过配备大量远程投射兵器防御阻击对手，随后再“出锐卒更迭挠之”，达到“以沮其坚忍之势”迫使对手主动撤退的目的。应该说在吴玠、吴璘两兄弟所活跃的川陕战线之上，这一方法还是屡试不爽的。虽然一味地被动防御，显然是无法收复中原失地的，但较之与女真军队展开野战的风险，吴璘的这种相对稳妥战略还是为宋军上下所效仿。毕竟并非每一支宋军都有岳飞所部那般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而即便是岳飞为后世所推崇的郾城、颍昌两役，宋军也胜的极其凶险。

在大半国土均为战火所侵蚀的情况下，事实上宋、金双方均无力维持对攻的战争态势。因此从公元1135年开始，两国高层试探性展开外交接触，史称“绍兴和议”。客观地说和谈的橄榄枝虽然最初由南宋政府投递而出，但金帝国方面以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宗隽为首的“主和派”给出的回应也相当的积极。只经过不到一年的磋商，金帝国便单方面决定废黜其作为中原代理人的伪齐皇帝刘豫，将黄河以南的所有占领区移交给南宋政府。而南宋政府所要付出的不过是“许每岁银、绢五十万”的经济补偿和同意成为金帝国“臣属”的政治姿态而已。仅从双方得失来看，南宋政府无疑是这一阶段和谈的受益方。



出土的金代甲片实物

金帝国“主和派”之所以如此急于结束与南宋的战争状态，除了需要暂缓攻伐、

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的考量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以部落联盟进化而来的金帝国，在建立之初还保持着原始部落议会的组织形式——“勃极烈”制度，完颜阿骨打在世之时虽然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将这一制度由相对较庞大的议事会，改组为皇帝主政和少数国相级别的高级核心官员共议国事的内阁制度，但由于“勃极烈”内阁成员多为地位尊崇的完颜宗室成员，不仅位高权重，更往往能以血亲关系干涉国政，甚至左右帝位的传承，成为了女真帝国中央集权进程的一大羁绊。而自完颜阿骨打祖父乌古乃以来，传承制度上的随意和无序更加速了“勃极烈”内阁的混乱和对立。

乌古乃因个人喜好而重用次子劾里钵，但又没有明确的废长立贤，而是让长子劾者与其同邸办公。因此其劾者一脉长期在完颜部中占据相当的“股份”，其子撒改在完颜阿骨打的“勃极烈”内阁担任相当于首相的“国论勃极烈”之职。阿骨打如此倚重撒改这位堂兄倒不是缘于对劾者当年无缘继承酋长之位的亏欠。而是因为劾者一脉拥有着完颜部近半数领地的控制权，且撒改本人在女真部落联盟中颇有人望。《金史》记载他“敦厚多智，长于用人”。因此“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正是由于撒改本人在女真诸部中的人脉，其子完颜宗翰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迅速崛起，在其父死后也跻身“勃极烈”内阁。

劾者一脉在“勃极烈”内阁中的表现只是完颜宗室广泛参政的一个缩影。而在强大宗室力量的面前，即便是阿骨打这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得不遵循女真传统兄终弟及的惯例，在自己有十五个儿子且多成年的情况下，将帝位传给了弟弟吴乞买。而作为金帝国从部落政治向中原皇朝转型期的掌舵者，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在文治武功方面均颇有建树，但在帝位传承的问题上却同样处处受制。

公元1130年，金帝国“皇太弟”完颜斜也病逝。作为劾里钵一脉中年龄最小的嫡子，斜也的死无疑提前宣告了金帝国兄终弟及制度的结束。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吴乞买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扶植自己的子嗣。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金帝国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统军于外的完颜宗翰和阿骨打的庶长子完颜宗干手中，吴乞买想要传位自己子孙的想法尚在萌芽阶段便遭到了宗室中劾者系和阿骨打系人马的联手打压。

面对空前的阻力，即便是身为九五至尊的吴乞买也只能选择另辟蹊径，迂回前进。在相当于储君之位的“谙班勃极烈”空置两年之后，吴乞买宣布自己百年之后将传位于阿骨打的嫡长孙——完颜亶，而作为交换条件，吴乞买的长子完颜宗磐被提

升为“勃极烈”内阁首相，至此劾者一脉的所谓“国相系”，阿骨打一脉的“太祖系”、吴乞买一脉的“太宗系”在“勃极烈”内阁中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在吴乞买看来自己侄孙完颜亶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自己安置在朝野中的完颜宗磐等“太宗系”人马，退可把持国政，进可取而代之，似乎安枕无忧。但事实证明吴乞买恰恰是在这个少年身上打错了算盘。完颜亶虽然年幼，但很早便拜汉族大儒韩昉为师，即位之前更勤于各类汉文典籍的学习。公元1135年，吴乞买病逝之后，完颜亶随即开始了自己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首先便废除了“勃极烈”内阁制度，代之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制，虽然“太宗系”、“太祖系”和“国相系”的领军人物宗磐、宗干和宗翰分列三师，依旧位高权重，但在汉化政府系统之中严格的君臣之分与昔日“勃极烈”内阁却判若云泥。同时“三师”也不再肩负对外的军事职能，长期以都元帅之名开府于河北的完颜宗翰首先遭到冲击，在被调入中枢之后，其安置于前线的心腹将领被迅速替换，至此历经太祖、太宗两朝的“国相系”势力趋于瓦解。

完颜宗磐推动“金宋和议”的时间基本与完颜亶的“天眷新制”改革重合。显然这位据说个性“豪猾难驭”的先帝之子不愿坐以待毙，他随即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反击。站在完颜宗磐的角度来看，“金宋和议”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不仅可以在朝堂之上打击主战的“太祖系”领军人物完颜宗干，更可以仿照对付完颜宗翰的先例，将“太祖系”在外领军的阿骨打第四子完颜宗弼召回中枢解除兵权。

可惜的是完颜宗磐虽然在朝堂廷议中驳倒了完颜宗干，但却抵挡不住完颜宗弼从前线带回的快刀。公元1139年，完颜宗弼发动武装政变，将完颜宗磐等“太宗系”骨干系数诛杀。这一场血腥的政治清洗，不仅极大地推迟了金、宋两国已经开启的和平谈判，更撕裂了自乌古乃执政以来完颜宗室内部暧昧温情的面纱，据说在诛杀长期与之并肩作战的叔叔完颜挞懒之时，挞懒曾对完颜宗弼说：“我之死，祸必及汝”。这句诅咒虽然没有在完颜宗弼的身上应验，但却最终几乎吞噬了整个金帝国“太祖系”人马。

公元1148年，独掌军政大权长达9年的完颜宗弼因病去世。他的死随即打响了金帝国新一轮高层权力斗争的发令枪。仅仅一年之后，完颜宗干之子完颜亮便刺杀完颜亶，自立为帝，史称“皇统政变”。如果单单从《金史》的相关记载来看，完颜亶和完颜亮这对堂兄弟可谓是“两个昏君、一双神经病”，但抛开那些宫闱八卦来看，事实上完颜亶和完颜亮只是在面对同样的政治难题时，给出了不同的错误答案

而已。

自公元1141年最终与南宋政府达成“和议”以来，金帝国的版图逐渐趋于固化。但庞大的完颜宗室却没有停止生育。在越来越多勋贵帝胄挤入朝堂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身为皇帝的完颜亶和完颜亮无法绕过的问题。性格相对儒雅的完颜亶采取的方法是“敬礼宗室”，即便在诛杀完颜宗磐等人之后，仍厚待残余的太宗诸子，试图重建“太祖系”与“太宗系”的政治平衡。但在大宝之位的诱惑下，区区小恩小惠无法获得真正的效忠。在自己宠爱的长子济安死后，性情大变的完颜亶开始屠戮宗室，但他的做法往往是趁醉杀人，远非完颜亮执政期间那般系统的政治清洗。

靠武装政变起家的完颜亮，自知得位不正。因此比完颜亶更为忌惮宗室的力量。客观地说，完颜亮的文韬武略在金帝国历代统治者中即便谈不上出类拔萃，但也当在中上之列。他身后的骂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屠戮宗室重臣，大举扩充后宫以及强行推动征宋。而从完颜亮发动政治清洗的历次顺序来看，其主要针对的还是朝中势力颇为强大的太宗诸子、“国相系”完颜宗翰子孙及曾有机会问鼎的完颜斜也子孙，而完颜阿骨打的子孙之中除了英武难制的完颜亨之外，受株连者并不多。阿骨打三子完颜宗辅曾长期活跃于宋金战场之上，军中威望不弱于完颜宗弼，在其英年早逝之后，完颜亶和完颜亮对其子完颜雍都颇为依仗，委于重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完颜雍能够取完颜亮而代之，并坐稳帝位。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的两位堂兄弟替他翦除了诸多潜在竞争对手。

完颜亮在民间“好色”的形象源于明代冯梦龙脍炙人口的小说《醒世恒言》中“金海陵纵欲亡身”一节。由于开头部分借用了《金史·后妃传》中“海陵（完颜亮）为人善饰诈，初为宰相，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逞欲无厌，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因此很多不读史者便直接将这篇“政治八卦”当作正史来读了。但事实上从中国历代帝王的后宫规模来看，完颜亮并不算登峰造极，其唯一出格的地方是将一些被诛宗室、忠臣的妻妾、女眷纳为妃嫔。这一点在女真婚俗文化中并非太出格的事，但在汉族眼中却是有违人伦，完颜亮自然便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完颜亮决心南下征宋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1159年，因为在这一年的农历正月，金帝国宣布单方面的关闭宋金两国的口岸特区——“榷场”，随后封锁边境地区，大举备战。而在历代笔记之中，完颜亮这个“战争狂”对灭宋的处心积虑则要进

一步前推到其登基之初的公元1150年。而主要的证据是完颜亮在金宋外交中曾主动赠送给宋高宗赵构一条其父宋徽宗赵佶所佩戴的玉带，以及一个据说完颜亮严令“毋泄于外”的“代天征宋”之梦。

那么为什么在近十年的时间之中，完颜亮迟迟没有发动南下攻宋的军事行动，实现自己“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理念呢？除了翦除宗室、朝野异己，推进汉化改革之外，一个曾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外在因素，近年来逐渐浮出了水面。在通过“绍兴和议”与南宋政府结束战争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战争却正在金帝国的北部边境上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在这条战线上金帝国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以往的对手和前所未有的困局。

公元1161年，在历经两年的全力备战之后，金宋两国的主力部队已经于淮河两岸全线展开。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南宋方面派了徐仿、张抡两名官员作为“起居称贺使”前往金帝国，寻求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金帝国方面当然不会给予对方使团窥探前线的机会，在完颜亮的首肯之下，翰林侍讲学士韩汝嘉抵达两国交接的泗州宣读了一份颇有玄机的口谕：“自来北边有蒙古达勒达等，从东昏时数犯边境，自朕即位，已久宁息。近准边将屡申，此辈又复作过，比前生聚尤甚，众至数十万，或说仍与夏通好。若不即行诛戮，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尽在中都，密迩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久，全无得力宿将可委专征，须朕亲往以平寇乱，故虽宫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势不可留。已拟定十一月间亲临北边，用行讨伐，然一二年却当还此。”

韩汝嘉所说的大体意思无非是由于完颜亮要御驾亲征骚扰北方边境的蒙古、塔塔尔诸部，所以不方便接待南宋使节。对于金帝国方面的回应，正使徐仿不敢表达异议。倒是武官出身的副使张抡问了一句：“蒙古小邦，何烦皇帝亲行？”韩汝嘉一时竟也无言以对。

完颜亮借韩汝嘉之口所说的“亲征蒙古”果然是基于战略欺骗所释放的烟雾。因为仅仅在不到两个月之后，金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便咆哮着扑向长江流域。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身为一国之君的完颜亮口中所说的那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的确曾长期困扰着金帝国。而有趣的是系统保存着金帝国与蒙古草原诸部早期军事冲突的，恰恰是取材于南宋政府半官方年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按照南宋政府的说法，蒙金交兵始于公元1135年。“是冬，金主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完颜）宗磐提兵破之。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其人劲捍善战，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 南宋方面的这则记录，遭到了后世诸多史学家的质疑，其疑点主要集中在“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和“以鲛鱼皮为甲”两点之上。认为文中所说的蒙古其实是今天生活于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流域，以大马哈鱼皮为衣的赫哲族。但值得注意的是赫哲族虽然在明代被归入东海女真的范畴，但却被满族主流称为“鱼皮鞑子”。显然这个清代初年才逐渐形成较稳定族体的民族，本身就有着来自蒙古的基因。而广义的蒙古也并非单指策马牧羊、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百姓”，还包括了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森林地带、以渔猎为生的“林中百姓”，而这

些“林中百姓”的生产、生活模式大体与近代的赫哲族相近。



至于民国史学家王国维以《金史》没有相关记录，而认定南宋方面有关蒙金战争的记载均为道听途说，实无其事的说法。也随着近年以来金代史料的不断发掘被证明过于主观。通过现存于吉林省博物馆中《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中“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的记载，不仅可以确认公元1135年蒙金交兵的确存在，更证明领军参战的除了太师完颜宗磐之外，还有尚书左丞相兼侍中的完颜希尹。那么为什么从唐末纷乱一直到辽宋对峙期间都仿佛人畜无害的蒙古部族，会在金帝国崛起的同时成为来自北方的威胁？而这系列的战争记录又缘何会在元帝国官方修撰的《金史》中彻底消失？这一切的答案或许要从草原政治生态系统的演化说起。



民国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

自唐帝国贞观年间连续灭亡东、西突厥以来，蒙古草原之上原有的庞大中央集

权便归于覆灭。不仅突厥集团的主体部落被迫或内附，或西迁，即便是原本臣服于突厥的铁勒、回鹘诸部也在争夺其政治遗产的过程中逐渐归于消亡。从公元745年最后一任突厥可汗阿史那鹘陇匐为回鹘所杀，献首长安。至公元10世纪，契丹族确立其在漠北的统治地位。近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于地球的历史或许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却足以令其在恐龙般横行的突厥、回鹘等庞然大物灭绝后，逐渐进化成新的主宰。起源于科尔沁草原、半农半牧的契丹人固然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成功者，那么未来横行欧亚大陆的蒙古诸部又何尝不是呢？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鞑靼考》和《蒙古考》等专著，我们不难看到自唐代中叶以来，塔塔尔部和蒙古诸部便出现于中原史料之中。前者被音译为鞑靼，后者则易写为室韦。在中原帝国眼中这两个部落虽然同为北狄范畴，但源流却并不一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认为："鞑靼，靺鞨之遗种"。而蒙古则被归入"契丹之别类也"的范畴。而其活动区域也泾渭分明，蒙古诸部广泛分布于"东至黑水（黑龙江），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贝加尔湖）"的蒙古高原之上，而鞑靼则"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大体上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至阴山山脉一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宋代之前中原对蒙古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还是有相对清晰的概念的。而之所以出现后世蒙鞑不分的现象，主要还是缘于契丹崛起之后，中原与蒙古草原的联系被切断所导致的。

契丹人称鞑靼为阻卜，而对蒙古诸部则称谓颇多。如谟葛失、毛割石、袜劫子等不一而足。后世所常用的蒙古之名也主要脱胎于契丹人口中所称的萌古子、萌分子、盲古子、蒙国斯之名。有趣的是辽帝国很早便将鞑靼纳入其统治范围，而对蒙古诸部则敬而远之。按照曾长期滞留契丹国内的汉族士大夫胡峤的说法，是因为蒙古诸部"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因此"契丹诸国皆畏之"。甚至出现"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的情况。

胡峤于公元947年跟随契丹贵族萧翰北上，在辽上京（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附近生活了七年之久。他对蒙古诸部生活习性的描述显然要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南宋人李心传要深入和贴切得多。不过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袜劫子并非蒙古诸部的统称，而是特指活动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惕部，而未来与其爆发多次抢亲大战的铁木真家族所在的乞颜部此时仍是浩瀚草原中的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根据铁木真家族的祖谱——《蒙古秘史》的记载，乞颜部发轫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一次西迁："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这里的大湖指的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不儿罕·合勒敦山则对应今蒙古国的肯特山。孛儿帖·赤那为何要进行这样的一次西迁？《蒙古秘史》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后世学者则大体倾向于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威胁。

在柯劭忞所编著的《新元史》中是这样描述这次西迁的："其（乞颜部）先世与他族相攻，部族尽为所杀。惟余男女二人，遁入一山，径路险山戏仅通出入，遂居之。"这段描述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过于夸张。事实上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意为"苍狼"，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这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名，显然代表着乞颜部最初的图腾信仰，未必是真的只剩下一对男女。

从家族谱系来分析，孛儿帖·赤那是铁木真的二十二世先祖。而最终得到蒙元帝国官方追认始祖的则是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孛端察儿。从孛儿帖·赤那到孛端察儿中间的家族传承，《蒙古秘史》记载的颇为简略。但从其记录的几处细节仍不难管窥出乞颜部早期的生活方式。如孛端察儿的伯父都蛙·锁豁儿据说是一个额头长了第三只眼睛的"二郎神"。而他的第三只眼睛不仅能看到三天路程之外的地方，甚至站在肯特山上还能看到顺着鄂嫩河上游支流迁徙来的一群人中有一位还没嫁人的美女。最终将通过由孛端察儿的父亲朵奔·蔑而干聘娶那位名叫阿阑·豁阿的女孩，实现了蒙古部与突厥分支豁里·秃马惕部的政治联姻。

草原部族离散无常，生聚的同时往往也埋下了离散的种子。都蛙·锁豁儿死后其四个儿子选择了与叔叔分家，迁徙到呼伦湖的姐妹湖贝尔湖居住。形成了意为"四子部落"的朵儿边部。而朵奔·蔑而干死后，他同父异母的五个儿子也分了家产，而其中唯独少了最年幼的孛端察儿那份儿。深感世态炎凉的孛端察儿只能骑上一匹患了脊疮的短尾青白马离家出走，他临走说的那句"死就死吧，活就活吧！"的气话，后来被《元史》改为："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顿时显得霸气侧漏。

孛端察儿沿着斡难河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靠着附近兀良哈部牧民的接济才侥幸没饿死。但当他的哥哥们良心发现前来接他回家之时，他却第一时间提出那群接济自己的牧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他的几个哥哥顿时对这位小弟刮目相看，各自出动家中的壮丁，一举将那些牧民掳为奴隶。

孛端察儿这种恩将仇报的行径虽然不怎么厚道，但却折射出蒙古部由原始部落

走向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虽然早在其父朵奔·蔑而干时代，蒙古部便已经出现了豢养奴隶的现象。但朵奔·蔑而干的做法不过是用自家多余的鹿肉换取穷苦牧民的子女留在家中奴役。这种明火执仗掳人为奴的做法，则由孛端察儿首开先河，也难怪他的后世子孙忽必烈对他颇为欣赏，钦点其为“毅玄皇帝”，上庙号为“元熙祖”。而孛端察儿所开创的蒙古部分支也被称为孛儿只斤氏。

孛端察儿的第一个妻子便是他掳来的那些兀良合惕部牧民中的一个女子。不过这个女子被掳之时已身怀六甲，孛端察儿倒也没有嫌弃，为其取名札只剌歹，意为“外姓之子”。札只剌歹成年之后自立门户，其家族经过四代营聚，最终诞生了一位险些统一蒙古草原的豪杰，他就是与铁木真三结安答的札木合。

如果说孛端察儿时代蒙古部的扩张和劫掠还只是针对“无所属附”的小股牧民的话。那么在其曾孙海都一辈，蒙古草原的纷争逐渐上升到了整个部落生死存亡的层面。据说海都的幼儿时期，他的祖母莫挐伦（蒙古语中的意思是“给力”）因为牧草而与邻近的札剌亦部发生战争。札剌亦部曾是当时蒙古草原上较为强盛的部族之一。但是因为拒绝成为辽帝国的从属，而被契丹军队驱逐赶到了莫挐伦的牧地，流亡的札剌亦部无所依赖，小孩只能掘草根来果腹。而恰逢“给力”的莫挐伦乘着自己的大车路过。对于札剌亦部的遭遇，莫挐伦不仅毫无同情心，反而大加呵斥。随后驱策自己的牛车前去冲撞，随即造成了死伤。

札剌亦部以抢走了莫挐伦的马群作为报复。莫挐伦是一个颇能生育的光荣妈妈，她的儿子们听说了自己的马群被抢，第一时间蜂拥而出，甚至连战甲都没来得及穿。此时挑起争端的莫挐伦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吾儿无甲，何以御敌？”马上让自己的儿媳妇们“载甲从之”。但是为时已晚，等这些女人们赶到战场，家族的男丁们已经悉数战死。札剌亦部又乘胜杀死了“给力”的莫挐伦和她的儿媳妇。整个家族只有被自己的奶妈藏起来的小孙子海都和他此前便早已入赘巴尔虎部的小儿子纳臣幸免于难。

遭遇如此惨重的打击，孛儿只斤氏本该一蹶不振。但在纳臣的帮助之下，海都却很快完成了部族的复兴，并轻松完成了对札剌亦部的逆袭，将其征服为自己的附庸。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并非是海都天生英武不凡。而是在不断的冲突和联姻中，一种全新的游戏规则正在蒙古草原之上逐渐成形。随着奴隶制的日渐成形，蒙古草原各部族的生产力均有极大的提升，此时衡量一个部族实力的指标便不再是男丁的多寡，而是马群、奴隶乃至盟友部落的数量。

正因为如此，史料中没有记载海都击败札剌亦部的过程，而是不惜笔墨的描写了纳臣伪装成路人杀死札剌亦部看守马群的孩子，夺回家族马群的经过。有了这些失而复得的马群，孛儿只斤氏在经济上便对只能用草根充饥的札剌亦部形成了绝对优势。随后再通过联合巴尔虎部等其他盟友，合力绞杀札剌亦部这样的外来户就并非难事了。不过对于和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札剌亦部，海都并未赶尽杀绝，而是与其建立起“世为主奴”的附庸关系。当然札剌亦部并非唯一依附海都的部落。根据《元史》的记载，随着孛儿只斤氏的日益强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及其子孙盘踞斡难河流域之时，正是辽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公元1004年，辽帝国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建立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要塞。正式确立了其对蒙古草原东部的统治地位。以镇州为治所的辽帝国西北路招讨司除负责驻军镇戍、开辟屯田之外，还负责管理鞑靼及蒙古诸部。起初辽帝国采取直接派员充任蒙古诸部节度使以加强统治，但面对辽帝国马、驼、貂鼠皮、青鼠皮的岁贡，且需应征出兵的劳役，草原诸部多不堪其扰。辽朝任命的节度使只要不善抚绥，便往往会引起群起反抗。

无奈之下，辽帝国不得不改变对蒙古草原的统治策略，改为由诸部首领管理部内事务。海都次子察剌孩便受封为“令忽”（为汉语中“令公”的音转），察剌孩之子必勒格则更进一步升级为“详稳”（汉语中“相公”的音转）。由此可见，海都的子孙不仅被辽帝国册封为地方官吏，更开始逐渐接受辽帝国输入的“二手”汉文化。

公元1125年，强盛一时的辽帝国在女真入侵和内部宗室叛乱的双重打击下最终归于崩溃。与辽帝国治下诸多汉族官吏、难民向南涌入宋朝领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多契丹贵族选择了向北，退入蒙古草原。其中便包括了辽帝国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及未来在中亚建立西辽王朝的耶律大石。客观地说，大多数逃亡蒙古的契丹贵族或多或少都动过借用蒙古诸部力量复国的念头，耶律延禧以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为最后的容身之所，耶律大石取道蒙古汪古部的地盘西进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蒙古诸部对于契丹流亡贵族大体上还是支持的。耶律延禧带着不足三十骑避难“入夹山四部族帐”。 为了配合辽帝国流亡政府反击云中的战略，蒙古诸部更出动三万之众：“天祚（耶律延禧）驱鞑靼众三万余骑，乘粘罕（完颜宗翰）归国，山后虚空，直抵云中府袭击。兀室（完颜希尹）率蔚、应、奉圣州、云中府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军马千余骑伏于山谷间，出鞑靼军之后，鞑靼溃乱，大败。”或许正是

因为这次重创，在耶律延禧兵败被俘之后，耶律大石北逃汪古部后，蒙古诸部对其的支持更多的是物资上的——“进献马匹四百只、驼二十只、羊若干。”

离开汪古部之后，耶律大石抵达辽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可敦城（即镇州）。在那里他召集鞑靼、蒙古诸部的首脑，颁布了他“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的战略规划。但耶律大石虽然整军精甲，但他军旗所指的方向却不是辽帝国的故土，而是遥远的西域。耶律大石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如《辽史》所说，是因为盘踞高昌的西州回鹘曾与辽帝国订立过攻守同盟。更是基于蒙古草原的种种无奈之举。辽阔的大漠草原固然孕育了无穷无尽的良马和骑兵，但内无强兵之铁，外无富国之资。要获取武装部队的铁矿资源和赖以支持与中原长期战争的经济基础，向西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昔日的匈奴、突厥都将控制西域作为自身发展的首要任务，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们，在与金帝国多次交兵都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仍执意发动两次西征。

耶律大石率领驻守漠北的最后一支契丹族军团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留下群龙无首的蒙古诸部，独立面对如日中天的女真铁骑。应该说灭辽后不久便卷入与宋室漫长战争的金帝国，对经略蒙古草原始终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新元史》等诸多史料，都记载了金帝国试图招揽铁木真曾祖父合不勒的故事，但这点小恩小惠显然无法抵消金帝国所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蒙古诸部日常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

作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渔猎部族，人口基数的不足可谓是长期限制女真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面对治下数倍于己的契丹人，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金帝国在其建立之初，便有计划地对契丹族人进行强制迁徙。除了长白山脉以东之外，蒙古草原也是金帝国安置契丹人的主要方向。而出于便于监管和前线军事需要的双重考虑，金帝国在蒙古草原之上恢复并加强了辽帝国时代便已成型的国营牧场——群牧所。

“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的群牧制度可以说是辽帝国的立国之基，但到其统治末期已经衰弱不堪。金帝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一口气强行上马多达22个群牧所的举动，非但得不到已转向农耕经济的契丹人支持，更因为要抢占“无蚊蚋、美水草”的优劣牧场而与蒙古诸部产生摩擦。而女真贵族对契丹群牧所的管理更可谓“简单粗暴”。不仅所牧牲畜长到三岁即转交公，遇有战事，则征括殆尽。更要受到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的勒索。

群牧所内契丹人的遭遇，或许也同样降临在邻近的蒙古诸部头上。而遍布火山

军（今山西河曲县）、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内（今内蒙古固阳）等地的民间走私贸易，更给了蒙古诸部敢怒也敢言的底气。在对蒙古部落控制力相对较强的辽帝国时期，曾屡次下诏“禁鬻生铁于蒙古等界”。而辽金交接之际，则官员唯利是图，铁禁遂弛，因而大量铁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蒙古草原。“北方得之，多作军器，甚而有以坚甲利兵与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终于在公元1135年左右，合不勒杀死了前来召他入朝的金帝国使者，正式举起了对抗女真暴政的义旗。

合不勒发动反金起义之际，正值宋金战争的高峰期。公元1134年农历四月，南宋将领吴玠、吴璘于西线的仙人关一线大破完颜宗弼的金帝国野战军主力。五月，岳飞自鄂州渡江北伐，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后收复襄阳六郡。十月初一，宋高宗赵构宣布亲征，率六军前往长江，俨然摆出一副总决战的态势。其后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金帝国的主力部队仍不得不长期驻守于陕西、河南、山东、安徽一线。公元1135年2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又恰巧去世，朝野人心惶惶。合不勒在此时插上的“背后一刀”，对正值内忧外患之际的金帝国而言可以说是致命的。或许正因为前线的强兵悍将无法抽调，且远水难解近渴。秉持朝政的完颜宗磐才不得不亲自领军出征。而或许正是鉴于完颜希尹曾有过在云中大破鞑靼、蒙古联军的记录。刚刚即位的金熙宗完颜亶才特地委派其为完颜宗磐的副手。

依旧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的蒙古诸部联军显然不是完颜宗磐麾下金帝国近卫军的对手。史料中虽然没有提及此战双方战场上的损失，但从“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以及事后其与完颜希尹还因为战利品分配的问题发生争持来看。此战应该所获颇丰。有趣的是在“来路不明”的金帝国民间编年史《大金国志校证》中，记录此战的过程中特意提到“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似乎完颜宗磐是先发制人，而且在交战的过程中有殃及其他部落的现象。而在遭遇重创的蒙古乞颜部中，退回草原的合不勒不久便因病去世了。虽然其有七个儿子，但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汗位最终由其弟俺巴孩继承。

谈及金帝国初期对蒙古的军事政策，最常见的就是宋末诗人、画家郑思肖的笔记《心史》中说法：“昔金人盛时，鞑（蒙古）虽小夷，粘罕（完颜宗翰）　兀术（完颜宗弼）辈尝虑其有难制之状，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删蒿也。去其拇指，则壮丁无用。”也就是说在金帝国元勋宿将的要求之下，女真军队除了定期的屠杀和劫掠之外，还会采取“蒿指之法”来遏制蒙古各部的生产能力，所谓“蒿指”就是像割野草一样将蒙古族壮丁的大拇指剁去。而除了血腥的屠杀之外，金帝国还大量的从蒙古草原大量掠夺人口充作奴隶。直到金帝国灭亡之时，中原的汉族百姓依旧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二十年前，山东、河北，谁家不卖鞑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

虽然在金帝国的官方文献中至今仍未发现所谓“三年减丁”政策的相关依据。但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载的蒙金交战记录来看，却大体符合“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的时间特征。在完颜宗磐征讨蒙古“入朝奏捷”的三年之后，公元1138年“女真万户呼沙呼北攻蒙古，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

金帝国的“上京”在今天哈尔滨阿城区的白城镇。“海岭”则是金代大兴安岭的统称。依照这则记录所提到的几个地名，大体可以判断此次军事行动由金帝国远征军翻越大兴安岭深入呼伦贝尔草原开始，由其后勤不继，撤退过程中遭遇对手的追击而大败告终。对于这一条记录，王国维同样以《金史》无载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呼伦贝尔草原当时是被称为“鞑靼”的塔塔尔部的牧场，宋朝政府又向来蒙鞑不分，因此讳言鞑靼的元朝修史者将其隐匿也在情理之中。

塔塔尔部虽然在当时被称为海岭的大兴安岭重创了金帝国军队，却并没有进一步围攻“上京”。除了实力不济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此时其正由于一场“医疗事故”而与蒙古诸部恶斗连场。根据《新元史》的相关记述，事情经过大体是由于合不勒的小舅子——弘吉剌部贵族赛因特斤患病，于是请来了塔塔尔部的巫医，谁知道竟“不效而卒”。患者家属一怒之下“执巫者杀之”。从医患关系的角度来看，弘吉剌部多少有些理亏。而且在当时蒙古草原的社会阶层之中巫医在部落中地位往往仅次于酋长，塔塔尔部的愤怒自然可想而知。随即出兵攻打弘吉剌部。

弘吉剌在突厥语中意为“褐色骏马”，在蒙古语中被引申为“有姿色的人们”，据说以盛产美女而著称。弘吉拉的牧场位于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恰处于蒙古乞

颜部与塔塔尔部势力的交界地带。因此简单的医患矛盾的背后，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考量。

乞颜部作为弘吉剌部的姻亲出兵相拳。但大举参战的同时，乞颜部内部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合不勒诸子要替自己的娘家出头，自然个个奋勇。但身为酋长的俺巴孩却认为这样的敌对情绪没必要长久的延续下去。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向塔塔尔部提出和亲的提议：通过塔塔尔部的某位贵族迎娶自己的女友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为了表达诚意，俺巴孩亲自前往送亲，结果却被塔塔尔部擒获，转手送给了金帝国。

塔塔尔部在同意和亲之后还诱捕乞颜部的酋长，多少有违草原民族一诺千金的性格。而王国维则认为逮捕俺巴孩的并非塔塔尔人，而是效忠于金帝国的游牧雇佣兵集团——乣军所为。乣军历史悠久，自辽代便已有之，主要由边境地带忠于辽、金帝国的游牧民组成，因此成分相对复杂。但无论是将俺巴孩押往金帝国上京的乣军如何组成，乞颜部酋长在塔塔尔部的地盘上出事，后者都难辞其咎。从这个角度出发，乣军的这次突袭不仅堪称“斩首行动”，更能挑动两大敌对游牧部落的相互争斗，可谓一石二鸟。

或许正是不愿意自己的死为敌人所利用，被押解到上京被处于木驴之刑时俺巴孩让自己的随从回乞颜部转达自己的死因和向金帝国复仇的决心。而为了避免这个重要的口信无法传达，俺巴该用激将法对金熙宗完颜亶说：“汝假他人之手以获我，又置我于非刑。我死，则我之伯叔兄弟，必能复仇。”年轻气盛的完颜亶果然中计，大手一挥放了俺巴孩的随从，并表示：“此言可告汝部众，朕不畏也。”而根据《新元史》所给出的时间点，此事发生在公元1143年。

完颜亶之所以不畏惧蒙古乞颜部的复仇，或许是因为其早已做好了一举荡平对手的军事准备。根据南宋方面得到的情报：“是月（农历四月），蒙古复叛，金主命将讨之。”而除了试图抓住乞颜部酋长新亡、群龙无首这一战略机遇期之外，此时金帝国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之上已经建立起被称为“团寨”的小型据点网络，其最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克鲁伦河以西，在辽帝国的龙兴之地——临潢府形成了一个割裂塔塔尔和蒙古诸部的战略突出部。完颜亶似乎有计划先剿灭相对弱小的蒙古乞颜部，再回头收拾塔塔尔人。

可惜的是随着俺巴孩的死讯传到乞颜部，不仅举族上下同仇敌忾，更迅速形成了合不勒汗的第五子忽图剌为首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而金帝国远征军内部却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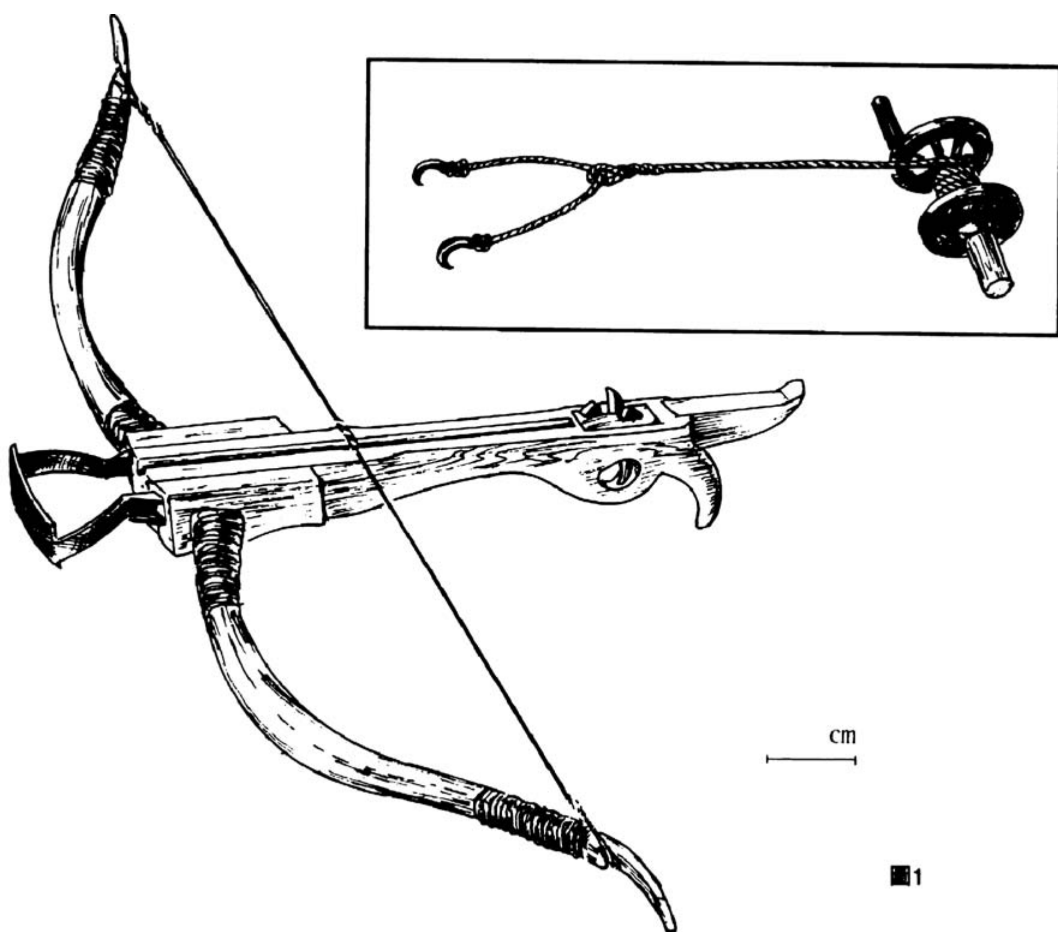
异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鲁国王（完颜挞懒）既诛，其子胜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不过《金史》并没有记录完颜挞懒有一个叫胜花都的儿子，因此这条记录也曾被王国维视为伪作。但纵观世界历史，诈称先君重臣之子发动叛乱的案例不计数。完颜挞懒曾位居金帝国左副元帅，麾下门生故吏当不在少数。这些人自完颜挞懒死后便一再受到打压和排挤，此次征讨蒙古更可能处于负弩前驱的先锋位置。拥立一个自称挞懒之子的胜花都发生叛乱也并非不可能。南宋方面认为是这次叛逃直接影响了蒙金双方的力量对比——"蒙古由是强，取二十余团寨，金人不能制"。

当然除了胜花都的阵前倒戈之外，金帝国内部军事体系的演变也是导致此次远征蒙古失利的重要原因。自完颜亶即位以来，其在全国范围内所实行官制改革，其本质是变女真族奴隶制统治为以多民族的封建皇权制，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原本分布于女真、契丹聚居区的猛安谋克体系便需要逐步南迁。应该说这一带有军事移民性质的迁徙，对巩固金帝国整体统治秩序是有利，一方面猛安谋克组织被迁入中原以后，能有效地控制敌视女真的汉族百姓，另一方面内迁的猛安谋克也受中原封建制的包围和影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内部独立性，不再成为中央无法影响的独立王国。

但这种内迁对于蒙金边境地区的力量对比却是灾难性的。大批猛安谋克组织南下所留下的边防缺口交给了所谓的"镇防军"来填充。"镇防军"名头倒是响亮，但其主力却是由"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组成的驱军，金帝国虽然也会从各野战军中挑选精锐加入"镇防军"，但这些精锐部队以一定的周期轮番更替，战斗热情自然可想而知。而金帝国与南宋虽然在公元1142年签署了和约，但两国漫长的边境线上金帝国仍需部署大量的野战部队才能保障安全。此消彼长之下，公元1143年金帝国远征军兵败大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金帝国军队虽然撤回了国境，但蒙古诸部的反击却不会就此中止。《新元史》记载："（忽图剌）败金人于境上，大掠而去。"被彻底激怒的完颜亶"以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对蒙古诸部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神臂弓"是北宋年间通用于辽、宋、西夏等诸国的步兵武器，根据当时的笔记所载可能有巨型床弩和单兵使用多种型号。金帝国虽然也大量装备这种武器，但却有着严格的弩手删选考试："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立之谓之等杖。取身与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闲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在承安年间（1196—

1200）整个金帝国也不过增签弩手千人。完颜亶要一口气动员八万弩兵参战显然有些夸张。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宋人口中这些“神臂弓弩手”其实是“射粮军”的误传。



宋代神臂弓想象图

所谓“射粮军”是金帝国通过“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皆刺其面”的方式强行招募的杂役部队的统称。如果金帝国在蒙金战场上所投入的主力的确是“射粮军”的话，那么“连年不能克”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无奈之下，身为金帝国前线总指挥的完颜宗弼只能委派自己的亲信萧保寿努与蒙古方面展开和平谈判。对于金帝国割让西平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每年给予牛、羊、米、豆、绵、绢等物资的条件，忽图剌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对于金帝国册封其为蒙古

国王的条件却表示无法接受。

当公元1147年和谈终于有了结果之时，金帝国意外的发现忽图刺之所以坚持不肯接受自己的册封，并非是因为谦虚和低调。而是嫌弃“蒙古国王”这个称号太过“小气”。在金帝国认识到“用兵连年，卒不能讨”，最终选择“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的情况下，忽图刺自封皇帝，建元天兴。至此蒙古诸部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与金帝国分庭抗礼的草原帝国了。

虽然在西方人所撰写的蒙古史料之中，忽图刺被吹嘘为蒙古人的赫拉克勒斯。但在当时的草原之上，自封皇帝的忽图刺既没有自己部落内的绝对权威，也得不到其他部族的认可。在一次独自出猎的过程中，他甚至遭到同为乞颜部分支的朵儿边部（都蛙·锁豁儿四个儿子的后裔，意为“四子部落”）的袭击。忽图刺虽然侥幸脱险，但在他返回部落之时却发现乞颜部的贵族不是急着去寻找他，而是已经排着队拿着祭礼往吊他的家属了。或许正是一幕细想之下不由得后脊发冷的场面吓到了忽图刺，在此后的十年多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征战，仅与塔塔尔人的战争便有十三次之多。因为只有这种无岁不争的局面，才能保障一个酋长始终在部落勇士的簇拥之下。

对于忽图刺的频繁征讨，乞颜部中与之分道扬镳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但也不乏有识之士透过那一次次征战的血雾，看到蒙古诸部光明的未来，他就是铁木真的生父也速该。也速该在《蒙古秘史》中的登场，多少有些不光彩。一次在斡难河畔放鹰捕猎的过程中，也速该偶然遇到了蔑儿乞惕部的少年也客·赤列都正领着自己新婚的妻子诃额仑经过。也速该随即叫来了自己的两个兄弟赶走了新郎，将新娘诃额仑抢回了自己的帐房。

如果放在今天言情小说家的笔下，自然要粉饰一番诃额仑如何被逼嫁给了自己所不爱的赤列都，遇到也速该后如何为对方的雄风和温情所倾倒，最终委身于之。不过《蒙古秘史》却不惜笔墨地描写了诃额仑掩护自己的爱人赤列都逃走时的难舍，以及被掳之后的伤心，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那么也速该此举是否缘于一时的见色起意呢？答案似乎并非那么简单。因为根据后续事态的发展，我们知道也客·赤列都并非普通的牧民，而是蔑儿乞惕部首领脱黑脱阿的弟弟。而诃额仑的身份虽然没有定论，但出身于弘吉剌部的分支—斡勒忽讷兀惕氏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克鲁伦河下游的弘吉剌部是乞颜部与塔塔尔部之间重要的缓冲带的话，那么活跃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斡勒忽讷兀惕氏部则是连接蔑儿乞惕部与塔塔尔部的重要桥梁。

因此也速该的这处“抢亲”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破坏了蔑儿乞惕部与斡勒忽讷兀惕氏部之间的联姻。而从此后的历次草原争斗中斡勒忽讷兀惕氏部都站在铁木真母子的身后来看，诃额仑在其部族中身份恐怕不低。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诃额仑雕塑

对于也速该这种“半路截和”的行径，蔑儿乞惕部首领脱黑脱阿当然很生气。但此时的蔑儿乞惕部正与盘踞于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一带的克烈部交兵，一时分身乏术。而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宗旨，也速该也密切留意着蔑儿乞惕与克烈两部的战事。

仅从部族规模和开化程度而言，克烈部自然远胜蔑儿乞惕。但公元1100年左右，由于该部酋长磨古斯错误的判断形势，草率的发动反辽起义而导致整个部族遭遇重创。磨古斯之子忽儿扎胡斯好不容易利用辽亡金兴的机会重整部落，但一时之间仍元气未复。在与蔑儿乞惕部的战争中，忽儿扎胡斯不仅一败涂地，甚至连儿子脱斡邻勒也被对方掠为奴隶。忽儿扎胡斯好不容易从蔑儿乞惕部救回了自己的儿

子，塔塔尔部又大举杀到，脱斡邻勒连同自己的母亲一带再度落入敌手。这一次忽儿扎胡斯彻底绝望了，他向西翻越阿尔泰山，寻求乃蛮部的支持。

关于克烈部的起源，史学家向来有突厥后裔和蒙古分支两种说法。而乃蛮部的血统则相对纯正，一般都认为其是突厥西迁时留在阿尔泰山地区的“钉子户”。而从忽儿扎胡斯第一时间选择向乃蛮求援来说，克烈与乃蛮在血缘和文化上应该都有着相对较高的彼此认同感。在乃蛮部的支援之下，忽儿扎胡斯再次击败了塔塔尔部，救回了自己的妻子和两度沦入敌手的儿子——脱斡邻勒。在克烈—乃蛮联军驱逐塔塔尔部的同时，也速该和乞颜部也投入了战斗。这场战争究竟是不是忽图剌所领导的十三次对塔塔尔部的战争之一，史料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公元1162年的那场战争中，也速该似乎收获颇丰。得胜回部的他，得知诃额仑在5月3日刚刚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顿时喜形于色的用自己阵斩的塔塔尔部勇士之名将自己的长子命名为：孛儿只斤·铁木真。而此时在遥远的中原大地之上，号称百万的金帝国南征大军正在辽阔的宋金边境上全线撤退，虽然战事仍在继续着，但完颜亮“混一天下”的梦想已经和他的生命一起终结在长江之中那座被称为“瓜洲”的滩涂之上了。

完颜亮的败亡其实并非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伐宋受挫。事实上在公元1161年10月28日完颜雍由金东京（今辽阳）起兵，攻占中都燕京之前。完颜亮的南征在各条战线上进展都颇为顺利。此后南宋海军虽然在山东唐岛海域全歼金帝国舰队。但金帝国陆军仍直趋长江。如果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亲信虞允文及时收容南宋各部败兵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重创对手先锋部队的话，局面很可能重现当年完颜宗弼南下时“江之南虽有兵，望见金军即奔走，船既着岸，已无一人一骑”的场面。而即便是初次渡江作战失败，完颜亮仍可以利用己方兵力上的优势，扩展战线寻找宋军千里江防的薄弱点发动偷袭。但此时的他已经被来自后方的政变夺走了所有的时间和耐性。在严令诸军发动自杀式袭击的背后，何尝不是完颜亮本人的绝望。

公元1161年12月15日深夜，在契丹贵族耶律元宜的指挥下，金帝国的南征大军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君主。面对纷乱射入御营的箭雨，内侍们焦急的请求完颜亮暂避。但完颜亮却无奈地回答：“走将安往。”最终中箭着刀之后被部下缢杀。或许在平定江南之后，这位好大喜功的帝王还有很多的计划，亲征蒙古、吞并西夏乃至将朝鲜半岛纳入版图，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完颜亮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但那些追逐、征服的梦想，却伴随着长江边那被部下点燃的尸骸随风飘荡，最终降落在蒙古

草原那个呱呱坠地的孩童手中。

在自己堂兄所营建的宏伟宫殿之中，登基为帝的完颜雍无暇为完颜亮的死而庆幸或者悲伤。除了要协助南征大军顺利撤退并阻击南宋政府在各条战线所展开的反攻之外，他还要为重新架构宋金之间的和平而努力奔走。而在北方由契丹牧民撒八所领导的起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日夜期盼着耶律元宜等南征将帅能将金帝国主力带回中都的他，此刻根本没有想过更为遥远的蒙古草原之上以乞颜部为代表的蒙古诸部、塔塔尔人、蔑儿乞惕部、克烈及乃蛮正各自积蓄着力量，号称“五大兀鲁斯”（蒙语中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他们将在未来的角逐中孕育出整个欧亚大陆的梦魇。

第一章 金莲川上

隆兴北伐

——完颜亮死后的宋、金战局

公元1179年，农历四月。对于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河北平原而言。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节。在昔日海陵王完颜亮役使民夫八十万，兵士四十万，所营建的金中都燕京的宫闱之中。作为完颜亮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人，被后世称为金世宗的完颜雍心中是否对那位堂兄抱有一丝亏欠，世人或许永远没有准确的答案。但回首完颜雍执政以来的岁月，不得不说他从完颜亮手中所接收的并非只有财富。

完颜亮所发动的南征虽然最终以一场身败名裂的军中哗变而收场。但战争的机器一旦发动，从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生命的终结便戛然而止。在金帝国远征军偃旗而退的背后，是士气高昂的南宋政府军。而山东、陕西、河南等地的汉族健儿也纷纷奋袂而起，加上西北路愈演愈烈的契丹族大起义。金帝国的统治一度出现摇摇欲坠的迹象。

面对空前的危局，完颜雍一方面安抚率军回师的耶律元宜等人，不仅赦免其兵变弑君之罪。更加封其为平章政事、冀国公，赐姓完颜。当然这些恩赏并非是没有代价的。改名为完颜元宜必须马不停蹄地奔向前线，将自己的刀刃对准昔日同胞——契丹族起义军。而此时契丹族起义军已经由于内部的分歧由西北路（今内蒙古正蓝旗）转战至辽东。最早领导契丹族义军的是曾在金西北路招讨司担任译史的契丹官吏撒八。而促使广大契丹族群牧民众起抗暴的，除了完颜亮为了南征所进行的横征暴敛之外，另一个主要因素便是迫于蒙古诸部的威胁。早在完颜亮筹备南征之初，契丹牧民便派人请愿："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但在完颜亮的高压政策下，金西北路的地方官员"畏罪不敢言"，最终导致契丹民众由恐惧所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撒八及其追随者刺杀了金西北路招讨使完颜沃侧，随后"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


率领契丹族西迁的耶律大石

应该说对起义军未来的发展，撒八本人有着相对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单纯依靠契丹牧民的力量无法与金帝国长期抗衡。怀着“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的忧虑，撒八决定带领契丹牧民远走西域，投奔已经建立西辽帝国的耶律大石。可惜的是撒八正确的战略选择并不能得到起义军中大多数人的认同。在故土难离的情绪冲击下，契丹起义军中自封“六院节度使”的移剌窝斡清洗了撒八等早期领导人，随后选择了与西迁背道而驰的东进。移剌窝斡的初衷是希望能在契丹的龙兴之地复兴故国辉煌，但无奈时移世易。在移剌窝斡的带领之下，契丹起义军先是顿兵临潢府，随后攻泰州不克。而面对金帝国优势兵力的围剿，移剌窝斡又不敢坚持初衷，再度选择西迁。最终在地处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境内的袅岭西陷泉为金帝国野战军主力所击败。此后移剌窝斡虽然带领残部继续于燕山一线游击，但终究大势已去。公元1162年农历九月七日，移剌窝斡及其家眷被起义军内部的叛徒所擒，十日之后问斩于金帝国中都。

完颜雍之所以能够迅速扑灭撒八、移剌窝斡所领导的契丹牧民起义，除了对手内部不和、举棋不定之外，还得益于完颜亮为了南征所调集和储备的强大物质基

础。正是有了雄厚的物资为后盾，一方面完颜雍可以不断以罢免关税、田赋，赈济灾民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仍能不断向各条战线源源不断的输送兵员和武器。在南线与宋军的战场上，只是因为“夏久雨，胶解，弓不可用”，完颜雍就一口气调拨了汴库所贮的上万张劲弓支援前线。而对于尚书省要求征发奴隶从征的建议，完颜雍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而予以驳回，可见即便是两线作战，金帝国的兵员仍是相当的富裕。

应该说在南宋政府所发动的历次对金战争之中，于公元1163年发动的“隆兴北伐”可以说是开局最好的一次。完颜亮的南征失败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复兴热情。更在宋金边境上留下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突出部：东线，南宋军队紧随完颜亮所部金军撤退的脚步，攻占了淮北重镇——泗州，向东与此前突袭拿下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连成一片，向西则收复寿、亳州。而在战线的中部，金帝国军队在贪污无度的汉将刘萼的指挥下本就进展不大。完颜亮死后更是一溃千里。南宋军队轻松地收复中原重镇——蔡、唐、邓、陈、汝、许六州，将战线向北推进了上百公里。在以川陕为核心的西线战场上，宋军宿将吴璘不仅一度收复了扼关中通往中原要道的商、虢、陕、巩四州，更将战线延伸至甘肃南部，夺取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

南宋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完颜亮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了金帝国在南征部署中存在着强干弱枝，兵力过于集中于完颜亮亲自负责的两淮一线之外，还得益于岳飞、韩世忠等一代“中兴名将”的军队建设。如带领300名志愿者收复海州的“忠义军”将领魏胜便曾是韩世忠麾下的一名“弓手”。而于唐家岛重创金帝国舰队的南宋海军指挥官李宝则是岳飞的昔日部署。但与中下层军官的战斗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南宋统治者的悲观预期。在完颜亮麾下大军北归的同时，宋高宗赵构便再度准备派遣洪迈、张抡以接伴使的名义北上与金帝国新任掌门人完颜雍接触，甚至还颇为自得的对臣僚们表示：“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当然他后面所说的“以小事大，朕所不耻”经常为世人所曲解，其实赵构的原意是说和谈工作“当以土地、人民为上，若名分则非所先也”。



正是赵构一心只想着以“和谈”保持偏安的指导宗旨。使得南宋政府在形势大好的局面之下，错失了最为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随着完颜雍逐步巩固自身政权和北方契丹牧民起义转入低潮，金帝国大批精兵良将迅速南调，南宋方面战略反击阶段所积累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而与完颜雍大手大脚的挥霍相比，南宋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显得格外吝啬。在清代学者毕沅所著的《续资治通鉴》中便记录川陕军区和后方主管财政的户部侍郎王之望之间的一场口水战。

针对前线“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的情况，川陕军区希望“多与准备赏给钱物近一两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多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但是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却被王之望以一句“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西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给顶了回去。

王之望可以说是有宋一代职业官僚的代表，他不仅“博学无所不通，谈论英发，听者忘倦”，写文章更是“下笔立成，豪赡宏博，切于事理”。但却偏偏分不清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自宋室南迁以来，原有禁军、厢军、乡兵三级动员制度便归于破产。宋高宗赵构一方面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抗“亡我之心不死”的金帝国，一方面却又时刻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太阿倒持的局面。因此军队几经整编，最终形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所谓的“三衙”诸军拱卫中枢，屯驻军戍守前线的格局。“三衙”诸军长期驻守后方，待遇自然优厚。而屯驻军则需分兵戍守辖区州县，每年春夏秋冬还要带着家眷换防，对于采取招募制而加入军队的职业士兵而言，经济压力可想而知。“进而胜捷，能破关险，则有重赏”便成为其奋勇作战的原始动力。

可惜的是主持南宋政府的大多是王之望这样的官僚，在他们死死捂着“钱袋子”不肯拨款的情况下，一线士兵的战斗热情自然直线下降。例如，南宋政府军收复河州之时，士兵们纷纷要求犒赏，最终却只得到了十几文钱。而战区物价飞涨，这点钱只够买个烧饼。于是将士们纷纷把钱丢在地上，吐槽道：“我等捐躯下河州，今性命之贱，乃不值一炊饼也。”正是在这种不满情绪的弥漫下，到公元1162年农历三月，南宋在东线和中线所控制的海、泗、唐、邓、陈、蔡、许、汝、亳、寿十州，已经在金帝国的攻势下仅存海、泗、唐、邓四州而已。而在西线好不容易收复的河州也被金军所破，城中数万百姓被屠戮。经济损失远非王之望所节约的那一两

百万钱物所能比拟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如果南宋政府能够理性的权衡利弊，集中力量巩固已收复的领土的话，仍有可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谈局面。但偏偏此时南宋政府高层却又盲目乐观起来。在长江防线阻击完颜亮得手的虞允文奉旨宣谕川陕，抵达前线之后随即与吴璘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夏季攻势”——“令董庠守淮东，郭振守淮西，赵撙次信阳，李道进新野，吴拱与王彦合军于商州，吴璘、姚仲以大军出关辅”。而比起纸面上所动用的庞大兵力之外，这次寄希望于一举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竟毫无后勤支持，一切都寄希望于“因粮于敌”——“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而之前一直拒绝拨款的王之望更是打着“军兴费广”，要求百姓“踊跃捐款”以支援前线。

就在前线宋军谋划启动全线攻势的同时，在远离战场的临安，宋高宗赵构却正自编自导着一场禅让大典。赵构早年育有一子，但不幸早夭。迫于宗室的力量，赵构收养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宋太祖赵匡胤八世孙赵昚为养子。但公元1162年7月24日，年仅55岁的赵构却突然宣布“倦政”，传位于太子，多少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虽然后世从健康、伦理等多方面分析赵构退位的原因，但却往往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谋划。

长期以来史学家都认为赵构在其执政后期，面对朝野之上秦桧及其党羽的大权独揽始终处于尴尬的地位。元人所著《宋史》更宣称秦桧“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其淫威甚至到了“桧死，帝方与人言之”的地步。但这一说法显然与秦桧死后，赵构对其的一系列评价相冲突。如果说公元1155年11月19日，秦桧死后次日赵构对其“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的评价还可能是违心之言的话，那么一年之后赵构还公开对臣僚们表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就显然是盖棺定论了。

事实上赵构和秦桧固然存在着君权和相权之争，但两人的施政理念却是相近的。这一点清康熙帝玄烨可谓洞若观火，他在《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中说：“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因此为了压制朝野的主战派，赵构需要秦桧这样的政治打手和代理人，而秦桧同样需要赵构的支持和认可。但无论是赵构和秦桧都很清楚，南宋朝野的“复兴”热情并不是靠强力打压便能瓦解的。而其最终的反弹也必将吞噬这对君臣，正因为如此，秦桧在其临终前上《遗表》中还希望赵构能“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

觎”。所谓“邪党”自然指的就是秦桧长期打压的“主战派”。

秦桧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构都试图延续其政策。而所谓“秦党”也继续在朝堂之上发挥着作用。但是完颜亮的南征彻底改变了南宋政府内的力量对比，为了充实抗金力量，赵构被迫启用和平反大批曾遭受秦桧迫害的“主战派”人士。以赵构的政治眼光自然不会不清楚随即而来将是一场对“主和派”的反攻倒算。“自打耳光”这种事情历代为最高统治者所忌讳，正因为如此，赵构才选择了在即便是今天仍不到男性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退居二线”。当然身为太上皇的他依旧有遥控政局的能力，但无论未来宋金战争如何走向，隐匿于幕后的赵构都要从容得多。

南宋两代领导人的政权交接虽然平稳，但极大地影响了前线宋军的进攻部署。被后世称为宋孝宗的赵昚，虽然表面上替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平冤昭雪，但却第一时间要求正在川陕一线筹备收复中原的吴璘班师，对此吴璘的部下很不理解，纷纷高呼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对此吴璘本人倒是很平静，他说：“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何敢违。”而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吴璘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丢失了此前收复的三路十三州，更在金军的追击中损失了数万人马。



今天吴玠、吴璘兄弟的塑像

吴璘兵团突然撤出川陕战区的举动，令金帝国方面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集结于中原地区的金重兵集团开始重新向两淮地区进击。而南宋朝堂上此时却还在为应该先发制人还是被动防御而争执不休，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不仅是传统“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更是新旧势力的政治碾轧。代表“主战派”是曾长期受到秦桧压制的三朝老臣张浚，而这一次站在他对立面的是深受宋高宗、宋孝宗父子器重的参知政事史浩。而两人的针锋相对，从一次朝堂争论便可管窥一二。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则反驳说：“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面对这种诡辩，张浚只能解释道：“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谁知道史浩继续无耻地回击说：“（陈）胜、（吴）广以锄櫌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

正是在南宋政府内新晋“主和派”的掣肘之下，张浚于虹县、灵壁一线发动的小规模反击很快便因后援不续而败北。后撤的宋军在符离一线遭遇重创，除了兵员损失之外，更丢弃了大量装备和辎重，史称“符离之溃”。面对前线的败局，赵昚仍假惺惺的不许张浚辞职，摆出下诏亲征的姿态。无奈之下张浚只能改变立场，力主对金和议。经过近一年的外交磋商，宋金两国最终于1164年农历十二月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史称“隆兴和议”。由于协议正式生效时，南宋政府已经改元乾道，因此又被称为“乾道之盟”。

较之宋高宗赵构执政时代所签署的“绍兴和议”，南宋政府在“隆兴和议”唯一取得的实质性收益是将每年缴纳给金帝国的岁贡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了各二十万两匹。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全线放弃此前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其余诸如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以及“岁贡”改称“岁币”则不过是口头便宜。而就在中原的苍生仰望着和平再度降临的同时，在遥远的北方，蒙古草原之上正悄然孕育着新的战争阴云。

对于完颜雍和赵昚先后接掌金、宋两大帝国的君主，后世对其的整体评价都不算太低。史学家甚至将他们在位的28年以其年号和庙号分别称为“大定之治”和“孝宗中兴”。而横行比较两人的施政手段，更不难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如“勤政”：完颜雍“孳孳为治，夜以继日”、赵昚则“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如“治吏”：完颜雍“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赵昚则“严赃吏禁”。如“理民”：完颜雍“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赵昚则“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在两人的治理下，金、宋两国的社会治安也呈现了急剧改善的现象，在“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情况下，金帝国“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而南宋政府甚至多次出现“大理寺狱空”的现象。

按照封建时代对明君的要求，完颜雍和赵昚可谓都远超及格线。因此编撰《金史》、《宋史》的元相脱脱曾盖棺定论的评价说：“（完颜雍）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但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脱脱也指出这两位统治者所取得的政绩主要还是缘于“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之外，还得益于金、宋两国之间的战略平衡。“隆兴北伐”的失败，固然让赵昚认识到了“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但完颜雍同样清楚的看到“宋人之和，终不可恃”，因此“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正是金、宋之间这种微妙的力量均衡，使得两国边境地区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时光。

而外部环境的相对缓和也给了宋、金两国统治者梳理政权内部矛盾的时间窗口。自“靖康之难”以来，赵宋皇室赖以巩固政权的文、武两大支柱——士大夫政治和禁军系统均在南迁的过程中归于瓦解。宋高宗赵构执政时期虽然通过重用秦桧及其党羽压制了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但权臣集团却尾大不掉，相权对君权的冲击日益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局面，赵昚一方面频繁更换内阁班子，其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达34人之多。而这还没有计算这些宰相、参知政事们被免职、外放又最终被召回中枢的反复。即便是战功卓著的虞允文、深受宠幸的史浩也都不免几起几落。



宋孝宗赵昚

而除了频繁更相之外，赵昚还有意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而除了在内阁中刻意制造对立之外，赵昚还大量启用自己的“潜邸旧人” 参与军机大政。而对于这股被士大夫指斥为“近习”集团的政治势力，赵昚在利用其完成其制衡相权的目的后，竟也

已被赵眘以结党营私之名赶出中枢。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反复敲打士大夫集团的同时，赵眘也着手整肃军中宿将。长期把持川陕军政大权的吴玠、吴璘家族，最为“中兴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支。吴氏一族统率蜀兵已达二十多年之久，而在抵御完颜亮的南侵的过程。吴玠之子吴拱还统兵出峡、东戍襄阳，一度升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其军中的地位不弱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面对吴氏一族纵连蜀、荆，尾大不掉的态势，赵眘自然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因此在其上台伊始，首先便下诏要求正在北伐途中的吴璘班师。此后又发动臣僚制造舆论，弹劾吴璘。无法自辩的吴璘只能在1165年自请入朝，面对赵眘、赵构两代国君假惺惺的安抚，吴璘用手中的兵权换取了“新安郡王”的封号和兴元一府的职权。与此同时，其侄吴拱也被召入中枢，授予了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职务。

两年之后吴璘病逝，吴拱离开中枢，接管家族在兴元府的政治地盘。吴氏一族在军中虽然依旧有一定的势力，吴璘之子吴挺为赵眘所重用，在中枢和蜀、荆军区都担任过要职，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而在全力打压吴氏一族的同时，赵眘也主动拉拢南宋军中的其他派系。在太上皇赵构的做媒之下，赵眘聘娶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李凤娘为自己三子恭王赵惇之妃。算是在军中打入了一个自己的楔子。李道虽然战功寥寥，但资格颇老。早年便跟随宗泽抗金，随后隶属岳飞麾下，担任选锋军统制，参与了岳飞的历次北伐作战。可惜的是李道的这个女儿李凤娘个性强悍，日后在宋室的后宫之中兴风作浪。令太上皇赵构和宋孝宗赵眘都颇为头痛。

除了为自己找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儿媳，为自己将来的退休生活埋下祸根之外。赵眘对待宗室和权臣之后的态度更可谓遗祸无穷。在宋人周密的笔记《齐东野语》中所曾记载了赵眘对自己兄长赵伯圭的纵容。在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哥哥“不甚教子”、“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的情况下，仍对其家族委以重任。而对此的解释，用赵眘的话说：“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正在秉承着这种“以高爵厚禄之惠，购上下勋贵之忠”的指导思想。南宋宗室、士大夫、军中宿将暮气日重，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如果赵眘的施政是有意压制南宋政府内锐气进取精神的话，那么完颜雍则始终在努力革除金帝国内部的女真贵族及汉族精英阶层的保守思潮。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庞大的契丹和汉人族群无疑是金帝国内部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帝国历代统治者曾做出过许多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完颜亮大举南征

之际，契丹牧民纷纷举义、中原地区的汉族精英投衅而起便是这一矛盾长期积累之下的总爆发。完颜雍虽然成功的凭借武装镇压度过了危机，但仍不得不在国家政策领域做出全面的调整。

在完颜亮统治时期，吸收渤海、契丹和汉族精英为官，打破女真族宗室贵族对政府职权垄断的改革便已经悄然启动。但由于完颜亮个人性格的缺陷，这项改革操之过急，各方利益集团相互碾轧，最终导致连场血腥的政治清洗。完颜雍虽然继承了这一政策，但在政府内阁改组却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兼顾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其在位期间，历任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7人，非宗室女真15人，汉族14 人，契丹、渤海2 人。基本形成了女真、汉族精英共治，渤海、契丹参政议政的局面。

而针对完颜亮激进的全盘汉化举措，完颜雍虽然也倾心于汉文化，但深知女真文化和猛安谋克制度才是完颜政权的立国之本。因此在其任内大力倡导女真文字。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而在大力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的同时，完颜雍真正期望的还是恢复和强化猛安谋克的“战斗堡垒”作用。

事实上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完颜亮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的举措更进一步弱化了其作用。因此完颜雍执政伊始便重新推行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此后多次新授猛安谋克，并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所属民户耕种或租佃，在确保女真族人经济地位的同时，还要求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完颜雍之所以如此急于恢复猛安谋克系统的战斗力，除了出于应对与南宋对峙和冷战的需要之外，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北方蒙古诸部的军事压力。根据郑所南所著的《心史》中“金酋雍（完颜雍）立，仁慈，恕鞑旧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时思乃祖旧恨，但望北射三箭泄余愤。如是十九年，鞑人孳育丁壮甚盛”的记载，完颜雍执政时期，金帝国似乎基本停止了对蒙古诸部的军事征讨。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因为完颜雍的所谓“仁慈”，而是在金帝国武装力量的全面衰败之下的无奈之举。在镇压撒八、移剌窝斡所领导的契丹牧民起义之中，金帝国的骑兵部队已经无力与对手长期周璇，出现了“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能再指望金帝国远征军可以深入大漠草原对蒙古诸部实行“减丁”政策。

作为一个务实的帝国元首，完颜雍当然知道那所谓的“泄愤之箭”不可能阻挡蒙古诸部的滋扰。在竭力恢复女真族人战斗力的同时，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防工程在金

帝国的北方全线开工。1165年农历正月，完颜雍下诏在泰州、临潢等边境地区修筑边堡60座，增派边防部队13000人。此后又多次下令增筑边堡、配置守备部队。关于这道防线，史学家有人称之为金长城，但更多的时候，相关的研究者们还是习惯称其为“金界壕”。由于大多兴筑于较为平缓的草原地带，因此金帝国的边防系统，无法像传统的长城那般依山而建，只能掘地为壕。而宽达30—60米的界壕之后再修筑5—6米的边墙，而在界壕和边界的基础之上，再隔5—10千米筑一边堡，用于驻兵屯粮。

对于金界壕的修筑，长期以来史学界的非议都大于肯定，甚至在完颜雍在位期间，丞相李石和纥石烈良弼便联名反对。认为“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迫于官僚系统的压力，完颜雍亲自主导的金界壕工程最终草草下马。直到1197年，在金帝国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的主持之下，才将这项“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的半吊子工程进一步修缮完成。

必须指出的是，“金界壕”的修筑并非始于完颜雍，而在其身后金帝国统治者也不得不在争议声中重新上马该项工程。而“金界壕”所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单纯的从军事角度予以考量。长期以来，中原政权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最佳的防线莫过于燕山——阴山山脉，历代长城也大多依托于此。但金帝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却迫使其必须控制蒙古草原，以保障己方战马供应。因此不得不以界壕保护其牧群和草场。而金界壕的建立，除了可以有效地抵御蒙古诸部的袭扰之外，更成为了金帝国招揽草原民族内附的最佳国力展示。

在完颜雍执政时期，1175年隶属于乃蛮系统的“粘拔恩”部3万余户的内附，何尝不是艳羡于金界壕之内的安定。而蒙古诸部的领袖如克烈部部长脱斡邻勒、汪古部白厮波及未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之所以都曾一度接受过金帝国的册封，循例缴纳岁贡，又何尝不是缘于无力攻破界壕，只能以朝贡贸易获得所需物资的理性选择。当然另一方面金界壕的建立在堵塞蒙古诸部原本南下劫掠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内部的矛盾。蒙古草原之上原本群雄并立的局面，正是在金界壕建立之后逐渐演化为了诸部争雄，最终孕育出了强大到足以摧毁金帝国边防系统的蒙古帝国。

1179年农历四月，对于坐落于华北平原之上的金帝国首都燕京而言，已是柳丝芳菲，桃飘李飞的暮春时节。56岁的完颜雍按照惯例，向各政府机关下达了准备北巡的诏令。“春水秋山、夏冬捺钵”本是契丹、女真这样的游牧、渔猎部落的本色。

何况要去的地方也并不算太远，一想到位于西京路桓州（今河北省沽源县）的金莲川此时水草丰美的景象。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完颜雍的心中依旧难以遏制那策马奔腾的冲动。

完颜雍第一次前往金莲川是在11年前的1168年。面对着这片昔日契丹达官贵族的游猎避暑之地，完颜雍兴致颇高的亲自将其原名“曷里浒东川”改为“金莲川”。完颜雍此举固然是因为当地遍布着一种花大色黄的金莲野花。更是取“莲者连也，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这片草场作为沟通金帝国燕山南北的纽带。此后完颜雍每隔数年必将巡幸当地，史料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其在巡幸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但依照封建帝王的行为惯例，少不得要召见一些当地文武官员、内附的游牧部族首脑。但是这一次完颜雍的诏令刚刚下达，便收到了一封劝谏表疏。

写这张谏表的人名叫梁襄，来自山西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大定三年进士出身，此时担任完颜雍第七子薛王完颜允济的王府秘书（掾吏）。从梁襄的从政经历和此时所担任的职务来看，金帝国对其还是颇为信任和重用的。他如果能够安心本分的工作，日后完颜永济登基为帝之时，梁襄未必不能捞个六部主事甚至左丞右相的高位。但此时的他不知道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的确不吐不快。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谏北幸》递了上去。

从《谏北幸》开篇部分所谓“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的表述来看，梁襄应该没有去过那里。但这并不影响其大发宏论。认为完颜雍的北幸之举不仅皇帝自己“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而即便皇帝没有危险，随行的百官禁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即便随行人员没有危险，“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的巨大财政开支也实属没有必要。最后还高屋建瓴的将完颜雍的北巡比作隋炀帝下扬州和完颜亮南征。将自己说成是阻止唐太宗行关南、汉文帝驰霸陵的魏征和袁盎。面对这样一篇雄文，完颜雍也只能叫停了北巡的工程，同时不得不以敢于直谏的名义，升任梁襄为礼部主事。不过完颜雍还是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巡幸的看法：“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类似梁襄这样的举动，其实在汉族士大夫的历史中并不罕见。在无法以政绩求表现的时候，以直谏搏闻达可谓是最常用的求官手段。事实证明梁襄的政治才干实在一般，其后其在监察御史、地方刺史、节度使的岗位表现都不过平平。但他的名字和《谏北幸》的文章却最终为《金史》所载，甚至被认为是“大定间人才辈出，文

义蔚然”的论据。但恰恰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的政治氛围之中，金帝国统治者的手脚被逐渐束缚。梁襄《谏北幸》之后的十年里，完颜雍虽然依旧多次出巡。但随着1187年完颜雍出巡金莲川时，首都燕京发生地震之后。金莲川这个地名彻底消失在金帝国统治者出巡的名单之中了。


今天依旧“遍地金莲”的坝上草原

数十年之后，南下的蒙古大军以金莲川凉陉驻扎，修整军队之时或许并不知道他们脚下曾是金帝国君主避暑之所。而1251年受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的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开创金莲川幕府并最终将当地确立为未来蒙元帝国的上都时，恐怕更不知道曾有一个名为梁襄的腐儒，认定这里是“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

草原危途
——乞颜部内讧和铁木真童年时代的磨难

在完颜雍被迫取消北幸金莲川的同时，一个蒙古乞颜部的贵族少年正在为营救自己的新婚妻子而焦急奔走着。他就是也速该的长子——孛儿只斤·铁木真。对于此时年仅18岁的铁木真而言，他的命运可谓多舛。孤独、流浪、贫苦、被掳，诸多困难的经历从9年前他的父亲也速该离奇死亡后，便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铁木真原以为一切的痛苦，随着自己迎娶弘吉剌部的女孩孛儿帖将宣告终结。却不曾想等来的却是更为可怕的屈辱。世人无法知晓此时心急如焚的铁木真是否对他早逝的父亲有过怨恨。毕竟在他看来如果也速该当年没有饮下那杯塔塔尔人的毒酒，那么他的人生将会截然不同。但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却不得不认为也速该的死和铁木真早年所经历的磨难均是一种必然。

虽然按照南宋史料的说法，忽图剌屡挫金帝国远征军的兵锋，自封祖元皇帝，建元天兴。但对于仍处于部落经济时代的蒙古部而言，忽图剌依旧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他的权威既得不到其他草原民族的尊重，更无法通过血统得以传承。早在其继承俺巴孩的酋长之位时，蒙古乞颜部内便有人宣称："汝等公议立罕，则事可定。否则必有内乱。"而在忽图剌死后，蒙古乞颜部内部长期没有确立领导核心。出现"诸部各立部长，不相统属"的局面。



当地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也速该之死》

曾常年跟随忽图剌南征北战的也速该，或许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忽图剌在乞颜部中的军事领导地位，更可能拥有着同时代蒙古诸部贵族中少有的战略眼光。在忽图剌死后不久，他便中止了与塔塔尔部的长期战争，转而投身于克烈部的内战之中。在连续为蔑儿乞部和塔塔尔部所重创之后，克烈部酋长忽儿扎胡斯被迫长期依附于乃蛮部。忽儿扎胡斯死后，其两度为敌国掳走的长子脱斡邻勒始终摆脱乃蛮部的控制，但却为自己的叔叔古尔所驱逐。对于脱斡邻勒而言，此时蒙古草原“五大兀鲁斯”中，乃蛮—克烈联军是敌人，而蔑儿乞和塔塔尔同样是仇寇。唯一可能向其伸出援手的唯有乞颜部。因为也速该出兵支持其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汗位，对于脱斡邻勒而言无疑是再造之恩。

成功帮助脱斡邻勒归国复位之后，克烈部随即成为乞颜部西线最为得力的盟友和屏障。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大战略，也速该开始在自己的部族东部活动。而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长期与乞颜部有着姻亲关系的弘吉剌部。依照《蒙古秘史》的记载，也速该向弘吉剌部的求婚之旅，完全是铁木真“未来岳父”特薛禅主动“倒贴”。也速该和特薛禅在路上偶遇之后，特薛禅一见铁木真就异常中意，各种面相、吉梦的

大吹一气，非要说铁木真是自己家族的贵人。但综合事态后续的发展，却不得不说也速该此行与其说是求亲，不如说是送质。年仅9岁的铁木真远未到婚配的年龄，却要以“倒插门”的形式寄居于特薛禅的家中。而也速该对此举也颇为不舍，甚至临走前还特意关照和叮嘱说：“我儿子怕狗，休叫狗惊着。”不过谁也想不到这个9岁还怕狗的小男孩在时势的运转之后，最终对着自己的部下们说出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

也速该在离开弘吉剌部之后，又参加了一场塔塔尔人的宴会。对于此事大多数记述都依照《蒙古秘史》的说法，认为是一场偶遇。但以乞颜部与塔塔尔部常年交恶的情况来看，也速该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因为“口渴”就参与对方的宴会。或许求亲于弘吉剌、会宴与塔塔尔本就在也速该的日程表中。而以草原部族交锋的游戏规则来看，塔塔尔人如果要谋害也速该似乎也没有下毒的必要。毕竟他们曾明火执仗的绑架过乞颜部的首领俺巴孩，直接在宴会下杀了也速该也并非难事。何必采用一种三天之后才能置人于死地的慢性毒药？

无论如何，也速该最终死在离开塔塔尔部领地回家的路上。而临死之前，他没有将自己的家人和财产交给自己的亲属打理，而是嘱托了一个名叫“蒙力克”仆从尽快将铁木真从特薛禅家中接回铁木真，并照顾自己留下的孤儿寡母。也速该的遗嘱虽然简单，但至少透露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他对乞颜部内的亲属并不信任，二是此时他在自己的部族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而这两点无疑都在将来乞颜部的分裂中起到了作用。

也速该死后，蒙力克虽然悉心的“照顾”其家族，甚至一度迎娶了也速该的遗孀诃额伦。铁木真因此曾长期尊称其为“额赤格”（养父）。但在乞颜部内，诃额伦始终是也速该势力的代言人。而其与其他贵族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其家族为部族所抛弃和孤立。整个事件源于一次祭祀活动，在一年春天祭祖的大典，诃额伦由于迟到而没有分到胙肉、供酒。


当地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乞颜诸部离散》

自也速该去世之后的长期积怨最终令她将矛头指向了主持家族内部事务的俺巴孩两位遗孀，诃额伦有足够的理由愤怒，她说："也速该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们终将长大成人，今天不分给我们肉干，明天是不是就要抛弃我们？"这一事件令原本没有貌合神离的俺巴孩派系与也速该部族的彻底决裂，俺巴孩的两位遗孀第二天就移营而去，也速该的部族很多也跟随着她们一起移动，诃额伦不得不高举着自己亡夫的军旗前去追赶。

也速该生前对自己亲属的不信任，令其部族在瞬间分崩离析，连铁木真的叔叔脱朵延也最终决定率众离去。铁木真的后爸蒙力克和他的继爷爷——察剌合竭力挽留却只换来了脱朵延一句："深池已涸，坚石已裂，留复何为"的回答。或许是恨蒙力克霸占了自己的嫂子，脱朵延随后还捅了察剌合一枪。这位可怜的老头不久便因伤去世了。而此时尚未成年的铁木真除了大哭一场别无他法，毕竟在无情的草原之上，依附强者自古以来便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必须指出的是乞颜部的分裂，固然带走了也速该昔日强盛的部族内的大半领民。但铁木真及其几个兄弟姐妹继承了其父乞颜部贵族的身份及其势力范围，其童年生活虽然清苦，但渔猎牧马本是当时蒙古族少年的本分。即便也速该在世，其物

质生活也未必会丰富多少。而正是因为忌惮也速该生前在蒙古诸部中的影响力，俺巴孩派系所形成的泰赤兀氏酋长塔儿忽台才兴师动众的出兵将铁木真掳走。从泰赤兀氏和铁木真家族交手的过程中来看，他们未必是想剿灭这支同宗，更多的是想将铁木真扣为人质。塔儿忽台虽然在草原之上人送外号“乞邻勒秃黑”，是个喜欢玩木枷的“好汉”。但他抓到铁木真之后，也只是让其轮宿于各家之中，并未加害于他。而在泰赤兀氏亲贵锁儿罕·失剌及其子赤老温、其女合答安的帮助之下，铁木真最终顺利逃脱。



被掳走后身戴木枷的幼年铁木真

为了躲避同宗的泰赤兀氏追杀，逃出生天将自己的牧场迁徙到蒙古高原腹地的肯特山脉脚下。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铁木真母子逐渐重振了也速该的部族。与同被乞颜部边缘化的札达兰部结为攻守同盟。正是有了雄厚的政治资本，铁木真才再次向弘吉剌部求婚。迎娶和自己早有婚约的特薛禅之女孛儿贴。而面对妻子陪嫁的黑貂袭，铁木真却选择了将它作为投资送给了邻近的克烈部酋长脱斡邻勒，脱斡邻勒随即收铁木真为义子。脱斡邻勒倒未必是稀罕一件黑貂袭，而是看重身为弘吉剌部之婿、乞颜部新贵的铁木真身后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可惜的是克烈、乞颜部的世仇——蔑儿乞部对这一切同样洞若观火。

1178年，铁木真新婚后不久，蔑儿乞部的首领脱黑脱阿率三百骑兵来袭。猝不及防的铁木真家族四散奔逃，混乱之中孛儿贴被蔑儿乞人掳走。从事态后续的发展来看，依旧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蔑儿乞部将此事简单的理解为 “当年也速该抢了我的弟妹，今天我抢他的儿媳，也算是报了仇了。”虽然是“强盗逻辑”，但脱黑脱阿自认师出有名，因此事后并没有做好应对苦主反击的装备。而反观铁木真，在孛儿贴被掳之后，他并未第一时间动员家族成员投入追击。而是积极的奔走于克烈部、札达兰部之间。最终纠集了一支数万兵力的联军，将草原上约定俗成的“抢亲纠纷”升级为了一场部族决战。

公元1179年夏，乞颜—克烈—札达兰三部联军强渡勤勒豁河，突袭不兀剌草原之上的蔑儿乞部营地。脱黑脱阿虽带着少数精锐突围，但蔑儿乞部经此一役之后元气大伤。昔日参与过突袭铁木真营地三百壮丁被悉数屠戮，而其余的妇孺儿童则被收为奴隶。而在乱军之中，铁木真也找到了自己被掳的妻子。被蔑儿乞惕部俘获的孛儿贴被许配给了脱黑脱阿的弟弟赤勒格儿，根据《蒙古秘史》的说法，赤勒格儿不仅对孛儿台颇为尊重，甚至在铁木真率领自己和扎木合的联军杀入蔑儿乞惕部之时后悔的表示：“我不过是一只只配吃残皮剩肉的乌鸦，如今却妄想吃大雁和仙鹤。正因为我这个面目丑陋的赤勒格儿，触犯了尊贵的后妃，才招致了全蔑儿乞的灭顶之灾。”不过这样的迟到的忏悔并不能改变孛儿台在被俘期间和赤勒格儿的夫妻之实。而被铁木真大军“迎回”的孛儿贴已经身怀六甲更是一件令铁木真无比苦恼的事情。

在没有亲子鉴定的情况下，铁木真只能向和孛儿贴一起被掠走的女仆豁阿黑臣询问。虽然身份卑微，但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豁阿黑臣还是慷慨直言地回答道：“糊

涂的男人，连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句话与其说是在为孛儿贴开脱，不如说是在向铁木真控诉，既然你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子，那又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对方的不贞呢？而事实上另一位在蔑儿乞惕部的入侵中被掠走的铁木真家族的女性也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表达了一个女人委身于敌的内心煎熬，她就是也速该的别妻、铁木真同父异母的弟弟别里古台的母亲，因为没有脸面再见自己的儿子，她选择了遁入森林之中，或许也真因为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铁木真选择了善待自己的妻子以及那个血统存疑的长子。

关于铁木真长子的血统，史学界争论不一。其中有个有趣的现象，蒙古及西方的史料之中似乎都比较偏向于他是铁木真的妻子孛儿贴被掳和赤勒格儿所孕育的“爱情结晶”。而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史料之中则喜欢渲染孛儿台在被劫持之前便已经身怀有孕，甚至不惜将赤勒格儿美化成蒙古“柳下惠”。不过这个问题既然铁木真本人也搞不清楚，大家似乎也不必太过于深究。铁木真在迎回自己的妻子孛儿贴的回师途中，这个孩子突然降临。由于军中没有初生婴儿用的襁褓，孛儿贴只能用搏面的器皿装着自己的骨肉将他带在马上。初为人父的铁木真显然觉得这小子挺麻烦的，于是抱怨说：“此不速之客也。”随即为这个“来路不明”的男孩起名为蒙古语中意为“客人”的“术赤”。



招降纳叛、充实实力的铁木真

铁木真虽然最终包容了术赤，但对于和自己自幼一起长大的“安答”札木合的关系却日益复杂。在击败蔑儿乞部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铁木真和札木合部合营放牧。有一次兄弟两人同游忽勒答合儿崖。扎木合随口说了一句：“我们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住；靠水居住，放羊的人可得饮食。”这句话看似平平无奇。但是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台却提醒自己的丈夫：“扎木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这是在讨厌我们了。”在这股枕头风的吹拂之下，铁木真连夜率领部众离开了扎木合的牧场。向西返回了自己昔日的牧场。这对异姓兄弟的决裂由此开始。

对于札木合这段话所代表的含义，后世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最为离谱的或许是苏联历史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他说这段话代表了札木合同情普通牧民，而代表蒙古贵族势力的铁木真及其妻子对这种思潮很反感，因此下定了和民主倾向的札木合闹分裂的决心。而比较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札木合是在向铁木真表达：咱俩各有各自的情况，应该分开来各奔前程。但在笔者看来札木合这段话之所以引起铁木真和孛儿帖的警觉，主要还在于札木合说这番话时，已经俨然将自己凌驾于铁木真之上。继续合营放牧，铁木真及其部族将失去其独立性。

铁木真离开札木合的营地之后，首先扑向了同宗的泰赤兀氏。有了蔑儿乞人的

前车之鉴，塔儿忽台只能移营躲避铁木真。而大批乞颜部的贵族及附庸随即重回铁木真的麾下，甚至札木合的同胞兄弟豁儿赤也跟着铁木真跑了。按照豁儿赤本人的说法，他和扎木合是“同母而异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扎木合的母亲也是札答阑部的首领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正是由于这一点豁儿赤得以在投靠铁木真时吹嘘自己其实是铁木真的远亲，因为毕竟扎木合的母亲之前跟过谁，没有人有确切的记录。

之所以投靠铁木真投诚，豁儿赤的理由是“神人托梦”，豁儿赤的这个梦说起来不仅荒诞而且无聊，主要是关于一头草黄色的母牛撞了扎木合的房车，随后又拉着车子跟铁木真跑了。不过豁儿赤却说这是“天地相商，神牛载国”。比其中原文化什么神龙、旭日之类的祥瑞来，豁儿赤的“造梦”能力实在不怎么样。这种虚无缥缈的说法本来也经不起推敲。不过铁木真当时羽翼未丰，的确需要豁儿赤这样人来向草原昭现自己的慷慨，于是不仅接纳了他，还许诺将来自己成为了大汗，将册封豁儿赤为万户那颜。不过豁儿赤还不满足，要求铁木真允许他娶多位蒙古美女，使他成为拥有三十个妻子的人。正是这种广纳贤才、善结盟友的政治手腕，最终令铁木真在草原上赢得了“以己衣衣人，以己马乘人”的威名。将昔日的草原霸主—扎木合、塔而忽台、脱斡邻勒等人一一埋葬。

第二章　肯达山南

继承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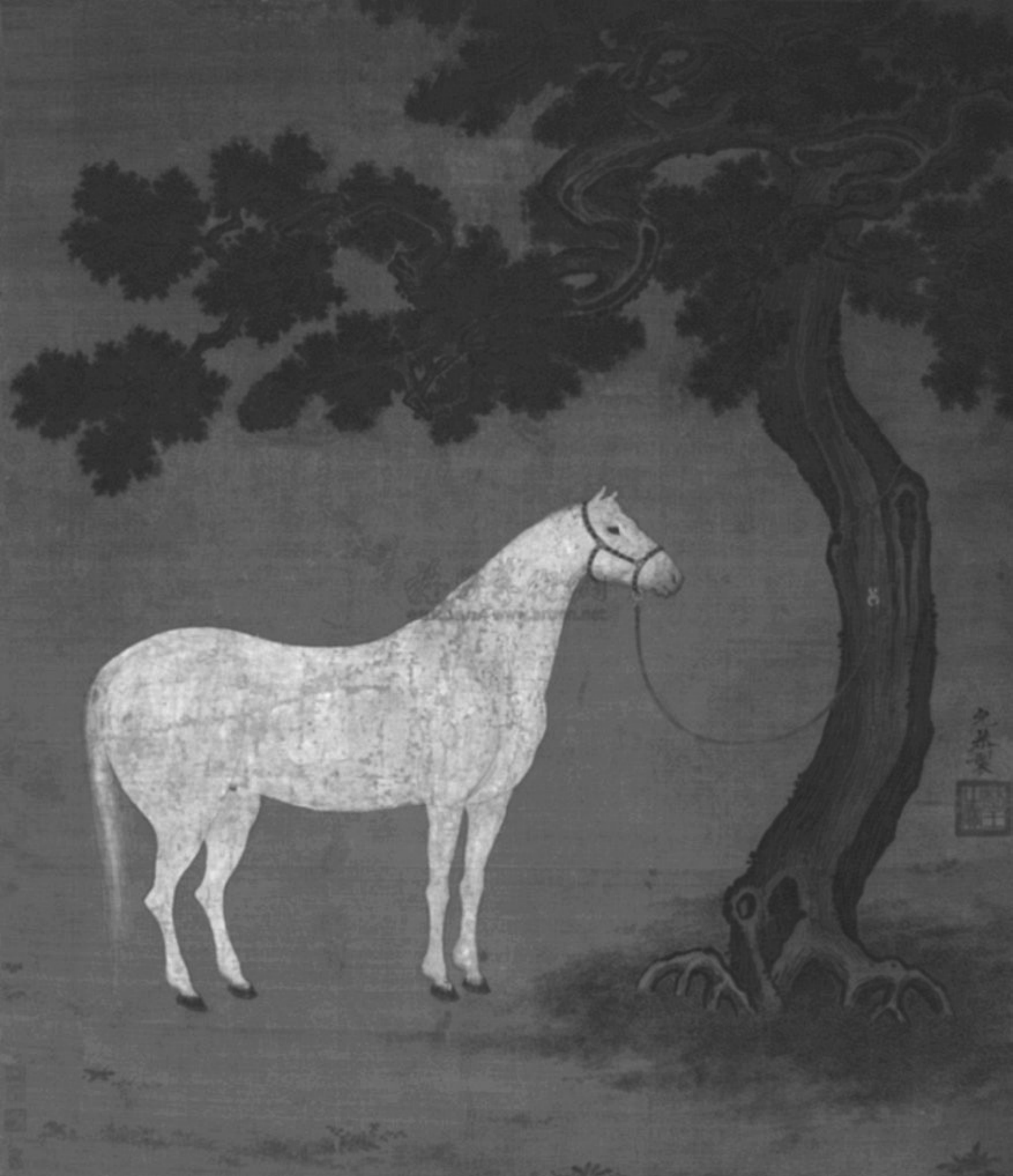
——金章宗完颜璟和宋光宗赵惇的继位之路

公元1189年1月20日，67岁的金帝国统治者完颜雍病逝于首都燕京的福安殿中。作为一个政治上颇有建树的君皇，完颜雍很早便对自己的继承者展开了挑选和培养。完颜雍育有九子，其中最为受宠的是嫡长子完颜允恭。1162年，完颜雍刚刚登上帝位便立其为太子，期望之高可谓溢于言表。但从金帝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醉心于儒家文化的完颜允恭并非是继承帝位的合适人选。在身为太子的23年时间里，完颜允恭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汉字典籍，甚至“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而对于自己的儿子的汉化趋势，完颜雍不仅没有及时纠正，相反还挑选优秀的儒生为其侍读。对此身为太子太保的宗室重臣完颜爽颇为不爽的表示：“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官，皆用女真人。”完颜允恭表面上只说自己做不了主，私底下却揶揄完颜爽没有学问。

由于传世的文章不多，完颜允恭文采究竟如何并无定论。但其擅长丹青，尤工画人、马及墨竹，却是世人所公认的。身为储君有点文艺气息本不是什么坏事，但如完颜允恭般太过痴迷诗画不免会耽误政事。元人王逢曾作诗讽刺说：“金家武元靖燕徽，尝诮徽宗癖花鸟。允恭不作大训方，画马却慕江都王。”除了专情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外，完颜允恭还表现出一个储君所不应有的迂腐，他曾向一位前往山东的政府特派员询问民间疾苦，对方回答：“钱难最苦。官库钱满有露积者，而民间无钱，以此苦之。”完颜允恭随即提出：“钱在府库，何异铜矿在野。乞流转，使公私俱利。”完颜雍虽然表示赞赏，但让有关部门拿出相应办法后，此事就没有下文了。

1184年，完颜雍鉴于完颜允恭已经24岁了，有意离开首都燕京前往上京居住。让太子以“守国”之名代行首脑职权。完颜雍此举显然是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能通过这样的一段“实习”，尽快上手政府工作。但空前的精神压力却令完颜允恭很不适应。在一段“移晷忘倦”的高强度工作之后，完颜允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只能将自己的儿子完颜璟派去上京请爷爷回来主持工作。而完颜雍尚未抵达燕京，完颜允恭便一命呜呼。晚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令完颜雍一路放声痛哭之余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客观地说此时完颜雍仍在世的6个儿子之中富有政治才干的并不在

少数。而其中因其生母不同，又以张元妃所生的“大阿哥”允中、“五阿哥”允功为一系、以李元妃所生的“六阿哥”允蹈、“七阿哥”允济、“八阿哥”永德为一系。因此唯一在诸兄弟之中没有党羽的“九阿哥”允成反倒成了继承皇位的热门人选。完颜允恭死后，完颜雍一度任命“九阿哥”完颜允成为中都留守，处理治丧事务。但最终完颜雍还是选择隔代传位，立完颜允恭之子完颜璟为皇太孙。



完颜允恭所画的《玉花骢图》

对于完颜璟从政道路的安排，完颜雍多少吸取了其对完颜允恭错误培养的教训。在正式确立其皇太孙身份之前，完颜雍首先安排自己这个17岁的孙子担任地方官员“判大兴府事”。随后又引入中枢担任尚书右丞相之职。而经历这些岗位的长期历练，完颜璟的政治手腕相较其迂腐的父亲要高得多。完颜雍过世后，完颜璟迅速

打压叔辈诸王的政治野心，以谋反之名先后勒令已改为“永”字辈的大伯完颜永中、六叔完颜永蹈自尽。外放了颇有政治才干的五叔完颜永功、九叔完颜永成。对无德无才、柔弱无能的七叔完颜永济、八叔完颜永德倒是颇为器重，以彰显自己厚待宗室。

在灵活处理了宗室矛盾之外，完颜璟也基本延续了祖父完颜雍“与民休养、重视桑农”的施政纲领。在其执政的第一周期——明昌年间，金帝国的人口超过5600万，财政大量盈余。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史家评为“宇内小康”。但作为一个帝国统治者而言，完颜璟毕竟太过年轻，其父完颜允恭对汉文化的痴迷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在其思想中发酵。其即位之后，除了进一步敬礼孔子、大兴科举、健全礼法之外，完颜璟还大举削弱女真猛安谋克系统的特权，明昌年间，猛安谋克不复世袭和武功的特权，而是要与汉族士大夫一样通过科举考试。此举固然促进女真贵族与汉族士大夫的日趋同一。但完颜雍曾苦心维护的女真族最后的战斗堡垒也归于崩塌。如果金帝国依旧处于太平无事的快车道上，完颜璟的这些汉化改革或许无伤大雅，但偏偏他即将面对却是无比复杂的多线战争。

首先登场与完颜璟对垒的是南宋权相韩侂胄，作为北宋名将、所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韩琦的曾孙。韩侂胄的一生可谓“兴于后宫也亡于后宫”。韩侂胄的母亲是宋高宗赵构的患难妻子吴芍芬的妹妹。相传吴芍芬的父亲吴近在女儿降生之前，曾梦到一亭，亭子两旁遍种芍药，万绿丛中一朵红花，亭子的匾额上有“侍康”二字。吴近从梦中醒来，不明是何预兆。后来，十四岁的吴氏被选入宫，侍奉宋高宗赵构时，方才明白“侍康”的梦兆指得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要去侍奉康王。

长大成人之后的吴芍芬不仅长得颇为标致，还胆色过人，时常扮演着保护和宽慰自己丈夫的角色，“常以戎服侍左右”。而在金帝国南下，赵构仓皇南逃的过程中，吴芍芬先是在四明以智慧和胆略哄骗了到处“问帝所在”的叛军。随后在宋高宗赵构乘船入海从定海（今浙江省镇海区）转赴昌国（今浙江省普陀区）途中，亲自用弓箭射倒了一名金帝国的游骑。更将有鱼跃入船舱的自然现象，引申为“此周人白鱼之祥也”。来宽解自己几乎走投无路的老公，随即被封为和义郡夫人。回到越州之后又进封才人。最终成为掌管后宫的皇后。

吴芍芬除了是个好妻子之外，还是一个不错的儿媳妇。赵构的生母韦太后由金帝国被释放南归之后，吴芍芬就负责侍奉太后起居，最终在朝臣请“累表请立中宫”之时，韦太后“亦为言”，力挺吴芍芬。1143年，吴芍芬正式由贵妃晋升为皇后。

同时“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三十五人”。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殊荣。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妹妹嫁入北宋政治豪门——相州韩氏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韩侂胄失势之后，南宋政坛一度盛传其并非韩氏子弟，而是来路不明的野种。撇去这种有意抹黑政治对手的坊间流言不论。韩侂胄成年之后靠着家门荫蔽走上仕途，又迎娶了吴芍芬的侄女。在这段亲上加亲的婚姻之上，韩侂胄也算跻身皇室贵胄的行列，从此自然官运亨通。在宋孝宗赵昚执政末期，已经官至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知阁门事”，而真正令其飞黄腾达的还是参与和主导了逼迫宋光宗赵惇退位的宫廷政变。



南宋首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后—吴芍芬

宋孝宗育有四子，和完颜雍一样，赵昚曾将未来继承大宝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嫡长子赵愭的身上。可惜的是1167年，赵愭因庸医误诊，病逝于临安。赵昚在悲痛之余，不得不在自己的次子赵恺、三子赵惇之间重新物色太子人选。按照中国传统

文化“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位顺序，赵昚本应拥立年长的庆王赵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赵昚认为庆王赵恺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赵惇“英武类己”，最终决定舍长立幼。此举在赵昚看来无可厚非，却不想在恭王赵惇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化解的心结。毕竟赵惇虽然身为太子，但朝堂之上还有一个正值壮年的老爹，临安之外还有一个颇得人望的哥哥，心中的忐忑可想而知。

入主东宫之后，赵惇竭力伪装自己。他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父亲赵昚更是克尽孝道。老爸情绪好时，赵惇也“喜动于色”， 赵昚情绪低落，赵惇也“愀然忧见于色”。父子还经常以诗会友，一个提醒自己的儿子要继承恢复故国的宏图壮志，另一个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

恭王赵惇小心翼翼地做了十几年孝子，逐渐也年过不惑，却仍不见老爸有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赵惇随即向宋孝宗赵昚试探性地说道：“我的胡须都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赵昚自然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但是却故意装作不懂地回答说：“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赵惇在自己爸爸这边碰了钉子，只能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奶奶——吴芍芬了。身为赵昚的养母，此时的吴芍芬虽然已经跟随老公赵构退居二线了，但对朝政仍有相当的影响力。更长期扮演着赵构、赵昚这对父子之间的传声筒和桥梁。

身为太上皇的赵构虽然已经是退休之身，但却依旧有大手大脚的习惯，有一次手头比较紧便借着喝酒问自己的养子要钱，赵昚当时喝多了便随口答应改天送钱二十万缗。但是过几天便就忘记了，太上皇赵构算算日子又不能再开口去要，只能向自己的老婆——吴芍芬打听。吴芍芬替养子开脱说：“在此久矣，偶醉时奏，不知是银是钱，未敢遽进。”太上皇赵构倒也老实随即说：“要钱用耳。” 吴芍芬便拿出二十万私房钱先给丈夫花，赵昚知道后立即送了四十万缗给吴芍芬以感谢她“调娱父子之欢”。

面对这位精明过人的老太太，恭王赵惇很多话不用明数，他只是宴请吴芍芬吃了几餐时鲜美味，这位太皇太后便心知肚明，开始向赵昚暗示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需“历练历练”。1187年农历十月，做了25年太上皇的赵构因病去世。赵昚在悲痛之余也开始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报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赵构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而在守丧之期接近结束之时。 赵昚又召集

宰执大臣，表示自己准备禅位给自己的儿子—恭王赵惇，大臣们都交口赞同，唯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赵昚于是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答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

黄洽是赵昚的心腹，曾被宋孝宗赵昚比喻为："卿如良金美玉，浑厚无瑕，天其以卿为联弼耶？"他口中所说的李氏指的是赵惇的太子妃——李凤娘。出身将门的李凤娘天性泼辣，虽然身处大内，却依旧难掩她那不安分的一面。经常因为争风吃醋而跑到自己的公公和公爷面前去投诉自己的丈夫和左右侍臣。对此已经退休的宋高宗赵构不厌其烦，只能对自己的老妻——吴芍芬抱怨受了道士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而不忍自己宝贝儿子受气的赵昚则直接对李凤娘说："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不过李凤娘似乎丝毫也感受不到压力，反而在恭王赵惇即位之后变本加厉。

按照常理来说黄洽这样的朝臣不应非议后宫之事。但想来是李凤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格。他才不得不发出善意的提醒。在赵昚固执己见的情况下，黄洽只能表示："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不过此刻赵昚还天真认为李凤娘虽然刁蛮骄横，但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恭王赵惇即位之后，替他生下独子赵扩的李凤娘也自然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皇后。执掌后宫的李凤娘随即表现出空前疯狂的妒忌心。有一次，赵惇见为他端水的宫女的手生得嫩白，随口说了一声："好！"第二天李凤娘就给赵惇送来了一盒"点心"，里面装的就是那位宫女的两只手，吓得赵惇当场心脏病发。对于小小的宫女尚且如此，其他和李凤娘雨露均沾的妃嫔自然也难逃她的打击。

在后宫之中地位仅次于李凤娘的是赵昚早年赐给自己儿子的宫女——黄氏，赵惇对黄氏宠爱有加，即位后便立为贵妃。但是在嫉妒成性的李凤娘眼中自己的丈夫越是宠爱的女人便越想除之而后快。于是她利用赵惇离宫祭祀之时，派人谋杀了黄贵妃，还谎称其是暴病而亡。黄贵妃被害的当天据说风雨大作，正在举行祭奠的太庙也"黄坛烛尽灭，不能成礼"。赵惇得到这一消息当即气得卧病在床。李凤娘又趁势将丈夫的另两个妃子——张贵妃和符婕妤赶出宫去，改嫁给平民。皇帝在和平时代被迫离婚恐怕也算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了。

气倒了自己的老公之后，李凤娘随即开始执掌朝政。不过李凤娘除了大肆追封自己的上三代为王，把自己家庙的卫戍部队数量增加到太庙之上。将自己的亲属、

部下甚至是李氏门客都提升为官员之外。倒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恶行。因此身为太上皇赵眘也只是出面劝说李凤娘对自己的老公好一点。当然口气颇为严厉："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但却不想引来了李凤娘一句："我与皇上是结发夫妻，名正言顺，又有何不可"的反击。



李凤娘虽然对赵昚曾经试图废黜自己的威胁怀恨在心，但是她再怎么蛮横也不能直接对自己的公公下手。不过李凤娘还是通过离间宋光宗赵惇来展开反击。应该说即位之初，赵惇对自己的父亲还是颇为孝顺的。他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四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父亲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赵惇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对此南宋政府朝野上下倒是颇为八卦的干涉其皇室的私生活来。有一次赵惇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宋高宗赵构在世时，赵昚凡出游，必恭请自己的养父同行，而现在赵惇却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要了独自出去游玩。

和讲究礼仪、看重孝道的大臣相比，后宫的太监却在李凤娘的授意下热衷于挑拨离间。有一次赵昚遣宦官赐玉杯给儿子赵惇，赵惇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赵昚心中自然不快。此后赵昚出游东园，按例赵惇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赵昚寄人篱下的处境。赵昚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

赵昚对自己儿子的诸多不孝虽然气愤，但是却依旧关心着赵惇的身体。某次赵昚求得一剂良药，准备在儿子前来朝见的时候给他，但是却被太监们曲解为："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李凤娘得知之后随即更加阻止自己的老公去朝见自己的父亲了。赵昚、赵惇父子失和，最终在1193年农历九月的重明节引发了朝臣们的大规模抗议。宰执、侍从，台谏三大系统连名请求赵惇去朝见自己的父亲。自称是东晋名臣谢安后裔的给事中谢深甫说得最为透彻，他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之爱陛下，亦犹陛下之爱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所谓的"嘉王"指的是赵惇的独子赵扩。以己度人的赵惇终于被感动了，准备带着百官去朝见自己的父亲。就在百官班列等待赵惇"驾朝"重华宫的时候，李凤娘突然挽留住了自己的老公，以"天寒，官家且饮酒"的名义将自己的丈夫留在了自己的宫中，对于这一情况百官和侍卫都"相顾莫敢言"。只有中书舍人陈傅良冲进去准备劝谏，结果被李凤娘一句："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个秀才不要

脑袋？”赶了出来。陈傅良随即就跪在宫门外大哭，李凤娘随即派人去询问原因。陈傅良回答说：“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事实上，宋光宗赵惇和自己父亲关系恶化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面对赵惇的种种不孝，赵昚有意让赵惇将帝位传给自己的侄子——赵恺之子嘉国公赵抦。对于这一点宋光宗赵惇夫妻当然无法接受，而李凤娘更执意当面要求宋孝宗赵昚立自己的儿子赵扩为太子，理由还是“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

公元1193年，长期心情抑郁的赵昚终于病倒了，但身为皇帝赵惇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宋孝宗赵昚心中充满了失望、忧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而太学生们听说赵惇竟然在父亲病危的情况下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大肆讽刺赵惇的不孝无德。而群臣更是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但赵惇依旧在下诏不准之余，漠视自己父亲的病情。

公元1193年农历六月，宋孝宗赵昚驾崩，赵惇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芍芬代其主丧。实际上，赵惇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自己的父亲，他不相信宋孝宗赵昚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因此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对于这种反常的举动，世人都认为他是“疯了”。而就是在赵惇不敢参加的葬礼之上。朝野的不满最终在太皇太后吴芍芬的主持下，最终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赶来参加自己祖父葬礼的嘉王赵扩被拥戴为帝。史称“绍熙内禅”。

赵扩继位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芍芬宣布让他即位时，他还没有心理准备，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吴芍芬随即急了，命令左右说：“拿皇袍来，由我亲自替他穿上。”赵扩又急忙拉住韩侂胄的手臂求助，还绕着殿柱躲避。吴芍芬最终不得不以太皇太后身份喝令赵扩站住，流着泪对他说：“大宋王朝延续到今天不容易，难道你忍心让它完结吗？”韩侂胄也在一旁百般劝说。见到自己曾祖母的决定已经不可改变，赵扩才穿上皇袍，叩谢了太皇太后吴芍芬之余，嘴里还喃喃自语：“使不得，使不得。”

宋宁宗赵扩即位之后，宋光宗赵惇与李凤娘随即升级为太上皇和太上皇后。这一结果虽然不是这对夫妻想要的，但也并非不能接受。不过宋光宗赵惇退休之后精

神状况便始终不太好。经常回忆起过去的种种，因此时而瞋骂，时而痛哭。李凤娘这个时候倒是显得温柔体贴。不过经常隐瞒外面的消息，不想让自己的老公再受刺激。但是当宋宁宗赵扩登基大典的鼓乐传来，宋光宗赵惇还是忍不住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李凤娘只好骗他说“市井为乐耳。”宋光宗赵惇这个时候长期的压制终于爆发了，愤怒地吼道：“你竟然在这个时候还骗我？”1200年，李凤娘和赵惇先后在孤寂和恐惧中死去。而继承皇位的赵扩日子也并不好过，曾长期受到赵眘打压的士大夫和宿将集团此刻正与宗室力量展开一场全面的撕咬。但比起蒙古草原之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南宋朝堂之上的党争只能算是死水微澜。

离开札木合的营地，驱逐了泰赤兀氏之后，铁木真基本已经控制了乞颜部的核心牧区。在部下“自发拥戴”之下，1189年铁木真自称蒙古乞颜部大汗。而为了维系与克烈部、札答阑部的关系，铁木真第一时间向脱斡邻勒和札木合通报了自己称汗的消息。脱斡邻勒没说什么，札木合却愤愤不平地表示：“当年铁木真与我住在一起没分离时，你们为什么不立其为汗？如今你们立他为汗，又在动什么念头呢？”随后假借告诫信使的口吻，警告铁木真说：“今汝等立吾安答为汗，其忠于所事，勿使疑汝等反复也。”至此铁木真与札木合的私人友谊算是走到了尽头。但对于铁木真而言，仍希望能竭力避免与札答阑的正面冲突，毕竟此时的他羽翼未丰，仍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

要为战争寻找借口，从来都不是难事。1191年，札木合以自己的部下给察儿为铁木真的部下所杀为由，纠集了十三部族联军向铁木真兴师问罪。应该说札木合的理由颇为牵强，给察儿之死完全是其越境盗马所致，纯属咎由自取。但这并不影响与铁木真家族有衅的乞颜部泰赤兀氏等部族踊跃加入札木合的联军。札木合虽然名义上得到了塔塔尔部的支持，但此次战役主要参战的各方仍以乞颜部氏族为主，因此可以视为乞颜部的内战。由于彼此之间沾亲带故，因此札木合的联军不乏铁木真的同情者，如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因此前迎娶了铁木真的妹妹帖木伦而暗中派人向铁木真通报了札木合军中的情况。而更多的乞颜部氏族，则选择了两头下注。如朵尔边部便分裂成两股，同时加入交战双方。而有趣的是铁木真的养父蒙力克此时选择了投靠札木合，与铁木真父子为敌。

札木合动员三万多骑兵，本意自然是效仿当年克烈—乞颜—札答阑三部联军一举重创蔑儿乞部的故事，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消灭铁木真。但铁木真由于事先从自己的妹夫手中获得了第一手的情报，因此一方面可以从容动员自己手中的全部战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容的选择战场。经过周密的考虑之后，铁木真选择主动迎击对手，将战场拟定在克鲁伦河上游的答阑·巴勒主惕地区。蒙古语中的“答阑”意为“七十”，“巴勒主惕”意为“沼泽地带”。从这一地名不难想见，该地区沼泽遍布，易守难攻。之所以挑选这样的战场，铁木真主要是考虑自己在悉数动员的情况下，也仅能出动13000骑的兵力，未及札木合联军的半数。因此在战略上采取主动的情况下，战术上则摆出被动防御的姿态。

虽然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秉承着“输人不输阵”的心理，铁木真将自己的部队也编组为13阵。因此“答阑·巴勒主惕之役”又被称为“十三翼之战”。但编制上的对等并不能改变兵力的不均。双方正式交兵之后，铁木真很快便意识到了强弱不敌的事实。被迫主动撤出战场，退守斡难河源头的哲列捏峡谷。而此举显然并非是慌不择路，而是铁木真早有计划地候着。依靠着答阑·巴勒主惕地区沼泽对蒙古骑兵部队的迟滞作用，铁木真所部从容的脱离战场，随后在哲列捏峡谷的入口据险而守。当然这次战略转移也并非全无损失，但远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而留给札木合的却是一个尴尬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蒙古骑兵利于野战却短于攻坚，何况其麾下的十三部联军各有统属，谁也不愿意牺牲自己去替别人冲开哲列捏峡的谷口。另一方面当时蒙古草原的经济形态也无法支持数万大军的长期集结和对峙。因此札木合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放弃对铁木真的围攻。

客观地说，札木合纠集十三部联军围攻铁木真的举措虽然最终没有功德圆满。但也多少确立了其乞颜部霸主的地位。札木合如果能够理性的处理自己同盟内部的分歧，耐心地利用铁木真一时雌服的机会，壮大自身的力量。在未来他与铁木真的角逐之中仍有很大机会。但其在回师途中劫掠乞颜部赤那思氏的领地，却最终将札木合推向了乞颜部公敌的深渊。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札木合弑俘》

作为蒙古乞颜部的一支，赤那思氏在“十三翼之战”中投效于铁木真的帐下，在会战中自族长察合安·兀阿以下被俘者甚多。对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本是札木合收买人心的大好时机。但未能歼灭铁木真的失望，令札木合选择支起七十口大锅，将赤那思氏的俘虏全部用煮杀的酷刑处死，将其族长察合安·兀阿的首领拖在自己的马后视众。作为一代霸主，札木合选择杀人立威本无可厚非。劫掠失败者的领地也是蒙古诸部“以杀戮为耕作”的风俗。但札木合选错了时机，更选错了方式。十三部联军此时本就对札木合的指挥有所指责，处决俘虏和赤那思氏那些微薄的战利品并不足以消弭同盟中的不满，反而加剧了诸部首领对札木合的不信任和恐惧。“十三翼之战”后，与赤那思氏沾亲带故的部族纷纷选择投靠铁木真。而一些原本依附札木合的铁木真亲属如蒙力克等更害怕打击报复，重新回到了铁木真的帐下。

后世对“十三翼之战”的评价，大多以铁木真虽败未败、札木合似胜非胜为结论。但事实上铁木真虽然战后招降纳叛，力量有所增长。但相较札木合的势力而言，仍力有不逮。毕竟札答阑部经历多年的营聚依旧是草原之上颇为强盛的势力，否则日后反铁木真联盟也不会再度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在其指挥之下，再度与铁木真激战连场。真正令铁木真逐渐扭转力量对比的并非是少数乞颜部族背弃札木

合的投效，而是一场与克烈部、金帝国联手剿灭塔塔尔部的战争。

《蒙古秘史》对这场战争的记述相对简单，只是说铁木真得知“汉地的金朝皇帝因为塔塔儿人蔑古真·薛兀勒图不顺服，命令军队前去征讨”。随后铁木真便派人联络克烈部酋长脱斡邻勒：“我们要去夹攻那杀害我们的父祖的塔塔儿人！请汗父快来吧！”似乎这场战争是铁木真所主导。而战争的进程也异常的顺利，乞颜—克烈部联军很快便攻破了塔塔尔的营地，将其酋长蔑古真·薛兀勒图斩首。乞颜、克烈两部瓜分了其部众，可谓皆大欢喜。但综合金帝国方面的史料来看，这场战争却远非那么简单。

蒙古诸部对金帝国北方边境的威胁在完颜雍执政的晚期便已日益凸显。但在金帝国史料中主要提及的并非被称为阻卜的塔塔尔部，而是乞颜部的分支——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之所以出现蒙古诸部纷纷南下的态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完颜雍执政时期，金帝国减少了对蒙古诸部武力征讨，导致其人口爆炸性增长，迫切需要更多的物资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金帝国的北方防线——界壕系统，在完颜雍执政时期本就未建设完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出现了界壕“为沙雪埋塞，不足为御”，边防部队因为“土瘠樵绝，于戍兵不便”而逐渐撤离的局面。面对名存实亡的金界壕防线，不仅北方的蒙古诸部可以轻易南下，原本内附的游牧部族也纷纷放弃了替金帝国戍边的职责，或率众北归、重回草原，或会合南下的蒙古诸部，当起了“带路党”。用金帝国官员董师中的话说：“南北两属部数十年捍边者，今为必里哥孛瓦（乞颜部合答斤氏酋长）诱胁，倾族随去，边境荡摇如此可虞。”

北部边境地区的动荡自然引起了金帝国中枢的重视，但是从1189年到1194年之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所造成的水患，严重地牵制了金帝国有限的国力。因此面对军方“北边屡有警，请出兵击之”的倡议，完颜璟只能无奈地回答：“今方南议塞河，而复用兵于北，可乎？”这一局面直到1193年，金帝国宗室完颜守贞出任相当于副总理的平章政事才得以改观。完颜守贞是昔日多次击败蒙古诸部的女真名将完颜希尹的孙子，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习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向完颜璟进言：“彼屡突轶吾圉，今一惩之，后当不复来。”并且提出“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也就是建议像完颜亮执政前那样对蒙古诸部采取越境打击的模式，才能维持金帝国北部边境的长治久安。

完颜守贞的意见得到了金帝国军中女真将帅的鼎力支持，毕竟和平是军人的坟墓，在完颜璟的汉化改革之中，诸多昔日以弓马立命的猛安谋克被迫读起了自己所

不擅长的四书五经。曾出任过国防部部长的太尉徒单克宁便曾警告完颜璟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而从辈分上来说徒单克宁是完颜希尹的外甥，完颜守贞要喊他一声"表哥"。但金帝国军方主战派的意见很快便被汉族士大夫反对声浪所淹没。而其中最为起劲的是御史中丞张万公。张万公身为言官，提反对意见虽是本分，但此公颇得完颜璟的信赖，因此他的一句"劳民非便"，很快便成为了百官的大合唱。不少非宗室的女真官员也随声附和。如翰林修撰移剌益，便以上书"反对用兵"为投名状，得到了兼任监察御史的差事。

完颜璟的瘦金体书法

金帝国中枢内的汉族官员之所以敢于如此胆壮心齐的和军方唱反调，除了吃准完颜璟痴迷儒家文化，不敢对其因言治罪之外。背后还有佞臣胥持国的授意和指挥。胥持国出身不高，在金帝国科举考试的系统中仅仅获得了相当于秀才的经童学籍。但他早年入宫侍奉完颜璟之父完颜允恭的饮食和太子仓库，因此算是完颜璟的潜邸之臣。完颜璟登基为帝后，他也自然平步青云。很快便从宫籍副监升任工部尚书，随即又成为了相当于副总理的参知政事。胥持国之所以如此受到完颜璟的青睐，除了久居太子宫中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其大走"夫人路线"，与完颜璟所

宠爱的妃子李师儿结成政治同盟。

李师儿出身同样微贱，由于家人犯罪才被没入宫籍。但李师儿相貌端庄，又兼天性聪慧。很快便在诸多宫女之中脱颖而出，登上了龙床。完颜璟的正室钦怀皇后去世后，李师儿虽因为出身汉族，无缘封后，但俨然已是后宫之主。虽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要谋求将来母仪天下的政治地位，李师儿还是需要在朝堂之上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外援。在相同的出身和政治诉求的牵引之下，胥持国和李师儿开始互为表里，筦擅朝政。时人讥讽其为“经童为相，监婢作妃”。

当然胥持国并非全无政治才干，也不是看不到蒙古诸部连年寇边的危害。但在其身边早已云集了一批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徒，其骨干被称为“胥门十哲”。与之相对应的，世人将云集于完颜守贞身边的政治团体，封为“冷岩十俊”。因此他频繁操纵朝议，驳斥完颜守贞的建议，明为政见不合，实为朋党之争。最终在胥持国长期对其所谓“交结近侍、密问皇上王妃起居，窥测上心、预图一逞”的诽谤声中，完颜守贞被外放出京。而恰恰在此时金帝国对蒙古诸部征讨的军事准备才悄然发动。

1194年农历二月，有宰臣请求撤退北边的屯驻军马，完颜璟不仅未予同意，还命令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等视察北疆屯驻军马，筹划防御措施。九月，又命令上京等九路以及诸群牧、乣军选择三万精锐，准备来春调发，并命诸路及顺从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年夏会师于临潢。由此可见完颜璟和胥持国之所以长期与完颜守贞等宗室宿将唱反调，无非是不希望对方专美于前而已。

金帝国对蒙古诸部的大规模攻势原定于1195年的夏季正式启动。但当年的农历正月，蒙古诸部联军已经率先发动进攻，围攻金帝国边陲重镇庆州（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身为金帝国东北路招讨副使的瑶里孛迭急忙率军驰援。但蒙古骑兵来去如风，瑶里孛迭的部队还未赶到，蒙古诸部联军便已经退回草原了。这次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显然更加坚定了完颜璟越境打击对手的决心。农历五月，完颜璟正式任命老将夹谷清臣以左丞相、枢密使的身份“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正式建立起前进指挥系统。

夹谷清臣经历了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三任统治者，参与过完颜雍的军事政变，平定过契丹牧民的起义，抵挡过南宋政府的“隆兴北伐”，可谓老于军旅。因此其在抵挡前线之后，并没有急于进军。而是不断派出斥候，侦查蒙古诸部的虚实。在确认了敌方的游牧区域之后，夹谷清臣挑选了8000骑兵，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和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轻装扑向对手，夹谷清臣自己统帅1万精兵跟随接应。夹谷清臣谋定后动，自然无往不利。当夹谷清臣所部主力抵达至哈拉哈河时，先锋移剌敏已经在栲栳泺一带连续攻破蒙古诸部14座营垒。

但是正面战场高歌猛进的同时，金帝国远征军却后院起火。导致这一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帝国先锋移剌敏在回师途中，被协同作战的塔塔尔部抢走了所获的“羊马资物”等战利品。对于塔塔尔部而言，这种瓜分战利品的行径本是草原部族之间的战争常态。但身为主帅的夹谷清臣却认为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径，有损金帝国的威名，随即派遣使者前往塔塔尔部交涉，在严厉谴责之余更要求对方吐出“违法所得”。夹谷清臣显然高估了自己和金帝国在对方心目中的威望，塔塔尔部不仅拒绝道歉，更鼓噪而起，一时之间临潢、泰州等地内附的游牧民族皆参与了叛乱，甚至对金帝国的后方基地——临潢府城展开了围攻。

由于主力已经悉数外出，留守后方的奚族将领伯德梅和尚只能带着少数卫士拼死逆袭。面对敌严阵以待的情况，梅和尚直捣其阵，杀伤甚众。但敌知孤军无继，聚兵围之。梅和尚度不能免，乃下马相背射，复杀百余人，矢尽犹以弓提击，最终为流矢所中，战死沙场。好在担任前锋右翼的完颜安国及时回援，才避免了临潢府城的失守。

综合夹谷清臣此战的情况来看，老将基本贯彻了自己“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

奇为正，故无往不克”的战术理解。但对于蒙古诸部的政治生态，夹谷清臣仍缺乏了解。以至于一场本可以轻松化解的“战利品风波”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完颜璟以“虽屡获捷，而贪小利，遂致北边不宁者数岁”为由将其罢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金帝国少数硕果仅存的宿将之一，夹谷清臣尚且老猫烧须，不免会令朝中诸将对远征蒙古产生忧虑和恐惧。正是担心这样的情绪会继续蔓延下去，完颜璟被迫派出位高权重的宗室贵胄完颜襄替代夹谷清臣坐镇临潢，继续主持对蒙古诸部的讨伐。而此时金帝国北境边防已经呈现进一步恶化的态势，除了原本驻守于金帝国北京大定府（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和临潢的乣军胡里部也加入了叛军的行列之外，金帝国西北路地区的游牧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因此完颜璟对完颜襄寄予厚望，除了给其“佩金牌，便宜从事”的特权之外，还特意“临宴慰遣，赐以貂裘、鞍山、细铠及战马”。



完颜襄的北伐可谓金帝国在北部边境最后的辉煌

完颜襄的从军经历与夹谷清臣相仿，23岁便在镇压契丹牧民起义中身先士卒，“论功为第一”。随后在与南宋交锋之中，又被主帅盛赞为：“克敌于不可胜之地，真天下英杰也。”因此在完颜雍执政时期，已经进拜为平章政事。完颜璟即位之时，更与太尉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张汝霖同为顾命大臣。虽然一度位极人臣，但完颜襄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新君即位必将改组内阁，自己身为宗室成员更无异于身处风口浪尖。于是早早地找了个借口就把自己外放了。完颜襄这种淡然的态度，果然消弭了完颜璟的不安。怀着“板荡思忠臣”的心理，再度请其出山。

完颜襄对金帝国北境的边防态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虽然“猛安谋克”的制度日益瓦解，金帝国只能采取招揽游牧民族内附的形式来对抗蒙古诸部的侵扰。完颜雍执政时期，金帝国政府内曾有人提出北方边防诸部族的节度使及其僚属多为乣军，时常私纵不法之徒，应该将乣军的指挥权移交女真族人，或者设立监军制度。对此完颜襄驳斥说：“北边虽无事，恒须经略之，若杜此门，其后有劳绩，何以处之？汉、唐初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正是秉承着这种用人不疑的态度，完颜襄很快便招降了啸聚北京、临潢之间的乣军胡里部，不仅打通了后方与前线的道路，更进一步加强了临潢突出部的兵力。

在保障了临潢这一前线枢纽万无一失之后，完颜襄首先选择了派兵攻占地处蒙古草原腹地的额吉淖尔湖。额吉淖尔湖不仅周边水草丰美，更是蒙古草原东部最大的天然盐池，所出产的“大青盐”不仅是上好的调味品，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完颜襄此举不仅有效的割裂了塔塔尔部与其他蒙古诸部的联系，更在经济上对草原牧民进行了堪称釜底抽薪的打击。但如此关键的战略节点，蒙古诸部不可能不出兵争夺。因此围绕着被称为“大盐泺”的额吉淖尔湖，金帝国远征军与蒙古诸部反复拉锯数月之久。而其中与金军缠斗最久的是与铁木真有着姻亲关系的弘吉剌部。



今天依旧是内蒙古重要食盐产地的额吉淖尔湖

地处乞颜与塔塔尔势力范围之间的弘吉剌部，之所以长期成为诸部求婚的香饽饽，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控制着额吉淖尔湖的食盐生产。此时被断了财路，自然怀着如父母被杀般的刻骨仇恨，全力与金帝国远征军厮杀，甚至击杀了金帝国群牧使移剌睹等人，一度占据了战场主动权。直到完颜安国指挥的金帝国野战军主力赶到，才最终被迫撤走。而完颜襄的战略计划虽然代价不菲，甚至一度受到了朝野的质疑，但效果却显而易见。一方面1196年农历正月，金帝国军队完成对额吉淖尔湖的控制后，形成了对塔塔尔部东、西夹击的局面，另一方面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很多原先与金帝国关系不睦的草原部落纷纷选择了投效帐前。铁木真所领导的乞颜部和脱斡邻勒所领导的克烈部，加入金帝国对塔塔尔部的战争，大体便在额吉淖尔湖易手之后。

从《金史》的相关记载来看，对塔塔尔部主力的决战，基本由金帝国野战军独立完成。1196年夏，完颜襄首先命完颜安国据守多泉子，扩张额吉淖尔湖地区前线基地的纵深。随后密令瑶里孛迭组成东路军由临潢一线出击，完颜襄自己则统率西路军从额吉淖尔湖地区展开夹击。完颜襄的原定计划，应该是通过瑶里孛迭的东路军逼迫塔塔尔部向西迁徙，然后再由自己的主力完成邀击和歼灭。但出乎意料的是

塔塔尔部并没有西迁，而是集中部族在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一线围攻瑶里孛迭所部。在对手的优势兵力的合围之下，瑶里孛迭左冲右突，激战三天仍无法突围，被迫向完颜襄求援。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完颜襄只能放弃“俟诸军集乃发”的原定战略，带领轻装部队“鸣鼓夜发”，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战场。完颜襄虽然用兵神速，在“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的情况下，打了塔塔尔部一个措手不及。但此战终究没有一举歼灭对手主力，仅仅是“获舆帐牛羊”而已。因此战后完颜襄仍不得不派出完颜安国等人继续追击塔塔尔部进入斡里札河（今蒙古国乌勒吉河）流域。而铁木真所倡导的乞颜—克烈部联军正是在此时加入了战团。

刚刚遭遇重创的塔塔尔部，此刻面对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局自然无力抵抗。因此乞颜—克烈部联军才轻松的攻破其营地，瓜分了其部众及牛羊马匹。塔塔尔部长期活跃于金蒙边境地区，雄厚的财力远非仍处于游牧经济的其他蒙古诸部所能比拟的。《蒙古秘史》中特意提到了此战之中铁木真所缴获的银摇车、东珠饰衾等珍宝。

对于诸多塔塔尔部俘虏，铁木真也并未赶尽杀绝，而是将其作为奴隶分给了自己的部众。其中铁木真的母亲分到了一个名为失吉忽秃忽的小男孩。而这并非是诃额仑首个来自敌对部落的奴隶。攻破篾儿乞部营地后铁木真送给母亲一个名叫古出的男孩，逼走泰赤兀氏后又送了一个名叫阔阔出的男孩。对于这些孩子，诃额仑并没有太多的门户之见，而是将其收为养子，希望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可以给铁木真“充当白天看望的眼睛，夜里听闻的耳朵”。

铁木真的举动从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堪称“抢男霸女”的恶霸行径。但在当时的草原生态之下，却是迅速融合各部族的最优选择。而由于有夹谷清臣此前逼反塔塔尔部的前车之鉴，完颜襄并没有向乞颜、克烈两部追讨本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只是含糊的用“（塔塔尔部）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来搪塞自己所获颇少的现实，同时将铁木真和脱斡邻勒率部助战的功劳上奏中枢。完颜襄一举荡平塔塔尔部的辉煌胜利，加上西北路几乎同时传来的捷报，令完颜璟龙心大悦。他加封铁木真为乣军招讨，而对脱斡邻勒则封以王号。从此之后脱斡邻勒便以王汗自居。

虽然在金帝国的册封中，铁木真较脱斡邻勒低了好几个档次。但这并不影响其心情。毕竟此次配合完颜襄讨伐塔塔尔部不仅颇多实惠。更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刚刚从斡里札河流域的战场回师，铁木真便以没有出兵助战和战时劫掠自己的营地为由，出兵攻打同为乞颜部的主儿乞氏。主儿乞氏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

黑所创立，一度在乞颜部内也是兵强马壮、不可一世，在出兵夹击塔塔尔部之前，铁木真对其一度颇为恭顺。但此时却能轻易将其消灭。如此之大的转变，除了铁木真所部是得胜之师，士气正旺外，可能还有着来自于金帝国的外部助力。毕竟内附的草原部族常常勾结金帝国边防军的统帅攻打自己的同胞。早在塔塔尔部灭亡之前，金帝国边防军将领完颜安国便曾遭遇过“欲立功以夸雄上国”的所谓塔塔尔邻部的邀请。而此后完颜安国在面对“诸部入贡”时，竟然能“一一呼其祖先弟侄名字以戒谕之”，可见金帝国边防军在纳入乣军系统的蒙古诸部的关系。

就在铁木真打着金帝国旗号，借助其粮草、兵器供给以吞并邻部之时。身为金帝国统治者的完颜璟却是昏招迭出，1197年农历九月，完颜璟急不可耐的从前线召回了功高震主的完颜襄，而就在他忙着以“亲举酒饮，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赐”来彰显君臣和谐之际，北方又传来“群牧契丹德寿、陀锁等据信州叛，伪建元曰身圣，众号数十万，远近震骇”的消息。无奈之下完颜璟只能再次请完颜襄出马平叛，不过这一次颇不放心的他还派出了自己的亲信汉臣胥持国以枢密副使的身份随行辅佐完颜襄。完颜襄此前便已经觉察到了契丹牧民有聚众起义的迹象，因此在大定府一线留驻了6000精兵，加上从临潢、咸平等地调拨的边防部队，契丹牧民的此次起义在完颜襄闲暇如平日的从容中便被镇压了。倒是养尊处优的胥持国受不了塞外的风寒，最终死于军中。

虽然以胥持国牵制完颜襄的企图以破产而告终，但这并不影响完颜璟架空这位老臣的全盘计划。就在完颜襄驻节大定府平叛的同时，完颜璟派出同为宗室成员的完颜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暗中着手接管北境边防军的指挥权。作为金帝国宗室中的少壮派完颜宗浩没有太过显著的军功背景，因此到任后不久就提出利用蒙古诸部“春暮马弱”之际一举扫荡弘吉剌部和乞颜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的计划。对此完颜襄并不赞成，他认为若攻破弘吉剌部，则乞颜部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但完颜璟此时正沉浸于在完颜宗浩“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乎”的高调中，根本听不见维持草原政治生态的正确建议。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金帝国再度大举北伐蒙古的同时，南宋政府内部也正在谋划着一举“克服中原”。

第三章　斡难河源

追亡逐北
——铁木真对乞颜诸氏的征讨和与克烈部联盟的决裂

1198年春季，完颜宗浩所统率的远征军再度深入蒙古草原。在弘吉剌部主动降服，乞颜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遭遇重创的情况下，金帝国的北方版图延伸到了极限。但如何消化这一胜利果实，却是摆在完颜璟面前现实的难题。完颜宗浩的北伐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其深入蒙古的劳师远征却给金帝国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令金帝国不得不以泛发纸币交钞来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转。因此对于完颜襄提出了“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的加强“界壕”系统的提议，朝野之上颇多反对意见。

对此完颜襄的解释是：“今天修筑国防工事虽然耗费百万贯，但一旦修筑完成，则可以巩固边防且减少边防驻军。半年就可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三百万贯；而且可以减少百姓转运军粮之苦，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过尽管完颜襄、完颜安国及其继任者独吉思忠采取了招募饥民、动用边防驻军等手段减少工程开支，但由于“界壕”系统最终未能阻挡蒙古铁骑的南下，因此后世不断有人将完颜襄所主持的这项国防工程视为金帝国衰弱的开端。但诚如王国维先生在《金界壕考》一文中所说的金朝修筑的界壕，与历代中原王朝修筑的长城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期望用庞大的国防工事将游牧民族挡在草原之上。“然使金之国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时，又非有强敌如成吉思汗，庸将如独吉思忠、完颜承裕，则界壕之筑，仍不失为边备之中下策，未可遽以成败论之也。”而令金帝国统治者所没有想到的是金界壕刚刚完工后不久便成为了铁木真的庇护所。

完颜宗浩的北伐不仅消灭了长期袭扰金帝国北境的强横，同时也替铁木真削弱了其东邻的劲敌。因此在金帝国埋头修筑界壕的同时，铁木真几乎马不停蹄的征讨敌对部族。他首先派遣其弟合撒儿率部奔袭试图南下牧马的蔑儿乞残部，随后又借口泰赤兀氏酋长塔而忽台收留蔑儿乞人，会合王汗脱斡邻勒麾下的克烈部大军循斡难河北上，与泰赤兀氏主力交锋于撒里川一线。泰赤兀氏在蒙古语中为“勇士”之意，其部族之中不乏能征善战之辈。因此铁木真所部便被逼的节节后退。但就在塔而忽台打算乘锐追击之时，却不料恰恰踏入了铁木真精心设下的陷阱。由铁木真麾

下木华黎、赤老温等四将统帅的伏兵首先从各个方向冲入战场，随后克烈部大军由南而北横扫战场，泰赤兀氏大败而走，至此一蹶不振。

撒里川之战中铁木真的胜利不仅宣告了蒙古草原上的争斗从传统的正面硬抗转化为了复杂的多兵团协同作战模式，更从一个侧面证明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的经营生聚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部族能够单独挑战铁木真与王汗脱斡邻勒所组成的“乞颜—克烈联盟”。有鉴于此，1201年敌对铁木真的蒙古诸部会盟于呼伦湖畔，拥立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为“诸部共主”，立誓共同讨伐铁木真与脱斡邻勒。札木合此次纠集的联军在部族数量上虽然少于“十三翼之战”，仅为12部。但其中既有蔑儿乞、塔塔尔这样昔日“五大兀鲁斯”的残部，也有新败于铁木真的泰赤兀氏。甚至独霸蒙古草原西部的乃蛮部也派出酋长拜不花之兄——不亦鲁黑汗领军前来助战。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完颜宗浩北伐中遭遇重创的弘吉剌部、乞颜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也加入了札木合的联军。因此王国维等史学家认为札木合此次所组建的联军“固对成吉思汗之同盟，亦对女真之同盟也”。如果说“十三翼之战”还是乞颜部内战的话，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蒙古草原之上反金势力与亲金势力的总决战。

各方史料虽然没有详细记述札木合此次12部联军的总兵力，但从铁木真得到内线所传来的情报后第一时间与克烈部会合，随即又不断派出斥候警戒对方的进军速度，最终不得不“移军入塞”退入金界壕防线躲避的情况来看，札木合联军应该拥有着相当大的兵力优势。而为了保障全军的安然撤退，铁木真和脱斡邻勒还各自挑选了精兵强将交由脱斡邻勒之子桑昆统率，担任全军后卫的任务。有趣的是，在《蒙古秘史》之中这支部队被称为“先锋”，由此可见“转进”一词古已有之。

在“乞颜—克烈”联军后卫部队“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的情况下，铁木真和脱斡邻勒所部主力得以安然的退入金界壕。在妥善安置了部族和辎重之后，铁木真和脱斡邻勒亲率主力与后卫部队会合，“倚阿兰塞为壁”依托金界壕防线继续阻击担任札木合联军的前锋乃蛮大军。但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这次阻击并不成功。“乞颜—克烈”联军被迫后退守金界壕以南60公里的莫尔根河南岸，而札木合联军趁势占据了莫尔根河之北制高点——辉腾山，从整个战略态势上来看札木合联军俨然处于优势。但恰恰就在此时，札木合联军突然分崩离析，全线崩溃了。

《蒙古秘史》对此事的解释是在决战前夜札木合军中有两位巫师自称可以兴风作雨，结果做法之后风雨是来了，但却逆行吹打札木合的军阵。札木合联军认为这是“天不佑己”的具体表现，于是不战自乱。气候条件对战争胜负自然有着一定的影

响。但一场盛夏季节的风雨便令数万蒙古骑兵全线崩溃显然并不合理，而从战后札木合联军“道经诸部之立己者，大纵掠而去”的表现来看，导致其在这场“阔亦田之战”中功败垂成的原因应该更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此时札木合联军已经进入了金帝国的领土，继续推进下去，能否歼灭铁木真尚属未知之数，但遭遇金帝国边防军打击的可能却是与日俱增，因此联军内部不免产生分歧，而远离自己的牧区上千公里，沿途没有获得任何缴获补充所造成的后勤压力也可想而知。因此已呈强弩之末态势的札木合联军才格外重视巫师所代表的上天庇佑。

面对全线崩溃的敌军，铁木真与脱斡邻勒决定分兵追击。铁木真将矛头对准同宗的泰赤兀氏，脱斡邻勒则负责掩杀札木合的札答阑部溃军。这场大规模的追击战一直从金帝国境内延伸到了斡难河畔。追亡逐北的战斗，对铁木真而言自然是所获颇丰，仅在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铁木真及木华黎等6名战将便击溃了泰赤兀氏300余骑，缴获战马百匹，铠甲50副。但这样的追击战也往往伴随着危险，铁木真本人在追击中也两次中箭，一次被射翻了自己心爱的白嘴黄马、另一次则被箭镞擦破了颈部动脉，险些丧命。但铁木真对此并不介意，反而将企图射杀自己的泰赤兀氏神箭手哲别收为部下。而在扫荡泰赤兀氏营地之时，铁木真还遇上了童年时救过自己的锁儿罕·失剌及其女合答安，对于这对救命恩人，铁木真无以为报，便将在战乱中失去丈夫的合答安收为妻子。

虽然没有生擒泰赤兀氏酋长塔而忽台，以报自己幼年身负木枷的屈辱。但吞并泰赤兀氏之后。铁木真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乞颜部可汗。本就摇摆不定的弘吉剌部、乞颜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随即投入了铁木真的麾下。而力量逐渐壮大的同时，铁木真也开始有意避免与脱斡邻勒再度会师。1202年秋，乞颜部与克烈部再度分兵，铁木真率部向东攻击塔塔尔部残军，脱斡邻勒则去找童年时掳走过自己的蔑儿乞人晦气。

在对塔塔尔部残余势力的扫荡之中，铁木真本人虽然笑纳了其也客扯连酋长膝下的一对姐妹花——也遂和也速干，并在也速干的建议下养了部落贵族后裔的两兄弟——忽里和哈喇蒙都。但对该部的成年男丁却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铁木真这样的举措绝非是为了报也速该当年为塔塔尔毒死的“杀父之仇”，而是因为此时乞颜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自身经济所能承受的顶点，因此在乞颜和克烈两部如草原豺狼般在昔日同列“五大兀鲁斯”的同僚僵尸上吃饱了的同时，其相互之间的撕咬也就难以避免了。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扫平塔塔尔部》

1202年冬，铁木真与脱斡邻勒最后一次联合作战，扫荡札木合麾下的残兵，随后向西追击乃蛮部的不亦鲁黑汗。依照谋主札木合的计划，这个冬天本应是反铁木真联盟休养生息的时机。等到来年春天再东西夹击“乞颜—克烈”联军，但铁木真抢先动手，首先在斡难河附近的沙漠中击败札木合所部，此战之中泰赤兀氏酋长塔而忽台被出身自己族内的铁木真部将赤老温所杀。塔而忽台临死前感叹：“我固当死，然为锁儿干失剌之子标枪中我，我死不甘心”。而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之中，札木合放弃了尊严投效于脱斡邻勒的麾下。由于此前便不再分割战利品，甚至相互招揽对方的人马，因此铁木真对于脱斡邻勒的行为只能装聋作哑。

盟军的崩溃，令乃蛮部的不亦鲁黑汗不得不在大雪的封锁下，强行翻越阿勒泰山西逃，最终为“乞颜—克烈”联军大败于索果克河流域。而为了追击对手，铁木真与脱斡邻勒率部也进入乃蛮的势力范围。不亦鲁黑汗的部队虽然被打垮，但乃蛮部依旧有着充裕的战力，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铁木真与脱斡邻勒心里都没有底。因此在札木合的煽动之下，脱斡邻勒竟率克烈部主力擅自脱离联军撤走了。童

年时曾被族人抛弃的阴影，令铁木真面对克烈部空无一人的营垒感叹昨日重现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残酷的草原之上从来没有永恒的友谊，唯有永恒的争斗。

不过令铁木真没有想到的是，率先撤军的脱斡邻勒竟然意外遭到了乃蛮部的伏击。不仅部众人马被掠走大半，连宝贝儿子桑昆都陷入了乃蛮部的合围之中。无奈之下脱斡邻勒只能向铁木真求援，希望其能派出被称为“四骏”的木华黎等勇将前去解围。铁木真虽然没有拒绝，并在解救克烈部之后与脱斡邻勒重订父子之约。但是很难想象铁木真这样的一代枭雄会真的相信那些空洞的誓约。1203年，在双方彼此的虚情假意和不信任中，年事已高的脱斡邻勒终于按捺不住，率先向乞颜部发动了突袭。

《蒙古秘史》对铁木真与脱斡邻勒交恶过程的描写犹如韩剧，札木合在克烈部内到处散布不利于铁木真的言论，老迈昏庸的脱斡邻勒和他的草包儿子桑昆则宛如牵线木偶。铁木真则一幅“义父虐我千百遍，我待义父如亲爹”的样子，险些踏入对方设下的圈套。但有趣的是在得到脱斡邻勒交付的全军指挥权之后，札木合却对自己的亲信说道：“王汗（脱斡邻勒）让我指挥这支军队，我（以前）与（铁木真）安答厮杀，（常）不能（胜他）。如今让我指挥这支军队，（可见）王汗还远不如我，他只是个平庸的伙伴。让人去给（铁木真）安答传话，安答你不用怕，但要谨慎！”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突袭克烈部》

事实证明脱斡邻勒之所以敢于主动进攻乞颜部，并非依仗克烈部的兵马，而是看准了刚刚归于统一乞颜部内的不和，以及自己在草原之上多年以来所建立的人脉和威名。铁木真在战场之上虽然击败了克烈部，但在包括自己弟弟合撒儿在内诸多部族的背叛中，却不得不带着1300骑人马逃往弘吉剌部。不过跌入事业低谷的铁木真倒没有陷入绝望，因为他深知克烈部对叛降的乞颜部贵族绝无善意，而克烈部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果然1203年夏季，铁木真之弟合撒儿被脱斡邻勒剥夺了部属和财产，只能只身投奔铁木真。在获知了乞颜部贵族纷纷被脱斡邻勒逼走，克烈部内防御松懈的消息后，铁木真果断率军突袭了脱斡邻勒的主营。在一场持续三天的攻防战后，克烈部主营向铁木真开门投降。脱斡邻勒西逃乃蛮，为其边防哨卡所杀。其子桑昆流亡于多年之后，最终也为部下捕获斩首。至此蒙古草原之上五强并立的局面，只剩下乞颜与乃蛮东西对峙。而这场决定谁将主宰蒙古诸部命运的决战随着一场乃蛮宫廷的闹剧即将到来。

乃蛮部西临咸海，东跨阿勒泰山，南接西辽，北越唐努山。大体占据了今天蒙古国西部近一半的国土及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地区。仅从所控制的面积来看便与此时铁木真所领导的蒙古乞颜部不相上下。而早已广泛使用畏兀儿文字，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政治举措更令乃蛮部在文化程度及综合实力上远胜于其他蒙古部族。或许正因为这份国力的骄傲，历代乃蛮酋长以金帝国所赐封王位音译“塔阳”自居。汉族典籍进一步将其写为“太阳汗”。但自上任“太阳汗”亦难赤死后，乃蛮部便陷入了分裂之中，其次子拜不花继承了“太阳汗”之名和乃蛮本部，而亦难赤的长子不亦鲁黑汗则率众盘踞阿勒泰山以东，自成一支。

关于乃蛮部的这次分裂，后世的史学家根据一些“宫廷八卦”将一位乃蛮的“名女人”牵扯了进来。认为导致不亦鲁黑和拜不花不和的原因，除了大汗的宝座之外还为了争夺自己父亲美艳的妃子——古儿别速。分裂之后的乃蛮部力量被明显的削弱，但角逐汗位失败的不亦鲁黑汗所部的实力依旧足以令铁木真一度不得不退守金界壕躲避其所加入的札木合联军。而在铁木真击败不亦鲁黑汗，将乃蛮部的势力范围一度压缩到阿勒泰山以西的地区后。坐拥乃蛮本部的拜不花所部依旧拥有着不俗的战斗力。只是派出老将可克薛兀所率领的一支偏师，乃蛮部便一度令草原强者——脱斡邻勒所领导的克烈部损失大半的部众，如果不是铁木真不计前嫌的派出木华黎等“四骏”前往支援，或许不用铁木真出手，克烈部便将一蹶不振。

为了解释如此强大的乃蛮部最终的败亡，《蒙古秘史》中让古儿别速始终扮演着一个不识大体的“傻老娘们”的角色。她先是让自己的第二任老公拜不花取来死于乃蛮边防军之手脱斡邻勒的首级，以“验明正身”。在确认是昔日克烈部酋长本尊之后，又将首级盛于盒中，置于帐中大白毡上，命乐师奏哀乐，亲自把酒祭祀。这种前倨后恭的做法既是对死者的侮辱，同时更令乃蛮部的大臣们寒心。或许是觉得自己的境遇过于黑色幽默，连已经死去的脱斡邻勒也“露出了笑容”。这种超自然的反应令拜不花当场崩溃，他飞起一脚将王罕的首级踩碎，随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君王气概，他决定亲自领军去会一会铁木真。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杭爱山之战》

《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这则故事显然有其深意。铁木真灭亡克烈部之后，蒙古诸部争雄的失业者们如札木合、蔑儿乞部酋长脱黑脱阿等纷纷西逃，混迹于拜不花的帐下。而乃蛮部更以早年与克烈部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布克烈部的牧场为其固有领土。正是出于招降纳叛的目的，拜不花才公然在自己的大帐之中上演了这场拜祭脱斡邻勒的闹剧。但大量逃亡的蒙古诸部贵族加入乃蛮部又冲击了其原有的政治秩序，因此曾击败过克烈部的老将可克薛兀等人当面讥笑拜不花懦弱无能。

这个时候古儿别速再度出场说出了足以转折她人生的一句名言："蒙古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他们浑身都是膻味，衣服油污，我们打他们干什么？倒是可抓些略微长得清秀些的蒙古女子来，给我乃蛮勇士做女奴，先教她们学会洗手洗脚，然后干些挤羊奶的差事。"古儿别速的这些话或许是为了缓和一下拜不花与部领之间紧张的气氛。而老将可克薛兀也自觉失言，但已经深受刺激的"太阳汗"还是毅然决定出兵征讨乞颜部。

从战略态势上看，乃蛮部此时已经恢复了阿勒泰山一线的防御体系。而且由于不亦鲁黑汗此前的兵败，乃蛮本部的势力大肆东扩，其哨卡线已经深入了原克烈部的牧区。刚刚经历连场大战的铁木真不敢与其正面交锋，只能向东退守乞颜部核心牧区——斡难河流域，以待休养生息。如果"太阳汗"拜不花有足够的耐心，利用自身"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通过不断出兵袭扰的方式蚕食地处蒙古草原西部的克烈部牧场，打击乞颜部的经济，逼迫铁木真先行出兵阿勒泰山以西，在乃蛮部本土与之交战的话，那么鹿死谁手或许还犹未可知。但他在凭怒兴兵之余，又找错了盟友，竟然派人去联络已经内附金帝国的汪古部，希望与其东西夹击铁木真。

汪古部在血统上虽然与乃蛮部同为突厥后裔，但此时在经济和政治上却早已与金帝国同化，自然不会与乃蛮部一共进攻同为乣军系统的铁木真。因此乃蛮部即将出兵的消息不仅被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转手“卖给”了乞颜部，铁木真还以“马五百、羊一千”的价格收买了阿剌兀思剔吉忽所部汪古部精兵加入其对抗乃蛮部的大军。在重金招揽“雇佣军”的同时，铁木真还对自己的部众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整编”。所有归入乞颜部麾下的草原各部统一以千户为单位进行编组，设立千户长、百户长和十户长三个军政合一的管理系统。同时选调能征惯战的1000名勇士作为铁木真的亲兵宿卫拱卫中枢。

在完成了部众的整编之后，1204年农历四月十六日，铁木真祭旗出征。全军分为六部，以哲别、忽必来所部第一军为前锋，乞颜部大军溯克鲁伦河而上，与乃蛮部大军对峙于杭爱山下。此时乃蛮部大军不仅占据了杭爱山的制高点，形成以逸待劳之势。兵力上更占据优势。但劳师远征的“太阳汗”拜不花此时却摇摆不定起来。最终为铁木真的心理战所打败。

由于战役发生在春季，蒙古骑兵的战马大多瘦弱。因此当在前哨战中被乃蛮军夺去一匹战马之后，铁木真立即命令自己的部下在晚上宿营的过程中每人点上五堆篝火。果然面对满山遍野的篝火，身为联军统帅的“太阳汗”拜不花误认为铁木真的大军数量庞大，随即派人通知其担任前锋的长子屈出律，提出要退回阿勒泰山地区再战。应该说拜不花的选择在战略可谓最优。但此时两军已经形成对峙，乃蛮部大军再无可能从容后撤。因此他的长子屈出律随即对自己的父亲抱怨道：“你就像女人一样无用，你就像老鼠一样胆小！”而其他乃蛮部的宿将也对自己的主帅表示不满：“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敌人看到过他的后背，他的战马从来没有后退过半步！早知道你这样胆小，还不如让你的古儿别速来指挥军队！”

“太阳汗”拜不花虽然在儿子和部下们的讥讽声中不得不整军出战，但是偏偏他身边的高参扎木合不停地替自己安答铁木真的军队大吹法螺。札木合倒不是有意替铁木真张目，他起初只是向拜不花献媚，说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但身为“太阳汗”的拜不花轻视这些铁木真的手下败将，斥责札木合及蔑儿乞部酋长脱黑脱阿等人软弱无能才致今日的局面。于是恼羞成怒之下，札木合将铁木真及其麾下诸将描述成了天神下凡。甚至连铁木真的幼弟铁木格斡赤斤这样“早睡晚起”的“懒羊羊”也被说成是打起仗来不甘于人后的勇将。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脱黑脱阿等人也随声附和。

这些人众口一词的夸大宣传加上杭爱山下那多如繁星的营火，最终令乃蛮大军在初战失利后失去了主动进攻的勇气，全军龟缩于杭爱山麓地区。而此时札木合竟再度派出亲信向铁木真报告了乃蛮军中的虚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札木合流亡克烈、乃蛮两部时的举动都更像是铁木真布在敌营之中的“暗桩”。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创业失败的札木合从未调整过自己的心态，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用别人的失败来证明自己并非无能。

乃蛮部占据着兵力和战马肥壮的双重优势，但一旦转化为山地攻防战，这些优势便荡然无存。1204年农历七月一日，铁木真延展自己的战线，在中央突破的同时，从左右两翼挤压乃蛮部的防线。被赶上山后的乃蛮大军彻底失去了斗志，在盲目突围的过程中，自相践踏、坠入山谷所造成的伤亡远超过战场上的损失，竟真的出现了铁木真战前所宣称的 “人多的损失多，人少的损失少”的奇迹。不过当乃蛮部可克薛兀等老将们在身负重伤的太阳汗拜不花面前以“在我们看到他死去前，让我们在他面前厮杀吧，让他看到我们战死吧”的决心发动自杀式冲锋时，王子屈出律却仓皇而逃。知子莫如父，早在战前面对儿子的嘲讽，“太阳汗”拜不花就曾经说过：“骄狂自大的屈出律，只怕和敌人交战的时候，最先逃跑就是你。希望你能够把你身上的狂气，用到敌人身上！”



今天蒙古国插画家笔下的铁木真麾下战将

屈出律率领乃蛮残部及札木合等蒙古诸部亲贵仓皇而逃之时，铁木真已经从容的开始分配战利品了。面对被俘的乃蛮王妃古儿别速，铁木真别有用心地将这个女人的名言告诉自己的部下，并表示要找一个膻味最重的好汉让这个女人好好尝尝一下蒙古男人的味道。大家于是心领神会的表示大汗膻味最重。不过铁木真似乎也很欣赏古儿别速的美色，承诺："只要你乐意陪我，用心侍奉我，又不惹是生非，我不会抛弃你的，还会封你当王后的"。应该说铁木真基本遵循了自己的诺言，但是古儿别速却似乎没有"不惹是生非"的习惯，据说在铁木真的晚年她曾红杏出墙。不过这一事件虽然被铁木真发现了，但却没有给予追究。因此就有好事者猜测，这对夫妻之间的"第三者"就是铁木真的二子——察合台。



乃蛮部溃不成军

而在下令所部大军分头展开追击的过程中，铁木真还笑纳了另一位美女——来自世仇蔑儿乞部的忽兰，忽兰的父亲答亦儿兀孙酋长曾经参与过抢走铁木真新婚妻子孛儿帖的行动。虽然有没有从中"得利"不得而知，但是在与铁木真长期的战争中

跟着倒了霉却是肯定的。在乃蛮大军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答亦儿兀孙酋长失去了继续逃亡的信心。在他看来自己和铁木真之间因为女人而结下的梁子或许也能用女人来解决，他脱离了蔑儿乞部渡河继续向西溃逃的队伍，准备将自己的女儿——蒙古草原有名的美少女——忽兰献给铁木真。

不过答亦儿兀孙第一时间撞上的不是铁木真本人，而是他麾下和哲别一样来自泰赤兀氏的勇将纳牙阿。应该说在当时弱肉强食的蒙古草原之上纳牙阿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圣贤，但至少是一位颇有骑士风度的将领。在护送忽兰之前，他便曾拼死保护过自己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少年时代的死敌——塔里忽台突围，尽管他本人不齿塔里忽台的种种行为。而真是这份忠于故主的忠诚，使得铁木真不仅接纳了纳牙阿并一直对他委以重任。

纳牙阿虽然接纳了这对父女和他们的族人，但是等到他将忽兰送到铁木真的营帐之时，却险些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很难理解新婚不久就戴了几年“绿帽子”的铁木真此时为什么要对忽兰和纳牙阿大吃其醋。除了忽兰也许长得的确不错之外，纳牙阿号称能“倒拖牛车”的强壮估计也是铁木真对他护送忽兰返回的一路之上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浮想联翩的原因。不过忽兰却对纳牙阿交口称赞，说自己一路之上不断的遭遇被击溃的散兵游勇。纳牙阿将他们父女安置在自己营帐之内才保护了他们的周全。当然对于自己和纳牙阿之间的“清白”，忽兰最终还是表示铁木真“一试便知”。最终险些被治罪的纳牙阿随着铁木真在春风一度后获得满意之中被无罪释放，而忽兰也因为铁木真的宠爱而成为第二斡儿朵（蒙古语：行帐、宫殿）之首。地位仅次于主持第一斡儿朵的正室孛儿帖。

忽兰成为了铁木真的妻子，但是他的父亲答亦儿兀孙却在铁木真继续向西追击的过程之中在后方发动了叛乱。这位国丈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铤而走险，同样没有答案。或许这就是铁木真统一之前的蒙古草原生态——部族仇恨要远远高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过答亦儿兀孙所领导的蔑儿乞部此刻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铁木真的少数留守部队便将他们再度击溃。关于答亦儿兀孙最终的归宿，历史学家众说纷纭，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答亦儿兀孙是铁木真后来所册封的九十五千户中的答亦儿千户。理由是从个人情感上，铁木真宠爱忽兰，自然不免爱屋及乌赦免自己的岳父，而从政治上考量，蔑儿乞人的各大部族虽然相继被灭，但是其族人在草原上是一股潜在的力量，由答亦儿兀孙作为代表人物，也可以起到安抚的作用。

对于答亦儿兀孙的宽容并不代表铁木真原谅了所有的蔑儿乞人，对于曾经突袭

过自己新房的篾尔乞部首领脱黑脱阿和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对派去追击的速不台下达了死命令：“他们失败之后逃走，和带套杆的野马或中箭的鹿一样。捉住他们，如果他们飞上天去，你就做鹰隼。如果他们藏在地下和雪猪一样，你就用铁锹掘他们。如果他们变成鱼，用网捞他们。越高山，涉大河，趁现在马还未瘦的时候。要爱惜士卒。不可轻易围猎。马具不要伤马。若有违反号令的人，是我认得的，便拿将来，不是我认得的，就在那里正典刑。”

速不台最终在名为吹河的水系一举擒获了篾儿乞惕部的残余，不过铁木真的仇敌脱黑脱阿已经在逃亡的过程中消逝了。被速不台俘虏的是他的小儿子——墨尔根。据说墨尔根擅长射箭，当速不台把他押到铁木真长子术赤的军前时，术赤曾亲自考较过这小子的箭法。果然墨尔根在第一箭正中靶心情况下，还可以用第二箭将第一箭从中劈开，可以说是神乎其技。术赤不知道是爱惜这个人才，还是因为他本人和篾儿乞惕部的那份说不明、道不清的香火之情。总之，术赤在自己的父亲铁木真面前为墨尔根求情。但是铁木真却冷酷地表示：“篾尔乞部是我的死敌。这小子还那么擅长射箭，将来一定是后患。”随即将墨尔根处死。

与墨尔根同时处死的还有一代枭雄札木合。随着杭爱山之战乃蛮大军的崩溃，众叛亲离的札木合躲进了科布多湖泊附近的山林之中，虽然他本人对于狩猎和流亡的生活还能忍受，但是他的部下却心怀怨恨，将他用绳子牢牢捆住，押送到了铁木真的面前。在自己的安答面前，札木合依旧一幅平起平坐的派头，他说：“卑微的乌鸦竞捕捉高大的野鸭，下贱的奴隶竟擒拿其主子。呵，我汗安答，汝怎可容此等卑劣之徒效命于汝之帐前？”此时已经定鼎草原的铁木真自然不需要在扎木合的随从身上再玩什么“千金买骨”的小把戏，当即表示：“此等侵犯其主子的奴隶，怎可免他一死？此等卖主求荣之辈，能得到谁的信任？这等小人，应连同其子孙以及其子孙之子孙，统统斩首！”

面对与“三结安答”的老朋友，铁木真虽然也想下手。但是按照一般的江湖道义，他还是要客气几句。他说：“当初，我二人亲密无间，犹如一车之二辕而不可分也。嗣后，汝忽生离退之心，弃我而去。所幸者，汝今已归来矣。我切望我二人重归于好，相伴如初。”这番肉麻的话对于札木合而言只能算是临终关怀。因此这位口才不错的枭雄回答说：“天命有归于安答，安答得天而独厚，故处处占我先也。呵，安答！此时此刻，汝应摆脱似我这等包袱和刺头，如此，汝心方可安矣。”札木合越是从容，铁木真反而越难下手，只能把他交给自己的侄子按赤台。之所以这么安

排，可能是出于按赤台年纪比较小，较之铁木真的几位兄弟和麾下的将领面对札木合时没什么心理负担。最终扎木合被装入麻袋中窒息而死，也算是替“十三翼战役”之后死在其酷刑下的冤魂报了仇。

不断的手刃仇寇的同时，铁木真麾下的大军也顺势扫荡了阿勒泰山东西两翼的乃蛮部牧区。长期臣服于乃蛮部的葛逻禄等畏兀儿部族趁势揭竿而起。一度与其伯父不亦鲁黑汗联手试图复兴乃蛮的王子屈出律无法立足，只能选择继续向西逃入西辽的领土。由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王国也被西方和穆斯林史料称为“哈喇契丹”。在耶律大石时代西辽王国迅速崛起，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和又被称为“葱岭西回鹘”的喀喇汗王国，击溃疆域辽阔的塞尔柱帝国的干涉军。连中亚古国——花剌子模也一度成为了其附庸。不过耶律大石死后，西辽王国内部政局动荡，到耶律大石的孙子耶律直鲁古继的手中，显赫一时的西辽王国已经呈现衰弱的趋势。花剌子模王国在苏丹摩诃末的领导之下率先摆脱了西辽的控制，随后喀喇汗王国和高昌回鹘也蠢蠢欲动。恰逢大批乃蛮等草原部落的难民和溃军开始向西迁徙。为了招揽这股力量，西辽国王耶律直鲁古继随即接纳了前来投靠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

抵达西辽之后的屈出律很快便利用国王耶律直鲁古继对他的信任，提出：“我离开自己的部落和人民已经很久了，听说部众和军队流散在叶密立、海押立和别失八里一带，如果他们知道我还活着，都会聚集起来抗击敌人，请让我去召集他们。我只要是活着，就一定忠诚于你。”耶律直鲁古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抱负，不仅同意提供支持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屈出律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也放弃原先的景教信仰，皈依佛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屈出律可以算是一个“坑爹专业户”。他在归收集旧众之后，随即投身于西辽与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不过不是为自己的岳父作战，而是联合苏丹摩诃末东西夹击耶律直鲁古觉。最终在屈出律的压力之下，耶律直鲁古觉只能被迫将自己“升级”为太上皇，把西辽王国交给自己的女婿继续打理。屈出律此时倒似乎孝顺了起来，根据元帝国所编撰的《辽史》中的说法，屈出律对耶律直鲁古觉“朝夕问起居”，不过相信他想知道的是这个老头子是不是在进行对自己不利的活动以及什么时候死。果然两年之后耶律直鲁古觉“因病”去世了。

屈出律对自己岳父的承诺是假的，但对神的信仰却是真的。他执政之后随即要求西辽国内的所有穆斯林都改信佛教。为了推行自己的信仰，他甚至不惜在攻下喀喇汗王国的过程中将重镇可失哈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所有的伊斯兰

教神职人员统统赶到郊外。当地教牧——大伊玛木阿老丁大胆上前与这个暴君辩论，却被活活钉死在清真寺的大木门上。而为了监督和控制国民，屈出律甚至将自己的乃蛮士兵派到每户居民的家中居住。对此当地的穆斯林纷纷诅咒屈出律。 “全知的主啊，你大发慈悲，把他投入海中直到淹死。”从某种意思上来说，他们的诅咒灵验了，因为铁木真不久之后自称的“成吉思汗”据说就有“大海”的意思。

屈出律篡夺西辽王位除了引起本部民众的不满之外，耶律大石所征服的高昌回鹘长期积累的独立诉求也出现了井喷的现象。当地的封建领主阿儿思兰汗等人杀死了西辽王国在当地所派驻的少监。不过高昌回鹘地处蒙古与西辽之间，其宣布独立之时铁木真的“四狗”之一忽必来正在附近扫荡乃蛮余部。面对着东西两大强敌，高昌回鹘的领导者阿儿思兰汗理智地选择了向新兴的蒙古帝国靠拢。不过控制了高昌回鹘之后，铁木真并不急于向西进军。此时的他忙于消化辽阔的占领区的同时，正不断地向南北两个方向派出使者，以招降纳叛的罪名问责生活于蒙古草原北方西伯利亚地区的“林中百姓”吉利吉思部及南方的吐蕃政权。

吉利吉思部以渔猎为生，无论是部族经济还是武器装备均无法与铁木真正面抗衡，只能乖乖的选择臣服。但吐蕃方面虽然自唐末陷入部族分裂以来便国力日衰，但活跃于青海、甘肃一线的青唐唃厮啰政权坐收河湟地区和西南茶马的经济收益，吸收唐、宋时代遗留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虽然内部派系重重但依旧足以蔑视新近崛起的铁木真。在吐蕃诸部拒绝降服的情况之下，铁木真开始找起了与吐蕃唇齿相依的西夏王国晦气。

1205年，蒙古骑兵以追击乃蛮败兵的名义攻破西夏国境要塞——吉里寨，此时的西夏国王李纯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已有百年不曾参与战争，于是选择了敛兵守城。蒙古大军在野外的一番劫掠也草草结束了这次对西夏王国攻略的试水。应该说依旧身兼金帝国乣军招讨的铁木真侵攻西夏，已经清晰的表达了其脱离金帝国系统，介入中原纷争的野心。可惜的是此时的完颜璟正忙于应对南宋方面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无心过问这场发生在西线的边境战争。

1205年，南宋政府改元“开禧”。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很快便引起了金帝国上层人士的注意。深谙儒家文化、曾担任过完颜璟汉文老师的宗室成员完颜匡在朝野上下一片“宋败衄之馀，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的鸽派言论中，忧心忡忡地表示：“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完颜匡口中的所谓“忠义保捷军”其实指的是最早设立于南宋荆湖军区的两支部队——孟宗政的保捷军和陈祥的忠义军。虽然均为不属于南宋政府军系统的民兵武装，但由于其成员多为侨居南方的中原百姓，因此光复国土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

事实上南宋政府的战争准备最迟不远于1203年便已悄然展开。这一年主持四川军区的兴州都统郭杲病死任上，作为南宋郭氏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郭杲与其兄郭棣、其弟郭果均不曾建功于沙场，但长期担任禁卫军指挥官——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要缺依旧给了这个家族极大的政治红利。特别是郭杲在逼迫宋光宗赵惇退位的“绍熙内禅”中的表现，更无形之中促成了赵汝愚、韩侂胄两位权臣的崛起。

最早提出由时任嘉王的赵扩代替自己的父亲宋光宗赵惇执政的是左丞相留正，作为深受宋孝宗、宋光宗两代君皇所信任的老臣子，留正并没有想要以剧烈的政变手段来逼迫赵惇退位，只是希望赵惇能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此后光宗如想退位，才由太子赵扩即位。但身为留正副手的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愿意立赵扩为太子，都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孝宗丧礼，直接推举嘉王赵扩即位。这种形同政变的行为当然需要禁卫军的武力支持。于是在留正装病、乘肩舆出城避祸的情况下，赵汝愚连续派人与殿帅郭杲串联。同时密会与太皇太后吴芍芬关系密切的外戚韩侂胄请其下懿旨，赋予此次政变以合法性。



权倾一时的赵汝愚

可以说赵汝愚策划的宫廷政变，是通过郭杲、韩侂胄两人的鼎力支持才能完成的，因此两人都希望以“定策”之功得以晋升。而政变顺利完成后，郭杲虽然以拥戴功，先后除武康军节度使、最终升任太尉。但赵汝愚对韩侂胄却只给了一个遥郡防御使的外职。对于自己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赵汝愚竟然还能恬不知耻地对韩侂胄表示：“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如果赵汝愚自己也急流勇退的话，韩侂胄或许还无话可说，但偏偏在演足了三辞而受的戏码之后，赵汝愚成功地从枢密院知事爬上了右丞相的高位，由于位居其上的左丞相依旧是“绍熙内禅”中临阵脱逃的留正，因此赵汝愚在南宋政府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度乾纲独断，大肆招揽与之关系不错的理学大儒朱熹、黄裳、彭龟年等人为羽翼，隐然有架空新君赵扩的趋势。

赵扩虽然年轻，但却城府极深、少年老成，按照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的说法，赵扩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他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但却从不咨访询问，无非听听而已。但如果就此认为赵扩安于做一个“橡皮图章”却大错特错了。面对赵汝愚一党独大的局面，赵扩早已开始暗中部署反击。他首先册立韩侂胄的侄女为后，进一步巩固了韩侂胄的外戚地位。面对韩侂胄逐渐重返中枢的种种迹象，显然引起了赵汝愚的警惕，皇帝召见自己的亲戚本就无可厚非，但是其试图通过朱熹、彭龟年等弹劾韩侂胄的努力，却被对方轻松的化解了。抓住朱熹等人好面子的特点，韩侂胄故意安排优伶穿着峨冠阔袖，扮演儒生在皇帝面前表现喜剧，不堪其辱的朱熹和彭龟年随即先后请辞，被外放为地方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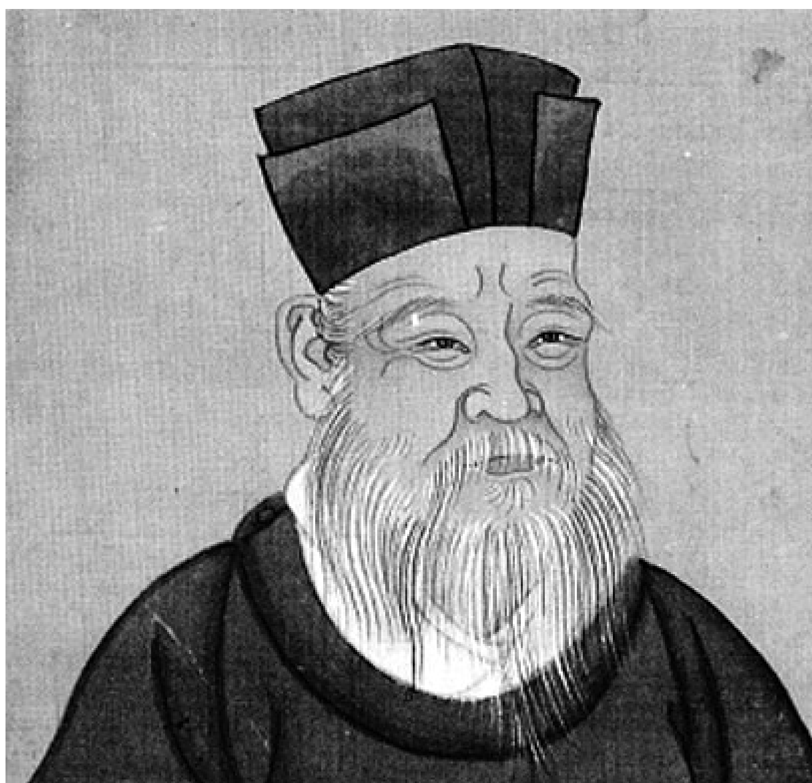


宋宁宗赵扩

赵汝愚和韩侂胄势不两立的局面，被名为刘弼的一位南宋政府官员看在眼里，他向韩侂胄进言说：“赵相欲专大功，君岂惟不得节度，将恐不免岭海之行矣。”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韩侂胄不能掌握军权，那么早晚会被政敌流放。韩侂胄虽然身为武职，但在军中并无根基，于是只能询问刘弼有无破解的方法。刘弼此时才缓缓说

出自己的腹案：“惟有用台谏尔。”的确朝堂相争本来就是舆论战，谁掌握了言官系统谁便可能成为胜利者。按照刘弼的思路，韩侂胄很快便通过赵扩在御史系统中安插自己的心腹。

抓住得意忘形的赵汝愚，曾在“绍熙内禅”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的把柄，1195年韩侂胄在朝野之上部署了对赵汝愚的全线弹劾，以“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等罪名罢免了赵汝愚。一年之后被一路降职的赵汝愚病死于贬途之中。而秉着除恶务尽的态度，韩侂胄还利用儒生内部对朱熹学术系统的不满，对其人格进行诋毁，将其所创建的“理学”定为伪学，其门生弟子系数不能参与公务员考试，史称“庆元党禁”。



“低头认罪”的教育家——朱熹

此时已经身为平章政事的韩侂胄自然不会亲自出动打击朱熹，对朱熹的全面讨伐由监察御史沈继祖来全力推行，沈继祖罗列了朱熹的“十罪”请求政府判处朱熹死刑。不过沈继祖虽然来势汹汹，但其罗织罪名的能力却实在太差。他所列的朱熹第

一大罪是“不孝”，但理由是朱熹作为儿子，父母还在的时候，福建建宁的米白，是全省最好的大米，而朱熹却不用最好的大米来供养母亲，每天用仓米，也就是普通大米食之。以这样的罪名开场，剩下的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随后说朱熹“不忠于国”，是因为宋孝宗死了，有人说应葬于会稽，朱熹却说应改卜他处。朱熹“玩侮朝廷”是因为他老是辞职。

沈继祖十大罪中最为劲爆的就是对朱熹“糜烂”私生活的“无情揭露”。朱熹不仅“娶刘珙之女，得身后巨万之财”。更“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最为八卦的则是“冢妇不夫而自孕”。“冢妇不夫而自孕”说得是朱熹的儿子死了之后，他的媳妇竟然怀上了身孕。这种别人家的私事本不能作为罪名。但是由于朱熹这位老夫子向来道貌岸然，之前还在台州整肃官场时逮捕过名妓严蕊，于是乎朱熹“爬灰”之说也就甚嚣尘上了。

对于以上的种种指控，朱熹的态度竟然是照单全收，表示上表认罪说“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且还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俨然一幅低头认罪的“臭老九”形象。有意思的是据说沈继祖攻击朱熹的文字是由朱熹曾经的学生胡纮操刀的。胡纮在正史中的描述是“博学强记，才华出众”。但是他拜在朱熹门下之后却很快便逃学了，而理由不是不接受朱熹的理学，而是因为朱熹对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只给一碗“脱粟饭”。胡纮于是便对别人说：“买只鸡再打点酒，就算是山里也不难办到吧！朱老头不讲人情啊！”他追随韩侂胄后得以进升，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

朱熹在被沈继祖弹劾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据说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虽然此时正值“庆元党禁”的高潮期，但依旧有诸多朱门弟子争相前往奔丧。面对“伪学逆党”利用朱熹之死所展开的示威活动，韩侂胄不得不以“真伪已别，人心归正”的名义上奏赵扩请其放松党禁。当然韩侂胄此举并非是怕了那些击登闻鼓上书请杀他以谢天下的布衣儒生，而是因为1200年其身为皇后的侄女死后，他和皇帝赵扩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身为太皇太后的吴芍芬不仅斗败了强势的孙媳妇——李凤娘，还为自己的曾孙子——宋宁宗赵扩早早地培养了一个贤内助——杨桂枝。杨桂枝出身卑微，据说家族是淳安县辽源十五里坑的一家农户。如果不是母亲张氏擅长音乐，杨桂枝有幸跟随母亲进了德寿宫乐部，作一个杂剧孩儿的话。杨桂枝可能一生都无缘走进宫闱。

有趣的是杨桂枝本不姓杨，她在宫廷之中偶然结识了一个名为杨次山的老乡，随即认为兄妹。杨次山是将门之子，他的曾祖父杨全曾经参加过靖康年间的汴梁保卫战，因此其家族世代受到政治上的优待。杨桂枝认杨次山为兄之时并改姓为杨时，据说仪状瑰伟，能文能武的杨次山已经是近卫军指挥官——宫中武德郎了。

杨桂枝的母亲生病回乡之后，她被留在了宫中以侍女的身份侍候皇太后吴芍芬的起居。吴芍芬本人能诗擅画，颇有文化修养。在发现杨桂枝聪明伶俐之后，不免产生怜爱之心，对她加以指点和培养。而杨桂枝也颇为好学，一生诗词、绘画、书法皆有作品留传于世，堪称全能的宫廷艺术家。不过吴芍芬的照顾和指点却引来了其他宫女的不平，有一次乘吴芍芬沐浴之时，有人鼓动杨桂枝穿戴太后的衣冠，随后便大造舆论，没想到吴芍芬并不以为意，反而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小觑了她，或许有一天她会穿上皇后的凤冠霞帔的！"

在吴芍芬的教诲之下，杨桂枝最终以姿容选入宫中，侍奉当时身为太子的赵扩。据说赵扩每次到吴芍芬宫中请安都要偷偷地盯着杨桂枝。吴芍芬随即在一次家宴上将杨桂枝赏赐给了自己的曾孙子。还对杨桂枝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好好看着他！"不过此时赵扩的身边已经有了权臣韩侂胄的侄女韩氏。因此杨桂枝虽然在赵扩即位为宋宁宗之后，被册封为平乐郡夫人，又晋封为婕妤、婉仪。但是贵妃却似乎已经是她后宫事业的巅峰了。

1202年，皇后韩氏病故之后，韩侂胄又和赵扩的另两个妃子——曹氏姊妹结成政治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侂胄支持赵扩立曹氏姊妹其中之一为后的态度自然坚决。而理由是杨桂枝擅长权术。女人才学高、知古今、性机警不是好事，而曹氏姊妹性情柔顺。杨桂枝为人机警，随即先发制人，她利用赵扩临幸之机，在自己寝宫内盛筵款待，频频劝酒，待到赵扩倦眼微醉、余情缱绻之际，乘势乞求为后。赵扩不加思索，即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立杨氏为后的手诏。杨桂枝怕大臣生变，随即又请宋宁宗赵扩重写一纸，当晚即将一纸交近侍按常例颁发，另一纸速交给自己认的义兄杨次山。第二天早朝，杨次山匆匆登殿，从袖中取出御笔，当众宣布立杨桂枝为皇后。韩侂胄虽然觉得不妥，但是皇命难违，也只好听命认输。在酒后册立杨桂枝为皇后赵扩似乎也认识到了喝酒误事，此后在后宫走动，总是命令两个太监背着写有"少吃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两架小屏风作为前导。遇到妃子们劝他吃生冷食物和饮酒时，他就指指屏风以拒绝。



一度深得人望的韩侂胄

失去了后宫依托的韩侂胄不得不寻求其他途经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一方面以退为进向赵扩请求辞职，获得主导朝政的特权。另一方面暗中联络陆游、辛弃疾等朝野主战派文人制造战争舆论，重用郭杲之侄郭倪、郭倬，吴璘之孙吴曦等宿将子弟，试图“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而当时金帝国连年用兵蒙古，国民经济运转失灵，出现“府仓空匮，赋敛日烦”的局面，更给了韩侂胄以莫大的鼓励。在他的授意之下，辛弃疾写下了“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的肉麻词句，更亲自觐见赵扩，吹嘘“金必乱亡”。陆游也不遑多让的鼓动说：“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

犹能为国平燕赵。”

为了证明金帝国的虚弱，1205年韩侂胄在己方战争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便不断的派小股部队袭扰敌境。这些边境冲突能拿出手的只有镇江都统戚拱派遣号称“李铁枪”的特工李全焚烧金帝国涟水县城。甚至于左丞相崇浩和参知政事贾铉都觉得：“宋边卒狗盗鼠窃，非举兵也。”幸好有左丞布萨端和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及时指出：“小股部队肆扰应该是昼伏夜出，又怎么可能白天列阵。况且在灵壁、涡口、寿春同时发动进攻？这是宋军的战术欺骗，不早做准备的话，一旦大举进攻，将陷入完全的被动。”因此韩侂胄的所谓“先发制人”除了引起完颜璟的警觉，进一步加强金宋边境的防御外可谓得不偿失。

南宋政府的大规模北伐从1206年春季正式展开。韩侂胄的整体部署是由殿帅郭倪指挥两淮的战事，继任郭杲负责四川军区的吴曦进屯川陕前线。赵淳、皇甫斌从荆、襄一线分兵向北推进。而为凝聚将士的爱国热情，抵制国内的反战言论，韩侂胄还特意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缪丑”，认为秦桧当年主导的“绍兴和议”是“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理应被揪出来承担责任。可惜对岳飞的平反和追赠似乎并不能得到这位冤死名将的庇佑。就在五月六日南宋政府正式以“伐金”之名宣战后不久，两淮前线的宋军竟出现了全线崩溃的迹象。

有人将“开禧北伐”的失利归咎于南宋方面缺乏将才，南宋末年的诗词大家刘克庄便曾在其撰写的辛弃疾作品集《序言》中写道：“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但客观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南宋军队在战役初期，昔日“岳家军”的后裔如毕再遇、孟宗政等人均有出彩的表现。完颜璟也曾担心南宋攻势强劲，河南地区将悉数沦入北进的宋军之手，而在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地区集结重兵，以拱卫首都燕京。之所以出现多数南宋军队不堪一战的原因，则更多的归咎于南宋政府长期以来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缺位。

自1165年宋金订立“乾道之盟”以来，南宋军队已有近半个世纪未曾有过大规模的战争历练。宋孝宗赵昚及其继任者宋光宗赵惇虽然重视对士大夫和宿将集团的控制，但无非是在维持高官厚禄的同时频繁更迭其职务而已。在长治久安的和平态势之下，南宋军队逐渐出现了形成诸多如吴氏、郭氏般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宿将门阀在军中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如郭杲主政四川军区时便因为“刻剥军士”，导致大批逃兵聚集为盗。直到郭杲死后才由其副手王大节通过招安的方式平定。吴曦虽然一度在蜀中声望颇高，但他抵达四川之后，随即花费巨资为自己的爷

爷吴璘建庙，随后“又命士卒负土筑江滨地，际山为园，广袤数里，日役数千人”，转瞬间便尽失军心。而除了剥削、奴役士族之外，吴氏、郭氏将门更在四川大面积的圈占土地，以至于出现“四川关外四州营田，半为吴、郭诸家所据，租入甚轻，计司知之而不敢问”的局面。吴曦接手之后，更为自己的叔叔吴忽谋取了茶马贸易特使的职务，叔侄两人沆瀣一气，从中渔利，最终导致“茶马司所发纲马，全不及格”。如此严重的“军中腐败”，自然令南宋政府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在战场上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



晚年的杨桂枝

深得韩侂胄重用的郭倪是一个毫无尺寸军功的纨绔子弟，但这并不影响他自比

诸葛孔明，整天摇着一把写有“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扇子，终日在军中纸上谈兵。依靠毕再遇等前线将士初战得胜，收复泗州之后，郭倪便喜不自胜要加封毕再遇为刺史。这种轻佻的做法，令毕再遇以“国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予以拒绝了。而此后战事不利，郭倪又表现的极度沮丧，经常对着自己的幕僚哭泣，因此得了一个“带汁诸葛亮”的外号。

郭倪虽然能力不强，但比起主政四川却接受金帝国的诱降，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准备向金称臣的吴曦来却还算尽心尽责。吴曦踞蜀称王、联金叛宋的图谋，虽然仅仅维持了41天便为军民所阻止，但其对整个战局所造成的影响却可谓深远。在西线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金帝国集中兵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荆襄战区。南宋军中的毕再遇等新生代将领虽然在六合、庐州、襄阳等地阻击了金军的进攻，但金军抵达长江北岸的消息，还是促使南宋政府决定主动向金求和。1207年农历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皇后杨桂枝密谋下，伪称赵扩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夏震秘密于玉津园暗杀了韩侂胄。

后世很多史料都宣称赵扩对韩侂胄的死并不知情。但坊间却传闻其一度得知了史弥远将在玉津园对韩侂胄下手的消息，试图将韩侂胄叫回来。但是杨桂枝却说：“若欲追回他，我请先死！”无奈之下赵扩只能放弃了已经孤立无援的韩侂胄。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一度权势显赫。虽然其发动北伐的目的并不单纯，但多数迎合了南宋军民光复中原的热情。因此在其死后南宋朝野随即将杨桂枝比喻成唐代祸国殃民的杨贵妃。将以“杨安史”比喻她和史弥远的政治同盟。

随着韩侂胄的失势被杀，南宋政府的“开禧北伐”也草草告终。1208年农历三月南宋政府以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换取了金军从占领区撤回。史称“嘉定和议”。而对于完颜璟特别提出要求南宋政府将韩侂胄的首级送来以换取淮南、陕西之地的要求，南宋政府竟也照单全收。当时南宋的太学生们特意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仪，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不过完颜璟对韩侂胄却似乎还怀着一份敬意，在得到了其首级后，并未公然羞辱。而是诏谥其为忠缪侯，以礼葬于曾祖父韩琦的墓侧。

完颜璟此举固然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胸襟，但另一方面虽然成功击退了南宋政府的北伐，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也耗尽了完颜雍以来金帝国国力最后的积累。在战争过后，完颜璟曾经忧心忡忡的询问大臣南宋的议和可不可靠。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王维翰说：“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

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但此时的完颜璟和金帝国均已有心无力，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危机，却已经无法阻挡数年后即将破关南下的蒙古铁骑了。

第四章 界壕内外

窥测中原
——铁木真对西夏的侵攻和对金战争准备

在金宋两国剧烈交锋的同时，统一蒙古草原的铁木真也并未停止其东征西讨的脚步。随着1206年夏蒙古诸部于斡难河源头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公推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皇帝”。铁木真随即大封功臣亲贵，俨然已经完成了一个游牧帝国的草创工作。但蒙古草原之上长期积淀的原始政治生态依旧与铁木真所要建立的封建帝国格格不入。在内部压制合撒儿、铁木格斡赤斤等兄弟争权、翦除以蒙力克之子阔阔出为首的萨摩神棍对政权干涉的同时，铁木真不得不面对蒙古草原北方西伯利亚地区“林中百姓”吉利吉思部的起义。

“林中百姓”的起义表面上是由于铁木真派往管理他们的万户那颜豁儿赤贪婪好色所引起的。当年豁儿赤背弃自己的兄弟札木合投奔铁木真之时，铁木真曾许诺他日后可以在蒙古逐步选美，成为拥有三十个妻子的人。在铁木真建立了蒙古汗国之后，对豁儿赤的拥戴之功还是给予了充分报答的，不过让豁儿赤在自己的领地内挑选美女，铁木真多少有些舍不得，于是便把他打发去管理贝加尔湖周遍的“林中百姓”各部落。豁儿赤治下到底有多少人口，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要挑选三十个美女应该还是不难的。但豁儿赤偏偏要对由寡妇塔儿浑夫人所领导的秃麻部下手，还想直接将塔儿浑夫人也纳为自己的妻妾。一般来说，身居高位的女性都难免会产生女权主义倾向。塔儿浑夫人直接逮捕了豁儿赤，随后联合其他部族揭竿而起。塔儿浑夫人的举动之所以能够得到“林中百姓”的广泛支持，更多的是因为依旧处于原始部族经济的吉利吉思诸部不堪蒙古帝国的征调税赋之苦。

铁木真起初轻视“林中百姓”的战斗力，草率的派出“四骏”之一的博尔忽前往镇压。但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丛林之中，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无法施展骑术。博尔忽所部遭遇吉利吉思诸部的伏击，不仅部下损失惨重，博尔忽本人也中箭身亡。豁儿赤被俘，自己母亲的养子、心腹爱将博尔忽战死。铁木真本想亲自出马，但在木华黎等部下的劝阻之下，铁木真最终委任自己的长子术赤统帅朵儿边等部率部北上。



“林中百姓”利用地利，一度令铁木真无从镇压

许多史料和小说之中都竭力熏染铁木真和术赤之间那极端恶劣的父子关系。并将原因归咎于铁木真对他血统的怀疑。不过事实上铁木真对术赤的教育和培养还是颇为尽力的。这一点从术赤很早便参与自己父亲所发动的对外战争中便可以看出一二，当然如果将其理解为铁木真不喜欢他，刻意让这小子去充当炮灰，似乎也不无可能。也许是因为自己本身便是草原仇杀所造成的不幸产物，术赤虽然性格刚烈、骁勇善战，但是却并不嗜杀。他第一次走上战场，跟随自己的父亲讨伐家族世仇塔塔儿部便令“俘获者多蒙全宥”，宽恕和保全了许多生命。他的这一做法对蒙古帝国的扩张颇有好处，在其指挥的蒙古帝国军对和林西北诸部的征服中，术赤以军事手段配合外交攻势，轻松的便征服了贝加尔湖东西各部落。铁木真大喜之下随即将吉利吉思诸部交给术赤管理。而此举也奠定了术赤一系日后建立横跨亚欧大陆的钦察汗国的基础。

蒙古草原疲弱的自然经济令铁木真所创建的游牧帝国必须不断的对外用兵，在通过战争维持向心力的同时，依赖战争所得为自身“输血”。而铁木真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囊括今宁夏全省、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陕西北部地区的西夏王国。之所以挑选西夏为目标，一方面固然是此时的蒙古帝国仍无力远征西域，又不愿贸然向

东与强大的金帝国交恶，南下攻略西夏便成了唯一的选择。而另一方面1206年，西夏宗室成员李安全与当朝太后罗氏通奸，发动政变废黜了夏桓宗李纯佑，自立为帝。李安全的篡位之举，虽然在正史中并未留下太多西夏王国动荡的记录。但李纯佑在位13年，虽没有太突出的政绩，但也被认为是守成之主。突遭自己母亲的奸夫废黜，自然会给朝野上下造成一定的冲击。正是在西夏国内人心浮动的情况下，1207年农历八月蒙古铁骑再度越过两国边境，这一次铁木真将目标指向了勾连西夏东西两翼的交通枢纽——丰州兀剌海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针对蒙古铁骑长于野战、不利攻坚的特点。李安全采取的应对之道还是敛兵守城，坐等对手劫掠一番后自行撤退。但这一次铁木真却有心想在西夏王国的身上锤炼自己部队的攻城能力。对于兀剌海城的围攻由铁木真驱赶当地的党项族牧民入城开始，铁木真向其宣称："如果开城投降，则可免一死，如果抵抗则破城之后、尽数屠灭。"面对铁木真的心理战，西夏守将不为所动。在长达40天的围困和拉锯之后，蒙古大军最终用火攻战术陷落了这座要塞，而铁木真也随即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屠灭了全城的西夏百姓。这种以屠城为威慑迫使对手投降的心理战术，随后在蒙古大军不断的攻城略地中被发扬光大。

铁木真第二次对西夏的侵攻持续了长达6个月，直到1208年的春季蒙古大军才撤回草原。能够维持长期战争一方面固然是蒙古帝国国力日益雄厚的证明，另一方面水草丰美的六盘山脉，对于常年生活于苦寒之地的蒙古诸部来说可谓天然避冬的良选之地。蒙古大军驻屯于自己的国境之内，对于李安全而言自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西夏自身的军事力量无法驱逐对手的情况下，李安全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向金帝国求援。

秉承着"唇亡齿寒"的战略理念，金帝国内部也出现了"西夏既亡，必加于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的呼声。但此时的完颜璟早为南宋的"开禧北伐"搞得身心疲惫，竟然以"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来应对。完颜璟的这种态度与其说是鸵鸟政策，不如说是有心无力。在"开禧北伐"中金帝国曾大量的征募西北游牧民族的骑兵参战，但战后却无力对其封赏，大臣李藻等人因为上书提及此事竟然还挨了一顿板子，愤而投靠蒙古帝国去了，由此可见金帝国此时国力的虚弱。



征服西夏之后，铁木真加紧了对金帝国的战争准备

金帝国的军队虽然没有出现在战场之上，但西夏王国频繁向燕京方面的求援举措，依旧引起了铁木真的警觉。在草草结束了对第二次与西夏的战争之后，1208年铁木真亲自前往金帝国边境地区的静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以朝贡之名刺探金帝国的虚实。此时的完颜璟已是疾病缠身，只能委任自己几位叔叔中最为无能的卫王完颜永济代为前往。应该说这一次的“静州会晤”，铁木真和完颜永济对彼此的感觉都不好。完颜永济对铁木真在会晤时的傲慢无礼也颇为不爽，一度“欲请兵攻之”。但恰逢1208年农历十一月完颜璟的病故，在忙于角逐帝位之余，完颜永济暗中部署兵力，准备以新君即位的名义诏铁木真再次朝贡时将其拿下。

不过当金帝国按照惯例向蒙古派出使者要铁木真拜受时，铁木真却问对方：“新皇帝是谁啊？”在得到了是完颜永济的回答之后，铁木真当即面朝南方吐了一口唾沫。“我一直以为中原的皇帝都是天神一样的人物。原来这样的庸才也可以啊？那我还拜什么拜啊？拜拜了您勒！”于是乘马北去，开始谋划对金帝国的全面战争。

金帝国的史料之中曾不惜笔墨的描述完颜永济和完颜璟良好的叔侄关系。认为完颜璟在长期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虽然“疏忌宗室”，但对“柔弱”的完颜永济颇为厚待，因此在自己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才准备传位给他。但事实上在完颜璟临终之前，他的两位宠妃贾氏、范氏都已经怀孕，完颜璟仍有怀有将帝位传给自己未来子嗣的期望。真正将完颜永济推上帝位的，是主持金帝国政府运转的宗室重臣完颜

匡和把持后宫的李元妃。

在完颜匡看来，软弱无能的完颜永济继位将有利维持自己独掌朝纲的政治局面，而李元妃则因为不希望看到贾氏、范氏母凭子贵爬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这两人的内外串联之下，完颜永济不仅顺利的荣登大宝，还随即毒杀了贾妃，令范妃堕胎，将其削发为尼。不过在翦除后宫政敌的同时，李元妃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在完颜匡的授意之下，金帝国言官系统“揭发”李元妃串联贾妃假孕，企图以李氏子弟的孩子冒充完颜璟的骨肉。在这个“狸猫换太子”的罪名之下，李元妃被赐自尽。其亲信宦官李新喜等人被处决。至此在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期间，权倾一时的李元妃势力被连根拔除。

利用金帝国权力更迭的有利时机，1209年农历三月，铁木真第三度攻入西夏国境。面对蒙古铁骑的连年进犯，不胜其扰的李安全只能硬着头皮动员全国兵力予以迎头痛击，他任命其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统率5万出征。但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西夏的野战军此时早已不是昔日李元昊败宋拒辽的党项雄兵，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蒙古大军便再度攻破了兀剌海城，进一步逼近了西夏王国的首都中兴府（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李安全在派兵死守中兴府外围要隘克夷门的同时，只能再度向金帝国求援。

龙椅尚未坐稳的完颜永济自然无力支援西夏，而面对地势险峻，关外两山对峙，仅一径可通，悬绝不可登的克夷门，蒙古铁骑也屡攻不克。在双方相持两月之后，铁木真最终决定乘夏军懈怠，采取据险设伏的战术，派遣少数游骑兵引诱西夏军主动出击。大半国土沦丧的西夏王国将士果然按捺不住，最终在草率出击的过程中为蒙古骑兵围歼。在重创西夏军主力之后，蒙古铁骑随即攻破克夷门，包围中兴府。

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李安全不得不亲自登城督战。而自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以来，两百多年的经营，也令中兴府城高池深。蒙古大军屡攻不下。双方相持到农历九月，随着连降大雨，黄河暴涨，铁木真随即遣将筑堤，引水灌城，西夏兵民淹毙极众。十月，西夏再度遣使赴金求援，又遭完颜永济拒绝。而就在西夏王国危如累卵之际，黄河水却突然溃决蒙古大军所修筑的外堤，一时间水势泛滥，蒙古军队也无非驻足，只能遣使入城，以图建立城下之盟。此时的李安全实在没有心思讨价还价，只能登城隔水与铁木真相见，献女求和。至此曾与宋、金三足鼎立的西夏沦为了蒙古帝国的附庸。

客观地说，此时的蒙古帝国依旧没有做好灭亡西夏的准备，更没有统治一个高度文明的封建王国的经验，而为了对抗表面上依旧强大的金帝国，铁木真更需要西夏从西线牵制对手。而出于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心理，侥幸在蒙古大军的围攻中保住首级的李安全也乐于附蒙攻金。1210年，在蒙古大军尚未完全撤走之际，李安全便发兵万余骑，攻打金帝国的葭州（陕西省佳县），由此正式掀开了漫长的夏金边境战争的序幕。

西夏对金用兵可谓频繁，在13年的时间里，有史可查的大小战役便多达25起，可谓“无岁不征”，但所取得的战绩却乏善可陈。除了促成了完颜庆山奴、郭斌等金帝国新生代将帅的崛起外，其最终结果是“精锐皆尽，两国俱敝”。讽刺的是李安全并没有看到金、夏两国鹬蚌相争，蒙古最终渔翁得利的最终结果，因为就在他点燃战火的一年之后，西夏宗室成员李遵顼发动政变，废黜李安全，自立为帝。尽管史书上说李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曾参与西夏王国的科举考试，并“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但得位不正的先天不足，却令李遵顼这样一个曾经醉心文化的王室贵族，不得不在李安全所发动的战争之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唯有如此，内部早已腐朽不堪的西夏王国才能保持最基本的向心力。好在李遵顼执政时期，铁木真对金帝国的战争也已全线展开，他至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铁木真对金帝国的蚕食，早晚不迟于1209年结束对西夏的第三次侵攻之后。从1209年农历十一月撤离西夏首都中兴府，到1211年农历二月，正式“誓师伐金”的一年多时间里，铁木真一方面进一步稳定蒙古帝国内部，增强西线对西辽、花剌子模等中亚国家的警戒和监视，另一方面则不断招降纳叛的鼓动金界壕内外的汪古部等游牧民族，甚至金帝国边防军转投自己的帐下。

在蒙古方面积极准备对金作战的消息，通过金帝国北部边防将领纳哈塔迈珠等人及时传递到了中枢。但完颜永济对此却毫无办法，只能继续选择了鸵鸟策略，颇不以为然地回答道：“铁木真怎么敢！况且没有什么理由，怎么可能挑起战争！” 纳哈塔迈珠继续称述自己的理由，认为此时的蒙古已经是“诸部附从，西夏献女”。但却依旧全力开动军工机器“造箭制盾不休”，甚至在迁徙的过程中也令男丁坐车。这样积蓄民力的做法，只能是在进行战争准备“非图我而何”。不过在完颜永济眼中，纳哈塔迈珠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当面顶撞自己却属于“找事”，因此直接将他送进了监狱。

完颜永济虽然囚禁了纳哈塔迈珠，但并不代表其真的不担心蒙古大军的南下。为了应对南宋的“开禧北伐”，金帝国北境边防部队大多抽调南下，而汪古部等游牧部族倒向蒙古更令整个“金界壕”系统已形同虚设。处于被动防御态势的金帝国，必须同时兼顾东京辽阳、中都燕京、西京大同三个方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永济也只能一方面悄然释放了纳哈塔迈珠，通过西北路招讨使钮祜禄哈达等人向铁木真伸出橄榄枝。另一方面也委任独吉思忠率领金帝国野战部队进驻抚州（今河北省张北县）一线，在拱卫首都的同时兼顾各个战略方向。

完颜永济的备战举措，从纸面上来看并无太多的错误，但在具体落实方面却是漏洞百出。此时的铁木真早已磨刀霍霍，完颜永济的求和举措不仅主动示弱，坚定了对手发动战争的决心。更令许多对女真贵族统治心怀不满的契丹、汉族官员借出使之名行叛逃之实。例如，契丹王族后裔——耶律阿海早年作为特使出访蒙古时，便主动怂恿铁木真：“金帝国戎备废弛，俗日侈肆，亡可立待。”而金帝国方面直到发现自己的特使竟然成为了铁木真的部下，才意识到对方的叛国举措，愤而将其家属全部收押。不过此时已经迎娶蒙古贵族之女的耶律阿海并不介意，主动担任蒙古大军南下的先锋，一路鼓动契丹牧民倒戈。对于这样忠勇的部下，铁木真自然投桃

报李，当蒙古铁骑抵达金帝国中都城下时，铁木真对金帝国的议和使者特别提出："阿海的家属，你们有什么理由关着不放啊？"完颜永济在无奈之下，也只能将耶律阿海的家族全部释放。

独吉思忠虽然担任军职时间不短，但并没有太多战场经验，他的主要成绩是曾修缮完成了西北路的界壕系统。因为"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而广受好评。此时面对蒙古铁骑的不断袭扰，独吉思忠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只能在抚州一线筑垒自卫。对此时任平定州刺史金帝国官员赵秉文提出："我军聚于抚州，由于其城池较小，只能列营其外，恰逢夏天雨季，器械弛散，兵卒多病，等到深秋敌军进攻之时，已经疲惫不堪。不如从临潢一线主动进攻，则山西之围可解，这就是兵法中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此时的金帝国不仅要抵御蒙古大军的南下，继续维持与南宋的对峙，还要应对西夏王国的趁火打劫。1211年农历七月，李遵顼在即位伊始便出兵5万，围攻金帝国西北边防要塞——东胜城（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迫使完颜永济不得不抽调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石烈鹤寿所部赶往支援。而马匹的短缺比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更为严峻，在"金界壕"系统崩溃之后，金帝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阴山——燕山以北各群牧所的控制，没有了稳定的战马供应，金帝国只能搜刮民间马匹充作军用，在这样的情况要实现赵秉文从临潢一线突入蒙古草原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1211年农历七月，铁木真在蒙古大军已经在大水泺、丰县、利县等地建立稳固的前进基地的情况下，开始围攻独吉思忠抚州防线的核心据点——乌沙堡。事实证明独吉思忠在修筑工事方面还是有一手的，坐落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兴和县境内的乌沙堡一度成为蒙古大军无法逾越的屏障。但铁木真很快便发现了独吉思忠整个防御体系的弱点：乌沙堡虽然坚固，但为其提供兵员和后勤支持的后方基地——乌月营却防御松懈，随着铁木真派出哲别所指挥的别动队奇袭乌月营，独吉思忠的防线随即崩溃。

独吉思忠被迫从乌沙堡全线后撤的消息，顿时令承平日久的金帝国首都燕京陷入了极大恐慌之中。各地很快便流传起了一首童谣："摇摇罟罟，至河南，拜阏氏。"所谓"罟罟"指的是蒙古贵族妇人头上所戴的高冠。在这样的童谣歌声中许多金帝国的汉族官吏已经看出了人心向背，自称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裔的金帝国汾阳郡公郭宝玉无奈地感叹道："北军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在他这样的汉族官吏眼

中，金帝国不过是灭亡了正统的北宋王朝的异族而已，并不值得他们效忠，于是举军向铁木真投诚。

作为第一个向蒙古帝国输诚的汉族大姓首领，郭宝玉此举不仅奠定了其家族跟随铁木真东征西讨的基础，更是堪称日后左右中原战局的蒙古汉族世侯家族的滥觞。无独有偶，“幼有大志，膂力过人”的契丹贵族移剌捏儿也怀着“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的投机心理，带着几百人部下主动投效于铁木真的帐下，受封为“霸州元帅”。

在“人情恇惧，流言四起”的情况下，完颜永济一方面在首都宣布戒严，一方面却“禁百姓不得传说边事”。但这种挟制舆论的做法，并不能改变金帝国上下不战自乱的局面。罢免了独吉思忠之后，完颜永济委任宗室成员完颜承裕主持前线军务。在抵御南宋政府的“开禧北伐”的战争中，完颜承裕也算是屡立战功，但其负责的战线主要在川陕一线，对手是一心图谋据蜀自立的吴曦。因此在名将的光环之下，完颜承裕究竟有多少才干仍有待检验。

完颜承裕抵达前线之后，随即宣布放弃从昌州、桓州、抚州三地，全军退守易守难攻的野狐岭重组防线。如果仅从抚州前线的局势来看，完颜承裕此举不失为收缩防线，集中兵力的无奈选择。但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蒙金战场，金帝国放弃昌、桓、抚三州之后，其整个北境边防系统便门户大开。铁木真没有急于进逼野狐岭，而是分兵扫荡被金帝国称为西京的大同府。

身为金帝国西京留守的女真将领胡沙虎，早年曾担任过金章宗完颜璟的侍卫，因此在完颜璟执政期间，一路官运亨通。虽然被言官弹劾“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仍稳步高升。在南线与宋军交锋中，更凭借攻克淮阴，兵围楚州的军功，而被视为将才。但此时面对蒙古铁骑的兵锋，曾在长江中与数百艘南宋战舰搏杀于水上的胡沙虎却失去了拼死一战的勇气。在统率7千精兵与蒙古大军对峙的过程中，胡沙虎突然丢弃了自己的部队，借着夜幕的掩护独自逃走。在胡沙虎所部随即溃散的情况下，金西京大同宣告陷落。

在解除了侧翼的威胁之后，蒙古大军开始全面部署对完颜承裕所构筑的野狐岭防线的进攻。此时完颜承裕手中已经云集了河北、山西等地的汉族豪强和内附草原游牧部族，总兵力号称达到40万以上。保家卫国的热情加上兵力的优势，令金帝国各路民兵武装纷纷向完颜承裕请战，甚至愿意自己担任先锋，金帝国的正规军只要声援就可以了。但完颜承裕却始终只打听哪里有小路可以南逃。于是汉族豪强们纷纷私下嘲笑道：“这里的溪涧曲折，我们都很熟悉，但是领导却不知道利用地利来与

敌决战，一心只想自己先走。”

完颜承裕之所以急于南撤，除却其个性畏怯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胡沙虎弃守西京大同之后，蒙古大军已从西线进抵野狐岭防线侧后的翠屏山，威胁完颜承裕所部大军的补给线和后方安全。担心遭遇对手合围的完颜承裕选择主动后撤，固然有他的理由，但数十万大军敌前转向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偏偏此时被完颜承裕委以殿后重任的纥石烈九斤又一时头脑发热，委派契丹贵族裨将石抹明安前往蒙古军营挑衅，之所以派石抹明安前往，纥石烈九斤的理由是：“汝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其往临阵，问以举兵之由，不然即诟之。”纥石烈九斤显然没有想过，石抹明安既然认识铁木真，又怎么会对着蒙古帝国皇帝当面放嘲讽，果然石抹明安抵达蒙古军营之后随即投诚，将野狐岭防线的情况和盘托出。

在得知完颜承裕主力已然南撤的情况下，铁木真集中全军主力猛扑野狐岭北山口——貛儿嘴。面对“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的木华黎等蒙古悍将，还等着石抹明安回来复命的纥石烈九斤所部无力抵抗，全军覆没。突破野狐岭的蒙古铁骑随即对完颜承裕的主力展开衔尾追击，失去依托的金帝国野战军只能且战且走，最终在会河堡一线全军溃散，主帅完颜承裕仅以身免。

野狐岭战役对金帝国北境边防系统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金帝国不仅在战场上伏尸百里，损失了大量精锐的野战部队，更失去了河北、山西等地契丹、汉族豪强的支持。在金帝国“猛安谋克”体制日益崩溃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势力的向背直接决定着蒙金两国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如果说耶律阿海、石抹明安、郭宝玉等人背金降蒙代表的是金帝国内部契丹、汉族官僚系统的立场松动的话，那么随着蒙古大军轻松的突破早已为金帝国放弃的居庸关，霸州等地石抹孛迭儿、史秉直等地方豪强望风而降，则无疑代表着河北民间力量也随着转投蒙古帝国。

而在远离野狐岭主战场的山东境内，更有一个叫杨安国的青州青年乘势崛起。杨安国早年以卖马鞍为业，因此也人称为“杨鞍儿”。在韩侂胄所主持的“开禧北伐”中杨安国一度在山东揭竿响应。但是在南宋的北伐军被击退之后，杨安国不得不接受金帝国的招安，一度升任防御使。但是在蒙古骑兵扣边的情况之下，杨安国的军队却始终徘徊在远离战线的鸡鸣山一线。为此完颜永济还特意“驿召问状”。杨安国的回答颇为理直气壮：“平章、参政军数十万在前，无可虑者。屯聚鸡鸣山，所以备间道透漏者耳。”但是金帝国主力在野狐岭覆灭之后，杨安国便立刻逃回山东，和张汝楫等人再次举起了反抗金帝国的义旗。因其部队穿红袄作标志，故称“红袄军”。在

随后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杨安国及其妹杨妙真、妹夫李全所领导这支民间武装逐渐成为蒙、金、宋三方之外举足重轻的一支地方割据势力。因此野狐岭战役的影响，诚如编撰《金史》的脱脱所言：“金之亡国，兆于此焉。”

当铁木真将自己的指挥部前移至居庸关龙虎台时，由哲别统率的蒙古骑兵直接便游猎于金中都城下。在再度宣布首都戒严的同时，完颜永济不得不计划在“乣军”的保护之下逃往被称为“南京”的汴梁。因为早在战争打响之前，“尚书令史”李英便上疏指出“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但令完颜永济没有想到的是，乣军的先锋部队刚刚抵达中都。蒙古大军便悄然退去，于是乣军便大吹法螺，说己方先锋部队500人“自相激励，誓死迎战”，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极大的杀伤，而当蒙古军向俘虏的金帝国军民打听这支部队的具体编制时又得到了“二十万”的天文数字，所以就被吓跑了。

事实上铁木真之所以选择在此时退兵，一方面是鉴于中都燕京城防系统完备，拥有高达4丈的城壁、910座箭楼、地堑三重。以蒙古帝国此时的攻坚能力基本无法撼动。另一方面则是考虑此时已近暮秋，蒙古骑兵必须在冬季降临前返回草原，修养战马以利再战。而就在金帝国上下对铁木真的退兵欢欣鼓舞之余，蒙古大军却在回师的途中扫荡了燕山以南金帝国硕果仅存的几处群牧。等待完颜永济的将是最为难熬的一个冬天。

面对进抵中都燕京境外后如旋风般离去的蒙古铁骑，金帝国上下陷入了空前的迷惘之中。如何亡羊补牢自然成了完颜永济及其臣僚的首要议题，针对蒙古骑兵飘忽不定的劫掠战术，早在铁木真大举来犯之前，金帝国上京留守图克坦镒便向完颜永济提出：“自国家与蒙古交兵以来，敌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我们却分兵防御；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不可能不败。不如集中兵力，重点防御。边境地区的昌、桓、抚三州，不仅储备丰富，而且民众健勇，可以将当地的行政机关和人民内迁。以保证人畜财货，不至亡失。”但这个后来被证明颇为正确的选择，却被参政梁镗指责为“自蹙境土”。此时图克坦镒又提出：“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一旦遭打攻击，层层上报，会延误战机。不如派遣大臣建立独立的军区和行省特区。”

作为经历了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时期的三朝元老，图克坦镒的建言未必是为自己谋求功名利禄。但作为上京留守的他提出辽东军政的独立，却很难不招致来完颜永济猜忌，他不仅以“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为由拒绝了图克坦镒的合理化意见，还要求辽东方面抽调2万驻军驰援中都。而就在完颜永济大举征调

辽东等各地精锐驻军拱卫中都之际，铁木真在马不停蹄地扫荡阴山—燕山以北的金帝国云中东、西两路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了辽东。

尽管在公元1211年夏、秋两季战争之中，蒙古多次重创金帝国的野战兵团。但是正如归降的契丹族将领石抹明安所说："金帝国的行政区划有十七路之多，而我们所夺取的不过是云中东、西两路而已。如果不继续进攻。对方一旦制订了完备的战略计划，集中兵力。那么战场的形势将出现逆转。"这样的情况之下，蒙古必须利用所掌握的战场主动权不断开辟新的战线。而此时主动从辽东赶来投靠的另一个契丹贵族——石抹也先的一番话更坚定了铁木真攻略辽东的决定。



在金帝国汉族和契丹降将的引领下，蒙古铁骑突破长城防线逐渐成为了常态

石抹也先是辽帝国时代著名的后妃家族——萧氏的后裔。据说在其十岁时便向他的父亲询问辽帝国灭亡的原因和过程，还颇为豪气地表示："儿能复之。"他向铁木真建议说："金帝国的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是其根本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而此时在东北战场之上，还活跃着另一股反金势力——耶律留哥指挥的契丹军。随着蒙古的崛起，金帝国对境内的辽国遗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

——“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结果这一政策反而激化了契丹人的民族情绪，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在蒙古骑兵进入东北之时，由耶律留哥已经“营帐百里，威震辽东”牵制了金帝国相当数量的野战部队。

1212年，蒙古铁骑抵达辽东之时，正值耶律留哥所部契丹起义军的低潮期。金帝国方面受命“镇抚”辽东的完颜承裕，虽然在野狐岭战役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但所能动员的兵力和物资对比耶律留哥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为了能迅速剿灭自己辖区内的契丹起义军，完颜承裕甚至开出了可以用耶律留哥的骨肉换取等重的金、银及世袭千户的赏格。但就在完颜承裕沉浸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幻梦中之时，由哲别统率的蒙古骑兵突然抵达战场，冲击完颜承裕所部的军阵，再度为蒙古军队所击败的完颜承裕退守辽阳，不久便病死于任上。

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到了金帝国正准备委派出任东京留守的消息后，石抹也先随即采用冒名顶替的方式，假称是金帝国派来的新留守，帮助蒙古骑兵顺利骗开了东京辽阳的城门。至此作为金帝国龙兴之地的辽东被彻底隔绝了与中原战场的联系，虽然依旧有相当数量的金帝国军队在完颜承裕部将蒲鲜万奴的指挥下继续与耶律留哥的契丹起义军周旋，但其对整个蒙金战争的影响已是微乎其微。

蒙金战争初期，完颜永济最大的困扰或许莫不过于无人可用。由于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时期“猛安谋克”体系的全面崩溃，女真族优秀将领日益凋零。面对完颜承裕病故，东京辽阳的失守的局面，完颜永济一度不得不重用起于行伍、百战成名的老将完颜弼出征辽东。完颜弼虽然接受了元帅左监军的任命。但却提议由自己组建一支雇佣军。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首都被包围，也可以回戈自救。而如果按照金帝国过去的动员模式，征召由市民组成的义务兵，那么在战场上恐怕不堪一击”。

完颜永济却不认同老将的看法：“我现在跟你谈的是东北方向的事情，你扯首都干什么。就算如你所说，我也自有办法。你和皇后是亲家，所以我一向对你不错，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完颜永济的意思似乎是想将国政家事化，和完颜弼拉拉亲戚关系。但不想完颜弼却抓住这一点不放，强调说：“陛下勿谓皇后姻亲俱可恃也。”讽刺完颜永济重用驸马都尉图克坦穆延。完颜永济一气之下，以“无人臣礼”的罪名对完颜弼施以杖刑一百，贬为云内州防御使。

赶走了完颜弼之后，完颜永济只能将规复辽东的期望寄托在身处敌后的蒲鲜万奴的身上。从抵御南宋“开禧北伐”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来看，蒲鲜万奴应该算是金帝国中后期相对优秀的骑兵指挥官，而由于出身于辽东的海西女真蒲鲜部，更令蒲鲜万奴在对抗耶律留哥的契丹起义军时尽心尽责，屡败屡战。但蒲鲜万奴出身低微，在“开禧北伐”之前仅为掌管皇帝御马调匀牧养的从五品尚厩局使，这样一个昔日的“弼马温”成为了主持辽东军政的一品大员，自然引发了东北诸多女真贵族的不爽。

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的完颜铁哥曾是完颜襄麾下的爱将，在“开禧北伐”更自称“平南荡江将军”，自然不会将蒲鲜万奴放在眼里，他不仅拒不执行蒲鲜万奴的军令，更利用自己在金帝国中枢的关系网放出蒲鲜万奴怀有异心的言论，怀恨在心的蒲鲜万奴随即将其下狱治罪，最终导致完颜铁哥死在监牢之中。但完颜铁哥的死并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反而引起了辽东各地将帅的集体抵制。对于辽东方面各种弹劾蒲鲜万奴心怀异志的奏表，完颜永济虽然不以为意，但面对同僚的攻讦和掣肘，蒲鲜万奴却始终无法自安。

在无视辽东战线各种反对的声浪，重用蒲鲜万奴的同时，完颜永济又错误将拱卫中都的重任交托给了昔日的西京留守胡沙虎。虽然在蒙古铁骑面前，胡沙虎轻易

地放弃了自己的防区，还在撤退的过程中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抢夺政府所圈养的马匹分配自己的随从。擅自处死涞水县令。但由于其及时出现在了无将可用的中都城下，完颜永济非但没有责问，相反提升其为右副元帅。胡沙虎随即主动提出要求指挥二万人的野战部队“北屯宣平”。而不过鉴于自己手中只能挤出三千人，所以完颜永济将其防区改到了中都附近的妫州（北京市延庆区）。

相对于抗蒙前线的宣平县（今河北省万全县），妫州显然要安全得多。但胡沙虎所追求的却是山高皇帝远的惬意，因此怀着不满，这位跋扈将军又讨价还价要求，干脆将自己的部队撤往南口或者新庄，为此他在给尚书省的报告中说：“蒙古兵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面对这种畏敌如虎的将领，即便是“柔弱鲜智能”的完颜永济也终于难以忍受了，直接将其遣送回家了。但随着1212年夏秋之交，铁木真大军再度突破居庸关，威逼中都。完颜永济不得不重新起用胡沙虎。对此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丞相图克坦镒、参知政事梁镗都表示明确的反对。特别是张行信多次上书特别明确指出：“一个人的能力不在于他的履历。何况胡沙虎过去的败绩，朝廷也都知道！今天又重新起用，似乎不太合适。”但是最终完颜永济还是一意孤行，重新任命胡沙虎为右副元帅，还令其统率中都的近卫部队——武卫军，驻扎在通玄门外。

官复原职的胡沙虎对于逐渐逼近的蒙古军队却没有丝毫的戒备。即便是昏庸的完颜永济也因为蒙古兵日近，而胡沙虎“日务驰猎，不恤军事”而遣使责之。而早已对这个赏罚无度的君皇失去耐心的胡沙虎此刻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他一边派出部下在中都制造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的恐怖气氛，一边假称奉旨讨伐谋反的驸马都尉图克坦穆延及其父图克坦南平，于1212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在中都发动军事政变。

胡沙虎率领部下直入皇宫，在大安殿上与卫绍王完颜永济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对话。身为国君的完颜永济远远地对胡沙虎喊道：“圣主令臣何往？”胡沙虎则老实不客气地回答道：“回你的老房子住去。”不过毕竟胡沙虎还知道自己的分量，只是自称监国都元帅而已。但是为封赏自己的部下，他还是让一个小太监前往后宫索取玉玺。当时掌管玉玺的是尚宫左夫人郑氏，面对前来索取皇帝之宝的小太监，郑氏义正词严地回答道：“玉玺是天子用的，胡沙虎不过是人臣，取来干什么？”小太监也很坦诚地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皇帝都自身难保，何况一个图章！你也要为自己打算。”但是这个世界上并非人人都将自身的得失看得那么重。郑氏继续骂道：“你

也是宫中近侍，现在皇帝有难，你不以死相报也就算了，还来帮逆臣夺玺耶？我可以死，但玉玺是绝对不给的！”不过玉玺毕竟只是一个图章而已，胡沙虎还是拿来了另一个名叫“宣命之宝”的图章盖委任状去了。

胡沙虎控制了金帝国中枢之后，又找了孟铸、张行信等一干过去的政敌。得意的问道：“你们就是一向弹劾我的人吧？”不过这些言官一向强势，所以胡沙虎也没有体会到多少胜利者的喜悦。在对方“各以正言对”的强硬声调中，以“且须后命”的名义将他们遣散了。但对于众叛亲离的完颜永济，胡沙虎却没有那么宽容。在遣人迎接居住于彰德府的金世宗完颜雍长孙、金章宗完颜璟庶出的大哥完颜珣入主中都的同时，胡沙虎派遣宦者李思中用毒酒将完颜永济鸩杀于自己的宅邸之中。

在金帝国中枢内乱的同时，铁木真麾下的蒙古大军已经攻破了由丞相完颜纲坐镇的缙山防线。多次在战场上成功“转进”的胡沙虎显然没有完颜永济那么宽容。他不仅翻出当年在宋金战场上的失败记录处斩了完颜纲，对完颜纲的部下术虎高琪也严格要求：“胜则赎罪，不胜斩汝矣！”与之相比，刚刚登基的完颜珣则显得豁达得多。他在封术虎高琪为元帅右监军的同时还勉励道：“我听说部队中的每件事情都要上报，这样做不是耽误时间吗？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当机立断，我只关心结果。”

在中都以南的易州、涿州战场上又一次败给蒙古骑兵的术虎高琪知道回到中都少不了会成为胡沙虎的刀下之鬼，于是决心先下手为强。而他麾下的军虽然打不过蒙古铁骑，但是对付胡沙虎麾下那些久疏战阵的部队却是绰绰有余的。于是在一场新的宫殿政变之后，术虎高琪取代了胡沙虎的位置。对于这一段混乱的时局，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以儒家特有的历史观作了总结。他首先为金宣宗完颜珣肯定了胡沙虎推翻完颜永济拥立自己的功绩，将发动政变美化为“躬行弑逆”。然后以南北朝时代，徐羡之、傅亮、谢晦废黜刘义符拥立刘义隆的故事。提出对胡沙虎的处理应该首先“暴其过恶，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缘坐其家。”不过张行信还是希望完颜珣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杀戮。依照刘义隆当年的做法，赦免胡沙虎的家人。

胡沙虎和术虎高琪所发动的两次政变，与其说是金帝国军队系统通过自己的方式拯救国家的努力，不如说是一干新晋女真军阀逃避责任、夺取权力的倒行逆施。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自金世宗完颜雍执政以来，得以重用的汉族士大夫阶层，一度也有过建功沙场的热情，如在蒙古帝国南下攻金的同时，西夏也频繁出兵骚扰金帝国的西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金帝国中枢只能任命文官——陕西东路转运使事韩玉为凤翔总管判官，自行募集军队。韩玉是经义、辞赋两科进士，据说能“应

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其所写就的《元勋传》，令以诗词和书法著称的金章宗完颜璟都感叹：“那些元勋功臣何等庆幸，可以得到这样的大家为他们书写传记！”但是在击退了西夏军队的袭扰之后，韩玉却被诬告为与入侵者相勾结，而遭到逮捕，最终冤死狱中。

金帝国高层对汉族精英外宽内忌的态度，最终导致诸多有识之士选择了明哲保身的袖手旁观。言官张行信向完颜珣建议由朝中的大臣广泛的推举贤能，授以全权。但是这一看似合理的建议却造成了许多荒诞的结果。在东华门内外的招贤所内，会聚了一大批的江湖骗子。其中有贬低诸葛亮不懂兵法以自抬身价的王守信，过去靠说书为生的贾耐儿，以及自称通晓天文的李栋。最终张行信不得不再度上书以《易经》中“开国承家，小人弗用”为理论依据推翻了自己早先天真的想法。

1214年，铁木真对金帝国的第三次攻掠已经持续了近9个月的时间。在自己的部队逐渐呈现师老兵疲的情况下，铁木真摆出了一副无赖的嘴脸，派遣特使萨巴勒进入金中都，向完颜珣展开讹诈：“现在山东、河北的郡县，已经悉为蒙古所有，中都燕京不过是一座孤城。不过上天既然在削弱你，我又怎么会步步进逼呢？这样吧！我现在回到草原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总要对我的部下们意思意思吧？”术虎高琪虽然看出了蒙古方面的虚弱表示应该决一死战，但是都元帅完颜承晖却指出金帝国的中都守军家属都分散在各地，长时间的围困早已离心失德。决战风险太大，还不如接受对方的和平建议。最终金宣宗完颜珣在奉上大量金帛和马匹之外，还将完颜永济之女——岐国公主嫁给铁木真。

岐国公主虽然是失势的前任君皇之女，但是她出嫁的排场还是颇为壮观的。由丞相完颜福兴率领着精锐的卫队护送，携带着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彩绣衣三千袭，马三千匹组成的嫁妆抵达了铁木真的军营。铁木真对岐国公主起初还是比较客气的，毕竟金帝国表面上依旧是雄居华北的大国。但是随着金宣宗完颜珣的难逃，这位公主皇后的日子却似乎并不好过。当公元1220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奉诏前往西域之时，这位公主已经和在燕京被俘的其他金帝国后妃们居住在远离中原的八剌喝孙。见到了来自故土的这位道士，岐国公主竟忍不住 “号泣相迎”，可见处境不太美妙。岐国公主没有留下子嗣，但是寿命却很长。直到公元1259年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发生争夺汗位的内战之时，她的名字依旧出现在史料之中。没有在金帝国的覆灭中沦入战火兵患，得养天延固然是她的幸运。但是在远离故土的塞外孤独终老又何尝不是一个女人的不幸呢！

在蒙古军队解除了对金帝国中都的围困之后，金宣宗完颜珣便立刻接受了南京留守布萨端等人的“请幸”，准备迁都河南。对于这一点，丞相图克坦镒立即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在图克坦镒看来既然和蒙古的和议已经达成，那么强化中都的防御，稳定北方诸路才是上策。即便要放弃中都也应该选择依山背海的女真族根本之地——辽东。而不应该选择河南这样的一个四面受敌的绝地。而得到了金帝国迁都的消息，嗅到对手恐惧的铁木真立即摆出一副正义的架势来。认为对方在和约签定之后选择迁都，是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尊重。因此果断单方面终止停火协议，再度发动南下进攻。



蒙古大军攻克中都这样的大型中原城市仍很吃力

完颜珣在决定迁都之时，曾在燕京留下了以太子完颜守忠为首的留守内阁。但

是在得到了蒙古军队南下的消息之后，完颜珣第一时间想到的便将自己的儿子完颜守忠也召集到汴梁来，对于这一点翰林学士完颜素兰提出："太子在中都，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无虞。就像当年唐明皇逃到四川，而太子则在灵武，这是为了稳定天下民心。"但这样的意见对于将家庭看的比国家更重要的完颜珣而言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随完颜珣由河北入河南的金朝主力军依旧不下数十万之众，术虎高琪以重兵组建黄河防线，守南京开封以自固，不顾华北、东北州县残破，根本无心抗击蒙古，收复失地。本就"畏罪不自安"的金帝国辽东战区司令蒲鲜万奴"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1215年春蒲鲜万奴以自己的治所咸平为首都，开始出兵攻略上京等其他金帝国将领的领地。

由于打出了重建"猛安谋克"体系的旗号，蒲鲜万奴的行动得到了辽东女真各部的支持，至1215年农历十月，蒲鲜万奴已控制了几乎所有依旧忠于金帝国的辽东城市，随即以咸平为首都，自称天王，国号"大真"。而不愿与之为伍的金帝国贵族和官员只能从海路逃往山东。蒲鲜万奴叛金自立的行径，固然是其个人野心昭显，但从整个辽东的态势上看，在隔绝了与中原联系，金帝国日益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大真"王国的建立又何尝不是辽东女真各部的本能选择。

金帝国政治中枢的南迁，同时也便引起了南宋朝野的广泛议论。事实上早在野狐岭战役期间，以"贺金主生辰"名义出使的南宋户部员外郎余嵘便亲眼目睹了从前线败退的金帝国军"溃兵累累、号泣不止"的惨状。回到南宋之后，余嵘随即向赵扩报告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而铁木真在1213年和1214年也三度派遣使者与南宋政府接洽，以期"纳地请兵"，希望西夏在西线牵制金帝国的同时，能与南宋联合行动，令金帝国陷入三线作战的困境。但昔日"海上之盟"与女真族联兵灭辽的教训，使得南宋政府在军事行动上格外谨慎。

眞西山



著名的理学大师、时政评论家真德秀上疏提出应该立即中止向金帝国每年缴纳的“岁贡”。真德秀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金帝国的南迁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蒙古军队会像猎手追击鹿群那样继续向南进攻，无论蒙古是取代金帝国成为北方新的霸主还是最终放弃中原，造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对南宋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因此南宋政府应该将每年向金帝国的财政补贴用于“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以自强自保。当然对此也有人有不同的见解。淮西转运使乔行简提出：“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帝国虽然过去是我们的仇敌，但今天却是我们的战略缓冲。应该继续给予财政支持，使之可以继续抵抗蒙古的南下。”最终南宋政府还是决定停止向金帝国输血，但是自强自保的种种举措却依旧不过是清谈而已。

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之下，金帝国的中都燕京最终被蒙古军队攻陷。在城市沦陷之前，城防司令穆延尽忠下令突围。得到消息的金帝国王室妃嫔们纷纷赶到通玄门。此时穆延尽忠颇为豪爽地提出：“我先走一步，为各位王妃探路。”但是一出城就不见了踪影，一路跑到中山穆延尽忠才对部下们说：“如果和那些王妃一起走，我们又怎么能到这里！”夺取了金帝国的中都及黄河以北的大部分领土后，铁木真又一次选择了退兵。而对于他来说龟缩河南的金帝国就好像一场围猎之中惊恐不安的猎物，大可以要留给自己的儿孙辈拿来练手。

第五章 玉龙赤杰

大纛西向

——第一次蒙古西征的前期准备和“黄金家族”的分裂

1218年春季，在将中原战场交给亲信部将木华黎统一指挥的情况，铁木真马不停蹄的命哲别率领的两万蒙古骑兵，通过高昌回鹘的领土向西辽本土进军。之所以如此突然的改变进攻轴线。一方面固然是金帝国龟缩河南之后，华北大地已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作为“外来户”的蒙古帝国需要一段时间梳理其经略中原的具体战略；而另一方面，自1211年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夺西辽王位以来，蒙古帝国的西部边境便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为了根除西线的隐患。1217年铁木真首先派出速不台、哲别及长子术赤扫荡东进的乃蛮残部，随即启动了对西辽王国的总攻。

面对蒙古帝国的大军压境，屈出律此时的表现连他的父亲都不如，他第一时间放弃了耶律大石子孙三代四任君王苦心经营的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向西逃往自己新近征服的可失哈耳。这无疑是在自寻死路，面对宣称宗教信仰自由的蒙古军队，可失哈耳的居民不仅无心替屈出律作战，甚至倒戈一击纷纷杀死了居住在自己家中的西辽王国士兵。无力镇压的屈出律只能继续向西逃窜。最终在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之间被当地的猎户拘捕，移交给了哲别。旋即在军前被处死。

哲别对西辽王国的征服如此之顺利和快速是铁木真都没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从哲别辉煌的战报中怀疑是不是故意夸大其辞、有在西辽地区自立为王的意思。为此特意派人去提醒哲别不要夸大自己的功劳，因为“王汗、太阳汗和屈出律都是因为骄傲而失败”予以敲山震虎。哲别也意识到自己功高震主，立即派人征集了千匹白嘴黄马送往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在表达自己的忠诚之余也算是补偿了自己此前射杀铁木真坐骑的过失。

屈出律和西辽王国败亡的过程之中，他昔日的盟友花剌子模王国的苏丹摩诃末正在忙于扩张自己的领土。花剌子模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在中亚的历史之中却始终处于各方势力垫脚布的地位——周遍强盛的帝国崛起之时都会去踩上一脚，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远征军到贵霜帝国的佛教信徒，从西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到东方的契丹移民。花剌子模王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

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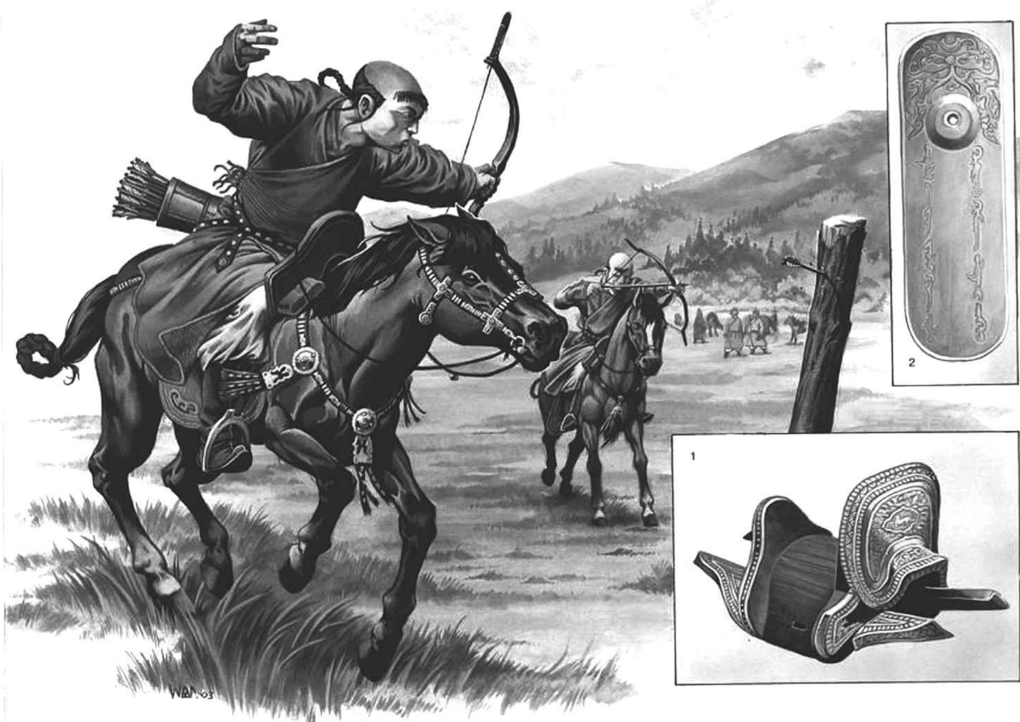
但进入公元13世纪之后，花剌子模的国运似乎出现了逆转。利用突厥分支土库曼人所建立的塞尔柱帝国日益衰弱的有利时机，花剌子模首先借助西辽的力量驱逐了前者的势力。又抓住西辽王国内部的动荡悍然宣布独立，随后又利用屈出律的篡夺，吞并了撒麻耳干地区的西辽属国——喀喇汗王国。至此摩诃末自认为是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当蒙古帝国的势力逐渐扩展到中亚地区之时，据说摩诃末正带着自己的大军进行这一次越波斯的武装游行，除了接受沿途世袭的突厥总督们向他本人的效忠之外，他还打算前往巴格达，要求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哈里发加封他为苏丹。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他又借口哈里发有和西辽王国夹攻他的阴谋，在自封苏丹之余准备武力夺取巴格达另立哈里发。当然对于东方的事务，摩诃末也不是漠不关心。1215年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蒙古，了解铁木真与金帝国的战争情况。据说是准备在统一了中亚地区之后挥戈东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暴发户，我们不得不好奇地问一句："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诸多史学家都将花剌子模触怒铁木真，引发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的原因归咎于所谓的"讹答剌事件"。这一严重的外交事件的原委大体如下：1215年花剌子模的使团抵达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之时，铁木真曾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通商，并遣使回访，同时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队于1218年前往花剌子模贸易。但商队抵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该城长官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所携带的财物，竟诬其为间谍，将他们尽加杀害。一名幸免于难的骆驼夫逃回蒙古报告，铁木真愤怒至极，又派出了三名使者前去交涉，结果摩诃末杀掉了其中一人，将另外两个人剃须后驱逐出境。如此蛮横无理的外交模式连一向粗放的蒙古人都被彻底激怒了。"汝要作，便作战"，七百多年后的一位笔名金庸的小说家替铁木真咆哮道。



随着西辽的灭亡，畏兀儿诸部成为了蒙古和花剌子模争夺的对象

但事实上在西辽王国灭亡前后，蒙古帝国和花剌子模的边境之上已经是战火四起。西进的蒙古帝国术赤所部就曾经遭遇过花剌子模王子扎兰丁部队的攻击。此时蒙古帝国对幅员辽阔的花剌子模还心存敬畏。术赤的部下们纷纷以“众寡不敌”建议术赤撤军，不要轻易与邻国交锋。但是术赤却说：“遇敌而逃，何以归见吾父及诸弟。”在击溃了扎兰丁部队的左翼之后，才一路采取多设篝火的方式从容撤退。而在哲别从西辽王国回师的途中，花剌子模也不断派兵追击，并顺手夺取了原属于西辽的西境锡尔河上游沿岸诸城。



骑射是蒙古少年自幼练习的技能

面对空前辽阔的战线和纵深数千公里的战场，为了筹措第一次西征所需物资，蒙古帝国动员了几乎所有可用的战力，不仅铁木真已经成年的四个儿子悉数上阵。而且根据当时南宋使者的笔记，此次西征蒙古大军之中还抽调了大批的未成年人“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当时的蒙古草原之上，骑射本就是从小便需要熟悉的生存技能，“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射，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因此十三四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了，被称为“渐丁军”。

除了广泛征调蒙古诸部之外，铁木真还向西夏国王李遵顼征兵助战。尽管西夏向蒙古臣服已久，但是铁木真这次的态度却还是比较客气的。他对李遵顼说：“你答应做我的右手。现在我和花剌子模决裂，即将出征。和我一同出发，做我的右手吧。”但是此时的西夏已在铁木真的指挥棒下与金帝国缠斗多年，战果有限却损失极大。一度出现“自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的局面。而作为盟友的蒙古帝国

虽然在中原大地之上不断攻城略地，但对西夏王国的实际支援却微乎其微。

1217年农历一月，李遵顼好不容易抓住机会，邀请穿越西夏国土进攻潼关的蒙古大军，在回师途中帮助自己攻打金帝国的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此次蒙夏联合行动投入的兵力不可谓少，仅西夏方面就动员了三万余骑，但结果却是大败而归。西夏败军在撤回本土的过程中，又在宁州（今甘肃省宁县）遭到金帝国将领完颜庆山奴所部的伏击，损失惨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连年的政治动荡和频繁征调令西夏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同时也有蒙夏联军互不统属、配合不利的因素在其中。对于这样一个盟友，仍决心与龟缩河南的金帝国缠斗下去的李遵顼，以不堪征调为由，拒绝出兵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能够更为委婉的拒绝铁木真的邀请，西夏与蒙古的外交关系或许不会那么快破裂。但偏偏负责外交事务的西夏大臣阿沙敢直接对蒙古使节说：“如果铁木真的力量不够，何必自称为汗？”西夏政府敢于如此牛气，很大程度在于他们认定蒙古帝国多线作战，是无力战胜强大的花剌子模的。大战在即，铁木真本人也是心中没底。为了以防不测，他听从自己老婆也遂的建议。公开和自己的儿子们讨论自己的继承人问题。

此时的铁木真虽然只有56岁，但按当时蒙古草原男子的平均寿命来看已经算是高寿了。虽然在建立蒙古帝国之初，铁木真曾将所征服的疆域视作自己所为“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和自己的兄弟们商定：“夺取天下，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而在此后的分封过程中，铁木真也基本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古老传统——“忽必”（也就是汉语中所谓的“分子”）将自己的领地和人口分给了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们。其中在1214年南征金帝国的过程中，将蒙古高原以东的地区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弟弟，形成了日后的所谓“东道诸王”。而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铁木真又把蒙古高原以西的疆土分封给自己的几个儿子。按照这样的分配模式，此次西征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铁木真嫡出的四个儿子。

铁木真先问长子术赤：“汝乃朕诸子之长，汝意下如何？试言之！”这样严肃的问题，术赤自然不能贸然回答。但是他的沉默却遭到了二弟察合台的抢白。察合台向来和术赤不合。因此大声嚷道：“父汗先问术赤，莫非是欲立术赤为太子吗？”随即又接着：“他不过是一个蔑儿乞惕部的野种，我等怎可让此等之人登汗位。”所谓打人不打脸，察合台公然揭术赤的伤疤，自然引起对方的激烈反应。

这样的兄弟相争，铁木真是最有资格出来劝解的但却也是最无能为力的一个。

因为他知道无论偏袒谁都会激化矛盾。所以这个角色只能由手下人来做。老将阔阔搠思此刻站出来说：“察合台，汝为何如此性急？汝等未生之前，蒙古地面充满混乱；列国相攻，人不安生，邻里相劫，天下扰扰，无处没有劫掠之事，有人即有杀戮之举。”随即又说术赤四兄弟的母亲孛儿帖“心像油一样温柔慈爱，灵魂像乳汁一样纯洁”。最后指责察合台说：“汝等四人非同出于其腹吗？汝等今日岂已忘却其乳温了么？察合台，汝今说出此等言语，乃是损害汝母之名誉侮辱汝圣洁之母，恶语中伤汝母也！”

由阔阔搠思这番话垫底，铁木真才从容开腔，对察合台说：“汝何可以此等之言语伤汝兄术赤耶？术赤岂非朕之长子吗？此后断不可出此等言语！”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察合台只能表示自己言辞失当。但察合台也不完全是一个莽夫，他随即又说：“窝阔台敦厚谨慎，我等愿听从其指挥调遣。窝阔台可于父汗之侧，奉识大冠形影之教”。这句话无疑将未来的汗位之争形成窝阔台——察合台联盟对抗术赤的局面。铁木真此刻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不可能解决，于是打了哈哈说：“汝等无须并效于朕前。后土宽广，江河众多，天高地阔，朕将令汝等各治一处，分镇营此宽阔之邦，各守封国。”这次继承人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却不失为最好的动员。在此后的征战中，铁木真的儿子们为了自己未来的封地无不拼死向前。其日后所形成的“四大汗国”在汉族的史料中又被称为“西道诸王”。

1219年夏，铁木真亲自统领大军越过阿勒台山，在也儿的石河驻夏后，开始全面进攻花剌子模国境。当时花剌子模分布在锡尔河、费尔于纳要隘和河中各城的这条防线，虽然总兵力占优，但是力分则弱。铁木真的先锋部队顺利地突破了花剌子模的边境防线。蒙古大军随即分头行动。察合台、窝阔台负责围攻曾经屠杀蒙古商队的边境重镇讹答剌。守将哈只儿只兰秃深知自己身负蒙古大军的仇恨，因此顽强抵抗。甚至在外城被攻破后还在核心城堡里顽抗了一个月之久，弓箭射尽他就接过妇女们从墙头递来的砖头猛掷，可谓困兽犹斗。不过最终被俘之后，铁木真对他的处置也很有意思，考虑到他贪财好物，就命令将生银熔化从他的耳朵里灌入。的确别出心裁。

在围攻讹答剌的同时，术赤率部沿锡尔河左岸向下游进发。术赤采用的是蒙古大军惯常的战术，每到一城先派人劝降。如果当地守军拒绝投降便展开疯狂的轮番进攻。破城之后便展开屠杀，以警告其他城市。而对于接受劝降的城市，在蒙古大军抵达之后，也要求居民出城躲避七天，以便蒙古军队大肆劫掠。随后再派信任的

土著前往出任地方官员。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大军西征》

在术赤向锡尔河向下游挺进的同时，由蒙古将领阿剌黑等人率领的另一支大军则溯锡尔河而上，进攻花剌子模军队锡尔河防线的核心——忽班。守备忽班的是花剌子模军中有名的勇将帖木儿灭里（突厥语中“铁王”的意思）。这位“铁王”果然名不虚传，不仅抵抗坚决，最后在城破之时还带着一支舰队沿锡尔河而下，连续突破了蒙古军队的铁链和浮桥防线，最终逃之夭夭。

在自己的三个儿子和部下将领们扫荡锡尔河一线的同时，铁木真带着小儿子拖雷和精锐的怯薛中军直扑花剌子模王国的纵深，很快便夺取了穆斯林世界的最大的城市之一——不花剌。不花剌城以其布局巧妙的城市供水系统和地毯纺织业而闻名。但是这座商业都市在蒙古铁骑面前却无力自卫。守城的雇佣军只抵抗了三天就作鸟兽散。不过也得益于雇佣军的溃退，不花剌免于遭到屠城的厄运，不过城中的居民也要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园，为蒙古士兵提供抢劫的方便。最终蒙古士兵似乎觉得不过瘾，开始纵火焚城。居民们对此却毫无办法，唯有以泪洗面而已。诚如一个穆斯林教牧所说：“这是真主吹动的愤怒之风。我们这些被此风吹散的稻草无权发言！”

铁木真的大军在洗劫了不花剌之后，开始向花剌子模王国的新都撒麻耳干挺进。苏丹摩诃末对此毫无办法，这是因为他的国家崛起的时间太短，各地的地方势力在和平时期还算顺从，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面前则都在犹豫观望。无奈之下他只

能退守阿姆河南岸，但是他一离开撒麻耳干便遭到了铁木真以哲别为先锋，以速不台和自己的女婿脱忽察儿后续跟进的三万骑兵的追击，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辗转西逃，好在哲别和速不台的部队虽然快速开进，但是铁木真的女婿脱忽察儿却沿途大肆劫掠。他之所以这么做，未必是自恃其地位，而是因为他来自贝加尔湖周遍的“林中百姓”部落，实在没见过什么世面。最终苏丹摩诃末成功的遁入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附近一个岛上，在1220年年底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而对于自己的女婿脱忽察儿延误战机的行为，铁木真虽然不免有些气愤，但也只是短暂的解除了他的职位而已。

苏丹摩诃末的逃窜给撒麻耳干的防御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面对铁木真裹携着由从附近攻陷的城市和沿线的乡镇中抓来的市民和农民组成的大军。守军只抵抗了五天便开城投降了。其实真正的攻防战持续的时间更短。因为在抵达撒麻耳干城下之后，铁木真首先花了两天的时间亲自环绕全城，实地勘察城墙防护、外围工事及城门的虚实。第三天才开始攻城。公元1220年5月17日，蒙古军队通过位于西北的“祈祷门”开进撒麻耳干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撒麻耳干的东门名曰“中国门”。这一名字得缘于来自东方的“丝绸之路”。随即动手拆毁城防工事将居民驱赶出城，放手劫掠。蒙古大军对撒麻耳干的居民显得比较宽容，铁木真的部下在抢劫了一番之后，忍住没有放火毁灭这座生产供整个中亚的商人使用的帐篷和装在雪白的铅制盒子里远销各地的撒麻耳干甜瓜的城市。而铁木真本人也只从居民中挑选了3 万名工匠，将他们分赐给他的儿子、妻妾和各位高级将领。其他居民除了征发了3 万名壮丁随军作役夫之外，只要缴纳赎金便可以回城。



西征过程中蒙古大军的攻坚手段日益成熟

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过程中的首场恶战爆发在花剌子模王国的故都玉龙杰赤城下。这座城市除了是以沙漠中的绿洲构筑的天然堡垒，城内的居民同仇敌忾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蒙古军队内部的将帅失和。指挥围攻玉龙杰赤的蒙古大军统帅起初是术赤和察合台两个人。除了两兄弟本来就互相憎恶之外，玉龙杰赤在战前被指定为术赤的封地也是导致蒙古大军步调不一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攻围不克，加上术赤和察合台的相互指责，最终令铁木真失去了耐心，他让窝阔台统一指挥攻城部队，责令术赤和察合台都必须听从其弟窝阔台的指挥。窝阔台抵达玉龙杰赤之后首先调节了两位兄长之间的矛盾，随后针对当地多是沙漠和沼泽，找不到可供炮击的石头的特点，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法——火攻。而这种火攻最为狠辣的地方在于它是借助投掷燃烧着的石油罐来蔓延的，即便是坐落于绿洲之中水资源充沛的玉龙杰赤也无力抵挡。

玉龙杰赤在火攻之中崩塌，尽管术赤对前来乞降的穆斯林长老表示：“汝曹以抗拒而没我军多人。迄今受怒火与威严者乃我军也，汝曹竟说汝曹受我军之怒火与威严！今我军当使汝曹一受之！”但是最终还是宽恕了退守一隅的居民。虽然他们之中

年轻的妇女和儿童都沦为了蒙古人的奴隶。所有的工匠被集中在一处，以便遣往蒙古为成吉思汗服务。其余的男性居民被分别充入蒙古军队列之间，但毕竟保全了性命。随后蒙古大军掘开阿姆河堤，引水灌城。使这座在沼泽和沙漠之间的肥田沃土成为了一片泽国。玉龙杰赤战役之中，窝阔台的继承人身份首次得到了肯定。而术赤随后则留在了沦为废墟的玉龙杰赤。这不仅因为那里是他的封地，更因为在铁木真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可以说黄金家族的分裂，正是从玉龙杰赤的陷落拉开了其序幕。

在玉龙杰赤惨烈攻防的同时，铁木真正在撒麻耳干城内的奈撒夫绿洲避暑，他毕竟已经是58岁的老人了。等到秋高气爽之后他才动身前往阿姆河流域的忒耳迷城。忒耳迷城经过了短暂的抵抗之后也随即陷落，对于城中的居民铁木真虽然采取了之前惯用的手段——将其驱逐出城然后纵兵劫掠。但是一位当地贵妇的多事却最终引发了一期颇为血腥的事情。在忒耳迷城内一位贵妇被捕之后，表示如果不杀她，她可以献出一颗漂亮的珍珠。蒙古士兵觉得这笔交易不错，于是要她交出珍珠，但这个贵妇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将珍珠吞进了肚子里。一向粗暴的蒙古士兵当然没有心情等她再把珍珠拉出来，于是随即挥刀剖开她的肚子，果然取出了一颗珍珠。而铁木真本人也觉得这种行为可能颇为普遍，于是随即下令剖开所有尸体，以搜寻被吞下的珍珠。

整个蒙古大军的第一次西征之中，年事已高的铁木真都表现得极为懒散。在自己的三个大儿子围攻玉龙杰赤，猛将哲别和速不台追击苏丹摩诃末而深入伊朗高原北部和高加索山脉的同时，铁木真在攻陷了忒耳迷城之后又跑到了卡尔希绿洲（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过冬，直到1221年春才再度动身出发前往攻略当时被称为“呼罗珊”的伊朗高原东北部及阿富汗北部地区。如果说花剌子模的本土——阿姆河下游三角洲历史上是各大帝国崛起的垫脚布的话，那么“呼罗珊”则可以说是波斯文明的龙兴之地，曾令众多抵达这里的强大远征军铩羽而回。

蒙古大军在征服“呼罗珊”的过程中损兵折将，第一个倒下的是铁木真的女婿脱忽察儿。在进攻波斯帝国曾经的首都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内沙布尔）的战斗之中，得到自己岳父重新任用的脱忽察儿急于一雪前耻，结果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中箭而死。不过你沙不儿守军还来不及欢呼胜利，便遭到了铁木真第四子——拖雷所统率的蒙古大军的疯狂围攻，根据西方的史料，你沙不儿的城防部队准备了弩炮3000门，发石机500 架，自持火力强大。但是在看到蒙古大军在城下所布置的多于他们无数倍的攻城器具时，仍不得不派出求降使团向拖雷输诚。但是在一向看重亲情的拖雷面前，“即使将全世界的黄金都堆在面前，也不能动摇其的复仇执念”。

你沙不儿最终于回历沙法儿月的12日即公元1221年4月7日陷落。而随即展开的屠城据说更由脱忽察儿的遗孀秃满伦公主亲自指挥。这个女人的心狠手辣丝毫不

弱于其父兄，不仅“所见辄杀，猫犬不留”。更为了防止有人躲在死人堆里，命令部下将所有居民的人头一律砍下。将这些被斩下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头分别堆积，各聚之为塔。整个大屠杀整整持续了15天之久，只有400名技术熟练的工匠得以保全了性命。



杀戮和掠夺令蒙古帝国在第一次西征中满载而归

和你沙不儿所遭遇的情况类似的还有以巨大的洞窟佛像而闻名的阿富汗北部城市巴米安。在攻城的过程中察合台的儿子蔑忒干由于亲负矢石而被守军射杀。铁木真很宠爱这个孙子，随即下令“屠尽所有有生命者，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不取任何俘虏，杀死所有的人，包括杀死母腹中的胎儿；不取任何战利品，一切都在摧毁之列；今后不许其他任何人居住这个‘该死的城市’”。他的命令虽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但是蔑忒干的生命却终究是唤不回来的了。而除了自己痛惜之外，铁木真还要考虑如何给察合台一个交代。

察合台和窝阔台在攻陷玉龙杰赤之后便随即前来与铁木真会师。不过他们和术

赤私分了战利品的行为多少冲低了铁木真对察合台的愧疚之情。据说他连续三天拒绝接见自己的两个儿子。为此失吉忽秃忽等人都不得不劝说道：“取得玉龙杰赤，增加了我们的威力，花剌子模被征服，你的大军皆喜。汗为什么这样愤怒？三个王子似鹰雏一般加入围猎，他们来学习战争的本领。为什么一回来就这样责骂他们呢？从日出处至于日落处，我们的敌人很多。请你放我们去冲向敌人，就像你在围猎时候放出猎犬一样，蒙天地护佑，我们战胜敌人，我们将一切金银绸缎财富取来献你，我们替你攻破人民和城池。你要不要我们去攻打巴格达的哈里发呢？”铁木真这时才放下了架子，接见了窝阔台和察合台。不过在察合台面前，他继续大声地责备对方，直到察合台跪在地上发誓说他死也不会违抗父汗之命。这个时候铁木真才图穷匕见地说道：“蔑忒干已被敌人射杀。汝不得哭泣悲伤。”可怜的察合台只能竭力忍住眼泪，事后才找了个借口一个人跑出去大哭了一场。

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最大规模战役发生在巴米安东南约150　　公里处的哥疾宁城。在那里继承苏丹之位的摩诃末之子扎兰丁集结了10万大军。由于此前连续击败了蒙古军队的前锋和由铁木真的义弟失乞忽秃忽所统帅的3万大军，花剌子模军士气正盛。作为铁木真家族所收养的塔塔尔部孤儿，铁木真和失吉忽秃忽的感情不错，这一点与他对自己亲兄弟的残忍反倒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说有一次铁木真按照游牧生活的习惯，在天气酷寒和积雪根深的时候移营，在路上恰巧遇到了一群麋鹿。当年不过十五岁的失吉忽秃忽对铁木真的御帐管理人屈出古儿那颜说，他很想去追猎那些在积雪之上行动迟缓的鹿群。屈出古儿虽然同意了失吉忽秃忽的请求，但是没有让队伍停下来等待这个少年。因此直到在晚上宿营的时候，铁木真才知道了失吉忽秃忽脱队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用车辕把屈出古儿暴打了一顿，因为他认为在风雪之中“这个小孩子要冻死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失吉忽秃忽竟然回来了，还报告说自己猎杀了那三十头麋鹿中的二十七头。尽管这个说法听起来太过离奇，但是随后派去查看的轻骑果然看到了铺满雪地的鹿群尸体。此后失吉忽秃忽的豪勇和胆识也使他在铁木真的眼中成为栋梁之材。



冬季移营中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肃清了草原之上的其他各路强敌，回到自己的“根本之地”斡难河流域，树起了九游白旄纛旗，正式建立了蒙古帝国之时，失吉忽秃忽因为功勋卓著，不仅没有因为是塔塔儿人而受到歧视，在被册封为千户那颜的同时，还领命就任蒙古帝国最高法官——断事官，负责刑罚词讼及民户分封等事务。

在这个岗位之上，失吉忽秃忽按照铁木真“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集中起来的要求，建立起了蒙古帝国第一部案例集和档案——青册，以及第一部文字法典——“成吉思汗大扎撒”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推行。作为一名法官，失吉忽秃忽无疑是称职的，据说他在审理案件之中奉行“逼供来的证据没有任何价值，充分的事实或自动坦白才是定罪的依据”的理念，一度整肃蒙古帝国内部先前杂乱无章的情况。

而失吉忽秃忽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则是处理蒙古大军不断在前线占为己有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在这个方面失吉忽秃忽的工作同样成果斐然，他不仅拒绝了金帝国降将合答的贿赂，将各地所缴获的财物、人口据实上报之外，还将著名的治国贤才耶律楚材推荐给了铁木真。获得铁木真的嘉许。失吉忽秃忽虽然是铁木真的耳目，但是在有些问题上还是不能令自己的领导完全满意。据说他从被俘虏的女子之中进献给铁木真的都是一些年老色衰的妇女，没有一个能令铁铁木真看得顺眼的。不过失吉忽秃忽有他的理由——大汗的后宫里早已美女如云，而自己献上的这些都是产婆，她们懂得怎样顺利的接生孩子。

事实证明，失吉忽秃忽在内政领域是把好手，但是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却乏善可陈。他第一次单独领军便大败于花剌子模王子扎兰丁之手。此役失吉忽秃忽错误地估计了扎兰丁的实力，以绝对劣势的兵力进入了对手早已布置好的包围圈。失吉忽秃忽在发现自己形势不利之后，立即在军中扎了许多草人安置在蒙古骑兵所携带的备用马匹之上。但是这一心理战术被扎兰丁看破。最终失吉忽秃忽的部队损失惨重，他本人只能带领少数精锐突围。铁木真对失吉忽秃忽惨败看得很淡，表示“忽秃忽一向惯于打胜仗。现在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就会在军事上变得更加谨慎和富有经验了”。不过此后铁木真和他的继任者再也没有给失吉忽秃忽指挥大军的机会。

在宽恕了失吉忽秃忽之后，扎兰丁终于迎来了铁木真的蒙古西征军主力。应该说扎兰丁个人的军事才能颇为出众，但是花剌子模王国终究只是雄起一时，各地诸侯依旧无心死战。在部将不和、军队分裂、力量削弱的情况下，扎兰丁兵败印度河畔，最终只是独自跃马渡河，逃入印度。铁木真似乎觉得这个王子也挺有意思的，于是禁止部下放箭和下水追击，并指示自己的儿子们：“凡为将者，皆应如此也。”

在追击花剌子模王子扎兰丁的过程之中，蒙古铁骑第一次抵达了印度河流域。此时的南亚次大陆之上正处于分裂和混战之中，即便是较为强大的德里苏丹国，其政治体制和国防力量也不足以抵挡蒙古大军的兵锋。但当地炎热的气候却令长期居住于大漠之上的蒙古军队很不适应。印度河蒸气磅礴，虽然蒙古士兵口干舌燥，但是河水热度似沸，不能入口。这一点令整个西征军队怨声不断，恨不得立刻驰归。而恰逢此时一头鹿身马尾、绿色的独角怪兽的出现给了身为铁木真高参的耶律楚材借题发挥的空间。这头怪兽的叫声隐约有些像蒙古话。因此耶律楚材引用中国的神话“忽悠”铁木真，说这就是神兽角端，是上天厌恶杀戮的体现。而它所发出的叫声就是“汝主早还”。不过从科学的角度上分析，蒙古远征军所遇到的应该是今天仍分

布于尼泊尔和印度东北部的独角犀。

铁木真所统率的蒙古西征大军的主力于1223年前后开始踏上了归途。但蒙古第一次西征的脚步却并没有因此而止步。这一年的春天由东斯拉夫人组成罗斯联军出兵钦察草原向哲别和速不台所统率的蒙古军队发动进攻。公元13世纪的东斯拉夫人正处于公国林立的分裂阶段，他们之所以挥师东进，主要是由于接受了邻近突厥游牧部落的求援。1222年，哲别和速不台在扫荡了北高加索山区之后宣布：钦察地区是蒙古大汗长子术赤的封地，所有钦察人和该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是蒙古的臣民，都要接受术赤的统治。钦察草原游牧民为此不得不大举西逃，蒙古大军随即跟踪追击，一直渡过顿河，追逐到亚速海北岸以西之地。



花剌子模军队

罗斯的王公们在是否出兵与蒙古军队作战的问题上一度争论不休，最终还是加里兹公国密赤思老大公一锤定音：“钦察人虽与我们是世敌，但是大敌当前，救钦察就是救我们自己。如果把钦察人推向蒙古人，壮大了他们的力量，早晚我们将在罗斯的土地上迎接蒙古大军。不如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将蒙古人挡在国门之外。”密

赤思老大公之所以如此积极，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本人是钦察部首领迦迪延的女婿。而事实上蒙古大军此时并无心与罗斯王国交战，哲别和速不台曾派出10名使者到基辅会见各位王公，表示蒙古没有进犯罗斯的意图，只是讨伐钦察人，不要听信钦察人的挑拨。况且钦察人常年侵扰罗斯境内，不如与蒙古和兵同伐钦察，共分果实。但是在国密赤思老大公的坚持之下，罗斯各王公的联军还是杀死了蒙古使节，出兵第聂伯河下游。



罗斯联军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遭遇重创

罗斯各公国虽然各自的实力不强，但是联手出兵依旧集结了不下十万大军。而溃散各地的钦察人纷纷赶来加入联军参战。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仅仅有2万军队的哲别和速不台再度派使者，对罗斯诸王公表示："你们听信钦察人的谗言，杀害我们的使臣，集结军队向我们宣战。我们对天发誓说不侵犯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请你们不要进兵挑起战争。我们蒙古人是不怕打仗的，但是要把道理讲清楚。"罗斯诸王公觉得蒙古人不过如此，于是放回使者转告蒙古将领，坚持要与蒙古军约战。不过事实证明罗斯联军的战斗力远不如百战之余的哲别和速不台所部，在主动后撤并会合了术赤派来的援军之后，公元1223年5月31日，蒙古军队在迦勒迦河大败罗斯联军。罗斯联军损兵7万，有6位王公被处死，70位贵族阵亡，密赤思老大公被俘之后屈膝求降。

蒙古军乘胜长驱直入，蹂躏了南罗斯的广大地区，进入克里木半岛，攻陷速达黑城。1224年，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率军东行，在蒙古西部地区与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师，哲别则奉命留守钦察草原。这位屡建战功的蒙古骁将哲别，不久便病逝于咸海西部的康里境内。在结束了西征，返回蒙古草原之后，铁木真饶有兴致地在今天的塔什干以北举行围猎。由于西征的辉煌胜利，这次围猎更像一次家族休闲娱乐活动。铁木真留守和林的孙子们也纷纷前来参加。据说年幼的忽必烈和弟弟旭烈兀也分别取得了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的收获。按照蒙古民族的风俗，小孩子第一次狩猎要将猎物的血抹在家族长老的拇指之上。旭烈兀跑过去抓住铁木真的手用力猛按，搞得这位老人家很不舒服。铁木真随即说道："你这么用力对我这位老人家，我替你感到羞耻。"相比之下忽必烈则要乖巧得多了。他捧着铁木真的手轻轻地抚摸，令铁木真很是受用。

而在这次围猎中除了旭烈兀之外，术赤以生病为由没有前来参加也令铁木真颇为不爽。客观地说即便术赤有自己身为长子却没有机会继承汗位的不满心理在，他的生病也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一年之后，铁木真听信了来自西方的蒙古官员关于术赤"见其出猎，未闻有疾也"的说法，准备派察合台和窝阔台出兵讨伐自己的长子之时，术赤病故的消息便随即传来。铁木真在伤心之余，随即派自己的幼弟铁木格斡赤斤前往选定术赤的继承人。据说术赤子嗣众多，其中见著史料的便有十四人，而其中一直最为著名的拔都其实是术赤的次子。不过最有理由继承术赤遗产的长子鄂尔达自认才能不如自己的弟弟，于是在铁木格斡赤斤的主持之下，拔都随即成为

了术赤家族的领导人，但由于相隔的距离太过遥远，拔都返回蒙古草原参与黄金家族的政治活动，要等到1227年铁木真逝世之时。

在蒙古大军结束西征后不久，花剌子模王国的残余势力曾再度兴起，不过最初领导花剌子模复国运动的不是逃入印度的扎兰丁，而是在蒙古西征过程中始终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摩诃末第三子嘉泰丁。在蒙古西征大军回师之后，嘉泰丁纠合旧部迅速收复了呼罗珊和伊朗南部山区一带。和嘉泰丁相比，他的哥哥扎兰丁在印度混得却并不好。尽管德里苏丹一度接纳了他，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位王子。但是扎兰丁随后卷入了德里苏丹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惨遭放逐。在得到了自己弟弟复国的消息之后，扎兰丁随即北上依靠伊朗高原各地封建领主的拥戴，用武力将自己的弟弟赶下台去。



当代蒙古历史油画长卷之《铁木真与忽必烈》

由于蒙古帝国此时对伊朗高原缺乏热情，扎兰丁复兴花剌子模王国的行动一度颇为顺利。他不仅接受了自己弟弟的全部势力范围，还随即出兵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曾是高加索地区的强国之一，1221年前后其女王鲁苏丹妮，曾一度派

出三万大军响应罗马教廷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但是这一精锐部队最终没有能够南下巴勒斯坦，而是在第比利斯以东被哲别和速不台轻松歼灭。此时元气尚未恢复的格鲁吉亚自然不是扎兰丁的对手，首都第比利斯被花剌子模军队轻松攻陷。

而在征服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过程中，扎兰丁缺乏政治远见的短板显露无余。作为一名穆斯林他不仅破坏了第比利斯全部基督教教堂，还大肆屠杀所谓的“异教徒”。如果说扎兰丁攻打格鲁吉亚的行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随即又出兵小亚细亚，打击同为穆斯林的其他国家，就可以理解为自我孤立了。这位不事整顿内政，只知穷兵黩武的君皇很快便被窝阔台所派出西征军所击败，再度逃亡。最终于公元1231年8月在土耳其东部山区被当地的库尔德人杀死。扎兰丁死后不久，他的弟弟嘉泰丁也被其部将缢死，花剌子模王国的直系子孙从此悉数灭绝。

有趣的是在扎兰丁死后，花剌子模王国的故土之上始终流传着他再度侥幸逃生的故事。甚至在22年之后依旧有人身穿着印度丐僧的衣服，对阿姆河摆渡的船夫说：“我就是世人以为在阿米德山中被曲儿忒人所杀之花剌子模扎兰丁苏丹，当年被杀者实际上是我的马夫，我流落四方多年，此事尚不为世人所知！”摆渡的船夫随即将之诱至附近蒙古总督府处，在蒙古官员的严刑拷问之下，这位丐僧至死不改变自己即是扎兰丁苏丹的说法。

第一次西征对于蒙古帝国而言，可谓所获颇丰。除了西辽、花剌子模等中亚大国多年积累的财富，悉数被收入蒙古大军的囊中之外，大批手艺精湛的西域手工业者更被作为战利品，加入铁木真于西征之前便大量安置汉地匠人的“工业基地”——称海城、谦谦州等地。重视军工制造等手工业的发展，是铁木真和昔日草原霸主最大的不同。在蒙古西征之前，南宋方面的使者还认为蒙古大军军备极差，“元帅方有一旗，国王只有一鼓，临阵则用之。鞍轿以木为之，极轻巧。一石以上箭，用沙柳为笴。手刀甚轻薄而弯”。

而在第一次西征之后，前往蒙古帝国商讨“联蒙灭金”事宜的南宋特使彭大雅却惊诧于对手装备的精良：“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有批针，剡木以为栝，落鹏以为翎；有环刀，效回回样，轻便而犀利，靶小而褊，故运掉也易；有长、短枪，刃板如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防牌以革编绦，否则以柳，阔三十寸，而长则倍于阔之半；有团牌，时前锋臂之，下马而射，专为破敌之用；有铁团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阵转旋之便；有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炮之具。每天酋头项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常卷常偃，凡遇督战，才舒即卷。攻城则有炮，炮有棚，棚有纲索以为挽索者之蔽，向打凤翔，专力打城之一角，尝立四百座，其余器具不一而足。其长技，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前后如此之大的差异，自然与蒙古帝国军工系统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有形的财富之外，第一次西征还为蒙古帝国引入了中亚地区成熟的商贾系统和包税收制。作为昔日花剌子模与蒙古帝国通商事宜的负责人，色目商贾牙老瓦赤不仅没有在西征中受到牵连，反而受到铁木真的重用，受命与蒙古特派员一起治理辽阔的中亚占领区。而由于色目商贾长于理财，拥有大量资本的蒙古贵族也逐渐开始将财富、采邑交给色目商人经营，从中牟取利润。这些在汉族士大夫眼中“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的色目商贾，正是凭借着自身在经济领域的特长，逐渐成为蒙古帝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



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令蒙古铁骑的装备日趋精良

第一次西征的丰厚收益并没有缓解铁木真的征讨脚步。1223年，在蒙古大军主力回师的途中，铁木真召见了木华黎之子孛鲁，令继承当年去世的木华黎的职务“继掌经略中原事”，出兵征讨西夏。西夏国王李遵顼拒绝配合蒙古西征的狂妄言行，对于向来记仇的铁木真而言，无疑是必须严惩的恶行。早在蒙古大军开始西征的1218年，铁木真便令木华黎率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但由于此时中原大地群雄并起，东北方向更出现了耶律留哥的弟弟耶律厮不背蒙自立、建立后辽政权，一度投靠木华黎的蒲鲜万奴逃往图们江流域建立东真帝国的反复，使得木华黎不能长久屯兵于西夏战场，铁木真征讨西夏的计划只能暂缓实施。

蒙古大军主力西征，本是西夏王国改变附蒙攻金的外交政策，积蓄国力、对抗蒙古的大好时机。但偏偏屡次兵败令李遵顼对蒙古帝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即便面对木华黎这样一支偏师的统帅，也不敢违逆。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攻打金帝国的陕西边境要塞，对此，完颜珣除军事上予以反击之外，不断向西夏伸出橄榄枝，试图缓和两国关系。但李遵顼却始终拒绝和平。甚至在1221年农历三月，木华黎部渡过黄河，攻西夏河西诸堡，守将无力抵抗，纷纷投降的情况下，李遵顼还不思改变，继续派监府塔海设宴招待蒙古军队，将5万西夏野战部队交由木华黎指挥，将西夏的国运继续捆绑在蒙古帝国的战车之上。

1222年农历六月，木华黎率兵攻金陕西诸州，向西夏借道，李遵顼马上应允，并全力出兵配合，但在战场之上，早已不堪征讨之苦的西夏士兵却表现格外消极。1223年，西夏各地由于春旱颗粒无收，国内一度出现“饥民相食”的局面，与蒙古大军一道围攻金帝国风翔府的西夏野战军，不得不先行撤兵退还，用于国内维稳。但木华黎丝毫不体谅李遵顼的苦衷，以惩罚风翔之战夏兵不辞而别为名，包围了西夏军队好不容易从金帝国手中攻下的边境城堡——积石州（今甘肃省夏河县）。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或许是李遵顼“附蒙攻金”政策最好的写照，为了贯彻自己所制定的国策，李遵顼甚至不惜废黜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长子李德任。但换来的却是蒙古帝国方面一再遣使责令其退位的无情抛弃。1223年农历十二月，怀着无奈的心情李遵顼宣布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成为李西夏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太上皇”。

蒙古帝国逼迫李遵顼退位从政治意图上看，无非是想借此兴废之事确立对西夏王国的政治把控。但令铁木真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有个不靠谱的父亲，但李德旺却

是一个颇有政治抱负的新生代君主，他即位之初便立即改变李遵顼的附蒙政策。主动与金帝国联络，结束两国战争状态之余，更在1224年农历二月，利用蒙古帝国主力西征未归之机，遣使联络草原诸部，试图与不甘为铁木真驱使的部落结为联盟，以共同抗击蒙古。客观地说，李德旺的这一波外交攻势恰好打中了铁木真的软肋，眼见有后院起火之虞的铁木真，在西征军主力无法及时回师的情况下，只能要求中原方面军的新任统帅孛鲁先行出兵压制西夏。

木华黎在中原经营多年，所部早已不再是昔日铁木真大军西去之时的小股偏师。在吸收了大量背金自立的契丹、汉族乃至女真部武装之后，孛鲁所部兵强马壮。在经过一番血腥的攻防战后，蒙古帝国中原方面军于1224年农历九月，攻克西夏重镇银州。无奈之下，李德旺只能以请降、质子的名义，请求蒙古大军暂时后撤。自以为对手中了缓兵之计的李德旺显然并没有想到，铁木真同样需要时间以调整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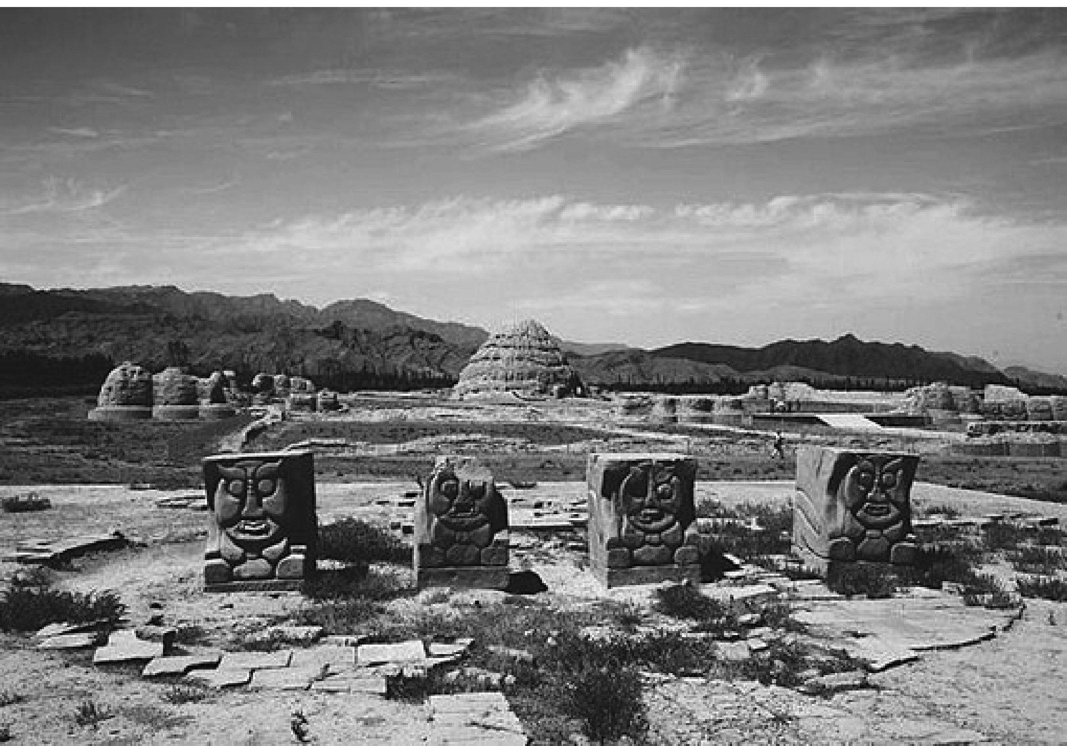
1225年，铁木真结束西征、回到漠北。一番休养生息之后，1226年农历二月，铁木真以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为借口，亲自统兵十万，由北路攻入夏境。先破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兀剌海等城。接着遣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合兵攻沙州。西夏军民顽强抵抗，蒙古军经过月余的强攻才攻克沙州。沙州沦陷之后，蒙古军挥兵南下，先后攻陷肃州、甘州和西凉府，西夏右臂的河西地区全部丧失。内忧外患之下，李遵顼、李德旺父子先后在惊惧中去世。西夏王国的政权如击鼓传花般落到了李德旺的侄子李的手中。

李即位之时，蒙古大军已分成东西两路向西夏都城挺进。八月，蒙古西路军越过沙陀（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东路军攻破夏州。两路夹击，形成对西夏政治、经济中心灵、兴地区的钳形攻势。十一月，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大军围攻灵州。李虽然派出最后的野战军紧急赴援，却恰好中了铁木真“攻其所必救”的诱敌之计。

被蒙古大军诱入黄河岸边沼泽地带的西夏军队虽然奋勇死战，其惨烈程度为铁木真起兵以来所少见，但最终仍以全军覆没而告终。攻陷灵州后，铁木真留一部分兵继续围攻中兴府，自己带领大部分军队渡黄河进攻积石州，以彻底卡断夏兵的后路。直到第二年闰五月，铁木真才回师隆德、避暑于六盘山中，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谕降。 此时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

献城投降。但偏偏在这个月里铁木真突然病故。在临终之际，铁木真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可怜还被蒙在鼓里的李打开中兴府的城门之后，便惨遭屠戮。至此建国一百八十九年的西夏王朝归于灭亡。

由于一生杀戮颇多，因此关于铁木真的死因也成为了后世好事者对其发泄不好的渠道。有人说他不孝生母、不悌兄弟，因此是为天雷轰毙。有人说他好色成性，因此是在围攻中兴府时为西夏王妃咬断下体而死。也有人说他围猎无度，是在六盘山中意外坠马，为自己的坐骑践踏而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客观地说铁木真一生戎马，中年之后身体状况便始终不是很理想。早在西征途中，其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不得不千里迢迢的召见中原道教全真系掌门人邱处机，寻求长生之药。



辉煌一时的西夏王国最终只剩下恢弘的王陵供后人凭吊

邱处机是一个拥有灵敏政治嗅觉的宗教领袖，在金、南宋和蒙古三方竞相拉拢的情况下。他以“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为由先后拒绝

了金帝国东平监军王庭玉和依附于南宋的李全的邀请。在铁木真的邀约直下，却不顾自己七旬高龄，带着徒弟尹志平等十八人欣然北上。

抵达燕京之后邱处机才知道铁木真远在西域战场，此时他才想起还是“身体要紧”，于是上表请求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但是此时的铁木真一心想着长生不老，于是采用逐步哄骗的办法，先是派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随后又派人要求邱处机前往他的行宫。此时铁木真的行宫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距离宣德也就两个月的路程。邱处机似乎觉得还能接受也就动身前往了。

在铁木真的行宫蹒跚了十七天之后，邱处机又接到继续西行的指令。随即踏上漫漫的长路。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越过名为大海子的呼伦湖，翻过杭爱山，好不容易抵达了称海城，这个时候的邱处机实在走不动了，于是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铁木真返回。但是铁木真却“不许稽其行程”，邱处机只能留下九名弟子在当地修建道观。随即继续向西翻越天山、阴山，穿过被称为大沙陀的准噶尔盆地沙漠，终于在1221年的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抵达了花剌子模的故都撒马尔罕，不过这个时候铁木真已经率领大军追击扎兰丁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而此时距离邱处机从山东出发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了。好在铁木真此时对战局发展颇为乐观，允许邱处机在撒马尔罕过冬，等待明年春天再进行朝见。

1222年的农历三月，养精蓄锐的邱处机不得不再度南下。又跋涉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渡过阿姆河抵达了位于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的大雪山行营。但是见面之后铁木真的第一句话便让邱处机很尴尬。铁木真说：“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邱处机只能无奈地回答：“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铁木真虽然不免有些失望，但是觉得这个老道倒也诚实，于是还是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并在军旅之中听取了邱处机“减声色，省贪欲”的道论。

邱处机前后历时3年，行程万里的“西游”，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铁木真对这个老道颇为照顾，不仅经常派人前来肉麻的表示“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更赐予了燕京金帝国宫城东北琼花岛离宫其周边数十顷的黄金地块以供邱处机修建道观之用。而为了利用邱处机在中原的声望，铁木真还特意赐给他金虎牌，任命邱处机为天下道家的掌门人。不过铁木真当时对中原的宗教事务并不熟悉，因此在诏书中含糊的写下了“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的字句，这一点直接导致了邱处机和他的弟子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除了“大开玄门”，保护和收容了大批

难民之外，邱处机还自恃有圣旨和金牌，派出弟子到处宣称可通管僧尼，到处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

而在围攻中兴府的过程中，蒙古军中也一度瘟疫盛行。好在当蒙古将士争着掠取子女财帛，唯独耶律楚材搜罗了西夏王国的诸多典籍以及两骆驼驮当时名贵的中药——大黄。在军中所爆发的疫病中，耶律楚材以这些大黄治愈了几万名蒙古军士。而铁木真本人则可能是年岁已高，终被这场瘟疫彻底击垮了。而从铁木真的一系列遗嘱来看，其临终之前不仅逻辑清晰、思维活跃，提出一系列针对金帝国的战略方针，更巧妙地回避了自己的继承人问题。

虽然自蒙古帝国草创以来，铁木真便利用千户分封的机会确立了自己一系对其他兄弟分支的主导权和绝对优势，但是对于自己的四个嫡子铁木真却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化解他们之中越来越明显的继承权之争。只能以不断的对外征服来暂缓其矛盾。此时长期以来一直由于血统问题而被铁木真所猜忌、诸兄弟疏远的长子术赤按照蒙古习俗中“以西为大”的理念被分封在了遥远的中亚地区，从此只能向西去征服“这个方面马蹄所至之地”，基本被排除在了继承人的行列之中。

铁木真虽然在西征中确立了次子窝阔台在军中高于诸兄弟地位，但按照蒙古民族“幼子守产”的惯例，真正得以继承了铁木真所控制的蒙古本土的却是四子拖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汗位的归属权似乎毋庸置疑。甚至连窝阔台之子阔出等人前来求赏，铁木真也表示：“我的产业已全部给了拖雷，他是一家之主，你们应该向拖雷去要。”可见在铁木真的心目中，俨然将拖雷视为自己帝国的继承人。

但是当时的蒙古帝国依旧沿袭着过去部落联盟的政治形态，因此在铁木真死后，由谁来继承汗位并不以统治者的个人意愿为转移。而铁木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自己遗嘱之中突然将深得人望的窝阔台推到了台前。很大程度上便是认识到了窝阔台在蒙古帝国内部拥有着比拖雷更深的根基。而即便是这样的安排，在铁木真逝世后的两年时间里，以监国身份管理蒙古帝国日常政务的拖雷始终态度暧昧不明，而他的部下更一而再、再而三发出拥立拖雷的提议，令窝阔台不得不以退为进再三推让。但此时另一股力量的介入，却动摇了拖雷即位的法理根基。

在蒙古族的风俗之中向来以东为尊，因此铁木真将自己的兄弟及其后裔分封在东部地区，而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西，理论上说也合情合理。但是在当时蒙古草原之东的大兴安岭及松花江流域依旧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因此在蒙元帝国的历史中“东道诸王”的政治影响力始终在盘踞着今天的甘肃、新疆乃至辽阔中亚地区的“西

道诸王”之下。但在铁木真逝世之时，“东道诸王”中却有一位足以问鼎大宝的人物，他就是铁木真的幼弟——铁木格斡赤斤。



蒙古大汗的王帐

尽管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一度对于铁木真给予自己和铁木格斡赤斤的封地颇有不满。但事实上铁木格斡赤斤所获得的领民虽然不多——根据《史集》中的说法：铁木格斡赤斤分得五千户，而诃额伦分得三千户。但是依照蒙古“幼子守产”的惯例，诃额伦的领民最终也交由铁木格斡赤斤继承，其总和依旧远在其他蒙古权贵之上。而在1214年随着蒙古帝国政治中心的南迁，铁木格斡赤斤封地更囊括了今大兴安岭以西，海拉尔河以南到哈拉哈河一带。这一地区除了地域广大，资源丰富之外还扼守着蒙古高原进入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在铁木真所展开的蒙古帝国的第一次西征之中，铁木格斡赤斤再度自愿留守。此时即便是全权负责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名义上也在铁木格斡赤斤节制之下。不过这位仁兄显然对中原事务没什么兴趣，在“放手”让木华黎与金帝国鏖战的同时，他悄然将手伸向了辽东和朝鲜半岛。除了稳步的将自己的势力拓展到大兴安岭

以东地区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之外，铁木格斡赤斤还几次三番以“皇太弟”的名义向高丽政府发出“国书”要求其臣服。

铁木格斡赤斤自诩“皇太弟”，除了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之外，当然还高举着“幼子守产”的习惯继承法。因此铁木真的直系子嗣要杜绝其染指大宝，便必须摒弃这一传统。最终在蒙古东、西道诸王支持窝阔台的情况之下，拖雷不得不选择让步。在窝阔台的即位典礼上，蒙古帝国的内部形势显得格外明朗，东道诸王的领袖——皇叔斡赤斤扶着窝阔台的左手，西道诸王的领袖察合台扶着窝阔台的右手，而拖雷则负责敬上一杯装在金樽中的美酒，这杯酒的个中滋味或许拖雷和窝阔台都有着各自的理解。

第六章　黄河彼岸

新生时代
——窝阔台执政之初对蒙古帝国战略的全盘调整（上）

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政治博弈之后，窝阔台虽然最终坐稳了蒙古帝国大汗的宝座，并要求参与自己登基大典的诸路王公，立下“只要是从窝阔台子孙中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我们仍要拥立他为汗”的誓言。但作为一名大国领袖，窝阔台自然深知如何誓约，在个人野心面前都一文不值。而此时在他的治下，至少有四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在蠢蠢欲动。

作为铁木真的长子，术赤本人虽然已在1225年病逝，但其子拔都却已长大成人，且在蒙古帝国第三代政治人物中大有独占鳌头的架势。但窝阔台对遥远的钦察草原毕竟鞭长莫及，只能以完成术赤未竟之志的名义派遣大将速不台辅佐拔都继续在伏尔加河流域开疆扩土。虽然窝阔台深知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在自己的子嗣能够独当一面之前，窝阔台并不急于与拔都这样的后生晚辈争锋。

如果说随着术赤的早逝，侄子拔都对于窝阔台而言，还属于可暂时搁置的“肌肤之疾”的话。那么曾以“监国”之名掌握蒙古帝国达两年的弟弟拖雷，却是窝阔台必须尽快解除的“心腹大患”。但拖雷一系兵强马壮，如果以武力对抗不仅胜负难料，内战一起更令整个蒙古帝国伤筋动骨。在权衡利弊之后，窝阔台最终决定采用借刀杀人的方式，令拖雷负责南下攻金相关军事行动。

在金帝国迁都汴梁后不久，完颜珣寄予厚望的长子完颜守忠、长孙完颜铿已先后去世。因此其继承人只能在次子完颜守纯和三子完颜守礼之间挑选。从完颜珣的个人感情而言，似乎更倾向于庶出的完颜守纯，一度任命其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掌握近卫军权，随后又加封其为掌握军国大权的“平章政事”。完颜守纯也没有辜负自己老爹的期望，于1220年成功翦除了权倾朝野的军阀——术虎高琪。但完颜守纯庶出的身份，最终令其与帝位无缘，随着弟弟完颜守礼被册立为皇太子，改名完颜守绪之后。完颜守纯的工作热情明显受挫，以至于完颜珣不得不亲自训诫说：“汝乃惟饮酒耽乐，公事漫不加省，何耶？”

完颜守纯虽然对工作不怎么热心，但是当1224年1月完颜珣病重之际却颇为积极。第一时间跑进皇宫，摆出一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架势。但身为太子的完颜守

绪也不是省油的灯，面对完颜守纯封闭的宫门，完颜守绪第一时间调来了自己3万人的东宫卫队。无力争雄的完颜守纯只能乖乖开门，接受被幽禁于自己的府邸的命运。

面对蒙古帝国步步紧逼的危局，完颜守绪力图振作，他即位后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针对铁木真死后，蒙金之间的战线一度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完颜守绪也试图谋求和平，以为自己争取调整部署的时间。为了体现自己的诚意，西夏的灭亡本来是金帝国最为危险的信号，但完颜守绪却不知道从哪里灵光一闪，从铁木真临终前所谓“停止杀戮”的遗嘱里读出了和平的讯息。于是不仅停止了对各地城防工事的修筑还严格控制军需品的租调。然后颇为得意的向大臣萨哈连说：“‘水深才见高度’，大家都在怂恿我和蒙古决战，只有你很从容。先帝一直说你是可用之材，果然和我英雄所见略同。现在和平即将来临了！”

完颜守绪派阿固岱前往蒙古，以给予“赗赙”的方式来伸出橄榄枝。所谓“赗赙”就是给钱帮你们家办丧事“意思、意思”。但不想这样的好心却成为了铁木真继承者窝阔台的战争理由。窝阔台对阿固岱说：“你们家主子这么长时间不投降，让我老爸死在行军途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谁要你来意思、意思。”以此为借口，窝阔台再度整军南下。

面对金帝国依托黄河和潼关所构筑的防线。铁木真在临死前曾指示自己的子嗣：“金帝国的精锐部队集结于潼关一线，在他们的主场我们讨不到什么便宜，不如向南宋政府借道。南宋和金帝国是世仇，一定会答应我们的。我们的部队从侧翼迂回过去，直接威胁金帝国的首都，一定可以将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当时对方千里赴援，人马疲敝……呵呵，你懂得。”不过在蒙古帝国的继承者窝阔台看来，自己的铁骑在哪里都是主场。何况在灭亡西夏和进攻金帝国陕西一线时，蒙古军队习惯性的“搂草打兔子”，顺手对南宋四川利州路关外五州及其所属关寨城堡大肆劫掠了一番，酿成了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在此之后南宋方面不仅有大臣提出 “存金以藩鞑”的联金抗蒙战略，淮东战线上的赵范、赵葵兄弟更与金帝国野战军达成了攻守同盟。因此窝阔台并没有遵照自己老爸的意思，依旧不断向潼关一线发动进攻。



长途奔袭是蒙古军队的长项

在这条战线之上，蒙古大军除了要面对不利的地形之外，完颜彝和他所统率的金帝国“忠孝军”更成为了窝阔台无法逾越的屏障。完颜彝这个名字在蒙金战争的历史中并不响亮，不过他的小名——完颜陈和尚还是比较有知名度的。完颜彝的老爸也是金帝国的战将，不过没有等到和蒙古人交手，便死在了与南宋的战争中，完颜彝还没来得及子承父业便被南下的蒙古铁骑俘虏。不过当年蒙古军队还没有后期那么习惯于屠杀，因此完颜彝不仅没有被杀，还以回家探望母亲为由逃出了蒙古军营，成为了日后蒙古军队眼中麻烦的代名词，而由其所组建的“忠孝军”仅从名字就大体可以猜得出这支部队和南方的忠义军一样是个有别于正规军，由各种流亡者组成的“山寨军队”。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山寨货”一般都比较威武。在庆阳大昌原战役之中，完颜彝只带着四百骑便大败蒙古八千主力军，堪称蒙金二十年战争以来金帝国首次不注水的大捷，在这次胜利的刺激之下，完颜守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蒙古使节叫嚣道：“我已准备军马，能战则来。”

完颜守绪这种亢奋的情绪并不能感染完颜彝和前线的将士，因为他们在统帅副

枢密使移剌蒲阿的命令之下正埋头忙于抢掠蒙古占领区内的人口和牲畜。尽管这样的袭扰作战每次都能有所斩获，但是对于每次所投入的庞大兵力而言却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对此完颜彝对同僚抱怨道：“副枢密使以大将军的身份干着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今天抢了三头牲畜，明天掠来一两千牛羊，却完全不顾步兵吃不吃得消。大金帝国最后的这点家底看来是要被他掏空了。”军营里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话很快传到了移剌蒲阿的耳朵里。在一次酒会上，移剌蒲阿走到完颜彝的面前敬酒，颇有领导威仪地说道：“听说你小子在背后说我是个败家子，有没有啊？”按照惯例身为下属理应锤胸顿足、赌咒发誓说绝无此事，不过完颜彝喝完酒之后只说了一个字“有”。移剌蒲阿也只好打个哈哈，颇有领导气度地说：“以后这话当面说，当面说啊！”

在潼关一线不断进攻受挫的窝阔台终于发现还是自己老爸临死前制订的计划比较“给力”。于1231年年初派出拖雷统率精锐部队自凤翔过宝鸡，入小潼关，经过宋境沿汉水而下，自唐、邓一线迂回攻击金帝国的首都汴京。不过铁木真所设想的是向南宋政府借道，但是南宋政府不仅多次拒绝蒙古使节李邦瑞入境，对其提出的“借道攻金”也采取不通融的态度。不过蒙古铁骑可不是你一句“不行”就能挡住的。拖雷一边指挥大军“武力借道”一边派出使节速不罕前往青野原，再次向南宋提出借道要求。在速不罕被南宋边防将领诱杀，南宋边境各处军民在得到消息后“烧绝栈道”，以示不允许蒙古军过境的决心之后，拖雷王子有些兴奋地说道：“宋自食言，背盟弃好，今天的事情我不能这么算了！”于是明目张胆的挥军深入南宋领土。这场没有宣战的蒙宋之战同样按照干支纪年被称为“辛卯之变”。

拖雷的这次战略大迂回可以说是蒙古军队的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他不仅直捣了金帝国空虚的腹心，更一举摧毁了南宋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川陕一线“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边防体系，令南宋的战略大后方——四川满目疮痍。当时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不过由于窝阔台是在官山九十九泉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拖雷军队的行动路线的，而一路与南宋军队的纠缠也令拖雷的部队失去了奇袭的突然性。因此金帝国在拖雷大军抵达战场之前有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时间。此时金帝国的文官系统纷纷建议完颜守绪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使对手“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但是完颜守绪认为“敌至不能迎战，徒欲自保京城”很没面子，决定听天由命，

集中全部主力豪赌一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帝国的这次主力决战并非全无胜算。因为这次集结相对从容因此并没有出现“千里赴援”的疲惫，更没有误认为对手“从天而下”的恐慌。但是统率这支大军的移剌蒲阿却绝对可以媲美宋襄公。蒙古军队在抵达主战场之前还需要强渡汉水这道天堑。大多数将领都主张击其于半渡或者直接沿汉水布防。但移剌蒲阿却觉得将敌人压制在河滩或者直接沿河对峙比较不爽，远不如让对手渡河再战来得妥帖。

蒙古军队从容渡过汉水之后，金帝国的主力兵团在禹山预先布阵，本来也是占据上风。但是蒙古骑兵一采取迂回的战术，移剌蒲阿就觉得：“今日之势，未可战也。”虽然部下奋战勉强击退了对手的突击。但是移剌蒲阿却不敢放手追击，而是一心等待着对方耗尽粮草不战而败。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兵力是拖雷的数倍，比消耗粮食的速度来，蒙古军队远不是金帝国的对手。庞大的金帝国野战兵团最终在返回邓州补给的途中再度遭到了蒙古骑兵的突袭，几乎溃不成军，退入邓州城后，甚至不得不鸣钟召集暗夜中迷路的士卒。禹山的惨败再度被移剌蒲阿鼓吹成了胜利，不明真相的金帝国朝野一片欢腾。左丞李蹊甚至喜极而泣的表示“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而原本聚集在金帝国首都——汴梁的难民和民兵也纷纷返回家乡，结果几天之后便都成为了蒙古大军游击骑兵的俘虏。

蒙古骑兵在汴梁附近的游击作战，成功地将猬集于邓州的金帝国主力兵团吸引了出来。而在行军的途中，拖雷不断发动突袭和骚扰，令金帝国军队疲惫不堪，而又一场大雪更令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金帝国士兵在三峰山野外几乎全部失去了战斗力，而蒙古骑兵养于塞北，对于这样的寒冷天气表现出了良好的免疫能力，最终除了完颜彝等少数将帅逃进了附近的钧州城外，金帝国最后一支可以一战的野战兵团也全军覆没。

在钧州城内完颜彝率部与蒙古军巷战，最终主动放下了武器。而在被俘之后，这位金帝国最后的名将表现出了一个军人应有的气度。在拖雷面前他自报姓名，随后说：“我是大昌原、卫州倒回谷战役的指挥者。我如果死在乱军之中，也许还有人会猜测我是独自潜逃了。而今天我明明白白的死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的结局。”不过对于这个蒙古军队的宿敌，拖雷倒不是很客气。对他施以酷刑，折磨而死。面对这样的硬汉，蒙古军队中也有将领表现出了惋惜之情，他们用马奶酒祭祀完颜彝。希望这样的好男儿“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

而就在拖雷的大军一路奏凯的同时，其他的几路蒙古军队却状况频出。特穆尔岱率领的左路军在归德府遭到了金帝国防御部队的顽强抵抗。在这座曾经以睢阳的名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城市防御战传奇的城市里，金帝国军队竟然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挖出了唐代张巡所埋的古炮，而且数量多达五千门之多，而特穆尔岱屯兵的城南高地据说就是尹子奇攻破睢阳故址。有人向特穆尔岱提出决开黄河大堤，水灌归德府的建议。谁知道河水从西北流向城西南的濉水故道，反而成为了天然的护城河。恼羞成怒的特穆尔岱想要追杀这个馊主意的提出者，却发现对方早就卷了赏金跑路了。

在汴梁城下，当年铁木真麾下号称“四狗”之一的速不台同样遭遇了空前的苦战。作为金帝国的第二首都，汴梁经过了五代十国时期历代君主和北宋政府的多年经营，城防体系堪称世界一流。而当年曾被宋钦宗用来砸过女真大军的皇家园林艮岳中的太湖、灵壁假山石再度成为了投石车的弹药。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徽宗赵佶耗费国力搞得“花石纲”也并非全无用处。而在这场攻防战中中原帝国的科技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铁罐中灌满火药的原始榴弹——震天雷令蒙古大军的诸多攻城器械形成玩具。而以火药为动力的“飞火枪”更压制了掩护攻城部队的强弓劲弩。起初对于金帝国的停火请求，速不台还牛气冲天的表示：“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最后也只能放下身段，主动提出：“两国已讲和，更相攻耶？”

而在激烈的汴梁攻防战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矢石如雨之下，竟然有一个女孩子冲到城下，大声疾呼：“我叫张凤奴，是被蒙古军掠走的许州人。敌人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大家努力为国坚守，不要被他们所欺骗了！”言竟就跳壕沟自杀了。没有人知道在乱世中这个弱女子经历了什么，但是她最终的绝响却绝对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善良和顽强。而在这场战役之中，位高权重的女真人并没有太多的伤亡，在蒙古大军撤离之后，汴梁城外却多了九十多万座新坟。完颜守绪的大女儿对自己的父亲说：“近来立功效命的都是汉族及其他异族。我们女真人太平的时候就钩心斗角，有事却让他人尽力，百姓焉得不怨？”可以说蒙金战争后期金帝国所表现出的大多数悲壮，与其说是女真族最后的光芒，不如说是汉民族在守护自己家园中一如既往的无畏和顽强。

1231年，窝阔台与拖雷的分进合击，虽然掠取河南十数州。但归德、汴梁的久攻不下还是令同样承受巨大战争减员压力的蒙古帝国不得不于1232年农历四月选择回师，而就在蒙古大军北撤的途中，一出离奇而荒诞的政治闹剧悄然上演：身为大

汗的窝阔台突然病倒，随军的萨满巫医随即表示："这是金帝国的山川之神认为蒙古大军杀戮过多所导致，不用人命为供品是无法解除其诅咒的。而甘愿牺牲的还必须是蒙古大汗的兄弟或者子侄"。这个时候最令人觉得惊奇的事情出现了，拖雷竟然主动提出愿意为自己的哥哥献出生命。在喝下了窝阔台的洗澡水之后没几天，拖雷便死在了行军途中，而窝阔台则神奇的康复了，对于这一段关于兄弟情谊的神话，或许连习惯为了胜利吹鼓的史官们都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于是留下了"窝阔台康复，而拖雷病死，虽然可能是巧合，但是弟弟这种至孝，可以感动鬼神是没有问题的。怀疑它过于荒诞的人，都是世俗浅薄……"

据说拖雷在甘愿代死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哥哥能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这一点窝阔台的确有去做。不过他的安排是让自己的长子贵由按照蒙古的旧俗迎娶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从而"继承"拖雷系的全部领土和麾下的百姓、财产。不过窝阔台显然太小看自己的弟妹了。作为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扎合敢不之女，可以说是从小便在显赫的草原贵族中长大的，因此对于政治格外的敏感，她不仅对窝阔台的这一安排，以要"教养拖雷诸子成人"为理由婉拒了。更对窝阔台不经宗室会议商讨，便私自将拖雷名下的财产分给自己的三子阔端的行为采取了忍让。

应该说拖雷夫妻的遭遇在蒙古帝国内不乏同情者，以失吉忽秃忽为首的铁木真时代的官员曾向唆鲁禾帖尼提议，应该召开诸王会议对窝阔台当面质问，但是唆鲁禾帖尼却反过来说服他们应该遵从大汗的旨意，而且虽然被分割了部分财产，对于唆鲁禾帖尼而言她和她的儿子依旧衣食无忧，而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的几个儿子日益长大更能感到安慰的了。

唆鲁禾帖尼顺从的态度最终引来了窝阔台的信任，根据《史集》中的说法"（唆鲁禾帖尼）她在采购他们（诸子）和丈夫的军队的食品和装备之时，建立了严格的核算措施，使任何欺骗都不可能得逞。合罕（窝阔台）一切事情都同她商量，不违背她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允许对她的命令作任何更改"。似乎有将唆鲁禾帖尼视为自己"贤内助"的意思，而获得拖雷大量领民的阔端也把这份恩情算到了自己婶婶的头上，在未来新一轮的权力角逐之中抛弃了自己的侄子失烈门等人，站在了堂弟蒙哥一边。

除了将唆鲁禾帖尼吸纳进自己的智囊团之中，窝阔台还对拖雷的长子蒙哥十分宠爱，甚至一度有将汗位传给对方的意思，据说他曾爱抚地摸着蒙哥的头说："你是

将来可以君临天下的人啊！”不过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因为随后窝阔台又因为自己用母牛来喂自己养的豹子时，小孙子失烈门一句：“那小牛怎么办？”感到自己的小孙子宅心仁厚，也认为失烈门有君临天下的潜质。拖雷系的蒙哥兄弟想要翻盘仍要耐心的等待时机。而在解除了拖雷系对自己家族威胁的同时，窝阔台也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叔叔——铁木格斡赤斤。

身为“皇叔”的铁木格斡赤斤虽然在窝阔台即位的过程中，虽然在窝阔台即位的过程中成功“搅局”，挤掉了拖雷以“幼子守产”之名继续“监国”的可能。但其领袖“东道诸王”的政治地位及以“皇太弟”身份收高丽为附属国的举动，仍令窝阔台感到不安。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窝阔台一方面将中原的益都路及平、滦二州赐给铁木格斡赤斤，作为其家族在中原的飞地。将“东道诸王”的力量引入蒙金战场。同时以蒙古帝国中枢的名义正式接管对高丽王国的外交事务。

蒙古帝国与高丽王国的接触始于1218年。当时契丹反金义军首领耶律留哥之弟——耶律撒不背蒙自立，于澄州（今辽宁省海城市）建立所谓的“后辽帝国”。但耶律撒不在契丹义军中的威望远不如其兄，旋即为部将所杀。内部失和的“后辽”政权自然无力抵御蒙古大军的征讨，只能向东越过鸭绿江，重文轻武、笃信佛教的高丽王国无力抵达这股契丹大军。因此当蒙古帝国军以“追剿”之名尾随进入高丽王国境内之时，高丽国王王皞丝毫没有抵触情绪，还命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

在攻克了为契丹族叛军所占领的所谓“后辽”首都——高丽江东城之后，蒙古与高丽正式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但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同盟。高丽王国虽然借口“道远，难于往来”，但每年仍要“遣使十人入贡”。事实上宣告了高丽臣属于蒙古。在高丽王国表示臣服之后。蒙古东道诸王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其中1221年使者著古便以铁木格斡赤斤的名义前往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两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铁木格斡赤斤狮子大开口，著古本人更是骄横贪婪，竟然一路任意索要，最终激起高丽民众的愤怒。1225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当地百姓杀死，蒙高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也随之断绝。



据说在韩国很火的抗击蒙古入侵的油画

铁木格斡赤斤的特使为高丽所杀，自然不免引起了蒙古“东道诸王”的愤怒，但此时恰逢蒙古大军刚刚结束西征，又忙于准备攻伐西夏之际。随着铁木真病故而空悬的汗位，更是引发了铁木格斡赤斤问鼎的野心。因此对朝鲜半岛用兵的计划便一再拖延，直到窝阔台即位之后，这一问题才再度浮出水面。而此时金帝国方面也正在积极通过叛将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真政权与高丽王国结盟，试图在蒙古帝国的东线打开局面、牵制对手。有鉴于此，1231年，窝阔台在南下攻掠金帝国的同时，命昔日领军进入过朝鲜半岛的老将撒里台再度统兵出征。

撒里台当年与高丽王国联手围剿契丹叛军，不仅熟悉朝鲜半岛的风土人情，更与高丽王国将领赵冲、洪福源等人结下了不错的私人情谊。此次蒙古大军再度横渡鸭绿江，负责高丽王国边防的将领——麟州都领洪福源随即成为了“带路党”。在洪福源的指引下，蒙古大军轻松攻陷四十余城，进围高丽王国首都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在令其投降的同时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

量贡物，并命送高丽王室以王公大臣之子女作为人质。高丽国王王皞随即派自己的弟弟王侹到蒙古帅营请降，同时献上大量的金、银、衣、马、器皿，在各项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后，蒙古大军于1232年初班师还朝。

经过一年的战争，本来蒙古和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初步稳定了。但是于1232年农历二月抵达王京的蒙古使者都旦的举动却令高丽王室不得不奋起抗争。都旦是契丹人。他本来只是前来催促高丽王国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的。但是出于个人野心，都旦却说自己是奉窝阔台之命前来“都统高丽国事”，还想直接从招待所搬到王宫居住。忍无可忍的高丽国王王皞听从权臣崔怡的意见迁都江华岛。不仅处死了使者都旦和蒙古帝国在朝鲜半岛派驻的72名特派员（达鲁花赤），还带着首都的群众“上山下海”，准备和蒙古帝国展开持久战。

面对高丽王国的不合作态度。撒里台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依旧以“带路党”的身份率领着朝鲜半岛北部的民众迎接“王师”，蒙古大军轻松的夺取了已经成为空城的王京，在没有海上力量无法登陆江华岛的情况下。撒里台领兵继续南下，在夺取了高丽王国的南京之后，撒里台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处仁城，被流箭射死。由副帅铁哥领蒙古军队随即回师。将以西京为中心的占领区交给洪福源管理。

1233年，窝阔台诏谕高丽国王王皞，列举了对方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高丽王国再度被激怒了，在以崔氏家族为首的武派的坚持之下。高丽军队出兵对洪福源展开了北上攻势。无力抵抗的洪福源只能带着诸多降民逃到了辽东半岛。高丽王国之所以得以“雄起”一时。很大程度上缘于此时窝阔台已将注意力转向了盘踞辽东的东真王国。利用蒙古西征之后又用兵西夏、同时与金力争中原，无暇分兵辽东的有利时机，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真王国不断发展壮大，其疆域最盛之时：东至日本海，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省依兰县），西至长白山脉，南至与朝鲜青州（今朝鲜咸镜北道）接壤，基本涵盖了今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部地区，正是有了相对雄厚的实力，蒲鲜万奴才敢于向高丽王国发出：“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斡赤斤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希望结成抗蒙同盟的倡议。

面对高丽王国的反复和蒲鲜万奴的张狂，窝阔台与其说是无力征讨，不如说是在坐待良机。1233年农历二月，窝阔台“诏诸王，议伐万奴”。但最终却没有任用富有战场经验的老将挂帅，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长子贵由。而从窝阔台为自己儿子所配置的将领来看，更不难发现此举背后的深意，除了木华黎的长子塔思、速不台长子兀良合台等蒙古新生代将领之外，贵由此次远征军中还囊括了大批昔日契

丹反金义军的后裔，如移剌捏儿之子移剌买奴、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查剌等悉数从军。如果说这些宿将元勋之子从征，是窝阔台有意在培养贵由未来的政治班底的话，那么其特意挑选铁木真三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作为贵由的副手“将左翼军讨之”，则无疑是为撬动整个“东道诸王”政治版块所插入的一根杆杆。

在自己的诸多兄弟之中，铁木真最为忌惮的莫过于二弟合撒儿，因此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在铁木真已经决定不再重复过去部落统治的固有模式，开始寻求自己独揽大权的新道路的同时，骁勇善战的合撒儿必然成为其绊脚石。虽然最终在母亲诃额伦的干预之下，合撒儿保全了性命。但是却失去了此前的特殊地位，麾下的部署大多被铁木真调走，沦为普通的将领抑郁而终。而对于英年早逝的三弟合赤温，铁木真倒颇有几分香火之情，作为合赤温之子的按赤台，很早便跟随伯父铁木真南征北战。但由于毕竟是后生晚辈，按赤台在“东道诸王”中的地位始终不及叔叔铁木格斡赤斤，窝阔台此时重用按赤台自然是有心在“东道诸王”中扶植一个新贵，以分化铁木格斡赤斤的势力。

面对贵由和按赤台所统帅的蒙古大军，蒲鲜万奴没有在野战中一决胜负的勇气，只能全力据守自己的新都——开元城（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但此时的蒙古军队早已在战争中练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攻坚战术，即便东真国的首都“城坚如立铁”，但仍在石抹查剌“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橹”的猛攻下沦陷了。 虽然蒲鲜万奴一族在城破之后被悉数诛灭，但窝阔台对于东真国的政权却予以了保留。毕竟东海女真一族在当地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其耗费气力的斩草除根，不如收为己用。而沦为蒙古藩属的东真国，此后也对蒙古攻略高丽颇多助力。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真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洪福源等朝鲜叛将也带着“还乡团”又杀了回来。这一次高丽国王王皞不得不派出王族成员王佺北上朝见。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使节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的宗藩关系。

窝阔台不遗余力地在辽东、朝鲜半岛用兵，固然有蒙古帝国南下攻金的同时，解除侧翼威胁的军事需要。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通盘考量，随着东真和高丽的臣服，“东道诸王”基本失去了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的空间，只能跟随着窝阔台的指挥棒进入中原战场。而作为“东道诸王”的领袖，铁木格斡赤斤在窝阔台在世期间，只能小心翼翼地收敛着自己的野心，继续经营自己的封地。

而在窝阔台调整自己帝国内部的诸多问题的同时，彼此对立的金宋两国之间也不断在修正着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蒙古与金帝国之间的战争对于偏安东南的宋皇朝

而言，起初并不引起重视。唯有湖北路安抚使赵方认定“金人北逼于蒙古，计必南迁。”于是进一步强化长江中游的重镇江陵一线的防御体系。果然在蒙古的压力之下，金帝国选择了南下。对于金帝国军队在边境附近不断招降纳叛、步步紧逼的局面，师从张栻的湖湘学派巨子表现出了南宋士大夫特有的战斗激情。他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朝廷和、战未定，益乱人意，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尔！”在边境上一再挫败金帝国的野战部队。

而金帝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南下的希望渺茫。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提出：“南宋有江南蓄积之馀，而我们只有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现在理应和南宋联合，使我们不至于两线作战。那么蒙古方面得到消息，可能还有所收敛。”但是金帝国的骄兵悍将却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继续向南用兵。最终虽然一度攻占了南宋的一线边境城市却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而蒙古和山东方面的红袄军也利用宋金战争的机会扩大了其在中原的势力范围，金帝国的统治愈加削弱。

面对危局，完颜珣颇多感慨。虽然有心南下攻宋但却没有可用之人。“天下之广，缓急无可使者，朕安得不忧！”而无论是对南宋边防部队还是红袄军战局都异常艰难。而山东方面奋起的“红袄军”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李全和杨妙真夫妻统帅。杨妙真之所以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百年之后的两位“粉丝”——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和何良臣。戚继光在他的军事操典《纪效新书》中首先提出：“枪法之传，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天下成尚之，变幻莫测，神化无穷，后世鲜有得其奥者”。随即在自己书中列出了据说杨妙真所创的“九转梨花枪”的图解。而何良臣虽然在军功上与天下闻名的戚继光相差甚远，但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军事理论家，他在自己全书四卷，二十三类，六十六篇的《阵纪》也颇为推崇的表示“天下无敌者，惟杨家梨花枪法也”。

但在正史之中杨妙真却并不以长枪见长。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杨妙真）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宋史》中则说杨妙真“狡悍善骑射”。唯一提到杨妙真枪法的是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不过也并没有渲染其枪法精妙，只是说杨妙真“勇而有力，能飞马植枪，深入一尺”。由此看来出生于山东淄州、青州交界处的杨妙真可能是一个同时善于使用长、短兵器的复合性军事人才。

杨安国的起义军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在以“母舅刘全为帅”，“从子（杨）友伪称九大王”的情况之下，武艺出众的杨妙真自然也要参与军事事务。不过可能考虑到杨妙真是个女孩子，杨安国交付给她的任务更多的是守备自己的老营——杨家堡。

而正是这一安排，令杨妙真随后结识了自己的丈夫——李全。李全是山东潍州（今山东潍坊市）人。根据《宋史》中的说法李全虽然出生于北海一户农民家庭。但是在普遍习武的山东地区却也“弓马趫捷，能运铁枪”，加上他本人脑子比较聪明，又擅长社交。很快便在潍州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李铁枪”。

在“开禧北伐”中李全作为南宋特工一度在敌后不断展开“特种行动”。而其正式揭竿而起，是在金帝国为了躲避蒙古军队的兵锋迁都汴梁之后。他和自己的二哥李福聚众数千，随即又得到了其他各路起义军的响应和依附。随即成为了山东地区仅次于杨安国的地方武装。不过李全和杨安国虽然都“衣红衲袄以相识”，号称“红袄军”，但起初彼此之前却并无交集。李全甚至一度打起了杨安国根据地——杨家堡的主意。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李全的部队所过之处，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家堡不以为意。李全知道之后打算“攻劫之”。根据《齐东野语》中的说法，李全的部队抵达杨家堡之时，杨安国已经回师救援了。两军对垒之际，杨安国对李全说：“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结果李全和杨妙真“酣战终日”也没有决出胜负。于是在“忿且惭”的情况下竟想出了“伏兵诈败”的路数，最终才俘虏了杨妙真。杨安国倒也不介意，随即“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婚”。不过在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中却说李全和杨妙真并没有正式交手，杨妙真只是“飞马植枪”之后，请李全“飞马而拔之”，结果李全“不能拔”，于是只好“下马屈服，遂为夫妇”。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杨妙真的武艺都不在李全之下却是公认的。而杨安国也顺利通过“政治联姻”避免了与李全的直接冲突，组成了军事同盟。

杨妙真与李全成婚之后根据汉族女子出嫁从夫的风俗便留在了李全的军中。而身为大舅子的杨安国随即也为李全指了一条明路——归降南宋。杨安国是山东民间武装之中最早试图与南宋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他通过往来于南北的江淮商人季先、沈铎向南宋政府的京东经略按抚使兼楚州知州应纯之表达了“豪杰愿附之意”。不过在南宋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之前，杨安国的起义军便遭到了金帝国驸马都尉仆散安贞的全力镇压。在仆散安贞率金帝国重兵集团前来围剿之际，杨安国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以其为首的“红袄军”主力一度控制了莱州、登州、密州等地。一度建立了年号“天顺”的地方政权。而其妹夫李全也扼守穆陵关，威胁着金帝国军队的侧翼。但是在1214年农历七月的主力决战中，杨安国的“红袄军”却惨遭大败，连续丢失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杨安国本人在乘舟入海的过程中被贪慕金帝国“获杨安儿者，官职俱授三品，赏钱十万贯”赏格的船夫曲成等人袭杀，落水而死。

杨安国从据“三州之众十万”到死于逃亡途中前后仅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跟随着自己丈夫的杨妙真不仅来不及救援，连共赴艰难的机会都没有。毕竟李全驻军的穆陵关距离前线仍有三四百里的距离。不过在自己的哥哥败亡的过程之中，杨妙真还是轻骑北上，和自己的舅舅刘全一起收拾残局。也就出现了《宋史》中“刘全收溃卒，奉（杨妙真）而统之，称曰姑姑，众尚万餘。掠食至磨旗山”的情况，之所以称杨妙真为“姑姑”，是因为此时杨安国所部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杨安国的从子——杨友。不过南宋政府对于山东地区的情况不甚了解，于是在《宋史》中含糊的记述道：“（李）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当然也可能是为了安定军心，杨妙真和李全不得不在磨旗山“再度结婚”。

杨妙真、李全在磨旗山会师之后，随即与金帝国主力野战部队的完颜霆所部展开激战。完颜霆不是女真人而是出生于燕京宝坻的汉族人，原名李二措。在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之中李霆以组建民兵而获得了金帝国的信赖和重用，赐姓完颜氏。改名为完颜霆之后，这位数典忘祖的汉族将领表现的空前积极，不仅成为了镇压山东“红袄军”的主力，不久之后还在宋金边境冲突之中以四千人击败驻军朐山的南宋正规军三万之众，堪称“忠勇绝人”。面对这样的对手，李全夫妇显然没有讨到便宜，李全本人甚至一度被完颜霆麾下号称“赛张飞”的勇将张惠险些刺于马下。

就在“红袄军”起义进入空前低潮的情况下，南宋政府却开始大肆招降纳叛。而身为南宋政府的京东经略安抚使的应纯之首先任用的便是杨安国派来联络的江淮商人季先和沈铎。应纯之任命沈铎为武锋军副将跟随南宋正规军将领高忠皎一起北上。而季先则随军北上，沿途联络山东各地的民间武装。在与季先会合之后，李全随即出兵五千配合高忠皎对海州的进攻。随即又频繁出击，连续攻克了金帝国在山东一线的莒州、密州、青州等地。应纯之尝到了甜头之后，随即向南宋政府提出大规模收编山东民间武装的建议。此时大权在握的史弥远虽然以“频岁小稔，朝野无事”为由拒绝明纳，但还是私下同意应纯之设立一个“忠义军”的番号，暂定编制为一万五千人。不过不等李全南下，头脑灵活的沈铎便先一步招纳了东海马良、高林、宋德珍等小股民间武装的一万多人，挤占了“忠义军”的大部分名额。对此李全的心情多少有些复杂。

为了得到南宋政府粮食和军饷的接济，尽管对于应纯之这样泥沙俱下的扩充“忠义军”的方法感到不满。但是李全最终还是选择了率军南下，并将其家眷、辎重迁到了南宋制置使所在楚州的附近。杨妙真也随之移居，成为后方留守营房的主管。而

随着李全不断北上与金帝国交战，于嘉定十二年（1219）俘杀金帝国的“四驸马”而晋封为刺史，杨妙真也随即被南宋政府封为“令人”。这个所谓的“四驸马”虽然身份存疑，但是李全多年以来出生入死的战功却是实实在在的。而考虑到杨妙真本身也是武艺出众，因此她对李全而言可能不仅是“贤内助”那么简单。

对于以李全为代表“忠义军”出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向南宋中央提出“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需！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因此对其采取比较弹性驾驭的政策。用“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不断鼓励李全等人向北发展。以至于金帝国中央也惊叹：“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但是身为南宋政府的官僚，贾涉对于李全等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最终不过是利用而已，他在写给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的报告中提出：“天意隐而难知，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于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

由于南宋政府断绝了每年的财政补贴，金帝国很快便陷入了国库空虚的状态。为此完颜珣决定发动更大规模地对宋战争，对此翰林学士杨云翼提出反对意见：“今天的事势，与泰和年间反击南宋北伐时期有着太多的不同。首先时间选择上泰和年间是在冬天用兵，而今天则选择夏季作战。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掉，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西夏方面的情况来看， 向日弓箭之手在西边者，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掳守臣，败吾军而擒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谓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其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但是完颜珣此刻完全听不进去。最终南下的金帝国野战兵团在淮河流域遭到了李全统率的忠义军的全力反击，最终铩羽而还。

纟

乚

鉴于李全击退金帝国南征兵团的战功，南宋政府授予他保宁军节度使兼任京东路镇抚副使的官职，对此一直都对忠义军口惠而实不至的贾涉感叹道：“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之将至于不可劝耶！”对于羽翼丰满的李全等忠义军将领，贾涉逐渐失去了驾驭的能力，最终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而请求辞职，最终病死在返回首都的路上。而他死后，他的继任者由于种种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忠义军内部

的分化，将领们进一步蜕变成了控制山东、两淮一带的军阀。而贾涉此时年仅11岁的儿子贾似道也逐渐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

公元1227年的春夏之间，北上掠地的李全所部在青州为蒙古军队所包围。经过一年多的攻防战，李全最终在弹尽粮绝、突围失败的情况下选择了向蒙古军队投降。据说在决定投降之前，李全曾有过焚香南拜准备自杀成仁的念头。但是部下却劝解他说：“只要身体在，还怕没衣服！”也算是留得青山在的又一版本。对于迫于形势才选择归降的李全，蒙古人自然无法信任。但是身为木华黎长子的孛鲁却已经深谙他父亲的统御之道。他深知杀一个李全容易，但却会失尽山东乃至中原及两淮的民心。于是在请示了成吉思汗之后，孛鲁任命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的行省长官。

对于李全无奈投靠蒙古帝国的选择，南宋政府所派出的地方领导——淮东制置使刘琸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连亲自落井下石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鼓动忠义军中的另一个山头的领袖——盱眙总管夏全给予在楚州李全之妻——杨妙真最后一击。女中豪杰的杨妙真对此的应对也颇有外交官的风范。她先派人前往楚州城外的夏全军营，转达了“将军非山东归附耶？狐死兔悲，李氏灭，将军宁独存？愿将军垂盼”的口信。在得到了夏全的承诺之后，杨妙真更“盛饰出迎”，对夏全百般逢迎：“人言三哥死，吾一妇人，安能自立！便当事太尉为夫，子女玉帛、干戈仓廪，皆太尉有，望即领此，无多言也。”最终换来了夏全的倒戈一击，不仅驱逐了淮东制置使刘琸，更将南宋政府精锐的镇江军打得一败涂地。而在夏全在为杨妙真作了这一切之后却被拒之于楚州城外，最终不得不转投风雨飘摇的金帝国。杨妙真的真实年龄虽然无从考证，但想到当时应该至少也已经是“奔四”的年纪，还能施展这样的“美人计”，不得不说令人佩服。

在经历了一连串分化和控制忠义军行动的失败之后，南宋政府干脆采取“轻淮重江”的政策，直接放弃对忠义军的军饷供给，最终引发了李全在楚州部队的内乱。李全的二哥李福、次子都在内乱中被杀。小妾刘氏也被误认为是杨妙真而被斩下了首级送往了南宋政府的首都。听到噩耗身在青州蒙古军营中的李全不惜自断一指换取蒙古将帅的信任，而在回到楚州之后，李全一一击破了其中忠义军的将领，重新掌握了主导权。对于两淮的纷乱，金帝国试图以淮南王的封好招降李全。但却遭到了对方“王义深、范成进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处我”的调侃。从此徘徊于蒙古、宋、金三方之间的山东民间武装力量开始逐渐倒向新兴的蒙古帝国。

李全回到了楚州之后，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除了招募各地流亡的壮丁之外。更购买和建造大型战舰，甚至在海上搞阅兵式。其南下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南宋政府和金帝国方面却始终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南宋方面主要是因为权相史弥远的鸵鸟政策。而金帝国方面则是因为受制于蒙古。南宋权枢密判官白华李对全的行动给予了如下的评价：“李全借北兵之势，要宋人供给馈饷，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冢，待夜而出，何足介怀！我所虑者，蒙古之强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图，一旦无事，必来攻我。与我争天下者此也，全何预焉！若北方事定，全将听命不暇；设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宁不知逆顺，其肯去顺而从逆乎？为今计者，宜养士马以备蒙古。”

而对于铁木真死后的中原局势，南宋政府内部也感到颇为棘手。按照太学录陈埙的说法：“方张之敌，未亡之金，叵测之忠义，跳梁之群盗，皆所当虑。”不过虽然蒙古作为“方张之敌”排名比较靠前，但是南宋政府首先要面对的还是以李全为代表的“叵测之忠义”，对此曾经在荆襄一线长期抵御金帝国兵锋的赵方之子赵范、赵葵向史弥远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理由是长江以北多的是芦苇遮蔽的港汊，敌人可以轻松的偷渡。并指出“扬州，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岂可无备哉？”以“善守者敌不知所攻”的态度构筑了南宋政府在长江上游的防线。

在李全正式向南宋宣战之前，南宋政府不得不继续向其提供军饷。除了稳定两淮之外，也通过忠义军方面向蒙古方面表达善意。而李全方面也依仗蒙古的势力向南宋政府提出“裂土封王，增加军饷”的要求。双方虽然表面上还保持最后一丝暧昧。但是在李全心目中却始终认为：“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决心不只做一个“会哭的孩子”，要冲出摇篮去抢夺属于自己的糖果。

1230年，昔日的忠义军领袖李全最终向他曾经保卫过的南宋政府发起了进攻。而在出发之前他对自己的部下所说的话语，多少表达了他矛盾和纠结的心情：“我乃不忠不孝之人。糜费朝廷钱粮至多，乃杀许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杀，不能报复，不孝。”但是在战场上这个纵横多年的悍将还是展现出了自信和霸气，他在写给沿江制置使赵善湘的信中说：“我复归三年，淮甸宁息，奈何您与二赵兄弟（赵范、赵葵）使我为难。我决定亲往盐城，如有不信我李全、嫉恨我的人，如赵知府之辈，可以提兵与我交战。能灭我的，高官厚禄由您给；不能灭我的，便知道我李全的心意了。”



今天的扬州平山堂

面对李全的南下，身为南宋政府首相的史弥远除了“泄泄如平时”的淡定外，便是开出了“许增万五千石粮”的价码，希望花钱买个平安。不过却招来了正在扬州城下与副都统丁胜恶战的李全“史丞相劝我归，丁都统与我战，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嘲笑。无奈之下史弥远只能派出赵范、赵葵兄弟前往扬州迎战。

在扬州城下李全和赵葵曾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李全对赵葵说：“朝廷动辄对我猜疑，这一次又绝我粮饷，我非背叛，索钱粮耳。”赵葵则淡然的回答：“朝廷认为你是忠臣孝子，但你却反戈一击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粮！你说你不是造反，忽悠谁啊？”赵氏兄弟在荆襄前线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和金帝国的野战部队交战多年，也是披着士大夫马甲的老兵油子。而南宋政府的正规军野战或许不行，守城却颇有一套。李全虽然占据着战场主动权，每每还对部下抱怨说：“我不要淮上州县，渡江浮海，径至苏、杭，孰能当我？”但却始终不愿意放弃占据江淮门户的扬州城，最终不得不转为长期围困。



宋太師右丞相衛國忠獻王諱彌遠像第三十六世

扬州的剧烈攻防，令身在大后方的史弥远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个已经把持了南宋政府23年的权臣显然对目前的局面也毫无办法，只能挂起了“病休”这块官场“免战牌”。对此由史弥远一手拥立的宋理宗赵昀倒是颇为体恤，特意下诏表示为了体现“尊礼元勋”，史弥远不用每天上朝，只要每十天到皇宫中协助处理一下政务就可以了。但不想这纸诏书在史弥远看来却不亚于催命符，毕竟这个肆混多年的老政客明白首相和高级顾问之间的差距，在剧烈的心理落差之下，已经63岁的史弥远竟然半夜跳进自己家的池塘想“自杀”，还在被侍妾及时发现，否则纵然淹不死，在农历十一月的气候条件下估计也会冻出肺炎。而在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之后，史弥远似乎清醒了些，放弃了长期以来的独断专行，吸纳了郑清之、乔行简、袁韶进入政府中枢，虽然这几个都是史弥远的亲信，但至少出现了南宋政坛不多见的“集体领导”局面。

李全对扬州的围困可以说是军事上的一大败笔，他的部下大多是出身草莽的亡命之徒，只适合在战场上搏杀。长期的对峙只会消磨士气，而赵范、赵葵兄弟和他老爸一样也是防守反击的高手，此消彼长之下令李全颇为苦恼。而这位昔日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好勇斗狠的性格最终也将他送上了不归路。为了迎接来自蒙古帝国中央的使节，李全在平山堂摆下酒宴，恰逢南宋军队出城偷袭，来得又是战场上人尽可欺的一支弱旅，于是“李铁枪”大手一挥：“看我扫南军！”便亲自出马，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弱旅的旗号之下竟是赵氏兄弟的精锐部队，在慌乱之下，李全策马冲入一片泥潭，被赵葵的部下乱枪刺死。而这位风云人物临死之前颇为狼狈，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喊出了“无杀我，我乃头目”的一声哀号。

在李全死后，忠义军迅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对于部下的惶恐，杨妙真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她对部下们说：“老娘的梨花枪，二十年天下无敌手，今天事势已去。你们还没有投降，不过是因为我在而已，现在我准备归老涟水，你们各奔前程吧！”杨妙真的话给了部下一个顺利出降的台阶，不过“归老涟水”不过是这个半老徐娘耍的又一路“花枪”，她在离开楚州之后，很快来到了山东，召集旧部，拥立养子李璮，继续周旋于南宋政府和蒙元帝国之间。

根据蒙古帝国名臣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第八卷《答杨行省书》中的说法，蒙古帝国方面非但没有因为杨妙真是一介女流而轻视她。相反还给予了“闺门之内

助”、“族出名家，世传将种。无儿女子之态，有大丈夫所为”的高度评价。而对于杨妙真一再请求隐退的报告，也再三挽留。耶律楚材在肯定了杨妙真“惧折鼎覆餗之患，避牝鸡司晨之讥”有“谦尊而光”的古风之余，也告诉她应该“嚮若随时之义”。并鼓励杨妙真“秣马厉兵，可报西门之役”。所谓“西门之战”指的是当年李全驻军的平山堂在扬州西门之外。但是在自己的丈夫死后，杨妙真虽然官拜“山东淮南行省”，也曾参加了对南宋淮南地区的进攻。但最终她还是在一年之后辞去了自己的官职，在将地盘和军队交给养子李璮之后归隐。据说最终病死于公元1234年前后。

在蒙古大军撤退之后，完颜守绪再度选择了迁都。不过这一次面对士大夫的阻挠，他编造了一个“御驾亲征”的故事——亲自率军去进攻敌人，还振振有辞地说：“我不出马，部队必须一分为二：一部分守城，一部分出战；现在可以合二为一。”结果礼部尚书舒穆噜世勣很不给面子地回答说：“陛下出马的结果更糟，我们必须把兵力一分为三，一部分守城，一部分野战，还有分出人手来保护你！”不过完颜守绪不是来和大臣们讨论数学的，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出城“转进”。

完颜守绪一路辗转逃往河南南部的蔡州，汴梁城内的金帝国权贵们在经过又一通复杂而欢乐的窝里斗之后，最终出身无赖的汉族将领崔立主导了局势。在向速不台献城投降之后，崔立身边的摇尾系统纷纷建议为这位无耻将军树立功德碑，在“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的权衡之下，金帝国的士大夫们纷纷选择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辞，更有人问：“这个功德碑上能写什么？”结果引来了依附于崔立的尚书省负责人翟奕的勃然大怒，呵斥道：“崔立大人不战而降，让全城数百万居民得以苟活，不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功德吗？”果然是有转进千里的元首，便有“曲线救国”的大将。不过蒙古人似乎并太认同所谓功德，速不台统率大军进入汴梁城外除了大肆劫掠金帝国的王室和显贵之外，也没忘了冲进崔立的府邸，将他的正妻、小妾连同收藏的金银珠宝一扫而空，等崔立赶到也只有恸哭的份儿。

金帝国的崩溃可以说是南宋政府收复中原失地的最后机会。为此宋理宗赵昀特意召见了江淮制置使赵善湘咨询国策。虽然招降了金帝国南线的边防军，收复了盱眙、泗州、寿州等地。但是赵善湘还是保守的认为南宋的国力自守有馀却不足以经理境外。但是在另一方面苟延残喘的金帝国却不这么看，在蔡州城下依靠完颜彝死后所残留下来的忠孝军击退了特穆尔岱所统率的蒙古追兵之后，完颜守绪一边忙着搜罗美女充实后宫，一边却打着向四川继续转进的念头。可惜此时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早已失衡，新近崛起的南宋将领孟珙轻松击败了金帝国的所谓“重兵集团”。身

为权相史弥远本家侄子的史嵩之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之所以可以主政荆襄并不全靠关系。顺利地利用了金帝国的虚弱，迫降金帝国南方重要的战略据点——唐、邓二州。



蒙古大军进入汴梁

对于南宋政府的防守反击，完颜守绪豪气万千的表示："蒙古军队擅长骑射，又学会了中原的军事技术，我们的状态又不太好……不过南宋那帮杂鱼，何足道哉？只要给我三千铁骑，我就可以横扫江南。"随后便派出全权大使完颜阿古岱前往临安。临行前完颜守绪语重心长地交代道："南宋政府的人品实在太恶劣了，自我上位以来一直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偶尔南下夺取他们几个州郡也很大度的让他们用钱赎回去了。今天他们趁火打劫，果然是目光短浅。蒙古自崛起以来已经摧毁了四十几个政权，先是西夏然后是我们，接下来必然轮到他们。唇亡齿寒的道理，爱卿一定要向他们讲清楚，和我们联手，其实是为他们好！"可惜南宋政府根本没给完颜阿古岱入境的机会。

蒙古方面对于金帝国领导人无视现实，一味顽抗的行径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在

河南继续拔除对手孤立据点的同时，窝阔台也派出使臣，要求南宋政府出兵、资助军粮联合灭金。南宋朝野上下虽然议论纷纷，但是襄阳前线的史嵩之和孟珙却早已达成了一致意见，作为军人孟珙的想法很现实，他认为南宋如果足够强大，当然可以拒绝与蒙古的联合，但是目前的局势是金帝国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无论南宋政府如何选择其结果都是一样，与其给蒙古这个潜在的对手一个轻视的理由，不如出兵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史嵩之也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说服了早已迟暮的叔叔。南宋政府在1233年农历十月出动2万精锐野战部队，运送三十万石粮草加入了对金帝国的最后一击。

蒙宋联军对蔡州的全线进攻虽然结局已经没有了悬念，但是其惨烈的过程却令很多人始料未及。在攻城战中连蒙古军中的汉族将领张柔都被乱箭射成了刺猬，在孟珙的救援下才侥幸保全了首级。但此刻秉承着战场上军人天职的孟珙或许永远无法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张柔和他的子嗣们将会成为南宋政府的掘墓人。而随着外围的防御体系被蒙宋联军一一攻破，金哀宗完颜守绪在疯狂地驱策全城军民顽抗的同时，也开始感受到了末日的临近，他感慨地说："我做了十年太子和十年皇帝，自问没什么大的过失，因此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只是大金帝国传承百年，竟然亡在我手里，和古代那些荒淫暴乱的国君一样，实在令人介怀。"这话虽然听上去很伤感，但是一般的亡国之君都会来上这一段，难免令人审美疲劳。最终完颜守绪将帝位传给了宗室将领完颜承麟，自己上吊而死，算是摆脱了他所恐惧的亡国之君的名号和成为阶下囚的命运。而完颜承麟的登基大典还没有完成，蒙宋联军便已经攻入了内城，这位新君在指挥巷战时死于乱兵之中，其在位时间确切的算起来只有几个时辰，因此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新纪录。

强盛一时的金帝国在蔡州城下的尸山血海中归于灭亡。作为世仇的南宋朝野自然是一片欢腾。有好事者画了一幅名为《尝后图》的春宫画，以彰显南宋野战军的"赫赫武功"。甚至还将南宋主将孟珙也画入其中。题词云"南北惊风，汴城吹动，吹出鲜花红董董。泼蝶攒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着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镇的样子，那将军是报粘罕的孟珙。"　粘罕是昔日攻陷宋皇朝首都汴梁的金帝国军队统帅，其对宋朝宗室及普通妇女的暴行显然深深地刺激了汉族男性的自尊心。因此才在笔墨间由孟珙施以报复，好好尝尝金帝国后妃的"滋味"。不过考虑到金哀宗完颜守绪逃亡到蔡州时曾以"六宫空虚"为由，到处搜罗美女，即便南宋野战军真的以牙还牙，那么承受他们暴行的也未必是女真族的贵妇。



史嵩之画像

“联蒙灭金”之后，坐镇襄阳的史嵩之第一时间将完颜守绪的遗骨连同俘虏的金帝国大臣张天纲、完颜海罕等人押送到临安。对于朝野上下一片边臣论功，朝臣颂德的热闹场面。曾因为触怒史弥远，而赋闲七年刚刚复出的监察御使洪咨夔冷静的提出现在南宋政府已经与强盛的蒙古接壤，其形势如“抱虎枕蛟”，理应加强戒备，而不应盲目的庆祝。不过这种提醒未必人人都听得进去，临安知府薛琼便想在被俘的张天纲身上好好体会一下胜利者的心理优越感，于是大声呵斥道：“你也有脸到这里来？”可惜张天纲也是词赋进士出身的汉族士大夫，轻松地回答道：“国家的兴亡，哪个朝代没有！金帝国的灭亡过程，比你们的徽宗，钦宗二帝怎么样？”自取其辱的薛琼只能很没风度的乱骂了一通，然后请示宋理宗赵昀将其处死，不过对于一心求死的张天纲，南宋政府却还想通过他撰写回忆录将金帝国批臭，因此一直养着他，直到不知所终。

第七章　多瑙河畔

群狼咆哮
——蒙古帝国的“长子西征”幕后的故事

1235年春，窝阔台汗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在这次忽里台大会商议西征的问题时，察合台提议派各宗室的长子、长孙率军出战，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从征。因此这次西征又被称为“长子西征”。察合台的这一提议除了由于各宗室的长子、长孙手中均握有重兵之外，更主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子侄辈们能通过这次西征积累战斗经验和政治资本。基于这一考量铁木真的四个嫡子的后裔——术赤的次子拔都，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长孙不里，窝阔台汗的长子贵由，拖雷的长子蒙哥以及铁木真的庶弟阔列坚系数与役。他们之中以年长的拔都为西征军总帅并统管诸王子弟，而熟悉西线情况的老将速不台则作为西征军副总帅主持军务。不过作为汗王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在西征大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负责统管其他将领的子弟。

蒙古大军展开第二次西征之前，他们的主要对手——罗斯诸国虽然不断抵抗着蒙古的侵蚀。但是在迦勒迦河会战之后的十几年间，这些同样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建立的国家之间却内争不断，始终无法形成合力。而在蒙古大军一路西进，开始扫荡其两翼的邻国——由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建立的不里阿耳和钦察部落之时，罗斯诸国也始终未能再组成联军展开支援。

“长子西征”的过程中无论是拔都、贵由还是蒙哥事实上都是在老将速不台的教导之下指挥作战的。拔都指挥大军攻略了“以城防坚固和资源丰富而闻名全世”的不里阿耳城之后，蒙古大军开始南下，征讨“长子西征”中的第一个强大对手——钦察部的酋长八赤蛮，窝阔台在西征之前曾经说过：“闻八赤蛮有胆勇，速不台亦有胆勇，可以胜之。”果然在以速不台为先锋的蒙古骑兵猛攻之下，八赤蛮和钦察部的其他酋长或死或降。

生擒八赤蛮的据说就是未来的元宪宗蒙哥，在搜捕八赤蛮的过程中蒙哥首先遇到了一个生病在床的老妇人，询问之下才知道八赤蛮已经逃到了里海之中的一个岛屿上。蒙哥随即利用北风大作和里海北部海水较浅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的突击上岛俘虏了八赤蛮。不过面对要自己下跪的蒙哥，身为钦察部酋长的八赤蛮表示：“我

好歹也是一国之主，现在被俘了也就不打算再苟活下去了。况且我又不是羊驼，为什么要下跪？”不过硬气归硬气，不久之后八赤蛮就对自己的看守说：“我流窜到海岛，自认为是鱼入大海，想不到还是被你们抓住了。看来这是天意。不过从这片岛屿回到陆地的浅滩马上就要被涨潮的海水所淹没了。你们还是带着我快点回去吧！”果然蒙哥的大军刚刚开始回撤，就遭遇到了涨潮，殿后的部队有不少不得不浮渡回岸。不过蒙哥并没有感谢八赤蛮的建议，随即将其处死。

扫除了南北两翼的威胁之后，蒙古大军在1237年的秋天开始向罗斯诸国的腹地进军，未来吞没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大军的“冬将军”此刻反而成为了蒙古铁骑的盟友，罗斯境内地势低平，特别是冬季河川封冻后，骑兵可以自由驰骋，畅通无阻。而当时罗斯诸国的城堡、房屋也多用各种木材搭建，抗不住蒙古大军先进炮石和火药的轰击。到公元1238年的春天，拔都的大军已经占领了包括未来创造守城奇迹的莫斯科洼城在内的罗斯弗拉基米尔公国全境。据《蒙古秘史》记载，当时的莫斯科“居民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它的四周，树木和茂林密布，以致连一头蛇都不能穿过”。不过蒙古大军到达后，先从四面八方修筑了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然后架起射石机，仅用五天时间就攻陷了莫斯科城。

在灭亡了弗拉基米尔公国之后，蒙古大军一度试图向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公国进军。但是大军行至距诺夫哥罗德城不到50公里的地方却突然掉头南下。据说是担心春暖雪化，道路泥泞对作战不利。诺夫哥罗德公国不仅幸运地躲过了一劫，而且得以保存了罗斯诸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承，更使其有力量在5年之后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东进，避免了整个东斯拉夫文明的衰亡。而未来俄罗斯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莫斯科公国的隐忍和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积累。



蒙古大军攻克莫斯科

在占领了除诺夫哥罗德公国之外的整个北罗斯地区后，拔都的大军开始南下围攻罗斯诸国的政治中心——基辅。据说未来的蒙古帝国统治者蒙哥曾站立在城外的崖岸上遥望这座东斯拉夫人的龙兴之地。见城内屋舍雪白，建筑壮丽，30座教堂金塔摩空，从而一度不愿意毁坏这座美丽的城市，采取了长期围困和派使者入城谕降的手段希望能够保全这座古城。可惜的是东斯拉夫人此刻依旧内讧不断。基辅公国的贵族首先逃亡波兰，斯摩棱斯克大公罗斯迪斯拉夫入守基辅，又加里西亚大公丹尼尔赶跑。加里西亚公国位于今年的乌克兰西部、波兰南部，基辅城对他们来说不是政治中枢而是前沿要塞，因此毫无负担的宣布将死守到底。而此时由于窝阔台的去世，主张和平解决基辅的蒙哥跟随贵由东归。拔都随即下令在公元1240年冬，利用第聂伯河封冻之际，全力猛攻。守城军民虽然前仆后继展开激烈的巷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死者如麻、全军覆没。有趣的是指挥抵抗的加里西亚公国将领狄米脱里却被拔都认为英勇而免于了一死。基辅保卫战的英勇事迹使基辅成为英雄城市而载入史册。

基辅失守之后，以邻为壑的加里西亚公国也随即被蒙古大军占领。丹尼尔大公

逃亡匈牙利，寻求贝拉四世的庇护。匈牙利国王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蒙古西征招降纳叛。大批流亡的钦察游牧民为了躲避蒙古大军的追击逃入了他的领地，贝拉四世随即接纳了他们，但是要求他们归依基督教。这位匈牙利国王的如意算盘是自己一举令超过二十万的“野蛮人”改信基督教，那么匈牙利在罗马教皇面前的地位也大为提高，同时大批钦察的加入也将令他的军队更为强大。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抵达了匈牙利边境之后，拔都随即向贝拉四世送去了最后通牒——“你们收容了我们的叛徒钦察人，他们本是我们的奴仆。立刻停止收容他们，不然你们将成为我们的敌人。”贝拉四世显然还不知道蒙古骑兵的力量，他随即派遣专差拿着涂染鲜血的宝剑（一个匈牙利的传统，表示国难当前的信号）到全国各地号召所有诸侯贵族起兵勤王。

贝拉四世是否从钦察部落和流亡的罗斯王公丹尼尔等人口中了解过他的对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蒙古西征大军的统帅——拔都和速不台却显然对中欧地区的政治局势进行了一番精确地分析。当时匈牙利是中欧最强的国家，不击破匈牙利的现有力量，那么蒙古在罗斯地区的统治难以长久。而根据间谍和使团所带回的情报。他们也知道虽然欧洲各国统治者之间为了利益经常互相攻伐，可是上层贵族之间又因互相联姻而有血缘上的关系，如果遭遇到外来的攻击，他们还是会守望相助的。因此在与匈牙利正式交锋之前，拔都派遣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统领右翼军先行北上进入另一中欧大国波兰的境内，以牵制其对匈牙利的援助。而窝阔台的第六子合丹则率左翼军匈牙利东南方推进，监视拜占庭帝国的动静。

拔都和速不台显然太过于高看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匈牙利的援助热情了。在贝拉四世的动员令下，匈牙利国内的大小诸侯倒是纷纷响应国王的号召，甚至连邻国也有人领兵前来共同抵抗“东方野蛮民族”、“异教徒”的入侵。不过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却不得而知。如奥地利大公腓特烈就颇有意思。他长期以来都和匈牙利国王争夺边界土地而心生不睦，因此在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城之后，发现城里居民并不欢迎客居的钦察人，就趁机煽动匈牙利民众暴动，被匈牙利人驱逐的钦察人，愤怒地离开了匈牙利，在逃往保加利亚的途中一路烧杀抢掠。而挑事的腓特烈大公此时却悄悄地溜回奥地利，袖手旁观的等待蒙古人对匈牙利的入侵。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四世此时虚有君主的称号，仅占有都城克拉科夫和桑多梅日两城，他的兄弟们则控制着其他公国各自为政。拜答儿的右翼军进入波兰境内之后，国王博列斯拉夫四世随即仓皇出逃。大小贵族相继出走，平民百姓则逃亡山林。连保家卫国

都尚且无力，又怎么可能支援邻邦呢？

波兰大半国土沦丧，使得整个中欧地区不得不正视蒙古大军的西进。日耳曼各城邦之中的条顿骑士团和波希米亚随即派兵支援波兰王国的下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在里格尼茨地区集结了一支数万兵力的大军。关于里格尼茨战役中欧洲联军的总兵力史学家们向来说法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各路人马都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因此最终被推到第一线的竟然是衣甲不整的日耳曼义勇兵和矿工。紧随其后的则是其他波兰王公的军队，号称精锐的条顿骑士团则部署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亨利二世和他的所谓波兰精锐——西里西亚公国军队则位于大军的最后。当然与离战场还有两天距离的波希米亚大军相比，亨利二世还是勇猛的。

里格尼茨战役在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弥撒后正式开场。在中欧联军的眼中，蒙古大军显然也不怎么给力。在日耳曼义勇兵和矿工的冲击之下，蒙古军队竟然迅速的后撤。但是随即蒙古大军的后撤并不等于败退。在追击的过程中中欧联军中不断有人倒在对方的密集的箭雨之中，而在追击的过程中联军原本猬集的阵线也被拉开。随着蒙古大军全线反击的展开，中欧顿时兵败如山倒。关于此役中欧联军的损失，同样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根据蒙古军队把每个被杀的联军士兵的一只耳朵割下来就装满了九只大麻袋，以及龟缩在阵后的联军主帅亨利二世也战死的情况来看，差不多算是全军覆没了。

里格尼茨战役被欧洲史学家粉饰为虽败犹荣的经典战役。认为亨利二世虽然战败，但是也给予西征的蒙古大军以巨大的杀伤。迟滞了蒙古人征伐的脚步，欧洲各国能够免遭蒙古铁蹄的践踏，应该感谢那些在里格尼茨以东平原上“献身”的勇士们。但是从拜答儿和兀良合台随后的继续长驱直入直达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边境，饱掠一番后进入匈牙利境内同拔都主力会师的情况来看，那些所谓“勇士”的血估计是白流了。



蒙古西征的辉煌战役——击溃条顿骑士团

1241年3月12日，拔都所率领的西征军主力攻破匈牙利军在喀尔巴阡山关卡，长驱直入匈牙利境内，而在以每天四十公里强行军抵达距离匈牙利王国首都佩斯特城半日路程的地方。拔都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得到了侦察部队的情报：匈牙利兵力两倍于蒙古军，兵甲强盛。而此时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西征大军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约定战略是固守不出，但是佩斯特城内的军民踊跃要求出战。大主教乌古兰也不满意贝拉四世的谨慎。在来自人民和上帝的双重压力下，在里格尼茨战役几乎发生在同一天，贝拉四世率领七万大军主动出击。蒙古大军随即东撤，两军随即在索约河对峙。

贝拉四世的匈牙利军在索约河筑营，匈牙利人将他们的辎重马车首尾相连，组成一道环形防线，仍然保持着匈奴王阿提拉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而蒙古大军则利用索约河东岸的密林为掩护开始分兵迂回。索约河之战可以说是拔都和速不台这两位蒙古新老名将战法的全面比较。决战之前，拔都效仿自己的祖父铁木真登上高台，企求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腾格里的保佑，祷告了一天一夜。随即以自己据守

的索约河上游的浅滩处发起进攻。拔都的攻势起初进展顺利，成功的攻破了匈牙利军队在索约河东岸的桥头堡。但是在强渡河流时却遭到了对手的顽强抵抗，拔都麾下的悍将八哈秃也在战斗中阵亡。此时拔都及其他年轻的诸王都觉得应该停止攻击，但是速不台却表示："要撤你们撤，我不杀到佩斯特城是不会收兵的！"而此时河对岸的匈牙利军队果然出现了混乱。拔都的大军乘势过河，一举击溃了贝拉四世的大车防线。而在随后的追击战中七万匈牙利大军仅有一万人得以生还。事后拔都责备速不台在渡河的时候动作迟缓，直接导致了自己的爱将八哈秃战死。速不台这个时候才揭示了索约河战役的真实情况："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筏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正是速不台从下游迂回的一支骑兵打乱了匈牙利人的河防部署，最终赢得了这一辉煌的胜利。



索约河之战

贝拉四世自从索约河畔的战场化装逃脱之后，一路弃甲曳兵向西逃，最后逃入奥地利，被他的世仇奥地利大公爵腓特烈囚禁起来，后来他答应割地赔款，腓特烈

才没有把他绑送给蒙古人。赎得自由之身后，拔都还是不放过他，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逮住。最后贝拉四世逃到亚德利亚海上一个小岛才得到安身之处。中欧各国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连接遭受两次如此惨痛的战败，波兰人因此认为蒙古人不是凡人，而是上天派遣下凡惩戒人类的鬼神，称之为“黄祸”。



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

1241年夏秋，西征军各路兵马驻营于多瑙河畔，休整兵马，分兵四处劫掠。1241年冬季，多瑙河冻冰后，拔都分军两部渡多瑙河向西扫荡。蒙古攻取克兰大城，四处纵掠，南路蒙古军队，此时越过尤利安山脉进入意大利，前锋离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城市威尼斯城不到50公里，哨骑已经到达威尼斯城郊。而主力蒙古部队，也到了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维也纳已经关闭城门准备守城战。但是随后窝阔台病逝的消息传到前线。蒙古军队于公元1242年便全部撤离匈牙利。不过此时从亚德利亚海回到国内的贝拉四世已经无力追击，他首先要做的是设法恢复国家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经济与军事能力。

铁木真的孙子一辈之中，拔都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天才的军事家。但是尽管“长子西征”之中他拓地最广，由于他父亲术赤的血统所累，他依旧没有一窥大宝的机会。因此在窝阔台逝世之后，他一度并不想参加在推选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大会中。只是在速不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的要求之下，才被迫起程东归。但是在得到和自己不和的贵由继位为汗之后，他又以生病为由停下了脚步，而速不台独自返回。1243年年初拔都抵达伏尔加河下游东岸，在此修建了萨莱城。从此开始了蒙古钦察汗国的建立工作。尽管中外史书均称赞拔都执法严明，处事敏决，知人善任。蒙古人及征服地的臣民皆称其为“赛因汗”（赛因是蒙古语好的意思）。但是在拔都之中蒙古帝国随即停下了向欧洲进攻的脚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有趣的是蒙古大军的西征并没有令中欧各国更加团结。仅仅一年之后贝拉四世就为了争夺达尔马提亚的几座城市与威尼斯作战。其后又在1253年和1260年为争夺奥地利和施蒂里亚而与波希米亚国王普什米塞·奥托卡二世进行过两次战争。而一度以难民身份流亡匈牙利的加利西亚王公丹尼尔在回到被蒙古大军摧毁的家园之后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准备趁火打劫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组成的联军。公元1246年，这位被乌克兰视为一代中兴名君的王公被召集到金帐汗国首都，伏尔加河岸的萨莱，并被迫向蒙古称臣。根据乌克兰历史学家奥列斯特·苏布泰利尼的说法，拔都汗递给丹尼尔一杯发酵的马奶，告诉他要适应它的味道，因为“现在你是我们的人了”。无独有偶，在楚德湖的冰面上击败了条顿骑士团的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没有接受罗马教皇的自杀性的、与蒙古军队血战到底的建议，1246年接受了拔都授予他的基辅大公的封号。



将基辅化为战场的落跑王公丹尼尔

“长子西征”虽然战绩辉煌，但窝阔台利用此次西征确立自己长子贵由帝国继承

人的政治意图却无法实现。因为指挥权的问题与术赤的长子——拔都龌龊不断，两人甚至因为庆功宴上谁先喝酒的问题引发了冲突。不过当时的术赤系已经在中亚及乌拉尔山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拔都在“长子西征”中又战功赫赫，因此在得到了拔都对自己儿子贵由的控诉之后，窝阔台一度有把贵由贬为普通军官流放边远之地，以息事宁人的想法。好在他的幕僚及时提出：“成吉思汗有训，内事只家中断，外事只野外断。此外事，请付拔都治之。”把皮球踢回给了拔都。拔都虽然在西征大军之中占据了优势，但是在整个帝国中却毕竟还是小字辈，于是也只好与贵由继续保持貌合神离的态度。

“联蒙灭金”的同时，南宋政府内部也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换血，86岁高龄的权相史弥远终于在册封为会稽郡王、二子、一婿、五孙皆加官秩的优厚待遇中退休，随后告别了人世。但是亲政之后的宋理宗赵昀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处理权倾朝野的“史党”问题。“史党”的政敌们首先将矛头指向的自然是史弥远的旁系亲属、封疆大吏——史嵩之，于是这位在襄阳主持军政十年的史嵩之成为了监察御史王遂口中“不懂军事，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的政治无赖。好在宋理宗赵昀还算理智，而和“史党”颇有宿怨的洪咨夔也认为“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理应“益严守备，犹恐不逮”，这个时候的确不适合搞政治运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史嵩之的运气，同样是在边境地区上颇有政绩的吴渊便因为曾得到史弥远的赏识而被攻击为“恃才贪虐”而直接一撸到底。当然吴渊之所以倒霉，并不仅仅因为他曾被史弥远称赞为“国器”。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新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进军中原的政策。

在金帝国灭亡之后，南宋朝野上下充斥着一股躁动的情绪。这一点多少与宋蒙联盟中的一些不确定条款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联手灭金的过程中，蒙古方面许下了所谓“河南之地”的优厚回报。但是随着蔡州城被攻破，宋蒙方面在瓜分金帝国遗产的过程中，根据双方最终确定的却是以陈、蔡一线进行分割，窝阔台的许诺基本上算是打了个五折。对于这一点，“联蒙灭金”的实际操作者——史嵩之的态度倒是比较务实。毕竟国际争端向来是有实力的一方拥有“最终解释权”，与其和兵强马壮的蒙古发生不必要的争执，不如“落袋为安”，增强边疆防卫以巩固“胜利果实”。

史嵩之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最高领袖的思路。早在灭金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前，宋理宗赵昀便召见了在两淮前线肃清了李全所部忠义军势力的赵范、赵葵兄弟。不过从史料记载的双方对话之中，我们不得不说赵氏兄弟多少有些无辜。面对宋理宗赵昀对于与蒙古外交关系的询问，赵范只是回答说：“和约这种事情只不过是忽悠对方的‘羁縻之策’而已。我朝宣和年间和女真人的海上之盟，最初不也是情比金坚……不，坚如金石的吗？如果过分依赖所谓的和约，最终只能是被欺骗和损害的一方。因此应该尽早进行战备才行。”而关于如何进行战备的问题，赵范的回答则更为简洁：“问我弟弟去……”而赵葵对未来局势的判断是：“一年之内不会有战事，因此可能有两年的缓冲期，我们可以训练野战部队、修筑边防要塞。而最主要的还是推行屯田。”对此宋理宗赵昀很兴奋，高屋建瓴的总结道：“这个计划很有高度，尽快实

施。”不过赵葵怎么也没有想到，宋理宗赵昀的“尽快”竟然是在蔡州战役的硝烟散去还不到6个月，便要求他统率两淮的南宋正规军向理论上是蒙古帝国版图的河南北部进军，开始了“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军事行动，史称“端平入洛”。

对于“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南宋政府的官方说法是鉴于“因彼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啮。百姓至此极也。”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由于蒙金双方的长期战线拉锯而陷入一片混乱，南宋政府为了避免这一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而派出军队以恢复当地秩序。不过虽然师出有名，但是南宋政府朝野上下却普遍持反对的态度。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首先提出：“目前国内百姓苦于各项苛捐杂税，豪族劣绅兼并成风。在内部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境外。恐怕中原还没有规复，江南已经开始骚动了。”

而此前被罢免的吴渊之弟——淮西总领吴潜对于“端平入洛”的看法同样消极。他提出：“规复中原的军事行动不应该如此草率。此前蔡州战役投入很大，但是收获很小。”当然有了自己哥哥的前车之鉴，吴潜不得不对以郑清之等当权派恭维几句，在自己的报告中特意写到“近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可谓俊杰”。肉麻归肉麻，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总结道：“‘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特别是后勤补给方面。目前百姓已经困苦不堪，继续征调将可能会激起民变。”

如果说乔行简、吴潜等人算的是“端平入洛”行动的政治账、经济账的话。那么身为两淮制置使赵范参谋的邱岳则为自己的领导算了一笔军事账。在邱岳看来，蒙古这个方兴之敌“气盛锋锐”，不可能轻易放弃在中原的既得利益。部队一旦开进河南北部，自然会遭遇对方的反击。而“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后勤补给的压力必然空前艰巨。但是这些意见对于头脑发热的宋理宗赵昀而言是根本听不进去的。

不过“端平入洛”在开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由庐州知府全子才率领的前锋部队几乎兵不血刃的便收复了昔日中原重镇汴梁。不过这一辉煌的战果主要归功于蒙古方面对中原地区统治的随意和混乱。在窝阔台率领蒙古军队主力撤离之后，蒙古方面将汴梁的军政大权留给了卖主求荣的前金帝国将领崔立。崔立不仅在政治上是个摇摆不定的投机者，在私生活方面更是“淫人妻女乐呵呵”的色魔。这样的人能获得部下的真心拥戴，恐怕是只在穿越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于是全子才的部队刚刚开到汴梁城下，城内的李伯渊等将领便联合发动政变，杀死了崔立，并将其暴尸于宫殿前的一棵槐树上，据说尸体刚刚挂上去树就倒了，人们纷纷传说这棵老槐颇

有灵性，不过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只能说是崔立生前的体重应该比较惊人。

成功夺取了汴梁本来可以说是“端平入洛”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南宋政府的主战派却急于将这个有利局面无限扩大。于是统率大军后续抵达的赵葵对全子才的态度不仅没有褒奖，相反指责他贻误战机。认为“我们的预定计划是依托黄河、潼关组织防线，你已经抵达了汴梁半个多月，还不夺取洛阳、潼关，在等什么呢？”而全子才列举了后勤补给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之后，赵葵的对策是派出由自己的亲信——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统率先锋部队向西进发。由一个机要秘书指挥相当于一个步兵师的兵力自然有些不妥，因此赵葵又派杨谊指挥全子才麾下装备有强弩的另一支部队后续跟进。这两支部队或许都是赵葵心目中的精锐。但是在给养问题上，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军所携带的口粮都只能支撑五天而已。当然在赵葵的心中或许还存在着最后的一丝幻想——洛阳是中原古都，只要部队可以抵达预定目标，就地便可以征集粮秣。而自己的运粮车队应该也在兼程赶来。

不过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久经战阵的赵葵还是显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蒙金战争的破坏力远比他所想象的要恐怖得多。这一点担任大军前锋的全子才显然要比他清楚一些。从庐州一路北上，全子才的部队的确可以用如入无人之境来形容，因为他们沿途所走过的基本都是无人区。即便是北宋时号称“小东京”的城府此刻也剩下十几户人家。而为了阻挡南宋政府的北上，蒙古军队还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人为的在淮北制造了一片水深及腰的黄泛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南宋政府动员了大量的民夫，后勤效率却依旧低下到难以维持的境地。

而蒙古帝国方面，早在南宋发动“端平入洛”军事行动之前，大臣耶律楚材和李实便已经在为窝阔台制定《平南策》了。不过蒙古方面将主攻方向定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方面，随后再“顺流而下窥江南”。南宋方面的“端平入洛”从一定的程度上也打乱了蒙古方面的预定战略。在中原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窝阔台增派木华黎之孙塔斯率军南下。不过在这支生力军抵达战场之前，将五日军粮分成八天吃的南宋野战部队已经提前败给饥饿。在几乎已经变成一座空城的洛阳数万精锐的淮西健儿只能“采蒿和面作饼”。此消彼长之下，两军在龙门和洛东两度爆发的遭遇战都以南宋军队的崩溃而告终。无奈之下赵葵只能选择主动放弃已经控制的汴梁南撤，而在通过黄泛区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丢弃所有的辎重。“端平入洛”军事行动以全面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场堪比闹剧的武装大游行中，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插曲。在两淮前线的部队还在进军的途中，宋理宗赵昀派出祭祀自己家祖坟的特派员——朱扬祖、林拓

抵达了长江中游的襄阳军区。此时中原战场的局势空前紧张，传说蒙古帝国的哨骑在孟津到潼关一线到处游弋，两位特使的行程显得格外危险。不过刚刚在蔡州战役中载誉而归的孟珙却不这么看，他说：“淮东军区从淮西进军，抵达汴梁要近半个月的时间，而从我的防区出发，精锐骑兵只要不到十天就可以往返了。”于是亲自护送两位特使到中原祭扫了宋帝国历代皇帝的祖陵，还画了一幅《八陵图》送回去让宋理宗赵昀感慨。而在整个“端平入洛”行动中，史嵩之所控制的荆湖军区始终处于作壁上观的姿态，可以派骑兵完成拜唁祖陵的政治任务，但却“无力”支援友军。可以在一年前慷慨地给蒙古军队三十万石粮秣，等到了自己人饿肚子的时候就打报告说：“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也许宋理宗赵昀面对着精心画就的《八陵图》也真的只有“忍涕太息久之”了。



宋理宗赵昀

“端平入洛”的惨败自然需要有人负责。在后方长期按兵不动的赵范率先发起弹劾。赵葵、全子才都被官降一级，从此长期并肩作战的赵氏兄弟反目。不过最惨的还是亲临第一线的徐敏子以及杨谊，他们被分别处以了开除和勒令停职的处分。其实徐敏子作为一名机要秘书，在战场上已经算是尽力了。洛阳突围之时，这位文弱

书生带着食不果腹的部下，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之上竭力躲避着蒙古铁骑的追杀，一路之上徐敏子身中流矢，战马也被射死。他还收容了被杀散的溃兵，一路上步行吃着桑叶和梨蕨才侥幸逃回了南宋的国土。当然宋理宗赵昀也不会放过始终坐观成败的史嵩之，而史嵩之也颇有政治手腕的主动提出辞职，于是只是丢了京湖制置使的乌纱帽，却没有受到其他的处分。不过他的政治对手——郑清之的日子也不好过，宋理宗赵昀虽然一再拒绝了郑清之的辞职，但是毕竟还要面对朝野上下的一边指责之声。

而对于蒙古而言，南宋政府的“端平入洛”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却依旧给了他们理直气壮、大举南下的借口。于是1234年的农历十二月，窝阔台的特使王檝首先抵达了南宋首都临安，作为曾经为金帝国工作的汉族文人，王檝可不单纯只是一个会坐而论道的士大夫，在他的履历之中招降纳叛、行军缉盗的经验远比外交事务来得多。因此这位特使的到来远不是递交窝阔台指责南宋政府背盟的国书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刺探南宋政府的虚实，甚至暗中招降。而南宋政府方面也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回访，在一片热烈而友善的气氛中，第一次蒙宋战争逐渐拉开了序幕。

面对窝阔台措辞严厉的指责，宋理宗赵昀一边派出了宁淮军统制程芾作为蒙古通好使前往正在大兴土木的蒙古帝国首都和林。而与此同时也在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作为“端平入洛”中唯一令其感到满意的将领，宋理宗赵昀特别召见了荆湖军区的孟珙。对于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孟珙的回答很巧妙。他只是说：“我是军人，理应主战而不主和。”这一回答令宋理宗赵昀很是高兴。而此刻也有人跳出来对孟珙的老领导——正在江西安抚使岗位力主和议的史嵩之大打小报告。南宋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袁燮的儿子——袁甫向宋理宗赵昀报告说：“我和史嵩之是同乡。当然我不太了解他。不过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和我是老朋友。国家有难，史嵩之每次都主张和谈，而他老爸史弥忠每次都会告诫他不要轻易和谈。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的立场问题，还在于朝廷用人太随便了。”可是袁甫的这个小报告打得实在太拙劣了，他不仅攻击了史嵩之，还把主持政府任免大权的宋理宗赵昀也牵扯了进去，因此自然无法起到他所预想之中的效果。

1235年的夏秋之间，蒙古铁骑终于来了。不过窝阔台这一次的进攻矛头并不只针对南宋，同一时间列为打击对象的还有西域的伊斯兰世界及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在最初的动员方案中，蒙古帝国计划以西域的民族充当南征的主力，而将华北地区新招募的汉族军队投入朝鲜半岛的战场。这看似是一个颇有创意的安排，但却

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反对。耶律楚材很清楚西域各民族和中原的汉族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远不如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如此大范围的调动其结果自然是人马疲乏、水土不服。在他的建议之下，最终蒙古帝国将动员计划改为：每一个蒙古军户抽调一名男丁西征，一名男丁南下。而中原的汉族军户则抽调一名男丁南下，一名男丁加入讨伐高丽的远征军。

面对兵力雄厚的蒙古大军，首当其冲的唐州前线，在“端平入洛”行动中收复汴梁的全子才无力抵挡，只能弃城而逃，再度被处于官降二级的行政处分。好在赵范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在上闸遭遇战中击败了由塔思统率的蒙古前锋部队，才最终阻止了崩溃蔓延的势头。不过接替史嵩之成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的赵范在荆湖军区没有自己的班底，只能依靠归降的前金帝国将领——王旻、李伯渊等人，而他拉拢这些所谓“北军”的手段也并不高明，无非是吃喝玩乐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荆湖军区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

由1235年开始的第一次蒙宋战争，南宋政府所面临的正面压力并不大。毕竟蒙古帝国同时还要兼顾西域和高丽两条战线。但是由于连年用兵所导致的军费赤字和金融改革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却令南宋政府的内部矛盾却在此刻集中爆发。而这一次南宋政府所要面对的还不单纯是百姓的骚动还有武装部队为了加薪而发动的兵变。而为了压制各地野战部队的情绪，南宋政府除了弹压之外，还派出曾从龙和魏了翁以中央大员以枢密院使的身份携带巨额军饷前往江淮、荆湖军区建立更高一级的前线军政机构——督府。不过作为当年和王安石一起推行过变法的曾公亮的四世从孙，长期活跃于宋金外交舞台之上的曾从龙虽然是开设督府的始作俑者，并且也的确有执掌一方的阅历和威望，但唯独缺少的是一副好身板。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一展拳脚，曾从龙便病死在赴任的途中，无奈之下宋理宗赵昀只能将原定的两大督府合二为一，统一由魏了翁领导。

魏文靖像



魏了翁画像

魏了翁没有曾从龙那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但是多年以来的宦海沉浮和游历讲学却令他在南宋朝野颇有人望。而除了儒家理学之外，魏了翁还是南宋政府内少有的易学大师，因此也颇受宋理宗赵昀的信任，为了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老臣壮行，宋理宗赵昀还亲密写了一首唐代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赠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还。”当然魏了翁也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他历任地方官吏的过程中也曾整殇城防、训练民兵。更重要的是魏了翁的岗位是统领全局，不是攻城拔寨。因此在吸收了吴潜、赵善潮、马光祖等一批干才进入领导班子之后，在江州开设的魏了翁督府一度也颇有气象。但是此时蒙宋之间的主战场却悄然从东线转移到了西侧的川北。

南宋川陕军区的负责人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和南宋政府的其他封疆大吏一样。赵彦呐也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在太平盛世，赵彦呐或许是个不错的地方官吏，但是在端平年间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他的犹豫和怯懦却注定了他和整个川北地区的悲剧。事实上在金帝国灭亡之后，蒙古和南宋在西部边境上依旧存在着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由前金帝国民兵司令、秦巩豪族汪世显控制的巩昌一线。汪世显虽然是蒙古汪古部的后裔，但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在政治上却倒向南宋，多次遣使向赵彦呐请求“内附”。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却也是这样的招降纳叛终究也要背负一定的外交和政治风险。因此赵彦呐遵从官场的游戏规则，把球踢给了千里之外的内阁负责人——郑清之。或许是忌讳汪世显的异族身份，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风，最终郑清之代表南宋政府拒绝了对方的输诚。而蒙古大军南下，统率大军的窝阔台次子阔端在对巩昌展开全面包围的同时，派出同是汪古部出身的按竺迩前劝招降。一边是南宋政府的再三婉拒，一边是蒙古方面的热情招揽，汪世显最终倒向了后者，他的部队并成为蒙宋战场的一支生力军。

汪世显投降之后，身为王子的阔端曾和他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阔端以胜利者的姿态问道：“我在中原地区征战多年，所到之处金帝国的官吏无不望风而降，只有你选择了固守，这是为什么呢？”汪世显当然不好意思回答说那你还没有兵临巩昌城下，于是正义凛然地回答道：“我不是卖国市恩之人。”阔端又问道：“金帝国灭亡已久，你还不投降是为了谁？”汪世显再蠢也不会说自己长期以来“土皇帝”做得很开心，还有想去抱南宋的粗腿。于是继续正义凛然：“殿下的大军刚到，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发现殿下仁武不杀，我认为一定可以保全城内的军民，因此才毅然

投降。”这样的回答自然令阔端很满意，不仅整肃了部队的纪律，还继续任命汪世显为巩昌的最高军政长官。

虽然收降了汪世显和他的民兵部队，但是阔端所部在四川前线的进展却并不顺利。这一点与他所选择的进攻方向和遇到的对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夺取了南宋在川陕一线的重镇—沔州（今陕西省略阳县）。阔端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兵力攻击鸡冠隘和阳平关。作为川北的门户，这两个重要关隘历来是军事重镇，而南宋方面此刻的前线指挥官更是大有来头的左骁骑大将军曹友闻。按照今天的定义，曹友闻可以算是南宋的高干子弟，他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直系后裔。不过祖辈的光环早已淡去，曹友闻同样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得以步入仕途。不过他上任伊始便遭遇了蒙古军队南下犯边的“丁亥之变”，身为天水地区教育部部长的他还没有到任就被隔绝在蒙古军队的包围圈外。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此时应该在庆幸之余原路回家。但是曹友闻临难不苟，单枪匹马闯入了孤城，为此时任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还特意绣了一面“满身胆”的锦旗颁授给他。而曹友闻也从此告别了文官队伍，成为了南宋历史上的又一名“儒将”。面对这样的一个棘手的人物，阔端自然讨不到什么便宜。因此只能在留下少数哨骑之后，暂时撤退。

经过1231年“辛卯之变”中拖雷大军的扫荡，南宋政府所统治下的四川地区战备和经济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根据赵彦呐提交的统计数据，整个四川军区野战部队不过3万，而粮食储备也极其有限。而南宋政府中央也有人向宋理宗赵昀发出了警报：“赵彦呐连年调度，早已师老财殚、兵分力薄。四川是长江的上游，一旦被蒙古军队夺取，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将更为危险。目前当务之急是保卫四川，不仅应该从襄阳方面派出增援部队，更应该在物资上给予全力的支持。”　宋理宗赵昀虽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战场上的局势却早在南宋政府中枢做出反应之前便全面的恶化了。

正面进攻受挫之后，阔端再度祭出了蒙古军队所擅长的迂回战术。1235年的农历十二月，蒙古军队从甘肃东南部出击，沿着三国时代邓艾偷渡阴平的路线进逼文州（今甘肃省文县）。曹友闻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了增援部队，但是南宋的部队在野战中显然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蒙古军队顺利地拔除了川西北一线的文州、阶州两大据点。随后又在遭遇战中歼灭了曹友闻部下忠义总管当可和西和州总管陈禹的部队。据说当可和陈禹都被认为是南宋四川军区的“才勇之人”，他们的战死不仅令南宋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更令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川北防线最后的预备队消耗殆尽。

烽烟四起的战线上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快便反应到了南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宋理宗赵昀的面前。而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野战部队的兵力和士气问题。江淮军区的兵力不可谓不多，但是正规军的数量远少于民兵。而在南宋政府的官僚系统看来，这些当地的民兵组织“皆沿淮恋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而荆湖军区则充斥着同样令人不放心的“北军”。而南宋政府的对应策略是建立更多的“州军”——也就是卫戍区。这种做法的优势是可以充分动员边境地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而缺点则是令出多门，使本来就分散的指挥权更加凌乱。而宋理宗赵昀此前寄予厚望的魏了翁督府也成为了朝臣们攻击的对象，作为理学大家魏了翁多少有些耿直或者说迂腐，因此长期以来在南宋政府内的人缘并不好。在很多大臣的眼中让他离开中枢去外地开府不失为一个“眼不见为净”的权宜之计。因此借着战局的恶化，成立不到3个月的魏了翁督府轰然解体，受不了这个刺激的魏了翁本人当即提出辞职。宋理宗赵昀只能出面安抚说：“这是内阁开会决定的，不是我的意思。”不过经过了一番折腾，魏了翁的职位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的签书枢密院事变成了高级顾问——资政殿学士，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招“乾坤大挪移”。

魏了翁督府刚刚解散，荆湖军区的襄阳城内便发生了空前的兵变。这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前来增援的镇江都统李虎率领“无敌军”与原金帝国降将王旻所统率的“克敌军”之间由于防区等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身为军区主要领导的赵范对部下失去了驾驭能力。事实上荆湖军区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南下的蒙古军队，但是自宋蒙开战以来，除了上闸遭遇战的小胜之外，在其他战场之上南宋军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州、邓州、枣阳等前沿要塞先后失守，南宋军队在水、陆战场都连遭败绩。如果说赵范本人在此前一直算是南宋政坛的绩优股的话，那么襄阳兵变则可以是一次空前的跌停板。

驱逐了李虎的“无敌军”之后，王旻和李伯渊向蒙古军队打开了襄阳城门。从刺杀自己的长官，向南宋军队投诚以来，这已经是李伯渊第二次转换阵营了。是他本人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还是蒙古高层导演的“无间道”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在一个空前纷乱的时代里，人类出于求生的本能往往会践踏所有的高尚情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南宋名将岳飞于公元1134年从金帝国扶植的刘豫伪政权手中收复襄阳以来，这座江汉重镇已经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经营。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座城市、一座要塞，更是南宋军民心目中光复中原的希望所在。但是这一线希望随着一把冲天的大火而归于泯灭。而同时消散的还有荆湖制置使赵范的升迁之

路，鉴于他所肩负的领导责任，赵范很快在朝野上下的弹劾声中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回家赋闲去了。直到三年之后才重新复出，不过在出任静江知府之后没多久便死在了任上。

襄阳的易手对于南宋的整体国防态势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身为元首秘书——左司谏的李宗勉率先向宋理宗赵昀提出：“襄阳沦陷之后，蒙古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一旦江陵失守，那么长江航运便有被截断的危险。过去朝野上下所担忧的还是今年秋天蒙古方面可能会发起的攻势，现在的形势却是危在旦夕。”而针对宋理宗赵昀任命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兼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同时，遵照后者的意见在长江以南的鄂州建立指挥部的行为，李宗勉再次谏言：“欲保江南先守江北。”要求宋理宗赵昀严令史嵩之将指挥部前移。在李宗勉的多次建议之下，宋理宗赵昀打消了被认为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赔款求和的念头，颁布哀痛之诏，号召全国总动员。

一纸文书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的万千豪情，却并不能第一时间转化成实际的战斗力。就在宋理宗赵昀忧心忡忡地降低了自己的伙食标准、减少娱乐活动期待前线传来捷报之际。公元1236年的秋天却从四川前线传来更大的噩耗。首先是曹友闻的野战部队在阳平关一线的全军覆没。在经历近半年的准备之后，蒙古军队在四川一线集结了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军队，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曹友闻对自己的胞弟曹友万提出了自己“众寡不敌，岂容浪战”的担忧，并认定唯一可取的战术只能是在据守沔州（今陕西省略阳县）这一军事要塞的同时，以机动灵活的奇袭、伏击战术来对应。但是曹友闻的这一战略设想却并没有得到川陕军区负责人——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的支持，当蒙古大军的先头部队攻破武休关和兴元府（今陕西省汉中市）之际，赵彦呐错误的命令曹友闻放弃外线牵制的预订计划，全军赶赴以阳平关为中心的大安卫戍区与敌军展开主力决战。

阳平关战役前后历时半个多月之久。曹友闻采取伏击、迂回等灵活机动的战术，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指挥部队全面出击。但是关键时刻战场上却下起了暴雨。而由汪世显所率领的蒙古骑兵部队投入战场。四川的南宋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于徒步战斗。被蒙古铁骑分割包围。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战局，部下纷纷劝说已经负伤的曹友闻突围。因为在他们看来部队虽然打光了，但是也重创了敌人，只要曹友闻还在，希望就还在。但此刻的曹友闻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在一连串的战略失误之后，等待川陕战区

的最终将是毁灭，而身为军人曹友闻选择了以身殉职。据说汪世显与曹友闻曾是生前的好友，曾以名马相赠。而此刻面对命运的无情，他也只能感叹："蜀曹将军真男儿汉也！"

在硝烟散去之后，打扫战场的蒙古军队从堆积如山的尸骸之中发现了曹友闻的遗体以及那面"满身胆"的锦旗，不过没有等蒙古方面决定是厚葬还是暴尸，曹友闻的尸体便被潜入战场的一个女孩子哭着烧毁了。这个毁尸之后选择自杀的女孩子据说是曹友闻的女儿，面对这对忠烈的父女，即便是暴虐的蒙古军队也为之动容，将其合葬在一起。

和曹友闻几乎同一时间战死的还有一位传奇人物——神射手郭斌。不过这位百步穿杨、例无虚发的名将并不是死在蒙宋战场之上。而是以金帝国会州都总管的身份从容的迎接生命的终结。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地处金、宋、西夏三国的交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金帝国的边防要冲。作为世居当地的保甲射手，郭斌逐渐在与西夏军队的边境冲突中崛起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将。而因为他颇有个性的长相——"嘴尖而下唇阔大，双眼暴突而细小"，郭虾蟆的外号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和大多数出身贫寒的人一样，郭斌十分看重那些改变自己命运的"知遇之恩"。因此即便在他逐步升迁的同时，金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却始终不渝。即便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他依旧拒绝了汪世显二十多次的招揽，依旧以金帝国官吏的身份守护着自己的城市。

原本蒙古军队并不急于夺取这座孤城，但是公元1236年的秋天情况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在指挥主力部队强攻汉中——阳平关一线的同时，阔端王子派出宗室亲王宗哥穆直统率一支偏师沿着阴平古道展开侧翼迂回。而此时位于这支部队前进道路侧翼的会州便成为了担任大军前锋的按竺迩必须解决的威胁。郭斌的抵抗虽然坚决，但是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还是令会州沉陷于蒙古军队的猛攻之下。面对纷涌而入的敌人，郭斌让部下将柴禾堆积于州衙门前，随后将家中妻小及城中将士妻子全部集中到一处，随后举火自焚。在熊熊燃起的火焰中，郭斌和部下以门扇作掩护，不断狙击着敢于靠近的敌人，直到弓箭射尽之后才一一转身冲入火场。

但是并非所有生命都消逝在那冲天的烈焰之中，在郭斌射完了自己身上所携带的所有箭矢冲入火场之时，却有一个侍女冲了出来。不过她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将怀中抱着的婴儿哭着托付给满身血腥的蒙古军人。身为蒙古军统帅的按竺尔虽然凶悍，但终究还是一个人。他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感动，主动收养了郭斌的儿

子。按竺尔战功卓著，后来列土封王。抚养一个孤儿长大成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此后的命运却没有再出现在史籍之中，毕竟按竺迩子嗣众多，我们很难从里面确认哪一个才是郭氏孤儿。

在攻克了会州之后，按竺迩指挥的蒙古军队一路南下顺利的于公元1236年农历十月中旬与突破剑阁天险的阔端王子会师于成都郊外。此时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早已逃往夔门（今重庆市奉节县）。客观的来讲，在阳平关战役曹友闻全军覆没之后，此时赵彦呐手中的野战部队恐怕也少得可怜。但是比起成都的守军而言，赵彦呐的兵力还是雄厚。毕竟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手中只有400名盾牌手和300衙役。不过命中注定的悲剧却有一个颇有喜感的开场，因为蒙古大军的前锋部队打着武休关守将李显忠的旗号，所以起初丁黼还以为是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因此大开城门将其接纳了进来。此后近两天的时间蒙古兵往来城内，成都的居民都“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有数人于一小巷内擒杀一骑兵，市民们方知是蒙古兵。一边撕破了伪装的侵略着，一边从梦中惊醒的成都市民。双方随即在城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不仅家学渊博，更是著名的南宋大儒徐谊的门生。在被蒙古军队乱箭射死之前，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作为南宋方面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丁黼的战死以及成都的失守令南宋政府内部再度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弹劾声中，内阁领导人——郑清之反复递交的辞职报告终于获得了批准。接替他的是一向老成持国的乔行简，与此同时拥有多年军事斗争经验，竭力主张大搞民兵建设的老臣崔与之也被退休返聘。从他个人的简历上来看，崔与之的确可以说是南宋政府内不多得的全才，但是此刻他已经81岁高龄了，面对宋理宗赵昀七道任命诏书，身在广州的崔与之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最终崔与之虽然勉强答应作为高级顾问复出，但是一年之后便病故于任上。

1236年农历十一月，是第一次蒙宋战争中转折性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的上旬，蒙古军队火烧成都，扫荡了整个四川腹地。与此同时南宋荆湖、江淮军区也同时告急。但是此刻已经连续作战近半年的蒙古军队，其攻势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衰竭的迹象。首先是在江陵城下，南宋方面的名将孟珙以夜袭的方式摧毁了对手围城的营垒和为了渡江而建造的舰队。随后这位机动防御大师又奔赴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战场，在全城上下一片“吾父来矣”的欢呼声中，蒙古军队不得不改变攻击防线，绕过黄州进攻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而在同一方向，等待着蒙古铁骑的是

真州知州邱岳所布下的伏兵和强弩石炮。在攻坚失利的情况下，蒙古军队不得不全线后撤。虽然战争并非就此结束，但是南宋方面的战略危机期终于算是渡过去了。为此宋理宗赵昀下诏改元，用宋朝历史上最繁荣的两个时代——嘉祐（宋仁宗年号）、熙宁（宋神宗年号）组成的嘉熙来替换那不吉利的“端平”。

蒙古军队对于第一次宋蒙战争的结果基本上算是满意的，毕竟在同一时间内蒙古军队在朝鲜半岛依旧深陷于战争泥潭之中。这一点倒不是因为高丽的军队比南宋善战，而是因为高丽国王早就认清形势逃到了江华岛上，令当时还没有海上力量的蒙古大军只能望水兴叹。因此元太宗窝阔台决定在休整近一年之后，在秋高马肥之际继续向南宋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不过窝阔台显然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南宋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善的国家，一年时间足够南宋朝野调整军事部署，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抵抗。于是在安丰城下（今江苏省兴化市），蒙古大军再一次领教南宋军队弓弩的厉害。而南宋方面新一代的将领也在战争中逐渐崛起，时任池州都统制的吕文德率军驰援自己的故乡安丰，最终令蒙古军队不得不撤围而去。

而在文官系统之中，南宋政府此刻也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公元1238年已故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儿子贾似道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不过他的这一升迁并非单纯是因为他老子的功劳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的姐姐已经成为了宋理宗赵昀所宠幸的贵妃。少年得志的贾似道是临安有名的花花公子，据说有一天晚上宋理宗赵昀登高望远，发现西湖之中有几艘灯火通明的画舫，便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我的小舅子贾似道又在开游艇派对了！”第二天派人查询，果不其然。对于这种荒诞的行径，赵昀特意嘱咐临安市长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警告和规劝。史岩之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的弟弟。作为南宋朝野裙带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当然不会按照赵昀的吩咐去得罪这位“国舅爷”，于是反过来对宋理宗赵昀说：“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是其材可大用。”



年轻时的贾似道

而贾似道也没有辜负史岩之的帮衬，在1238年的1月，他向宋理宗赵昀提交了两份报告。首先他推测说蒙古方面应该会派出和谈代表，战争即将结束。此时窝阔台的特使王檝的确正在南下的途中，贾似道的本职工作是管理皇室的祭祀活动和军队装备，他能够掌握这一情况，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他有过人的政治嗅觉，要么他有一套自己的情报网络。而无论是哪一点，都基本上可以肯定贾似道在外交领域的确有些天赋。而第二份报告的分量则对南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提出惩治腐败的意见。宋理宗赵昀因此对贾似道的看法有所改观，但也不希望再在西湖上看到别人的豪华派对，于是把他外调到澧州（今湖南省澧县）去做父母官去了。

窝阔台的特使王檝抵达临安之后开出了岁币、银绢各二十万的和平清单。但是此刻南宋军队正在襄阳一线准备全线反攻，而巨额的军费开支也令南宋政府的财政

并不宽余。于是在参知政事李宗勉的反对之下，南宋政府委婉地拒绝了对方“施舍”的和平。于是双方在公元1238年展开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决战。蒙古方面的主攻方向在淮西，由成吉思汗时代的近卫军统帅察罕指挥号称八十万的重兵集团直扑庐州。但是在南宋方面的杜杲、吕文德等人顽强防守和果断反击之下，这一轮的秋季攻势再度以蒙古方面的全线失利而告终。而南宋方面随即展开的冬季反攻却大获全胜，在孟珙的指挥下，南宋军队一路将战线从郢州（今湖北省武昌周围）推回到河南南部的蔡州，在中原战场基本上恢复到了战争开始前的态势。东部战线基本归于稳定之后，蒙宋双方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线。双方于公元1239年年底在四川东部的夔门、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一线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攻防战，最终孟珙又一次化解了危机。而蒙宋双方也基本耗尽了各自的国库和战争热情，终于选择了坐下平心静气的和谈。不过作为窝阔台的特使，王檝第五次抵达临安却还没来得及与南宋外交部分达成一份和约，就病死他乡。

接替王檝的是来自乃蛮部的月里麻思，月里麻思率领了一支七十多人的使团南下。出发之前月里麻思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自己的整个团队要求道：“遵照窝阔台大汗的命令，你们同我南下，南方人比较奸诈。如果我们一旦遭遇什么不测，不管是谁，都应宁死不屈，不能玷污我们蒙古大汗的名誉。”果然使团抵达淮北便被当地的南宋军队扣押。这起外交事件多少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此前蒙古和南宋之间一直都有使节往来，为什么南宋方面会偏偏在战局趋于平稳的时候拘押月里麻思呢？答案或许就在月里麻思出使前对部下的训话之中。他本人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这次南下他所肩负的使命可能远远超出和谈这么简单，因此月里麻思才能有如此悲观的预测。不过南宋政府毕竟还是遵守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古训。将月里麻思投入了长沙的飞虎寨监狱，足足囚禁了36年，直到他老死其中。不过此时的蒙古正处于窝阔台死后的政局动荡期，对于月里麻思被拘事件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铁木真的继承人窝阔台在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们的眼中是一个宽厚的老好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一次他和自己的哥哥察合台看到有一个西域人在河中洗澡。按照蒙古帝国的法律，春季、夏季在河中洗澡的人要被判处死刑。察合台随即命人将那个西域人处斩。窝阔台随即表示："他是在水里捞他丢了的黄金，不是洗澡。"从而救了这个名叫奥都拉合蛮的西域商人一命，随即还将其引为亲信。

窝阔台据说嗜酒如命，到了晚岁尤其严重，耶律楚材多次劝谏，都没有效果；最终只能拿着腐朽的铁制酒槽对窝阔台说："麹糵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窝阔台似乎醒悟了，对身边其他的臣子说："你们爱君忧国之心，都能这样想就好了？"随即赏赐了耶律楚材一些金帛。但是完全戒酒对于窝阔台这样的蒙古人是做不到的。能像他自己所规定的那样做到每天只喝三杯就算不错了。


窝阔台

长期的酗酒令窝阔台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除了在与金帝国战争回师的途中害死自己弟弟拖雷的那场不知道是真病还是假病的医疗记录之外。他晚年还发生一起严重的休克。据说医生都表示“脉已绝”。但是耶律楚材却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趁机劝说乃马真皇后：“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囚系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果然不久之后窝阔台的脉搏又复苏了。除了酗酒之外，无节制的打猎也严重地损害了窝阔台的健康。在他死前，耶律楚材曾假借天意劝阻过他。但是窝阔台的部下却说：“不骑射，何以为乐？”而在打猎的过程，窝阔台故态重萌“欢饮极夜”，最终在第二天一命呜呼了。

作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一向迷信的窝阔台更将自己的命运与狼联系在一起。在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在远征西域的过程中，窝阔台偶然从部下的口中听说当地的伊斯兰牧民捕获了一头屡次侵袭牲畜的野狼。窝阔台立即命人从当地牧民手中购买下了这头野狼，甚至还赏赐给了告之他此事的蒙古部下一群羊。当野狼被带到窝阔台面前后，窝阔台不仅公然将其释放还煞有介事的对狼说：“你回去之后要将这里的危险告诉你的同类，让他们迁徙到别处繁衍。”但事实证明放生不过是窝阔台的一厢情愿，野狼刚刚被解除束缚便被帐前豢养的凶猛猎犬群起咬杀。对于发生在面前的惨剧。窝阔台显得很失落，“入帐默久之”后，对左右说：“我身体不好，本来想放生这头狼来向长生天祈祷延寿。谁知道它在劫难逃。这件事情对我不是什么好兆头。”果然不久之后，窝阔台便因病去世。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许还有待考证。

中亚史料《史集》则认为是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毒死了窝阔台，唆鲁禾帖尼的姐姐亦巴合别吉有个儿子是窝阔台的宝儿赤（厨子），按照唆鲁禾帖尼的吩咐，亦巴合每年要从自己的营地来宫廷一次，并设宴款待大汗，这一次，她与其子一起向大汗献酒，其夜，窝阔台即因饮酒过多而死，于是宫廷便流言说是亦巴合和其子在酒中下了毒。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同样有待考证，但随着窝阔台的去世，沉寂多年的拖雷诸子再度看到了登上权力巅峰的希望。

蒙古帝国入主中原多年，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其中为首的便是名臣——耶律楚材。铁木真攻陷中都燕京之后，曾一度寻访和重用契丹贵族。时任金帝国左右司员外郎的耶律楚材便是其中之一。铁木真第一次召见耶律楚材时颇为得意地告诉对方：“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但是耶律楚材却不以为然地回答

道：“臣从祖父起便为金帝国工作，既然是臣子，那么又怎么可能仇恨君皇呢？”这一颇为巧妙的回答令铁木真对这个“身长八尺，美须宏声”的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以便随时咨询。一向喜欢给人起外号的铁木真也不称呼耶律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语称作“吾图撒合里”，意即“长髯人”。

从家谱来看耶律楚材是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所谓“东丹”是契丹对被为自己所灭的渤海王国起的新名字。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时一概采用汉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汉两种文字撰写文章。作为他的后裔，长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也是金朝著名学者，兼精汉、契丹、女真文字，曾译汉籍为契丹、女真文，又参与编纂辽史，以文章行义见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据说耶律履精通占卜之数，当耶律楚材出生时，他就曾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随即根据《左传》中“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名句，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耶律楚材。


名臣耶律楚材

耶律履最终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被蒙古所用的“金才”，在耶律楚材三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不过在母亲杨氏的养育和教诲之下。耶律楚材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十七岁时已经“书无所不读”。在　“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之后，耶律楚材自命为“百尺栋梁”。强烈地追求功名，企图按照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奉特旨应试中甲科，任为省掾。不过

耶律楚材在金帝国并没有太大的政治作为，虽然在中都被围后他也曾“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的坚守工作岗位，但是衰弱的金帝国最终无力抵抗蒙古南下的兵锋。

1218年铁木真正式征召这个契丹皇族的后裔扈从西征。耶律楚材看到了蒙古帝国方兴未艾，势不可当的气象，便决心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决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动来影响它的发展进程。不过在铁木真的西征之中，耶律楚材所担任的工作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汉文书记。不过他对天象的解释和对人事的预卜，却深得笃信萨满教的铁木真的信任。而耶律楚材在从东亚来到中亚的远程过程中，也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天象的出现有直接联系。他从而提出“里差”（即现在所说的“经度”）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来“改作”历法，编订了一部《西征庚午元历》。应该说他是在中国首先提出和使用“经度”概念的人，几十年后，苏天爵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地方时”的概念。

耶律楚材真正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是在窝阔台执政时期，在最终确定窝阔台即位的忽里台大会之上，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初建皇权威严的窝阔台随即投桃报李，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黄河以北汉民的赋调征收。此时黄河以北地区刚刚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耶律楚材主张予以宽宥，使窝阔台下诏，宣布特赦自庚寅年（1230）农历正月朔日以前所有“误触禁网”的百姓。

1230 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条陈十八事，主要内容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窝阔台都加以采纳，仅仅认为“贡献礼物”是贡献者自愿的事，不必禁止。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贡献”形同强夺，往往是各地驻军强行索要的。

在蒙古崛起初期，主要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并没有所谓国库的概念。因此近臣别迭等建议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杀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对此还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比较了解财富的真谛。他向窝阔台进言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为此他还为窝阔台算了一笔经济账：“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馀万石”。铁木真听后当然很高兴，于是“诚如卿言，则国

用有馀矣。卿试为之”。随后由耶律楚材制定了蒙元帝国最初的税收制度。据估计，当时黄河以北汉民可征赋调的至少接近四十万户，如果以四十万户计算，那么平均每户承担银1.25 两、绢0.20 匹、粟1 石。这样的赋税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耶律楚材采取的劝农性的赋税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使蒙古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切实保证，从而使蒙古成功地进行了最后灭金的战争。而在灭金战争中，耶律楚材的特殊功绩则是保护生命。面对战争中的残酷杀戮，他总是力图保全更多的生命。当1233 年正月蒙古军队行将攻占汴梁时，战将速不台主张按蒙古惯例，对这个进行过抵抗的全国都城实行屠城。由于耶律楚材在窝阔台面前力争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举才得以免行，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万户免遭惨祸。蒙古对待汴京的这种宽大措施，以后成为定例，在攻取淮河、汉水流域诸城时也得到遵循。耶律楚材还成功地说服窝阔台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给资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的残酷禁令。

1234 年蒙古灭金以后，耶律楚材认为“以儒治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相关方案，在《西游录》中已有简要的记述，那就是“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由于他得到大汗窝阔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项目有了实施的机会。但随着窝阔台晚年饮酒无度，怠于政事。耶律楚材逐渐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 年农历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汉民公事，耶律楚材的实权更见削夺。一个月之后，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摄政。耶律楚材虽然继续任职，但已难以有所施展。

作为蒙元帝国的第一任统治者，铁木真曾经与蔑儿乞惕部有过一段“抢亲”的恩怨。不过有趣的是，他的继承人窝阔台最为宠爱的却恰恰是曾为蔑儿乞惕部酋长妻子的乃马真脱烈哥那，真正的皇后孛剌合真反而默默无闻，无子无名。在强悍的窝阔台生前，乃马真那对蒙元帝国的政治似乎干预不多，但是随着1241年窝阔台的病逝，在这位窝阔台所有妻子中排名第六的乃马真脱烈哥那却成功的脱颖而出，理由很简单，在窝阔台的子嗣之中，无论是参与第二次西征的大汗长子——贵由，还是拥兵吐蕃的阔端都是乃马真脱烈哥那所生。在成功的获得察合台等宗亲赞同之下，乃马真得以在贵由统领西征大军返回前以“摄政”之名暂代国政。



蒙古帝国皇后的标准像

乃马真摄政之后，似乎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代理国君的身份，开始宠信蒙古西征大军在波斯俘获侍奉宫廷的穆斯林妇人法蒂玛，使其得以干预朝政；中原事务则

委任给商人奥都剌合蛮全权处理。她对奥都剌合蛮的信任之深，甚至将空白的圣旨“御宝空纸”都交给对方，任何奥都剌合蛮提出的建议她都一概同意，如果官员提出反对意见不肯按章办理，就要被处以断手之刑。对于这种恶政，以耶律楚材为首的蒙古帝国官员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耶律楚材表示：“国家的法律颁布和行政命令，先帝一向都交给老臣，这事和其他官员没有关系。如果法令合理，我们自当奉行；如果法令不符合国情，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断只手吗？”

对于耶律楚材的不合作态度，身为摄政皇后的乃马真也不能将其直接罢免或者处死。因为耶律楚材自己都说：“我帮助铁木真、窝阔台治理国家二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对于这样的先朝旧勋，即便是乃马真脱烈哥那这样的悍妇也不得不表示尊敬和忌惮。

身为政坛元老的耶律楚材与摄政皇后直接发生冲突，令他的政治处境格外的艰难。而他的妻子苏氏的亡故，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耶律楚材的晚境十分凄凉，1244 年农历五月十四日，这位与蒙古帝国一同崛起的契丹名臣在郁郁中与世长辞。其政敌随即企图乘机对他进行清算。有人谮言他在久居相位时贪污严重。乃马真皇后随即命近臣到他的府第进行搜查，但结果只发现琴阮十余张以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并没有其他的财物。

耶律楚材死后，乃马真顿时失去了掣肘，开始大肆地迫害与自己结怨的大臣镇海等人，逼迫对方只能逃到乃马真的儿子阔端那里躲避。而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乃马真脱烈哥那又不得不采取滥行赏赐博取手握重兵的宗亲贵族、那颜们的欢心，而吃准了乃马真心虚的蒙古诸王也逐渐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了主动索取，令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长期雌伏的“皇叔”铁木格斡赤斤更忍不住露出了自己的獠牙。他利用乃马真皇后摄政期间政局混乱，人心浮动之际。悍然率军西进，令蒙古帝国中枢惊慌失据，乃马真只能一边以侄媳的名义语气谦卑的写信询问铁木格斡赤斤起兵的原因，一边准备迁都躲避。

不过铁木格斡赤斤虽然势力雄厚，但多年来用于伪装的懒惰似乎已经成为了习惯，他不仅进军速度缓慢还缺乏放手一搏的勇气。当听说贵由和拖雷之子蒙哥已经率领西征大军回师之时，他便以“吾来奔丧，非有他也”的名义缩回自己的封地去了，而他这种谋篡的行为当然不会因为未遂而被原谅，贵由继承汗位之后立刻授权蒙哥对其进行调查和审判。对于铁木格斡赤斤最终的结局，史学界向来有“被处决”和“善终”两种说法，不过从他的后嗣在蒙元帝国的政治地位来看，无论他最终是

怎么死的，对于他的家族影响都不大。因为无论是执掌蒙古帝国的贵由，还是觊觎汗位的蒙哥和忽必烈都一时无力鲸吞铁木格斡赤斤在辽东的势力，相反必须倚重于他的嫡孙塔察儿。

贵由、蒙哥所部西征军团胜利回师不仅有力的回击了以铁木格斡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试图“问鼎”的野心，更令长期空悬的汗位终于有了着落。客观地说乃马真虽然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又用人唯亲，但至少在她的“银弹外交”之下，保证了汗位空悬的五年之中，蒙古帝国内部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在贵由于1246年通过召开忽里台会议的方式正式继承汗位之后，作为他母亲的乃马真脱烈哥那也如谢幕的演员一般离开了人生的舞台。在乃马真病逝之后，贵由随即立即以施展巫术害死自己的弟弟阔端为由处死了自己母亲生前的亲信——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并拘收其母及诸王滥发的牌印，禁止无限制搜括。

第八章　钓鱼城下

血沃宫闱
——贵由的短暂执政和拖雷系的绝地反击

由于执政时间不长，长期以来各类史料之中，贵由都被描绘成一个潜在的“昏君”。但设身处地的来看，贵由回师之后虽然取代了摄政五年之久的母亲，但乃马真长期以来滥行赏赐，法制废弛，从而造成了政令不一，矛盾重重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消弭，而由其所造成的巨大政治惯性，更令贵由不得不继续大开府库，以金银财宝赏赐那些推举他为大汗的诸王、大臣和将领，以表示他的慷慨和感念之情。当然对于自己治下“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局面，贵由也并非全无警觉，不过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将矛头对准了西征中与自己龌龊不断的堂兄拔都，希望能通过一场内战来凝聚自己。

1247年，贵由任命自己父亲窝阔台的心腹——大断事官野里知吉带为新的西征军统帅，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员——除了从诸王的部众之中十抽其二之外，还号召所有蒙古牧民百选一人，组成“巴图鲁”（勇士）精锐部队。与此同时贵由授予野里知吉带统辖阿姆河以西各地区和所驻蒙古镇戍军的军权和收取地方财政收入以充实军需的财政大权。这一异常举动，明显含有对付拔都的意图，因为此时拔都的势力已扩展到高加索地区，而贵由则特别指明这个地区归入野里知吉带所管辖的战区。最终贵由的一道手谕更表达了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朕将自往，以汝为前锋耳！”

公元1248年年初，贵由自称身体不适要到自己父亲窝阔台的封地叶迷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养病，随后便率领精锐的近卫军踏上了西行的不归路。1248年农历三月，贵由在抵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突然死去。关于他离奇死亡的真实原因史学界颇多争议。不过无论是被毒死还是因为和昔班（拔都的四弟）酒后斗殴中被打死，似乎一切的线索都指向拔都。但事实上拖雷系在这次宫廷政变中也出力不小，因为正是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秘密派出使者通知拔都，让他提前防备贵由的西进。可以说在贵由时代术赤系与拖雷系便可能已经结成了秘密同盟。



为了征讨堂兄拔都，贵由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多民族部队

贵由虽然死了，但是窝阔台家族表面上依旧实力雄厚。蒙古帝国的政权再度落入一个女人的手里，她就是贵由的妻子海迷失，应该说在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之前，无论是术赤系的拔都还是拖雷系的蒙哥都不敢第一时间跳出来挑战窝阔台制定的继承人——皇孙失烈门以及他的法定监护人海迷失。可惜海迷失皇后的政治才干甚至连她的婆婆乃马真都不如，而贵由的两个儿子忽察和脑忽也一心想着争夺汗位，在母子三人都自认为是、各自为政的情况之下， 海迷失不得不将推举大汗的权力移交给身为长子嫡孙的拔都。或许海迷失心里还在打着如意算盘——术赤血统不纯，拔都没有机会窥测汗位自然只能按照之前的誓约将汗位传给窝阔台的子孙。但可惜的是海迷失忘记了拔都虽然没有理由自己即位却有推举别人的权力。

拔都此时也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一方面按照蒙古帝国的习惯法请海迷失暂时摄政以稳住窝阔台系诸王，一方面以长支宗王身份遣使召集各路诸侯前来共商大事，而地点则选在他大军驻守的阿剌脱忽剌兀。由于这个尴尬的地理位置，察合台

和窝阔台派系的人马自然不敢自投罗网，连海迷失本人也只是派来了全权代表。不过窝阔台系统还是有一位强力人士抵达了会场，他就是在西线战场上统帅大军的野里知吉带。



蒙古帝国公推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

有空前强大的野战军为后盾，野里知吉带在会议上要求大家遵从海迷失的全权代表那颜八剌的建议：按照窝阔台的遗命推举失烈门继位，这一点似乎站得住脚却不想其实是自打耳光。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立刻抓住了其中的逻辑错误，指出：“既然窝阔台生前留下过遗嘱，那么贵由是不是谋朝篡位啊？”然后继续推导得出竟然窝阔台自己的儿子都敢这么乱来，那么之前的誓约也就毫无信用可言——“今日之事，奈何以太宗之命为辞！”

在推翻了失烈门继承权的合法性之后，大汗继承人的热门人选就只剩下主持会议的拔都和参加会议的拖雷系的长子蒙哥了。于是在以退为进的指挥棒之下，拖雷系首先大肆推举已在钦察草原立国、已无东归之意的拔都。而拔都也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在主动予以拒绝之后，一场有些做作的对话便出现了。与会的人事一起提

问：“王既不自立，请审择一人，以践大位”。然后拔都则做思考状，回答说：“我国家幅员甚广。非聪明知能效法太祖者，不胜任。我意在蒙哥。”然后台下一致表示：“我们也这么看！”在所谓“民主”的推动之下，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权力的巅峰。而蒙哥还要再推让一番，才在自己的弟弟末哥鼓噪“我们兄弟不是一向听拔都大哥的吗？你今天怎么不尊重他了啊”之后，才表示“勉强接受”。

但阿剌脱忽剌兀的推举毕竟只是在术赤和拖雷派系中产生的。被排除在外的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立即提出选汗大会应在成吉思汗大帐举行，要求移师到他们的“主场”重新举行。这一次轮到拔都纠结了，不过虽然自己不敢贸然前往，但是拔都还是派自己的弟弟伯勒克、托克帖木儿统率大军武装护送蒙哥返回蒙古本土，同时自己驻守在边境之上作为声援。拔都麾下都是“长子西征”中的百战精锐，蒙哥兄弟在母亲唆鲁禾帖尼多年苦心经营之下，也是实力雄厚，连1246年抵达蒙古的罗马教皇使者卡尔平尼都认为：“在鞑靼人中，除皇帝的母亲外，这个贵妇（唆鲁禾帖尼）是最有声望的，而且除拔都外，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因此面对这两股势力的合流，即便是在蒙古本土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也迅速发现自己毫无优势，只能继续抵制会议的召开。但是这种缓兵之计无法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1251年农历六月，在克鲁伦河上游举行的大会中，与会的东、西道诸王、百官再度提名蒙哥登基。大蒙古国汗位正式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

尽管可以想见钢刀很快便会架到脖子之上，但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之中真正敢于铤而走险的却只有失烈门、贵由之子脑忽等少数愣头青，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显得格外幼稚——带上自己的亲信人马以参加蒙哥即位后展开的庆祝酒会为名抵达会场，然后将新任大汗及拥戴蒙哥的各方诸侯杀个干净。应该说中国历史并不乏少数死士突击得手，从而颠覆一个政权的先例，但是显然以失烈门等人的组织能力并不能成功的实施这一并不复杂的宫殿政变。

根据各方面史料的说法，失烈门等人阴谋的败露完全是一起偶然事件，蒙哥的鹰夫克薛杰为了追赶自己逃走的骡子而意外的在萨里川之地（土拉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间）遭遇到了失烈门等人的车队，而车队中由于混杂了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因此竟然意外的没有发现克薛杰这个路人。而“恰巧”又有一辆大车因为车轮损坏而停在路边，而赶车人又“恰巧”的认为克薛杰是自己人于是请他帮忙修车，在这个过程中克薛杰发现了车上满载的兵器。克薛杰问对方原因，那个赶车人竟然毫不怀疑地回答：“你的车也是这样，问什么啊？”于是克薛杰立刻警觉的赶回了会场，向蒙

哥报告这一迫近的阴谋。

因为有太多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巧合，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一切都原本不是“巧合”。总之失烈门等人还没有赶到会场便被蒙哥方面的大军所包围，在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失烈门和他的随从便成为了蒙哥的阶下囚。随后在严刑拷打之下，相关的人证迅速出现。但是蒙哥的镇压却不仅仅局限于失烈门个人。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失烈门和脑忽等人麾下的窝阔台派系的七十多位那颜首先被处死。随后参与密谋的大臣合答随即被捕杀；察合台的孙子也孙脱虽然与失烈门等人同谋，但是他只是率军作为后应，一见形势不对便弃军投降，因此只是被逮捕而已。

在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身为皇太后的海迷失依旧态度强硬。她依旧以摄政者的身份向蒙哥的使者发出斥责：“各系宗王们曾经发过重誓，誓言大汗之位只能由窝阔台家族传承，绝不与他的子孙为难。现在你们却自食其言，不守信用！”不过所谓的誓约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需要实力来进行背书，蒙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视，直接派人用生牛皮缝住海迷失的手将她带往和林，交给自己杀人如麻的断事官长忙哥撒儿。

忙哥撒儿是蒙哥和忽必烈的父亲——拖雷时代的老班底。在跟随蒙哥参与“长子西征”的过程中也“勤奋效力，立功尤多”，因此颇得蒙哥的倚赖。甚至他有事入奏时，蒙哥如果还没有起床，他也能直趋宫帐前，扣“箭房”。所谓的“箭房”是指元帝国的内卫处。根据《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规定的宫帐宿卫法，夜间不许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卫士得格杀勿论；至少少数权贵在有急事入奏的情况，可以先通知宿卫，一同至宫帐后启奏。而对于忙哥撒儿，蒙古不仅“所言事皆获允准”。还将自己的大帐、行榻赏赐给他，可见其受宠信之深。

据说忙哥撒儿对待做过三年摄政女王的海迷失极其残忍，不仅没有给予其政治上的特权，相反在审问的过程要求对方裸身处刑。尽管忙哥撒儿一向冷酷，但是我们似乎找不到他和海迷失有什么私人恩怨，但是蒙哥对海迷失的憎恨却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向来自欧洲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使节表示：“（海迷失）比一条母狗更卑贱”。而忙哥撒儿显然正是在自己领导的指示之下，对海迷失进行一番羞辱之后，将她与失烈门的母亲合答合赤哈敦一起，以蒙古习俗裹入大毡，投入河中从此尸骨无存。

在肃清了窝阔台系的骨干之后，蒙哥命令自己部下不怜吉歹和不花分别率军向

察合台系的领地逼近，以武力支持拥护自己的察合台长孙合剌旭烈前往取代长期以来支持贵由的察合台汗国的领导者也速蒙哥。事实上合剌旭烈本来就是察合台所选定的继承者，只是由于贵由的干涉才被自己的弟弟也速蒙哥赶下了台，可惜的是这位复辟的汗王走到半路便因病去世，只能让自己的遗孀——兀鲁忽乃出马在察合台汗国首都虎牙思处死了也速蒙哥，随后以监国的身份管理察合台汗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察合台汗国都在蒙哥的羽翼之下。

而对于窝阔台系，蒙哥则采取直接支解的模式，根据《史集》中的说法："他们的军队除阔端诸子的以外，全被夺走并分配掉了"。不过这一说法事实上并不确切，窝阔台的子孙之中没有卷入政治斗争的合丹、灭里、海都等各分得一部分属民和领地，虽然他们的力量暂时没有能力威胁到蒙哥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将会成为蒙古帝国分裂和内战的源头。

从他的种种行为来看，蒙哥是一个刻薄而又残忍的人，在肃清了蒙古帝国宗室内的反对势力之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政府内那些没有明确支持自己的官僚。曾经在铁木真最危难的关头同饮班朱尼河水、立有卓著功勋的三朝元老镇海虽然曾经得罪过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但是由于长期与贵由关系密切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耶律楚才的儿子——耶律铸也险遭杀身之祸，只是因为得到了忽必烈的保护和说情才得幸免。在蒙哥毫不留情地政治大清洗之中，被杀的诸王、后妃和那颜达三百多人，以致他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病死之时，那些被害者的家人无不拍手称快的表示："你也有今天！"

在蒙元帝国的历任统治者中，蒙哥无疑是比较抠门的一个。即便是对于拥戴自己的拔都，他在赏赐上面也是颇为吝啬的。1253年农历六月拔都派遣使者向蒙哥申请"买珠银"万锭，结果直接被蒙哥打了个一折，只给了千锭。还不忘告诉对方："我们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积累的财富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快没钱赏赐给你们这些诸王。这笔钱就当是今年的赏赐了。"对于长期以来向蒙古贵族销售奢侈品而发财的回回商人，蒙哥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公元1257年农历九月，回回商人以进献的名义向蒙哥兜售水晶盆和珍珠伞等工艺品，狮子大开口的要价三万锭。蒙哥随即表示："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钱耳。朕独有此何为？"于是给了点路费就把对方打发走了。

除了"不喜侈靡"的节俭品德外，蒙哥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领导者。不过他的沉默不代表不作为，而是心计深沉的表现。针对窝阔台时代以来蒙古帝国内部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情况。蒙哥大权独揽，所有的行政命令都自己书写，甚至还要再三

修改。而他对部下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他经常对自己的亲信们说："你们得到了我的赏识，如果还不低调的话，可是要吃苦头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吝啬"和"内敛"，蒙古帝国在蒙哥的治下基本结束了乃马真、贵由母子治下的种种乱象。

"众所周知"死在襄阳城下一个独臂汉族游侠手中的蒙哥，其实在史书之中的确与"射雕英雄"有些关系。在他的众多妻子之中，第二皇后忽都台便曾向蒙哥展现过不输给蒙古男子的射击技术。据说忽都台自幼勇敢机敏，酷爱骑马射箭，而嫁给蒙哥之后小夫妻的感情也一直不错。有一次两人正在蒙古包中亲昵，突然空中传来了蒙古草原之上特有的雕叫之声，忽都台竟然取下弓箭走了出来，蒙哥见到妻子这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决定赌点"彩头"，不过这个"彩头"实在太大——"你如果能射中大雕，汗位是可争得的；如果射不中，恐怕就很难"。谁知忽都台张弓射去，竟然一箭双雕。



蒙古草原之上骑射也是女性的生存技能

除了有一身好体魄之外，忽都台在政治上也是蒙哥的“贤内助”，她很早便向蒙哥灌输“王室分裂，汗祚移人，今日贵为汗，明日楚囚相向，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的残酷斗争理念。据说不仅蒙哥一举拿下海迷失一系的诸多亲王背后有忽都台的推手，连将窝阔台系诸王的领地瓜分数块，分授其他后人这既分散了他们的权力，又奖励了于忠于自己的宗室，增加汗廷的实力的蒙哥版“推恩令”也是忽都台的主意。可惜忽都台的寿命并不长，1256年就在自己的丈夫登上权力巅峰的五年之后，忽都台撒手人寰。也许她不死的话，她与忽必烈之间将有一场精彩的“叔嫂暗战”。

从公元1241年到公元1246年，蒙古帝国始终处于汗位虚悬的状态。在等待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从西征俄罗斯前线归来的过程中，蒙宋战场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蒙古军队在东、西两线都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但是却始终无力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而南宋方面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战略调整期，按照宋理宗赵昀“正好乘暇作工夫”的指示，构筑了一条从长江上游的夔州、重庆经中游的襄阳、樊城一直延伸到上游的江淮一线的要塞群。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莫过于由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主导，由播州绥阳（今贵州省绥阳县）冉琎、冉璞兄弟所规划建设的合州防御体系。

余玠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的身份抵达四川前线之时正是两川民不聊生，监司、戎将各专号令，局面日益恶化的时期。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一系列政策令几乎糜烂的四川局势出现重新振作的迹象。而他在自己帅府附近修建的招贤馆更吸引了遍游巴蜀名胜和关隘重镇的冉氏兄弟前来报效。不过冉氏兄弟虽然被余玠奉为上宾，但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建设性意见。余玠没有将他们扫地出门，而是派人暗中观察。结果发现两兄弟每天都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出战区内山川城郭的形状，互相攻守，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兵棋推演”。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这几天，冉氏兄弟私下向余玠建议：“为今保卫四川的办法，只有将防线向西北推移到合州一线。合州有嘉陵江和钓鱼山天险，只要任用得人，再加上足够的粮食储备，远胜十万大军。”对于冉氏兄弟的建议，余玠显得异常兴奋甚至跳了起来。

事实上南宋朝野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冉氏兄弟，在此之前，时任仓部郎官的赵希塈和宋理宗赵昀讨论四川局势时便提出：“当择威望素著之人当夔、峡要害，建一大阃。”因为重庆城防即使再坚固，如果没有外线的要塞呼应和屏障，一旦被蒙军围困，蒙军主力再顺江而下，四川战区作为拱卫南宋长江上游的功能就会丧失。

但是余玠的幕僚们却不这么看，毕竟此时重庆以西南宋军队几乎没有一条连贯的防线。在余玠上任之前，作为南宋四川军区的负责人，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也曾锐意进取，一度收复了成都、汉州等地，并在旧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城池，加强守备。但结果仍被汪世显指挥的蒙古大军轻易的攻破，声称要以百万大军讨伐蒙

古的陈隆之在“城破被执”之后也被蒙古军队杀死。战火一直烧到嘉定、泸州、叙州等地，史称“西州之祸”。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大家出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自然反对余玠敌前筑城的做法。这些反对的意见最终引起了余玠的愤怒。他大声呵斥道：“筑城计划如果成功，那么整个四川战区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不成功，我一个人去守备好了，你们大家只要负责围观就好了。”在余玠的坚持之下，南宋军民在合州地区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几十座军事据点，形成了棋布星分的整体防御体系。为此余玠还特意找人画了一幅《经理四蜀图》进献给宋理宗赵昀，表达自己愿意用十年的时间，收复整个四川地区，然后归老山林的意愿。

在蒙古帝国处于乃马真皇后摄政的五年之中，南宋政府内部也进行新一轮的大洗牌。依仗着部下孟珙的英勇善战，战争期间总领江淮、荆湖、四川三大军区的史嵩之自然而然的出将拜相，从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时代进一步升为右丞相兼枢密，其职权相当于总揽军国重事的内阁副总理加国防部部长，完成了史氏家族“一门三相”的政坛帽子戏法。对此史嵩之本人颇为得意，很少写诗的他在《宴琼林苑》中大发感慨：“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

但是南宋政府内部对于史嵩之的反对声浪却始终不绝于耳。这一点除了出于对这个官N代的不忿之外，更重要的是大权在握的史嵩之和他的叔叔史弥远一样行事专横。曾在安丰和庐州战场上多次击退蒙古大军的淮西制置使杜杲只是因为史嵩之的和谈政策，便被夺去兵权，终老田园。最终对史嵩之的不满在1244年的秋天集中爆发了，而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竟然是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的去世。按照南宋政府的惯例，为官之人一旦碰到至亲有丧必须要脱离本职岗位回家守孝，时间为三年。 而贪恋权位史嵩之企图援引战时特例，继续赖在高位上不下去。此举最终引来了南宋各大高等学府——太学、武学、宗学、京学学生及部分官员的大串联，他们纷纷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主和乱军、专权固位、结党营私，他们并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朝入，诸生夕出”，以罢课来抗争。无奈之下史嵩之只能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



南宋最后的名将——孟珙晚年画像

史嵩之回家郁闷去了，南宋政府再度进入了军政分离的时期。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是史嵩之过去的助手范钟和政敌杜范。而军事方面则由国防部副部长——同知枢密院事赵葵领导。赵葵走马上任之初虽然发表了一通“任用人才，应该长时间考察其成效”之类的豪言壮语。但是在各大军区领导人的问题还是不免有所偏颇。在赵葵一手提拔的吕文德和其在江淮军区的老战友——余玠都得到重用的情况之下。在史

嵩之时代担任荆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统一指挥长江中下游各地驻军的孟珙，此时却被一再削弱兵权，并加上了江陵知府的头衔，再无驰骋疆场的机会。

事实上孟珙的年纪虽然比赵葵要小9岁，但是早在赵葵的父亲赵方的时代，孟珙便已经活跃于战场之上了。因此两人不仅是平辈更曾是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而在升迁的道路之上，赵葵由于“端平入洛”失败的影响而一度落于孟珙之后。今天我们无从得知赵葵对孟珙的真实看法。但是从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上，两人的心态的转变却似乎已经跃然纸面。余玠前往重庆赴任之时，孟珙不仅主动资助其军粮十万石，更将自己麾下的晋德和六千精锐部队也交给了对方。

或许在孟珙看来余玠的到来对他而言是一件好事，毕竟长期以来同时指挥荆湖和四川两大军区的孟珙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阻击蒙古军队在四川一线的进攻之上，而其自己经营襄阳的计划却始终得不到实施。但是随后而来的江陵知府的任命却令孟珙空前失望。他甚至公开对部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朝廷的决策太过于简单了。一旦蒙古方面派兵牵制我，长江上下游发生险情我是救还是不救？去救的话，对手必然乘虚而入，直捣江陵，而我不去救援的话，谁又能挡住那些蒙古铁骑呢？”显然对于孟珙这样擅长机动防御的将领而言，将其框死在江陵的做法不仅愚蠢更是一种残忍。

牢骚归牢骚，对于赵葵抽调其麾下五千精锐前往江淮战区，支援安丰、寿春战场的决定。孟珙还是支持的，但是随后赵葵又要求他分兵三千前往齐安。这一次孟珙终于发火了。当然在拒绝的同时，孟珙也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我的防区黄州距离预定目的地只有一江之隔，如有战事可以随时支援，何必预先调动。何况部队调防劳师动众。可以说是无益有损。万一上游有警、我军已疲，这似乎不是好主意！”不过随之而来的便是南宋政府要求孟珙回镇江陵的行政命令。在江陵城上孟珙悠然长叹，他不是为自己的仕途担忧，而是焦虑江陵的防御。江陵外围虽然水网交织，既可灌溉农田，又可作为阻挡蒙古骑兵的障碍。但是依旧存在着可以通行的低洼地带。一旦蒙古大军南下可以轻易的直达江陵城外，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孟珙选择险要地段，修筑要塞11 处，另筑大型外围防御工事10 处。加上开挖连通的外围河道，江陵终于可以称得上是金城汤池。

不过孟珙在江陵的建设却并不能换来赵葵和南宋政府对他的信任。 心灰意冷的孟珙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哥哥孟璟在武昌，自宋帝国建立以来没有“兄弟同处一

路”的道理，请求解甲归田。但却没有得到批准。而新一轮分兵令再度降临在孟珙的身上。跟随孟珙多年的部下张汉英率军五千人被调往了江淮战场。如果说这还属于正常的话，那么南宋政府以防御大理可能的入侵而要孟珙从荆湖军区再抽调五千人前往广西，这可以说是在赤裸裸的“削藩”了。

要知道孟珙的父亲孟宗政经营一生，才打造出了一支两万人的“忠顺军”。此后孟珙虽然不断吸收中原地区的流亡难民，但其中真正拥有实战经验的壮丁并不多。孟珙事业巅峰时期所统帅的镇北军也不过一万五千多人。而不断奔波于四川和荆湖两地，加上战场的损耗。孟珙手中的精兵可以说越打越少，以至于连回鹘人爱里八都鲁带令壮丁一百多人加上一百多老头和小孩，已经两百六十匹战马都令孟珙极其重视，特意为他们创立了“飞鹘军”的番号。而从两淮招募到了359人也被编组成“宁武军”交给自己的弟弟孟璋指挥。而南宋政府却一再狮子大开口，这边要几千、那边要几千，对于孟珙而言都是切肌之痛啊！

孟珙再一次据理力争，提出：“从大理到广西，数千里部落隔绝，应该任用官吏分布各郡县，教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险要的地形处设立军事据点，储备粮草。这样一来声势既张，国威自振。现在这样的闻风调遣，只能是空费钱粮，无补于事。”但是这样的声音最终石沉大海。而随后甚至连孟珙所递交的蒙古即将发起进攻的军事情报都被直接无视了。蒙古军队在察罕和曾在蔡州城下被孟珙救出的汉军将领张柔的统率下轻松的在淮西突破了吕文德的防线，一路扫荡劫掠甚至威胁到江淮重镇——扬州。此时的孟珙或许也只有“哀莫大于心死”的感怀了。

最终给予孟珙致命一击还是南宋政府对于他准备接纳蒙古边将范用吉投诚问题上的冷漠。范用吉本名为孛术鲁·久住，是女真族孛术鲁氏部落的族人。在金帝国灭亡前期，孛术鲁·久住审时度势的投靠了当时的两淮制置使赵范。赵范起初对他还是比较欣赏的。但是当对方改用了汉族名字范用吉之后，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赵范觉得对方触犯了自己的名讳，时常找些小事就呵斥他。不过范用吉倒是应对如故。

时间一长，赵范也只能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于是就让对方改个姓氏，以花用吉的身份继续充当自己的亲信。结果1233年农历三月，已经身为均州(原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军事主官的花用吉却杀了当地的长吏，席卷了全城的钱粮投奔南下的蒙古人去了。范用吉是否是真心想要回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值得信任吗？这些对于孟珙而言已经都不重要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政府，而不是一群只会

钩心斗角的官僚。在南宋中枢阻止他与范用吉继续接触之后，这位转战多年的名将发出了“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的感叹，而他的病假申请再度没有被批准。1246年农历九月初一，这位名将终于在江陵病逝于自己的岗位之上。接替他的是风头正劲的“国舅”——贾似道。

在孟珙生前的最后两年里，史嵩之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而令他难堪的不是政敌的痛打落水狗，而是他的政敌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内阁午餐会上的饭桌上。首先暴病而死的是向来与史嵩之不和的新任右丞相杜范，如果这位前后在岗位上干了还不到四个月的丞相还算是自然死亡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用离奇恐怖来形容。杜范的心腹、新任工部侍郎徐元杰在拜会左丞相范钟之后，在内阁吃了一顿工作餐，结果当天晚上便手指甲爆裂，在惨叫声中死去。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测徐元杰的死因之时，杜范派系的另一员干将户部侍郎刘汉弼也在内阁午餐会之后死于家中。于是所有的猜测很快便汇聚到了内阁的饭桌之上，因为担心中毒，一段时间之内政府内部人心惶惶，竟然到了中午在内阁食堂没人敢动筷子的地步。

此时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也暴病而亡，因为史璟卿不久前曾写信劝谏史嵩之辞去相位。所有的线索一时间都指向了已经赋闲在家的史嵩之，虽然所有的指控都没有真凭实据，但是史嵩之复出的大门却也在朝野上下对他的猜忌和恐惧之中永远的关上了。在此后漫长的十三年里，史嵩之也曾多次请求复出，但是最终只是在垂老之际获得了一个观文殿大学士的顾问头衔。

被并称为“淳祐三贤”的杜范、徐元杰和刘汉弼接连死亡，背后自然是疑点重重。但是被指控为凶手的史嵩之虽然有动机但却没有丝毫的得利。而就在“内阁午餐投毒案”的疑云逐渐淡去的同时，一度退休的郑清之再度出山，南宋政府内部一度出现了郑清之主政、赵葵掌军、陈韡理财的局面。而此时蒙古方面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也从西征前线返回，继承汗位。但是蒙宋双方长达六年的战略休整期并没有由此而宣告结束。因为贵由首先要面对是自己的堂兄、西征大军的统帅拔都的挑战，与此同时蒙古借口高丽停止进贡，再度向朝鲜半岛出兵。中原大地之上虽然小规模的战事不断，但是蒙古方面依旧无力大举南下。

公元1251年农历十一月，南宋太傅、左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以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恐误国事为理由连续递交了十份辞呈之后终于获得了宋理宗赵昀的恩准，第三次光荣退休了。不过他再也没有机会像4年前那样放浪湖山，寓身僧刹。因为已经年逾古稀的他早已被繁琐的政务熬到灯尽油枯了。就在他离开内阁后的第六天，

郑清之病死于家中。他的离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从史弥远主政时期便一直饱受战争侵袭的南宋政府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惊无险，但是在即将席卷而来的蒙古铁骑面前，这个繁盛一时的帝国终于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郑清之死后，宋理宗赵昀曾一度想要重新起用史嵩之，据说甚至连诏书都写好了。但是却半夜惊醒，改变了主意。选择任用了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为左丞相，而曾经上书反对郑清之“端平入洛”决策的吴潜则接替被士大夫们长期认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因此没有资格担任丞相的赵葵。对于自己所任命的新一届内阁班子，宋理宗赵昀并不是完全满意，因此在谢方叔等人入宫谢恩时特别关照：“朝廷内部长期党争不断、猜忌成风，希望你们可以勿牵人情，勿徇私意。”但是嘱咐归嘱咐，事实上谢方叔或许是一个合格的监督者却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蒙宋决战中，谢方叔对军事的无知和门阀乡党理念很快便将南宋拖入了深渊。

蒙古方面自元定宗贵由死后，继承汗位的蒙哥任用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总领中原的军务。忽必烈除了在自己的治理范围内广泛采用汉族士大夫推行儒学的行政模式外，更在军事上一改以往蒙古军队只重劫掠，不擅经营的弊端。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在河南中部的唐州、邓州一线效仿自己的对手实施屯田制，并同时在蒙宋边境一线修筑工事。面对忽必烈的变招，宋理宗赵昀显得格外敏感，他亲自拟订了两条对应措施：一是在两淮、沿江各建立一支机动性较高的战略预备队以策应各战区；二是在边境地区大挖沟渠，在方便百姓灌溉的同时，削弱蒙古骑兵的突击能力。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内阁班底却并不太积极，只是敷衍地回复说：“容讲行之。”

不过忽必烈在经营中原的同时，并没有急于南下。此时蒙宋正面战场之上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中，南宋军队依旧捷报连连。但一场空前的战略大迂回却已经悄然展开。对于灭宋的战略，忽必烈起初和自己父辈们的观点一致，认为由长江上游的四川入手，顺江而下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南宋在合州、重庆一线修筑的要塞群，忽必烈认为强行攻坚必然伤亡巨大，不过堡垒毕竟是固定的，再绵长的马齐诺防线也会有尽头。于是忽必烈向蒙哥提出了“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战略。在得到了蒙哥的批准之后，忽必烈于1252年屯兵于当年自己的祖父铁木真指挥灭亡西夏的六盘山中。而为了配合忽必烈的行动，蒙哥同时授意继承已故父亲汪世显势力范围的巩州、昌州地区民兵司令汪德臣出兵四川，牵制南宋四川军区司令余玠所部。

汪德臣和余玠也算是战场上的老朋友了。在余玠抓住蒙古军队在四川地区主力

北撤修筑合州要塞的过程中，汪德臣便主动来找麻烦。他率领部队直扑余玠尚未修缮完成的运山城，准备一举拔除这颗还没扎稳的钉子。但是南宋军队的要塞修筑在“形如屏立，横亘半空”的运山之上，汪德臣虽然拼死猛攻，在战马被飞石砸死的情况下，依旧步行指挥，甚至连自己的汪直臣都搭进去了，最终还是铩羽而旧。公元1250年余玠调集全川精锐，号称十万大举北伐。双方在汉中地区再度交手，这一次蒙古方面调集了包括汪德臣在内的多路大军，屯兵于汉中城下的余玠只能知难而退。而这一次可以说是两人时隔两年之后的第三次对决。

余玠在四川一线多次击退了蒙古军队的骚扰。但是战线反复拉锯，却始终未能恢复到蒙宋战争前的水平。而蒙古方面，在蒙哥、忽必烈兄弟上台以来也改变了在四川战区的原有战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在进攻命令下达之时，汪德臣刚刚完成了对川北重要战略据点沔州的恢复。因此大军从沔州出击，轻松地杀到成都城下，第三次攻陷了这座巴蜀重镇。余玠虽然随后在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城下击退了汪德臣的进攻，并在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地不断地伏击对手，令汪德臣的回家之路走得格外艰难。但是成都失守的责难却依旧令余玠在南宋朝野被贴上了无能的标签。

而此时远在临安的谢方叔也在谋划着给予余玠致命一击。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四川前线的利戎军司令姚世安正在不断地向他输送着攻击余玠的炮弹。蒙宋战争爆发之前，南宋四川军区有四大主力——分别是沔戎、兴元、金州和利州。而随着战区面积的不断缩小，原先的沔戎、兴元、金州都已经成为了“沦陷区”。利州军便成为了四川军区野战部队的一枝独苗。作为四川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余玠对于这支百战之余的野战部队当然是倚重的，但是这支部队有着它自身的势力范围。其领导者更频频拥兵自重，丝毫不把余玠放在眼中。

早在姚世安之前，指挥利州军的都统王夔便是一个抗敌无能、扰民有术的军阀，人送外号“王夜叉”。余玠前往他的防区视察，王夔派出由两百名老弱病残组成的仪仗队表示“欢迎”。余玠此时也只能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一直听说王都统麾下兵强马壮，想不到疲敝若此，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 王夔此时不免得意地说道：“不是我的部队不行，只是怕吓着您老人家！”于是一个呼哨，四周顿时鼓声如雷，伏兵四起。余玠的随从都吓得面无人色，他本人倒是谈笑自若，让部下赏赐前来“迎接”的利州军将士。这倒令王夔有些下不了台，只能私下里对部下表示：“原来士大夫中也有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军阀，余玠毫不客气地以开会的名义诱捕、除斩了

王夔，让自己的亲信杨成接管了利州军。但是杨成终究在利州军内没有根基，很快余玠只能将他调走，去作文州刺史了。

姚世安是利州军内肆混多年的老兵油子，他的前任退休之前自说自话地便将利州军司令的位置传给了姚世安。这种私相授受的行为当然不能得到余玠的默许，他亲自派出三千骑兵前往利州军司令部所在的云顶山下，准备以武力护送自己所指定的都统金某上山接管指挥权。但姚世安可不是王夔那样的“大炮筒子”，他不仅能做出“闭关不纳”的抗命行为，更有着制衡余玠的本钱——他上面有人。谢方叔是威州（今四川省理县东北）人，他的亲属在战乱中全部沦为了难民，姚世安抓住这一点，对谢方叔家族颇为照顾。此刻他更利用这条人脉，向临安方面求援。

谢方叔是监察御史出身，弹劾大臣的工作本来就驾轻就熟，于是很快在政府中枢掀起了一派攻击余玠的浪潮，成都失守、失尽军心、老师糜饷这些对余玠指控宋理宗赵昀都能宽容。他甚至亲自为余玠辩护：“余玠上任之初的局面大家都清楚，他经营八年，一再击退蒙古军队的入侵。四川内地也连年丰收，这些成绩还是要肯定的！”但是当谢方叔和他的党朋祭起“大权独揽、不知事君之礼”时，宋理宗赵昀终于坐不住了。毕竟有宋一代最忌讳的便是军人跋扈、拥兵自重。岳飞死在这个罪名上，孟珙可以说也是死在这个罪名上，余玠当然也无法幸免。宋理宗赵昀听取了徐清叟的意见“出其不意”地向余玠召回的指令。这种召回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余玠奉诏返回，那么等待他的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文官系统的弹劾和炮制。而如果他拒绝，那么自然是抗旨不遵，大可以就地免职。不过余玠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激烈而又直接的方式——“一夕暴卒”来回应了所有的怀疑和指责。

余玠出生于江西蕲州，自幼家贫的他，虽然就读过沧浪书院和白鹿书院，但最终还是没有经济实力完成学业，只能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一个幕僚。早年的流离和终年的征战令他几乎没有什么诗词流传于世。但从他仅存不多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投兵从戎的书生风骨。《瑞鹤仙·怪新来瘦损》：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　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　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　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就在余玠的生命结束之时，在六盘山养精蓄锐一年之久的蒙古大军在忽必烈的统率之下兵分三路开始了针对云南大理政权的全面进攻。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忽

必烈的才能远不如自己的祖、父辈，南下的大军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除了西路军取道四川阿坝草原，一路较为顺利之外。由忽必烈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沿着大渡河河谷前进，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林立，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也经常是被汉将郑鼎背着前进。汉将董文炳率一部为中路军殿后，到达吐蕃境内时，所率46骑中“只两人能从”。而东路军则几乎是沿着南宋四川军区的边境侧敌行进，如果不是余玠的继任者前鄂州知府余晦无能，这支军队能否抵达大渡河或许都要打个问号。即便如此，在波斯史家拉施特口中，忽必烈南征大理之役“由于路途漫长，行军艰难，气候恶劣，他们（蒙古军队）每天都要打两次仗，以解救自己”。拉施特所谓的打两次仗，相信指的是与沿途的恶劣的气候和地形做斗争。因为在抵达大理边境之前，各地的土司军队对蒙古大军大多采取恭迎的态度。

而就在蒙古三路大军艰难跋涉远征大理城下的同时，为了消除侧翼南宋四川军区的威胁。蒙哥再度授意汪德臣进一步将战线从沔州推进到利州一线。曾经突袭过余玠运山城的汪德臣深知敌前筑城的痛苦，他一边请求蒙古政府任命他的哥哥汪忠臣代理自己原先的岗位，一边派出自己的弟弟汪良臣领兵驻守于利州嘉陵江南策应自己的行动。而此时南宋四川军区正处于余玠病故的真空期，虽然南宋军队也展开了一些反击，但最终仍无法阻止汪德臣在利州城东的宝峰山上将要塞直接修在了南宋军队的家门口。对于这件事情，宋理宗赵昀的反应远比邻国大理首都的沦陷更激烈，公元1254年农历正月他亲自指示谢方叔：“北兵攻利州，筑城已就，不可坐视。”而谢方叔倒是比较淡定，轻描淡写地回复说：“当令余晦御之。”

事实上，公元1254年的春天正是汪德臣在利州最为艰难的时期，要塞虽然修缮完工。但是由于四川天气干旱，嘉陵江水位下降，依赖水运的蒙古军队的后勤补给几乎全部中断。部队士气低落，将帅们更纷纷建议汪德臣弃城北撤。如果此时南宋四川军区的新任领导余晦可以主动出击的话，那么蒙古军队在利州一线将很难继续坚持下去，但余晦却似乎丝毫没有理会南宋中央的焦急心态。非但没有采取攻势，反倒令将自己战马杀掉、分饷士兵的汪德臣奇袭嘉川得手，缴获了两千石的军粮，解了燃眉之急。随后汪德臣更进一步东进，连续攻占了阴平、彰明。

此时作为野战军的利州军才从云顶山派出由吕达率领五千人马前去拦截，结果不仅被汪德臣军队击溃，更白白贡献了五千石的军粮。原本只是打算出城打打草谷的汪德臣此刻显然已经走出了此前屡败于余玠的阴影，更进一步地坚定了“以战养

战”的决心。

在野战失利的情况下，南宋四川军区负责人余晦决定遵循前任余玠的策略，在前沿依托地理修筑防御据点。因此派部下统制甘润领兵数万在盐亭紫金山筑城，但是敌前筑城这一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汪德臣抓住对方缺乏经验、防备不严的空隙。1254年5月率领精锐部队发动夜袭。不仅彻底击溃了这支规模不小的工兵部队，还将几近完工的要塞也收入囊中。在毫不费力的连续获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汪德臣自然不忘发动政治攻势，不仅南宋方面被俘的营级军官崔忠等人得到了优待，连普通士兵和平民愿意回家者皆发给路费。事实证明这一轮政治攻势的确有效，驻守剑阁苦竹隘的南永忠等川北一线孤立据点的将领纷纷投降，剑阁苦竹隘是余玠所修筑的全川防御体系之中担负枢纽地位的“巴蜀八柱”之一。它的失守不仅令蒙古大军没有了侧后的牵制，更令其周边的利州、阆州等地的其他城寨失去了支撑。

自蒙宋战争爆发以来，南宋四川战区虽然一再遭遇重创。但是像公元1254年的春季这样被蒙古方面的汪德臣一支偏师彻底搅乱的局面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个被拎出来充当替罪羊的是阆州知府兼利州安抚使王惟忠，罪名是“通敌”。在元代临安人刘一清所撰写的南宋政坛八卦文选《钱塘遗事》之中曾记录了一段“（余）晦诬（王）惟忠”的故事。大体的意思是说余晦接到了前线关于南永忠叛降蒙古的报告之后，没有通知就在身边的王惟忠，而是故意先假意王惟忠咨询这个人的情况，王惟忠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对同僚的爱护，于是对南永忠大加赞许了一番，称其“勇而义”，看到对方上套之后，余晦又接着问道：“有人说这个人靠不住，你觉得呢？”王惟忠当即表示：可以立下军令状，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余晦随即拿出南永忠叛降的报告，王惟忠当即愕然。

事实上作为驻守川北要冲的战将，南永忠或许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这一点在他此后在蒙宋战场上的表现可以证明。而在他投降蒙古之后不久，在进攻一座南宋军队的堡垒中，身为一军统帅的他竟被城上的昔日战友王佐骂到痛哭流涕，可见也算是良心未泯。而余晦之所以和王惟忠开这样一个可大可小的玩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所以关系比较密切。相反正是因为王惟忠和余晦是老乡，因此对这个靠着父亲余天锡的荫庇而官运亨通的上司格外的鄙视，在余晦出任四川制置使之后，王惟忠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叫着对方小时候的外号：“余再五来也。”

而在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主持南宋朝政之后，自宋帝国创立以来一直活跃的言官系统却逐渐走向瘫痪。出任右司谏的丁大全、右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都

是靠着宋理宗赵昀宠信的妃子或宦官才爬上高位的，阿谀奉承、攻击异己的本事远比直言进谏强得多。因此被当时的南宋士民讽刺“三不吠之犬”。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关于余晦诬告王惟忠的案子自然没人提出异议，甚至由弹劾人陈大方出任法官。最终被问斩于街市的王惟忠或许也只能大喊：“吾将诉于天，以明此冤也。”同时倒霉的还有已故余玠的家属，南宋政府以余玠治理四川期间“聚敛罔利”的名义不仅抄没了余玠的家产，还要其子余如孙拿出家产贴补军费。而真正应该对四川惨败负责的余晦却只是受到了解除一切职务的行政处罚，三年之后又风风光光地总领淮西财赋去了。

与汪德臣在四川战区的无心插柳相比，忽必烈对大理的远征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尽管在公元1254年的春天，蒙古军队便已经顺利地攻占了大理国的首都，但是大理国王段兴智却成功地逃往了附都善阐（今云南省昆明市）。而忽必烈显然也对在雨林中的围剿和追击失去了兴趣。他留下蒙古开国元勋速不台的长子、蒙哥的近卫军司令——兀良合台继续讨伐残敌，自己则班师回朝去了。而对于大理战场，南宋政府倒是颇为关心。宋理宗赵昀特意召开内阁首脑会议，提出：“听闻大理方面仍在努力抵抗蒙古的入侵，大家认为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吗？”可惜谢方叔等人跟皇帝打起来太极拳，含糊地回答道：“广西方面传来的消息全都未经证实，我们应该严加戒备。”这一套官场通用语可以说毫无漏洞，毕竟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全都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所谓的严加戒备，也就是听任大理自生自灭。

谢方叔靠不住，宋理宗赵昀不得不重用自己的“前小舅子”（贾贵妃已经于公元1247年病逝了）——贾似道。于是一直在荆湖、两淮前线屯田的贾似道被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主持南宋政府的国防事务。而曾经在两淮和贾似道配合默契的吕文德此刻也以湖北安抚使、峡州知州的身份统一指挥长江中下游的防务。而四川方面，尽管处于赋闲状态的赵葵和史嵩之都向宋理宗赵昀表示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但是最终接替余晖的却是南宋政府内以填词而流名史册的资政殿学士李曾伯。李曾伯虽然也曾在淮西、荆湖、广西等地历任过军政长官，从资历方面考虑的确足以胜任。但对他的任命是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也就是说李曾伯要同时兼顾四川和荆湖两个军区。作为补充，南宋政府很快便又让国家总装备部部长（军器监丞）蒲择之代理四川制置使的工作，在重庆指挥四川地区的抗蒙战争。

李曾伯和蒲择之都很清楚要想挽救四川的危局，靠士大夫的清谈是挡不住蒙古铁骑的，姚世安这样的四川当地土帅他们也指挥不动，因此必须提拔和重用一批真正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的职业军人。而李曾伯在出任荆湖制置使的过程中曾着力招揽了一批孟珙麾下的悍将，其中最为骁勇当然是打着孟珙亲书“赛存孝”军旗的刘整。刘整是邓州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人，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是金帝国公民。不过在金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孔武有力、擅长骑射的刘整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孟珙指挥的南宋军队，而在孟珙指挥之下，刘整率领一支12人的突击队，竟成功地夺取了金帝国的边防重镇信阳。依照民间传说后唐的李存孝曾率十八骑夺取洛阳，而刘整所率的兵力比李存孝还少，因此当时兴致颇高的孟珙也没有多想就写下了“赛存孝”的名号送给刘整。而历史上李存孝除了骁勇之外，还有一个特质却被人们都忽视了，那就是他对自己养父李克用的背叛。

在刘整等一批来自孟珙和麾下的百战宿将的指挥之下，南宋军队在四川战区也获得了一些胜利，其中对未来战局影响较大无疑是收复了此前由于南永忠的叛降而落入蒙古手中的剑阁苦竹隘。对于南永忠这位降将，身为蒙古帝国大汗的蒙哥还是很重视的，在四川的战事趋于平稳之后，亲自召其北上觐见。但是南永忠一走，其麾下内心怀故国的周德荣等人便毅然反正。但是收复剑阁苦竹隘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计划的那样兵不血刃。不等南宋方面前来接收的部队抵达，南永忠便已经率军赶回，不仅捕杀了周德荣等人，重新在剑阁苦竹隘上竖起了蒙古的军旗。深知剑阁苦

竹隘战略地位的李曾伯无奈之下，只能将原来的接收改为强攻。

蒙宋两军以苦竹隘为中心反复拉锯，最终以南宋都统段元鉴成功全歼苦竹隘内的蒙古守军而告终。但是南宋军队在川北并没有一条稳固的防线，蒙古方面依旧可以利用侧后的沔州、利州据点频繁袭扰南宋方面脆弱的后勤补给线。就在南宋方面收复苦竹隘之后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汪德臣便成功地歼灭了两支南宋方面重兵护送的运输队。对此四川军区内部和南宋政府中枢之内都有人主张放弃川北，最终还是宋理宗赵昀一锤定音指示说："四川军区各隘口、两淮地区以北的黄泛区都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理应长期经营，若根蒂已固，可无后患。"

而在四川军区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南宋政府中枢又完成一轮政治洗牌。谢方叔由于得罪了后宫的妃嫔和宦官系统而被迫下野。接替他的是曾在广西出任运判兼提刑史的董槐。应该说宋理宗赵昀的这一人事任命还是颇有一番考量的，毕竟随着大理的覆灭，南宋在西南方向上门户大开，迫切需要董槐这样有着丰富当地工作经验的干部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果然董槐上任后不久便向宋理宗赵昀传达了通过贵州地区的彝族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罗氏鬼国的重要情报："蒙古已经攻占了大理国的陪都——善阐，目前正招募当地人为向导，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而在宋理宗赵昀"彼不能支，骎骎及我矣"的指示之下，董槐一边着手在泸州、溆州一线建立边防要塞，同时派人联络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思州（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当地的土司，要求其出兵支援罗氏鬼国。可惜的是董槐同样和宋理宗赵昀所宠信的阎妃系统的丁大全不和，不久之后便被罢免。

蒙古帝国对大理的最后一击是由兀良合台完成的，面对大理国陪都善阐的坚固城防和云集的当地少数民族军队。兀良合台采取"夜半鸡叫"的袭扰战略，每天晚上都虚张声势地展开佯攻，最终令对手疲惫不堪，而由兀良合台之子阿术率领的小股突击队则利用这一机会成功潜入，最终一举攻克了善阐城，俘虏了大理的末代国王段兴智。

不过蒙古帝国对云南征服此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曾经臣服于大理的周边少数民族纷纷揭竿而起，令蒙古大军疲于应付。在采取武力压制的同时，蒙古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温柔的政策，被押送到蒙古帝国首都和林的段兴智不仅保全了首级，更以大理总管的身份重返大理，要知道段氏在蒙古入侵之前早已被掌握大理军队的高氏架空成为了傀儡。经过这一轮覆灭和重起，其权力反而还得到了提升和强化，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而坚决抵抗蒙古入侵的高氏军阀首领高泰祥也因为在被俘后表现出

的“不屈精神”被忽必烈“许以世其官”，后代继续在云南各地出任土司。

在云南各地基本平定之后，兀良合台才得以按照原先的部署，强渡泸江从贵州一线迂回包抄南宋在四川一线的战略枢纽——合州、重庆。在这一线兀良合台遭到了被蒙古称之为“乌蛮”的罗氏鬼国顽强的阻击，南宋军队也派出增援。尽管兀良合台成功地抵达了合州地区，与蒙古四川方面的汪德臣成功会师。但是很快蒙古与安南之间的战争便令兀良合台的注意力南移。南宋政府此前便已经意识到“罗（氏）鬼（国）不足恃”。开始全力经营长江下游防线，由吕文德、向士壁统率大军在湖南中南部、重庆等地全面布防，任命赵葵为宁远军节度使、京湖宣抚大使兼夔州策应大使，李曾伯为湖南安抚大使兼任潭州知府。甚至连此前由于“端平入洛”的失败而被开除公职的徐敏子此刻也被派往了广西。可以说南宋政府此时一举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名臣良将，全力迎对一触即发的战争。

蒙古方面在公元1256年也已经开始制定全面的灭宋战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忽邻勒台大会之上，铁木真的女婿帖里垓率先提出了南征的计划：“南宋距离我们这么近，并与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置之不理，拖延着不去征讨彼国呢？”这个问题蒙哥不仅作了正面的回应，并表示自己即将御驾亲征。在各路大军陆续开拔的过程之中，蒙哥还特意问责了纵兵劫掠山东的帖里垓。显然在蒙哥心目中这一次的南下已经不再是为了掠夺财富，他的目的是一举征服整个长江流域。

蒙哥对南宋的全面进攻以四川为重点，由其亲自统领的主力还在六盘山集结之时，蒙宋双方便已经在剑阁苦竹隘爆发了激烈的攻防战。南宋政府在赵葵的要求之下，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征召十万青年从军。而此时贵州一线再度传来了蒙古云南方面军大举开拔的消息。宋理宗赵昀和自己的祖辈一样亲自定下了“内外夹击”的战略，不过就在南宋内阁在地图将兀良合台的部队歼灭了无数次之时，对方却开往了安南战场。

在兀良合台征讨安南的过程之中，蒙古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南宋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在中原战场上由蒙哥远方堂兄弟塔察儿统率的部队对南宋荆湖军区发动攻势，在这个方向上忽必烈任用的汉族将领——“行军千户”董文蔚此前已经修筑了一系列前沿要塞，甚至一度攻破了南宋江汉重镇——樊城的外围。不过接替忽必烈执掌中原军事的塔察儿却遭遇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加上连月的阴雨，最终公元1257年的秋天塔察儿基本没有完成蒙哥所赋予的牵制南宋军队的使命便私自退兵了，引来了蒙哥的强烈不满。

塔察儿在荆湖战区“打酱油”的行为，令蒙哥不得不重新起用他颇为猜忌的忽必烈。1257年冬两兄弟在冰释前嫌之后，定下了“以明年为期”分道南下的灭宋战略。忽必烈统领左翼诸路蒙古、汉军直扑鄂州威胁南宋长江中下游防线。而蒙哥则统率蒙古帝国的主力兵团猛攻南宋四川军区。而与此同时，塔察儿将继续对南宋荆湖军区施加压力。已经从安南战场胜利班师的兀良合台则从云南出兵进入湖南、广西，对宋军进行牵制。在蒙哥看来如此多线推进，足以令南宋政府顾此失彼。而在这场灭宋之战中真正可以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自然是自己的四川战区。

蒙哥的自信有他的道理。在1257年到1258年夏天的西线战场上，由纽璘统率的蒙古前锋部队便搅得南宋四川军区几乎全线崩溃，不过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宋四川军区代总司令蒲择之。在得到了赵葵从荆湖军区不断调来的有生力量之后，蒲择之颇为豪放地放弃了过去被动防御的战略，对蒙古军队采取了以攻对攻。因此当蒙古先头部队从川西的利州进入四川腹地，占据了南宋方面已经放弃的四川心脏地带——成都之时，蒲择之“敏锐”地嗅到了战机。他根据宋理宗赵昀驻蜀诸军收复成都的命令，布置了空前庞大的一张战略包围网：都统杨大渊率一军守御剑阁，以断蒙古北援；安抚使刘整、都元帅段元鉴各率一军扼守要道灵泉山城和箭滩渡阻击蒙古方面正在夔门、钓鱼城游击的纽璘所部，自己亲率主力向成都挺进。按照蒲择之的计划，此战不仅可以轻松收复向来易攻难守、且城防设置早已被蒙古人烧毁一空的成都，更可以将四川腹地近两万蒙古先锋部队各个击破。

但是蒲择之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南宋军队向来长于防御而不擅野战。对于蒲择之的计划，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刘整和杨大渊都竭力反对。刘整认为防守成都的蒙军兵力单薄，不足以为惧，应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成都之敌，然后聚主力再寻找与东路返还的纽璘军作战机会。杨大渊则提出不应该主动与蒙古军应战，而应该以余玠多年经营的各山城防御体系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对抗蒙军的侵扰，以保存四川军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兵力优势。蒲择之对杨大渊的建议予以驳斥，认为那是一个消极防守、困守自毙的做法。对刘整的建议也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手中的兵力解决成都之敌应该没有问题，围城打援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在四川腹地这样的平原地带，蒙古骑兵有着强大机动作战能力。即便是刘整这样的悍将依托箭滩渡的河流屏障也未能抵挡住纽璘麾下的蒙古铁骑。双方鏖战一昼夜，纽璘还是突破了刘整的防线，蒙古外线兵团成功地回师成都。不过对于蒲择之而言，他的计划并未完全失败。因为南宋军队依旧控制着成都周围的要

冲，蒙古军队虽然在会合之后兵力有所增加，但依旧难逃覆灭的命运。在令杨大渊等人继续扼守剑阁和灵泉山等外围据点的同时，蒲择之开始指挥部队全力攻坚。而此时另一个好消息从城内传来，蒙古方面成都最高指挥官阿答胡死了。这无疑意味着成都城内的蒙古军队将很快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此时蒙古方面在成都的确有多支互相独立的部队，论身份地位王室成员阿卜干或许是最有理由出来牵头领导各军的人物。但是阿卜干却似乎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对成都城内的诸将表示："现在南宋军队步步进逼，得到我方主帅去世的消息一定会全力猛攻。我军远离中枢，等待上级重新任命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不如推选纽璘为首，指挥大家拼下去。"阿卜干的让贤和推举最终挽救了困守成都的蒙古军队。在纽璘的指挥之下，南宋军队对成都的长期围攻始终没有得手，而与此同时，纽璘送往利州的求援信也递到了汪德臣的案头。正处在上升期的蒙古军队内部此时虽然还没有"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陋习，不过地盘观念还是有的。因此汪德臣在向成都派出援军之时，也与纽璘定下了"先破敌者当奏请领此城"的君子之约。

或许是成都的城防的确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也可能是不愿为别人作嫁衣。就在汪德臣的援军大举南下之时，纽璘利用成都地区农历五月的雨季突围而出，在外线连续击破蒲择之早已疲惫不堪的各路人马。其中纽璘的部下契丹人石抹按只也攻破了灵泉山城，击杀了南宋都统韩勇，可以说是给了南宋军队致命一击，作为联系川东和成都前线的后勤枢纽，灵泉山城的易手彻底切断了蒲择之大军的补给线，无力再战的蒲择之只能选择全线撤退。纽璘趁势包围了南宋利州军指挥部所在地——云顶山城。曾经依托地形阻挡过汪德臣和余玠的山城终于无力招架内部的动摇，守将姚世安拱手将山城献给了其实同样虚弱的纽璘。



汪德臣铜像

云顶山城的叛降，宣告了蒲择之所策划的成都战役全面破产。此时关于成都战区的指挥权的问题，自然成为了纽璘和汪德臣争议的焦点。双方将问题交给已经南下抵达汉中的蒙哥亲自仲裁，对于麾下的这两员悍将，蒙哥并不想轻易得罪其中任何一个。于是含糊地表示，这个问题先暂时登记在案，等到征服南宋之后再作处理。不过成都之战终究是纽璘打的，因此一向吝啬的蒙哥在大肆奖赏了纽璘之后，更任命其为四川军区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统一指挥成都一线的蒙古大军。

而对于有些失意的汪德臣，蒙哥则亲自前往安抚。1258年农历十月，蒙哥抵达了汪德臣所修筑的利州要塞。身为帝国大汗的蒙哥与汪德臣并马立于北山，环视四周，问起这一带敌我双方的态势之余，蒙哥也不忘口头鼓励一下对方。赞叹说："朕在和林，自南来者，盛称汝立利州之功。不过我看你虽然胆略不小，但身材不是很高大，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在城下见到过你啊？"汪德臣此时自然不会说出自己当年在利州要塞杀马充饥的丑事，于是回答道："赖陛下洪福，未曾一来。"蒙哥自然继续奉承说："那一定是忌惮你的威名吧！"于是君臣尽欢之余，汪德臣也自然接下了充当蒙哥主力大军南下前锋的工作。

从地图上来看，到1258年秋季，由蒙哥亲自指挥的蒙宋西线战场的局势可以说是空前的利好。在肃清了成都地区南宋方面残存的孤立据点之后，纽璘在留下部将拜延八都鲁、刘黑马及五千部队留守之后，以空前强盛的兵势从水旱两路向东推进。在泸州渡马湖战场，契丹人石抹按只再度为纽璘打开了胜利之门，他所统率的蒙古水军先锋配合夹江前进的蒙古铁骑一举击溃了南宋方面由500艘以上战舰组成的水上防线。并一举擒获了南宋四川军区昔日余玠麾下的名将——张实。而此时川北一线，通过汪德臣所修筑的浮桥，蒙哥的主力也渡过嘉陵江和白水江的交汇处，直逼剑阁苦竹隘的城下。为了配合蒙哥主力的南下，纽璘将表示愿意为蒙哥效劳的张实派往苦竹隘劝降，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名将在进入苦竹隘之后便立即化身为一个坚定的战士，和守将杨立并肩作战。剑阁苦竹隘再度成为了蒙古大军南下不得不拔除的钉子。

在蒙哥面前，汪德臣急于地表现出了他在四川战场历练多年的山地攻坚战术，即便是苦竹隘这样的要塞，在汪德臣麾下不顾伤亡攀援而上的山地步兵面前，最终也没能支撑太久。随后南宋在川北一线的各地州县无不望风而降，驻守阆州大获城

的杨大渊虽然斩杀了前来劝降的前南宋长宁知县王仲，但是在水路补给线被切断之后也不得不派自己的儿子杨文粲到蒙古军前乞降，对于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行径，蒙哥原本打算将杨大渊直接处死。不过汪德臣显然更希望通过杨大渊来为其他南宋将领树立一个典型，因此竭力劝谏，将杨大渊力保下来。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在未来的蒙古帝国四川军政版图之上这位自己在刀下救下的汉族将领将接替他的位置。

榜样的力量向来是无穷的，在杨大渊归降之后，在余玠指挥下曾经重创汪德臣的运山城在守将张大悦的眼中也成为了其转投蒙古阵营的见面礼。紧接着青居城中裨将刘渊也杀死都统段元鉴献城出降，至此加上杨大渊和姚世安所献的阆州大获城、云顶山城以及汪德臣攻陷的剑阁苦竹隘，昔日余玠所建立的“巴蜀八柱”已失其五。随着蒙古大军的兵锋继续东进，一旦突破了合州、重庆一线。那么蒙哥的大军便可以从侧翼迂回包抄长江中游的南宋荆湖军区与忽必烈会师于鄂州城下。

1259年的农历新年对于蒙哥而言似乎格外的意义非凡，在他看来四川战区的大局已定。因此在武胜山与麾下诸将同庆新嬉的过程之中，他很有前瞻性的向大家询问是否有意愿在向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度夏。此时便有人向蒙哥提议：“南土瘴疠，上宜北还。”可惜这一颇有见地的看法被众人嘲笑为怯懦的表现。在做出了分兵攻掠礼义山城、平良山城等地，纽璘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区）一线架设浮桥阻击南宋水路增援的部署之后，蒙哥亲率主力兵团开始进逼合州钓鱼城。一路上招降纳叛的蒙哥自然而然的派出了南宋的降将晋国宝前往钓鱼城。

但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会存在着例外，不仅钓鱼城的南宋主将王坚借晋国宝的人头向蒙哥表示了血战到底的决心。礼义山城、平良山城等地面对蒙古大军的逼近也是誓死抵抗。令蒙哥首轮政治攻势以失败而告终。从公元1259年农历二月开始，蒙宋两军正式围绕钓鱼城展开了全面的攻防。而南宋政府此时也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增援四川军区，宋理宗赵昀要求国防部长枢密使贾似道以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的身份调集南宋后方军区江西、两广的部队北上驰援。而吕文德则接替蒲择之，以四川制置副使的身份领军入蜀。

吕文德的大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他首先要面对的自然是横亘在长江之上的蒙古军队浮桥防线。虽然吕文德所面对的对手纽璘曾有过泸州渡马湖水战的辉煌胜利，但是在长江之上蒙古军队终究不敌长于舟楫的南宋精锐。在南宋悍将曹世雄和刘整的并肩突击之下，纽璘的浮桥防线最终崩溃。吕文德的大军于公元1259年农历

六月进入合州——重庆战区。但是从重庆继续向西，吕文德的水师却遭到了蒙古方面史天泽的夹江拦截。吕文德对钓鱼城的解围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极大地牵制了蒙古方面的进攻节奏。更重要的是吕文德抵达重庆封闭了蒙古大军绕过钓鱼城沿长江南下的可能。

就在吕文德的援军抵达前的公元1259年农历五月，正在雨季艰难攻坚的蒙古军中便有宿将述速忽里向蒙哥建议在重庆、钓鱼城之间，部署五万精兵，以牵制南宋援师。然后避开钓鱼坚城，迂回夔州、万州（今四川省万县市），等到冬季长江水位下降，在出三峡入两湖，抵达鄂州与忽必烈及兀良合台会师，一举可定东南。但是蒙哥却自持兵强马壮，执意要夺取钓鱼城杀出一条血路。在强攻无果的情况之下，汪德臣只好单骑策马抵达钓鱼城下，高呼：“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但是城墙之上回应他的却是由投石车抛洒而来的致命飞石。

重伤不治的汪德臣对前来看望自己的蒙哥说：“陛下贵为天子，还冒着酷寒盛暑征战在外，我本来是行伍之人，战死沙场是分内的事啊。”他这些话或许是发自真心，但却也表达了一个道理，战场之上同样是人人平等。不仅冒死攻城的普通士兵有尸填沟壕的风险，连将帅、君王也未必能保得自身周全。就在汪德臣因伤去世的一个月之后，蒙哥也死在钓鱼城下。



今天的钓鱼城遗迹

关于蒙哥的死因，史学界向来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无论是因病还是因伤，蒙哥死于南征大军的营垒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阻击了蒙哥大军长达半年之久的钓鱼城，蒙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释怀。特意嘱咐麾下诸将：“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死）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不过可惜的是早已被钓鱼城搞得身心疲惫的蒙古大军已经无心恋战。在蒙哥死后，蒙哥西线军团随即北撤。

第九章　和林临安

大宝之争
——忽必烈的崛起及其与阿里不哥的内战

身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蒙哥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颇有才干的君主，但是也许与早年寄人篱下的遭遇有关，蒙哥很早便清醒地认识到在权力面前亲情只不过是一层暧昧的薄纱。因此尽管对忽必烈在自己继承汗位过程中的表现颇为认可，自己登基之后也让自己的这个弟弟统领中原的军政事务，但是很快忽必烈在日程政治事务和军事上对南宋、大理的一系列成就和胜利却不可避免地招来了蒙哥的猜忌。对于蒙哥和忽必烈关系的急转直下，很多历史学家从施政纲领、宗教信仰乃至个人情感领域给出了各种解释，但或许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权力是无法分享”的。

蒙哥对忽必烈的钳制从行政和军事两个层面分别展开，行政方面他于公元1257年派遣大必阇赤（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等地“钩考”钱谷，以财务审核为名审查忽必烈在当地所任用的官吏。打击忽必烈藩府势力，迫使忽必烈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这三个地区的地方权力，撤销三司。军事上则以忽必烈的脚有问题，对其采取彻底封杀的态度。不让他参与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从忽必烈晚年的身体状况来看，他似乎的确有关节炎之类的毛病。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和蒙哥之间的问题不是“没瘸！走两步……”可以解决的。在自己麾下的汉族士大夫幕僚团的介意之下，忽必烈首先将自己的爱妻察必和儿子真金送往和林充当人质，随后又亲自觐见蒙哥，据说两兄弟见面之后竟然同一时间落下了眼泪，忽必烈的口才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蒙哥便已经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南下攻宋的东线最高指挥官。

事实上蒙哥和忽必烈的这次见面表面上虽然异常的煽情和感人，但其背后却有着各自的算计。忽必烈被排除在权力中枢之外，一度意志消沉，但近侍燕真的一番话却令他不得不有所行动：“蒙哥已经怀疑你有异志了，现在他率军远征，怎么可能让您以皇弟的身份悠闲地留在后方？”显然忽必烈不主动做出一些表示，更大的打击可能就在眼前。而对于蒙哥而言，东线的蒙古军队统帅东道诸王领袖塔察儿长期出工不出力也令他十分困扰，而在自己所指挥西线不断传来捷报的情况下，他似乎也

不反对忽必烈此刻出马在东线牵制一下南宋的荆湖军区。不过他对忽必烈所指挥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两人的口头约定之中，忽必烈所承担的任务是夺取南宋长江中游的鄂州，然后等待蒙哥西线大军突破南宋在四川所构筑的合州——重庆防线，然后会师西进，直捣临安。

由于只担任配合的角色，忽必烈在南下的过程中并不十分用心。他首先召集了自己的幕僚——宋子贞、商挺、李昶、杜瑛等人会商这次战争中自己所要面对的政治得失及攻宋之计。而其中刚刚被任命为江淮荆湖等路宣抚副使的郝经所提交的一份名为《东师议》的可行性报告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郝经虽然肯定了蒙古帝国的军事优势——“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破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蹂躏诸夷，奄征四海，今十分天下，已有其八”，蒙古骑兵更是“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但是这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却存在着准备不足——“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以及后续乏力——“连百万之众，　首尾万余里……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郝经预见了蒙哥亲自出马在战场所可能遭遇的不测——“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在这样的分析之下，忽必烈显然已经开始接受了郝经“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的建议，将蒙哥此前拟订的一举灭亡南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修整为“以打促和”。而忽必烈的大军刚刚进入战区，西线便传来了蒙哥死于合州城下的消息。

按照正常的逻辑，忽必烈理应在得到自己兄长死讯之后第一时间回师，以便夺取政权。但身为一个政治家，忽必烈的眼光却必须放得更为长远。蒙哥死前虽然没有指定继承人，但事实上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事实上便是看守内阁，自己贸然回师自然会被第一时间收回好不容易才重新获得的兵权。而手握重兵留在战区后发制人似乎才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忽必烈慷慨地表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随后登上香炉山，让自己麾下的水战专家董文炳强渡长江，大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气势。不过在包围了南宋的重镇要塞鄂州之外，忽必烈却将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汉族士侯张柔，忽必烈为此还特意打了个比方：“我就像一个猎人，总不能把已经赶进了圈里的野猪再杀了给吃吧！你自己来吧！”这一说法固然有蒙古铁骑不善于攻城的成分，但是想来也有忽必烈保存实力的私心。


今天的鄂州古城门

表面上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南宋方面贾似道所指挥的诸路援军杀得天昏地暗。但事实上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却已经在暗中进行之中。忽必烈首先派出自己的亲信谋事廉希宪以“送饭”的名义前往和自己同在战区的蒙古帝国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据说廉希宪在一番关于忽必烈“圣德神功，天顺人归”的吹嘘之后，便成功地劝说对方：“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赢得了东道诸王的拥戴。随后忽必烈又在战场局势占优的情况下，接收了贾似道的和谈请求。

但是此时身在和林的阿里不哥显然已经开始着手削弱忽必烈的力量，由阿兰答儿所统率的蒙古大军开始向忽必烈的根据地开平移动。忽必烈留守开平的妻子——察必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使者表示：“出兵增援前线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家真金啊！”暂时遏制了阿里不哥突袭开平的行动。但是察必和真金虽然身份特殊，但毕竟没有行政任命，无法阻止阿里不哥逐步开始蚕食华北等地军政权力，无奈之下察必只能写信通知前方的忽必烈，要自己的老公回来主持大局。

忽必烈和贾似道的谈判从一开始互相便都没有什么诚意。当得到长江上游合州地区蒙哥已死的消息之后，贾似道虽然主动提出和谈，但其实也是一种以拖待变的姿态。而就在忽必烈的特使赵璧前往洽谈具体停火条件之时，忽必烈已经不得不准备班师了，不得不与赵璧谈定“见军旗挥动便火速返回”的暗号，赵璧进入鄂州之

后，与贾似道的代表宋京还在讨价还价，城外的军旗便已经开始挥动了。因此从一定程度来讲，鄂州城下贾似道是“卖国无门”。

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在路上便听从自己的谋士商挺关于“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的建议，更换了口令和通信方式，彻底断绝了和林方面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和通信权力，所有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一律被当作间谍直接处死。随后又派自己的亲信廉希宪前往“宣抚京兆、四川”，廉希宪成功地争取到了蒙古帝国西线军队之中秦巩世侯汪良臣以及刘黑马等人的效忠。据说汪良臣起初还以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为由推脱，但是在廉希宪解下自己所佩的虎符和银印交给他，并忽悠他说：“这些都是忽必烈密旨给你的，只要你跟着忽必烈混，委任状马上就到。”

抵达燕京之后，忽必烈再三拒绝了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他回到草原，以逼他就范的企图。就在双方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的暧昧气氛之中，忽必烈首先发难，在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之后，于1260年农历三月于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应该说按照蒙古帝国的习俗，忽必烈的这次即位并没有太大的法律效力，毕竟与会的宗室亲王数量有限，连参与的南征蒙哥之子阿速台也因为倒向阿里不哥没有与会。但是就如忽必烈的幕僚廉希宪、商挺等人所说的“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忽必烈抢先宣布即位夺取了政治上先机，阿里不哥虽然紧随其后于1260年夏季，在阿勒泰山中举行宗亲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但也已是“另立中央”。

阿里不哥还是有他的优势，毕竟蒙哥生前指定由他留守和林从一定意义上已经确立了他继承人的身份。其次由于蒙哥之子阿速台的加入，驻守于六盘山一线的蒙哥生前亲率的主力大军也支持阿里不哥，从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忽必烈于新疆、中亚等地的西道诸王的联系，使后者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阿里不哥这一边，连远在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之子别儿哥态度都偏向于阿里不哥，这一点从替父亲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药木忽儿不仅公开支持阿里不哥，甚至充当南下讨伐忽必烈的急先锋的行动上不难看出。而别儿哥方面则在自己汗国所铸造的钱币之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以表明钦察汗国支持对方的“鲜明立场”。忽必烈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短板之所在，因此连忙派出长期在自己身边的察合台曾孙阿必失哈赶往察合台汗国首都虎牙思，希望可以联合那个长期“寡妇监国”的堂嫂兀鲁忽乃。可惜的是阿必失哈没有能够穿越阿里不哥所设置的封锁线。走到半路便被截留了，察合

台汗国从此落入了阿里不哥所提名的察合台之孙阿鲁忽的手中。加上虽然被支解但是居心叵测的窝阔台之孙海都，此刻的忽必烈可以说是以中原之地独自抗衡铁木真以来形成的四大汗国，形势不容乐观。

但是忽必烈有忽必烈的优势，在长期以来的经营和运作之中，蒙古帝国已经形成了中原地区向漠北“输血”的经济模式，随着忽必烈迅速在中原地区建立起颇有效率的行政机构，一方面是被扼住了生命线的大漠皇庭，另一方面是不断动员“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的中原帝国，持久的消耗战显然对阿里不哥不利。

无奈之下阿里不哥一方不得不主动进攻，东路军由旭烈兀之子药木忽儿等人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则由蒙哥时代的老将阿兰答儿指挥，兵指六盘山以期与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会合。对于阿里不哥的东路军，忽必烈并不太担心，因为忽必烈早在返回燕京、开平之后在自己潜邸宿卫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怯薛部队交由心腹董文炳等人指挥，初步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真正令他担忧的反而是西线的战局，因为一旦阿兰答儿与六盘山的蒙哥主力兵团成功回师，那么川陕一线便将门户大开，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诸王的军队可能会源源不断地开赴中原战场。

对于这一点为忽必烈坐镇川陕地区的廉希宪、商挺也感觉颇为棘手，廉希宪虽然当机立断，捕杀了当年蒙哥派来“钓考”的刘太平、霍鲁怀等人。但是对于六盘山集结的蒙古帝国精锐野战兵团他也是束手无策，不得不与商挺措商对策。商挺对六盘山地区的敌重兵集团的动向做出了如下的分析：“如果他们集中兵力，攻击西安那么对于我们将极其不利，而继续在六盘山一线待命，我们也很难办。不过如果他们带着重装备北上策应和林，那么形势就对我们很有利了！”针对这一情况，廉希宪让自己麾下的汪良臣等人在西安一线虚张声势，指挥蒙哥主力兵团的浑都海果然采取了最愚蠢的办法，率领大军向北移动。此后虽然会合了阿兰答儿的南下兵团，却错失了最佳的进攻时机。最终在忽必烈所调遣的增援部队配合之下，汪良臣利用陕西地区特有的沙尘暴天气，用步兵短兵相接的方式击溃了蒙哥麾下最为精锐的蒙古铁骑，忽必烈即位之后最为担忧的“关陇危机”终于得以顺利度过。

而在东线战场之上，忽必烈的大军在合撒儿之子——号称蒙古第一射手的移相哥的指挥之下，不仅成功地击溃了药木忽儿的大军，还成功地将战线推进到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此时的阿里不哥显然对决战城下信心不足，于是在处死了被囚禁

的阿必失哈，匆匆放弃首都逃往自己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封地谦州（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唐努山北麓）。为了防止忽必烈的继续追击，阿里不哥向自己的哥哥发出了请求停火的信使，表示等到来年秋高马肥，和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一起亲来觐见。忽必烈毕竟不是蒙古帝国的冬季战专家，于是留下移相哥镇守和林，自己则冒着严寒穿越沙漠返回相对舒服的中原去了。


阿里不哥

应该说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首轮交锋之中虽然占据了上风，但是并未给予对

方致命的打击。而令局势迅速逆转的还是双方经济实力的悬殊对比，阿里不哥所控制的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而忽必烈又对其实施了贸易禁运政策，使得阿里不哥不得不向支持他的四大汗国频繁伸手。本来就持观望态度的四大汗国，此刻已经认清了形势，而此时旭烈兀又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和钦察汗国的别儿哥龃龉不断，在接受了忽必烈对自己地盘的认可之后，双方开始在高加索地区兵戎相见起来，都没心情搭理落难的阿里不哥，沉重的经济压力顿时落到了察合台汗国以及松散窝阔台汗国的领导人阿鲁忽和禾忽的身上。

应该说阿里不哥还是有信用的，第二年秋天真的回到了和林，不过他并不是来输诚的，而是展开了大规模反扑的。不明就里的移相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和林再度易手。公元1261年农历十月，两兄弟在昔木土脑儿之西再度遭遇。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后院都不太平，忽必烈要面对的是山东李璮的叛乱，而阿里不哥方面则是阿鲁忽和禾忽两位汗王断绝了对他的后勤支持，于是在正面战场难分胜负的情况下，大家都选择了各自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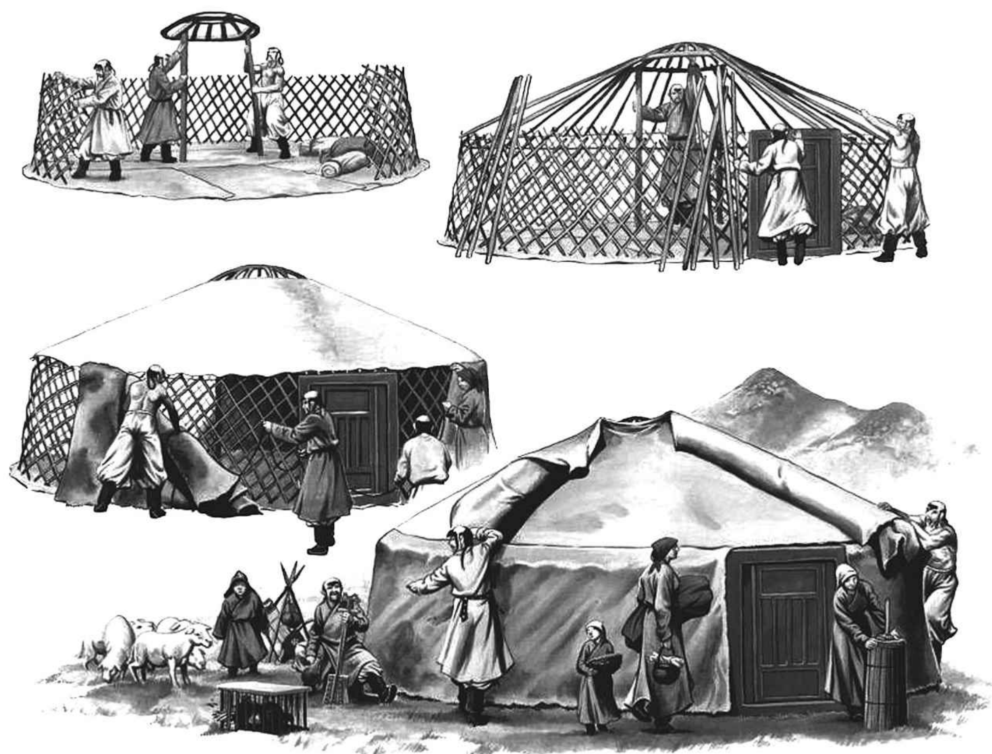
应该说阿里不哥的军事才能在蒙古帝国的诸多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比较排名靠前的。尽管在忽必烈面前失了点亏，但是揍起阿鲁忽和禾忽来却是得心应手。不过在战争的摧残之下，原本还算富饶的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察合台汗国的首都虎牙思（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霍城县）更是出现了“僵死相枕”的残局。阿里不哥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永远失去了后勤补给。而当阿里不哥的军队以小麦代大麦饲马，当地的老百姓竟以牛马的饲料为食，一时间饿殍遍野，连当地许多向来养尊处优的穆斯林长老也因为饥饿而死。

在无奈之下，绝望的民众只能向上天祷告。不知道是否是这信仰的力量真的发生了作用，一天阿里不哥正在召开宴会，突然袭来了一阵狂风，将由数千颗钉子固定的朝会大帐也掀反了，与会者无不带伤。原本就绝望的情绪加上这样的不祥之兆，使得阿里不哥的大军顿时溃散。悍将药木忽儿全然不顾“轻伤不下火线”的原则，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跑回自己的父亲旭烈兀身边去了。而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以在自己的封地征兵为命，向阿里不哥要回了自己父亲的印章，随后就盖在了向忽必烈投降的协议之上。

阿里不哥的衰弱首先招来的不是忽必烈的打击，而是长期被他追杀的阿鲁忽反击。在无奈之下阿里不哥只能踏上了向自己的哥哥忽必烈投降的东归之路，忽必烈

得到消息预先在边境地区准备好粮食，先让自己长期挨饿的弟弟好好吃上一顿。而此后的兄弟相见也颇有戏剧性。据说忽必烈见到阿里不哥首先是许久的沉默，随后就是哭，阿里不哥也跟着哭。忽必烈这个时候问自己的弟弟："你说说，按道理我们兄弟二人谁应该继承汗位啊？"阿里不哥很调皮地回答道："以前是我，现在是你！"而此时宗室将领阿济格也对蒙哥之子阿速带说："当年战场杀我兄弟阿毕世喀的是不是你？" 阿速带倒还是颇有王子风度地回答道："我不过是奉命行事，现在我臣服于忽必烈大汗，今天大汗如果下令让我杀你，我也照办无误。"

尽管表面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兄弟似乎只是"相逢一哭"便"泯结恩仇"，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帝国统治者，在接受自己弟弟和侄子们的投降之后，忽必烈还是对其主要部下进行了血腥的清洗。据说在忽必烈考虑如何追究阿里不哥的叛国罪行上，这位一度被西方历史学家列为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之间的蒙古帝国君皇和他的部下们都显现出了豪迈的一面。他主动请求将所有的罪行都加诸在自己的身上，不愿牵连自己的部将，但是以秃满为首的阿里不哥系将领却纷纷表示："是我等之谋。请勿罪阿里不哥，而置我等于刑。"在这样的"君臣争死"的情况之下，最终还是阿里不哥还原了事件的本来面目，他说："蒙哥去世之后，孛鲁合和阿兰答儿的确劝过我。在你和旭烈兀都领兵在外的情况下，我理应出来主持大局。"客观地说阿里不哥的选择的确没有错，唯一错的是他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忽必烈滞留在蒙宋战场之上的有限时间抢占先机，而蒙哥在六盘山所遗留的重兵集团又进退失距，最终导致了阿里不哥在这场皇位角逐中只能以一个失败者的方式落幕，他和阿速台虽然保住了首级，但是他们的部下孛鲁合、秃满、脱忽思等人却被悉数处死。



蒙古人的大帐有着强大的抗风性能

对于阿里不哥的处置，正在高加索地区全面开战的旭烈兀和别儿哥百忙之中表示拥护。而一度被阿里不哥折腾得够呛的阿鲁忽则以自己没有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而不发表评论，转身也加入到对钦察汗国别儿哥的战争中去了。而为了对方阿鲁忽的这“背后一刀”，别儿哥不得不以远交近攻的战略开始扶植窝阔台系的势力，日后即将成为元帝国西北心腹之患的海都正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崛起。

鄂州战役对南宋政权的新贵贾似道而言是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程。尽管从公元1246年开始他便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身份在南宋各大军区出任军政一把手的职务。不过他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以及利用自己在临安的人脉以及与宋理宗赵昀的特殊关系申请经费解决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因此当在鄂州城下直面蒙古强盛一时的兵锋之时，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是可以想象的。不过此时南宋政府已经从各大战区调集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吕文德、高达、曹世雄、向士璧等人悉数出现在了鄂州战场之上，因此忽必烈所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事实上并不确切。

不过在那些沙场宿将的眼中贾似道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威望。曾在襄樊战场上击败过蒙古亲王塔察儿的襄阳知府高达便曾令贾似道一度下不了台，贾似道前往高达所负责的汉阳战区督战，高达当面嘲笑他：“你一个戴高帽子（巍巾）的能干什么？！”而在口头嘲讽之余，每一次与蒙古军队交锋高达都派人前去邀请贾似道出场，如果贾似道拒绝就让部下到他的指挥部门口起哄。对于这场闹剧，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将领也不仅始终保持着“强势围观”的态度。更连日常的军务也不向贾似道汇报。最终还是在江淮战区曾和贾似道搭档过的吕文德出面帮贾似道解了围。派出部队到贾似道指挥部门口戒严，呵斥高达的部下：“宣抚在此，何敢尔耶！”这一举动令贾似道颇为感动，同时也对鄂州战场上的其他将领怀恨在心。

而身为左丞相的吴潜的一纸命令更险些将在鄂州指挥的贾似道送入绝境。当时吴潜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求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长江以南的黄州。而为了这一次行动的安全，鄂州方面还特意派出了由孙虎臣指挥的700名精锐骑兵护送。但是队伍开进到草坪一线却意外遭遇到了蒙古军的外围游击部队。贾似道立即向卫队指挥官孙虎臣询问该怎么办。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人影全无。以为在劫难逃的贾似道只能硬着头皮迎战，结果发现这不过是一支打着蒙古军旗号的土匪而已，领头的是骑着牛的江西降将储再兴。在了解了对手的实力之后，孙虎臣又不知道从哪里杀了出来，一举拿下了储再兴。这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孙虎臣未来的官运倒颇为亨通。而在贾似道后来向南宋政府申请表彰的此次遭遇战的将帅名单中除了孙虎臣之外还有两位未来同样赫赫有名的人物——范文虎、张世杰。

由于贾似道南下黄州，急于撤军的忽必烈派出的使节赵璧在鄂州城内没有见到

贾似道本人。因此蒙宋“鄂州之盟”的很多具体条款事实上并未来得及具体敲定，便在“俟它日复议之”的论调之下匆匆结束了。而贾似道向宋理宗赵昀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所谓“和谈”的事宜，只是简单地宣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将外交成果粉饰成了军事胜利。此时已经被丁大全愚弄到习惯了的宋理宗赵昀自然也没有深究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在一番封赏之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而事实上，在忽必烈的蒙古东线兵团北撤之后，蒙宋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由云南北上穿越贵州、湖南一线的蒙古南线军团此刻正在兀良合台的指挥之下依旧在猛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在忽必烈所派出南下部队的接应下，蒙古南线军团穿越整个战线北上，沿途蒙宋双方自然又不免发生冲突。而其中已经被提升为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再次脱颖而出。这个来自前金帝国的河北汉子，从家族渊源上看应该更倾向于蒙古方面，因为他的叔伯之中便有一位蒙古帝国的封疆大吏——张柔。不过张世杰却选择了效忠南宋政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料理完鄂州战役的一些后续事务之后，贾似道首先要面对的是南宋政府的储君之争。宋理宗赵昀是个风流天子，除了后宫粉黛之外，还时常让内侍董宋臣在宫外寻觅一些歌妓舞女之流召进宫中，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临安名妓唐安安。皇帝与名妓的不伦之恋说起来也是赵宋的保留节目，不过当年的宋徽宗赵佶和李师师之间也不过是通过地道偷偷往来，远没有宋理宗赵昀这般“光明正大”。不过多情归多情，宋理宗赵昀最终却并没有子嗣。因此随着宋理宗赵昀的年纪越来越大，朝野上下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颇多猜测。



并称宋末三杰的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

宋理宗赵昀本人倾向于自己的过房侄子——忠王赵禥。偏偏这个时候内阁首相吴潜向宋理宗赵昀递交了一份关于立储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中一句“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可以说是深深地刺痛了宋理宗赵昀的神经。因为这两句话的背后牵扯到了南宋历史上有名的宫闱争斗——“霅川之变”。宋理宗赵昀的前任宋宁宗赵扩也没有子嗣，因此同时收养了同宗的几个侄子，其中最受宠爱的便是宁武军节度使、祁国公——赵竑。不过赵竑对当时把持朝政的史弥远颇有看法。甚至经常指着地图上的海南岛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还帮史弥远起了个外号叫“新恩”，意思是说将来史弥远流放的地方不是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就是恩州（今广东省阳江市）。如此赤裸裸的威胁，老而弥辣的史弥远自然不会视而不见。他利用自己和后宫领袖杨皇后的关系，在宋宁宗赵扩死后修改遗嘱，册立当时不过是邵州防御使的赵昀为帝国元首。

与帝位擦肩而过的赵竑在宋理宗赵昀的登基仪式上便不肯执臣子之礼。而在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之后，当地的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便密谋联络山东、江淮一线当时兵力强盛的李全，拥立赵竑为帝。尽管由于李全的作壁上观以及赵竑本人犹豫动摇，这次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却给了宋理宗赵昀和史弥远一个不得不翦除这个政敌的理由。在史弥远的操作之下，赵竑被迫自杀。但是其在朝野上下却不

乏同情者。因为湖州别称霅川，因此这场“霅川之变”在宋理宗赵昀的执政时期几乎成为了热门名词，一旦出现灾象及战事，就会有人会将其与“霅川之变”的赵竑冤狱联系在一起。此时吴潜的旧事重提自然令宋理宗赵昀颇为不满。而贾似道本人也因为鄂州战役中吴潜让自己转移到黄州一事心存不满，于是抓住这一难得机会，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指控对方阴谋册立赵竑之后。这一击正中宋理宗赵昀的下怀。吴潜当即被罢免，贾似道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南宋内阁领导者的位置。而忠王赵禥也被顺理成章地立为太子。

不过贾似道刚刚从鄂州前线返回首都临安，新的麻烦便又接踵而止。首先在江淮方向上蒙古方面新近任命的江淮大都督李璮进攻淮安。对于这个昔日忠义军领袖李全的养子，贾似道并不陌生。自己在江淮一线经营多年的前线据点——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便是被其攻陷的。不过淮安毕竟是江淮军区的中心城市，而在这一方向上更有贾似道颇为欣赏的南宋新一代名将李庭芝统一指挥着江淮军区。

李庭芝的家族世代生活于汴梁地区。在金帝国灭亡的过程中才迁徙到南宋境内。首先发掘这一人才的是可以称得上是南宋末期“名将之父”的孟珙。孟珙不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给予了李庭芝一展拳脚的舞台，更在自己死后将他推荐给了继任者贾似道。李璮南下之时，李庭芝正因为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去了。不过在贾似道的力挺之下，他还是以代司令的名义返回江淮战场。不过作为忠义军的余脉，李璮虽然依附于蒙古，但却始终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蒙古方面多次征调他前往其他战区，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这次南下同样也是避重就轻，在遭遇了李庭芝的反击之后，李璮便撤回山东去了。

在江淮方面的战事宣告结束之时，忽必烈的特使郝经也抵达了宿州。此前一直鼓吹自己在鄂州战役中赫赫武功的贾似道自然不敢让郝经进入临安向宋理宗赵昀提交国书，于是利用李璮在江淮一线挑起的战事，将郝经一行使团拘押在真州忠勇军营之中。贾似道当然有他的理由。在他向宋理宗赵昀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指出：“蒙宋两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蒙古方面的使节穿越战区不太合适。必须从邻国入境。”不过此刻从江淮一直延伸四川、云贵高原乃至今天的中越边境都是蒙宋拉锯的战线。因此和窝阔台时代被扣押的月里麻思一样，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等待郝经等人的也几乎是同样将牢底坐穿的命运。忽必烈得到这个消息，虽然异常愤怒，但他很清楚此时要全力对付的是阿里不哥方面来自漠北和西域的威胁，因此虽然李璮一再请求南下攻宋，他都予以了拒绝。只是派人前往南宋探访和安抚被囚禁的郝经等人。

在击退了李璮，囚禁了郝经之后，贾似道开始整治那些在鄂州战役中对自己颇为“不友好”的军中悍将。不过比起那些动辄只会扣上“心怀不臣”的言官系统来，贾似道所采用的手法更为专业和现代，他首先在各大军区推行名为“打算法”的全面财务审计。南宋向来以繁荣的经济而著称于世，但是自“开禧北伐”以来，连年不断地与金、蒙两大强敌交手，军费开支无限制的膨胀却令南宋的国库几近被掏空。而在抵抗蒙哥和忽必烈两路大军的战斗之中，各地军事统帅在中央拨款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下，越权挪用地方财政收入自然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有些开支固然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诸多招募乡勇、庆功宴请之类的费用却早已成了一笔糊涂账。于是在全面细致的“打算法”面前，那些屡立战功的悍将自然成为了贪渎枉法、中饱私囊的典型。

首先倒霉的是一向轻视贾似道的高达和曹世雄。而在这场南宋军队内部逐渐“大清洗”之中，吕文德不仅没有保护自己昔日的战友，还成为了贾似道的爪牙和帮凶。借助吕文德所收集的证据，高达被解除职位、开除公职，而曹世雄更被逼死狱中。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固然有派系和人品之别，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个人的经济状态。经过一轮“打算”，如果将领可以自己贴钱填补财务缺口，自然可以按照“主动退还非法所得”的名义减轻处罚。而在这一问题上，担任襄阳知府的高达显然比始终在前线领军作战的曹世雄有优势。

不过在出钱和坐牢之外，显然还有第三条贾似道没有想到的出路。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安抚副使的刘整便大胆地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公元1261年农历六月，刘整突然向蒙古方面的成都经略使、外号“刘黑马”的刘嶷传达了投诚的意愿。应该说蒙古方面收降的南宋将帅不在少数，此刻成都外围的各大据点几乎清一色都是南宋降将在镇守。但是这些人毕竟还是迫于蒙古大军的兵势，像刘整这样素有威名，此刻又独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主动前来接洽的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此刘嶷的很多部下都表示：“（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不过“刘黑马”的儿子刘元振倒是对刘整此刻的尴尬洞若观火，他向自己的父亲指出：“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何况刘整本身也不是南宋公民，此刻把守泸南重地，事势和当年的李全有什么不一样！因此我认为刘整此刻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刘元振的分析固然精辟，但事实是刘整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除了远在临安的贾似道正在对各军区推行“打算法”之外，作为四川军区的高层他更要面对素来不和

的新领导——四川制置使俞兴。刘整和俞兴是老相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刘整还是俞兴的救命恩人。在此前的蒙宋战争中，守御嘉定地区的俞兴被蒙古大军包围，刘整领军驰援，在战场上双方配合还算默契。但是等蒙古军队撤走之后，俞兴却摆起了架子，既不出城迎接，也不设宴招待，只是让自己部下的小吏送去一些瘦羊劣酒。或许在俞兴看来，增援嘉定本是公事，自己没有必要太过客套，何况手中的经费也不富裕。但是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却引来刘整更为粗暴的回答，刘整毫无理由地把前来劳军的小吏暴打了一顿。从此两个人的战友情谊算是彻底破裂了。

从刘整对俞兴此前的态度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位“赛存孝”是个很看重“官场潜规则”的人。因此俞兴一出任四川制置使，刘整便主动做出了一系列表示，又是送出了雕功精美的黄金花瓶，又是托人到江陵，请俞兴的母亲写信劝慰对方以修补彼此的关系。甚至还派人前往临安“走走门路”。可惜的是俞兴不知道是真的铁面无私还是睚眦必报，而临安方面此刻刘整的老领导李曾伯远在广西。总之前来执行财务审核的官吏还是出现在了刘整所据守的泸州城中。此时已经听闻了老战友——高达和曹世雄遭遇的刘整只能盼望着成都方面的蒙古军队能比前来逮捕他的南宋官吏更早一步抵达。而刘元振显然没有令他失望。

刘整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出降，对蒙古而言自然是空前的收获。因此忽必烈大笔一挥，刘整便被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而此时远在临安的贾似道似乎还没有觉得自己所推行的“打算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命令吕文德支援俞兴，全力收复泸州。蒙宋两军在这一地区反复拉锯近一年的时间，尽管最终收复了泸州城，但是刘整也将当地的百姓迁徙到了成都、潼川，而刘整以及前一批叛降的南宋将帅对蒙宋战局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年里逐渐展现出来。

在刘整叛降的同时，贾似道的“打算法”大清洗正式进入了高潮阶段。赵葵、史岩之、杜庶等人无一幸免。而其中被指控挪用公款最多的是当年死守潭州的向士璧。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在潭州攻防战中向士璧又是创立“飞虎军”又是招募民兵组织斗弩社，还每天上城慰劳兵卒，这几项的花销恐怕远远超出了南宋政府所给予的军费预算。其实向士璧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当年曾主动捐献家财百万以供军费。但是过去的主动捐赠不能抵扣今天的客观挪用，最终不仅向士璧死在监狱之中，连妻妾也被抓去顶账，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而比向士璧更为冤枉的是沿海制置使赵葵，作为一个13世纪的海上贸易强国，南宋当然也有一些海洋争端。由此而设立的沿海制置使尽管为了对抗来自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菲律宾的海盗也会产生一些军费开支。但是赵葵接手之时，他的前任吴潜已经订立了商队、渔民互相援助的海上民兵组织办法——“义船法”。并设立永平寨以及“海上十二铺”等专业军港，可以说在赵葵任内，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似乎找不到什么把柄。但事在人为，在与赵葵向来不和的马光祖的竭力收罗之下还是发现了赵葵在任期间搞春节军民联欢活动中“恶意挪用”地方财政收入三万缗的证据。这种“欲加之罪”的做法连赵葵的政敌——汪立信都看不下去了。贾似道或许也觉得对赵葵的指控过于站不住脚，于是也就放了对方一马。

被“打算”的还有教育部官员谢枋得。谢枋得是宝祐四年（1256）进士出身，在他那一批的考生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状元文天祥。不过宝祐四年的殿试对策充满了戏剧成分。据说文天祥当天的状态不好，最终在成绩考订上只位列第七，只是得到了宋理宗赵昀的欣赏才得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而谢枋得由于对策时攻击了当朝的丞相与重臣，被朝廷贬为第二甲进士。因此两人的施政水平和文学造诣孰高孰低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不过文天祥早期的政治成就远不如谢枋得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天祥秉承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出任建昌军（今江西省南城县）仙都观的主管这个闲职的时候，谢枋得已经以礼兵部架阁的身份到处招募民兵了。

谢枋得对于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格外的反感。在国家军费连年赤字的情况下，他本人散尽家财也只募集了一万多人。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挪用地方财政收入的确不合国法。因此他的态度是首先自己出钱贴补了一万缗。在实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他向贾似道上书：“当年商鞅为了推行变法，曾经为了移动一根木头而开出了千金的赏格。可见对于国家而言信用比金钱更为重要。今天为了两颗鸡蛋就不惜自毁长城，不知道我们的邻国听到了会做何感想？”于是他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贾似道忙于肃清朝野异己的同时，忽必烈在与最为强大的帝位竞争者阿里不哥相持的同时也筹措再度南下了。不过蒙古帝国山东版图内的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却拖住了忽必烈的脚步。叛乱的领导者是蒙古帝国新任江淮大都督李璮。从时间上来看，李璮举起反蒙的旗号恰好在忽必烈以南宋政府“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为由向各地军政长官发出征讨檄文之后，似乎为这位忠义军的后裔抹上了一层民族大义的光环。但事实上李璮的叛变很大程度上完全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蒙宋双方订立了内容含糊不清的“鄂州之盟”后，李璮始终是在江淮一线挑起边境冲突的急先锋。但是他出发点始终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提升自己在蒙古帝国中的政治地位。而对于这一点正忙于手足相残的忽必烈洞若观火，除了一再驳回李璮煽动大举南下的战争请求之外，忽必烈一边对李璮褒赏有加，另一边却开始逐步削弱李璮在山东一线的固有势力。其中最为阴险的一招莫过于派出曾经和忠义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贞出任益都、济南和山东临近地区宣抚使。而一直与李璮关系恶劣的张宏也被提升为济南路大都督。

张宏是蒙古帝国在山东地区汉族世侯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张荣在金帝国末期便利用战乱，割据一方。最终虽然不得已才归顺蒙古。但是在晋见铁木真时，张荣对自己之所以长期抗击蒙古军队的原因，竟做了如下的回答：“山东地阔人稠，不能都给您了。”铁木真觉得此公倒也诚实，也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山东一带的势力。于是便顺势册封其为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部都元帅。这样的地头蛇和李璮在山东势力范围犬牙交错，自然龃龉不断。面对忽必烈厚此薄彼地将山东地区悉数交给自己的政敌掌管，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姚文獻像



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姚枢

1261年冬，李璮利用忽必烈领军北上再度征讨阿里不哥的机会全力筹备叛乱事宜。但是出乎李璮意料之外的是忽必烈的大军并没有深入大漠，在昔木土脑儿（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便遭遇到了攻克和林的阿里不哥主力兵团，双方恶战一场之后便各自撤军。当年的农历十二月，忽必烈已经回到了燕京。而此时李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面对骑虎难下的局势，李璮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公元1261年正月底，他利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随后开始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蒙古驻军展开突袭。

李璮的叛乱尽管准备不足，但也同时打乱了忽必烈此前逐步削弱他的部署。面对江淮一线的蒙古驻军全面覆没，宣抚副使王磐只身逃入济南的不利局面。忽必烈也一时不知该从何入手。因此他特地请教了自己的高级幕僚姚枢。姚枢对李璮所可能采取的战略作了如下的分析："如果李璮利用我方北征阿里不哥的机会。由山东迅速北上，席卷华北平原，依托燕山防线阻击我军南下。那么必然天下震动，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李璮的最佳选择。而退一步联合南宋，依托江淮一线，与我们长期对峙，再不断进行骚扰，也足以令我军疲于奔命。但是李璮如果直接出兵攻略济南，坐等其他各地的汉军将帅响应。那么就是自寻死路了。"这一番话当然说得忽必烈颇为紧张。不过姚枢很快便给他吃了颗定心丸，认定李璮一定会采取最愚蠢的办法，集中兵力向济南进军。

事实上李璮也不是傻瓜，在战略选择上他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在叛乱发动的同时，他宣布支持阿里不哥的檄文便迅速地在河北、山西一带扩散开来。不过忽必烈很快便处死了准备在政治上投一把机的太原路和平阳路地区的蒙古军政官员。太原路和平阳路长期以来都是亲阿里不哥派的蒙古宗室术赤和察合台系的封地。李璮的叛乱顺便扫除这两地潜伏的第五纵队也算是忽必烈的因祸得福。

而在外交上，李璮也早已向南宋方面伸出了橄榄枝。他通过自己战场的老对手李庭芝与贾似道展开了书信往来。虽然说起来贾似道和李璮算是世交，但是在对方正式举起对抗忽必烈的旗帜之前，贾似道自然不会做出任何积极的反应，而是要李璮先吐出此前从自己手里夺走的涟水、海州，以示诚信。直到李璮率军北上，南宋政府正式接收涟、海诸城之后，贾似道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在鄂州战役之后，捞取政治资本的绝佳时机。因此由其主持的南宋政府不仅对李璮本人大肆封赏，甚至还恢复了当年举兵南下的李全的官爵。

对此南宋朝野也并非全无看法，东路安抚使司兼明道书院院长的周应合便向宋理宗赵昀提出了反对意见：“李璮以所控制的山东地区向我方输诚，无非是有求于我而已。其所统帅的兵力在蒙古帝国的武装序列之中不过是‘区区一旅’而已，一旦我军应援失败，那便是自取其辱。而即便接应李璮南下成功也很可能重蹈当年梁武帝萧衍接纳侯景的覆辙。”不过向来容易头脑发热的南宋君臣此刻根本听不进去。宋理宗赵昀还兴致颇高地赋诗一首送给贾似道：“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宏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悉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潜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可见对纳降李璮继而收复山东寄予了厚望。

宋理宗赵昀如此热情，贾似道自然也不能含糊。他迅速调集了三路大军在北上支援李璮。但是在战术层面的选择上，李璮恰恰走上了姚枢早已判决了他死刑的绝路。他从两淮前线回师自己的势力中枢——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打开府库犒赏部下之后便急吼吼地向济南进军，去找自己的“宿雠”张宏的麻烦。此时山东地区包括张宏在内的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世侯的精锐部队都跟随忽必烈北上了，虽然已经班师但还没有返回各自的驻地。因此张宏根本无力在济南与李璮决战，只能弃城而走。事实上此时李璮虽然已经走错了一步，但依旧有反盘的机会。但是他却选择了在济南坐等蒙古帝国从容的集结兵力，阻断他与儿子——时任平滦总管李南山之间的联系，逐步收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对于忽必烈而言，他最担心的并不是李璮叛乱本身而是由此在蒙古帝国内部的汉族世侯中的连锁反应。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高参姚枢显然比忽必烈更了解同为汉族的各方诸侯的心思。李璮虽然经营多年，兵强马壮。但是终究不过是一个军阀而已，因此可以说政治几乎没什么号召力。何况他本身是南宋忠义军的后裔，与山东、河北一带依靠蒙金战争崛起的土豪势力不仅没有什么渊源，更是后者除之而后快的异类。李璮和张宏的矛盾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忽必烈向河北、山东一线的汉族世侯们发出“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的号令之后，史天泽、严忠范等昔日的汉族土豪纷纷动员自己的领内作战部队成为了镇压李璮的主力军。老牌蒙古汉军将领张柔此刻虽然已经申请退休，但他的两个儿子——张弘略、张弘范在这场平叛之战却各自展露了头角。

作为张柔事业的主要继承人，张弘略统一指挥着蒙古帝国在皖西北重镇亳州一线的野战部队。在平定李璮叛乱的战役之中，他的主要任务是阻击南宋方面北上的地面部队。尽管南宋军队在夏贵和青阳梦炎的指挥之下一举收复了亳、滕、徐、

宿、邳、沧、滨七州和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但是张弘略却采取侧翼迂回的战略，夺取了南宋方面水路补给枢纽——涡口，令夏贵不得不撤回了自己的出发地——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而途中又遭遇到了张弘略的伏击，损失惨重。另一路的南宋增援部队失去了侧翼的掩护，自然也不敢孤军深入。南宋方面从陆路支援李璮的行动归于失败。

除了陆路的夏贵和青阳梦炎两军之外，在增援李璮的军事行动中，南宋方面还第一次动用了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南宋海军由海州出发，北上在山东沿海的登州、莱州一线展开突击。不过以当时南宋的军事力量，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还是无力展开的，南宋海军的行动至多只能起到袭扰和牵制作用。面对蒙古方面大军云集，担任北上主力的地面部队又行动迟缓的局面，最终南宋海军在山东沿海也只是“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对济南战场的李璮只能“声援”而已。为此指挥南宋海军的“赵马儿”都统还编造了一个“海神擎日”的神话。说舰队在山东沿海每天早晨日出之时都看到一个红色皮肤、眼睛碧绿的巨人，用头顶着太阳缓缓升起。正是因为这种应该是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大大地影响了南宋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士气云云。

在南宋方面三路策应大军都止步不前的同时，李璮在济南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李璮在夺取济南之后，也曾主动出击。但是在与蒙古军队初期的野战中却连遭败绩。而随着蒙古方面各路增援部队的抵达，李璮在兵力更处于劣势，只能选择负隅顽抗。不过史天泽等汉族世侯都不愿意主动攻坚，秉着保存实力的宗旨，负责统一指挥的史天泽以李璮“多谲而兵精”为由提出的“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的战略自然得到了一片拥护之声。

不过同样参与围城战，老于军旅的张柔却对自己的儿子张弘范有另一番教诲。张柔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要求儿子在修筑营垒之时一定要选择在李璮的突破口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自己的部下不至于在长期围困中消磨斗志，同时也可以引起自己上级领导的重视，一旦出现险情必定全力支援。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稳操胜券的战争中，屯兵险地才能建立功勋。而张弘范对自己老爸的训诫也是言听计从，当李璮初期不断袭扰蒙古各军营垒却独独没有对自己下手之时，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头脑，连夜挖深加宽了自己阵地前沿的壕沟，果然在第二天对手的全力猛攻中，李璮军队预先制造好的“飞桥”根本不足以跨越张弘范的战壕，大量有生力量在翻越壕沟时被张弘范所部轻松射杀。

和张弘范奉行同样策略的还有史天泽的堂侄史枢。在叔叔的照顾之下，史枢的

防区地理位置比张弘范更好，直接扼守济南城西南方向的历山一线。作为李璮最有可能突围的方向，史枢依托河涧修筑防御工事。但是由于连续降雨河水暴涨直接冲垮了史枢所设立的木栅屏障。不过这在史枢看来却未必是坏事，因为李璮必定会抓住这一战机而发动夜袭。果然在当天晚上，史枢以投掷火炬作为原始照明弹一举击溃了李璮的突围大军。

在连番突击失败之后，李璮在济南城中的粮食储备迅速消耗一空。对前途日益悲观的部下纷纷出逃。眼前大势已去的李璮手刃了自己的妻妾，但却没有勇气用刀剑解决自己。他坐船跑到因为“夏雨荷”而闻名全国的大明湖中投水自尽。但偏偏水浅淹不死。于是无奈地成了蒙古帝国汉族世侯们的俘虏。不过作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李全和杨妙真的后代，李璮人生的落幕也同样充满着戏剧成分。

对于已经成了阶下囚的李璮，史天泽似乎颇为忌讳。他向围城大军的名义总指挥哈必赤建议不必将李璮送到忽必烈的驾前，直接在济南杀掉比较好。而理由是颇为玄妙的“以安人心”。这个理由表面上看是安抚济南的百姓和参战将士，但是在处死李璮之前的公审大会之上，我们却可以发现真正要目睹李璮身首异处才能安心的恰恰是史天泽本人以及其他汉族世侯们。根据明代著名的八卦文章大师祝允明（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的《前闻记》中的描述，这次公审大会几乎就是一场闹剧。首先义正词严地喝问李璮的是世袭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忠范，但是在李璮一句“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的回答之后便不敢再问了，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便跑掉了。这或许也算是一种“两肋插刀”吧！史天泽问李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对方依旧是一幅哀怨的样子反问：“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最终气急败坏的汉族世侯让刽子手对李璮施以凌迟酷刑才能是心满意足。

也许李璮在公审大会上的表现和他故意在写给自己身居蒙古帝国高位的岳父王文统的信中流露一些敏感性字眼一样有拉人下水的嫌疑。但是随着李璮主要根据地益都的开城投降之后，一场空前规模的蒙古政坛大地震悄然展开。首先遭殃的是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汉族大臣。这些人中间地位最为微妙的莫过于商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之中，商挺作为陕西、四川一线的军政长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时却被急召回京受到了严格的盘查和软禁。而赵良弼则更被严刑逼供，一度险些被处以断舌之刑。不过这几位毕竟都与李璮没什么交集，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日后依旧活跃于蒙古帝国的中枢。

在李璮叛乱中真正受到冲击的最终还是史天泽等汉族世侯。尽管对于在济南城

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的史天泽，鉴于对方“擅杀自劾”的态度忽必烈未加罪责。毕竟此时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忽必烈不希望在中原出现一个李璮倒下去、无数个李璮站起来的局面。因此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而这些曾经和李璮暗通款曲的汉族世侯，最终也没有逃过秋后算账的命运。即便是在平定李璮之战中出力颇多的张弘略，尽管在蒙古政府事后追查的李璮通信记录之中，张弘略每次和对方通信“皆劝以忠义”，还是被解除了一线军事职务，被调任首都卫戍区。而长期与李璮关系恶劣的济南路大都督张宏首先被赶出了济南，派往蒙宋前线的濠州。更在几年之后以“乘变盗用官府财物”的名义被罢免。而在李璮叛乱期间，面对南宋军队的兵锋选择弃城而逃的张宏之叔邳州万户张邦直更以违规贩卖马匹而被处死。济南张氏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从此荡然无存。

不过尽管史氏、严氏、张柔等名门望族在各地的军政权力纷纷被剥夺或者削弱。但其毕竟在中原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忽必烈在对其展开压制的同时，却也不得不继续任用他们的子弟。忽必烈在张柔诸子中特别选拔出张弘范来代替张弘略的工作，任命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为顺天路管民总管。而同样在济南围城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史枢在几年之后也以左壁总帅的身份，统领蒙古帝国的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各路人马。



张柔铜像

在蒙古帝国再度忙于内部事务之时，北上策应李璮失败的贾似道也在巩固自身的权力。不过这一次他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目光转向的是那些曾经位高权重，但此刻已经失势的前丞相们。而他逐一解决这些人的顺序竟也是按照他们倒台的时

间逆向排列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前任领导——左丞相吴潜，吴潜在被宋理宗赵昀免职之后，贾似道进一步罗织罪名将他流放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不过吴潜在循州虽然只是一个刑徒，却为当地做了不少实事。吴潜对水利向来颇有研究，当年出任浙东制置使便修筑过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到了循州之后，他更牛刀小试，针对东龙江（东江上游）常年水患，修建了大路田防洪大堤。此外吴潜还在东山寺创设了“三沙书院”，又名“东山书院”，常偕士大夫、文人墨客在此讲授道经，先后收取了过百余名学生。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贾似道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连忙任命刘宗申到循州当知州，让刘宗申找机会毒死吴潜。不过吴潜毕竟是几起几落的老官僚了，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刘宗申一上任他就在自己的床下挖掘水井，从此之后只喝自己床下打出来的水。刘宗申请他吃饭，他一概推辞。最后逼得刘宗申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带上厨师上门请客。吴潜在避无可避之下，最终只能说一句：“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果然当天晚上在广东地区常见的雷暴雨天气中，吴潜从容地写好遗书，端坐而逝。吴潜死后，南宋朝野上下立即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贾似道。而贾似道则将刘宗申推出来作替罪羊。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十五年之后，他自己也会险些出现在循州。

第十章　襄樊之间

公田买卖

——南宋经济的崩溃和贾似道的“土地财政”

高高在上的贾似道日子也不好过。诚如他刚刚执掌南宋政府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所说：“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著擎禾手，多少旁人冷眼看。”在“鄂州之盟”后，尽管蒙宋之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是刘整叛降、李璮入款。双方的战线也反复拉锯，几乎没有一天消停过。而真州军营里还拘押着蒙古郝经使团这颗定时炸弹。贾似道可以选择无视，但是忽必烈不可能遗忘郝经的存在。1263年农历二月，忽必烈的第二批使节团在王德素充、刘公谅率领下又准备南下了。被拘押的郝经也多次上书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只能继续隐瞒不报。无奈之下郝经只能安慰自己的下属说：“我们虽然不幸一起患难。但是只要耐心等待。按照现在的局势，我想南宋政府不可能维持太久了啊！”

外交事务或许还可以拖拉一下，但是南宋政府日益吃紧的财政却是贾似道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蒙古崛起之前，一般史学家都认为南宋的经济状态是当时全世界所有政权之中最好的。最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全世界各国财政收入的60%。但是支撑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大多是南宋政府在和平年代的财政收支表，在连年战乱，四川地区大半国土沦丧的情况之下，南宋政府的财政情况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要改变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与蒙古媾和，以每年二十万缗的“岁币”来买一个“和平年代”。对于南宋这笔“保护费”如果可以换来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甚至边境贸易往来，应该还是划算的。但偏偏这条路被贾似道自己所吹嘘的“鄂州大捷”给堵死了。继续拘押郝经、拒绝蒙古使团入境，只能引发新的战争。走投无路的贾似道必须迅速筹集一笔庞大的军费，以支撑南宋政府和军队在更为艰难的战局中的运转。

贾似道此前推行的“打算法”虽然逼迫那些名臣良将从自己口袋掏钱补贴国家军费。但是这点钱和战争的消耗相比根本不成比例。而此时南宋政府长期以来采用增发纸币，借通货膨胀来转移战争开支的道路也走到了尽头。早在“端平入洛”时期，南宋政府便已经开始增加货币投放量了，一时间物价疯涨，民怨沸腾。民间流传着“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的说法。不过当时宋理宗赵昀任用的真德秀等人却除

了大谈理学之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经济政策，因此民谣只能发出“吃了西湖水，当作一锅面”的感叹。而到了贾似道时代，南宋政府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国计困于造楮，富户困于和籴”的死循环了。也就是说一边是国家大力印发纸币，一边却又要向以更高的价格向富户征收军粮。而此时临安知府刘良贵和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提出的回购“公田”政策便成为了贾似道的救命稻草。

所谓“公田”，顾名思义就是南宋政府的国有土地。但是国有土地又怎么会存在回购一说呢！这不得不从南宋政府建议之初抛售“公田”说起。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局面与贾似道时代有些类似。金帝国的步步进逼，使得草创的南宋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军费赤字。为了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前线抗金战争，宋高宗赵构可以说是无所不卖，不仅大小官爵待价而沽，甚至连僧侣的身份证明——度牒都要花钱认购。在这个情况下抛售没收不法官僚及逃户、尽户没人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以及军队开垦的营田似乎还不算离谱，而为了鼓励私人买公田，政府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田地30年以上的，价钱减少20%；凡是买有公田一千贯钱的免劳役3年，一千贯以上的免5年，五千贯以上的免10年；承买荒田的免三年的田租。从这个角度来看抛售“公田”不算是什么“恶法”，相反还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之一。

但是贾似道提出的回购“公田”的模式却完全不同，尽管在贾似道授意的提案官员口中，回购公田有五大好处：“如果可以回购此前抛售的一千万亩公田，那么每年国家便可以自行生产六七百万石粮食。用于支撑边防部队的开支绰绰有余。这样一可以免除国家每年征收粮食的烦琐，二是可以用于军饷开支，三能控制中央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四是平易物价，五还能遏制土地兼并。”而回购公田首先针对的是南宋的政府官员名下的田产。根据贾似道及其施政团队所指定的限田制，规定一品大员名下的田产不能超过五十顷，然后逐品递减五顷，也就是九品官员只能拥有五顷土地。而超出部分一律由国家购买其中的1/3，收归国有。

应该说到这个层面，“公田法”针对的还只是南宋的政府官员。在贾似道自愿贡献出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以及赵氏亲王的响应之下。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并不强烈。内阁之中只有礼部尚书徐经孙提出明确反对。不过宋理宗赵昀此时头脑还算清醒，他虽然一时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是依旧觉得不妥，于是便向贾似道商量：“现在正是春耕时期，这一项政策能否等到秋后再推行。”不过贾似道立即以辞呈相要挟。在贾似道的大力推动之下，“公田法”于公元1263年农历二月在浙西平江

（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地进行试点，随后向全国推广。

为了推行这一新政策，贾似道特意成立专门的政府机关——官田所，任命自己的亲信前往各地督办。这些肩负“督催之责”的官员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刑部侍郎包恢，包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包恢也确实有乃祖之风，在他就任地方官员和刑部侍郎的过程中也处理过一些冤假错案。而包恢虽然是以督办“公田法”的名义兼任平江知府的，但他在就任之后却发现南宋的财政弊端不在于军费开支过大，而在于许多政府的迎送开支都被分摊到普通商户的头上，而主要财政收入如酒税则被南宋的税务官员私自截留。因此在上任之后，包恢一方面缩减政府开支，另一方面整顿地方税务。在他的任期内，平江地区不仅正常供应前线粮饷，填补了前面九任地方官员所遗留下来的财务亏空，还结余了六百余万钱。可见南宋财政的问题并不在于改变土地的所有制，而在于整顿吏制。

不过包恢的个人努力并不能挽救“公田法”在南宋的全国各地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因为到公元1263年农历六月，基本上南宋政府官员手中的超限田产已经全部回购了。但是仅有三百五十余万亩，仅满足了此前设想的一千万亩的三分之一强。这其中除了贾似道的施政团队此前订立指标过高外，应该也有南宋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隐瞒自身田产的因素。毕竟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这样的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何况贾似道所领导的“官田所”所制定回购价格不高且支付方式极其复杂。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亩产量的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田租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这个价格看似不算太低。因为在史弥远执政时代，南宋地区一亩良田的平均价格在八十贯左右。但那是在“公田法”推行的近三十年前，而从史弥远到贾似道的这三十年中正是南宋通货膨胀最为剧烈的时期。何况各地的地价不同，首先推行“公田法”的试点地区都是南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浙西地区曾有过“千缗之田”，这虽然是说每亩的纸币价格在一千贯左右，但是换算成铜钱也在二百五十贯上下。

定价不高或许还能接受，而官田所还不是给现金。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委任状）、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

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予迅速贬值的会子。看来贾似道不仅在公田问题上铁了心和宋高宗赵构时代的同僚反着来，在官告、度牒问题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当年可以当作商品抛售，现在当然也能当作货币支付。而贾似道所管理的印钞厂——会子所更是开足马力，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于回购公田。

如果说“公田法”只针对南宋政府官员的话，那么问题或许并不严重。毕竟作为公务员，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那些告身、度牒也不愁没有地方变现。但是由于指标远没有完成，贾似道所制定的“公田法”的矛头很快便转向了普通民众。而对于普通民众所能拥有的田产，“公田法”终于露出了可怕的獠牙——起初每户限制两百亩，随后又降低到一百亩。而收购价格比针对政府官员时更低。田租一石的只给予第十七界会子二百贯或所谓“十七界”（就是南宋政府统一印发的第十七次纸币）。第十七界会子的市场牌价，一贯相当于铜钱五十文。也就是说每亩的价格不过每亩铜钱十贯而已。随后改为第十八界会子四十贯。第十八界会子的市场牌价，一贯相当于铜钱二百五十文。虽然表面上看每亩的收购价还是铜钱十贯。但是由于每天加印十五万贯的第十八界会子冲击市场，这一版的货币在市场上已经无法再兑换到等价的产品。二百文的第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因此当“公田法”针对普通民众几乎就是明抢土地。

而即便是这些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回购“公田”的过程中也不是足额支付的，只要金额略大，官田所立刻拿出官告、度牒来冲低买款。而这些荣誉头衔的委任状价格倒是高得惊人，一个正八品的修职郎竟然可以顶三千贯的纸币。而军衔如校蔚、承节郎之类的官职由于其“含金量”不同基本上都能冲低万贯纸币以上。

政府这样以虚职换取百姓实产的做法，自然激起了空前的抵制声浪。而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田法”，官田所负责人刘良贵将回购“公田”和各地官员的政绩相挂钩。凡是推行不力，一律就地免职、永不叙用。在贾似道和刘良贵的指挥棒下，“公田法”试点推行的六个郡县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而在这一环节，“公田法”所损害的依旧是南宋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一些非议，但依旧没有引起群体性的反抗。毕竟有家有业的地主阶级还不至于为了额外的田产而发动骚乱。而宋理宗赵昀此时也颇为支持贾似道，对于朝野上下对“公田法”的抨击。他亲自出面宽慰提出辞职的贾似道，替他辩护：“言事易，任事难。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反对公田法的人很多，我当时也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你却能将这个公私兼济的法令已经推行下去了，每年政府的军饷也都仰赖于此。这个时候因为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便停止甚至倒退，无非是

令议论者逞口舌之快而已。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你一向任劳任怨，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理论呢！来，姐夫挺你！”

而为了推行“公田法”，南宋政府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经界”。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南渡以来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确保财政收入计，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明确无误地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绍兴二十年间，由户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过“经界法”。经界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是有积极作用的，唯其如此，也遇到来自官僚、地主的顽强阻力。李椿年终于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进行到底。其后，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实行过经界，只是小打小闹，规模无法与绍兴经界相比。但咸淳经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买公田提供数据。由于不必丈量土地，只需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其后变动，准确度自然不及经界，故而称为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因此很快便得以完成。

而回购的“公田”由南宋政府统一运作，出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而为了鼓励农户的生产热情，官田所对于耕种“公田”的佃农采取“八折”优惠，即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现租只收八斗，如遇到灾年则给予进一步的减免。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各地国营农庄却为了追求产量，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同时国营农庄还采用一石三升乃至到一斗六升的大斗征收，使得原先满怀热情的佃农们逐渐对租种“公田”失去了热情，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而针对在实施“公田法”的过程中，大量用于向官员和民众购买的土地的第十八界会子充斥市场。为了遏制南宋政府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贾似道又在公元1264年农历十月推行货币改革，停止第十七界会子的流通，发行铜钱本位的新货币——“金银见钱关子”，在严格限定民间所有第十七界会子必须在一个月内兑换成第十八界会子的同时，又推出了“金银见钱关子”的官方牌价：每一百“金银见钱关子”相当于七十七文铜钱，可以兑换三百第十八界。这样的做法堪称南宋版的“休克疗法”，变相又在流通领域从普通民众手中抢走了大笔财富。

无从抗辩的南宋百姓只能拿新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开涮，说这种纸币上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个繁写的“贾”字。而因为纸面上印有宝盖幢幡之状的花纹，因此“金银见钱关子”又被民间称为“金幡

胜”。所谓“幡胜”是南宋民间一种金银箔纸绢剪裁制作的装饰品，言下之意自然说是这种所谓“金银见钱关子”在当时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的情况根本没有流通能力。还编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的政治笑话，这个笑话比较有内涵。除了表达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和货币改革，在蒙古灭亡南宋可以说是功居榜首之外，还有一个潜层含义。麒麟阁是汉帝国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的库房，同时也保存着功臣的画像。汉代麒麟阁的第一功臣是霍光，而唐帝国也有类似的设施——凌烟阁，其中第一功臣官方的说法是长孙无忌，而民间普遍认为是秦琼。因此“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也可以理解为：“花（霍）光尽穷（秦琼）”。

南宋纸币——会子

而在贾似道忙于推行他所制定的“公田法”和货币改革的同时，蒙古方面也没有停止对南宋施加军事压力。而重点依旧是放在西线的四川地区。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在四川一线采取分而制之的战略，主要承担对宋作战任务的是东川四帅府。所谓“四帅”指的是由汪德臣之弟——汪良臣统一指挥的三名南宋降将——杨大渊、张大悦和蒲元圭。而鉴于汪良臣在川陕一线忙于与阿里不哥派系军队的内战，东川四帅府虽然名义上由蒙古统帅钦察以及汪良臣领导。但是实际军事事务则交给了杨大渊管理。杨大渊向忽必烈进献的灭宋战略是“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也就是进一步向南宋合州、重庆一线推进。

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之中，南宋方面在四川地区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击。不过这种所谓的反击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领域。贾似道和接替俞兴出任四川制置使的朱禩孙多次派出密使携带空白委任状和丰厚礼物劝说杨大渊等人反正。但是此时颇受忽必烈信任的杨大渊却借贾似道密使的人头向忽必烈进一步证明自身的忠诚。

公元1263年农历九月，从陇西战场回镇东川四帅府的汪良臣一步将在南宋前沿要塞钓鱼城附近的母章德山、武群山修筑营垒，采取“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进一步压缩南宋军队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要“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南宋四川制置使朱禩孙企图趁敌立足未稳的反击也被汪良臣在野战中击溃。南宋合州防线再度摇摇欲坠起来。但是在曾经击败过蒙哥大军的南宋名将王坚被贾似道排击、调走之后，又一位南宋将领——张珏崛起于被后世称为“东方麦加、上帝折鞭处”的钓鱼城上。1263年农历十月张珏被任命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面对汪良臣和杨大渊的步步进逼，张珏并不急于反击，而是着手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与此同时，张珏和四川军区新任领导夏贵也不断地派出运输队强化位于合州以北的得汉城一线的防御。通江得汉城是余玠时代构筑的“巴蜀八柱”依旧还在南宋掌握之中的三座要塞之一。得汉城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合州钓鱼城乃至整个南宋四川方面防线的安危。

蒙宋双方在四川一线的反复拉锯，令忽必烈多少有些厌倦。而此时前往燕京觐见忽必烈的刘整更向这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提出“急攻缓取”的思路却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应该说在叛降蒙古之后，刘整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吕文德的反击之下，刘整被迫放弃了自己在泸州一线的地盘。而此前招降他的“刘黑马”刘嶷也因病去世。

因此刘整在叛降蒙古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尴尬的“冷板凳队员”位置。因此他利用自己对吕文德的了解，向忽必烈建议：“南宋所依靠的无非是吕文德这个‘黑炭团’而已。此时人好利，可以派人向他提议在襄阳前线设立两国通商口岸。”而局势的发展也地区如同刘整所预料的那样，吕文德不仅同意了在襄阳、樊城等地设立“榷场”，更任由蒙古方面以防备盗贼为由在“榷场”周围设立土墙，而蒙古方面则更进一步通过违章搭建将通商口岸转变成逼近襄、樊的要塞。而此时的忽必烈可以说已经开始接受刘整灌输了放弃了四川一线，转向荆湖战区的战略思路。

而就在蒙古帝国逐渐转移其进攻轴线之时，宋理宗赵昀终于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历程。继任者自然是皇太子赵禥。而在南宋政府的权力分配方面，文官系统顶住了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的设想。在这一轮的权力争夺之中，虽然冲锋在前的是高呼“母后垂帘，岂是美事”的权参知政事（代理副总理）叶梦鼎，但是最终得益的还是长期以来和叶梦鼎政见不和的贾似道。对于这一点贾似道可以说是投桃报李，虽然叶梦鼎一再推辞自己“参知政事”职务的转正，但是最终还是勉强留任。从此南宋政府进入了宋度宗赵禥时代。而贾似道和这个年轻的皇帝以及皇太后谢道清的暗战此刻不过是刚刚开始。



宋度宗赵禥

在宋度宗赵禥手下工作，贾似道虽然获得了太师、魏国公的荣誉头衔，宋度宗赵禥对他的态度也异常的客气，但是贾似道此时的实际工作却是“总护山陵使”，负责宋理宗赵昀的陵墓修建工作。对于这样的投闲置散贾似道自然是不甘心。于是在宋理宗赵昀的陵墓修完之后，他便辞职回乡，同时又让自己的政治盟友——吕文德

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警报。无奈之下宋度宗赵禥和皇太后谢道清只能下诏邀请贾似道复出，但是对于授予自己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贾似道显得颇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节度使，粗人之极致耳！”于是在出任后不久便以“时日不利，亟命返之”的名义回归临安。不过贾似道这种“狼来了”的把戏，最终真的引来了蒙古帝国的狼群。公元1265年农历八月，蒙古悍将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从云贵高原转战到了河南平原，在两淮轻松击溃了南宋的多路野战部队。

不过此时的贾似道没有心思关心这些，他一再以辞职为筹码向宋度宗赵禥要权。甚至逼得宋度宗赵禥要起身拜留他。好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及时制止了这一闹剧，表示“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对此贾似道事后也觉得不妥，私下向江万里致谢说：“没有你，似道几乎成为千古罪人！”但是表达谢意和继续施压并不矛盾。既然从宋度宗赵禥方面打不开突破口，贾似道便转向朝野百官。贾似道在召集政务会议时，曾对在座的官员发出了“诸君不是我的提拔，安得至此”的警告。虽然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但是权礼部侍郎李伯玉却正面回答道：“我是殿试第二名，就算你不提拔，我也能到这个位置。”但是这样有胆色的人在南宋末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的大环境之下终究是少数。随着李伯玉以显文阁待制的身份被派到隆兴（今江西省南昌市）挂职锻炼去了。贾似道最终以特授平章军国重事重掌大权。

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重新登上权力巅峰的贾似道显得更为嚣张跋扈，他常年居住在自己西湖葛岭的府邸之内，所有的国家政务全都在自己家中签署。内阁俨然成了他的橡皮图章。因此当时南宋朝野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感叹。而每次处理完政务，贾似道就在自己家中的半闲亭打坐。对此不乏有附庸风雅者填了一首《唐多令》的词来献媚于这位权臣：“天上谪星班，青牛初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问，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但是在当时的南宋所面临的环境之下，贾似道很快便不能再这样“忙中偷闲”了。

公元1267年农历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再次举兵南下，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两淮，而是南宋荆湖军区前线的襄阳和樊城。在大肆劫掠之后，阿术在牛心岭会战中大败南宋荆湖军区的野战部队。面对困守襄阳的吕文焕，阿术立马于虎头山上，鞭指汉东白河口说：“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而此时在蒙古帝国的中枢，新任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向正在向忽必烈推销自己的襄阳战略。刘整曾在南宋荆湖军区名将孟珙的麾下工作过，对于襄阳的地形及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忽必烈最终采纳了他“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的建议，让刘整协助阿术对襄阳展开全面的围攻。而作为曾经转战过大理、安南的名将，阿术深知自己麾下蒙古骑兵的优点和短板，于是向忽必烈提出：“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请求增调史枢统帅汉族步兵进入战区。

而就在蒙古大军不断地在襄阳外围构筑据点，准备长期围困之时。襄阳前线也传来了胞弟吕文焕的告急蜡书。不过对于战局，吕文德却显得信心十足，因为在他看来，襄阳、樊城两大要塞经过南宋政府的多年经营，武器和粮食储备都足以支撑十年。而等到汉江水位上涨，南宋占据优势的水军便可以轻松地纵横往来。但是认识到南宋水上优势的并非只有吕文德。抵达襄阳前线的刘整首先便向阿术建议：“我军的优势是骑兵突击，但是在水上作战却往往不敌对手。要想征服南宋就一定要遏止他们的长处——打造舰队、训练水兵。”当然建立一支能战的水上劲旅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阿术和刘整首先在白河口及鹿门山一线建立夹江防线，随后又在汉江中打造水上要塞。初步遏制了南宋军队一直都仰仗的内河舰队。

面对蒙古军队的围困，南宋军队虽然不断地在内线发动反击，希望能拔除对方步步进逼的堡垒。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南宋朝野之上开始将打破僵局的希望寄托于更换前线指挥官之上，而最近在襄阳一线击退蒙古入侵的只有在“打算法”中已经因为挪用公款而被罢免的高达了。御史李旺将向贾似道提出由高达统领各路援襄军队的建议。贾似道的回答倒也坦诚：“我任用高达，那么吕家兄弟怎么办？”可见虽然吕文德在谢方叔案件上虽然对贾似道不够迎合，但是依旧是贾似道在军队中的主要政治盟友。对此李旺也只能感慨：“吕氏安，则赵氏危矣。”而吕文焕在襄阳一线也不断地制造胜利的假象，以阻止临安方面易将的企图。而事实上随着蒙古方面水上力量的日益强大，南宋方面由夏贵和范文虎指挥的内河舰队多次增援

襄阳的努力也惨遭失败。

“刘整如果真的敢胡来，我一定亲自前往襄阳。不过估计到时候他早就跑了。”曾经放出豪言的吕文德最终没有机会兑现他的承诺。1269年农历十二月，这位转战半生的悍将因为背疽发作而去世。据说吕文德死前曾一直以准许蒙古设立“通商口岸”（榷场）最终陷入对方的堡垒围困为憾事。在“误国家者我也”的感叹中饮恨而去。事实上即便没有前期的“榷场之谋”，凭借着野战中压倒性的骑兵优势，蒙古帝国在襄阳外围强行构筑野战工事尽管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南宋方面最终恐怕仍无力阻止襄阳的被围。吕文德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贾似道推行“打算法”的过程中没有保护任何人，从而直接导致了南宋政府的大批宿将含冤离去。

接替吕文德指挥南宋荆湖军区的是贾似道一直颇为欣赏的儒将李庭芝。但是他对李庭芝的信任终究比不上不通文墨却老于官场的吕文德。而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更对李庭芝颇为轻视。他利用自己和贾似道的关系大吹法螺，表示：“我率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就可以扫平敌军，没有必要由李庭芝来指挥，这样所有的功劳才能归到您的名下。”对于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贾似道竟信以为真。而依仗着自己岳父的权势。身为福州观察使的范文虎拥兵自重，每每携带美姬娇妾，在军中跑马击毽，恣情玩乐，视李庭芝的军令为儿戏。而除了范文虎之外，襄阳前线的另一位统军大员——湖北安抚使兼鄂州知府高达对李庭芝的命令也采取无视的态度。不过高达的矛头针对的不是李庭芝，而是迫于朝野舆论才不得不起用的贾似道。

襄阳前线将帅失和，举步维艰。而在临安城中，贾似道却采取严格的舆论管制、封锁消息。先是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王应麟因为提出：“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但是政府却依旧保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事几一失，岂能自安？”对于“为什么不转入战时体制”的质疑，贾似道的回答是：“你家里喊你回去丁忧！”王应麟回家之后虽然没有再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是由他编撰而成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却流传后世，成为此后中国儒家早期教育的重要必修科目。



另一个在这一段时间被贾似道罢免的官员是未来的南宋政治明星——文天祥。1270年文天祥因为在瑞州地区的政绩而被提升为军器监和崇政殿说书。文天祥的升迁虽然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努力。但是在贾似道看来却是自己的恩赐，因此当贾似道再度以辞职相要挟，文天祥在为宋度宗赵禥起草挽留诏书时不仅没有按照惯例大肆吹捧贾似道的功绩，反而指责自己的行为是“惜其身”、“违朕心”时，显得格外的恼火。于是这位当时仅三十七岁的文天祥被停职留薪，同样赶回家去了。

而随着襄阳前线的局势日益吃紧，贾似道不得不将手从朝堂伸向了宋度宗赵禥的后宫。因为有一天宋度宗赵禥竟然问贾似道：“襄阳是不是已经被围三年了？”尽管贾似道早已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本领，从容回答道：“蒙古军队早已撤走，陛下从哪里听到这个小道消息？”在得到了宋度宗赵禥是从宫女口中得知的回答之后。贾似道立即发动自己的情报网络，找到这个宫女，随便编了个理由处死，以儆效尤。不过不得不说贾似道也不容易，毕竟宋度宗赵禥以好色闻名，根据宫中旧例，如果宫妃在夜里奉召侍奉皇帝，次日早晨要到合门感谢皇帝的宠幸之恩，而宋度宗赵禥所保持的夜御三十人的记录，估计是有宋一朝空前绝后的。要在宋度宗赵禥所接触过的宫女中找出那个“真凶”，想来贾似道也的确是花了一番工夫的。

到了1272年，已经改称为元的蒙古帝国在两淮和四川地区连续发动进攻以牵制南宋兵力的同时，对襄阳和樊城的围困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了。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元帝国的前线指挥官们不断完善着对这两座要塞的封锁。而由吕文焕指挥的城内守军虽然粮食储备还有富余，但食盐、燃料以及布帛却已经严重不足。而此时连樊城守将张汉英派出潜伏于水草中随波逐流的“游泳健将”也被巡逻的元帝国士兵擒获，两座要塞的陷落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张汉英所写的求援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元帝国封锁圈的弱点——“鹿门山虽然在敌人的控制，但是仍能通过荆州、郢州进入战区。”而发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张汉英一个人。指挥整个荆湖战区的李庭芝此时已经将自己的指挥部前移到了郢州。而在南宋帝国的各路正规军都畏缩不前的情况之下，他所能派出的只有张顺、张贵所指挥的三千民兵。抱着必死的决心，这三千人乘坐着几乎没有防御设置的轻舟从汉江上游，发源于均山、房山的清泥河顺流而下，转战一百二十多华里，一路突破元帝国的水陆封锁线直达襄阳城下。尽管这次突袭成功令襄阳守军士气高涨，但是

在行动中担任断后任务的张顺也身中四枪六箭，英勇殉国。

我们不知道这位宋朝末年的张顺和《水浒传》中同名的梁山好汉有什么渊源。但是这位张顺显然没有“浪里白条”那么牛气的外号，他被人称为“竹园张”。想来也许是家中以竹园为产业或者只是替人看守竹园而已的普通人。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行为印证一个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永远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侥幸抵达襄阳的张贵却在两个月后的突围行动，由于南宋将领范文虎的约期不至和情报泄露，惨死在阿术和刘整的屠刀之下。

在自己苦心招募和训练的民兵部队全军覆没之后，李庭芝向南宋政府提出以卢龙军节度使和燕郡王的头衔招揽叛降蒙古的刘整。这样的虚衔显然是不足以说服此刻大权在握的刘整，如果李庭芝不是智商突然下降，那么这样的行动就只有一个解释：反间计。可惜的是尽管携带着告身、金印、牙符及李庭芝书信的僧人永宁成功在蒙古境内被擒获。忽必烈也派出大臣张易、姚枢调查此事。但是最终从襄阳前线赶回元帝国大都的刘整还是成功地洗清了自己，而当刘整返回襄阳前线之时，他带回的除了忽必烈的信任之外还有一件足以改变战局的新型武器——回回炮。

回回炮以其发明者——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都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而得名。这种武器原理上虽然依旧是采用杠杆原理抛射巨石。但是其射程和所发射的石弹的重量在当时却是空前的。当然诚如革命导师教育我们的那样“决定战争胜负的永远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事实上，在回回炮进入襄阳战场的前后，元帝国一线指挥官随世昌、张弘范的奋战已经打开了樊城的大门。而回回炮那击碎襄阳城头谯楼的炮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1273年农历二月，南宋荆西安抚副使吕文焕打开了襄阳的城内，长达近六年的襄阳、樊城战役最终以元帝国的胜利而告终。

而对于南宋长江中游防线的崩溃，执掌大权的贾似道却显得异常的无辜。他向宋度宗赵禥表示，这完全是由于对方一直不让他离开临安前往前线的缘故。如果自己可以亲自出马，局势应该“当不至此”。在襄阳陷落前期，贾似道的确一再上书表示愿意前往前线。但是同时他也利用自己的党羽在朝野放出贾似道离开临安“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的议论。而随着襄阳的易手，贾似道再度表示要前往第一线以便“上下驱驰，联络气势”。不过宋度宗赵禥似乎也习惯了对方的这种左右互搏之术，直接发嗲说：“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 于是贾似道顺理成章地在中书省设立南宋版的“军机处”——机速房，继续在临安遥控指挥全局战

事。

尽管在后世的文人笔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贾似道暴虐的传闻，如元代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便描述了一则贾似道出游西湖因为自己的侍女偷瞄美少年而大吃飞醋，将其斩首的故事。而《宋史》中更有贾似道将误闯自己府第的小妾之兄捆绑后投入火中的记录。不过公正地说贾似道有些时候还是宽容的，特别是对于自己政治上的盟友。襄阳失守之后，不仅一直以来在援襄作战中出工不出力的范文虎只是被降职而已，而吕文焕的哥哥吕文福，吕文德之子吕师夔更是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过作为南宋荆湖军区的主要领导李庭芝的处境却比较微妙了，他先是被贬至广南，随后又罢官于京口。接替李庭芝的是气壮斗牛的权兵部尚书汪立信。

在襄阳被围时期，汪立信便向贾似道提出过著名的《紫原三策》。虽然说名义上是“三策”，但是汪立信实际上只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立即抽调南宋全国的野战部队前往长江以北建立新的防线。二是迅速释放被拘押的元帝国郝经使团，以交纳岁币的方式换取两到三年的缓冲期，所谓的最后一策则是告诉贾似道如果前两点都办不到的话，那么南宋政府干脆投降算了。《紫原三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颇有气势，但实际却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毕竟南宋政府当时的国力根本不可能调集汪立信所谓“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的大军。而胜券在握的元帝国此刻正一心想要“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也根本不可能给你和谈的机会。倒是第三策似乎还有点施展空间。对此贾似道的回答是：“死瞎子，你还真敢吐槽啊！”



晚年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尽管汪立信向来被认为是南宋治军理民的一把好手。而其此前在潭州地方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在前沿要塞——樊城和襄阳相继失守的情况下，南宋一向重点经营的荆湖军区虽然不至于说是被打成了空壳，但至少也是门户大开。面对随时可能顺江而下的元帝国重兵集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后方的南宋沿江军区此刻也变成了前线。和贾似道私交不错的赵溍、陈奕分别以沿江制置使的身份兼任建康和黄州留守。而在两淮安抚制置使兼扬州知府印应雷暴病而亡的情况之下，在援襄战役中承担领导责任的李庭芝被重新起用。

应该说李庭芝在两淮军区特别是扬州地区有着极高的个人威望。在他经营两淮的过程中不仅兴办盐业、疏通河道。更大量地招募中原的难民充实军旅，最终组织一支两万人规模的“武锐军”驻守于扬州城外的平山堂要塞之中。而这一次回归扬州李庭芝更竭力网罗淮南的能人志士，时有“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的议论。而未来将最后背负南宋希望的陆秀夫正是以李庭芝机要秘书（机宜文字）的

身份崭露头角的。但是对于两淮军区在未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李庭芝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随着元帝国大军的顺江而下，两淮军区事实上同时承担两个方向的作战任务——坚守淮东的扬州以及与长江南线的部队协防、扼守庐州—芜湖一线。因此李庭芝特意向南宋政府提出分割两淮军区，自己主抓淮东——扬州一线的防御工作，而由夏贵统领淮西的部队在庐州一线待命。



击溃心理防线的襄阳回回炮

在日益感觉末日临头的危机意识之下，执掌南宋政府的贾似道也不得不起用大

批曾经与自己不和但确有才能的官吏。公元1273年农历十二月，在家赋闲三年之久的文天祥被重新起用为湖南提刑，其后不久又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返回自己的故乡，招募民兵准备加入最后的决战。在赴任的途中，文天祥特意去拜见了自己的再传恩师——江万里。面对不容乐观的局势，早已老迈的江万里不由感慨道："我已经老了，想来不久之后便要变天了。曾经阅人无数，但也只有你可以肩负拯救世道的重任，好好干吧！"师徒二人流着泪至此永别。

1274年农历七月，就在忽必烈下达对南宋的总攻命令后的一个月。年仅33岁的宋度宗赵禥由于长期纵欲终于死了。不过宋度宗赵禥声色犬马的生活还是有成果的，至少在后嗣方面他要比自己的两位膝下无子的前任——宋理宗赵昀和宋宁宗赵扩要强得多。这一优势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由于宋度宗赵禥有几个儿子，所以其他宗室基本无力窥探大宝，其次由于宋度宗赵禥死的时候本身就很年轻，因此他的继任者也就只能从那些几乎还不泯世事的孩童中选拔。贾似道主张由宋度宗赵禥的次子——年仅4岁的嘉国公赵显出来接任帝位，为此与朝野中力挺宋度宗赵禥长子——建国公赵昰的势力不免有些摩擦，不过客观地说贾似道这么做没什么错，因为按照中国皇家的继承法，从来都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何况建国公赵昰当时也不过6岁而已，同样对政局没什么帮助。而此时的贾似道虽然已经大权独揽，却已经没有理由再拒绝已经贵为太皇太后的谢道清出来垂帘听政了。

而此时已经65岁的谢道清显然要比宋度宗赵禥老辣得多，她出面代理宋恭帝赵显主持朝政所主持的第一件事务便是督促贾似道亲自统军迎战步步进逼的元帝国南征军团。而无奈之下不得不出马的贾似道利用自己的权力做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以自己的亲信——朱禩孙出任荆湖、四川两大军区司令兼任江陵知府，由当年在鄂州战役中保护自己脱险的"福将"孙虎臣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在筹集了大量军费的情况下，召集全国各地的野战部队前往临安勤王。

事实上元帝国的南征军团在夺取了樊城和襄阳之后，进展也不顺利。他们首先在汉水之南遭遇了由张世杰负责的南宋郢州要塞的顽强抵抗。郢州要塞扼守着汉江进入长江的水道，在南宋国防的战略地位上看不弱于樊城和襄阳。在屡攻不克、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身为元帝国南征军团总司令的伯颜果断采用阿术和吕文焕的战略，从汉江下流游黄家湾堡拖船入藤湖，再由藤湖进入汉水的迂回战略的话，而按照其他元帝国的将帅要求拔除郢州要塞，以巩固后勤补给线的设想，那么郢州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吞噬元帝国无数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襄樊。亲自与阿术率

领百余精锐骑兵断后的伯颜提醒了自古以来所有大兵团指挥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大军之出，岂为一城哉？"

在击溃了张世杰派出的两千骑兵之后，蒙古大军顺流而下，先后攻克了南宋荆湖军区纵深的防御据点——沙洋、新城（均在今湖北省钟祥市以南）、复州（近湖北省仙桃市），兵锋直抵长江。此时身为前线指挥官的阿术再三派人向伯颜询问渡江计划。但伯颜的态度却始终是淡定的"不答"。直到阿术亲自登问，伯颜才对他上了一堂保密课程："渡江计划是大事，只能你我二人知道。又怎么可以传到第三人的耳朵里呢？"而按照伯颜的计划，蒙古大军由蔡店（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以西）进逼汉阳。

此时南宋政府同样清楚长江已是足以抵御元帝国铁骑的最后屏障。因此在长江中游一线猬集了庞大的兵力。除了由权知汉阳军的王仪、权知鄂州张晏然以及都统王达分别守备汉阳、鄂州以及阳逻堡之外，更由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统帅内河舰队主力在长江上往来游弋，荆湖军区司令朱禩孙率游击军在长江南岸巡逻策应。可以说是构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江防体系。元帝国军队在鄂州、汉阳周围的柳子、鲁伏、新滩、沌口等地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拥有战场主动权的伯颜最终采取避实击虚的方式，在大举佯攻汉阳吸引南宋内河舰队主力回援的同时，乘隙夺取长江以北的沙芜口。沙芜口是发源于湖北大洪山麓的沦河（今湖北省境内的府河）入江口，随着元帝国的工兵凿开汉水堤坝，集结于汉水之上的元帝国舰队顺利地通过沦河进入长江。元宋双方内河舰队之间的决战由此正式展开。

在刘整等人多年苦心经营和训练之下，元帝国已经拥有了一支颇为精锐的内河舰队。为了制南宋的水上优势，刘整也算是煞费苦心，即便是在雨季无法在江面训练，他也要求部下们在营垒之中画地为甲板，演练攻防战术。而经过汉江流域的多年实战磨炼，此刻元帝国的内河舰队已经可以在长江这样开阔的水域与对手一决高下了。在第一轮的水上交锋中，夏贵的南宋水师不仅没有讨到便宜，还损失了包括夏贵之子夏松在内的大量有生力量。南宋在长江南岸的重要据点——阳逻堡直接暴露在元帝国的密布江面的元帝国舰队面前。

守备阳逻堡的南宋都统王达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和此战对于自己国家的意义。他对伯颜派来劝降的使节发出了"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尔"的怒吼。而在奋涌着乘坐着名为"白鹞子"的轻型舰艇强渡长江的敌人，王达更死守江岸

三天之久。最终逼迫伯颜再度派阿术逆流而上，在距离阳逻堡四十华里的青山矶乘雪夜偷渡，以期迂回阳逻堡的侧翼。但是在青山矶的江岸之上，阿术的突击队再度遭到了南宋荆鄂都统程鹏飞的水陆夹击。在一场恶战之中，不仅参战的史天泽之子——史格多处负伤，连阿术本人也在登陆过程中一度陷入混战之中而失去了指挥权。但随着桥头堡逐渐巩固，后续的蒙古骑兵进入战场，最终南宋军队的反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青山矶，阿术迅速建立了一座浮桥，接应元帝国的大军陆续渡江。听到敌军成功渡江的消息，夏贵顿时失去了再战的勇气，他率领着自己嫡系的三百艘战船脱离战场，南宋方面云集内河舰队也随即崩溃。地面战场之上死守阳逻堡的王达和麾下的八千将士以身殉国。朱禩孙统率的游击军也随即撤回江陵。失去了野战部队支援的汉阳和鄂州随即开城投降。面对溃逃的夏贵，伯颜并没有急于追击，他轻松地表示："我本来还想派人向南宋方面报告我军在阳逻堡的胜利，现在夏贵回去应该可以替我转达了吧！"而对于最终选择了投降的王仪、张晏然以及在鄂州放下武器的程鹏飞或许我们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毕竟诚如吕文焕在鄂州城下所说的那样"汝国所恃，江、淮而已。今大军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随着江防的崩溃，南宋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继续抵抗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增加不必要的伤亡而已。

而一心想要效仿北宋平定江南名将曹彬的伯颜也一再严肃部队纪律。而对于程鹏飞这样的南宋将领他也予以了重用，任命其为荆湖宣抚使。当然程鹏飞也必须承担其他一些义务，如北上黄州劝降自己的领导——沿江制置使陈奕。与程鹏飞这样曾在战场上拼杀过、负伤过最终迫于形势而放下武器的将领相比，陈奕的表现就多少有些无耻了，他在派人过江请降的同时还为自己要求官爵。对此伯颜一笑置之，说："你只要率众来归，还担心没有名爵吗？！"随即开出了沿江大都督的价码。而在陈奕的"榜样"之下，南宋沿江州郡无不望风而降。而其中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不仅拱手献上了江州城，更在款待伯颜的酒宴之上引出两个盛装的妙龄女子。据说这两个还不是寻常的烟花女子，算起来也是南宋皇家的宗室，不过吕师夔的"美意"却引来了伯颜的呵斥："吾奉天子命，兴仁义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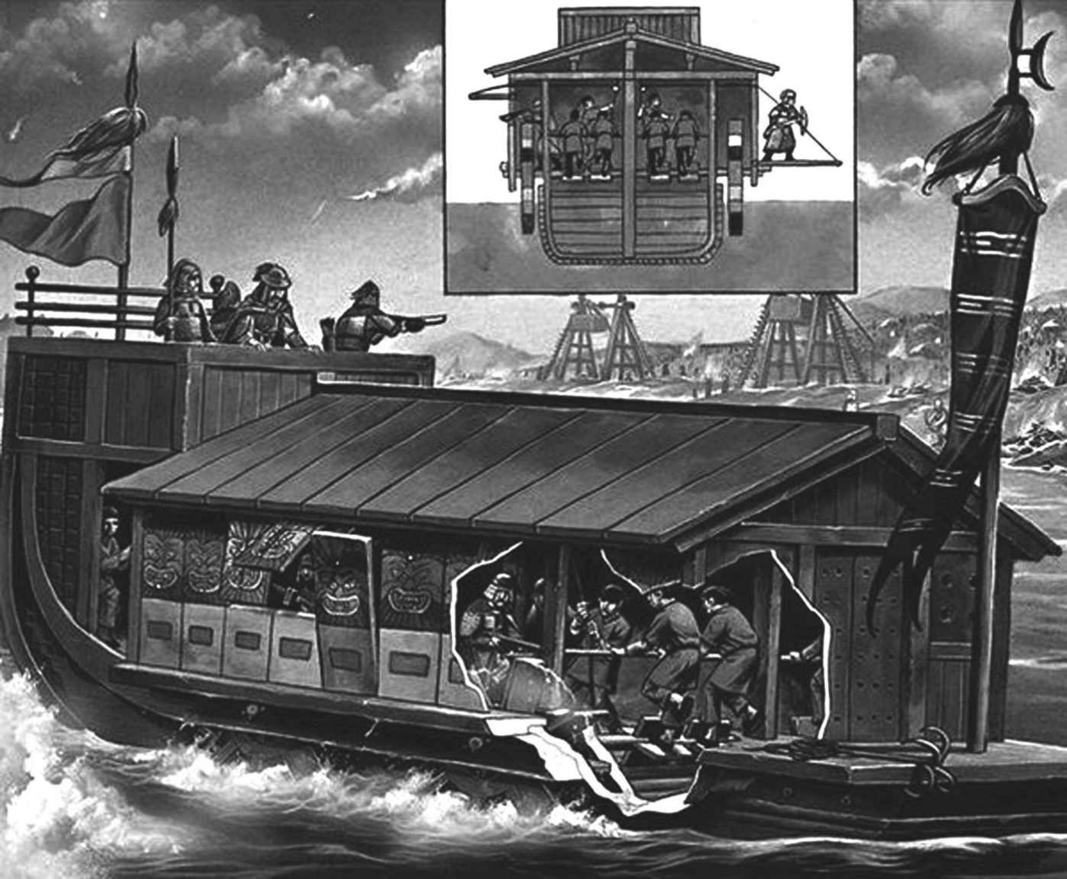
不过吕师夔毕竟是新近投降的南宋名人，又是吕文焕的侄子。因此呵斥归呵斥，在随后的生涯中，吕师夔不仅继续充当着平定江南的急先锋，在和平年代更过着钟鸣鼎食的逍遥日子。据说在死后留下了总计十四份，每份"金二万两、银十万

两、玉带十八条、玉器一百多件、布二十万匹”的丰厚遗产，以至于当时有人感慨：“以此观之，石崇又何足数也。”我们不去追究吕师夔这笔丰厚财产的来源，但无可否认的是吕氏家族从当年淮西安丰的一个普通樵夫能发展至此，可谓是“人生的赢家”。

而与吕文焕和吕师夔相比，另一位南宋降将刘整的日子却过得比较凄凉。在元帝国大举南下之前，刘整本来接受的任务是与吕文焕一起担任大军前锋，但是随即却被派往了次要战场——淮南，这个时候刘整虽然已经有些郁闷，但是依旧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向伯颜建议利用南宋军队的主力集中于长江中游一线的有利时机，由自己统率一路偏师从长江上游渡江直插临安。对于这一颇具风险的计划，伯颜不仅没有批准，更表示：“我受命南下只不过是阻击南宋对襄阳、樊城的反扑而已，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要渡江的授权。”根据此前伯颜和阿术之间关于渡江时间上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伯颜这或许不是有意欺骗，但至少也体现了伯颜对刘整的疏远。最终刘整只能指挥一支骑兵部队前往攻掠淮南，最终屯兵于长江北岸的无为军地区。当得到吕文焕在汉阳和鄂州一线取得的辉煌战果之时，刘整心中的不平衡无疑达到了顶峰。在“办实事永远没有好下场”的抱怨声中这位曾以“赛存孝”之名纵横战场多年的悍将最终病死军中。

在文天祥及后世许多史学家的眼中刘整有幸位居“亡宋贼臣”的榜首，但事实上纵观刘整的一生，他对南宋所造成的损害远比不上其政府内部的派系倾轧。向忽必烈提出攻取襄阳、然后顺江而下战略构想的并不只有刘整一个人，在他之前蒙古帝国的汉族大臣史天泽、郭侃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刘整的意见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对四川战区已经失去信心的忽必烈耳中。而训练水师尽管是刘整一手主抓的，但是从蒙宋此前的水上战役的记录来看，拥有国力和兵员优势的蒙元帝国要打造一支水上劲旅并不困难。而真正将刘整的内河舰队从汉江领域投入到长江战场之中终究还是伯颜和阿术。或许刘整对蒙元帝国最大的贡献是他病亡的消息被远在临安的贾似道误认为了转机，率领着自己庞大的机关系统和南宋从全国调集的十三万精锐从首都出发。

此时的贾似道已是一位62岁的老人，多年以来养尊处优、痴迷于斗蟋蟀和古玩的“半闲”生活早已令他不复当年指挥鄂州战役时的坚韧和果断。在效仿诸葛亮向宋恭帝赵显上了一道《出师表》之后，携带着众多辎重和金帛的野战部队终于缓慢地向前线进发着。而比武装部队先行一步的是曾与忽必烈签署“鄂州之盟”框架协议的职业外交官——宋京。不过这一次忽必烈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伯颜轻松地回答道：“我们的部队如果没有渡过长江，这个‘议和入贡’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商量，不过现在你们长江以南的地方官员都争着来投降，我也很难办啊！”随后表示宋京说了不算，还是请贾似道亲自前往磋商。贾似道自然没有勇气去以身试险，派了两个幕僚阮思聪、束元嘉代为前往。可惜这两位连宋京都不如，领受了命令之后始终不敢前往，只是准备好了小船以便随时跑路。



南宋主力战舰——车船

与无能的幕僚相比，贾似道长期以来信任的武将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安庆战备区司令范文虎不等元帝国的部队进入自己的防区，便派人前往江州请降。作为长江中下游的咽喉之地，兵不血刃便能收取安庆自然令伯颜很是兴奋，立即授予了范文虎两浙大都督的委任状。对于自己的这个女婿，贾似道似乎也不好意思太过指责，于是将责任推给了范文虎的直接领导——沿江制置使赵缙。而当贾似道麾下连绵百里的内河舰队一路磕磕绊绊地从新安进入长江领域，在芜湖与从前线撤回的夏贵所部会师之时，这位沙场老将也早无余勇可贾，面对贾似道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的小纸条，其寓意很明显——“日子到头了”。

在芜湖，贾似道还遇到了一位老熟人——此刻正以端明殿学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讨使的身份前往建康招募新兵的汪立信。虽然还不曾万里，但却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两个老头在各自的末日之旅中相逢显得格外感怀。贾似道拍着汪立信的背

说："端明、端明，我没有听你的意见，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啊！" 汪立信则回答说："平章、平章，今天我这个死瞎子还有一句话要说。"贾似道此时自然是从谏如流，可惜汪立信说的是："今江南无一寸赵家地，某去寻一片干净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最终汪立信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病死在了沦陷区之外的江北高邮。对于他的死，后人给出这样的评价："厚我藩垣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

和汪立信分别之后，贾似道似乎也被对方的壮烈所感动。终于拿出了拼死一战的勇气，任命孙虎臣率领七万精锐陆军在刚刚沦陷的池州下游构筑防线。夏贵指挥南宋内河舰队在长江中布阵，自己则坐镇鲁港。可惜的是贾似道的勇气无法感染所有人，作为南宋这支最后重兵集群的一线指挥官——孙虎臣和夏贵都属于那种只能打"顺风仗"的将领。随着元帝国远程攻击部队架设在长江两岸的回回炮（此刻已经改名为襄阳炮以增加威慑力）齐声轰鸣，孙虎臣首先跳上自己小妾的船开溜。夏贵也选择了不战而走，不过他比孙虎臣厚道一些，路过贾似道所乘坐的战舰还打了个招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在这一盆冷水的当头浇灌之下，贾似道顿时被打回了原形，发布了全军总撤退的命令。而在元帝国水师的全力追击之下，撤退随即演化成了崩溃。正是"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而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的珠金沙河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之上，孙虎臣和夏贵对芜湖战役却有另一番描述。孙虎臣哭着表示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部下不拼命。担任南宋陆军先锋的勇将姜才如果听到这话估计只有泪流满面了。也许是觉得孙虎臣的说法过于搞笑。夏贵在说出"吾尝血战当之矣"这句谎话时，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对于这两个一线指挥官足以防弹的脸皮，贾似道此时也不想再追究了，只是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夏贵认为部队士气低落，不堪再战，贾似道应该撤往李庭芝的防区，然后带着小皇帝效仿宋高宗赵构海上。而自己则准备"死守淮西"。尽管对夏贵的承诺不抱希望，但是前往扬州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贾似道和孙虎臣沿江而下。面对不断遭遇的溃兵，贾似道还颇有责任感的进行收容。并表示将增加军饷。但是这些莫名其妙被击溃的将士此刻却不知道哪来的幽默感，轻松回答："我们要军饷干什么？前两年的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一个怯懦的统帅是无法用钱买来部下的忠诚和效死的。就在贾似道向扬州"转进"的同时，在已经孤立于敌后的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唐震在野战部队全

部被抽调往前线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民兵登城守备。唐震的努力最终保证了负责南宋郢州要塞的张世杰可以顺利地从前线撤往大后方。而在途经饶州之时，张世杰同样去拜访了赋闲在家的江万里。与文天祥那样的坐而论道不同，张世杰和江万里是以酒会友。大醉之时张世杰问道："国事已经恶化到这样的情况了，您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江万里此时已经无力报国，只能表达了必死的决心。张世杰此时也坦诚："他家事世，杰尽知之。"自己的远方堂叔张柔虽然已经去世，但自己的堂兄弟张弘范却是元帝国军队中正在升起的新星，张世杰如果想要"转会"，并不比吕文焕、吕师夔困难。但是他最终却以杯中物为比喻。即便效忠南宋是自己命运赐予的苦酒甚至毒酒，他也将一饮而尽。张世杰的军团开赴临安之后，饶州最终在杀死元帝国劝降使者之后被攻陷，唐震和江万里也相继自杀。而由于饶州沦陷与张世杰所部通过当地的时间颇为接近，因此抵达临安的张世杰一度被误解为元帝国潜伏过来的"第五纵队"，无法获得信任。

抵达扬州的贾似道向南宋政府发出了迁都的倡议书。从客观上来说按照贾似道的计划，从海上迁都福建虽然同样有"我能往彼亦能往"的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南宋政府争取一定时间，以调整国防部署。但此时的南宋政府高层早已在芜湖惨败的消息中集体崩溃。左右丞相王爚、章鉴先后挂冠而去。而长期依附贾似道的枢密院知事陈宜中则忙于发动宫廷政变，在自己的府第之中谋杀了贾似道所任命的内卫部队司令（殿前指挥使）韩震，一度在临安城内引发内卫部队之间的火拼。

在南宋朝野之中陈宜中可以算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没有显赫的身世——自幼家贫如洗，但是却满腹经纶热衷于政治。他曾经以太学生的身份发动了对当权者丁大全的弹劾，一度被取消继续进修的资格、发配地方而被称为"六君子"。而在丁大全倒台之后，他却效忠于贾似道，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为贾似道打击政敌，推行国策。而随着前线战败的消息传来，第一个跳出来要求以误国之罪革除贾似道所有职务的也是陈宜中。好在对于权力斗争太皇太后谢道清比陈宜中要成熟和稳重得多，她以贾似道是三朝老臣，不能因为一次的战败就一撸到底为理由，只给予了对方降职处分。在先稳住对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政府机构。而贾似道在离任前期还为未来的和平作了最后的努力——他释放了被囚禁了十六年的元帝国外交使团中的郝经及其他幸存者，算是结束了元宋之间长期纠结的外交事件。虽然郝经此时的身体健康不容乐观，但是比起在他之后踏上南宋国土的很多后来者，他也许还是幸运的。

郝经的归国以及战场上的空前胜利，令远在上都的忽必烈嗅到了和平解决南宋问题的气息。因此在以张晏然为代表的南宋降臣们“止罪擅命之臣，保留南宋皇室优待”建议之下，忽必烈大度地表示：“即便是擅自拘留我方使节的贾似道我都不要求一定将他治罪，何况是南宋皇室。”这或许只是一个安抚南宋降臣们的姿态，但忽必烈毕竟在派出以礼部尚书廉希贤和工部侍郎严忠范为首的使节团的同时，也要求伯颜的大军也止步于建康地区（今江苏南京）。

从芜湖一路南下，伯颜的处境只能用“受降受到手发软”来形容。各地的南宋官员除了临江军（今江西新干县附近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抵抗之外，不是望风而逃，便是望风而降。其中比较倒霉的宁国知府赵与可，在众多逃亡官员之中他由于是南宋宗室而被作为典型，被判处“除名、勒停”的“双开”处分。而当忽必烈在要求伯颜停止前进的命令传来之时，伯颜正忙于处理占领区的地方事务。忽必烈似乎没有着重提起已经派出外交使团准备和谈的事宜，只是说考虑江南的酷暑即将到来，应该给予部队一段时间的休整，等到秋高气爽再继续前进。而伯颜则认为南宋背靠大海，此时大军驻守建康威逼临安等于是扼住了猎物的咽喉，只要稍加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忽必烈在战与和之间似乎也很随便，就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处理前线军事事务的自主权交给了伯颜。因此在公元1275年的农历三月，元帝国南征大军的主力虽然停止了继续前进，但是小股部队却依旧不断地在长江以南扩大占领区。



宋末代宰相陈宜中

而此时一心想要替代贾似道的陈宜中，日子也并不如自己此前想象的那样好过。在临安城内随着局面的逐渐稳定，此前逃走的左、右丞相王爚和章鉴又前后脚

地回来了。为了压制这两个政敌，陈宜中不得不发动新一轮针对贾似道及其党羽的弹劾风潮。这次政治运动的打击面极大，许多曾经依附于贾似道的南宋中央官员纷纷落马。而对于坐镇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等地的潜说友、吴益等人，陈宜中却因为提出弹劾的是王爚派系的人物，又主张网开一面。在南宋中央政府的权力斗争之中，大批骑墙派的官员逃出了戒严中的首都。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为能逃离是非之地，竟主动要求同僚弹劾自己，但是弹劾的报告还没送上去，他本人已经急着出城关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为此下诏痛斥廷臣出逃，仍无济于事。在王爚和陈宜中的角力之中，集结于临安的十多万勤王之师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只能在临安周遍建立其以独松关为中心的“首都防卫圈”，坐视着越来越多的国土沦丧。

独松关位于今天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东西有高山幽涧，南北有峡谷相通，是临安经广德通建康的咽喉要道。在南宋末日构筑的“首都防卫圈”之中，负责守备这座要塞的是浙西安抚司参议——张濡，之所以选择张濡来担当这一重任，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曾祖父——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为“中兴四将”的张俊关系密切。在张俊崭露头角的年代，南宋政府所要面对的国防形势比公元1275年更为糟糕，南下的金帝国大军不仅突破了长江防线，南宋方面连临安都没保住，而正是张俊在明州掩护宋高宗赵构成功地“转进”了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市），才保住了东南半壁。因此明州虽然最终还是沦陷于女真大军之手，但却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此那些对于张濡寄予希望的人或许都想让他重显其曾祖雄风。而张濡也没有令大家失望，很快成功伏击元帝国一支前锋部队的捷报便传到了临安。而被送往首都的俘虏之中更有一个身负重伤的将领，他的名字叫“廉希贤”。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那么张濡的功勋或许远远超过他的曾祖的所谓“明州大捷”，因为只是在一次战斗之中，他便一举击毙了元帝国的工部侍郎、俘虏了兵部尚书。但事实上张濡所伏击的并不是什么敌方先头部队，而是前来和谈的元帝国廉希贤使团。可以想见独松关的这次伏击战自然成为了元宋之间远比郝经被拘押更为严重的外交事件。

表面上看这次事件完全是张濡和他的部下过于冲动所导致的。但是联系到廉希贤和严忠范在元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以及伯颜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态度，我们却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严忠范是元帝国汉族世侯势力中山东严氏的掌门人，在平定李璮的叛乱中虽然出力颇多，但是最后却和史天泽一起将被俘的李璮擅自处死，从而引起了忽必烈的猜忌。事后严忠范虽然没有受到责难，但是却很快被调入

中枢。严氏在山东东平一带的地方势力被完全削夺。而廉希贤和他哥哥廉希宪一样都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但是正因为熟悉，他的哥哥廉希宪经常在忽必烈的面前摆出一副老资格。忽必烈甚至不得不提醒对方：“以前我是宗王，你指出我的过失，我可以包容。现在我是天子，你是臣下，你怎么还能那样直言无忌呢？”虽然廉希贤比他的哥哥要小心缜密，但是相信同样掌握着许多忽必烈崛起过程中原始积累的秘密。因此在平定阿里不哥的行动中，忽必烈已经有意指派他作为特使，前去冒险，而这一次只能说是故技重施了。

而在廉希贤抵达建康之后，伯颜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廉希贤向伯颜要求派卫队护送自己。但是伯颜却回答说：“使团是去谈判的，又不是去打仗的。带着人马过去只能引起对方的怀疑。”直到廉希贤反复要求之后，伯颜才勉强答应派出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部队护送。如此高规格的使节团要穿越当时仍在不断拉锯、犬牙交错的战线，却只有如此薄弱的护送力量，伯颜似乎有些过分吝啬了。而在决定派出使团之前，忽必烈的话中更早有玄机：“如果南宋政府继续执迷不悟，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变故。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天意吧！”

临安前线的对峙不等于整个战局的稳定。公元1275年的农历二三月之间南宋政府在长江中上游的控制地域呈现全线糜烂的局势。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

湖北安抚副使兼岳州知州的高世杰在调集上流诸军战舰一千六百艘、二万野战部队由荆江口（今湖南城陵矶）反击失败的情况，向元帝国投诚。长期与贾似道不和的名将高达，在岳州、沙市相继失守之后，也打开了江陵的城门。而南宋最后一任荆湖军区司令朱祼孙在吃了毒药都死不了的情况下，也“无奈”加入降将的行列，随后主动写信招降了鼎州、澧州、常德府、寿昌军等各地的部队。此后南宋荆、蜀地区再也无法联兵东下，忽必烈颇为得意地表示：“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

当然忽必烈是站在战略的角度看待问题。事实上在长江下游，伯颜的侧后依旧

有固守扬州的李庭芝以及视淮西为自己禁脔的夏贵。忽必烈有意让阿术集中兵力先解决两淮问题，但是元帝国的同签书枢密院事赵良弼却提出："宋重兵在扬州，宜以大军先捣钱唐。"从实际兵力上来讲，赵良弼的话并不确切。因为在临安地区南宋所云集的正规军及民兵有十七万之多，这些所谓勤王之师的士气却显然无法与屡斩劝降使节的李庭芝麾下的那些两淮精锐可比。

而不断从各地传来的不利消息也令忙于和王爚勾心斗角的陈宜中不得不放下自己主战派的空架子，由度支尚书吴浚派人向伯颜递交了自己所写的信函，表示："前杀廉希贤，乃边将所为，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虽然认为："彼为诈计，视我虚实耳。"但还是派出议事官秦中、张羽前往临安，希望可以督促南宋政府尽快投降。但这一支战地使团在途经平江地区的驿站时再度离奇被杀。不过如果说"独松关事件"背后可能有元帝国上层的阴谋成分的话，"平江驿亭事件"则更可能是南宋内部意见不统一和派系斗争所致。因为在这个期间张世杰正不断发动反击，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东北）、广德、溧阳、常州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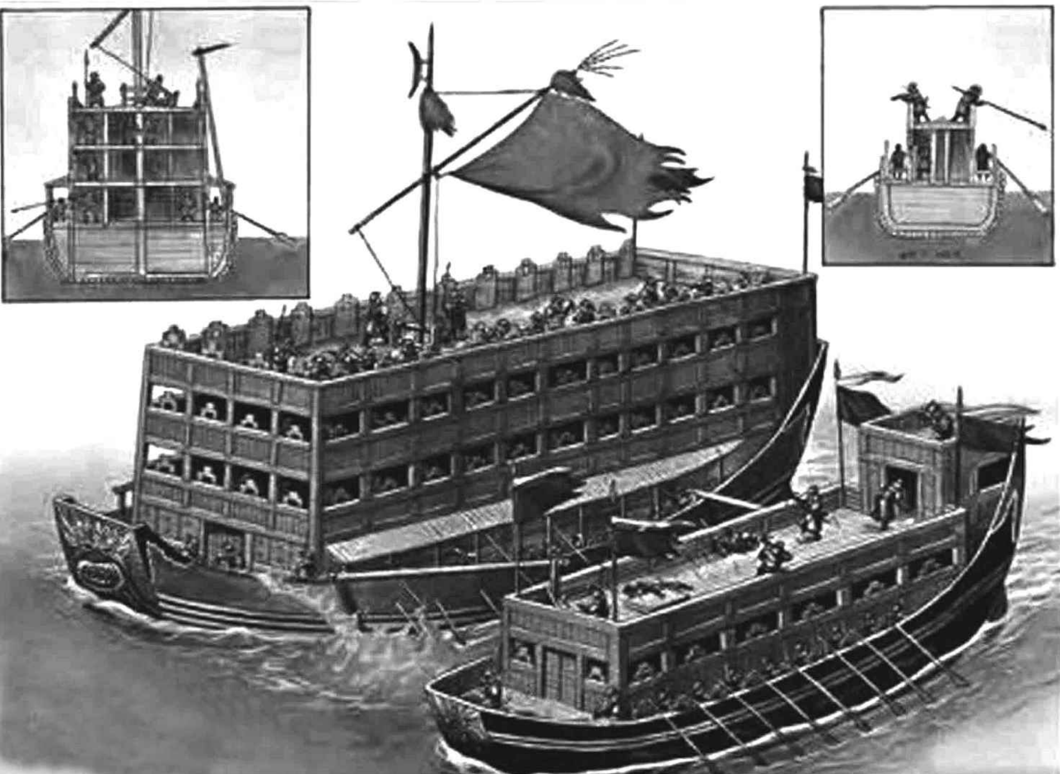
和谈希望渺茫，公元1275年农历六月初一又出现了可怕的日食现象。各种流言在临安四处传播。童谣传唱着："江南若破，百眼来过。"已经开始将元帝国的统帅伯颜征服江南视为必然。为了打破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南宋军队展开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张世杰和李庭芝商定，由扬州方面出兵瓜州（今江苏镇江北），张彦率领常州方面的地面部队向镇江挺进。而张世杰亲自率领南宋海军主力从杭州湾直趋金山（今江苏镇江东）。集中所有兵力与元军进行决战。

但是几路大军在协调上不免出现问题。伯颜虽然没有北上夺取扬州，但始终派遣阿术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在长江以北监视李庭芝的行动。曾被孙虎臣指责为"吾兵无一人用命者"的南宋陆军此后在都统姜才的指挥之下在三里沟、扬子桥与蒙古铁骑多次拼死鏖战。但最终未能突破阿术在扬子桥的防线。而身为殿前都指挥司的张彦更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在南宋南北两路的地面部队都无法按期抵达的情况下，阿术所要面对的就只有飘荡在长江入海口的张世杰一支孤军。

张世杰无疑是南宋覆灭过程抵抗最久也是最为坚决的一位将领。但是出身河北的他却并不是一个军事天才，而在指挥水战方面他甚至不如来自蒙古的阿术。面对顺流而下的元帝国内河舰队，张世杰打算发挥自己舰队多为大型航海船只的优势，以十艘为一个单位，连以铁索，全部下锚组成海上长城。虽然在当时《三国演义》

还没有问世，阿术可能也没有机会翻阅《三国志》这样的汉字史典。但看见这个阵势，老于军旅的阿术也本能地采取了诸葛亮和周瑜当年的策略——火攻。面对元军从江面和两岸射来的密集火箭，张世杰败得虽然没有曹操在赤壁那么惨，但焦山江面上也是溃不成军。南宋政府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攻随着那燃烧的船帆而归于灰飞烟灭。

而焦山战败的同一时间内，南宋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军区也在元帝国纽璘之子——也速答儿和汪良臣的攻势之下遭遇重创。曾经多次在西线发动反击，甚至一度收复成都的南宋嘉定安抚使昝万寿在困守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近半年之久后，最终选择了开城投降。消息传到临安，再度引发了本就处于惊恐之中的南宋政府内部的大地震。此刻已经被提升为平章军国重事的王爚以：“大敌押境，战线已经距离首都不远了，但是六月出师，却没有人肯出来指挥各路大军，我不在这个岗位上，又说不上话。还是请求辞职吧。”巧妙地将责任推诿给自己的政敌——都督诸路军马的陈宜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虽然没有批准王爚的辞职，但却也没有对陈宜中进行处罚。于是王爚又让自己的儿子煽动在临安的太学生们闹事，由太学生代表刘九皋上书指责陈宜中的过失数十条，其中有些固然是泛泛之论，如“集议而不行”本来就是南宋政府内部的通病。但是有些却的确是军事部署上的问题，由于对麾下将领的不信任，陈宜中曾对其指挥权进行过调换，以至于出现“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的现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陈宜中放弃，跑回福州老家去了。



遭遇火攻的南宋大型战舰

同时王爚还顺手摆了此刻仍在扬州的贾似道一道。以“既不死忠，又不成孝”的名义要求贾似道回家为他芜湖之战前病故的母亲守孝去。应该说贾似道政治上虽然失意，但是在扬州终究远离政治中枢，又有李庭芝的庇护，日子还不算难过。但是从扬州返回自己的故乡绍兴却无异于自投罗网，从此走上了人生的末路。

经过陈宜中和王爚等人的大清洗，贾似道昔日的党羽和幕僚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曾经征相依附的权贵此刻自然也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家乡绍兴的地方官员首先拒绝他入境，改徙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之后当地又出现了坚决要求驱逐他的大字报。太皇太后谢道清想把他派到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市）去，作为未来南宋迁都福建的储备干部，又遭到了政府内的理学大师翁合的反对，理由是建宁是朱熹的故乡，怎么能让这么一个臭名远闻的人去呢！无奈之下谢道清只能将贾似道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他以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安置。

安置不过是流放的代名词，在会稽县尉郑虎臣的押送之下，贾似道一路上受尽

了侮辱。当时正值江南地区的农历七八月的时节，在暴晒的艳阳之下，郑虎臣故意让轿夫拆掉轿子的顶盖，唱着杭州当地的各种讽刺贾似道的民谣。而在途中一座古庙里，郑虎臣发现了当年同样被贾似道流放循州的前丞相吴潜的题诗，于是故意问道："贾团练，吴丞相何以到此？"人生的境遇有时便是如此的巧合，后人对此特意填了一首《长相思》："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以证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在泉州洛阳桥上，贾似道又遇到了曾经因为反对"公田法"而被自己流放的太学生叶李。此刻已经被平反的叶李毕竟是个文人，他并没有趁机羞辱贾似道，相反还赋诗赠之。这或许令落魄的贾似道终于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叶李那么宽容。一路押送着贾似道的郑虎臣和他父亲郑埙都曾受到过贾似道的政治迫害。或许是在叶李的行为面前感到有些卑微，也可能是此前那些羞辱对方的手段都玩腻了。最终在福建漳州城南的木棉庵内，郑虎臣在多次督促贾似道自杀无果后，不得不亲自动手。而他在锤死这个已经62岁的老人时仍不忘抬出大义的名分："我为天下杀你，虽死何憾！"贾似道的一生颇为复杂，如果简单地以忠奸而论，未免失之片面。但是在他的后半生，贪恋权柄、痴迷享乐，以及所推行"公田法"对民间财富的疯狂掠夺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恰如后人所说的"襄阳累载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生灵。"

南宋灭亡的命运不会因为贾似道的死而出现转机。就在贾似道流放的路上，临安城内再次上演了大逆转。陈宜中的以退为进，最终迫使太皇太后谢道清逮捕了闹事的学生代表刘九皋，免除了王爚平章军国重事的权力。由于陈宜中此前撂挑子的做法，从福州赶回来时他的岗位已经由左丞相下降半级成为了右丞相，南宋政府内阁中名义一把手的位置让给了长期躲在家里请病假的留梦炎。而这个过程中一直被以"乌合之众"的名义排斥在"首都防卫圈外"的赣州知府文天祥所招募的民兵部队也终于得以抵达临安。

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始于公元1274年农历十二月太皇太后谢道清所颁布的《哀痛诏》，谢道清以"继君年幼，自己年迈，民生疾苦，国家艰危"号召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急王室之所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朝廷将不吝赏功赐爵。在这道诏书面前南宋许多封疆大吏和军事主官采取了围观的态度。其中身为福州观察使加保康军承宣使的吕文福更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以勤王的名义北上抵达饶州（今江

西省鄱阳市）之后杀死使者，然后横渡鄱阳湖到江州加入了自己侄子吕师夔的降将行列。而真正全力响应的只有文天祥和湖南提刑李芾等少数人。但是赣州毕竟不是前线重镇，当地几乎没有可以动员的驻军。因此文天祥所组织的民兵部队的主体是“郡中豪杰”以及“溪峒山蛮”。

这样一支由略带黑社会性质的地方帮会势力以及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战斗力自然无法与正规军相提并论，因此在组建之初就有人向文天祥泼冷水，认为“元帝国三路进军，已经攻破长江防线。你率领这些乌合之众前去迎战，等同于赶着羊群去斗猛虎。”但是文天祥有着自己的理由和坚持：“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应召，我万分悲痛。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希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众人力量，也许能保存社稷。”从树立一个榜样这一点来说，文天祥的确是做到了，不仅在南宋末年，在此后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他都被作为是“国家有难，冲锋在前”的旗帜而为世人景仰。

在文天祥“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的口号召唤之下，这支三万多人的民兵部队开始向临安进发。但是维持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即便是文天祥散尽家财也无法维系的。因此在乐安、宜黄一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军纪涣散的现象。不过比起夏贵在汉鄂会战后一路沿着长江放火的“焦土政策”来，文天祥的民兵对地方上的肆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一向妒忌文天祥的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等人却以此为理由阻止文天祥继续前进，导致这支部队被长期羁留在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区内。

也许是焦山战役之后，南宋政府手中可用的正规军已经枯竭，因此终于开始重视起文天祥的民兵来；也可能是文天祥本人的长期申辩终于得到了认可，总之在公元1275年农历八月，文天祥的民兵进军临安，他本人也随即被任命为兵部尚书。针对南宋政府此时还不切实际的大搞两淮军区长官大调换的举动，提出了建立长沙、隆兴、番阳和扬州四大军区的提案，采取多线袭扰的战略。可惜这一方案不仅没有被采纳，他本人也被从临安调到了前线的平江去作知府了。

而进入农历八月份以来，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长期按兵不动的元帝国南征兵团也在北上觐见忽必烈后返回前线的伯颜指挥下再度发起了新的攻势。南宋在长江南北的前沿据点——淮安、泰州、吕城（今江苏省丹阳市）相继失守，孙虎臣自杀、张彦被俘后投降。此时张世杰所收复的常州便成为南宋抵挡元帝国兵锋的最前沿。从公元1275年农历九月到农历十一月，在文天祥民兵部队的支援之下，常州阻

击了元帝国中路军长达三个月之久，最终逼迫伯颜撕去了南下以来伪善的假面具，又拿出蒙古大军纵横欧亚的种种残酷的攻坚手段，驱策无辜民众在火线上堆起土山，填埋战壕。以至于远在大都的元昭文馆大学士姚枢向忽必烈建议有必要重申“止杀之诏”以便江南的城市都效仿常州死战到底。

常州战场宛如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除了绞碎了城内的南宋守军之外，还大量消耗了文天祥由平江派出的增援部队。由尹玉、麻士龙等赣州豪杰所率领的民兵骨干在常州外围战场上的拼死血战与提军隔岸、不发一矢的南宋正规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此时南宋政府此前集结的勤王大军已经消耗殆尽。而在临安当地，陈宜中以十五岁以上男丁征召所谓“武定军”则大多是一些老弱病残，甚至还有身高不足四尺的半大孩子。

在常州沦陷之后，元帝国左翼军经溧阳、广德之后直扑南宋“首都防御圈”的门户——独松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独松关张濡率领几千精锐出关阻击元军，在野战中被对手的骑兵击溃，独松关随即失守。而由忽必烈的亲信、前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率领的元帝国海军以范文虎为先锋，由江阴入海一路招降了南宋方面由朱清、张瑄率领“海上游击军”，朱清、张瑄本是以崇明岛为基地的海盗集团首领，利用蒙元帝国和南宋政府都忙于地面战场的有利时机，两人“啸众剽劫”， 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逐渐形成了气候，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南至通海（今江苏南通一带），北至山东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尽管接受了南宋政府的招安，但是在董文炳的庞大舰队面前，这两位海盗头目还是顺理成章地“见风使舵”，加入了元帝国海军南下的行列。在朱清、张瑄的引导之下，董文炳的舰队顺利攻克了许浦（今江苏常熟东北）、澉浦（今浙江海宁东南）等沿海港口之后，控制了钱塘江入海口，基本断绝了南宋政府从海上南逃的生路。而对于朱清和张瑄而言，他们的这一次临阵倒戈不仅换来了元帝国代理管军千户的委任状，而且还打开了其家族未来富可敌国的大门。

面对逐渐形成合围之势的元帝国三路大军，再度宣布进入戒严状态的南宋首都临安也顺理成章地再度出现了官员逃亡潮，不过这一次左丞相留梦炎跑了，右丞相陈宜中还在。面对着一心准备保卫临安的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人，陈宜中却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式——和谈。作为陈宜中全权代表的柳岳很快抵达了位于无锡的伯颜前线指挥部。首先再度申明“廉尚书之死，非朝廷意”。不过这一次南宋政府连误杀都不承认，直接把张濡归入了强盗的行列。随后又开始以宋恭帝赵显的年龄来做文

章，请求元帝国能讲点人情“礼不伐丧”。最后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尔。”对于南宋使者这种无耻的说法，伯颜倒也很讲道理。他首先强调了南宋的战争责任：“汝国执戮我行人，故我兴师。”把自己放在正义一方，其次江南这片土地也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大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太祖赵匡胤是从南唐和吴越等割据政权手中夺过来的。你们是暴力夺取、我们是武装占领，没什么两样。最后你说宋恭帝赵显还是个小孩子，当年陈桥兵变宋帝国的建立不也是欺负人家柴氏的孤儿寡母吗？可见柳岳所说的不过是什么“礼不伐丧”的道理，而伯颜的回答则是弱肉强食的“天理”。这次所谓的和谈自然无疾而终。

但是至少伯颜没有像此前南宋各地的那些忠臣名将那样用使者的人头来传递信息，柳岳至少安全地回到了临安。元帝国关上了一道门却留给了一扇窗。南宋政府倒也心领神会，立即追封已死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任命吕文德的另一个儿子吕师孟为兵部侍郎，以此向元帝国表达一个信号：吕文焕不是降将，只不过担任贵军的导游而已。那么贵军自然也不是侵略者，而是来观光旅游的。随后在柳岳的带领之下，宗正少卿陆秀夫和吕师孟作为特使再度北上，不过此刻伯颜已经不在无锡了，既然南宋政府已经表示吕文焕是导游了，那么平江一线的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觉得自己作作地陪也没什么，直接开城迎接。

进入平江的伯颜显然没什么兴趣再和陆秀夫等人讲道理，只是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南宋政府开出的停火条件是称侄纳币，底线则是如果忽必烈觉得赵显做自己的侄子规格还太高的话，赵显不介意叫声忽爷爷。这种口头上的便宜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此伯颜直接回答“不许”。而在陈宜中和谢道清一番磋商之后，南宋政府决定在牺牲了宋恭帝赵显的“人格”之外再牺牲“国格”——南宋愿意成为元帝国的从属卫星国。客观地说，作为城下之盟的条件，南宋政府表面上很委屈，但实际上已经大占便宜。毕竟向忽必烈上尊号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对于南宋的经济条件而言也不算太高，但却可以保全整个江南的版图。但是主动提出约伯颜在长安镇（今杭州东北）相会的陈宜中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在伯颜抵达会晤地点之后，迟迟不敢动身，于是再度将南宋的政府信用透支为零。

于是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中旬，伯颜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由平江进一步推进到皋亭山上（今杭州东北，临平镇西南），元帝国大军的游击骑兵已经频繁出现了临安城北。此时身为南宋政府实际领导人的陈宜中完全乱了方寸。他先是再三请求迁

都，好不容易说服了谢道清。可到了晚上，却不见陈宜中来，谢道清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母仪天下的风度，大声吼道："我本不欲迁都，而大臣几次来请，我才答应，哪知竟是忽悠我的！"随后脱下簪珥，掷予地上，关上房门谁也不见。

事实上作为一个女人，谢道清还是有些规划的。她本人虽然不想离开临安，但却沉着地安排了宋室后嗣的转移。她册封了宋度宗赵禥的另两个儿子——吉王赵昰和信王赵昺分别为益王和广王，分别授予福州和泉州的行政权，也算是做了两手准备。不过文天祥与张世杰背城一战的计划却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因为交战双方都有人不希望看到承平已久的临安城沦为战场。

既然和谈不成，那么就直接投降吧！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十八日，谢道清派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向伯颜转交传国玉玺和降表，正式请求投降。伯颜表示接受，不过点名要那个曾经放过自己鸽子的陈宜中前来商议投降事宜。不过伯颜没有想到的是陈宜中不仅没有胆量来谈判，连出来投降的勇气都没有，直接从临安逃往自己的老家福州去了。同一时间离开临安的还有张世杰、刘师勇、陆秀夫等人统率的野战部队，毕竟南宋政府已经放弃了抵抗，他们继续留在临安也没有任何意义。而文天祥则接任陈宜中的岗位，但此时他名义上都督诸路军马，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有关以执政的名义前往与伯颜谈判有关投降的事宜而已。

事实证明，文天祥的口才要比先前的柳岳强太多了。他与伯颜在明因寺的会谈首先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点："贵国是把南宋当成一个政权来受降，还是准备将其彻底毁灭。"伯颜当然只能回答："我们是来受降的，不是来杀光你们的！"利用受降和毁灭是两个概念这一点，文天祥接下来大做文章："竟然是受降，那么请将部队撤退到平江或嘉兴一线，然后我们再讨论赔偿军费的问题。这样对大家都好。而如果你们是打算彻底毁灭我们的国家。那么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你们没有占领的地方还很多，大家摆开阵势继续打，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伯颜这个时候才回过味来，于是自动转换到军人模式，开始以武力相威胁，不过文天祥也是有备而来回答说："我是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



谢道清铜像

文天祥的软硬不吃令伯颜理屈词穷，只能将他软禁在军营里。与此同时派人以南宋政府的降表书写不规范为由进入临安，要求撤换文天祥。而此时元帝国大军虽然被禁止入城，但是由吕文焕、范文虎所率领的先头小分队已经穿过了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好投拜”字样的城区，进入皇宫大内，觐见太皇太后谢道清。吕文焕多少还有些良知，在写给太皇太后谢道清的谢表之中，他坦言：“兹衔北命，来抗南师，视以犬马，报以仇雠，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而谢道清则下诏临安城内的所有南宋正规军及民兵组织解除武装，并以“庶几生民、免遭荼毒”为理由并号召江南各地归附。由贾馀庆接替文天祥的工作，以祈请使的身份前往元帝国的首都。随后元帝国的部队陆续进城，接管库房、图书馆以及南宋各级官员的行政权力。

被软禁的文天祥直到伯颜邀请他出席招待贾馀庆等人的宴会之时才知道自己此前的努力都已经白费了。他在酒席宴间大骂贾馀庆卖国、伯颜失信。陪同的吕文焕想要劝说几句也被文天祥当作了发泄对象，文天祥认为：“吕氏家族父子兄弟都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全部都是叛逆。”吕文焕自知理亏选择了沉默，不过他的侄子吕师孟多少有些不知趣，竟反驳说：“丞相曾经上疏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现在为什么不杀了我呢？”于是引来文天祥更为严厉的呵斥：“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们投靠敌人，要杀我很容易，但却成全我当了大宋的忠臣，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一番言论引得元帝国的将帅也跟着喝彩，大呼：“骂得痛快！”

不过文天祥慷慨激昂的言辞并不能改变南宋灭亡的命运。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南宋新任左右丞相吴坚、贾馀庆率领的祈请使团从伯颜军营出发，文天祥被裹胁其中。此时临安城内的南宋政府彻底瘫痪。农历二月初一，伯颜开始命令征缴临安城内民间所藏匿的兵器。农历二月十二日，抽选南宋皇室后宫中的宫女、内侍、乐官诸色人等出城劳军。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宋恭帝赵显以下包括后妃、宗室亲王、各级官员以及太学、宗学生在内的数千人被命令北上大都。只有太皇太后谢道清因为生病暂时还留在空空荡荡的皇宫之中。南宋作为一个国家至此宣告灭亡。

尾声　镇压和怀柔

——元帝国对江南的控制和征服

南宋作为一个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是战争却并非就此结束。这一点很大程度在于忽必烈和伯颜过于轻视南宋的抵抗力量，将文天祥“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的话片面地理解为虚言恫吓，事实上南宋政府此前所表现出的低效率和怯懦固然足以令人鄙视，但并不代表着长江以南依旧拥有着顽强抵抗意志和战争潜力的汉族民众便可以轻易地被征服。而就在元帝国军队进入临安之前，驸马都尉杨镇就保护着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逃往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观望形势的发展。随着伯颜将临安城内的南宋皇室以及行政机关一锅端的送往大都，这个流亡政府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对于赵昰和赵昺的逃脱，伯颜还是十分警觉的，除了加强对南宋宗室的控制之外，立即派范文虎率军追击。但是范文虎只带回了一心求死的驸马都尉杨镇，杨淑妃的弟弟等人早就背着八岁的赵昰和六岁的赵昺躲进了浙西的群山之中，几天之后才会合了曾因为在常州会战中坐视文天祥的民兵苦战而不敢参战救援险些被军法处置的统制张全所率领的小股部队，一同逃往福州。

对于福州的南宋流亡政府，伯颜已经没有兴趣亲自统帅大军追击。他在临安处理善后事宜的同时，还颇有兴致地登狮子峰、观钱塘潮。据说元帝国南征军团曾在杭州湾沿岸驻防，临安当地的百姓纷纷寄希望于每个月农历十五到农历二十的大潮可以将侵略者一举吞没，可惜似乎连江潮而畏惧了敌人的兵锋，在1276年农历正月竟然推迟到来。

对于临安地区出降的南宋官吏，伯颜基本上都保全了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除了曾在独松关袭击元帝国外交使团的张濡。在由廉希贤之子亲自赶到临安处斩了张濡之后，元帝国还抄没了张濡家族的财产。但是有形的财富虽然可以用武力剥夺，可最终却无法能够消泯张濡后人的精神家园。张濡的孙子张炎虽然在元帝国的统治之下过着失意潦倒的生活，但却写下了无数华美而又凄凉的词作，被推许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

公元1276年农历三月，伯颜在留下阿喇罕、董文炳经略闽、浙，由宋都木达统率李恒、吕师夔等南宋降军从江西向福建进军之后，带着平定江南的荣耀开始回师大都。但是挡在他回家之路上的还有依旧在坚守的扬州。事实上扼守着长江下游交

通要道的李庭芝不仅在南宋政府宣布投降之后仍在坚持抵抗，还多次主动出击企图阻挠南宋方面由左、右丞相吴坚、贾馀庆率领的祈请使团北上。而一直被裹胁在祈请使团中的文天祥也正是在扬州地区的混战中成功脱逃。

但是此刻已经被南宋政府背弃的李庭芝对于拼死逃出的文天祥并不信任，他不仅授意接纳文天祥的部将真州安抚使苗再成将其秘密处决，在苗再成释放了文天祥之后，更在自己所控制的战区内全面通缉他。无奈之下，文天祥只能一路辗转，由通州入海，前往福州。在混乱的时局之下，我们不能说李庭芝当时略显粗暴的处理方法有什么不妥之处，何况如果文天祥当时顺利地进入扬州城内，那么等待他的可能是更早也更默默无闻的毁灭。

而随着由宋恭帝赵显手下的庞大的南宋宗室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迁徙队伍途径扬州北上，李庭芝的反击进入了最高潮。李庭芝和姜才流着泪号召将士们夺回自己的君王，四万大军呼号着冲入营垒，夜袭瓜洲。在李庭芝凛利的攻势之下，阿术不得不将宋恭帝赵显等人转移。而姜才更一路追击到蒲子市。或许在阿术等元帝国将帅的眼中看来，李庭芝和姜才的这种困兽之斗毫无意义，但正是那些在逆境之下永远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坚持的人们在推动着这个民族克除艰难，蓬勃向前。

而事实上在南宋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在元宋之间辽阔的战线上依旧上演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活剧。在四川战区，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的张珏以钓鱼城为中心，不断采取围魏救战的战略，频繁骚扰元帝国军队的后方，最终不仅逼迫元帝国放弃了对重庆的围困，更一举收复了泸州、涪州等地。

而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战场之上，曾誓言“以家许国”的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府李芾在坚守了九个月之后也终于迎来了自己所保卫城市的毁灭。而比他先走一步的是前来避难的衡州知府尹穀，当元帝国的精锐步兵在负伤后仍亲自督战的阿里海牙的带领下终于登上潭州城墙之时，尹穀正在家里为自己的两个儿子举行汉族特有的男丁成年仪式——冠礼。当时有人表示：“在这个时候还搞这套过于迂腐了。”但尹穀却从容应对道：“这是让我的儿子们可以更好地拜见自己的祖先。”随后举家自焚。而李芾随后也找到城中的刽子手，让他们将自己的全家一一处决。一时之间整个潭州城内竟出现了“城中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的景象。幸运的是尽管阿里海牙一度以屠城相威胁，但是在攻陷了潭州之后，最终在自己的部下的劝说之下，放下了屠刀。其中“抵挡我们的是南宋军队，老百姓有什么罪过。既然潭州已经被攻陷了，那么潭州城内的老百姓是元帝国的公民，杀光他们有什么意义”或许只是个说辞。真正

打动阿里海牙应该还是“还有很多城市没有归附，今天的屠杀只能换来明天更为坚决的抵抗”。而在潭州幸存者的孱弱的背影之下，南宋在湖南一线的其他城市也纷纷打开了城门。阿里海牙的大军第一步向南进发。

而就在阿里海牙的部队在广西境内进展顺利之时，却传来了南宋淮西军区的夏贵所部已经展开反击，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消息。担心自己的退路被切断的元帝国将帅们纷纷提出撤军的建议。只有广西宣慰使史格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作为史天泽之子，史格的大局观还是比较不错的，他首先认定夏贵的反击很可能是南宋流亡政府放出的假消息，而即便长江中下游的战局真的出现了逆转，此刻在广西境内的元帝国大军也可以取道云南撤回北方。在史格的坚持之下，元帝国在广西继续扩大着自己的占领区。

而事实上在长江下游战场上，依旧坐拥强大野战部队的南宋两淮宣抚使夏贵不仅没有发动任何的反击，相反第一时间响应了临安方面南宋政府的投降号召，还顺手诱杀了自己家丁出身、准备抵抗到底的部将洪福。在元帝国大军南下的过程中，据守淮西的夏贵始终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特意写信给伯颜表示：“贵国不用耗费国力来攻打我的边境要塞地区，只要南宋政府投降，我一定紧跟其后。”显然在夏贵的眼中，所谓国家和民族大义，远不如自己那一亩三分的地盘来得重要。纵观夏贵的一生，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无能的统帅，毕竟在他逐步升迁的过程中也曾多次转战于蒙宋战场之上，尽管是个只能打顺风仗的将领，但毕竟也曾获得过许多战术上的胜利。我们也不能指责他无耻的不忠，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都选择了投降，军人放下武器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既然在夏贵之后有吕师夔和范文虎这样突破了道德底线的同僚，而同时又有李庭芝那样高高在上的楷模，最终历史不得不选择了将他遗忘。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宋史》还是《元史》之中都无法找到夏贵的传记，只剩下一些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以及那首著名的讽刺诗：“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向我们描述着一个争议人物的一生。

夏贵以南宋淮西军区的大量有生力量向元帝国输诚，直接影响到了已经是仍在淮东一线坚持抵抗的李庭芝。而事实上随着元宋之间的战线由长江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一线，两淮的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日益加大，就在夏贵投降之前，真州安抚使苗再成还在向文天祥讲述自己两淮联手，海路进击镇江，完成对阿术在扬子桥一线的反包围的战略规划。而此时逃往福州的益王赵昰也在陈宜中等人的拥立之下，

在福州江心寺昔日宋高宗赵构南逃时留下的御座上以天下兵马都元帅的身份组织流亡政府，又随后击败了南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的叛军，可以说是在当时一片败亡的景象中为南宋点燃了一丝复兴的曙光。但是随着淮西的投降，令江西一线的元帝国逊都台和李恒所部再无后顾之忧，专心于赣闽前线。

元帝国大军南下之前，南宋在江西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曾经作过贾似道幕僚的黄万石。面对着元帝国由都元帅逊都台和右副都元帅李恒所率领的偏师，黄万石在转运判官刘槃打开了隆兴（近江西省南昌市）的城门之后，便轻易地放弃了“襟领江湖，控带闽粤”的重镇抚州，逃往了建昌　（今江西南城）。江西一线的南宋军队在主帅的模范带头作用之下，自然作鸟兽散，以至于都统密佑率领自己的部队展开反击之时，元帝国大军发出了“你是来投降的还是来打仗的”的疑问。但密佑的部队终究只是一支孤军，尽管奋勇突击但最终还是以全军覆没而告终。逊都台对被俘的密佑颇为客气，甚至还让他的儿子亲自前往劝降。但是对于自己的骨肉，密佑却全无舐犊之情，告诉对方：“以后你就是在街上讨饭，只要说是我的儿子，谁都会照顾你！”随后慷慨就义。

部下的刚烈并不能影响上司将无耻进行到底。随着南宋政府在临安宣布投降，逃入福建境内的黄万石不仅打算转投元帝国的麾下，更准备以自己曾经担任过福建漕使的身份，将整个福建作为自己在元帝国继续升迁的垫脚石，不过黄万石似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随着南宋福州流亡政府的建立，他的公开投敌很快便将他由前来避难的政府官员转成化为了全民公敌，在各地依旧效忠于南宋的官吏抵制和打击之下，黄万石从江西带入福建的政府机关和军事力量迅速瓦解，其中许多人加入了福州流亡政府的抗元大军。

公元1276年农历五月，随着南宋政府的祈请使团和北上的皇室宗亲先后抵达元帝国的大都，忽必烈在太庙正式宣布在南宋地区的军事行动以胜利而告终。忽必烈对投降的南宋皇室宗亲并没有太多的刁难，宋恭帝赵显、太皇太后谢道清等人不仅保全了首级还获得了瀛国公、寿春郡夫人之类的虚衔。不过南宋政府的祈请使团成员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一路北上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前右丞相贾馀庆首先病死，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后，前左丞相吴坚终于得到了忽必烈的召见，而忽必烈对他显然没什么兴趣，只是随口问了句：“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能当丞相？” 吴坚只能坦诚地回答道：“陈宜中他们跑得太快，我年纪大了没跟上，所以被强加上这个头衔，其实我作丞相也没多久，年纪又这么大了，请您放我回去吧！”　吴坚一生

胆小怕事，他年轻之时便曾写过一首表达自己单善其身的诗作：“家由余忠上所知，殊恩岂独眷中闺。巍冠已许挂神武，散笔不妨窈翠微。余事只消寻炼鼎，闲居恰好试新衣。更宜筑屋云烟上，门外莫关谁是非。”可惜最终也没能逃过客死他乡的命运，最终被羁留大都，不久也因病去世。

宋恭帝赵显成为元帝国的瀛国公，他的哥哥益王赵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南宋皇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公元1276年农历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在福州正式登基为宋端宗。如果仅从政府班底来看，福州流亡政府基本集中了南宋在临安时的大部分名臣良将——陈宜中依旧是左丞相兼枢密使，右丞相之职先是给了仍在扬州的李庭芝，随后又给了一路辗转而来的文天祥。从浙江引兵南下的张世杰被提升枢密副使，陆秀夫作为高级顾问和皇帝的私人幕僚——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苏东坡的第八传孙苏刘义被任命为内卫部队总司令——主管殿前司。连当年和贾似道政见不和而隐居的叶梦鼎都被请了出来，可惜叶老从宁海坐船南下抵达永嘉(温州)便由于道路堵塞而不能前进。于是只能向南恸哭，两年后病死家中。

除了有一个貌似强大的内阁之外，南宋福州流亡政府还第一时间任命了几位前线指挥官——曾经轻易放弃江防重镇的赵溍被任命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闽北的邵武。而曾经和文天祥同科进士的谢枋得则作为江东制置使，指挥饶州一线的军事行动。谢枋得在南宋政府长期负责教育工作，但事实早已证明他对军事领域也颇有兴趣。公元1258年当南宋政府处于蒙哥大举南侵的危机之中时，谢枋得便曾以礼兵部架阁的身份，在饶、信、抚三州一带变卖家产招募民兵，为此还差点因为贾似道的“打算法”而吃官司。随后谢枋得在建康当考官时，便以贾似道政事为题提出“兵必至，国必亡”的论调，一度被流放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从此一度淡出政治中心，直到公元1275年才又重新出山以江西招谕使的身份在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地区组织了一支民兵部队。

不过谢枋得终究是个文人，在他身上既有士大夫的忠贞和刚烈但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的天真，在元帝国大军南下的过程中他便竭力主张重用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夔，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担保。但是最终当吕师夔率领大军抵达信州城下，面对高呼“谢提刑来了”的谢枋得和他的民兵部队之时，对方的回答却是密集的箭雨。在丢失了信州之后，谢枋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光杆司令了。南宋福州流亡政府仍指望他能收复失地，只能说是比谢枋得更为天真。

几位前线指挥官不给力，而在福州城内也同样是钩心斗角，作为保护着赵昰和

赵昺安全抵达福州的有功之臣。杨亮节一心想以国舅的身份“居中秉权”，而身为宗室的秀王赵与择则显然认为杨亮节抢了自己的位子，于是口角不断。而曾在临安城下准备以死殉国的张世杰、陆秀夫对于几次三番跑路的“长腿丞相”陈宜中也没什么好感，在处理政务中更是摩擦连连。陈宜中起初一度对陆秀夫伸出橄榄枝，以对方“常在兵中，知军务”为理由委以重任，但很快两人便因为政见不和而决裂，陈宜中甚至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流放。最终还是张世杰挺身而出表示：“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南宋的宗室权贵和文武大员们还不忘争权夺利，也难怪抵达福州的文天祥一度不肯接受对自己的任命，随后又被陈宜中派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都督府，被排除在中央政府之外。

而就在南宋福州流亡政府忙于内部争斗之际，坚守扬州的李庭芝终于由于弹尽粮绝而不得不选择突围。在拒绝了忽必烈对他的赦免之后，李庭芝与姜才率领七千精锐部队向泰州方向撤退，准备由南通地区入海前往福州与南宋流亡政府会合。而在李庭芝走后，制置副使朱焕立即打开了扬州城门，迎接在城下屯兵已久的阿术。随后在泰州地区，李庭芝再度被围。最终看不到希望的士兵们打开了城门，李庭芝与姜才成为阿术的阶下囚。对于依旧不肯投降的两人，阿术一度也犹豫不决，但是最终却在吕文焕“扬州战役我军伤亡惨重，这一切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留着干什么”的劝说之下，举起了屠刀。我们不知道吕文焕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什么心理，但至少客观上他成全了李庭芝和姜才的求死之心，也将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历史正面的一页之上。而随后坚守真州的安抚使苗再成也在城破后的巷战中战死了。



作为前线要塞的扬州失守了，而一度被福州流亡政府视为大后方的广州也因为广东经略使徐直谅的摇摆不定而一度沦陷。在接到临安方面的投降诏书之后，徐直谅先是派部将梁雄飞向元帝国请降，随后却又在得到了福州流亡政府建立的消息之后，又派兵阻止梁雄飞南下。在由广东当地民兵组成的摧锋军战败之后，徐直谅弃城而逃。被元帝国任命为招讨使的梁雄飞轻松地拿下了这座岭南重镇。好在梁雄飞手中的兵力不多，潮州、惠州等地又在当地民兵首领熊飞指挥之下奋起反攻，最终才帮助南下的赵溍收复了广州城。

广东的局势虽然暂时稳定了下来，但是南宋广西重镇静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却在南下的阿里海牙大军的攻势之下摇摇欲坠。在采取迂回战术攻破了号称楚粤咽喉的严关（今广西兴安西南）之后，阿里海牙的大军包围了由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府马暨驻守的静江城。在长达三个月的攻防战中，元帝国大军充分发挥自身的工兵优势，筑堰阻断了大阳、小溶二江，遏其上流；又决开东南坝水淹静江，最终才攻破外城。马暨在率死士巷战中不幸被俘，随后被杀红了眼的阿里海牙处死。在潭州就叫嚣着要屠城的阿里海牙，此刻终于兽性大发，他以静江 “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为由纵兵烧杀。

而几乎就在静江陷落的同时，试图收复江西和浙江的南宋福州流亡政府，最终在兜港、温州连续遭遇重创。在元帝国军队攻破建宁府、邵武军，威胁福州的情况下，张世杰和陈宜中决定放弃临时首都，将近十八万军队和三十万难民全部转移到海上，承载着近五十万人的庞大船队宛如一个浮动的国家蹒跚着向南转移，史称“海上行朝”。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曾经主张在临安背城一战的张世杰此刻面对着再度南下的元帝国军队失去了往昔的勇气。而这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上大迁徙却注定是一次悲剧之旅。尽管由于大雾，南宋流亡政府所组织的庞大船队在海上遭遇了元帝国海军的拦截，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可是在抵达南宋著名的海上贸易枢纽泉州之后，张世杰却和当地的汉化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发生了冲突。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浓郁的重商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认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在《古兰经》中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公元13世纪正是阿拉伯人垄断

东、西方贸易的黄金时代。他们利用常年积累下来的印度洋风向和水文资料，往来于亚、欧、非三大陆之间，贩运着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一切利润丰厚的货物，而蒲寿庚的家族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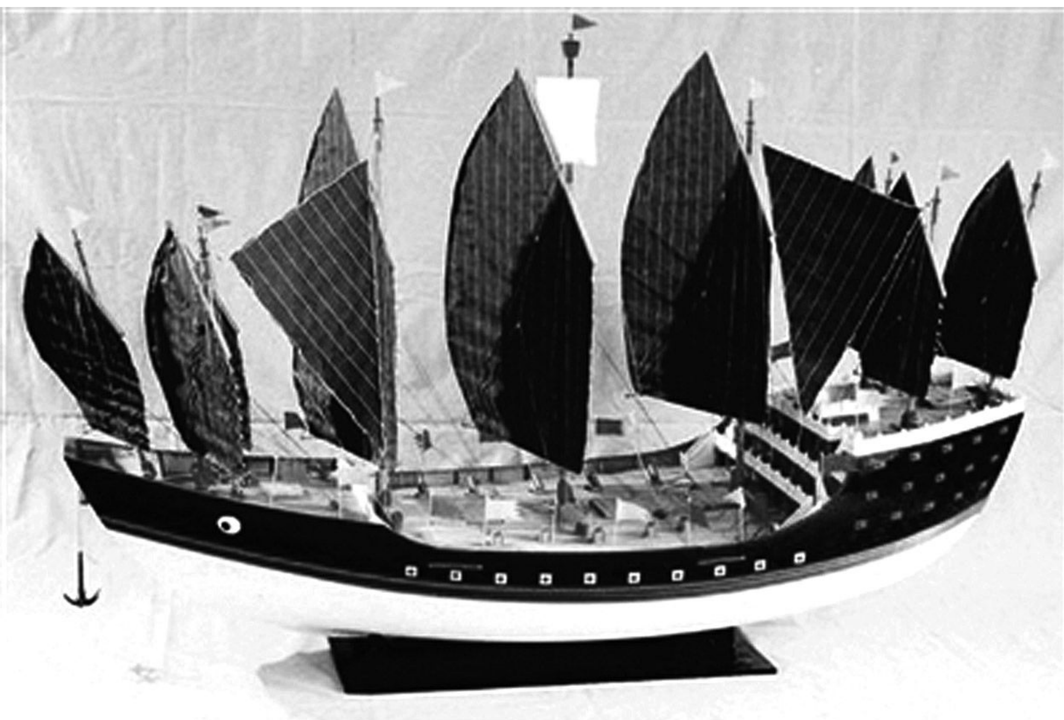
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蒲氏家族便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占城（今越南中部），随后又抵达了中国的广州，开始经营海上运输事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不过随着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崛起，蒲氏家族在广州的经营业绩开始明显下滑，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即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重操旧业，很快便再度崛起，并在南宋政府内争取到了安溪县主簿的职位，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却可以说是蒲氏家族由单纯的从事商业向染指地方行政权力的开端。

和很多肥皂剧的情节一样，随着世代从商的蒲氏家族在泉州地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脉之后，蒲开宗的子嗣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有艺术气质、“厌铜臭而慕瓢饮”的蒲寿晟，也出现了好勇斗狠、豪侠无赖的蒲寿庚。而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之下，继承蒲开宗海上贸易事业和政府关系的蒲氏兄弟最终在长于商业运作却往往又能惯于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的蒲寿庚经营之下，垄断了南宋在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以此积累了空前巨大的财富和地方势力。

繁忙的海上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自然引来的海盗的窥视，而随着南宋政府的主要精力转投到与元帝国的战争之中，公元1274年，海盗对泉州港的袭击也达到了高潮。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以蒲氏兄弟为首的泉州商贾不得不奋起自保，而正是因为剿灭海盗的功勋，蒲寿庚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他被此刻已经焦头烂额的南宋政府任命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此前蒲氏兄弟在南宋政府内也曾先后担任过官职，蒲寿晟曾被任命为广东梅州的知府，不过他自命清高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在南宋末年的官场发展，因此很快便退隐家乡，以与当时的儒学大师洪天锡等交游为乐。而蒲寿庚虽然担任过相当于泉州海关关长的提举泉州舶司的职位，但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也不过作了两年多而已。公元1274年本身便拥有庞大民间力量的蒲寿庚终于登上了地方军政长官的宝座。

应该说相对于蒲寿庚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南宋政府的这一任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稳定当地的局势更有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元帝国的入侵。但是南宋政府高层纷乱的局势却最终使得蒲寿庚所拥有的权力失去了驾驭。公元1275

年农历三月，利用贾似道在芜湖前线的溃败，陈宜中在临安发动政变，私自处决了内务部队指挥官殿前指挥使韩震，这一事件虽然在临安城内只引起了小规模的骚乱，但是在泉州地区却引发了长期的军事冲突。作为殿前指挥使韩震直接领导的野战部队，驻守浙江、福建一线的南宋左翼军在得到了指挥官被杀的消息之后，在统领夏璟的统帅之下已经站到了陈宜中所领导的南宋政府的对立面上，在得到了蒲寿庚的支持后，左翼军在瑞安、温陵、三阳等地连续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宋政府的其他地方部队，俨然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南宋大型海船模型

不过无论是蒲寿庚还是夏璟，他们此时所迫切希望的只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渴望获得泉州地区强大海上力量的元帝国派来的招降使节面前，蒲寿庚还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对南宋政府的忠诚。而在南宋临安政府投降之后，以宋端宗赵昰为首的流亡政府也投桃报李，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双方之间尽管彼此并不信任，但仍未撕破那暧昧的面纱。不过随着张世

杰和陈宜中放弃福州，率船队大举南下，双方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

起初面对停泊在后渚港的南宋皇家舰队，蒲寿庚还是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他主动上船觐见了宋端宗赵昰，并向对方提出了在泉州建立临时首都的设想。作为已经在泉州拥有丰厚家底的商人，蒲寿庚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考量的。毕竟数十万南宋难民和军队的抵达将强化泉州商业之都的地位，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将居心叵测的元帝国大军挡在泉州地区之外。但是由于对蒲寿庚的不信任以及对元帝国追击的担忧，张世杰明确反对南宋流亡政府在泉州长期逗留，同时还强行征用了蒲氏家族的海船两千多艘以及大量随船货物，在战争期间征用民间财物，本来就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张世杰面对的不是一个只会忍气吞声的普通商人，可是一个官商合一、手握重兵的地方豪杰。

在张世杰没有采纳部下扣押蒲寿庚的建议之后，蒲寿庚返回泉州第一时间关闭了城门，然后指使自己的儿子蒲师文动员自己的家族势力大肆捕杀在泉州的南宋皇家宗室以及前期进城的南宋流亡政府军队，在泉州城内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张世杰却由于担心长期顿兵泉州会遭到元帝国追兵的合围，仓促地带着强行征用的船只和货物逃往广东。而在赵溍再一次上演弃城而走的“传统节目”的情况下，南宋流亡政府未能抵达广州，只能龟缩于潮州、惠州一带。彻底和南宋政府决裂的蒲寿庚也随即投向了元帝国的怀抱，他和泉州知府、与文天祥同榜进士的田真子，左翼军统领夏璟一同向南下的元帝国将领董文炳递交降书，而元帝国显然比南宋的张世杰更懂得尊重地方势力，随即便授予蒲寿庚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等一系列官爵，蒲氏家族在泉州一带的权力不仅没有得到削弱，相反还进一步强化。

张世杰和陈宜中轻易地放弃了福州及在泉州激变了本来就对南宋流亡政府若即若离的蒲寿庚，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正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转战的文天祥。由于受到了陈宜中的排挤，离开福州在南剑州开设幕府的文天祥事实上一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而公元1276年农历十月，文天祥出兵汀州（今福建长汀）失利之后，他的根据地南剑州又叛降元帝国。在退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文天祥和“海上行朝”的南宋流亡政府失去了联系，只能从陆路退却到广东梅州。才与从海路抵达潮州、惠州一带的流亡政府算是再度会合。

而随着公元1277年农历四月南宋流亡政府在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建立临时首都，随即再度收复广州。流亡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再度发动反攻，可

是在反攻的方向问题上文天祥和张世杰却发生了分歧，文天祥主张先图江西，再与江淮、浙东、闽广连成一片，支撑南宋东南半壁河山。而张世杰则打算联合自己曾经安抚过的福建西南陈吊眼率领的畲族武装，集中兵力从海上围攻泉州。在双方各持己见的情况，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的方式，同时向江西和泉州两路进军。

1276年到公元1277年之间，元帝国在继续追击南宋流亡政府的同时还要同时面对西北的海都叛乱和与缅甸之间的战争，如果文天祥和张世杰可以同心协力的话，那么未必不能扭转长期以来的不利局面。但事实是公元1277年农历五月文天祥由从梅州出南岭，进入江西，尽管连续取得云都（今江西于都）大捷，克复兴国临（今临江）、洪（今南昌）、袁（今宜春）、瑞（今高安）诸州纷纷响应，一时有包举江西之势。但是随着农历八月元帝国江西宣慰使李恒着手组织反击，文天祥收复江西的努力最终随着他在兴国的大本营宝石寨被元帝国的奇袭部队攻破而告终。文天祥在兴国的惨败固然有其自身防备松懈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抽调了赵时赏等人所率领的大量野战部队围攻赣州的情况下，缺乏后续增援的文天祥根本无力控制整个江西战区。此后文天祥一败方石岭，再败空坑，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抗元大军几乎伤亡殆尽。文天祥本人也是在部下赵时赏冒名代死的情况下才侥幸逃生。

赵时赏算是南宋的皇室宗亲，不过地位并不显赫。公元1265年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了一个旌德知县这样的地方官员。应该说并不属于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不过在南宋的名将大臣、权贵亲王纷纷北降的大环境之下，他却毅然效忠于南宋流亡政府，好不容易被提升为邵武卫戍区司令却又被元帝国的大军打了出去，结果以弃城的罪名又被罢免了。但是在加入文天祥的幕府之后，赵时赏却频繁地参与军事，收复宁都、围攻赣州，每每都以偏师独当一面。但是这并意味着赵时赏天生便是一个儒将，而他的同僚友军在行进的过程中满载着辎重，将帅们身边还带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诚如赵时赏所说：“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在空坑战役之中南宋军队兵败如山倒，连文天祥的家属都成了元帝国的俘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望的赵时赏故意高调地宣布自己就是“文丞相”，被俘之后更对其他沦为阶下囚的同僚表示出轻鄙的神情：“你们抓这些人做什么！”最终保护了许多人。而自己在身份暴露之后，慷慨赴义。

文天祥在江西最艰难的时期，张世杰正在组织对泉州的全面围攻，从战略角度来看夺取泉州将有力地增强南宋流亡政府的海上作战能力，同时遏制元帝国海军的

南下，而从经济角度考量，南宋流亡政府迫切同样需要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当然张世杰和南宋宗室向蒲寿庚的个人仇恨也是这次泉州之役的出发点之一。

尽管张世杰多方调集部队，陈吊眼与许夫人所率领各寨畲族武装也群起呼应，甚至连蒲田南少林也派出数千僧兵助战，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商人的蒲寿庚也是拼尽了全力。在向元帝国求援的同时，他不惜大撒金钱，贿赂前来参战的畲族武装，令对方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泉州战役前后历时三个月之久，其中对泉州城防的围攻便长达70多天尽管在那70多天中蒲寿庚“晨夜血战”，泉州城中更“死者万计”，但是最终他以这些为代价战胜了张世杰，保住自己家族在泉州地区的势力范围。而此后蒲氏家族在将继续他们奢华而专横的生活，直到元帝国轰然崩塌。

最终没有全力配合文天祥收复江西的张世杰不得不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在击溃了文天祥的军队之后，元帝国李恒、吕师夔的军队从梅岭向广东扑来，在长时间围攻泉州无果的情况之下。张世杰以及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放弃最后一座所控制的大型城市广州，再次逃入大海，转移到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井澳（今广东中山市南海中大横琴岛下）一带继续抵抗。而在转战的过程之中，宋端宗赵昰不幸落水，随后在惊病交加之中去世。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又拥立年仅6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此时已经无心继续这种颠沛流离生活的陈宜中以联络外援为理由独自逃往占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南宋流亡政府的士气低落到了谷底，即便是“正笏立如治朝”的陆秀夫也时常“凄然泣下”，甚至在用来拭泪的朝衣袖子都湿了。不过哭归哭，陆秀夫依旧拒绝解散流亡政府，因为在他看来：“自古以来不乏触底反弹的例子，夏朝的少康能够凭借五百人马、十里方圆的根据地完成中兴，何况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数万部队，如果上天不想灭亡宋室的话，那么万顷碧海不足以复兴大宋王朝三百年的基业吗？”

但是自古兴亡之道除了所谓的“天意”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人事”。而即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南宋流亡政府本就虚弱的抵抗力量却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分裂，或许是无法原谅文天祥和反攻阶段和自己的意见不合，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混乱而对对方失去了信任。总之对于在循州一带正在重新组织抗元力量的文天祥所提交的 “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入朝”的报告，主持流亡政府的张世杰以宋怀宗赵昺的名义加以拒绝，只是给了一个信国公的虚衔。这样明显的疏远和排挤，最终令文天祥不得不写

信给陆秀夫抱怨："皇帝年幼，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呢？"

而就在文天祥和张世杰的关系始终得不到修补的情况之下，忽必烈已经厌倦了和南宋流亡政府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亲自任命江东宣慰使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领元帝国的精锐的海、陆两军对广东一线发动最后一击。而与此同时，在汪良臣等人的长时间围攻之下，据守四川东部的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张珏终于随着泸州、重庆等地相继失守，而在巷战中被俘。随后在被押送往大都的途中自尽殉国。在张珏展开最后的抵抗之前，元帝国著名的地方治安专家李德辉曾写信给他，表示："你作为南宋帝国的臣子，难道关系比他们宗室还要亲吗？你所治理合州又怎么可能比南宋的统治范围还大，今天南宋宗室已经将他们的帝国都拱手送上，你还以忠诚的名义在负隅顽抗，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张珏最终没有回答，或许他真的是想不出坚持的理由，但又或许忠于自己心中所追求的理想本来就没有理由。

张弘范的南征兵团首先在被文天祥追捕的土匪头子陈懿的带领之下突袭了文天祥在潮阳、海丰一线的根据地，并最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俘虏了已经降格为游击队的这支抗元力量的主要领导人。此时文天祥的部下刘子俊毅然效忠自己的昔日同僚赵时赏自称是"文丞相"，希望可以保护自己的精神领袖脱险，但是同样被俘的文天祥本人却决定自己走完未来的殉道之路，他和刘子俊各争真伪，最终在查清两人身份之后，刘子俊被以酷刑烹死。

1279年农历正月，在不断派出侦察部队追捕海上转移的南宋流亡政府的情况之下，张弘范终于在厓山（今广东新会海中）将张世杰所统率的庞大船队包围。我们不知道这对堂兄弟之间私下的感情如何，但是张弘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劝降使者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天祥那首脍炙人口的《零丁洋诗》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言而是在张弘范要求其参与政治攻势时流传于世的。而张世杰以及被围的南宋军民的态度也和文天祥同样坚决。或许在厓山剑拔弩张的两军阵前，张世杰和文天祥终于原谅了彼此，毕竟他们都将走向同一个终点。

张世杰不擅长海战这一点在当年的焦山战役中已经显露无余了。在厓山他再一次采用了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战略——将舰队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以海上浮动堡垒的模式应对张弘范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不过这一次张世杰至少吸收了焦山战役的经验，事先已在舰船的甲板之上厚涂湿泥，并在船体前方绑上前出的巨木，张弘范效仿阿术采用的火攻战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被包围的南宋流亡政府虽然作战顽强，但是在被对手扼守了取水道路的情况下，淡水补给很快出现了问题。在喝着足

以令人呕吐和腹泻的海水，吃着干粮的情况之下，腹背受敌的张世杰虽然努力奋战但最终无法改变全线崩溃的命运。站在桅杆和甲板上都插满了箭矢宛如刺猬的旗舰之上，看着自己舰队的樯旗一面面倒下，张世杰怀着最后的希望拼死突围。



今天深圳赤湾的宋少帝墓

而面对着前来接应的小船，担心被人出卖的陆秀夫先是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跳海，自己则背上宋怀宗赵昺，以“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辱，陛下不可再辱！”的名义跳入汹涌的海水之中。此后作为母亲的杨太妃也哭着道：“我迢迢千里而来，也为了赵家的骨肉，今天连他都死了，我还应该活着吗？！” 也跟着儿子跳海自杀。最终厓山的海面上除了燃烧和倾覆的战舰之外，还漂浮着十几万具南宋军民的尸体。在包围对手之后，张弘范曾经向依旧忠于南宋流亡政府的普通民众发出过：“你们的陈丞相跑了，文丞相也成了俘虏，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此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回答。而侥幸突围而出的张世杰最终也发起了前往占城或

者返回广东东山再起的念头，面对着狂风巨浪，他在表达了自己为了南宋帝国已经尽力的无奈之后，也跳入了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大海。

站在今天的角度，有些人或许认为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的行为有些过激，甚至可以说是残忍。但是我们终究不应该苛责那些曾经有过锦绣前程最终却选择了与自己的国家一同逝去的生灵。在曾经留下过“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厓山石壁之上，后人也刻下了“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的字样。虽然“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的论述对从未正式效忠过南宋政府的张弘范有失公允，但是“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却足以道出了人心的所向。而今天在中国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的蛇口赤湾港一侧的青山之上，天后庙旁当年由当地僧侣和民众为漂浮到此的宋怀宗赵昺修建的宋少帝陵依旧香烟袅袅，俯视着眼前的海湾内无数巨轮的停泊和起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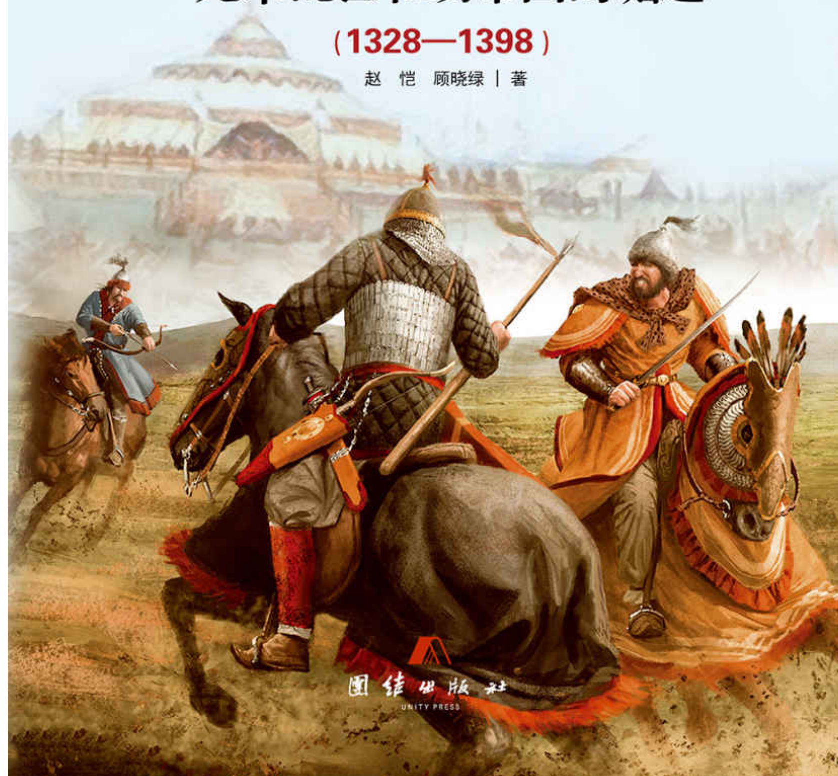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4

纵横塞北

——元末乱世和明帝国的崛起

（1328—1398）

赵 恺 顾晓绿 | 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纵横塞北

——元末乱世和明帝国的崛起

（1328—1398）

楔子 皇子复仇记

西道诸王

公元1328年，蔚蓝色地球依旧维持着其固有的速率在浩瀚的银河中孤独地转动着，而生活于其上的亿万生灵，也在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驱动之下，继续各自的生活，而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和各种或明或暗的冲突，最终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的宏伟篇章。当然对于此时生活于广袤非洲草原之上的黑色人种，活跃于南、北美洲的印第安部族以及大洋洲及其周边岛屿之上的毛利人的境遇，我们知之甚少。所谓“文明”聚光灯照耀之下的舞台，依旧仅局限于亚欧大陆。

在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陆地的最西端，这一年的2月1日，自诩“美男子”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结束了他34岁的短暂人生。这位有过三任妻子却没有子嗣的国王之死，不仅宣告了篡夺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兰西卡佩王朝的终结，点燃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导火索， 9年之后查理四世的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法兰西王冠”为名率军南下。



爱德华三世

越过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此时的亚平宁半岛和中欧平原依旧处于日耳曼诸邦无休止的混战之中。天主教廷在历次十字军远征中所积累的微薄声望，也随着其迫

于法国的压力而从意大利罗马迁到法国阿维尼翁而荡然无存，这一年1月17日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德维希四世便选择了罗马贵族来主持自己的加冕典礼，而这场皇权和神权的拉锯战，此时才刚刚开启序幕。



浪漫主义画作《最后的十字军》，反映**14**世纪中期欧洲的全面衰败

横跨亚得里亚海，此时巴尔干半岛虽然依旧处在自诩罗马帝国后裔的拜占庭人统治之下，但在奥斯曼帝国逐步蚕食和巴尔干半岛军阀割据的影响下，这个“千年帝国”正日益走向没落和衰亡。这一年号称“新永恒之城”的君士坦丁堡迎来了他的新主

人。经过长达4年的“两安德洛尼卡之战”，身为孙子的安德洛尼卡三世终于成功将自己的爷爷——安德洛尼卡二世赶下了王位。成功登基之后的安德洛尼卡三世虽然组织了一系列对奥斯曼帝国的反击，但他的微薄战绩并不能抵消其起兵篡权的恶劣影响，在其身后拜占庭帝国又爆发翁婿争权的“两约翰之战”和父子阋墙的“约翰—安德洛尼卡之战”。如此频繁的内耗最终瓦解了这个强盛一时的帝国，只在西方谚语中留下一句“拜占庭式的阴谋”以警戒后人。



依附于钦察汗国之下的莫斯科公国

在拜占庭与奥斯曼犬牙交错的战线以东，辽阔的欧亚大陆此时名义上仍在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下，昔日蒙古铁骑西征的狂潮早已退去，无论是掌控着俄罗斯诸国的钦察汗国还是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此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均无可避免地驶向了分崩离析的末路悬崖。 1327年，位于莫斯科西北的特维尔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甚至连时任钦察汗国统治者月即别的堂兄也为暴民所杀。盛怒之下，月即别汗随即命伊凡一世出兵弹压，伊凡一世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孙，曾先后击败过

瑞典和条顿骑士团。正是凭借着屡屡战功，伊凡一世于1328年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的封赏，并掌握了从俄罗斯各地向金帐汗国缴收贡赋的征集权。而随着作为俄罗斯统一象征的弗拉基米尔主教府迁至伊凡一世的封地莫斯科，近代沙俄帝国在钦察汗国的卵翼之下缓慢地生长出他的第一缕枝芽。

与伊凡一世对钦察汗国的“忠心耿耿”相比，伊尔汗国内部此时却正经历着一场君臣交兵的阵痛。长期把持国政的“贝勒贝”（突厥语，相当于中原政权的“太尉”）出班受到了来自新任国君不赛因的猜忌，作为昔日成吉思汗“四骏”之一赤老温的后裔，不甘坐以待毙的出班于1327年举兵反叛，但此时成吉思汗家族的余威尚存，出班的叛军刚刚抵达首都孙丹尼牙（今伊朗苏丹尼耶），便在不赛因的政治攻势下溃散，出班只能带出少数亲信逃亡在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呼罗珊地区，但最终为当地的统治者所杀。成功翦除了出班家族的势力，固然巩固了国君不赛因的统治，却也令伊尔汗国的统治基础——蒙古贵族遭遇重创，在不赛因死后整个帝国迅速陷入诸侯并起的分裂之中。

相对于纷争不断、内乱连连的钦察汗国和伊尔汗国，1328年的察合台汗国此时正处于短暂的安定和繁荣之中。坐拥富饶的“河中之地”（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和伊犁河谷的察合台汗国，长期以来最大的问题是在邻邦窝阔台汗国与拖雷之子忽必烈所建元帝国的战争中如何站队。而这一尴尬的局面直到1310年窝阔台汗国的灭亡，其疆域和领民系数为察合台汗国所吞并才有所改善。此后察合台汗国虽然因领土问题与元帝国有过短暂的边境冲突，但这一局面很快以君主也先不花的遇刺告终，也先不花的弟弟怯别继承汗位之后，积极改善与元帝国的关系，并从东亚连通西域的商道中渔利。令怯别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这条商道西来的除了滚滚金元之外，还有在元帝国内部争斗中落败的王子——忽必烈的曾孙孛儿只斤· 和世瓎。


命运坎坷的皇子和世瓎

和世瓎的西逃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要理清其来龙去脉还要从蒙元帝国第四代统治者拖雷之子蒙古即位之后的中亚局势说起。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之初曾将所征服的疆域视作“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按照《元朝秘史》中的说法，成吉思汗曾和自己的兄弟们商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而在此后的分封过程中，铁木真也基本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古老传统——“忽必”（也就是汉语中所谓的“分子”，也可理解为现代营业模式中的“股份”）将所征服的领地和人口分给了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其中在1214年南征金帝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将蒙古高原以东的地区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弟弟，形成了日后所谓的“东道诸王”。而在第一次蒙古

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又把蒙古高原以西的疆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其日后所形成的“四大汗国”在汉族的史料中又被称为“西道诸王”。

在蒙古族的风俗之中，以东为尊，因此铁木真将自己的兄弟及其后裔分封在东部地区，而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西，理论上说也合情合理。但是在当时蒙古草原之东的大兴安岭及松花江流域依旧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而在元帝国建立之后，忽必烈又竭力限制“东道诸王”向东北亚滨海地区、朝鲜半岛等地发展，因此，在蒙元帝国的历史中，“东道诸王”的政治影响力始终在“西道诸王”之下。

“东道诸王”长期以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格斡赤斤马首是瞻，而“西道诸王”之中，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由于出生之前，母亲孛儿帖曾被蔑儿乞人掠走，因此长期以来血统存疑，被排除继承人的行列。而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则根据蒙古部“幼子守产”的习俗，继承了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草原核心区域。因此“西道诸王”长期以来事实上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的势力范围。察合台自知并不为成吉思汗所喜，因此长期以来都紧跟窝阔台的脚步，并最终在成吉思汗死后的继承人之争中，成功帮助窝阔台上位。在窝阔台的即位典礼上，蒙古帝国的内部形势显得格外明朗，“东道诸王”的领袖——皇叔斡赤斤扶着窝阔台的左手，“西道诸王”的领袖察合台扶着窝阔台的右手，而拖雷则负责进上一杯装在金樽中的美酒，这杯酒的个中滋味或许拖雷和窝阔台都有着各自的理解。

在窝阔台所发动的灭金战争之中，率部长途奔袭、歼灭金帝国主力的拖雷再度成了蒙古帝国的英雄人物，但是在班师的途中，身为大汗的窝阔台却突然病倒。随军的萨满表示：“这是金帝国的山川之神认为蒙古大军杀戮过多所导致，不用人命为供品是无法解除其诅咒的。而甘愿牺牲的还必须是蒙古大汗的兄弟或者子侄。”这个时候最令人觉得惊奇的事情出现了，拖雷竟然主动提出愿意为自己的哥哥献出生命。在喝下了窝阔台的洗澡水之后没几天，拖雷便死在了行军途中，而窝阔台则神奇地康复。

据说拖雷在“甘愿代死”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哥哥能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这一点窝阔台的确有去做。不过他的安排是让自己的长子贵由按照蒙古的旧俗迎娶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从而“继承”拖雷系的全部领土和麾下的百姓、牛羊。不过窝阔台显然太小看自己的弟妹了。作为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扎合敢不之女，可以说是从小在显赫的草原贵族中长大的，因此对于政治格外敏感，她不仅对窝阔台的这一安排，以要“教养拖雷诸子成人”为由婉拒了，更对

窝阔台不经宗室会议商讨便私自将拖雷名下的财产分给自己的三子阔端的行为采取了忍让。


与窝阔台并座的唆鲁禾帖尼

唆鲁禾帖尼顺从的态度最终赢得了窝阔台的信任，根据《史集》中的说法："（唆鲁禾帖尼）她考虑到他们（诸子）和丈夫的军队的食品和装备之时，建立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使任何欺骗都不可能得逞。合罕（窝阔台）一切事情都同她商量，不违背她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允许对她的命令作任何更改。"似乎有将唆鲁禾帖尼视为自己"贤内助"的意思，而获得拖雷大量领民的阔端也把这份恩情算到了自己婶婶的头上，在未来新一轮的权力角逐之中抛弃了自己的侄子失烈门等人，站在了堂弟蒙哥这一边。

除了将唆鲁禾帖尼吸纳进自己的智囊团之中，窝阔台还对拖雷的长子蒙哥十分宠爱，甚至一度有将汗位传给对方的意思，据说他曾爱抚地摸着蒙哥的头说："你是将来可以君临天下的人啊！"不过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随后窝阔台又因为自己用母牛来喂自己养的豹子时，小孙子失烈门一句："那小牛怎么办？"感到自己的小孙子宅心仁厚，也认为失烈门有君临天下的潜质。何况早在自己继承汗位之初，窝阔台已经让蒙古帝国的诸王立下了"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　我们仍要接受他为汗"的誓言，拖雷系的蒙哥兄弟想要翻盘似乎是难于登

天。

在成吉思汗在世之时，察合台便与术赤势同水火。窝阔台虽然表面上严守中立，但是私下却与察合台组成了攻守同盟。而窝阔台所发动的“第二次蒙古西征”之中，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更因为指挥权的问题与术赤的长子——拔都龃龉不断，两人甚至因为庆功宴上谁先喝酒的问题引发了冲突。不过当时的术赤系已经在中亚及乌拉尔山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拔都在长子西征中又战功赫赫，因此在得到了拔都对自己儿子贵由的控诉之后，窝阔台一度有把贵由贬为普通军官流放边远之地以息事宁人的想法。好在他的幕僚及时提出：“成吉思汗有训，内事只家中断，外事只野外断。此外事，请付拔都治之。”把皮球踢回给了拔都。拔都虽然在西征大军之中占据了优势，但是在整个帝国中毕竟还是小字辈，于是也只好与贵由继续保持貌合神离的态度。

随着窝阔台去世，贵由回师之后取代了摄政五年之久的母亲——乃马真脱烈哥那之后，立即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堂兄拔都。　1247年，贵由任命自己父亲窝阔台的心腹——大断事官野里知吉带为新的西征军统帅，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员——除了从诸王的部众之中十抽其二之外，还号召所有蒙古牧民百选一人，组成“巴图鲁”（勇士）精锐部队。与此同时，贵由授予野里知吉带统辖阿姆河以西各地区和所驻蒙古镇戍军的军权和收取地方财政收入以充实军需的财政大权。这一异常举动，明显含有对付拔都的意图，因为此时拔都的势力已扩展到高加索地区，而贵由则特别指明这个地区归入野里知吉带所管辖的战区。最终贵由的一道手谕更表达了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朕将自往，以汝为前锋耳！”



西方画作中的“短命可汗”贵由

1248年初，贵由自称身体不适要到自己父亲窝阔台的封地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地区）养病，随后便率领精锐的近卫军踏上了西行的不归路。当年农历三月，贵由在抵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突然死去。关于他离奇死亡的真实原因史学界颇多争议。不过无论是被毒死还是和昔班（拔都的四弟）酒后斗殴中被打死，似乎一切的线索都指向拔都。但事实上拖雷系在这次宫廷政变中也出力不小，因为正是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秘密派出使者通知拔都，让他提前防备贵由

的西进，可以说，在贵由时代术赤系与拖雷系便可能已经结成了秘密同盟。

贵由虽然死了，但是窝阔台家族表面上依旧实力雄厚。如果贵由的妻子海迷失可以审时度势地从容应对的话，那么无论是拔都还是蒙哥可能都仍没有十足的胜算。但是由于海迷失无法摆平窝阔台的三个孙子——失烈门、忽察和脑忽，不得不将推举大汗的权力移交给身为长子嫡孙的拔都。或许海迷失心里还在打着如意算盘——术赤血统不纯，拔都没有机会窥测汗位自然只能按照之前的誓约将汗位传给窝阔台的子孙。但可惜的是，海迷失忘记了拔都虽然没有理由自己即位却有推举别人的权力。

拔都此时也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一方面按照蒙古帝国的习惯请海迷失暂时摄政以稳住窝阔台、察合台系的势力；另一方面以长支宗王身份遣使召集各路诸侯前来共商大事，而地点则选在他大军驻守的阿剌脱忽剌兀（在海押立附近）。由于这个尴尬的地理位置，察合台和窝阔台派系的人马自然不敢自投罗网，连海迷失本人也只是派来了全权代表。不过窝阔台系统还是有一位强力人士抵达了会场，他就是在西线战场上统帅大军的野里知吉带。

有空前强大的野战军为后盾，野里知吉带在会议上要求大家遵从海迷失的全权代表那颜八剌的建议："按照窝阔台的遗命推举失烈门继位。"这一点似乎站得住脚，却不想其实是自打耳光。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立刻抓住了其中的逻辑错误，指出："竟然窝阔台生前留下过遗嘱，那么贵由是不是谋朝篡位啊？"然后继续推导得出竟然窝阔台自己的儿子都敢这么乱来，那么之前的誓约也就毫无意义。

在推翻了失烈门继承权的合法性之后，大汗继承人的热门人选就只剩下拔都和拖雷系的长子蒙哥了。于是在以退为进的指挥棒之下，拖雷系首先大肆推举已在钦察草原立国，已无东归之意的拔都。而拔都也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在主动予以拒绝之后，一场有些做作的对话便出现了。与会者一起提问："王既不自立，请审择一人，以践大位。"然后拔都则做思考状，回答说："我国家幅员甚广。非聪明知能效法太祖者，不胜任。我意在蒙哥。"然后台下一致表示："我们也这么看！"在所谓"民主"的推动之下，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权力的巅峰。而蒙哥还要再退让一番，在自己的弟弟末哥的鼓噪"我们兄弟不是一向听拔都大哥的吗？你今天怎么不尊重他了啊"下才表示"勉强接受"。



蒙古亲贵推举首领的“忽里勒台”大会

但此番推举毕竟只是在术赤和拖雷派系中产生的。被排除在外的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立即提出选汗大会应在成吉思汗大帐举行，要求移师到他们的“主场”重新举行。这一次轮到拔都纠结了，不过虽然自己不敢贸然前往，但是他还是派自己的弟弟伯勒克、托克帖木儿统率大军武装护送蒙哥返回蒙古本土，同时自己驻守在边境之上作为声援。拔都麾下都是“长子西征”中的百战精锐，蒙哥兄弟在母亲唆鲁禾帖尼多年苦心经营之下，也是实力雄厚，因此面对这两股势力的合流，即便是在蒙古本土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也迅速发现自己毫无优势，只能继续抵制会议的召开。但是这种缓兵之计无法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1251年农历六月，在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大斡耳朵举行的大会中，与会的东、西道诸王、百官再度提名蒙哥登基。大蒙古国汗位正式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

尽管可以想见钢刀很快便会架到脖子之上，但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之中真正敢于铤而走险的却只有失烈门、贵由之子脑忽等少数“愣头青”，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显得格外幼稚——带上自己的亲信人马以参加蒙哥即位后开展的庆祝酒会为名抵达会场，然后将新任大汗及拥戴蒙哥的各方诸侯杀个干净。应该说中国历史

并不乏少数死士突击得手，从而颠覆一个政权的先例，但是显然以失烈门等人的组织能力并不能成功地实施这一宫廷政变。

失烈门等人还没有赶到会场便被蒙哥的大军包围，成了新任蒙古大汗的阶下囚。随后，窝阔台派系的七十多位“那颜”首先被处死。参与密谋的大臣合答随即被捕杀；察合台的孙子也孙脱虽然与失烈门等人同谋，但是他只是率军作为后应，一见形势不对便弃军投降，因此只是被逮捕而已。在肃清了窝阔台系的骨干之后，蒙哥命令自己部下不怜吉歹和不花分别率军向察合台系的领地逼近，以武力支持察合台长孙合剌旭烈取代也速蒙哥。事实上合剌旭烈本来就是察合台所选定的继承者，只是由于贵由的干涉才被自己的弟弟也速蒙哥赶下了台，可惜的是这位复辟的汗王走到半路便因病去世，只能让自己的遗孀——兀鲁忽乃出马以监国的身份管理察合台汗国。

而对于窝阔台系，蒙哥则采取直接肢解的模式，根据《史集》中的说法：“他们的军队除阔端诸子的以外，全被夺走并分配掉了。”不过这一说法事实上并不确切，窝阔台的子孙之中没有卷入政治斗争的合丹、灭里、海都等各分得一部分属民和领地，虽然他们的力量暂时没有能力威胁到蒙哥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将会成为蒙古帝国分裂和内战的源头。

身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蒙哥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颇有才干的君主，但是，也许与早年寄人篱下的遭遇有关，蒙哥很早便清醒地认识到，在权力面前亲情只不过是一层暧昧的薄纱。因此，尽管对忽必烈在自己继承汗位过程中的表现颇为认可，自己登基之后也让其统领中原的军政事务，但是，很快忽必烈在日程政治事务和军事上对南宋、大理的一系列成就和胜利招来了蒙哥的猜忌。对于蒙哥和忽必烈关系的急转直下，很多历史学家从施政纲领、宗教信仰、个人情感方面给出了各种解释，或许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权力是无法分享”的。



刻薄寡恩的蒙哥

蒙哥对忽必烈的钳制从行政和军事两个层面分别展开：行政方面，他于公元1257年派遣大必阇赤（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等地“钩考”钱谷，以财务审核为名审查忽必烈在当地所任用的官吏。打击忽必烈藩府势力，迫使

忽必烈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这三个地区的地方权力，撤销三司。军事方面，则以忽必烈的脚有问题，对其采取彻底封杀的态度，不让他参与对南宋的全面进攻。从忽必烈晚年的身体状况来看，他似乎的确有关节炎之类的毛病。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和蒙哥之间的问题不是“没瘸！走两步……”可以解决的。

在自己麾下的汉族士大夫幕僚团的建议之下，忽必烈首先将自己的爱妻察必和儿子真金送往和林充当人质，随后又亲自觐见蒙哥。据说两兄弟见面之后竟然同一时间落下了眼泪，忽必烈的口才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蒙哥便已经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南下攻宋的东线最高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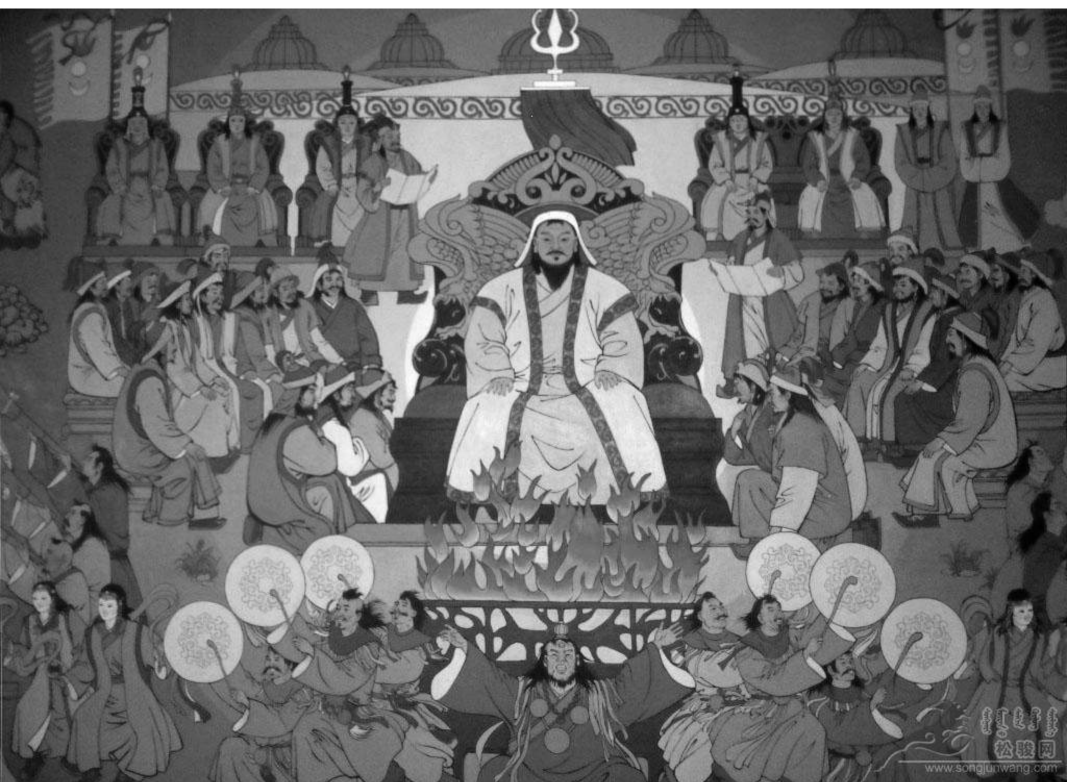
蒙哥和忽必烈的这次见面，虽然表面上异常煽情和感人，但其背后有着各自的算计。忽必烈被排除在权力中枢之外，一度意志消沉，但近侍燕真的一番话令他不得不有所行动：“蒙哥已经怀疑你有异志了，现在他率军远征，怎么可能让你以皇弟的身份悠闲地留在后方？”显然忽必烈不主动做出一些表示，更大的打击可能就在眼前。而对于蒙哥而言，东线的蒙古军队统帅“东道诸王”领袖——铁木格斡赤斤之孙塔察儿长期出工不出力也令他十分困扰，而在自己所指挥西线不断传来捷报的情况下，他似乎也不反对忽必烈此刻出马在东线牵制一下南宋。不过他对忽必烈所指挥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两人的口头约定之中，忽必烈所承担的任务是夺取南宋长江中游的鄂州，然后等待蒙哥西线大军突破南宋在四川所构筑的合州——重庆防线，然后会师西进，直捣临安。

由于只担任配合的角色，忽必烈在南下的过程中并不十分用心。他首先召集了自己的幕僚——宋子贞、商挺、李昶、杜瑛等人会商这次战争中自己所要面对的政治得失及攻宋之计。而其中刚刚被任命为江淮荆湖等路宣抚副使的郝经所提交的一份名为《东师议》的可行性报告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印象。郝经虽然肯定了蒙古帝国的军事优势，但是这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存在着准备不足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郝经预见了蒙哥亲自出马在战场所可能遭遇的不测。在这样的分析之下，忽必烈显然已经开始接受了郝经“而图后举”的建议，将蒙哥此前拟订的一举灭亡南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修整为“以打促和”。而忽必烈的大军刚刚进入战区，西线便传来了蒙哥死于合州城下的消息。

按照正常的逻辑，忽必烈理应在得到自己兄长死讯之后第一时间回师，以便夺取政权。但身为一个政治家，忽必烈的眼光却必须放得更为长远。蒙哥死前虽然没有指定继承人，但事实上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事实上便是

看守内阁，自己贸然回师自然会被第一时间收回好不容易才重新获得的兵权。而手握重兵留在战区后发制人似乎才是更好的选择。而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也同时暗中进行之中。忽必烈首先派出自己的亲信谋事廉希宪以“送饭”的名义前往和自己同在战区的蒙古帝国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赢得了东道诸王的拥戴。随后忽必烈又在战场局势占优的情况下，接收了南宋方面的和谈请求。

此时身在和林的阿里不哥显然已经着手削弱忽必烈的力量，其麾下的部队以增援为名开始向忽必烈的根据地燕京移动。忽必烈留守后方的妻子——察必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使者表示：“出兵增援前线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家真金啊！”暂时遏止了阿里不哥突袭的行动，察必和真金虽然身份特殊，但毕竟没有行政任命，无法阻止阿里不哥逐步开始蚕食华北等地军政权力的行为，无奈之下察必只能写信通知前方的忽必烈，要他回来主持大局。



反映忽必烈即位的壁画

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在路上便听从自己的谋士商挺关于“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的建议，更换了口令和通信方式，彻底断绝了和林方面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和通信权力，所有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一律被当作间谍直接处死。随后又派自己的亲信廉希宪前往“宣抚京兆、四川”，廉希宪成功地争取到蒙古帝国西线军队之中秦巩世侯汪良臣以及刘黑马等人的效忠。据说汪良臣起初还以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为由推脱，但是在廉希宪解下自己所佩的虎符和银印交给他，并忽悠他说：“这些都是忽必烈密旨给你的，只要你跟着忽必烈混，委任状马上就到。”

抵达燕京之后，忽必烈识破了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他回到草原，以逼他就范的企图。就在双方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的暧昧气氛之中，忽必烈首先发难，在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之后，于1260年农历三月在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应该说按照蒙古帝国的习俗，忽必烈的这次即位并没有法律效力，毕竟与会的宗室亲王数量有限，连参与南征的蒙哥之子阿速台也因为倒向阿里不哥没有与会。但是就如忽必烈的幕僚廉希宪、商挺等人所说的“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忽必烈抢先宣布即位夺得了政治先机，阿里不哥虽然紧随其后于1260年夏季在阿勒泰山中举行宗亲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但也已是“另立中央”。

不过阿里不哥还是有他的优势，毕竟蒙哥生前指定由他留守和林从一定意义上已经确立了他继承人的身份。其次，由于蒙哥之子阿速台的加入，驻守于六盘山一线的蒙哥生前亲率的主力大军也支持阿里不哥，从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忽必烈与新疆、中亚等地的“西道诸王”的联系，使后者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阿里不哥这一边，此时正在远征巴格达的拖雷之子旭烈兀、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之子别儿哥态度都偏向于阿里不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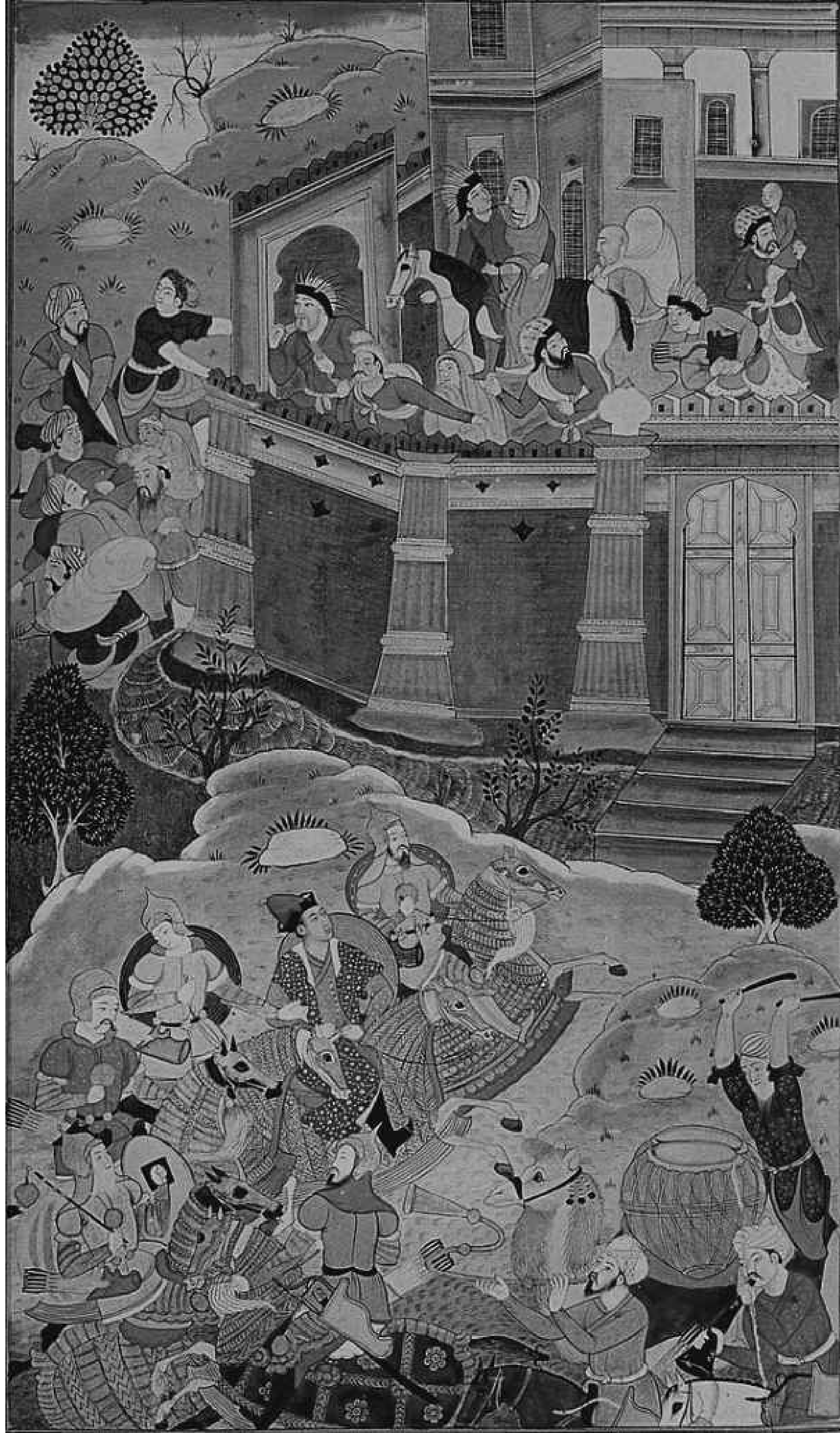
忽必烈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短板，因此连忙派出长期在自己身边的察合台曾孙阿必失哈赶往察合台汗国首都虎牙思，希望可以联合那个长期“寡妇监国”的堂嫂兀鲁忽乃。可惜的是阿必失哈没有能够穿越阿里不哥所设置的封锁线，走到半路便被截留了。而针对忽必烈试图撬动察合台汗国政局的情况，阿里不哥迅速提名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迎娶自己的堂嫂，至此察合台汗国正式落入了阿里不哥的手中。加上居心叵测的窝阔台诸子，此刻的忽必烈可以说是以中原之地独自抗衡“西道诸王”的四大汗国，形势不容乐观。

自成吉思汗南下灭金以来，蒙古帝国已经形成了中原地区向漠北“输血”的经济模式，随着忽必烈迅速在中原地区建立起颇有效率的行政机构，一方面是被扼住了生命线的大漠皇庭，一方面却是可以不断动员庞大物资用于战争的中原帝国，持久的消耗战显然对阿里不哥不利。

无奈之下阿里不哥一方不得不主动进攻，东路军由旭烈兀之子药木忽儿等人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则由蒙哥时代的老将阿兰答儿指挥，兵指六盘山，以期与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会合。对于阿里不哥的东路军，忽必烈并不太担心，因为忽必烈早在返回燕京、开平之后在自己潜邸宿卫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怯薛部队交由心腹董文炳等人指挥，初步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真正令他担忧的反而是西线的战局，因为一旦阿兰答儿与六盘山的蒙哥主力兵团成功会师，那么川陕一线便将门户大开，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诸王”的军队可能会源源不断地开赴中原战场。

对于这一点为忽必烈坐镇川陕地区的廉希宪、商挺也感觉颇为棘手，廉希宪虽然当机立断，捕杀了当年蒙哥派来“钓考”的刘太平、霍鲁怀等人，但是，对于六盘山集结的蒙古帝国精锐野战兵团，他也是束手无策，不得不与商挺磋商对策。商挺对六盘山地区的敌重兵集团的动向做出了如下分析：“如果他们集中兵力，攻击西安，那么对于我们将极其不利，而继续在六盘山一线待命，我们也很难办。不过如果他们带着重装备北上策应和林，那么形势就对我们很有利了！”针对这一情况，廉希宪让自己麾下的汪良臣等人在西安一线虚张声势，指挥蒙哥主力兵团的浑都海果然采取了最愚蠢的办法，率领大军向北移动。此后虽然会合了阿兰答儿的南下兵团，却错失了最佳的进攻时机。最终在忽必烈所调遣的增援部队配合之下，汪良臣利用陕西地区特有的沙尘暴天气，用步兵短兵相接的方式击溃了蒙哥麾下的蒙古铁骑，忽必烈即位之后最为担忧的“关陇危机”得以顺利度过。

与此同时，东线战场之上，忽必烈的大军不仅成功击溃了药木忽儿，还将战线推进到了和林。此时的阿里不哥显然对决战城下信心不足，于是，在处死了阿必失哈后，匆匆放弃首都，逃往自己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封地谦谦州（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唐努山北麓）。为了防止忽必烈的继续追击，阿里不哥向自己的哥哥发出了请求停火的信使，表示等到来年秋高马肥，和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一起来觐见。忽必烈也自认不是冬季战专家，于是留下部队镇守和林，之后，便返回中原去了。



西方画作中阿里不哥军队对“河中”地区的侵扰

应该说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首轮交锋虽然并未给予对方致命的打击，但双方经济实力的悬殊对比还是令局势继续朝着对忽必烈有利的方向发展，阿里不哥所控制的谦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而忽必烈又对其实施了贸易禁运政策，使得阿里不哥不得不向支持他的四大汗国频繁伸手。本来就持观望态度的四大汗国，此刻已经认清了形势，而此时在西亚建立伊尔汗国的旭烈兀正和钦察汗国的别儿哥龃龉不断，都没心情搭理落难的阿里不哥，沉重的经济压力顿时落到了察合台汗国以及窝阔台汗国身上。

应该说阿里不哥还是有信用的，第二年秋天真的回到了和林，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扑。忽必烈在当地的驻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和林再度易手。1261年农历十月，两兄弟在战场上再度遭遇。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后院都不太平，忽必烈要面对的是山东李璮的叛乱，而阿里不哥方面则是因为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断绝了对他的后勤支持，于是在正面战场难分胜负的情况下，大家选择了各自回家。

应该说阿里不哥的军事才能在蒙古帝国的诸多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排名比较靠前的。尽管在忽必烈面前吃了点亏，但是揍起察合台、窝阔台的后裔却是得心应手。在战争的摧残之下，原本还算富饶的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察合台汗国的首都虎牙思（今新疆霍城县）更是出现了“僵死相枕”的残局。阿里不哥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永远失去了后勤补给。而当阿里不哥的军队以小麦代大麦饲马，当地的老百姓竟以牛马的饲料为食，一时间饿殍遍野。在无奈之下，绝望的民众只能向上天祷告。不知道是否是这信仰的力量真的发生了作用，一天阿里不哥正在召开宴会，突然袭来了一阵狂风，将由数千颗钉子固定的朝会大帐也掀翻了，与会者无不带伤。原本就绝望的情绪加上这样的不祥之兆，使得阿里不哥的大军顿时溃散。

阿里不哥的衰弱首先招来的不是忽必烈的打击，而是长期被他追杀的察合台汗王阿鲁忽的反击。在无奈之下阿里不哥只能踏上了向自己的哥哥忽必烈投降的东归之路，忽必烈得到消息预先在边境地区准备好粮食，先让自己长期挨饿的弟弟好好吃上一顿。尽管表面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兄弟似乎只是“相逢一哭”便“泯结恩仇”，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帝国统治者，忽必烈还是对其主要部下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客观地说，阿里不哥的选择的确没有错，唯一错的是他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忽必烈滞

留在蒙宋战场之上的有限时间抢占先机，而蒙哥在六盘山所遗留的重兵集团又进退失距，最终导致了阿里不哥在这场皇位角逐中只能以一个失败者的方式落幕，他本人虽然保住了首级，但是其部将孛鲁合、秃满、脱忽思等人却被悉数处死。

对于阿里不哥的处置，正在高加索地区全面开战的旭烈兀和别儿哥百忙之中表示拥护。而一度被阿里不哥折腾得够呛的阿鲁忽则以自己没有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而不发表评论，转身也加入到对钦察汗国别儿哥的战争中去了。而为了对付阿鲁忽的这“背后一刀”，别儿哥不得不以远交近攻的战略开始扶植窝阔台系的势力，日后即将成为元帝国西北心腹之患的海都正是在此时悄然崛起。

1266年前后，察合台汗国领导人阿鲁忽因病去世。不过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却不甘心退出，她在没有得到忽必烈册封的情况下便将自己与前夫哈剌旭烈所生的儿子木八剌沙扶上王位。忽必烈对此当然颇为不满，随即以木八剌沙过于年幼为名，派遣另一位察合台宗王八剌前往“辅佐”。八剌当然清楚应该如何帮助一个少年成长，他一抵达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便策动军队叛乱，夺取了汗位。不过八剌还算厚道并没有对自己的侄子赶尽杀绝，而是将他贬为管理王室猎场的普通官员。

忽必烈之所以扶植八剌继承察合台汗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约正逐步崛起的窝阔台之孙海都。长期活跃于反忽必烈联盟之中的海都，虽然很早便在自己的封地扣押了蒙哥的使节——汉族大臣石天麟，但是由于蒙哥对窝阔台子孙封地的削弱，海都初期的叛乱始终不过是小打小闹。海都的封地虽然狭小，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位于钦察汗国的东南边界线上，西临术赤第五子昔班在七河的封地，北近术赤长子斡儿答在额尔齐斯河西岸的兀鲁思。利用这一地利上的便利，海都竭力与钦察汗国的几位叔叔、伯伯结交，特别是与钦察汗国的领导人别儿哥“咸与亲厚”。

领导钦察汗国的别儿哥之所以特别看重海都这个侄子，主要是因为在拔都死后，钦察汗国在别儿哥的领导之下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在别儿哥眼中南面的旭烈兀是屠杀穆斯林的刽子手，与皈依伊斯兰教的自己不共戴天。东面的阿鲁忽和兀鲁忽乃夫妻背后偷袭。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为自己牵制察合台汗国的海都自然就特别的可爱了。不过海都初期的表现实在令别儿哥无法满意，在海都被阿鲁忽击败之后，别儿哥一度也对他失去了信心，幸好来自蒙古的萨满为别儿哥卜测凶吉时告诉他支持海都还是比较有利的，别儿哥才坚定了信心，继续以钦察汗国的人力和财力全力援助海都。

忽必烈扶植察合台汗国打压窝阔台系的目的在八剌即位之初似乎是实现了，

1268年，八剌在忽阐河中游以伏兵击败了海都，从而一度遏止了这位贼心不死的亲戚对自己所控制的伊犁河谷的窥视。羽翼丰满的八剌也同样不满忽必烈对他的种种干涉。他随即也把元帝国派驻斡端的大将忙古带赶走，正全力攻宋的忽必烈一度派出六千骑兵支援忙古带。但是，在八剌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面前，元帝国的政府军只能选择不战而退。八剌趁势派兵掠夺忽必烈统治下的于阗城（今新疆喀什）。而此时钦察汗国终于忍不住从幕后走到台前，继承别儿哥汗王的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派出5万人的大军增援海都，挽回了窝阔台系长期的颓势。在钦察汗国强大的武力干涉下，　　1269年春天，海都、八剌和钦察汗国代表正式会盟，至此，木赤、察合台、窝阔台三系结成了共同对抗拖雷系的军事同盟。

三大汗国的联盟基本上是建立在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对察合台汗国的压榨之上的。察合台汗国不仅要拿出阿姆河以北地区三分之一的赋税收入供养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的军队，还要为钦察汗国的利益进攻旭烈兀家族的伊尔汗国。当然在察合台汗国对伊尔汗国发动的进攻之中，海都也要承担提供兵员支持的义务。不过等到八剌的大军真的南下之后，海都的所谓增援部队始终“不动如山”，最终导致了八剌被旭烈兀之子阿八哈击败，在撤退的途中从马上跌下致残。

跛腿的八剌好不容易撑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海都的两万大军此时才出现。不过并不是来支援他的，而是趁火打劫。据说，在海都到达时八剌惊吓而死。八剌死后的察合台汗国群龙无首，他的四个儿子与阿鲁忽的两个儿子试图联手赶走海都。但是最终却被对手逐个击破。随后海都基本上操纵了察合台汗国的主要政治事务，先后扶植了两位傀儡——察合台宗主捏古伯和不里之孙秃花帖木儿。直到察合台汗国的汗位击鼓传花般地交给实力强大但却颇为恭顺的八剌之子都哇，海都才似乎觉得称心满意。毕竟此时海都的野心已经由控制察合台汗国转向了直接向忽必烈发出挑战。而此时的忽必烈也派出自己的第四子那木罕领军西征迎战海都。

深得忽必烈宠爱的那木罕果然出手不凡，　1267年，海都第一次率军东进便被那木罕打得大败而归。就在忽必烈自认西线局势转危为安之际，那木罕竟于1275年主动出兵突袭了占据叶密的贵由之子禾忽。尽管禾忽长期以来在海都和元帝国之间一直奉行暧昧的态度，但毕竟还没有到直接参与叛乱的程度。那木罕的这次草率军事行动直接导致禾忽随即表明态度，站在了海都一方，并出兵占据了河西走廊，隔绝了元帝国北方边防军与中原本土的联系，更间接导致了以昔里吉为首的“西道诸王”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

昔里吉是蒙哥的第四个儿子，曾经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中支持后者。不过在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之前，昔里吉便已经意识到了局势不妙。率先向自己的叔叔表示了悔改之意。忽必烈不仅赦免了他，还册封其为河间王。应该说在政治待遇上还是颇为优厚的。不过随着海都的崛起，那木罕西征的昔里吉心理再度活泛起来了。因为此时重返漠北的昔里吉身边已经云集以他为首的蒙哥和阿里不哥子侄辈诸王及其部民。

忽必烈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抽调刚刚灭亡了南宋的中原驻军击退了禾忽，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他立即派出名臣廉希贤奉使前往北边“安抚”昔里吉，而昔里吉等人也随即表示“悔谢”，似乎双方的关系再度回到了一团和气的阶段。但没过多久，元帝国北方边防军中便发生了北安王那木罕和奉命辅佐他的中书右丞相安童分配补给不公的事件。不过首先用行动表示不满的不是昔里吉等诸王，而是北安王那木罕的直属部下脱脱木儿。

那木罕年轻气盛，辅助他的安童当时也不过28岁。这对年轻的君臣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竟然想当然地派昔里吉出兵追击叛逃的脱脱木儿。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昔里吉很快便和脱脱木儿沆瀣一气。在那木罕军中不断出现将领叛逃的情况下，轻松地倒戈一击，俘虏了那木罕和安童，并将他们当作投名状送往西北。不过有趣的是，那木罕并没有被投入海都的牢房，而是到了术赤之后——蒙哥帖木儿的手里。而对于安童，海都不仅没有虐待或者直接处决而是授予了他官职，同时也并不急于出兵配合昔里吉的叛乱，坐看拖雷家族的内斗。

昔里吉虽然不断宣传海都、蒙哥帖木儿已经和自己达成了联盟，但是在没有实质性外援的情况下，他的部队很快就被元帝国从征宋前线调回的主力所击败。而此时海都似乎也认识到自己与元帝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因此，他不仅在以昔里吉的叛乱中始终按兵不动，随后还主动放回了那木罕和安童，以表示和平的诚意。而元帝国方面也采纳了乃蛮部大臣铁连在出使海都势力范围之后所提出的“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虞矣”的建议，在全力南下灭宋的过程中在西北地区取守势，再承认海都的既得利益和对察合台汗国的控制。

1276年之后，元帝国对南宋政府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之后，重新开始经营西北。但此时的海都已经羽翼丰满，元帝国虽然不断增兵但双方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带始终也处于反复争夺的局面。而公元1287年所爆发的东道诸王之乱，更令海都的势力范围一度延伸到了漠北。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元成宗铁穆耳登基，改组元帝

国政府军指挥系统才得以改观。

在蒙元帝国的历史中，海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般的人物，他个性鲜明且严于律己，据说是铁木真家族之中唯一一个不喝酒甚至包括马奶酒的人。但是在他的对手面前，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似乎始终略逊一筹。帖坚古山之战后不久，海都便因病去世。这位枭雄显然忘记了自己夺取察合台汗国宗主权的过程，死前竟然将自己的事业交给了自己的副手——察合台汗王都哇。都哇随即便违背了海都遗愿，在海都诸子中选择了较为懦弱和易于控制的察八儿为窝阔台汗，将窝阔台汗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都哇可以说是窝阔台汗国真正的掘墓人，利用察八儿的懦弱和无能，他首先决定改变与元帝国为敌的政策，以承认元成宗铁穆耳为成吉思汗大位的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元帝国对他们在西北地区独立合法性的承认。在与元帝国达成和约之后，都哇又不断出兵进攻窝阔台汗国的势力范围，甚至与元帝国联手瓦解了察八儿驻守在按台山、也儿的石河境的大军，最终逼迫察八儿向元帝国投降，窝阔台汗国随即灭亡。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察合台汗国虽然吞并了其大半的领土。但是都哇死后，察合台汗国随即也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最终在诸王们自相残杀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非成吉思汗系统的异密和地方诸侯的势力发展起来。在元末明初之际，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了一个地理概念。其东部地区是割据的地方贵族，而其西部则逐渐成为跛子帖木儿建立强大帝国的根基。

忽必烈有十一个儿子，老大朵儿只夭折得比较早，因此长期以来忽必烈都将继承自己事业的厚望寄托在自己的次子真金身上。据说真金出生之时，被铁木真册封为“寂照英悟大师”的高僧海云恰好在漠北。海云和蒙古帝国的王公贵族们的私交不错，据说忽必烈所信任的重臣刘秉忠就是他的亲传弟子，在得知忽必烈的王子出生之后，海云特地为他取了一个颇有汉族风范的名字——真金。而这个和其他大多数蒙古王子那些拗口的名字迥然不同的称呼，似乎便已经注定了真金日后将与宗教、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年的忽必烈

忽必烈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蒙古君皇，因此他根据自己当年在“潜邸”时期的特殊经历，很早便开始对真金灌输儒学思想，甚至指定自己的重要幕僚姚枢作为自己儿子的启蒙老师。客观地说忽必烈的这一安排颇有问题，以为作为著名学者姚枢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他所推崇的“程朱理学”在南宋时代已经被证明过于刻板和迂腐。因此真金的童年时代面对姚枢每天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性格上不免也失之耿直。在姚枢随忽必烈远征大理期间，他又找来了另一位儒学大师窦默作为代课老师。忽必烈对于姚枢和窦默一向敬重，他曾对自己的近侍说过：“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

全人矣！”因此在真金读完《孝经》之后，忽必烈还特意请他们吃了一顿“谢师宴”。

不过这个时候忽必烈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儿子的一些“偏科”现象，因此特意找来了刘秉忠的弟子——著名的神童王恂以亦师亦友的方式帮助真金成长。王恂只比真金大八岁，因此在真金的眼中显然要比姚枢、窦默那些老学究要亲近得多。不过王恂对真金要求也很严格，除了对其起居饮食慎为调护，还限制真金的社交圈子——“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其他宗室子弟及鹰房人等携鹰犬至真金窗前，邀他打猎，被真金全部赶走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1262年，年仅十九岁的真金被自己的父亲忽必烈册封为燕王，以中书令的身份正式到中书省上班。据说真金第一天上班，他的奶妈特意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金却笑着拒绝了：“我没事穿那么漂亮干什么。”的确，身为政府高层工作人员，没必要那么高调。何况忽必烈给真金的任务不过是以“见习元首”的身份“守中书”而已，需要的是多听、多看、多学。偏偏这个时候丞相史天泽不知道是真的不清楚状况，还是受了忽必烈的唆使，跑来向真金汇报工作。真金得体地表示：“我年纪还小，社会阅历不足。许多大事还要你们这些老前辈多多协助。”

不过谦虚的同时，真金也不忘培养自己的执政班底，他特意请了自己伴读王恂以秘书的身份和自己一起上班，让他一起听取来自各地的工作报告。种种得体的表现，使得真金只上班六天，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人便联名向忽必烈建言：“真金既然已经作为中书省的领导者，应该每个月给他几天的时间处理一些日常政治事务。”真金的身份从“见习”进一步提升到了“实习”。 1273年， 31岁的真金被忽必烈册立为太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接班人生涯。

除了忽必烈本人的宠信之外，汉族士大夫也对真金抱以厚望。在他们看来真金如果顺利即位，将会大大提升儒学在元帝国中的地位。不过忽必烈身体强壮，真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机会。于是他们便退而求其次，开始鼓动真金去对抗忽必烈所宠信的穆斯林——阿合马。阿合马所奉行的一些严苛的财政制度与儒臣极力主张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观念相左，于是在一片“革弊、去邪”的议论声中，真金被无可避免地推到了阿合马的对立面上。

事实上，阿合马和真金本身没什么矛盾，同时由于是真金的母亲察必皇后的侍从出身，阿合马对真金处处表现出谦卑和忍让。据说有一次真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拿着自己的长弓就莫名其妙地把阿合马打了一顿，忽必烈看到阿合马脸上有伤就关心了一句：“你怎么搞的？”阿合马不敢说：“是你的宝贝儿子打的！”只能回答

说："我这是让马给踢的！"不过他似乎忘记了真金就坐在旁边，这位太子爷立刻跳了出来："你当面撒谎，这明明是我打的！"从此以后，真金就开始直接当着自己老爸的面对阿合马开揍。



真金的母亲——察必皇后

我们无法知道忽必烈对自己儿子和宠臣之间的矛盾究竟抱以什么态度，但是真金痛打阿合马的消息对于那些整天渴望阿合马倒霉的汉族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鼓励。于是在公元1279年应以董文盅为首的汉族儒臣们要求，忽必烈开始给予了真金更多的参政机会。但是对于阿合马，忽必烈依旧保持着扶植和信任的态度，甚至在真金和阿合马的多次政治斗争中站在后者那一边。虽然阿合马最终在公元1282年忽必烈北上大都之时，被人假借太子真金之名刺杀，但是阿合马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却在他的党羽和继任者卢世荣等人的手中继续推行着。

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感情向来不错，在真金初为太子之时，他生病了之后，忽必烈往往都会前往探视，甚至亲自喂药。但是在政治事务中，父子二人的分歧却是无法用亲情来弥补。一方面忽必烈很清楚真金虽然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但是在蒙古亲贵中却长期被视为异类，在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说法："忽必烈老而病废已久，屡欲传国与真金，族人俱不从，谓我家无此法。"

真正得到蒙古亲贵们支持的是真金的弟弟那木罕，可惜的是这位奉命指挥元帝国边防军的亲王在与海都的战争中失手被擒，从此一度淡出了热门人选的行列，但

是被释放回国之后，那木罕依旧对自己的哥哥真金的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甚至赤膊上阵，直接问忽必烈：“我哥哥如果继位成了大汗，不知道那帮儒生们会怎么评价您呢？”忽必烈虽然表面表现得“大怒”，将那木罕臭骂了一顿，赶了出去，但是他对于真金一味崇尚儒学在内心深处却是同样倍感失望的。而这种失望的情绪，真金本人也是可以觉察到的。而正是这种身为继承人的惶恐使得他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直接引发了几乎将他置于死地的“禅位风波”。

1285年江南行台御史上书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理应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参与朝政。”这一做法应该是出于汉族士大夫的自发拥戴，以真金的性格和政治地位应该不用发动这样有损无益的舆论攻势的。而这份报告如果递交到忽必烈的手中，相信自然会引起这位独裁君皇的愤怒，不过他所打击的也不过递交报告者本身，事件未必会波及到真金。但是也许是出于保护自己支持者的动机，也可能是不想自己的确已经老迈而多病的老爹不开心，于是真金通过御史台都事尚文扣留了这份报告。.

但是这件事情被真金的政敌——阿合马的余党卢世荣和答即古阿散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知了。当时为了第三次远征日本，忽必烈正在大肆搜刮钱粮，担任审计工作的答即古阿散立即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封存并查看御史台所有案卷。御史台是元帝国的监察机构，答即古阿散此举的目的表面上是查找各地官员隐瞒财政收入的证据，但真实的意图却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份要求忽必烈“禅位”的报告。

随着御史台的文库被查封，所有工作人员被一一叫去问话。机关负责人尚文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第一时间将事情原委向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进行了通报，同时继续保留这一份报告的原件。由于政府行文都有详细的往来记录，很快答即古阿散还是根据相关记录向忽必烈报告了这一情况。忽必烈显然将这份报告看作了真金图谋不轨的重要证据，派出了宗室事务负责人——大宗正薛彻干亲自追查这份报告的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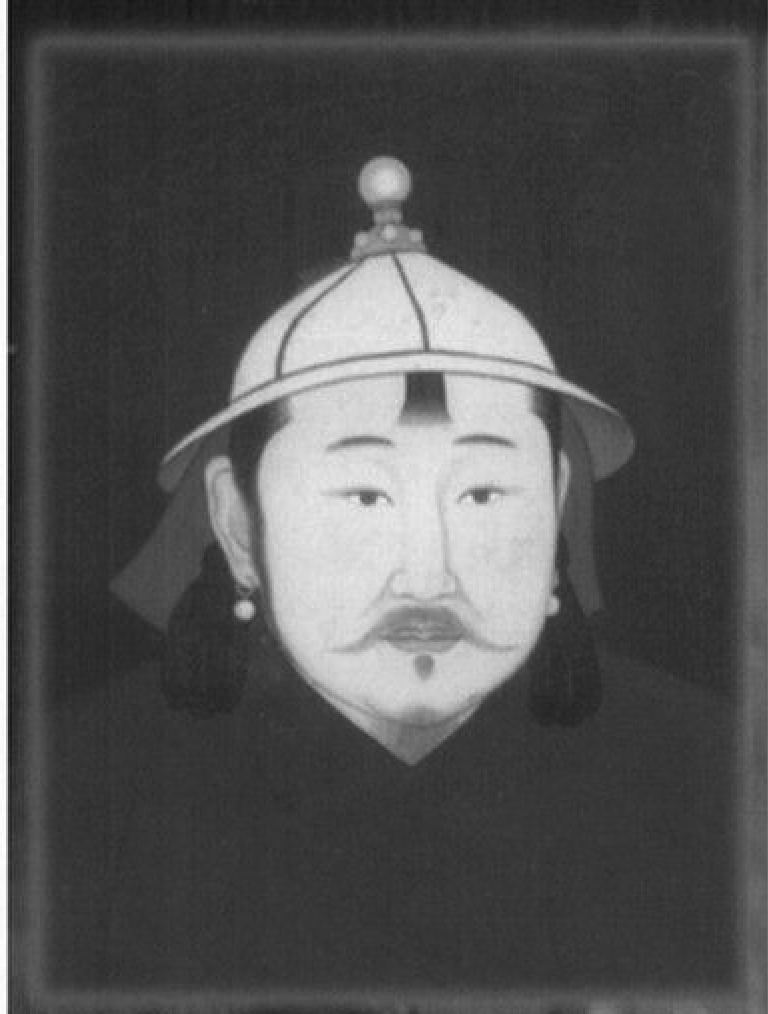
面对日益恶化的事态，尚文连夜串联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两位大员，让他们阻止这场“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的阴谋，而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地将事情的真实情况向忽必烈进行汇报，同时检举揭发答即古阿散贪赃枉法的罪状。应该说忽必烈对于汉族士大夫这种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行为十分不爽，但是他的愤怒远没有达到要将真金废黜的地位，面对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他也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难道没有责任吗？”丞相安童立刻带头认罪说：“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开

脱。但是答即古阿散的罪行已经触犯了元帝国的法律，现在更是用这种方式动摇人心，应该立即任命重臣进行全面调查，以‘庶靖纷扰’。”

应该说比起历史上那些不由分说便把试图取代自己的太子或杀或抓的君皇来，忽必烈在“禅位风波”上的处理还是冷静的。 1285年农历十二月三日，答即古阿散通及其同党被以“受贿贪赃”的罪名处死。但是真金太子却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心理所承受的压力过大，忧惧成疾，七天之后也撒手人寰。应该说真金作为一个儿子和学生都是优秀的，但是他的心理素质以及行事风格却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忽必烈此前的精英教育模式造成的。

1294年，已经八十岁的忽必烈终于在执掌了政权三十四年后因病去世。而此时元帝国继承人的问题便再次成为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真金死后，忽必烈虽然没有再册立太子，但是他对真金一系的扶持却是显而易见的。真金的长子甘麻剌在经过云南等地的一番政治历练之后，被册封为晋王，镇守着漠北的“祖宗根本之地”。真金的次子答剌麻八剌据说也一度被忽必烈作为接班人培养，但是在出镇四川怀州之后却由于水土不服，第二年便在大都病死。在伤心之余，忽必烈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了真金的第三个儿子铁穆耳身上。

1293年，铁穆耳领命北上加入征讨海都的大军之前，忽必烈特意授予他当年真金用过的皇太子印章，使他的权威可以凌驾于自己的哥哥“晋王”甘麻剌之上。但铁穆耳的政治地位毕竟没有经过立诏建储这一系列法定手续的认可。因为按照蒙古帝国的惯例，大汗去世后，理应由皇后临朝摄政，然后再择期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由宗室勋旧一同“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往往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元穆宗铁穆耳

亲身经历过乃马真摄政以及其后一系列由汗位纷争而引起的腥风血雨的忽必烈自然不希望悲剧重演，因此他第一时间将正在大同前线待命的宿将伯颜召回首都，在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担任自己“扬命群王”的代言人。在忽必烈生命的最后十天里，伯颜和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迅速控制了元帝国政府。而在忽必烈死后，这两位顾命大臣又进行进一步的分工，由伯颜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而不忽木则负责忽必烈的治丧事宜。

不过此时无论是忽必烈寄予厚望的铁穆耳还是镇守漠北的晋王甘麻剌都远在讨伐海都的西线战场之上。而在等待他们返回大都的过程之中，一件颇为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1294年春天，就在忽必烈死后的第八天，当年为成吉思汗家族立下过汗

马功劳的木华黎之后，突然拿出一块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石进献给了真金的遗孀伯蓝也怯赤。

经过元帝国权威部门鉴定，这块玉石竟然就是自秦以来历代相传的传国玉玺。这件事情如果放在忽必烈生前，那么不仅私藏国宝的木华黎之后少不了人头落地，敢于接受这一馈赠的真金系也不免受到牵连。但是在这个风云变幻、人心浮动的节骨眼上，这一事件却被看成了“传国神宝不求而出”的祥瑞，“大功臣子孙之家”自然功不可没，而真金的两个儿子的地位更是“皇权天授”不可动摇。



元初名臣伯颜

不过无论真金系得到这一传国玉玺多么无稽，但是在伯颜的坐镇之下，从忽必烈去世到铁穆耳等人返回大都，元帝国政府依旧保持着日常运转，没有出现南必等宗室企图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的情况。但是新的问题随即出现了，在均为嫡子的情况下，铁穆耳和晋王甘麻剌之间似乎后者更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

铁穆耳私交甚密的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不得不挺身而出。

玉昔帖木儿的职务虽然是个言官，但是这位当年铁木真麾下四杰之一的博尔术嫡孙却是元帝国近卫军的行伍出身。长期以来更是征战沙场，功勋卓著。东道诸王中的乃颜、哈丹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在忽必烈死前，他更是元帝国与海都叛军交锋的杭爱山一线的敌前总指挥。有元帝国强大武装力量为后盾，玉昔帖木儿在上都的宗室诸王会议上说话自然很有分量，他首先站起来问晋王甘麻剌：“你爷爷都死了三个月了，大汗的位置一直空缺着，你作为嫡长孙，也不表个态吗？”面对这一显然把自己排除在继承人行列中的提问，甘麻剌只能回答：“我尊重大家的决定。”随后，在玉昔帖木儿的主持之下，宗室诸王一致推选铁穆耳为新君。这个时候玉昔帖木儿才坐下，表示：“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

不过考虑到这种武力压制往往会带来许多无法预料的后遗症，而甘麻剌又统领着铁木真当年四大斡耳朵所属领地以及当年塔塔儿部牧区的行政机关和野战部队，为了让他心服口服，在真金的遗孀伯蓝也怯赤的建议之下，甘麻剌和铁穆耳加赛一轮，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甘麻剌还有机会，因为“知子莫若母”的伯蓝也怯赤选择的是甘麻剌最不擅长的演讲。



铁穆耳的皇后卜鲁罕

果然一旦着急便会口吃的甘麻剌被铁穆耳轻松击败。不过这种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比赛，还是招来了元帝国宗室的非议。此时伯颜不得不再度站出来，握着剑柄站

在大殿之上，以严厉的口气陈述了拥立铁穆耳的种种理由，一时间竟令与会的听众都为之战栗，因为他们很清楚这并不仅仅代表他本人，他所握着的是元帝国主力野战部队的指挥权。最终在伯颜“与诸王饮于宫前”的一片团结和睦的气氛中，铁穆耳被公选为新任元帝国皇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予新发现的传国玉玺，于1294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

铁穆耳虽然是一直被称为“垂拱而治”的守成之君，但是由于晚年体弱多病，而自己一向宠爱的德寿太子早夭之后，又没有再明确自己的继承人，自然引来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引发了空前激烈的政治角逐。铁穆耳的两个哥哥都颇能生育，大哥甘麻剌有三个儿子，二哥答剌麻八剌尽管死得早，但也留下了三个继承人。对于曾经和自己争夺过帝位的大哥甘麻剌，铁穆耳自然没有什么好感。对于答剌麻八剌留下的孤儿寡母，铁穆耳却是颇为照顾，甚至一度有按蒙古旧俗纳寡嫂为妻的念头，但是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个人感情上还是政治上都令皇后卜鲁罕无法接受。于是卜鲁罕不仅竭力地阻挠铁穆耳的这一想法，更在自己的丈夫病危之时，将答剌麻八剌的遗孀答己和幼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贬放怀州（今河南沁阳）。

卜鲁罕是元帝国第一位非弘吉剌氏的皇后，她来自被蒙古帝国征服的钦察部。作为一个既有野心又有政治手腕的女人，她在铁穆耳健康日益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成功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而对于她的干政举措，即便是对她颇有非议的《元史》等汉族史料也不得不表示卜鲁罕摄政期间“大德之政，人称平允”。而随着铁穆耳的生命进入倒数计时，卜鲁罕也在为自己最终登上政治巅峰做准备，她的最终计划是邀请忽必烈嫡孙安西王阿难答来大都“辅国”，自己临朝称制。

卜鲁罕和自己的小叔阿难答之间的关系一直颇为暧昧，元帝国朝野更有其私通的传闻。但刨去儿女私情不谈，卜鲁罕和阿难答之间在政治上确实有其互补性。手中没有兵权的卜鲁罕需要掌握元帝国西北地区军政大权、长期以来一直积蓄实力的阿难答来充当自己的武力后盾，而长期远离中枢的阿难答也需要长期干政的卜鲁罕皇后在帝国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两人很快结成了对抗元成宗铁穆耳两个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政治联盟。

与凭借血统出身便坐拥陇西一省的阿难答相比，元铁穆耳的侄子海山在漠北的“江湖地位”却是自己打出来的。1299年，鉴于自己的叔叔——忽必烈的第八子宁远王阔阔出在与海都的战争中无所作为，铁穆耳派年仅十八岁的海山前往漠北前线。客观地说此时海都的实力在经过与元帝国漫长的拉锯战之后早已消耗殆尽，遇

上了锐意进取的海山很快便招架不住。海山在漠北战场的出色表现不仅多次挽回了战局，更为自己获得了怀宁王及瑞州（今江西高安） 65000户的封赏，成了元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但是在皇后卜鲁罕的刻意安排之下，在铁穆耳死后率先以奔丧之名抵达大都的是与卜鲁罕皇后关系暧昧的安西王阿难答。如果按照蒙元帝国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大汗死后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勒台”大会，那么沆瀣一气的卜鲁罕、阿难答这对叔嫂自然大有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连重兵在握的海山也不敢贸然回京，但是自忽必烈以来元帝国所建立的中央官僚体制事实上已经冲淡了元帝国宗室对政治事务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和卜鲁罕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的右丞相哈剌哈孙此时开始转向皇后的对立面，元成宗铁穆耳病死之后，他立即秘密派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两兄弟。此时虽然卜鲁罕皇后已经下达了切断通往漠北驿路的命令，但是对于哈剌哈孙这样老官僚来说，打“擦边球”正是他的强项，他疏通通政院将自己要送往漠北的文件签署日期改到卜鲁罕的命令下达之前，一路上自然畅通无阻。

随后哈剌哈孙又将首都各行政机关的印章全部收入府库，自己则开始“请病假”。但是他这个“病假”请得实在有些意思，尽管所有的文件不签署但是哈剌哈孙却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就在中书省“就地休养”，一连三个月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澡都不回家洗。这种顽强的“赖班”精神，令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推行临朝称制的计划完全无法施行。

不过手握重兵的海山虽然接到了哈剌哈孙的密件，但是从金山前线回到和林之后却接受自己的老师党项人乞台普济的建议，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由停下了脚步。而与之相比，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手中无兵无勇，却在自己的母亲答己和老师李孟的建议之下，毅然同样以奔丧为由从怀州赶往北京。同样是皇子的老师，乞台普济和李孟在政治嗅觉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

李孟劝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方法也颇有艺术，他搬出忽必烈来推翻了作为旁系的安西王阿难答继承帝位的法律依据——“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然后告诉自己的弟子：“你哥哥现在远在万里之外，可以挫败对方阴谋、安人心、保社稷的只有你！”在这些“大道理”还没有成功鼓动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情况下，李孟不得不拿出“杀手锏”来，告诉对方：“等到对方的阴谋得逞，只要一纸文书可就能置你们母子于死地啊！”这个时候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大彻大悟了，带着母亲答己返回了大都。

不过回到由皇后卜鲁罕、安西王阿难答所控制的首都之前，局势依旧不明朗。除了积极的李孟之外，其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幕僚都持悲观的论调，毕竟卜鲁罕作为皇后深居后宫，八玺在手，四大禁卫军少说也有几万人。加之安西王阿难答手下的侍卫、随从，爱育黎拔力八达手上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怎么够看，大家都觉得还是等海山的主力野战部队从漠北赶回来再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毕竟从实力来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确是角逐帝位三方势力中最弱的一个。但是李孟此刻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所要进行的是宫廷政变又不是内战，兵力对比并不重要。关键是掌握先机，何况比起安西王阿难答和怀宁王海山的野战部队来，中央官僚集团的支持更为重要。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回到大都之前，李孟已经私下秘密地拜会了哈剌哈孙。李孟和哈剌哈孙的会面颇具戏剧性。由于当时卜鲁罕皇后派来探病的使者和各方官员鱼龙混杂，李孟走进去抓着哈剌哈孙的手假装搭脉便立刻被当成了皇后派来的医生，从而轻松地建立了联系。

哈剌哈孙告知李孟皇后卜鲁罕已经定下了安西王阿难答即位的日子，此时“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在这个前提之下，李孟再一次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你现在跳出来，还能得到反对安西王阿难答的官僚集团和道义上的支持，你哥哥回来了，你再让位就是了。一旦阿难答当了皇帝，就算你哥哥来了，人家也不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双方就只有内战了！所以仗义而动，事必万全。”

应该说驻军和林的海山从一定程度上也震慑住了在大都的卜鲁罕和阿难答，在没有得到哈剌哈孙所领导的中央官僚集团的支持之下，即便占据优势的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作。虽然卜鲁罕和阿难答最终决定于1307年农历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为名拘禁答己母子。但是，在农历三月初二，在得到哈剌哈孙有关海山的使者已经抵达首都，需要立即召开内阁会议的消息后，卜鲁罕和阿难答以及其主要党羽竟毫不怀疑地钻进了对方精心设计的圈套，一进入会场便被悉数逮捕。有趣的是这场宫廷政变中顽强到底的竟然不是常年领军在外的阿难答，而是常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左丞相阿忽台，最终不得不由著名的大力士——察合台四世孙秃剌出手才将其制服。

随着卜鲁罕和阿难答及其党羽的先后落网、被处死之后，原先相互牵制的三方势力逐渐演化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之争。客观地说九五之尊的位子谁都有兴趣，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显得很谦卑。当聚集在大都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以“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为由劝进之时，爱育黎拔力八达表示自己只是诛杀了“潜结宫壶，乱我家法”的阴谋分子，不会“欲作威福以觊望神器”。在仿效拖雷担任监国的同时，将派人去邀请哥哥海山。

事实上爱育黎拔力八达此举完全出于无奈，自己在大都的宫廷政变虽然得到了哈剌哈孙等官僚集团的支持，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施政团队。连任命自己的老师李孟“参知政事”也遭到了朝臣们的非议，逼迫李孟在辞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

下逃亡在外。而海山也在母亲答己的以所谓“星命”要他放弃王位的刺激下，兵分三路大举南下，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只能放弃近在手边的皇位，主动欢迎海山南下大都，继任为皇。

其实海山的生母答己也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与卜鲁罕相比她的大局观更差一些。在自己的小儿子成功地在大都发动宫廷政变之后，一心想要由“天性孝友”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的答己竟想出一招空前绝后的臭棋，她派自己的亲信北上告诉自己的大儿子海山，告诉他“自己最近刚找人为他们两兄弟算过命，你如果当皇帝必然短命，只有爱育黎拔力八达才能在位时间长久。你们两兄弟都是我生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亲疏，这些阴阳家的推送，你不能不考虑”。

可以想象正在和林一心等待自己的弟弟奉玺北迎的海山当时的心情，他当即表示：“我在北方守卫边疆几十年劳苦功高，又是嫡长子的身份。你现在就拿所谓的星命来忽悠我吗？我登基之后如果能够顺应民心，就是只当一天的天子也能流芳万世！”随后果断挥军南下。好在答己还算聪明立刻自圆其说，向海山表示：“这些什么在位时间长短云云都是那些术师们告诉我的，我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告诉你的，其实现在大臣们已经商议决定让你继承皇位了，还是快点回来登基吧！”海山此时也表示自己对母亲的热心“很感动”，不过并没有急于抵达大都，而是在自己控制的上都与母亲和弟弟会面，完成权力交接。

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来看，元武宗海山是一个优秀的战场指挥官。在海都和其他西北叛军的作战之中他多次身先士卒，一举挽回了己方的不利局面。但是从一个君皇的角度来看，他任人唯亲，自己的宿卫马谋沙只是因为孔武有力“角斗屡胜”便被授予了平章政事的重任。一时间，元帝国内部又出现了武夫当国的局面。而在经济上则以货币改革之名大搞通货膨胀。这两点在元武宗海山短暂的执政期间并没有引发政治动荡和民生凋敝，但是却为元帝国的未来埋下了可怕的隐患。

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他按照此前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订立的“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的约定，册封对方为皇太弟。不过他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所锻炼出来的强悍体魄，最终在酒色的摧残之下竟然只支撑了短短的五年。　　1311年元旦，元武宗海山终于病倒了，七天之后病死于大都宫中的玉德殿，年仅三十一岁。

元武宗海山不是没有考虑过册立自己的儿子。为此，他的宠臣三宝奴还特意去试探过右丞相康里脱脱的意见。当时康里脱脱正在外面打猎便被突然召入了宫中，而理由便是：“建储议急，故相召耳。”康里脱脱是当年恭迎元武宗海山的往来使

节，可以说是“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约定的主要见证人。因此对于三宝奴关于“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怎么保证的问题，他当即以自己的个人信用予以了背书——“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

同样对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从南宋政权直接“转会”到元帝国宫廷的太监李邦宁。据说在元武宗海山死前，李邦宁曾提出“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是，元武宗海山却只用了一句：“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弟去说”，把这个还不算太坏的宦官打发了。

对于自己的哥哥打算推翻之前约定的想法，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可能不知道。因此，他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拿三宝奴开刀。因为三宝奴此前一些飞扬跋扈的行径，他的死非但没有人同情，相反引来了一片“富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的嘲笑之声。不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处死了试图颠覆他和哥哥海山“君子协定”的三宝奴，但却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没有“父传子，家天下”的想法。 1315年农历十一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突然册封元武宗海山的嫡长子和世瓎为周王，四个月之后又要求和世瓎经陕西、四川到偏远的云南去。应该说这一安排不仅仓促而且不得人心。为此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特地预防性地逮捕了当年为自己背书的康里脱脱。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

此时的康里脱脱已经被排除在了权力中枢之外，外放到江浙行省做左丞相去了。可怜的老头子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天才有有关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之前怀疑你参与了某些阴谋活动，所以把你叫回来。现在事情已经查清了，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了！”康里脱脱自然清楚所谓的“某些阴谋活动”指的是什么。于是当即表示：“我虽然曾受先帝的知遇之恩，但是太后和皇上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我又怎么敢擅自行事呢？”不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只是教育了康里脱脱一个，却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将所有持有“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元武宗海山的势力全部清除。

和世瑓抵达陕西便立刻被当地的驻军将领所拥戴，一场内战似乎即将爆发。但客观地说，和世瑓和他的部下有些操之过急了。毕竟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只是派

自己的侄子出镇一方，又没有正式剥夺他的继承权。连和世㻋的随从武恪都说：“太子（和世㻋）此行，于国有君命，于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书太子（和世㻋）反。”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之下，预定进攻潼关和河中府的两路大军还没出发便内部瓦解了。和世㻋只能逃亡西域，依附于察合台汗国。可以说和世㻋在陕西的兵变几乎是自断前途。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随后顺理成章地册封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1328年，和世㻋在察合台汗国已经寄居了12年。在“岁冬居扎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的生活中，昔日的皇霸雄图或许早已灰飞烟灭。但就在和世㻋已经逐渐习惯了其“政治难民”的生活之时，突然从大都传来了其弟图帖睦尔恭请他回国继位的消息。

对于本应是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的和世㻋，察合台汗国朝野还是普遍持同情态度的，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继承人硕德八剌因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是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㻋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因此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和世㻋）南还京师”。在一片拥戴声中，和世㻋飘然启程，却不知道自己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今天的明祖陵安葬着朱元璋父母的衣冠冢

就在和世瓎逆着其远祖成吉思汗西征的道路，快步奔向权力巅峰之际。 1328年农历八月初八，在安徽濠州钟离县孤庄村中，一个名叫朱五四的汉族佃农正忧心忡忡地迎接着自己家中第六个孩子的降生。朱五四祖籍江苏句容，但从他的父亲朱初一开始，这个家族便因为躲债而在淮河流域到处流浪，靠着佃种当地大户的田地而勉强苟活。在这种赤贫的家境之下，连多子多福都成为了一种负担，两个女儿不得不早早地出嫁，对于这个新出生的第四子，朱五四的心中或许也有过将其送人甚至直接溺毙的冲动，但最终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父亲还是怀着明天会更好的良好憧憬，将其按照出生日期取名为：朱重八。

第一章 两都故事（1328—1332）

南坡之变

逃亡察合台汗国之时，和世㻋不过是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而踏上归国之路时他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变迁往往在孩子的身上能够得到最为明显的体现，看着年仅2岁正依偎在母亲怀里的次子懿璘质班，和世㻋不免感觉已经8岁的长子妥懽帖睦尔有些孤单和寂寥，但是身为父亲的他并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妥懽帖睦尔的母亲早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而懿璘质班的生母八不沙却是显赫一时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外甥女。

作为曾经的元帝国统治者，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和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同为忽必烈次子真金的后裔。不过也孙铁木儿的父亲是曾与弟弟铁穆耳争夺汗位却因口吃而落败的“晋王”甘麻剌。应该说甘麻剌虽然角逐失败，但其在忽必烈身前所获“统领太祖（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塔塔尔部国土”的漠北地盘，并未受到太大削弱。相反还能不断以诸部饥荒的名义向元帝国中央要钱要粮，可以说在忽必烈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甘麻剌都是蒙古草原之上的“无冕之王”。甚至在其死后，元成宗铁穆耳仍不得不将其爵位和漠北的军政大权交给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继承。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应该说在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期间，年轻的也孙铁木儿并没有挑战自己两位堂兄的举动。而元帝国中枢对其在漠北的工作似乎也颇为满意，多次给予优厚的封赏。但是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并没有维系太久。随着1320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去世，元帝国中枢再度陷入了一场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之中。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之初虽然有一股新政治上的锐气，但是由于自己母亲皇太后答己的压制却迅速陷入了颓废。他本人也是个好酒之徒，还在他身为皇太子时，他身边的儒士们便以“近习多侍上燕饮”而写了一篇《酒诰》去规劝他。不过在戒酒的问题上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的大哥海山态度一致——“虚心接受，坚决不

改”。

海山在位时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阿沙不花也曾提醒这位年轻的君皇戒酒：“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爱，酒色实乃穿肠毒药，此古人所戒也。惟曲糵是沉，姬嫔是好。是犹两斧伐孤树，未有不颠仆者也。”元武宗海山随便表面上表示认可：“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但随即就命人向阿沙不花进酒。阿沙不花只能苦笑地无可奈何地说：“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

应该说在强悍的大儿子元武宗海山在位的四年时间里，身为皇太后的答己还算是收敛的。除了和宣徽院掌管宫廷饮膳的铁木迭儿勾勾搭搭之外也没什么恶行。可能是听到了自己母亲的相关绯闻，元武宗海山虽然在职位上给予铁木迭儿提升，但是随后就把他派往了江西，接着又调到了更为遥远的云南。不过遥远的距离似乎无法阻隔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的感情， 1310年，有官员意外地发现云南行省左丞相的铁木迭儿出现在首都。这一明显违反元帝国人事制度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尚书省的弹劾，铁木迭儿也随即被捕，但是很快在皇太后答己的干预之下，铁木迭儿只是被罚了一些钱便官复原职去了。

在元武宗海山英年早逝之后，皇太后答己不等自己的小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老情人铁木迭儿从云南召回了大都，还帮他谋了个中书省右丞相的职位。当然，与其说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出于私人感情，不如说是皇太后答己的政治野心在作祟，因为她利用这一元帝国的政治真空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清洗了元武宗海山所任用的官员千人之多。事实上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主政期间，皇太后答己已经通过铁木迭儿在元帝国政府内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自己母亲的肆行妄为，心中固然有所不满，但是他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却也并非只是“孝养顺承，惟恐不至”，为了追求一个“视虞舜而不愧”的孝子虚名，更多的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缺少自己的政治班底，在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上又渴望获得答己的支持以破除他与海山“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的约定。因此在自己儿子的纵容之下，皇太后答己变得更肆无忌惮起来，甚至趁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北巡上都的机会，把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叫进自己的宫中暴打一顿，更可怜的是等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从上都回来，张珪的儿子张景元还不敢告状，这一事件最终以张珪病休回家而告终。



元英宗硕德八剌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身体也不好，又处处受到自己母亲皇太后答己的掣肘。因此很早便倦于政事，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身上。他甚至不惜向近臣放出消息说：“我听说前朝都有太上皇制度。现在皇太子年纪也大了，可以继承我的皇位。我嘛就做做太上皇，和你们一起作作驴友，以终天年，不是也很开心吗？”可惜的是右司郎中月鲁帖木不解风情地表示：“我听说前朝的所谓太上皇，都是唐玄宗、宋徽宗那样在战乱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之下才产生

的。您还是老老实实地干下去吧！”事实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最后还能扶上马背再送上一程。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在三十六岁便撒手人寰了。早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生前，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便竭力推荐自己的孙子——硕德八剌继承帝位。而据说硕德八剌还是有过一番谦让的：“臣幼，宜立臣兄和世瓎”。但在这种表面躬让的态度背后却是这位已经在政坛历练过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全面“抢班夺权”的部署。他和奶奶答己的暗斗也就由此展开。

就在硕德八剌还披麻戴孝每天睡在地板上、只能喝一顿粥的居丧期间，太皇太后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随后开始对长期以来和自己作对的大臣展开大清洗。面对这样的局面，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但是身为太皇太后的答己显然太小看了自己这个十七岁的孙子。当答己通过徽政院使向元英宗硕德八剌发出“请更朝官”的要求之时，对方直接回答道：“现在是大范围撤换官员的时候吗？况且这些都是我爹和我伯父的老班底，怎么能轻易更换呢？等我亲政了之后，和宗亲、元老们商量了之后再决定吧！”直接把自己奶奶给顶了回去。

在硕德八剌即位初期，这位年少气盛的君皇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有人告发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御史大夫脱忒哈等人正在阴谋要废掉自己，另立新帝之时，元英宗硕德八剌在没有进行审判的情况下便将这些人悉数处死。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徽政使”失列门也牵扯其中，所以“若是审到最后，他们把太皇太后扯进案子里来，那该怎么办？”这一粉碎“失列门等人的阴谋集团”的动作极快，令太皇太后答己几乎来不及干预，这位老妇人终于在又气又急之中只能在：“我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小儿！”的感慨声中和她的老情人铁木迭儿相继去世了。两个月之后元英宗硕德八剌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直接将“徽政院”也裁撤掉了。

元英宗硕德八剌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答己的压制，因此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更刻意营造出一种“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的氛围。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自己的奶奶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元英宗硕德八剌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大臣动遭谴责”。只是因为御史台谏修寿安山佛寺，就一口气杀掉了重臣观音保、锁咬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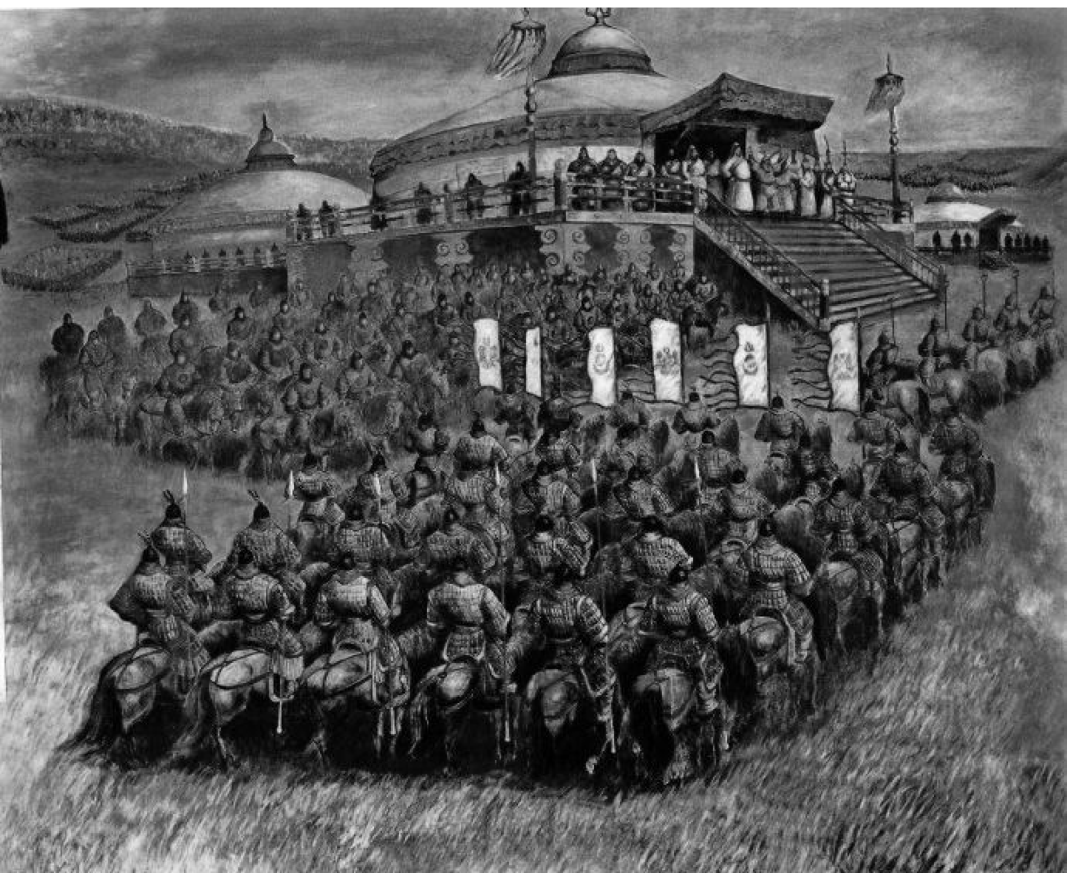
哈的迷失，杖责了成珪和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

除了脾气不好之外，元英宗硕德八剌还喜欢酗酒，而其酒后又往往乘醉杀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史骡儿被召进宫中就发现元英宗硕德八剌喜欢“使酒纵威福”，偏偏还无敢谏者。一天元英宗硕德八剌在紫檀殿上饮酒，让史骡儿弹弦唱歌。史骡儿编了一首《殿前欢》。但其中一句“酒神仙”却引来了杀身之祸。而史骡儿被杀之后，元英宗硕德八剌才酒醒，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处决了史骡儿，直到问起这个人的时候，才后悔地说：“史骡儿是在劝我戒酒啊！”元英宗硕德八剌的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

就个人能力而言，硕德八剌在同龄人中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但是作为一个君皇而言，他却是一个失败者。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本人早年没有机会建立一个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不无关系。不仅在与自己祖母答己的暗战之中，他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就是在清除了太皇太后的党羽之后，他所能重用的也只有木华黎的后裔，忽必烈时代的名相安童的孙子——拜住以及自己的大舅子铁失而已。当然中国历史也不乏依靠少数精英班底便开创一个盛世的情况，但就是硕德八剌的这两位左膀右臂，彼此关系还不够融洽。

在职位分工之上，元英宗硕德八剌在左丞相位置空悬的情况下，任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负责政府内部事务。而铁失则在独署御史大夫事的基础之上，还兼任忠翊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主要掌管监察和内卫机构。这种军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一方面说明了硕德八剌的确没有什么干部储备，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对拜住和铁失的绝对信任。但是拜住在处理铁木迭儿当年所留下的“诳取官币”案中却意外地发现铁失也牵扯其中。虽然起初硕德八剌以铁失与自己的私人关系而赦免了对方，但是在拜住却不依不饶地反复陈奏，最终令疑惧日甚的铁失不得不铤而走险。

作为硕德八剌身边近卫军的指挥官，铁失要发动宫廷政变并不困难。但是干掉元英宗硕德八剌之后该怎么办？铁失还需要得到蒙古宗室的支持和一个强而有力的外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向镇守漠北的也孙铁木儿派出了密使。应该说无论是从宗室地位还是个人实力而言，也孙铁木儿都的确有角逐皇位的资本。我们不知道铁失之前是否已经和也孙铁木儿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当铁失的密使斡罗思抵达了漠北表达“事成，推大王为皇帝”的意愿时，也孙铁木儿的反应却是见诸史料的，他立刻囚禁了斡罗思，派自己的亲信别列迷失立刻赶往上都向硕德八剌发出警告。



元朝皇帝巡幸上都

也孙铁木儿的使节抵达上都之前，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拜住已经在“南坡事变”之中被铁失所指挥的近卫军乱刀砍死了。所谓的“南坡”指的是元帝国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以南三十里的南坡店。每年春分时间，元帝国的统治者都要以避暑为名离开大都前往上都居住，除了驰猎，休闲之余，还要接见漠北草原之上的亲王贵胄，直到秋分时节才返回大都。铁失在南坡发动武装政变，成功杀死了政敌拜住和被后世称为“元英宗”的硕德八剌之余，还开创了元帝国乃至中国历史的一项纪录：参与暗杀行动的铁失集团中仅王侯就占了三分之一，每人头上都有知枢密院事、大司农、中书平章政事之类的头衔，堪称“史上最高职位暗杀团”。

对于元帝宗硕德八剌的评价，史学界向来褒贬不一。如果抛开政治不谈，作为一个丈夫，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硕德八剌或许可以算是恶劣的了。除了他用情不专，

仅皇后便同时册立了三个之外，这位21岁便领导一个帝国的青年性格暴虐，酗酒闹事，据说还有毒瘾和演习藏传密宗中双修术的不良记录。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他有一个贤明的妻子——速哥八剌。速哥八剌精通汉学，据说不仅能写史甚至可以参与修订史册。而对于政治事务，速哥八剌也甘于幕后，她时常穿戴整齐地去迎接自己的丈夫下班，劝说他收敛自己年少气盛的脾气，多培养一些亲信再推行所谓的新政和变革。可惜的是，元帝宗硕德八剌并没能真正听从自己妻子的劝告。尽管继承帝位的泰定帝也孙贴木儿对硕德八剌这位堂弟的遗孀保持着礼节上的尊敬，但是，在“南坡事变”四年之后， 27岁的速哥八剌最终带着无限的抑郁离开了人世。

表面上看也孙铁木儿在这次宫廷政变中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只是因为“晚到一步”才没有能够及时阻止这场阴谋。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就让他有些匪夷所思了，留守大都的元帝国政府官僚和亲王们并不急于平叛，而是第一时间和铁失一样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了“劝进”的呼声，关于这一点身为中书平章政事的张珪甚至还“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世为国忠臣，不敢爱死。事已如此，大统当在晋邸”。似乎一切都是临时决定的。随后由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组成的代表团带着皇帝玺绶前往漠北。此时长期以来“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的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况之下，才颇为勉强地在克鲁伦河畔宣布即位。

如果说元帝国官僚们的这一举措还算是为了遏止“铁失阴谋集团”窥探皇位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的话，那么也孙铁木儿在即位之后所发布的大赦令可谓是空前绝后。也孙铁木儿宣布此次向来被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列为罪无可赦的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一律既往不咎，倒是谋杀自己丈夫的妻子依旧必须执行死刑。显然这样的反常做法，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谋杀元英宗硕德八剌的铁失等人。

当然这不过只是也孙铁木儿的缓兵之计，根据他自己的表述：“铁失阴谋集团雄锯两都，掌握着兵权、省印、宪台，军政宪一把抓。自己只能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随着时间的推移， 1323年农历十月，登基才一个月的也孙铁木儿便在自己的地盘上首先秘密处死了前来劝进的也先帖木儿代表团成员，随后又派亲信旭迈杰为右丞相，让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


也孙铁木儿的外侄女乃马真八不沙

此时的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重臣自居，不仅和旭迈杰关系颇为融洽，甚至还一起举行了告祭太庙的仪式，据说在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颇为离奇的事件——“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事后人们都将这阵怪风理解为元英宗硕德八剌的鬼魂作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也像是对铁失的一种警报，因为仪式结束之后，旭迈杰便以也孙铁木儿的名义下令将铁失等人满门抄斩。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很多，因此也孙铁木儿随后也定下了一个基调——“逆党协从者众，何可尽诛”。而同样是“劝进”的张珪更不仅没有任何处置，相反还得到元老级别的特殊优待。

被称为泰定帝的也孙铁木儿其显然很清楚自己的即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在任内便全力优待此前一直受到政治迫害的宗室贵族。之前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流放海南的元武宗海山之子图帖睦尔因此得以返回大都，被封为怀王之后，虽然随后又被派往南方居住，但是毕竟物质生活比较富足。而逃亡西域的和世瓎因为有过“谋反”的“不良记录”虽然不在召回名单里，但也孙铁木儿还是将自己的外侄女乃马真八不沙许配给他，也算是给予了一定的优待了。应该说也孙铁木儿的本意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事实上返回大都的图帖睦尔和重新得到认可的和

世瓛很快便成为了野心家手中的旗帜。

应该说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的儿子元英宗硕德八剌时代的历次政治斗争之中，元武宗海山的派系虽然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中枢之外，但却依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随着同样是北方边防军出身的也孙铁木儿执政，这些“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元武宗海山麾下后裔们不仅重新得到了重用，而且开始跃跃欲试起来。当年一心想要元武宗海山册立自己儿子为皇的三宝奴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哈剌拔都儿却整天“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据说这个愤怒的青年是为“愤忠鲠以报国家”，不过他所谓的“国家”应该还是那“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狭义理念。

而在所有的元武宗海山旧部之中混得最好的莫过于“将门虎子”的钦察人燕铁木儿。燕铁木儿的家族是在与海都的战争之中和元帝国中的钦察军队一起逐渐崛起的，他的曾祖父班都察在蒙哥时代不过是一个带着百来个人钦察士兵远征大理的连级军官。不过到了燕铁木儿的祖父土土哈时代，在忽必烈与海都的战争中，由于双方的蒙古族士兵往往彼此认识，因此土土哈所率领的精锐钦察骑兵团便逐渐成为了主力。到了忽必烈统治的末期，土土哈的钦察族军队已经达到了数万人的集团军规模，土土哈颇为牛气地向忽必烈表示自己的部队“足以备用”。

土土哈的儿子床兀儿同样在与海都的战争中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当床兀儿从北部战线凯旋之时，元成宗铁穆耳不仅授予了床兀儿镇国上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等高官厚禄，甚至还将自己的衣服脱下赏赐给他。而在随后的对海都展开最后一轮打击中，床兀儿更是充当了元武宗海山的高参和急先锋的角色，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连一向好勇斗狠的海山都感叹：“何其壮耶！力战未有如此者。”这一次扑灭海都最后抵抗的战争，不仅令军功第一的床兀儿再次获得了元成宗铁穆耳赏赐的御衣的荣誉，更因为元成宗铁穆耳“卿镇北边，累建大功，即便全身包裹黄金也不足以我犒赏你的”的评价，而得以迎娶公主察吉儿，成为了皇室成员。

不过对于床兀儿这样一员悍将，即位为元武宗的海山还是颇为忌惮的。在赐封床兀儿为句容郡王的同时，一向喜欢胡乱封赏的海山颇有心计地将当年忽必烈远征大理时的野战帐篷、穿过衣服以及晚年所乘坐的安舆赏赐给他。床兀儿似乎也清楚“鸟尽弓藏”的道理，因此当即叩头泣涕表示：“贪宠过当，臣实不敢。”对于床兀儿的谦虚，元武宗海山似乎感到很满意，当即对左右表示：“其他人怎么就不知道推辞一下呢！”当即让有关部门提供其他的宝马、轿车，亲自送床兀儿到门口。



床兀儿及其钦察军队的奋战

而随着元武宗海山的去世，元帝国在西北地区再度与察合台汗国暴发边境冲突。和自己的哥哥不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军事能力有限，因此不得不再度倚重床兀儿。尽管三年之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因年龄的问题将床兀儿从前线召回，但是对他的恩赏依旧有加，按照宗室亲王的待遇每见必赐坐，每食必赐食。床兀儿也表示："老臣受朝廷之赐厚矣，吾子孙当以死报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床兀儿的儿子们的确实现了老爸的承诺，为元武宗海山的子孙们夺回了帝位。

作为床兀儿的第三个儿子，燕铁木儿少年时代便是元武宗海山的近卫军成员。自己的老爸退休之后，他继承了左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岗位。从史料之中，我们无从得知燕铁木儿身为近卫军指挥官是否参与了铁失的"南坡事变"，但是从他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执政时期兼任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的同佥枢密院事来看，也孙铁木儿对他还是颇为信任的。

但是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代，真正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是兼任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色目人官僚倒剌沙，把持枢密院的则是倒剌沙的哥哥马某沙和阿散火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燕铁木儿虽然身居要职但是却基本没有了上升空间。而随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燕铁木儿现有的岗位也可能因为皇太子阿剌吉八的登基而化为乌有。

根据自己堂弟元帝宗硕德八剌的前车之鉴，泰定帝也孙贴木儿在巩固自己权力的问题上也作了诸多努力，他早早地就册立了自己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同时还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麻亦儿间卜继承自己的晋王，以镇守蒙元帝国在漠北的龙兴之地。但是阿剌吉八和麻亦儿间卜年纪都还小，于是皇太子的生母八不罕便自然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虽然有八位皇后、二位贵妃，但是他的第一夫人八不罕却是一个有名的醋坛子。据说在自己的权力稳固之后，八不罕皇后便拒绝庞大的后宫继续膨胀，于是她时常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丈夫宠幸过的宫女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在八不罕皇后看来，这似乎是一件铲除情敌又收买人心的两全好事，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那些大臣们接手"皇帝的女人"是什么心情。



也孙铁木儿之子阿剌吉八

除了两位王位继承人和一个强盛的“第一夫人”之外，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世期间分封的诸王多达24个，权力的大蛋糕随时面临着重新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当1328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染疾罢猎，不久即北赴上都度夏，燕铁木儿毅然决定串联留守大都内廷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及其他居心叵测的宗室，一旦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上都去世，立即发动全面的军事政变。

燕铁木儿最初的计划可能是在上都和大都同时发难，一举将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势力连根拔起，但事实证明长期充当也孙铁木儿的高级幕僚，并把持朝政五年之久的倒剌沙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的。就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死后不久，倒剌沙在上都果断处死了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但是对于大都方面倒剌沙却是鞭长莫及了。毕竟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颇有家族影响力的钦察侍卫亲军，同时还身兼着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的“总环卫事”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

1328年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果断带着精锐的内卫部队杀气腾腾地召集在大都的各政府部门负责在兴圣宫开会。表示：“武皇（元武宗海山）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当场逮捕了倒剌沙在大都地区的看守内阁——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以下的14人。随即又没收首都各机关单位的图章，宣布全城戒严，算是正式接管了首都的军政大权。

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是忽必烈第七个儿子奥鲁赤的孙子。阿剌忒纳失里和伯

颜、脱脱一样似乎是一个蒙古语中常见的名字。以至于在元史中这位西安王常常被和著名的越王秃剌之子混为一谈。身为王室贵胄又深得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信任，我们很难想象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参与燕铁木儿阴谋的真实动机。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旁系宗王阿剌忒纳失里是没有足够的政治号召力的。因此在发动政变之初，无论是大都方面的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还是他们麾下的将帅们可以说都心中没底。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即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之中，燕铁木儿每天晚上也要更换自己的卧室。

据说燕铁木儿曾紧急提拔了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但是这些人得到了封赏却不知道应该感谢谁，只会傻傻地站在那里，燕铁木儿之好让他们向南拜谢，因为在发动政变前后，燕铁木儿随即派出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等人前往江南恭迎被贬居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而同时南下的还有前往串联出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拔都儿”伯颜的密使。

“拔都儿”伯颜是当年和成吉思汗发生过抢亲战争的蔑儿乞部后裔，他的祖父是蒙哥麾下的一个营、连级军官——领军百户，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作为烈士家属，“拔都儿”伯颜的父亲谨只儿得到了一定的政治优待，在元成宗铁穆耳时代已经身居总领太后兴圣宫宿卫的要职了，而十五岁的伯颜更跟随着元武宗海山北上，参与了对海都叛军的最后一战，据说也是因屡立战功，被赐号“拔都儿”。为了与那位指挥灭宋的忽必烈时代名臣伯颜相区别，我们就姑且叫他“拔都儿”伯颜。



和世㻋之弟——图帖睦尔

“拔都儿”伯颜毫无疑问是元武宗海山麾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他人生的第一次事业巅峰出现在1309年农历十一月。作为尚书省平章政事的“拔都儿”伯颜，还被特赐蛟龙虎符，兼任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总监（达鲁花赤）。可惜随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即位，他的行情一路走低，虽然没有因为出任和世㻋的政治顾问而受到牵连，但此后也一直在行省平章政事、行台御史大夫的岗位上轮调着。到了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代才略有起色，在出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同时，被佩以虎符

有权节制江淮诸军。

在得到了燕铁木儿发动政变并准备拥立元武宗海山之子的情况下，“拔都儿”伯颜显示出了高涨的热情，当即表示：“无论是和世㻋或者图帖睦尔，都是‘吾君之子也’。我过去是都是受了元武宗海山的恩赐，才有今时今日的社会地位。”随后立即派出自己的亲信罗里前往大都，告诉燕铁木儿“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以准备全力响应。

在得到“拔都儿”伯颜所领导河南行省的率先支持之下，燕铁木儿虽然占据了元帝国政治、经济中心——大都，但是却依旧存在着政治号召力不足、缺乏后勤支撑、多线作战等不利的因素，随时可能被手握漠北、辽东、陕西庞大战略资源的上都集团扑灭。就如“拔都儿”伯颜麾下的行省参政脱烈台所说：“现在元帝国的主要战马牧场和近卫军都在上都集团的手中，燕铁木儿手中有限的兵力却要分散防御长城一线的各个隘口。我看他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要想活下去，还是应该早做其他打算。”为此这位参政甚至还怀揣利刃准备刺杀自己的领导，可惜“拔都儿”伯颜毕竟在战场历练过的，不仅拔剑砍死了对方，还顺手收缴了脱烈台麾下所属部队的马匹和兵器。

“拔都儿”伯颜对燕铁木儿的支持首先是政治上的。随着河南行省倒向大都集团，居住在江陵的图帖睦尔才有可能顺利北上。而在途经河南行省的行政中心汴梁之时，“拔都儿”伯颜立即率军五千护送其北上，令燕铁木儿让自己的手下假装成和世㻋和图帖睦尔的赴京使臣，宣布两位王子已经先后启程“旦夕即至”的空头支票及时得到了兑现。而随着图帖睦尔抵达大都，燕铁木儿立刻要求他登基为帝。

对此，图帖睦尔还有所顾虑，他说：“我哥哥虽然远在西域，但毕竟长幼有序！”燕铁木儿当然知道和世㻋虽然长期寄居在察合台汗国，但是在四川、云南等地也不乏准备以之为旗号的野心家。但是此时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但同时仍不忘谦虚地宣布：“我只是临时代理，等到我哥哥回来我还是会让位给他”。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图帖睦尔的这一表态从某种意义上稳住了支持和世㻋的各方势力。

其次是经济上，“拔都儿”伯颜显然很清楚搞政变是一项最花钱的事业，因此在宣布站在大都集团一边之后，他立即对河南行省的钱粮储备进行了详细的会计核算。应该说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河南行省尽管没有恢复到北宋和金帝国中期的繁荣，但也是一个相对富足的大省。但是“拔都儿”伯颜却仍向下属各乡镇下达了提

前征收第二年的田租、向各地商人借贷，甚至节流东南其他省份经过河南上缴的财政收入。

“拔都儿”伯颜的理由很充分，因为除了图帖睦尔北上所产生的“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差旅费支出之外，随着大都和上都两大集团全面火拼的开始，河南行省必然需要负担巨额的军费。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一些正常开支之外的“赏赉犒劳之用”也是绝对不能省的，毕竟像自己这样“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的忠臣“伤不起”啊！当然在军事上“拔都儿”伯颜虽然跟随着图帖睦尔北上了，但他临行之前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大量的亲信安排到下属各郡县，最终使得河南成为了阻击上都集团陕西方面军向东突击的重要缓冲地带。

根据著名的清末民初历史学家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中的说法，燕铁木儿完全是站在自己是将门虎子的基础上，轻视上都集团诸王、大臣的军事能力，才敢于铤而走险的。上都集团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虽然采用了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四路从居庸关、古北口、辽东迁民镇紫荆口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事实上也都成功了，在1328年延续两个月的“两都之战”中，燕铁木儿始终处于内线机动防御的态势。战火一度烧到大都城下，连新科皇帝图帖睦尔都一度不得不走出大内，在齐化门外准备亲自督战。

面对颇为不利的战局，燕铁木儿单骑请见，向图帖睦尔表示：“陛下亲自出马，只会让大都的百姓惊慌失措。战场的事情还是交给我，请您还是回宫吧！”在“元帝国虽大，背后就是大都”的情况下，燕铁木儿的身影几乎出现了每一次战役的先锋位置。被燕铁木儿劝回的图帖睦尔不得不派人提醒对方：“丞相每临阵，躬冒矢石，脱有不虞，奈何？以后还是站在高处摇旗督战吧！”每天都不得不玩命的燕铁木儿此时估计也只有苦笑了，他在唱：“凡战，臣必以身先之。”的高调之后表示：“若委之诸将，万一失利，悔将何及！”

即便是燕铁木儿在大都战场不断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连续不断地击溃上都集团的各路大军。事实上全国各地其他地区的形势依旧不明朗。由大都南下的湘宁王八剌失里在山西战场上夺取了重镇冀宁（今山西太原），而支持上都陕西行省驻军更击败了燕铁木儿临时装备了折叠弩的潼关、虎牢关等地的要塞守军，逼近大都方面设立战区指挥部（行枢密院）的河南行省首府汴梁。此时接替“拔都儿”伯颜担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是翰林学士阿不海牙。

面对上都集团咄咄逼人的兵锋，阿不海牙不得不多次召开敌前军事会议，有趣

的是，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些所谓的会议发言人始终只有阿不海牙一个，其他人的反应不是“遵命”就是“好！”。可见在这场元帝国的内战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骑墙派。

大都集团内部是这样，上都集团同样如此。在四路围攻大都的军队之中，最为卖力的是居庸关方向的梁王王禅所部，可以说是屡败屡战，这份直执或许只能用兰陵王高长恭的那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来理解，毕竟他是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侄子，同样颇为努力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也是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侄子。不过既然是内战，那么自然不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当燕铁木儿和梁王王禅等人在居庸关、古北口一线反复拉锯的时候，上都集团辽东方面军在当时还没有山海关的情况下一举进据通州。



八不罕皇后

此时即便是燕铁木儿这样的猛将也是分身乏术，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支主力部队却在原地逗留不前长达两天之久，眼睁睁地看着燕铁木儿从古北口率师南救。虽

然兵法上有以逸待劳的说法，但是在通州城下战败的却是从容休整的辽东军队。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先期抵达通州的只是辽东方面军的前哨部队，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搞笑了。当辽东军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之后，随即又得到后续大部队的增援，结果与燕铁木儿再度交手，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们跑得很快，史料记载，在辽东军主力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的时候，以机动性见长的燕铁木儿竟然“追之不及”。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元帝国辽东地区的军队由于承平日久，战斗力已经急剧退化。不过很快同样来自辽东的军队却在向上都进军的过程中轻松地将梁王王禅的残余主力打得大败，逼迫权相倒剌沙献玺出降。这个时候历史的聚光灯下才缓缓走出元帝国辽东军界的大佬——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而这个联络了元帝国“东道诸王”关键时刻发动反戈一击的人物也是钦察人，而且还是燕铁木儿的叔叔。

而一年多之后，他所领导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便将改名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可见辽东的蒙古驻军之中在“两都之战”中可能已经充斥着燕铁木儿的同族兄弟。此时我们或许才能够理解“两都之战”。在燕铁木儿所指挥的大都保卫战那最关键的两天时间里，如果他兵败古北口，那么辽东军也可能在第一时间从通州发起“大义灭亲”的进攻。

兵败的泰定帝继承人阿剌吉八不知所踪，他的母亲却成为了燕铁木儿的俘虏。按照元帝国的惯例，这些失势的后妃们被全部流放到安东州。不过这一次不知道是新任皇帝元文宗图帖睦尔突发奇想，还是有人故意为之，总之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遗孀竟然由“拥立有功”的太平王燕铁木儿亲自押送。在一路之上燕铁木儿是否日夜辛劳不得而知，但是此后他决心不“让寡妇再守活寡”，将一些泰定帝也孙贴木儿的遗孀收为自己的王妃却是时有传闻，其中是否就有八不罕皇后，史学家众说纷纭。

上都集团在关键时刻的崩溃，无疑挽救了已经被对手兵临城下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阿不海牙。这位元武宗海山当年的近卫军，表面上“朝夕出入，声色不动，怡然如平时”、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忍不住大发牢骚，表示：“我长期身受国恩，关键时刻也只能一死以报圣上，可恨的是我的那些部下，一个个都不肯卖命——太平日久，将校不知兵，吏士不练习，才让我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好在此时上都集团陕西方面军意外地截获了从大都前往汴梁的信使，得到了上都已经开城投降的消息，随即从汴梁城下撤军，最终才解除了阿不海牙不得不“以死报国”的危机。随后

被元文宗图帖睦尔提升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上都集团的溃灭并不代表着元帝国内战的结束，事实上，就在“两都之战”的同时，身为元帝国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的囊加台始终拥兵自重，在自称“镇西王”的同时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随着上都的收复，已经即位为帝的图帖睦尔再也没有了道路不通的阻碍，向察合台汗国派出使节迎接自己的哥哥和世瓎。不过，和世瓎并没有他弟弟的谦让精神，　1239年正月，在途经和林的时候，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便草草地宣布自己是元帝国的合法皇帝。

旺忽察都

作为元武宗海山的儿子，和世㻋似乎觉得自己此时的境遇和当年的元武宗海山成功即位颇为相似，在弟弟图帖睦尔“肃清宫闱”之后，自己可以轻松地从漠北下山去采摘“胜利的果实”。而当和世㻋的使者抵达大都之后，民间“吾天子实自北来矣！”的欢呼更令他相信自己经历流亡和寄居的流离生活之后，终于时来运转了。在面对图帖睦尔所派来的使节撒迪时，和世㻋说出了一番颇有意思的话：“我弟弟曾经百览经史，不知道最近荒废了没有？让他在代理政务的闲暇时间，多和士大夫们亲近亲近，讲论古今，以知治乱得失。”大体上已经准备好了让图帖睦尔去坐而论道了。

不过和世㻋似乎忘记了他父亲海山是带着三万精兵南下才让自己的弟弟——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俯首帖耳的，而和世㻋身边所有的随从人员总计也就不到两千人。当然图帖睦尔本身也是靠着燕铁木儿等人的拥戴才上位的。随着燕铁木儿等元帝国新贵携带玉玺北上恭迎，和世㻋还是有机会拉拢对方的。不过和所有的政坛暴发户一样，和世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排场，他对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说：“朕到上都来，宗室诸王一定会都来入觐，这不是一般的会议活动。诸王察阿台也是跟着朕一起过来的，你们要好好准备，知道不？”

当然颐指气使本来就是君皇做派，燕铁木儿等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问题。而和世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很快便在“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的基础之上，宣布对燕铁木儿的任命：“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这些头衔不仅没有超出燕铁木儿之前的待遇，甚至还故意漏掉了此前燕铁木儿此前一直担任的国防部长（知枢密院事）一职，倒是给了监修国史的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军人出身的燕铁木儿当然心知肚明。不过此时他还抱有最后的一线希望，特意提醒了一句：“陛下君临万方，国家大事所系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而已，宜择人居之”。不过和世㻋领会错了，随后就开始大肆提升自己的亲信，除了和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被分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之外，更有一百多名潜邸旧臣和和世㻋身边的卫士获得各种委任状。

如果说这样的人事任命已经令燕铁木儿难以接受的话，和世㻋的两次重要讲话就可以基本理解为是在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了。和世㻋的第一次谈话表面上是针对

监察机构长官的，他说："天下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中书省是右手，枢密院是左手，左、右手有病，不吃药行吗？以后无论是宗室诸王还是政府官员，一旦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都要从重从严处理。这叫'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当然我有过错，也欢迎大家多提意见，我一定不会怪你们的。"这一讲话应该说已经是在敲山震虎了，但是接下来和世瓎更直接把燕铁木儿找来，说了一套关于政府行政机构的分工之后，最后加了最关键的一句："倘违朕意，必罚无赦"。而在自己直属领导的支持之下，和世瓎的随从们也跟着不把燕铁木儿当回事了。对于这种"不为之礼"的行为，燕铁木儿除了"且怒且惧"之外，自然也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和世瓎的这种做派不仅使在上都的燕铁木儿不满意，身在大都的图帖睦尔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身为九五之尊自然很爽，他即位之后便迫不及待地顶着舆论的压力，册封自己的妻子卜答失里为皇后；一方面因为自己此前的表态，不得不北上迎接自己的皇兄。不过在起程之后，他还是设置一个名为"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的机构安排在自己未来的皇太子办公室——詹事院，以便为自己退位之后留下一条敛财的路子。

"两都之战"期间双方骑兵部队只要十天左右便可以完成的旅程，图帖睦尔整整走了一个多月。而在路上似乎还与自己的哥哥意外地错过了，在上都又逗留了大半个月，才又折回赶到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自己父亲海山所设立的行宫旺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县境），面见自己的兄长和世瓎。

他们兄弟之间重逢的时间前后不满五天，1329年农历八月六日，元明宗和世瓎莫名其妙地突然"暴崩"了。这一史称"旺忽察都事变"的政治事件成为了元帝国历史最为清晰的"悬案"，说它清晰是因为无论是燕铁木儿还是图帖睦尔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杀掉这个多少有些看不清形势的君皇；而之所以更成为"悬案"是因为史学界一直都不明白究竟燕铁木儿和图帖睦尔谁在这次政治谋杀中扮演主导角色。兄弟相残自然是人间悲剧，但是在残酷的政治舞台上本身就容不下元明宗和世瓎这样习惯"抢戏"的明星。



旺忽察都旧址

客观地说，图帖睦尔不是一个毫无亲情可言的人，也许在他在自己兄长死后“入临哭尽哀”或许还有些做作，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一再提起“旺忽察都”并试图将帝位传给和世㻋的儿子的种种举动却着实要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杀死自己兄长还泰然自若的君皇要有人情味得多。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燕铁木儿“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的保护之下以三天的时间赶到上都，又有六天的时间完成了登基大典的筹备。

在野心家手中活人固然可以成为号召，不过死人有时也不妨拿来作为旗帜。盘踞于四川的“镇西王”囊加台此前在元帝国强大的武力压制之下已经接受了元文宗图帖睦尔的赦免和招降。但是随着“旺忽察都事变”的发生，似乎又有蠢蠢欲动的迹象，元文宗图帖睦尔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以“指斥行舆，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处死。不过“按下葫芦浮起瓢”，原先便曾在上都集团中敌视元文宗图帖睦尔的云南诸王秃坚等人再度公开叛乱，战火一度弥漫整个滇东北。此时的燕铁木儿位高权重，又收了包括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老婆在内的众多宗室女子为妾，自然不愿意走出温柔乡再赴修罗场。于是平叛的重任不得不落在了当年一起发动大都政变的阿剌忒纳失里身上。

阿剌忒纳失里在“两都之战”中虽然站对了队伍，但是因为在战场上没有更多出

彩的表现，所以虽然屡获赐与，且列名皆在同时受赐诸王之首，但是除了从“两字王”（西安王）进为“一字王”（豫王），以及以江西行省南康路为食邑之外，并没有获得什么实权。此时元文宗图帖睦尔让他出镇云南，固然有借重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的宗室威望，控制当地局势的考虑，但是不断地给予阿剌忒纳失里赏赐的行为，大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投桃报李。

可惜阿剌忒纳失里的军事才能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云南之乱历时将近一年，元帝国先后从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等地抽调野战部队，在国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投入了大量的军费，阿剌忒纳失里却始终搞不定，令元文宗图帖睦尔大动其火，甚至下诏派遣使者前去督战，结果阿剌忒纳失里直接又中了秃坚之弟必剌都迷失的伪降之计，所率的汉族野战部队全军覆没。最后还是由曾经阻击过囊加台的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出马才勉强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叛乱。

应该说，元文宗图帖睦尔对“旺忽察都事变”的亏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帝位，他必须对自己的政敌施以空前严厉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对拥护自己的燕铁木儿、阿剌忒纳失里、“拔都儿”伯颜等人，他又不得不厚加恩赏，甚至授以专权。由于云南平叛战役的失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随后便被授命出镇陕西，从此淡出了元帝国的政治中心。而“拔都儿”伯颜虽然没有燕铁木儿那样转战八方的赫赫战功，但是作为恭迎、护送自己从江陵北上大都的“首义之臣”，元文宗图帖睦尔对他的封赏仅在燕铁木儿之下。

尽管在“旺忽察都事变”之后，燕铁木儿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同时元文宗图帖睦尔又不设左丞相，同时还诏告天下，表示燕铁木儿功勋卓著，应该独断专行，以体现他的权威，所有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和所有官员都不得越级报告。基本上是将元帝国的政治事务全部交给了燕铁木儿处理。

但是比较微妙的是曾令燕铁木儿耿耿于怀的国防部长（知枢密院事）的职位，元文宗图帖睦尔同样没有授予燕铁木儿，而是交给了“拔都儿”伯颜。而“拔都儿”伯颜同时也享受了许多和燕铁木儿相同的政治优待，比如被册封“二字王”、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诏建生祠、立碑记其拥立之功、追封其先三世为王等。应该说在表面上纵容燕铁木儿大权独揽的同时，身为君皇的元文宗图帖睦尔还是留下制衡的手段。

元明宗和世瓎在前往大都即位的过程中不明就里的死去之后，他的妻子乃马真

八不沙一度锲而不舍地探究真相。不过不知道是出于愧疚的心理还是其他一些什么原因，元文宗图帖睦尔对乃马真八不沙异常的宽容，不仅帮助她在大都为亡夫大作法事，更几次三番地保护这个苦命的女人，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妻子卜答失里皇后向自己的丈夫提出不杀乃马真八不沙后患无穷，元文宗图帖睦尔一笑置之，此后卜答失里皇后又捏造证据，说乃马真八不沙勾结外臣，谋立懿璘质班为帝，元文宗图帖睦尔更表示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在几近崩溃的情况下，卜答失里皇后只能自己动手。当然一些史料上说乃马真八不沙是被卜答失里皇后从背后推下楼摔死的提法恐怕还是靠不住的。

自己亲哥哥元明宗和世瓎意外死亡，“旺忽察都事件”可以说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后半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这一点，他的妻子卜答失里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此她曾不惜重金资助建造了大承天护圣寺为自己的丈夫追求心理上的慰藉。不过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却多少有些不厚道，卜答失里借自己丈夫的手将抄没的名臣张珪家的田产四百顷划到了大承天护圣寺的名下，可谓是慷他人之慨。

尽管元文宗图帖睦尔和卜答失里皇后有两个儿子，但是长期以来元文宗图帖睦尔却始终固守着“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的原则，希望将帝位传给自己的两个侄子——妥懽帖睦尔和懿璘质班，为了保护自己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可以顺利登基，身为皇后的卜答失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她害死了自己的嫂子乃马真八不沙之后，又诬陷妥懽帖睦尔的血统不纯，最终令元文宗图帖睦尔将其流放外地。但是她的这一番努力最终换来了的却是被册立为皇太子的阿剌忒纳答剌离奇病死。这种“人算不如天算”的情况最终令卜答失里放弃了抗争，她接收了权臣——太平王燕铁木耳的建议，将自己的次子古纳答剌交由对方收养，改名为燕帖古思。



今天坐落于颐和园内的大承天护圣寺

收养未来的太子，在燕铁木儿看来无疑是对自己家族的显赫权势最好的巩固，于是更加投入到他自己所热衷的纵情声色之中。从燕铁木儿在“两都之战”中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但事实证明任何事情一旦过度都将对身体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身为太平王的燕铁木儿到底有多少妻妾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记录了他收纳了元帝国宗室的女子便有四十多人，而其他民间女子估计更不计其数，有些他更是娶回家三天就送回娘家了。最后连燕铁木儿自己都不记得哪些是自己的女人了。

据说有一次燕铁木儿到元帝国政坛元老赵世延家里吃饭。不过赵世延虽然自幼习文、多少也算是个读书人。但是这餐家宴却是男女宾客混坐，虽然美其名曰“鸳鸯会”，但站在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实在可以说是斯文扫地。我们也许只能认为赵世延是主随客便，或者在和燕铁木儿领导编撰《经世大典》的过程中被“带坏了”。这样的“鸳鸯会”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是社交派对，果然很快燕铁木儿便发现自己不远处坐着一位美女，随后立即打听对方是谁，准备吃完饭直接带回家，不过得到的答案却多少有些令燕铁木儿有些沮丧——那位美女竟然就是自己从家里带来

的“内人”。



懿璘质班

与燕铁木儿的好色无度相映成趣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酗酒成性。元帝国的历任统治者及宗室亲王似乎都是无酒不欢的主，不过元文宗图帖睦尔的酗酒却多少还是令人表示同情的。早年在图帖睦尔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出任藩王之时，面对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猜忌，他不得不借着酗酒来掩饰自己“韬光养晦”。而在“旺忽察都事变”之后，酒精更成为了他逃避“隐亏天伦”负罪心理的无二良法。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慢性酒精中毒的双重作用之下，1332年农历八月，年仅二十九岁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在执政后不到五年便去世了。

元文宗图帖睦尔的英年早逝，使得刚刚完成了一轮政治大洗牌的元帝国高层再度面临继承人的选择问题。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临死前曾立下遗嘱：“昔者晃忽叉（即

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因此主张不册立自己的子嗣，而将帝位传给元明宗和世瓎后代，以求获得自己心灵最后的慰藉。这一决定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并非没有可操作的余地。毕竟无论对于大权在握燕铁木儿、“拔都儿”伯颜，还是意图以皇太后身份摄政的元文宗图帖睦尔之妻卜答失里而言，年仅七岁的元明宗和世瓎次子懿璘质班都是一个不错的傀儡，而懿璘质班的哥哥妥懽帖睦尔则暂时被排除在皇帝候选人之外。

第二章 天威如狱（1333—1340）
——元惠宗对燕铁木儿家族及权臣伯颜的压制

天降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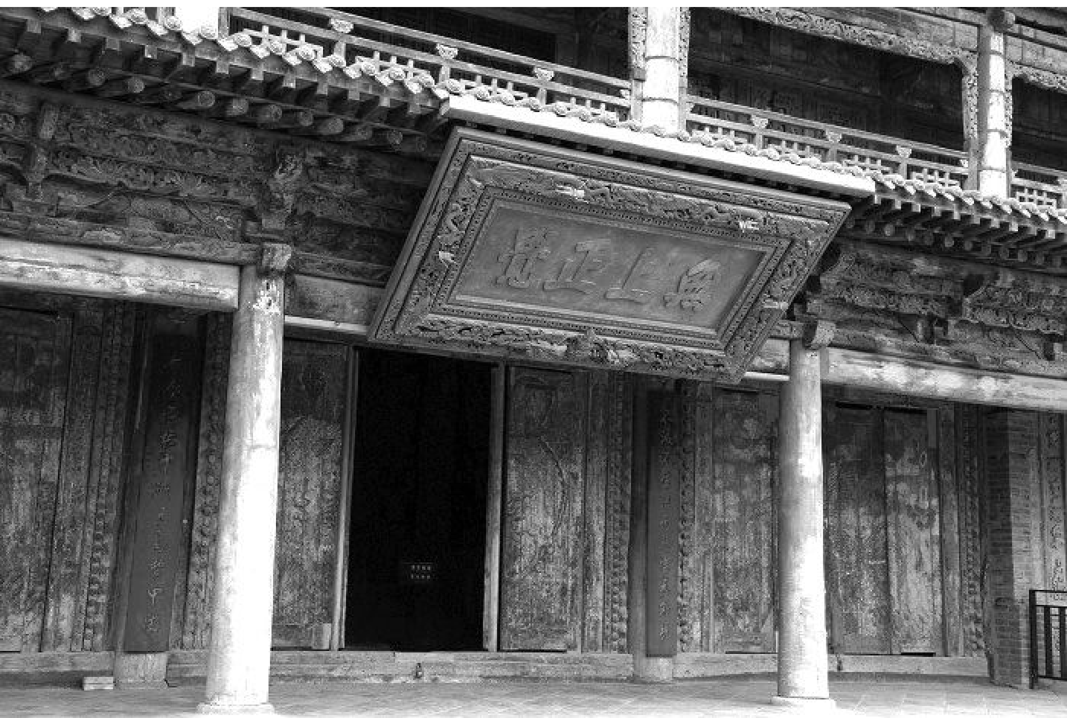
妥懽帖睦尔之所以不被燕铁木儿和卜答失里看重，除了他当时已经十三岁，比较难以操控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血统问题。妥懽帖睦尔不是元明宗和世瓎的皇后乃马真八不沙所生，因此虽长非嫡。继承顺位排在懿璘质班之后本身也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在乃马真八不沙离奇死亡之后，在元帝国宫廷内部妥懽帖睦尔“非明宗（和世瓎）子”的谣传逐渐扩散开来。在还没有亲子鉴定成熟技术的情况下，妥懽帖睦尔随即被流放到了朝鲜半岛。

关于妥懽帖睦尔的身世之谜，随着元帝国的崩溃又演化出了多个版本。其中最为夸张的莫过于“合尊龙爪”的传说。在明代陆容的作品《菽园杂记》中有颇为诗意的笔法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时承锡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扒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寧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泣泪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鏞。乞归行宫養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忆昔宋祖受周禪，仁义绰有三代风。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妥懽帖睦尔的生父是在临安出降的南宋皇帝赵显，而元明宗和世瓎不过是他的养父而已。

“合尊龙爪”本来只是一个笔记小说中的花边新闻，读者一笑了之也就算了。但偏偏自明帝国以来就是有那么多好事者不断挖空心思去广征博引，最终传说逐渐开始接近于真实。首先无论赵显是否在明光宫趁着酒劲去扒金柱的行为，历史上他的确被元帝国政府遣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并在萨迦大寺，改名为合尊法师。其次赵显虽然作为君皇统治南宋的时间极短，但是其即位和出家的年纪都比较小，因此在忽必烈之后元帝国频繁的政权更迭之中，他和妥懽帖睦尔之间虽然已经隔了数代君王，但是两人的年纪却还能对得上。在合尊法师赵显写下“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的诗句而被元英宗硕德八剌处死之时年仅五十二岁，而这一年妥懽帖睦尔也已经三岁了。而合尊法师赵显晚年又被元政府从萨迦大寺迁居到甘州十字寺（即今张掖大佛寺）恰巧又在元明宗和世瓎流亡的西域附近。

既然人物身份、时间、地点都能凑得上，那么“合尊龙爪”的故事也就越编越圆了。

唯一的漏洞是妥懽帖睦尔的生母，根据史料的记载元明宗和世瓎在逃亡的途中受到了罕禄鲁部的拥戴，并迎娶了当年投靠铁木真的阿儿思兰汗后裔之女——迈来迪。迈来迪的身份虽然比起元明宗和世瓎来算是“微贱”的了，但好歹也是部落酋长之女，似乎没有朝秦暮楚的理由。于是史家大笔一挥，将她的身份从“公主”降为了妓女。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改，整个故事不仅圆满而且香艳了许多。



今天的张掖大佛寺

不过，无论关于妥懽帖睦尔身世的种种传闻是否靠谱，在1333年正月之前，从朝鲜半岛的流放地迁居广西静江的妥懽帖睦尔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看不到丝毫希望的，能够即位为帝估计更是连做梦都不敢去想的事情。但是命运有些时候就是无稽。七岁的元宁宗懿璘质班仅仅作了四十三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本来就建立在各方势力相互妥协之下的微妙平衡被再度打破。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大背景之下，燕铁木儿和即将继续晋级为太皇太后的卜答失里不得不进行一轮新的权衡。

关于谁是妥懽帖睦尔意外获选的幕后推手，各方史料各执一词。应该说没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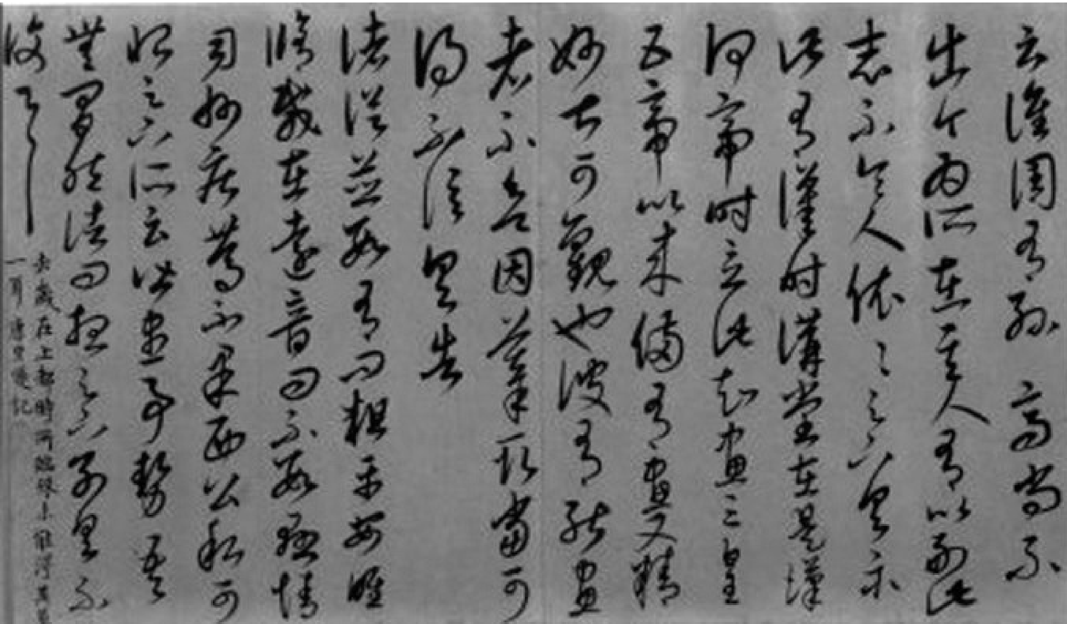
为母亲的卜答失里皇后更希望自己的儿子登上九五至尊才对。但偏偏此时卜答失里皇后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年将自己的儿子寄养在太平王燕铁木儿家中所产生的后遗症。一旦燕帖古思登基将成为燕铁木儿家族彻头彻尾的傀儡。因此，为了将燕铁木耳排除在最高权力中枢之外，卜答失里皇后不得不在元明宗和世瓎的次子——短命的元宁宗懿璘质班死后，表示："天位至重，吾子尚幼，明宗（和世瓎）长子妥懽帖睦尔在广西，今十三岁矣，其迎立之。"

1333年，按照古老东方天干地支的纪元方式，这是一个金水相生的"癸酉"之年。而在当时伴随着蒙古铁骑一同入主中原的藏传密宗佛学的字典之中，"癸酉"一词还被赋予了"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的解释。虽然这种玄奇之说并不足以为凭，但未来颠覆整个东亚政治版图种种剧变的种子，却的确是在这四季的寒热凉暑里迸发出第一缕新芽。

农历二月的漓江之畔，数百年后被推崇为"甲天下"的如画山水，对于矗立其妥懽帖睦尔而言不过是一个天地之间的巨大牢笼而已。甚至当迎接他入京登基的太平王燕铁木儿抵达之时，妥懽帖睦尔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在一路北行的道路上，这位常年被流放在外的王子表现的并不比他的父亲元明宗和世瓎更好。据说一路之上，燕铁木儿和妥懽帖睦尔并肩骑行，不断地拿着手里的马鞭指点山河，大唱"国家多难"的高调，不过妥懽帖睦尔的表现却很冷淡。

这也难怪，这位王子常年以来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突然面对这样一位"传奇英雄"难免有些怯场。不过燕铁木儿却觉得这是城府极深的表现，于是回到大都之后竭力阻止妥懽帖睦尔的即位。但是他对这位新皇帝的反感程度似乎还没有除之而后快的地位，否则北上的道路之上他有无数的机会再制造一起"旺忽察都事变"。

从一些汉族士大夫的笔记小说中看，妥懽帖睦尔是一个颇有小聪明的人。他登基之初在接受藏密佛教的教育时曾见到佛像前供奉着羊心，于是就问那些密宗的喇嘛："我曾听说之前还有用人心肝供奉的情况，有没有？"喇嘛回答说："的确有！不过那些都是心生害人之念的恶人的心肝"。于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追问道："那这只羊也有害人之心吗？"身为帝师的喇嘛一时竟也无法作答。而由于之前一直过着被流放的囚徒生活，妥懽帖睦尔登基之初也颇为节俭，他将御膳每天的羊肉的用量减少了一半，一年就节约了三百五十只羊以上的宫廷伙食开支。除此之外，他还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



康里子山是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登基之初的妥懽帖睦尔也颇爱学习。也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是。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他的老师主要是名士康里子山。康里子山不仅为妥懽帖睦尔讲解《四书》《六经》这些儒学经典，还掺杂讲了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不过康里子山的讲学模式也不免失之迂腐。

妥懽帖睦尔实在学腻了，就提出想找几幅古画来养养眼。康里子山随即拿来了郭忠恕《比干图》，又说了一堆“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的大道理。好不容易妥懽帖睦尔找到了一些宋徽宗赵佶的画来欣赏。康里子山又故意卖关子说：“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妥懽帖睦尔问是什么事情，康里子山随即说：“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这些道理在后来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成长中显然都起到了反作用。

不过妥懽帖睦尔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在自己的弟弟懿璘质班去世为他扫开通往帝位之路后。他抵达大都才几个月的时间，始终认定妥懽帖睦尔即位将导致天下大乱的燕铁木儿又因为长期荒淫而糜烂的生活方式在肾衰竭的折磨之中病死。妥懽帖睦尔得以顺利地继承帝位，成为元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撇去治国的才能不谈，仅就政治斗争而言，妥懽帖睦尔实在可以说是一把好手。面对当年大肆造谣自己是“野种”的卜答失里他既往不咎，继续给予对方以太皇太后摄政的权力。对于害死自己父亲的燕铁木儿家族，他不仅封赏有加，还迎娶了燕铁木儿的宝贝女儿——钦察答纳失里为皇后。此外，他还承诺自己将遵守“兄终弟及”的原则，在自己死后将帝位传给太皇太后卜答失里的儿子、太平王燕铁木尔的养子——燕帖吉思。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元帝国各方政治势力都表示基本满意。

不过妥懽帖睦尔很快便开始着手打破自己所构建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任命燕铁木尔之弟撒敦为中书省左丞相、太傅，继承了燕铁木尔所有的政治优待，自己的大舅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之后，妥懽帖睦尔还逐步提升长期久居燕铁木尔之下的七朝元老——“拔都儿”伯颜。他对“拔都儿”伯颜的任命则是中书省右丞相、太师。也就是表明在政府职务上“拔都儿”伯颜仍在撒敦之下（左、右丞相），但是在资历上“拔都儿”伯颜却已经力压了撒敦一头（太师、太傅）。

而妥懽帖睦尔随后颁布的一道行政命令则更令人玩味——以后元帝国内部除了伯颜、撒敦之外，其他官员不能再同时兼任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职务，也就是说直接把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势排在了第二梯队。而此后妥懽帖睦尔很聪明地听取了自己父亲元明宗和世瓎的老部下阿鲁辉帖木儿的建议，将日常政治事务都交给伯颜、撒敦去处理，自己则躲进了深宫做起了“甩手掌柜”，因为“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

站在燕铁木尔家族的立场考量，妥懽帖睦尔的安排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却也无可指责，毕竟燕铁木尔和“拔都儿”伯颜的江湖地位都是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的。撒敦和唐其势虽然也参与了“两都之战”，但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呈，由他俩驻守的居庸关和古北口都被上都军轻松突破，燕铁木尔在大都近郊疲于奔命的四处救火，很大程度上便是拜这一弟一子所赐。

明英烈



单田芳 述录

王樵 王俊明 整理

春风文艺出版社

以元末乱世为背景的《明英烈》

因此面对妥懽帖睦尔的一系列人事安排，撒敦还是比较理智的。他主动把中书省左丞相的位子让给自己的侄子唐其势，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从旁指导。但可惜的是唐其势这个官二代的休养和性格似乎都不太适应机关工作，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撒敦只能重新出马，一年之后便病死于任上。有趣的是在日后汉族艺人关于元末政坛风云所编纂的各种版本的《英烈传》中这位短命的撒敦都成已奸臣的形象出现，并贯彻了演义的始终。

正史之中撒敦的死无疑敲响了太平王燕铁木尔家族灭亡的丧钟，长期以来抱着“天下都是我家的，伯颜凭什么爬在我头上！”想法的唐其势虽然正式继承了中书省左丞相的位子但却依旧怨念难平，开始串联留守上都的叔叔——句容郡王答里，弟弟——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养子——塔剌海、诸王晃火帖木儿等人准备效法自己的老爸再次发动武装政变。显然唐其势这个纨绔子弟把政变简单理解为了群殴，如此大张旗鼓地呼朋唤友，连镇守漠北的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剡王彻彻秃都收到了风声。这方面姜还是老的辣，得到侄子准备“再干一票”的消息后，句容郡王答里连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妥懽帖睦尔的召见，算是在上都为燕铁木尔家族积蓄最后一搏的力量。

1135年，唐其势所发动的叛乱只能有“自投罗网”来形容，当他从东郊率领党羽杀入皇宫之后才发现“拔都儿”伯颜早已调集了精锐的近卫军严阵以待，这个时候发现势头有些不队的唐其势竟然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面对要将他逮捕的内宫卫士，死死地拉着殿前槛杆，大声叫道：“我姐夫曾经说过，会赦免我一家九代的死罪，如今怎么可以食言啊！”结果换来的结果只是手臂被打断而已。随后在大都的句容郡王答里试图起兵相应，但随即被“拔都儿”伯颜调集的野战部队扑灭。太平王燕铁木尔的时代随着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唐其势阴谋发生政变被捕后，燕铁木耳的幼子塔剌海逃进后宫试图寻找自己姐姐——皇后答纳失里的庇护。长期的流放生涯使得妥懽帖睦尔在元帝国的政治中枢没有自己的根基。因此迎娶太平王燕铁木儿的女儿更多的只是出于政治考量。在太平王燕铁木耳在世的时候，两人的感情表面上还说得过去。有趣的是贵为国母的答纳失里和她的父亲一样贪婪无度，竟然在后宫内搞起了盐业倒卖的生意，而妥懽帖睦尔对此不仅没有反对意见，还主动提供物流服务，只是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利润如何分割。

和自己兄长同样短视的答纳失里皇后此时也显然忽视了自己的处境，竟然将自己的弟弟塔剌海藏在椅子底下，并用自己的裙摆遮挡。不过伯颜和他的部下显然没有什么忌讳，直接掀起皇后的裙子将塔剌海拖出来当场杀死。随后又以“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护之者”的名义，要将裙摆上溅满自己弟弟鲜血的答纳失里皇后也带走。这个时候答纳失里皇后只能向自己的丈夫求救，但是换来的却有一句冰冷的“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任凭答纳失里皇后被伯颜赶出后宫，最终在开平的民宅中被杀死。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

全面解除了太平王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之后，1338年农历六月，逐渐巩固了自身权力的妥懽帖睦尔以谋杀自己的亲生父亲、阴谋害死乃马真八不沙皇后、长期将自己流放在外等罪名将卜答失里流放到安东州，随后又觉得不放心，还是下诏将其赐死了。至此昔日左右妥懽帖睦尔命运的重臣、后妃势力被连根拔起。但妥懽帖睦尔要乾纲独断仍需要面对大权在握的“拔都儿”伯颜的挑战。

元帝国权力中枢并没有呈现太久的真空期，以剿灭唐其势叛乱功臣自居的“拔都儿”伯颜虽然依旧只是中书省右丞相，但是朝野之上已经呈现了他自认第二，每人敢称第一的局面。唯一可以力压他一头是剡王彻彻秃，毕竟“拔都儿”伯颜虽然政治地位极高，但出身却是被铁木真家族收为奴隶的蔑儿乞部。因此“拔都儿”伯颜每次见到剡王彻彻秃都要叫一声：“使长”。

这一点在过去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此时的“拔都儿”伯颜而言却显得格外令人难以忍受，他说：“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于是便组织官员弹劾剡王彻彻秃“图谋不轨”，虽然妥懽帖睦尔拒绝将其处死，但“拔都儿”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一个后太平王时代似乎呼之欲出。

由于长期以来所奉行严苛的经济和民族政策，早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其社会状况便一直存在着若干不稳定因素。在追击南宋流亡政府的灭亡前后，江南各地反元义军四起。其中规模比较大有福建陈吊眼、广东大埔畲洞女豪杰许夫人、黄华、黄广德、林桂芳等人。而根据史学家的统计，仅1283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南方各地便发生起义二百余起，而1287年这一数字又上升到了四百余处。



元代农民起义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

如此频繁的民变，也难怪在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要感慨说：“自南宋流亡政府覆灭于南海之后，我依旧要和敌人连年鏖战，连脱下战甲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些反元起义往往声势浩大“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而元帝国的血腥镇压更令江南大地满目疮痍——“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其四”。

在南宋流亡政府最终溃灭前后，元帝国可以轻易地将这些民变归咎于对手的唆使和煽动，而事实上在当时许多反元义军也的确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与南宋流亡政府的军队直接联手，或沿用南宋年号以增强自身政治号召力。但是在崖山战役之后，反元起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日益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日益扩大。可见真正造成江南鼎沸之势的是元帝国长期以来的“吏治不清”以及好大喜功造成的。比如忽必烈在灭宋之后所急于展开了频繁对外战争。不过这一时期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帝国政府军所镇压。总体来说，此时元帝国的社会矛盾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1277年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1278年浙江处州（今丽水市）农民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义。随后衢州地区农民推选陈千二为领袖，遥相呼应。　1296年，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

建号称王，声震远近。而在这些以数字为名的起义军领袖之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1315年在江西赣州宁都聚众起义的蔡九五。

蔡九五起义由于发生在元帝国的统治中期，因此其规模并不算太大。其顶峰时期也不过“围宁都、焚四关、分掠郡邑”而已。但是却引起了元帝国监察机构的充分重视，御史台大臣向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蔡五九之变，皆由鼐智密鼎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而其中的“经理田粮”指的是从1314年冬天开始，元帝国政府希望通过核实田地实际所有情况来甄别和控制土地兼并，核定粮食征收标准的一项新政策。应该说“延祐经理”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由于推行实施的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吏治腐败，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纷纷抢在政府核查之前，大肆侵占土地。以至于出现新丰一县便强行拆毁民宅近两千户，除了与活人争地之外，许多人为“虚张顷亩”甚至连墓地都不放过，以至于“夷墓扬骨”。

而蔡九五虽然被元帝国宣称为强盗土匪，但是从此后受到政府嘉奖的汀州宁化县赖禄孙一家的遭遇来看，这些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揭竿而起的民众并不是泯灭人性的杀人狂。当农民起义发生之后，赖禄孙背着自己的老妈带着自己的妻子逃入了附近的山里，母亲生病之后，由于没有水，赖禄孙只能用自己的口水去滋润母亲干裂的嘴唇。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起义军主动送来了水，有人想要抢走赖禄孙的妻子，立刻遭到了起义军的群起呵斥：“怎么能侮辱孝子的老婆呢？”而随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取消“经理民田”的举措，蔡九五的起义军也随即瓦解。

早在妥懽帖睦尔接掌政权之前，元帝国经济状况便每况愈下。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代元帝国便不断经受自然灾害的考验——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直到湖北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啸，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蝗虫成灾。而随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去世而引发的内战，更令元帝国原本运转正常的国家机器逐渐开始失去了效率和作用。在“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的民谣声中，承平已久的中原大地再度呈现出一片鼎沸的态势。

妥懽帖睦尔统治时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行者是山东的陈马骡、河南的胡闰儿以及广东的朱光卿。但这三位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当平定了胡闰儿的元帝国河南行省右丞相庆童将所俘获的弥勒佛、小旗、宣敕和紫金印、量天尺等战利品送往大都之时，曾有蒙古族官员抓住汉族同僚长期以来“讳疾忌医”隐瞒各地民情的特点，特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还是侍御史许有壬挺身而出：“胡闰儿自称李

老君太子，还建立了自己的年号，组建反政府武装，摆明是造反。有什么好说的！”也就是说只要不是那么张扬，对于很多啸聚一方的地方豪杰，元帝国的各级官吏还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的。就好像1346年，有一伙在山东聊城以南，以会通河中段码头活动的“四十大盗”常年抢掠元帝国的漕运船只和过往商旅，两淮运使宋文瓒提议应该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追捕，但是这份报告却如同泥牛入海从此没了消息。

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是在元帝国政府高层的不作为和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中逐渐发展壮大的。在平定山东陈马骡起义的过程中，出任山东廉访使的高昌人答里麻便是先弹劾失职的地方官员，然后再组织军事镇压的。但是这一方法却没有得到元帝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除了针对平民的种种限制之外，在元帝国政府内部，“拔都儿”伯颜也希望逐步把汉族官员全部清理出队伍。 1335年，“拔都儿”伯颜便曾支持自己的党羽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所提出的取消科举考试的建议，虽然遭到了以许有壬、吕思诚等为代表的汉族儒士的全力反对，但是这一苛政依旧在元帝国施行了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大量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拔都儿”伯颜的任命之下进入了元帝国的政治中枢和各级行政机关。而随后仍在元帝国政府部门任职的汉族官员则要定期接受“诛捕之法”的“再教育”。

事实上，在妥懽帖睦尔统治初期的农民起义中，并非所有的汉人都投身于反政府武装的行列，在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的畲民起义中，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县民萧景茂便自发地组织民兵进行了抵抗，萧景茂兵败被俘之后仍以“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为名拒绝加入起义军行列。龙岩尉黄佐才也积极地响应元帝国号召，与李志甫起义军鏖战，结果全家四十余口全部遇难。但是，这些民间的力量却被远在大都的“拔都儿”伯颜直接无视了。这位元帝国的权臣最为荒唐的决定是提出要将汉族的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氏全部杀光。好在最高统治者妥懽帖睦尔还有些理智，关键时刻表示反对，才免除了中原大地血流成河。

在对汉族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同时，“拔都儿”伯颜在元帝国内部的声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除了大肆敛财达到“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的疯狂程度之外，他还大力扩充卫队“诸卫精兵收为己用”，每次出行所带的侍从都是满坑满谷，反倒显得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近卫军声势单薄。

除此之外，“拔都儿”伯颜还将收藏在太府监的历代玉玺全部磨掉篆文，改成镇

纸及鹰坠等小玩意儿送给了自己的亲信。唯独逃出他魔掌的是当年唐帝国武则天的私人图章，这块玉色莹白的图章虽然是制作如官印，但极其袖珍仅半寸大小。因为无法改作他用，于是竟得以保全。

在“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的情况下，一场血腥的“帝相之争”随时可能会爆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拔都儿”伯颜的侄子脱脱认为：“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那么我们整个家族都会有危险”。于是在老师浦江儒学大师吴直方的教导之下开始暗中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亲信来往，为自己寻找退路。

1339年农历十一月，元帝国政坛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政治事件。身为河南省行御使台掾史的范孟端假传圣旨、杀死了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封为河南都元帅。这一事件对元帝国所造成实际损失并不大，但是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甚至间接导致了“拔都儿”伯颜的倒台。

根据元末明初江西吉安儒生权衡所著的《庚申外史》中的说法，事件的起因是来自河南杞县的范孟端本身是一个家里没什么钱又不喜欢交际的小吏，长期以来得不到升迁，受尽了亲戚朋友认为他“不办事”的白眼。长期压抑的心理，让范孟端跑到河南行省的办公大楼写下了“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的字样。客观地说这是一首反诗，即便是出现于向来主张“不以言行杀士大夫”的两宋期间，估计范孟端至少也是要被开除公职的，但是河南行御使台的主管似乎和范孟端私交还不错，事后竟然还提拔了他，不过却没有同时提高工资待遇。因此，范孟端不仅没有感激，相反暗下了“我必杀若辈”的决心。

范孟端所采取的手段极其低级，他让自己的好朋友霍八失等人假扮成来自首都的密使，在他值班期间跑来假传圣旨。这样的安排只要河南行省的官员稍有理性就可以识破，偏偏当天晚上以河南行省“一把手”月鲁帖木儿为首的主要领导班子都在工作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摇晃着跑来。在所谓圣旨的斥责之下被一一用铁榔头敲死。随后“圣旨”又册封范孟端为河南都元帅，没收河南地区各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宣布实行戒严。应该说范孟端在短时间之内所拥有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辛苦打拼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如果他本人有一定的政治抱负的话，很可能有机会搅起一场新的内战。不过在事件发生的头五天里，他不是忙着到处祭祖，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到处找曾经耻笑自己“不办事”的大小官员晦气。

一个行省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进入军管状态，而庞大的政府机关竟然被一个小吏耍得团团转也算是千古奇闻了。而整个故事的结局也颇为搞笑。当同样是小吏的冯二舍在得知自己被范孟端任命为省宣使之后，很开心地跑去叩谢对方，并要求范孟端为自己引见来自大都的“特派员”。这个时候范孟端也和被自己处死了那些封疆大吏一样喝醉了，随后就说：“哪有什么特派员，我就是了！”冯二舍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随后向当地驻军报告，最终才处死了范孟端和他的主要党羽——霍八失等人。

长期失意的范孟端以血腥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主要领导应该说本身的心理动机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动员如此之少的社会力量，用如此拙劣的表演便轻松令百官俯首听命，数万大军进入戒严状态，甚至封闭黄河大江渡船，阻断南北交通，却可以说是连范孟端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而范孟端事件的背后除了折射出元帝国政府机关“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的集体盲从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更是政府领导频繁更迭下的人心惶惶的真实写照。在范孟端事件所牵连的大小官员中唯一受到表彰的归暘虽然没有接受伪职，但却未必是洞悉了范孟端阴谋，只是“有母在堂”不愿卷入政治纠纷而已。

范孟端事件除了直接牵连河南行省的诸多官员之外，还令长期对汉族不信任的“拔都儿”伯颜进一步向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提出将汉族官员从重要监察机构——廉访使岗位上全部撤换的建议。而这一次跳出来和他唱反调的竟然是他最为信任的侄子脱脱。为此“拔都儿”伯颜直接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要求惩治对方——“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

不过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却表现得很镇定：“这是我的意思，和脱脱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联盟此时已经隐然形成。而究竟“范孟端事件”是“拔都儿”伯颜和脱脱正式决裂的原因还是结果，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是整个1339年冬季，这对伯侄一直在积蓄各自的力量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脱脱不断扩充皇宫近卫军的做法，“拔都儿”伯颜曾试图阻止，但是脱脱却只是简单的一句：“天子所居，不可能不重点保护。”便让对方语塞了。

“拔都儿”伯颜显然很清楚自己的短板在于缺乏政治号召力，因此开始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和法定帝位继承人——皇太弟燕帖吉思暗中勾结。1340年农历二月，“拔都儿”伯颜邀请燕帖吉思到柳林地区狩猎，这一次活动究竟是准备发动军事政变还只是一次普通的会晤，或许没有人知道。但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和脱脱等人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控制了大都城内的主要机关部门，并发出了将“拔都儿”伯颜降职为河南行省左丞相的行政任命，关键时刻“拔都儿”伯颜还心存幻想，带着三十几名骑兵跑到大都城下。却只换来了脱脱“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卫。”的大声呐喊。

权倾一时的“拔都儿”从此成了孤家寡人。据说在前往河南赴任的道路上他曾对自己的同宗兄弟们说道：“你们今天见到了儿子杀老子了吗？”可惜在政治利益面前从来没有所谓的亲情，此时的“拔都儿”伯颜的亲戚已经全部站在了新贵脱脱一边，

于是回答他说："我们没见到儿子杀老子，倒是看见了有大臣要杀皇帝？"无奈的"拔都儿"伯颜只能孤独地走上了自己人生的末路，最终"病死"于被流放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的路上。

从政治阅历上来讲，二十六岁推翻自己伯父"拔都儿"伯颜的脱脱同样可以算是"三朝老臣"，他十五岁便因为膂力过人，能挽一石的硬弓而成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刺吉八的近卫军军官，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更被授予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职务。而在自己伯父大权独揽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执政初期，脱脱同样是飞黄腾达的少年亲贵，除了虎符亲军都指挥使的军职之外，还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担任元帝国监察机构的领导。

脱脱是元帝国少有的文武全才，在儒学大师吴直方的熏陶之下，脱脱不仅颇有政治才能。据说还擅长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更很早便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的志向。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还是过于年轻了。在"拔都儿"伯颜倒台之后，汉族士大夫虽然称赞脱脱此举可以说是"拔去大憝，如剔朽蠹"但是真正把持朝政的却是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

马札儿台和"拔都儿"伯颜不愧为一奶同胞，虽然他的哥哥死后，朝野有人写下了"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的讽刺诗，但马札儿台同样敛财无度，不仅在通州大肆投资旅馆、酒店，还开始公然贩运淮南盐。这些行为令脱脱不得不再度"大义灭亲"，让参政佛嘉问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主动辞职。脱脱正式摆脱了自己父辈的影响力，走向了台前。

脱脱第一次执政期间，他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始终保持着一个良性的互动。在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官员的言传身教之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也用心攻读，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是。脱脱所推行的恢复科举、平反冤狱、整顿吏治、降低盐税等政策也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



皇觉寺遗址

脱脱毕竟不是圣人，特别是在水利方面，他并不是郭守敬这样的技术型官员。公元1342年春，脱脱听取了所谓“专家”的意见，决定在大都城外开河置闸，引金口浑河之水向东抵达通州。这种开凿运河的工程虽然在元帝国不是第一次。但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元帝国早已不复忽必烈时代的强盛，何况以许有壬为首的许多大臣都认识到了浑河水流湍急，而且富含泥沙，新的运河即便建成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淤塞。不过脱脱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从谏如流的精神，最终这条在动员了十万民夫，沿途摧毁了众多房屋和良田的运河在建成之后被证明完全不能通行船只，成为了脱脱众多政绩之中的一大败笔。

1344年，脱脱被正式解除了中书右丞相的职位，对此，各方面史料都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一般认为脱脱是因病辞职。随后又因为自己的父亲马札儿台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流放甘肃，脱脱主动要求沿途照顾自己的父亲，随即离开了大都。这当然是一起经过粉饰之后的政治斗争，毕竟在脱脱当政的五年里，同样出现了“天下之人唯知有脱脱而已”，而这一点显然是身为帝国元首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正所不能

忍受的。

而就在脱脱去职的同时，安徽濠州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朱五四一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朱五四和他妻子陈氏、长子朱重五先后去世。只剩下年幼的朱重八和二哥相依为命，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为了活命，朱重八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

年幼的朱重八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沙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年仅17岁的朱重八才做五十天行童，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

第三章 开河变钞（1341—1351）
——元帝国的积重难返和脱脱整顿经济的努力

奇后母子

在朱重八并不知道脚下的路通往何方的同时，并没有就此而淡出元帝国政坛的脱脱，在不到一年之后，以自己的父亲马札儿台病故为由，重新回到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宫廷之中。而脱脱的这一次回归，多少要感谢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来自朝鲜半岛的皇后奇氏。

处死了太平王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很快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段政治联姻，迎娶了元帝国宗室——毓德王孛罗帖木儿的女儿——伯颜忽都。作为元帝国最后一位来自弘吉剌氏的皇后，伯颜忽都可以说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她生活简朴，尊重立法更不喜欢妒忌吃醋，对于自己的丈夫——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宠信来自朝鲜半岛的第二皇后奇氏的种种后宫八卦，她不仅不介意，甚至连评论都懒得参与。因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其虽然冷淡，偶尔也会尽一下自己做丈夫的责任。两人之间也曾拥有过爱情结晶——皇子真金，可惜这位真金只活到两岁便夭折了，丧子之痛令伯颜忽都皇后将自己母爱转移到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与奇氏所生的爱猷识理达腊的身上。

多年的独居生活，令伯颜忽都皇后对于男女之事格外的冷淡，以至于有一次在陪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前往上都的路上，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主动提出到她的营帐里过夜，也被她再三地以“此地并非皇宫，需要格外小心安全，暮夜时分不是皇帝出入往来的时候”为由拒绝了。对于自己妻子的这种反应，吃了闭门羹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也只能夸奖对方很“贤德”。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是元帝国少数穷奢极欲的皇帝之一，不过对自己慷慨的人往往对别人都很吝啬。为此，他甚至跑去查伯颜忽都皇后的开支账目。不过皇后毕竟不是家庭主妇，伯颜忽都皇后一句：“我领用财物，都是必需之时才去支取。其他后宫开始，也都是由指定负责的官员掌管，我哪里会去过问这些事呢？”便将丈夫的猜疑轻松地顶了回去。但是身为第二皇后的奇氏却还不放心，在伯颜忽都皇后去世之后，竟然亲自跑去翻对方的衣柜，在发现自己的情敌穿得都是一些质地低劣的旧衣服时，竟不由自主地放声大笑：“皇后竟然穿这样的衣服”。与之相比，从太原赶回

来奔丧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要有人情味得多，他大哭于伯颜忽都皇后的灵前。

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史书之中，葬送了元帝国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自然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而作为她的最后一任皇后来自朝鲜半岛的奇氏，理所当然地也被表述成了一个亡国妖姬。但是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奇氏虽然出身卑微，却也可以说是一成功的妻子和母亲。奇氏是元帝国权贵们眷养的“高丽贡女”之一，她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感情是在她作为宫女伺候对方的饮食起居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十三岁进入虎狼成群的帝国政治中枢的少年在夜深人静之时的寂寞和孤独，也就可以理解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对成为自己妻子的奇氏那份坚定不移的宠爱。

在太平王燕铁木儿把持朝政以及其后他的兄弟、儿子大权在握的时代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奇氏的宠爱始终是皇后答纳失里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是答纳失里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年少气盛的小丫头，发泄自己不满的途径仅仅是鞭挞而言的话，奇氏可能早已成为了后宫争斗中的牺牲品了。而在太平王的势力被连根拔起之后，身为内阁首相的“拔都儿”伯颜又再三以“出身不好”为由拒绝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给奇氏以皇后的名分。

即便在奇氏被册封为第二皇后之后，监察御史李泌还上言说：“世祖忽必烈曾发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为皇后？今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请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对于这些说法，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反应就是“不听”。

对于这些羞辱和贬低，长期以第二皇后的身份执掌后宫的奇氏不断地试图以各种努力来证明自己。据说她没事便翻看历朝历代的典籍以及《女孝经》，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后，而对于各地进献的美食，她也第一时间送去太庙祭奠祖先。对于大都地区的饥荒和瘟疫，她更是让自己的内侍和官员出粮赈灾，建立公墓，并展开大规模的水陆法事以超度亡灵。

而在自己儿子——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教育方面，身为皇后的奇氏也不满自己的丈夫一味要求爱猷识理达腊沿习佛法，而忽视儒学的做法，因此还一度与来自西藏的帝师乳必多吉发生了争执。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帝师乳必多吉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他向妥懽帖睦尔父子传授的佛法时偏重于密宗的“男女双修”的部分，对于老公的荒淫，奇氏自然无力阻止，但是对自己的儿子，奇氏却坚持“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教，舍此则为异端。”最终以“佛法虽好，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恢复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端本堂的日常学习。

奇皇后最为宠信的是她身边的宦官朴不花。因为朴不花和奇皇后一样来自朝鲜半岛。因此后世有好事者为他们之间编造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其剧情之狗血倒是颇有当今韩剧或仿韩剧的风格。大体的意思是这两个人不仅从小就认识，而且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天各一方。为了陪伴在爱人身旁，朴不花依然了去尘根，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入宫，以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方式演绎了世间最凄美的“绝爱”故事。

这当然是小说演绎，事实上奇皇后和朴不花除了同样来自元帝国的藩属——高丽之外，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纠葛。而向元帝国进贡阉童和少女本来就是高丽长期以来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朴不花入宫的时间也比奇皇后早，他七岁便已经以一个小太监的身份入宫。只是此后比较幸运地被分到了被以皇太子身份迎回大都的妥懽帖睦尔宫中。

随着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私生活的日益糜烂，身为皇后的奇氏开始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政治旋涡之中。作为一个家族势力支撑的皇后，奇氏干预朝政的手段有限，除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之外。只能借助于宦官的势力。而朴不花也由于长期负责照料皇太子的起居，逐渐得到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信任。很快便被任命为了荣禄大夫，加资正院使，担任掌管财政的要职。应该说朴不花并非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在1358年大都地区所发生的饥荒之中，他也曾出面买地收葬尸体二十万具。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太监，他对政治的理解停留在结党营私，以及为奇皇后母子扫清政治障碍方面。

除了倚重自己的同乡朴不花之外，身为皇后的奇氏在自己的宫中的还收罗了众多的高丽美女。这些是不是人工美女后人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奇皇后的赏赐，这些高丽美女显然被作为了元帝国大臣们身份的象征。而皇后中所云集的众多高丽宫女，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韩流”。“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仿高丽，举世若狂。”

自燕铁木尔以来，元帝国的统治者似乎都有把儿子寄养在权臣家中的习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也不能免俗。在六岁之前，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是在脱脱的家中长大的。应该说作为养父，脱脱对爱猷识理达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除了小孩子生病吃药他亲自料理之外，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出巡云州的路上，面对空前的暴风雨，也是脱脱抱着皇太子单骑登山才避免了这个小孩子被泥石流吞没。对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还是感激的，曾亲自慰抚对方说：“你的辛劳，我是不会忘记的！”

因此在脱脱为了照顾自己被流放的父亲而远走甘肃的过程之中，太子爱育失黎达腊也全力维护自己的这位养父。据说有一次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和奇皇后正在偏殿坐着。太子爱育失黎达腊故意拉着留在大都陪自己玩耍的脱脱之子加剌张在殿外奔跑嬉戏。应该说爱育失黎达腊这熊孩子挺会玩，他先让加剌张背着学乌鸦叫的自己绕着宫殿跑上三圈，然后又让加剌张学乌鸦叫，由自己背着也跑上三圈。这样玩法显然颇耗体力，因此加剌张在背了爱育失黎达腊三圈之后就跪下恳求对方收手，他说："我只是一个奴婢，您可是贵为太子的人啊！我怎么能让太子背着我跑呢？"玩兴正浓的太子爱育失黎达腊随后便假装用鞭子抽加剌张。

加剌张大声啼哭终于引来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和奇皇后的注意。在问清楚缘由之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觉得加剌张这么小就有尊卑之分——"贤哉此子也！"。随后奇皇后也跟着帮腔说："他爸爸脱脱也是好人，不应该长期流放在外！"这一句话虽然很中听，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不过点了点头，并没有急于将脱脱召回。加剌张拒绝让太子爱育失黎达腊背着自己跑显然是出于自己不利的处境着想，谨小慎微而已。而真正颇有心计的还是奇皇后和太子爱育失黎达腊。

而维护脱脱的除了奇皇后母子之外，还有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弟弟——元宁宗懿璘质班奶妈的儿子哈麻。哈麻在有关元帝国的诸多史料之中始终被描绘成了一个无耻贪婪的小人。而他之所以受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宠信，据说是因为两人之间有不正当的"男男关系"。这一点自然无从考证，不过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面前，哈麻可以肆无忌惮的"有一说一"却是有记载的。

有一次哈麻穿着一件新衣服站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身旁，不知道是听了什么笑话还是呛到了，正在喝茶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突然一口水全部喷在了哈麻的衣服上，哈麻随即看着对方说："有你这么当皇帝的吗？"这样的大逆不道的话，如果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估计不仅自己人头落地，还要祸及妻儿。不过对于哈麻，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只是笑了笑了。

在脱脱第一次当政时期，哈麻主要依附的是脱脱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和脱脱本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不过在脱脱的继任者别儿怯不花等人的面前，大肆收受贿赂的哈麻日子更难过。因此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心态，哈麻不仅在别儿怯不花等人弹劾脱脱父子时竭力替他们辩解，更努力促成脱脱返回大都。

有一次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见到罗马教廷所送来的一匹骏马格外高大，站在马群之中犹如羊队中的骆驼，无意间说了一句："马中佛郎马，人中有脱脱！"脱脱身材

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西方人所习惯骑乘的阿拉伯马、柏布马都要比蒙古马高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当蒙古西征之时，欧洲的骑兵往往以“骑着狗一般小马”来形容蒙古骑兵。听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脱脱的赞誉，哈麻立刻乘机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脱脱大加赞誉。这一反常的举动当然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很不理解，他说：“我记得脱脱曾经处罚过你，打了你一百多下板子，你今天怎么说起他的好话了？”哈麻当然不能告诉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脱脱只是打我屁股，别儿怯不花却要杀我的头”。于是很诚恳地说：“脱脱对我的处罚是合情合理的，我有什么好怨恨的。他其实是个好人”。

即便得到了奇皇后母子和哈麻的诸多回护，但是据说脱脱得以从甘肃返回大都。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奇皇后的先斩后奏。在偷偷地让人将脱脱召回之后，奇皇后故意把加剌张叫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面前，问他：“你想不想你爸爸脱脱啊？”和所有正常的小孩子一样，加剌张当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同样身为父亲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看着眼前有些可怜的加剌张，颇有些不爽的责怪自己的老婆多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脱脱现在在哪里？你难道有本事让他立刻出现、骨肉团聚吗？”

奇皇后这个时候亮出底牌说：“脱脱离开了不少日子了，一直想念您。我听说已经回来了？”随后立刻派人去请。事实上脱脱这样私自回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他出现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面前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第一反应是：“我派你去甘肃照顾你老爸，谁让你回来的！”脱脱毕竟是老官僚了，他没有拉奇皇后下水，而是抓住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语病，表示：“您让我照顾我父亲去甘肃，现在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回来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表示理解和安慰之余，便将脱脱留在了大都。从某种意义上讲脱脱如果继续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老师和顾问的身份低调的在元帝国内部活动的话，可能最终可以避免卷入那将其吞没的厄运。

长堤鼠穴

就在脱脱辞去右丞相之职的一个月之后，元帝国迎来了自其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烘涝灾害。　1344年农历五六月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暴雨侵袭之后，黄河先后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和金堤，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变成了一片泽国。而除了天然灾害巨大的破坏力之外，元帝国政府此时低劣的应变能力使得洪水不仅长期间得不到控制，不仅糜烂的黄泛区更有阻断京杭运河的趋势，各地得不到妥善安置的难民也开始揭竿而起。监察御史张祯为此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

可以想见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的元帝国政府，事实上在蜂起的民众面前则是不作为。依旧是两淮运使宋文瓒在黄河水灾之后，向元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指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集庆花山劫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最终竟然要借助当地的黑社会组织——盐帮。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南五省租税之地，恐非国家有矣。"

在追捕集庆花山劫贼的行动中，未来驰骋江南的张士诚兄弟是否也在"假手盐徒"的行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元末群雄中的方国珍在这一时期却已悄然崛起。出生于台州黄岩的方国珍，本身是浙江沿海贩盐的商贩，因为有一个沦落为海盗的同乡——蔡乱头而被仇家指认为海盗同党，不得不从一个合法商人转型为海上强梁。不过事实证明方国珍在这方面的确颇有潜质，仅几个月的工夫便成为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首领，连元帝国浙江行省前去围剿的三万大军都被其打败，连主帅参政朵儿只班都成为了阶下囚。但是，方国珍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在俘虏了朵儿只班之后，他竟然强迫对方"招降"自己。



方国珍雕像

对于要求招安的方国珍，曾因为“范孟端事件”而得到升迁的枢密参议归旸认为：“这次围剿失败固然是将帅无能的结果。但是参战的部队大多是北方的骑兵和步兵，让他们在海上作战无疑是赶入了死地。方国珍击败政府军，又非法拘押地方官员。显然只是迫于形势才要求‘招安’，万万不能答应。应该继续进攻招募沿海的民众组成民兵继续追剿。”可惜的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元帝国政府高层的认可，果断授予了方国珍定国尉的军衔。不过方国珍并没有因此而俯首帖耳，反而继续在海上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农民起义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要求“招安”，休养生息之后继续造反，逐渐成为了元末的一种常态。

黄河的水患以及东南地区的民众起义，最终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不得不再度起用自己一度颇为忌惮的脱脱。而脱脱重新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等人展开报复行动，而对于经常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殿中侍御史哈麻等人，脱脱则投桃报李任命其为

同知枢密院事。



至正交钞

第二次当政的脱脱首先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货币改革和治理黄河之上。货币改革是元帝国最擅长的金融项目，而且每每都可以取得扭转乾坤的功效。但是脱脱所推行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之时，元帝国本身缺乏强大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自元武宗海山执政以来，元帝国便出现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的情况，以后历代大量印钞，给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1350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

妥懽帖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具体办法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同时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但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

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二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

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两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

《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而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脱脱很清楚这一工程的难度。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

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次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脱脱才治理黄河。而事实上早在1346年农历二月时，元帝国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是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1314—1323年间曾两次中举。泰定初年（1324），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后任潞城县尹，又升为户部主事，未及上任，服父丧回籍。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事。时诏修宋、辽、金三史，又调任宋史局官。书成后，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官员考绩中名列第一，又调任中书省检校官。上书指出当时富户兼并贫民及流亡人口，致使国家租赋收入流失之弊。不久任监察御史，提出御史奏事应直接呈给皇帝，而不应经过其他官员。后升任都事。调任山北道廉坊副使。又被召回任工部郎中，提出关于工程建设的19项建议，针对其所提出改革时政的、长达数万言的主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任命贾鲁为行都水监。

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直到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可见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懽帖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应该说脱脱治理黄河的工程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在元帝国国力衰退，民变四起

的情况之下强行上马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其结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早在治理黄河的工程开始之前就有人提出“山东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其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而治河工程仍在进行，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讥讽声中，来自河北栾城的北方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阜阳）与刘福通等人聚众宣布起义。

白莲石人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但这一宗教信仰并不为佛教主流所认同，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认为“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南宋灭亡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发生，终于导致元武宗海山执政时期，对其采取了“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的全面查禁。

客观地说佛教白莲宗与中原各地流行的白莲教有着本质的差别，元帝国高层不分青红皂白大举弹压，身为茅子元的继任者——镇江妙果白莲寺主持普度和尚心急如焚，1309年普度带着自己的著作《莲宗宝鉴》，领了十个徒弟，“芒履草服”徒步上大都向元武宗海山上书请愿，海山对于宗教事务并不感兴趣，因此普度和尚主要奔走于国师哈迷立、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元帝国的公卿之间，向详解教义，辨明真伪。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普度苦口婆心的辩解之下，白莲宗在被禁三年后又恢复了合法地位。元皇庆元年（1312）正月，刚刚登基的元仁宗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将《庐山莲宗宝鉴》颁行天下，下旨护持建宁路白莲忏堂，普度也被赐号“优昙法师”“虎溪尊者”“正辩广教禅师”。镇江的妙果白莲寺不但成为有元一代气势恢弘、驰名中外的海内巨刹，而且成了净土白莲宗的复教圣地，影响力更加广泛深远。

得到元帝国官方认可后的白莲子随即吸引着海内外学佛者的追捧。日本保元元年（1317），日本僧人澄圆专程入元在庐山东林善法堂跟随普度学习慧远白莲之教，并受《宝鉴》《龙舒净土文》等书，元亨元年（1321）回日本创建旭莲社，以把白莲宗带进了日本。而当普度从妙果寺上京请命时，高丽国王益智礼普化正好寓

居大都，受到了普度的影响后，回国后在高丽国创建寿光寺白莲堂，普劝国人同修净业。

元至顺元年（1330），76岁的一代佛学泰斗普度和尚在妙果寺坐化。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净土白莲宗，一手营造了海内巨刹妙果寺，同时，他也深深地眷恋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按照他的遗愿，弟子们将他葬在了妙果寺前。在后来的净土著作如明朝道衍《诸上善人咏》、宏《往生集》、清朝《净土晨钟集》《净土圣贤录》《角虎集》中均为茅子元或普度立传，视其为莲宗中兴宗主。可惜的是，自从普度和尚圆寂以后，白莲宗再也没有涌现出像他那样潜心教义德高望重、能够左右最高领导层思想的精神领袖。此消彼长，白莲教继续往秘密方向发展，在底层民众间发酵，公开对抗大都，被朝廷严厉打压。

韩山童的祖父韩学究便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但这次流放并没有改变韩山童家族的宗教信仰，韩山童成年后，长期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自诩。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一时间“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其中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而民间白莲教主在宣教时，往往将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就能迎来光明的极乐世界。

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脱脱主导的变钞改革失败之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在贾鲁主导开河工程开始后，韩山童等人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政治，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应该说韩山童在发动起义之初进行了相当周密的舆论准备，除了众所周知在元帝国治理黄河的工地上埋下独眼石人像之外，他还表示自己是宋徽宗赵佶的八世子孙，韩山童的得力助手刘福通则自称南宋将刘光世的后裔。长期以来一直在秘密执行宋帝国的复兴计划——“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虽然起义军最初兵力微薄，但并不妨碍刘福通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当然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口号，对各地的难民更有吸引力的是他们

提出要改变元帝国“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局面。

口号喊的虽然响亮，但是就在韩山童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当地的治安官员闻讯赶到，将起义领袖韩山童当场逮捕。刘福通虽然保护着韩山童的老婆、儿子突围而出。但是面对元帝国随即派来武装部队，这支以头裹红巾作标志的起义军依旧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但韩山童、刘福通于颍州起义的消息，却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笔记中记载了“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的情况。元帝国政府也颇为震惊，只能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军前往镇压。

此时元帝国所派来镇压的政府军主力是六千“素号精悍，善骑射”的色目人雇佣军——阿速军。后方还有河南行省所调集的各路汉军，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但是两位主帅沉迷酒色，麾下的部队也专注于沿途劫掠。结果两军相遇，元帝国政府军主将赫厮一见对面漫山遍野的红头巾，就扬鞭大叫：“阿卜！阿卜！”（快跑！快跑！）回头就跑，元帝国大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色目人雇佣军更因为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刘福通随即率军大举追杀，在赫厮战死于上蔡后。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仅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控制了今天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红巾军的武装力量更不下十万之众。

至此元帝国彻底丢失了战场主动权，刘福通所部开始向中原地区大局发展。元帝国各地行政机构运转不灵，只能派遣后方城市和中枢官员赶赴前线，比如派遣汴梁路同知黄头、负责皇家牧群管理的尚乘寺卿那海前往项城县。但一届文官的黄头最终被起义军俘获，只能用不屈而死来彰显自己的“气节”。而那海也只能带着儿子伯忽都、侄子阿剌不花，以“狂贼新执黄头，势悍突甚，与其坐毙，孰若进讨。”发动自杀性冲锋。而除了尚乘寺卿那海之外，阵亡于前线的蒙古贵族还有中流矢死于颍州战场的安东万户朵哥和千户高安童。

刘福通起义军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的情况，令元帝国深感其“心腹大患”的威胁。　1351年九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委任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客观地说也先帖木儿在当时的元帝国内部也算是政治干才，在脱脱第一任丞相任期内，整肃朝纲，也先帖

木儿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整顿吏治，打击贪官，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绩。而卫王宽彻哥则是蒙哥的曾孙，其封地和采邑主要在河南境内，也没有理由不尽力平叛。但是也先帖木儿和宽彻哥均没有足够的军旅经验，因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随即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前线。

在元帝国方面不断增兵遣将的情况下， 1351年农历十二月，元帝国政府军终于攻陷上蔡，红军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与此同时元帝国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红巾军根据地再度陷入元帝国方面的夹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是监察御史出身，不过他的工作比也先帖木儿更为具体。早在他以陕西御史行台书记官的身份跟随御史郭贞在华阴县进行案卷调查之时，董抟霄便发现有一伙以李谋儿为首的匪徒，长期截杀过路的客商，为贼15年，犯案百余起。竟然因为贿赂有司以“徒党未尽获”的名义关在牢房里5年都没有处决。在董抟霄的竭力争取之下，李谋儿才最终被明正典刑。此后董抟霄“历官所至，往往理冤狱，革弊政”最终获得了“才誉益著称于时”的殊荣。

抵达平叛战场之后，董抟霄虽然在合肥附近击败了红巾军一部。但是朱皋、固始等地依旧在红巾军的掌握之中，董抟霄所部兵力有限，不足以同时应对两个方向的威胁。但董抟霄随即招揽附近结寨自守的民众和芍陂的屯田军，利用这股力量组成朱皋方向的防线之后，董抟霄得以放手想安丰方向挺进。而在与红巾军对峙于淝水一线之际，董抟霄又派遣进士程明仲前往红巾军中“卧底”，除了探明了红巾军方面的虚实之外，程明仲还成功地策反了红巾军中一千多户的家庭。

在夜幕的掩护下，董抟霄率军架设浮桥渡过淝水，但随即遭遇红巾军主力的迎击。在始终无法巩固桥头堡的情况下，董抟霄率领骑兵从浅滩冲过淝水河，迂回包抄红巾军的侧后。在董抟霄忽跃马渡磵，大声高呼：“贼已败”的情况，元帝国政府军主力，一鼓作气冲过淝水河。红巾军一败涂地，甚至出现了死尸枕藉二十五里的惨状。

董抟霄在战场上的成功，除其个人的胆略之外，更多的应该归功于其长期在监察御史岗位上对元帝国基层官员和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情况之下，大多数的汉族民众并不愿意铤而走险地走上谋反的道路，如果元帝国统治者能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对广大民众善加引导的话，红巾军起义无法如此之快形成燎原之势，更并非是无法平定的。

第四章 百万红巾（1352—1355）
——红巾军起义初期各路枭雄的境遇

元朝军制

长期以来蒙元帝国都被视为是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武装力量的政治体。但横扫西亚、东欧的蒙古铁骑，缘何在曾经征服过金、宋皇朝的中原战场上一再为可以被视为乌合之众的红巾军所败？要解释这一问题，不得不从蒙元帝国入主中原之后的军制演变说起。

铁木真时代的蒙古军队大体上可以算是一支“全民武装”，根据《黑鞑事略》中的说法，蒙古的风俗是一夫多妻制度“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人口数量自然增长很快。铁木真建立蒙古帝国之时所册封的九十五个千户，每千户在得到征兵命令之后都至少可以提供一千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加上铁木真本身的精锐近卫军，仅蒙古本土可以动员的兵力便在十万人以上。这在公元13世纪初期无疑是一支颇为庞大的武装力量。

蒙古大军的西征过程中不仅成年男子踊跃参军，连十三四岁的少年也随军出征。《黑鞑事略》的作者彭大雅本身也是一个军事家对此自然格外敏感，他随即向蒙古西征的将领进行了询问。对方回答说：“远征的道路很漫长，据说路上要花三年的时间，现在十三四岁的小孩子，等抵达战场已经十六七岁，正好是冲锋陷阵的年纪！”这种由未成年所组成的后备武装力量，在蒙古帝国被称为：“渐丁军”。或许正是受到了这一总体战思路的冲击，彭大雅在修筑重庆要塞时才会说出“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

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孩子本身在严峻的自然环境面前，本身就不得不练习马上骑射的技能。根据彭大雅的观察，他们三岁就被绑在马鞍上，由大人手把手地的教习执射，跟随大部队驰骋。四五岁就自己拿着小弓、短矢练习。所以“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秋而已”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被组织成了军队。

作为一个以战争立国的政权，蒙古帝国对于武器的生产和改良也颇为投入。大批被俘获的中原和西域工匠维持着蒙古帝国的战争机器的不停运转。其中“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常常在攻击城防一角的战斗中便可以集中几百门投石火

炮。令蒙古精锐的骑兵如虎添翼。

在战略战术方面，蒙古军队也颇多创性。为了防止在行军之中遭遇敌人的突袭。按照彭大雅的说法：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敌兵、某所粮草，皆责辨哨马回报。部队在宿营的过程中，蒙古军队也颇为机警，不仅派出巡逻的游骑，每一营帐还要留下两匹战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则整整不动也。



怯薛军是蒙古军队的核心和中坚

在野战之中蒙古军队更着重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在主力决战中，蒙古军队一般也只以十分之三兵力作为前锋，　　　　但并集中突击。而是以三五骑为一个战术单位。“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往往可以起到“百骑环射，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监百里”的效果。被彭大雅称之为“鸦兵撒星阵”，并认为“敌虽十万，亦不能

支”。而如果遇到纪律严明、阵地坚固的对手，蒙古军队除了骑兵突击之外。蒙古军队还有许多其他手段，如放出牛马冲阵、以降俘为牺牲品施行硬攻、佯败而走，弃辎重金银，诱敌逐北中伏，或者分兵骚扰。这些战术令博学的彭大雅也不得不承认“有古法之所未言者”。

蒙古军队在西征的过程中不断招降和裹胁钦察等游牧民族的壮丁，编入自己的军队之中，这些基本上算是被迫为蒙元帝国效命的其他民族士兵和被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的蒙古军人一起被编成专门用于镇戍各地的部队——探马赤军。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各部和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的常备近卫军——怯薛军。

怯薛军由宿卫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八千户组成，和平时代他们负责护卫大汗和蒙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分为四班，每班由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及其后代指挥，宿卫汗廷，三日一换，形成了“四怯薛番直宿卫”的制度。在一旦战事发生，怯薛军则作为全军的中坚力量投入战场，组成被称为“也客豁勒”的大中军。

在南下征服金帝国和南宋政府的过程之中，蒙元帝国逐渐开始认识到汉族兵员的优良素质。于是除了广泛地吸纳金、宋两国的各路降军、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之外，窝阔台时代，蒙元帝国便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随即形成了“旧军”与“新军”的区别。尽管汉军的编制最初比较混乱，但是在中原乃至朝鲜半岛、东南亚的战场之上，汉军比蒙古军队更能适应当地地形和气候，他们依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忽必烈的即位，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随即带来的自然也是军事组织体制的全面汉化。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小、得到实惠最多的是怯薛近卫军。尽管怯薛近卫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中一度站错了队伍。但是作为蒙元帝国大汗的象征，他们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继续享有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为此不少人走门路、托关系想方设法“投充”到怯薛近卫军的队伍之中，使得这一编制原定为一万人的精锐部队不断超编，忽必烈在世的时候便开始下令“沙汰”怯薛近卫军的成员，但是蒙古亲贵往往都早已占好了位置，只能把一些汉人、南人清理出去。

大批汉军渴望保护伟大领域的热情毕竟“伤不起”，于是从1260年开始，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的中央军队，大量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被调集到了大都

组成了沿承金帝国军事体制的“武卫军”，“武卫军”的编制最初为三万人，随即不断扩充。到1279年已经发展为了前、后、左、右、中五卫。随后又陆续设置了武卫、虎贲卫、忠翊卫、海口侍卫等编制。而面对汉军的优厚待遇，为铁木真家族出生入死的蒙古人和其他民族士兵自然坐不住了，于是元帝国政府又不得不下达“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的命令，设置了唐兀卫、钦察卫、西域卫、左右阿速卫、龙翊卫、斡罗思卫、威武阿速卫等部队，以吸纳那些不甘心老死边疆的探马赤军后裔。

到了元帝国后期，仅在大都、上都地区的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不过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外征讨无力，倒是频繁成为了野心家手中的工具。除了拱卫核心首都圈的中央军之外，忽必烈在元帝国的版图之上还组建四支重要的边防和镇戍力量——镇守漠北的蒙古军，分屯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探马赤军，长江流域的新附汉军以及东北、西南等地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地方“乡兵”。形成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国防布局。无论元帝国面临哪个方向上的攻击都可以以当地驻军为第一道防线，随即得到邻近行省和探马赤军的支援，如果战事不利，则可以投入精锐的侍卫亲军。

元帝国时代的漠北基本上保持着铁木真时代的风貌，而当地的蒙古驻军也基本维系着平时散归牧养、战事传檄集合的状态。虽然忽必烈一度抱怨过蒙古驻军在平定西北海都和东北乃颜之乱中不给力“不复从前”。但是客观地说蒙古驻军在元帝国的政权更迭之中漠北的蒙古驻军更频繁成为帝位竞争者们的强大武力后盾。其战斗力之强由此仍可见一斑。

在元帝国初期的对外扩张中探马赤军是一支重要的机动武装力量。被签发出征和分批镇戍江南、云南乃至西北地区。但是在对宋作战结束之后，这些军人被集中安置在各地的蒙古军都万户府管辖之下。原本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组建的探马赤军在有了固定驻地后，随即开始逐渐由牧民转化为了农夫。根据元史的记载他们初到驻地“犹以射猎为俗”，但是随着繁衍和生息“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战斗力自然也就逐步退化。

南宋临安政府投降前后，长江南北的大批南宋政府军或主动或被迫地向元帝国投诚。其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最为夸张的是元明时代的士大夫笔记中的所谓“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这个当时夸大其词。因此南宋末年所有在籍的兵员也不过七十万人。即便没有其他因素，战场的消耗和溃散也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元帝国将南宋的降卒统一称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

新附军内部番号颇为繁杂，不过都不是沿用南宋政府的原有编制，而是根据这些军队的特点而起的绰号。比如之前在南宋政府领取被称为“口券”的伙食补助的正规军被称为“券军”。其中野战部队由于领取的是名为“生券”的高额补助而被称为“生券军”，而南宋各地的驻屯军由于领取的是伙食补助，而被称为“熟券军”。为了防止逃亡而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原南宋“惩戒营”则被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除此之外，还有南宋政府在江南地区临时召集盐徒组成的义勇军，被称为“盐军”。

元帝国对新附军并不信任，除了少数精锐被抽调到中央侍卫亲军之外。其他新附军几乎都成为了元帝国初期征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炮灰。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可见数量可观的新附军最终被元帝国纷繁的对外战事“消化”掉了。

除了数量庞大的正规军之外，元帝国在对外作战中还大量使用“不给粮饷，不入账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队，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族的士大夫颇有新意的为他们起名为“乾讨虏军”，“乾”是简体字“干”的繁体写法。这种雇佣军的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因此作战不利、拢民尤甚，元帝国政府虽然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到元帝国末年这种所谓类似于土匪的“乾讨虏军”却成为了战场的主力。

大批所谓“乾讨虏军”取代了正规军在战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帝国所推行的军户兵役制度的崩溃。在蒙元帝国的统治时期除了蒙古族继续采取“全民皆兵”的征召制度外，对于编入国防体制内的探马赤军、汉军军户和新附军户都采取世袭的军户制度。其中除了对汉军军户的征募比较宽松，依据军户的不同情况，可以二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名，其他各户出钱资助之外。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都要依照“一人当兵，世代从军”的原则，永远为蒙元帝国征战。军户的士兵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还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即便军人在阵前战死或病死，这一军户也只能“存恤”一年或半年，就必须继续出人服兵役。

除了没有“三险一金”、没有“法定假期”，即便是换防在边远地区往往也要等上两三年甚至六年才有一次机会之外。探马赤军和汉军军户还要自己出钱购置军需装备。而所获得的收益不过是每人每月五六斗米，一斤盐以及政府在赋役方面的豁免和优待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这一问题在元帝国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对军户仅有的政策优惠也化为了空头支票之

后，军户制度随即崩溃。

元帝国的军事组织体系可以说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颇为先进的。除了拥有“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集今天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于一身的枢密院之外，1261年，元帝国还设立了的军储都转运使司，随后逐步升级为军器局、武备监，武备寺，成为了重要国防机构。武备寺下辖管理衣甲的寿武库、利器库、广胜库、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甲局、弓局、箭局、军器局等几十个单位，专门管理武器生产、储存和发放。

蒙元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武备寺对军队的集成化、正规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古建立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戍军队系统，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多由隶属于武备寺的炮手工匠生产。

武备寺的建立除了统一元帝国全军的武器规格之外，其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加强对民间武器生产和使用的控制。除了由政府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中原、江南民间兵器一律拘收，汉人、南人不得私藏衣甲和武器，甚至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禁者轻则杖罚，重则处死。汉军和新附军人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缴纳仓库，统一保管。元帝国政府甚至规定了官府储放兵器的数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

一度被以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名字出现，最后定制为太仆寺的元帝国马匹管理机构在军事上也担任重要作用。不过虽然在蒙古草原和大都周围建立了众多的国营牧场。牧养着“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的国营马匹。但是每当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元帝国政府却总是要临时在民间“刷马”“括马”。以强制手段征用民间马匹。和这一情况类似的还有元帝国在各地设立屯田万户府、千户所。虽然名义上屯田的目的是为了“以资军饷”，但实际上元帝国政府虽然向屯田军人提供牛具和种子，但是各地军屯的经济效益较低，歉收和无收的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屯田的收成，大多数要上缴国家，只有少数留作口粮和种子。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战功赏赐、边备和战争等所需的费用。组织武器生产，赈济贫乏军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等，也要计入军费开支。维持一般的边备和军官、军队费用，对朝廷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一旦有较大战争发生，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即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帝国财政状况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之下，与巨额的军费开支自然有着密切关系。

至正十二年（1352）农历正月，面对元帝国政府军的两线围剿，刘福通所部红巾军渡过黄河，以当地起义军领袖韩兀奴罕所部为先导。迅速攻克了滑州（今河南滑县）、浚州（今河南浚县）。在开州（今河南濮阳）建立新的根据地，韩兀奴罕生平无传，但从名字来看似乎并非汉人，很可能是侨居中原的色目人士。可见，在元帝国当时腐败的吏治和凋敝的经济之下，蓬勃而起的民众起义绝非是简单的民族矛盾。

红巾军转进河北，本是元帝国政府调集各方面力量将其彻底剿灭的大好时机。毕竟开州等地一马平川，远比水域众多的江淮战场更利于蒙古铁骑的冲杀。而大都周边所驻守的大批戍卫部队也可以就近参战，形成对红巾军方面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恰恰就是在这看似满手好牌的情况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再度出现了用人上的失误。1352年农历三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委任出身国舅世家弘吉剌氏的太不花为河南平章的同时，命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驻守大都的“侍卫汉军”和“爱马鞑靼军”两支部队南下参战。

从战场表现来看，身为皇亲国戚的太不花堪称能征善战。他到任之后没多久便击败红巾军韩兀奴罕所部，收复了南阳、汝宁等地，将红巾军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在了黄河以北地区。但是统率精锐近卫部队的巩卜班却长期驻足于邢台以南的沙河北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面对这样的对手，一度走投无路的刘福通趁势北上，突袭元军营地。再度打乱了元军分进合击的围剿之势。

有趣的是，在当时元帝国所委派的前线诸将之中，巩卜班是唯一有过成功平叛经验的。至正元年（1341），湖南道州路因春荒严重，米价飞涨。爆发了蒋丙、唐大二、何仁甫等领导下饥民起义。起义军一度“破江华，掠宁远”，湖南震动。正是时任湖广行省平章的巩卜班领大兵征剿，一举捣毁起义军所构筑的“溪峒堡寨二百余处”。俘获起义军首领唐大二、蒋仁伍等人。虽然此后蒋丙虽然重整旗鼓，招集余部，自称“顺天王”，设官分职，声势大振，相继攻克连州、桂州等地，队伍扩大到数万人。但最终仍在巩卜班所统帅的三省军队围追堵截之下被扑灭。但显然巩卜班此时所面对的战事远非十几年前的蒋丙等人可比，其漫不经心的举动最终换来的只能是命丧乱军之中。

巩卜班的战死，并没有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认真思考元帝国军制崩溃之下近卫

部队战斗力下降的原因。相反将战败归咎于兵力不足，1352年农历闰三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将前线部队的指挥权集中于也先帖木儿之手，令其统率30 万精兵重返沙河前线，但这样一场“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的浩大攻势，却以莫名其妙的“军中夜惊”而归于崩溃。



彭莹玉

所谓“夜惊”指的是在睡眠中突然尖叫、哭喊，意识呈朦胧状态，发作后约一至两分钟，又复入睡，隔天则不知何事。军旅之中士卒生活紧张，突有声响就会发生全营动乱，被称为“啸营”。“军中夜惊”本是常态，历代名将安卧不动便将其平定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但也先帖木儿却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在“汝为大将，见敌不杀”的指责声中，也先帖木儿只能驻军于朱仙镇一线。而有鉴于也先帖木儿的哥哥脱脱仍秉持着朝政，最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也先帖木儿的处理意见，也不过是将其召回大都，仍为御史大夫。

榜样的力量从来都是无穷的。随着刘福通在河南一带不断攻城略地。头戴红巾很快成为元帝国末期汉族民众的新时尚。之前曾一度选择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 在袁州发动起义遭到镇压的彭莹玉，这一次也放弃了自己原先设计的背心上写一个“佛”字的反政府武装制服，在淮西和铁匠邹普胜一起戴上红巾拥戴卖布出身徐寿辉为首领，一举攻取了罗田县城。

彭莹玉身为南方白莲教的教主，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元帝国方面称之为“妖彭”，其10 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彭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只能逃亡淮西，有赖于“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才保全首级。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正是在彭莹玉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之下，南方白莲教教徒培养了大批骨干，为其日后起事之时形成燎原之势奠定了基础。

而之所以挑选本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的徐寿辉为领袖，则无非是鉴于其体貌伟岸，颇有领袖气质。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匠邹普胜。至正十一年（1351）农历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便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据说当时恰巧徐寿辉带着10斤鉴铁前往邹普胜家中让其打造一柄锄头。而就在与邹普胜交谈之际，徐寿辉蹲坐在铁砧上，而此前邹普胜刚刚梦见“黄龙蟠其铁砧”，随即认定徐寿辉有“天子之相”，以“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挑唆其参与反元起义。

关于徐寿辉与邹普胜相识的传闻虽然离奇，但却多少说明了南方白莲教信徒在谋划起义时缺乏领袖人物的无奈。但恰恰是在徐寿辉的名义领导之下，南方白莲教信徒不断攻城略地，相继攻占了圻州（今圻春）和黄州，并在水陆要冲之地圻水（今浠水）建都，不过向来迷信的彭莹玉又一次玩起了文字游戏，为这个新政权取名为“天完”，寓意是在“大”上加“一”、“元”上加“宀”，彻底压倒“大元”。而这种迷信的意味还影响到了出身渔民家庭的沔阳青年陈友谅，只是因为一位风水先生说他们家的祖坟修得不错，未来必出贵人。这位已经作了县吏的年轻人顶着父亲陈普才“奈何为灭族事？”的训斥加入了徐寿辉的起义军。

如果说身为南方白莲教首领的彭莹玉也采用红巾军名义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其他几路顺势起义的人马则多少有些“山寨”味道。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和正统红巾军有版权之争。因此在活跃于邓州、南阳的王权（布王三）、张椿等人自称“北琐红巾军”，而攻占襄阳的孟海马则相对应的自称“南琐红巾军”。

在各路起义军之中崛起之初力量最弱的莫过于徐州的李二。身为元代起义军领袖“号码帮”成员李二因为在饥荒年代拿出家里仅有的一仓芝麻来赈济灾民，因此又被称为“芝麻李”。他本人和白莲教没有半点关系。只是因为听说红巾军在各地都闹得很凶，因此和邻居赵君用决定“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以夺取“富贵之秋”。身为当地“社长”（居委会主任）的赵君用立即向李二推荐了据说“勇悍有胆略”的彭大。不过从随后赵君用拜访这位彭大的过程来看，所谓“不得其人，不可举大事也”的说法完全是赵君用吹的牛皮。

根据权衡《庚申外史》中的说法，赵君用拜访彭大之时，这位壮汉的确正在磨自己的斧子，颇有大将之风。但当赵君用问他磨斧子干什么的时候，回答却只能用心酸的“黑色幽默”来形容。彭大说“州县政府每天都说要赈济我们，我天天都在等，可总是等不到，我决定磨好了斧子去山上砍些木柴去城里换米。”最后加了一句：“官府不足信也。”赵君用随即挑唆他参与起义行动。彭大随即表示只要“芝麻李”参加，他就参加。估计此前这为彭大也吃过李二家的芝麻。

不过这支起义军的规模实在太小，据说算上李二、赵君用和彭大一共也才八个人。但就是这个八个人伪装成元帝国政府治理黄河的民工在徐州城内外到处放火，竟然就轻易地夺取了这座江淮重镇。随后竖旗招兵很快就扩大到号称百万大军的规模，迅速控制徐州周遍的大片土地。

和“芝麻李”这样“无耻”的盗用“红巾军”头衔的起义队伍相比，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的郭子兴倒是比较地道的白莲教徒。不过他不是像彭二那样家中没有隔夜粮，天天等着政府救济的破落户。根据史料记载，郭子兴和自己的两个兄弟都是善于经营的地方豪强。因此在是否响应起义的问题上，郭子兴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各路红巾军都取得不错的进展，他才应势而起散尽家财，组建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自称“节制元帅”，向安徽濠州进发。不过由于郭子兴的犹豫和观望，他基本已经被踢出了红巾军先驱者的行列。在濠州地区几乎与他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孙德崖以及俞某、鲁某、潘某四位“元帅”级别的人物。不过在攻克濠州之后，这五位“元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的，算得上是“亲密战友”。



郭子兴绣像

对于声势浩大、蔓延迅速的农民起义，一向干练的脱脱显得束手无策。面对着红巾军所打出了的各种激进的“反蒙反元”、“摧富益贫”的口号，脱脱显然是无力改变元帝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错误的经济和民族政策的，只能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当中书省吏员抱着题为“谋反事”文牍送到脱脱面前时，为了规避自己此前货币改革和治理黄河成为导火索的责任，他甚至亲自将文件的标题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将严重的社会矛盾诠释为长期以来一直盘踞在元帝国统治者心头的民族矛盾。

为了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脱脱不仅在讨论“平乱”问题的会议上将汉族官员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排除在外，还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建议：“在大肆搜捕‘河南谋反汉人’的基础上，召回所有被流放在各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这种撤出“侨民”的做法俨然已经将河南视为敌对国家了。

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的红巾军起义初期，顽强抵抗的恰恰是脱脱所不信任的元帝国汉族官僚。刘福通大军攻陷确山之后，曾一度试图将沦为难民的监察御史张桓请出来作为起义军领导人之一，在对方严词拒绝之后。起义军甚至表示："你只要作了揖，我们就放你走！"但是张桓却更为坚决地表示："我恨不能手刃你们的首领，又怎么会在你们的威胁之下折腰呢？"最终在红巾军将士在感叹："张御史真铁汉，害之可惜"的情况下只能将其处死。而在江西曾任礼部侍郎的颍州人李黼以江州路总管的身份不断向元帝国中枢递交沿江布防的建议，在始终得不到批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在感慨："我将死无葬身之地"的同时在江州组建民兵部队准备与随时可能顺江而下的徐寿辉所部红巾军一决高下。

在李黼准备死守江州的同时，济宁路总管董抟霄收复了安丰之后，正本来准备将矛头对准郭子兴等人所盘踞的濠州，但却意外得到了增援江南的命令。如果董抟霄继续向濠州挺进，那么以内部并不团结的郭子兴集团而言，必然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中国历史也可能随着濠州的失守而改写。因为此时一个名叫朱重八的皇觉寺小和尚，正为了躲避战乱而打算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

此时的朱重八已经在外流浪9年了，他以濠州为中心边走边乞讨，向南到达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过固始、信阳等地，又往北到过汝州、陈州等地，最后东经鹿邑、亳州，期间曾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此时的皇觉寺虽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很快便受到了战争的波及。在"寺为乱兵所焚，僧皆逃散"的情况下，朱重八也只能外出"避兵"。但此时25岁的朱重八仍没有投身反元义军的觉悟。甚至已经投效于郭子兴帐下的同乡汤和写信邀请朱重八入伙，他仍犹豫不决。

后世将朱重八命运的改变归咎于一场占卜，在"避乱"、"守故"都"不吉"的情况下，朱重八才最终选择了"从群雄倡义"的"大吉"之道。但从当时濠州地区的整体环境来看，投靠郭子兴所部义军也是朱重八唯一的活路，因为驻守于濠州城外的元帝国政府军正频繁的"掠良民为盗以徼赏"，朱重八这样的汉族壮丁随时有被杀良冒功的可能。

除了李黼、董抟霄这样独当一面的汉族官员之外，还有许多汉族儒生遵循着古老的"守经权变"理念充当着平乱行动的幕后推手。身为淮西廉访使陈思廉虽然手中无兵无权，不过并不影响他跑去游说在庐州有钱有势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帖木儿不花是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儿子。忽必烈不太喜欢出征安南老师无功的脱欢，甚至下达了"终身不许见"的手令。

不过虽然远离政治中枢，但脱欢的几个儿子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不仅在庐州、饶州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班底和近卫军。所以陈思廉在告诉帖木儿不花“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的现状之后，要求这位“镇抚淮甸”的“帝室之胄”出动自己的王府近卫军出手“平乱”，宣让王帖木儿不花起初还以“鞍马、器械未备”为理由推脱，但是陈思廉只用几天就调集了大量的战备物资，帮助宣让王帖木儿不花轻松地平定了庐州地区的起义军。随后陈思廉又要求宣让王帖木儿不统一调集、指挥淮西的驻屯军，阻击刘福通大军强渡淮河，这个时候曾经被“拔都儿”伯颜政治迫害过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又犹豫了，表示：“非奉诏不敢调。”陈思廉这个时候又起了关键推手的作用，以“非常之变，理宜从权”的名义表示“擅发之罪”自己愿意独立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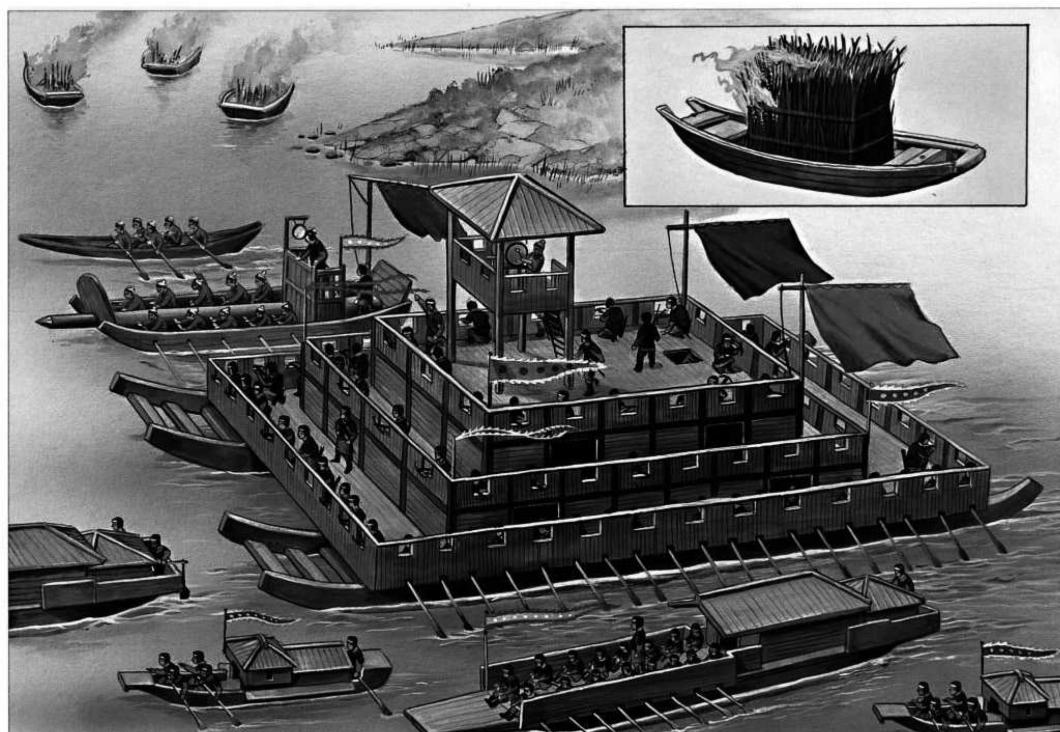
不过并非所有元帝国宗室都有：“（家业）乃我先人力战所致。今国家有难，当身先士卒以图报效，庶无负朝廷也”的觉悟。面对红巾军的起义，各地弃城而逃的蒙古亲贵大臣不计其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的兄弟威顺王宽彻普化和平时期扰民有术，而对于起义军则御敌无方，在野战中被徐寿辉麾下外号“蛮子”的倪文俊击溃之后，随即放弃了重镇。倪文俊和陈友谅是同乡，不过两人在加入起义军之前是否认识却不得而知。不过在“天完”政权的建立初期，倪文俊的名号显然要比陈友谅响亮得多。而随后的岁月中倪文俊对陈友谅这位小老乡也可以算是颇多照顾的。

在夺取了武昌之后，徐寿辉麾下的“天完”红巾军顺江而下，直扑“南开六道，途道五岭，北守长江，运行岷汉，来商纳贾”的江州，不过在各地官员望风而逃的情况下，坚守江州的李黼却意外地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李黼首先陆地战场之上，以奇袭的方式击溃了“天完”红巾军的前锋部队。据说在出击之前，李黼发现自己所组建的民兵部队连统一的制服都没有，于是只能用墨汁将脸上抹黑以作为敌我识别标志。“天完”红巾军显然没有想到竟然会遭遇到元帝国的“黑人雇佣军”，在李黼身先士卒的冲击下损失惨重。

首战获胜之后，李黼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提出：“贼不利于陆，必由水以舟薄我。”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自建立之初便重视内河舰队的创建工作。在进攻江州的军事行动中，“天完”红巾军已经拥有数千艘用于长江作战的船只，不过正当这支庞大的水上作战力量“扬帆、顺流、鼓噪”大举进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船只突然全部在停顿在江面上动不了了。在仔细探寻之下才发现，原来江州附近的长江沿岸早已被李黼铺设了用于阻断船只航行的“七星桩”，滞留在

江面上的“天完”红巾军舰队成为李黼麾下民兵火箭的靶子。

连续两场的辉煌胜利令元帝国政府提升李黼为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军民都总管。但是除了一份空头委任状之外，江州前线并没有获得更多实际的支援。“天完”红巾军随即杀到城下，李黼虽然“登城布战，张弩射敌”，但苦于兵力不足。最终江州的城防崩溃，李黼在指挥巷战的过程中，只留下了一句：“杀我，毋杀百姓！”最终死于混战之中。



庞大的舰队往往对于火攻无能为力

在1352年，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可以说各路起义军之中发展最为迅猛的。除了在江州城下遭遇了李黼的抵抗之外。其分兵四出的战略使得其迅速控制以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在内的大片区域。其势力继续向湖南、广西、福建发展。而作为“天完”红巾军的军师，“老牌革命家”彭莹玉走得更远，在与项普略一起率军夺取了江州之后，这一支“天完”红巾军的偏师一路向东，在转战安徽之后更突破昱岭关，向杭州进军。沿途不断发展壮大——“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

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正是彭莹玉如此大张旗鼓地东进，令元帝国不得不将兵临濠州的董抟霄等人调往江南战场。而在濠州城外徘徊的朱重八也得以顺利地通过封锁线进入城中，在朋友汤和的推荐之下，成为郭子兴的近卫军十夫长。

脱脱南下

面对红巾军在各地的起义，元帝国当然不可能采取完全不作为的态度。但是现实情况是元帝国政府此时各项战备物资都极度匮乏。除了发出“徐州内外群聚之众，限二十日，不分首从，并与赦原”的空头恫吓之外。元帝国不得不采取“纳粟补官”的办法，让各地有意升迁的官员“自备粮米供给军储”，变相卖官以筹集军粮。同时一向以骑兵见长的元帝国由于长期禁止汉人养马，此刻马匹不足。不得不向漠北的牧民买马。

在调集各方面力量准备平叛的同时，元帝国政府还可以倚重民间的力量，以所谓“义兵”的地主武装去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在各路地主武装领袖之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由居住在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的“探马赤军”后裔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虽然是来自西域的畏兀儿人，但是由于世代居住在河南已经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甚至还有一个汉族名字叫：李察罕。如果不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的察罕帖木儿很可能会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在元帝国谋得一官半职。不过随着红巾军的崛起，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察罕帖木儿最终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察罕帖木儿最初只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但是在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的地主武装合流之后，这支部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并不吃力地就击退了罗山地区的起义军。应该说罗山不是红巾军的主攻方向，察罕帖木儿的战绩即便注水也拿不上台面。但是比起率领十万大军驻守沙河，不等与红巾军交锋便因为夜惊而溃散的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的无能来。收复罗山自然成为了元帝国在平乱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对此元帝国政府对察罕帖木儿大加赞赏，特授其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的职位。而李思齐也被任命为汝宁府知府。此后各地元帝国开始采用通过免除劳役的方式来招募的民兵。其中陕西一带组织的民兵由于使用兽皮做成的瓠型箭囊，而被称为“毛胡芦”军。正是借助各地地主武装的支援，只率领三千探马赤军出征的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在襄阳地区迅速组建了一支两万人精锐野战力量，迅速平定了王权（布王三）、张椿等人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



亲赴一线指挥攻坚的脱脱

就在元帝国各地的地主武装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彭莹玉所领导的“天完”红巾

军顺利的攻占了杭州。放弃濠州驰援江南的董抟霄认定：“贼见杭州子女玉帛必纵掠，不暇为备，宜急攻之”从而否决了同僚退守湖州的建议，以“诸君荷国厚恩，而临难苟免。”和“敢有慢令者斩！”的霹雳手段展开全线猛攻。客观地说“天完”红巾军在杭州地区的军纪并不涣散，彭莹玉除了继续宣称自己是弥勒佛出世之外，倒也做到了“不杀不淫”。但是“天完”红巾军在元末各支反元武装之中虽然长于发展，但战斗力却始终得不到提升。彭莹玉的部队在与董抟霄的精锐部队遭遇之后，在江浙地区屡战屡败，最终竟然全军覆没。彭莹玉从此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之上，一般认为他战死于杭州或瑞州等地。但是在各种野史小说中，这位据说身负绝世武功的高手仍不断活跃于各路反元势力之中。

就在各路红巾军相继覆灭的情况之下，被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斥责：“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的脱脱除了“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之外。只能决定亲自出马，而目标锁定的则是阻断南北交通、盘踞徐州的“芝麻李”。应该说起义时仅有八条好汉的“芝麻李”，虽然在徐州已经组织起了一支号称百万的大军。但是却未必比彭莹玉的“天完”红巾军战斗力更强。可脱脱为了一战成功，巩固自己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却沿途不断招募民兵，除了三万名身穿黄色军装的“黄军”民兵组织之外，脱脱还听从部下所谓政府军“不服水土”，组织了五千名濒海盐民作为攻城敢死队。

徐州攻防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杀鸡用牛刀”的脱脱个人秀。在“知城有必克之势”的情况下，脱脱表现异常英勇，不仅时常亲临战场，更对向他射来的铁翎箭都不为所动。但是在数万大军的包围，“巨石为炮，昼夜攻之”的情况之下，脱脱虽然最终攻克了徐州，但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彭大、赵君用等人却成功逃亡。“芝麻李”也是在徐州城破后一个多月才被元帝国政府军擒获。脱脱顺利攻克徐州之后，可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战绩，也可能是为了以儆效尤，竟然对全城的无辜百姓举起了屠刀。

徐州攻防战上表面上是元帝国的辉煌胜利，但是脱脱最后的屠城却必然激起汉族民众更为顽强的抵抗。而在徐州战役之后，脱脱竟然就似乎认为大功告成，派了水利专家贾鲁继续南下，自己则班师回朝了。而成功脱逃的彭大、赵君用等人在抵达了濠州之后竟无疑将促成元帝国掘墓人朱重八的崛起。朱重八加入郭子兴集团后，很快便因他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而得到郭子兴的赏识，被调到帅府当差，被任命为亲兵九夫长。不久郭子兴便将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

总是和朱重八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为了笼络人才，于是便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重八，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朱重八也为自己名字为：元璋，字国瑞。

按照正常的逻辑，彭大、赵君用在濠州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的流窜犯而已。但由于郭子兴和孙德崖等其他几位“元帅”此刻各怀鬼胎，彼此缺乏信任，都想拉拢这两位从徐州南下的“传奇人物”。彭大、赵君用因此反而俨然成为了濠州集团的首脑。郭子兴本人是地方豪强出身，因此与好勇斗狠的彭大关系密切，被冷落的赵君用因此串联孙德崖等人在郭子兴外出的过程中将其绑架。

关键时刻朱元璋从淮北前线赶来，抬出“我在此，谁敢尔！”的大老粗彭大，用武力将郭子兴又救了出来。而此时濠州已经被元帝国的水利专家贾鲁率领大军包围了，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人只好掉转枪口一致对外。一场内部火拼被暂时压制了下来。

回到大都的脱脱在为自己所竖立的“徐州平寇碑”面前，不禁飘飘然起来。此时各路红巾军之中除了刘福通、徐寿辉集团和被围困的濠州之外，基本已经相继覆灭。而刘福通所部也在自成一军的察罕帖木儿打压之下，始终得不到发展。 1353年农历十二月，元帝国政府军又攻克了天完政权都城蕲水，徐寿辉逃入黄梅山和沔阳湖中。似乎的确大局已定。脱脱在主抓农业生产之余，竟然已经开始清除异己了。



古代制盐的辛劳，养成了盐民强悍的体魄和性格

脱脱的政治对手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木华黎的七世孙——朵尔直班。组建“毛胡芦”军的朵尔直班长期和脱脱关系恶劣，更在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兵溃沙河之后联名弹劾过这位长腿将军。因此在自己的亲信“不杀朵尔直班，则丞相终不安”的挑唆之下，不断对主抓围攻“天完”红巾军方面各路野战部队后勤工作的朵尔直班百般刁难，最终令这位四十岁的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病死军中。

脱脱的另一个政敌则是曾经的同盟——哈麻。脱脱和哈麻关系的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哈麻不断诱导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放纵淫乐的生活方式，与脱脱的儒学道德观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脱脱在重新当政之初，虽然出于报答的目的给予了哈麻中书省右丞相的任命，但是并不认可对方的能力。因此改为重用左司郎中汝中柏。这一权力分配显然令哈麻颇为不满，两人关系随即急转直下。而就在脱脱和哈麻不可避免地将展开新一轮的权力争斗之时，南方又传来了小名张九四的盐贩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以及濠州集团发展壮大的消息。

张士诚的起义与红巾军关系并不大，作为一个贫苦的盐民。他最初无非是聚集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和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一直欺压自己的盐警邱义，顺手再干掉其他几个富户而已。但是复仇固然痛快，但是面对随即将要到来的法律制裁，张士诚决心索性“搞搞大”。元帝国末期的盐民生活穷苦，且异常团结。我们不知道脱脱组织用来攻打徐州的那五千名盐民敢死队的安置问题。但是张士诚的动员效率显然比元帝国要高。在付出了自己弟弟张士义中箭身亡的代价，最终消灭丁溪大户刘子仁的地主武装之后，张士诚的起义军已经拥有不少于一万人的规模了。

元帝国对张士诚的态度起初是招揽。不过一张水军万户的委任状已经满足不了控制泰州、兴化的这位盐民领袖了。而从随后张士诚的起义军对高邮的攻坚战中顶着元帝国政府军先进的发火筒、火镞的射击前赴后继地举着木船为掩护不断冲击的情况来看，这支完全出于生计考虑的盐民起义军的战斗力远在以宗教为纽带的红巾军之上。元帝国真正的对手在这个时候才一一粉墨登场。

在张士诚被称为“十八条扁担起义”的前后。 1354年农历五月，水利专家贾鲁在发表了：“我奉旨统八卫汉军，屯兵于濠州七个月了，今天午时不攻克濠州大家都不许吃饭！”的战前动员令后，意外地病死军中。围攻濠州的政府军随即撤退。尽管最终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但是濠州集团也是元气大伤。此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招募

的七百多人显然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郭子兴随即授予他镇抚的军衔。

不过食髓知味的朱元璋并不满足，随即又带着徐达等二十四人南下定远，在与其他地方势力的争斗中，先后夺取了驴牌寨、招降秦把头、击溃缪大亨，迅速建立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不过对于朱元璋而言，他更为欣喜的是在攻略滁阳的过程中结识了定远李善长。有趣的是朱元璋在任命李善长为自己的书记官之后，首先告诫对方：“方今群雄并争，的确需要你们这些智者来参与规划。但是我发现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经常诋毁左右将士，以至于大家都不肯卖命了。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独存！你要吸取这一教训啊！”显然在没读过书的朱元璋眼中，谋士都有搬弄是非的习惯。

在朱元璋以状貌魁伟，面色黝黑花云为前锋，击溃了惊呼着：“此黑将军勇甚，不可与争锋”的元帝国滁阳驻军的同时，濠州集团的彭大、赵君用挟持着郭子兴往泗州。虽然这两人随即邀请朱元璋前往盱眙，但是此时已经羽翼丰满的朱元璋自然不愿意再和他看来粗暴浅谋的彭大、赵君用共事，而在彭大、赵君用发生火拼之后，朱元璋主动派人向赵君用发出警告：“你当年从徐州逃出来，如果不是郭子兴接纳你，估计早死几千次了吧？现在你盘踞濠州也就算了，如果还要害郭子兴就太说不过去了吧！什么道德、伦理虽然空洞，不过我在滁阳还有几万人马，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这段话显然很有分量，不久之后郭子兴顺利地摆脱了赵君用的控制，带着一万多人抵达了滁阳。作为濠州集团的分支，朱元璋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他的时代。

1354年农历六月，张士诚功克扬州，京杭运河再次梗塞，与此同时一度为元帝国招降的方国珍在浙江沿海不断袭扰过往船只，元帝国的另一条输血管道——海运也宣告断绝。无奈之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以颇为恳切的语气再次恳请脱脱出马：“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事实上早在徐州战役之后，脱脱已经认识到了长期依赖南方漕运和海运的元帝国在面对南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时经济的脆弱。虽然他自领大司农事在相对稳定河北平原大搞“生产自救”，但要填补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缺口，终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因此从主观意愿上来讲，脱脱本人也渴望一举荡平盘踞江淮一线的张士诚以及内部分裂的濠州集团。

不过脱脱虽然动员了“旌旗亘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空前庞大的军队，但是他最大的隐患却不是南方的各路起义军，而是自己背后的政敌哈

麻。在脱脱决定领军出征之前，他的亲信——治书侍御史汝中柏曾建议脱脱果断地除掉哈麻。但是脱脱最终还是犹豫了，让汝中柏与自己留在大都代理朝政的弟弟——也先帖木儿商议。可惜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自己，坚决不从。脱脱的悲剧便随着他踏上南征的道路而逐步拉开了序幕。

脱脱的大军在高邮城下首先击溃了张士诚的野战部队，而随即围困高邮城的同时，脱脱还分兵向濠州集团所控制的六合展开进攻。由于彭大、赵君用的到来而公然分裂的濠州集团之中，此刻兵力最强的郭子兴——朱元璋一系此刻自然成为了救援六合的最佳人选。不过郭子兴显然还对此前赵君用对自己的多次绑架心存不满，一度“怒不发兵”。最终还是在朱元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说之下，派朱元璋率军驰援。

增援六合的战役，朱元璋虽然打得很顽强，前沿要塞瓦梁垒反复易手。但是最终起义军还是败下阵来。而在从六合撤回滁阳之后，朱元璋更派人以劳军的名义将此前缴获的军马送还政府军，表示：“滁阳城里都是良民，之所以非法聚集不过是防御强盗而已”。这样的鬼话自然没人相信。但是朱元璋此后的表态却还是令脱脱感到满意的。朱元璋说：“政府南下，我们愿意提供后勤支持。现在高邮的张士诚还没有剿灭，您为什么要分兵进攻我们这些良民呢？”显然六合战役已经令脱脱对朱元璋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清楚的认识，也不想在攻克高邮之前节外生枝，于是坦然地接受了朱元璋的停火协议，打了个哈哈说：“不是良民怎么肯归还我们的军马？”

在与南线的濠州集团暂时停火之后，脱脱对高邮的围攻开始进入了新的高潮。据说已经到了“旦夕且破”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却从大都传来了解除脱脱军权的命令。毫无疑问这是脱脱的政敌哈麻的主意，不过可以在军前解除一位政坛元老的职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完成对脱脱的致命一击，哈麻首先必须获得长期以来对脱脱颇为信赖的奇皇后母子的帮助。

此前脱脱在是否授予爱育失黎达腊皇太子册书和宝玺的问题上，显得比较保守。哈麻抓住这一点，向奇皇后表示：“皇太子之所以被拥立却没有举行正式的授予册宝仪式，完全是脱脱兄弟在从中作梗！”这话当然是事实，但是客观地说由于奇皇后的出身比较低微，反对拥立爱育失黎达腊的绝不只是脱脱一个人而已。在消除了脱脱最大的保护伞之后，哈麻开始鼓动党羽向脱脱兄弟发动弹劾。

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的奏劾报告写得也很有艺术：“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这话当然没错，不过考虑到大都到高

邮的距离、大兵团行进的速度以及脱脱沿途还去济宁拜扫了孔庙，在邹县祭祀了孟子，三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而虽然高邮没有收复，但六合一线元帝国政府军毕竟还是遏制了濠州集团南下和东进的态势，也算得上是“寸功”了。至于打仗花钱，带上省、台、院部诸司的官员本来就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所特许的。

当然袁赛因不花对自己的领导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的批评还是中肯的，如果不是这个无能之辈，在自己哥哥出兵之后就开始请病假，哈麻对脱脱的诟病未必可以传递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耳朵里。当然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本身对脱脱的不信任，也是促成他随后解除对方兵权的主要诱因。

应该说命令虽然下达了，但是脱脱还是有反击机会的。他的参谋龚伯遂表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您出马也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现在只要以军情紧急为名将诏书暂时封印起来就行了！”不过长期接受儒学教育的脱脱并不是燕铁木耳和“拔都儿”伯颜这样的豪强，他迂腐地回答说：“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主动交出了兵权之后甚至还表示：“我的确毕竟愚笨，长期得到领导的信任，委以军国重事，一直都战战兢兢的，今天终于解除了重负，感谢领导对我的恩典。”云云。他的束手就擒，显然令很多人大失所望，除了高呼“丞相此行，我等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的客省副使哈剌答之外，一直担心脱脱会率领大军反戈一击而秘密派人向前线各地指挥官下达：“诏书抵达军前，如果不立即解散，就满门抄斩。”的哈麻显然也被证明是自己多虑了。

如果不是哈麻对脱脱的猜忌，放手让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人继续指挥对高邮的进攻。那么元帝国很可能仍将夺回江淮一线的控制权，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正是他下达的解散命令让“大军百万，一时四散”。不仅元帝国政府军失去了一支强大的野战力量，更使得许多职业军人加入了各路起义军的行列。

脱脱家族随后被分散流放，也先帖木儿被赶到了四川边境通商口岸的碉门，长子哈剌张则踏上了自己祖父同样的道路被流放甘肃。当然最为凄凉的还是脱脱本人， 1355年农历三月，他抵达了自己人生的终点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腾冲西）。当地的知府高惠似乎对这个落魄官僚还算不错，在提供保护之外竟然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脱脱。

不过脱脱显然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表示：“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谢绝再连累一个无辜的女孩。九个月之后，哈麻派遣使节以元惠宗妥懽帖睦尔

的名义将脱脱赐死。脱脱从容地喝下了毒酒，死时年仅四十二岁。或许他已经预见了自己竭力保护的帝国也行将就木。

十年之后面对日益糜烂的局势，元帝国的监察御史们集体发出了：“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的呼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随即给予了脱脱家族以平反昭雪的待遇，甚至授予脱脱之子哈剌张中书平章政事的职务。但是此刻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脱脱虽然不失为一个善于治国的忠臣，但是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垂死没落的帝国。随着他所领导的时代黯然终结，元帝国在下滑的轨道上逐渐加速起来。

第五章 群雄并起（1356—1361）
——察罕帖木儿扫荡红巾军和江南地区的混战

三路北伐

脱脱在高邮城下被解除兵权的同时，事实上元帝国政府军在江淮一线对张士诚的清剿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曾经在杭州击溃“天完”红巾军彭莹玉所部的名将董抟霄在盐城、兴化一线扫荡了张士诚的水上堡垒群。而曾向脱脱提出：“高邮附近都是湖泊湿地，骑兵施展不开，只要给我三万步兵我保证将其拿下。”的山东“义兵万户”石普虽然一度攻入了高邮城中，但是随着大军的瓦解，最终只能带着少数精锐高呼：“大丈夫当死国，有不进前者斩！”被张士诚的部下乱枪捅死。

脱脱的元帝国主力部队在高邮城下功败垂成，其他各地的红巾军也乘势复起。在“天完”红巾军虽然丢失了首都，但是其前期所派出的各路野战部队仍有着强大的实力。而元帝国在前期局势归于稳定的情况之下，竟然让曾经弃城而走的威顺王宽彻普化复镇武昌，这位一度跑到自己兄弟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地盘上“镇遏怀庆路”的亲王倒也老实不客气，带着老婆、唱着歌的回来接受武昌路总管、穰县（今河南省邓州市）人成遵组织民兵收复的这座江汉重镇。

事实上，当时的武昌局势并不太平，“天完”红巾军悍将倪文俊的部队就在汉江之上活动。只是因为成遵所指挥的民兵部队“防御之备甚至，号令严肃，赏罚明当”，才不敢草率登陆。威顺王宽彻普化抵达之后，似乎自我感觉还不错，立即下令转守为攻。这位王爷实在太喜欢讲派头了，出兵打仗搞得像全家旅游一样。三个儿子作为前锋保护着他和他老婆四十艘大船前进。结果还不认识路，船队在汉江鸡鸣汊水域搁浅，再度被倪文俊打得大败。威顺王宽彻普化的三个儿子死了两个，一个被俘，连他的大小老婆也落入敌手。不过威顺王宽彻普化本人的逃亡技术还是过硬的，一溜烟地跑到陕西去了。

面对这样的领导，从武昌调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的成遵自然是哭笑不得。因此在随后倪文俊以威顺王宽彻普化的儿子为人质，要求元帝国册封他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时候，成遵坚决不同意。他说：“行省平章的职务，仅次于宰相也。太平时

节，很多德高望重的汉族官员元帝国都不肯任命。现在一个叛逆跑来要挟，政府如果答应，还有什么纲纪可言！”关于这一点元帝国中枢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被俘虏的王子是忽必烈的直系后裔，就这样不给面子的直接拒绝倪文俊的要求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成遵就此打了个比方：“当年楚汉相争，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要挟说如果不投降就直接把老头子给煮了。刘邦说你煮我的老爸不要忘记分我一杯羹。现在我们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区区的王子，破坏政府的形象呢！”



“天完”政权领导人徐寿辉

倪文俊向元帝国请求招安，显然只是一种政治姿态。事实上他很快便找到了到

处流窜的“天完”红巾军领导人徐寿辉，在汉阳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并向湖南、安徽、浙江一线发展。不过徐寿辉对拥戴自己的倪文俊并不信任，在任命对方为丞相的基础之上还是重用自己的老战友邹普胜为太师。这一人事安排显然令力挽狂澜的倪文俊颇为不爽，为“天完”红巾军随后的内斗埋下了隐患。

而在南方的“天完”红巾军触底反弹的同时，河南地区的刘福通也在1350年农历二月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以宋为国号，刘福通找来了元帝国的国子监学生杜遵道出任丞相。元帝国显然对河南地区的局势颇为紧张。因为按照成遵的说法：“今天下州县，丧乱过半。只有河北地区因为凭借黄河天堑而稍微安定一些”。元帝国政府此时已经以“剥肤椎髓”的方式来调集河北的人力、物力进行平叛战争了。一旦黄河防线失守，那么“河北民心一摇，国势将如之何！”针对刘福通的“宋”红巾军，元帝国第一时间任命了平定“北琐红巾军”和“南琐红巾军”的名将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希望他能再立奇功。

这一时期濠州集团的郭子兴——朱元璋一系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滁阳乏粮，朱元璋向郭子兴建议向和阳发展。而在夺取了和阳之后，同属于濠州集团的孙德崖也率部来投。对于朱元璋接纳孙德崖的行为，郭子兴很是不满。一度形成了郭子兴绑架孙德崖，孙德崖的部下又劫持了朱元璋的局面，险些酿成大规模的火拼。最终通过徐达的斡旋双方达成了交换人质的协定。气量狭窄的郭子兴因为这件事情竟然因病去世了。濠州集团的领导权落入了郭子兴之子郭天叙的手中。

郭天叙的威望显然不足以压制孙德崖，而此时刘福通又派来使者册封郭天叙为“都元帅”，算是正式收编濠州集团。朱元璋虽然表示：“大丈夫怎么能受制于人！”但是在“树大好乘凉”的心理作用之下，濠州集团还是接收了“宋”红巾军的龙凤纪元。虽然名义上属于“宋”红巾军的阵营，朱元璋在军事行动中却与“天完”红巾军的赵普胜的巢湖水军相配合，趁着大雨突破元帝国在水路设立的防线，进入长江，直逼被称为“南北喉襟”的采石矶。


今天的采石矶

采石矶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5公里处的长江东岸，南接著名米乡芜湖，北连六朝古都南京，这里不仅有“千古一秀”的美丽风景，更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南宋时期著名的儒将虞允文曾在这里阻击过金帝国有名的暴君完颜亮。朱元璋的军队虽然在进攻采石矶之前便已经强化了水上作战的训练，但是在抢滩登陆的关键时刻，突然杀出的怀远人常遇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事实上采石矶之战不是常遇春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见面。早在此前加入土匪刘聚集团的常遇春曾要求加入朱元璋的军队。而朱元璋对这个“刚毅多智勇”的青年并不看好。当常遇春哭着说：“刘聚是个土盗，我跟着他没什么前途。如果能为您这样的贤者效力，虽死犹生”。朱元璋却只是表示：“你能跟着我渡江吗？等你打下了太平

县，再说吧！”

太平县虽然离采石矶不远，但是登陆之后的朱元璋所部却一心只想着抢些东西就回去。对于这种流寇心理，朱元璋采取斩断缆绳将所有船只推入江中的决绝做法。在顺利攻陷了太平县之后，一边让李善长撰写了《戒戢军士榜》，严肃军纪。一边招揽了儒生李习、陶安等人，准备向江南重镇金陵挺进。而在朱元璋大举南下之后，郭天叙在进攻集庆的军事行动中战死。随着朱元璋被推举为都元帅。这位据说“龙姿凤质，非常人也”的起义军领袖终于成为了濠州集团的领袖。

在朱元璋不断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他名义上的领导“宋”红巾军实际领导人刘福通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在与元帝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的交锋之中，刘福通虽然长期占据上风，甚至一度从孟津北渡黄河，再度将战火引向了元帝国所依赖的河北地区。但是随着由察罕帖木儿所率领的地主武装投入战斗，战局急转直下。元帝国政府随即任命察罕帖木儿为中书刑部侍郎。强渡黄河失败的刘福通随即把火撒在了杜遵道的身上，在处决了杜遵道之后，他自任丞相随即准备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三路北伐”。

1356年九月，“宋”红巾军实际领导人刘福通准备已久的“三路北伐”全面展开。从表面上来看刘福通似乎是准备一举包围大都，彻底推翻元帝国。但是从各路指挥官的行动和刘福通本人的行动来看，这次“北伐”更像是为了减轻“宋”红巾军在河南的正面压力而采取的战略佯动。而在事实操作中更出现了中路北伐军一路“避实击虚”，采用“迷路式推进”一直跑到了辽东，甚至朝鲜半岛的现象。

红巾军三路北伐之中的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这支部队出潼关，克陕、虢（今河南灵宝），扼崤函，之后转攻晋南。1357年初，李武、崔德所部西路军又转攻陕西，下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奉元路（治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占同（今大荔）、华（今华县）诸州。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前去救援，西路军败走兴元（今陕西关中）。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与李武、崔德会合，自兴元转攻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属陕西），败于察罕贴木儿，西路军溃退。次年，一部分红巾军西路军在李喜喜率领下南下四川，改称“青巾”，但在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入川之后，这部分红巾军被迫于1360年五月，向李思齐投降。

红巾军东路军的统帅是毛贵。他原是赵均用的部将。1354年，赵均用率部东去

盱眙、泗州后，进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元将董抟霄激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地，大败元军于泗州。1356年三月，扬州地主武装“青军”头目张明鉴起兵对抗镇南王孛罗普化。赵均用随即与之联络，围攻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而据之。

刘福通任命赵均用为淮安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之后，赵均用命毛贵出兵转战于安东、海宁、沭阳、赣榆一带。1357年初，毛贵所部夺取元帝国海军战船，由海道入山东。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击毙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又下海，转攻益都，益王买奴逃遁，遂下滨州（今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莒县）。短短两三个月内，尽有山东州县。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又命答失八都鲁攻曹州方向的起义军盛文郁部，防止盛部与毛部势相联结。

为防止毛贵北上，急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克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是年冬，驻棣州（今山东惠民）的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负责镇压山东农民军的总指挥一直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次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二月，毛贵克济南。至此，山东几乎尽为红巾军所有。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命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官吏，又于莱州大规模屯田，一度出现了“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的良好局面。毛贵将山东建成后方稳固的基地，随即挥师北上。

1358年二月，毛贵所部抵达河北南皮魏家庄，与转战各地的元帝国名将董抟霄再度交锋。此时的董抟霄不仅自己“属老且病”，而且麾下的部队战斗力也直线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还是缘于漕运、海运断绝之后，元帝国经济的全面凋敝。董抟霄虽然高呼“我受命至此，当以死报国尔” 拔剑督兵以战，但最终还是在全师崩溃的情况下，战死于乱军之中。

击溃了董抟霄所部之后，毛贵进逼大都，一时间“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但由于中路军作战失利，未能突破山西、河北元军防线，从而与东路军会合攻大都，致使毛贵孤军深入，在柳林败于元将刘哈剌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

红巾军所谓的“中路军”，其实指的是此前盘踞曹州的盛文郁所部，作为最早于颍州拥立韩山童的红巾军元老。曾考中过元帝国文学科进士的盛文郁气质上与刘福

通等人颇有些格格不入。“小明王”韩林儿称帝之处，盛文郁与曾出任过元帝国枢密椽吏的杜遵道同为宰相。但知谋权变，文墨素养较深的杜遵道很快便被刘福通以“专横骄恣”的罪名诛杀了，物伤其类的盛文郁随即选择在1357年三月北渡黄河，攻下曹州（今山东菏泽），建曹州行省自任行省平章，谋求独立的发展。

盛文郁虽然实质上独立于刘福通的“宋”红巾军的中枢之外，但对刘福通组织北伐的行政命令基本上还是响应的。 1357年农历九月，盛文郁委派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诸将率师，逾太行山入山西，取泽州之陵川、高平。闰九月，克潞州（今山西长治），但最终却在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遇阻。此时毛贵率东路军北上，直趋大都。为加强侧翼力量，阻止元军来援，命其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攻怀庆，克晋宁，与中路军配合，势力大增。于是，中路军决定分兵两路：冯长舅、沙刘二率部攻打绛州（今山西新绛）；由沁州（今山西沁县）攻冀宁、大同等地。但很快毛贵进逼大都失利，察罕帖木儿在晋南伏击了攻打绛州的冯长舅、沙刘二。至此，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所部红巾军便成为身处敌后的一支孤军。

1358年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由辽州（今山西左权）转攻冀宁，旋被察罕帖木儿将虎林赤击走，而关先生军再克冀宁。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十月，占领大同，北上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廷夏都，筑有宫阙官署，中路军予以焚毁，逗留七天，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克辽阳。并以辽阳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刘福通就在这时置辽阳行省，任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为平章。



元上都遗址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发布致高丽王书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红巾军在毛居敬率领下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平壤）等地。翌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战败，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二月，攻占开京（今开城），迫使高丽政府南逃。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破头潘率余众败退辽阳。四月，辽阳行省兵邀击红巾军余众，破头潘被俘。中路军残部投降于孛罗帖木儿。

鏖战江南

刘福通在发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1357年六月，刘福通首攻汴梁，不下。八月，取大名、卫辉（今河南汲县）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十月，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

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刘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

但“宋”红巾军政权鼎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发生了逆转。1358年九月，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元军破曹州，擒杀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曹州陷落，使“宋”红巾军政权与山东等地的联系被切断。 1359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而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发起进攻。“宋”红巾军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发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1359年四月，淮安失守，赵君用逃奔毛贵，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争夺势力，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1359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掠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家属数万，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至此，宋政权虽曾发布文告，加封朱元璋官爵，朱元璋名义上也仍奉龙凤为正朔，所发布榜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但实际上“宋”红巾军政权已名存实亡。

朱元璋之所以迟迟没有选择脱离“宋”红巾军政权，主要是基于其所面对的江南局势的无奈选择。就在朱元璋南渡长江的同时，高邮的张士诚也从通州渡江，先后攻陷了常熟、平江等地，随后在高邮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称“周王”。这一时期的张士诚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认为江南百姓困苦主要是地方官员无能。因此大力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官员。对于始终和自己比邻的张士诚，朱元璋起初很客气，他派儒士杨宪前去建立外交关系。

朱元璋的信表面上写得很客气，说：“我听说足下从通州占领了吴郡，堪比西汉末年占据天水的隗嚣啊！我为足下感到高兴，也很羡慕，希望今后通使往来，不要因为别人的挑唆而发生摩擦！”这封信表面上看起来很真诚。但是张士诚虽然和朱元璋一样是个苦出身，可麾下也有读过书的儒生，对于西汉末年割据一方的隗嚣是什么样的人物以及最后的结局不可能不清楚，随即扣留了使者杨宪。我们不知道朱元璋将张士诚比作隗嚣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但是在江南的土地之上，这两雄并立的局面注定不会长久。不久之后，朱元璋便在金陵接受部下的拥戴，自封“吴国公”。

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的战争由张士诚的舰队进攻镇江而开始。对于派去抵御张士诚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特别告诫：“张士诚是个盐贩子，谲诈多端，今天出兵镇江，证明和我们已经没什么交情可讲了。你们要速战速决。”在徐达主力骑兵的冲击之下，张士诚北上的计划第一次受挫。不过张士诚向南发展颇为顺利。在“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张军府上坐”的情况之下夺取了松江等地。而诸路起义军和元政府军之中张士诚部队的军纪似乎还不错，因此江南一带流传着：“死不怨泰州张（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元帝国将领杨完者）”的民谣。



杨完者塑像

杨完者本名杨通贯，是自五代十国以来便盘踞今湖南邵阳、怀化一带“飞山太公”杨再思的后裔。凭借着当地“十峒飞山”的险峻地形，杨氏一族长期以土司的身份独霸一方。而元末动荡的政治局势，更令十几岁时便组织附近的苗家少年操兵练武的杨通贯产生了起兵争雄的念头。

至正十二年（1352），利用徐寿辉所部“天完”红巾军攻陷武昌，又陷岳州之际，杨通贯父子以祖辈受过元廷封赏、怀有记恩之情为名，打着“为国平乱”的旗号，动员数万苗族壮丁正式加入了逐鹿天下的行列。而自脱脱的南征大军溃散以来，面对正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且不堪一战的局面，元帝国各级官员也鼓励民间武装跨境“勤王”。身处武昌前线的元军统帅陶梦祯看见苗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甚至连连叫好道：“乡道此来，吾军胜矣”。随即册封杨通贯的父亲杨正衡为千户，以

苗军为前锋，挺进武汉，一举收复武昌，被称为“飞山蛮”的苗军也由此而名声大震。

武昌战役之后，元帝国政府对杨氏的苗族武装可谓青眼相加，杨正衡授为潭州路同知，旋升湖广右丞，其弟杨正仁授为湖广都元帅副使，杨通贯授湖广副都元帅，其他叔侄，一并加封。加官晋爵的同时，杨氏一族也必须投身更为广阔的战场。 1352年秋，苗军兵分两支，一支由杨正衡统领，进攻粤西，一支由杨通贯统领，开往江浙。

元末粤西地区此时仍没有成规模的汉族起义军，反倒是被称为“百越夷蛮”的壮族的势力范围。元帝国方面抽调杨正衡南下，打的自然是“以夷制夷”的算盘。杨正衡所部进入粤西之后便遭到当地部族武装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而缺乏后勤支持更成为杨氏苗军最大的短板，许多部将劝杨正衡“旋兵湖南”，脱离朝廷，但杨正衡认为“皇恩特重”，不能“因粮草暂缺”遂生异志，于是贸然决战，结果却是全军覆灭，杨正衡亦战死于阵前。

杨正衡战死之时，其子杨通贯正率苗军主力跟随湖广平章阿思兰顺长江而下，准备进攻庐州。但越境参战的苗军军纪涣散，杨通贯等人的政治野心也令沿途的元帝国官吏颇为不安。淮东都元帅余阙便力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苗蛮不当使。”于是元帝国强令苗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命余阙监视杨通贯，若“苗军有暴于境者，即收杀之，凛凛莫敢犯”。但是，张士诚势力得到发展，朱元璋迅速崛起，元廷迫不得已重新启用苗军。

1355年九月，朱元璋派郭天叙、部将张天佑等进攻集庆。元廷忙派杨通贯随江浙行省右丞阿鲁恢率苗军赶去救援，苗军大败红巾军，阵斩了郭天叙。其时，张士诚的淮军攻占扬州，杨通贯又率军前往，败张士诚。1356年正月，张士诚攻占平江，威胁杭州，又准备进攻嘉兴。驻守杭州的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求救于杨通贯，并许以升任参知政事。杨通贯带领少量精兵，夜袭敌营，接着苗军全力出击，张士诚所部措手不及而大败，“生擒其首，其徒溺死者无数”。

不甘失败的张士诚又派其弟张士德率兵数万人转攻杭州，达识帖睦迩弃城逃走，并传令杨通贯夺回杭州城。经数日猛战，“士德大溃，收拾残兵，十丧八九”。八月，张士诚派张士信、史文炳率水兵数万，沿运河北上，兵临嘉兴城。杨通贯采用“诱敌深入”战法，将敌军诱至峡谷时，伏于两岸的苗军把备好的火把投入敌船，恰逢南风大作，“大火焚烧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苗军趁机出击，大败张士诚

所部，“斩首七千，俘虏数千，张士信以伏水遁还”。至此，苗军威震东南。 1357年，元帝国升杨通贯为江浙行省右丞、骠骑将军，并以“克全忠义”而赐名“杨完者”，其兄赐名“伯颜”。

张士诚在南线战场受挫之后，似乎意识到了朱元璋的实力，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对方，表示愿意每年向朱元璋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银二百斤“以为犒军之费”。朱元璋的态度很简单：“你既然知道自己错了。那么就放了我的使者、支援军饷，撤军回去”。随后还加了一句：“我们大丈夫处事，要的就是真心相待。哥不喜欢玩虚的！”但不久之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再度摩擦四起。

1357年，朱元璋和张士诚再度在镇江一线发生大规模的交锋。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士诚控制着北起淮东、南到浙西的辽阔疆域。但是无论是地面交通还是海上运输都必须控制镇江一线的江阴、长兴两大交通枢纽。在朱元璋看来，“得长兴，则张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张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因此，全力争夺以阻断张士诚北上的道路。

而战争初期的失利，朱元璋甚至对自己麾下最信任的将领徐达都采取了降职的处分，更威胁说：“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补过，否则罚无赦！”耻而后勇的徐达随后果然在战场上成功地击溃了张士诚的主力部队，更活捉了张士诚“骁鸷有谋”、长期以来军功赫赫的弟弟——张士德。

张士德被俘之后，朱元璋对他很客气。但是对于张士诚愿意用十万石粮食、一万匹布交换战俘的请求却始终不答应，最终张士德在战俘营中绝食而死。不过这位曾经率领突击队、兵不血刃为张士诚夺取平江的名将，最后还是通过秘密的渠道向自己的哥哥进献了与元帝国联盟，以夹击朱元璋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脱脱进攻高邮功败垂成之后，元帝国便已经向张士诚伸出了橄榄枝，不过对于张士诚派出被自己俘虏的前元政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到杭州请降时，双方却少不得一番讨价还价。元帝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起初表示：“我昔在淮南尝试招安张士诚，不过他反复无常，实在没有信用！”不过随着谈判的深入，元帝国却似乎对这个没什么信用的盐贩子还是很慷慨的。虽然张士诚要求封王爵或者位列三公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虽然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嘴上说着：“三公一定要上级任命，我虽然可以先斩后奏，但有些事情也不能独断专行！”但在心中却还是不愿意错过招降张士诚的机会，因此随后便授予张士诚太尉之职，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则出任江浙行省同知行枢密院事，在达识帖睦迩大撒委任

状的过程中连身为朱元璋阶下囚的张士德都被任命为了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招降张士诚对于元帝国和张士诚本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笔双赢的交易。一方面张士诚借助元帝国的帮助，摆脱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顶住了朱元璋的南下势头。虽然丢失了江阴、常州，却也在太湖之中俘虏了朱元璋的内河舰队指挥官廖永安。据说，朱元璋对廖永安的被俘也很紧张，他没有张士诚财大气粗，只能提出用三千被俘的张士诚部下前来交换。不过此时张士德已经绝食而死了，因此张士诚也要廖永安把“牢底坐穿”。随后朱元璋遏止住了张士诚在江南的发展。但是在江北地区张士诚的势力却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他所占领。

而另一方面元帝国也借张士诚之手首先干掉了向来飞扬跋扈的“飞山蛮”苗军将领杨完者。 1357年七月，朱元璋连克徽州(今歙县)、建德(今东至)。元廷又派杨完者出兵，企图收复失地，但苗军连续几次兵败于李文忠、邓愈、胡大海之手，丧兵数万，损失惨重。张士诚和达识帖睦迩却暗自高兴，因为杨完者是张士诚心腹之患，为愿借敌之手，除掉杨完者。

1358年，达识帖睦迩命杨完者出兵浙东，张士诚出兵淮南。杨完者以部将杨通泰、杨通知、李才富、肖玉率主力分四路开赴浙东，自己则坐镇杭州。张士诚佯装率兵十万与朱元璋作战，暗中却屯兵杭州城附近，当探知苗军已出兵远征，即迅速调集兵力攻击杭州，以达识帖睦迩为内应，围攻杨完者。杨完者战败，与其兄伯颜自缢身亡。不久，杨完者的部将率军回杭，征剿张士诚，张士诚闻风潜逃。为了平息“杭州之变”，安抚苗军，元廷赠杨完者为潭国公，谥忠愍，赠伯颜为衡国公，谥忠烈。但这些并不能平息苗军的气愤，他们举起反元旗帜，归附于朱元璋。

杨完者的人生悲剧除了其个人性格上与达识帖睦迩等元朝正统官吏格格不入之外，主要还是其所部“纵其军钞掠，莫敢谁何，民甚苦之”对江南地区造成巨大的破坏有关。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颇为常见的就是“苗军素无纪律，肆为抄掠，所过荡然无遗”；而嘉兴城被张士诚占领后并没有太大的破坏，被杨完者的苗军收复后却“城中燔毁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正因如此，在元帝国高层看来，与其将富庶的江浙地区交给杨完者的苗军，还不如由张士诚这样的汉族武装打理。

而在随后大都所发生的饥荒之中，张士诚虽然“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但还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浙江同样接受元帝国招安的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恢复了每年向元帝国海运粮食的运作。虽然数量只有元帝国鼎盛时代的十分之一，但毕竟也令虚弱的元帝国得以维系下去。张士诚的风生水起很大程度上是

建立在朱元璋无暇南顾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此时在南京方面的朱元璋不得不腾出手来应对来自西线的“天完”红巾军的威胁。

占据长江中游的湖北的“天完”红巾军内部此前一直龃龉不断。曾经将落魄的徐寿辉迎接到汉阳的倪文俊，不甘心大权旁落，试图刺杀徐寿辉而自立，但事实证明这位“蛮子”虽然是个善于指挥大兵团水上作战、“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的名将胚子，但是对搞政变却是个外行，不仅没有干掉自己的领导，反而从汉阳被驱赶到了黄州，最终死在了同样不愿久居人下的陈友谅的手中。

在这一事件中徐寿辉虽然成功地解决了倪文俊，但是事后却不得不让陈友谅继续指挥前者麾下“天完”红巾军的主力兵团，为自己的未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不过此时的“天完”红巾军毕竟正处于全盛时期，除了向东发展之外，徐寿辉还派明玉珍大举入川，在元帝国政府军无力的抵抗面前，很快便占据了重庆、嘉定（今四川乐山）等地。

明玉珍出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便以“明王出世”而改姓明；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但身高八尺且“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的明玉珍在元末的乱世之中却注定无法安分守己。在各地红巾军起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明玉珍召集自己乡里的耆老，提出“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的问题。而耆老们则很识相地回答说：“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正是在同乡耆老们的支持下，明玉珍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被推为屯长的明玉珍也由此走上了争霸天下的道路。

随着“天完”红巾军进入湖北，明玉珍很快便接受了徐寿辉的招揽，被任命为统军元帅。徐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属于元帅倪文俊的指挥之下。但随后的形势却是“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 1353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明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直到1355年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后，“天完”红巾军的形势才转危为安。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倪文俊

命明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　　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明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也算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元末控制四川的明玉珍

1357年三月，忠于元帝国的“义兵元帅”杨汉由西平寨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

明玉珍虽然一度犹豫不决。但其麾下的万户戴寿却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明玉珍听从戴寿的计划，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战船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明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明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徐寿辉大喜，随即便册封

明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

1358年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明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明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明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军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明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陈友谅杀倪文俊，兼并其军之后，明玉珍上表斥责陈友谅。陈友谅则以派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行刺明玉珍作为回敬，虽然最终没有得手，但明玉珍和陈友谅的关系算是彻底决裂了。

就在陈友谅谋杀倪文俊后的次月，即1357年农历十月，这位“天完”红巾军的新科平章政事便从沔阳率内河舰队东下，与巢湖一线的赵普胜等人会师。而在夺取了长江下游重镇安庆之后。“天完”红巾军的势力范围也开始直接与夺取扬州、招降“青军”元帅张明鉴的朱元璋直接接壤了。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交情，随着双方的部队在江西宁国遭遇，一连串的军事冲突随即爆发。在两线作战的不利情况之下，令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削弱对手的实力。

利用“赵普胜勇而无谋，陈友谅挟主以令众。上下之间，心怀疑贰”的机会，朱元璋不断派人离间两者之间的关系。果然在潜山击溃了陈友谅的前锋部队之后，这位早已对赵普胜不满的“天完”红巾军平章以会师为名跑到安庆将赵普胜处死。在兼并了赵普胜的部队之后，拥兵自重的陈友谅又将矛头对准了徙都南昌途经江州的徐寿辉。在劫持了徐寿辉之后，陈友谅随即以自己的势力范围江州为“天完”政权的首都，自称汉王，将徐寿辉彻底地傀儡化了。

在陈友谅和张士诚的两线夹击之下，朱元璋虽然疲于应付，但却不断地以与民休养、减轻罪罚等政策集聚实力。而招揽人才更成为了朱元璋集团长期以来的既定国策。 1360年农历三月，被《英烈传》等民间小说描绘成粗俗可爱的“浑人”胡大海为朱元璋推荐了青田名士刘基。这位同样被民间小说塑造为“诸葛亮第二”的刘伯温其实并不是什么民间隐士。他参加过元帝国的科举考试，也担任过一些地方官职，只是因为仕途艰险，才不得不辞职回家。



堪称“诸葛亮第二”的刘伯温



常遇春画像

事实上同一时间被朱元璋聘用的除了刘基之外还有章溢、宋濂等人。不过在与朱元璋的对话之中，刘基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精神显然远远超过了只会唱“天道无常，惟德是辅”的龙泉名士章溢。刘基虽然也奉承朱元璋的部队是“王者之师”。但是却为了分析了所面对的战略局势，堪称元末版的“隆中对”。

在刘基看来，朱元璋虽然两线作战，但是张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不过是守财奴而已。而陈友谅虽然“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但是其自身地位却并不稳固，因为他“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而且这个人性格很有问题——“剽悍轻死”，自然就会驱策部下去作无谓的牺牲。那么长时间作战其势力内部自然就会瓦解，因为“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基主张朱元璋应该先集中兵力对抗陈友谅，在兼并了陈友谅的地盘之后，则“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不过刘基的分析虽然颇有见地，但是战场的局势却是瞬息万变的。就在朱元璋决定先拿陈友谅开刀之时，前线却传来了太平失守、花云战死，陈友谅的舰队已经突破采石矶一线逼近南京的消息。客观地说，陈友谅能取得如此的进展要拜朱元璋麾下的第一悍将——常遇春所赐。在接受了刘基的建议之后，朱元璋将在杭州久攻不克的常遇春召回了建康，特地教育他：“克敌在勇，全胜在谋。昔关羽号万人敌，为吕蒙所破，为无谋也，尔宜深戒之。”但是在随后与陈友谅所部的池州战役中，常遇春虽然和徐达配合默契，伏击了对手的野战部队，但是面对三千战俘，常遇春头脑一热，就背着徐达以“这些都是强敌，不杀，为后患”名义开始有计划地屠杀战俘，等到朱元璋下令制止，三千战俘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了。而朱元璋为了补救，又错误地将这些幸存者全部释放。随后朱元璋“不留俘虏”的消息自然传来的了陈友谅的军中，这一点对于本身兵力便占据优势只是苦于士气不高的“天完”红巾军而言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太平是应天的门户，兵临城下的陈友谅显然是认为大局已定。强烈的自我膨胀让他公然锤死了傀儡皇帝徐寿辉，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汉”。但是他在进行登基大典的时候显然没有先听天气预报，仪式进行到一半便被一场大雨浇了个透心凉。不过这场大雨并不足以让陈友谅停止东进的脚步。在邀约张士诚出兵策应的情况下，

陈友谅的舰队开始顺江而下。

面对陈友谅咄咄逼人的兵锋，有人建议朱元璋投降，有人建议他占据应天附近的钟山。不过这些人在刘基口中都被归入了“该杀”的行列。刘基的意见当然是在应天决战，他先是忽悠朱元璋说：“天道后举者胜”对应此前儒生朱升所谓“缓称王”的论调。但是刘基后面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他说：“明公若倾府库以开士怒，至诚以固人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自古以来毫无吝啬的恩赏和待人以诚的态度往往都是足以逆转乾坤的利器。

应该说朱元璋的军事才能也远胜他的对手陈友谅，他断然推翻了部下反攻太平和主动迎击的建议，理由是“太平地区有花云当初构筑的地面工事，陈友谅是依靠着内河舰队才将其攻克的，而此时自己的水上战斗力量不足对手的十分之一，不足以从水上攻克太平。而从陆路进军，陈友谅的水军顺江而下只要半天就可以抵达应天城下，顾此失彼显然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朱元璋的战略是一边派胡大海出兵信州以牵制陈友谅的后方，一边让自己麾下与陈友谅之前就认识的将领康茂才写信给对方，让他速速进军。这一点连颇为睿智的李善长都很不理解，认为：“我们现在就怕他来，您还让他快来？”朱元璋倒是颇为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说：“我们现在担心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约好了时间一起来。只有让陈友谅先到我们才能各个击破。”

陈友谅虽然暴虐但是在约会的问题上似乎还有些信用，当发现此前和康茂才约好的见面地点——江东桥一夜之间已经由木桥变成了铁石桥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派人大叫：“老康……”结果自然引来了两岸的朱元璋部下的全力猛攻。而在江东桥兵败的陈友谅一路上又遭到了赵普胜部下的叛变，不仅被迫放弃了太平，连前进基地安庆都丢了，只能逃回江州去舔伤了。而张士诚显然没有想到陈友谅败得如此之快，虽然出兵太湖但同样遭到了朱元璋部下耿炳文的迎头痛击。但此时的朱元璋却没有趁势追击，因为一场风暴正在华北大地之上逐渐酝酿成型。

第六章 鼎足之势（1362—1365）
——南北混战的高潮和结局

闽中风云

朱元璋、张士诚和陈友谅混战于江南的同时，在福建地区又一位汉族军阀强势崛起。他就是元帝国福建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陈友定，这位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的福清县青年和察罕帖木儿起家的模式颇为类似，也是在元末农民起义之中组织“义兵”参与平乱，逐渐成了一方霸主。陈友定虽然“威镇闽中”也一度有北上争雄的野心，但是他首先要面对的却是盘踞在元帝国最大贸易港口泉州的蒲氏家族以及麾下的“亦思巴奚”。

泉州蒲氏家族兴起于南宋末年的蒲寿庚时代，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蒲氏家族便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占城（今越南中部），随后又抵达中国广州，开始经营海上运输事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随着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崛起，蒲氏家族在广州的经营业绩开始明显下滑，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不得不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重操旧业，很快便再度崛起，并在南宋政府内争取到了安溪县主簿的职位，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却是蒲氏家族由单纯的从事商业向染指地方行政权力的开端。

和很多肥皂剧的情节一样，随着世代从商的蒲氏家族在泉州地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脉之后，蒲开宗的子嗣之中既出现了富有艺术气质、“厌铜臭而慕瓢饮”的蒲寿晟，也出现了好勇斗狠、豪侠无赖的蒲寿庚。而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之下，继承蒲开宗海上贸易事业和政府关系的蒲氏兄弟最终在长于商业运作却往往又能惯于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的蒲寿庚经营之下，垄断了南宋在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以此积累了空前巨大的财富和地方势力。

繁忙的海上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自然引来了海盗的窥视，而随着南宋政府的主要精力转投到与元帝国的战争之中，　　1274年海盗对泉州港的袭击也达到了高潮。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以蒲氏兄弟为首的泉州商贾不得不奋起自保，而正是因为剿灭海盗的功勋，蒲寿庚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他被此刻已经焦头烂额的南宋政府任命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此前蒲氏兄弟在南宋政府内也曾先后担任过官职，蒲寿晟曾被任命为广东梅州的知府，不过他自命清高的个性显然不适

合在南宋末年的官场发展，因此很快便退隐家乡，以与当时的儒学大师洪天锡等交游为乐。而蒲寿庚虽然担任过相当于泉州海关关长的提举泉州舶司的职位，但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也不过做了两年多而已。　1274年本身便拥有庞大民间力量的蒲寿庚终于登上了地方军政长官的宝座。

应该说，相对于蒲寿庚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南宋政府的这一任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稳定当地的局势，更有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元帝国的入侵。但是南宋政府高层纷乱的局势却最终使得蒲寿庚所拥有的权力失去了驾驭。1275年农历三月，利用南宋权臣贾似道在芜湖前线的溃败，丞相陈宜中在临安发动政变私自处决了内务部队指挥官殿前指挥使韩震。这一事件虽然在临安城内只引起了小规模的骚乱，但是在泉州地区却引发了长期的军事冲突。作为殿前指挥使韩震直接领导的野战部队——驻守浙江、福建一线的南宋左翼军在得到了指挥官被杀的消息之后，在统领夏璟的统帅之下已经站到了陈宜中所领导的南宋政府的对立面上，在得到了蒲寿庚的支持后，左翼军在瑞安、温陵、三阳等地连续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宋政府的其他地方部队，俨然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不过无论是蒲寿庚还是夏璟，他们此时所迫切希望的只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渴望获得泉州地区强大海上力量的元帝国派来的招降使节面前，蒲寿庚还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对南宋政府的忠诚。而在南宋临安政府向元帝国投降之后，以宋端宗赵昰为首的流亡政府也投桃报李，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双方之间尽管彼此并不信任，但仍未撕破那暧昧的面纱。不过随着张世杰和陈宜中放弃福州，率船队大举南下，双方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

起初面对停泊在后渚港的南宋皇家舰队，蒲寿庚还是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他主动上船觐见了宋端宗赵昰，并向对方提出了在泉州建立临时首都的设想。作为在泉州拥有丰厚家底的商人，蒲寿庚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考量的。毕竟数十万南宋难民和军队的抵达将强化泉州商业之都的地位，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将居心叵测的元帝国大军挡在泉州地区之外。但是由于对蒲寿庚的不信任以及对元帝国追击的担忧，张世杰明确反对南宋流亡政府在泉州长期逗留，同时还强行征用了蒲氏家族的海船两千多艘以及大量随船货物，在战争期间征用民间财物，本来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张世杰面对的不是一个只会忍气吞声的普通商人，那可是一个官商合一、手握重兵的地方豪杰。

在张世杰没有采纳部下扣押蒲寿庚的建议之后，蒲寿庚返回泉州第一时间关闭

了城门，然后指使自己的儿子蒲师文动员家族势力大肆捕杀在泉州的南宋皇家宗室以及前期进城的南宋流亡政府军队，在泉州城内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张世杰却由于担心长期屯兵泉州会遭到元帝国追兵的合围，仓促地带着强行征用的船只和货物逃往广东。彻底和南宋政府决裂的蒲寿庚也随即投向了元帝国的怀抱，他和泉州知府、与文天祥同榜进士的田真子、左翼军统领夏璟一同向南下的元帝国将领董文炳递交降书，而元帝国显然比南宋的张世杰更懂得尊重地方势力，随即便授予蒲寿庚昭勇大将军等一系列官爵，蒲氏家族在泉州一带的权力不仅没有得到削弱，相反还进一步加强。

此后南宋流亡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再度组织对泉州的全面围攻，从战略角度来看夺取泉州将有力地增强南宋流亡政府的海上作战能力，同时遏止元帝国海军的南下，而从经济角度考量，南宋流亡政府同样迫切需要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当然张世杰和南宋宗室向蒲寿庚的个人仇恨也是这次泉州之役的出发点之一。

尽管张世杰多方调集部队，陈吊眼与许夫人所率领的各寨畲族武装也群起呼应，甚至连莆田南少林也派出数千僧兵助战，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商人的蒲寿庚也是拼尽了全力。在向元帝国求援的同时，他不惜大撒金钱，贿赂前来参战的畲族武装，令对方在战场上出功不出力。泉州战役前后历时三个月之久，其中对泉州城防的围攻长达70多天。蒲寿庚“晨夜血战”、泉州城中更“死者万计”，但是最终他以这些为代价战胜了张世杰，保住自己家族在泉州地区的势力。而此后蒲氏家族将继续他们奢华而专横的生活，直到元帝国轰然崩塌。

1352年，“天完”红巾军遣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其中以宁化的曹柳顺实力最强，一度出现拥众数万的局面。但就在曹柳顺自认福建全省传檄可定之时，身为明溪驿卒的陈友定却率先杀死了曹柳顺派往自己家乡的八十余人的先遣队。出师不利令曹柳顺勃然大怒，随即动员步骑千余人杀奔明溪。但此时的“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的陈友定已经联络了附近乡里的赖政、孙通、胡璃等500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随即据险而守，大败曹柳顺所部。但就在曹柳顺退守自己的根据地——曹坊，惊魂未定之际，陈友定竟然打上门来。拥有数万手下的曹柳顺来不及动员所有力量，就这样被陈友定以“斩首行动”轻松搞定了。

陈友定“平叛”的功绩很快便得到了元帝国汀州府判官蔡公安的注意，随即被授予明溪寨巡检的职务。随后陈友定又跟随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

平）总管。

1358年农历五月，陈友定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天完”红巾军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的陈友定只能驻兵于县前平安寨。但靠着夜袭红巾军军营，陈友定还是成功扭转了战局，随后陈友定又追击红巾军的败兵至宁化，收复清流，进一步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邓克明的兵败并未改变陈友谅鲸吞福建全省的野心。 1359年陈友谅再度派出康泰攻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多线告急的元帝国福建行省只能委任陈友定汀州路总管，令其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陈友定成功在战场擒获了邓克明将邓益，迫使邓克明全军溃退。经此一役之后，陈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再度出兵攻破赣闽交界的杉关，但在陈友定的全力抵抗之下，“天完”红巾军只能再度选择无功而返。

1361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的陈友谅再次派部领邓克明攻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邓克明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邓克明退守抚州。陈友定再度收复邵武诸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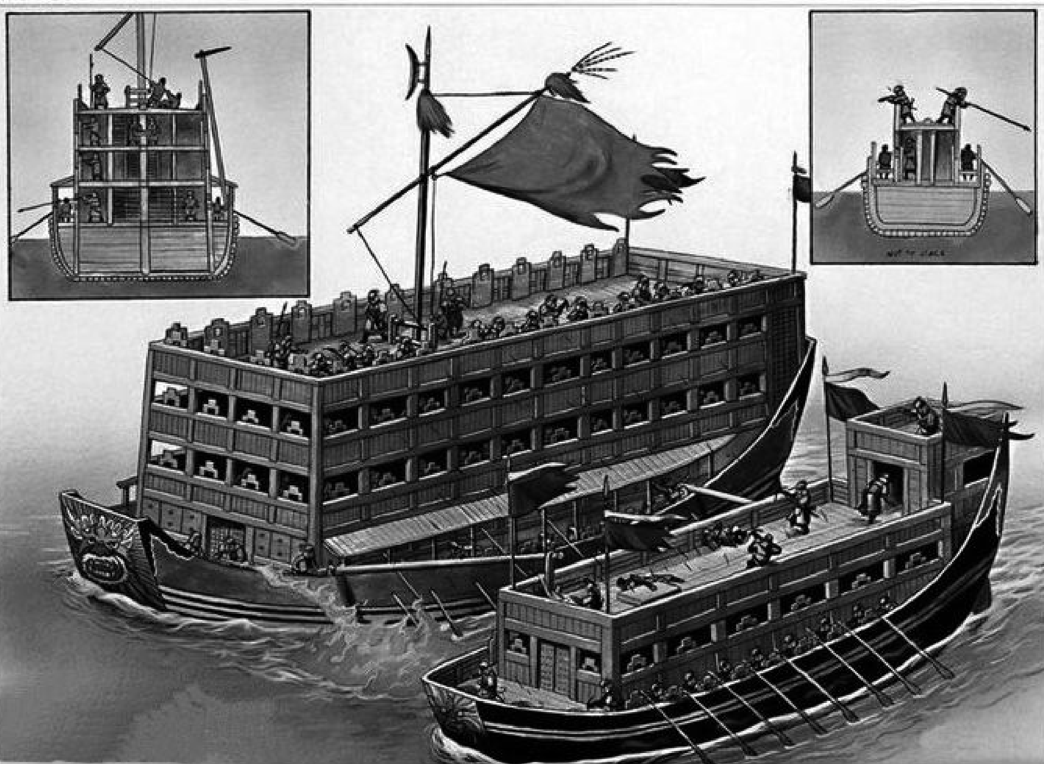
1362年五月，长期处于防御姿态的陈友定趁陈友谅与朱元璋交兵、无暇南顾之际，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陈友定随即收复汀州，但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屈居人下的政治地位，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在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让渡权力的同时，陈友定“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

1364年元帝国正式承认陈友定一省之长的合法权利，置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至此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陈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占有。所谓“亦思巴奚”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持刀盾的骑兵”。作为国际性贸易大港，泉州一带聚集的阿拉伯商人众多，又有蒲氏家族雄厚的财力支持，因此陈友定一时也奈何不了对方。

“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虽然没有能够给予元帝国致命一击，但客观上却牵制了元帝国政府军的大量军力和资源。而这次大规模北伐除了造成长江流域的各路起义军的趁势崛起之外，更令元帝国内部的各路军事统帅逐渐成为了拥有地盘和私人武装的军阀。在平定“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之中出力最多的将领是招募义兵起家的察罕帖木儿以及曾经总制河南军马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虽然一度被刘福通击败，被元帝国政府认定为“玩寇失机”，忧愤而死，但是他的儿子孛罗帖木儿却先后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不断获得反击红巾军的胜利，堪称“大都铁壁”。

应该说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都是元帝国末期少有的军事人才。如果他们可以通力合作，甚至只要各司其职，那么元帝国的崩溃可能都不会如此之快。偏偏这两位因为出身不同，互相看不起。又都有很强的地盘意识，都试图控制元帝国相对太平和富庶的河北、山西地区。于是在南方各路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元帝国的内战又热闹开锣。而为了对抗察罕帖木儿的老搭档李思齐这个外来户，陕西宣慰使张良弼主动与孛罗帖木儿结盟，元帝国内战随即又扩大到了四川和陕西。

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张桢看着打着政府军旗号的部队在日夜仇杀，元帝国派去调解的大臣们却“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甚至从大都前往战区却要绕道延安以西，只能无奈地感慨：“天下事不可为矣！”辞职回家去了。张桢显然并知道此刻元帝国的中央官员更将这场内战当成了捞钱的工具——“南之赂厚，则曰密旨令汝并北，北之赂厚，则曰令汝并南”。不过察罕帖木儿毕竟要比孛罗帖木儿老道一点，除了贿赂大臣之外，还派自己的外甥兼养子——扩廓帖木儿在向大都运粮的过程中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扩廓帖木儿的汉族名字“王保保”更为著名也显得更为可爱一些，以下我们便称呼他为王保保。



水战中大型战舰往往占有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正有资格问鼎大宝的铁木真后裔们终于坐不住了。奉命镇守漠北的窝阔台后裔——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领兵南下，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表示：“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你何故丢失大半？现在应该把国玺给我，让我来收拾残局！”应该说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刻的回答很有帝王范儿，他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随后派出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领并平叛，不过秃坚帖木儿实在“不给力”，竟然在战场上被对手直接打到崩溃，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逃回了上都。阳翟王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令元帝国此后在与中原的反政府武装交锋中始终不该倚重西北藩国的力量。甚至在元帝国崩溃之中，脱脱之子知枢密院事哈剌张在不得不发出：“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实施时，他无奈地回答：“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

不知道是实在打得疲惫了，还是开始意识到各路起义军的威胁，总之在1361年农历六月，察罕帖木儿终于决定放下和孛罗帖木儿的恩怨，将矛头指向了南方。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则是盘踞在山东地区的“宋”红巾军诸帅。一路上招降了田丰、王世

诚等人，迅速席卷山东。此时正在布置对陈友谅新一轮打击的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了威胁的逼近。他派人与察罕帖木儿通好。不过却也向自己的部下如此解释自己的目的："察罕帖木儿组建'义兵'，号称图谋恢复，但是却和自己的同僚打得不可开交。似乎不是忠臣应该做的！我听说他好虚名，即便是田丰这样的小人，他也待如心腹，可见没有知人之名。古代的名将都是洞察入微，智谋弘远的人，察罕帖木儿似乎还不够格！"这段话由于有太多先见之名似乎不太可信。但是朱元璋并不想急于站在元帝国的对立面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如他自己所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之。"

不过察罕帖木儿的南下很快在红巾军的主要根据地益都城下陷入了停滞。因此在朱元璋东进夺取了陈友谅"大汉"政权首都——江州之前写来了一封态度暧昧的信函，表示已经向元帝国为朱元璋申请了行省平章政事的职务。不过朱元璋毕竟不是张士诚，他对自己的部下说："察罕帖木儿言辞虽然婉媚，但心里肯定是想吃了我。况且只是写了封信回来却不放回我的使者，无疑是另有所图。不过我现在没工夫和他计较！"就这一件事情，宁海的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叶兑还特意写了一封计划书递交给朱元璋，其前言就是："最近听说察罕帖木儿妄自尊大，写信给您。这件事就像当年曹操招揽孙权。我觉得元帝国国运不久，人心不属。即便察罕帖木儿效仿曹操，您就效仿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朱元璋那样的政治远见的，就在察罕帖木儿南下的同时。拥有"西蜀形胜，东有瞿唐，北有剑阁，沃野千里"的"天完"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在部下："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谦让犹豫，一旦将士思乡土，瓦解星散，大王谁与建国乎？"的怂恿之下开始自立为王。自此"天完"红巾军彻底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他的遗骸之上出现了陈友谅的"大汉"和明玉珍所创建的"大夏"两个割据政权。不过明玉珍的皇帝坐得并不安稳，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察罕帖木儿的老战友李思齐的讨伐。

客观地说察罕帖木儿的大举南下，正处于江南各股势力互相制衡的微妙时期。朱元璋自己也感慨："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而察罕帖木儿本人似乎也做好了平定江南的准备，他甚至对张士诚的下属——淮南行省左丞相汪同表示："张士诚非忠于国者，中原事定，平江南当自姑苏始"。连已经被元帝国招安的张士诚都列入了黑名单，那么像朱元璋这样的骑墙派自然也是察罕帖木儿的假想敌之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察罕帖木儿顿兵益都，随即又在军前被降将田丰以视察军营的名义诱杀。元帝国最后一次扑灭叛乱的机会就此失去。察罕帖木儿表面上看是由于其自己的疏忽大意，以及“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的豪杰意气，但是从他遇刺之前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所谓“白虹扫太微”的自然现象第一时间得出“山东必失一良将”的推断来看，事情的背后似乎并不简单。而此后察罕帖木儿的竞争对手——孛罗帖木儿的遭遇似乎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而察罕帖木儿作为一个军阀，他的部下随即以“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的名义拥立王保保为指挥官。尽管朱元璋对于察罕帖木儿之死发出了“天下无人矣！”的感叹。但是继承自己养父麾下大军的王保保却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分，他首先率诸路军急攻益都，最终将其攻克。但是王保保的政治才能却显然比察罕帖木儿低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他在攻克益都之后首先展开了报复性屠城，随后又卷入了与孛罗帖木儿的地盘之争。

而朱元璋此时也故技重施，主动写信给王保保，言辞极其肉麻。朱元璋首先以“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庙廓方岳之臣，互相疑沮，丧师者无刑，得志者方命，悠悠岁月，卒致土崩”名义挑唆王保保。其后又将他曾经贬低的察罕帖木儿吹捧了一番。说什么：“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最后表示：“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以厚贶，何慰如之！”希望可以和王保保保持“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的良好关系，宛如一个“求交往”的痴情男子。王保保是否回信，我们不得不而知。但是他连退守安丰，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的韩林儿和刘福通都无心追杀，带着部队北上和孛罗帖木儿争夺河北和山西却是不争的事实。

真正给予安丰地区的“宋”红巾军最后一击的是张士诚。面对张士诚的大军压境，刘福通曾派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名义上还是“宋”红巾军将领，一度也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表示：“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张，不可不救。”但是刘基却提出：“陈友谅方伺隙，未可动也”。一个月之后陈友谅的确出兵包围了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守备的洪都。但是朱元璋在安丰失守，刘逼通战死之后却还是“毅然”出兵了。不过令朱元璋比较“失望”的是小明王韩林儿却幸免于难。朱元璋只能将他安置在滁州。

应该说朱元璋出兵安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除了迎回了韩林儿这个傀儡之外，还一度令陈友谅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朱元璋自己也对刘基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势去矣。” 不过令朱元璋庆幸的是：“今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计之不者，不亡何待！”陈友谅在洪都城下顿兵长达八十五天，这给了朱元璋足够的时间调集兵力西进。

为了一举荡平朱元璋在长江下游的势力，陈友谅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全军号称60万，堪称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0步。

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朱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朱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两千，往来应援以御敌。而就在陈友谅攻城甚急，朱文正麾下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之时，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发。陈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双方在鄱阳湖展开了元末最大规模的水上交锋。这次战役的过程早已被各种史料、小说描绘成了元末版的赤壁之战。当然和赤壁之战一样许多历史的真相便湮没在“火攻”“伪降”等传奇桥段之中。事实上朱元璋一方的兵力并不弱于下风，否则也不能将内河舰队编组成十一队轮番猛攻。而陈友谅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也并非不强，甚至一度将朱元璋的军队逼到右翼溃退，朱元璋下令斩杀中下级军官十余人都控制不住的境地。这绝不简单的只是一句：“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可以解释的。



民国年画：九江口破陈友谅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陈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　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友谅舰20余艘，杀溺者甚众，但朱元璋方面也有战将韩成、宋贵等人阵亡，随后陈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朱元璋所乘之舟，而朱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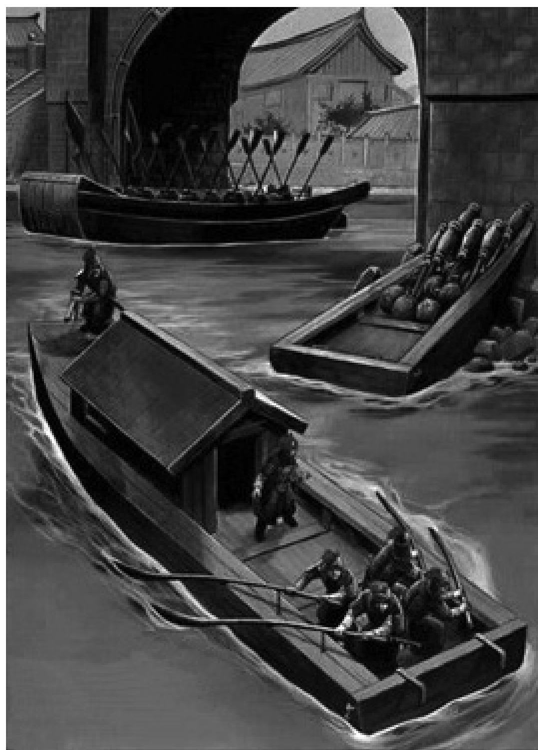
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陈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奉命指挥小舟火攻的朱元璋部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

即便是在朱元璋发动火攻成功，事实上双方依旧相持和对峙了很长时间。而朱元璋的部下纷纷建议先行撤军。只是朱元璋意志坚定，表示：“两军相持，先退非计也。”而陈友谅没有采纳自己部下“今战不胜，出湖实难，莫若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的建议，最终陷入了进退失据、食尽穷蹙的局面。不过大军团作战对于朱元璋一方所造成的损失也很巨大。因此他以嘲讽的语气写了一封信给陈友谅。

在回顾之前双方的交恶记录之后，朱元璋最后说道：“以公平日之狂暴，正当亲决一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公早决之。”而面对陈友谅的沉默，朱元璋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信：“江、淮英雄，唯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

之土地，吾已得之，纵欲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侥幸逃还，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被朱元璋连番羞辱的陈友谅只能拿战俘来出气，命令将被俘的朱元璋部下全部处决。而这恰好给了朱元璋施展政治攻势的空间，他不仅反其道而行之，释放了所有被俘的陈友谅部下，还给予其伤兵医疗援助。甚至连死在自己手上的陈友谅之弟——陈友仁、陈友贵等人朱元璋也大肆祭奠了一番。与此同时，朱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令陈友谅只能移舟渚矶。



元末的火攻战船

双方相持3　日，陈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朱元璋，失此二将之后，陈友谅兵力益衰。在军事、政治的双重打击之下，陈友谅本人中流矢而死，麾下的大军随即崩溃。只剩下陈友谅的发小——张定边带着陈友谅之子——陈理杀出重围，打算在武昌重振旗鼓。

东西吴王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的相持和决战，本来是张士诚坐收渔翁之利的绝佳机会，但张士诚虽然出兵，但是注意力却集中在向元帝国讨要王爵的事情之上。元帝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虽然以“今若逆其意，则目前必受害，当忍耻含垢以从之耳”的态度写了几份申请递交上去，但是这个老官僚显然也早已预见到了“朝廷虽微，必不为其所胁”的结果。最终张士诚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自称“吴王”。因为和朱元璋的称谓出现了“撞名”的情况，因此老百姓只能将朱元璋在建康的政权称为“西吴”，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政权则被称为“东吴”。

而就在张士诚称王的同时，朱元璋的部下也发动了对他的劝进声浪。朱元璋虽然表示：“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但是随即还是从吴国公晋级为吴王，而对于在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采取了和刘基一样的态度：“彼牧竖耳，奉之何为！”不过表面上还是继续采用“宋”红巾军的龙凤纪元。

1364年农历二月，在采取“若来冲突，慎勿与战，且坚守营栅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的围困政策近四个月，又消灭了陈友谅集团有名的悍将“泼张”张必先的增援部队之后，陈友谅之子——陈理在得到了朱元璋“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的保证之后，开城出降。名将张定边不愿在朱元璋麾下任职，从此解甲归田、削发为僧，自号沐讲禅师。后世对他推崇有加，说他文武双全，还懂阴阳，通医术，善谋略。不过从陈友谅败亡的过程来看，张定边的能力未必特别出众，但是他从一而终的忠诚以及失败后悬壶义医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而武昌城内朱元璋还意外发现了陈友谅生前用过的镂金床，一向简朴的朱元璋当即表示：“这和后蜀皇帝孟昶的七宝溅盂有什么不同！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馀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随即将其摧毁。而对于不断跑来请求封赏的部下，朱元璋显得也很吝啬。他说：“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如果有功劳就算我不知道，难道你们的直系领导也不知道？你们看徐达，他已经作了丞相了。但是过去的同僚也还有作中下级军官的！这个封赏不是乞讨来的！回去好好努力吧！我这边官爵多得是，只怕你们自己不给力！”一个黑心老板的形象呼之欲出。



徐达画像

应该说在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已经有“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自信了，他对郎中孔克仁说：“现在天下的大军阀无非这么几家，河北的孛罗帖木儿有兵而无纪律，河南的王保保稍有纪律而兵不振，陕西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道途不通，馈饷不继，江南则只有我与张士诚。张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不过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

者。”显然有一点是朱元璋没有对孔克仁说明的，那就是元帝国的四路大军本身还不团结。就在朱元璋灭亡陈友谅，将矛头转向张士诚之际，元帝国新的一轮内斗又拉开了序幕。

1363年，出于对御史大夫老的沙不满，奇皇后母子怂恿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将他封为雍王，逐回高丽。老的沙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娘舅，在朝野之中也是有势力的大人物，自然不甘心任人摆布，于是在途经大同的过程中跑进了孛罗帖木儿的军营要求“政治避难”。

奇皇后母子在要求孛罗帖木儿交出老的沙无果的情况下，就诬告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图谋不轨，让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下诏削除孛罗帖木儿的官职和兵权，把他流放四川。这样的做法在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当然没有问题，但此时的孛罗帖木儿早已将军队转化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当然不甘心轻易就范，以“此诏非皇帝本意”为由不仅拒绝执行，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突破了居庸关，向大都进军。元帝国的首都卫戍部队无力抵抗。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只能带着自己的卫队逃往辽东。

不过孛罗帖木儿似乎不想把事情做绝，他的部队只是驻扎在清河一线。真正负责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交涉的是曾经在漠北被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叛军打得单身逃亡的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事实证明秃坚帖木儿军事才能可能有限，口才倒是不错，他首先逮捕了政敌——右丞相搠思监和奇皇后的“初恋情人”——宦官朴不花。随后对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说：“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习不改，奈天下何！臣今执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过，卓然自新，一听正人所为，不复为邪佞所惑，然后天下事可为，祖宗基业可保也。”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刻只能点头称是。

孛罗帖木儿对贪婪成性的右丞相搠思监似乎很熟悉。在将他带到自己的军营之后。孛罗帖木儿笑着说：“我当年送给相国的七宝数珠一串，您可不可以还给我！”在生命和珠宝面前，右丞相搠思监当然知道该怎么选择。他随即拿出了六串七宝数珠。孛罗帖木儿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发现都不是自己送的终于愤怒了。以“在君侧者贪婪如此，我可以姑容乎！”的名义将搠思监和朴不花处决。

客观地说孛罗帖木儿并没有取代元帝国皇室的政治野心，在获得了太保的名誉职位之后，他便很欣喜地退守大同了。但是年轻气盛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返回大都之后随即命令和自己私交不错的王保保出兵讨伐孛罗帖木儿。王保保的部队还没有抵达战场，孛罗帖木儿便又从自己的防区杀到了大都城下。虽然旗号打的还是“清君侧”的名义，但是由于这次针对他的人是已经再度出逃

的皇太子，孛罗帖木儿在进入了大都之后除了自己出任中书左丞相之后，倒也没有进行新的政治清洗。

尽管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孛罗帖木儿的控制之下，发出了“孛罗帖木儿、王保保俱朕股肱，视同心膂，自今各弃宿忿，弼成大勋”的号召。但是在会合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后，王保保还是在准备北上争夺大都的控制权。在这个情况之下，已经辞职的前任监察御史张桢不得不仗义执言，表示：“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藉藉，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忧乎？”请求王保保以大局为重，不要急于挑起内战。王保保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暂时也就选择了忍让。

在元帝国的内战之中，长期和张士诚保持“良好关系”的元帝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终于因为拒绝让自己的位子让给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而被囚禁。这位老官僚在失去自由之后据说还很淡定：“日对妻妾，放歌自若”，直到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自杀，行省印章被强行夺走，才无奈地表示：“大夫且死，吾不死何为！”也跟着服毒自杀。

达识帖睦迩的死似乎也敲响了张士诚的丧钟。在政治报复上张士诚本来就只满足于小富即安。他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化家为国，以底小康”，也就是说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庭来治理。这种模式在初期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势力范围的日益扩大，张士诚集团迅速成为了“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的新兴豪门。不过对于知识分子，张士诚还是敬重的，因此他虽然经常不处理政务，但时间也都放在和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上。

而替他管理日常事务的张士信私生活则更加放浪，他竟然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学习“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而在正式接替达识帖睦迩之后，张士信更将所有政府工作都交给自己的亲信黄敬天、蔡彦文、叶德新三人掌管。对此苏州老百姓编了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乾鳖！”“黄菜叶”指的就是黄敬天、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而所谓的“西风”则是盘踞建康的朱元璋。

对于张士诚的昏庸，朱元璋显得很得意，他表示：“我诸事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欺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受欺乎！”不过陈友谅的余部还要一一平定，元帝国内战之后的政治局势也仍不清晰，在给予张士诚决定性一击之

前。朱元璋再度写信给王保保，这一次他除了继续肉麻的表示“英雄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济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惟阁下图之”外，朱元璋还大肆挑拨王保保和孛罗帖木儿本来就很微妙的关系，朱元璋说：“孛罗犯阙，古今大恶，此正阁下正义明道、不计功利之时也”。俨然一幅要王保保舍身取义的道学先生面孔。当然朱元璋也知道大道理说服不了一个军阀，于是又加上一句：“然阁下居河南四战之地，承颍川新造之业，而孛罗寇犯不已，虑变之术，不可以不审。”最后竟然提出正式结盟的请求，说什么：“予地虽不广，兵虽不强，然《春秋》恤交之义，常切慕焉。且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又何彼此之分哉！”邀请对方：“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约！”

其实不用朱元璋挑唆，王保保也早有与孛罗帖木儿一决高下的计划。不过他联盟的对象不是朱元璋，而是以自己养父的老战友——李思齐为首的陕西诸将。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名义，王保保于公元1365年农历三月起兵北上，打的旗号自然依旧是“清君侧”。在确认了元帝国再度陷入分裂之后，朱元璋放心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命令常遇春进军襄阳之外，还分兵向浙江、福建地区的地方政权方国珍和陈友定发动进攻。

孛罗帖木儿控制元帝国朝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事实上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百姓和恢复统治秩序的政策——比如杀处死了一批奸佞的大臣，幽禁了干涉朝政的皇后奇氏，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等等。但是在元帝国朝野眼中他依旧是一个狂暴的军阀。而面对打着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旗号的王保保和李思齐，孛罗帖木儿派出迎战的将领先后倒戈。孛罗帖木儿自己出马又在通州遇到了大雨，蹒跚了三天不得不撤回大都。战场上的诸多不顺令孛罗帖木儿只能用酗酒来麻痹自己。甚至还企图霸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喜欢的女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找来了著名的“长腿亲王”——威顺王宽彻普化的儿子——和尚，让他秘密招徕了六名杀手，由儒生徐士本指挥，在延春门外假冒宫廷侍卫伏击守候。

这次刺杀行动开始并不顺利。大权独揽的孛罗帖木儿本来就把早朝看成走过场。在预定对他进行暗杀的七月二十九日当天，更早早地就准备回家了。而就在杀手们都认为计划失败之时，孛罗帖木儿派往上都阻击皇太子军队的秃坚帖木儿恰好有捷报传来。在部下们的怂恿之下，孛罗帖木儿勉强折回，准备将这一“好消息”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报告。而就在延春门的李树下，几个孛罗帖木儿表示“此人面

生”的侍卫跑了过来。如果只是一个杀手的话，孛罗帖木儿即便是徒手也还能抵抗，但是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之下，这位战将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听着事先约好的得手信号——鸽铃，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从容地走出了自己的密室，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的党羽。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虽然保住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却未必保得住自己的皇位。因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早在太原就有效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此刻最主要的对手孛罗帖木儿被剪除了，他更有理由以平乱功臣的身份从自己的父亲手里接过帝位，不过这一计划王保保并不支持。他在部队抵达大都城外三十里处时突然宣布就地解散，让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顿时失去了武力支持，只好接受自己父亲的摆布。我们不知道王保保这么做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过从客观上来讲一个昏庸的君王总比一个强悍的太子要容易掌控得多。

就在孛罗帖木儿倒台前后，朱元璋再次写信给王保保。这一次已经坐拥大半个江南的朱元璋要比之前不客气得多了。他先严厉地谴责了王保保长期以来拘押自己使者以及出兵犯境的恶劣行径。不过还是不愿意把脸撕破，表示自己所占领的区域“虽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从他人得之，非取于元者也。”同时指出“阁下外假元名，内怀自逞，一旦轻我，遂留前使。予虽不校，但以阁下内难未除，犹出兵以欺我，使其势专力全，又当何如！果若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则当开诚心，示磊落，睦我江淮，殆非所宜。”

朱元璋对王保保的态度向来是将挑唆进行到底。在孛罗帖木儿倒下之后，他又将矛头转向了陕西。他在信中写道：“况有自中原来者，备言张良弼、李思齐等，连和合从，专并阁下，此正可虑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数雄，结连关内，反舍近图，欲趋远利，独力支吾，非善计也。”甚至还吓唬王保保说：“予尝博询广采，闻军中将欲为变，恐不利于阁下，故特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闻，阁下其图之！”。

而在挑唆完了王保保之后，朱元璋还向盘踞四川的明玉珍伸出了橄榄枝。在写给对方的信中，朱元璋再度以三国时代为比喻。他说：“足下处西蜀，予处江左，盖与汉季孙、刘相类，王保保虎踞中原，其志不在曹操下。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戒。”同时还故意对明玉珍南下攻略云南的军事行动中出现的军纪涣散表示遗憾。

王保保和曹操相比，各方面才能孰高孰低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他在接收了元帝国总领天下兵马的任命之后确有大举南下的计划。但是此刻他的幕僚却认为江

南强盛，应该“缓其行”，首先处理元帝国内部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良弼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宜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

但以李思齐为首的陕西四将显然也对元帝国的人事任命很有意见。特别是资格颇老的李思齐，在接到征调檄文之后甚至破口大骂说：“乳臭小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而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随即和其他三位统帅约定：“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双方在鹿台一线展开兵马正式开练，于是元帝国好不容易稳定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了内战之中。

第七章 洪武北伐（1366—1369）
——朱元璋声势浩大的北伐和元帝国的毁灭

翦平江南

利用王保保在李思齐内战，无暇南顾的有利时机，朱元璋顺利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的势力范围。而此时盘踞四川的明玉珍也因病去世。朱元璋在筹划着对张士诚核心控制区域——苏州、杭州发动总攻的同时，再度写信给王保保，不过这一次他的态度开始转向强硬。虽然比较肉麻地替王保保解释了几次都扣押自己使者的原因：“阁下恐在其号令中，故力与之竞，若归使者，必泄其谋，故留而不遣。”朱元璋依旧把王保保比作曹操，但是却明确表示王保保的政治局面不如魏武帝——“意者阁下不过欲挟天子令诸侯，以效魏武终移汉祚；然魏武能使公孙康擒袁尚以服辽东，使马超疑韩遂以定关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抚定中原。阁下自度能垂绅搢笏，决此数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

最后便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了。所谓“倘能幡然改辙，续我旧好，还我使臣，救灾恤患，各保疆宇，则地利犹可守，后患犹可弭。如或不然，我则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阳之师，经唐、邓之郊，北趋嵩、汝，以安陆、沔阳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濠、泗之将自陈、汝捣汴梁，徐，邳之军取济宁，淮安之师约王信海道舟师，会俞宝同入山东，加以张、李及天宝努腹心之疾，此时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计，不足为利而反足以为害矣。惟阁下与众君子谋之，毋徒独断以贻后悔！”

不知道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王保保随后也试图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向李思齐提出联手对抗张良弼的方案。应该说李思齐和张良弼本来就是冤家对头，而和王保保倒还有些香火之谊。但是从来就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张良弼不惜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李思齐军前的情况之下，关中四将的联盟似乎牢不可破。王保保的多路进攻都被对方击败。

在元帝国忙于内斗的同时，朱元璋顺利的拔除了张士诚势力范围外围的湖州、杭州、嘉兴等地的军事据点，不断歼灭其野战部队。随后采用叶兑所提出的“锁城”法。对“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的苏州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四川的明玉珍之子——明升向朱元璋派来使节。这位来使在朱元璋的面

前大吹四川地形险固且富饶，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对方的牛皮，笑着说：“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其险且富，非为国长久之道。且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而乃称富饶，此岂自天而降耶？”为此还将四川的来使作为反面教材，告诉自己的部下要“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取笑于人。”而随后朱元璋派去四川的使者便成功的带回了明升暗弱、群下擅权的消息，顺手还带来了四川各地的军事地图。



元末惨烈的攻城战

朱元璋对苏州的围困长达十个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分兵驻守各门、各方，在城外四周筑长围困之之外，还建造了高大的三层木塔敌楼，监视城中动静，不停地

施以弓弩火铳。而政治劝降的工作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朱元璋亲自写信给张士诚，劝其“全身保族，如汉窦融、宋钱俶故事”。还不断地派出说客进入城内。而随着徐达在城外展开四十八卫，每卫五门襄阳炮，其它炮架各五十余座的炮兵阵地。苏州的攻防战随即进入了最后阶段。据说张士信上城督战，部下献上桃子，还没来得及品尝就被攻城的炮火轰死。

在朱元璋即将解决张士诚之时，王保保对李思齐的军事打击也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元帝国政府高层并不希望这场内战以王保保的全面获胜而告终。因此不断派出使节要求双方停火，然后协力向江南进攻。为此一度还划定了战区：王保保“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对此王保保多少还敷衍了一下，派出了一支部队从徐州南下。虽然没有挺进多远就被击溃了。而李思齐、张良弼则直接表示当地“信号不好，没听见”。



张士诚遗像

元帝国的试图南下，依旧搞得朱元璋很紧张，认为战场上的小规模胜利不过是王保保的骄兵之计，随即要求淮北一线进入全面戒备。事实证明朱元璋是在自己吓唬自己。王保保根本没有心情南下。为了可以一举拿下李思齐，王保保甚至不惜向元帝国的战场观察团行贿。随后派出一支精锐部队直扑李思齐的重要军事基地——凤翔。

偏偏这支精锐部队之中夹杂了许多孛罗帖本儿的旧部。他们向来对王保保心怀不满。独立行动之后，随即就打出“政府军不打政府军”的旗号拒绝向凤翔进军。而指挥官貊高也表示：“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帝国显然很乐意看到王保保的部队陷入了内部分裂，于是立即任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王保保只能无奈地交回兵权。不过他没有按照元政府的安排返回自己的封地，而是率领着自己的骨干力量退守泽州（今山西晋城）。



施耐庵故居及其塑像

王保保失势的同时，朱元璋终于拿下了久攻不下的苏州。张士诚在令其妻妾自尽之后，自己闭门上吊，结果被朱元璋的部下救活。在抵达建康的一路上，张士诚绝食求死。但最终还是被作为战俘经受了李善长的一番审讯才再度上吊自杀。据说张士诚死前曾在朱元璋前“踞坐甚不恭”并表示说：“天日照尔不照我，视尔何为哉？”将自己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天命”。但事实上张士诚集团最终崩溃更多应归咎于他的蜕化变质。

张士诚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

巨大的经济负担，令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怨声载道。 1363年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当地民谣却唱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其中“西帅”指的就是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有趣的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中国两位古典小说巨子——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先后在张士诚的政府中任职。这段特殊的经历自然深刻地投射到了两人的小说中。

朱元璋剪除了自己在江南的一大对手，随即又写信给王保保，揶揄他说：“阁下如存大义，宜整师旅，听命于朝。不然，名为臣子，而朝廷之权专属军门，纵此心自以为忠，安能免于人议！若有它图，速宜坚兵以固境土。”朱元璋的这封信表面上看是替王保保着想，但仔细一分析还是挑唆。因为他并不只满足于江南半壁。就在苏州攻防战结束之后，朱元璋就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第二天又问徐达等人：“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大家比较诚实地回答：“荷恩，皆置酒相庆。”朱元璋显然不想自己的部下们就这样开心下去，于是随即提出：“吾岂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

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酣歌逸乐，今竟何如？”136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正式任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掌军国重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由淮入河率军北上。

朱元璋之所以敢于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连续作战，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元帝国内部情况的理性分析之上的。朱元璋对徐达和常遇春说：“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王保保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将亡，其几已见”。而常遇春也表示：“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馀，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胜也。”

在具体的战略部署上，朱元璋不同意常遇春“直捣元都”的计划，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朱元璋的计划是：“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如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并陇，可席卷而下矣。”

对于徐达和常遇春的这对搭档，朱元璋还是有信心的。不过考虑到这两个人的从属问题，朱元璋在出兵之前还特意对全军指战员表示：“御军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遇春，然身为大将，好与小校角，甚非所望也。”对于部队的纪律，朱元璋也再次强调：“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在起兵北伐的同时，朱元璋还任命自己的老战友汤和为征南将军，前往讨伐浙江的方国珍。在各路起义军之中朱元璋和方国珍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在朱元璋崛起之初曾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派典签刘辰前去“招谕”方国珍，方国珍认为：“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无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谅，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方国珍表面上虽然纳款，但却始终与朱元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朱元璋第一次在江东桥击败了陈友谅，方国珍的态度立即有了鲜明的转变。他不仅派自己的幕僚张本仁献上自己控制的温、台、庆元三路，还将自己的儿子方关作为人质送到建康。朱元璋为了表示自己的豁达，对张本仁说：“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明誓不信，变而为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

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何自怀疑而以质子为哉！”派人把方关又送了回去。方关随即改名为方明完。

而在鄱阳湖决战前后，从庆元返回建康的朱元璋部下夏煜向朱元璋告之了方国珍依旧首鼠两端的情况。朱元璋此时正处于“吾方致力姑苏，未暇与校”、只能派人前去警告对方“及今能涤心改过，不负初心，则三郡之地，庶几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败亡，妻子为修，徒为人所指笑也。”而对于朱元璋的警告，方国珍显然还是害怕的。他随即派人送来了金玉饰马鞍舆，不过朱元璋并不领情，表示：“吾今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他玩宝，非所好也。”

当朱元璋一方面担心王保保的南下，一方面和张士诚反复鏖战之时，方国珍的观望心态再度萌发。朱元璋对此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尔能深烛成败，高览远虑，自求多福，尚可图也”。而在夺取了杭州之后，朱元璋的领地已经与方国珍的领地直接壤了。朱元璋一方面要求对方支援军粮二十三万石，另一方面继续施加政治压力，写信给对方说：“尔早改过效顺，犹可保其富贵。不然，为偷生之计，窜入海岛，吾恐子女玉帛反为尔累，舟中自生敌国，徒为豪杰所笑也”。

对于朱元璋的威胁，方国珍的部下很多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苏州未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或者“江左兵多步骑，其如吾海舟何！”只有邱楠表示：“二人所言，非公福也，唯智可以决事，唯信可以守国，唯直可以用兵，公经营浙东，十馀年矣，迁延犹豫，计不早定，不可谓智。既许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谓信。彼之征师，则有词矣，我实负彼，不可谓直。幸而扶服听命，庶几可视钱俶乎！”不过要方国珍这样的老牌起义军领袖俯首称臣显然并不容易，他所做的工作是日夜运送珍宝，集结船舰，准备继续做一个海盗。

过惯了钟鸣鼎食的日子，方国珍显然已经无法再适应海上的流亡生活。他很快便选择了屈服。派出自己曾经被推为人质的儿子方明完向朱元璋奉表乞降。朱元璋对方国珍的反复无常虽然气愤，但是对方明完这个小孩子倒似乎没什么恶感。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又发现由詹鼎所写的降表写得不错，感慨了一句：“孰谓方氏无人耶！”随即豁达的表示：“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正式结束了他和方国珍之间彼此猜忌和试探的历史。方国珍的实力有限，投降之时只有陆军9200人，海军14300人，官吏650人，马190匹，海舟420艘，粮151900石。在元末诸多割据势力之中只能甘陪末座。

如果说方国珍在元末群雄逐鹿的过程中率先抢跑但最终却鲜有成就，完全是由于个人性格原因，始终首鼠两端的话，那么与之比邻的陈友定则完全是受制于福建当地的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以至于在朱元璋迅速崛起的时候未能积聚起足以争雄的力量。

1365年农历二月，陈友定曾尝试进攻攻朱元璋控制之处州（今浙江丽水）。但随即在朱元璋所部参军胡琛的大举支援之下，选择了撤退。此后朱元璋随即命胡琛、朱亮祖等人由铅山、杉关等地攻入福建。陈友定虽然成功地在建宁地区击败了胡琛。但却无法改变朱亮祖所部控制赣闽要冲杉关等地的现实，战略态势日益恶化。

为了集中兵力迎战朱元璋随即可能发动的进攻，1366年农历四月，陈友定利用泉州“亦思巴奚”头目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地区豪族柳伯顺的机会，秘密出兵夹击“亦思巴奚”军。陈友定派遣其子陈宗海率军连夜从宁真门潜入莆田城，并在次日从西门、南门出城对围城的“亦思巴奚”军发动进攻，这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迅速击溃了“亦思巴奚”军，在这场战斗中，“亦思巴奚”方面有数千名士兵阵亡，白牌、马合谋、金阿里也被俘杀，剩余的士兵疲于奔命，却在沿途不断受到对其恨之入骨的兴化农民的袭击，最终仅有4名骑兵回到泉州。

莆田之战获胜后，陈宗海立即着手组织对泉州的总攻。五月，陈宗海调发元朝水陆两路军队，水路部队由林珙带领，而陆军在柳伯顺部队配合下由北面向那兀纳的大本营泉州发动进攻，而那兀纳则强征民众入伍，以抵抗元朝军队。陈宗海军的监军陈铉原是泉州洵美场司丞，他暗中联络晋江县尉龚名安、千户金吉等人做接应。金吉也是色目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因而对逊尼派的那兀纳有不满。在泉州之战开始后由龚名安率水军进入东山渡，并引导陈宗海的水军进攻泉州城，而金吉则在城内打开城门迎接。在里应外合之下，那兀纳最终兵败被擒，并被押往大都。“亦思巴奚”兵乱以元朝政府军成功镇压“亦思巴奚”军，平息兴化、泉州一带的战乱并重新控制泉州而结束。

作为一名汉人，陈友定虽然效忠元帝国政府，但是据说民族意识特别强烈，为了报复当年蒲寿庚背叛宋室，他对蒲氏家族的后人也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当然同时获得了当地蒲氏家族所积累的大量财富。据说为了敛财，陈友定连蒲氏家族的祖坟

都没放过。据说“得诸宝货无计”，而其中又以蒲寿庚长子蒲师文墓中所获得的财宝最多，甚至连墓碑都是用玛瑙石做成的。得到了如此丰厚的财富，陈友定手中阔绰到甚至可以担负向元帝国海运任务以换取政治资本。

战争致使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导致本就在“亦思巴奚”兵乱中遭遇重创的泉州海商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而当年八月，元中书左丞李国凤上奏其功，陈友定正式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但陈友定却随即发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惟漳州总管罗良不服，以书指责陈友定：“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害；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陈友定得书大怒，竟然发兵攻打漳州。一时间在陈友定控制的福建全省出现“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但陈友定此时每年遣海舶运粮由海道经登、莱等州运抵大都，却是元帝国仅存的生命线，因此对其不仅没有苛责，反而大加嘉奖。

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削平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十二月，朱元璋所部从杉关进入福建境内，陈友定所委任的邵武守将李宗茂、建阳守将曹复畴纷纷投降。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朱元璋又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等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攻福州，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守将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曲出杀使者，吴师围西、南、水部三门，曲出等遁去，正孙、英辅逃奔延平陈友定处，其余元臣多自杀死。汤和遣使招谕兴化、漳州、泉州诸路，分兵攻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

手中有钱有兵的陈友定自然不会甘心投降，他残忍地杀死了朱元璋的使者，将他的血倒在酒瓮中，和部下分着喝。随后表示：“吾曹并受朝廷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不过他的实力终究无法与朱元璋相抗衡。 1368年正月，汤和的部队抵达了延平，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陈友定的部下纷纷变节，陈友定本人饮药自尽未死，被拘押到了建康，朱元璋问他“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陈友定回答说：“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随后和自己的儿子陈宗海一起被杀。

随着陈友定的败亡，元帝国在福建名义上的统治也归于结束。朱元璋除了从湖南出兵南下攻略广西，从福州进军广东之外。最关心的自然还是中原战场。事实上

早在苏州战役结束之前，朱元璋已经写信给了王保保的部下——镇守沂州的“义军都帅”——王宣父子。朱元璋显然和王宣父子早有联系，因此在信中说：“你们父子几年前就写信给我说：‘虽在苍颜皓首之际，犹望阁下鼓舞群雄，殪子婴于咸阳，戮商辛于牧野，以清区宇。’今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尔若能奋然来归，相与戮力戡乱，岂不伟哉！”

不得不说王宣父子的马屁拍的还是很响的，直接将朱元璋比喻成了刘邦和周武王。但是在实际行动中这对父子却始终放不下元帝国所给予的高官厚禄，不仅没有率先起兵响应朱元璋的北伐，即便是徐达兵临城下了还试图阵前倒戈、逮捕朱元璋的特派员——徐唐臣。不过这一手显然没有逃出徐达的法眼，最终王宣被处死，他的儿子王信逃亡山西。元帝国在山东的第一道防线随即瓦解。

得到前线的战报之后，朱元璋立即派人向徐达转告了自己的建议：“闻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冲要，以断援兵，使彼外不得进，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虽然朱元璋特别强调：“然兵难遥度，随机应变，尤在将军。”但是徐达自然还是遵循了朱元璋的部署，首先避开了向来易守难攻的益都，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还是打了个对折，只是派兵攻陷了榆行、梁城、滕州一线阻断了元帝国对益都的增援，并没有真的直接将攻击矛头转向济南。不过即便如此，对益都所形成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在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之中，这座山东重镇便开城投降了。

徐达的大举北上显然给了元帝国政治中枢莫大的震动，以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为首的一干官僚随即上书，表示：“近者南军侵陷全齐，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军马数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

他们针对元帝国中央脑子里所想的还是争权夺利，仍在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山西雌伏的王保保，提出“臣等以为驭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于一偏，狃于故辙。前日南军僻在一方，而王保保近在肘腋，势将窃持国柄，故宜先于致讨，以南军远而轻，王保保近而重也。今王保保势已穷蹙，而南军突至，势将不利于宗社，故宜先于救难，则王保保弱而轻，南军强而重也。”但是这些人的真知灼见并没有被元帝国所采纳。就在徐达的大军连续夺取济南、登州、莱州的情况之下，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首元帝国主力兵团正在忙于围攻王保保所驻

守的泽州，不过王保保也不是省油的灯，随后跑到晋宁（今山西临汾）继续抵抗。

1368年正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主力已经顺利地席卷了山东，由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上成功地夺取了南阳。如此顺利的进展，令朱元璋本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派人提醒徐达、常遇春说："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乎败，乃可无败；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为人所乘。将军其勉之。"而随后朱元璋本人也终于放弃了所谓"中原未平，军旅未息"的矜持。在建康宣布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大明帝国。

朱元璋自立为帝的行为，显然引起了元帝国的警觉。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命令据守关中的张良弼、李思齐"守御关中，抚安军民。"同时以脱列伯、孔兴从潼关出击，"及取顺便山路，渡黄河，合势东行，共勤王事。"不过李思齐等人继续装作不知道，在关中拥兵自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只能直接上书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表示："王保保的部队，终为南军之所忌，如果能好好利用，总不至于一点帮助都没有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担心被扣上收了王保保的黑钱为游说的帽子而已。何况王保保自己也频繁上书疏明其心曲，是犹未自绝于朝廷。显然如果硬要给他加上悖逆的罪名，他又怎么可能甘心受罚呢？其害或有不可言者。"



登基为帝的朱元璋

陈祖仁同时还指出："当今为国家计，不过战、守、迁三事。"元帝国如果想要打下去。则必须借助王保保的出兵山西以成"掎角之势"。如果想要防御，也需要王保保出兵勤王。即便要迁都，王保保也可以提供"藩卫之力"。不过尽管陈祖仁已经发出了"当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仓卒之出，则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弃之，此时虽碎首杀身，何济于事！"的警告，但是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还是不予理睬，让王保保倒戈的部下貊高和关保继续向晋宁发动猛攻，甚至明确表示："如果王保保拒命，就便擒击。"在王保保坚决抵抗的情况之下，元政府不得不下诏削夺了他的爵邑，同时命令关中的李思齐等人出兵增援。对于王保保手下的骨干力量，元帝国也发动了政治攻势。除了其高级幕僚——孙翥、赵恒"罪在不赦"之外，其将士官吏效顺者免罪。

不过此时明帝国的北伐军已经进入了河南，李思齐等人虽然有心北上参与扑灭王保保的战役，但仍不得不优先退守潼关以保护自己的根据地。而在徐达、常遇春等人由虎牢关进入洛阳之后，李思齐等人似乎也意识到河南地区的李克彝等人靠不住。于是第一时间联名写信给王保保，说什么"以前出师非其本心"，自然希望"重修旧好"云云。不过王保保此刻仍被貊高和关保围困在晋宁，就算有心参战，也无力南下。王保保来不了，明帝国的北伐军倒是来得迅猛。应该说此刻明帝国新一代的名将也已经逐渐崛起，未来令王保保、李思齐和整个北元政权不胜头疼的冯胜率先登场，轻松地突破了李思齐重兵把守的关中门户——潼关，李思齐和张良弼面对这位北宋年间连中三元的名臣冯京的后人，完全没有了当年联手阻击王保保的气势，丢弃了大量辎重之后竟然各自逃往凤翔和鄜城了。

在山东、河南相继入手之后，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已经在考虑夺取元帝国首都的相关事宜了。　1368年农历六月，朱元璋将徐达召到了自己的行营，亲自犒赏这位名将。徐达表示："大军平齐鲁，扫河洛，库库特穆尔逡巡观望，潼关既克，李思齐狼狈西奔，元声援已绝。今乘胜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朱元璋对于这一设想颇为鼓励。甚至在徐达提出关于如果元帝国政府放弃大都北逃，是否追击的问题时，朱元璋很慷慨地表示："气运有胜衰，彼今衰矣，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以防其侵轶可也。"

就在朱元璋和徐达全面部署大军渡河北上，围攻大都的军事行动之时，王保保却在山西上演了大逆转，这位长期被自己的部下貊高和关保所压制的名将，始终采取保持实力的态度来应对对方的进攻。在得知了貊高分兵劫掠附近郡县的情况下，才果断出击以夜袭的模式，一举攻占了对手的指挥部。将貊高和关保先后俘虏。这个时候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王保保的态度顿时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貊高和关保是“间谍构兵，可治以军法”，对于这两个政府认定的“元奸”，王保保自然不客气地处决了。

不过对于元帝国政府不自量力地大反击部署：“命王保保任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各方势力显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李思齐虽然在凤翔调集了关、陕、秦、陇各地的部队，据说“拥精甲十馀万”，但是“坐视不救。”

而对于自己一向欣赏的老对手——王保保，朱元璋此时也给出了另一番评价。他说：“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几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足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者，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为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这番话虽然失之刻薄，却说出了王保保最大的弱点，作为一名军事主管，王保保始终将自己放在一个军阀的位置之上，在许多的问题上自然不可能站在全局的角度上去思考。面对步步进逼的明帝国北伐大军，王保保虽然名义上出兵勤王，但是走的路线却是由晋宁向大同。

王保保反常的进军路线立即遭到了部下的非议，有人提出：“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

（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王保保虽然嘴上辩解说：“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但是本质上他还是听取了自己那位“罪在不赦”的幕僚——赵恒的建议：“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不过王保保的复起，多少还是令明帝国的北伐军有所忌惮的，在元中书右丞相也速望风逃遁的情况之下，徐达在进军通州之后，仍命令部下“各卫立栅桃桃堑以待战”。显然是做足了与王保保一决雌雄的准备的。

不过王保保虽然主观上没有驰援大都的行动，客观上却还是给予了元惠宗懽帖贴睦尔成功脱逃的机会。根据元帝国国防部官员（枢密属官）刘佶所撰写的《北巡私记》中的说法，元惠宗懽帖贴睦尔曾在清宁殿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以“巡幸上都”的名义准备逃亡。脱脱之子知枢密院事哈剌张提出反对，理由就是敌军已经抵达了通州“一出都城，立不可保”。不过徐达还在准备与王保保的主力决战，因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成功的抵制了大臣们“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集赛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的非议，于半夜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一部分政府官员“胜利大逃亡”去了。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元帝国的宗室留在了大都，他们是曾经驻守庐州的宣让王、当时的淮王帖木儿不花，以及曾经帮助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剪除孛罗帖木儿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义王和尚。这些宗室大多在战乱之中失去了封地，此刻都和留下来守城的中书左丞相庆童一样已经有了“吾知死所，尚何言哉！”的觉悟了。但是作为元帝国的首都，此时城内的防御兵力实在少得可怜。中书平章政事朴赛因不花据说：“有膂力，善骑射”，但是等他跑到自己的防区——顺承门之时，才发现这一区域只有几百名老弱病残。也只能表示：“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

面对近在咫尺的元帝国首都，徐达表现得异常谨慎。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逃亡之后的五天时间，他始终在修筑工事准备迎击骁勇的蒙古铁骑。根据《明兴野记》中的说法，即便是小股侦察部队“至燕都城下，不逢敌兵，城上亦无旗帜”，徐达也认为“疑有伏兵”。直到确定元帝国政府军没有主动出击之后，徐达才命令部队分三路向大都挺进。而在半路之上，徐达还是遭遇到了一小队蒙古骑兵的反击。徐达让自己的部将尹坚出马，尹坚显然也是一员猛将，顺利地俘获了两名佩金虎符的元军战将。刨去史书的粉饰之外，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小队的蒙古骑兵应该是从大都城内出发前来进行自杀式冲锋的“亲贵敢死队”，因为按照蒙元帝国的军事制度只有万

户才有资格“佩金虎符”，而如果是元帝国的正规军，那么至少由两个万户指挥的大军规模应该还是比较庞大的。这次出马尹坚显然是赚到了，不过这种军功实在没什么可骄傲的。在大都战役之后，我们就没有在史料中再看到这位勇将的身影了。

在击溃了元帝国的“亲贵敢死队”之后，徐达的大军顺利地抵达了大都城下，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场移交仪式而不是血腥的攻城战役。在汉族的史料中只用了简短的六个字来概括整个过程——“填壕登城而入”。不过或许是因为大都的沦陷过于迅速，在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中都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明帝国的部队是藏在一万辆装满了财物的大车里，贿赂了守城军士才进城的。这个元末版的“木马计”实在太过侮辱读者的智商了，我们只能一笑而过。

进入大都之后的明军也没遭遇所谓的巷战，徐达亲自坐镇齐化门，看着城内的元帝国亲贵一一处决。有趣的是，为了保护以监国身份留在大都的帖木儿不花，许多元帝国贵族和大臣都自称“淮王”，上演了一出“代死”的帝国灭亡保留节目。而除了蒙古亲王之外，元帝国的汉族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遑多让。理财专家丁好礼以75岁的高龄，向徐达表示：“我以小吏致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唯一死耳”随即慷慨赴死。

徐达虽然在大都城内只是处决了一些元朝的亲贵大臣，但是对于大都周围依旧忠于元帝国的“团结”“山寨”等民兵组织所进行的肃清却异常的血腥。农历八月十五日明军进攻鸡鸣山寨及宣德府怀来县，当地的民兵“力战不克”，明军随即“梯登屠之”。不过这并不影响明朝的历史书写下以下的文字：“（徐达）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接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是过也”。似乎有元一代谁都想成为曹彬，但是北宋曹彬攻克江南时“不妄杀一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神话呢？

大都的易手基本表示着统治中原97年的元帝国土崩瓦解。但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徐达在占领大都之后随即派出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顾时等人率领骑兵部队展开追击，但是由于徐达一开始便将追击的主要方向盯在了古北口一线，因此尽管意外地捕获了一批从大都逃亡的回回大户，缴获了大批物资，但是却与从居庸关逃亡塞外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失之交臂。

事实上徐达虽然是一员名将，但是对于中国北方的地形并不熟悉，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本身无可厚非，而事实上综合一些蒙古语典籍来说，居庸关方向也并非全无战事。蒙文史籍《黄金史纲》记载了铁木真之弟哈撒儿的后嫡——

图穆勒呼巴图尔在掩护元帝国宗室北逃的过程中曾“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语云：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由此来判断，徐达当时可能是分兵多路追击，只是没有选对重点而已。

有趣的是，这一本来可以原谅的错误，在明帝国统治时期却演绎出了一则新的政治神话——徐达和朱元璋是有意放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明代号称“吴中诗冠”的徐祯卿在自己《剪胜野闻》这样写到：“徐太傅追元顺帝，将及之，忽传令颁师。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驰归告帝曰：‘达反矣，追兵及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身为副手的常遇春打自己上司徐达的小报告，似乎还在情理之中。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就有些离奇和荒诞了。

徐达知道常遇春告自己的“黑状”之后，竟然“留兵镇北平而自引军归，驻舟江浦，仗剑入谒。”除了这等同于公然谋反的行为之外，徐达竟然因为朱元璋正在生气，命令自己的卫兵不许徐达进见，徐达竟然“拔剑斩阍吏，夺关而出”。朱元璋此刻的脾气似乎又好了起来。派人“释其罪，令内谒。”徐达却偏不给面子，最后两人是在徐达的军舰上见面的。徐达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我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不会等到今天！虽然好像晚了点，但是带领着部队兵临长江，割据江淮还是可以的吧！我之所以不活捉元帝国的皇帝。主要是这样考虑的。他虽然已经不行了，但毕竟曾经统治中国，我把他抓回来，您似乎反而不好处置他吧？不如把他赶到沙漠去！”好吧！我们只能承认这个徐达是未来嚣张跋扈的蓝玉附身了。而朱元璋随即竟然还称赞徐达说：“深知大体，岂诸将所能及？”君臣似乎都有些脑子不清楚起来了。

偏偏这一明显与情理不合的说法此后不断被明、清两代的文人不断引用，当然也进行了各种修正。他们所提出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甚一是朱元璋曾经因为应回了“小明王”韩林儿而陷入了政治地位的尴尬，最后只能用自己的部下廖永忠将其秘密投入江中淹死。其二则是朱元璋和徐达挺进大都之前曾说过“气运有胜衰，彼今衰矣，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以防其侵轶可也”。不过韩林儿的情况毕竟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不同，前者曾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而朱元璋所谓“不烦穷兵”也是从军事上来考量。毕竟元帝国政府虽然北逃，但是在山西、陕西还有王保保和李思齐两大重兵集团。

无论如何，徐达的追击不力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逃出了生天，由于上都之前曾

被红巾军的北伐部队攻陷过，因此相对残破。根据《北巡私记》中的记载，居庸关一线“道路萧条，关无一兵。车驾至，亦无供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只能长叹说：“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此时的元帝国流亡政府始终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在鸡鸣山遇到山崩也以为是明军追杀，吓得一个晚上都“人马皆惊”。加上一路上连日大雨，天气又冷，很快就出现了有人冻饿而死。不过《北巡私记》的作者刘佶由于是政府工作人员，虽然饿了几顿，但在向自己的领导反映之后，随即就被安排住进了毡帐，吃了一顿烤羊肉。

应该说在抵达上都的初期。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还是试图反攻。随着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兵抵达之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首先让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红罗山建立防线。随后从辽东征召部队，甚至要求卫星国高丽也出兵支援。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策动山西一线的王保保发动反击，为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特意册封其为齐王。

在山西拥兵自重的王保保始终被明帝国认为是心腹大患。这从某种程度上也牵制了明军北上的脚步，1368年八月，明军兵分两路进攻山西。王保保虽然在韩店击溃了明军杨景的部队。但是却无法改变太原地区遭遇明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此时恰巧传来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命令王保保收复大都的指令，我们当然不能相信王保保这样的一个军阀会听从已经失去了全国政权的那位君皇的号令，王保保之所以出兵保安，准备经居庸关奔袭已经改名为北平大都，更多的应该是围魏救赵的考量。

不过王保保的计划被徐达看穿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明军此刻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徐达对自己的部下提出“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捣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无奈之下的王保保只能从保安撤军，在太原城下与明军决战，最终由于部将豁鼻马的叛变，被常遇春在夜袭中击溃。凄惨地带着十八名骑兵逃亡大同。而在明军继续追杀的情况之下，王保保不敢北上大都与元帝国流亡政府会合，继续向西进入了甘肃。

在占领了山西全境之后，明军又将矛头对准了长期处于观望中的李思齐集团。在年轻将领冯胜的指挥之下，明军将李思齐集团的关中诸将一一击破。李思齐出降，张良弼被杀，脱列伯被擒，孔兴逃亡。至此，元帝国在关中名义上的统治也宣

告终结。而在明军进攻西北的同时，元帝国流亡政府在大都地区发动了第一次也是唯一大规模反击。由常败将军也速指挥的四万骑兵从辽东攻到了通州城下，一度令元政府极为振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要求“亲率精骑直搏大都”。不过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似乎还比较清醒，拒绝让自己这个勉强合格的继承人前去冒险。果然随即传来了也速在滦州战败的消息。

元军在滦州的战败，主要是由于明帝国及时从西北战场上抽调回了常遇春和李文忠的精锐部队。在常遇春的面前，也速显然不是对手。随即一败再败。元帝国在辽东一线的残余兵力也被一扫而空。元帝国流亡政府只能从上都撤往应昌（今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对于这一选择，仍在甘肃坚持抵抗的王保保提出了异议，他奉劝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速“移至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但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时并不希望就此放弃“反攻中原”的机会，坚持留在“未经红贼，城市尚完”的应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第八章 拉锯漠北（1370—1378）
——明帝国的两次北伐和北元的反击

争夺辽东

逗留于应昌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最终等来的不是奇迹，而是死神。137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在位37年，享年51岁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因痢疾而去世。二十天前明军统帅徐达在本道峪（今甘肃定西西北）彻底击溃了围困兰州的王保保。而与此同时李文忠的大军正在向应昌进军的途中。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两路大军都寄予了厚望，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

撤离兰州的王保保，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王保保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王保保所部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双方兵力相当，但明军粮储充足，王保保则兵疲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 人，将校士卒84500 余人，获马15280 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王保保只能带着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元帝国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面对明帝国庞大的远征军，即位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不想成为猛虎口中那只孤独的小猪，终于向自己祖先的龙兴之地——和林转移，不过他跑得很仓促，连自己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后妃宫人也成为了明军的俘虏。在他身边只有当年背着他学乌鸦叫的脱脱之子——哈剌张和几十名骑兵。在和林爱猷识理达腊与自己曾经信任过，也曾经讨伐过的老朋友王保保再度会合。在孕育过一代天骄的草原之上，这三个难兄难弟久别重逢的景象将是何等唏嘘。

客观地说，此时元帝国虽然丢失了富饶的中原大部，但名义上依旧能够对漠北、辽东等地实施有效的统治，加上盘踞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以及控制巴蜀的明玉珍政权对朱元璋治下大明帝国的牵制。此时即位为帝的元昭宗爱猷识理达

腊，至少从地盘和兵力上来看，要较之昔日草创蒙元帝国的远祖成吉思汗有利的多。而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首先寄予厚望的便是掌控辽东的太尉纳哈出。

纳哈出是昔日成吉思汗麾下四杰之一木华黎的后裔，他和朱元璋也算是老相识了。早在1355年身为元帝国太平路（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万户的纳哈出便在战场上被朱元璋俘虏过。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朱元璋曾以纳哈出为名臣后人，待之甚厚，劝其归顺。但纳哈出却坚决不肯。最终朱元璋竟然好言相抚，厚赠银两，准其北归。从这个角度来看，纳哈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随着朱元璋的日益强大，不再需要彰显自己“优待俘虏”后，这位起义军领袖处死过诸多元帝国的所谓“名臣之后”。而侥幸保全首级的纳哈出此后也是一路官运亨通，在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放弃大都北逃之际，已经被册封为丞相，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后，更进一步加封其为太尉。

但必须指出的是纳哈出虽然“雄踞辽东”，但其所控制的地域并非囊括“统有七路、一府。属州十二，属县十”的辽阳行省全部，因为就在辽东地区此时还活跃着屯兵老鸦山（今辽宁凤凰城）的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集兵屯盖州之得利瀛城”的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及“屯聚开原”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而纳哈出所部则主要集结于在开原西北350里的辽河北岸金山一线。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从元帝国建立以来对东北诸民族的管理讲起。元帝国治下的辽阳行省呈现汉、蒙古、契丹、女真多民族混居的状态。辽帝国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投下军州”。因此直到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仍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因此刘益这样的汉族官吏能够在元末的乱世中，称为元帝国辽东地区的军政长官也就不难理解了。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除了与成吉思汗家族沾亲带故的“东道诸王”之外，便以在灭金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木华黎家族的部众为多，另一来源则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仍主要集中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而纳哈出和也先不花则分别被视为这两股蒙古势力的代言人。纳哈出身为木华黎的后裔，动员本族及“东道诸王”的牧民，以号称20万的大军据守金山一线，既是对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东道诸王”对自己领地的保护。与当地蒙古驻军领袖的也先不花形成犄角之势。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也曾是契丹族龙兴的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虽然在元帝国治下辽东契丹族逐渐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最终消失于史籍之中。但仍有部分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而契丹人出身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显然就是这股势力的代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元帝国统治之下的辽阳行省看似仍幅员辽阔，但其统治基础仍主要集中于汉、蒙古、契丹三部聚居的辽河流域。除此之外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达辽东半岛南端，主要被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熟女真”所控制。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则被称为“生女真”。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熟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由于早与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因此在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则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和兀者诸部的主体。水达达居住在混同江南北之临江滨水区域，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有时也捕鱼为食。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要比它南面的“生女真”诸部更落后一步。但总体来说在元帝国统治时期，“生女真”和所谓的“女直水达达”和“兀者”诸部基本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除了令其进贡毛皮、“海东青”猎鹰等土特产之外，元帝国始终将辽东行省的偏远地区视为重犯流放之地。而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执政初年，更由于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无度，而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10年才最终平息。

辽阳行省令出多门，不相统属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反攻大业”。因此这位“北元”皇帝随即决定派遣自己的童年玩伴哈剌张前往辽东，就近协调各方面的势力。但就在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试图统一辽阳行省军政大权的同时，朱元璋的注意力也从西北战场转向了辽东。对于生长于江淮地区的朱元璋而言，苦寒的辽东无疑是一个遥远的异域，与其劳师远征，不如采取政治攻势。

1370年朱元璋派出降将万户黄俦前往辽东，招降当地的汉族军阀——行省平章刘益。有趣的是，黄俦和纳哈出也是老相识。当年朱元璋俘虏纳哈出之时，便是黄俦出面劝降的。朱元璋此次派黄俦出使辽东，显然不是简单的招降刘益那么简单。刘益身为汉族官吏在元末的乱世之中早已抱定了待价而沽的态度，面对朱元璋的招

揽，随即“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朱元璋对此颇为满意，随即以刘益的地盘为辽东卫，任命其为指挥同知。

“指挥同知”不过是从三品的官爵，刘益本人或许满意。但却很难摆平麾下诸将。朱元璋的委任状刚刚签发没多久，新近设立的辽东卫便发生了蒙古族将领洪保保刺杀刘益的恶性事件，洪保保发动的叛乱虽然在张良佐、商暠等刘益旧部的弹压下被平息，但洪保保劫持黄俦逃往纳哈出所盘踞的金山一线，还是引起了辽东卫的全线警觉。在受到张良佐所发出的“辽东僻，处海隅，肘腋皆敌境。平章高家奴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剌章屯沈阳古城，开元则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则太尉纳哈出。彼此相依，时谋入犯。今保保逃往，衅必起”的求援之后，朱元璋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兵支援辽东卫，而是命马云、叶旺两员战将领兵从山东莱州出发，横渡渤海湾后，于旅顺口一线登陆。

朱元璋此举从战略来讲可谓避实击虚，马云、叶旺两人虽然均为千户，所部兵力并不多。但登陆之后很快便整合当地摇摆于元、明之间“熟女真”诸部的势力，形成了对屯兵老鸦山高家奴契丹武装的威压之势。1372年高家奴在马云、叶旺两部的打击之下，不得不主动请降，至此明帝国在辽南地区建立起了与纳哈出长期对抗稳固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北元政府与属国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

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之后，明帝国与高丽之间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但高丽长期以来都是元帝国，双方皇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姻亲关系，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因此在与明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仍与北元藕断丝连。对于此事朱元璋也多次对高丽使节表达过不满。但此时的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今济州岛），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保持与北元帝国的外交关系，也在情理之中。明帝国在辽东站稳脚跟之后，高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随即遭到了也先不花、纳哈出等蒙古将领的合兵入侵。高丽王国无力抵抗。只能继续维持在元、明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

朱元璋自认为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太久，因为1372年正月，朱元璋已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目的自然是一举扫荡北元的势力。

由于最终的结果不甚理想，所以在明帝国的官方史料《太祖实录》中，将发动“北伐”的归咎于徐达和诸将的倡议：“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朱元璋）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鬪，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似乎整件事都是军方‘鹰派人物’的主张，而朱元璋始终是颇为稳健。”

事后朱元璋在给自己儿子晋王朱棡的圣旨中也是如此自述。 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户支翰赍朱元璋敕晋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十分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之变。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此乃擅听群无谋者。”但从朱氏政权历次重大战役皆由朱元璋亲自决策及制订计划的历史来看，北伐这一事关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举措很难在朱元璋持疑虑态度的前提下展开。另外值得寻味的是，实录所载朱元璋关于王保保“困兽犹斗”的预测竟然与后来岭北之役明军惨败的原因完全符合，虽然实录馆臣采取如此记述的目的在于为朱元璋开脱责任，但“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暴露了实录为君王讳的动机与刻意弥缝的痕迹。可以相印证的是，非官方史籍记载了与实录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

明人陈建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直接指出岭北之役计划由朱元璋提出。该书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朱元璋）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而王世贞在《弇州史料》的记载，则大体将朱元璋与徐达的台词互换了一下：“高帝御武楼，与计边事。曰：‘扩廓（王保保）游魂尚在，出没奈何？’达乃请曰：‘亟发兵厄竖子耳。’”在这里，朱元璋仍然是发起五年北伐的倡导者。

《太祖实录》作为明朝历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献，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对个别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讳辨的。各朝实录中，尤以《太祖实录》经历三修，篡改最多。像这种完全改头换面、张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鲜，黄彰健通过

比照《毓庆勋懿集》与《明太祖实录》，便发现了实录将朱元璋赐郭英敕换成了赐燕王敕。《龙飞纪略》所载朱元璋所作战略规划，更可能构成了明军轻率冒进的根本原因。“壬子春正月，以大将军徐达帅师伐迤西，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帝以残虏未除，终为边患。乃以达帅师伐之。冯胜、傅友德、文忠各总东、西道兵。顾时、陈德为副将军，率兵以从。赐敕谕戒以务察胡人情状，审其来否，则慎督三军，一鼓可俘，否则坚守斥堠，以静朔方。”

此次北伐的战略计划，基本延续了两年前的成功思路，只是改两路并进为三路进取。明军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对整个北伐行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对三支军队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趍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

根据以上文字，不难对三路明军职责给出具体的解释：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也即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

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作战为目的，而旨在中路军的掩护下，以实现消灭北元汗廷为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其承担这双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重任务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王保保军。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之前那样佩“右副将军印”，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可以讲，中路军的作战任务是最重的，东路军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军却恐怕是最容易默默无闻的。在三支军队首将的选择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武臣，以其主持三路军务，与王保保展开决战，是最正常、最

合适的选择。李文忠以奇袭开平而一举奠定其在明帝国武将集团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此次继续负责奇袭任务，既发挥其所长，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项举措。

而冯胜与其兄冯国用则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将领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农民军内部经常发生叛乱，朱元璋政权内部亦是如此。1356年，朱元璋建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其麾下亲信猛将多属此系统，是朱氏政权的主力军，而充其首领者便是冯氏兄弟。 1358年冯氏兄弟任“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充其副职的是李文忠、康茂才。随后冯国用以疾卒，冯胜袭其职，“代领其众，居中宿卫”。 1361年，朱元璋改“帐前亲军”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冯胜担任最高职务“都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冯胜都是仅次于徐达的二号将领，常遇春尚居其后。但冯胜爱排挤他人，军事行动也多有失误，因此屡受朱元璋责罚，渐居常遇春之后。而此时北伐之中还有一员正冉冉升起的将星：担任徐达中路军先锋的蓝玉。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而对于徐达所给予的先锋之职，蓝玉也颇为用心，先于山西境败王保保所部游骑于野马川，随后又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击败王保保主力，可谓是旗开得胜。但此时明军主力已经远离本土，脆弱的后勤补给很快便成为制约其战斗力的“阿克琉斯之踵”。

徐达北上所走的是元帝国时代所开辟的联通和林与大都之间的所谓“孛老站道”。这条主干道从成吉思汗南下征金以来便逐渐成型，此后经元历代统治者修缮，一度拥有相对成熟的驿站和补给系统，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的战争破坏，驿站消失，驿站管理制度日趋瓦解。徐达所部北上沿途补给完全依赖于后方转运，压力可想而知。而此前蒙古军队出征，一人要备马三至五六匹不等，以备替换的便利，明帝国军队显然也并不具备。而本土作战的北元军队则可以获得兵力和物资上源源不断地补充。最终在岭北徐达遭遇了他军事生涯最大的一次惨败，损失数万精锐。

同样的问题在东路李文忠所部进击过程中也显得尤为突出，进至胪朐河时，李文忠命部将韩政等保护辎重，而自己率领轻装部队，每人携带二十天的粮食，迅速赶至土剌河。北元太师蛮子哈剌章率领部众全部渡河，列阵以待。李文忠率军进逼，敌军才稍微退却。到达阿鲁浑河时，敌军逐渐增多。李文忠马中飞箭，他下马

之后，手持短器，继续战斗。指挥使李荣将自己的战马交给李文忠，而自己则夺乘敌军战马。李文忠重获战马，更加殊死作战，终于将敌军打败，俘获敌兵数以万计。追奔至称海时，北元军队重新聚集。李文忠只能收兵据险，杀牛犒劳士兵，将所获马匹释放野外。敌军怀疑有埋伏，慢慢引军而去。李文忠也率军返回，错过了旧路。到达桑哥儿麻时，缺乏饮水，军中将士十分口渴，于是向天祈祷。所乘战马跑过之地，泉水涌出，三军都得以解渴，于是杀牲口以祭上天。然后班师回朝。这一战役，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都已战死，因此朱元璋未予赏赐。

与中路、东路两军的情况相比，冯胜所指挥的西路军似乎进展颇为顺利。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从上条史料可以看出，冯胜军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在这里歼灭了甘肃元军的一支主力军队。尔后经肃州“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一战，再次歼灭元军另一支主力军队，并招降上都驴部。从永昌至肃州，中间要经过甘州（今甘肃张掖），这里虽未交代占领甘州之事，想来应是先占甘州，后占肃州。至此，明军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进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的最西境，也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与哈密三地。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很好地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任务。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至亦集乃，乃败俞宝兵，分兵守扼关塞。冯胜乃遣友德又率兵追击俞宝于瓜、沙州。”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的所有地区。此后，西路军应是听到了岭北之役失利的消息，了解到策应中路军的任务已经

失去了意义，从而全线撤退出甘肃。

但耐人寻味的是，冯胜返京之后，却与战败将领徐达、李文忠一样，皆未受到封赏。《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解释的。“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这条史料显示贪黩马匹等物是西路军将领集体所为，并非冯胜一人。但王世贞《弇州史料》却将西路军将领不受封赏的责任完全归于冯胜一人：“时大将军达兵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所失得相当，独胜以捷闻，而有言其匿私虏橐駞马者，赏不行。”无论如何，冯胜因贪污不受封赏，是明代史籍的共同记载。

日本学者和田清并不满足于这个“浅显”的理由，而将其引向另外一个思路。“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虽然这一推测很有吸引力，但毕竟没有史料佐证。由于明人讳言岭北之役惨败的缘故，相关史实的记载甚少，在《纪事录》发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明人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明初成书的《纪事录》记载了一个其他史籍皆未记载的惊人史实，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退时，采取的是彻底放弃的方式，导致朱元璋对其严厉责罚。

西域得失

俞本《纪事录》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罕见的一手文献，这是由撰者身份与著述立场决定的。 1357年，俞本进入军伍，成为朱元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手下之“帐前黄旗先锋”。冯国用卒后，当改隶冯胜，经历战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称吴国公等大事。晚年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虽有年月错讹，但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著述。明末钱谦益（1582—1664）著《国初群雄事略》，尚参考了大量《纪事录》的内容，但该书后来亡佚，多种丛书皆仅著录其名。

根据俞本的说法：“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劵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

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什么呢？《纪事录》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惧回鹘之兵”。“回鹘”，原称“回纥”，是隋唐时期活跃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也分成四支外迁。 1283年，随着高昌城毁于战火，高昌回鹘政权的灭亡，“回鹘”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回鹘”一词并未随之从历史中消失，不仅“回鹘文”仍在西域地区流行，而且惯常用典的元代汉族文人也仍然经常用“回鹘”指代畏兀儿与西域，以及用此称元朝境内的西域人。俞本这里的“回鹘”所指代的是哪个政权或民族呢？

元朝末年，当蒙古 统治者面临长城以内汉族的叛乱时，察合台汗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也大为削弱，非黄金家族的“异密”们掌握了实权，察合台汗国从而被分裂为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与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东部朵豁剌惕异密播鲁拥立秃黑鲁帖木儿（1330—1363年，1347—1363年在位）继承汗位，从而建立东察合台汗国（又称叶尔羌汗国，蒙兀儿斯坦，明人以其国都所在地称别失八里、亦力把里）。

秃黑鲁帖木儿很有作为，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稳固了社会基础，同时，逐渐削弱异密们的权力。在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向西进攻河中地区，发动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虽然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并未在当地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也向东扩张势力，其势力威慑到了哈密，与元朝声气

相接。洪武初年，明朝尚未与帖木儿帝国及更西势力形成直接接触，明朝对西域的了解，恐怕更多的是对邻国东察合台汗国的认知。故而，冯胜所惧“回鹘”势力，便应是东察合台汗国。

明朝建立的1368年，当东方汉地正处于元、明易代的大规模战争中时，察合台汗国境内也正展开着一场长达22年的内部战争。 1365年，权力遭到削夺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哈马鲁丁趁也里亚思火者汗去世的机会，大肆诛杀秃黑鲁帖木儿诸子，自立为汗，引起东察合台汗国部分势力的反对，一代枭雄“瘸子”帖木儿趁机在1368年，对东察合台汗国发动进攻。

而当明朝发动岭北之役的1375年，哈马鲁丁却向帖木儿帝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占领了帖木儿帝国的大片领土，势头甚猛。冯胜所面对的东察合台汗国，正处于此时势力大炽的时期。冯胜在岭北之役惨败的惊惧之下，对东察合台汗国东进甘肃心存畏惧，于是选择焚弃城池的弃地措施，以免贻粮于地的政策，也符合情理。傅友德占领瓜、沙二州后，之所以未进一步西进，也应在于避免与东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故而《纪事录》所载的“惧回鹘之兵”，便应是惧怕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

但冯胜撤兵之后，东察合台汗国并未东进，原因何在呢？这在于其与帖木儿帝国的长期内战使其无暇东进。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东察合台汗国与西部帖木儿帝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篡夺汗位，不仅遭到了国内诸多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且帖木儿帝国标榜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也对哈马鲁丁的正统性构成了威胁，无论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马鲁丁皆将西进河中，统一察合台汗国，剪除异己势力作为东察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

同时东察合台汗国以牧立国，自然条件较差，河中地区农耕条件十分优越，有以牧立国的东察合台汗国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源，占领河中地区对于东察合台汗国壮大经济实力，也很有帮助。故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经略目标是河中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东察合台汗国势力才延展到嘉峪关以西的沙州、哈密地区。但也仅仅是渗透进来，主宰这一地区的仍是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集团。至于甘肃，更从未与察合台汗国产生过瓜葛。对于东察合台汗国来讲，这是一片陌生的东方地域。相应地，哈马鲁

丁只有在统一察合台汗国，消除后顾之忧后，才有可能考虑东进甘肃的问题。

岭北之役后，北元军队趁势南下，但对甘肃的进攻只局限在兰州、河州、会宁等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地方，对甘肃广大地域并未见有收复举措。这同样在于北元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其统治的“心脏地带”，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源于蒙元汗位之争引发的中央与西道诸王的重重矛盾。察合台后王虽一直未争夺汗位，但却多次卷入蒙古帝国汗位之争，且因疆域屡次扩张的关系，侵夺了元朝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北元政权甚至在臣僚屡屡提出西进建议的情况下，迟迟徘徊于上都、应昌两地，而不愿西进至和林，这也是和林距辽东远，而距西北诸王近的缘故。

相应地，北元汗廷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统治的心脏地带，对于异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地区，被视为边缘地带，无法顾及了。明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占领甘肃地区，恐怕与北元汗廷将军队集中于中、东二路，放弃西路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明朝能在撤退甘肃之后，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再次收复甘肃，也得益于蒙古势力内部的纷争。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均衡，以及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皆以甘肃作为边缘地带的战略观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肃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明朝占领甘肃，确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条件。

洪武初年，西北地区的边缘地位尤其明显。中唐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汉族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历经吐蕃、辽、金、西夏、蒙元政权的长期统治，长城沿线边疆地区的社会进程已被纳入北族政权的脉络，在语言、宗教、文化、服饰等方面都呈现了“北方民族化”的特点。作为起源于东南中国的明政权，对新占领的西北地区存在疏远与隔膜，是十分正常的。冯胜在弃地甘肃之前，已经弃地河州（今甘肃临夏）了。据《纪事录》记载，我们能发现洪武初年政权内部对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疏远与隔膜态度。

岭北之役中，冯胜西路军虽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冯胜彻底放弃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使西路军的战略成果化为乌有，因此与其他二路将领一起，并未受到封赏。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在岭北之役失利消息的震恐下，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无论北元，还是东察合台汗国皆未趁机进取甘肃，在于这两个政权皆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由于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皆无力进取甘肃。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最终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在于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

政权，同样将处于西北边疆的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对进一步边疆开拓缺乏兴趣。冯胜放弃甘肃还有其主观原因，即其面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显得有些隔膜，以其为化外之地，遂加放弃。总之，明朝西北疆域的形成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第九章 次要战线（1379—1382）
——明帝国平定云贵及与高丽王国的关系

一统金瓯

1372年，明元战争结束之后，明帝国暂时停止对北元的攻伐，改以和平攻势。1374年夏天，朱元璋派遣江西行省左丞李思齐北上劝降王保保，王保保对自己的这位长辈和对手似乎很客气。但是在将李思齐送到边境上之时，护送的骑兵却突然对李思齐说：“请您留下一物以作遗念”李思齐不知道是吝啬，还是真的没有带什么东西。回答说：“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结果对方直接不客气地说：“请留一臂”。无奈自断一臂的李思齐在回到明帝国的疆域之后最终不治身亡。站在王保保的立场上，他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而在元帝国最后仍有可能平定局势的时代里，李思齐的行为又何况不是断了元帝国的一臂呢？

不过朱元璋对李思齐的死似乎并不介怀。此后又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惠宗妥欢懽睦尔的孙子——买的里八剌；赠给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在彼此承认对方实力的基础上，北元和明对峙的短暂时代逐渐拉开序幕。不过这种对峙对于北元帝国而言并不有利，因为随着富庶的中原经济迅速从战乱之中恢复过来，而对于西南地区的征服，更令朱元璋消弭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国之力筹备对北元的征讨。　1368年正月，割据福建的陈友定覆灭之后，长城以南仅有四川的明玉珍所建立的大夏政权和盘踞广东的何真两股势力仍独立于朱元璋的统治之外。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明玉珍随即“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徐寿辉发丧，甚至一度“拊膺哀悼，殆不堪忍”。但与此同时也命部将莫仁寿领兵镇守三峡，从此切断了与陈友谅之间的联系。

1361年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均在青城被农民起义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明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

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1361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认为“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

在刘桢频繁规劝之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明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1361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 1362年五月，又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1363年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随即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明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可见其对元帝国所奉行的政治体制并不认可。在立国后各项政治体制也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

不过大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最终不得不在1365年将六卿制度重新更改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

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1364年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发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陈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1365年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巩固后方。1363年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刺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次年春天，明玉珍命万胜领兵11万人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

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董等领兵8000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明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应该说在明玉珍时代，其所建立的大夏政权颇有几分蓬勃向上的活力，以至于朱元璋也不得不主动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表示：“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1366年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明玉珍病危之时，虽然召臣下遗言说：“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

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

但明玉珍所册立皇太子明升即位时年仅10岁，各大臣不肯居于他人之下。而万胜与张文炳之间存有隔阂，万胜暗中派人杀死张文炳。张文炳曾善待明玉珍的养子明昭，所以明昭又假托彭氏旨意，吊死万胜。万胜为明氏立功最多，他被吊死，蜀人大多同情他。吴友仁以清君侧为名，从保宁传来檄文声讨明昭。明升命戴寿前去讨伐。吴友仁给戴寿写信说道：“不杀明昭，国家不安，众心不服。如果明昭早晨被处死，我傍晚将会赶到”。戴寿于是奏请处死明昭，吴友仁则入朝谢罪。于是诸大臣各司其职，而吴友仁更加专横放纵，致使国权旁落，国势日益不振。万胜死后，刘桢为右丞相，三年之后也去世。

1369年，朱元璋派使臣前来征求木材。明升便将蜀地特产一并献上。朱元璋以玺书作答。同年冬天，朱元璋派平章杨璟谕示明升回京复命，明升拒不听从。杨璟写信给明升说：“古之从政治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而能身家两全，流芳百世，反之则败。足下如此年幼，便继承先人功业，占据巴、蜀，却不考虑长远之计，而听从群属之言，认为有了瞿塘、剑阁之险，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些都是他们不懂时势变化，将使足下蒙受伤害的言论啊。昔日占据蜀地最强大者，莫过于蜀汉昭烈帝刘备。而且有诸葛武侯辅佐，考核守官，训练士卒，物资不足，均取于南诏。但是仍然朝不谋夕，仅能自保而已。而今足下的疆域，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求彼，相隔万里，而想凭借一隅之地，延长顷刻寿命，可以说这是明智吗？”但明升最终还是没有听从杨璟的劝告。

1370年，兴元守将献城投降。吴友仁几次前往进攻，都未能攻克。同年，朱元璋为征伐云南，派遣使者前往借路，明升拒不遵从诏令。　1371年正月，朱元璋命征西将军汤和统率副将军廖永忠等率领水师由瞿塘直趋重庆，前将军傅友德统率副将军顾时等率领步兵、骑兵由秦、陇直趋成都，攻打蜀地。

朱元璋对众将说：“蜀人听说我军要西伐，必定将其全部精锐部分东守瞿塘，北阻金牛，抵抗我军。如果出其不意，直捣阶、文，门户已毁，腹心自溃。兵贵神速，只怕军队不勇猛啊。”傅友德疾驰至陕，召集诸军声言兵出金牛，而暗地里却率军直趋陈仓，攀援岩石，昼夜行进。抵达阶州，击败蜀将丁世珍，攻克此城。蜀人弄断白龙江桥。傅友德军修桥渡江，攻破五里关，于是攻克文州。然后渡过白水江，直趋绵州。当时汉江水涨，不能渡江，傅友德军为此伐木营造战舰。为将军威

通达瞿塘，于是便削成数千木牌，将攻克阶、文、绵的日期刻上，投入汉水，让它们顺流而下。蜀守军见后，全部解题体。

战争爆发前戴寿曾对明升说："以王保保、李思齐的强大，仍不能与明军对抗，何况我们蜀地呢？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们怎么去应付呢？"吴友仁则说："你说得不对，我们蜀地依山傍水，非中原能比，不如对外结交友邦，对内则修整军备。"于是便派莫仁寿用铁索横断瞿塘峡口。而今又命戴寿、吴友仁、邹兴等增兵援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凿穿两岸石壁，牵引铁索成为铁桥，使用木板安置炮弹来抵御敌军。汤和率军到达，不能前进。

面对这样的防线，明将廖永忠密派数百人携带干粮水筒，抬着小船翻山渡关，到达上游。蜀山草木繁多，廖永忠下令将士都穿上青蓑衣，在崖石间鱼贯而行。估计已到，便率领精锐出墨叶渡，五更时分，兵分两路攻其水、陆寨。水师都以铁裹住船头，设置火器而前进。黎明时分，蜀人才发觉，派出全部精锐前来抵抗。但此时廖永忠已破其陆寨，会合抬船出江的将士，一并齐发，上下夹攻，大破蜀人，邹兴战死。廖永忠然后焚毁三桥，弄断横江铁索，擒获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飞天张、铁头张等都逃走了，廖永忠于是进入夔府。第二天，汤和才到达，于是与汤和分道前进，相约于重庆会合。廖永忠率水师直捣重庆，驻扎铜锣峡。夏主明升请降，廖永忠以汤和还未到为由推辞不受。等汤和到达后才接受投降，承旨抚慰。下令严禁侵扰百姓，一士兵拿了百姓七只茄子，立即斩首。又慰抚戴寿、向大亨等的家人，命其子弟携信前往成都招降。

两线失利令明升大为恐惧，右丞刘仁劝他逃奔成都。明升的母亲彭氏哭着说："我们可以去成都，但这也只能延长旦夕寿命。因为大军所过，势如破竹，我们不如早一点投降，以挽救百姓的性命。"于是派遣使者携带奏章前去乞降。明升反绑双手、车载棺材，与母亲彭氏及官属前往军门投降。

汤和接受璧玉，廖永忠则为他解开绑绳，秉承朱元璋旨意，对其加以抚慰，并下令诸将对他们不得有所侵扰。而戴寿、向大亨也以成都降于傅友德。明升等全被押送京城，礼臣奏道："皇帝御临奉天殿，明升等俯伏待罪于午门外，有关官员宣读赦免诏令，就像从前孟昶降宋一样。"朱元璋说道："明升年幼弱小，凡事听由臣下，与孟昶不同，所以应当免去他伏地上奏待罪之仪。"当日，朱元璋封明升为归义侯，并赐居京城。

讽刺的是，明玉珍和陈友谅生前势不两立，两人死后他们的儿子明升和陈理反

倒因为相同的境遇成为了好友。经常会面发牢骚。这二人虽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对此朱元璋说：“这只是小孩所犯的过错，恐怕他会受到小人的欺骗诱惑，不能牢记朕对他的恩典，还是应当让他远离京城为好。” 1372年正月，归德侯陈理及归义侯明升一起迁居高丽，朱元璋命元朝降臣枢密使延安答理护送他们，并赏赐高丽王罗绮，要求善待他们。此举不仅是朱元璋消除政治隐患的举措，同时也是其将高丽进一步属国化的外交姿态。但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护送陈理、明升前往高丽的明帝国使团之中竟然出现了副使孙内侍离奇自缢的事件。

朱元璋事后揭露说：“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高丽方面虽然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鸩杀？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在这一幕疑云重重的“明使自缢事件”背后，自然投射出此时高丽王国仍在明帝国与北元之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外交姿态。

属国之争

元明交替之际，主政朝鲜半岛的是第31代高丽君主王颛。王颛曾是蒙古王室的驸马，取名伯颜帖木儿，长期入侍元廷，而他早年依靠的也是世臣大族奇氏和权氏的势力，但即位后由于目睹了元朝势力日衰，就果断地出兵侵元，并坚决肃清了奇氏和权氏两族的势力，停止使用元朝年号，恢复高丽传统官制，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人心。

1356年，王颛命枢密院副使柳仁雨为东北面兵马使，率军进攻双城总管府。双城总管赵小生、千户卓都卿逃走。高丽攻占“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及宣德、宁仁、辉德、静边等镇。”至此， 1258年后归属于元的高丽朔方道部分土地被高丽收复。之后，高丽又继续北进。由于元统治者此时无暇东顾，这一地区女真人数也有所减少，因此高丽军相继攻占了曷懒甸之战时设立的咸州，即元之合兰府（今朝鲜咸兴）直至三散（今朝鲜北青）的大片土地，势力达至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

但这一地区女真人仍有相当势力。他们不愿意受高丽控制，多次进行反击。如1364年，元军万人渡鸭绿江围义州，高丽派李成桂率军救援。这时，海洋女真首领三善、三介乘机聚集女真，南下攻取咸州、和州等地，一度夺回和州。这时，中朝东段边界处在动荡和迅速变化阶段。为了应对这一地区急剧变化的战事，高丽君主王颛不得不任用如李成桂等大批出身于蒙古军队的职业军官。同时在中枢王颛任用了一个与世臣大族无任何关系、出身卑贱的僧侣——辛吨。

根据《东国僧尼录》的记载，遍照的父亲不详，母亲是桂城县玉川寺的奴婢。由于当时子女身份从母的制度，遍照被当作贱民，受人轻视。后来与王颛交谈十分投机，多次被召入宫中。李承庆、郑之云等大臣认为他惑乱君王，将要杀他。王颛秘密令其躲避，等1364年二人死后蓄发还俗，改名辛吨，入宫。王颛十分信任他，称之为师傅，国政大事皆咨询于他。次年封真平侯，委以重任。 1366年设立田民辨正都监后，辛吨担任判事。当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辛吨将大庄园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并将庄园主的私人奴婢恢复为良人，受到了下层百姓的拥戴。

辛吨的改革受到了上层社会的强烈反对，大臣们对他恨之入骨。辛吨蓄发娶妻，没有正式的僧人品位；而且可以随意出入国王的宫殿，甚至可以同王颛“并据胡床”。1369年，辛吨以风水说怂恿恭愍王迁都，自封“五道都事审官”。大臣们告发辛

旽欲借机谋反。王颛大怒，将辛旽流放水原。 1371年，在群臣的要求下，辛旽最终被处决。

辛旽之死固然是其个人权力欲望过大，威胁到王颛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是高丽王国世族全面反击的开场。 1374年，朱元璋遣礼部主事林密携中书省文谘至高丽取马："钦奉圣旨：'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留在耽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王颛遣门下评理韩邦彦前往耽罗取马，侨居当地牧马的蒙古人只同意送三百匹。林密等对王颛说："济州马不满二千数，则帝必戮吾辈，请今日受罪于王。" 王颛无以对，于是以门下赞成事崔莹为杨广、全罗、庆尚道都统使，将兵讨之，得胜而还。但就在这次军事胜利的同年，王颛被权臣李仁任所指使的宦官和内侍崔万生等弑杀。其养子辛禑王成为高丽的新一代君主。辛禑王一改王颛时期的亲明政策，在北元势力及朝中亲元派的影响下，恢复了与北元的宗藩关系。

辛禑，小字牟尼奴，一般认为是为权臣"（辛）旽妾般若之出也"。因王颛无嗣，才纳为养子。但也有人认为辛禑是王颛幸辛旽宅婢女所生，养于辛宅。故称"辛禑"。但无论如何辛禑即位的合法性都受到了高丽朝野的普遍质疑。北元首先欲插手立王之事。1374年十二月，高丽派遣判密直司事金胥如北元告丧。次年正月，纳哈出派使者前往高丽询问王位继承事宜。

王颛被弑之后，关于高丽王位的问题，一些亲元大臣康舜龙，赵希古、成大泳等受意金义，向北元请求"奉沈王为主"，故而北元封沈王之孙脱脱不花为王。此事遭到李仁任的坚决反对。因当权者反对，北元不得不放弃原本的打算。虽然在王颛死后高丽的明德太后也"欲立宗亲"，但仍因遭到另一亲元派重要人物侍中李仁任的"戮力固拒"而放弃。李仁任主张"王以大君（辛禑）为后，舍此何求"。这一主张，自有李仁任的野心，当时有人对他说："自古国君见弑，为宰相者先受其罪，帝若闻先王之故，兴师问罪，公必不免，莫若与元和亲。"李仁任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是时，纳哈出也支持李仁任立辛禑为王，高丽恐明朝问其罪则，又因北元地方势力的影响，遂立辛禑为王。

因辛禑是受本国亲元派大臣的推举和北元势力的帮助方立为王，故而日渐恢复了同北元的外交关系。自辛禑成为高丽王之后，北元的地方势力也随之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1376年十月，北元派遣兵部尚书孛哥帖木儿出使高丽，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王保保贻书于高丽，曰："往者予与令先君获承往来甚厚......每惟高丽事我

朝，自世祖爰降贵主，建为东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娅也。……如令先君往年以大驾北狩，必暂饵朱寇以安境内。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义重，甥舅恩厚，而可悖哉……圣天子宽容待物，忘过记功，方且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王子成能改图以副上命，厉兵秣马，其成犄角，庸赞我国家中兴之业，则于尔祖归国之功，不尤有光欤？爰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备言之。书到，可善审厉害轻重，速令使来，朝廷必有处也。”

高丽接到此书，旋即遣使北元，向北元表明愿与之修好。次年二月，北元即派遣翰林承旨孛剌的赴高丽诏册辛禑王，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牟尼奴，惟我国家受天景命统承万方，世祖皇帝圣德神功泽被四表，惟时高丽虽介在海隅，能仰德执义率先来臣以顺以忠帝用嘉之爰降贵主……今以牟尼奴为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于戲稽古象贤，期于为治而已，牟尼奴其益懋心保又我民！毋替若祖为我国藩辅之义则忠孝之道于是在矣往敬之哉益光宠命！”自此，高丽始行北元“宣光”年号。

高丽与北元继续确立宗藩关系，便遣使如元册封皇后，“三月池奫伏诛。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谢册命表曰：‘天地无私广施生成之造侯藩有庆优承宠渥之恩，万姓呼四方，耸听伏念，臣年才角材乏，经邦权世职而守封……且献礼物，皇帝白金七锭紵布八十一匹，皇后白黄红紵布各九匹’。”另外北元的地方势力也加强了与高丽的往来。其中高丽外交关系受辽东势力纳哈出的影响尤为重要。

作为高丽近邻的北元势力纳哈出，虽在王颛在位时与高丽来往减少，但并未中断。自高丽与北元重新修好，纳哈出与高丽的联系也有所加强：1376年十月，纳哈出“遣右丞九往来，归我行人文天式”。　1377年正月，“纳哈出遣使遗羊马”。纳哈出地处辽东，所在位置乃是高丽通北元的必经之所，所以，二者的联系对明丽关系的影响及对北元与高丽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纳哈出实属北元势力，高丽与北元交往，有时虽附带出使纳哈出，但有时需与纳哈出进行友好往来，方体现出与元修好之具体行动。另一方面，纳哈出与高丽的联系，向明朝表明了高丽的外交态度，虽然北元对明朝并未能造成威胁，但高丽与纳哈出的关系却影响着明朝辽东一带的主权与安全。

北元一方面参与高丽内政，一方面加强与高丽的联系，加之亲元派掌握强权，迫使高丽在外交上选择了一种倒退，即与北元政权进行亲密的外交往来。王颛时虽然力求与明修好，但因北元势力在高丽的恢复，这一政策付诸东流。另外，高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形成，明朝方面是又一重要原因。虽高丽与北元政权和地

方势力纳哈出频繁接触，但高丽并不打算放弃与明朝业已确立的关系。 1376年二月，高丽“遣李之富如定辽卫通好，仍察事变”。三月，又遣判事金龙如定辽卫通好。高丽如此做法，一方面由于亲明势力的存在，一方面辛禑、李仁任等也不愿与明彻底决裂。此时明朝方面也不太平，西南有贵州的苗变，旧元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割据云南地区，张士诚、陈友定的残余势力仍流落海上，倭寇犯边，加之高丽与北元关系改善后，纳哈出在辽东的势力不断侵扰，使明朝不可能因王颛被弑、明使被杀而问罪于高丽。

王颛死后，辛禑、辛昌乃至王瑶都曾请求大明给以册封，但明太祖的态度常常是：“朕思（高丽）限山隔海，难以声教，当听彼自然，不干名爵”。“童子（辛昌）不必来朝，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想干”，“（高丽）果有贤臣在位，定君臣之分于上，造妥民之计于国，虽数十岁不朝，亦何患哉”。这一趋势最终演变为明朝却贡，明朝与高丽双方断绝交往，这使得高丽外交倒向北元。

但纳哈出在辽东的势力并不稳固，那时，辽东经济凋敝，后勤物资供应疲惫。明军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加强后勤储备。除了户部征购商人粮米之外，朱元璋还令大将廖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而纳哈出方面则除了正常的军备之外，还要接济逐渐东迁的北元政府，分出牛羊赠送给高丽王国以维持两国关系，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自然可想而知。而蒙元骑兵所惯常的劫掠战术却在辽东地区很难有用武之地。

1372年农历六月，纳哈出率军从大本营金山出击，侵入辽东。但却在马云、叶旺，纳哈所修筑的盖州城，慑于对手防御严密，而不敢攻打，绕过盖州到达金州。金州城的防御设施还没完工，指挥韦富、王胜等人督促士兵分守诸门。乃剌吾是敌人的骁将，他率精骑数百在城下挑战，身中伏弩倒地，被抓俘，敌人大为沮丧。韦富等人纵兵攻打，敌人败退，不敢沿着来的道路退走，从盖城南十里沿着柞河逃走。叶旺早就派兵扼守柞河。自连云岛到窟驼寨十余里，沿河垒起冰块为墙，浇上水，晚上冻结，像城墙一样坚固。在沙中布下钉板，旁边设下陷阱，埋伏军队等候敌人。

马云和指挥周鹗、吴立等人在城中竖起了大旗，按兵不动，安静得像没人一般。待敌人到达城南时，伏兵四起，两山旌旗蔽空，矢石如雨点般地射下。纳哈出仓皇逃往连云岛，遇上冰城，从旁边走，全部掉入陷阱，于是溃败。马云从城中出击，联合部队追击至将军山、毕栗河，敌军被斩、被俘和冻死的不计其数，乘胜追

击至猪儿峪。纳哈出仅仅是自身免于一死，但不甘心失败的纳哈出于同年冬季，率领数万军队，偷袭明军的辽东军需仓库牛家庄（昌图镇），烧毁十余万石粮食，杀死数千名明朝将士。

第二年农历十一月，当纳哈出再次寇掠辽阳时，却被“千户”吴寿率兵击败。鉴于纳哈出惯于冬季突袭的规律，明代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给“辽东都指挥使司”下令：今冬一旦纳哈出偷袭，我们必须坚壁清野，不给纳哈出留下一粒粮食。与此同时，明军在地势险要之处设下伏兵，截断纳哈出军队后路，力举全歼。连遭兵败之后，纳哈出似有醒悟，深感在武力上难与明朝抗衡，不觉锐气大减。与此同时，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仍在期待着纳哈出最终归顺明朝。1377年之后的10年间，纳哈出与明朝一直相安无扰。 10年间，明朝不断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而纳哈出的内部却祸乱迭出。纳哈出手下大将“哈剌章”、“蛮子阿纳失里”等人互相猜忌，并且极为不满纳哈出的飞扬跋扈。

1386年朱元璋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决定再次采用武力彻底教训一下纳哈出。当年年末，明朝征用了20万民夫，运粮123万石，送到松亭关（长城喜峰口北）、会州等地。 1387年正月，明朝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统兵20万征讨纳哈出。与此同时，明朝派出降将劝说纳哈出归顺明朝。同年农历三月，冯胜大将军率军出长城松亭关，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裕4座城池，并留兵屯守，以便保障前方将士后勤供应。农历五月，冯胜大将军率军直扑纳哈出大本营“金山”。在辽河东岸，明军俘获了纳哈出的屯军300余人、战马400余匹。纳哈出闻讯后，急忙向北逃窜。

冯胜大将军率领明军势如破竹，步步逼近纳哈出大本营“金山”。同年农历六月，纳哈出部将观童归降。冯胜大将军又遣使招抚纳哈出。当时，纳哈出的各个部族均厌恶分裂割据，向往统一。面对众叛亲离、极端孤立、明军压境的局面，纳哈出被迫派遣使者，到冯胜大将军营帐约降。于是，冯胜大将军委派副将军蓝玉，到一秃河（伊通河）受降。不料，就在举行受降仪式时，发生了一桩始料不及的变故，险些导致受降泡汤。

在受降仪式上，为表诚意，蓝玉副将军脱下衣服赠送给纳哈出。不料，纳哈出却坚辞不受。蓝玉副将军外甥、常遇春儿子常茂见状，误以为纳哈出不肯投降归顺，便当即抽出马刀，砍伤纳哈出手臂。纳哈出大怒，以为明军玩弄阴谋诡计，遂立即遣散了准备投降归顺的部众、将士。情况危急，冯胜大将军立即命降将“观

童”安抚纳哈出，排除误解。纳哈出弄清真相后，重新召回部众、将士，宣布归顺明朝。受降仪式风波平息之后，经过整编，冯胜大将军率领纳哈出及其所部20余万将士南迁。经过亦迷河（饮马河）时，明军又收编了纳哈出流散当地的两万余名将士、马车5万余辆。至此，盘踞“金山”地区30余年的纳哈出，终于归顺了明朝。东北地区最终得以统一。纳哈出到达明朝首都“应天府”（南京）之后，立即受到朱元璋的隆重接见。考虑到纳哈出在东北地区的威望和影响，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晋封纳哈出为“海西侯”，赐“铁券丹书”。纳哈出属下官员也各有赏赐、各授官职。

讽刺的是纳哈出兵败之时，高丽国王辛禑正与亲信崔莹开始秘密讨论攻打明朝定辽一事。“禑独与莹决策攻辽，然犹未敢昌言也”。前线军官李成桂坚决反对进攻辽东之举，但辛禑仍执意发兵。高丽攻辽之兵“左右军共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人，傔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马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匹”“左右军发平壤，众号十万。禑如大同江，张胡乐于浮碧楼，自吹胡笛”，但此次征辽并不得人心，“是时，全罗、庆尚二道为倭寇巢穴，东西北面，方忧割地，京畿、交州、杨广三道，困于修成……八道骚然，民失农业，中外之怨，甚于（李）仁任、林（坚味）、廉（兴邦）时矣”。“亡卒络绎于道，禑令所在斩之，不能止”。如此，面对强大的明朝军队，高丽不敌，李成桂认为“以小事大，保国之道”，且直言“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祸立至矣”“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将矛头指向崔莹等人，随即得到诸将赞同，于是回军退渡鸭绿江，辛禑闻变，急忙还京，从者仅五十余骑。不久“复行洪武年号，袭大明衣冠，禁胡服”。高丽大权从此落入李成桂之手，高丽也不得不与明帝国重修旧好。

高丽与明朝的关系，由王颛时期的修好，到断交，之后再次修好，这种变化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朝对高丽的态度。虽然表面上高丽行使独立的外交，但无论何种对外态度都受中原王朝影响颇深，迫使高丽曾一度倾向北元而疏于明朝。高丽与北元和明朝宗藩关系的变化，与本国的亲明亲元势力的强弱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辛禑王在位时期，先是由于亲元派势力掌权，再者北元势力与之交往甚密，明朝对高丽与外交关系的怀疑，使高丽在辛禑元年至十四年与北元继续维持着原有的宗藩关系，然而，征辽一事，亲明派李成桂掌权后，明朝与高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高丽与北元彻底决裂。纵观这一变化过程，受北元势力与明朝的影响，高丽的独立自主显得有名无实，因行使独立的外交对高丽而言，虽心有余但力实不足。国力有限，使高丽的外交也只是有气无力。北元势力的极力修好，加之明朝对新政权的否

认，使高丽的外交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远征云南

被封为“海西侯”的纳哈出并没有享受太久的荣华富贵，便于1388年，病逝于跟随大将傅友德再征云南的战船之上。所谓再征云南指明帝国继平定盘踞在云南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故元梁王和土酋段氏之后，对云南的第二次用兵，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则不得不从1381年明帝国第一次出兵云南说起。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是忽必烈的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后裔，其统治区域以昆明为统治中心，仍奉元朝正朔，服从退据蒙古沙漠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命令。土酋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虽然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朱元璋起初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

在远征云南的明军出发前，朱元璋召见傅友德，对其面授机宜。朱元璋南征的方略是：其一，以少数兵力从四川叙永进击贵州威宁，吸引元军及东川、昭通等当地部落武装；其二，因此，元军主力则必然死守作为“入滇咽喉”的曲靖，此时，明朝大军主力则暗度陈仓，从湖南沅陵、芷江进入贵州安顺，出奇制胜，在曲靖一带与元军主力展开决战，待拿下曲靖以后，由征南将军中抽出一人统率一路大军，北上贵州威宁，与来自四川的部队会合；其三，其余大军直捣昆明，迫使元军彼此牵制，无暇他顾，疲于奔命；其四，昆明既克，大军直扑大理，一举收复滇西。这样先声夺人，大势已定，元军势将瓦解。至于云南当地部落武装，可以遣人招降，安抚说服，这样也可以让部队免于长途奔袭，疲于战事，休养生息。

随后朱元璋在皇宫外的柳树湾检阅部队，并于龙江边为将士们举杯饯行，可见朱元璋对这次南征的重视。傅友德所率大军是乘船从南京出发的，万艘大船“旌旗蔽江而上”。征南明军沿长江水路经安徽、江西，只用了26天便到湖北武昌。在武昌，明军兵分两路，傅友德亲自率明军主力继续乘船向西，直达洞庭湖北岸的湖南常德，尔后弃船登陆，沿常德途经郑家驿、茶庵铺、沅陵而达辰溪，再经芷江到达新晃，这是一条从武昌经新晃入贵州而达云南的古驿道，即普安入黔旧路，亦称东路，民间所谓的通京大道。另一路，傅友德命郭英、胡海、陈桓统率 5 万明军，由今湖南进入四川，从而进击威宁，以吸引元军的注意力。

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主力经过两个半月的行军，于12月11日攻克贵州安顺、盘县。明朝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记载：“十一日，王师进攻普定。普定土酋安瓒不

恭，命友德讨擒之。于是罗鬼、苗蛮、仡佬皆望风迎降。瓒亦备马、粮、毡、刀弩、牛、羊万计助军。”当明军攻克安顺、盘县时，沐英就对傅友德说：“趁元军还不掌握我南征明军战略部署，我们应趁其不备，星夜急驰，赶至曲靖，以实现皇上出奇制胜、平定云南的战略意图。”傅友德遂采纳了沐英的建议。

作为军人，傅友德深谙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的兵家之道。明朝大军攻克安顺、盘县当日，即马不停蹄直奔曲靖。为了出其不备地突然出现在曲靖，南征明军从安顺、盘县到曲靖本应需要6-7天的路程，结果明军以双倍的速度长途急行军，仅用4天时间便抵达曲靖境内。此时，梁王已得到明朝大军近抵云南的情报，急命平章达里麻统率10万元军主力驰援曲靖，意欲在曲靖与明朝大军展开决战。

曲靖位于云南东北。云南多山，山与山之间的平原，云南人俗称“坝子”，一马平川的曲靖坝子在云南坝子中占据第四位。珠江就发源于曲靖的马雄山。云南古称“滇”。曲靖自古即为入滇门户的锁钥，滇东重镇。古代进入云南的东行古道，即安顺、盘县的“黔滇古道”（明军主力进军云南的路线），西行古道，即秦朝开凿的，由四川宜宾至曲靖的“五尺道”（郭英率偏师进入云南所走道路）皆交会于曲靖。

特殊的区位，使曲靖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征服滇国，在此设益州郡，置味县（今曲靖）。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并将行政管理中心从滇池县（今昆明晋宁县）移至曲靖。从那时以来，直至公元765年，南诏剿灭滇东爨氏地方大姓割据集团的500年间，曲靖一直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欲取云南，必先夺得曲靖。 1381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 20多万人的明军和10多万人的元军在距曲靖城以北仅 1 公里的白石江相遇了。

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十六日，明军乘大雾进抵曲靖东北之白石江。雾散天晴，达里麻隔江望见明军势众，急遣精兵扼守江岸。傅友德采纳沐英建议，督将士正面佯攻，另遣奇兵暗从下游渡江，绕至梁王军阵后，在山谷间树旗帜、鸣金鼓，守军见势惊乱。沐英乘势率军渡江，大败守军，俘达里麻以下两万余人。大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将达里麻所率10余万精兵，占领曲靖。

随后傅友德乃分遣蓝玉、沐英进兵昆明，自己亲率数万众循孤格山南麓北上直奔威宁，以接应从四川叙永一带南下作战的郭英部队。郭英的进军路线，史书无记载。根据军事常识及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武昌继续乘船沿长江

经重庆到达泸州至纳溪登陆，大军一路向南过云南的镇雄而至乌撒。二是，郭英与傅友德同达武昌，经今慈利、大庸、龙山而进入四川来凤、黔江再至永宁。一般来说，只要当时长江上能通船至重庆，郭英是会选择水路的。从战役上考虑，1381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征大军到达武昌，郭英即与傅友德兵分两路，郭英到达威宁的时间应早于傅友德到达曲靖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元军及滇东北一带的当地部落武装。

郭英的部队从四川叙永出发，为避开元军拦截，明军走的是山间驿道，一路山高林密，路途险阻，众将领都有些吃不消，倾向于绕道前进，便于大军行军。郭英就对他们说："破敌贵在先声夺人，要选择敌人防备薄弱之处予以击破。舍近趋远，非兵家之道。"郭英等南下叙永的军队，与威宁的彝族土官实卜相持于赤水河。郭英的军队在距赤水河不到20里的岸边安下大营。那个时候恰逢雨季，赤水河水势猛涨，郭英为将士们打气，哥们儿，别怕，元军这群乌合之众，想凭一条赤水河就拦我渡江，门儿都没有。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选择这样的时刻渡江。郭英下令，全军将士斩木造筏。

待傅友德自曲靖北上的援军到来，就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借着夜色的掩护，明军强渡赤水河，两面夹攻，威宁的彝族军队溃败。威宁距曲靖沿今326国道有400公里路程，傅友德回马一枪杀向威宁，其行军路线当沿五尺道前进，五六天即可到达。兵贵神速，傅友德白石江大败元兵又马不停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威宁，这是乌撒、东川、乌蒙元兵及土酋部落武装所始料不及的，傅友德与郭英两面夹击，很快就平定了滇东北一带。于是，"遂城乌撒，得七星关（在今毕节市西南部），通毕节，至可渡河。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皆降"。平叛之后，傅友德仍然团结当地的彝族各土官，劝令他们维持好社会秩序，并分拨一部分军队驻守威宁、昭通各处交通要道，然后南下，与蓝玉、沐英的部队会师昆明。《明通鉴》第七卷说："……癸酉，玉、英等师至板桥，元右丞观音保以城降。玉等整众入城，秋毫无犯，收宫府符信图籍，抚定其民。"

傅友德与沐英会师昆明后，决定兵分两路。两路大军似两把利剑，直插滇南、滇西纵深地带。南路大军由东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宣德侯金朝兴率兵数万直取临安（今建水）等滇南腹地，红河两岸的彝族、哈尼族等土官迅即归附。《滇史》卷十说："初，使都督金朝兴率师攻临安，元分省右丞伍卜歹归款，遂城临安，置府卫。命天策卫指挥万中、宁州卫指挥王执留兵镇之。宁州土官知府弄甥，普提六世

孙也，亦率夷民首先归附。弄甥气度豁达，专心抚学。顺舆情而迁州，崇师道而建学，士类羡称之。”南路军没有进行大的战争，整个滇南即平。

东川侯曹震南下临安的同时，颍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统西路重兵西下威楚（今楚雄），直指滇西重镇大理。威楚一路，凡明军所到之处，基本上处于不战自降状，故傅友德、沐英比较顺利地平定威楚而直逼大理。大理，位于云南西部，距昆明600公里。即使在交通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高速公路也要驱车 5 个多小时。大理是一片弥漫着浓厚历史气息的土地。早在西汉武帝征服滇国时，就在此设置叶榆县，大理开始被纳入中央版图。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建立南诏国，共经历13个诏王，253年，其中10个南诏王受唐中央政府册封。南诏国是以乌蛮（彝族）为主体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全盛时期疆域含云南全境，并含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国通用汉语，信奉佛教。

宋代，段氏建立以白族为主体的封建领主政权，疆界与南诏国大致相同。段氏曾被宋朝册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大理国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几乎接近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宋朝时期的大理国，被许多历史学家、文人称为“佛国”、“妙香国”。即使到元朝，蒙古军虽统一了云南全境，元朝仍只能册封段氏为总管，大理仍由段氏割据。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说：“由唐以来蒙、段窃据殆六百年。元人得之，仍任段氏为总管，不能有其地。段氏既与梁王构隙，复专擅一方，恃负险远。”

因此，收复大理，明军主帅傅友德、沐英做好了晓喻劝降及军事进攻的两手准备。明军先礼后兵，派出使者劝降段氏，但段氏以世守大理，并妄图以唐时南诏国、宋时大理国为例拒绝归附，并且还在写给沐英、傅友德的信函中引“宋挥玉斧”为典，欲与明朝廷分庭抗礼。《滇史》《云南通志》等对此有详细地记载。史书记载，当段氏得知明军欲攻取昆明的消息时，就与其臣属商议是否驰援梁王。然而，因历史上段氏与梁王有世仇，段氏仍按兵不动，眼看着梁王孤立无援，为明军所灭。

大理依附苍山、洱海，段氏领着五万精兵把守上、下两个关隘。交战初期，沐英亲率大军攻城，结果久攻不下。正面硬攻不下，看来只能采取佯攻、切割、包抄的战法，出奇计方能破敌。沐英的战术是：派遣一支明军由洱海直趋上关，将段家军分割开来，使其首尾不得相顾，并与沐英率领的从下关攻取城池的明军互为犄角；再秘密派出小股部队，趁着夜色绕到苍山背后，从悬崖绝壁中悄悄摸到段家军的背部，出其不意，扰乱军心。在段氏军队的背部树起明军大旗，借以动摇段家军

的军心；黎明时分，伴随着隆隆炮声，睡梦中惊醒的段家军兵士抬头一望，城外山上，早已布满明军大旗，惊魂未定的段家军误以为城池已被明军攻陷，军心大乱。此时，沐英一马当先，策马渡河，汹涌的河水瞬间就没过马腹，众将士紧紧跟随，杀声震天，丝毫不怯阵。山上的明军亦奔驰而下，段家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没几个回合，明军便攻下城池，生擒段氏。攻下大理之后，傅友德、沐英立即分兵取鹤庆，略丽江，西渡澜沧江而驻兵保山。云南靠内地区初步平定。

明朝军队初入云南之时，以段氏为代表的云南靠内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土官，或被打败，或慑于兵威而不得不投降。然而，地方民族统治阶级是天然的分裂割据者。他们乐意于当夜郎王而不愿受制于封建中央。所以，一旦有机会，他们总想利用自己的地方武装和在本民族中的影响而发动叛乱，重新把他们那种自我封闭的堡垒建立起来。

1382年 3 月，“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芒部（今镇雄）等处复叛”。这里的彝族土官们，最初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不投降。及至傅友德南下，留守的军队少了，他们便立即发动叛乱。傅友德、沐英只好率兵从滇西的大理折回来对他们进行讨伐，于同年 7 月平定了叛乱。为了避免他们再在背后捣乱，以利于对南部和西南部边疆地区的深入，乃“以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由邻近的四川来进行控制（又复将东川也改归四川）。

7月，滇西乃至西南边境的土官们也发动了叛乱，这部分叛乱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才平息。傅友德、沐英忙于平定乌撒、乌蒙等处的叛乱，留守昆明的军队人数少了，于是土官杨苴（白族）又趁机于 9 月发动叛乱，纠集20万地方武装围住昆明城。都督谢熊、都指挥冯成只能勉强守住昆明城，无力出击。沐英不得不从乌撒（今威宁）领兵赶回昆明，这才打败杨苴的叛军，解了昆明之围。杨苴兵败之后，又纠集叛兵于安宁、罗次、邵甸（今嵩明县白邑村）、晋宁（今晋城）、江川等处，据险树栅，欲图再举。滇东北等地的彝族土官也仍然持两端，各自盘踞住自己的营垒，不与明朝军队合作。

于是，与各土官斗争而后争取他们，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直到明洪武十九年（1386），距明朝军队初入云南已经 5 年之久，明朝军队在云南靠内地区的处境仍然是很困难的。当时，朱元璋给傅友德、沐英等的谕文中仍说：“六月初八日（洪武十九年六月初八日）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知盘江（今北盘江）道路尚未通行（因滇东北至黔西地带的一些彝族土官仍然作梗），兼说目下并无升合口粮，如此

艰辛。”因而指示傅友德、沐英等，不要仅仅守住城池，应当主动派兵出去和土官们斗争，打破他们盘踞着的营垒，并在永宁以南的乌撒、乌蒙和黔西到曲靖的要害地方建立卫所，驻扎军队，以保证通向内地的交通线。

1387年十月，朱元璋调陕西、山西将士五万六千余人、调楚府护卫兵六千赴云南，诏长兴候耿炳文率陕西士兵往云南屯种。十一月，命普定候陈桓、靖宁候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继而又命陈桓等领兵屯于毕节等卫。十二月，“（上）遣前城门郎石壁往云南谕西平候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

1388年，朱元璋又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桓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东川叛蛮。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云南的卫所屯田逐渐全面铺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军屯以外，明代云南各地还发展了民屯和商屯。 1389年，沐英从南京组织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划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大理、鹤庆等郡县，并上奏朝廷，迁移山东、江西富民六百余户充滇。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第十章 捕鱼儿海（1383—1398）
——明帝国对北元的最后一击

明初政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 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1382年，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 1373年，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 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两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

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1393年，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1382年，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朱元璋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是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1367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

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的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作"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得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

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

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为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世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较多时间则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1355年，朱元璋克和州，始归附，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尔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做宁国县令，可以说是他起家的开始。

据说，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1364年，朱元璋设湖广行省，又擢其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由于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升为太常寺卿。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

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汪广洋仍为右丞相。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杀为止，任相达七年之久。

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广洋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

但即使刘基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发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

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

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极端的君主专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看，

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也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

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

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

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

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发，"亦弃市"。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发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首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行，仅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

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得闲情逸致。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的阴谋。

李善长的罪状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过于牵强，但是否知情而不报，作“观望怀两端”，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他既不能告发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两种后果都是危险的。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这时去案发已有十二年之久。就连开国儒臣之首太子师父宋濂也因其长孙坐胡惟庸党而几乎被杀，在皇后、

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郑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传。郑濂被告交通胡党，兄弟六人争入狱。朱元璋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于是免死。这两个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证据不足，说明朱元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滥杀方针。

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延，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置丞相，"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妨碍。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设丞相，他认为相权会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胡惟庸由受宠遇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名将末路

在残酷清洗文官系统的同时，朱元璋也对功勋名将痛下杀手。 1370年，朱元璋开始对当年追随自己建功立业的文人、武将论功行赏。他封6人为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28位大将军被封为侯爵：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顾时、耿炳文、陈德、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郭子兴（已去世）。在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中，公和侯是最高的两级，地位十分尊崇。陆游的梦想——“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而这些人比陆游幸运得多，封公封侯，总可以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了。

这34个人总共拥有38194户佃农，供养他们，人均达到1123户佃农。朱元璋还跟他们攀亲戚，把郭英的妹妹纳为自己的宁妃，把冯胜、蓝玉、徐达的女儿嫁给皇子，把公主下嫁给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人的儿子。这些军事贵族战功大，享有很高的社会特权。朱元璋还颁给他们一枚神物——铁券。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

但是，铁券不是使人一次次复活的神药，而是引诱功臣加速犯错、加速自杀的速死铁牌。仗着有铁券，不少人迅速腐化变质。杀人伤人、恃强凌弱、霸占土地、逃税漏税、奸淫妇女、吃喝嫖赌、贪污纳贿，甚至造刀枪、穿龙袍的都有。只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伴君如伴虎，功高则震主。功臣太强，让朱元璋感到害怕，梦里都担心部下造反、江山不保，子孙后代会做别人的阶下囚。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功臣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要无情地清洗。尤其对其子孙构成威胁的人，必须除之而后快。只有杀，才能确保他以及嗣君控制住军队，不丢宝座。

他扣在功臣头上的罪名也非常模式化：谋反和连坐。只要想杀人，肯定有人站出来揭发他谋反。因为没有什么罪名比这两条更毒辣、更方便，而且一查一个准。谁敢让他不爽，谁敢逾越雷池一步，那无异于找死。他一杀就是一家人，有的杀人手段十分残忍。德庆侯廖永忠的免死铁券，第一个成为空头支票。他在很多战斗中有功，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他还淹死小明王，扫除朱元璋称帝的障碍。 1375年，朱元璋将其杀死，理由是他私自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穿皇帝的衣服属于逾制，等同于有篡国夺权的野心。

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活活鞭打而死。朱亮祖曾经参加平定四川的战役，因为擅杀部下，被皇帝取消奖赏。他镇守广东，仍然恶习难改，鞭打当地官员，接受富商贿赂，做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番禺知县道同给朱元璋写秘密材料，揭发朱亮祖的罪行。朱亮祖反咬一口，污蔑道同对他傲慢无礼。对大官傲慢无礼，就等于自取灭亡，将道同判处死刑。朱元璋将朱亮祖父子召到南京，用鞭子活活打死。

1384年，临川侯胡美因为犯禁被处死。朱文正被鞭打而死。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儿，坚守江西南昌城85天，阻挡住陈友谅的疯狂进攻，为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决战的胜利奠定基础。他后来骄纵不法，公然抢夺妇女，玩腻了就投到井中淹死。还割人舌头，残暴不法。还用龙凤图案装修自己的寝室。朱元璋亲自到江西将他逮捕，幽禁于安徽，将他的50多名部下割断脚筋，致使残废。

曹国公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南征北战，立下不朽功勋。他能文能武，1383年任大都督（军队最高领导人）兼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南京大学校长）。李文忠曾经批评皇帝太依赖宦官，对待官员太苛刻。他居然被毒死（有的说是病死），理由是——礼贤下士，周围知识分子太多，难道你想搞小动作不成？临死前，他对朱元璋说，我给你一句忠告：要少杀人，防止宦官作恶。朱元璋听了，猜测是幕府教唆他这么说的，大怒，把所有的幕府全部杀了，李文忠身边的医生、奴婢60多人全部灭族。不过，朱元璋还是采纳他的部分意见：禁止宦官干政，不许他们读书识字，否则剥皮处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立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

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勋臣宿将，一律翦除。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1392年，性格仁慈的朱标太子病死，而新立的皇太孙朱允炆更加孱弱。身后之事，成为65岁的朱元璋的一块心病，他杀起人来就更狠了。1394年，颍国公傅友德自杀。他为朱元璋效命33年，功劳不在徐达、常遇春之下，儿子做驸马，女儿做晋王嗣子的妃子。但定远侯王弼看穿朱元璋的心思，对傅友德说：皇上年纪大了，我们该早点找出路了！不幸又被朱元璋听到，心里老大不高兴。这年冬天，大家在皇宫开宴会，还没吃完，傅友德习惯性地站起身来，抹抹嘴，准备先撤。朱元璋很不高兴，责备他大不敬，气呼呼地对他说：“你把你两个儿子叫来。”

傅友德起身刚走，叫卫士又传话：叫他把两个儿子的人头拿来。不一会儿，傅友德真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来了。宴席的气氛顿时紧张到极点，空气似乎凝固了。朱元璋嗫嚅道：“你还真下得了手啊！”没想到傅友德做出一个惊人的动作，只见他从宽大的袖子里拔出匕首，对朱元璋大声说：“你不就是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那你现在就拿去吧！”说完，把匕首往脖子上一抹，流血百步，自杀而亡。朱元璋怒不可遏，把他的家属全部发配到辽东和云南。

1395年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又找借口杀宋国公冯胜。冯胜降服元代丞相哈纳出的20万军队后，押送降将，胜利班师。冯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宣布有罪，剥夺兵权，发往安徽凤阳软禁。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回到南京后，朱元璋赐给他一杯毒酒，将他处死。冯胜在人生巅峰落马，可能因为他骄傲自大，行为不轨。 1389年，他的女婿周王曾经秘密地去凤阳会见冯胜，可能他们的军事同盟关系威胁到皇权。

朱元璋大肆屠戮宿将，很大程度上也与北元帝国的日益衰弱有关。据说明帝国建立之初，民间流传“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这样一句谚语，以讽刺那些稍有微劳而自矜者。意思是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但显然对于明帝

国诸将而言，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生擒王保保了。因为1375年这位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北元名将于金山去世。《明史扩廓帖木儿传》云：“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对此记载，《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大同小异，《蒙兀儿史记》“徙金山”作“西徙金山”、“衙庭”作“牙庭”。《新元史》仅作“卒于哈剌那”。

“金山”作为塞外的重要山峰，在当时有好几处。最出名的“金山”，是今天的中蒙边界的阿尔泰山，是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地区的分界线。还有一处“金山”，在元末明初也很出名，就是北元的另一个军阀纳哈出所盘踞的金山。两个“金山”，扩廓的死亡地点是哪一个呢。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中作“西徙金山”，《明太祖实录》应是现存关于扩廓死亡最原始并唯一的历史记录，其作“后从徙金山之北”，并没有说明“西徙”。显然屠氏通过“西徙”来经暗示这个金山是阿尔泰山。似乎王保保是去讨伐蹂躏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创始人——跛子帖木儿。

元史料奇缺，尽管今人索隐钩沉，仍所获无多。仅有的史料说明昭宗在扩廓死亡前仍滞留在其辽阳行省、岭北行省的辖地内。洪武七年九月，太祖在送还买的里八剌时给昭宗的信中说“（昭宗）今之众，壮弱不过两万，流离边境，意图中兴”。又云“今闻奥鲁去全宁不远”所谓“奥鲁”，拉施特书均译作后军，“奥鲁”是保管全军辎重的后勤部队，翻译做“老营”比较准确。全宁，自然是指元代的全宁路，其治所全宁城遗址在今天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昭宗的老营就在全宁路一带地区，自然其斡耳朵也在附近。而在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朱元璋写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母舅亲笔，叫保儿知道，如今辽东已胜了，小达达那里，时下不敢轻动。”所谓“辽东胜了”是指洪武八年十二月纳哈出寇辽东全军覆没这一战事。看来被太祖蔑称为“小达达”的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就在辽东外围且其动向在明廷的掌握之中。

王保保死亡时间在《明太祖实录》中记在洪武八年八月条结尾，应该是事后的补记。当时南北对峙，信息不通。扩廓作为北元的擎天之柱，对明朝来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王保保的陨落，自然是对昭宗“中兴”的沉重打击，更是明军弹冠相庆的喜讯。但根据其他资料，明朝至少在洪武九年初，仍未得到其死亡消息。洪武九年六月，降明的北元将领高家奴给高丽的信中说：“切思无知纳哈出孤兵深入，所部将士未战自败，纵然侥幸，到金山子百无一二。然又接王保保辈，况彼几战败将，何足为论”。

《明太祖实录》随后补充了一句：“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王保保这样的重臣去

世，且其部属、兄弟均在，而其妻子竟然自尽，除了“节烈”，似乎暗示了王保保当时的某种窘迫的状况。 王保保与爱猷识理达腊虽然合作不错，但也有矛盾发生。扩廓在沈尔峪之败后，仅以身免，其实力大打折扣。虽然以中书省右丞相统领全局，但其身份已由“军阀”转变为了“将领”。洪武五年岭北战役之后，其活跃度已经被纳哈出等人超越。

王保保似乎曾经以受到北元朝廷的怀疑和迫害为由与明廷做过交涉。在洪武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太祖朱元璋给北平备边的大将军徐达的信中曾说：“与大将军等，王保保此来，恐非实意，谨防虚诈。铁冠曾言，子月有战。此人今来，其前贼普贤奴、乃儿不花、魁的斤贼众又恐乌合来扰我边，不可不防。其王氏被疑逼而逃近塞上或有之，不可全信，不可全不信。广伏精兵，务讨实信。”这也许是王保保的苦肉计，但朱元璋不是也。不可全不信吗？对比《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十一月，由于听说王保保兵至大同以北，徐达、李文忠等人进兵大同北的猫儿庄，结果遇到大雾退兵雁踏堡。俘虏提供的情报说，怀柔有敌情。于是徐达又派偏师掩捕至三角村，小有斩获。但没有碰到王保保。

实录中所谓“后从徙金山之北”应该是此战之后，即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躲到了纳哈出的后方。金山之北是什么地方呢？洪武二十年五月，由于担心明军的扫荡，纳哈出放弃了金山营寨，向北遁去。明军冯胜出征“逾金山至女真苦屯”，“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北，”另外实录提及的据点还包括“信州”、“新泰州”等地方，应该都在一秃河附近。所以纳哈出的根据地大概在金山以北，以一秃河（今伊通河）、亦迷河（今饮马河）、松花河（今松花江）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吉林省的中部地区。其北地区则是小兴安岭山地，自非游牧之所。所以扩廓随其主所居的金山以北，则是西北的呼伦贝尔草原，朱元璋所说“奥鲁去全宁不远”则可以视为其驻冬之地，而金山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及西到克鲁伦河一带则是其驻夏之地。其后的大罕脱古思贴木儿也游牧于此。也就是太祖所说的“捕鱼儿海”。

北元崩溃

1378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卒于和林，脱古思帖木儿即位。脱古思帖木儿身世不详。他的出生年依据《蒙古源流》的说法是壬午年（1342），而他与前代北元皇帝元昭宗（必里克图汗）爱猷识理达腊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蒙古史料《蒙古源流》《黄史》等均记载脱古思帖木儿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弟。

明朝史料均记载他是元昭宗之子，有人进而指出他就是曾被明朝俘虏的元昭宗长子买的里八剌（明人王世贞则记载他为元昭宗次子，被封益王）；洪武三年（1370年，至正三十年），李文忠等率明军攻破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俘虏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之嫡长子买的里八剌，押到南京后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崇礼侯”，1374年，明太祖以元昭宗“父子隔绝、未有后嗣”而将崇礼侯买的里八剌遣还蒙古，到1408年，明成祖朱棣在致蒙古本雅失里可汗的信函中说：“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之子孙存恤保全，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脱）古思帖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这也就成为脱古思帖木儿是被明朝俘获后又遣还的买的里八剌的依据。

或许正因为脱古思帖木儿有过这样一段被明帝国俘虏的历史，在他即位之后，国内兴起一大批野心勃勃的大封建主，趁乱称雄一方，你打我杀，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大汗即北元最高统治者的实力与权威。 1388年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随即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代。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

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

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势力，各自为政。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辽宁一带）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处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间的是鞑靼部，它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

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

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依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

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用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

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到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

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汲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后记：

新生代

1398年农历五月， 71岁的朱元璋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应该说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由于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因此朱元璋的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

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朱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朱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朱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朱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

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

永平。二旬众至数万”。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三万。

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诫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

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

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孳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

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死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

《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

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

明初所建卫所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流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

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

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在元帝国灭亡的过程中，明帝国虽然在《平胡诏》中宣称："列群讴歌四集，百年污染一新。"但是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明军诸将却都没留下什么有名的诗作。倒是元惠宗妥懽贴睦尔据说在仓皇离开大都的路上，写下了一首"歌声既哀继之以泣"的长篇史诗。由于篇幅较长，实在不宜转录。不过再华美的辞藻也赶不上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所记录的朱元璋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面前的讲话来得直接和雄壮："痴达子，痴达子！汝何人，入主中国，可谓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归，奄有天下，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则朕之待胜国亦可谓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的确对于崛起于草原最终又回到草原的铁木真及其子孙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那些伟大映像之中，不应该有悔恨和眼泪。

在辽、金时代，盘踞于蒙古高原南部的鞑靼已经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代名词。因此在蒙古崛起之前，人们只知道辽、金边外有鞑靼，不知有蒙古。而根据与中原地区的远近和汉化程度，将蒙古诸部称为黑鞑靼，而将内附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而从此之后，这两个称谓几乎成为这支草原部族的荣辱坐标。当其强盛、统一之时，人们恭谨地称之为"蒙古"，而在其衰弱、分裂降临之时，他的敌人总会轻蔑地指着那些被驱逐着策马远去的背影骂上一句："×鞑子"。

赵恺　郭强　著

东海博弈

——明帝国与日本的三百年战史（1369—1681）

前言

谈及明帝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倭寇之乱和万历援朝当是国人的第一印象。但各类史料纷繁复杂，普通历史爱好者对这两大历史事件本身往往不甚了了，对其前因后果更缺乏全面的了解。有鉴于此，本书将首次采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对明帝国与日本往来的三百年历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全面展示中日两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对抗和博弈，为读者深入解读其间种种高层决策背后的考量。

一代雄主朱元璋是否如世人所想象的那般只重农桑，缺乏远图？面对盘踞九州的日本军阀怀良亲王斩使、绝交的傲慢行径，向来杀伐决断的朱元璋为何一再中止了麾下周德兴等骄兵悍将们跨海远征的勃勃雄心？在不断采取经济封锁、外交恐吓逼迫日本就范的同时，一起扑朔迷离的“如瑶藏主案”又如何成为了朱元璋一举铲除胡惟庸集团的罪证之一？最终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的同时，朱元璋又留下了怎样的后手来制约这个潜在对手？

通过“靖难之役”成功上位的永乐帝朱棣缘何轻易地给予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的请封？这一完全有违日本政坛游戏规则的“认证”背后又隐藏着日本国内怎样一场波诡云谲的政治阴谋？继承己父足利义满之位的足利义持为何草率地与明朝断绝外交关系，而由朝鲜王国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惩戒战争”背后又是否有着明帝国的推手？

自明宣宗朱瞻基时代步入正轨的中日贸易究竟是否如大众所想象的那般是一场天朝上国“赔本赚吆喝”的亏本生意？而贸易额不断攀升的中日双边贸易又给双方国内政局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一场看似无伤大雅的宴会座次排序为何会演变成中日两国决裂的导火索？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大倭寇”缘何成为大明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而纵横东海的中日海盗集团又是否在不经意地撬动了日本列岛的政治走向？

群雄并起的日本“战国时代”缘何终结在以“永乐通宝”为战旗图案的织田信长手中，而这位一心追求“天下布武”梦想的野心家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必然？继承了织田信长政治遗产和野心的丰臣秀吉对中朝两国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底气何在，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富丽堂皇的大阪城中是否真的怀有迁都北京鲸吞东亚的迷梦？

长达6年的“万历援朝战争”以朝鲜王国军队的土崩瓦解开场，前期驰援的明帝

国前锋部队也屡遭挫折，是怎么样的力量最终令明帝国远征军很快便扭转了战局、收复平壤？一场双方都宣布胜利的碧蹄馆之战又究竟鹿死谁手？在双方地面战陷入僵局之时，被后世尊为朝鲜民族英雄的李舜臣所部水军是否成为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丰臣秀吉为何频频在外交领域自打耳光、食言而肥？而重启朝鲜战端的背后又是否埋下了丰臣氏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

一统日本、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为了修复中日、朝日关系作出了哪些努力？在为了抵御西方殖民者渗透所颁布的“锁国令”背后，日本在东海之上又暗中展开了哪些颇为阴险的小动作？日后逐渐崛起的郑氏集团又是如何利用中日之间关系的回温捞取自己的第一桶金的？席卷东亚大陆的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崛起是否也影响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德川幕府对于南明小朝廷的历次求援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三藩之乱中日本方面是否也曾有过伺机而动的冲动？本书都将一一为您解答。

序章　从白村江到博多湾

大和与百济

根据地质学的观点，最早生活于今天日本列岛之上的“人类”是来自东亚大陆的“中国猿人”和东南亚地区的“爪哇猿人”。在距今约50万年至15万年前的“洪积期”和“第三冰河期”，由于海平面的下降和地壳运动，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之间曾存在着诸多可以徒步穿越的大陆桥，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日本海不过是一个为陆地所包围的“内湖”。正是这些地理上的联系，给了东亚地区的人类远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迁徙到日本列岛之上，并在当地定居、繁衍和进化。

尽管长期以来日本考古界努力证明着其大和民族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自然孕育而成的本土文明。但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近代以来出现诸多有关日本文明外来的学说，其中比较常见的有日本文明来自中国南方的“渡来说”以及发轫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其他还有诸如日本民族来自印欧语系，甚至与希伯来—犹太文明一脉相承等观点。但总体来说，远古以来的日本本土文明基本是在自我演化的同时，不断地汲取着通过移民所带来的东亚文明的滋养，最终才逐渐发展成形的。

在经历了以渔猎为生的蛮荒“绳纹时代”之后，从东亚大陆传来的水稻和铁器，令日本进入了农耕文明的“弥生时代”。吃饱了米饭的日本先民开始相互攻伐，根据汉帝国乐浪郡的报告，仅在九州、本州岛北部一带便出现了“百余国”并立的局面。为了获得强大的外援，这些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的“国王”争先恐后地向汉帝国乐浪郡的长官进贡。其中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皇恩浩荡”地允许“倭奴”使团抵达了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授予“汉倭奴国王”金印一枚，算是正式承认了其藩属的地位。

当然汉帝国皇帝不会那么小气，在今天发现金印的福冈县境内，日本人还挖到了诸多用于陪葬的“奢侈品”，其中最多见的便是青铜镜、铁剑和琉璃制勾玉。由此可见日本人无限神化的“三神器”，不过是当年汉帝国赐予的“礼品套装”而已。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先民在感恩戴德之余，也在50年后（107）送来了“回礼”——160名奴隶。日本列岛的物产之贫瘠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列岛进入了空前惨烈的大混战之中。世人对这场“百年战争”的内幕知之甚少，因为《后汉书》中只没心没肺地记录了“倭国大乱，

更相攻伐，历年无主”这12个字而已。倒也不是说汉帝国不关心藩属的内政，而是此时正处于东汉中期，忙于在外戚和宦官势力中间搞平衡的中国各级行政机关，无暇去理会邻国的是非。



现存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
“汉倭奴国王印”

“倭奴”再次抵达洛阳，已经是公元239年的三国时期。通过带方郡太守刘夏的引见，邪马台国的特使难升米、都市牛利向魏明帝曹叡进献了“厚礼”——奴隶10人、斑纹麻布两匹。考虑到邪马台国自称是先后灭亡了28个政权的“大国”，这点礼物实在略显寒酸。不过秉承着“礼轻情意重”的善良，曹魏政府还是给予了对方优厚的回报。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邪马台国频繁前来“朝贺”。礼物也不断推陈出新，除了保留节目：奴隶和纺织品之外，还出现丹木、短弓以及不知名的犬类动物，是否就是著名的“日本草狗”——秋田犬？这便不得而知了。在频繁的外交往来中，曹魏帝国了解到邪马台内部有些奇异的权力架构。



“天照大神”原型卑弥呼女王雕像

据说邪马台国长期以男性为国王，但是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却推举了“事鬼神道”的少女卑弥呼主持国政。这种各派势力相持不下，最终“神化君权”的模式，在深谙权谋的汉族知识分子眼中本没什么稀奇的。无论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卑弥呼不过是“以妖惑众”而已。不过这并不影响日本的先民对“侍婢千人，少有见者”的卑弥呼的顶礼膜拜，甚至在其死后还非要拥立卑弥呼一脉的另一少女“壹与”为领导人。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卑弥呼或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

其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却在此后不断发酵。在以部族为单位长期攻伐的情况下，掌握祭祀权威的女性往往有着超凡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本应被文明所淘汰的“神棍领导”却由于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而被长期保留了下来，并最终进化成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卑弥呼的形象更被异化成了日本历代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

根据中国史料的相关描述，邪马台应该是位于九州岛的地方政权。但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不愿正视日本列岛长期陷于分裂的现实，非要认定其是一个定都奈良县，势力范围遍及九州、关东近乎于统一日本的强大存在。事实上，即便采信日本主流的邪马台“近畿说”，这个日后以“大和”为国名的政权真正“统一”日本列岛也是在公元5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从邪马台到大和国之间的日本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也正好给了日本学者“发明历史”的广阔空间。公元8世纪之后，经过“遣隋使”、“遣唐使”历练的御用文人陆续回国，随即以天皇口述的名义写下了以《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为代表的多部架空小说，令这段历史更加云山雾罩。

事实上撇去那些拗口的人名以及过于推前的纪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也并非全无营养。至少这两部小说都承认了建立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是由濑户内海东渡而来的征服者建立的，而指挥这次远征的则是传说中的初代“神武天皇”——倭伊波礼毗古命。

长期以来日本都坚称“神武东征”发生于公元前660年，即略相当于中国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的同期。但这种天马行空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特别是在中国史料的映衬之下）。因此近代有良心的日本史学家将这次改变日本的远征修正为公元3世纪左右，算是勉强自圆其说。



日本画家笔下的神武天皇东征

“神武东征”并非一蹴而就，相关记载虽然极尽神化和粉饰之能事，但其行军路线曲折飘忽、走走停停、屡战屡败却不像是故意的虚构。特别是《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天皇第一次东征失利之后，“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的记载，近代也得到了考古挖掘的证实。但令日本人感到尴尬的是出土的青铜兵器竟然大多数与中国的刀剑制式相仿，考虑到“神武东征”之时，中国正处于“三国两晋”的内乱时期，神武天皇“华丽”的东征是否依赖于来自大陆的“军火走私”，答案显然不言自明。

如果说卑弥呼的邪马台国孕育了“君权神授”的天皇制度的话，那么“神武东征”便是这一畸形制度的血腥分娩。但日本列岛为海洋及群山分割的地形，催生了诸多自给自足的“土皇帝”。因此“倭国政权”无非是占据中央沃土的“天皇”家族与各地土豪的松散联盟而已。这种基于权力微妙平衡之下的政治格局，自然无法长治久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近邻朝鲜半岛纷争的加剧，日本列岛开始进入了新的躁动期。

公元346年，盘踞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百济政权，在第13任君主“近肖古王”扶余句的领导之下进入了加速开疆扩土的快车道。而其第一个目标便是奄奄一息的属国——马韩。马韩与辰韩、弁韩，合称“三韩”，是朝鲜半岛相对古老的部族联盟，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的商周时代。有学者认为“三韩”是中国殷商移民的后裔，认为其便是《商颂》中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商帝国海外属地。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达成史学界的共识，但商帝国灭亡后，大批殷商遗民远走朝鲜半

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韩时代的朝鲜半岛政治版图

“三韩”在中国秦、汉帝国统治时期各自有所发展，定居于洛东江以东地区的辰韩率先从部落联盟进化为了城邦国家，并最终形成了取义“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

四方之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新罗”。盘踞洛东江南部地区的弁韩则土地肥沃，与大海相连且富有铁矿，最终形成了以商贾立国的贸易同盟——伽倻联邦。但“三韩”之中曾经最为强大，坐拥整个汉江流域、54个城邦、10余万人的马韩，却被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扶余族打断了其正常政治演进。

扶余族虽以农耕、渔猎为生，但却擅长畜牧，因此也兼具游牧民族的特征。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高朱蒙因宫廷斗争失利而被迫南逃。此时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北部依旧隶属于汉武帝东征燕国后裔所建立的乐浪等四郡的统治之下，朱蒙抵达当地之后一度依附于汉帝国地方政权，收拢当地的扶余等族势力，逐渐形成了所谓“卒本扶余”的政治势力，并利用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所引发的政治乱局，试图夺取乐浪郡的地方权力。高朱蒙本人虽没有亲眼见到“卒本扶余”由部族联盟进化为国家的华丽转身便为王莽手下的官员诱斩，但其子高类利、其孙高无恤还是成功地击败了周边的其他扶余部族，并于公元37年一度攻占了汉帝国的乐浪郡。正式以汉帝国对高朱蒙的封号“高句丽县王”的名义与东汉帝国分庭抗礼。



今天位于平壤的高句丽开国君主高朱蒙的塑像

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一度出兵远征朝鲜，击退了高无恤的部队，收复了乐浪郡，

但考虑到劳师远征成本过高，且汉帝国同时还要应对北方匈奴等游牧部落的袭扰，因此在高无恤之子高解忧执政时期，汉帝国正式承认了高句丽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其采取怀柔的政策。而高解忧虽然一度出兵侵扰汉帝国边境，但此时却也不得不正视双方国力上的差距，选择与汉帝国通好。而与此同时，身为高句丽君主的高解忧也不得不关注其自己表亲——百济王室的发展。

百济王国的首任君主扶余温祚自称是高朱蒙之子，由于受到了同父异母的兄长高类利的排挤，而不得不逃往汉江流域。由于扶余温祚身边最初只有10位臣子辅佐，因此自称“十济”政权。此后队伍不断扩大，便改名为“百济”。百济立国之初虽然也试图向北发展，但很快便由于力量不足，而将矛头转向曾经接纳他们的马韩诸部。

扶余温祚建国之初虽然兵微将寡，但毕竟来自于相对发达的扶余—高句丽宫廷，眼界和政治手腕远非一盘散沙的马韩诸部可比。在他和他的子孙远交近攻的蚕食之下，至“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时期，马韩诸部已经从54部被削减至20余部，再无力与百济相抗衡。百济之所以能够缓慢地灭亡马韩，除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之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当时朝鲜半岛的外部局势。北方的高句丽始终试图利用汉帝国的内乱蚕食辽东，最终却在244年为曹魏帝国的名将毌丘俭所击败，险些亡国灭种，此后一度元气大伤。而马韩的近邻辰韩诸部则始终陷入了新罗政权所发动的一次次内战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济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又大力发展与中国、日本、弁韩所形成的“伽倻联邦”的多面贸易，逐渐成为了朝鲜半岛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元369年，百济彻底灭亡马韩并将伽倻联邦纳为属国。这一彻底改变地区政治版图的举措随即招徕了北方邻国高句丽的强势介入。仅从领土面积来看，高句丽虽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但联系到此前高句丽与中国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政权的交锋情况来看，却不得不说发动这场战争的高句丽国王高斯由多少有些色厉内荏。从公元293年开始，崛起于龙城辽阳的慕容鲜卑便频繁出兵袭扰高句丽的边境。高句丽方面起初还能够抵挡，甚至与慕容鲜卑的对手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结成同盟，一度形成对慕容鲜卑的围攻之势。但随着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的先后灭亡，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战况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

公元342年，慕容鲜卑重创高句丽军队，攻入高句丽的领土。不仅将高句丽历代积累下来的金银全部搜刮一空，虏走了百姓5万多口。还挖开高句丽前代君王高

乙弗的墓穴，将这位国王的尸体以及其仍然在世的妻子周氏一同打包带走。面对被焚之一炬的首都，以及父母被掳走的屈辱，第16代高句丽国王高斯由虽然有心复仇，但无奈经此一役之后，高句丽元气大伤，只能遣使向慕容鲜卑输诚。慕容鲜卑此时虽已经调整战略方向，准备大举入关，与后赵政权逐鹿中原，但仍不时出兵袭扰高句丽的国土。直到公元355年，慕容鲜卑于中原建立前燕帝国，才正式与高句丽和解，归还高斯由的生母周氏。



今天仍保存完好的日本大仙陵古坟

接受前燕册封的“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的头衔，高斯由休养生息了一番之后选择向南发展。急于弥补与前燕战争消耗的高句丽迎头撞上了发展势头良好的百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随即全面展开。仅从高句丽和百济的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可谓旗鼓相当，但高句丽此时已经臣服于前燕，并无后顾之忧。而百济身后却有伽倻联邦和新罗的牵制，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之初便积极地寻求与日本的大和政权结盟，希望其能出兵助战。那么孤悬于海外的倭国政权又是否有必要来蹚这摊浑水呢？

从公元300年迄公元600年的日本列岛，由于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四周挖有深壕、前方后圆的巨大穴式坟墓，而被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古坟时代”。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尚无可信的文字史料传世，便给了后世的各种“发明”历史的空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便提出鉴于“古坟时代”的墓穴之中出现了大量的陪葬马匹和马型陶俑，提出“古坟时代”实为扶余族南下征服了“弥生时代”的日本先民所建立的。因此倭国与百济之间属于兄弟政权的关系，甚至有人借此提出倭国政权事实上是百济的殖民地。期间的历代天皇也大多由百济王室成员出任。

针对以江上波夫为代表的这种“骑马民族征服说”，日本国内出现了粉饰所谓“神功皇后三韩征讨”的反击浪潮。所谓“神功皇后”指的是日本第14代天皇足仲彦尊的妻子气长足姬尊（也称息长带姬命），由于著名的日本架空历史小说《日本书纪》之中明确记载神功皇后的生母是新罗王子“天日之矛”的后裔，足仲彦尊死后，“神功皇后”也以摄政的身份亲征新罗，并逼迫百济、高句丽进贡称臣。因此百济与大和应该是大和政权的殖民地和附庸才对。

无论是“骑马民族征服说”还是“神功皇后三韩征讨”，放在公元4世纪之前的东亚生产力水平和政治环境之下，均显得有些天马行空。百济王室自脱离高句丽政权依赖，便始终忙于与马韩、新罗、伽倻联邦等国交战，很难想象还能抽调出兵力远征日本，且在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持的情况下，百济军队即便拥有着骑兵方面的优势，也很难征服多山的日本列岛。而“神功皇后”按照日本《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是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中叶的人物，经过一系列的史料修正之后，勉强可以认定其于公元369年的确出兵袭扰了新罗沿海地区，但即便其海盗般的突袭行动攻下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也没有理由跟着表示臣服。



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型陶俑

正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骑马民族征服说”和“神功皇后三韩征讨”对于世人研究“古坟时代”的日本历史也并非全无帮助，事实上一衣带水的对马海峡从来都无法隔绝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有诸多打着权贵之名的中、朝移民以“渡来人”的身份抵达日本列岛，如同所谓的新罗王子“天日之矛”。而日本列岛的大小豪强为了夺取相对富庶的邻国的财富，也可能如“神功皇后”般扬帆出海，袭扰朝鲜半岛的沿岸地区。而这些并不为史料所记载的孤立事件，共同构成了“古坟时代”日本与朝鲜半岛全方位的“民间交流”，而这种方式在未来还将长期延续下去。



日本画家笔下的神功皇后东征三韩

公元371年，百济与高句丽之间长达2年的战争，最终以百济太子扶余须率军于平壤取得大捷而告一段落。此战之中百济军队不仅在战场上成建制地俘虏了数以千计的高句丽士兵，更一举射死了敌国君主高斯由，可谓是空前的胜利。而作为百济同盟国的日本大和政权在此战究竟有多少贡献，史料中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之中，世人仍不难“窥一斑而知全豹”。

百济与高句丽交战时期，倭国政权正处于“神功皇后”的儿子——应神天皇品陀别命的统治之下。应神天皇据说是“神功皇后”在远征朝鲜半岛的途中所生，不过联系到“神功皇后”此时的“正牌老公”已经作古，应神天皇的血统似乎颇有可疑之处。不过“神功皇后”此时手握精锐的远征军指挥权，因此倭国政权内部一时无人敢质疑应神天皇的合法继承权。在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同时，大和远征军扫荡了伽倻联邦以及被称为耽罗的济州岛地区，并多次袭扰了新罗沿海地区，可谓替百济解除了后顾之忧。

为了感谢倭国的“帮助”，百济王室与倭国的特使千熊长彦在朝鲜辟支山之巅，举行了正式的盟誓。而作为两国间友谊的“见证”，“近肖古王”扶余句还特意打造一柄富有百济特色的“七支刀”赠送给了应神天皇，并希望其能够“相传于后世”。当然这柄百炼而成的“七支刀”在当时虽然名贵，却并不足以维系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真正令百济和倭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休戚与共的关键还在于共同的利益。百济虽然在平壤地区击败了高句丽，但战线并不稳固，在一时无力攻陷平壤的情况下，百济不得不迁都汉山（今首尔地区），以便就近监视对手。而对于伽倻联邦和新罗的威胁，百济则继续引入倭国的势力予以制衡，正是基于百济王国的这种态度，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南部顺利地建立起了名为任那的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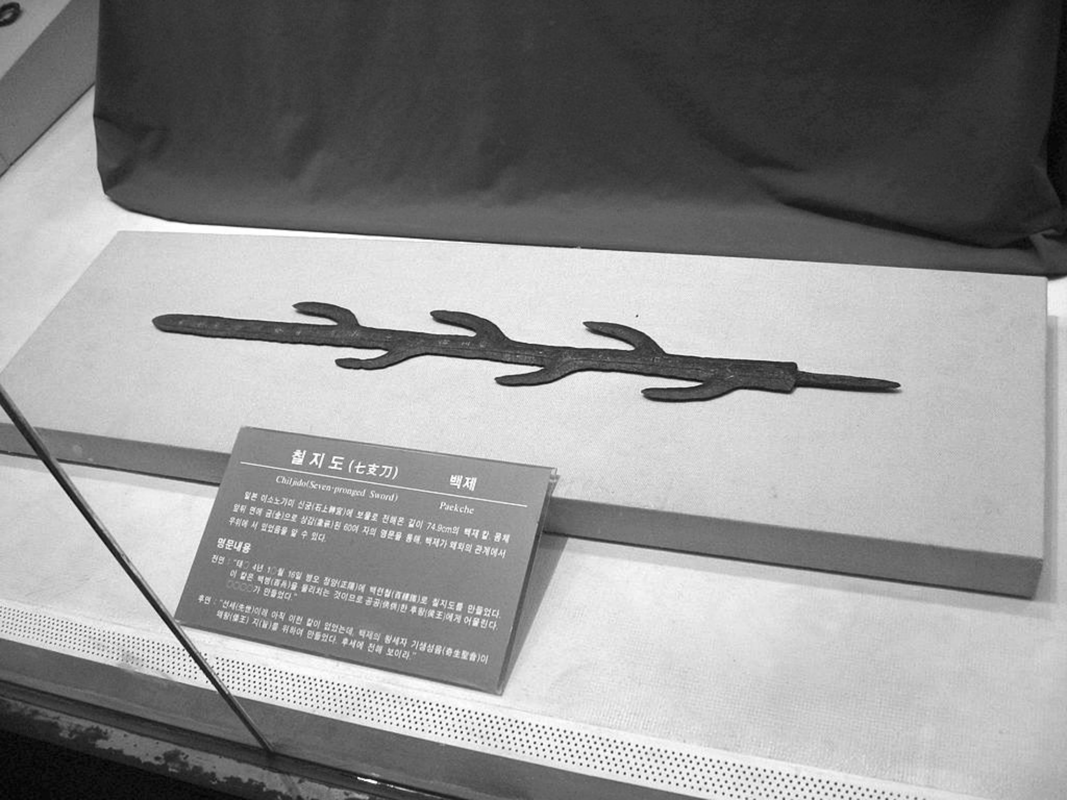
扶
余
挹
婁
前
燕
新城
350年---------372年
之後由前秦代替
遼東城
國內城
高
句
麗
平壤
百
濟
慰禮城
新
羅
金城
伽倻
渤
海
東
海
倭

鼎盛时期的百济版图

但好景不长，公元4世纪末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热情遭遇了迎头一棒。与百济结盟的倭国军队，于公元399年在今天平壤附近被高句丽所败。军事上的失利，令倭国政府只能通过谋求东亚老大—中国的册封来自我安慰。从公元421年开始，天皇们孜孜不倦地派出使节，请求偏安东南的刘宋帝国在“安东大将军”、“倭王”之外，再给予自己“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力。

应该说“使持节都督某国军事”本身就是一个虚衔，但即便是这样的“口头胜利”，日本人也艰苦争取了三代人。有趣的是因为刘宋帝国长期和新罗对立，因此同样秉承“精神胜利法”将其划入日本的管辖之下，但却从未允许日本将自己的同盟百济列于其下。好不容易从中国借来的“虎皮大旗”，并无法改变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溃退。公元476年，高句丽攻占百济首都，新罗趁势侵入日本殖民地—任那。无奈之下，倭国政府只能选择将自己在朝鲜半岛一半以上的领土“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染指就此走向没落。

倭国政府在经济上长期依赖于朝鲜半岛的输血，陡然被腰斩一半，难免肉痛心跳。为了挽回颜面和损失，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倭国政府频繁对新罗用兵。但这些劳师糜饷的远征，不是被打得满地找牙，就是搞得民怨四起，内战连连。大和政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换来的是公元663年白村江口外，唐帝国海军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百济赠送给倭国的“七支刀”

高句丽之所以能够长期对百济和倭国联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主要缘于当时东亚大陆正处于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的乱世之中。公元370年，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虽然灭亡了慕容鲜卑的前燕，但其对辽东半岛的兴趣远不如南下攻略东晋帝国来得热切，高句丽趁势向北发展。以至于公元598年，面对篡位并完成了南北朝统一之后的隋帝国，高句丽国王高阳成竟然也敢主动寻衅，主动出兵突袭隋帝国的辽东重镇——营州。



高句丽的重装骑兵长期在与百济、倭国的战斗中占据上风

盛怒之下的隋文帝杨坚，随即委派第五子杨谅率大将高颎、周罗睺及30万海陆大军攻打高句丽。但这次远征并不成功，泛海出击的隋帝国舰队在渤海湾饱受风浪的侵袭，登陆后又不断遭遇高句丽骑兵的袭扰，最终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只能无功而返。而此时恰逢高句丽国王高阳成去世，在其继任者高元主动以“辽东粪土臣元”的名义上表请和的情况下，隋文帝杨坚暂时原谅了高句丽此前的无礼举动。但辽东边境的问题却就此成为了隋帝国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前的朝鲜半岛政治版图

公元607年，隋帝国第2任君主隋炀帝杨广北巡榆林时发现高句丽与突厥秘密联盟的情况后，随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准备。5年之后的公元612年农历正月初二，总计130余万人的隋帝国远征军正式开赴辽东战场，但面对高句丽方面坚壁清野的防御姿态，隋军最终因后勤不济和战线过长而被迫撤军。此后隋炀帝杨广又连续两次对高句丽发动百万级规模远征，但结果却是“再而衰、三而竭”。隋炀帝杨广对高句丽的征讨不仅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辽东地区的边患，反而令国内民变四起、群雄争立，令强盛一时的隋帝国迅速滑向崩溃的深渊。

前后长达14年的隋末乱世，虽然最终以关陇军事贵族李渊父子所建立的唐帝国统一中原而告终，但继承了表哥隋炀帝杨广雄心和抱负的唐太宗李世民，同样视高句丽为心腹大患，在“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的口号引领之下，唐帝国开始了更为漫长的高句丽征讨作战。

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前后延续了24年之久（644—668），在双方频繁的攻守拉锯之中，公元660年唐帝国与新罗联手灭亡百济之役可谓是战争的分水岭。此时的百济正处于第31代国君扶余义慈的统治之下，在扶余义慈的父亲扶余璋统治时期，百济改变了长期以来与高句丽对抗的政策，转而与之结盟进攻新罗。虽然历代百济国王仍对中原政权保持恭敬，但其与高句丽结盟的举措已经触及了唐帝国的底线。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以新罗求援为名，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0万大军跨海讨伐百济。

在首都泗沘（今韩国扶余郡）城下，百济军队倾国迎战，但仍一败涂地。面对国力悬殊的现状，扶余义慈不得不率众向唐帝国投降。至此号称立国678年的百济宣告覆灭。但此时唐帝国对百济的占领仍不稳固，百济皇室的外围成员扶余福信以朝鲜半岛西南部、扼守锦江出海口的周留城为据点，积极与倭国联络，希望日本方面能送回此前以人质身份居留的王子扶余丰，并出兵帮助百济复国。

站在倭国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国际形势似乎对其颇为有利。唐帝国远征军主力已经撤回国内，百济境内仅有万余驻军。而朝鲜半岛的北方战线，高句丽正筹划着大规模的反攻。高句丽方面曾向倭国吹嘘说“高丽士卒胆勇雄壮”，而唐帝国军队则“抱膝而泣，锐钝力竭”。在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公元661年正月，日本历史上第2位女天皇“宝皇女”不顾65岁的高龄，亲自率军进抵九州筑紫地区，准备御驾亲征渡海参战。但在朝堂之上成功翦除权臣苏我氏的“宝皇女”，毕竟年事已高，还

未来得及登上战船，便病逝于行宫之中。

白村江口之战时期的倭军甲胄及武装

“宝皇女”之死极大地延误了倭国加入朝鲜半岛战局的时间，更令稍纵即逝的战机一去不复返。公元661年农历四月，扶余福信一度率军围困驻守百济故都泗沘的唐帝国驻军刘仁原所部，但因后援不济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元662年，高句丽军阀渊盖苏文在平壤地区大败唐帝国军队的情况下，“宝皇女”之子天智天皇才重新启动了援助百济复国运动的相关工程，当年五月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终于在倭国军队护卫下回到自己的故乡。一个月后，2.7万人的倭国精锐远征军在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的统率下，突袭新罗沿海，攻占沙鼻岐、奴江二城，在新罗与百济地区唐帝国驻军的结合部打入了一个楔子。

但就在战场态势对倭国方面颇为有利的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斗却在百济流亡政府内悄然开锣。回到国内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不满自己只是精神领袖的政治地位，很快便将矛头对准了拥立自己的堂叔扶余福信。公元663年，扶余福信以谋反之名被诛杀，其子扶余集斯逃亡日本，改姓鬼室。这场叔侄内斗极大地动摇了百济流亡政府本不稳固的统治基础。在唐帝国军队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扶余丰不得不再次向倭国求援，这一次直接要求倭国军队进驻周留城。此时的倭国政府在维持新罗沿海据点的同时，还必须不断运送大批物资向百济流亡政府输血，经济压力可想而

知，但面对扶余丰岌岌可危的统治，倭国方面只能再度派出数万远征军越海驰援。

公元663年8月初，在得到倭国援军将至的消息后，扶余丰亲自率军从周留城赴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迎接。而与此同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唐—新罗联军的计划是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周边。而百济军队则因扶余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据点，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继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唐军围攻一个月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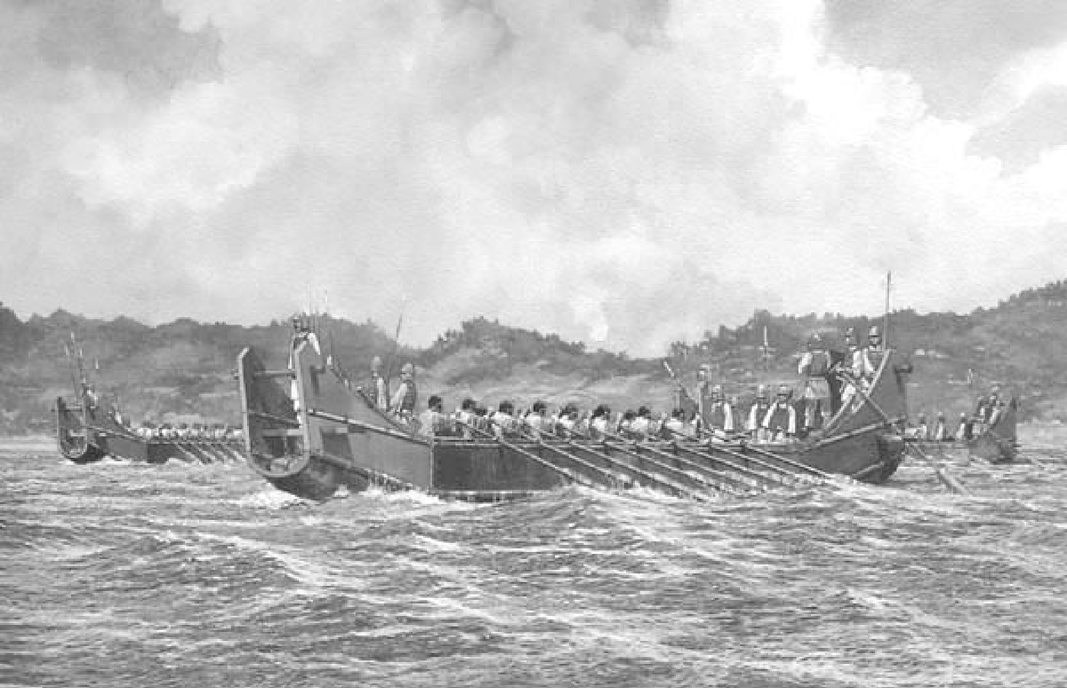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村江口。但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却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一时间“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刘仁轨只能立刻下令布阵，170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公元663年8月27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将帅虽然初战失利，但仍认为“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刘仁轨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在狭小的包围圈内倭军舰只能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日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数十唐军，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间，日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在岸上守卫的扶余丰，见日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白村江口战役形势图

唐海军白村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9月7日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率守军投降。倭军陆军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9月19日撤回本国。唐日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日本受到严重打击。日本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的扩张，大约在900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5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终于统一朝鲜半岛。



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

平氏崛起

白村江口之战不仅彻底令日本放弃了在朝鲜半岛努力维持的“立锥之地”（此处绝非比喻），更令日本从与隋帝国外交往来中“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狂妄中彻底醒来。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令日本在积极派出“遣唐使”团，引进东亚大陆先进政治、文化和经济模式的同时，将扩张的矛头转向本州东北部和九州南部的原住民。


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

倭国政权毕竟接受华夏文明几个世纪的抚育，收拾起九州岛南部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隼人诸部”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与被称为北方“虾夷人”的战争却旷日持久。经过近200年的努力，直到公元811年大和政府方始将“虾夷人”赶出本州岛，宣告“内地平静”。倭国政权在本州东北的扩张之所以举步维艰，并非是因为“虾夷人”为人勇悍、擅长射箭，且箭头涂有毒剂。大和政府真正的敌人是本州岛东部的蛮荒状态，在日本方面的有关史料中，最多见的名词便是“筑栅”、“移民”、“造城”、“置国”。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股新的力量逐渐崛起，并成为了此后日本列岛一千年的主宰。它们便是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

“幕府”本身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汉语词汇，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李牧列传》，北魏名臣崔浩的注解中还特别提到了“幕府（莫府）”一词的来历，即“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莫府’”。由此可见，“幕

府”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但并非常设机构，一般“军还则罢”。“幕府”真正进化为军政合一的常设机构，大体是由汉代开始。在“鹰派领导人”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事，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均“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此前战时才招募组建的“幕府”，至此成为了聚集诸多名士“与参政事”的独立军政机关。

尽管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名将权臣的幕府几乎贯彻始终，在盛唐时期甚至出现了“公主开府”的特例，但是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得到皇帝特批“开府”，也逐渐由大权独揽转化为一种荣誉和虚衔。而在日本，“幕府”这一词汇作为“舶来品”真正流行，始于“平安时代”。公元784年，桓武天皇山部由于自己出身卑微（其母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王室后裔），做出了迁都的决定。经过10年的营造，“山寨”自长安的“平安京”最终于琵琶湖畔落成。

此时在盛唐文化的辐射之下，日本列岛已逐步完成了所谓“律令改革”。所谓“律”也就是刑法。对日本后世影响极大的“大宝律令”基本照抄了“唐律”。而“令”则是国家组织形式和官吏权职的设置，在这一点上日本虽然竭力仿效大唐，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浓郁的“日本特色”—层叠和世袭。

在仅相当于今天日本领土二分之一的区域内，设置了60多个“国”级行政区，而每一个“国”级行政区之下，则设置数目不等的“郡”，“郡”内居民每50户编为“里”。如此叠床架屋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因无他，就是为了“摆平”各地亘古相传的豪族势力。中央政府通过任期四年的“国守”和“国司”行使权力，而各地豪族则长期把持“郡司”之职。而横行一方的大户，则以“里长”的身份鱼肉一方，担负征税、警备和编造户籍等工作。



公元 8 世纪的日本列岛势力分布图

在盛唐所有的政治体制中，唯一被日本长期拒之门外的便是科举制度。因此在日本大多数官吏都成为世袭罔替的“贵族”，而比起繁复的位阶和官位之外，代代相传的田地和封户更令各地豪族心满意足。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开支，必然通过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在此基础之上，日本民众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还要面对每三年或四年一次的兵役。相对野战军60天的服役期而言，被派往九州充当“防人”（边防军）则要苦熬3年。也难怪当时日本民间流传着“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的说法。



平安京复原图

由于除了可以主动免除其他徭役之外别无福利，因此民众对从军长期缺乏热情。而在征讨“虾夷人”的战争之中，逃兵现象更出现了井喷。为了缓和严峻的社会矛盾，桓武天皇废除了大而无当的义务军制，代之以出身公卿、郡司、里长家庭“精于弓马者”的“健儿”。作为准职业军人的“健儿”，战斗力自然要比“自带干粮”从军的民兵高出一大截。而为了统一指挥这支开疆扩土的生力军，大和政府还特意设立了位高权重的“征夷大将军”一职。不过此时的“征夷大将军”名副其实，虽然亦有权“开府”，但只负责“（东）征（虾）夷”，一旦军事行动宣告结束，便随即卸任。



“幕府将军”的开创者——坂上田村麻吕

最初三代的“幕府将军”对日本皇室忠心耿耿，特别是被日本人追认为“武尊”（战神）的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更曾以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在卸任之后还协助嵯峨天皇神野扑灭了自己嫂子—藤原药子所发动的政变，堪称功高至伟。有趣的是，坂上田村麻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先祖是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在三代“征夷大将军”将“虾夷人”赶到了苦寒的北海道之后，如何开垦增了一倍的新疆土，便成为了大和政权新的难题。最初这些土地被大量划归皇室，被称为“敕旨田”。“敕旨田”由皇室动用民众的徭役进行耕种，既然是皇室的财产，自然不需要向政府缴纳地租、税赋。不过令日本天皇没有想到的是，此例一开随即上行下效，各地豪族、寺院纷纷效法。

历任天皇虽对这等“僭越”行径颇有不满，但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些土地本来就是豪族子弟打下来的，开垦和经营更少不了各地新任郡司和豪族的协助。于是乎，大和政府长期奉行的土地国有的“班田制”轰然解体，由豪族主导的庄园经济如火如荼地在日本列岛遍地开花。面对蔓延全国的土地兼并浪潮，大和政府竟然无力阻挡，便只能因势利导。从公元10世纪开始，大和政府逐步改变过去按户籍征税的模式，代之以全国范围的土地实名制登记工作。凡是榜上有“名”者，都是征税对

象，这一过程催生出了私有化的土地—“名田”，以及一大批私营业主—“名主”，而根据所占有的土地多寡，“名主”们又分为“大名”和“小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后在战国时代大行其道的“某某大名”之类的称呼，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常用的“某董”或“某总”。

随着大批郡司、豪族成为了“大名”，原有的“国守”和“国司”们的地位不免就尴尬了起来。名义上他们还是掌握一方的封疆大吏，但事实上四年轮换的任职模式却令他们在地方缺乏根基，难免遭遇地方豪族的架空和排挤。以公元987年尾张国郡司和名主们对“国守”藤原元命长达三年的围攻和弹劾为标志，来自中央的公卿势力与地方豪族长期保持的暧昧关系荡然无存。

面对旷日持久、上达天听的诉讼和辩论，利益诉求的纠葛使“国守”和“郡司”们几乎同时选择了自我武装。各自“大名”在庄园内组建了以治下自耕农为主体的“郎党”。而为了保证自己征税的权力，原先只负责行政事务的“国衙”也随即进化出了军事职能。日后对日本列岛影响深远的平、源二氏便是“国守”出身，平氏先祖平高望是“上总国介”，介是国司的副职，而上总国则位于今天日本东部的千叶县，因此平氏一族最终成为了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源氏先祖源仲满则是“摄津国守”。摄津国是大和政府中央直属的“五畿”之一。因此在日后的发展中源氏一度成为了近畿武士的代言人。



日本画家笔下的虾夷人

日本地理上的所谓“关东”和“关西”的划分，大体以本州岛东西部之间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的三处关卡为准。但这一称谓并非亘古相传，其真正盛行始于公元12世纪末期，源氏一族击败平氏，主导大和政权之后。而在此之前，日本国内通行的叫法，是以平安京周围的关西地区为“近畿”，而三关之外的“关东”地区则长期被视为荒蛮之地的“关外”。而自以源、平二氏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崛起，日本的历史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关东”对“近畿”的侵攻。

关东地区对今天的日本而言是首都东京的所在地，堪称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公元12世纪之前，这里却是从“虾夷人”手中夺来的不毛之地。面对着群山环抱之下的有限耕地，以及不适宜水稻种植的水温条件，关东地区的“名主”抱着何等“羡慕妒忌恨”的心态注视着“近畿”的公卿和豪族自然可想而知。

公元939年，平氏一族的平将门率先动员关东八国发动叛乱，“平将门之乱”虽然仅仅持续了3个月便被扑灭，但却揭开了关东武士以武力实现利益诉求的序幕。“平将门之乱”后源氏一族的势力重心转向关东地区，而以伊贺、伊势为中心的平氏则逐渐成为了“近畿”势力的代表。此后尽管平氏曾一度打垮了所有政敌，掌握大和政府的实权，令天皇彻底沦为“橡皮图章”。但是关东武士的不满情绪却始终无法消弭，被流放后世以温泉和歌女闻名的伊豆半岛之上的13岁少年源赖朝随即便成为了他们的旗帜。

由平清盛当权的伊势平氏得以在朝廷内获得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是12世纪以来日趋繁盛的日宋贸易。平清盛当权时的日本，正处于由贵族向武家转变的时刻，使得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而这同中国的局势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平安中前期，大陆还处于盛唐的稳定统治之中，但公元875年黄巢起义之后，东亚大陆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公元894年，日本方面废止了遣唐使。13年后，唐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

同时，朝鲜的新罗王朝分裂，高句丽系的高丽王朝代替了它。而在中国的北方，与日本有着友好关系的渤海国则被东北地区新兴的游牧帝国—辽所灭亡。公元960年，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帝国的将领赵匡胤通过兵变建立宋帝国并统一了全国，新建立的宋朝的农业、手工业都极为发达，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也开展得十分频繁。

日本国内庄园的市场化也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宋朝商人在开展对日贸易前多先

与各大寺社、贵族们交好，而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是这些人所期待的。于是在筥崎宫、香椎宫的神域、仁和寺下辖庄园怡土庄的今津港、肥前的平户、法皇院领之一的神崎荘，以及九州各地沿海庄园都开始了与宋商的贸易，这些庄园中贸易发展迅速者，还成为了聚集着东亚各国商人的贸易大都会，繁荣之景非笔墨可形容。

在此前的11世纪时，藤原明衡曾在其所著的《新猿乐记》中按“本朝”与“唐货”两大类别介绍了当时平安京出售的商品。其中“唐货”有麝香、丁子等香料；白坛、紫坛等建材；苏芳、丹等染料；虎、豹皮、犀牛角、玛瑙等奢侈品及绫罗绸缎等高级织物，而江南的瓷器更是备受尊崇。《中日交通史》中所载：“宋商来日，仍依前代成例，安置于鸿胪馆，供给衣粮。然来者太多，则费用浩繁，不胜应付；故一条天皇时，限定年岁，给以定期来日之护照。”宋商来日之频繁竟致日方 “不胜应付”，可见宋商们对日贸易的重视。而高丽也因将辽国掳去的日人送归日本而加深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贸易也得以进一步展开。

但此时战乱却又一次降临在大陆之上：公元1115年，臣服于辽国的女真族向辽国宣战，大败辽军后建立了金国。为了彻底消灭辽国，金国与宋建立了盟约，共同消灭了辽国。但在辽国灭亡后，金国又开始打起了宋的主意，于公元1127年攻破宋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宋朝灭亡。但宋帝国残余的皇族成员逃至南方，再次建国，史称南宋。



伴随着宋日贸易而崛起的平清盛

大陆形势的这种变化，直接造成了日宋贸易的兴起。由于南宋不堪金国的进攻，每年都要支付大笔战争赔款，宋朝所需要的正是日本丰富的黄金、珍珠等贵重物品，而南宋又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中立贸易国之一。并且由于日本上层贵族长期受到盛唐时期奢华风气的影响，对“唐货”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双方贸易的兴起可以说是必然的。

在日宋贸易兴起的浪潮下，一个新势力正在一步步攀上政权的顶峰，它就是桓武平氏的支系——伊势平氏。而伊势平氏的兴起，是自平正盛时开始的。平正盛所处的时期，正是源氏赖义、义家父子经前9年、后3年之役后的得势之时。深感势微的平正盛便投身于源义家处，并娶了源义家的孙女。源义家虽为俊杰，但其子源义亲却是骄奢嗜杀之徒，在封地对马无故杀害领民，百姓怨声载道。源义亲的暴行为朝廷所知，被流放至隐岐。但在源义家故去后逃至出云，并杀死了当地目代，朝廷大惊之下视源义亲为朝敌，并派身为出云邻国因幡国守的平正盛前往讨伐。

平正盛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令，很快便将源义亲的首级送到了京都，从此平正盛博得了白河上皇的器重，很快擢升备前守、赞岐守。平正盛在本州岛西部地区期间，一方面通过取悦皇室提高平家的声望，另一方面还构建了与当地武士的主从关系。尤其是通过追剿海贼使其臣服于平氏，为其后平氏的兴隆铺下了奠基石。

平正盛之后，嫡子平忠盛在其基础上开始扩大对海权的控制力度。公元1129年，时任备前守的平忠盛被任命为山阳、南海两道“海贼追捕使”，在征剿海贼的过程中，平忠盛对濑户内海的控制也逐渐加强，随着“海贼集团”对平忠盛的臣服，整个濑户内海，包括九州及本领伊势湾的制海权全部落入平家的掌握之中，说此时的平家为日本的 “海上领主”，亦不为过。

平忠盛在征剿海贼后成为了鸟羽上皇的近臣，受封为院司，负责法皇在九州的直辖庄园神崎庄的管理。神崎庄临近博多，时常有宋船来往交易，当时博多一带的贸易商品均由太宰府长官负责统一管理，初设此制度时长官还可忠于职守，而在平忠盛前来时，太宰府的长官们已将管理各地的贸易货物的权力当作了获利的大好时机。据《长秋记》记载，忠盛为了不让太宰府的官员们在贸易中分羹，便假传上皇“宋船至院领的贸易与太宰府无关”的旨意将来查看交易货物的太宰府官员赶了回去。当时平忠盛尚在京都，仍如此关心九州的宋船，其对贸易的热忱可见一斑。而对贸易货物的独占也使法皇获利不小，加上忠盛又为上皇修建了得长寿寺，于是上皇破例给予武士出身的平忠盛“殿上人”身份，平氏一族踏上政治舞台的历程从此开始。

公元1153年，平忠盛去世，嫡子平清盛继承其官位，也继承了自平正盛开始的对本州西部的经营。在通过保元、平治两次动乱后，平清盛将源氏族人大多排挤出朝廷，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并与法皇建立了姻亲关系。在与朝廷建立良好关系后，平清盛便可以放手开展对宋贸易了。平清盛为了尽可能大地扩大贸易交往，废

除了此前日方规定的禁止日商出海至外国贸易的规定，且对出海贸易的日商给予奖励，这样的做法激起了日商的积极性，贸易度更为扩大，此时已作为国际通货标准的宋钱也大量流入日本，每次往返的宋船均能带回数百万枚宋钱。出海的日商大多前往明、泉二州进行交易，亦极受欢迎。日商所携交易之物，据《宝庆四明志》所载有以下数种—细色：金子、沙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硫磺、螺头、合蕈（即香菇）、杉板、罗板。其中光黄金每年最多输出量便有四五千两。

虽然日宋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平清盛远不满足于此。为了使宋商深入自己的根据地濑户内海进行交易，平清盛在公元1167年出家并辞去太政大臣之职，前往福原建立别庄，并修筑了适合宋朝大型船只停泊的大轮田泊，如此一来宋商便可经博多入濑户内海再直抵福原进行贸易。这对于平氏来说是极大的财富来源，在其建立的很短时间内平家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平清盛不光是要通过福原来增加平氏一族的财力，他还要将福原变成世界级的贸易大港，进而将整个日本变为以海为中心、通过海洋与世界交流的贸易帝国。为了保护过往船只安全和平家的万事荣华，清盛还组织修建了严岛神社（供奉平家氏神的神社）与经岛（福原的防护堤）。

为了实现其梦想，平清盛还将首都迁至福原，强行将安德天皇及皇族公卿们带至新都。但在守旧派的极力反对下，不到半年又重新将都城迁回平安京。而平氏一族对财富的过量敛取也使贵族和地方武士们感到不满，平氏政权的根基开始有了不稳定因素的存在。随后由于关东源赖朝的起兵和平清盛本人的死去，平氏一族迅速失势，源氏再度返回政治舞台，并建立了镰仓幕府。但幕府对于对外贸易的态度同平清盛相似，使得日宋贸易得以进一步的繁荣。

公元1180年8月，利用平氏与公卿势力内讧的机会，源赖朝在岳父北条时政的支持下举兵西进。尽管源赖朝一路走得磕磕绊绊，但是在关东大小武士集团的热情支持下，公元1192年源赖朝还是最终一统全国，如愿以偿地出任已经异化为全国武士领袖的“征夷大将军”。而其位于今神奈川县镰仓的“幕府”也随即取代了“平安京”成为了主导日本列岛的政治中枢。

被称为“镰仓时代”的幕府统治最大的特点，便是武士阶层对国家经济无可置疑的支配权。忠于幕府将军的武士以“御家人”的身份出任“守护”和“地头”，开始接受各“国”的军事、警备、征税和土地管理权。但必须指出的是，镰仓幕府无非是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已，因此不仅在法统上“幕府将军”依旧是天皇的臣僚，甚至在各地任命“守护”和“地头”的问题上也必须权衡当地豪族的权益，向与镰仓幕府貌合神离的豪族—“非御家人”让渡部分权力。

原有关东武士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各地豪族此起彼伏的挑战，最终令“镰仓时代”自公元1199年其创始人源赖朝死后，便陷入了持久的动荡和战乱之中。尽管其遗孀北条政子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六亲不认的精神，杀亲子，逐老父，流放了后鸟羽天皇尊成，算是勉强维持了镰仓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但北条氏族终究没有源、平二氏那样高贵的血统和辉煌的家谱，与关东豪族的对立，令北条氏不敢染指“征夷大将军”一职，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镰仓幕府 “六波罗探提”的身份掌握全局。

六波罗位于平安京的东郊，北条氏常驻京都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就近监视历任天皇，另一方面也有重新倚重关西武士对抗关东的意味。最终来自关东更为偏僻的下野国（今栃木县）的源氏后裔足利尊氏趁北条氏和天皇势力的内斗之际，于关东起兵。在“关东”艳羡“近畿”的不满中，源、平两族对立、交锋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日本列岛上演着。

据说第2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死后葬于山城国宇治郡（今京都府宇治市）的栗栖寺内，这座名为“将军冢”的坟墓，有一个令人畏惧的传说：每当日本国内有大变故时，“将军冢”便发出异响。在向来迷信的日本人眼中，日本中世纪连年的内战和杀戮，就如同天皇家族的诸多不幸一样，背后似乎充斥着鬼神作祟。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益分配的不均、世袭政治的泛滥才是最终令地狭民稠的日本只能在内战中陷入纷争轮回的因果。

日本武士并非天性黩武好斗，而是残酷现实逼迫着他们从关东谷底杀入富饶的近畿京都。大和民族也绝无所谓“好学”的基因，而是在这片土地之上，早已固化的阶层，令普通民众对任何外来事物都充满着功利的好奇。声名和荣誉在列岛之上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家族唯一无法剥夺的财富，更是胜利后参与分红的“股权证明”。而在各地土豪与幕府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难免会有人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之上。但不得不承认，在东亚大陆经历盛唐到明、清的频繁政权兴替的同时，真正看得上日本列岛的外来政权并不多。

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能支持大规模的跨海远征外，用曾出使日本并滞留“岁余”的蒙元帝国外交官赵良弼的话或可作为参考—“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赵良弼的这番话是说给雄心勃勃想要远征日本的元世祖忽必烈听的，作为少数几个敢于吃螃蟹的马上皇帝，忽必烈对日本还是饶有兴趣的。但硬要说忽必烈一开始便打算征服日本列岛，但却也未必属实。在征服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过程中，忽必烈长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并未多加留意。只是在征服高丽的过程中从当地人赵彝的口中得知：“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才出于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功业的心理，从而屡次遣使日本，以投递国书。对于雄踞东亚的强大邻国，日本列岛的各路势力不免都有“挟洋自重”的冲动。而把持镰仓幕府的北条家族深知自己的得位不正，因此在外交事务中格外保守。得知蒙古帝国发来国书，北条家族的第七代执政北条政村吓得连忙将执权之位让给后进晚辈北条时宗。

被日本史学家粉饰为“抗元英雄”的北条时宗时年不过18岁，这个年纪的愣头青大多不知轻重。加上宗室内管理日本列岛西部地区的北条时辅等人也对北条时宗有所不满。因此北条时宗难免动了借刀杀人的想法。在忽必烈递交国书之后，日本天皇系统的公卿虽然写好回书，但却被镰仓幕府否决。公元1270年末，针对日本多次不予答复的“傲慢”行径，忽必烈下令高丽王国境内的驻军进入战备“以为进取之计”。同时派出职业外交官—女真人赵良弼前往日本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



日本武家政治的始祖—源赖朝

赵良弼出使日本的过程从中国的史料上看似乎颇为凶险。北九州当地豪强少贰资能先是“以兵环之，灭烛大噪”。第二天又“陈兵四山”。在问清楚赵良弼的来意之后，少贰资能表示“愧服”之余，随即就要求赵良弼将蒙古帝国的国书交给他。这种不合外交常理的做法自然不能为赵良弼所接受。于是以“必见汝国王，始授之”的名义拒绝了。



被美化的北条时宗

少贰资能倒也没有为难他，只是将蒙古帝国的代表团继续滞留在太宰府地区。过了几天再度前来求要国书，理由是“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少贰资能的说法，并非全无法律依据，自被盛唐帝国在白村江口击败之后，日本政府的确有相关的规定。但赵良弼倒也老实，随即回答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在赵良弼和少贰资能的讨价还价之中，少贰资能无意间说出了一句话“大将军以兵10万来求书”，从中文的史料中看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但结合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也可以说是少贰资能的感叹。少贰氏本是镰仓幕府的政敌平氏一族的同盟。虽然在镰仓幕府建立之初便卖身投靠，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只是由

于镰仓幕府长期的内斗才捞到了镇西奉行的官职，随后在压制众多地头蛇之后才将九州岛北部地区包括对马、壹岐两岛划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蒙元帝国两次征日地图

到少贰景资的时代借由太宰府拥有的对外权限，少贰氏大力推行贸易通商，并展开和中国、朝鲜的局部外交，攫取丰厚的利益。俨然一副“九州岛霸主”的气势。不过树大招风，被镰仓幕府盯上后少贰氏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上有镰仓幕府和管理日本关西地区的六波罗探提，下有贼心不死的菊池氏等地方土豪，因此少贰资能难免有直接与蒙古帝国建立外交联系，挟洋自重的打算。从最低层面考量也必须将蒙古使节团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以获得与镰仓幕府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少贰景资对赵良弼代表团的种种安排，与其说是武力威胁还不如说是保护。赵良弼和少贰资能最终交涉的结果是代表团不能前往京都。但是少贰景资派弥四郎等12名使节跟随赵良弼前往大都。不过此时被激怒了的忽必烈在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少贰资能恐怕只能感叹“卖国无门”了。

多次外交接触均被对方莫名其妙地拒绝了之后，忽必烈决定以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公元1274年，由高丽王国建造的三百艘“可载四千石者”的大型战舰基本完工。而蒙古帝国的高丽籍将领洪茶丘又接受了限期完成“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的任务。当年农历十月，由蒙古将领忻都、高丽籍将领洪茶丘和汉族将领刘复亨指挥的三万“蒙古—高丽”联合远征军从合浦（今韩国镇海湾

马山浦附近）出发，首先进攻对马、壹岐二岛。

而也就在蒙古大军兵临城下之际，镰仓幕府内部的纷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北条时宗先于公元1272年处决了自己家族内部政见不和的日本西部地区负责人—六波罗探提“南方别当”北条时辅以及家族议会成员—北条时章、北条教时。就在蒙古大军出发前后，北条时宗又将长期批评镰仓幕府的日莲和尚予以流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年轻的北条时宗迫切需要一场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权。因此，北条时宗不仅没有缓和局势的打算，相反任命亲信藤原经资为“镇西奉行”，统率九州、关西地区的地方土豪全力备战。

在镰仓幕府的强力威压之下，日本九州地区的当地土豪家族不得不纷纷出兵。其中少贰氏、大友氏和岛津氏是九州地区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然是为巩固自身的地盘而战，而处于第2梯队的菊池氏和秋月氏则希望利用对抗蒙古入侵的机会提升自己在镰仓幕府中的地位，因此也全力出兵。而早在战前北条时宗便以“异国警备番役”的名义将大批镰仓幕府骨干力量—“御家人”派往九州地区。一时之间聚集在北九州地区的日本军队据说竟达10万之众。不过这支“土豪联军”在蒙古大军正式登陆之前始终处于观望状态，以至于对马、壹岐二岛的土豪家族—宗助国和平景高只能带着自己手下的一百人左右的部队发动自杀式的冲锋。此后九州西北部地区的“海盗世家”—松浦氏也遭到了蒙古远征军毁灭性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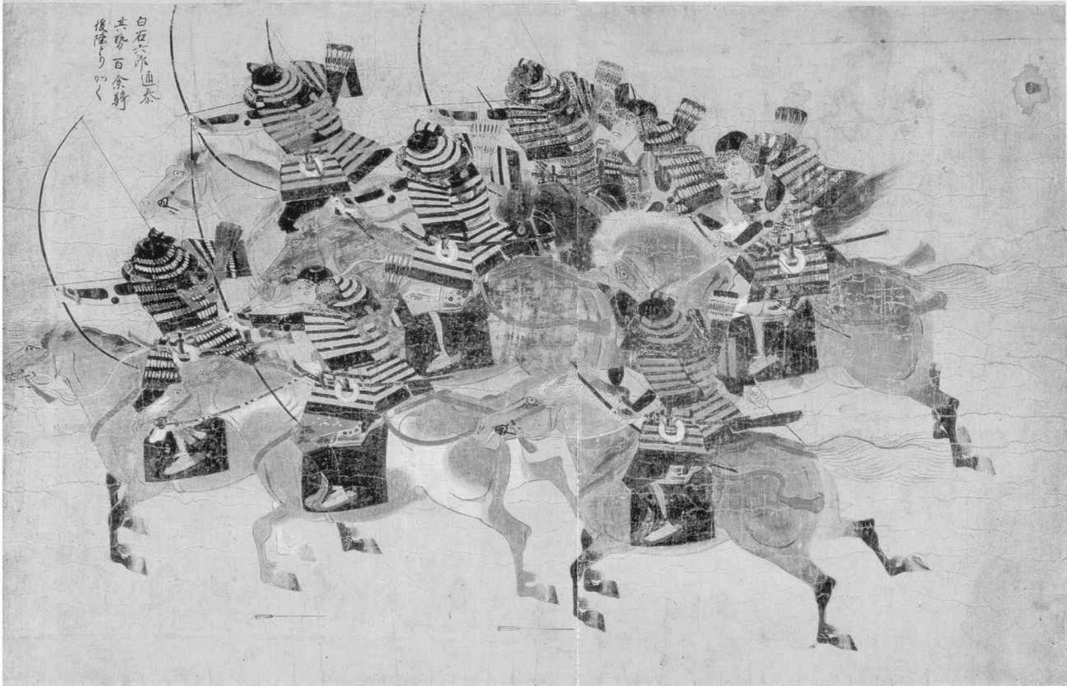


被北条氏流放的异见人士日莲和尚

根据被北条时宗流放的日莲和尚的记述：“（对马、壹岐）二岛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被集于一处，用绳索穿手掌而过，锁于船舷之上。肥前国松浦一党，遭遇与此二岛百姓相同。”不过日莲和尚之所以大肆宣扬蒙古远征的屠杀，并不是出于悲天悯人或者杀身报国的思想，而是为他本人的宗教势力张目：“敌国贼寇之所以会入侵日本，是因国人信奉异端所招致的业报。”不过这种宣传无形之中倒也提升了九州岛“土豪联军”保家卫国的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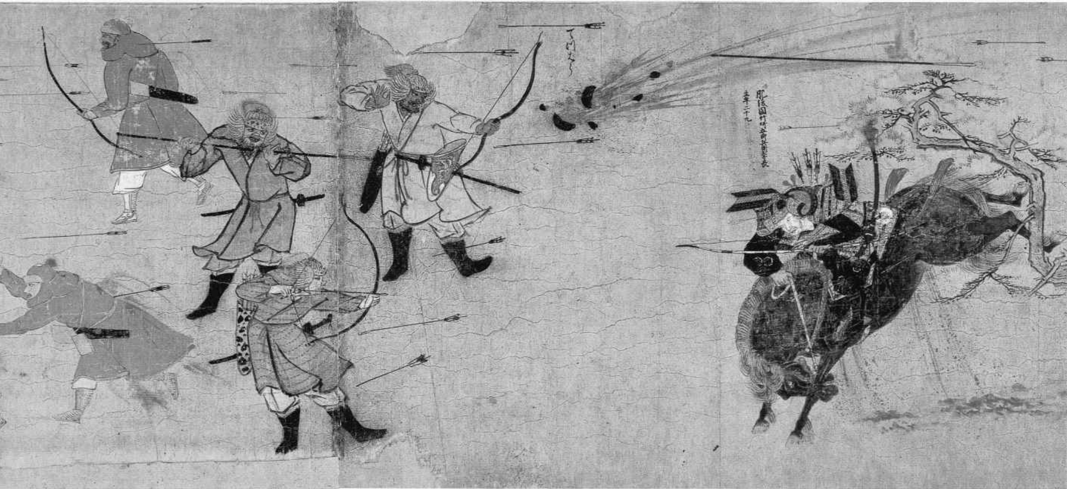
公元1274年农历十月十九日，蒙古远征军在博多湾展开登陆。不过最有利于“击敌于半渡”的海滩防线却只有海盗松浦氏的余党以及当地土豪原田氏的部队。好在蒙古远征军发现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之后便退回了海上。给了九州岛“土豪联军”一天的准备时间，“镇西奉行”藤原经资匆忙调集了数万大军赶到博多湾展开布防。虽然是有备而战，但是在名为“百道原”的正面战场之上，九州岛“土豪联军”却依旧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毕竟藤原经资虽然是镰仓幕府的特派员，但是当地的土豪少贰氏、大友氏官职也是“镇西奉行”。无奈之下藤原经资只能将“给我冲”改为了“跟我上”，带着五百名精锐骑兵带头冲锋。

日本虽然国内颇多战事，在其史料之中也不乏动辄“十万大军”的集团会战。但是从战场的表现来看其军队组织、武器装备都与亚洲大陆存在着代差。日本后世虽然以名刀著称于世，但两军对阵首先发挥作用的还是投射武器，而日本军队大量准备的缠藤弓虽然体积巨大但是射程却很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因此无论是射程还是射速都完全被蒙古军队短弓和更为先进的火药武器所压制。为了挽回颜面，日本方面只能在史料中鼓吹“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即中毒。”指责对手不厚道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为悲剧的是日本骑兵的战马连“击鼓鸣锣，杀声震天”的场面都没见过，随即“惊恐不安，跳跃打转”。



以家族为单位发起冲锋的日本武士

公元1274年的蒙日战争，在日本史料之中又被称为“文永之役”，日本方面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述颇多。其中除了抱怨兵器不如人之外，更多的则是吹嘘日本军队奉行“武士道”采取“一骑讨”的小集团冲锋，才被“不讲道义”的蒙古野蛮人所击败的。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说没有，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日本方面各自都怀着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便在藤原经资带头突击的情况下，土豪们也只是以家族为单位发动进攻，其结果自然只能艳羡对方“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的高明战术，以及前所未见的火药武器“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辨东西”。在战术指挥下，蒙古帝国远征军也表现出日本土豪们所不具备的大局观，在第一天尝试登陆发现百道原当地的地形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之后，第二天的战斗之中蒙古军队事实上是兵分两路，除了正面进攻之外还分兵于博多箱崎成功登陆，击败守军，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突袭在百道原同元军作战的日军。



蒙古军先进的火药武器

日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余部向太宰府水城（名为防御工事的巨大水坝）方向撤退。不过在败退的过程中，日本“土豪联军”中长期受少贰氏压制的菊池氏却主动承担断后的任务。这倒不是菊池氏高风亮节，而是长期在镰仓幕府中坐冷板凳的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战功。眼前政敌如此卖力，身为前线指挥官的少贰氏少主——少贰景资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在侥幸俘虏的几个蒙古士兵口中得知蒙古远征军的汉族将领刘复亨中箭受伤，随即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头上。实在令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砍了几个不明来路人头的菊池重基“泪流满面”。

以百里道为中心的蒙日双方会战中双方都没有留下具体的伤亡数字。但从战局发展来看，蒙古远征军虽然是胜利者，却也无法在缺乏后援的情况下继续这样消耗下去。因此自认兵力不占优势的主帅忻都以“孙子云，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我军疲敝，而敌军日增。如今之计，莫如走为上”为名拒绝了同僚“我军已深入敌境，士气斗志高涨，应仿孟明焚船，韩信背水之故事，与敌再度决战”的请求，在成功登陆之后主动撤军，随后又将船队开回了朝鲜半岛。不过由于在途中遭遇暴雨暗礁，最终令蒙古军队在海上遭遇的损失远多于战场之上。

这次战争的结果，蒙古和日本方面都作出了有利己方的解释。镰仓幕府根据前方自吹法螺的战报认为蒙元帝国的大军是被“击退”了，于是朝野大喜若狂，而沦为政治傀儡的“龟山天皇”恒仁，虽然一度在蒙古袭来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世仁（后宇多天皇）。此时却也以太上皇的身份巡回全国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

祈祷，争取“出镜率”。北条时宗则以蒙古军队可能的报复为由下达了所谓的“异国征伐令”，以“反攻大陆”为名继续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忽必烈在得到了忻都“入其国败之”的报告之后，认为武力惩戒日本的目标已经达到，随即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正式建交。

作为外交大臣出使的杜世忠其景遇有些类似于被南宋方面囚禁的郝经，他自作聪明地吸取了赵良弼出使的经验绕过了大宰府，直抵日本本州岛的长门—室津港。但长门国守长期由镰仓幕府的亲信—“政所执事”二阶堂一系兼任，杜世忠选择在长门地区登陆，正可谓是“自寻死路”。

如果杜世忠抵达大宰府，那么在战争中吃尽了苦头的少贰氏和其他九州岛的土豪很可能在了解蒙古帝国的真实意图之后，改变与之对抗的政策。也正是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北条时宗在得到此消息后，急切地命令立刻将杜世忠一行送到镰仓。北条时宗与杜世忠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后世没有留下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对于蒙古帝国写给政治傀儡—天皇的国书自然是北条时宗没有资格也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对于日本历代幕府而言，天皇直接与其他国家发生接触都是危险的信号。北条时宗最终的选择，是将杜世忠一行30余人处斩于镰仓龙口。后世日本认为这是为了显示武士的气概和不屈精神。但事实上北条时宗不仅违背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外交惯例，更处死了所有蒙古使节，根本没有将自己拒绝与蒙古帝国建交的信号传递给对手，忽必烈在杜世忠被杀之后事实上长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杜世忠死时年仅34岁，作为一名蒙古族人他的汉学水平似乎不低，杜世忠临死前赋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他的死与其说是北条时宗自信和豪迈的表现，不如说是镰仓幕府绑架整个日本的信号。

北条时宗虽然在蒙古军队撤退之后便以远征朝鲜半岛为由，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65岁以下的男子加入预备役部队，甚至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但事实上北条时宗根本无心远征，所谓“远征”无非是为了将所有这些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在九州岛北部的博多湾沿岸构筑漫长的“元寇防垒”工作中去的借口而已。

这种大型国防工事耗资巨大但实际效果却未必理想。因为北条时宗本人也不敢肯定元帝国一定会继续在九州岛北部发动进攻。因此他随即下令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北条时宗还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率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御家人”，防卫本州岛西部。与此同时，增派北条实政去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



镰仓幕府耗尽国力修筑的“元寇防垒”其实不过是一道围墙

公元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广东崖山灭亡，这时的忽必烈才注意到杜世忠等人尚无消息。此时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在征得忽必烈同意之后，范文虎派出自己的私人使节。不过忽必烈此时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他命令高丽王国再次造舰900艘，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10万人，战船3500艘，组成江南军。为了集中领导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而为了准备这场庞大的远征，元帝国不得不再度大量征召汉族士兵，忽必烈为此还下达了严格的征兵条令：“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

公元1279年农历八月，范文虎派往日本的周福、栾忠使团被杀于大宰府。元帝国大军随即兵分两路征讨日本。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指挥。公元1281年，忽必烈在大都召开军事会议，任命宿将阿剌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公元1280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垦之用。而对于参战诸将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显然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和，但却没有加以处置，这是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北条时宗在公元1280年农历十二月也发出了要求各地土豪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号召：“镇西警固事，蒙古异贼等明年四月可袭来云，近年守护御家人多

以不和之间，无同心仪之由不顾天下大难，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军兵者，随守护之命，可致防战之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处不忠之重科。”不过此时西起今津，东至箱崎，高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十余公里的“元寇防垒”终于建造完成了，处于守势的日本方面似乎又多了一成胜算。

首先抵达战场的是忻都统率的东路军。在再度顺利地夺取了对马岛之后。元帝国远征军东路军随即抵达了会师地点—隐岐岛。不过忻都自诩对九州岛北部的地形已经颇为熟悉了，又轻视日本“土豪联军”的战斗力，于是在没有等待江南军会师的情况之下，再度从博多湾强行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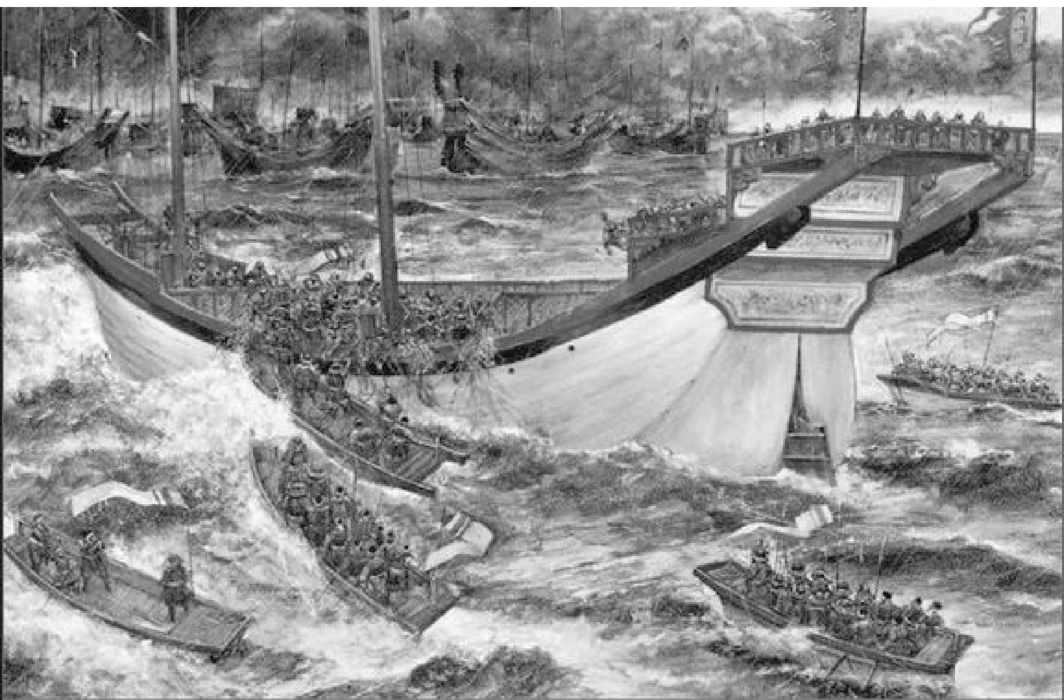
而为了阻止日本各地可能的增援，忻都还派出一支偏师，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当地的守军。忻都本人没有想到，他分兵长门的举动在日本国内随即引起了空前的恐慌。战争期间民心不稳，舆论惊慌本是常态。因此随着元帝国舰队出现在长门海域，“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的谣言迅速传开。

在各种抢购风潮之下，日本本土很快出现了“市中无米，民有饥色”的情况。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世仁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他老爸“龟山上皇”恒仁更是除了在清水神社祈祷，还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辞：愿以身代国难。一向自诩镇定的北条时宗也不遑多让。在和尚祖元要求他“发挥勇武精神，血书大经”的情况下，当即“刺指血书经卷”。



元世祖忽必烈

元军在博多湾强行登陆中，北条时宗耗费国力建造的“元寇防垒”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元帝国军队在经过侦察之后，随即发现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倒是九州当地的“土豪联军”吸取了上一次被动挨打的教训，首先对元帝国远征军的锚地采取了海盗式的夜袭。被日本史料描绘成孤胆英雄的草野经永本来就是海盗松浦家族的部下。他带回了21个所谓“元军”的首级，一时间其他人纷纷效仿。但随着元帝国远征军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反而伤亡巨大。日本“土豪联军”在博多湾前线的兵力有4万左右，基本与元帝国东路军相当。而其后方还有不下6万的增援部队随时可以参战。



偷袭蒙古战舰的日本武士

元帝国军在志贺岛成功登陆，却受制于当地狭小的地形，始终只能以“添油”的模式投入小股部队，因此进展颇不顺利。而大部分部队长期滞留船上生活，蔬菜、饮水供应困难，使得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一度是战斗减员的3倍以上。东路军孤

军深入的同时，元帝国的江南军却因为两路军统帅阿剌罕病故而衍期后至。直到公元1280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在候补司令阿塔海迟迟没有赶到的情况才从明州出发。直到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才抵达会师地点。此时元帝国远征军才真正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就在元帝国大军准备进攻大宰府之时，海面上却出现了台风到来的种种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可惜元帝国的高层领导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最终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遭遇台风袭击的蒙元舰队

一般认为，元帝国远征军在台风天灾中几乎全军覆没。不过事实上虽然台风过后出现“无数死尸随潮汐入海湾，拥塞成道，人马可践踏而行”的惨状，但由于江南军的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在觉察到台风抵达的先兆时，便下令夜里停泊时战舰各去50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便即乘船各处搭救同僚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正是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



群龙无首被最终歼灭的蒙元残兵

但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4000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4000军卒回国。从结果来看，参战的东路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2.7万余人，台风后归国者仍有1.9万余人，损失7000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少。而江南军总兵力10万人，台风过后还有半数也仍有5万左右。由此可见，导致元帝国第2次东征日本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一年之后，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3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农历八月七日，日本方面在确认元帝国主力撤走之后，才出兵乘船搜捕。一般认为这3万元帝国远征全部成为了俘虏，但从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中仅俘虏几千人的情况来看，这批孤军应该是大部分在奋战中牺牲了，而被俘的人员中陆续逃回的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人也不在少数。

范文虎等回到大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历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还乡里。"范文虎和忻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到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同时以在合浦把军队散还乡里为借口，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

这样的举措一度骗过了忽必烈，竟然还得到了赏赐。一年之后，莫青等人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大小将领，全部罢免。好在征东行省左丞——忽必烈的女婿高丽国王王椹站出来指出"罪在元帅"，主动承担责任。忽必烈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随即连元帅都不问罪了。范文虎以"立功自赎"，在一年之后"练兵治械于扬州"，准备第3次出征日本。

侥幸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远征军令日本朝野上下一片欢腾。近乎奇迹的"胜利"更令日本从此自信心空前膨胀，此后经常作出一些螳臂当车的举动。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附会说："北条时宗可以击败北面来的元军，那么东条英机也能打败东面来的美军。"事实上在利用强邻来绑架自己祖国实现个人野心的问题上，北条时宗的镰仓幕府和东条英机时代的日本军部倒是别无二致。

第一章　不征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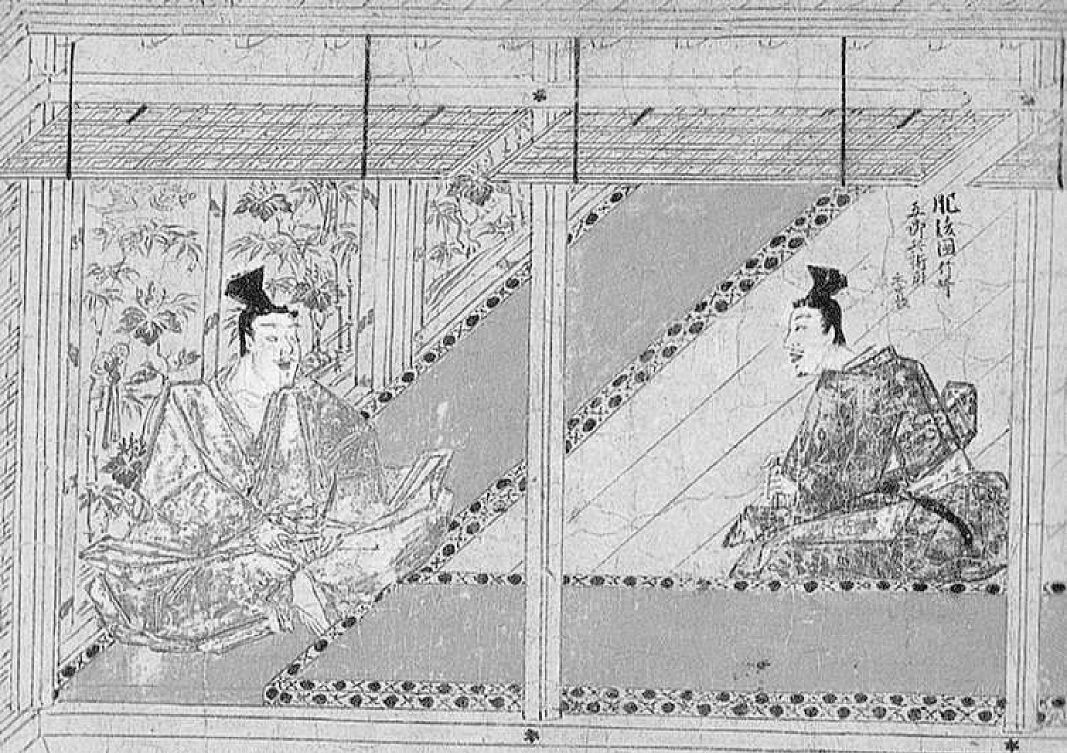
天皇倒幕

——后醍醐天皇的野心和镰仓幕府的终结

北条时宗虽然成功抵御了自己挑起的与元帝国之战，但是这场战争却也耗尽了镰仓幕府的财力和人品。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句看似粗俗的话语实则道出了战争的真谛。一方面不事生产的庞大军队无疑是拖累国家财政的“吞金兽”，另一方面除了“当兵吃饷”之外，刀头舔血的军人们也难免会产生“大捞一把”的预期。但与这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公元1281年“弘安之役”后的镰仓幕府的尴尬现状。日本武士尽管击败了强大的对手，但若渡海展开反攻却是万万不敢的。于是那些盼望着可以在战后获得赏赐甚至进入朝鲜半岛殖民的各地土豪，在只得到了镰仓幕府象征性的褒奖之后，就又被要求出钱、出粮准备应对元帝国的第3次入侵，其心中的不爽是可想而知的。

其中九州地区的少贰氏、大友氏、菊池氏三家在与元帝国作战中出力最多，但所获却寥寥。其中菊池氏也只得到幕府赏赐的一些甲胄。而恰逢此时，北条时宗于公元1284年便以34岁的壮年去世了。重臣平赖纲随即向北条时宗的岳父安达泰盛发难，史称“霜月骚动”。“霜月骚动”表面上看不过是又一场幕府内斗，但本质上却大有不同。北条氏长期越俎代庖掌控镰仓幕府，形成了有别于之前“幕府将军—御家人”的全新组织架构—即以北条氏为核心的“得宗”，以北条氏家臣“御内人”为爪牙的“执权政治”。

对于大权旁落的局面，跟随源氏一族鞍前马后的“御家人”自然不满。但在“蒙古袭来”之前，“御家人”的反乱虽然此起彼伏，但基本上北条氏还能勉强维持“御家人”和“御内人”两系间的微妙平衡。在北条时宗私邸—山内殿所展开的关门会议——“寄合”中，列席的除了北条时宗的亲信佐藤业连和书记太田康有之外，便是分别代表“御家人”势力的安达泰盛和代表“御内人”势力的平赖纲。



《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安达泰盛

这种微弱的平衡最终还是被蒙元帝国远征军所带来的“神风”无情地吹垮了。而此时北条时宗的突然去世无疑是打响了双方全面武斗的“发令枪”。蒙元帝国随时可能再度来袭的巨大阴影，令北条氏对日本列岛西部地区的豪族充满了不信任。之前，北条时宗借口战备之名，将九州岛和本州西部的山阴、山阳各地守护替换成了出身北条氏的亲信。“御家人”和“御内人”不免要争个头破血流。

安达泰盛主张一系列改善和保障“御家人”生活的改革，史称“弘安德政”，而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况下，这种只在如何分蛋糕问题上下功夫的改革，最终只能是牺牲另一阶层的利益。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御内人”和在战争期间向“御家人”提供信贷的大商贾们。以安达氏为首的“御家人”，以战功为资本在全国各地挤走“御内人”出任实职的同时，战时“御家人”典当和出卖给商人的土地也被要求“无偿回复”。

安达泰盛所推行的“弘安德政”，从大局上来看还是出于维护镰仓幕府统治的目的。但是他本人出任向来由北条一门世袭的陆奥国守一职，为自己的爱子安达盛

宗、安达宗景谋求了肥后国守代和秋田城介的职位却不免引人非议。公元1285年农历十一月，平赖纲先发制人，他以北条时宗继承人北条贞时的名义调动武装部队，首先奇袭了身在镰仓的安达泰盛一族。在激烈的火并中，不仅安达氏一族被杀了个干净，平赖纲顺手还干掉了二阶堂行景、武藤景泰、大江泰广等其他一干幕府元老。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政敌的打压。而在平赖纲“政治清洗”中倒下的众多名门大姓之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被勒令剖腹自尽的足利家时。

“足利”本是一处位于下野国（今栃木县）的庄园名。源氏在征讨虾夷的战争中，在关东获得了诸多封地，其子嗣遂以封地之名分化出新田、足利两个分支。而在追随本家源赖朝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足利氏二代当家足利义兼不仅战功卓著。还颇有远见地迎娶了源赖朝的小姨子——北条时子，从而与源赖朝身后权势滔天的北条氏世代联姻，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可谓是风生水起，仅其子嗣分封便演化出后世著名的吉良、今川等19个姓氏，其势力逐步遍及近畿和关东地区。

北条氏自然也注意到了足利家日益尾大不掉的态势，之前便借口其第四代当家足利泰氏的擅自出家对其处以没收部分封地的惩处。而在“霜月骚动”之后，大权在握的平赖纲更以有参与谋反之嫌，勒令兼任三河、上总两国守护的足利家第六代当家足利家时自尽。足利家毕竟与北条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势力盘根错节，“霜月骚动”之后的平赖纲尽管“诸人恐惧”、风头无两，却也不敢贸然去扳倒足利氏这棵大树。于是足利家时之子足利贞氏不仅没有受到株连，还得以继承了三河、上总两国地盘。但和诸多在“霜月骚动”倒霉的“御家人”一样，痛失亲长的足利贞氏不可能再对北条氏忠心耿耿，在表面的雌伏隐忍背后是一片磨刀霍霍。



混乱而迷茫—镰仓幕府末期的武家写照

作为幕府内斗的胜利者，平赖纲在横行了7年之后，最终被不满大权旁落的北条贞时借“关东大地震”之机起兵诛杀。发生在公元1293年的这次地震，不仅震级达到了7.1级，更由于震源为相模的陆地浅层，因此破坏力格外巨大。因此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均可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相提并论。北条贞时何以选择地震次日发动政变，世人众说纷纭。仇恨平赖纲的“御家人”纷纷传说“大地震”是平赖纲的胡作非为所招来的“天罚”。而史学家则更倾向于北条贞时是看准了地震灾害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平赖纲焦头烂额之际将其“一刀拿下”。

在一举处决了平赖纲及其亲属92人的“平禅门之乱”之后，北条贞时也一度效仿安达泰盛，于公元1295年颁布所谓的“永仁德政”，要求全国各地商贾无偿归还御家人出卖或典当的土地。但“忠诚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经过了两次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北条氏已经无力再赢回“御家人”的忠诚。越来越多武士阶层在对镰仓幕府的不满和反感中，开始积蓄力量准备“取而代之”。无论是盘踞北九州的少贰氏，还是

在近畿和关东均有强大势力的足利氏均有推翻镰仓幕府的野心。但是面对出任日本列岛半数以上（38国）守护的北条氏，他们依旧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打响“武装倒幕”第一枪的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楠木正成头上。



楠木正成像

楠木正成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主要还是由于其对天皇家族的“忠心耿耿”。公元1331年，“后醍醐天皇”尊治中了东亚大陆传来的“宋学”之毒，竟然妄图改变天皇长期只是傀儡的现实，决定发动“倒幕”运动。“天皇造反”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每每计划倒幕的集会最终都变成了“彻夜酒宴，狂欢作乐”的大派对，后世记录这段历史的《太平记》为之粉饰，说这种“无礼讲”是为了掩幕府耳目，但却无法解释参加这种集会的公卿往往主动向幕府告密的事实。连续两次被出卖之后，后醍醐天皇终于对那帮近臣失去了信心。男扮女装逃入京都附近的笠置山中，以弥勒寺为行宫，向天下豪族号召“起兵倒幕”。但是对于后醍醐天皇“正义”的召唤，长期与天皇一系共同进退的寺院力量表面上都装聋作哑，其他豪族的态度可想而知。倒是盘踞金刚山一带的“恶党”头目楠木正成主动跑来投效。

在日本这个讲究出身和血统的国度，楠木正成这种“军神”岂能不“根红苗正”。于是史家大笔一挥，把他写成了奈良时代的皇族公卿橘诸兄的后裔。由于这个说法实在太过失实，于是“有良心的”日本史学家又将楠木正成修正为出身关东武藏国的武家后裔。但不管怎么附会，楠木家族在正成出生之前默默无闻却是不争的事实。

两次“蒙元来袭”之后，许多正儿八经的“御家人”都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中，不堪忍受变本加厉压榨的自耕农们，从起初逃亡最终走向了联合反抗的道路。这些自发行为由于得到了“非御家人”的武士加入而形成了名为“恶党”的武装组织。看着“恶党”们逍遥自在的生活，许多“御家人”也纷纷效仿，最终甚至连各国的守护也选择默认其存在，甚至招入自己的麾下。



日本画家笔下逃亡中的后醍醐天皇

楠木正成虽然以“恶党”之名流传后世，但细究之下却不难发现，楠木家族其实与寺院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楠木家世代与河内国桧尾山的观心寺交好，楠木正成的曾祖父楠木成氏甚至是该寺重建的出资人之一。而楠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水银，主要的消费客户也是寺院—用于佛像的镀金和描红。因此楠木正成8岁之后便得以进入观心寺寄居学习。封建时代的寺院向来是失意政客的避难所，因此在观心寺中楠木正成得到钻研“宋学”的泷觉和尚以及来自加贺的大江时传授儒学和兵法。

公元1331年农历九月三日，楠木正成抵达了后醍醐天皇的“倒幕司令部”—笠置山。对于他的出现，后世的小说中极尽铺垫之能事，说后醍醐天皇梦到自己南坐在一棵大树之下感叹“普天之下，无处容身。唯此座可以坐也！”而庙里的和尚随即将此梦解为“木傍南楠”，是对应在楠木正成的身上。留下了所谓“紫晨庭树南枝梦，占得中兴第一功”的佳话。撇去这些所谓的“天命祥瑞”之说，楠木正成出现在笠置山，其背后应该是长期与天皇系结盟的寺院力量的推手。碍于幕府的强大，近畿的各大寺院不敢公开支持后醍醐天皇的“倒幕”大计，于是以楠木正成为代表的“恶党”，由于其边缘性便成为了最佳的人选。

楠木正成是否是唯一接到“勤皇”指令的“恶党”，世人不得而知，但真正拿出实际行动的却显然不多。楠木正成也不是傻瓜，被忽悠上了笠置山之后，他随即发现后

醍醐天皇根本不具备倒幕的实力，于是在面见后醍醐天皇时只说了几句“逆贼暴虐，自取祸谴。天讨所加，莫不胜也”的大话之后，便是安慰后醍醐天皇“或遇小衄，愿勿烦圣虑”。至于什么“有臣存焉，何思不济”，除了为自己脸上贴金之外，便是急于下山的托词。

楠木正成很清楚单凭笠置山上的那些公卿，以及后醍醐天皇第三子护良带来的那点军队是根本无力与幕府军抗衡的。而自己草率地上山之后，显然已经被镰仓方面列入了黑名单。因此楠木正成在朝见了后醍醐天皇之后，第二天便随即下山，跑回自己的老家—石川郡赤坂村开始着手全面的战备。

楠木正成选择的赤坂村附近的一处台地设立要塞，为了和公元1333年建立的另一座要塞相区别，日本史学家一般称其为“下赤坂城”。按照《大日本史》的描述，下赤坂城“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仅500人”。似乎无险可守，而在9月27日（一说28日）攻破了笠置山之后，前来讨伐楠木正成的幕府将领大佛贞直也对下赤坂城发出了“直用只手提去耳”的轻蔑评价。

今天的考古学证明下赤坂城面积虽小，但是却坐落于标高185.7米的台地之上，虽然仅有南部靠山，但东、南两侧都是比高60米以上的断崖，只有北面坡道可以上山。所谓“三面平地”的说法，显然是德川光圀有意在误导读者。幕府军对下赤坂城的围攻持续了近20多天，撇去同样不靠谱的伤亡数字，楠木正成能够坚持下来，并顺利逃脱也已经堪称是奇迹了。而支撑楠木正成苦战到底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而是人类求生的本能。毕竟笠置山被攻破后，后醍醐天皇和诸多公卿无非是被流放和出家而已，而等待楠木正成这样的“恶党”的惩罚则是身死族灭。



今天的下赤坂城遗址

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往往就是像楠木正成这样的小人物在无形之中所推动的。在逃出下赤坂城之后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楠木正成流窜于近畿的河内、纪伊、和泉三国。楠木正成的游击战并未给镰仓幕府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却向日本列岛彰显出幕府军的无能，以及“倒幕”日益降低的风险，通过隐匿于自己军中的护良亲王，楠木正成甚至成功地将自己的官位从兵卫尉晋升任为左卫门尉。

公元1332年，楠木正成重新夺回幕府交给汤浅宗藤据守的下赤坂城，并不断以筑城的模式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形成了以金刚山千早城为中心的要塞群与幕府大军对抗。在其表率作用之下，各地的“恶党”开始群起效仿。翌年一月，播磨国（今兵库县）的赤松则村、筑后国（今福冈县南部）的原田种昭、伊予国（爱媛县）的忽那重清和土居通增等人相继起兵。

对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叛乱，镰仓幕府无暇一一扑灭，只能全力讨伐楠木正成一党，以期在大堤崩溃前堵上这个该死的“蚁穴”。尽管幕府大军先后攻破了楠木军控制的赤坂城、吉野城等外围据点，但在这场赛跑之中，镰仓幕府早已失去了主动

权。

公元1333年农历闰二月二十四日，长期被流放的后醍醐天皇成功地在近臣千种忠显的帮助下逃出了隐岐岛，后醍醐天皇原本的计划是逃往出云国的杵筑湾，但由于当天海上风浪太大，最终却在伯耆国的名和凑（今御来屋港）登陆，这一阴差阳错的选择在无意中却成就了当地的海盗家族—名和氏的崛起。



一身戎装的足利高氏

在得知后醍醐天皇出现在自己的地盘上后，长期占据名和浦、从事“海上交通、商业活动”的名和长高，抱着奇货可居的心态，在邻近的船上山树立起了“倒幕”的大

旗，在击退了幕府军的进攻之后，后醍醐天皇随即以“护驾有功”册封名和长高为伯耆国守护之职，不过出于“不能忘本”的心理，晋升为贵族的名和氏竟选择了以“帆挂船”为其家纹。



在名和凑登陆的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霸气侧漏的“王者归来”，随即掀起了“倒幕”运动的“新高潮”，除了各地的“恶党”之外，原先对镰仓幕府心怀不满的各路豪族也跟风而动，最先起兵的是九州土豪菊池家。菊池家不仅在抵御“蒙古袭来”的问题上血本无归，在“霜月骚动”中家督菊池武房更被逼“愤死”，可谓对镰仓幕府苦大仇深。接到后醍醐天皇发出的“倒幕”诏书之后，菊池武房的嫡孙武时随即串联了九州岛上的少贰、大友两家准备联手起兵。不过镰仓幕府逐渐熄灭的生命之火，还有能量烧死几只敢于出头的飞蛾。3月13日，在少贰、大友两家虚与委蛇的情况下，菊池武时草率地对坐镇博多的幕府“镇西探提”北条英时发动进攻，却不想正中了老奸巨猾的少贰氏“攻菊池以稳英时，再图后举”的圈套。

在幕府军和少贰、大友两家的前后夹击下，菊池军（仅150骑，比楠木正成这个“恶党”还有所不如）自第12代家督武时以下大部战死。菊池家的悲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倒幕有风险，出兵需谨慎”。但面对着千古难逢的“倒幕良机”，一个菊池倒下去，千百个豪强还是会选择站出来。就在菊池兵败博多的半个多月后，受封于陆

奥国白河庄的结城宗广起兵倒幕。结成宗广的行动无疑说明从来支撑镰仓幕府的关东地区，此刻也走向了北条氏的对立面，楠木正成口中天下无敌的“武藏、相模之兵”即将冲向万夫所指的镰仓和京都。果然4月27日，奉命前往船上山讨伐后醍醐天皇的足利高氏于行军途中突然宣布倒戈。

足利高氏作为足利家的第八代家督，长期以来都与北条氏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他不仅迎娶了镰仓幕府执政北条守时的妹妹，更一度活跃于讨伐叛军的战场之上。就在奉命出征的前夜，足利高氏还将正妻、嫡子送往镰仓作为人质。但事实证明，足利高氏所谓的“忠诚”无非是背叛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已。与各地的“恶党”相比，足利高氏只能算是“后进分子”。但这并不影响他以“倒幕军”领袖的身份自居，向全国广发《军势催促状》。在攻占京都之后，足利高氏更摆出一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架势，俨然已经成为了取代北条氏的新霸主。在足利高氏的表率之下，与之同宗的新田义贞于5月8日在上野起兵，会合了足利高氏的嫡子千寿王（足利义诠）后攻占镰仓。九州的少贰、大友两家也联合岛津氏围攻博多，最终逼死了“镇西探提”北条英时。显赫一时的镰仓幕府至此轰然崩塌。

公元1333年农历六月，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逐步开启了以天皇政治为中心的“建武中兴”时代。不过所谓的“中兴”其实只是对后醍醐天皇一系的皇室成员及支持其的公卿、寺院而言的，被查没的北条氏资产大多优先转到了这些人的名下。当然对于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和“恶党”头目，后醍醐天皇自然也要论功行赏一番。

足利高氏虽然是长期保持观望态度的后进分子，但毕竟是源氏一脉的御家人代表，因此在被赐名“尊氏”的同时，还得以身兼武藏、上总两国守护。加上对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等亲贵、部下的封赏，表面上来看足利氏似乎应该心满意足、山呼万岁了。但放眼全局，却不得不说后醍醐天皇对足利氏的戒备多于恩赏。在足利氏的根据地—关东地区，后醍醐天皇任命16岁的少年—北畠显家为陆奥国的守护。陆奥国不仅幅员辽阔（相当于今天日本的福岛、宫城、岩手、青森5县及秋田县的东北地区），更兼与虾夷族盘踞的北海道比邻，因此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盛产强兵、良马的战略要地。

而在京都的政治中枢之内，后醍醐天皇正式赐予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等“恶党”以武士的身份，更吸收其进入审议政务的“记录所”和负责封赏的“恩赏方”。而与足利尊氏同宗的新田义贞则掌管了负责军事和内卫工作的“武士所”。与之相比足利尊氏虽然顶着“正三位参议”的虚衔，却没有实际负责的工作，只有亲信高师直、上杉宪房在负责接待“上访”的“杂诉决断所”上班，后醍醐天皇排斥和分化足利氏势力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起兵倒幕时“取北条氏而代之”的勃勃野心，与现实中不得不“坐冷板凳”的尴尬无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令足利尊氏对“建武中兴”深恶痛绝。而后醍醐天皇亲政之后对各地武士封赏的随意和偏颇，以及为营造宫廷而开设苛捐杂税以及不合时宜的纸币改革，更令日本列岛民怨沸腾。


“建武中兴”时代的后醍醐天皇

面对有意推动和凝聚各地不满情绪的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一系人马自然有先发制人的心思。而其中最为激进的莫过于出任“征夷大将军”的“三阿哥”护良亲王。用他自己的话说：“（足利尊氏）仅凭一战之资，却妄图凌驾于万人之上，视天下为己物。现在其势力尚微弱，如果不趁时讨伐他，总有一天养成比逆恶无道的北条高时更盛的威势。”后醍醐天皇是一个颇为多产的“光荣爸爸”，护良虽然在倒幕战争中曾“昼终日卧深山幽谷，石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野里，跣足蹈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却并不受宠。特别是在后醍醐天皇册立“五阿哥”恒良亲王为太子之后，护良的“积极性”反被视为对皇室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护良试图暗杀足利

尊氏的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效忠于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

公元1334年9月下旬，足利尊氏突然加强了自己居所周边的警戒级别，而每次随驾巡幸，也必以“保护天皇”为由出动大批卫队。10月，护良亲王的“亲密战友”楠木正成奉命讨伐纪伊国饭盛山一带的北条残党而离开京都。而恰在此时，护良亲王被后醍醐天皇以“谋反”的罪名逮捕。护良究竟有没有暗杀足利尊氏的计划，似乎并无直接的证据。而即便护良真打算铤而走险，刺杀同僚顶多是“谋杀”，谈不上“谋反”。其实，护良亲王最终倒台的背后，是足利尊氏通过后醍醐天皇的宠妃阿野廉子，向后醍醐天皇展示了护良暗中发往各国的召兵令旨。

护良从被捕到最终幽禁于镰仓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史料显示后醍醐亲王为挽救因自己儿子而人头落地的公卿们做过努力。尽管有史学家认为后醍醐天皇是预见到护良无力与足利尊氏抗衡，而不得不做出弃卒保车的决定。但决绝如此，也实在令人寒心，以至于有野史说护良亲王与自己父亲的宠妃阿野廉子有染，用“不伦之恋”和“由爱生恨”来解释护良最终由“皇室股肱”沦为“阶下楚囚”的离奇经历，而站在足

利氏一方立场上记述这段历史的《梅松论》，更借护良之口表达了他的冤狱是“恨君上更甚于武家”。

护良亲王倒台之后，他原先所担任的“征夷大将军”一职自然空缺了出来。比起志在必得的足利尊氏来，后醍醐天皇更中意于自己未满10岁的儿子——成良亲王。而恰在此时，北条氏的残党在公卿西园寺公宗、日野资名的庇护和资助下公然发动叛乱。叛军以自称镰仓幕府末代执政—北条高时遗子的相模二郎时行为旗号，由于相模二郎时行尊称北条氏的统治时期为先代，公然要“中兴北条先代之荣”，这次叛乱又被称为“中先代之乱”。“中先代之乱”虽然得到了关东相模等地北条亲旧的鼎力支持，但是足利直义顺手干掉了囚禁中的护良，带着成良亲王逃回京都之后，足利尊氏随即率大军收复了镰仓。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自然留给了世人诸多的想象空间，而后醍醐天皇本人也对足利尊氏的“功勋”表示怀疑，他依旧驳回了手握重兵的足利尊氏申请“征夷大将军”的讨要，固执地将这一桂冠加在了逃回京都的成良亲王头上。

事至于此，足利尊氏终于忍无可忍了。屯兵镰仓的足利尊氏拒绝了后醍醐天皇所谓“已拟纶旨，速回京都受赏”的召唤，公然发布全国武士总动员的命令，矛头直指在京都主持日常军事事务的新田义贞。应该说新田义贞和足利尊氏不仅是同宗血亲，更是当年一起“倒幕”的战友，关系一度还算融洽。但是权力从来不能分享，面对“武家领袖”这一巅峰，两人最终从合作走向了决裂。在先后收到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讨伐对方的奏请之后，后醍醐天皇最终也选择站在了足利氏的对立面，授意新田义贞向镰仓进军。

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尽管走得磕磕绊绊，但曾经推翻过不可一世的北条氏，以及镇压各地北条残党的成功经验，还是让后醍醐天皇依旧坚信，自己军旗所指之处，任何反对势力终将灰飞烟灭。也正是基于这份自信，后醍醐天皇在授权新田义贞从东山道进击的同时，派出“四阿哥”尊良亲王领军从东海道逼近镰仓。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均为关东武家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正面交锋之中，各地豪族难免有首鼠两端的想法。在足利军初战不利的情况，不少骑墙派顿时纷纷倒戈，新田义贞的大军随即兵临号称“天下险”的箱根峠。一旦新田义贞突破此地，那么地处关东平原的镰仓将无险可守，足利尊氏必将重蹈相模二郎时行的覆辙。但也就在此时，新田义贞突然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新田义贞此举当然不是有意放足利尊氏一马，而是此时尊良亲王跑到了自己的军中。尽管尊良亲王出征镰仓之时已经是一个年逾24岁的“有为青年”了。但是在“倒

幕”的过程中，他除了跟着老爹出逃、被俘、流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绩。面对这位缺乏军事经验，却顶着全军主帅头衔的“贵二代”，新田义贞也只能派出自己的弟弟脇屋义助为贴身护卫，分兵由其进取位于箱根山西麓的“竹之下”（今静冈县小山町）。

新田义贞此举固然有迂回箱根峠侧翼的意图，但更多的是出于给后醍醐天皇一个面子及“眼不见为净”的考量。但足利尊氏恰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绩，亲率主力直扑尊良亲王的这支偏师。养尊处优的尊良亲王何曾见过足利尊氏这样不要命的打法，顿时要求脇屋义助保护自己先行撤退。可怜脇屋义助跑到一半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脇屋义治还在敌军的重围之中苦战，只能又返回战场。

脇屋义助虽然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却无力挽回战局，而随着竹之下战败的消息传来，正在进军箱根的新田义贞军中豪族再度倒戈，无奈之下新田义贞只能选择回师京都。自感已经扭转乾坤的足利尊氏随即集结了关东八国的诸路军马向京都挺进。在轻松成功突破微不足道的阻击之后，足利尊氏对京都的围攻也进行得相当顺利。公元1335年正月，号称10万的足利军开始叩击京都西侧的宇治一线，而阻挡足利尊氏迈向胜利的正是昔日的“倒幕英雄”——楠木正成。面对楠木正成的阻击，足利尊氏展开了军事、政治的双重攻势，据说足利尊氏曾以畿内、南海11国试图诱降对手，但楠木正成铁了心跟天皇走，并不为所动。

戰塲利運感神助
百萬軍中意氣優
偶謁祖翁排闥入
通身白汗任他流

寛政己未正月值
法雲寺殿入道月潭圓心公
四百五十年忌就
金華方丈南軒聊
題賛詞
住尚九年玉龍前真如
天真齋杜多







楠木正成坚贞不渝，并不代表日本列岛之上的其他野心家们不趁势而动。同样曾以“恶党”身份为后醍醐天皇奔走卖命的赤松则村此时便从播摩起兵抄袭“皇军”的侧翼。赤松则村在成功“倒幕”之后，尽管一度“论功行赏”被封为播摩国的守护。但由于赤松则村长期与护良亲王关系密切，在足利尊氏起兵之时，赤松家已经被后醍醐天皇打回了佐用庄地头的原形。强烈的落差和不满，令赤松则村自然渴望新一轮的权力重组。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行动并没有给足利尊氏打开通往权力巅峰的大门，倒是却留下了一条逃出生天的活路。

公元1335年正月十日，赤松则村伙同足利尊氏派往四国、本州岛西部招募武士的细川定禅突袭“皇军”山崎一侧的防线，脇屋义助带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无奈再度败走。面对全线崩溃的防线，还是新田义贞头脑冷静，第一时间跑回京都，保护着后醍醐天皇本人及皇室主要成员逃入比叡山中。

顺利地控制了京都之后，足利尊氏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积极准备向皇军退守的比叡山麓的“东坂本”进军。但恰在此时，一股强大的变量出现在了京都的战场之上，正月十五日，细川定禅突然向足利尊氏报告雾气氤氲的琵琶湖中出现大批身份不明的战舰，军旗上书写着中国兵家孙子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足利尊氏当然不会误认为200年之后的武田信玄穿越而来。在日本历史上真正拥有这“风林火山”军旗专利的是后醍醐天皇布局于陆奥的美少年—北畠显家。北畠显家的陆奥军此时的出现，顿时打乱了足利尊氏的全盘部署。真正令足利尊氏感到担忧的并非是北畠显家此时的到来以及其麾下的关东雄兵，而是北畠显家既然尾随自己抵达了京都，那就意味着自己在关东的根据地—镰仓已经易手。



被美化为翩翩公子的北畠显家

一日之内横渡琵琶湖的陆奥大军，不待休整便全力投入对足利军前沿据点—日本圆珍和尚仰慕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更名为三井寺的“圆城寺”。有趣的是在这场战

斗之中，双方军中均有大批僧兵参战，三井寺的僧众站在足利氏一侧拼死抵抗，乱军中杀死了“皇军”悍将千叶高胤。而比叡山方面延历寺僧兵则冲入三井寺中到处放火。如此疯狂的举动源于三井寺“天台寺门宗”派与比叡山的“天台宗”长期对立所积淀的刻骨仇恨。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日本残酷的竞争中连佛门圣地也难免于刀兵。

在三井寺僧侣“便到此为之罢”的哀嚎声中，足利军在对手优势兵力的不断冲击下不得不选择放弃京都。在自己曾经宣布起兵倒幕的“投机圣地”—丹波筱村，足利尊氏面临着自己人生的又一次艰难抉择。“生存还是毁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关键便在于怎样才能活下去，对于失去了关东根据地的足利尊氏而言，命运看似已经将他逼到了绝路。

2月3日，在听取了细川定禅的意见后，足利尊氏决定继续向西，退守背靠濑户内海的摄津国兵库郡一线。之所以选择摄津，是因为此地恰好位于海陆交通的枢纽位置。如果战局继续恶化，从陆路足利尊氏可以撤入赤松则村所控制的播摩，从海路则可利用平清盛当年修筑的大型港口—大轮田泊，退守此前基本驱逐了天皇势力的四国岛。尽管并非走投无路，但无论是去播摩还是四国都并非足利尊氏想要的选择。播摩与京都接壤，所谓“我可往、寇亦可往”，足利尊氏依旧无法摆脱“皇军”的追讨，而四国地贫民乏也绝非东山再起的最好选择。而就在足利尊氏依旧苦苦寻觅出路之际，一封来自九州的书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写信前来向足利尊氏输诚的是九州岛的“实力派”—少贰贞经。长期以九州霸主自居的少贰氏，尽管在“倒幕”中搭上“末班车”。但在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中并未捞到太多的实惠。因此足利尊氏在镰仓起兵之后，一心想要独霸九州的少贰贞经自然站在了武家势力这一边。　　联系当时落后的通信条件和京都攻防战瞬息万变的局势，少贰贞经的这封信实际的起草日期应该是足利尊氏攻占京都前后的鼎盛时期，因此少贰氏原本的意图只是想再锦上添花，并无雪中送炭的意思，但这封信为足利尊氏开拓了思路。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足利尊氏开始了为自己绝地反攻的布局。

在赤松则村的建议下，足利尊氏首先与“下岗天皇”——光严上皇量仁取得了联系。量仁对于赶自己下台的后醍醐天皇早已不爽，随手便写了一张“讨伐伪帝后醍醐”的院宣交给足利尊氏。至此足利尊氏与后醍醐天皇的对抗算是名正言顺。当然没有实力的支撑，所谓的“大义名分”根本分文不值。足利尊氏下一步要准备动身前往九州，建立“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


僧兵长期都是日本封建时代的重要武装力量

很多文学作品都将足利尊氏前往九州的旅途描写成“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平心而论足利尊氏虽然“丧家”但并非“惶惶”。途中他还在赤松则村的地盘上召开了为期两

天的“高层峰会”，交代了自己走后四国、本州西部的相关部署。除了赤松则村在播磨阻击“皇军”的进攻，细川定禅继续经营四国之外，足利尊氏还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驻守周防、长门两地，算是为自己一旦无法在九州立足安排了退路。当然完成如上布兵之后，足利尊氏手中可用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了。但在足利尊氏看来自己前往九州，无非是会合少贰、大友、岛津等九州豪强而已，完全没必要多带人马。

公元1336年2月25日，抵达长门国赤间关的足利尊氏迎来了少贰氏嫡子少贰赖尚。尽管少贰赖尚带来的礼物和兵力均不多，但此时的足利尊氏也没有权力要求太多，盘桓了4天之后，足利尊氏匆匆渡海前往九州。公元1336年农历二月三十日，足利尊氏一行人抵达了北九州的筑前国芦屋津。而就在当天的黄昏，一个骇人的消息从少贰氏的主城—内山城传来：少贰氏遭遇以菊池家为首的九州“皇军”突袭，内山城陷落，少贰贞经已然率众自焚了。菊池氏是少贰氏在九州的死对头，少贰贞经在此前的“倒幕”中更首鼠两端的害死了菊池氏当家菊池武时。应该说无论是少贰赖尚还是足利尊氏都清楚菊池氏将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但谁也不曾预料到长期雄踞北九州的少贰氏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

客观地说，少贰氏与其说是败给了菊池，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家族内部的动摇和分裂。镰仓幕府倒台之后，后醍醐天皇尽管在封赏功臣中有诸多偏颇和不公，但是对长期在九州默默无闻的菊池家还是颇为慷慨。在楠木正成等人的坚持下，不仅“倒幕身死”的菊池武时被赞誉为“第一忠臣”，菊池家还获得了对马、肥前两国守护的后赏。怀着感恩之心，菊池家第13代家督菊池武重前往京都，在新田义贞的军中奋勇拼杀。其弟菊池武敏则长期监视着宿敌少贰氏的一举一动。在得知少贰赖尚前往长门迎接足利尊氏后，菊池武敏随即率军对少贰氏展开了突袭。

此时的少贰氏内部已经由于足利尊氏的兵败而产生了动摇和分裂。面对“引火烧身”的风险，正是少壮派的代表少贰赖尚坚持认为足利尊氏有“赖朝之再世”的气度，才最终换来了父亲少贰贞经对足利家的支持。面对菊池家突如其来的进攻，少贰氏不仅猝不及防，更有不少家臣怀着观望的心态拒不出力，最终在关键的水木渡之战中，在北九州经营多年的少贰氏竟然只有150人出战。而在随后的内山城攻防战中，更有人“窝里反”占据了核心阵地—本丸。遭遇内外夹击的少贰贞经最终才无奈地选择自行了断。

面对自己主要政治盟友——少贰氏的突变，足利尊氏的九州之行可谓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就在足利尊氏在是退回长门还是继续进军之间犹豫不决之际，菊

池武敏的大军已经紧逼到了他的面前。命运看似又一次将足利尊氏逼到绝境，其弟足利直义虽然以“中国的汉高祖刘邦从荥阳突围。其身边只有28骑，源赖朝在土肥的杉山兵败，随从也只剩7人”相勉励，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却无法改变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现实。公元1336年3月2日上午，北九州的多多良海滨终于迎来了足利尊氏一生最为凶险的决战。



日本画家笔下的多多良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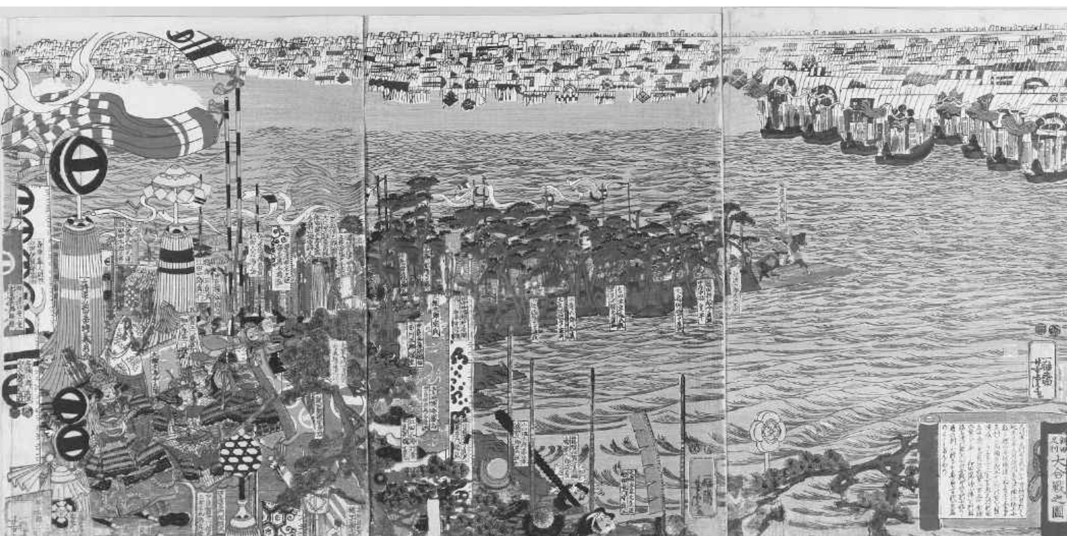
关于多多良之战双方参战的兵力，足利尊氏方面比较清晰，足利尊氏本人带来的300多人加上少贰赖尚手下的500余人，全军总计不过1000人。但是以菊池武敏为首的九州皇军的兵力却众说纷纭，最为夸张的记录是“全军6万”，相对保守的估计则认为菊池武敏手中不会少于5000人。但考虑到菊池武敏攻占内山城时的总兵力是3000，在几乎马不停蹄地前来迎战足利尊氏的情况下，其兵力不可能陡然增加太多。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方面兵力还是处于1：3的不利境地。但足利尊氏有着自己的优势，作为沙场宿将，在布阵方面他老道地选择了战场。背水列阵不仅可以激发部下困兽之斗的志气，更杜绝了对手包抄自己的可能。另一方面足利尊氏带来九州的人马虽然有限，但基本都是百战之余的老兵，少贰赖尚的部下则与菊池家有着血仇深仇，更是人人奋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战幕一启，局面便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在足利直义的带领下，足利军在对手的军中反复冲杀，轻松地将菊池军先锋部队击退，而菊池军300人的别动部队也在试图渡河攻击足利尊氏侧后的运动中被击败。恰在此时，海盗出身的松浦党于菊池军中倒戈，遭遇前后夹击的菊池武敏最终只能逃入肥后的深山之中，随着足利尊氏抵达少贰贞经自焚之所进行拜祭，足利氏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展现在其面前的是整个北九州纷纷前来投效的土豪。足利尊氏平定九州仅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南部的群山之中忠于菊池家的武士还在打游击，但是接到赤松则村自播摩白旗城发来求援书信之后，足利尊氏已经无心再去收拾他们。4月3日，带着以少贰赖尚为首的九州武士团，足利尊氏海陆并进再度向京都发动了进攻。

赤松则村死守白旗城，长期被日本小说家描述成了足利尊氏扭转乾坤的关键，而好事者杜撰出“新田义贞迷恋京都女官们的风情，迟迟没有进军才错失了战机”的野史。事实上重新攻占京都之后，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将足利尊氏赶出京都的皇军主力无疑是北畠显家的“陆奥方面军”，但无论是北畠显家还是陆奥军却无法在京都长期逗留，就在足利尊氏在九州苦战之际，后醍醐天皇连京都都来不及回，便急忙在自己的“行在”比叡山为“七阿哥”义良亲王完成了“元服”的成人礼，授予其“陆奥太守”之职。显然陆奥军充沛的兵员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震慑了足利尊氏，也吓坏了后醍醐天皇，他急于分化北畠显家的权力，避免在关东地区再出现一个尾大不掉的军阀。

而以“陆奥大介”的名义护送义良亲王返回陆奥的北畠显家，所要面对的也是一副烂摊子。在关东不仅有长期负隅顽抗的足利尊氏的同宗兄弟斯波高经，更有二阶堂、佐竹等一干旧幕府官僚趁势兴风作浪。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作为“皇军”骨干的“陆奥方面军”都被死死地钉在了关东，无力支援其他地区，京都方面的“皇军”兵力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新田义贞在收复京都之后，还是随即展开了对播摩的进攻。

但此时老练圆滑的赤松则村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小寺藤兵卫来到了新田的军前。在摆了一通当年“倒幕首义”的老资格之后，赤松则村提出自己是因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才投奔足利氏的，只要恢复他播摩守护的官爵，他愿意“弃暗投明”。新田义贞毕竟不是“大老板”，只能请示后醍醐天皇定夺。而就在“皇军”公文往来的过程中，赤松则村趁势加固了要塞—白旗城的防御，在拿到天皇签署的委任状后，赤松则村才亮出自己的底牌——足利尊氏许给爷的好处比你多得多。


日本画家笔下的集结于严岛的足利氏大军

新田义贞对白旗城的围攻其实也并非向赤松则村在信中向足利尊氏吹嘘的那么坚决。在初次攻坚失利之后，新田义贞便接受了胁屋义助的意见，分兵备中、备前，环濑户内海构筑防线，全力准备迎战足利尊氏。但时隔两个月之后，足利尊氏已非败走京都时的穷酸样子，在濑户内海的严岛会合了从四国归来的细川定禅后，足利军中已经聚集了160家以上的“外样大名”，尽管总兵力20万里面注水不少，但也形成了对京都“皇军”的压倒性优势。5月15日夜，足利氏的陆军抵达备前、备中一线，首当其冲的胁屋义助再度兵败，“皇军”的濑户内海防御体系随即面临崩溃。有趣的是在天皇、公卿们打了鸡血似的高呼“决战到底”之时，倒是楠木正成这个前“恶党”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在足利尊氏撤出京都之时，楠木正成便提出政治解决双方分歧，毕竟“灭亡镰仓幕府是尊氏之功”，“天下武士不属义贞，而皆属尊氏”。但楠木正成的意见并未得到后醍醐天皇的重视。面对足利尊氏兵临城下的大军，楠木正成向后醍醐天皇呈上了著名的《楠木奏折》。其中提出与足利尊氏议和，拖延时间以待战机是为上策，而让出京都“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使其军粮枯竭”则为中策，贸然与足利尊氏决战城下则是“有败无胜”的下下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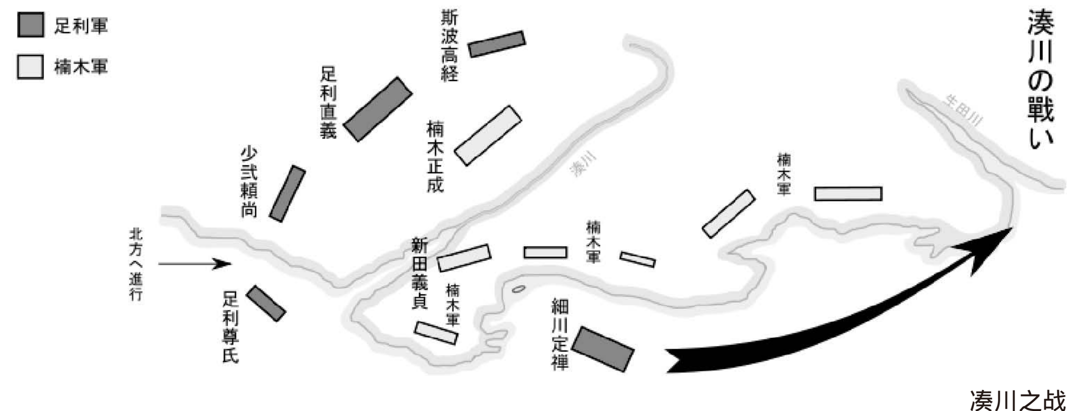
应该说比起留恋京都繁华的公卿来，楠木正成的确有着超越其时代的战略眼

光。但楠木正成随后奉命赶赴前线，却未必如小说家们渲染的那么悲壮，毕竟此时新田义贞虽然兵败，但兵力依旧雄厚。如果能够扼守住兵库一线，那么将海、陆两线进击的足利军各个击破也并非全无可能。真正将楠木正成推向死亡的恰恰是手握重兵的新田义贞，面对泛海而来的足利氏舰队，新田义贞委任自己屡战屡败的弟弟胁屋义助等人率八千精锐守备海滨一线。而楠木正成仅率领自己的部属700人在凑川以西的西野宿布阵，独立面对足利氏方面庞大的地面部队。

如此众寡悬殊的布阵是否缘于“皇军”兵力的确有限，只能兼顾一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坐镇和田岬的新田义贞手中还握有2500人的预备队。新田义贞的战略从善意的方面解读，可能是误判了对手的进攻轴线。但联系到新田、楠木两人长期以来恶劣的关系，依旧令人心生新田义贞“借刀杀人”的疑窦。应该说在被称为“凑川之役”的决战中，“皇军”初期还是颇具优势的。在地面战中，向来长于山地防御的楠木正成一度阻挡住了以少贰赖尚为先锋的足利氏大军。而在反登陆方面，胁屋义助也击溃细川定禅的四国敢死队。双方一度呈现战线交织缠斗的局面。但恰如孙子兵法所说“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面对“皇军”严密的正面防线。细川定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田义贞在绀部海滨（今神户市中央区）的防御漏洞，将登陆点转移到了对手的东侧。

新田义贞在这一关键性时刻再度应对失误，他草率地放弃了位于战场中央的和田岬，与胁屋义助合兵一处向绀部移动。但新田义贞的行动恰恰中了细川定禅的调虎离山之计，足利尊氏的大军随即在和田岬登陆，轻松合围了仍在苦战的楠木正成所部。

公元1336年5月25日下午，在明确知道自己已被友军抛弃、深陷重围之中的楠木正成放弃了被动的防御，频繁发动突袭。日本史料中对其的勇猛极尽褒美之词，但从人类的本能来考量，楠木正成的进攻与其说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不如说是为了求生而作的突围。最终在6个小时中连续突击17次的楠木军终于冲出了重围，但此时其部下已“十存其一”，仅剩73人。深陷绝望之中的楠木正成对自己的弟弟楠木正季发愿“七生报国”后互刺而亡。



湊川之战

楠木正成死后，新田义贞率军在生田森（今神户市中央区生田神社）与足利大军展开最后决战。但此时足利氏海、陆两军已然顺利会师，在绝对兵力的优势之下，足利大军势如破竹。当天夜间，新田义贞带着残部数千人撤往京都。出于对楠木正成的尊敬，也为了收买人心，足利尊氏在战后将其首级送回了河内的楠木一族的手中，这位被后世尊为军神的“恶党”最终被安葬在见证了他学习和成长的观心寺中。

正如其他冠以“悲剧英雄”之名的历史人物一样，在楠木正成死后其形象不断被美化的光环之下，他们逐渐忽视了其悲剧命运背后的推手。客观地说，无论是后醍醐天皇还是新田义贞都很清楚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凑川决战极难取胜，但为了赢得调整部署的时间，更为了向足利尊氏彰显其血战到底的决心，楠木正成都是最佳的棋子。从这一点上来说，楠木正成与6个世纪之后唱着以其事迹改编的《七身报国歌》向美英盟军发动自杀式袭击、以期“打疼”对手，谋求“一击媾和”的“神风敢死队”，在本质上的确并无异质。

公元1336年5月27日，后醍醐天皇在新田义贞的保护下再度撤离京都。不过这一次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博弈中，后醍醐天皇尽管利用和谈赢得了陆奥的北畠显家率军驰援的时间，在大和国的吉野郡“另立中央”。足利尊氏则于京都拥立了光严天皇的弟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日本列岛“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从此开启。

日本历史上所谓“南北朝”，是指后醍醐天皇在大和国的吉野郡建都，足利尊氏于京都拥立光明天皇的对峙和内战。由于广大以战争为生的武士阶层以家族为单位的朝秦暮楚，在南北朝局面形成之初，交战双方都无力一举击垮对手。公元1352年到1355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竟然反复易手了3次之多。为了筹措军费，足利尊氏以修建天龙寺为名，向昔日的仇敌——元帝国派去了名为“天龙寺船”的官方商队，而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更令九州岛和环濑户内海沿岸的豪族纷纷扬帆出海，或商或盗地滋扰元末纷乱的东南沿海。

海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堪称颇具“生命力”的古老营生。最早出现在西方史料之中的海盗集团，是盘踞于地中海东南部的腓力斯丁人。他们对古埃及王国、两河流域的赫梯王国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甚至有证据显示，正是由于这些“海上民族”的入侵，直接覆灭了雄踞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而今日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也是以海盗的身份侵入不列颠群岛。讽刺的是，一番斗转星移之后，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维京海盗的骚扰，被迫以“丹麦金”的形式向后来者缴纳“保护费”。

与西方的同行相比，中国本土海盗集团则明显要“低调”得多。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畏惧大海，缺乏所谓的“开拓精神”。而是面对兴盛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以来中国沿海居民更多地致力于商贸，对杀人越货兴趣不大。即便有少数热衷于“常劫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的海中大豪，虽然有地方官员充当“保护伞”，最终仍难逃脱中央政府的制裁。

元末，中国大陆东南虽然纷乱，但强横众多，江苏有富甲一方的张士诚，浙江有海盗出身的方国珍，福建泉州有组建“亦思巴奚”民兵自保（波斯语，意为刀盾的骑兵）的色目大贾蒲寿庚，因此这批早期倭寇并未讨到什么便宜。倒是明太祖朱元璋问鼎中原之后，由于海防废弛，加上张士诚、方国珍大批的残党与倭寇合流，来自海上的袭扰反而成为了令大明帝国头疼的边患。



南北朝时期的日本武士还原图

向以铁腕著称的朱元璋，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以武力解决倭寇问题。驻防福建的战将周德兴也表示“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此时的大明帝国，北有残元未灭，南有五溪蛮乱。考虑到忽必烈折戟沉沙的前车之鉴，朱元璋最终选择了以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夺。公元1369年，大明外交使团抵达九州岛，传达朱元璋“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战争威胁。可惜的是大明帝国的国书没有抵达京都，就被盘踞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所截留了。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八阿哥”，为人刚愎自用。他对于明朝国书中“四夷之君长”、“酋帅”等轻蔑言辞颇为不爽，随即处决了使团中主使吴用等5人，还拘禁了副使——杨载和吴文华3个月之久。



元代末期泉州的穆斯林雇佣军长期称雄于海上

不过面对第二年抵达九州的莱州府同知赵秩传达的“蠢尔倭夷”的说法，怀良的火爆脾气却似乎好了不少，联系到此时朱元璋已经将太仓卫指挥监事翁德等人晋升为指挥使，在沿海建立卫所，以武力对抗倭寇的武装袭扰。怀良此时不仅遣使与明朝修好，更主动送还了倭寇劫掠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对明帝国“方将整饬巨舟，致罪于尔邦”的真实畏惧。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明朝政府始终以为怀良就是“日本国王”，为此朱元璋还拒绝了日本北朝足利氏从公元1374年开始连续6年诚意十足的朝贡。在明帝国看来，足利氏不过是区区一个军阀，泱泱大国岂能与乱臣贼子建交。所以终朱元璋一生，明朝政府都始终以怀良亲王为谈判对手，要求日本政府制约袭扰无度的倭寇，不过怀良亲王所代表的南朝在日本国内的内战中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控制地域贫瘠的物产，因而倭寇对大明帝国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过。

公元1381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国书给“日本国王”，依然以开战相威胁“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

国，则必受祸”。不过此时长期主政九州岛的怀良亲王已经于公元1372年战败而退隐，面对朱元璋的国书，日本九州岛的军阀和豪商巨贾，只能拿出“瞒天过海”的家传手艺，以“怀良”的名义给朱元璋写一封很有意思的回信，在信中“怀良”虽然底气十足地表示“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但纵观其行文却是处处透露着卑躬屈膝。无非是以“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的名义讨饶而已，所谓“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则只是虚壮胆色而已。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对日本国内的政局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位粗通文墨的“马上天子”，甚至填了一首乐府诗——《倭扇行》，以表达对这个流氓政权的鄙视。诗中朱元璋不仅指责日本政府“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更嘲笑怀良亲王“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不过朱元璋并没有兴趣去改造日本，因此他虽然感叹“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怀良”国书中“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的建议，将日本划归大明帝国“十五不征之国”之列。

所谓“十五不征之国”指的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在下令编纂《皇明祖训》时，宣布将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这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表面上看“十五不征之国”的确立标志着明帝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承认了上述国家的主权独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但仔细分析这“十五不征之国”却不能简单“一视同仁”。

所谓“渤泥”国即今天的文莱王国的前身，当时控制着加里曼丹岛大部及菲律宾南部的一些岛屿。所谓的“三佛齐”则是控制着今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的大部的佛教王国。湓亨、白花则为马来半岛的割据政权，苏门答腊、西洋、爪哇三国则是今天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封建王国。安南所控制的地域大体涵盖了今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北部，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当时是占城的疆土。真腊是今天柬埔寨王国的古称，暹罗则是泰王国的旧名。大、小琉球则为今天的日本冲绳群岛。



壮年时期的朱元璋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均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藩属，如真腊、暹罗、占城等国均早在隋唐时期便建立起了与中国朝贡体系，而盘踞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地区及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则从宋、元时期与中国交往密切。特别是公元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平章史弼等人率军远征爪哇的军事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当地诸国。使其纷纷主动向元帝国输诚。因此基本上朱元璋所划定的“十五不征之国”中除了朝鲜与日本之外，基本均为宋元以来中国的传统藩属，既然是附属国，那么自然没有必要征讨。



现存于南京的渤泥国王墓

朝鲜的情况之所以在“十五不征之国”中显得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国家。明帝国成立之初，朝鲜半岛仍处于高丽王国的统治之下，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位之时，曾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并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但高丽王国与昔日的元帝国有着悠久的姻亲关系，当时的辽东地区也仍盘踞着北元帝国的残余势力，因此高丽王国一度在明帝国与北元王庭之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旽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但朱元璋认定其得位不正对其的朝贡却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被称为好太王的高谈德

虽然得到了明帝国的正式册封，但此时的高丽王国却已是风雨飘摇。北方残元的势力虽然在明帝国的打压之下逐渐衰弱，但南方的“倭寇”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倭寇”侵扰朝鲜古已有之，事实上，“倭寇”一词不是中国创造的，其最早见于文献，是公元404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好太王碑文，这块今天被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的石碑，记载了高句丽第19代君王高谈德于当年击败进犯平壤地区的百济——倭国

联军的事迹，其中记载的“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句。从此开启了东亚大陆对日本入侵者的统一称谓。

镰仓幕府统治时期，虽然也不时有日本海盗袭扰朝鲜半岛。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223年，倭寇侵扰金州。不过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种跨境劫掠的行动并不支持。公元1227年，90名涉嫌从事海盗行动的日本人便于九州岛被当着高丽使节的面斩首示众。但随着镰仓幕府的崩溃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日本国内破产武士及普通民众加入海盗集团，泛舟出海“捞生活”的热情逐渐走高，朝鲜半岛也随之成为了“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公元1323年至公元1422年的百年间，寇掠朝鲜382次。而在倭寇最猖獗的公元1350年至公元1390年之间，未记载倭寇出没的年份仅有公元1356年和公元1386年两年而已。据《高丽史》所说，倭寇入侵朝鲜之时，所至“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萧然”。而由于高丽王国的反击不力，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甚至开始深入内地，成为了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在“恭愍王”王颛时期，三南（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已经成了倭寇的自留地，几乎一日一警。高丽王朝因为倭寇潮水般无穷无尽的侵袭，财政极度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是军心全无。“诸岛荒芜，王京震动”，无奈之下，高丽政府只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辛禑执政之后，得陇望蜀的倭寇更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面对这样的局面，辛禑曾经对大臣发火：“（你们）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地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对倭寇的恼怒和恨自己属下不力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平心而论，此时的高丽王国并非没有精兵强将。在南方各地饱受倭寇袭扰的同时，高丽王国北方边防部队却利用元末辽东地区群雄并起的态势，在不断击败来犯红巾军、元帝国政府军的同时，成功地跨过鸭绿江，一度杀到了辽阳城下。而这支北境雄师的统帅正是出身元帝国辽阳行省双城总管府的元帝国千户之子李成桂。李成桂得势之后曾自称是新罗名臣李翰之后，但在其有史可查的家谱中，从其曾祖父李行里开始，李氏一族便长期依附于蒙元帝国，世袭元帝国斡东千户所千户，直到

公元1356年，高丽王国利用元帝国内乱北拓领土，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才“毅然反正”，协助高丽军队攻占元帝国双城总管府，从此开启了李氏一族在高丽王国的从政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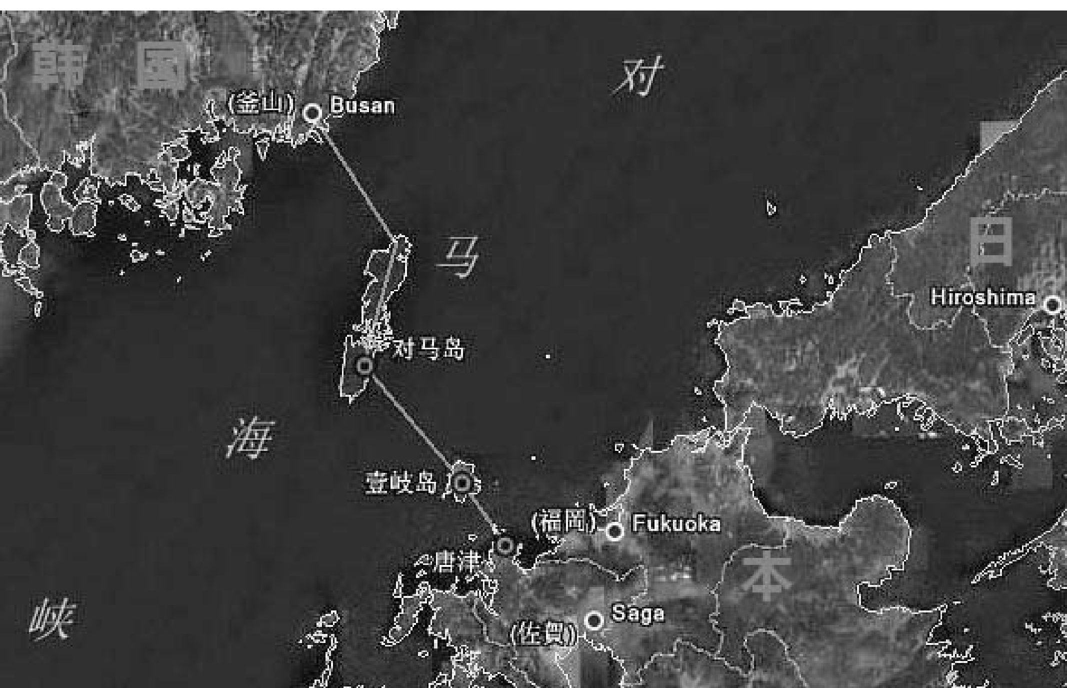
对于自幼从军的李成桂，“恭愍王”王颛颇为宠幸，一度任命其为相当于国防部的密直司副使，与老牌政客崔莹、曹敏修分庭抗礼。但新科国君辛禑对其却并不信任。公元1377年，李成桂率军前往智异山和西海道击破倭寇，才第一次确立了其在高丽王国新一届政府内的位置。公元1380年，一支由500艘战船组成的倭寇舰队侵入云峰（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郡），占领引月驿。在前往当地清剿的高丽驻军大败而回的情况下，李成桂再度出马。成功射杀了“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莫敢当，我（高丽）军争避之”的倭寇首领“阿只拔都”。



李成桂曾多次击败倭寇

“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年轻人”，“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士”。显然朝鲜官方并不清楚这位年轻的倭寇首领的名字。只是根据其年龄和战场表现随意给他起了一个“代号”。而从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此时的倭寇集团主要在盘踞壹岐岛的松浦氏领导之下，壹岐岛位于九州岛北部。北面通过对马海峡与对马隔海相望，南方通过壹岐水道与肥前国相离，这里不仅是由日本九州岛至中国大陆和朝鲜的一个中转站，也是防御外界入侵的一个重要前哨。因此蒙古袭来时遭到了很大破坏。

壹岐作为一个岛国，渔业很是发达；同时岛内也有平原，有大米、麦和大豆等农作物。虽然面积不如对马，但其耕地及人口都比对马岛要多。而更为关键的是在镰仓幕府统治期间，壹岐地区长期集结了大批戍守前线的武士。日本国内南北朝拉锯战所产生的许多溃兵败将也流亡至此，令倭寇势力大增，倍加凶猛。因而才会出现“阿只拔都”这样策马舞槊的职业军官统率流民跨国劫掠的现象。



壹岐和对马群岛长期以来都是日本前往朝鲜半岛的绝佳跳板

李成桂麾下部将李之兰成功射杀“阿只拔都”的举动，极大地挫伤了倭寇的斗志，高丽军队趁势取得大胜，俘获倭寇600多人，杀敌无数，史称“荒山大捷”。据说

当地的河流都被倭寇鲜血染红了，过了六七天后颜色都没有褪干净。此战之后，壹岐岛方向的“松浦党”倭寇元气大伤，相当长一段时间无力骚扰高丽边境。而高丽国王辛禑也随即又将矛头对准与明元交战的辽东方向。

公元1388年，明帝国在原双城总管府之地设置铁岭卫，移文告知高丽。高丽国王辛禑、门下侍中崔莹密议进攻辽东，守门下侍中李成桂反对无效。是年4月，辛禑派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出兵辽东。5月，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要求班师，辛禑不听。于是李成桂劝服曹敏修，果断在威化岛回军，返回开京（今朝鲜开城），流放崔莹，此后掌握高丽政权。6月，辛禑退位，其子辛昌即位，以李成桂为东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统使，赐忠勤亮节宣威同德安社功臣之号，都总中外诸军事；10月，兼判尚瑞司事。公元1388年11月，辛禑意图复辟，事败，李成桂以明帝国称王昌非“恭愍王”之后而不许入朝为借口，废辛昌为庶人，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是为“恭让王”。辛禑流放江陵，辛昌流放江华，12月被杀。恭让王只是李成桂的一个傀儡，他以李成桂为奋忠定难匡复燮理佐命功臣，封爵和宁君、开国忠义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田二百结、奴婢二十口，称中兴功臣，父母妻封爵，子孙荫职。



登基为王的李成桂

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掌握实权的李成桂与新兴士大夫势力开始进行私田改革，主要以限制权门世族和佛教势力为目的，这种对经济基础的重新洗牌成为新王朝建立的前奏。首先李成桂下令调查全国土地，公元1390年，将所有现存的公私田册档都予以焚毁。次年，颁布了土地制度的新法令——科田法。规定科田只能取自京畿地区，按每人已有的官阶对官僚集团成员实行分配，其他郡县土地属于公田。这样，高丽权门世族和佛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遭到彻底破坏，从而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另一方面，私田改革也象征着高丽王朝本身的没落，公田的增长使政府收入相应增加，为朝鲜王朝开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公元1392年4月，效忠高丽王朝的大臣郑梦周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刺杀，自此，李成桂篡国的最后一道障碍被铲除。公元1392年7月12日，右侍中裴克廉等胁迫恭愍王妃废黜“恭让王”。7月17日丙申，在右侍中裴克廉、判三司事赵浚、奉化郡

忠义君郑道传、同知密直司事南訚等亲信的劝进下，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开创了朝鲜王朝500年的基业。时年58岁。

李成桂建国以后，就确立了对明事大的基本国策。公元1392年7月，李成桂遣知密直司事赵胖至中国明朝礼部上表称："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窃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臣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启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明帝国方面则以朱元璋圣旨答复："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尔礼部以示朕意。"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郑道传赴南京谢恩，并献马60匹。

当年8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继续讨封："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朱元璋则答复说："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回文书，声教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文书到日，国更何号，星驰来报。"

当年11月，李成桂再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至明朝上表："惊惶战栗，措躬无地间，钦蒙圣慈许臣权知国事，仍问国号，臣与国人感喜尤切。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箕子所建古国名）、'和宁'（李成桂诞生之地）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礼部复以朱元璋旨意答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于是"朝鲜"这一名称经过宗主国明朝批准，正式成为新王朝的国号。不过，虽然国号被批准，但朱元璋一直没有认可李成桂的王位。李成桂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明太祖的册封，在上书明朝时仍然使用"权知高丽国事"，国号更改后则使用"权知朝鲜国事"。朝鲜史官对李成桂屡上书明帝国"跑官"一事，丝毫没有羞耻之感，反而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

李成桂即位后，认为开京王气已尽，开始积极谋划迁都。即位后一个月就下旨由开京迁都汉阳（今韩国首尔，1395年改称汉城），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并在公元1394年开始营建景福宫。其间，一个传说相当传神地刻画了当年围绕新都争论的激烈情形——李成桂的挚友、高僧无学大师曾对汉阳的城池布局提出意见"以仁

王山作镇，白岳南山为龙虎”。首席谋臣郑道传则以儒家立场反对怪力乱神之说：“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闻东向也。”二人互不相让，场面剑拔弩张。最后，李成桂采纳了郑道传的意见，无学挖苦郑道传：“不从吾言，垂二百年当思吾言。新罗义湘大师云：择都汉阳，郑姓人是非之，不过五世，篡夺之祸生；岁才二百，板荡之难至。”

公元1396年，在宗社宫阙营建完成以后，朝鲜正式定都汉城。李成桂即位后，对内继续依靠郑道传等人实行改革，规划新王朝的蓝图，对外则通过招抚、武力征服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李成桂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辖，使其疆域达到图们江。

从朱元璋对朝鲜的态度不难看出，所谓“十五不征之国”中的朝鲜和日本，对于明帝国而言不仅是藩属，而且存在着内部统治阶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不能算做“一国”。因此所谓“不征”，无非是给出足够的外交空间，等待其内部争斗完成之后，再进一步考虑对其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而已。

朱元璋对日本国内局势暂时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同时，日本国内南北朝拉锯的局面却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对于足利尊氏一手创立的京都幕府而言，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苟延残喘的南朝，而是在于连年的征战之中，各地豪强在漫长的征战杀伐中形成了一个个尾大难掉的地域集团，早已将各地的领地瓜分干净。在这一轮洗牌中，不仅各地原有武士阶层积极参与，连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也闻风而动。在站在南朝立场撰写的历史演义《太平记》中便有以“野伏”、“甲乙人”、“溢者”身份登场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乡间的野武士、庶民和农兵。

对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忙于与南朝对抗的京都幕府无心也无力一一镇压。只能委任细川、斯波等同族及少贰、赤松等政治盟友为各国守护。而这些国守护们则通过名为“半济法”的税收制度掌握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所谓“半济法”，顾名思义就是把该地一年年贡中的一半以军粮的名义交给这些国守护们支配。至此“国守护”们已不再是镰仓幕府时代的行政官职，摇身一变成为了以“国”为单位的超级大地主。一个全新的阶层随即在日本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他们就是“守护大名”。

“守护大名”们的出现，可以说是足利尊氏饮鸩止渴的不得已行为。毕竟南朝的“皇军”虽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背后却是公卿、寺社以及商贾势力。令足利尊氏没有想到的是，“守护大名”的隐患还未爆发，室町幕府内部便由于“蛋糕”的分配问题而陷入了名为“观应扰乱”的内讧之中。

所谓“观应扰乱”，指的是北朝观应元年（1350），由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和足利氏的亲信武将高师直、高师泰之间的龃龉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纷争。足利直义在京都幕府之中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政所”和“问注所”的负责人，而高师兄弟则掌管负责军事事务的“侍所”，他们之间的冲突某种意义上与镰仓幕府末期“御内人”和“御家人”矛盾激化所导致的“霜月骚动”可谓是异曲同工。


足利直義
勝春亭画

“观应扰乱”的直接后果是足利直义出奔南朝。但足利直义的养子足利直冬在九州的叛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却令足利尊氏颇有些吃不消。而有趣的是，足利直冬虽然名义上是足利直义的养子，但实际上却是尊氏的孩子。足利尊氏早年在迎娶了北条氏之女赤桥登子之外，还纳了包括同族武士加古基氏的女儿等人为妾。在尊卑有别的时代，即便是加古基氏之女为足利尊氏产下的长子竹若丸都没有继承权，更何况是另一位身份不详的侧室——“越前殿”所生下足利直冬了。

足利直冬从小就被寄养在武藏国东胜寺中，如果不是被和尚玄惠法印介绍给叔叔足利直义收养，其一生很可能便要与青灯黄卷为伴了。因此在政治上，足利直冬更倾向于自己的叔叔。早在足利直义出奔之时，足利直冬正在赴任长门探提的路上，面对高师兄弟派来的追兵，足利直冬效仿他的生父，渡过濑户内海抵达了北九州的肥后国。

此时的九州岛表面上维持着以少贰、大友为首的北朝方和以菊池为代表的南朝势力的对峙，但水下却是暗潮汹涌。曾为足利氏负弩前驱的少贰赖尚在京都幕府建立后，竟发现自己非但没有获得九州的霸权，反而还要接受足利尊氏的“特派员”——“九州探提”一色范尚的指挥，内心的不满自然可想而知。

不过少贰赖尚并没有用“出工不出力”来表达自己的委屈，他直接连“工”都不出。没有了少贰氏的支持，一色范尚不仅在公元1338年的“犬塚原会战”中被菊池武重打得溃不成军，更在此后的10年里始终在九州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一色家族无能的表现却依旧得到了足利尊氏的支持，面对这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领导，少贰氏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而此时足利直冬的到来，更给了少贰赖尚一个揭竿而起的天赐良机。

足利直冬和少贰赖尚的叛乱、足利直义一系的倒戈严重地分化了原本胜券在握的幕府势力。但焦头烂额的足利尊氏毕竟是政坛老手，面对与足利直义合流的南朝兵锋，他理性地选择了“弃卒保车”，不仅果断牺牲了高师兄弟，更主动与南朝议和，把自己一手册立的崇光天皇兴仁赶进了佛门。由于此时正值南朝正平年间，因此日本历史称此次议和为“正平一统”。

“正平一统”的名字虽然霸气，但并非是日本列岛南北朝的终结。随着足利尊氏最终逼死了被南朝抛弃的足利直义，由于“观应扰乱”而陷入分裂的京都幕府各派终

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而本就虚与委蛇的南北朝两方也几乎同时撕毁了和约，双方围绕着京都重又展开了疯狂的拉锯。从公元1352年到1355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反复易手了3次。

虚弱的室町幕府之所以屡屡令南朝纠集的大军铩羽而归，除了足利尊氏的威望和政治手腕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足利尊氏采用了当年后醍醐天皇拒绝的“楠木战略”，利用播摩的赤松氏、四国的细川氏等人占据的外围据点，在对手占据京都后，随即展开合围，逼迫补给不畅的南朝军主动撤退。但此消彼长之间，足利尊氏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公元1358年4月15日亲手埋葬了无数强敌的足利尊氏最终败给了死神，于京都因背部肿瘤病变辞世。而在幕府长达百日的纪念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京都幕府第2代将军足利义诠的嫡子春王丸终于诞生了。而他正是未来最终结束日本列岛南北朝分裂的室町幕府第3代“领导核心”——足利义满。



英年早逝的室町幕府“二代目”—— 足利义诠

足利义满的形象其实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因为他便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足利将军的原型。不过足利义满尽管在动漫作品中形象不佳，在正史中却是一个

少年老成的天才政客。足利义满登上政治舞台之时年仅10岁，在他父亲足利义诠的手中，京都幕府尽管数度调集重兵南征，但始终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却令细川、斯波、今川、上杉、赤松等“守护大名”趁势而起，足利义诠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终究收效甚微。在巨大的压力和极度苦闷之中，足利义诠选择了以借酒色来缓解自己那经常濒临崩溃的神经，最终在透支生命的过程中英年早逝。

幼年丧父，不得不独立面对一干元老、悍将，固然是足利义满的不幸，但幸运的是在足利义满接掌幕府之时，日本列岛已经在长年的征战杀伐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南北朝鏖战已近40个年头，彼此均已精疲力竭，而在京都幕府内部，跋扈一时的元勋们或死或老，唯有执掌四国的细川赖之风头正劲。

足利义诠利用细川赖之嫡子早夭的机会，以细川赖之的妻子为足利义满的乳母，俨然已将足利义满寄养于同宗的细川氏，而足利义诠辞世之际，更指着细川赖之对足利义满说：“为汝与一父，莫违其教。”可谓是做足了托孤的戏码。细川赖之虽然年轻有为，但却也没有独立摆平其他派系、取足利而代之的能力。而恰在细川赖之和足利义满这对有实无名的“义父子”手中，京都幕府进入了全盛时期。

细川赖之很清楚在日本这样地狭人稠的国土，利益分配才是决定人心向背的关键。因此其在辅佐足利义满接任“征夷大将军”伊始的应安元年（1368），便颁布了被称为《应安半济令》的新法令。细川赖之很清楚对于那些由“半济令”而壮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要终止这一战时法令无异于自寻死路。因此在“应安半济令”中，细川赖之首先肯定了“半济之法不可改动”，甚至还要推而广之，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皆可称半济之地”。当然细川赖之真正的目的还在于规范“半济”的收取标准。有几类土地不纳入“半济”的范畴，即“禁里、仙洞、御料所、寺社、一元佛神领，殿下渡领等”。所谓“禁里、仙洞、御料所”，指的是皇室的领地，“寺社、一元佛神领”则是寺庙的土地，至于“殿下渡领”指的则是足利将军的领地。

“应安半济令”表面上看起来平常无奇，但在当时的日本列岛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南北朝的武士们苦苦缠斗无非就为了抢下一块可以合法收取“保护费”的地盘，高僧拼死支持南朝目的也不过是想将武士挡在自己的封地之外。因此“应安半济令”颁布的第二年，南朝的武士首领楠木正仪便怀着艳羡之情“弃暗投明”了。讽刺的是这位楠木正仪恰是为南朝先后肝脑涂地的楠木正成之子，楠木正行之弟。由此可见“七身报国”的忠义最终也难敌“半济之法”的实惠。

在成功策反了楠木正仪之后，细川赖之又将目光转向了南朝势力最为雄厚的九州。由于京都事务的羁绊，细川赖之无法亲自领军出征，于是他任命了远江国守护今川贞世为镇西探提。今川氏虽然与细川氏一样是足利将军的同宗，但长期以来在京都幕府的治下都表现得安分守己。正是这份低调令细川赖之放心地让今川贞世领军西去。而今川贞世也不负众望，不仅成功地击败了南朝在九州的支柱—菊池武光，更顺手在庆功酒宴上干掉了反复无常的少贰氏新任家督—少贰冬资。尽管负责邀请少贰冬资的岛津氏久事后愤而离席，但毫无疑问，在少贰氏和菊池氏走向衰弱的同时，属于岛津、大友的“新九州时代”即将到来。

由于京都幕府的一系列内讧，南朝随后又苟延残喘了二十余年，但足利氏已经走出了往昔的阴霾。公元1378年，亲政的足利义满搬迁到了位于北小路室町（今京都市上京区）的新御所居住，由于此后的历任将军都以“室町殿”相称，因此足利义满之后的“京都幕府”也被称为“室町幕府”。尽管这所号称“花之御所”的新宅费尽了细川赖之的心力，但功高震主的他在其中却早已没有了位置。

一年之后，足利义满借口细川赖之政敌的叛乱，逼迫细川赖之辞职回家。心灰意冷的细川赖之在写下了“人生五十愧无功，花木春过夏已中，满室苍蝇扫离去，起寻禅塌卧清风”的《海南行》之后愤而落发出家。这种鸟尽弓藏的结局果然是权臣的不幸，但遇到足利义满这样的领导却又是细川赖之的幸运。在此后的10年里，细川赖之目睹了足利义满逐一将逼走自己的政敌一一铲除。但细川赖之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学生足利义满结束日本“一天两帝南北京”的分裂局面，于公元1392年3月2日离开了人世，8个月之后南朝的后亀山天皇熙成接受了足利义满的条件，带着象征日本皇权的“三神器”离开了吉野行宫北上京都。至此，日本列岛延续了57年的南北朝局面才最终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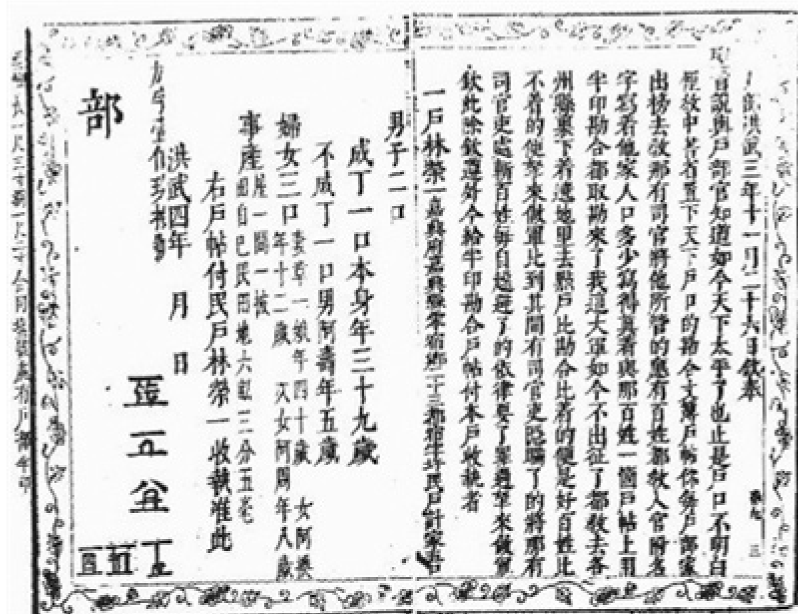
日本画家笔下的花之御所

日本南北朝对峙局面宣告终结的同时，朱元璋也基本上完成了其对大明帝国的内部整肃。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

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60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绝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一戶林榮一

男子二口

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

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

事產

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准此

洪武四年 月 日

部

明代的户口本——户帖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

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23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10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常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3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1.5万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4.5万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而在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过程中，日本还无意之间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便是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过程中持续发酵的“如瑶藏主”案。如瑶藏主是一个日本僧人，曾经作为日本政府的使者向明帝国朝贡，根据《明实录》记载，如瑶藏主访问明朝的时间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按照《明实录》的记载，如瑶藏主是受“日本国王怀良”的指派。不过洪武五年（1372）的时候，怀良亲王已经被北朝方的九州探提今川贞世（了俊）击败，失去了博多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朱元璋派遣的使者僧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恰好在日本进行访问，并成功见到北朝的幕府将

军足利义满。自此，日本北朝政权开始同明朝政府开展外交接触活动。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接见了日本北朝的使者之后，已经明白怀良亲王不是日本的国王（天皇）。他开始将北朝持明院统的天皇看作日本正统的国王。

不过此时朱元璋对于日本政府依旧没有好感，如瑶藏主访问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命令礼部起草了两份文书，一份名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另一份名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日本国将军显然是指幕府将军（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如瑶藏主之行是非常怀疑的。而恰恰就在如瑶藏主结束外交活动归国后不久，明帝国内部曝出了前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曾误击日本使船的丑闻。



明初对日主战派周德兴绣像

元末时，林贤曾是江浙一带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部下，张士诚败亡前后才

归附朱元璋。不过此人似乎在海战方面有些造诣。所以朱元璋一度命其出任明州卫指挥使，希望其能够“帅兵守御，以备东海，所任之职务，在精操士卒，仿古名将，务要军民安妥，使境内外无虞”。但林贤却在洪武九年（1376）利用护送日本使者廷用文珪回国的机会，串通“遣宣使”陈得中将日本使者廷用文珪的座舰洗劫一空后击沉，谎报是消灭了一小股倭寇。这件事情并没有瞒过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不过胡惟庸不敢正面上报朱元璋这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而是找了一个别的理由把林贤赶到日本去居住了3年。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胡惟庸此举应该是让林贤去日本善后，以保护自己的心腹陈得中。但公元1380年，胡惟庸本人被以谋反之名处决后，林贤昔日的所作所为也就随即浮出了水面。

由于此时的明帝国有关机构仍在罗织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因此“林贤事件”很快便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距离事件最近的“如瑶藏主”的使团被指“包藏祸心”，不仅在诈献的巨烛中暗藏火药兵器，潜伏精兵四百（一说千人）于贡舫之中。胡惟庸将林贤派往日本，更有“请（日本）兵为外应”的计划，端的是好大的阴谋。可怜的如瑶藏主本人还不知情。洪武十七年（1384）如瑶藏主再度来到明帝国朝贡，随即遭到逮捕，如瑶藏主本人被判死刑，随行人员充军云南。两年之后林贤案审结，林贤本人被凌迟处死，家中男性悉数被诛，女眷则沦为奴婢。

朱元璋之所以突然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了胡惟庸案的刺激，认定日本参与了明帝国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而另一方面却也不无趁势改变对日外交策略的动机。在如瑶藏主第二次抵达大明帝国的前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朱元璋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朱元璋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万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这些姿态不仅是防御，更有可能是朱元璋启动对日远征的准备工作。可惜的是朱元璋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计划落实，便提前败给了时间。洪武三十一年（1398），71岁的朱元璋于5月病倒，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30天以后，平静地死去。

公元1394年，终结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的足利义满早早地便将“幕府将军”之位传给了自己9岁的儿子足利义持，以公卿领袖“太政大臣”的身份当起了室町幕府的“太上皇”。据说足利义满这种“半退休”的生活过得很惬意，他在带领着斯波义将等一干元老出家之后，将原属于公卿西园寺家族的京都“北山第”占为己有，过起了坐而论道、品鉴书画的风雅生活。不过足利义满此举并非是功成身退的自得其乐，而是为自己更上一层楼所作的重要铺垫。

足利义满很清楚随着各地守护大名的壮大，幕府将军不过是其公推的天下“共主”而已，因此前半生作出了诸多努力以期强化幕府的实力，他充实了被称为“御马回”的将军卫队，招揽了诸如二阶堂等昔日镰仓幕府官吏世家，强化了室町幕府日常政务的处理能力，甚至频繁劳师动众地展开“诸国巡视之旅”。但以足利义满的政治眼光不难预见，自己的这些举措无非是暂时压制住了各地豪强的政治野心而已，真正要保障室町幕府长久的统治，唯有取代“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条道路，毕竟在日本这座小庙，不可能容下天皇和将军两座真佛。

长期以来支持天皇的核心力量无非是附庸风雅的公卿和假神之名的寺院而已，因此足利义满出家之后随即将“北山第”的别墅改造成了融合公、武、禅三家文化风格的“鹿苑寺”，由于其装修风格极尽奢华之能事，因此又被称为“金阁寺”。就在金碧辉煌的舍利殿中，足利义满开始拉拢公卿和寺院的力量，开始为自己的家族最终登上权力巅峰而冲刺。

足利义满的计划很简单，他打算首先利用后小松天皇干仁的生母三条严子去世的机会，让自己的正室日野康子成为天皇的养母，再让安排后小松天皇收养自己的次子足利义嗣。如此一来，足利家便成功融入了天皇谱系之中，只要让后小松天皇在合适的时间死去，并传位给足利义嗣，那么幕府将军便与天皇家族正式合体，实现真正的“公武合体”。

在野史之中，足利义满为了保证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因此视与足利义嗣同年出生的后小松天皇庶长子“千菊丸”为眼中钉，将其逐出皇宫，安置在京都安国寺，而这个“千菊丸”长大之后也选择了遁入空门，成为了日本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奇僧—“一休宗纯”，也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聪明的一休”。

当然这一说法无非是坊间传闻，后小松天皇尽管不算“多产”，但到足利义满逝

世之前也有两位嫡王子诞生。如果足利义满对一休的“流放”单纯是出于为足利义嗣扫清障碍，那么足利义满更没有理由会放过后来登基为“称光天皇”的嫡长子躬仁了。事实上促成一休宗纯的坎坷命运的，恰恰是其在银幕上温柔贤淑的母亲——藤原照子。



被称为“金阁”的鹿苑寺遗址

藤原照子尽管为后小松天皇所宠幸，但却站在自己家族的立场之上，怀有复兴南朝的野心，据说甚至有刺杀后小松天皇的计划。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无论是后小松天皇还是足利义满都没有理由将她长期留在身边。而正是担心“千菊丸”日后成为野心家的旗帜，足利义满才最终选择将其送入空门。应该说仅就政治家的角度而言，足利义满的这种处理方式亦不失为仁慈。



晚年的足利义满

历史上真正阻挡足利义满取天皇而代之的，并非是血嗣的延续，而是政治力量的对比。足利义满很清楚，天皇世代的传承早已在日本列岛深入人心。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要有周全的部署和准备。于是一个神秘的预言在日本悄然流传，这首名为《野马台》的预言诗据说出自中国南梁高僧宝志之手，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句便是“百王流毕竭，猿犬称英雄”。



朱允炆画像

足利义满自己的解释是，“百王”说的是天皇世系只能相传一百代，而后小松天皇恰好是第一百任天皇。而更为巧合的是建立武家政权的源赖朝属猴，而足利义满恰好是属狗的。拿着这首预言诗，足利义满随即找到了日本神道教的头目—吉田兼敦和公卿首领坊城俊任，不过这两位都毫不客气地告诉他：“‘百’应该只是泛指很多吧。”至于还有半句，这两位没好气地说：“预言只说‘称英雄’，又没说你们这两位‘猿、犬’可以称王道孤！”

既然含糊不清的预言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足利义满也就只能请求《野马台》诗名义上的产地—中国给出“最终解释”了。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通过九州博多豪商肥富，向雄霸东亚的明帝国递交了讨封的国书。日本南北朝的乱世固然是公卿、武家逐鹿的猎场，同时也是日本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盛世。在战火中倾覆的庄园，令众多自耕农走入工坊，而失意的豪族也纷纷转战商海。到室町幕府统一全国之日，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了以城下町（集市）为主要单位，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封锁，令商贾们和室町幕府都感觉如芒刺在背。

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严令今川贞世的继承者—九州探提涉川满赖禁捕倭寇，同时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再度向明帝国派出了朝贡的使团。此时的明帝国正处于名为“靖难之役”的内战之中。正被自己的叔叔朱棣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惠帝

朱允炆自然乐见其成，随即接受了对方的纳贡。有趣的是，由于在朱允炆的任内与室町幕府有这一外交往来，日后也有传说这位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终老于日本，更有人以其为后嗣自居。

由于朱元璋去世之时，其早年钦定的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因此皇位由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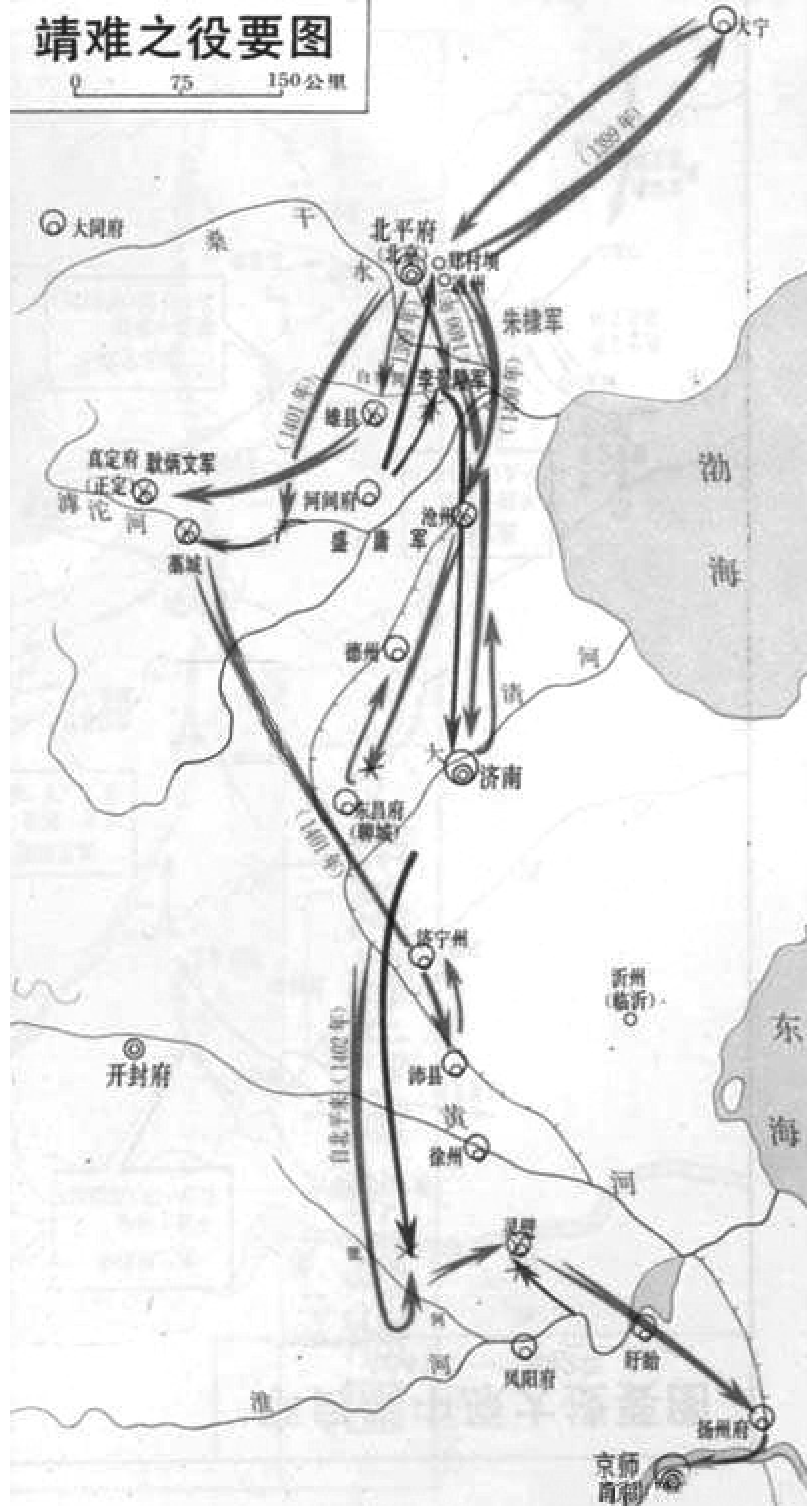
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朱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朱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朱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朱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朱允炆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朱棣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至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朱棣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

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驻兵真定，前锋9000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燕王朱棣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3万。

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10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朱允炆听闻耿炳文兵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50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朱棣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诫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8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朱棣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州之间），李景隆合兵60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朱棣攻城3月不克，退师北归。

朱允炆又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朱棣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朱棣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



靖难之役要图
0
75
150公里
大宁
北平府
朱棣军
李景隆军
雄县
真定府
(正定)
耿炳文军
河间府
沧州
盛庸军
藁城
德州
济南
东昌府
济宁州
沂州
(临沂)
沛县
徐州
开封府
凤阳府
盱眙
扬州府
京师
渤
海
东
海

靖难之役要图

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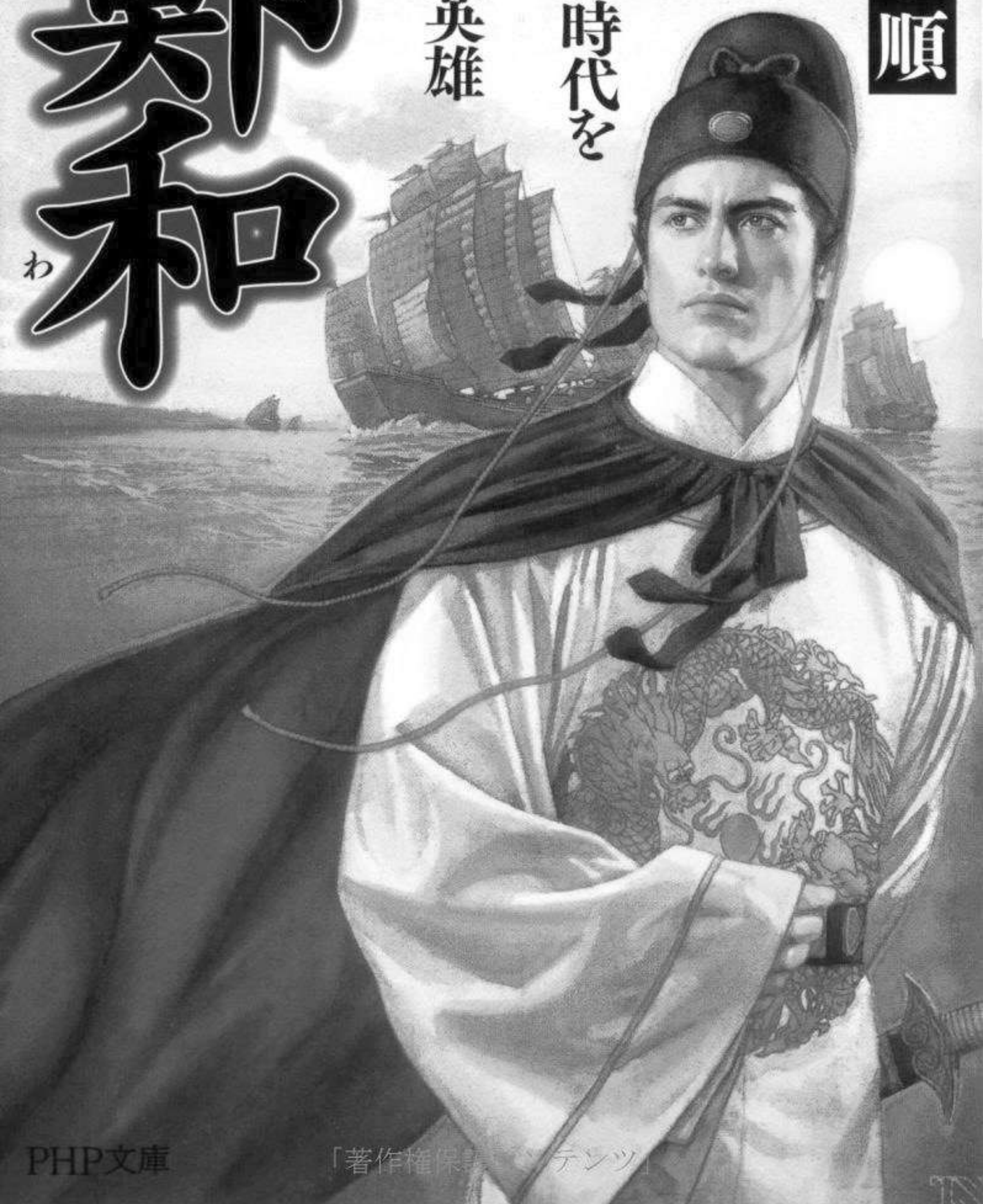
足利义满还未来得及向朱允炆提出重开双边贸易的请求，朱棣的大军便开进了明帝国的首都金陵。足利义满本身就是“乱臣贼子”，自然不敢计较朱棣的“得位不正”。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日本的使节与琉球、暹罗等国的朝贺团一同抵达，在庆贺朱棣登基之余，自然要旧事重提。



明成祖朱棣

以朱棣好大喜功的个性，自然不会拒绝日本的称藩入贡。但是在都御史王抒上

报“倭寇未绝”的情况下，朱棣还是决定先遣使与室町幕府进行交涉。而委派去日本的正是日后纵横南洋的“三宝太监”—郑和。郑和这次鲜为人知的“下东洋”，似乎并非是单纯的外交活动，明末学者顾炎武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书》中说其“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或有所夸张。但郑和出身武臣，选择由其出使明帝国自然不免有武力威慑的意味。而足利义满表现得也颇为知趣，不仅主动献上了宝刀骏马，更将盘踞对马、壹岐等地的倭寇团伙一扫而空“执其渠魁以献”。



日本人眼中的郑和

郑和虽然没有将这些“海盗头子”引渡回中国受审，却见证了这些恶贯满盈的“恐怖分子”被日本方面用酷刑“蒸杀”。应该说这种刑罚虽然颇不人道，但却也是日本列岛对付盗匪的一贯手法，日后号称“侠盗”的石川五右卫门，也是被丰臣秀吉以此种手法处死的。在听取了郑和相关汇报之后，向来心狠手辣的朱棣感觉很对胃口，随即以“嘉其勤诚，赐王九章”的方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得到了“日本国王”的金印、冠服等物之后，足利义满颇为自觉地以“日本国王，臣源义满”的名义表达了感激之情。不过对于自己老爸这种“挟洋自重”，意图取天皇而代之的做派，新任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并不认同。



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之后，足利义持随即改弦易张，他首先拒绝了后小松天皇给予足利义满“太上法皇”的封号，理由是日本坊间早有传闻说足利义满与后小松天皇之母三条严子通奸，后小松天皇实为足利义满的私生子。室町幕府如果接受了这一封号无疑是授人口实。

在拒绝了足利义满一生孜孜以求的天皇封号之后，足利义持又利用守护大名上杉氏宪在关东的叛乱，将足利义满苦心培养的天皇“接班人”—足利义嗣赶进了相国寺幽禁，并最终将其处死。而对于足利义满与明帝国建立的“睦邻友好”关系，足利义持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尽管在足利义满死后，朱棣不仅派出使团前来吊唁，更允许足利义持继承“日本国王”的封号，但是足利义持还是在亲信斯波义将的鼓动下，悍然与明帝国断交。

足利义持在写给明成祖朱棣的国书中，不仅表示日明建交是“惑于左右，猥通外国船信之问”，更将自己父亲足利义满之死也归咎于“受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随即再度放纵起骚扰中、朝两国海岸线的倭寇来。以朱棣的个性，如果不是明帝国忙于追讨漠北的蒙元残部，很可能会再度委派郑和渡海远征。

第二章　勘合银符

龙兄虎弟
——朱棣与李芳远的“联合反恐”行动

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明成祖朱棣连续两次御驾亲征，深入大漠，打击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的北元势力。而这两次北伐，朱棣又选择自己燕王时代的“潜邸之臣”——刘荣作为前哨先锋。挑选一位已经62岁的迟暮老将为大军负弩前驱，朱棣显然有他自己的考量。刘荣起于行伍，很早便冒用其父刘江之名投身于徐达的麾下，参与过朱元璋时代明帝国对西北的多次远征。这样富有经验的职业军官“给事燕邸”，自然获得了朱棣的信任和倚重。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政权的军事行动中，刘荣所统帅的数千精骑一度成为了战场上扭转乾坤的奇兵。

应该说作为朱棣大军的前锋部队，刘荣的工作可谓尽忠职守。不仅在进攻阶段“乘夜据清水源，败敌斡难河”，在大军回师过程中也充当着殿军的角色，掩护着由大量“武刚车”组成的辎重部队缓慢地撤回大明的疆土。对于这员已是“知命之年”仍“下马持短兵突阵”的老部下，朱棣自然是欣赏的。因此在两次北伐告一段落后，朱棣委任刘荣为都督总兵。镇守北邻蒙古、南有倭患的辽东地区。

如果仅从综合国力和舰队吨位来考量，此时的大明堪称世界第一海军强国。来自日本列岛的海盗舰队根本无力与明帝国海军正面冲突，永乐四年（1406），明帝国北上输送粮、饷的海运船只在山东烟台附近的沙门岛与倭寇舰队遭遇，戏剧性地出现了运输舰追赶海盗船的奇景，最终一群不以战争为生的大明漕卒将硬是将武装倭寇赶到了大连金州的白山岛上，“焚其舟殆尽，杀溺者不计其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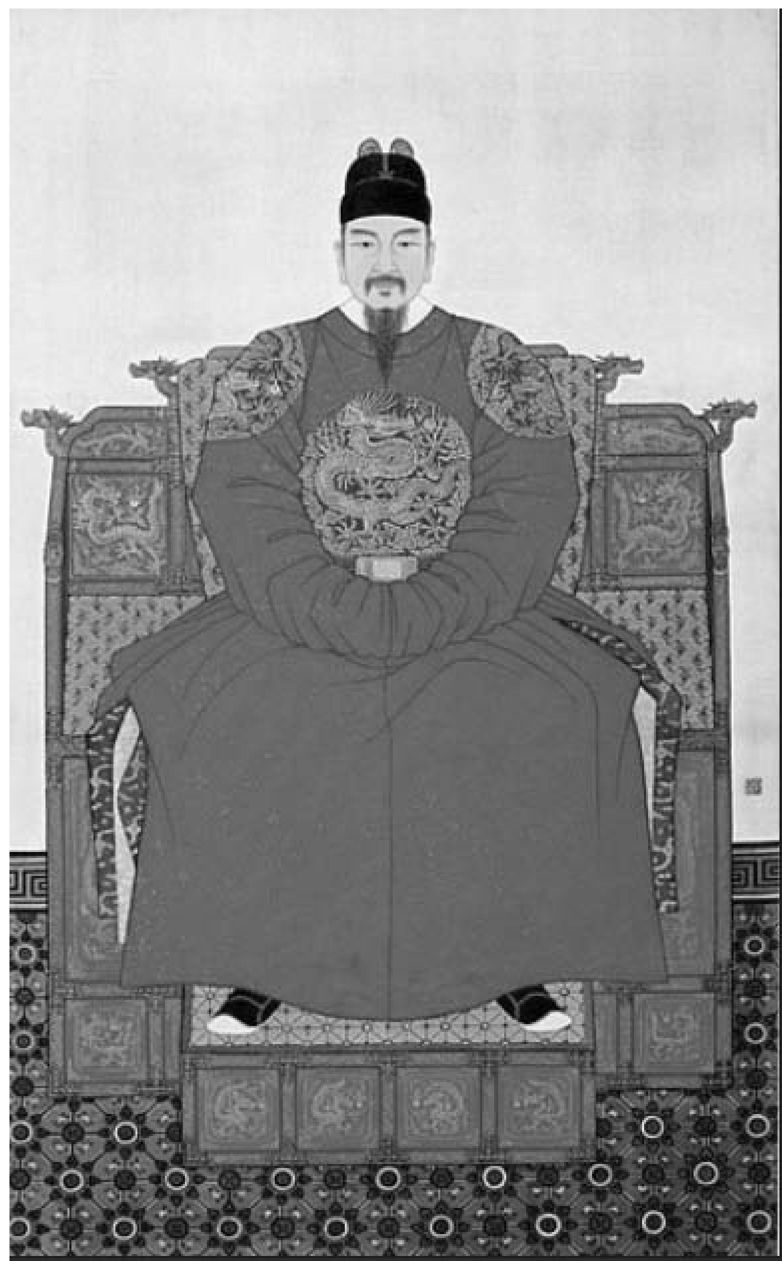
依靠战舰的优势大明漕卒也能将武装倭寇击败

但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大明帝国空有强大海上力量，却无法在大洋上准确地发现并截获对手。因此千里海防线仍需大量的陆地工事来守护。刘荣出任辽东总兵之后，随即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7座，初步构筑起了辽东半岛的海防网络。

公元1419年5月，日本北九州和对马岛等地再度发生饥荒，在室町幕府的默许之下，对马岛豪强宗贞盛雄心勃勃地扬帆下海，再次劫掠了朝鲜半岛的忠清道与黄海道。此次行动宗贞盛胃口颇大，在骚扰完近邻朝鲜之后，一支由31艘战船组成的倭寇舰队继续西航，冲向更为富庶的中国辽东半岛。但无论是足利义持还是宗贞盛，或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流氓行径，早已引发了中朝两国的极度不满，一场“联合反恐”正悄然展开。

此时主政朝鲜的虽然是世宗李祹，但实际权力却握在“太上王”太宗李芳远的手中。李芳远的成长道路与明成祖朱棣颇为相似，作为朝鲜王国开国君王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虽然为自己的父亲篡夺高丽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被长期排除在继承人的行列之外，心怀不满的李芳远发动了两次“世子之乱”才最终清除了幼弟李

芳硕和二哥李芳果的势力，成功登顶。



与朱棣同样心狠手辣的李芳远

朝鲜王朝开国君主李成桂有两个王妃。原配是承仁顺圣神懿王后安边韩氏，恭让王二年去世。继妃是顺元显敬神德王后谷山康氏。李成桂把神德王后所生的最小

的儿子——八子李芳硕立为世子，把辅佐大任交给郑道传。郑道传当时掌握着军权和政权。创业中立下功劳的五子李芳远对此心怀不满，终于在太祖七年（1398）八月发动政变。

李芳远发动政变时，李成桂正在病中。李芳远的府邸在汉城俊秀坊，坐落在景福宫西门迎秋门附近。李芳远因势力弱小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召集府中私兵和守卫景福宫的禁军，杀入宫中，冲入世子东宫——资善堂，乱刀砍死了李芳硕，然后从景福宫南门杀出，袭击大臣郑道传。郑道传的家宅号为叫百子千孙堂，在汉城寿进坊。那时郑道传正在家中同世子李芳硕的丈人沈孝生进行欢谈，乱兵杀进门来，遭受意外袭击一同身亡。掌握政权的李芳远对郑道传非常仇恨，将他的住所没收改成宫中饲养马匹的司仆寺。神德王后所生的另外一个儿子李芳蕃也同在此变中被杀。是为朝鲜的“第一次世子之乱”，又称“戊寅靖社”。

“世子之乱”发生后，整个汉城沉浸在不安和恐慌的氛围中。李芳远冲进宫中，宣布“李芳硕、郑道传谋反，图谋杀害王子”。在李芳远操纵下，李成桂被迫让位给二子李芳果 。失去了王后康氏和儿子芳藩、芳硕之后，李成桂患了一种像火一样堵塞喉咙说不出话的疾病。定宗不喜欢散发着血腥味的汉城，定宗元年，李芳果以参拜神懿王后韩氏的陵墓为由，前往开京，就在开城寿昌宫定居。当年三月，李成桂也被迫移宫。走过神德王后的贞陵前时怎么也迈不开脚步，慨叹：“初次迁出汉阳不是我个人的意愿，是和国人们商议的。”回到开京后，又说：“我迁都汉阳后失去王妃和儿子，现在重新迁都，对都邑人们实在惭愧。”

在“第一次世子之乱”后的李芳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也由此引起了其他王子的不满，李成桂的第四子李芳干也垂涎王位，于是和李芳远交兵。公元1400年，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李芳远和李芳干两人各自动员私兵，在开京街头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最终李芳远获胜。在这次战斗中取胜的李芳远已经不再甘心于幕后操纵，于是从李芳果手里接过了王位，就是李朝太宗。政变后，李成桂自开京出奔，直逃老家咸兴，皈依佛门，并居住在幼年的潜邸（咸兴本宫）中。李芳远为了探问，多次派出所谓“问安使”，朝鲜史书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芳硕变后，太祖弃位，奔于咸兴。太宗屡遣中使问安，太祖辄弯弓而待之，前后相望之使未敢道达其情。时问安使无一得还者。太宗问君臣‘谁可遣？’，莫有应之者。”

公元1402年，李成桂终于还是被儿子李芳远从咸兴挟持回京，据史料记载，李成桂回京时企图用弓箭射死太宗，可见父子感情之淡漠。此后李成桂被李芳远幽居

在昌德宫内。公元1408年5月24日，李成桂薨于昌德宫广延楼下别殿。共计在王位7年，在太上王位10年，年74岁，庙号太祖，谥号康献至仁启运应天肇统广勋永命圣文神武正义光德大王。明朝赐谥康献。葬在汉城近郊杨州俭岩山下的健元陵。

雷同的人生境遇和相近的性格人品，使得李芳远和朱棣长期保持着惺惺相惜的良好关系。不仅李芳远当年出使明廷，曾与朱棣私下会晤，相谈甚欢。更在彼此的成功道路上“守望相助”。朱棣在南京登基之后，李芳远第一时间发来“贺电”。而朱棣则回赠金印、诰命、冕服等物。李成桂等人多次求而不得的明朝册封，终于在李芳远身上得偿所愿。除了大义名分之外，中朝贸易额也在永乐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赚得盆满钵满的李芳远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竟然在永乐六年（1408）提出恢复蒙元时代朝鲜向中国进贡侍女的旧例。

对于李芳远的“好意”，刚刚丧妻的朱棣自然是“心领”的，不过他在颁给朝鲜的诏书却说“进封朝鲜贡女权氏等人为妃，完全是看你朝鲜国王的面子”。最后还嫌这些个朝鲜女孩长得实在“寒碜”：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要李芳远下次要多用心一点。事实上挑选朝鲜贡女的工作完全由朱棣的“特派员”内使黄俨等人负责，李芳远为了配合这次“海选”还下令禁止国内婚姻嫁娶。朱棣这些话只能说是揶揄这位“小兄弟”的玩笑而已。此时，这对同样依靠阴谋和武力上台的“龙兄虎弟”联手摆弄足利义持这个“愣头青”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朝两国配合默契的“己亥东征”

在得到了朝鲜官方遭遇倭寇袭扰的通报之后，大明辽东地区随即进入了一级战

备。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因此老于军旅的刘荣并没有采取正面接敌的常规战法，而是令指挥使徐刚率领步兵埋伏于山下，指挥使钱真等率领马军绕到倭寇背后，截其归路，百户姜隆则率领壮士，绕道到海口，潜烧倭寇所乘寇船。

6月15日凌晨，倭寇1500余人，乘着倭船31艘，停泊马雄岛，登岸直奔望海埚而来。对马岛的海盗显然骄横已久，尽管遭遇了明军诱敌分队的抵抗，仍大张旗鼓地冲向望海埚城，直到明军“炮举伏起”，倭寇才意识到堕入了刘荣的陷阱，只能向海边废弃的樱桃园空堡撤退。如果任这些海盗负隅顽抗，缺乏重型火器的明军可能要承受巨大的伤亡。刘荣果断采取围三阙一的战略，空出樱桃园西侧的壁垒，引诱倭寇突围。慌不择路的海盗们果然中计，再度一头撞入了明军的包围圈内。在这场短短12个小时（自辰至酉）的战斗之中，明军阵斩倭寇742人，生擒857人，一举全歼了对马岛海盗的主力。明成祖朱棣显然对这一战果颇为满意，随即给予“诏封广宁伯，禄千二百石，予世券”的封赏。

6月19日，正在对马岛等待部下满载而归的宗贞盛，突然接到浅茅湾的居民前来报告说海面上出现了重重帆影，对马岛全岛一时欣喜若狂，以为自此可以远离饥馑。等到对方登陆才发现竟是由朝鲜王族李从茂亲率的讨伐大军。精锐尽出的宗贞盛自然抵挡不住总数高达1.7万人的朝鲜军队。仓皇之中，对马岛当地的武士只能召集五十几个人进行抵抗，海岸防线顷刻崩溃。不过朝鲜军队此次出征并非为了攻城略地，因此李从茂仅派出小股精锐部队登陆，沿途烧毁1939户岛民的房屋，掠夺船只、烧毁庄稼，找到了131名被倭寇抢来的中国人。

朝鲜军队“入侵”对马岛的消息传入日军足利义持耳中，日本上下顿时人心惶惶。甚至坊间有传闻说明帝国的大军也将随后抵达。心惊胆战的足利义持连忙命令九州各地的豪族派兵前往对马岛，支援宗贞盛。面对日本政府的大举增兵，朝鲜远征军显然有所托大。6月26日，朝鲜军队再次在仁位郡附近登陆，于当地遭遇了日军的伏击。左军节制使朴实麾下的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好在右军节制使李顺蒙、兵马使金孝诚的后续部队及时赶到，这场被日本方面称为“糠岳之战”的战斗才以平手告终。此后朝鲜远征军退守尾崎浦，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尽管没有对马全境实施占领，但是朝鲜舰队沿着该岛的海岸线一路烧杀，还是令宗贞盛品尝到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痛苦。不仅诸多良田、房屋被烧成了白地，甚至连当地居民出海“讨生活”的船只都付之一炬。无奈之下，宗贞盛只能向朝鲜请求停战，甚至自说自话地开出了称藩的条件。好在日本政府及时派遣特使前往

朝鲜王国首都王京（今韩国首尔），重申了对马岛是日本“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杜绝了未来一场可能的领土纠纷。

中朝双方在清剿对马海盗集团中一守一攻可谓是配合默契，不禁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而在结束了被朝鲜官方称为“己亥东征”的军事行动之后，朝鲜王国在处理善后的两个细节更是颇值得玩味。由于朝鲜军队在行动中表现拙劣，朝鲜国内有人提出要将被解救中国人质安置在朝鲜国内，以免丑事外传。不过身为“太上王”的李芳远还是坚持将他们礼送回国。而在与室町幕府的交涉中，朝鲜政府更“刻意辟谣”说朝鲜绝不是遵从明朝的命令进攻日本，可谓是不打自招。

“望海埚之战”及随后朝鲜远征对马的军事行动，一举震慑了妄自尊大的日本政府。为东亚地区换来一个世纪的安定和平，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但16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国内再度陷入动荡，沉寂一时的倭寇现象终再度抬头，而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明帝国此时海防松弛，大量的中国商贩、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也暗中勾结日本海盗“联夷肆劫”，最终酿成了更大规模的“嘉靖倭乱”。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倭寇侵扰劫掠浙江之松门、金乡、乎阳一带，明军剿捕捉获倭寇数十人，解送至京。明吏欲杀之，但明成祖朱棣却认为“成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乃派使臣送还日本，并责问足利义持不通和好及纵民为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至日本兵库，不准进京，只得呈上国书和倭寇俘虏回国。但途经九州之时，萨摩大族岛津氏却遣使随吕渊赴明请求贸易。船至宁波，州官上报朱棕。按以往惯例，无国书一律不准贸易，但明成祖考虑倭寇为患，有意缓和矛盾，特破例准其贸易。可是，岛津氏只是一地方家族，只能约束九州南部自己所辖区域的倭寇活动，而无力制止其他地区的倭寇。在这种情况下，岛津氏也不愿限制自己辖区的倭寇，减少自己财富的增加。因此，倭寇活动有增无减。成祖于永乐十七年（1419）再派吕渊资国书赴日，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吕渊第二次抵达日本之时，恰逢“望海埚之战”及随后朝鲜远征对马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之时。足利义持虽然只派一僧人去兵库见吕渊，并且不接受明帝国国书，只将抄本带回。但看到明成祖朱棣在国书中谴责足以义持“违背前王意愿，持险不通朝贡，且纵民为盗劫掠沿海边民。如不迅速俊改，当兴师问罪”之时，足利义持却有些不淡定起来。更有趣的是明成祖朱棣鉴于以前明使有被杀者，对于吕渊的凶吉亦难料知，故在国书中指出“安书使臣，或囚或杀，任其所为”。

足利义持当然没有囚禁甚至处决吕渊的勇气，更不愿把对明关系过分搞僵，随即只令近臣元容西堂带去一个不愿与明再通和好的谈话笔录，交与吕渊。足利义持实在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只好向神求援，因此在笔录中说，日本不通和好并非持险不服，实顺神意。神不准和好，神意难违。至于小民犯边实属不知，岂有人主教民为盗者，如有当今沿海之吏制止之。对于倭寇之侵掠一笔推过。最后足利义持还不忘搬出历史来为自己壮胆，宣称“元军之来有神助而溺于海，明军如来结果可知”。



明代勘合章

足利义持话说得虽然漂亮，但骨子里却不免外厉内荏。在吕渊回国后不久，日本国内便开始盛传明帝国与朝鲜将要联合进攻日本的谣言。足利义持恐惧元军侵日的重演，对明加强警惕。在第二年，日本应永二十七年（1420），朝鲜使臣至日，足利义持特命僧人惠洪讯问，明政府是否有伐日之举。室町幕府尽管“倒打一耙”地称朝鲜这次惩戒活动为“应永外寇”，但却也自知不是中朝两国的对手。公元1428年，足利义持因为在沐浴时挠伤了臀部感染而死之后，其弟足利义教不得不再度向明称臣，随即恢复了与中、朝的“勘合贸易”。所谓“勘合”，本指古时盖有骑缝章的契约文书。双方需同时出具所持的两符，比对一致后方可开展交易。

在足利义教看来，自己的哥哥将军中断对明外交和贸易关系，只对搞走私贸易和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集团有利，对幕府本身毫无益处。幕府本身的财政收入

原本就很困难，需要从对外贸易和商人那里取得铜钱，中断对明贸易实际上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切断财政来源。那些以武力雄踞一方，对幕府保有某种独立性的地方武士，反倒有赖于走私和倭寇劫掠日益壮大，其奢侈程度和对明商品的嗜爱并不亚于将军。在南北对峙中兴起的大内弘世初进京时带钱不多，被京都武士看作乡下佬，受到轻视。他愤而回国，携带数万贯铜钱和明代珍奇二次进京。广为结交奉行、头人、评定众、艺妓、田乐等各阶层人士，不久便誉满京都。大内氏雄踞长门、周防，便于通商，又便于组织倭寇。他进京所带的数万贯铜钱和明代奇珍，主要来自对明私商贸易和倭寇劫掠。西部的宗氏、涟川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

足利义满晚年，各地大武士的势力已经形成。其中一些大武士如上杉显定总收入为66万石，大内持世为61万石，细川胜元为59万石，斯波持种为57万石，而将军的收入不过100万石左右。这几家的收入不比将军少多少，只要有两个以上大武士的联合势力，就可动摇将军的统治。朝鲜使者去日本，目睹了当时幕府与各大武士势力间的关系，将军的命令只涉及于京城附近，土地皆为豪族所瓜分，国家无仓库，只由富者支持。

因此当正长元年（1428）正月，足利义持死后，永享元年（1429），非常了解情况的新任将军足利义教就职后，立即着手改变这种不利于幕府的政策。足利义教在永享元年（1429）六月，对赴日朝鲜使臣朴瑞生表示愿意恢复对明的外交、贸易关系，同时请其转告朝鲜国王从中斡旋。12月朴瑞生回国，立即向朝鲜世宗汇报。朝鲜君臣商议的结果，认为明日关系紧张不宜斡旋。因此，足利义教恢复明日外交关系的想法，没有及时地传至北京。

另一方面，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死于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后，明帝国王位经过朱棣长子明仁宗朱高炽10个月短暂接力之后，传到了朱棣长孙朱瞻基的手中，是为明宣宗。朱瞻基因外形酷似其祖父，而从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在巩固皇权领域，朱瞻基大有其祖之风。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突然病故之时，身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但得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朱瞻基便火速赶回北京。途中还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叔叔——汉王朱高煦的设伏邀击，这对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政变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

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



但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封地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

御驾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

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请求将

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后，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

但在外交领域，朱瞻基却对自己祖父的一系列举措采取了改弦易辙的政策。朱棣执政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朱高炽短暂的执政期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朱瞻基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趾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解决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朱瞻基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建造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趾。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胡汉苍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明代安南疆域

胡汉苍在国内豪霸一方，对外竟然侵夺明帝国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汉苍侵夺七寨。胡汉苍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汉苍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汉苍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

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20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1200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承。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15府，36州，181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29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应当说明，朱棣攻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趾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拨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12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尽而死，交趾都司吕毅、参政刘昱同时战死。

次年2月，朱棣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11月，张辅擒获安南叛军首领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朱棣正着力于北征，交趾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趾新战乱的导火线。

永乐九年（1411），朱棣不得不第3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趾。张辅到达交趾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趾重新平定。但朱棣凭借武力征服对交趾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趾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趾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朱棣本人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直到朱棣病故，交趾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朱棣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趾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趾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趾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当这个包袱落到明仁宗朱高

炽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趾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趾触怒朱棣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趾问题了。10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朱瞻基虽然明知黎利此举是“借尸还魂”。但在向群臣出示交趾奏表的同时，仍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趾。朱瞻基此举可谓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史称“仁宣之治”。

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朱瞻基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解决倭寇扰边问题。宣德七年（1432）四月，琉球贡使回国，宣宗命内官柴山资国书随员使赴琉球，令其王尚巴志转告日本，关于朱瞻基愿恢复明日关系和制止倭寇侵扰的倡议。宣德八年（1433）六月，柴山至琉球，与琉球王议定于宣德九年（1434）五月柴山亲自赴日资送宣宗沼书。但至期，柴山突然改变初议，于六月回国，将朱瞻基沼书委托琉球王转交。因此，朱瞻基的诏书未能在宣德九年（1434）五月送至日本。

在朱瞻基派柴山赴琉球的同时，日本永享三年（1431），足利义教也决心恢复对明外交、贸易关系，命令组织遣明船。但此时幕府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垄断对明贸易了。遣明船共五艘，其中幕府只有一艘，山名氏船一只，自山氏、一色氏、细川氏大武士及醍醐寺、大乘院等13家寺院共组成3只。永享四年（1432），足利义教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八月从兵库起锚赴明。由于倭寇猖獗，幕府不得不对镇西府下令，命人加强遣明船途中的安全保卫。

宣德八年（1433）五月，龙室道渊一行至北京，二日，献方物和国书。国书称：日本国臣源义教，用宣德年号奉明正朔，但取消了“王”字。八日，朱瞻基召见日本使团并设宴款待，24日，破例赠正使以下220人纱、罗、金织袭衣、铜钱等。如此丰厚的赏赐无非是朱瞻基见日使朝贡，极为欣喜地以为倭寇问题今后将可解决，因而赠赐礼物极厚，尤其铜钱很多，以致后期历次贡使都要求按宣德八年（1433）例赠赐铜钱。

日使与明政府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的基本内容是：10年一贡，贡船勿过3艘，使人勿过300，作为商品运送的刀剑勿过3000。与永乐条约的船200、人200、不得携带军械的限制相比，大为放宽，表明双方贸易额有所增加。由此，室町幕府恢复了与中、朝的“勘合贸易”。所谓“勘合”，本指古时盖骑缝章的契约文书。双方需同时出具所持明帝国发放的银符，以朝贡的名义向明帝国派出贸易船只，在规定地点进行互市贸易。

同时明政府重申：将军应约使如制，不得为乱，制止侵寇，严禁倭寇船下海。宣德条约的基本内容，在此后相当长的贸易往来中，幕府和日商在人数、船只、刀剑数量等方面，虽屡有违犯，但大体上保持下来，特别是倭寇劫掠明显地减少，可以说，朱瞻基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外交目的。由于双方会谈非常顺利，朱瞻基极其高兴。在日使回国之前，六月六日朱瞻基特授龙室道渊以僧录司右觉义之职，回国后令主持天龙寺。但道渊和尚显然没有这份“福气”，在他率使团回国路经杭州的过程中竟圆寂于仁和县中馆驿之中。



令日本豪族趋之若鹜的“勘合贸易”

第二年，宣德九年（1434），朱瞻基派内官雷春为正使率500余人，乘五船，携带宣德勘合、数倍于贡值的回赠品和给予足利义教将军夫妻的赠品以及国书，于五月起航，五月底至兵库。足利义教携妻妾以及众公卿大名，同去兵库参见明使。雷春等内官三人外官二人乘轿、其余骑马，一行数百人于六月初至京。六月五日，足利义教接见明使。接见的仪式基本上沿袭已经过世父亲足利义满的规定，但略有修改。足利义满时，令公卿二人出总门迎接明使，改为令公卿在四足高处迎接明使。接受明国书时，足利义满焚香三拜后，跪坐启封宣读；而足利义教则改为焚香二拜后，站立启封宣读。

在安排雷春等大明使节的过程中，室町幕府方面也颇费周折。按惯例，明使应住于城外仁和寺和法住寺，足利义教的顾问满济和尚认为不妥。因为已与明使约定，在京进行贸易。住处过远每日往来途经旷野，万一有人遭逢不测，于日本不利。因此，将雷春安置于城内六条法华堂，其余分散住于各道场。九月，雷春完成使命回国，足利义教派恕中中誓为正使率船6只，携宣德勘合一至六号随同雷春赴明贸易。宣德十年（1435）十月，日使至北京，但此时年仅38岁的朱瞻基在短期患病后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离世。其长子朱祁镇以9岁的幼龄成为大明帝国的第6任天子。

因新君继位，明日贸易一切条约需要重新厘定，除了重新颁给朱祁镇的“正统”年号勘合符，并命日本将宣德勘合符送回，明日贸易基本维系了原有的模式。室町幕府持明帝国发放的银符，以朝贡的名义向明帝国派出贸易船只，在规定港口

——宁波交割货物，大明帝国则以“国赐”的名义交付日方所需要的商品。不过在勘合贸易船上往往还载有大量的附载物，对于这些商品，明帝国在通过宁波市舶司进行“抽分”（即实物关税）之后，予以“官买”或由“官准牙行”（类似于今天的贸易公司）进行互市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扇子、名刀、漆器等手工业产品之外，明帝国还大量从日本进口硫黄、银、铜等矿物。明帝国对硫黄的需求自然是源于军事领域，而以铜钱收购白银和日本铜，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一方面日本国内银贱而钱贵，明日贸易后期，明帝国15%左右的白银皆从日本流入。而日本的铜矿石中也含有大量的银元素，由于日本没有技术进行提炼，因此明帝国虽然以高价收购，但依旧利润颇为丰厚。

尽管日商在宁波等地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官准牙行”的压价和欺骗，但在“勘合贸易船”停泊期间，当地市舶司便提供日常饮食、用品的免费供应，款待周到。日商采购的中国产品如生丝、药材、字画、书籍更在日本列岛获利丰厚，甚至明帝国货币“永乐通宝”也在日本国内类似于今天美元的信用和购买力，以至于每每勘合贸易船返航之时，日本国内都是一片“唐船归朝，宣德钱到来”的喜悦之情。

明日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令日本国内不再以向明称藩为耻，甚至在船头竖起“日本国进贡船”的大旗来彰显得意，一时之间日本各地的豪强和巨富无不趋之若鹜。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垄断日明贸易的室町幕府自然吸引了众多“羡慕妒忌恨”的目光。公元1441年，足利义教为亲信赤松满佑刺杀，固然这与其个人崇尚严刑酷法，成为令“万人恐怖”的“恶御所”有关，不过其中却也不无独占日明贸易巨额利润，强化幕府权威的因素。

由足利义教遇刺所引发的“嘉吉之乱”，尽管最终以凶手伏法，自赤松则村以来延续四代的赤松氏没落而告终，但室町幕府却无可避免地由盛转衰，作为室町幕府的第7任“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教之子足利义胜仅仅在位8个月便离奇死亡，其弟足利义政继位之后，一度试图维持幕府对日明贸易的垄断，但是幕府派出的勘合船在返航途中遭遇时代盘踞长门、周防等地的大内氏抢劫，血本无归之后，足利义政不得不向控制濑户内海的大内氏和细川氏让渡日明贸易的权益。



令“万人恐怖”的“恶御所”足利义教

大内氏在室町幕府乃至日本历史上都可算是一个异类，其自诩为百济国琳圣太子的说法或许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其是朝鲜南部移民的身份却基本是坐实了的。世代的繁衍和经营最终令大内氏从周防国大内村的小族群逐渐发展为世代盘踞本州西部的“西国霸主”。无论是镰仓幕府、后醍醐天皇还是足利氏，尽管对其屡有打压，但面对大内氏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势力网，最终仍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的政策。

明帝国方面此时也同样深陷“纲纪松弛”的政治危机之中。小皇帝朱祁镇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67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之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因此进入朱祁镇“正统”年代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

朱祁镇年幼即位，遵照明宣宗朱瞻基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太后张氏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朱瞻基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朱祁镇当即应声受命。太后张氏这种“委政阁臣”的做法。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朱祁镇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余人，罢山陵夫役1.7万人，又放库役2640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9.2万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即诏发禁军3万到京畿地区屯田。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縻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

对此朱祁镇询问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

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就全局而言，正统二年（1437）之前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明帝国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还算是符合现实的。但随着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又因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明帝国纲纪遂日趋紊乱。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复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官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3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及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朱祁镇执政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时代开始的。作为朱祁镇昔日老师的“东宫局郎”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更是权势熏天。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朱祁镇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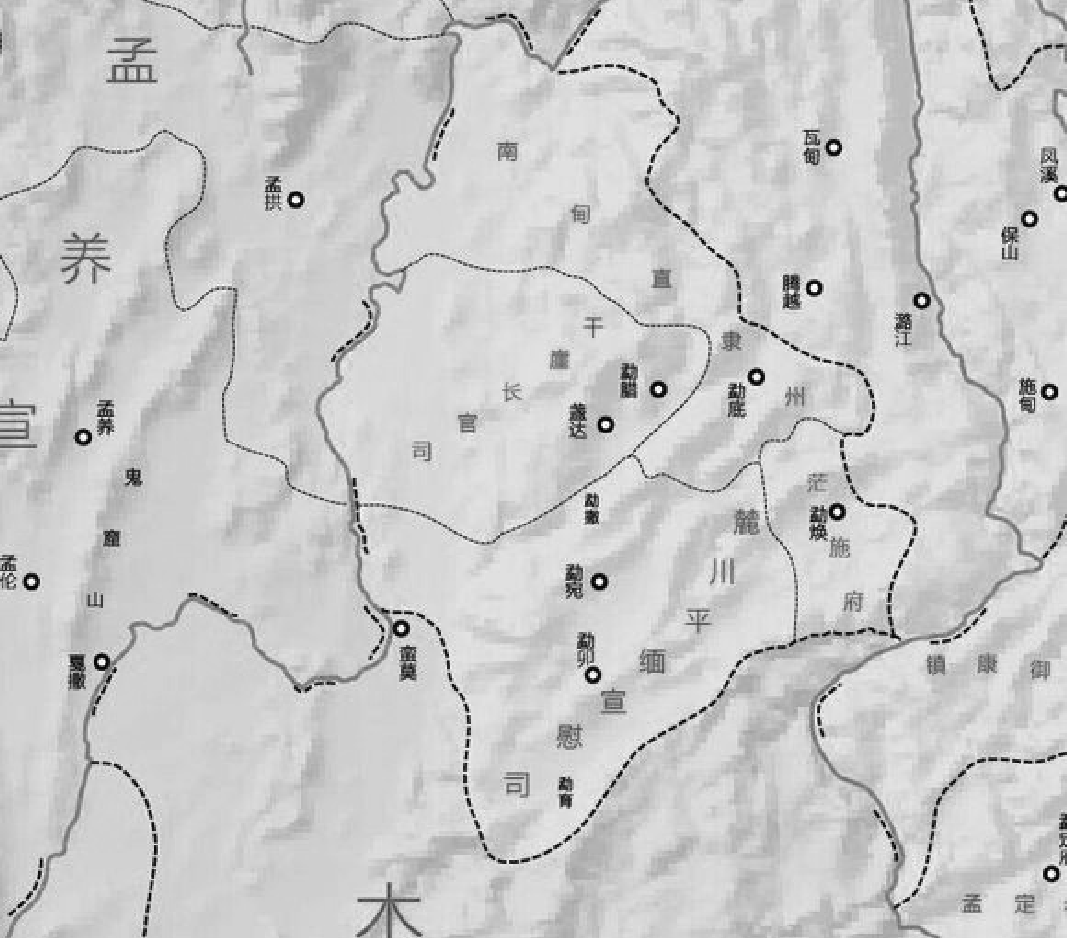
正统元年，杨士奇年72岁，杨荣66岁，杨溥65岁。“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

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朱祁镇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朱祁镇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同时趋于恶化。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明英宗朱祁镇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朱祁镇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3万余人、贵州1万人、四川8000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50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朱祁镇更为亲近宦官，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15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朱祁镇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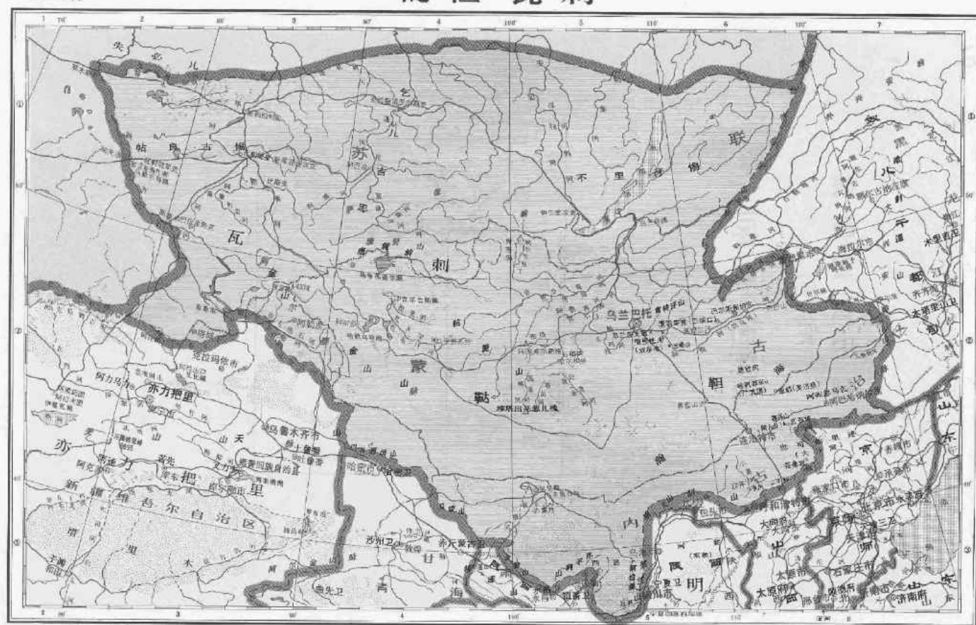
明代麓川及周边地图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时，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朱祁镇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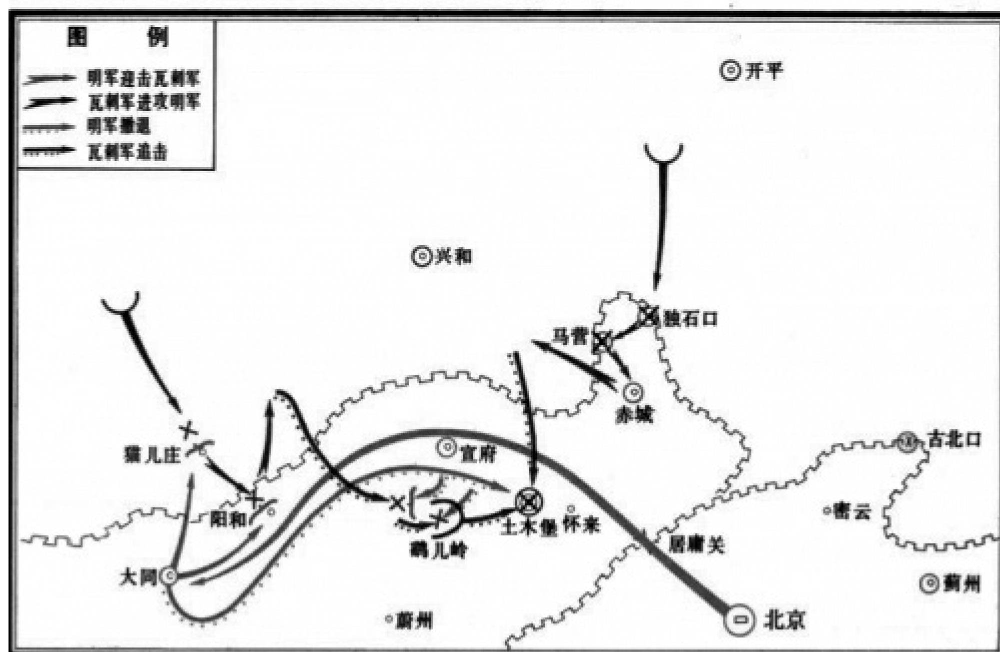
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明帝国面临着内外交困局面。

正统十年（1445），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举兵侵哈密，围攻忠于明帝国的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倒瓦答失里也是蒙古贵族，和也先还沾亲带故，其母弩温答失里是也先的姐姐。因此，在明帝国看来，这场蒙古部落之间的内战完全是舅舅打外甥。加上南方的“麓川之役”尚未结束，因此明英宗朱祁镇对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最终导致西域要道哈密卫易手。不过也先破城之后并没有处死倒瓦答失里，而是俘获要挟其归附。



明代的瓦剌和鞑靼

土木堡之战经过示意图



土木堡之变示意图

在控制了哈密之后，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朱祁镇与王振虽然命郭敬“毋见，毋予粮”，但却并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侵入长城之内的大明疆域。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但朱祁镇与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明帝国大同守军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朱祁镇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朱祁镇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朱祁镇命太监金英辅佐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

随从，亲率50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发。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之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

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明英宗朱祁镇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40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20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遂为瓦剌所俘。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50万精锐尽失，20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堂堂大明帝国的皇帝，竟然成了瓦剌部的俘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自己吞下了宠信王振所结出的苦果。不过因为其身份特殊，明帝国方面当然要避讳其出境，不能说他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辅政太监金英也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钰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朱祁钰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

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朱祁钰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朱祁钰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

相对于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朱祁钰而言，主持北京防御事宜的于谦已经是大明帝国的政治元老了。于谦，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16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92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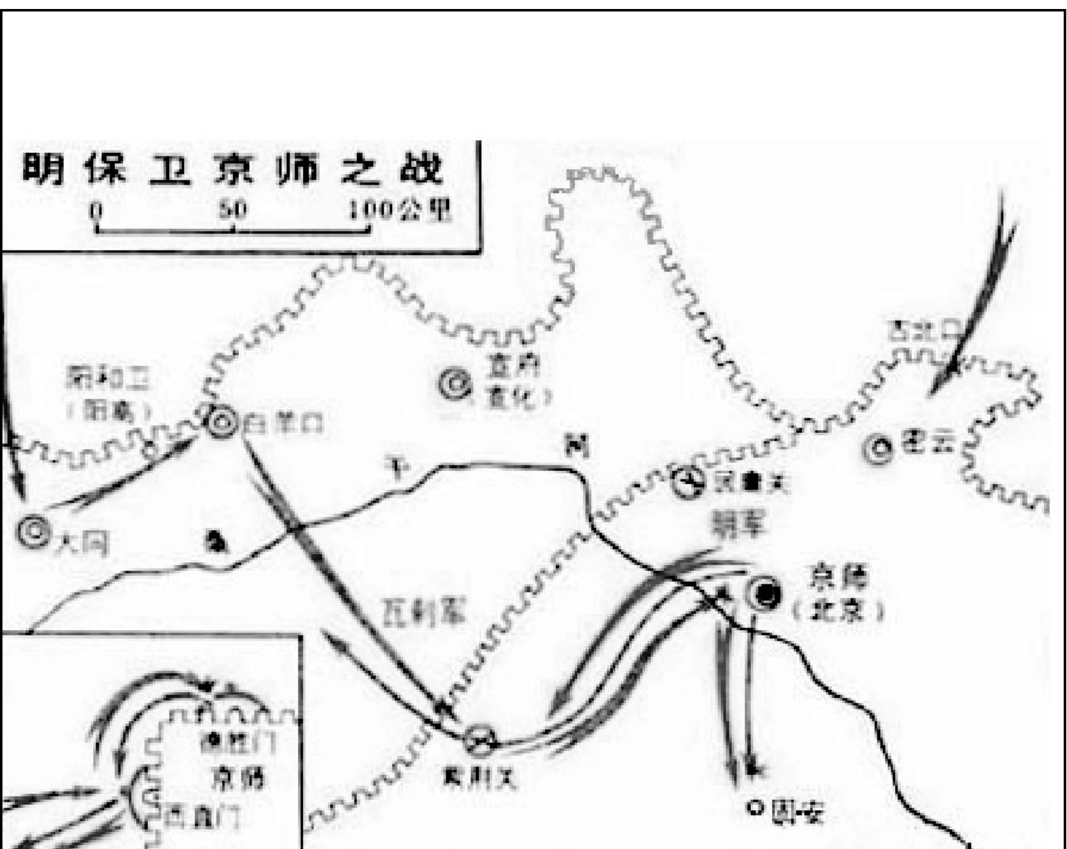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圣旨，以高亢的嗓音，历数朱高煦之罪行。朱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明宣宗朱瞻基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明宣宗朱瞻基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孚众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展现出相当的军事天赋，《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

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 其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明代北京保卫战示意图

十月初三日，瓦剌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剌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剌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

严阵待，意稍沮”。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朱祁钰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

十三日，瓦剌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剌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剌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发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发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剌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剌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剌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而死。瓦剌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两度执政的明英宗朱祁镇

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明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明景帝朱祁钰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自己的哥哥，在于谦的劝说下，最终才勉强应允讲和，接回已经“升级”为太上皇的朱祁镇。

八月十五日，朱祁钰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其送进南宫禁锢起来。从此，朱祁镇及其家人，开始了长达6年又5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直到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朱祁钰病重，由于朱祁钰的独子朱见济早夭。因此大臣们纷纷奏请复立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朱祁钰迟迟不允。十二日，朱祁钰召将领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朱祁钰病势沉重，遂与同党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拥护明英宗朱祁镇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随即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朱祁镇随即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朱祁镇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明英宗朱祁镇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6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然而，明英宗朱祁镇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朱祁镇感到难以控制。

天顺三年（1459）七月，朱祁镇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朱祁镇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食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企图废黜朱祁镇。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2000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3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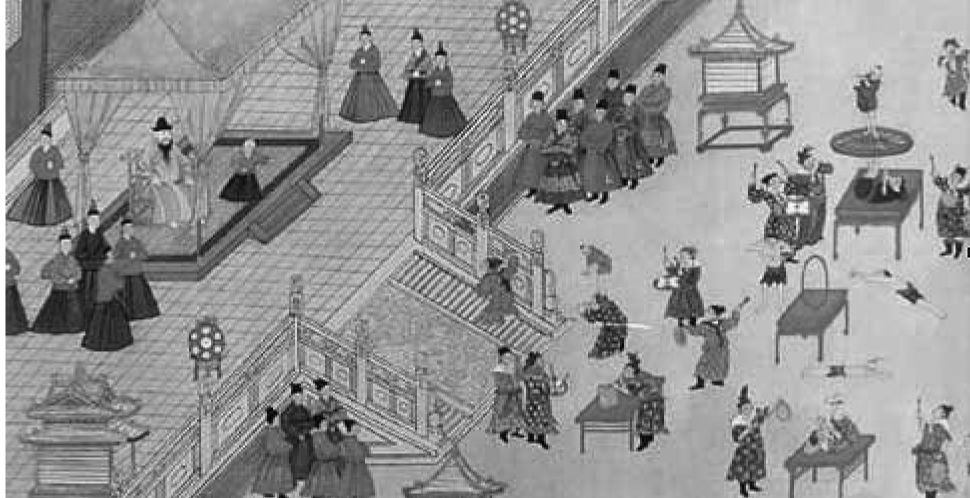
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次执政时期，还算是一个勤政的国君。他曾在文华殿召见阁臣李贤，说：“朕今复位5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随即恭维地说：“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这番话对于朱祁镇来说可谓受用。天顺六年（1462）四月，其诏免河南、开封诸府去年被灾税粮28.4万余石。七月，免两淮盐课30万引。天顺七年七月，免陕西被灾税粮91万石。天顺八年（1464）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朱祁镇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朱见深在文华殿视事。十六日，病情加剧，交代后事，命草遗诏。翌日，复辟帝位整整7年的明英宗朱祁镇病死，终年38岁。

纵观朱祁镇、朱祁钰兄弟交替执政时期，明帝国呈现宦官当政、吏治腐败的现象。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朱祁镇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而在“土木堡之战”之后，明帝国军队战斗力更直线下降，将士无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降。因此有学者提出土木之败，是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分界线。

天顺八年（1464），18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朱见深的童年颇为坎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之后，其后虽被瓦剌部放归，但却被幽禁于南宫之中，身为太子的朱见深也随即失去了自由，在惶惶不安之中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时光。而朱见深刚一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是明英宗朱祁镇晚年颇为宠信的特务头子。《明史》中称他“怙宠骄横，凡忤之者，辄嗾觇卒潜致其罪，逮捕拷掠，使无诘证，莫可反异”，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含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明英宗朱祁镇也未处置门达。朱祁镇病重之时，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朱见深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朱见深由此更加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朱见深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其时，为朱见深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朱见深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朱见深已听不进忠言。



明宪宗的元宵行乐图

朱见深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见深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朱见深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朱见深宠幸。甚至连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朱见深废去，打入冷宫。朱见深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自称子侄，以此博得朱见深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朱见深于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发，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

家安得不危！”



明孝宗朱祐樘

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朱见深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朱见深

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回京后，朱见深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5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朱见深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朱见深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等。

成化后期，朱见深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朱见深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朱见深病死，年41。一个月后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朱见深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6岁时，因朱见深与贵妃柏氏所生的悼恭太子朱祐极病死，朱见深因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朱祐樘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

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朱祐樘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朱祐樘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朱祐樘执政的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祐樘即位仅5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朱祐樘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十月，朱祐樘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招致明宪宗朱见深的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而在弘治年间，朱祐樘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朱祐樘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朱祐樘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戍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13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13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弘治十五年（1502），朱祐樘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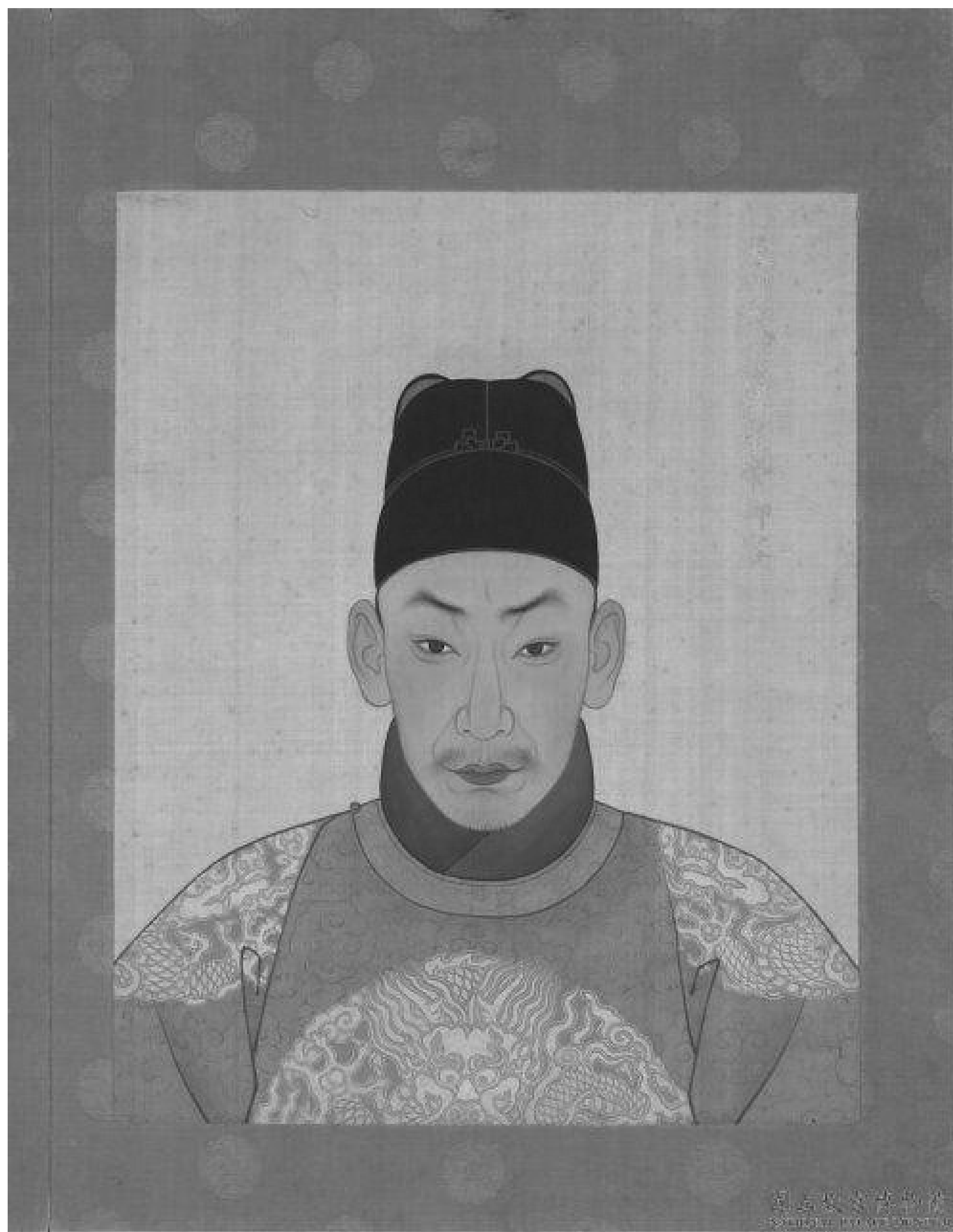
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朱祐樘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大臣忠直敢言，朱祐樘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朱祐樘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明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朱祐樘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朱祐樘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分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朱祐樘大多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朱祐樘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以至于

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明武宗朱厚照

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朱祐樘看了颇为感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朱祐樘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明宪宗朱见深统治的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千余人，朱祐樘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朱祐樘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朱祐樘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久，安能遽削之”。朱祐樘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明孝宗朱祐樘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其后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少的朱厚照“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朱厚照则乐此不疲。

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朱厚照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朱厚照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朱厚照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朱厚照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

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53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

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张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24万锭又5.78万两，元宝500万锭又158.36万两，宝石二斗，金甲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5年内，即搜刮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朱厚照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妄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0），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在进行土地核实“度田”时以50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

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

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朱厚照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发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朱厚照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朱厚照的赏识。一天，朱厚照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皇帝解了围，朱厚照由是日益宠信江彬。在江彬的诱导下，朱厚照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4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朱厚照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朱厚照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4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朱厚照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6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3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朱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朱厚照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朱厚照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朱厚照回驾，朱厚照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朱厚照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朱厚照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31岁。

朱厚照一生渴望统兵打仗，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

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朱祐樘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朱祐樘病逝，其子朱厚照以少年登基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

明帝国陷入政治动荡的同时，邻国日本的室町幕府日子也不好过。公元1449年，出任征夷大将军的足利义政虽然在位长达24年，在其统治时期室町幕府虽然通过推行“侧近政治”、干预守护大名的家督继承来强化中央集权，却在幕府财政拮据、各地民变四起的情况下，收效甚微。而守护大名们争权夺利，百姓不堪天灾人祸纷纷揭竿而起，随即催生出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守护代”。

所谓“守护代”，顾名思义就是代行守护之职的官吏。在日本历史上这一官爵并非室町幕府首创，但是却在室町幕府执政前后逐渐盛行开来。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室町幕府长期以来都招揽守护大名进入中枢辅政，长期忙于幕府事务的守护大名们无暇顾及自己领地的日常事务，于是便委任“守护代”行使其管理地方的职权。这些“守护代”多为守护大名的亲信武将或当地大族，在其“代行守护”的过程中，不免逐渐成为了新的地方实权人物。未来给日本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织田信长的远祖伊势入道，正是在这一时期从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来到了尾张国（今日本爱知县）出任守护代一职的，并以其世代生活的越前国丹生郡织田町为苗子，改名织田乡广。

公元1465年，30岁的足利义政终于迎来了自己嫡子——足利义尚，这本是一件有利于室町幕府传承的好事，但悲剧的是，就在两年前，足利义政由于厌政，而收养小自己3岁的弟弟足利义视，这种做法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在有违人伦，但却是室町幕府册立继承人的一种有效背书。在弟弟和儿子之间，足利义政无疑偏向于自己的骨肉。但他却迟迟不作任何表示，只是用中立和拖延的方式来逃避问题。在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和足利义视的大舅子细川胜元分别发展党羽，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一场室町幕府空前规模的内战呼之欲出。



将室町幕府推入深渊的足利义政

公元1467年，随着分别支持足利义视和足利义尚的两派势力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引发了名为“应仁之乱”的大规模内战。尽管起初双方都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武力夺取京都的短暂政变，但是各地守护大名的加入却使战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客观地说“应仁之乱”虽然波及面广，但真正血腥的大兵团会战却并不多。但是就在守护大名们忙于觥筹交错地重新洗牌之时，被他们引为爪牙的“守护代”却早已不甘寂寞。以越前国“守护代”朝仓敏景驱逐了守护大名斯波氏为标志，“守护代”们逐渐成为了即将到来的乱世主宰。



“应仁之乱”中的日本武士

在“应仁之乱”还有一位命运与朝仓敏景紧密相连，同样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就是出身卑微的骨皮道贤。骨皮道贤不仅名字古怪，履历更是神秘莫测。一般认为“应仁之乱”前，这位仁兄正在京都附近的寺庙的挂单。京都附近向来是寺院势力的角力场。在频繁的天灾人祸面前，各派教宗为了争夺信徒往往不惜刀兵相见。公元1464年，南北朝以来始终保存着庞大僧兵部队的延历寺便砸了新晋崛起的“净土真宗”本愿寺的场子。骨皮道贤从属于哪一方寺院势力虽然不详，但大体上应该也是个披着袈裟的流氓。



早期的“足轻”与武装匪徒没什么区别

在“应仁之乱”爆发时，骨皮道贤在京都已经小有名气，以捕快和特务的身份（目付）维持一方治安。而战争和混乱的到来更给了这个“会武术的流氓”以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面对连正规军都敢抢的骨皮道贤之流“黑社会团伙”，控制京都的细川胜元自然感觉奇货可居，随即将其招安，派去祸害对手的地盘。骨皮道贤本人不

是武士，手下也大多是地痞无赖之辈，自然不能以正规军相称呼，于是细川胜元从古籍中挑出了含义模糊的“足轻”一词为其冠名。

“足轻”一词本非“应仁之乱”才有，在日本历史上的历次动荡之中均有以农民为主体组建的轻步兵参战。在镰仓幕府建立前的“源平合战”时代，他们被称为“步卒”。而在南北朝时代装备弓箭的步兵大量参战，名曰“射手足轻”。但是“应仁之乱”中出现的“足轻”却与前代有着本质的差异，他们不再是建立于土地依附关系之上的武士随从，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的雇佣兵团。

以“足轻大将”的身份深入敌后的骨皮道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堪称是“特战先驱”。毕竟日本武士早已习惯了正阵之师的较量，对于他那套“抢钱、抢粮、抢娘们”的游击战术颇不适应。但是要说完全拿他没辙倒也不确实，随着对手的大军云集，骨皮道贤的“足轻队”最终陷入了铁壁合围之中。兵败之后骨皮道贤穿上女装试图潜逃，应该说此举在日本历史上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此前穿女装的多为白皮细肉的名门贵族，而骨皮道贤五大三粗，一抹络腮胡子最终露了怯。尽管骨皮道贤最终被斩首示众，但是在日本列岛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和他一样满怀着野心的“足轻”们在战场上将由“（无）足轻（重）”上升为“（举）足轻（重）”，最终在风云激荡之中孕育出“天下猿”——丰臣秀吉。

“应仁之乱”在“守护代”和“足轻”们高涨的热情中持续了11年之久。尽管在战乱期间足利义政依旧以幕府将军的身份把持着政局，但其既无心也无力终止战乱，只是一头扎进了自己爱好的艺术领域。足利义政缺乏一个领导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政治手腕，但在风雅和奢靡生活的追求上却大有其祖父足利义满的遗风。

公元1461年，在京都深陷“宽正大饥馑”贺茂川上满是饿殍浮尸的情况下，足利义政依旧沉迷于大兴土木和猿乐酒宴，被足利义满赶入空门的一休宗纯眼见政敌堕落至此，不由写诗讥讽说：“暗世明君艳色深，峥嵘宫殿费黄金。明皇昔日成何事，空入诗人风雅吟。”将足利义政及其妻日野富子比喻成了祸乱唐帝国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或许自己私生活也不检点的一休和尚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足利义政没有唐玄宗早年的辉煌，晚年的人生轨迹却颇有相似之处。

在“应仁之乱”结束前夕，足利义政无奈地将幕府将军之位交给了大权在握的嫡子足利义尚，自己则隐居京都东山。这一点与唐玄宗李隆基避祸入蜀之后被架为“太上皇”如出一辙。而被比喻为杨玉环的日野富子虽然没有在“应仁之乱”中香消玉殒，但也和自己的丈夫陷入了感情破裂的分居生活。

虽然遭遇了中年的婚姻危机，但是在扶持自己的儿子足利义尚上位之后，日野富子对幕府事务的干预却变本加厉。除了频繁干预幕府将军的人选问题，日野富子还公然在京都附近设立收费站，经营高利贷和囤积居奇，甚至做了尼姑还到处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乱政娘们”。正如“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虽然苟延残喘，却陷入了藩镇割据一样，“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也不复昔日的风光，日本列岛随即陷入了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

作为日本“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后代，年轻气盛的足利义尚也与唐肃宗李亨一样是位“马上天子”，应该说经过“应仁之乱”的洗礼之后，室町幕府的威信虽然遭遇重创，但足利义尚作为内斗的获胜方，身边还是团结了相当部分的实力派军阀的。也正因如此，对于公然无视幕府权威，强占寺社领地的六角氏，足利义尚才毅然决定重拳出击，以期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不过正如李亨收拾不了史思明一样，足利义尚拿违逆自己的近江国（今日本滋贺县）守护大名六角高赖毫无办法。



晚年的一休宗纯

为了征讨六角高赖，足利义尚不仅动员了以室町幕府嫡系部队“奉公众”为骨干的两万大军，还深入近江国，于琵琶湖南岸的钓町（今日本滋贺县栗本市）设立遥控幕府事务的野战司令部“钓之阵所”，大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架势。但此时的近江国早已成为了六角氏的独立王国，当地的居民对室町幕府毫无好感。



室町幕府的“马上天子”足利义尚

公元1487年冬季，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盘踞于近江国南部甲贺郡的一伙土匪（地侍）突然走出深山，由于此时六角氏的主城观音寺城已经被幕府军攻陷，而足利义尚还在钓町的司令部终日忙于接见来自京都的公卿和武士，因此防御松懈。由53家组成的土匪联军成功地潜入了幕府军的大本营，尽管只是趁乱放火烧毁了一些工事和建筑，但却给了幕府军士气以巨大的打击。

六角氏为了鼓舞士气、幕府方则为了掩饰失职。双方立场虽然不同，但对这次本微不足道的奇袭，事后的宣传口径却空前的一致，那就是闯入“钓之阵所”的甲贺武士各个身怀绝技，有潜行匿踪的特殊装备。于是在口口相传之下，一个神秘莫测的组织凭空出现，他们被称为“甲贺忍者”。

和“守护代”、“足轻”一样，“忍者”这一职业也并非室町幕府首次出现，早在大和政权的时代，当时日本政府将从事间谍、侦察、奇袭等工作的专业人士称为“志能便”或“斥候”。不过这些“原始特工”在“应仁之乱”前并无固定的组织，只是由公卿或豪族麾下的死士组成“临时客串”而已。随着足利义尚由于酒色过度而于公元1489年在“钓之阵所”死于脑溢血，“甲贺忍者”借助转危为安的六角氏封赏的土地而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



经过一番演变和神化，忍者最终成为日本文化中的一部分

关于“甲贺忍者”的由来，日本野史赋予了其极大的神话色彩，说他们是甲贺群

山主峰饭道山中隐居的传奇人物——“贺茂役君小角”的后裔和门徒。“贺茂役君小角”一般简称为“役行者”或“役小角”。其人物原型是生活于7世纪末8世纪初的魔术师和神棍，其曾自诩可以“役使妖鬼”在直线距离30公里的葛城山与金峰山之间架石桥（当然始终没有建成），而获得了后世日本政府“役行者”的追认。其因擅长日本古代名为“小角”的乐器而被称为“役小角”。

现实中的“役小角”最终由于妖言惑众而被日本政府流放伊豆，最终不知所踪。但是其形象却被向来敬畏鬼神的村妇野老们不断异化，不仅望文生义地说他是头上长有小角的半神，更将其身边的一对信徒夫妻也附会成了法力无比的“前鬼”和“后鬼”。有了这样一位“祖师爷”，“甲贺忍者”们随即也开始标榜自己拥有名为“忍术”的特异功能。

不过令“甲贺忍者”们感到头疼的是，在邻居伊贺国（今日本三重县）还有一家号称“百年老店”的竞争对手——“伊贺忍者”。与假借鬼神之名的甲贺郡同行相比，伊贺忍者编撰的“简历”要完善和可信得多，伊贺国比邻京都，自古便是争夺权力的公卿、土豪招揽间谍、刺客的“人力市场”，而被“伊贺忍者”奉为“开山祖师”的服部家长便曾为执掌朝廷的平氏一族效力。尽管服部家长本人最终随着平氏的灭亡而消弭了一段时间，但为打响品牌，“伊贺忍者”始终强调服部家长并没有战死，而是隐姓埋名重返伊贺。而服部氏也随即成为了“伊贺忍者”的世代首领。

残酷的市场竞争最终令伊贺和甲贺两大流派“忍者”开展了“差异化经营”。“伊贺流”主打“政府采购”的市场，一度辅佐了日野富子推上幕府将军之位的足利义澄、足利义晴父子。奠定了其未来“御用忍者”的基础，而为了迎合主顾的需求，伊贺忍者又按照家族出身，人为地将自己分成“上忍、中忍和下忍”，倒也符合了今天“阶差定价”的营销战略。而“甲贺流”自知没有竞争对手的人脉和名牌效应，于是转攻更为广阔的“民间”市场，为守护大名、“守护代”甚至“足轻大将”、“恶党”所雇用。不过由于这一市场需求相对低端，因此“甲贺流”很少进行内部细分，这就造成了“伊贺流”喜欢单独行动来打响个人品牌，而“甲贺流”则更擅长团队作战。同时与“伊贺流”转圜于京都各派势力，朝秦暮楚的做派相比，“甲贺流”也竭力打造自己忠于主顾的形象。一时之间，双方势力倒也各持胜场。

不过，无论是“伊贺流”还是“甲贺流”，日本忍者在“应仁之乱”之后的战国时期还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伊贺国和甲贺郡均属于群山环抱、地狭民稠的近畿边缘之地。民众为逃避公卿和武士阶层的盘剥、压榨，往往遁入山岭，或依附于寺院或以

修行之名结党群居。其中，“伊贺流”忍术据说便起源于供奉弥勒的“伊贺四十九院”，而甲贺忍者的前身则是以“饭道五院”为中心散居的僧众。

而造成战国时期日本“忍者”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中医和火药的传入。中医理论最早传入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但是在隋唐盛行一时后便随即由于宋元的交替而陷入了低潮。而随着日明贸易的发展和活跃，中医理论再次席卷日本列岛，并延伸出了崇尚“金元医学”的“后世派”和以“医圣”张仲景为祖师的“古方派”。中医理论不仅为日本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更令常年避居于深山中的“忍者”们成为了研制迷幻药、毒药的行家里手。而日本忍者在潜行的过程中大多借助烟雾和爆炸，这无疑是借助了火药之力。

争贡之刃
——“宁波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明日两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并未影响到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景泰四年（1455），室町幕府以东洋允澎为主使组织了第3次赴明贸易使团，这个贸易代表团是明日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乘船10只，到明港口的总人数为1200人，所带货物约为以前的10倍以上。如按以往惯例给价，将得铜钱21.77万余贯。但日本使团抵达明帝国之后，却沿途肆虐扰民，殴打官吏，捶楚馆夫，引起明礼部的极端不满。一面奏请减半付值，一面重颁勘合敦促严格履行宣德条约规定，同时请锦衣卫至倭馆处催促迅速离京回国。

此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正忙着大兴土木，起造银阁，修筑幽美庭园，极需铜钱。除向各大武士征派外，还向五山僧人借款。他极其重视对明贸易。当他听到明政府对日本使团的行为不满时，甚为不安，惟恐由于日本使团的放肆行为，影响今后的明日贸易。他遣派卢圆、柴江为使，于长禄二年（1458）赴朝鲜，请朝鲜王代为致意，表明幕府已对使团中不轨之人加以囚禁并暗示将派使赴明谢罪并进行贸易。此时的朝鲜国王李瑈刚刚篡夺了自己哥哥李珦的王位，急于谋求明帝国的支持，因此很热心地将足利义政的意思转告明朝政府，明帝国廷议之后令朝鲜转告足利义政，再进贡时须选择老成识大体之人充使，不得如前肆扰。在得到明政府仍准贸易的消息后，足利义政随即大张旗鼓地准备第4次遣明贸易。

第4次遣明贸易使团挑选了老成持重的日本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为正使，规模上也严格按照规定，只出动了船3只、人300。这支贸易使团于明成化四年（1468）五月至宁波，十一月至京向明宪宗朱见深呈递国书与贡物。同时，明政府重新颁给成化勘合，命下次将剩余旧勘合缴回。但是，在天与清启回国时，日本国内已爆发“应仁之乱”，并扩大到西部。



随着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恶化，倭寇死灰复燃

拥护山名管领的大内氏，雄踞西部周防、长门、丰前、筑前、安艺、石见等州，势力雄厚。应仁元年（1467）六月，大内氏率军攻占与山名管领为敌的细川管领的兵库。从此，大内政弘控制了由翰户内海至长门、博多、平户的赴明海路，即所谓的中国路。以界町为根据地的细川商船，赴明贸易只能走九州南部海路即所谓的南海路。大内氏是海盗的组织者，细川氏的商船在赴明往返途中经常为大内氏海盗船所劫掠。天与清启所带的成化勘合，在回国途中被大内氏的海盗船抢去。由于大内氏和细川氏的对立，在对明贸易上形成东西两派客商和从商的对立。在对明贸易中一向居于优势的博多、门司等地商人，受到以界町为首的细川派商人的挑战。不仅如此，甚至在组成遣明贸易船队时所雇佣的船和船夫，也受到职市势力的竞争。在“应仁之乱”后，对明贸易船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幕府及武士大名、寺院等从直接参加贸易逐渐演变成从贸易中提取“抽分钱”的经营主，而客商和从商人逐渐走上前台变成遣明船贸易的承包者。

“应仁之乱”的战争耗费了交战各方大量经费，因而都企图从对明贸易中获取巨利，应付战争开支。然而幕府和细川派一方只有旧勘合而无成化新勘合，大内氏一方虽有新的成化勘合，却无金印因而提不出国书。双方都曾转托朝鲜致意明政府，是否按现状赴明贸易，但此时的朝鲜国王已经从老谋深算的李瑈换成了年轻气盛的李晄，年仅20岁的李晄对这种外交事务并不感冒，因此表示拒绝斡旋。无奈之下室町幕府与细川氏便只能拿着旧的勘合符，以界町商人为主组织第5次遣明船。

第5次遣明贸易代表团由竺方妙茂为正使，仍是船3只，人300，携景泰旧勘合和国书，于日本文明八年（1476）四月从界町出发，走南海路从琉球航路赴明。成化十三年（1477）九月至北京。在国书中申明，“敝邑多虞，鼓角未息”，成化勘合为盗所夺，请以景泰勘合验收。特别提出请求，因战乱，国库索然，要求按永乐年间例赈施铜钱。明礼部虽以无先例可援，但经竺方妙茂辞笃情切的恳求，终于破例赐铜钱5万文以及回赐和赠将军的礼品。竺方妙茂于成化十四年十月回国。

日本文明十五年（1483）底，室町幕府组织第6次遣明贸易使团，由于璞周玮任正使，船3只，全由界町商人承包。回国后，界町商人海船拿出四千贯铜钱，其余归己。此后这种承包制便成为遣明船贸易的主要形式了。该代表团于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至北京朝见明宪宗朱见深，在国书中再次重申“抑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以尽，宫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历求在此耳”，“愿得壹

拾万贯，如满所求，则所赐无大于此”。但是，这时明政府的经济状况也在恶化，因而对日本贪得无厌的索求表示反感。明宪宗朱见深召见使者特别指出，以前赴明使者闹事须引起重视，今后使者必须选择识礼守法之人，勿再生事。以后贡物和册搭货物不准过多，应按宣德例。物薄情厚，以小事大之诚，不在良物也。

日本明应四年（1495），室町幕府组织第7次遣明贸易团。大内氏由于无国书虽有成化勘合而不能实现对明贸易，在幕府的斡旋下，大内氏和细川氏共同组成第7次贸易代表团。幕府与细川氏带景泰勘合，大内氏带成化勘合。由尧夫寿奖任正使，一行6船（幕府一只、细川3只、大内氏2只），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初至京，五月回国。因贸易团成分复杂，在返国途经济宁时，日本使团成员强行购买货物，引起口角，持刀杀人。所司上奏，明孝宗朱祐樘随即命今以后只许日使50人进京，其余留在船上，严加提防。



明代飞鱼服

明孝宗朱祐樘显然预感到了危机，但让日本使团待在船上并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中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贸易纠纷——“宁波之乱”。公元1511年，大内氏和细川氏架空了室町幕府，假借“日本国王源义澄”（足利义澄）而包揽了第8次“勘合贸易”。此例一开双方都自然可以撇开对方，独占利润。不过细川氏还未从1507年爆发的内斗“永正错乱”中恢复过来，大内氏却在室町幕府频繁的内乱中如日中天，因此在公元1511年的朝贡过程中，大内氏不但占据了正使的位置，还顺利地获得了明帝国的“勘合银符”，这意味着公元1523年的第9次勘合贸易自然将被大内氏强行“连庄”了。

对于大内氏公然破坏江湖规律的“黑吃黑”，细川氏倒也并非无计可施。因为在细川家商团之中有一位名叫“宋素卿”的外籍雇员。“宋素卿”本名朱缟，祖籍浙江鄞县。朱缟家世代经商，本应属小康之家。但他的叔叔朱澄却在对日贸易中偷奸耍滑，最终在无法按时交货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朱缟抵债给了日本商人汤四五郎。作为一个被贩卖的儿童，朱缟在日本的境遇已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朱缟最终步上了叔父和养父的后尘，进入了中日贸易领域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兼备中日两国的背景，最终令改名为“宋素卿”的朱缟自诩左右逢源。其长期在中日贸易中，利用金钱和谎言建立了非凡的人脉。

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宋素卿自称是日本国王的女婿，而在公元1511年跟随朝贡商团从中国返回之后，宋素卿又穿着明帝国官服“飞鱼服”，更引来日本朝野一片艳羡的目光。应该说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期间对封赏向来随意，“飞鱼服”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下都可以穿。宋素卿以千两黄金行贿于正德皇帝身边的贪财弄权的太监刘瑾，从非正常途径得到了这样一件衣服倒也不是什么难事。而宋素卿从中更看到了明帝国内部的腐败，尽管细川氏手中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执政时期（1488年至1505年）发出的弘治年间“勘合符”，宋素卿依然认为可以瞒天过海。

公元1523年四月间，大内氏和细川氏的朝贡船先后抵达了宁波港。应该说此时两家实际上都没有明世宗朱厚熜政府所发放的“嘉靖勘合符”，但是大内氏所持有的“正德勘合符”毕竟距离较近，因此大内使团上下都认为胜券在握，所以并不在意。而细川使团则做贼心虚，通过宋素卿上下打点，最终成功贿赂了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在“潜规则”的作用之下，细川氏的朝贡船得以优先入港查验。而在5月1日的招待宴会上，细川氏使团又被赖恩安排在相对尊贵的右手一侧。

客观地说事情发展到这里，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太监赖恩并没有关上大内氏朝

贡的大门，以明帝国历年以来对日本朝贡船只来者不拒的惯例，大内氏也绝不至于血本无归。但赖恩和宋素卿显然都错误地低估了日本人执拗的个性，在宴会之上大内氏正使宗设谦道当然发作。在与细川氏的鸳冈瑞佐争执一番之后，宗设谦道随即动员大内氏的商贾和水手冲入明朝海关，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细川派的正使鸳冈瑞佐因无武器，立被斗杀，宋素卿逃出，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毁嘉宾堂、然后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其后，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一路上掳走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卫军诛杀30，生擒20，缚献明朝。

“宁波之变”的发生，固然暴露了明帝国江浙一带承平日久、海防松弛的弊端，但更为严重的是明帝国在处理这一外交事务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追究太监赖恩渎职、受贿的罪名，更草率地采取了断绝“勘合贸易”，废除福建、浙江两地市舶司的“鸵鸟政策”。中日贸易不仅对日本大有助益，同时也滋养着福建、浙江两地的大批商贾。中日贸易的断绝随即导致了走私泛滥，民变四起。这为葡萄牙人的介入及日后倭寇的横行大开方便之门。

“宁波之变”表面上看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但联系当时的日本政局却不难发现“争贡”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由于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尚病死于讨伐六角氏的“钓之阵所”，时年仅24岁，并未留下子嗣。因此在“应仁之乱”一度败于自己侄子足利义尚的足利义视，趁势将自己的儿子足利义稙推到了前台。客观地说，足利义视此举虽然出于私心，但无论从血统还是政治角度看，足利义稙继承将军之位都符合室町幕府的利益。但偏偏此时曾经支持足利义视的细川氏却看重年纪更小、更便于控制的足利义教之孙足利义澄。一场围绕着幕府将军宝座之争的内战再度呼之欲出。

公元1493年，身为室町幕府管领的细川政元联合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利用足利义稙继承足利义尚的“遗志”出兵讨伐六角氏、又卷入畠山氏内战的机会，于京都发动“明应之变”。正式废黜足利义视之子足利义稙，改立足利义澄为幕府将军。细川政元的废立行为不但师出无名，更在足利义稙兵败之后，并未对这位“前任将军”痛下杀手，最终导致足利义稙仅被幽居了两个月后便成功逃亡，于越中国的放生津“另立中央”，史称“放生津幕府”。一场类似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内战从此展开。

足利义稙在近畿地区的活动虽然得到了不满细川大权独揽的各方势力的支持，但就在足利义稙动员包括延历寺、根来寺和高野山等寺院僧兵在内的大军杀奔京都之际，盘踞近江国的六角氏再度扮演了“将军杀手”的角色。在琵琶湖畔，足利义稙麾下大军面对六角氏的攻势迅速暴露了乌合之众的本质。无奈之下足利义稙只能辗转前往本州岛西部，依附于曾经在“应仁之乱”中反对过自己父亲的大内氏。



命运多舛的足利义稙（木像）

时任大内氏首领的大内义兴虽然接纳了足利义稙，但并不急于火中取栗替其夺回幕府将军的宝座。而是打着足利义稙的大旗扩大自己北九州地区的势力。直到公元1507年，号称“半将军”的细川政元因自己3个养子之间的纠纷而遭到暗杀，细川氏陷入名为“永正错乱”的内战时，老谋深算的大内义兴才全力资助足利义稙东进复辟。足利义稙夺回京都，再度登上了幕府将军的宝座。但足利义澄却并不甘心失败，细川氏虽然在内乱中严重失血，但也仍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两位“征夷大将军”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又拉锯了4年，直到公元1511年八月足利义澄病死，支持足利义稙的大内义兴于京都附近的船冈山击败细川澄元所部，足利义稙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稳固。

足利义稙的成功复辟，对大内氏和大内义兴本人来说，可谓事业上的巅峰。公元1512年，大内义兴获得“从三位”的官爵，从此晋身公卿行列，同时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足利义稙的养子足利义维，正式加入室町幕府的近臣行列。但长期“只知细川管领、不知足利将军”的细川氏却依旧呈现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状态，一方面

投靠足利义稙的细川高国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自己养父细川政元乾纲独断的权威，另一方面船冈山之战中败北的细川澄元也仍不断试图展开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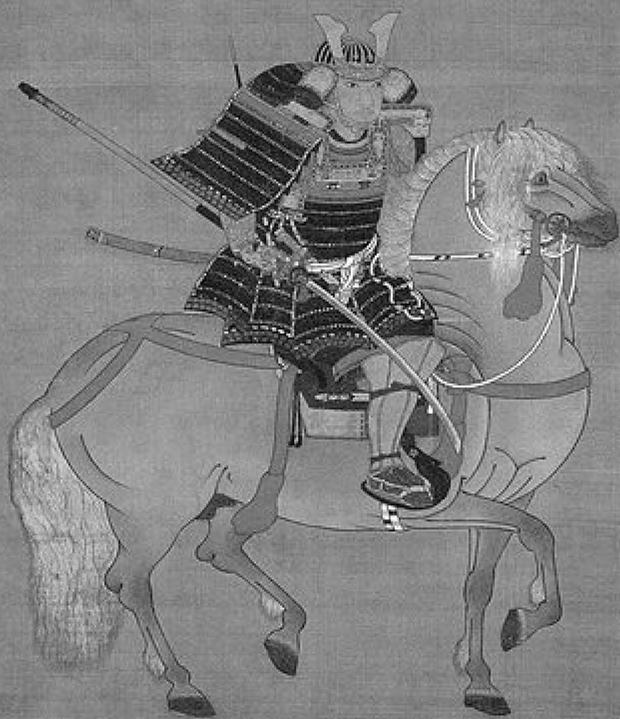
大内府君甲胄壽容 于時公三十五歳
將秋之仲辛未之年右京兆義興擁萬騎
色丹陽弓刀耀日　大將軍義尹來諸侯
發望洛旌旗亘天空群者黃之黑鬚臨塲
而王勤錦鸞卜日合戰得時亂旋運籌决
勝一以當百斬首捕虜級其幾千如陵變
谷府南曰舩鬼神泣兮雲晝々寒鴉啼兮
水漲々四方兩虎穴中指三軍揮晶一日
五鳳樓下賀太平極金鞭謹記厥事具陳
其先北極拱北辰祐降多々良之氏西周
帰西伯併披郝都乎也篇直首紀泉二陶
賞加領守至今將相兩府伴食當撤香積
界喚起維摩居士國清寺追陪豊千老禪
奉直發身澄清天下条神如直廟祠廣前
繁山雖有累土矣觀洛方難爲淵竒彼法
泉出山口響澤布懸廬嶺蓋大祖考之美
譽係于子孫之英賢拜升四位三品羅越
一日九遷風塵三尺社稷一戎威振夷夏
壽考萬年木支百世化行山川舜何人也
禹無間然
永正八年孟冬吉日宜竹景徐周麟謹賛



公元1518年，跟随大内义兴出征京都的出云国领主尼子经久，因不满大内义兴微薄的赏赐，率先发动了反对大内氏的叛乱。应该说对于大内义兴不满的本州西部土豪大有人在，尼子经久的叛旗一起，立刻从者如潮。眼见自己后院起火的大内义兴不得不离开京都，投入与尼子氏的拉锯战之中。大内义兴一走，足利义稙便不得不将对抗细川澄元的军事任务交给自己并不信任的细川高国。这一时期，同为细川氏的两股人马围绕着京都展开拉锯，足利义稙本人亦首鼠两端。史称“两细川之乱”。

公元1520年，在得到六角氏等近畿势力的支持之下，细川高国击败细川澄元，随即便将足利义稙赶下台，扶植足利义澄之子足利义晴为幕府将军。但好景不长，公元1526年，由于细川高国听信谗言杀害重臣香西元盛，随即激反了香西元盛的兄弟波多野稙通、柳本贤治等人。细川澄元之子细川晴元趁细川高国政权内讧的机会，于公元1527年，从濑户内海的阿波国出兵登陆本州，拥立足利义晴之弟足利义维为将军，设立界町公方府。两个将军并立的局面再度出现。

面对细川晴元咄咄逼人的攻势，细川高国兵败自戕。但正所谓“六亲同运”，掌控了京都之后的细川晴元也对自己麾下的重臣三好元长猜忌有加。公元1532年六月，细川晴元与日本当时新兴的宗教武装一向一揆联手逼死三好元长，随即又抛弃了自己所拥立的足利义维，迎回了流浪于近江、投靠六角氏的足利义晴。足利义晴虽然回到了京都，但此时将军权威荡然无存，成为傀儡。而一直试图恢复将军权力，设立由自己亲信组成的内谈众为政治中枢，试图亲政的足利义晴与细川晴元很快再度决裂。细川晴元虽然成功地再度将足利义晴赶出京都，但与三好氏的龃龉，却最终无可避免地敲响了细川氏政权的丧钟。



细川澄元

大明帝国之所以采取如此荒谬的应对举措，不得不说与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熜个人性格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明武宗朱厚照死时无子，皇太后张氏（明孝宗朱祐樘的皇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

孝宗朱祐樘亲弟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15岁的朱厚熜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

四月二十二日，当朱厚熜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朱厚熜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朱厚熜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明武宗朱厚照去世至明世宗朱厚熜即位的37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首先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其次则是收捕江彬。明武宗朱厚照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最后杨廷和还草拟朱厚熜的登基诏书。



明世宗朱厚熜

杨廷和所草拟的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14万多人，减漕粮153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基诏书的颁布，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

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借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朱厚熜相抗衡。

朱厚熜自知在行政事务上不可能与老官僚杨廷和相抗衡，只能在礼仪问题上寻找机会敲打对手。朱厚熜即位5天后，令礼官集议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以朱厚熜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也就是说朱厚熜要尊自己的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自己的亲生父母则降格为“叔父母”。

朱厚熜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朱厚熜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朱厚熜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招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朱厚熜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宁波之变”发生之时，恰逢皇帝朱厚熜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处于紧张对立之际。赖恩等太监作为皇帝的近臣此时便成为了朱厚熜最为信任的人。赖恩收受宋素卿贿赂为其开脱，宁波府官吏大多走太监赖恩的门路，与其统一口径，上报政府。这样，在宁波府关于“争贡事件”的上报中，宋素卿便成为日本进员贸易的正使，因揭发不是正使的宗设谦道玩弄奸诈时而遭追杀。因此宋素卿无罪，应追究宗设谦道，以杜绝今后之祸。

然而明政府官吏中并非全都昏庸无知，尚有刚正不阿之人。御史熊兰等弹劾宋素卿行贿、太监赖恩受贿，事件发生后又不加以制止，分守参政、副使等拱手观望，听凭夷人纵横，皆应治罪。经过近半年的争论，事件起因逐渐清楚，始定宋素卿罪并死于狱中。但是太监赖恩及其党羽，不仅没有治罪，反而各有升迁。嘉靖四年（1525），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朱厚熜令琉球国王转交日本将军一信。信中要求逮捕造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掳去指挥袁班及一应民众，不然将闭绝贡路。

朱厚熜的信，琉球国王于日本大永七年（1527）转至幕府。同年8月幕府又托琉球将回信转交明帝国。足利义晴在信中极力恭维朱厚熜，以求保证贡道畅通，而在所附别幅中，则按细川派的观点对争贡事件作了辩解。说明正德勘合未达京都，使用弘治勘合的原委。同时，表明袁班及一应群众，于前年已治船相送，因风尚阻留于九州，不日当归国。最后声称所赐金印因兵巍丧失，所以信无印章而用花押，

希望再赐金印和勘合以利进员。并要求放回所押宋素卿。明政府礼部接信后见无金印章，以夷情狡诈不可送信为由，再令琉球转告将军，必须擒宗设送回袁班，方可重新颁给勘合与金印。

大内氏同样不愿使进贡贸易渠道受阻，因而在宗设谦道回国不久，也于大永五年（1525）即派家臣赴朝鲜，告知争贡原委，求代向明政府斡旋。大内氏家臣亦带将军义晴的信件。其中说，弘治勘合为奸徒所窃，宗设谦道在明发现，追杀至余姚县，为武官袁班掩护逃走，故擒袁班回日。来年将送袁班回国，先求朝鲜国王转达。大内氏与细川氏各持将军义晴的信，而观点恰恰相反，明帝国由此可知，室町幕府已成为国内大武士进行斗争的手中工具了。不过明朝官员并不知道大内氏在内战中夺得明帝赐给将军的金印。所以大内氏所呈将军国书盖有印章，而细川氏所呈将军国书只能用花押。因此采信了大内氏的说法。在大内氏正与朝鲜王交涉之时，得知界町商人通过琉球已与明政府发生联系，颇为吃惊。于大永七年（1527）派使赴觅球参加其琉球国王尚清的即位典礼，并质问其王为何不将明国书交于大内氏。不过此时的琉球国王尚清正在积极谋划统一琉球诸岛的军事行动，无心参与明日之间的外交纠葛。公元1537年，尚清率军北伐，攻取奄美群岛。琉球王国终于将势力扩张到整个琉球列岛，确定了北起喜界岛、奄美大岛，南至宫古、八重山群岛的疆界，即琉球史书中所称“三省并三十六岛”。琉球王国的崛起自然也影响到了细川氏的南线贸易航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内氏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于天文八年（l539）四月，欲自己组成第10次对明贸易团。湖心硕鼎任正使，率三船由肥前五岛出发驶向宁波。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船至宁波，上报明政府，令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严加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并只准50人进京。船中所有剃刀、小刀类凡属铁器，皆拟兵器例缴藏东库。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正使硕鼎等至京，要求将没收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拨还，发给新勘合。

明帝国礼部则出面驳回，提出：“宗设干犯国法，没收货物系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素卿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今宗设、袁指挥未见下落，推许入贡已是天恩，还想其他，敬顺之意何在？”硕鼎虽然争辩说：“宗设已在受刑，袁指挥在嘉靖十年（1531）送还途中遇风漂没。愿以使臣自身留明朝代受国刑赎罪，务乞拨还宗设、宋素卿货物。”由于礼部坚持原议，硕鼎无所获遂于五月辞京，八月自宁波返回。

碰了一鼻子灰的大内氏并不甘心失败，天明十六年（1547）春，大内氏组成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明贸易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4只、637人，于五月至定海。因距十年一贡期限尚有一年，定海所坚决阻回，不得已于七月驶离定海，在附近回航以待贡期。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策彦所率大内氏对明贸易船，再次要求驶进宁波港，但距贡期仍有数月。巡抚朱纨奏请允其提前进贡贸易，并增加进京人数为百人。策彦要求新颁勘合，因弘治、正德旧勘合仍未缴回，故命下次贡期缴回之后再行颁发。八月初策彦率船回国。至此，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结束了。

明日朝贡贸易的终结虽然由“宁波之变”引发，但背后却有着双方经济上的考量。明帝国方面随着土地兼并、政治腐败等原因，财政收支日益吃紧，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已无以为继。面对这样的局面，朱厚熜虽于嘉靖八年（1529），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但收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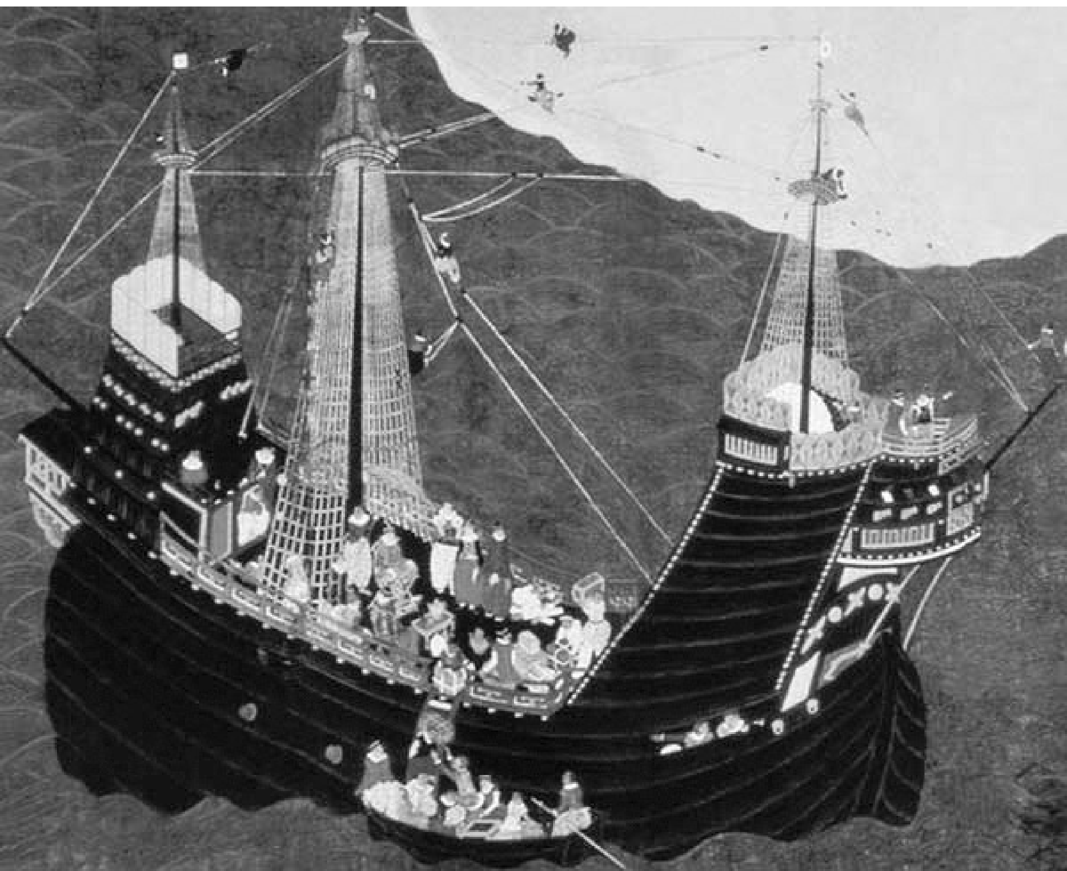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朱厚熜本人沉迷于道教文化，其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朱厚熜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因朱厚熜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借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朱厚熜所任用的官僚之中袁炜、郭朴等人便因投皇帝所好，被讥为“青词宰相”。另外，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的严嵩，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徐阶，虽然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朱厚熜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随着道教在明帝国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加大，政府在这个领域开支也随之水涨船高。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

此消彼长之下到了朱厚熜执政中期明帝国财政已经到了“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的崩溃边缘。这样的情况之下，明帝国自然无心再继续需要财政投入大量开支的明日贸易。

大明帝国对朝贡贸易虽然不再积极，但日本方面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此前的贸易协定，表达足够的诚意，仍有希望令大明帝国重新打开国门。但偏偏此时日本方面国内群雄割据，战争，即所谓战国时代已然开始。各地守护等忙于国内战争，无暇顾及对明贸易，就在细川氏族日益没落的同时，大内氏在本州岛西部的日子也不好过。尼子经久拉拢毛利氏当主毛利幸松丸的监护人、其叔父毛利元就，两家更合兵攻击大内氏在安艺西条的桥头堡镜山城，毛利元就运用离间计内通城主藏田房信叔父藏田直信，得其协助破城，藏田房信自尽。大内氏同时在各地战线也被尼子氏压倒。



日本人眼中的葡萄牙货船

大内义兴虽然于公元1524年部署反击，以嫡子大内义隆为帅出兵安艺，攻击尼子氏盟友安艺武田氏，包围其居城佐东银山城。在尼子氏大举增援的情况下，大内氏的军队不得不主动撤退。这一阶段大内氏唯一的战果，是已继任毛利氏家督的毛利元就怨愤尼子经久暗中支持其弟相合元纲叛乱，宣布重新归顺大内氏。公元1529年，大内义兴于山口馆病逝。而他的继承者大内义隆所要面对的则是一条犬牙交错、无比复杂的战线。

大内义隆就任家督之初，颇有几分励精图治的气象。他率军进攻北九州，与大友氏、少贰氏激战连场，一度支配了海盗世家松浦氏，灭亡少贰家，完成北九州的经略。公元1537年，受将军足利义晴邀请，大内义隆试图再度进军京都。但在途经尼子氏领地之时，却连连失利。特别是公元1542年，在攻击尼子氏主城月山富田城的战斗中，大内氏军队一败涂地，被大内义隆寄予厚望的养子大内晴持也战死沙场。

此战之后大内义隆失去对政治的兴趣，沉迷于玩乐与文化事业，因重用文治派的相良武任而导致军队的反叛。公元1551年，大内氏军队领袖陶晴贤，发动“下克上”叛乱，大内义隆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略作抵抗后于八月底逃到大宁寺。9月1日，大内义隆于长门的大宁寺自裁，享年45岁。史称“大宁寺之变”。

大内义隆自戕之时，恰逢大内氏所主导的第11次对明贸易船回国后不久，国内动乱，已无人再行组织对明贸易。加之，明沿海倭寇、海盗出没无常，正式贸易船极易遭受攻击，大内氏的第11次对明贸易船的第3号船，在返国途中，曾遭受28只海盗船的围攻，死伤许多船员。但日本政府不再组织官方朝贡贸易团，并不代表日本国内便从此断绝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恰恰是在日本国内陷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同时，日本对外交往呈现了井喷的姿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火药武器的传入。

近代日本史学家对火药武器的传入，大多采信“南蛮铁炮说”，即公元1543年8月28日，一艘原定行往中国的葡萄牙商船应避风而误入了九州岛南部的种子岛赤尾木港。当地领主种子岛惠时、时尧父子见葡萄牙商人携带有欧式火枪，随即以重金购置了两支，随即命巧匠八板清定予以仿制，山寨出了名为“种子岛铳”的火绳枪，按照日本人向来喜欢夸大其词的性格，这种火绳枪日后被统一称为“铁炮”。

为了标榜此举意义之重大，日本人不仅在种子岛建碑立馆，更编造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八板清定虽然成功地仿制了欧式火枪，但始终未能尽善尽美。为了实现家主的要求，八板清定只能答应葡萄牙商贾的要求，将女儿若狭姬许配了给对方。好在一年之后葡萄牙商贾再度抵达了种子岛，八板清定随即利用女儿回家省亲的机会，对自己的女婿谎称若狭姬暴病而卒。算是为这个有些虐心大剧补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西式火绳枪传入之前的日本火器

从国人的角度来看，八板清定“以女换枪”的故事充斥着无聊、低俗、讹诈和欺骗。但是在日本却脍炙人口，从真实历史的投影来看，八板清定的个人际遇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妇女大量走出国门，用青春和肉体换取日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宝贵外汇如出一辙。

有趣的是，日本列岛的内战中使用火器的记录早于“种子岛铁炮传入”之前便已经屡见不鲜了。不仅“应仁之乱”中的交战双方有大量使用“飞炮”、“火箭”的记录，即

便是地处相对偏僻的甲斐国（今日本山梨县）的守护大名武田信虎，也有于种子岛铁炮传入的近二十年之前就有抓农夫“试枪”的恶行，由此可见日本列岛将火药用于军事领域并非受葡萄牙人的影响。

事实上蒙元帝国很早便将火药武器带入了沦为其属国的朝鲜半岛。高丽政府更频繁于以“防倭”为名向元、明两大宗主国进口火器和火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式火器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了与朝鲜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而无孔不入的中国商人更可能通过军火走私从日本谋求暴利。这一点从种子岛惠时父子购买葡萄牙火枪时便可窥见一斑，起初双方语言迥异，根本无法沟通，此时一个关键性人物出现了，一个“大明儒生五峰者”主动出面担任的翻译。而“五峰”正是此时横行于中日海疆的海盗头子汪直的旗号。汪直出生于大明徽州府，在这个以商贾文化而闻名的地区，汪直自然也不例外。他利用大明嘉靖年间海禁松弛之际，通过向日本、暹罗等地走私火药和丝绸迅速捞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即又与同乡许栋所领导的海盗团伙合流。

值得注意的是，许栋所盘踞的宁波外海双屿岛恰是葡萄牙对华贸易中在窃取澳门之前的主要据点，《明史》载：“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而根据葡萄牙人品托的《远游记》中的描述，双屿岛上一度侨居的外国人多达上千人，除了葡萄牙商贾外还有大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由此可见，无论担任种子岛惠时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翻译是否就是汪直本人，中国走私贩子在西洋火枪传入日本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掮客角色。

另一个令“种子岛铁炮传入”难以自圆其说的，是这种新型武器在日本列岛普及的速度。除了种子岛家族侍奉的萨摩岛津氏之外，远离九州的本州近畿地区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仿制的欧式火枪。与岛津氏这样的守护大名不同，在近畿掌握“铁炮”锻造和使用技术的是两股民间势力——根来寺和“杂贺众”。

根来寺无疑是日本本土生生不息的寺院势力之一，但是其信奉的是盛唐时代由和尚空海从中国引入的藏传密宗。密宗佛教虽然在平安时代盛行一时，但是由于本身的分化和唐宋之交禅宗佛教的传入而日益式微。在凡事皆讲究实力的日本列岛，密宗开始效仿日本禅宗之中分化出的天台宗延历寺组建自己的僧兵集团。而本身就是密宗内斗而自立门户的根来寺，更以“行人方”（担负杂役的下级僧侣）为主体组建了上万人的“根来众”的武装。而“杂贺众”和根来寺同处纪伊国（今日本和歌山县）北部，是以杂贺乡（今日本和歌山市）为中心的一个民间自治组织。

关于“铁炮”在近畿地区的迅速扩散，日本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根来寺的“监物”津田算长在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得铁炮传入的消息之后，便动身前往种子岛，从惠时父子手中重金购买到了葡萄牙人两支原版欧式火枪中的一支，在带回纪伊国之后迅速展开了仿制的工作。而几乎同时，来自“堺町”（今属日本大阪市）商人橘屋又三郎也从种子岛习得了“铁炮”的制造工艺，并转而专营军火买卖。理论上日本政府官方生产的铁炮则要等到公元1544年二月，岛津义久通过管领细川晴元进献给将军足利义晴之后才最终面世。

日本史学家所铺就的这条“铁炮传播之路”虽然得到了古籍《铁炮记》的佐证，但不得不说还是漏洞颇多。首先重金买下葡萄牙火绳枪的种子岛惠时本应奇货可居，却为何轻易地就将原版和相关技术交付给了毫无渊源的津田算长（《铁炮记》作杉坊算明，究竟是另有其人还是津田化名不得而知）和橘屋又三郎呢？而要解开这个问题，或许还是要从明日贸易在16世纪中期的异化入手。

“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威权不在，长期由大内和细川两家把持的对明勘合贸易更是陷入了“竞争上岗”的激烈对抗之中。而除了在室町幕府内部争夺明帝国发放的“勘合符”之外，支持大内氏的北九州“博多商团”和以细川氏为代表的“堺町商团”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通过中国东南沿海的不法商贩展开了走私贸易。而借“大航海时代”的东风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更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一度垄断了明帝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以至正德年间，广东口岸“朝贡日稀，番商日少，岁入锐减”。

葡萄牙人参照其征服印度的步骤，于公元1509年窃占了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修筑工事之余，大肆收买当地官员，大有化屯门为东亚果阿之势。但是明帝国立国百年，虽然不免有些腐败堕落，但其军力仍非南亚次大陆的一干苏丹国可以比拟的。对于自称“满剌加国”（即马六甲的音译）王子的“求援国书”，明世宗朱厚熜可以不理，但是在接到了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大造火铳，劫掠村镇”的报告之后，明帝国却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于是1521年八月，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首次海上交锋——“屯门海战”随即拉开了序幕。

在“屯门海战”之中，葡萄牙海军所装备的大型帆船虽然犀利，但却最终难敌明军“火船冲击”和“水鬼凿底”的上下夹击，最终在明帝国大军“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杀之”的严厉整肃之下，葡萄牙海军一年之后又败于广东新会。自此不敢再轻易尝试其屡试不爽的武力入侵了。而明帝国也在两次大胜之余，大量吸收

和仿制战场上缴获的“佛郎机铳”，日本人奉为至宝的“铁炮”在明帝国军队之中实际并不稀奇。

宁波外海的双屿岛，充当起了中日走私贸易的“大买家”和“保护伞”。在这样的情况下，欧式步枪流入日本市场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巧合的是“铁炮”传入日本本土之时，除了正值汪直的走私团伙频繁往来于葡萄牙和日本之外，也正值明帝国准备对双屿岛实施武力清剿的前期。葡萄牙人和汪直是否有化日本为其后方军工厂，进而与明帝国长期对抗的计划，世人不得而知。公元1548年四月，明帝国闽浙总督朱纨率军扫荡双屿岛，不仅将岛上的葡萄牙人杀戮殆尽，更“聚木石、筑塞港口”，彻底中止了葡萄牙人在浙江外海的活动。



屯门海战复原图

一年之后，朱纨又在福建漳州府走马溪，突袭了正在与当地商旅交易的葡萄牙商船。尽管朱纨本人因在走马溪之役中擅杀了“通番”的96名当地商贾而遭遇弹劾，最终含恨自尽。但深刻感受到一个东方帝国的愤怒之后，葡萄牙人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在将贸易重心转为广东的同时，积极配合明帝国当地政府清剿海盗，疏通关系，最终得以于1553年获准入住当时被称为“濠镜”的澳门。

失去了葡萄牙人的支持，许栋和李光头等海盗集团相继被朱纨剿灭之后，汪直

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120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汪直成为当时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并接受日本战国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约，以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并以日本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汪直号称“五峰船主”。而田汝成所著的《汪直传》则更进一步宣称：“（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36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汪直将大本营移到日本的松浦津，自称徽王，并不时派部下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当时“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海禁严厉的明朝兼有海盗（倭寇）的活动，有大量是中国沿海居民，由商、民转为寇、盗。开始时，汪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明廷背信弃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勾结倭寇，后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遣使蒋州和陈可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激（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蒋州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宜。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


一生毁誉参半的胡宗宪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汪直被杭州谒巡按王本固诱捕，据《倭变事略》载：三司集议时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明世宗实录》卷478载：胡宗宪谓：“（汪）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明世宗朱厚熜由此下诏表示：“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不过汪直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

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宫港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毛海峰得知汪直下狱后，诛杀肢解人质夏正，噩耗传来，胡宗宪“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

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谈迁云：“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汪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

在明日进贡贸易的百余年间，倭寇不论在人数还是在武装集团的规模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宣德年间，日本的倭寇以各地武士为核心，形成了许多较大的武装集团。例如，大内氏统辖志贺、灶户社岛等倭寇，宗像氏统辖内外大岛的倭寇，大友氏统辖丰后沿海的倭寇，志佐、佐志、田平、呼子等松浦诸氏统辖隐歧、平户各地的倭寇，等等。

其中以大内氏所辖的倭寇集团最多，人数最众，势力也最大。在他支配下的小股倭寇不算，光是打着八幡大菩萨旗帜的大股倭寇就有：濑户内海院岛的村上源氏一族、来岛兴岛河野氏一族、艺州能见岛的乃美式部大辅、备前儿岛的四宫隐歧、赞州盐饱岛的宫本佐渡和吉田妹尾、直岛的高原左卫门、周防大岛的源艺秀、备后的藤原忠义、伊予镰田的源贞义、丰前农岛的野井邦吉等十大集团。这些大小股倭寇的活动都受大内氏的约束。

尽管倭寇武装大股集团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将军以及各大武士、大名守护为保证对明贸易渠道的畅通，对倭寇的劫掠行动有所约束。甚至是大内氏等，都对明朝有过约束倭寇劫掠的表示和行动。因此，在明日贸易的百余年内，倭寇虽有发展但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为祸不烈。在嘉靖中起明日进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参与日本内战的大名、守护都极其需要铜钱，而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流通货币是中国造铜钱，日本国内，并无造币的能力。日本国内一度也曾有过自造铜钱，但质量极差，后来不得不以重量为基准进行流通。

被视为“日本造币局”的大明帝国，突然关上了大门拒绝贸易，这等于是切断了为他们输送铜钱的渠道。他们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再约束倭寇的劫掠活动，而且还自行组织亦寇亦商的商船队，加入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船队中。这些“载其方物，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明沿海防倭哨船，很难区分哪些是倭寇船，哪些是私商船，因而遇船既行追捕。浙、直追捕教紧，他们则奔福建，福建捕急则奔广东。这种商船交易方式简陋，搭棚于地，铺板其上，陈货而售，违禁品如刀剑之类则藏于船内。



濑户内海中的日本海盗基地

这种亦商亦盗的模式和倭寇劫掠虽然结合起来，但其劫掠动火还只在沿岸还没有深入内地。当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遂使倭寇的劫掠发生巨大的变化。明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惧怕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遂其劫掠和走私之奸；而倭寇也利用海盗、私商熟悉地理和内情得以放手劫掠。这样，倭寇的劫掠活动不仅达于极点，而且范围也从沿海深入内地。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奸淫，生灵涂炭，村舍荡然。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而以江、浙、福、广沿海最为严重。

有明一代倭寇为患从未停止过，洪武时期曾出现过一次小高潮，由于朱元璋全力防倭，并未酿成大患。至嘉靖时期倭寇窜扰骤增，形成大害，延续数十年。究其原因，虽有日本进入战乱不定的战国时代，各大名支持怂恿倭寇四出劫掠的外部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明政府内部因素起了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养痈成患。

首先是海防军备松懈。明初由于朱元璋的重视，沿海卫所制度井然，兵员充足，战船齐备，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至嘉靖时期，承平日久，武备日弛，病员锐

减，战船敝败，十存一二。洪武时期，每卫兵额五千，至嘉靖时期，有数字可查者，除福建永宁一卫兵员足额外，其余各卫所无一足额者。北自辽东、南至广东，水陆各卫所兵员在籍数，为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二至五十七不等。兵员在籍数字如此不足，士兵战斗力下降尤为严重。



西方画家笔下凶残的倭寇

各卫所在籍兵员多为老弱无能之辈，带兵官员亦皆武艺平庸，多不习战阵之人。将领不通战术，常被倭寇以少胜多，出兵剿倭，屡中埋伏，往往全军覆没。柴家鹿一战，倭寇以42人伪装成逃难者，乘其不意杀散官兵千余人，死一协总、一指挥、二千户、三百户及士兵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焘督兵五千，进攻陶宅倭寇据点，倭寇仅以二百人迎战。明军望倭寇而四散奔逃，未及一弓一矢居然就只剩刘焘与家丁扈从二十余人，刘焘引弓射之，倭寇不敢进逼，仅以身免。明军如此无能，倭寇自然无惧，所以敢于飘忽往来，窜扰各地，劫掠烧杀，惨绝人寰。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窜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人，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历时八十余日，始被击溃。当倭寇自芜湖直逼南京安德门下时，明著名学者后来历任政府要职的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目睹情况：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问之，倭寇不过五十余人。而当时南京守城明军约12万，其他明军尚不计算在内。留都兵部尚书张时彻、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市民被迫“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归有光愤而问道：“平昔养军果为何？”拥有12万大军的明留都兵部尚书，不敢与只有五十余人的倭寇作战，可见并非是倭寇之如何厉害，实在是明庭大吏过于腐朽，明军将士过于无能而已。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福建兴化，屠戮村镇几尽。独庐浦一村，村民组织起来，自力抵御。村去兴化城仅5里，而兴化都司白震，参将侯熙登上北城楼，坐视该村被屠，竟不援救。尤其可恨的是，官军怯于倭寇而掠于民，往往倭寇劫掠于前，官军以追剿为民而掠杀之于后，杀良冒功，反而得赏。民苦于兵，而甚于倭寇。

胡宗宪派总兵张四维御守福建浙江边境，张四维纵兵劫掠福宁南镇，惨毒之状尤甚于倭寇。领导剿倭的上层官吏，从世宗到督抚，从未有亲自临阵都督作战者，大多遥居指挥，敌情不明。在作战中互相观望，互不策应，有功则争为己有，有过则委诸他人。上下蒙蔽，互相猜忌，是非不清，赏罚不明。纵令有一些有胆有识的将官和抚臣，如张经、俞大猷等，受制于贪官污吏，非但难以在剿灭倭寇中做出贡献，反而为其所陷害，非死即调。边防军备尚如此，倭寇为患，焉得不一日甚一日。

其次是政治腐败。嘉靖时期朝政不纲，贿赂公行。刚正不阿之吏，搀谤交至；

朋比宵小之人，递相升迁。而对日益严重的倭寇，世宗不是设法动用军队剿灭，却听从严嵩党徒工部侍郎赵文华的建议，祭祀东海海神以镇倭寇。赵文华以建议有功，不仅受委托去松江祭海，而且加官升职去督察浙江防务。让着重趋炎附势之徒去督察军务，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机会。总督浙直的干吏张经，不阿附严、赵，尽管在王江泾一战，斩倭首一千九百余级，是剿倭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赵文华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机”的罪名谗于世宗。世宗不听张经的辨别，竟斩之西市，形成“天下冤之”的大冤狱。从此，“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相反，搜刮民膏的赵文华却在倭寇日益猖獗的形势下，以“水陆功成”、“江南太平”的功绩上报，明世宗朱厚熜居然相信这样的谎言，准其回朝交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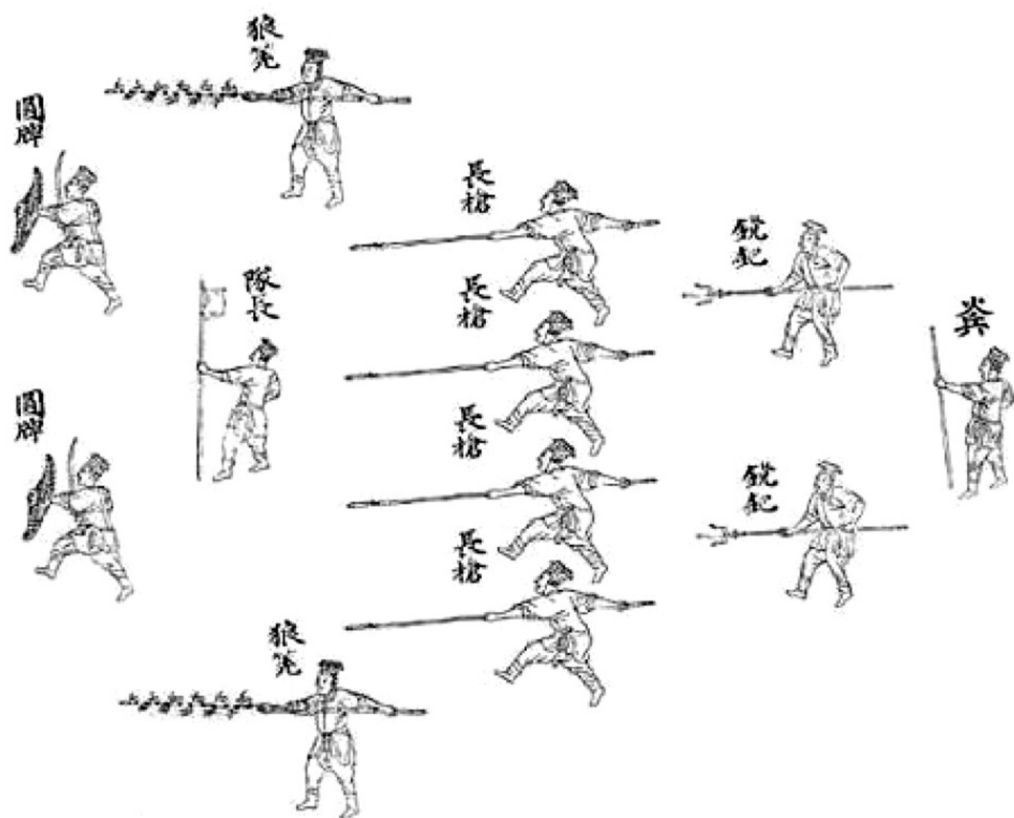
胡宗宪以阿附赵文华，由浙江巡抚按升为总督。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患高潮时期，胡宗宪统辖各地主客兵20万，以如此庞大的军力和众多的将吏，却不主张武力剿倭，极力主张诱降。因为胡宗宪害怕与倭寇战争失利获罪，失掉搜刮民财的权利，同时，诱降巨魁又可掩饰赵文华欺骗世宗的罪过。胡宗宪借御倭之名，多方搜刮，聚敛财富，题增款派，漫无稽考，人民称之为“总督银山”。他用搜刮来的财富，贿赂权臣严嵩父子，以保其职位。

其三是经济政策不当。明代中期，国内商业资本发展迅速，私商海外贸易发展尤为迅速。在海外私商贸易中，江、浙、广等地私商，占有优势。在他们活跃的地区，常常形成不为明政府承认的对外贸易港。例如，漳州龙溪县的月港，当时是“北连日本，西接暹罗、琉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的大商港。这种私商贸易在海禁政策之下，只能以走私形式进行。

明政府对于这种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不是鼓励而是禁止，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是支持，而是捕杀籍没。明政府根本看不到也不认识海外贸易对本国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相反，把海外贸易当作一种要挟手段，用海禁政策迫使外国屈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做，当然不可能使外国屈服，相反，却扼杀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内外贸易。因为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执行得严，涉及面又宽，政府不准下海的禁令，把过省船运也禁掉了。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的就是海运，内陆山区道路崎岖不便，禁海之后，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的国内商业贸易，都被迫中断。造成了上述地区民生困苦，因此，东南沿海的渔民以及一般小商小贩，为了寻找生计，下海走私，铤而走险。

纵观嘉靖时期的剿倭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有剿

倭的军事行动，但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助手段。后一阶段从严嵩及其党羽失势起，特别是从戚继光训练新军起，剿倭战争上升为主要手段。戚继光原为山东防倭都指挥参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山东调至浙江，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以及所属各县。在胡宗宪以抚为主的方针下，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与倭寇作战并不顺利。



戚继光所发明的鸳鸯阵

但是，在同倭寇接触过程中，戚继光总结剿倭的经验教训，认为军事剿倭不力的原因在于“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战无号令，守无营壁”。这样的士兵不可能战胜倭寇，保卫边防。而怯台州知府谭沦曾训练新军一千，在剿倭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取得不少胜利。因此，戚继光上书胡宗宪要求准许他训练新军加强剿倭力量。恰值此时，严嵩父子失势，胡宗宪主抚已无内援，而倭寇并未

因为汪直等之死而稍有收敛，被迫转向武力剿倭，遂批准戚继光训练新军。

戚继光深知原来的官军怯战，不足以为持，便接受了义乌县令赵大河的建议，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亲自去义乌县招募农民出身的“矿夫”和义乌乡团四千人，带至绍兴训练。戚继光在训练新军中注意两点：其一，重视思想教育指出“民养军、军卫民”的军民关系。同时教育新军严守纪律，不扰民，才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而且指出新军都是耕田出身的农民，因而要在倭寇扰民时英勇杀敌保卫农民。其二，戚继光总结与倭寇的作战经验，并根据南方地形多沼泽的特点，创造出有别于北方“方列并驱”的战斗阵法——鸳鸯阵。这是一个拥有盾牌、火器（鸟铳）、弓箭、长矛、短刀，长短武器相配合的12人战斗小组。必要时，这个小组还可以一分为二，使战斗更加灵活和适应任何地形和敌情。因此，戚继光的新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训练新军的同时，戚继光着手整顿卫所，制造战舰，加强卫戍和海上战斗力量。

戚继光的新军，只训练了两个月，便开赴前线。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约万余人驾船数百只，大举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率领新军，在龙山一战，首获战功，击溃倭寇主力，余倭狼狈逃走。戚继光率领新军于花街口堵剿，倭寇溃败，追至瓜陵江悉歼来寇。这一仗救出被俘男女五千余人，是剿倭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同年五月，再次全歼入侵台州的倭寇二千余人，解救被俘虏男女民众一千余人。戚军凯旋之日，台州人民欢迎的行列，长达二十余里，欢声雷动。台州大捷，显示出了新军的优点，因而其他各处的剿倭将领都开始整顿部队，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至嘉靖四十一年初（1562），浙江之倭寇已基本上被肃清，残余倭寇逃往福建等地。

福建宁德近海的横屿原是倭寇的老巢，日本国内新来的倭寇又占据福清的牛田，互相支援之下，劫掠活动极其猖獗。福建军队作战不力，向明政府告急。明政府令胡宗宪调戚军进剿，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军六千人进入福建剿倭，八月攻取横屿倭寇老巢，斩首二千六百余级，乘胜围攻牛田，肃清该处倭寇。残匪四千余人逃至兴化林墩，结垒为营，四出劫掠。戚军于夜间围攻，连克营垒六十余座，斩首千余，救出被俘群众二千余人。天明时，兴化群众方才知道倭寇已经全部被歼，当地群众扶老携幼彩帐郊迎于10里之外，载酒杀牛犒劳戚军。福建倭寇三大巢穴横屿、牛田、林墩全部被戚军荡平，获胜利班师回浙江原防地。这时胡宗宪亦因依附严嵩罪下狱，江南剿倭战争形势大为改观。

嘉靖四十一年（1562）冬，倭寇再次侵掠福建兴化，并攻陷兴化府城。在此以前倭寇只攻陷过县城，尚无攻陷过府城者，猖獗达到了极点。明帝国升任被胡宗宪陷害入狱的俞大猷为浙江总兵，戚继光副之，率军剿倭。戚继光又至义乌县招募民兵万余人，在进军途中训练。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巡抚潭沦调各路军队围剿兴化府平海卫倭巢。俞大猷居右翼，刘显居左翼，戚继光居中军，同时攻入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府城。斩首三千余级，解救被俘那女内三千余人。戚军紧追残寇，至马鼻、硝石岭一带，一战而歼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海外新来之倭会合残倭万余人，再次攻掠兴化府附近的仙游，戚军进剿，歼寇二千余人，活捉翻译一名。接着于蔡家岭击溃这股倭寇，其中数百名“惯战黑吉倭”即日本武士全部被歼，对福建之倭打击最重。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残倭夺船入海，福建倭患基本肃清。



明帝国的海军基地

倭寇在江南无立足之地，遂奔广东。明政府再调俞大猷任广东总兵，而吴桂芳提督两广兼巡抚，二人合作默契，并以戚军为例，在广州训练新军，在福建造战船八十余艘，招募福建水兵乘船在海上剿倭。俞大猷准备就绪，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率军进攻倭寇巢穴绉塘，斩首数千。六月潮、惠一带倭寇悉平。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戚军与俞军联合进剿福、广交界处倭寇，连战皆捷，倭寇悉数就歼。嘉靖四十五年（1566），余倭在沿海岛屿站不住脚率众逃往安南，俞大猷率舰队追及全歼。至是，广东倭寇也已基本肃清。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中国沿海倭寇老巢已经被全部荡平，大股倭寇基本肃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激荡的战国时代已真正开始了。因此，日本大小大名武士都被这场全国性的战争所吸引着，竭力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已经无暇再把眼光放到这场战争之外的地方了。倭寇中的日本武士浪人失去了自己的补充来源，而中国沿海岛屿又被戚继光等新军所控制，中国海盗也所剩无几，且丧失了立足点。这样，肆意掠夺中国沿海达数十年的倭寇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条件，除零星小股继续活动到万历中期外，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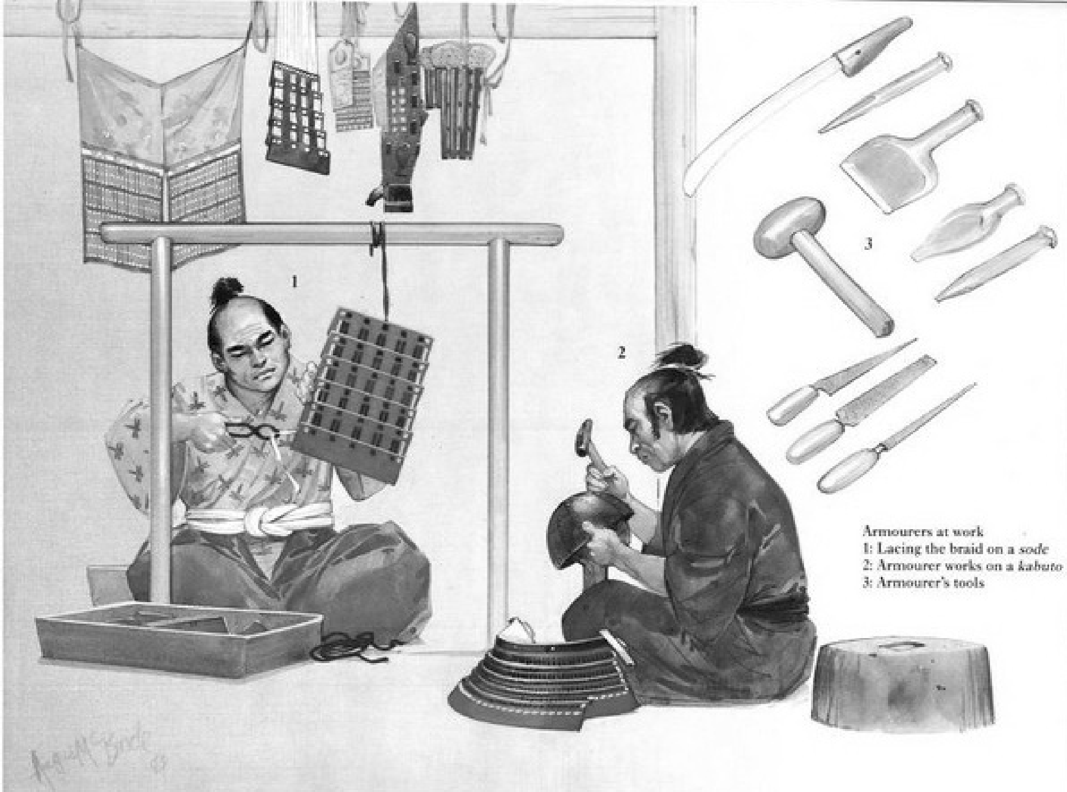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通过这场战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恰如马克思所说的“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而同样的历史进程也出现了在日本。在“应仁之乱”后连年的天灾和内乱之中，各地被称为“一揆”的群起抗暴运动此起彼伏。所谓“一揆”原指“上下同心，团结一致”。汉语中也有“揆，度也”的解释。而能使无数本性纯良的民众团结一致的必然只能是利益诉求。最初追求“民间德政”的自发性运动被称为“土一揆”，其要求也不过是减免年贡租税。而这种风潮很快便引起了国内豪族的注意，于是在公元1485年年底，在山城国（今日本京都府南部）出现了驱逐守护大名的“国一揆”。而在日本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还是以“一向宗”信仰为纽带的“一向一揆”。

“一揆”运动之所以能在日本战国时期大行其道，除了室町幕府的日益衰弱之外，自然还与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日本列岛社会结构的变革有着必然的联系。采矿、冶金和手工业的进步，令刀剑、护具不再成为奢侈品，火器的传入和仿制更令常年在田地中劳作的农民也拥有了与武士这样职业军人抗衡的能力。“一向一揆”之所以能够以石山本愿寺（今日本大阪市中央）为中心蔓延全国，持续了百年之久，自然与当地恰是日本“铁炮”制造业中心不无关系。

而早在镰仓幕府统治中期，原先由国守、郡司、地头组成的统治结构便已然瓦解，日本各地出现了以血统为纽带的自治体系——“惣领制”。所谓“惣领”即以家族元老“惣领”统领全族，除负责族中一般事务、土地经营及年贡租税缴纳外，还有率领本族武士执行幕府军事任务、承担大番役任务等义务。这一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可以通过“惣领”轻松动员一个宗族的力量，但弊端在于随着家族的繁衍，大量继承遗产的庶子必然导致“惣领”的分化。

为了凝聚力量，镰仓幕府的统治者不得不与为了削弱封国而颁布“推恩令”的中国汉武帝刘彻反其道而行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惣领”只能是单独继承。应该说这一制度影响深远，直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长期实行的仍是“长子继承制”。尽管驻日美军带来了相对西化的继承权法，但在偏远的乡村，老人们仍在遗嘱中明确将大部分财产给予长子。以至于有人将充斥着“外来务工人员”的东京等大城市称为“次郎的天下”。



日本民间的武器作坊

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无所得的“次郎”们当然可以走出乡村，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但是在中世纪的日本，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庶子们便只能用长刀去谋求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或成为守护大名的家臣，或在“一揆”运动中窥探时机。这个充斥着野心的时代所出现的种种行径，被日本人形象地称为“下克上”。近臣渴望取代将军，家臣阴谋推翻主人，连昔日老实本分的农民都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而已经贫穷到连即位大典也举行不起，冬季赏雪宴会连酒都没有的天皇和公卿，更被列为了空气一般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野心家们渴望着变革，但却又都梦想由自己来终结乱世。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一幕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活剧在日本上演着。

最早有声望和实力终结日本战国的是身兼远江、骏河两国（今日本静冈县）的守护大名今川氏。自远征九州的今川贞世以降，今川氏不仅幕府的历次内乱中无役不与，更幸运的是，每每都能正确站队，一度在足利义教时代受封为“副将军”，成为了室町幕府炙手可热的实权派。



战国北条氏创始人伊势早云

“应仁之乱”后，日本列岛各地的“守护大名”和“守护代”们纷纷不满足于原有的封地，在相互的攻伐和吞并之中，进化成了以自己的庄园和领地为据点，大肆扩张的“战国大名”。而对于这些野心勃勃的地方豪强而言，通往权力巅峰的最佳道路莫过于“上洛”——率军进入京都，直接将室町幕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最终取而代之。

室町幕府已然奄奄一息，由于与幕府管领细川氏长期失和，第12代将军足利义晴不得不多次逃离京都。虽然最终在近畿各方势力的妥协之下，仍保留着幕府将军

的虚衔，但其权威可谓荡然无存。而连年的内耗也令位高权重的细川氏走向了没落。近畿一带随即成为了细川氏家臣三好氏及曾与足利义尚对垒的六角家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首“公方（足利）无嗣吉良继，吉良无嗣今川继”的童谣，悄然在日本列岛流传开来。

从血统上来看，吉良氏和今川氏的确均为足利将军的近亲，但是室町幕府的重臣斯波、涉川、一色诸家均与足利氏有血缘关系，民谣为什么却单单挑出了吉良、今川两家呢？其实仔细分析，答案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吉良与今川两家不仅一脉相承，且自室町幕府建立以来其封地便唇齿相依。但在连年的战乱之中，吉良氏在三河、远江两国的势力逐渐衰退，吉良氏的势力更被压缩到了三河国的西部地区。因此这首民谣首先是在肯定今川氏吞并同宗吉良家产业的合法性。

将今川氏的势力范围由骏河一国扩展至三河、远江两地的是其第7代家督——今川氏亲。但是其开疆扩土的赫赫武功却不得不归功于其娘舅——伊势早云。伊势早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浪人，甚至今天日本史学界对其出身、家谱仍众说纷纭。虽然有学者以伊势早云曾出任过幕府将军足利义视的“申次众”（引见人），而认定其出身武士阶层并非一介草根。但考虑到“应仁之乱”后，足利氏早已衰弱，伊势这个所谓的室町幕府执事名门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不过正是由于接待了“应仁之乱”中率军进京的“骏河守护”今川义忠，伊势早云成功地和今川氏搭上了关系，还成功地把自己的姐姐嫁入了这一战国豪门。

不过伊势早云的崛起倒并非是全凭裙带关系，毕竟他的姐姐“北川殿”只是今川义忠的一个侧室，且今川义忠本人在“应仁之乱”末期出兵远江的归途中战死。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与其说是伊势早云借今川家之力脱颖而出，不如说是伊势早云以自己的外交手腕帮助外甥今川氏亲渡过了难关。伊势早云深知自己的对手虽然遍布内外，但并不团结，今川氏更雄踞骏河，有足够的筹码讨价还价。于是在伊势早云亲入敌营的情况下，一度对今川氏虎视眈眈的上杉政宪同意了早云提出的所谓今川氏亲成年前由上杉氏盟友小鹿范满“暂代理政”的条件。

在平息了一场今川氏的箭在弦上的内讧后，伊势早云回到京都。在此后漫长的11年里，伊势早云如何卧薪尝胆，世人并不清楚。但是公元1487年，他再度返回骏河，成功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拒绝交权的小鹿范满一系人马尽数诛杀。而对于感恩莫名的外甥，伊势早云却只要求骏河与伊豆交界的兴国寺城及周边12个乡为赏赐，一时令今川氏上下大为意外。因为兴国寺城不仅地处纷乱的国境，在土地

肥沃的骏河更可谓是“穷乡僻壤”，但就在这片土地上，伊势早云韬光养晦，最终将其建设成为了进军关东的重要据点。

骏河扼守京都前往关东要冲，“应仁之乱”后大批难民的涌入，令原本荒芜的兴国寺城反倒成了新型的开发区。伊势早云因势利导地推出所谓“四公六民”的税收新制，更令不堪重负的民众趋之若骛。公元1493年，伊势早云向外甥今川氏亲借兵300人，以奇袭的方式颠覆了室町幕府控制关东地区的“堀越御所”，一举成为了伊豆半岛的霸主。

对于自己舅舅在关东的崛起，今川氏亲给予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而伊势早云也投桃报李，于次年为今川氏领军扫荡了远江国的佐野、山名、周智三郡。在此后的几年里，这对甥舅互相扶持，伊势早云很快便攻取了以小田原城为中心的相模国西部的大片领土。公元1506年，当伊势早云率领上万大军攻略三河国西部地区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对手却令这对甥舅最终分道扬镳，他就是“应仁之乱”中占据三河国岩津、安祥、冈崎三城的松平氏第5代当家——松平长亲。

在伊势早云的大军面前，松平长亲仅有的500骑人马本不足以扭转局面，但其突然对早云本阵的突袭还是打乱了对手的布局。面对松平家麾下三河武士悍不畏死的冲锋，伊势早云放弃了对岩津城的围攻，撤军返回了自己的领地。显然以伊势早云的兵力硬要吃掉松平氏也并非全无可能，但这位已经72岁的老人不能不为自己的事业打算。在返回相模之后，伊势早云虽然于公元1506年和1508年两度应今川氏亲之请，出兵三河，但其精力却显然已经转向与关东管领上杉氏分化出的“山内上杉”和“扇谷上杉”的争夺。而今川氏亲在写给自己舅舅的书信中也改称其为“屋形样”，俨然承认了伊势早云独立大名的身份。

公元1518年，伊势早云将家督之位传给其子伊势氏纲，一年之后在留下了“吾欲灭上杉氏并关东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孙继任其事，毋敢或懈”的遗言之后，这位日本战国最初的枭雄最终淡出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伊势早云或许并非白手起家，但却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子孙打下了一个雄踞列岛的良好基础。战场上的伊势早云并非一个常胜将军，但是由于其内政上的开创性成就却足以令他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四公六民”的税制之外，伊势早云还一手创立了所谓“早云寺殿二十一条”的家法，以驾驭部下的言行，可谓日本战国“企业文化”之始，而他推行的“检地”制度，更迅速地为日本列岛的野心家所沿袭，成为了动员自己领地物资、兵员的一个重要手段。

所谓“检地”，指的是“战国大名”对自己所控制土地的测量和调查。这一方式不仅

可以有效地控制农民，对自身所掌握的战争潜力有直观的印象，更可以有效地控制领有土地的家臣。通过“检地”，“战国大名”们保障下属武士阶层的地位和收入，而同时这些武士则根据自己所领有的“石高”承担兵役，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而就在伊势早云建立“小田原众所领役帐”的同时，他的外甥今川氏亲也推出了 自己的《今川修理大夫判》，在保证寺社僧侣特权的前提下，开始调查自己所拥有的户数和田地。

通过“检地”领有富饶的骏河、远江、三河大部的今川氏亲开始向北部的甲斐国和西部的尾张国扩张。站在今川氏的角度来看，甲斐的武田氏自第17代家督武田信绳继位以来便长期陷入了内部的不合之中，虽然侥幸于公元1495年击败了今川与伊势的联军，但群山环绕的甲斐终究国力有限，无力抵挡兵多将广的今川氏大军。而尾张国的守护大名斯波氏则早已在“应仁之乱”中耗尽了气血，更不构成上升期中的今川氏的障碍。

今川氏亲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量，于公元1515年同时向甲斐和尾张用兵。尽管在开局阶段，今川氏进展顺利，首先在远江大败斯波氏，并在尾张国建立前进据点——那古野城。随后又于胜山会战中大败陷于水田之中的武田骑兵。但是今川氏两线作战的弊端却最终令氏亲的勃勃野心徒成画饼。由于远江国“守护”——大河内贞纲的叛乱，今川氏亲只能放弃对尾张和甲斐的攻势，全力扑灭盘踞挂川引马城的大河内贞纲。借助骏河安倍金山矿工的帮助，今川军很快便切断了敌军的水源。大河内氏的叛乱虽然最终被扑灭，但一举吞并甲斐，侵入尾张的良机已然失去。无奈之下，今川氏亲只能与武田氏新任家督信虎签订合约，将自己的幼子今川氏丰安置于那古野城，监视斯波氏的动向。

经过6年的休养生息，公元1521年，今川氏再度动员了1.5万人的大军攻入甲斐。此时武田信虎手中仅有不足2000人马。抱着必死的信念，武田信虎让自己即将分娩的妻子逃往甲斐东北的积翠寺避难。而正是这种哀兵必胜的信念，令武田军在激战中力挫了7倍于己的今川军，而随后嫡子降生的消息也从积翠寺传来，武田信虎喜不自胜，随即为这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取名“胜千代”。当然此时的武田信虎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会由于理念的不同，而与这个成年后的改名为武田晴信的儿子反目，并最终遭遇半生的流放。

兵败甲斐成为今川氏亲人生最后一次对外用兵，公元1526年，今川氏亲由于中风在骏府城离世。继承其衣钵的是年仅14岁的长子今川氏辉。为了平抑国内可能发

生的动乱，在去世前2个月，今川氏亲订立了自己国内的法度——《今川假名目录》，开始正式抛弃了室町幕府，大步走向战国大名的行列。

今川氏亲一代可谓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序幕，在幕府权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各路诸侯皆使出浑身解数，谋求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伊势早云身后，其继承者氏纲出于艳羡昔日镰仓幕府的心理，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北条”，正式开启了“小田原北条氏”称霸关东的道路。而延续着伊势早云所开辟的道路，在本州岛西部的出云国，依托大内氏力量崛起的尼子兴久于公元1512年自立门户，并迅速夺取了伯耆、因幡、石见、安芸等11国的领土，由于在日本行政区划中，这些地区被称为“山阴”和“山阳”地区，因此巅峰时代的尼子兴久号称“阴阳一太守”，而就在尼子和大内两家忙于征战杀伐之际，长期籍籍无名的小领主——毛利元就在朝秦暮楚中逐渐壮大了起来。

与伊势早云境遇相仿的还有以“盗国物语”而闻名的斋藤道三。世人经常误认斋藤道三为“卖油郎”之子，但事实上斋藤道三的父亲松波基宗本是如假包换的幕府武士，只是由于“应仁之乱”而断了生计，才被迫在京都妙觉寺出家，随后又入赘灯油商奈良屋氏。并辗转来到了四战之地的美浓国。

由于美浓国的守护土岐氏内部不合，斋藤道三父子随即怂恿失去继承权的次子土岐赖艺发动政变驱逐自己的哥哥土岐赖武，在土岐氏的内讧之中，斋藤道三最终通过迎娶美浓豪族明智光继之女等手段，最终鸠占鹊巢，成为了雄霸美浓的“战国大名”。由于斋藤道三得位不正，因此坊间称其为“蝮蛇”，有趣的是，最终被斋藤道三驱逐的土岐赖艺虽然软弱无能，却号称“美浓之鹰”，理由是他长于绘画，尤擅画鹰。

室町幕府自足利义满以降，附庸风雅便不再是公卿的专利。各国大名之中虽然像土岐赖艺这样的“资深艺术家”终究是凤毛麟角，但类似于“赛诗会”的“连歌”却早已成为了武家日常的娱乐方式，而据说为今川氏亲驻守尾张桥头堡的幼子今川氏丰便是一个“连歌”发烧友，经常会在自己所居住的那古野城邀请一干“社会名流”，由于“连歌”往往历时数天，因此今川氏丰还特意在城内为客人修建了客房。

今川氏丰之所以频繁地召集“连歌”或许有收买尾张国人心的用意，但是以今川氏前哨据点的那古野城作为主场却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正是利用今川氏丰邀请自己参加“连歌”之际，尾张国豪族织田信秀奇袭了那古野城，一举拔出了这个今川氏打入自己领土的钉子。而这座日后进化为名古屋的城市也就成为了织田氏走向战国大

名的第一块铺路石。

面对被俘乞命的今川氏丰，织田信秀大度地放了他一条生路。显然面对今川氏这头巨兽，羽翼未丰的织田信秀还不敢贸然与其决裂。而此时刚刚亲政的今川氏辉也正忙于联合自己的舅舅北条氏纲去找武田信虎的晦气，一时也顾不上替自己的六弟出头，本来仅有尾张下四郡管理权的织田信秀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逐渐做大。

在逐步统一尾张全境的同时，织田信秀的主要对手除了今川氏之外，还有风头正劲的邻居——盘踞三河国西部的松平氏。在13岁便继承家督之位的松平清康的领导之下，松平氏的势力一度进入了全盛期。公元1535年，在草草平定三河国西部地区后，松平清康纠集了上万人马向尾张进军。

松平清康在起兵之初便作了一系列的外交工作，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也都有意看到织田与松平这两家后起之秀拼个你死我活。在排除了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松平清康很快便深入了织田氏的腹地，开始围攻织田信秀居城清州城的外围据点——守山城。但就是在松平氏的军队忙于进行一系列攻坚筹备之时，松平清康却意外地被自己的家臣阿部正丰所刺杀。

由于是日后德川幕府的老祖宗，因此日本史学家向来对松平清康不乏褒美之词，甚至断言说：“（他）如果能活到30岁，必能夺取天下！”这种无意义的假设显然不足以阻挡织田氏反攻的铁骑，在织田信秀的衔尾追击之下，松平氏的内讧也进入了顶点，甚至连松平清康的嫡子松平广忠也被赶出了家门。走投无路的松平广忠只能投奔今川氏寻求庇护。今川氏辉虽然有心利用这一良机侵吞松平氏，无奈天不假年，公元1536年，24岁的今川氏辉离奇病故，由于今川氏日后表现不佳，因此也就没有人假设他再活几年会怎么样！



织田信长

由于今川氏辉生前没有子嗣，因此空悬的家督之位随即引发了一场兄弟争衡的“花仓之乱”，最终今川氏辉的五弟今川义元胜出。在今川义元的鼎力支持之下，松平广忠最终得以重返三河。不过经历了连番内讧之后，松平氏不仅沦为了今川氏的属国，更在织田氏的连续施压下步步后退。公元1547年，为了获得今川氏的援助，松平广忠不得不将自己4岁的嫡子竹千代送往骏府。但这位可怜的人质还未送达今川义元的手中，便被松平氏的政敌绑架，几近周折之后落入了织田氏的手中。

织田信秀秉着奇货可居的心理，将竹千代安置在那古野城中。而此时那古野城的城主正是比竹千代年长9岁的织田家嫡子——织田信长。织田信长是一个向来不拘理法的顽童，因其喜欢在市井与各阶层的孩童玩耍，而获得一个“尾张大傻瓜”的诨号。对于身为人质的竹千代，织田信长自然也没有太多的门户之见。因此许多日本小说家抱着想当然的心态描述了一幅两代枭雄自幼相善的动人画卷。

织田信长的成长历程恰是其家族壮大的历史。公元1548年，在多年刀兵相向之后，雄踞美浓的斋藤道三最终选择了接受织田家伸出的橄榄枝，将自己的爱女——

斋藤归蝶许配给织田信长。应该说此时的日本列岛，战国大名已经走出了“应仁之乱”后“一夜暴富”的阶段，彼此之间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以子女联姻为纽带的同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公元1537年，长期敌对的武田、北条、今川三家便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联姻缓和了关系，并在公元1541年，武田晴信将自己的父亲信虎流放之后，逐步建立起了所谓的“善德寺三国同盟”。

作为执掌美浓的枭雄，斋藤道三并非全无亲情可言。据说在自己女儿出嫁的前夜，斋藤道三曾将一柄短刀赠与归蝶，表示：“若信长果真如其名，汝可杀之。”但被自己父亲作为政治筹码的斋藤归蝶却并不领情，反唇相讥道：“若夫君乃大才，归蝶或与夫君杀父！”

事实证明，归蝶嫁入织田氏之后与信长感情很好。而斋藤道三在富田正德寺与织田信长会面之后，也深感自己此前的预测有误，发出了“呜呼！我儿只配为上总介（织田信长）拉马为奴矣”的感慨。不过这些终究只是小说家言，对于身处四战之地的斋藤和织田两家而言，能够摆脱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才是这一政治联姻最直观的成果。

公元1548年，在今川氏的大力扶植之下，松平广忠于小豆坂险胜织田军。但就在这位24岁的父亲想要迎回自己嫡子竹千代之际，松平氏内部再度发生了扑朔迷离的暗杀事件。由于刺杀松平氏两代家督的凶手所使用的都是伊势桑名出产的“村正”刀，因此在日后由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户幕府统治时期，有关“村正”乃妖刀邪剑的传说不胫而走。但事实上，真正巧合的是松平清康、松平广忠父子遇刺之后，均是有一位名叫植村氏明的武士当然砍杀了凶手。

面对再度群龙无首的松平氏，今川义元反应迅猛。公元1549年，今川氏的军队攻占了织田氏在三河的据点——安祥城，以俘虏织田氏庶子的方式要求换回松平氏的法定继承人——竹千代。不过在此后的12年里，这位未来统一日本列岛的枭雄还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甚至在元服的成年礼上也不得不拜受今川义元的“元”字，更名为松平元康。而这位松平氏名义上的家督也在骏府城见证了今川氏富国强兵的一系列政策。

公元1560年5月10日，苦心经营多年的今川义元俨然已经成为了日本列岛最强的战国大名。在“东海道第一弓取”的威名之下，今川氏动员2.5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打着“上洛”的旗号向尾张进击。此时织田信秀已于9年前中风而死。继承了家督之位的织田信长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岳父家的内讧。由于继承权及血统存疑等原因，

斋藤道三于公元1556年遭遇了自己长子义龙的反叛。尽管兵败之前，斋藤道三还写信给女婿信长要对方不必急于出兵支援，美浓就作为自己女儿的嫁妆送给织田家云云，但事实上织田信长继位之后的织田氏内部同样纷争不断，不要说进取美浓，即便是完全控制尾张都仍需耗费一番手脚。

在直面今川氏的大军之前，织田信长虽然夷平了尾张国内部的反对势力，但可以动员的兵力也不足5000人，其中还必须分出2000人监视美浓方向的大舅子斋藤义龙。面对以松平元康所指挥的三河武士为前锋的今川氏大军，织田家的外围据点不断被攻占。而织田信长却始终按兵不动，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迎战部署。一时间织田家上下无不弥漫着末日般的绝望。



桶狭间之战

认定织田信长无力翻盘的今川义元率领着5000余人的本阵于5月19日正午抵达了东海道与大高道交会处的丘陵地带。由于前线捷报频传，今川义元的心情大好，

随即选择了距离前沿约3公里的桶狭间山就地休整。显然今川义元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的黎明时分，织田信长以一段名为《敦盛》的“能剧”表达了必死的信念，动员全部的机动兵力正在向桶狭间奇袭而来。

所谓《敦盛》，指的是昔日“源平合战”时代平氏一族中深蕴音律、擅吹横笛的少年将军平敦盛。世人感慨他战死沙场，平氏一族灰飞烟灭的事迹，并以其为原型所编纂“人生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又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者乎？”的唱词，织田氏自诩为平家后裔，此时信长唱出此词俨然已是做好了孤注一掷的准备。

织田信长的举动并非无谋的豕突，事实上自今川氏大军压境以来，他便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寻找着今川义元本阵的位置，而秉承着“要欺骗敌方，首先要欺骗友方”的宗旨，织田信长始终未将自己的计划向家臣透露，甚至在突击之初也仅有织田信长自己麾下的206人的亲卫队，其余人马都是在得知家督出阵之后才匆忙赶来会合的。因此抵达桶狭间之时，织田家也仅有2000多人可以投入战斗。但在织田信长的鼓舞之下，人人奋勇争先。而今川义元的部下却大多在午餐中喝得酩酊大醉，借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织田军迅速突破了对手的前锋。惊慌失措的今川义元在不足300人的亲信保护下向东逃去。但在大雨中的泥泞道路上，本就足短身长不善骑术的今川义元此时酒意未退，最终倒在织田家武士的刀下。

今川义元战死之后，仍具有兵力优势的今川氏大军随即陷入了崩溃。这场史称“桶狭间之战”的奇袭不仅挽救了濒临灭亡的织田氏，更令长期沦为附庸的松平氏一举获得了独立。以源氏后裔自居的松平元康在跟随今川氏败军撤回三河之后，随即怀着向源义家致敬的名义改名为松平家康。公元1562年，织田、松平两家正式结盟迈向了并肩夺取天下的道路。

第四章　援朝战争

本能之敌
——织田信长黯然谢幕的必然

以日益衰弱的今川氏为缓冲，织田信长首先北上攻略美浓，开始接收自己岳父的政治遗产。而为了招揽美浓国内的豪强，织田信长派出自己麾下名不见经传的“足轻组头”——木下藤吉郎前往长良川右岸修筑堡垒。木下藤吉郎不仅出身贫农，且由于早年营养不良而形似猿猴，头秃如鼠。但早年辗转于美浓等地的“打工生涯”却令这位社会草根拥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和非常的人脉。木下藤吉郎抵达预定位置，随即找到了昔日好友——美浓土豪蜂须贺正胜。在数千由金钱驱使的野武士帮助之下，名为“墨俣城”的前沿据点竟在短时间内便修筑完工，号称“一夜城”。

以墨俣城为据点，织田氏很快便击败了斋藤义龙之子斋藤龙兴。33岁的织田信长以尾张、美浓为据点，随即开始了向京都进军的道路。此时操控室町幕府的三好氏利令智昏地公然刺杀了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梦想入主近畿的各方势力随即拥立足利义辉之弟足利义昭对抗三好氏，不过在诸路诸侯都心存观望的情况下，最终击败多年互殴的六角氏和三好氏，护送足利义昭入主京都的殊荣却还是落到了织田信长的头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织田信长的成功“上洛”也算完成了今川义元未竟的事业。

控制京都的织田氏很快便露出了獠牙。在一系列限制幕府将军权力的法令之下，心怀不满的足利义昭随即与对织田氏“挟将军以令大名”艳羡不已的各方势力合流，开始组建所谓的“织田包围网”。不过和历史上所有的多方联盟一样，“织田包围网”虽然云集了朝仓、浅井、武田、三好等强力大名，又有叡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宗教寺庙势力的加入，但各方利益诉求不同，难免各行其是，最终被逐个击破。甚至在局面大好的情况下，织田信长也只要对步步进逼的朝仓氏家督义景说一句“天下是朝仓大人所有，我将不再妄想”便曾从容脱身。

墨俣一夜城
歴史資料館

“织田包围网”的最高潮出现在公元1572年，多年以来一直忙于在北信浓及关东地区开疆扩土的武田晴信率领3.5万大军开始向京都进发。应该说尽管多年以来利用种种手段，武田氏的领土迅速膨胀，甚至连昔日盟友今川氏的骏府城亦被其收入囊中，但是在整体国力上，武田氏依旧与织田氏有着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除了武田氏核心势力范围甲斐国的土地贫瘠和商旅不振外，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织田信长所推行的“兵农分离”政策。



兵农分离制下普通的日本农民也能拥有与武士相当的装备

所谓"兵农分离"，顾名思义就是将"应仁之乱"以来各地大名盲目将扩军中动员制

改为常备军制。此举不仅可以有限地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更不会因为战争而荒芜国内的四季耕作，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不过武田氏也有自身的优势，多年以来与继承了“关东统领”之位的越后国大名上杉谦信围绕北信浓的恶斗，连续5次的“川中岛会战”，令本来就以精锐著称的甲斐武士锤炼成了一支百战之师。

公元1572年12月，在远江的三方原，武田军轻松地击溃了此时已经改姓德川的松平家康麾下“德川织田”联军。据说德川家康在战场上仓皇而逃，甚至被吓得尿了裤子。在躲进相对安全的滨松城后，德川家康立即找来画师，记录下自己落魄的样子，此后多年将这幅肖像挂于自己的卧室之内，以激励和鞭策自己。

对于年仅29岁的德川家康而言，三方原会战的失利无非是人生的一次历练。但是对于皈依佛门而改名信玄的武田晴信而言，这场辉煌的胜利却无法挽回他油尽灯枯的生命。公元1573年春季，在一时无力攻克德川氏遍布远江、三河大小据点的情况下，武田信玄的肺病日益恶化，不得不在三河国的长筱城休养一个月后放弃其“上洛”的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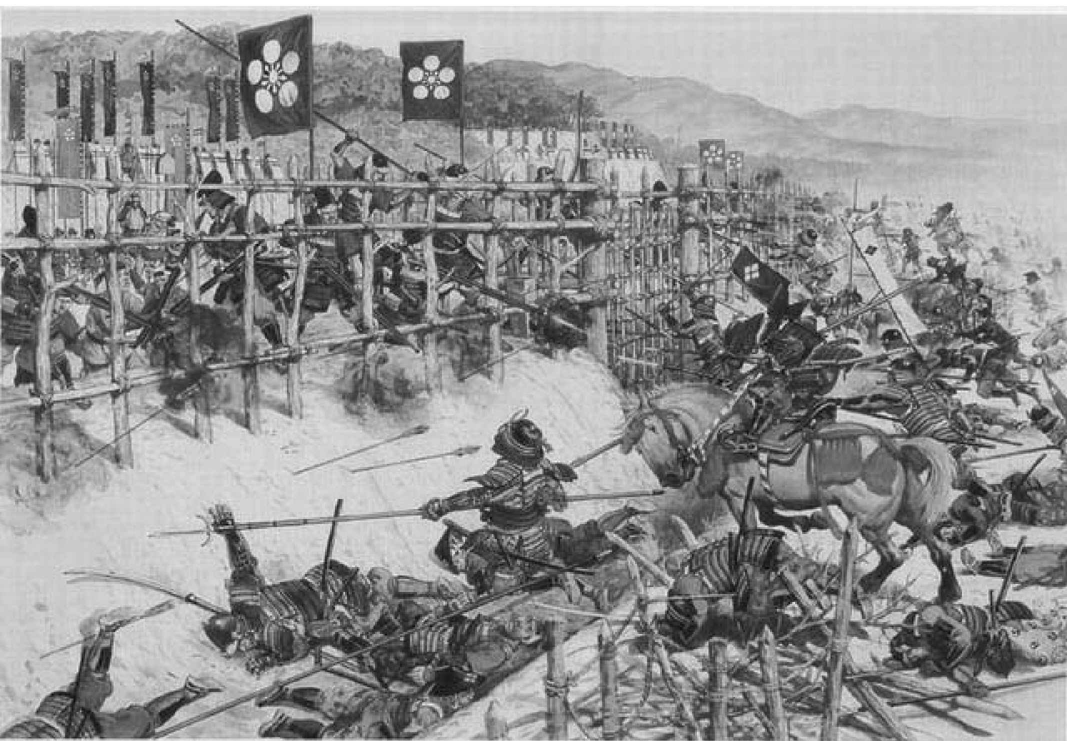
年仅53岁的武田信玄最终病死于撤军回甲斐的路上，他的死与其说是武田军功败垂成的偶然因素，不如说是一块遮羞布。毕竟此时的织田信长已经彻底击败了浅井、朝仓两家，长期秘密与织田氏为敌的比叡山延历寺也被烧光。所谓的“织田包围网”已然崩溃，而武田军历时4个月都未能瓦解德川家康在远江、三河的势力，而战争再继续进行下去，倾国而出的武田氏更有春耕荒芜的风险。

为了安抚军心，武田信玄临终前曾授意秘不发丧。因此织田信长通过“正亲町天皇”方仁与足利义昭的和解便成了武田氏撤军的绝佳借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日本天皇和公卿势力几乎均穷途潦倒，极端匮乏。“正亲町天皇”方仁在继承大统之后，等了3年才从各地大名的捐助中攒够了举办即位仪式的钱。因此对接管京都后对自己生活颇多资助的织田信长“百依百顺”，每每在织田氏陷入困境时下达和谈敕命。

最早接到武田信玄病故消息的是他的宿敌——上杉谦信，据说这位近年来性别存疑的“战国军神”为此痛哭流涕，感叹地说：“吾国之弓箭将不利矣。”并从此放弃了对甲斐的敌对政策。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的形象长期以来被日本小说家无限拔高，但平心而论这对冤家尽管可谓一时瑜亮，但对日本列岛的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堪称“偶像派”大名。

面对德川家康对自己在骏河国势力范围的不断蚕食，武田信玄的继承者武田胜

赖不顾自己老头子临终前“三年不离甲斐”的训诫，于公元1575年5月贸然出兵。最终于武田信玄昔日养病的长筱城下大败于织田德川联军。之后，由于织田、德川联军在此战中出动了3000挺以上的“铁炮”，而武田氏又长期以骑兵著称，因此“长筱会战”一度被日本史学界吹嘘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火枪”的战役。仿佛一夜之间日本便进入了“热兵器”时代。



长筱会战中所谓“热兵器对骑兵”的胜利其实并不存在

事实上，早在“长筱会战”之前，雄踞东亚大陆的明帝国便组建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并频繁将火器用于漠北等边境地区的冲突之中。而在西方公元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西班牙人便凭借火绳枪手和轻步兵的配合重创了横行欧洲多年的法兰西重甲骑兵和瑞士长矛手。而在“长筱会战”的时代，日本所谓的“骑兵”只不过是以马匹进行机动作战的步兵而已，而策马冲击只是少数武士才具有的特殊技能。真正击败武田氏的除了其自身对单兵素质的骄傲和迷信之外，主要还是织田、德川联军近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和预设战场的木栅、壕沟工事。

自“长筱会战”击败武田氏之后，织田信长在日本列岛的扩张进入了“快车道”。在驱逐了足利义昭之后，室町幕府已然名存实亡。为了追求自己“天下布武”的梦想，织田信长于公元1575年，将家督之位传给自己的嫡子织田信忠。此后，便长期以隐居的方式，在琵琶湖畔修筑的安土城内遥控指挥自己麾下的各路战将向各个方向展开扩张。

面对织田氏一家独大的局面，日本各地的“大名”们虽然以上杉谦信及在本州岛西部崛起的毛利氏为首组建了“第二次信长包围网”。但是随着公元1578年长年嗜酒的上杉谦信死于脑溢血之后，上杉氏随即陷入了内讧。与此同时，尽管在尼子氏和大内氏苦斗中渔翁得利的毛利元就临终前对自己的三个儿子作出了“三矢之训”，但由于其继承人毛利隆元离奇病死，毛利远就一心期盼的“两川体系”（其次子元春、三子隆景分别以过继的形式执掌山阴名门吉川氏和竹原小早川氏）也逐渐走向了貌合神离。

公元1579年，在“第二次信长包围网”陷入崩溃的情况下，织田氏大军疯狂地涌入东、西两线战场。其中负责攻略毛利氏领土的正是改名为羽柴秀吉的木下藤吉郎。应该说以雄踞西国的毛利氏的力量要击败织田氏的一个方面军并非难事。但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却始终无法形成合力，致使羽柴秀吉不断以“断粮”、“水淹”、迫降等方式逐步蚕食毛利氏的领地。

羽柴秀吉虽然连战告捷，但其在反复拉锯中所取得的战果显然无法令雄心万丈的织田信长感到满意。公元1581年，在京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阅兵式之后，织田军迅速席卷了武田和上杉两家的大片领土。在一派降者如潮的情况之下，武田氏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便归于灭亡，而上杉氏在内乱不断中也陷入了苟延残喘的窘境。

自诩天下无人能敌的织田信长于公元1582年下达扑杀武田遗臣的“狩猎武田令”后，便命令各路人马向京都集结，打算以同样的雷霆万钧之势支援羽柴秀吉，一举扑灭毛利家。但就在已经掌握日本列岛大半富庶之地的织田信长一路从甲斐回归安土城，并于公历1582年6月20日夜下榻京都本能寺之际，长期被织田信长委以重任的家臣明智光秀突然举起了叛旗，率军冲入本能寺中。身边仅有百余亲信的织田信长虽然亲自上阵，但最终仍因寡不敌众，被迫切腹自焚。史称“本能寺之变”。

关于“本能寺之变”，日本学者以各种笔记为出发点，拼凑出了一幅织田信长与明智光秀逐步结怨的长卷。但事实上，明智光秀不仅与信长的正室斋藤归蝶是表兄

妹，更长期为织田氏东征西讨，发动“本能寺之变”时，明治氏已然从昔日的美浓土豪跃升为丹波一国的守护。应该说诸多所谓织田信长当众羞辱明智光秀的记载，无非是信长的性格使然，也是两人关系不凡的另类证明。真正促使明智光秀铤而走险的，并非是意气之争，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矛盾。

丰臣秀吉在内政领域全面研习了织田信长“兵农分离”和鼓励商业的政策。但是在对外事务上却一改织田氏崇尚武力征服的思路，先后以接受名义上臣服，保证其独立性的方式收复了西国的毛利氏、四国岛的长宗我部氏以及九州岛的大友、岛津两家。并与雄踞关东的北条氏一度达成了平分日本列岛的协议。但丰臣秀吉的野心并不仅此而已。在一方面颁布“刀狩令”，镇压杂贺众等民间武装的同时，另一方面于公元1589年，丰臣秀吉借口北条氏家臣猪俣邦宪违反自己颁布的“关东总无事令”擅自出兵夺取名胡桃城，因而纠集各路大名所部20万人攻入北条氏的领地。

丰臣秀吉如此大张旗鼓地对关东用兵，固然有一举铲除异己，统一日本的意味，也不乏削弱德川家康等人，在战争中扶植自己号称“贱之岳七本枪”的核心家臣团及亲信石田三成的意味。所谓“贱之岳七本枪”，指的是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决战于贱之岳时表现出色的七名武将，其中以福岛正则与加藤清正两人最为有名，由于与丰臣秀吉沾亲带故而长期被视为丰臣系武将的核心。



今天的小田原城

石田三成出身不过是一个小沙弥，据说公元1574年左右，丰臣秀吉曾因外出打猎而在石田三成所在的寺院饮茶，结果石田三成先以凉茶相奉，再待以温茶，最后才献上热茶。丰臣秀吉深感此子心思缜密，随即将其引为心腹，常年侍奉于左右，参详军机大事。而事实证明石田三成也确有才干，其在丰臣秀吉麾下不仅成功地修建了被称为“战国无双”的大阪城，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太阁检地”。但是内政上的才能不等于军事上的天赋。在丰臣秀吉大军围攻北条氏的战场上，石田三成便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面对丰臣秀吉麾下的大军，北条氏放弃了野战，龟缩在以小田原为中心的城堡之中。此举不但令丰臣秀吉借机削弱各方大名力量的图谋落了空，更使战争有演变为长期对峙的局面。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丰臣秀吉命石田三成率军攻占小田原的外线据点——忍城。北条氏长期豢养着一批名为“风魔”的忍者，由于其身份神秘且长于骑术，因此日本史学界有“风魔”忍者是大陆游牧民族后裔的说法，不过“忍城”与“风魔”忍者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座堡垒是关东地方豪族成田氏的居城。

在遭到石田三成2.7万大军围困之时，忍城内仅有3千多人的守军。石田三成如果按部就班展开进攻未必就不能取胜。但是在勘探了战场环境之后，石田三成灵光一闪，打算效仿丰臣秀吉在与毛利氏交战中的成名之役——水淹高松，在忍城周围筑坝，引荒川之水倒灌忍城。计划上报到丰臣秀吉的案头，这位已经63岁的关白当然击节叫好。但是真的实施起来，石田三成才发现困难重重，不过此时再向丰臣秀吉请示却已经为时晚矣！

在丰臣秀吉“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也要上”的死命令之下，长达28公里的堤坝虽然在重金雇佣的民夫们努力之下建造了起来，但是瓢泼大雨之中守军却突然出击，掘开石田三成刚刚修筑好的工事，大水不仅溺死了丰臣秀吉方面的许多兵马，更令忍城周围成为一片泽国。好在此时关东各地以伊达政宗为首的各路豪强审时度势纷纷加入了丰臣秀吉一方，而北条氏内部也在长期围困中分崩离析。忍城才最终在小田原方面宣布投降之后向石田三成敞开了大门，但此战之后，石田三成也被丰臣系武将嘲笑为不擅掌兵的“战下手”。

北条氏的最终灭亡虽然标志着丰臣秀吉对日本列岛名义上的统一，但是利用此役削弱德川等大名，扶植自己亲信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怀着忿忿不平的心理，丰臣秀吉要求德川家康吐出包括世代盘踞的三河国在内的大片领土，代之以昔日北条氏的领土。德川家康虽然心有不甘，却最终选择了忍让。如塞翁失马，失去了昔日富庶之地的德川家康，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迅速在关东积聚力量，更以讨伐“北条残党”为由，获准不出兵参与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对朝鲜所发动的倾国远征。

丰臣秀吉之所以敢于悍然入侵朝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当时朝鲜、大明国内政治形势的了解及自身军事能力的盲目自信。自公元1392年李成桂废黜高丽末代君主“恭让王”，建立朝鲜王国以来。为巩固自己的“僭主统治”，李成桂家族不得不通过以各种名目授予亲贵田地，以收买其忠诚，是为“科田制”。而除了授予亲贵、重臣的“勋田”和“科田”之外，朝鲜王国还将大量的土地切割成小块授予地方豪强，由于这些受领者有义务为国征战，因此又被称为“军田”。而这些拥有世袭私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朝鲜王朝时期因其“文东武西”而合称为“两班贵族”。

“科田制”和“两班贵族”这样的顶层制度设计，无疑是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但朝鲜地狭民稠，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分蛋糕”的话语权，一系列“士祸”和“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日本发动侵朝战争之际，正值朝鲜“东、西党人”之争未平，“南、北党人”之争又起的节骨眼上。和多数东亚地区的朋党之争一

样，朝鲜的东、西、南、北四人党也是拿儒学经典和最高统治者的血统说事。当然他们争来争去也不是为了辨明程朱理学的核心是“性”还是“气”，又或者李成桂有没有汉族或者蒙古的血统。核心的目标还是要以大义的名分将对方赶出朝堂。

公元1591年，朝鲜东西两党为了国王李昖的“继承者们”又闹将起来。虽然这场“建储之争”以东人党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但对“政治失足”的西人党究竟该赶尽杀绝还是“费厄泼赖”东人党内部又产生了分歧，进而分裂成了以李山海为首的北人党和以柳成龙为首的南人党。而就在这些番朋党之争中场休息之时，一年前出使日本的“黄金组合”回来了。

“黄金组合”指的是“西人党”的黄允吉和“东人党”的金诚一。既然党派不同，那么给出的日本国情通报自然也不可能是一样。黄允吉说日本“兵强马壮，武士当国”，金诚一就说不过是“色厉内荏，不足为患”；黄允吉说丰臣秀吉“深目星眸，闪闪射人”，金诚一就说那其实叫“目光如鼠”。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黄允吉的说法显然更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此时的朝堂之上都是他的政敌，又怎么会有人替他帮腔。于是在“弹丸岛国不足为虑”的“东人党”大合唱中，朝鲜国王李昖也觉得没必要庸人自扰。

不过丰臣秀吉命对马大名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将于次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朝，请予协助”的国书还是引起了朝鲜政府的重视，因为丰臣秀吉明确写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辞。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不过直到此时，朝鲜方面仍认为丰臣秀吉不过是虚言恫吓，因此一方面向明政府报告，一方面作书质问丰臣秀吉“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

金诚一在朝堂之上虽然有意摆出与同团出使的黄允吉一道，但私下却在第一时间将日本备战的消息通知自己的同乡、身居“右议政”高位的柳成龙。柳成龙深知事态严重，于是第一时间开始选派得力的亲信武人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备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出任光州牧使的权栗和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的李舜臣。

权栗根红苗正，老爸是前领议政权辙。不过权栗本人虽然早年参加武科考试，但并非投身军旅。此时无尺寸之功便成为了一州军政长官，除了家族的荫蔽之外，自然少不得同乡柳成龙的推荐。与权栗相比，李舜臣的出身可谓“贫寒”。朝鲜史书上说他是德水李氏始祖李敦守的第12代孙，这过于遥远的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

即便李舜臣真是那个高丽王国时代神虎卫中郎将的后代，在朝鲜王国统治时期也没什么好自豪的。而在李舜臣的直系亲属之中只有曾祖父李琚做过兵曹参议，到了李舜臣的祖父辈更是家道中落。不过李舜臣的老爸李贞虽然是个布衣平民，但给几个儿子起名字倒是霸气侧漏。李舜臣的哥哥叫羲臣、尧臣，弟弟叫禹臣。如果再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要叫启臣。



朝鲜古籍中的李舜臣画像

国人读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笔者将其称为“姓名印象”。如张飞正史中明明

是一个擅画美人、立马书铭的才子，只是因为名字起的颇为跋扈，于是在演义中便成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莽夫，即便偶有良策，也不过是“粗中有细”而已。指挥水师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朝鲜半岛沿海的李舜臣本是武科及第出身的职业军官，但因为和宋、明时代的大儒同名，因此在后世形象中多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将形象。

和中国古代“穷文富武、饱吹饿唱”的说法不同，在朝鲜王国“两班贵族”的把持之下，文科、武科都是有产阶层的特权（勋田、科田、军田的所有者），平民百姓只能参与杂科考试（易、医、阴阳学、法律学等）。李舜臣虽然有资格参与武科考试，但直到32岁才在屡试之下中举，也算是大器晚成。而与权栗这样的贵二代不喜为官的洒脱相比，李舜臣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为祖国边疆献青春”。公元1579年，李舜臣被调往今天因地下核试验而闻名的咸镜道抵抗女真部族的袭扰。这一待就是10年，期间还因兵败鹿屯岛而获罪被革职，以白衣从军。

柳成龙无疑是李舜臣生命中的贵人，但对于两人的关系，朝鲜史料却讳莫若深。只说两人是少年时的老相识。但成长于安东的柳成龙如何认识家住首尔的李舜臣，却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为柳成龙的慧眼所发掘之前，李舜臣已经为金海都护府使李庆禄推荐给了“东人党”的另一大佬——李山海。可以说早在柳成龙“不拘一格”用人才之前，李舜臣已经算是“东人党”的外围了。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朝鲜王国南部三大水师指挥官系数换人，除了主持全罗左道的李舜臣之外，负责全罗右道的是王族旁支的李亿祺，接掌负责庆尚右道的是原咸镜道富宁都护府使元均。

而这两位和李舜臣最大的共同点便在于都曾在东北边境与女真族交战过，属于有实战经验的“军政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朝鲜王国对抵御日本侵略的相关战备工作的启动，最迟不远于公元1591年。所谓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如同无预警入侵”的说法并不成立。而之所以造成“壬辰朝鲜战争”初期朝鲜军队一溃千里的局面，则完全是由朝鲜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战略误判造成的。

朝鲜和日本一衣带水，自古便摩擦不断。曾长期困扰大明帝国的“倭寇”，亦是朝鲜半岛的主要外患之一。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便曾三度领军大败日本海盗。而公元1389年和1419年，朝鲜军队两次远征对马岛，越境打击日本海盗。因此在朝鲜官方的概念中，日本对朝入侵的手段无非是海上袭扰加小规模的两栖突击而已，只要加强水师建设便足以应对了。

因此与朝鲜海军战备等级迅速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王国陆军方面的敷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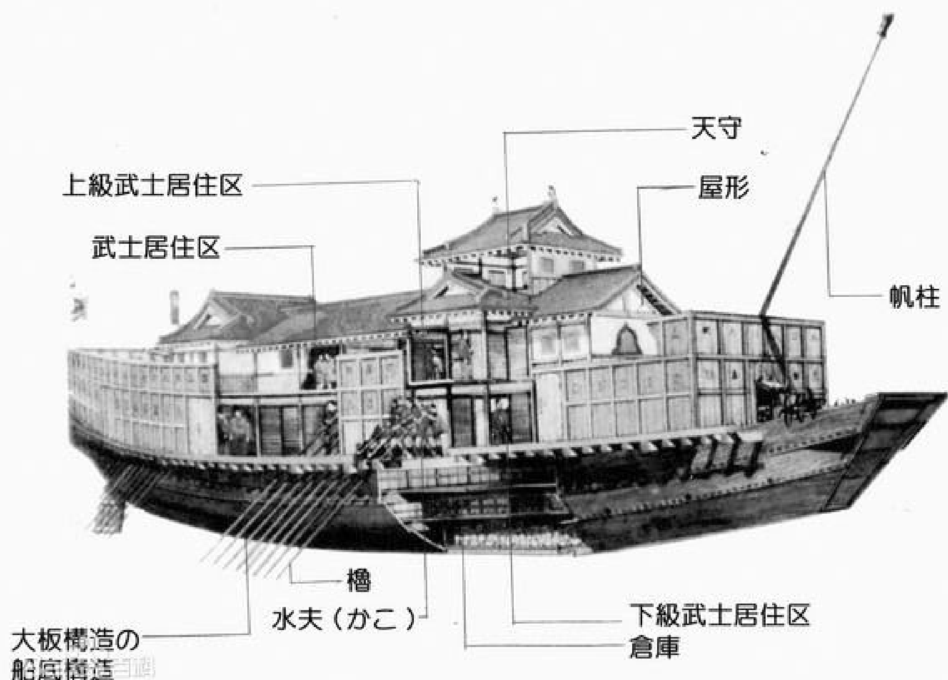
了事，派至南部三道备倭的金卒等3人，借修缮城池之机大肆搜刮民财，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而当时朝鲜的所谓的“名将”——申立和李溢，去各地视察武器，只重视弓、矢、刀、剑等，对新式武器如鸟铳却轻视地说：“岂能尽中？” 直到公元1592年4月14日，数万日军先锋于釜山一线卷海而来，朝鲜王国才知道自己错得有点离谱。

而在丰臣秀吉看来，经过战国时代的洗礼，日本海、陆军的战斗力均处于巅峰状态。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自古便不缺少统称“水军”的海盗集团。而随着战国争雄的愈演愈烈。本无统属的各地水军纷纷为豪门收购，成为了各战国大名“株式会社”的“海上事业部”。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也非常的热闹。更促进了日本列岛造船工业和舰载武器的升级换代。公元1576年，从属于织田信长的纪州水军领袖九鬼嘉隆在织田氏的全力支持下，建造出了宽7间（约12米）、全长12间（约21米），以两层漆木为樯橹，上覆铁板，内列火炮的“大安宅船”。两年之后，九鬼嘉隆正是以6艘大安宅船击破称雄濑户内海30余年的毛利、村上水军联合舰队的600余艘木制战船。可谓一战便拉升了日本海战的档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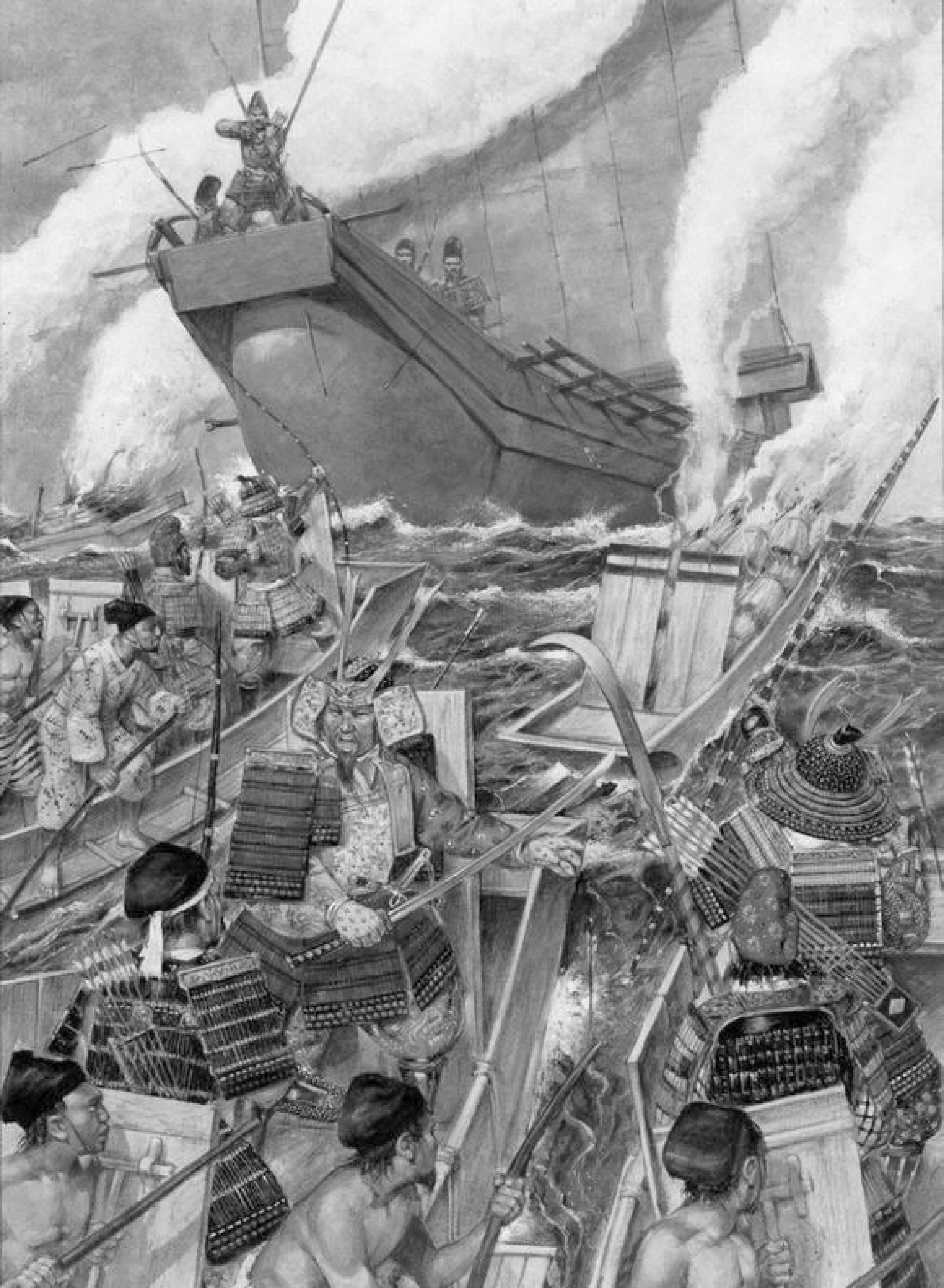
作为织田信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并非不重视水军的建设。早在受织田信长之命攻略盘踞本州西部的毛利氏领地之时，丰臣秀吉便施展自己所擅长的招降纳叛手段，延揽以濑户内海芸予诸岛的村上水军。而此时本就是股权不清的村上水军内部也暗流汹涌。而首先背离毛利氏投向村上水军来岛一系的来岛通总和他的倒霉哥哥——得居通幸。

作为村上水军的一员，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当然都本姓村上。不过公元1567年，两人的老爸村上通康去世之时，村上通幸不幸被嫡出的弟弟通总挤掉了继承家业的权力。当时年仅10岁的通幸干脆自暴自弃，号称是土居氏和得能氏的子孙，给自己编了一个得居的姓氏。而公元1582年，21岁的村上通总率先宣布背弃自己母亲所出的四国岛土豪河野氏，投靠丰臣秀吉之时，又遭到了村上水军其他几部的围攻。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村上通总只能逃往秀吉的军营避难。虽然村上通总能力一般，但出于千金买骨的目的，丰臣秀吉事后还是替他出头，不仅从毛利氏和村上水军手中要回了其根据地，更以其所盘踞的岛屿赐姓“来岛”。至此，原本相对齐心的“三岛村上”水军归于解体。



大安宅船透视图

公元1585年，丰臣秀吉以与其结盟的毛利氏为前锋，大举侵入四国岛。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亦负弩前驱。面对丰成氏压倒性的优势，被称为“土佐之蝙蝠”的长宗我部元亲很快便宣布降服。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因此分别获得了3千石和1.3万石的封地。算是跻身入了战国大名的行列。可不要小看这1.3万石，要知道日后以指挥水军参加对朝作战的其他几位日军将领，藤堂高虎此时也不过2万石的封地，加藤嘉明此时仅3千石，要到一年之后才加封淡路城1.5万石。胁坂安治山城、摄津两领相加也不过1.3万石的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岛通总两兄弟可谓起点不低。



日本海盗集团“水军”之间也常年龃龉不断

丰臣秀吉之所以肯给予来岛兄弟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分割的是四国长宗我部家的地盘，属于慷他人之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收降四国之后即将要跨海远征九州，来岛兄弟麾下的水军可能会派上点用场。但在公元1586年末丰臣秀吉所发动的第一次九州征讨战中，来岛兄弟却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军的特长，只能担任接应被岛津军诱引至户次川所败的丰成系武将仙石秀久及长宗我部的残军撤回四国的任务而已。第一次九州征讨的失败令丰臣秀吉颇为不爽。公元1587年农历三月，他操控天皇宣布岛津氏为朝敌，一气动员22万大军杀奔九州。面对丰成系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岛津氏稍作抵抗便宣布降服。

第二次九州征讨的成功，令丰臣秀吉开始迷信于泰山压卵式的大兵团作战。两年之后，他故技重施，再度动员丰成系本部人马及盟友大名所部25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向盘踞关东相模、伊豆等地已近百年的战国北条氏。来岛兄弟再度从军出征，但此时他们的风头不仅被曾经的织田系水军头领九鬼嘉隆盖住，甚至，连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这些“半路出家”的水军将领也有所不如。毕竟加藤、胁坂两人自平定四国岛之后也受封于濑户内海沿海，造船募勇均有先天的便利。

声势浩大的北条氏讨伐战，最终以北条氏主城小田原在海陆包围下宣布开城投降而告终。至此，丰臣秀吉不仅完成形式上对日本列岛的统一，更令其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对战争的看法。在丰臣秀吉看来，日本列岛经过百年战国的历练，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体制。通过被称为“太阁检地”的日本全国经济大普查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丰臣秀吉基本掌握了日本全国年生产力的经济数据。随后再依照每个大名、家臣所领有的石高数，去分配兵员和战争物资采购数，数十万大军便可以迅速完成集结和调遣。正是缘于对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原始“总体战”体系的自信，在丰臣秀吉眼中，远征朝鲜将成功地复制九州、北条讨伐战的辉煌。

应该说丰臣秀吉的这套战争理论在陆战中确实行之有效，但丰臣秀吉将这套理论照搬到海战领域，却不得不说有胶柱鼓瑟之嫌。从公元1591年农历正月下达给各大名的水军征召动员令中，不难看出丰臣秀吉完全按照陆军的模式，进行着海战的动员：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10万石准备大船两艘……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10人……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10万石建大船3艘、中船5艘。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迨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

以当时日本全国的石高约2500万石，沿海约占一半计算，在丰臣秀吉的指挥棒

下，为远征朝鲜征调、新建的战船可达700余艘，且自带水手。仅从数字上来看不可谓少，但是丰臣秀吉的征召令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战船的武备问题。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实现了火绳枪的国产化，但大口径火炮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换而言之，集中到远征军手中的这700艘战船上面连一门火炮都没有。

从各地征调的水手可以满足战船的正常航行需要，但一旦发生海上战斗仍需专业的水军。相对于第一波次投入朝鲜战场的15.8万陆军而言，首战朝鲜的日本水军仅有9200人，这个集合丰成系所有水军人马的数字，甚至远远低于战国时代鼎盛时期的村上水军一家的兵力。织田信长手中仍船坚炮利的日本水军，缘何在远征朝鲜之时缺兵少炮呢？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归咎于丰臣秀吉于1588年所颁布的《海贼停止令》。

仅从字面上看，天下已定，要求各地水军停止“海贼”行动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日本各地的水军除了打家劫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扮演着海上收费站和镖局的角色。正因如此，日本水军的主力舰被称为“关船”，意即在海上的航行要道设置关卡，以收取“帆别钱”。而客户如果愿意以“警固料”的名义出钱，各水军也不介意用小型的快船（小早）提供武装护送的物流服务。从长远来看，帆别钱、警固料对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但丰臣秀吉以行政手段将其一刀切，却不免操之过急。《海贼停止令》一出，各地的大小水军集团顿时星散，其中当然不乏好事者加入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远征朝鲜，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就此从良，过上了打鱼经商的平和生活。从这一点来说，被编入四国诸大名组成的第五番队（兵团）渡海犯朝的来岛通总所部，可以说是九鬼嘉隆之外，唯一一支成建制参与远征朝鲜的战国水军余脉。

到了同年3月时，丰臣秀吉又颁布了陆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各国诸大名每万石应征召人数各地不同：四国、九州600人；中国、纪州500人；畿内五国400人；骏河、远江、三河、伊豆四国300人，由此以东200人；尾张、美浓、伊势、近江四国350人；若狭、越前、加贺、能登四国300人；越后、出羽200人。以忠于丰成系的各派人马总计千万石来计算，日本对朝远征军便可达30万以上。因此在此后漫长的“壬辰朝鲜战争”中，日本远征军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兵员，而国力远胜于其的大明帝国在兵力上反倒处于劣势。

丰臣秀吉的自信同时还源于对明帝国此时内部政治格局的混乱。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病死，其子朱载垕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在位6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明穆宗朱载垕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不过登上皇位的明神宗朱翊钧此时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张居正可以说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明神宗朱翊钧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年幼的朱翊钧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10年中，可以说是权相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腐败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



明神宗朱翊钧

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慵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张居正

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

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

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300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蒙古鞑靼“小王子”巴图蒙克率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16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17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还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有改革。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招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朱翊钧仍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朱翊钧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朱

翊钧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58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3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的。朱翊钧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明神宗朱翊钧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朱翊钧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

朱翊钧一听，怦然“心动”，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数。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然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张居

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



并不受宠的太子朱常洛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朱翊钧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

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朱翊钧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朱翊钧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出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所谓“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因册立太子的问题而与群臣的矛盾，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朱翊钧因此也常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是很喜欢他。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晋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了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6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辞激烈，让明神宗朱翊钧颇为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在明

神宗朱翊钧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中，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朱翊钧施加压力。朱翊钧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15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个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朱翊钧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钧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朱翊钧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群臣请立朱常洛为太子一事，前后纷争凡15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让步，立虚龄已20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爆发了郑贵妃收买流浪汉张差欲行刺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朱常洵才勉强宣布离开北京前往自己的封国。

在“国本之争”持续发酵的同时，明帝国内部各种天灾人祸更不断上演。万历十六年（1588）八月，明神宗朱翊钧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1589）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31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

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朱翊钧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发生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也由此引发了所谓“万历三大征”——大明帝国长达十余年的三线作战。

次要战线
——与万历援朝战争同期的宁夏、播州之役

宁夏副总兵哱拜原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因与部落酋长英台吉有矛盾，于“嘉靖中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遂率领部众投奔宁夏官军”，因作战勇敢，从军功被提升为巡抚标下把总。后因屡建战功，渐渐由把总升至守备、游击、参将，并授宁夏卫世袭都指挥使。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经宁夏巡抚梁问孟奏请，“加宁夏总兵标兵参将哱拜以副总兵衔致仕，许其子哱承恩袭职”。

哱拜原本为了逃命和报其父兄之仇而亡命投靠明军，始终心怀异志，居心叵测，所以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便招降纳叛，吸引地痞恶棍，并在家中豢养号称“苍头军”的武装家丁三千余名。他的长子哱承恩更是“独形枭啼，性狠戾”，在接替父职以后，也是“多畜亡命”，目无上司和法纪。所以哱拜依仗自家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和一伙为非作歹的所谓的义子，凭借哱家苍头军的武力，已形成横行塞上的一个黑势力集团，地方官民避之不及，无人敢惹，官府为了息事宁人，都睁一眼闭一眼。

哱家父子不仅是一方人民的祸害，而且哱家军的实力日益膨胀，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影响宁夏军镇安全的一大隐患。宁夏巡抚梁问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才使用加官的办法，给予哱拜一个副总兵的头衔，让他交出兵权，离开军营。但是这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其子哱承恩承袭了父职，哱家的势力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引起了哱拜的怨恨和警惕，促使他叛逆心理的滋长。

万历十九年（1591），鞑靼部西犯，甘肃临洮、河州一带报警。此前，御史周

弘和巡按宁夏边务时，曾偏听偏信，“还朝，以将材荐哱承恩、土文秀、哱云”。今军情告急之际，又“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拜义子哱云等”大可任用。而哱拜也不甘寂寞，遂自请率哱家父子和家兵出征甘肃。新任宁夏巡抚党馨早已了解到哱家军漫无纪律，平时经常出塞劫掠人畜金帛，恐战时更难驾驭，主要还是对哱家父子的不信任，便没有批准他的出征请求。

但是哱拜转而得到经略郑洛的批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党馨不仅未给他分拨军马，反而还给哱家军调换乏马。战事结束返宁以后，党馨又想清查哱拜虚报冒领的粮饷，并鼓动其部下检举哱家父子西征时的不法行为。哱承恩还因强娶民女为妾，被党馨鞭责20军棍。哱家父子对此怀恨在心，等待机会要向党馨报复。恰当此时，宁夏官兵对党馨拖欠粮饷，冬衣不能及时发放，却反而催逼军兵们的屯田赋税，引起广大饥寒交迫士兵对党馨的怨恨。于是在下级军官刘东旸、许朝、刘川白、张文学等人的策划下，串联80多人，歃血为盟，准备举行兵变。

军中坐营江廷辅已察觉到军营要出事，就向党馨建议赶快补发所欠银两，以安定军心。但党馨不以为然，并进而威胁士兵说：“想以作乱要挟上司，决不可答应。你们难道就不怕杀头灭族吗？”所以，士兵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宁夏镇城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戊辰日，在哱家父子的进一步煽动之下，宁夏镇城兵暴发生了。“宁夏镇四营官军、家丁围杀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数其侵克残暴二十事，并杀卫官李承恩，供应官陈汉等于市，放狱囚，毁文卷”，“毁公署，据城门”，宁夏总兵官张继忠无奈自杀，刘东旸“自署总兵”，“奉哱为谋主，承恩、朝为左右副总兵，云、文秀为左右参将”。本来这仅是一场闹饷的哗变事件，由于哱家父子的煽动和加入，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形势更加恶化，并“勾结松虏”，使事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少数人索饷闹事而转化为有政治目的的反叛暴动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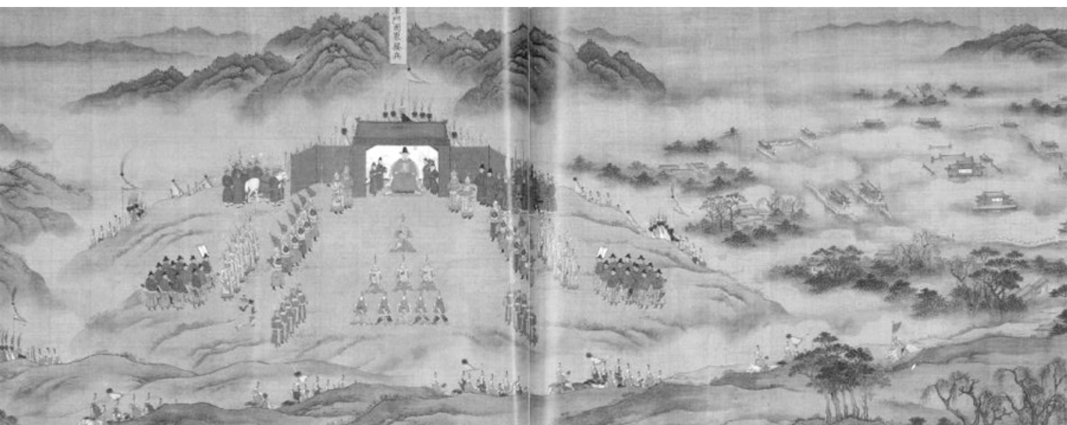
此时哱拜原形毕露，自称“哱王子”，宁夏叛乱，“实是哱拜主谋”，其子哱承恩、哱云和部将土文秀等成为叛军的主要首领，各率所部攻城略地，十分猖狂，当时宁夏全镇除北路平虏所，由于参将萧如薰坚守没有丢失外，其他大多数城池和河西47堡地方均被蹂躏，“且渡河，复诱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虏，花马池。全皆震动”。



明代边防骑兵

明帝国政府急命兵部尚书、总督魏学曾驰赴宁夏统一指挥征讨诸军，并升陕西

副使朱正色为宁夏巡抚，升协守洮岷副总兵董一奎为宁夏镇总兵官。又破格提拔萧如薰为宁夏副总兵，暂管总兵事，与总督魏学曾共同办理宁夏平叛事宜。同时增调宣大兵六七千人星夜驰援宁夏，还命陕西巡抚沈思孝率部移驻下马关，作为声援。再特命御史梅国桢速赴前敌担任监军。与此同时，朝廷又高悬赏格“斩承恩头，许以侯伯延世”，有能擒献哱贼，“与世封”，“有能擒献哱拜父子，赏银二万，封龙虎将军；擒献刘东旸、许朝、土文秀，赏银一万两，封都指挥使”。明神宗朱翊钧还赐魏学曾尚方宝剑，享受“斩临阵不用命者，以肃军法”的特权。



反映宁夏之乱的《平藩得胜图》局部

但是官军进展仍然缓慢，3个月后，于六月十八日才肃清宁夏镇外围，开始围攻镇城。此时有人建议水淹镇城，而魏学曾之所以不采用水淹镇城和武力强攻的办法，是不忍心看到城中“生齿30万”无辜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千方百计想以招抚和离间的办法，促使城中叛军觉悟，自行从内部解决。魏学曾先后派叶得新入城，招谕刘东旸、许朝，想让他们杀哱家父子，主动赎罪立功；又派宁夏原总兵官张杰入城与哱拜叙旧，劝哱拜杀刘、许自新；还与城中百户姚钦、武生张遐龄等约为内应，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才不得已于八月决堤放水，淹灌宁夏镇城。叛军也加堤反水淹官军，故始终未能攻下宁夏镇城。

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朝廷认为前敌大将帅老无功，便下令撤换了三军总督魏学曾，“命锦衣卫逮系来京究问”，改以叶梦熊总统三珲，萧如薰总兵宁夏，调名将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统一指挥新增派的山西、辽

东、浙江兵和南方苗兵，配合督抚各军通力合围宁镇。另一方面，边外著力兔、庄秃赖和十失兔各蒙部内犯援兵，也被总兵李如松、马孔英、杜桐等将分别击溃，大局已定。各路大军联合会攻宁城，“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总兵攻其西，故总兵刘承嗣攻其北，朱秉忠攻其东，原总兵麻贵以游兵主策应”。

哱拜自出北门，想逃往蒙部，当即被游兵谢贵赶回城中。哱刘叛军困守城镇，粮草告尽，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内外交困，已成瓮中之鳖。八月初，官军再次放水淹城，虽然水攻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却使得城中叛军人人自危，丧失了斗志，并彼此猜疑，互相残杀。先是刘东旸杀死哱拜部将土文秀，哱承恩又派人离间许朝和刘东旸，两人被杀。

哱承恩为了保全哱家的生命和地位，便将刘东旸、许朝和土文秀3人头颅悬挂于城头请降。九月十七日，官军最后发动总攻，哱承恩见势不妙，率所部冲出南门，被围城官军杨文登生擒，大军一举攻进城中，李如松、李如璋兄弟直扑哱拜第，将其包围，并用火攻，叛兵死伤过半。哱拜见大势已尽，在家中上吊自焚身死。十一月戊辰，皇帝亲登皇极门朝百官，举行宁夏大捷庆礼和献俘仪式，“命磔哱承恩、何应时、陈雷、白鸾、冯继武，斩哱承宠、哱洪大、王文德，各枭示九边”。并以宁夏大捷祭告郊庙和“逆贼荡平布告天下”。

“宁夏之役”表面上看是外籍军官领导之下的边防军哗变，但本质上仍是明帝国财政日益吃紧之下社会问题在军队中的集中爆发。而几乎同一时期爆发的“播州之乱”，则折射出明帝国长期以来在边境地区所奉行的“土司”制度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元帝国统治时期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首领世袭。

明帝国建立之初，朱元璋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遂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洪武初年，“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关于土司的选任和袭替，“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天顺末年起，朝廷“威柄渐弛”。

到嘉靖九年（1530）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

明代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稳定南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仇杀、内讧，于是明朝廷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是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统治。同时丈量土地，额定赋税，设兵防守等。

如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朱棣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土归流。但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

播州杨氏可谓是西南地区土司世家的“金字招牌”，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史料记载大中十三年（859），云南割据政权南诏出兵侵占播州地区。在唐帝国号召之下，山西太原人杨端与其舅谢氏率江西向氏、令狐氏、成氏、赵氏、犹氏、娄氏、梁氏、韦氏、谢氏九姓子弟组成的义勇军向播州进军，明攻娄山，暗渡赤水，收复播州。罗荣五世孙罗太汪偕同征战，杨、罗子孙遂家于播州。唐末乱世之中，杨氏家族开始实质上统治播州地区。历经两宋与元朝统治後，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首领杨铿降明，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前后历经29代。

可以说在杨应龙继承播州土司之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其与大明帝国的关系非常融洽。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还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而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时任四川总督的李化龙却私自增加播州的税赋，并要求杨应龙长年向其进贡。在李化龙看来播州虽为土司领导，但同样是大明的疆土，自己有权加税。但在杨应龙看来自己和明帝国实为藩属关系，此事需要外交磋商，因此便派其子前往四川谈判。

世人不清楚杨应龙的儿子和李化龙谈判的细节，但从后续李化龙所谓“贼杨应龙者，本以夷种，世厕汉官，披我冠裳，守彼爵土”的描述来看，这位四川总督对播州土司成见颇深。杨应龙的儿子前往成都谈判，却为李化龙处决，并将头悬挂于城

门，杨应龙震怒，发兵讨伐李化龙。李化龙便向明帝国中枢报告杨应龙反叛，明神宗朱翊钧钦点李化龙挂帅，对杨应龙部进行围囤。三个月后，杨应龙兵败于海龙囤。至此播州的叛乱似乎已经被平定了。

不过杨氏在播州毕竟统治多年，明帝国诏命黔蜀两省会勘杨应龙叛乱一案，万历二十年（1592），杨应龙赴渝受审，依法当斩。但此时日本军队正大举入侵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坚持严提勘结，杨应龙却又抗命不出，明帝国只能再度下令进剿。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继光会兵进剿，抵达娄山关。杨应龙诈降，暗地遣兵据关冲杀，官军大败且死伤过半，王继光被革职。

万历二十三年（1595），兵部侍郎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请令杨应龙至綦江听勘。杨应龙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并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朝廷允准，以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渝作人质。不久，杨应龙闻次子死，拒缴赎金。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万历二十五年（1597），杨应龙又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明帝国终于彻底被震怒。



播州杨氏重要据点海龙囤遗址

万历二十七年（1599），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此时，明朝援朝战事已经结束，明神宗朱翊钧决心平定杨应龙叛乱。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杨应龙于官军集结前率兵8万陷綦江，纵兵血洗秦江城。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8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


纵横朝鲜战场的刘珽

八路大军中，刘珽绰号刘大刀，是平倭名将，夙有威名，所部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以重点屯兵于此，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畏惧刘珽，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珽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珽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至此，明帝国平定播州叛乱的战事以完胜结束。

宁夏、播州两地的战事相较于明帝国的援朝抗日战事，影响似乎相对较小。但明帝国投入的兵力却丝毫不少于朝鲜战场。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200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8年，费帑金700余万。27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8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1160余万两白银。而宁夏、播州两线更极大地牵制了明帝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明帝国方面诸多战略计划的开展和实施。

天正二十年（1592）三月，丰臣秀吉动员了日本全国30余万兵力，以其中西国部队为主的15.87万人编成9个军团渡海至朝鲜作战；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等为总奉行。辅以水军9200人、船只700艘。另命东日本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政宗等将其旗下部队集结在肥前国名护屋城（位于今佐贺县唐津市）作为预备队，总兵力计约10.5万人。

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于四月正式开始了对朝鲜的战争。四月十二日日本远征军第一军团由小西行长率领1.87万人先渡海至对马岛待命。四月十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九军出发”之命传达军前，小西行长所部随即乘船驶抵釜山，次日天明攻城，揭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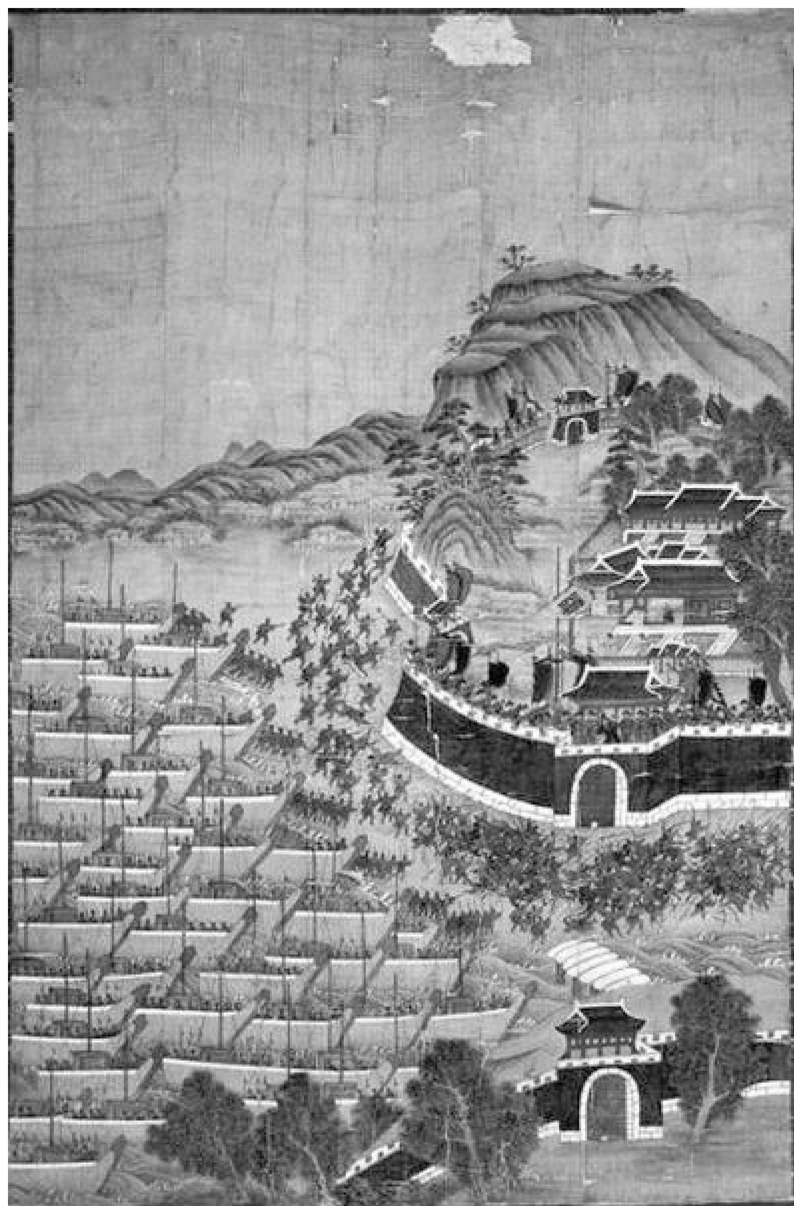
小西行长本是界町商人小西隆佐的义子，幼年跟随养父经营药草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冈山鱼服屋处与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进行贸易时，击退了前来行刺宇喜多直家的刺客。从此被由商人破格拔擢为武士。小西行长天资聪慧，加入宇喜多氏之后，他随即向武将远藤又次郎学习火枪及水军战法。在横行濑户内海的海贼村上武吉宣告依附严岛海战后势力大增的安艺毛利家后，为了应付毛利家逐渐逼近的威胁，直家起用远藤又次郎和小西行长组织宇喜多家的水军以巩固冈山城的安全。

在小寺家家老黑田官兵卫的引导下，织田家以羽柴秀吉为总大将出兵山阳道，夹在织田与毛利两大强豪之间，据有备前、美作两国的宇喜多直家虽在第二次上月城之战时，借毛利家的兵力夺回被秀吉两大军师黑田官兵卫和竹中半兵卫所攻下的上月城。但是第一次上月城之战时，不论是小西行长与远藤又次郎，还是一代奸雄宇喜多直家，都被织田家强大的武威所慑，所以在第二次上月城之战宇喜多直家故意称病不出，并且在战后派能言善道的行长为使与秀吉进行交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项任务竟是小西行长一生的转折点。



日本军队登陆釜山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小西行长彻底发挥商人这个角色的外交天赋。他让义父小西隆佐借出大笔金钱予秀吉资助军费，并换得日后播摩和但马的优先经商权，使小西隆佐大大获利，然后以“药商小西隆佐义子”的名分晋见秀吉，转达宇喜多直家的心意，顺利和织田方达到一定的协议，同时也避免毛利家察觉直家的二心。行长圆融的手法令直家十分满意，慢慢地将小西行长提升到与三家老相当的地位。



商人之子小西行长

当织田家扫荡了三木城别所家军团长荒木村重的反叛后，直家正式投入织田家阵营，在羽柴秀吉的努力下宇喜多家保住全领部领土。天正九年直家重病去世，他逝世前，秀吉带了成为人质的宇喜多秀家到冈山城在直家面前替他元服，并让小西行长担任他的太傅。随着宇喜多秀家质于姬路城，小西行长也与丰臣秀吉接近频繁，从另一角度来看，小西行长已等若丰臣秀吉的家臣，在天正九年时于丰臣秀吉攻打播摩宝津时被任命为水上兵站奉行，即水军后方补给司令官，负责维持和增进水军参战部队的战斗力和支援作战的工作。

织田信长死后，秀吉击败柴田胜家登上天下人的宝座，小西行长在他麾下担任水军将领，水攻太田城时，使用安宅船与大炮动员攻击。他也负责管理小豆岛及濑户内海一带水上输送的职务，之后官拜从五位下摄津守，得到两万石的领地，被赐丰臣姓。同时在高山重友的劝说下改信天主教。小西行长于1587年跟随秀吉进行九州征伐，翌年由于肥后国主佐佐成政治理不力，领内引发一揆动乱，丰臣秀吉派出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共同前往镇压，因功得到肥后南半国宇土郡、益城郡、八代郡24万石领地。

小西行长作为北九州地区的新兴势力，显然比其他的武士集团更渴望战功。公元1592年四月十三日清晨，由对马岛宗义智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到达釜山浦。之前，宗义智先致书于釜山镇守将郑拨，要求假道入明，遭到郑拨严词拒绝。双方随即兵戎相见，日军使用装备先进的火绳枪，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郑拨率军退守第二道防线，重新组织了弓箭手进行反击，但仍被日军击败，被迫退守第三道防线。数个时辰之后，郑拨中弹身亡，朝鲜方面随即军心涣散。翌日早晨，日军全面占领釜山城，并以此作为日后侵略朝鲜的“兵员、粮草”重要中转站。

宗义智率军攻打釜山镇的时候，小西行长也率大约7000人在釜山镇附近的多大浦登陆。朝鲜军队在多大浦佥使尹兴信的率领下抵抗日军的进攻，其弟尹兴梯也参加了战斗。朝鲜军队登上城墙守卫，小西行长则率日军在城下挖掘战壕，以战壕为掩护，使用火绳枪对城上的守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朝鲜守军则用箭和投石进行反击。日军最后使用攻城塔和梯子，在火绳枪的掩护下登上了城楼。

尹兴信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之后假装撤退，随即对入城的日军发起奇袭。激战过后，朝鲜军战败，尹兴信阵亡。日军占领多大镇，对城中的居民进行屠杀。随后日军陆陆续续上岸，驻守多大镇。小西行长以多大镇为据点，重组军队，向汉城方

向进军。

稳固了对釜山镇的控制，日军决定攻取釜山镇以北数公里处的东莱城。而这座东莱城也是釜山镇通往汉城的必经之路。日军的第一军在休息了一个晚上后，于十四日清晨从釜山镇出发，一个时辰后到达东莱城下。城内对日军的突然到来措手不及，东莱府使宋象贤急至街上召集民兵，登城抗击。梁山郡守赵英珪等人也纠集军队前来支援。

日军将东莱城重重包围。东莱城是一个近乎平地之处建起的城池，日军便围困东莱城，等待突袭部队的到来。宋象贤亲自登上城楼，击打大太鼓来激励士气。小西行长遣人致书于宋象贤，称“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提出日军要假道入明。宋象贤答复称“战死易，假道难”，严词拒绝了这个要求。十五日晚饭之后，小西行长率军攻城，并下达生擒宋象贤、不可害他性命的命令。庆尚道左兵使李珏，得知日军攻城，率庆尚道的援兵南下来到战场，但由于畏敌，在战场以北20里处的善山（今龟尾市善山邑）扎营。

城内的朝鲜军得不到支援，使用长长的木板作为盾牌，抵御日军火绳枪的攻击。日军架起梯子攻城，朝鲜军用弓箭和瓦砾迎战。日军奋力登城，并在一个时辰内完全控制了东莱城。宋象贤、赵英珪巷战而死。李珏得知东莱城陷落的消息后，率军逃离了战场。日军在东莱城进行大屠杀，并接收了城中的武器、兵粮、牛马。小西行长在城中休养两天，再度率兵北上。

东莱城之战后，巡边使李镒驻守尚州，在城中召集了一千余名农民抵抗日军。为避免军队在城中全军覆没的教训，李镒在附近的小山丘上也布置了兵力。使者报称日军即将迫近城池，李镒以扰乱军心之罪，将其斩首号令，稳定了军心。李镒遣人侦察日军的动向，但不幸的是，派出的侦察兵都被日军射杀。因此李镒完全无法得到有关日军的情报。



申砬的自负断送了朝鲜王国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

四月二十四日，小西行长率日军到达尚州附近时，命足轻兵使用火绳枪对朝鲜军进行攻击，但随后发现弹药不足。此后又突袭朝鲜军的小山丘阵地。李镒据守山丘，下令射箭还击，但朝鲜军的弓箭射程太近，无法伤及日军。日军开始试图包围朝鲜军阵地，李镒自知必败，连忙上马，率部撤退。小西行长最终攻取尚州，向忠州方向进兵。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朝鲜国王李昖急命左议政金命元为都元帅， 坐镇王京汉城之内，节制全国兵马。又增设三道巡边使，由曾经大破女真人的名将北道兵马节度使申砬担任，负责庆尚、全罗和忠清三道防务。在申砬离开汉城的时候，李昖把自己的佩剑赐予了他，授予他调动禁军并沿途招募了弓手的全权。

大明背负名将之誉的申砬，在战场上却表现得刚愎自用。当部下建议在庆尚道和忠清道交界的要塞鸟岭遏制日军的进兵时，但申砬认为驻守鸟岭无法遏制日军，因此拒绝采纳这个建议，决定在忠州附近的平原上交战。在得知日军的迫近之后，申砬在忠州附近的弹琴台布置骑兵，背靠汉江，希望通过背水之阵来激励朝鲜骑兵的士气，而后使用骑兵迅速冲破日军的火绳枪阵地。但申砬忽略了朝鲜军装备落后、日军装备优良这一点。朝鲜军使用的是弓箭，而日军使用的是火绳枪，因此朝

鲜军很难取胜。

四月二十七日，一名朝鲜士兵发现敌人，并报告申砬。但申砬认为他扰乱军心，当即斩首示众。而此时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侦知朝鲜军的战略后，当即决定对忠州的朝鲜军发起攻击。廿八日，小西行长派有马晴信、大村喜前、后藤纯玄率3700人偷袭忠州城。其余日军突袭弹琴台；由小西行长率领7000人，对弹琴台的朝鲜军发起正面攻击；宗义智、松浦镇信分别率领3000人，沿着汉江江岸对朝鲜军进行夹击。小西行长的正面部队偃旗息鼓，其行迹被弹琴台的树木挡住，故而朝鲜军难以发现。等到朝鲜军发现时为时已晚，三路日军已对朝鲜军完成包围。

申砬下令朝鲜骑兵冲击日军阵地。但三路日军使用火绳枪对朝鲜军进行猛烈射击，并使用长刀奋勇向前。朝鲜军战心顿失，许多朝鲜骑兵跳入汉江被溺死。申砬奋力杀出重围，逃往忠州城下，但发现忠州城已被日军占领，自感愧对宣祖，便自杀身亡。



装备日式火枪的朝鲜士兵

忠州被日军攻陷，李镒逃往王京汉城报败讯，此时日军已经逼近重镇稷山，王京汉城已难以固守，朝鲜国王李昖在柳成龙等朝臣的建议下，放弃都城、出奔平壤。五月二日日军攻克朝鲜王京汉城，俘虏朝鲜王子。在战略上，日本军采用了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水军保

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计划一举占领朝鲜，然后将朝鲜八道分别交给各军团长统治。

但此时除了小西行长所部之外，其余诸路日军进展并不顺利。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朝鲜各地的有力乡士自立组织义军，如庆尚道星州的郭再祐于4月21日组织义兵，屡次击败日军安国寺惠琼所部，使其无法顺利进入全罗道。面对郭再佑的游击战术，日军方面很不适应。不仅后方不稳，甚至正面作战也颇有影响。为了攻取全罗道的门户晋州，同时也对隐藏在丛林中的郭再祐义军能够有效打击，日本方面投入了作为预备队的宇喜多秀家所部第八军和细川忠兴所部第九军，下达了先攻取昌原、再攻略晋州的指令。

朝鲜庆尚右兵使兼咸安郡守柳崇仁死战防卫咸安，被日军击败，出奔晋州，希望晋州牧使金时敏开城接纳。柳崇仁是金时敏的上司，金时敏得知日军迫近晋州的消息后，担心柳崇仁入城后会导致城中守军号令不一，便拒绝了这个要求。柳崇仁最终力战而死。金时敏研究了日军的火绳枪，并仿制了170支分配给守城的朝鲜军，让他们多次训练，并坚定朝鲜军能够打败日军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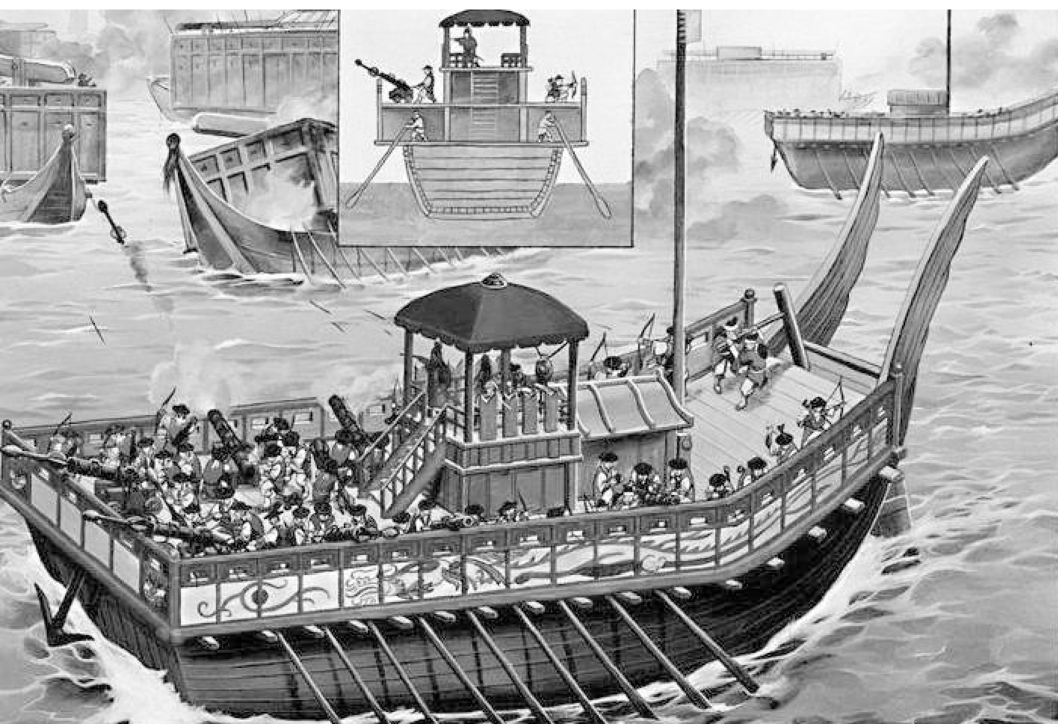
十月五日，细川忠兴率日军兵临晋州城下。当得知城中只有3000多名守军的时候，细川忠兴非常高兴，认为又将是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日军架起梯子攻城时，朝鲜军使用大炮、弓箭、火绳枪对攻城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使日军伤亡惨重。细川忠兴甚为震惊，下令使用火绳枪的火力掩护日军攻城。但守城的朝鲜军冒着弹雨，使用石块和斧头摧毁了攻城梯。攻城梯被摧毁后，朝鲜军在城楼上，使用火绳枪居高临下地对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伤亡更加惨重。

在战斗的第三天，金时敏被子弹击中头部，伤重无法继续指挥战斗。细川忠兴探知后，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城，试图借此机会摧毁朝鲜守军的斗志。虽然朝鲜守军坚持奋战，但没有统一的领导，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此时，郭再祐得知日军攻打晋州之事，率领二千余人的义兵驰赴晋州，发起游击战，趁夜偷袭日军营地。郭再祐身穿红色绯缎所织成的战袍，率义兵迅速闯入日军营地，突袭毫无防备的日军，并故意发出巨大声响以制造恐慌，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对郭再祐十分畏惧，称他为“天降红衣将军”。细川忠兴意识到如此下去日军必然损失惨重，只得下令撤退。朝鲜军队成功守住晋州。

除了郭再佑之外，此时朝鲜半岛南部还有郑仁弘、孙仁甲、金沔等人也组织义军令日本第七军毛利辉元所部无法顺利占领庆尚道。全罗道光州的金千镒、全州高

敬命、李基鲁、洪彦秀父子也于6月1日组织义兵，忠清道公州出身的赵宪、僧人灵圭则于7月3日整顿兵力，联合抵抗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率领的日军第6军。另外还有京畿道海州的李延馣也有效地对抗日本方面黑田长政所部第3军，以上战事皆阻碍了日军的进军。

陆路进展不顺对于丰臣秀吉而言或许还能接受，但海路的日军连遭败绩却令其依赖海路提供陆军补给的计划归为泡影。最早与对手交锋于海上的朝鲜水军将领是庆尚右道水军节度使（朝鲜方面简称为右水使）元均。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海军主力，元均虽然屡战不利，被迫放弃战略要冲巨济岛，但毕竟也算是敢于亮剑，比起一炮未放便“敌前转进”的左水使朴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当然朴泓也并非全无贡献，他至少在跑路之前凿沉了自己麾下所有的战舰。毕竟当时朝鲜水师所使用的主力舰——板屋船，无论是吨位还是火力均强于日本方面大量使用的“关船”，即便面对十万石大名才能建造的安宅船也并非不能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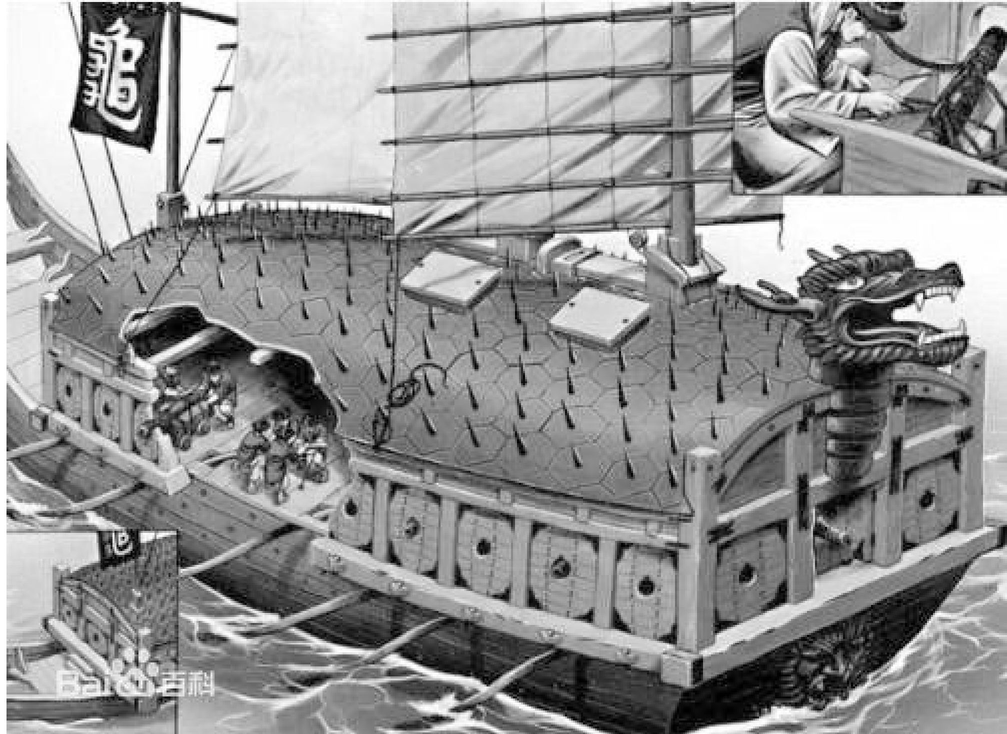


朝鲜海军的板屋船

元均兵败之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呼叫支援。但近在丽水港的李舜臣却发挥了“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精神，不仅自己不出兵，还派人告诫元均“勿令妄动”。当然李舜臣的行为后来被朝鲜王国官方认定为属于“大将气度，伺机而动”。可怜的元均带着庆尚道残存的4艘板屋船在巨济岛附近徘徊了近半个月，李舜臣的援军终于到了。此时距离日军登陆釜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过在李舜臣看来自己的战机恰恰就在此时，毕竟日军主力已经北上汉城，巨济岛一线留下的不过是负责掩护后方兵站的少数警戒部队。在会合元均所部之后，公元1592年农历五月七日，李舜臣集中24艘板屋船、57艘小型战舰（挟船、鲍作船）冲入藤堂高虎所部泊停的玉浦港。

必须指出的是初次出兵朝鲜之时的藤堂高虎领下不过两万石，因此全力动员也不过出兵2000人，根本不好意思在前线冲锋陷阵，只能以水军的身份在后方打打秋风。而正在他率部上岸扫讨（抢劫）之时，李舜臣的大军突然杀到。停泊于岸边的30艘日军战舰根本来不及还手就被李舜臣以舰炮、火箭击毁了24艘。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打了这样一场奇袭战固然是大捷。但事后朝鲜方面宣传毙伤日军4000人左右却显然有些不厚道。

成功奇袭玉浦之后，李舜臣随即打算将舰队临时停泊在巨济岛的永登浦过夜，但侦察船又传来了有小股日军正从附近经过的消息前往合浦。李舜臣随即又率队前往截杀，又一气击沉了对方6艘战舰中的4艘（一说5艘）。连胜两阵的李舜臣显然有些亢奋，第二天又按照此前侦查所获的情况，率军突袭了巨济岛对面的固城赤珍浦，又故技重施地击沉了13艘处于停泊状态下的日军船只。不过此时汉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一扫李舜臣、元均所部原本高昂的士气，于是在“诸将放声痛哭”的情况下，两道水师联合舰队宣布解散，各回本镇。



龟船作战模式想象图

应该说李舜臣所在的丽水港此时远离日军的进攻轴线，相对安全。而元均所统率的庆尚右道水军不仅船少兵寡，而且防区内的大多数良港、锚地均已落入敌手，在一线与敌周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得益于元均所部始终活跃于前线，才能使李舜臣于丽水安心休整一个月，并根据战场需要建造了第一艘“龟船”。

根据李舜臣《乱中日记》的记载来看，朝鲜水师很早便已有过使用龟船的历史。而其更为古老的名字——“蒙冲”则似乎暗示了这种战船有着中国血统。而结合中国古籍中关于艨艟（蒙冲）的记载更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此船（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基本上与龟船的设计理念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这种战舰在中国战场被淘汰后会在朝鲜以龟船之名复活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缘于自宋元以来，中国造船工业及火器运用日益发达。曾在冷兵器时代具有良好防护性的艨艟由于不利于架设多重帆橹机动性不强，且在大口径火器面前生存能力堪忧而逐渐淡出一线。而在朝鲜战场之上，由于日军缺乏火器且主战场集中于沿海港汊而重新给予了一展拳脚的机会。



日本海军的传统战术对龟船效果并不好

中远距离以弓矢、火绳枪射击，近距离投掷被称为“焙烙”的火药罐杀伤对手甲班的有生力量，最后以水手跳帮，白刃肉搏结束战斗的模式堪称战国日本水军的“三板斧”。但这些战术在面对李舜臣的龟船面前显然都很难奏效。龟船的上半部包覆的六角形的甲片，可以有效地抵御日方的中远程投射武器的攻击，而甲片上林立的铁锥也能令对手英勇的跳帮成为一场可怜的自杀。不过和大众传统的理解相悖的是，事实上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朝鲜水军所投入的龟船总数不过3到5艘。

李舜臣首次投入龟船的战斗是在1592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浦海战之中。根据元均从前方传来的情报，李舜臣于当天率军突袭泗川浦的日军。不过日本方面显然吸取了此前的教训，始终将舰队停留在狭窄的港区之内。面对近两百挺铁炮（火绳枪）组成的日军火力网，初次上阵的龟船不负众望，突入港内一举击沉了对手大半的战舰。当然这种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武器，如果面对的是大明水师，可能还没靠近就被弗朗机炮打成了筛子。

泗川浦之战的胜利和龟船的实战表现，极大地增强了李舜臣的信心，何况此时全罗右道水军节度使李亿祺正率部赶来会师。兵强马壮的李舜臣决定以固城外海的蛇梁岛为基地对日军进行长期作战，农历六月初二，李舜臣率部进击固城唐浦，首次遭遇了日军主力战舰安宅船。而这艘战舰的主人正是颇受丰臣秀吉宠幸的龟井兹矩。由于长期为丰成氏经营银山，因此据说早年枪术过人的龟井兹矩在日本国内战功寥寥，可能是为了安慰其作为武士的面子，丰臣秀吉此时给他的官位有些吓人——琉球守、台州守（没错，就是中国浙江的台州）。可惜名号吓不死人，在朝鲜军的猛攻之下龟井兹矩所部兵败如山倒，他本人一把写着“龟井琉求守殿”的军配（扇子）也成为了李舜臣的战利品。于是逃回国内一直活到江户时代的龟井兹矩，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中朝两国眼中首个阵斩的日本大名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舜臣又连续于唐项浦和永登浦击败了赶来支援的日本海军。来岛通总的哥哥得居通幸便在此两役中座舰被击沉，无奈只好于附近陆地登陆后自尽。更为悲剧的是得居通幸死后，他的领地还被丰臣秀吉没收，转授给了他的弟弟来岛通总。而此时李亿祺的加入，令朝鲜水军三道联合军队已经拥有了近百艘战舰的实力。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兵力为后盾，李舜臣才敢与集结于巨济岛的日军主力正面决战。而颇具讽刺的是，此战日方虽然投入了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三大水军主力，但在战场之上却始终只有胁坂安治所部。这场被称为闲山岛海

战的大捷，宛如一支功效强劲的鸡血，令李舜臣发动了自己统率海军以来最大的冒险行动——突袭釜山。

公元1592年农历九月一日，李舜臣集结三道水师74艘板屋船辅以挟船92只。大举冲入釜山港。但此时釜山集结的日本水军的船舰已经超过四百只，且已做好防御的准备。 朝鲜水军奇袭失败遭遇日军的强大反击，朝鲜将领郑运被击杀，朝鲜水师损失惨重，甚至连李舜臣险些被俘虏。 此战之后，李舜臣不敢再轻言出击，而转为攻击没有战船防护的运输船团。当然这样的失败是不会出现在伟大光明的朝鲜史料之中的，于是釜山之战的经过被修正为“舜臣与元均悉舟师进攻、贼敛兵不战、登高放丸。水兵不能下陆、乃烧空船四百余艘而退”。而李舜臣反击釜山失败的同时，朝鲜王国也已经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境之中。

朝鲜君臣仓皇北撤时，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所率的日军，一路未遇激烈抵抗，分别于五月二日和三日进入京城。七日，第3军黑田长政军亦进入京城。从小西行长攻入釜山到京城陷落，为期不过20天，朝鲜大半河山即为日军占领。日军在朝鲜首都汉城，大肆劫掠：“焚宗庙宫厥、公私家舍，括索驽藏，日输其国。”

五月十六日，丰臣秀吉得到占领京城的捷报后，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的目的即将实现。为此，他踌躇满志地作了下述三件事：第一，厚赏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并指示速遣使劝诱朝鲜投降，以减少进攻大明时的阻力。第二，决意亲征。命令小西行长迅速探明通往明朝的道路、里程及详细地图。丰臣秀吉狂妄地认为，用兵20日已攻陷朝鲜京城，下一步攻入明国的日期不会太久。第三，制定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25条。试择引几条，以看其狂妄的野心：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关白之职授汝（指养子丰成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10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10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

这是丰臣秀吉于五月十八日给其养子丰臣秀次的备忘录。丰臣秀吉已经被占领朝鲜京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把朝鲜看作他治下的领地，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未进入的明朝，仿佛也在他的统治之下了。他忙不迭地在那里任命统治明朝的官吏，授给功臣封地并把日本天皇安置在明朝北京，而自己则坐镇宁波。可是没用多久，他就明白了其所谓的宏图大略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已。

第五章　辉煌与落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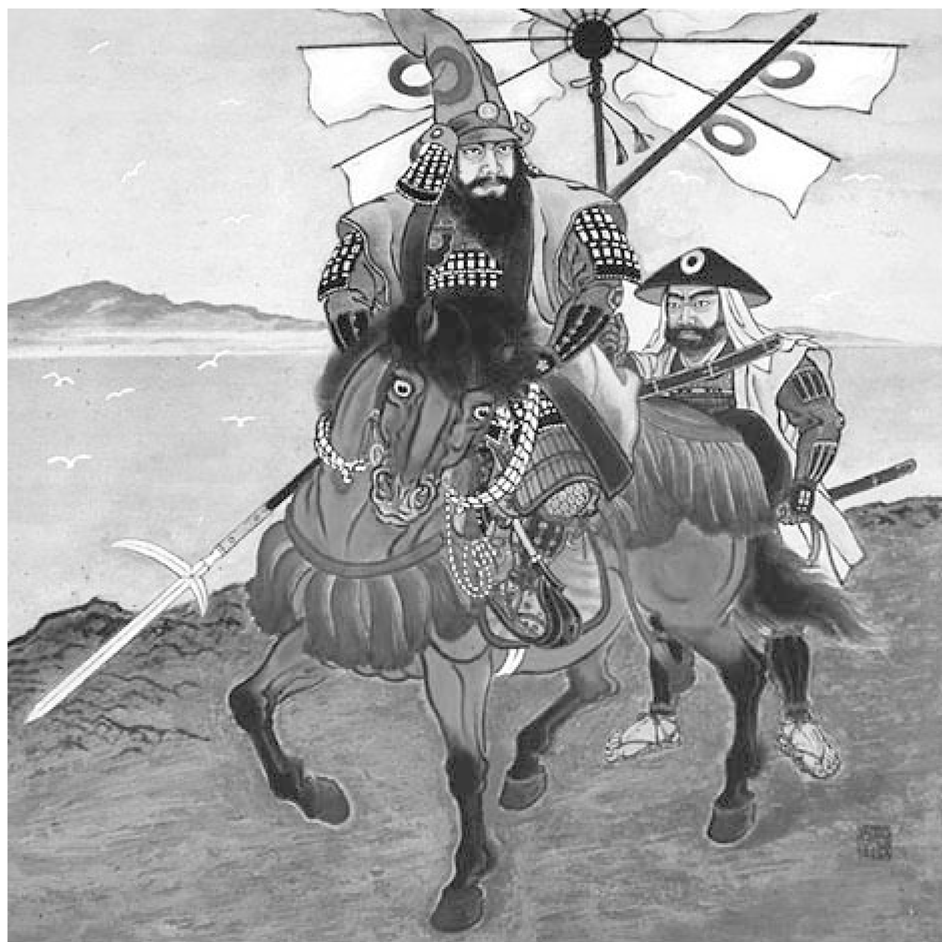
明军入朝
——大视野下的万历援朝战争（上）

丰臣秀吉的犒赏极大地鼓舞了前线的日军诸将，其中最为激进的莫过于与丰臣秀吉沾亲带故的加藤清正。加藤清正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父亲是当地锻冶屋老板加藤五郎助，母亲则是丰臣秀吉母亲的从姊妹。因此从血统上来说，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表弟。但由于加藤清正的父亲早亡，其很早便生活在丰臣秀吉的家中，因此又可以被视为养子。有了这样的双重关系。丰臣秀吉对加藤清正信赖有加，公元1585年，当丰臣秀吉就任关白一职的同时，加藤清正获封从五位下主计头一职。公元1586年，丰臣秀吉完成对九州的征伐后，于公元1587年以加藤清正取代施政失败的佐佐成政，从此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受封新领地，两人各分得半个肥后国。

虽然民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但比邻而居的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关系却并不融洽。加藤清正一向就瞧不起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而远征朝鲜以来，两人更在汉城为了战利品和战功发生过争吵，加藤清正还一刀劈碎了小西视若神明的天主圣像，两人大起争端。五月十五日加藤清正率先出兵抵达临津江，因北岸江防较严，加之水深江阔而舟船皆为朝鲜军所收藏起来，难以渡江，遂在南岸待命。而小西行长因执行丰臣秀吉的诱降命令，没有迅速北上，但三次派使均未到达朝鲜国王李昖处。

好不容易加藤清正击败渡江出击的朝鲜将领申吉所部，成功强渡临津江。不久小西行长亦率军渡江。五月二十七日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所部攻入开城。但此后便分道扬镳，小西行长军向平壤推进，加藤清正部向咸镜道进军，而紧随其后的黑田长政部则向黄海道开进。

丰臣秀吉在得到占领开城的捷报后，立即准备进入朝鲜。但在德川家康与前田利家的极力劝阻下，加之朝鲜方面又传来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海军击败了日本海军的消息，丰臣秀吉才停止出发。他对侵朝日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8位将领分领朝鲜八道，以便征收税赋补充军用。自此以后，朝鲜各道的中心城市，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加藤清正

小西行长进入平壤后，暂时没有继续向北推进。但日本开始在朝鲜八道的占领区以四公六民制向农民强行征收赋税和军粮，拟征数字达191.6188万石，这几乎等于朝鲜八道全年贡赋收入的综合。但如果考虑到日军所占领的地方不过是朝鲜的一些主要城市，尚有大片领土来不及占领，而四处出现的义兵也使他们难以派出征收官吏。不难想象，在这些地方征收这样数目的赋税，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军还在所占领的各地强制推行日语，培养走狗，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各路日军，在军事行动中，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焚烧村庄，镇压反抗者，甚至掘坟墓，剽府库，强征暴敛，不一而足，朝鲜人民恨之切齿。日本占领军的小股斥候、向导、零散兵卒，不断地失踪或被杀。



朝鲜抗倭民兵

但此时朝鲜全国八道仅剩平安道以北，以及靠近辽东半岛的义州一带尚未为日

军攻占，无论是以李昖为首的朝鲜政府还是活跃于各地的民间力量，都认为如果要收复国土，必须要仰赖明帝国的支援，因此便派了几批使者去向明朝求救。朝鲜使臣们除向万历皇帝递交正式国书外，又分别游说了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等，甚至表示愿内附，力图促使明帝国尽快出兵援朝。

由于朝鲜王国的崩溃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大明帝国起初对日本入侵一事诸多狐疑，甚至遣使询问说："贵国向为东国之强者，为什么突然失陷于倭贼？"倒是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颇为积极地向朝鲜王国表示愿意出兵助战。不过出于对努尔哈赤所谓"建州马军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这一夸张说法的怀疑，朝鲜王国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急公尽义"的酋长，继续耐心地向大明帝国求援。

明帝国方面之所以迟迟没有做出援助朝鲜的举措，除了外交上的狐疑之外，更多的是源于国内局势的无奈。此时"宁夏之乱"方兴未艾，辽东和北京一带明军主力被抽调往西北平叛，根本抽不出援朝兵力。明神宗朱翊钧对朝鲜方面的求援一直犹豫不决。而明廷的官吏也因之分为只加强辽东防务的"主守派"和主张立即出兵的"主战派"。对此主战派的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上疏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

明神宗朱翊钧和兵部尚书石星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决定援朝以巩固辽东和京师。庭议决策后，立即拨银二万两犒赏朝鲜将士，以鼓舞士气，并允许朝鲜国王李昖在危险时可以渡鸭绿江居于宽甸堡。六月下旬，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五千明军开赴朝鲜。七月至义州时，祖承训接到顺安郡郡守黄瑗的报告：平壤日军大部队调去京城，城中留守部队极少。祖承训对此情报未作认真调查，立即率军进逼平壤。祖承训素称辽东勇将，但对侵朝日军状况和武器特点不加以了解，也没有做任何研究，将倭寇的战斗力视作日军正规军的战斗力。轻举冒进乃兵家之所忌，这是祖承训与日军初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祖承训兵至嘉山时，问当地人：平壤日军尚在否？回答：尚在。祖承训举杯仰天祝之曰：贼尤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七月十五日，祖承训从安顺连夜抵达平壤，十六日黎明，乘日军无备，从七星门突入，同日军展开巷战。明军清一色的为骑兵，巷战极为不利，日军依险放枪，明军死伤极重。除祖承训外，所带的几个游击、千总皆战死。明、日两军第一次交战，以祖承训的傲慢轻敌而招致惨败。



朝鲜士兵的远距离武器以弓箭为主

祖承训兵败之后，一日之内败退过大定江，朝鲜急派兵曹参知沈喜寿往九连城，希望杨绍勋总兵能命令祖承训暂时留守在朝鲜境内，但祖承训撤退过速，已经渡过鸭绿江。对于自己的失败祖承训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的报告里面，为自己找了以下几个理由：粮草不继，朝鲜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够军队食用。军情不实，朝鲜情报指出平壤只有1000多名日军，实际交战后估计日军有上万人。指挥权不专，朝鲜群臣一直希望明军能由朝鲜将领指挥，并且迫使明军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出兵。明军对朝鲜军缺乏信赖，祖承训副总兵指出同时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鲜军，结果临交战时，400名朝鲜军先溃逃，剩下的100名则是与对方有所交谈。同时，明军

多有遭弓箭射伤与射死，根据朝鲜的情报，日军只有铁炮与长枪，所以怀疑射箭的是朝鲜人。

祖承训的这番说辞可能有其客观依据。但却极大地挫伤了当时仍相对脆弱的中朝同盟关系。朝鲜使臣不得不反复申辩：军情是由朝鲜的节度使提供的，可能侦查有误，关于射箭一事可能是因为朝鲜兵器落入倭军手中，或者是因为有朝鲜人遭到俘虏，才受到倭军指使。但在明帝国的廷议中，议和派开始抬头，不领兵的兵部尚书石星转向议和派，并向明神宗朱翊钧推荐据称沈惟敬充当议和使。明神宗朱翊钧授沈惟敬以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令其赴朝鲜对日交涉。

关于来自嘉兴人沈惟敬的出身来历，中国史料上众说纷纭，但世人大多采信其“市中无赖”的说法。但通过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其奏折《请计处倭酋疏》，我们却似乎看到了沈惟敬可能存在的另一种身份。自隆庆年间重新放松海禁以来，明帝国与日本的民间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随着日本侵朝行动进入高峰，明帝国开始筹划向日本方面派遣间谍。而福建巡抚许孚远正是这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在向明神宗朱翊钧的汇报的奏折中，许孚远这样写道：“臣于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内钦奉简命巡抚福建地方。入境之初，据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先后见臣，俱称奉兵部石尚书密遣前往外国打探倭情。臣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随令还报石尚书。其史世用，貌颇魁梧，才亦倜傥，遂于二十一年四月内密行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船只，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日本萨摩州。”

显然许孚远所接待的沈秉懿、史世用两人均为兵部尚书石星所派遣而来的，其后史世用一行于该年七月四日驶入日本庄内国的内浦港。此后，他潜入名护屋城，搜寻万历十九年将日本情报书送呈明朝的在日明人许仪后的行踪。八月二十七日，史世用和许仪后一道回到内浦港。九月三日，史世用与许豫通过许仪后的引进，面见了萨摩藩岛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栋（幸侃）。十月，史世用扬帆归国，不幸在海上遭遇暴风，延误了归期。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往赴日本萨摩的琉球使者一行与两名遭遇海难的明朝间谍邂逅。关于当时的情形，琉球方面的报告书中如是描写：“有中国二人，身服敝衣，蓬头跣足”，称该使臣指挥史世用、承差郑士元，奉差日本侦探，遇汛，船幸免死，脱至琉球。这两名间谍系明朝派往日本搜集情报的“指挥史世用”和“承差郑士元”。“指挥史世用”即是《请计处倭酋疏》中所记录的“名色指挥史世用”，“承差郑士元”当系随行史世用的一名明朝间谍。从内浦出发回帆明朝的途中，史世用一行遭

遇暴风，船上的其他乘员似乎都已遇难，惟史世用和郑士元两人侥幸生还，在萨摩州过着“身服敝衣，蓬头跣足”的流浪生活。

为了帮助史世用如期回国汇报日本情报，明朝朝贡国琉球特意派遣使者，以朝贡船将史世用等人护送回国。但是，护送史世用回国的琉球使者一行在驶抵中国海岸时再次遭遇暴风，漂流到了福建泉州府的平湖山地区。史世用一行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自福建出航日本，次年一月完成在日本的侦察倭情任务，同月出帆归国，却不幸遭遇海难，在日本的萨摩州流浪长达7个月之久。他们最终在琉球的帮助之下，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驶抵明朝。史世用潜入日本的间谍活动，费时一年半之久，总算大功告成。

史世用所带回的日本情报。虽然在明朝史籍中概无所见，但是在琉球和朝鲜的史料中都留下了部分记录。琉球史料《历代宝案》记录了史世用回国后所汇报的部分情报内容：又据兵部原差指挥史世用呈称，琉球壹国，劫顺贰百余载，朝贡不绝，必倚册封，方敢称王，屡岁为关白扰害，因地势联属，倚山而行，风顺开洋逆收山，无波涛之险。由萨摩发船，四日可到。琉球北山，其山延寰300余里，为日本琉球之界，三日可到琉球国，随路有山，早行夜宿，关白见其路顺，欺其国弱，所以声言发船来伐，要在北山屯兵，若果据北山，则琉球必为所得，而闽广为其出没之地，盘据骚扰，将无宁岁。今中山王世子尚宁，年参拾岁，容貌英伟，颇有力量，不肯臣事关白，一意向化天朝，其年大为世子不敢请封者，因旧时封王官贰员随从五百余人，在彼半年，食费供给，最是浩繁，又连年为关白所扰，国贫民困，故力不能请，恳乞酌处奏请敕谕加封国王。

据上可知，史世用在其汇报中，极力强调邻接日本琉球北山地方地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倘琉球的北山地方被日本所据，其国土势必为日本所吞，如日本以琉球为据点，则其将会频繁侵犯明朝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史世用强烈建议明朝拉拢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宁，迅速派遣使者册封其为国王，以确保琉球坚决倒向明朝，保证其东南翼的安全。关于琉球北山地区的相关内容，可以说是史世用取道琉球回国时所获取的一份额外情报。他在逗留日本一年多时间内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成果，在明朝和琉球史籍中皆未得以记载。所幸的是，史世用后来赴朝鲜参战，将其所掌握的日本情报带入了朝鲜。

在明日两国于朝鲜半岛交锋之际，像史世用这样的间谍并非个案。参加明朝间谍活动的福建海商许豫、张一学等人便潜入丰臣秀吉所住城郭，调查当地的地理情

况以及丰臣秀吉的相关情报，还以商人的身份与以幸侃（伊集院忠栋）为首的萨摩州高层进行了交涉。那么同样曾以商贾身份前往过日本的沈惟敬，似乎也并非无赖那么简单。

沈惟敬于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初一抵平壤城外，在城北10里外的乾福山下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此时的战场态势是小西行长虽依旧驻军平壤，但加藤清正却率锅岛直茂、相良赖房在海汀仓打败朝鲜将领韩克诚所部，俘虏了朝鲜王子临海君与顺和君。七月二十七日越过豆满江（中国称图们江），侵攻臣属于明朝的兀良哈建州女真的扈伦四部及海西女真各部落，加藤清正攻拔女真五营，女真余营皆遁去。八月，加藤清正再大破女真酋长卜占台，斩敌900人，攻破其部。丰臣秀吉得知加藤清正战果后，写书状给加藤清正指示“今略明地”。如果此时小西行长所部同时于平壤一线发难，那么朝鲜流亡政府的处境自然将更为危急。

而恰在此时沈惟敬抵达前线，以商人谈交易的方式与小西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无独有偶，出身于界町商人家庭的小西行长，也同样擅长商业诈术，当时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综合沈惟敬回北京的汇报和小西行长对丰臣秀吉的汇报，其主要内容如下：1．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属朝鲜，以东归日本。2．明朝准许日本封贡。　3．要求与日本和亲。　4．暂时双方于平壤城北十里处，立一界标，日本军、朝鲜军均不得越过此线。 5．回国汇报以50日为期。

单纯从这些条款来看，沈惟敬并未过多地出让明帝国主权，而小西行长也受制于后方补给不畅的压力，愿意接受以目前的战场态势为日朝边境的方案。而正是由于小西行长的按兵不动，加藤清正放弃丰臣秀吉假道建州入侵中国之战略，令锅岛直茂前往支援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自己率远征军返回朝鲜咸镜道。



西方画家笔下在朝鲜冬季作战的日军将领

沈惟敬回北京后未敢如实汇报，只将日本侵朝意在封贡的情节告示了石星。但是，在这时，明政府中主战派又占有了优势，八月十九日，明神宗朱翊钧任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使，经略蓟、辽、山东、保定各处海防备倭军务。宋应昌于九月离京，一路调兵遣将，巩固沿途防务。十月李如松自西北回师，明神宗朱翊钧任命他为提督蓟、辽、山东、保定军务总兵官，与宋应昌共同指挥赴朝大军。宋、李大军至辽阳时，沈惟敬从石星处回到朝鲜亦至辽阳。宋应昌命令他告诉小西行长：如要封贡，必须先行退兵。

另一方面，小西行长也将会谈内容向同僚宇喜多秀家和丰臣秀吉作了汇报，因原定不再向北推进，故会谈内容与日军行动无抵触。但是，由于朝鲜义兵的活跃以及天气逐渐转冷，国内运输困难，供应紧张，严重影响了日军的士气。高级将领毛利辉元生病回国，士卒病、死和开小差者不断出现，军马也多有饿死。平壤日军几乎人人盼望沈惟敬早日回到平壤实现和平，以便早点回家。有的日军士卒甚至登上平壤城头北望，希望能早些发现沈惟敬。

十一月下旬，沈惟敬来到平壤，与小西行长举行第二次会谈。沈惟敬向小西提出宋应昌的三项议和条件是：1．日军撤退至釜山；2．丰臣秀吉递降表称臣；3．返还占领的土地、城池以及被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履行了以上条款后，方才准许封贡。而小西提出的修正案是：二王子在咸镜道加藤清正部日军手中，交回肯定有困难；平壤可以交回明国，但大同江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京畿四道，暂时由日本辖属；封贡后从日商船到达浙江之日起，日本开始总撤军。沈惟敬便带着小西行长的修正案回辽东，向宋应昌作汇报。李如松对沈惟敬带回这样一个丧失原则的条约极度不满，欲斩之。被随军参谋李应试劝阻，并说利用日军奢望和谈之际，予以偷袭，是一奇计。李如松方才留沈惟敬于军中，并开始调度各路大军，准备进击日军。

李如松率领明军左、中、右三协共4.3万余人的大军，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二日抵达安州。这时朝鲜大臣柳成龙来迎，李如松就柳成龙所进献的平壤地图，详细地了解了敌我两军的形势。为了说明平壤和碧蹄馆战争的胜负原因，这里将明日两军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略作一下说明。

明军的军制为募兵制，军队分步、骑两个兵种。步兵多为南方人，按戚继光所创兵制，步兵一营二千余人，其中铳手占半数。骑兵多为北方人，其中快炮手和铳手占百分之四十。明军的铳和快炮的射程和威力远不如日军的鸟枪，尽管铳类所占的比例大于日军，但威力略逊于日军。但明军所使用攻城及野战大炮，远较日军为多而且杀伤力大，对日军颇有威慑力。

李如松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对柳成龙说：日军倚仗鸟枪，我用大炮，当可战胜日军。正月初四日，李如松大军至肃州，令参将李宁至顺安，告知小西行长：沈惟敬来，宜迎接。小西行长信以为真，派20人至顺安，李宁设伏捉获3人，其余逃回。小西方才知道明朝大军已至，但犹未作战斗准备。六日，小西于平壤风月楼率众着花衣迎接明使，但来者却是李如松的大军。

七日天明时分，李如松亲率大军攻城，这是明日两军主力的第一次激烈战斗。平壤攻坚战，明军打得极其英勇顽强，李如松坐骑中弹死，换马再战，游击、参将等中弹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终于在气势上压倒了日军，战斗了整整一天，将日军压到了城内一角的几个土窖内。这一仗，阵斩1285级，生擒2名，夺马2985匹，救出被俘虏的朝鲜男女1225名。日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明军虽胜伤亡亦多，但士气高涨，志在夺取平壤全地。



西方画家笔下在朝鲜冬季作战的以虎蹲炮轰击平壤的明朝军队日军将领

八日夜，小西行长与日军诸将商议，军粮、兵营悉数被明军焚毁，外援又久候不至，无法固守，决心连夜撤回京城。小西撤退到凤山时，才知道负责增援的大友

义统居然在听见明军大炮声后，惊恐非常，先行逃回了京城。正月十二日，小西行长兵败平壤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宇喜多秀家急忙着令有关将领和三奉行开会商议对策。会议决定，日军全线撤退到京城，集中兵力以便与明军决战。十七日，小西败军退至京城，十八日开城日军撤回，至京城集结。这时，京城日军的数量超过了5万人。

李如松九日收复平壤，十九日先遣部队进至开城，二十四日李如松率大军进至开城。在开城，李如松召集了各路将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各路将领意见不统一，作战计划暂未确定。李如松派副总兵查大受等率三千明军向京城方向前进，搜索敌情，探勘沿途地形，以便于制订进攻京城的军事计划。查大受军队在二十七日于高阳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相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明军斩首600余级，日军败退。

自平壤胜利后，明军已开始滋生轻视日军之意，迎曙驿的轻取日军，更助长了查大受的轻敌之心。因此，他既未认真搜索敌情，又未探察日军败退的方向，是否还有后续部队等，依然盲目前进。其实，加藤光泰败退后，立刻报告了主力部队将领小早川隆景。小早川率领二万日军赶来进行会战，当查大受发现时，想摆脱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退守碧蹄馆（距离京城50华里），被日军包围。

李如松得知先锋已经交战，迅速转为鹤翼之阵，在望客砚迎接查大受军队后于碧蹄馆重整军阵。此时已近中午时分，由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等率领的2万名日军先锋突然出现，并占领望客砚，后面还有由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率领的日军本队2万人正在进军。



朝鲜人眼中的李如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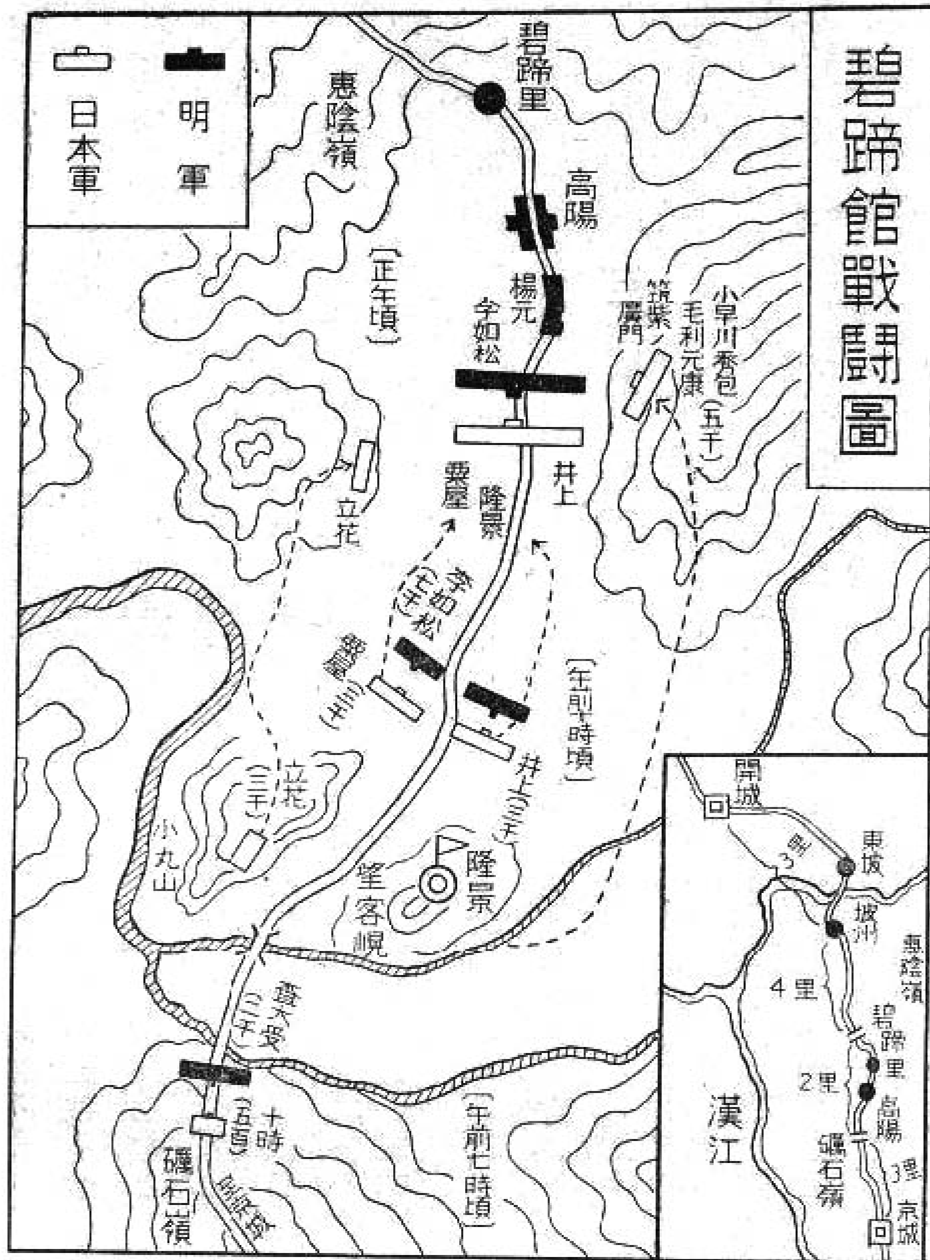
由于碧蹄馆地形狭隘，又多泥泞水田，不利骑兵行动。于是李如松且战且退，退往北方高阳市的出口惠阴岭，并急忙传令中军主力急速进兵。虽然明军先锋在开战初期成功击退了小早川隆景的左翼粟屋景雄所率3000人，但小早川隆景右翼先锋井上景贞3000兵却反包夹了明军先锋。不过总体战况仍是明军占优。

于此同时，立花宗茂领3000兵从日军左翼，移动至明军右侧山上隐兵埋伏伺机出战，先命部将立花成家率铁炮队速射三回后，以“示强之计”突然立出多数军旗并击鸣战鼓，全军举起长枪拔刀反射日光令敌兵敝目，一举斩入突击进至明军本阵处，此时宗茂挥刀甚急连斩15人。立花军中其中一位金甲武将安东常久与李如松单挑时，被李如梅射杀，同时明军左翼也遭到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的突击，正面则被小早川隆景压制，明军顿时陷入了被围之势。

李如柏、李宁、查大受、张世爵、方时辉、王问等明将皆亲自提刀奋战。其

中，明将李有声为护卫落马的李如松而遭到隆景部将井上景贞击杀，如松的亲卫队也战死80余人。而立花军中也有小野久八郎、小串成重、小野成幸战死，小早川秀包麾下也有八名家臣先后身亡。不久小早川隆景派出吉川广家、宇喜多秀家（实则为其重臣户川达安所率）、黑田长政率部对明军进行包围。两军从午后开战已逾6个小时。至黄昏时分，明军终于等到左协大将副总兵杨元率援军到来。

杨元奋勇冲破日军包围，抢占李如松右方阵地，并和李宁的炮营共同发炮轰击日军，掩护明军撤退。立花宗茂、宇喜多秀家派出部队猛烈追击至惠阴岭，立花一族之户次镇林在追击时奋勇战死。而小早川隆景则担忧明军撤退会设伏，劝追击的日军开始退兵。李如松收拾残军回到了开城后，听风传加藤清正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便于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明军虽然有碧蹄馆之败，但入朝不到2个月，便收复平壤到开城失地五百余里，甲方四道22府县，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胜利。



碧蹄馆交战略图

对于碧蹄馆战役，中、日、朝三国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日本方面文献一再强调日军的胜利，并引用明人的记述为证。然而，明代记述此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而朝鲜方面的文献如《李朝宣祖实录》

以及柳成龙、伊根寿、李德馨等人的报告，大体上均是接近事实的。李如松在此战役中的失误，不在于碧蹄馆战斗的失败，而是在于失败之后，应该迅速整军再战，而不是匆忙撤回平壤。

由于明军平壤大捷和向京城进军等一系列动作，朝鲜南方各道的义兵与朝鲜政府军都积极响应，全力与日军作战。权栗率领的义兵曾一度战胜增田长政率领的日军并攻克幸州（距离京城不远），而李如松一退回平壤，失去了明军的保护，权栗也只好放弃了幸州。甚至当李如松得知幸州被攻克的消息后，亦后悔后撤太操之过急，忙又向开城派出军队。如果当时李如松继续坚持进攻京城，不仅会对义兵的战斗起到鼓舞作用，而且会进一步加深日军的困难，日军将更难守住京城。



日本方面对朝鲜半岛的八道分割计划

在同一时期，日军的困境更甚于明军。孤军深入的加藤清正部在明军攻克平壤的形势逼迫下，被迫于二月底撤退到京城驻防。由于天气逐渐转冷和义兵活动进一步活跃，日军运输困难一再加剧，士兵死、逃亡不断发生。日军将领伊达政宗在其给母亲的信中说：“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由于水土不服，死亡相继。”由此可知，日军的减员情况极大。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6万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京城时，只有不到5.3万人，减员4.3万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平壤战役后，小西行长减员1.13万余名，只余6600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部队的严重减员，日军将领和士兵都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甚至连极端主战派的加藤清正，在咸镜道时也接见了宋应昌派去要求释放朝鲜国二王子的使者，并约定回京城后再行接触。当集结于京城的日军将领向丰臣秀吉汇报了日军的困境后，丰臣秀吉被迫作出撤退，巩固沿海根据地，并自蔚山经东莱至巨济岛一线，修筑十八城堡以作久留之计。同时，准许其部下与明军进行议和交涉。

明军碧蹄馆的失利，挫伤了李如松的锐气，不思进攻也没有注意研究日军的困境，特别是根本不了解日军将要自京城撤退的情况，相反地，在宋应昌的影响下，开始倾向于议和。有利于议和的气氛，促使明政府中的“议和派”开始再次抬头，于是被李如松扣留的沈惟敬重新以代表身份赴京城，再次与日军进行交涉。

三月十五日，沈惟敬至京城，正在进行撤退准备的日军，高兴地利用了沈惟敬，以免在撤退时遭到明军的进攻。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约定了四点：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京都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这个约定对日本来说，等于是什么都没有放弃，因为日军正要从京城撤退，而对明朝来说，等于是放弃了援朝战争，把朝鲜拱手让与日本，沈惟敬带着这个以四月八日为期的约定，回到平壤向宋应昌和李如松作了汇报，而宋应昌却完全同意了这些条件。同时，宋应昌还以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伪称明政府使节带百余随从，同沈惟敬至京城，随日军南撤。这等于是给南撤日军做掩护，以免朝鲜军队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撤离京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京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六月中旬，按丰臣秀吉的命令，日军集中9万人的兵力围攻晋州。日本方面之

所以选择晋州下手，主要是缘于朝鲜军实力较弱且守备地点较为突出。从釜山到晋州一带地势相对平坦，容易进军。且晋州是进入全罗道的重要门户，战略意义明显。李如松派使者前去质问，指责其违反议和协定，日军根本不予以理会。晋州城内义兵及政府军约7千人，加上男女市民可守城者约6万余人，抗击9万日军攻城15日。各地前来支援的义兵受阻，难以靠近晋州，而明军刘挺等部队害怕日军进攻各自防地，坐视不救。六月二十就日城陷，守军将领金千镒以下全部战死，日军在晋州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包括义兵在内守城兵力为7千人，而日军割下请功首级达2万余颗，被屠杀的超过6万人。

在《日本战史·朝鲜战役》一书中，著者如是说："然而，这是鲜将自遭祸，累及城中士女。我军欲脱无辜生灵之惨祸，六月二十七日以宇喜多秀家的名义，切实劝告开城，可顽泯之鲜将不听，遂蒙玉石俱焚之灾害，日军一面在玩弄和谈手段欺骗明军，一面修筑城堡清楚占领区内的反抗据点，力图长期巩固沿海所占地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八日，在小西行长等的引导下，伪明使谢、徐和沈惟敬一行，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进行明日和谈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实际上，会议仍由小西行长和沈惟敬操纵。沈惟敬以"丰臣修机原称臣和退兵以及请求封贡的调子"告诉伪明使，而小西行长则以"明遣使谢罪求和的调子"向丰臣秀吉汇报。丰臣秀吉就在这样议和基调的基础上，达成"议和七条"交于燃放赴明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伪明使谢、徐一道去北京。这七条要点如下：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由于沈惟敬的捣鬼，宋应昌不知有七条议和要点，仍以丰臣秀吉"愿顺天朝"，日已退兵，只小西行长驻海岛西生浦，等待日使议和回音的调子上报明神宗朱翊钧，同时又将派伪明使至日，将日使小西如安已至京城的情报，告诉兵部尚书石星，求其周旋使议和成功。尽管明政府主战派力争封贡之不可和议和实为日本诱我撤军以利其再犯朝鲜的手段，但明神宗朱翊钧惑于石星等人的说辞，遂同意议和。

明政府既然同意议和，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目的已经实现，遂以"师久在外，势必难以长驻，宜留少部兵力驻朝，其余班师"的理由上报。神宗批准，七月底李如松即自朝回师，明、日第一阶段的战争暂时告结束。石星、沈惟敬等虽然以欺骗手段，取得神宗同意议和，但无丰臣秀吉的降表，日使小西如安难以进京，一直留在朝鲜

京城。石星知无降表难以实现议和，于九月命沈惟敬去日催要降表，十一月日本的小西行长也因为日使小西如安不能赴京，而至书质问沈惟敬。十二月沈惟敬至熊川，与小西行长密议一月之久，于万历二十三年（1594）正月下旬取得丰臣秀吉的“降表”回国。明政府对丰臣秀吉的降表毫不怀疑，但对封、贡二事却引起一场争论。最后决定，贡议暂停，先行册封。廷议既定，日使小西如安于十二月七日入京，石星礼待甚厚。

十二月十九日，石星与小西如安会谈。石星提出议和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3.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日使小西如安件件依从，这个态度连明神宗朱翊钧都怀疑不解，因此命人询问小西如安。石星邀大学士赵志皋等数人，于二十日在兵部衙门和小西如安面谈共问答16条。小西如安钻了明政府官员对日本毫无了解的空子，信口回答。石星将回答情况如实上报，明神宗朱翊钧看了颇为满意，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但是，与小西行长不睦的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等人，却被排除在册封名单之外。

在双方使节往来3年之后，丰臣秀吉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纸“日本国王”的册封。对于比肩足利义满的待遇，丰臣秀吉虽然当场发飙说：“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但第二天却“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显然对于丰臣秀吉而言，如果能依靠大明帝国的册封，将自己家族对日本列岛的统治权固化下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册封终究只是一个形式，在日本军队执意不肯从釜山撤退的情况之下，公元1597年，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事再度打响。而恰恰就在日本积极筹划再度进攻朝鲜的前夜，朝鲜国王李昖突然宣布将李舜臣下狱。事后，朝鲜官方的说法是中了小西行长的反间之计，元均等军中将领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朝鲜国王李昖激愤之下失去了理智，才会行此昏招。这个说法虽然流行，但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小西行长要散布李舜臣谋反的谣言不难，难的是这个谣言要有人肯相信才行。要知道当时的李舜臣已升任三道水军统治使之一，但比其位高权重的职权大有人在。其次就算李舜臣要谋反，以其手中那区区数千人的水军登陆之后也难成大事。显然事情的真相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要搞清楚李舜臣“冤狱”的真实原委，当然首先要回顾一下“壬辰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王国中枢的党争态势。虽然经过战前的巧妙布局，身为“南人党”领袖的柳成龙拥有着最为稳固的政治基本盘，但战争初期各条战线的节节败退还是令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双双引咎辞职。不过李山海外放之后仍然多次遭到南人党的弹劾，很快就丢失了所有的官职，变成了一介白丁。而柳成龙虽然被下放到外职，但以招募义军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兵权。同时在海、陆两军之中有李舜臣、权栗这样的潜力股。派往明廷求援的李德馨也是柳成龙的亲信，果然大明帝国援军一到，主将李如松便点名要柳成龙前来助阵。

一时间“南人党”声势大振，俨然成为了朝堂的主宰。但“月盈则亏”的道理，自古便是官场颠扑不破的铁律。就在朝鲜宫廷重回汉城，柳成龙官复原职的同时，“南人党”也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为了能把南人党打倒，北人党试图抓住南人党的根基予以沉重打击。在明军主力撤出朝鲜后，支撑南人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屡立战功的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了。因此，在“北人党”看来要除掉柳成龙，首先就要先把李舜臣给除掉。

而所谓的“小西行长反间计”也并非是说李舜臣谋反。当时小西行长有一个名为“要时罗”的部下早年便诈降卧底于朝鲜军中。小西行长通过其传递假情报给朝鲜军方说“日军主力某天将会通过海路抵达朝鲜”。朝鲜政府随即要求李舜臣出兵截杀。而李舜臣不知道是看破了这一诡计还是老成持重，总之未按令出兵。“北人党”趁势攻击李舜臣公然违抗军令导致丧失破敌良机。柳成龙考虑到大局初定，不想与“北人党”产生大规模冲突，因此弃车保帅，没有积极阻止北人党弹劾李舜臣。

公元1597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被革职治罪押送到了义禁府。朝鲜国王李昖下令“国罪不容恕”要求“鞫问至自白为止”。因此李舜臣多次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好在“南人党”在朝堂之上仍占据主要席位，朝鲜水军诸将如李亿祺、忠清道水军节度崔湖等人也为其鸣不平。最终朝鲜官方也觉得对李舜臣通敌、谋反的指控有些站不住脚。于是免其死罪，再度让他白衣从军。而柳成龙在关键时刻没有保护自己心腹的行为也令“南人党”上下寒心，为其最终失势埋下了隐患。



朝鲜发行的鸣梁海战邮票

李舜臣下狱的这段时间，正值明日和平交涉正式决裂，丰臣秀吉随即向部下再度发出了出阵朝鲜的动员令，而此次的计划不再是好高骛远的一举征服朝鲜甚至要将战火烧过鸭绿江。丰臣秀吉认为“全罗道是否压制事关全局成败，此后再行攻略忠清道及其他地区”。因而日军首要目标便是扫荡朝鲜水军。而此时朝鲜水军前线最高

指挥官已经由元均担任。元均和李舜臣私交甚恶，李舜臣甚至在自己的《乱中日记》中写道：“在天地之间，像元均这样凶恶的人实在是非常少有的。”但常年与日军周旋的经验还是令其认识到朝鲜水军的长处在于机动游击，正面与日军交锋并非取胜之道。但是在上峰的严令之下，元均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军出击。

公元1597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朝鲜水军与进攻安骨浦和加德岛的日军船队首次遭遇。多年的养精蓄锐和不断加封早已令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成为领有10万石的大名。面对兵强马壮的对手，朝鲜水军很快便败下阵来。半个月之后元均裹伤再战，将朝军水军分为两队再度出击，但仍以失败而告终。为此，元均被已经升任朝军最高指挥官——都元帅权栗的严厉斥责并遭到了杖刑。无奈之下元均再次从闲山岛的本营出击，农历七月十五日夜晚，朝鲜水军主力停留在巨济岛跟漆川岛之间的漆川梁。得到消息的日本水军决定主动出击，藤堂高虎率领水军从海上包围朝鲜水师，而岛津义弘率陆军狙击逃亡的朝鲜士兵。海战一爆发朝鲜水师便溃不成军，上千人被斩首数千人跳船逃亡，朝鲜水师的船舰约160只被日本俘虏，元均、李亿祺、崔湖皆战死，除了庆尚右水使裴楔所部的12艘板屋船外，朝鲜水军几乎全军覆没。

随着日军全罗道平定的顺利推进，到农历九月中旬，全罗道残存的朝军控制地区仅剩全罗道南部一隅。朝军在漆川梁海战大败后，其水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度启用李舜臣为三道水军统制使也无法挽回战力上明显的差距。为此，日军陆军继续向全罗道南部进军，水军则沿海一路西进，从水陆两路迫近鸣梁海峡一带。

发生于1597 年10 月26 日的“鸣梁海战”，由于参战双方事后各执一辞的说法和对战局后续影响的不同看法，早已演化成了一出“罗生门”。朝鲜王国方面宣称，此役击沉日军战舰31 艘，重创92 艘，给对方造成了超过8000 人的伤亡；而己方无战舰损失，付出的兵员代价更微弱到几乎不值一提，因此鸣梁之战堪称旷世大捷。但对于这个说法，日本方面则认为此战不过是一场根本不需要记入战史的小规模遭遇战而已，己方舰队的确吃了点亏，但不过损失了几十人而已；何况战后日军还成功地控制了战场，攻占了李舜臣的水师基地。俨然一副“对我不利的事物都不存在，我才是胜利者”的模样。

综合各方史料来看，朝鲜王国的捷报固然注水不少，毕竟日方投入扫荡全罗南道的水军总计不过7000　之众。但日本方面也无法解释仅仅损失几十人的战斗为什么会出现前锋来岛通总战死，后援毛利高政落水，主将藤堂高虎负伤的情况。因此要揭开“鸣梁海战”的真相仍需要一番抽丝剥茧的梳理。结合鸣梁之战前的战局态势

来看，整体形势无疑是有利于日本方面的。自明日谈判正式破裂，日军主力重返朝鲜战场以来，日军不仅在漆川梁重创朝鲜水师主力，在地面战方面也是一路凯歌。

8 月15 日，丰臣秀吉的义子宇喜多秀家率军攻破地处小白山脉要冲的南原城，直趋全罗南道首府全州。在攻占全州之后，日军征朝诸将定议三路分兵：北上汉阳、东攻庆尚、扫荡沿海。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以上三个战略目标，日军的兵力配属是倒置的。北上汉阳的任务由黑田长政、毛利秀元两人担当，此二人虽然都与丰臣秀吉沾亲带故（一个是秀吉的养女婿，一个是秀吉的侄女婿），但此时却都已经淡出了丰臣系核心。以石高计算，两人合计32 万石，所部兵力不超过3万。此次北上与其说是准备再度攻占汉城，不如说是攻敌所必救，牵制中朝联军主力。

而负责向东攻略庆尚道的小早川秀秋、加藤清正等人，由于深得丰臣秀吉的宠信而兵强马壮。其中加藤清正由于长期独占九州对外贸易的肥水，据说隐藏石高达75 万石。而日军真正的战略重点仍在巩固对全罗南道沿海的控制上，并为此集中了一半以上的陆军（7.87万人）和水军7000 人主力。而其中李舜臣位于全罗南道海南郡的海军基地自然是首选目标。

1597 年10 月17 日，黑田长政、毛利秀元于朝鲜天安郡稷山，莫名其妙与明帝国援朝军队发生接触。面对明帝国大炮轰击、骑兵冲击的东亚大陆正统战法，在日本内战中自诩兵法出众的黑田长政显得很不适应。甚至有参战的日军写家书说“明军铁骑其势如长筱武田大军，望之极恐”，但其实对面所部明军一共才500 骑兵。明军痛击日军后，因为兵力单薄而后撤了。而凭借兵力优势控制了战场的日军，因为伤亡惨重已无力继续北进。因此“稷山之战”事实上已经缓解了汉阳方面的危机。

朝鲜国运转危为安的同时，李舜臣本人却不得不面对一场生死考验。外线日军的步步紧逼和内部的军心涣散，特别是朝鲜水师，此时剩余的18艘船舰均为庆尚右水使裴楔所率。对于裴楔这个元均旧部，李舜臣自然有些指挥不动。而根据李舜臣本人《乱中日记》的记载，裴楔是在“鸣梁战役”前半个月为了治疗疾病，在得到自己的准许后离开军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两年之后裴楔还是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在自己的故乡被问斩。他的离去究竟是个人的胆怯还是“被病假”，或许永远没有了答案。

请走了裴楔之后，李舜臣基本接管了其舰队。但下一步何去何从却并不那么容易决定。放弃军港远走固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战而退不仅有损士气，更可能会在撤退时遭到日军追击。因此在水文条件复杂且不利于大舰队展开的鸣梁海峡与

日军一战，这不仅不是李舜臣一时激昂的奋袂而起，反而是当时战场条件下唯一的合理选择。

关于具体战斗的经过，朝鲜方面的记述是：10 月26 日的清晨，李舜臣派出一艘军舰引诱敌军进入事先设好的圈套。在日本军舰驶入鸣梁海峡时，隐蔽于海峡内岛屿附近的朝鲜水师发起猛烈的炮轰。日军舰船在湍急的海流中摇晃不定，而李舜臣海军使用的是平底船，船身平稳因此炮火命中率高。入侵的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前锋来岛通总被击毙。而随着鸣梁海峡的海流开始逆转，日方的战舰开始相互磕磕碰碰，陷入混乱。李舜臣趁乱率领海军对日军展开猛烈攻势。大量的日舰挤在狭窄的鸣梁海峡内，成了极其被动的目标。李舜臣虽然只有12 艘军舰，但凭借着天时地利击沉了日军31 艘军舰，另有大约92 艘被损毁到丧失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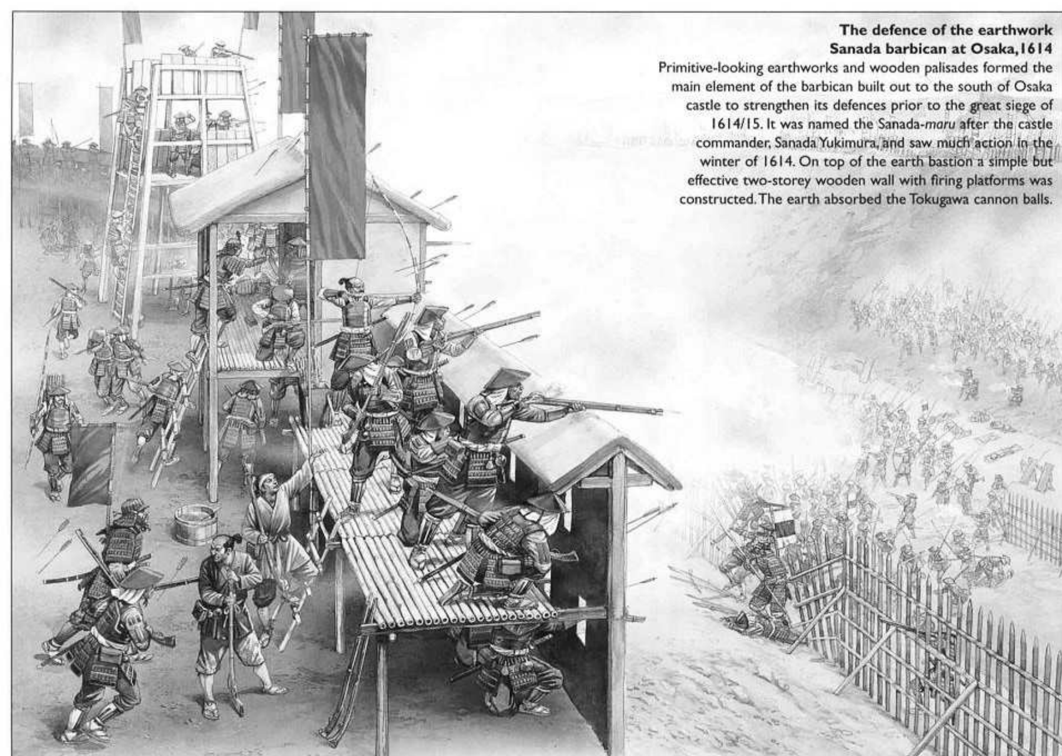
日本方面对此战的记述是：当时水陆两军已形成对李舜臣海军基地的合围。日军前锋抵达兰浦达洋面，遭遇李舜臣所部，朝鲜水师不战而逃，藤堂高虎随即带领数十艘关船甩开大部队开始追击，被对手引诱到鸣梁海域，遭到朝鲜方面12 艘板屋船及数百艘民船的围攻。此时海水退潮，日军战舰为对手埋在浅海底的铁索和木桩所制，无法后撤。激战中前锋来岛通总力战而死，主帅藤堂高虎轻伤不下火线，副将毛利高政英勇反击敌舰不慎坠入海中。随后藤堂水军大举来援击退对手，但由于不熟路况，藤堂高虎下令暂不追击。次日藤堂高虎和胁坂安治所部会合，再次抵达鸣梁海峡，但朝鲜水军早已不知所踪。日军随即攻克朝鲜水师根据地右水营，扫荡全罗道朝鲜水师的任务基本宣告完成。

至此结合双方所述，不难拼凑出此战的真相。10 月26 日清晨，担任警戒任务的朝鲜战舰发现日军主力来袭的消息，李舜臣所部整个舰队随即进入战备状态。考虑到鸣梁海峡的宽度及认定朝鲜水师残余兵力不堪一击，担任日方水军前锋的来岛通总草率地突入敌阵，藤堂高虎、毛利高政率几十艘关船紧随其后。但在鸣梁海峡复杂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下，来岛水军显得很不适应，加上两军战法的差异，日军前锋接战不利，在藤堂高虎、毛利高政救援不及的情况下，来岛通总与侄子得居通年战死。

对来岛水军的一击得手之后，李舜臣一边继续围攻前出的藤堂高虎、毛利高政所部关船，一边掩护自己基地内的后勤及家眷乘小船突围。这一幕被日方记述为数百民船加入围攻，傍晚时分，在日军后援抵达战场和疏散工作大体完成的情况下，李舜臣主动撤出了战场。一路北行，躲避日军的兵锋。而藤堂高虎等人则忙着捣毁

敌方基地也无暇继续追击。“鸣梁海战”至此宣告结束。

综合全局来看，李舜臣水师无疑取得了“鸣梁之役”战术上的胜利：不仅成功地突破了对手海陆并进的围剿之局，还取下了来岛通总的首级以鼓舞士气并作吹谈之资。而站在丰臣秀吉的角度来看，以一个海贼大名的性命把李舜臣赶到远离名护屋——对马——釜山运输线的朝鲜西海岸也并非不能接受。毕竟在发动第二次侵朝之役时，丰臣秀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大明帝国的阴影之下，日本鲸吞朝鲜半岛已成黄粱一梦，日本唯一取胜的机会便是在明帝国主力重新大举来援之前，扩大朝鲜半岛南部的占领区并将其要塞化，以期望国力远胜于己的大明帝国能够投鼠忌器，承认其实际控制区域为法定领土。



战国时代的锤炼令日本军队在据点防御中颇有心得

数以万计的日本士兵和朝鲜劳工在在泗川、固城、蔚山等地修筑倭城要塞的景象，与“二战”中后期日本不惜国力在太平洋诸岛修筑永备工事可谓别无二致。可惜

的是历代日本统治者永远无法理解超级大国的思维模式：那些为了将对手赶出自己势力范围所付出的代价，永远谈不上高昂。

当明军看到日军无力前进，企图巩固沿海一带阵地的意图后，便制订了一个断其一臂的“蔚山战役”计划。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一月，明军以三协：左协杨镐、李如梅率明军1.2万，朝鲜军四千；右协麻贵、李芳春率明军1.1万，朝鲜军三千；中协高策率明军1.1万，朝鲜军五千，分三路向南推进。左、右协奔庆州进攻加藤清正，中协驻宣宁阻止小西行长的支援，并抽出部分军队向全州、南原推进，以牵制小西行长。不难看出，这是个颇为周密的进攻计划，而且是自碧蹄馆之败以来，明军首次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的军事行动。它预示出战争的结局，即使丰臣秀吉不死，日本也不会是战胜的一方，只不过战争时间将会延长一点而已。

由于明军截断了蔚山的水粮供给，城内日军每天都有大批军兵因为饥渴倒毙。城中干涸的蓄水池里堆满了尸体，原本不食畜肉的日军官兵也因饥饿难忍，将城中为数不多的牛马全部吃光。但就是在这样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加藤清正还是支撑到了援军的抵达，不过他的这份执著更可以理解为恐惧。因为在朝鲜半岛，加藤清正杀人如麻，一旦落入中朝军民的手中，等待他的自然将是死无全尸。这时，毛利辉元率5万日军来援，杨镐惊惧首先逃跑，明军不战而溃。神宗大怒，革杨镐职以万世德代之。日军虽然解蔚山之围，但却也无力向外扩张，而且出现了“撤退派”。撤退派主张自蔚山等突出阵地撤退，集中兵力重点放手。丰臣秀吉不准，命令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坚守，其余将领回国过冬，等明年春暖花开再返回朝鲜指挥作战。



蔚山之战还原图

日本庆长三年（1598）三月，丰臣秀吉感到他的身体开始逐渐衰弱，这时他最关心的不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而是他的幼子能否牢固地继承他的事业。他心里最明白，幼子丰臣秀赖的最大政敌，就是德川家康。六月，他决定在五奉行之外，另立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总揽国政，发号施令。以五奉行成为政务的执行者。在二者之间，又设立了三中老，起调解作用。丰臣秀吉企图以这些互相掣肘的职位，使幼子秀赖得以安然地继承他的事业。



在明帝国军的强攻之下，只有少数日军堡垒可以长期抵抗

七月十五日，他召集重要大名至他病榻前宣誓，像忠于他那样忠于秀赖。八月五日，他感到这样也不保险，又召集五大老和五奉行交换誓言书，发誓忠于秀赖。最后，又决定让秀赖娶德川家康子秀忠的女儿，要求家康善视孙婿。同时，又私下对前田利家说："秀赖就拜托你了。"八月十六日，丰臣秀吉自知不起，召集各大老

托孤。十八日，63岁的丰臣秀吉死去了。

丰臣秀吉一死，在伏见的四大老（上杉景胜回自领不在）立即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并命令毛利秀元等三人赴博多掌握撤军事宜。九月五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这个指示一到朝鲜，原来就相当厌战的日军，不愿再为体面的议和付出任何代价了，纷纷准备撤退。

在丰臣秀吉为其子秀赖安排继承统治日本宝座的时期，明军又计划了一次新的战役。这次战役，一直准备到八月，方才就绪。麻贵鉴于“蔚山战役”过于集中一地，使日军可以抽出兵力支援，这次兵分三路，同时进攻，使日军无力分兵支援，加上海军从海上配合策应，以期必胜。三路进攻目标为，东路：蔚山；中路：泗川；西路：顺天。麻贵率明军2.4万，朝鲜军五千进攻蔚山；董一元率明军1.3万，朝鲜军2千进攻泗川；刘挺率领明军1.3万，朝鲜军1万进攻顺天；明海军将领陈磷率军1.3万，李舜臣率朝鲜海军7千。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向各自的目标挺进。



明军围困下的釜山

九月二十日，麻贵至蔚山，加藤清正坚守不出，双方无大战争。九月下旬，董一元进攻泗川，二十七日攻克旧城，日军逃入新筑的日式堡垒内坚守。董一元率军以炮火攻城，正在城墙已有数次坍塌，城陷在即。突然明军阵内大炮爆炸，引起火药爆发，出现大量伤亡，明军进攻将士不明所以，遂停止攻城。日军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开城出击，明军由胜利转为溃败。九月，中路军抵达顺天，小西行长亦坚守不出，刘挺虽遣使联系，并无结果。十月，闻泗川失利，东、西两路军皆退兵。问题在于，此时，朝鲜当局已得到丰臣秀吉病死的消息，虽然尚未证实，但明军却丝毫无加以利用之心。而且在董一元失利，日军亦无力反击的情况下，三路明军全部撤退，准备近一年的攻势，以一无战果而告终。

明军停止攻势后，西路军刘挺部队与小西行长的接触，未曾间断过。中路军的董一元亦与泗川日军发生联系，明显地感到日军愿意结束战争的意向。这时，日军已确定于十一月十五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全线撤军。而明军却毫无察觉，甚至刘挺部队还同小西部日军达成协议：（一）日军拆除工事；（二）明军送人质于日军，日军撤退。就这样，援朝明军与侵略日军进行的长达7年的战争，竟然在一个方面军的前沿阵地上，达成了和平协议，同意撤军。

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是不会轻易放走屠杀朝鲜人民近7个年头的日本侵略军的。自九月起，李舜臣和明朝海军将领陈磷，率领海军在海上堵截日军舰队，焚烧日军粮草，使日军遭受巨大损失。十一月十五日的撤退日期已至，但小西行长被李舜臣海军截住，难以回国。十一月十八日，岛津义弘率数百艘船只乘夜来接小西行长及日军，李舜臣得知，立刻与陈磷海军合围击溃日海军舰队，但在明军海军指挥陈磷所乘战舰被日海军包围时，李舜臣指挥朝鲜海军前去解救，不幸在解围战斗激烈进行时，李舜臣左腋中流弹，伤势甚重。李舜臣惟恐影响正在进行的战斗，告诉其部下："战方急，勿言我死。"说完之后，就死去了。部下遵其言，秘不宣布，奋击日军，终于救出了陈磷，焚毁日舰200余只，岛津义弘只率50余只逃走。战争结束后，明海军指挥陈磷方才知道李舜臣战死。而小西行长则乘李舜臣战死之机，偷渡回国。



李舜臣之死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军自朝鲜全部撤出。日本侵朝和明军援朝战争，一共进行了7年。其间，损失最大的是朝鲜。明军扶弱伐强支援朝鲜，取得道义上的胜利。但是由于明政府政治腐败，明军将领无能，战争7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朝鲜一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实际的损失是难以估算的。日本方面的损失也不下于明朝，各大名造船糜饷，人力、物力的耗损同样是难以估计的。丰臣秀吉一手创造的一统局面，在其死后不久即被德川家康所取代，与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极有相关的。

远征朝鲜与其说是丰臣秀吉自我膨胀的必然产物，不如说是在日本根基不稳的丰臣家族的一次豪赌，而伴随着这场赌博的终结，日本列岛再度出现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德川家康虽然接受丰臣秀吉的托孤，但是内心深处却无日不想取而代之。在石田三成与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反目的情况，德川家康动员日本列岛的各派势力，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的名义起兵。石田三成嗅到对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危险，于是迅速联合了与上杉氏同为丰臣秀吉托孤重臣的毛利氏、宇喜多氏，一起向关东进军。在美浓群山环抱的关原盆地，一场决定日本列岛命运的恶战悄然揭开了序幕。

公元1885年，为了与“国际接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聘请了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德国陆军现役军官前来执教。对于日本方面多次热情的邀请，德国政府却是敷衍了事，最终挑选了仅擅长战史研究、却缺乏实战经验的少校——克莱门·梅克尔。而梅克尔少校本人也对位于远东的这个无名小国兴趣索然，甚至一度表示自己只打算在日本待一年。

梅克尔少校抵达日本之后的执教生涯也谈不上愉快，他刚一出现在日本陆军大学，其秃顶长须的造型就招来了“涩柿大叔”的外号。面对学员的嘲弄，梅克尔少校也随即反唇相讥，公然在课堂上表示：“（自己）只需一个德国步兵军的兵力，便可以轻松击溃日本全国陆军。”如此气焰嚣张的言论，随即引来了学生们的反弹。尽管最终这场“纠纷”，以学生“刺头”根津被勒令退学而化解，但是恶劣的“师生关系”却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最终产生了著名的笑话——“西军必胜”。



关原合战布阵图

据说有一次在为学员讲课的过程中，梅克尔少校被临时要求讲解一次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会战。梅克尔少校虽然以战史见长，但显然对日本的历史缺乏研究。他大略地看了一下沙盘上两军的布阵和兵力对比，便凭着多年的经验，草率地发表了占据战场西侧笹尾山、松尾山，呈“鹤翼阵”展开的“西军”必胜的论断。

梅克尔少校的这一论断随即成为了日本学员的笑柄，因为在日本这场“决定天下的会战”的结果，早已家喻户晓。不过梅克尔少校这次“老猫烧须”，并非是其基本功不过关，而是因为他并不清楚公元1600年关原会战前后的日本列岛政局，恰如其同胞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丰臣秀吉逝世之时，日本列岛表面上形成了以其独子丰臣秀赖为“天下共主”的均衡局面。但丰臣秀赖不满6岁，丰臣氏内部很快便形成了秀吉正室“北政所”宁宁和秀赖生母“淀殿”浅井茶茶对立的局面。宁宁与丰臣秀吉相逢于未起之时，可谓“糟糠之妻”，但其多年未曾生育的现实以及秀吉好色的性格，却令这对夫妻的感情迅速走向破裂。以至于织田信长生前也特意写信安抚宁宁说：“像你这样才貌兼备的美女，藤吉郎还一再抱怨有所不足，实在是胡言乱语。你们家那只秃头老鼠（秀吉）是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如你一般的妻室了。”向来特立独行的信长不仅在信中恭

维宁宁说："在我印象中本就是十分美丽的你，现在已经是二十分的美人了。"更有意表示："你可以把这封信拿给秀吉看！"

织田信长虽然力挺宁宁，但却最终无法阻止丰臣秀吉在得势之后大肆"扩编"自己的妻妾，甚至在信长死后迎娶了比自己小31岁的浅井茶茶。从血统上来说，浅井茶茶是织田信长的侄女。由于浅井茶茶的母亲阿市号称"战国第一美女"，因此浅井茶茶自然也被好事人描述成了倾国倾城的美人。而丰臣秀吉虽然妻妾众多，但最终诞下子嗣的却仅有浅井茶茶一人而已，不禁令人产生了专宠的感觉。当然随着丰臣氏日后的衰弱，也有将浅井茶茶之所以受孕，归功于其两位政治助手——石田三成和大野治长。

宁宁和浅井茶茶之间所上演的"宫斗剧"，其幕后实则是丰臣家族内部武将系与文官派的内讧。以"贱之岳七本枪"为首的丰臣氏武将大多参与了远征朝鲜之役。和大多数日本武士一样，加藤清正等人从来不肯检讨自己在朝鲜的滥杀和冒进，而将矛头指向了负责远征军后勤和撤退事宜的石田三成。而也曾在朝鲜战场上亲冒矢石而负伤的石田三成，也多次向丰臣秀吉弹劾过加藤清正等人在朝鲜的暴行，于是丰臣秀吉原本寄希望于巩固家族势力的两次征朝之役，反倒埋下了文武决裂的导火索。

年幼的丰臣秀赖自然无力修补家臣团的矛盾，而本应"母仪天下"的宁宁和浅井茶茶又水火不容。公元1599年，随着丰臣秀吉的老友、实力派大名前田利家去世，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随即包围了石田三成的府邸。就在丰臣家一场空前恶斗在所难免之时，德川家康却出面调停。石田三成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也不得不退出中枢，引退佐和山城。

德川家康之所以为石田三成作保，无非是不想这场内斗如此迅速地落幕而已。在不到半年之后，借口大野治长等人预谋利用公元1599年"重阳节"当日，各地大名朝见丰臣秀赖之际刺杀自己。德川氏的军队正式进驻大阪。昔日执掌日本的丰臣氏俨然已经落入了德川家康的操控之中。甚至出兵讨伐上杉氏，德川家康也打着丰臣氏的名义。虽然作为儿子丰臣秀赖代言人的浅井茶茶以"这是家臣之间的争斗，主家不便参与"的名义高高挂起，但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却无一不为德川氏负弩前驱。

眼见德川家康"挟丰臣以令天下"的局面已然无可挽回，被逼到墙角的石田三成只能铤而走险。公元1600年七月十五日，石田三成会合宇喜多秀家所部4万大军，

率先围攻德川氏控制大阪一线的伏见城。石田三成自认此举必然打乱对手的全盘部署，不料却恰恰落入了德川家康这只“老狐狸”的谋算中。在关东经营多年的德川家康要收拾上杉氏本不用亲自上阵，仅由德川家康三子秀忠所指挥的3万精兵配合关东地区的伊达政宗等大名的部队已足以应付了。德川家康之所以大张旗鼓地率军出击，无非是“引蛇出洞”而已。考虑到作为诱饵的伏见城守军必然会被石田三成一举吃掉，因此据说在出兵之前，德川家康已然与重臣鸟居元忠作了不再相见的诀别。

自幼与德川家康一起长大的鸟居元忠的确没有辜负德川家康的期望，在仅有1800人的情况下，仍死守伏见城15天之久。石田三成虽然最终在甲贺忍者的帮助下攻克了这座丰臣秀吉所修筑的名城，但在61岁的鸟居元忠战死时的所谓“血天井”中那句“主公，祝您武运昌隆”的呢喃却如同一个魔咒。石田三成的行动非但没有给德川家康带来困扰，反倒令他们从容地集结原本用于讨伐上杉的大军转向西进。

据说在伏见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德川家康的军营之后，德川家康曾故作大方地向麾下云集的各路大名说：“各位的妻女都在大阪城中做人质，恐怕现在已经落到了叛贼三成手中。我决定要不顾生死讨伐叛逆，你们是去是留，完全自主决定。”此语一出，与石田三成势同水火的丰臣系武将无不慷慨请战。而得知德川家康引兵西去的消息，上杉氏内部则无不欣喜若狂。唯有少数清醒者黯然表示：“如果将德川方的这次退兵视为害怕我上杉家的话，那就太不了解家康公了。家康公此次带领诸将回军西上讨伐石田殿，十之八九石田殿下会败。到时剩下我主公一人如何对抗家康公。德川没有进攻我们而选择了退兵，这才是我们的不幸吧！”所谓“上兵伐谋”，对决尚未展开，石田三成一方已然失去了主动权。

“关原之战”名义上是石田三成与德川家康的较量，但实质上却是日本列岛“反德川”系大名与“反三成”派人马的交锋。作为昔日丰臣秀吉的家臣，石田三成的封地有限，所能动员的兵马仅所部6000余人而已。加入所谓“西军”的诸路大名之中，有些是与石田三成沾亲带故的，如在“关原之战”中奋死力战的“麻风病人”大谷吉继，本是率军响应德川家康的，只是路过佐和山城才碍于情面，临时“转会”的。而“西军”之中兵力最强的毛利氏人马、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等人则是不满德川家康大权独揽，期盼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实惠而已。



江户时代描述“关原之战”的屏风

为了笼络这些人，石田三成不得不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如将“西军”主帅的位置让与毛利辉元，还开出诸多无力兑现的空头支票，如向本为丰臣秀吉养子的小早川秀秋承诺可以在丰臣秀赖成年之前，由其继承丰臣氏“关白”的头衔。不过比起石田三成来，德川家康开出的条件却更令人心动，同样是对小早川秀秋的拉拢，德川家康开出的价码是更为实惠的封地和石高。早年在朝鲜战场上曾亲自手持长枪与明军恶斗，却遭遇过石田三成弹劾的小早川秀秋何去何从自然不难判断。《孙子兵法》中的“次者伐交”，德川家康同样玩得游刃有余。

唯一令石田三成感到欣慰的是，扼守德川大军西进要道的美浓国此时由对德川家康心怀不满的织田秀信执掌。身为枭雄织田信长的嫡孙，如今沦为边缘势力的织田信秀自然也站在德川氏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对立面，石田三成如能第一时间与织田信秀会合，仍有机会将德川家康阻挡于近畿之外。但掌握“西军”指挥权的毛利氏却选择向伊势国进军，最终在一个次要战场又白白浪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最终织田信秀兵败之后被迫隐居，德川家康的“东军”顺利进入了尾张。在自己的封地福岛正则颇为慷慨地拿出了30万石的储粮，长途奔袭的“东军”各部得以在衣食无缺的情况下，与石田三成展开了长期对峙。

眼见自己所打造的同盟在德川家康的渗透之下有分崩离析的趋势，石田三成不得不于公元1600年10月20日主动出击。在名为“杭濑川之战”的前哨交锋中，“西军”意外地获得堪称完胜的战果。备受鼓舞的石田三成得知德川家康有意绕道突入近

江，随即移师关原。以中山道为中间，依托两翼的笹尾山和松尾山为中心，“西军”布置成中央收缩，两侧展开的“鹤翼之阵”。因此说，仅从地理上来看，占据制高点的石田三成，的确对只能在平缓开阔地上展开的德川家康占据一定的优势。

除了地形的不利因素之外，德川家康还要面对兵力上的捉襟见肘。由于遭到信浓土豪真田昌幸、真田幸村父子的阻击，德川氏最精锐的3万大军迟迟无法抵达战场。真田昌幸曾是武田氏的家臣，在武田氏灭亡之后，真田氏虽然自立门户但却始终过着朝秦暮楚、依附强权的日子。真田昌幸之所以敢于凭借不足3000人马阻击德川氏的大军，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家族曾受过丰臣秀吉的恩惠，真田昌幸本人和石田三成是连襟关系，而更重要的是真田昌幸的长子信幸已然加入了德川家康的麾下，在局势仍未明了的情况下，分头下注显然是最为稳妥的举动。

在总兵力远少于对手的情况下，德川家康只能将本阵前移。10月20日，德川家康抵达了距离前线仅2公里的桃配山，但德川家康很快便发现自己此举有些荒唐。因为就在桃配山东南的南宫山上部署有毛利氏的两万余人马，这样一来“东军”不仅在正面战场要遭遇对手的左右夹击，更在战略上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尴尬之中。但事已至此，德川家康只能硬着头皮命令麾下的7.5万大军于10月21日清晨的浓雾细雨中向对手发起进攻。

尽管担任“东军”前锋的福岛正则叫嚣着要与石田三成一决生死，但是面对“西军”居高临下的火力优势，德川家康的第一轮进攻非但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反而陷入了混乱之中。石田三成以日本列岛罕见的大口径火绳枪“大筒”向对手射击（“大筒”并非火炮，类似大明帝国所列装的“佛郎机炮”，在日本战国被称为“国崩”），一边传令点燃狼烟，号召各部展开总攻。

毫无疑问石田三成最期待的是驻守南宫山的毛利军可以投入战斗，但是担任毛利军前锋的吉川广家却不仅不为所动，还有意阻挡堂弟毛利秀元的行动。客观地说，吉川广家并非贪生怕死之徒，在远征朝鲜的战役中，吉川广家在碧蹄馆、蔚山等战役中均有不俗的表现，真正导致其作壁上观的还是其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关原之战前夕，身为“西军”主帅的毛利辉元曾在大阪城力劝浅井茶茶抱着儿子丰臣秀赖前往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然后在关原前线树立起丰臣氏的战旗，但浅井茶茶却搬出一大堆理由，表示“不能擅离大阪”。既然有着切身利益的丰臣氏都如此首鼠两端，毛利家自然也大可不必为之卖命。吉川广家按兵不动，毛利秀元干脆要吃罢早饭再行冲锋，不过这顿饭一直从上午吃到正午，由此日本列岛多了一个“宰相殿下空

便当”的典故。

毛利氏大军尽管“不动如山”，但至少还是牵制了“东军”方面的上万人马。真正令石田三成功败垂成的还是小早川秀秋的迟疑和倒戈。占据松尾山的小早川秀秋不仅握有1.5万人的生力军，更直指德川军虚弱的侧翼。面对在“关白”之位和封地实惠间左右徘徊的小早川秀秋，德川家康终于失去了耐心。命令麾下的“铁炮大将”布施孙兵卫率部对松尾山射击。被枪声惊醒的小早川秀秋随即倒戈相向，冲入了友军大谷吉继的阵中。

小早川秀秋最终决定站在德川家康一侧之时，石田三成方面的核心战力事实上已经消耗殆尽。大谷吉继虽然事先已然对小早川氏可能的异动做好了准备，但在数倍于己的敌军合围之下，大谷吉继所部很快便全军覆没。而随着这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整个西军随即陷入了总崩溃之中。由于遭到德川氏的全力追击，石田三成的本部人马很快便全军覆没，一心还想东山再起的石田三成逃入伊吹山中，最终为当地的农民所俘。

据说石田三成被俘之后，德川家康对他颇为客气，还待之以诸侯之礼。但昔日同殿为臣的福岛正则却在马上呵斥云：“你掀起无益之乱，今天落到如此地步有何脸面？”石田三成却反唇相讥道：“是我武运不好，不能活捉你而感到遗憾。”尽管表面上看福岛正则和石田三成在战场上分属不同的阵营，但是关原之战最终败北的却是整个丰臣系人马。随着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等人在大阪等地游街后，最终人头落地。世人眼中丰臣家昔日无上的威望也跟着落到了谷底。而再度率军进入大阪的德川家康更挥舞起“改易”的大棒，开始重新划分日本列岛的政治版图。

所谓“改易”，顾名思义便是调整各大名的所属封地，“关原之战”中从属与德川家康的各路大名包括临阵倒戈的小早川秀秋、按兵不动的吉川广家等人自然要论功行赏，但是这些土地不可能由德川氏来自掏腰包。于是乎从属于西军的大名们便集体倒霉，宇喜多氏的领地被全部没收，毛利秀元虽然忙于吃盒饭，但毛利氏毕竟顶着“西军”主帅的头衔，其原有的8国120万石的领地被削减到2国37万石。为此，吉川广家日后在毛利氏受尽了白眼。

有趣的是上杉氏虽然长期与德川家康敌对，但由于其奉行“战是死，不战亦是死”的顽抗政策，最终于公元1601年宣布降服之后，倒也保留了米泽藩30万石的领地，其境遇与毛利氏不相上下。而在“关原之战”始终抱着“今日胜败虽属未知之数，岛津却自有岛津的进退”打酱油的岛津义弘，虽然从属“西军”，且在撤退的过程中连

伤德川家松平忠吉、井伊直政两员大将，却也只是让出家督之位，提前退休而已，岛津氏在萨摩的领地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尽管从战败者的头上掠走了近600万石的土地，但是由于德川秀忠所指挥的3万关东劲旅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因此这些战果德川家康必须首先用来安抚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德川家康自己的家臣反倒所获寥寥，面对这种局面德川家康只能另辟蹊径。一方面德川家康虽然无力削减封地的数量，但却能决定封地的位置，于是乎丰臣秀吉昔日以大阪、伏见两城为中心分封于近畿的家臣，纷纷被调往本州岛西部、四国、九州等地。日本列岛形成以关东江户为中心的德川系一家独大的局面。

除了将丰臣系人马“改易”之外，德川家康的另一手削弱对手的“高招”则是“筑城”。在骏府、广岛、名古屋等一系列新型城市的建筑过程中，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无不出钱出力，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实力。公元1603年，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川家康正式接受“阳成天皇”周仁的册封，成为“江户幕府”的首任“征夷大将军”，借着这个由头，德川家康更进一步将自己的领地扩充至400万石，而丰臣氏所有领地则由名义上的1000万石（实际约200万石）削减至65万石。



晚年的德川家康

同时德川家康还顺手接管了丰臣秀吉生前引为禁脔的堺町、长崎等地的商业收入，委托武田氏旧臣大久保长安统一管理日本的金、银矿山收入。而丰臣氏唯一得到的保障，仅有德川家康将7岁的孙女千姬嫁给丰臣秀赖的政治联姻而已。德川家康虽然于公元1605年宣布退休，将“征夷大将军”之位传给儿子德川秀忠，但是对丰臣系的打压却从未停止。

由于不清楚向来喜欢敛财的丰臣秀吉在大阪城预留了多少遗产，德川家康以祈求国泰民安的名义，要求丰臣氏独力出资重修京都因地震而倒塌的方广寺。应该说，身为一介女流的浅井茶茶在“老狐狸”德川家康面前，显得实在“很傻很天真”，不仅为了修筑金身大佛而耗费无数金钱，还将丰臣秀吉当年推行“刀狩令”而收缴的民间武器也一并熔作大佛殿之钉锔，但即便如此德川家康仍不满意。

公元1614年，负责承建方广寺的丰臣氏家臣片桐且元将精通汉学的南禅寺住持清韩长老所著的梵钟铭文送交德川家康过目。此时即将在方广寺举行佛堂供养典礼

的消息已然在日本不胫而走，各地的善男信女纷纷向京都集中。可是在仪式开始的前一天，江户方面突然宣布“梵钟的铭文和栋札有可疑之处”，要求中止典礼，史称“方广寺钟铭事件”。

方广寺的钟铭总计36句，144个字。却被德川家康麾下的心学大儒挑出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国家安康”和“君臣丰乐”被指有“将德川家康腰斩，丰臣氏君臣齐乐”的含义。甚至连“东迎素月，西送斜阳”也被理解为是编排关东江户为“阴”，关西大阪为阳。如此牵强的理解恐怕连日后向来擅长制造“文字狱”的满清君臣都要拜服了。

德川家康无端指责丰臣氏包藏祸心，最终目的无非是逼迫丰臣秀赖母子铤而走险。果然浅井茶茶得到消息后，先是拒绝前往江户充当人质，随后又以片桐且元暗中勾结家康为由将其逐出大阪。片桐且元身为昔日“贱之岳七本枪”之一，长期深受丰臣氏的信任，在“关原之战”后担负着与德川家康交涉的重任。浅井茶茶此举虽然还谈不上自毁长城，却也令德川家康通过收容片桐且元进一步了解了大阪方面的虚实。

事实上，自“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对丰臣氏的敲打便从未中断过。公元1611年，德川家康曾傲慢地在京都召见丰臣秀赖，俨然已将丰臣氏视为普通的大名。浅井茶茶担心德川家康会暗下杀手，一度阻止自己的儿子前往。但是在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人的力保之下，丰臣秀赖还是平安地抵达了二条城。但此时的福岛正则等人已然深知丰臣氏再无与德川家康对抗的实力。据说怀揣匕首的加藤清正在丰臣秀赖结束了与德川家康的会晤后，竟黯然落泪说：“今日终于报了太阁殿下（丰臣秀吉）的恩典。”而福岛正则更做好了一旦德川家康反目，便在大阪引火自焚的准备，可见丰臣氏当时的绝望。

丰臣秀赖在二条城会晤德川家康后不久加藤清正便离奇去世，后世不乏阴谋论者推测死因是德川氏下毒。但客观地说，在德川家康的不断打压和削弱之下，加藤清正等丰臣系武将早已无力与之对抗。加藤清正之死反倒避免了自己子孙日后的尴尬，得以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坐视德川家康于公元1614年冬动员16万大军扑向大阪。面对丰臣氏危在旦夕的局面，早已不复昔日之勇的福岛正则除了徒呼“调解”之外，并无实际的举动，而其子福岛忠胜更赫然在德川大军之中出力。显然比起所谓的“忠义”来，力量的对比更能决定日本武士的从属。昔日与德川家康势同水火的上杉景胜、佐竹义宣等人此时不也改投江户幕府的旗下了吗？



大阪战役期间的德川家康

面对被夸耀为“神武天皇东征以来最多武士”的德川大军，丰臣氏只能靠招揽“浪

人”勉强应战。不过自“关原之战”以来，日本列岛上被德川家康剥夺了领地和生计的失意武士众多，一时之间在大阪倒也云集了诸如真田幸村等昔日名将，在丰臣氏庞大财力的支持之下，大阪城内不仅聚集了近10万人马，更开始修筑了“真田丸”等外围据点。

尽管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丰臣氏麾下的“浪人”大多已被命运逼到了墙角，因此在战场无不奋勇死战。而德川氏麾下的大名大多养尊处优，更不希望死在太平盛世的前夜，因此在将丰臣氏的军队逼入大阪城，对“真田丸”等外围据点攻坚失利之后，德川家康巧妙地利用了浅井茶茶怕事的特点，以拆毁“真田丸”等工事为条件与丰臣氏议和。一再被忽悠的浅井茶茶母子再次吞下了对手精心准备的“香饵”。在德川氏撤军之后，不仅允许对手拆毁大阪的城防工事，还解雇了部分浪人。

公元1614年的“大阪冬之阵”后，德川家康却丝毫没有懈怠，针对大阪城的防御特点，德川氏大量囤积粮草和大炮。公元1615年4月，德川家康借口出席自己九子德川义直的婚礼，再次抵达京都。随后各地大名接到出征的号令，15万大军很快又在二条城一线集结起来。感到巨大压力的丰臣氏此时反倒积极了起来，主动向大阪周边进击。但是在野战之中，以浪人为主力的丰臣军无论兵力还是装备均不足与对手抗衡。最终试图一战翻身的真田幸村率领5万人马于大阪城南的天王寺对幕府军展开主力决战。尽管真田幸村凭借个人的武勇在敌阵中纵横驰骋，一度令家康本人也不得不仓皇后撤，但最终被后世推崇为“战国第一强兵”的真田幸村还是倒在了血泊之中，德川大军随即攻入了大阪城内。

在激烈的巷战中，浅井茶茶还指望让自己的儿媳——德川家康的孙女千姬为丰臣氏求情，但德川家康不仅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反而公然指责丰臣秀赖不过是浅井茶茶私通家臣所生下的野种。在万念俱灰之下，浅井茶茶母子与一干丰臣氏家臣只能相继自刃。有趣的是，日本民间为了反击德川家康这种不厚道的“八卦精神”，日后编纂出了一个“吉田御殿”的故事，说的是被德川家康从大阪接回江户的千姬，每每在夜间引男子到御殿之前，玩弄之后加以毒杀。但无论如何，随着“大阪夏之阵”的终结，自“应仁之乱”以来的日本内战不断的战国时代总算是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

明神宗“好货成癖”，张居正死后，他再无约束，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臣僚们不断上本，请他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他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发生火灾，扑灭不及，连乾清宫一起烧为灰烬。修复两宫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大笔经费。

在此之前，有人报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矿，请派官开采，因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等反对，未能实施。而对于开矿取利，神宗一直跃跃欲试。两宫火灾后，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正中他的下怀。神宗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随仲春在京畿地区开矿，由王虎总领其事。仲春得计，锦衣卫和其他卫所的军官，各衙门的下层官僚，纷纷效仿，争走阙下。神宗有请必准，先后派太监到北直隶地区的真定、保定、昌黎、迁安、昌平、涞水，以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开矿，开矿太监遍布各省。

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又向各通衢大邑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专职征税：梁永为陕西税监，马堂为天津税监（兼辖临清），杨荣为云南税监，高寀为福建税监。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三百万两，并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报矿者经常是无中生有，矿使不管有无，据其所报，便招矿徒开采，编富民为矿头，并随意征用民夫。陈增在益都县境内开矿，每天征用民夫上千人，许多人无辜而死，富民也很快成为盘剥的对象。税监则到处树旗建厂，巧立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无不征税。

奉派太监的骄横，激起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的不过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直把派遣税监、矿使比作暴秦。有些地方官吏对差派的太监采取强硬的措施。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像李鸿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十分难得。

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竭泽而渔的政策和令人发指的暴行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万夫所指，人同一心，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发动“民变”，驱除和制裁矿使税监。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泰被派到湖广地区，兼理矿税。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奸淫妇女。人心大恨，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程度。一日，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他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首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发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

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发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发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16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临清民变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

矿监陈增为抢夺地盘发生争执。神宗为二人调解，命马堂在临清征税，陈增在东昌征税。临清州虽然属东昌府，但处水陆交通冲要，一直是重要钞关。说起来，马堂并未失利。

马堂到临清，所带随从数百人，非偷盗之徒即市井无赖。他们手持锁链镣铐，白日夺人资财，遇有抗拒者，乱加违禁的罪名，锁起来就走。马堂还规定，家僮告发主人，没收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归告者。临清州中产之家多破产，远近罢市抗议。一日，万余州民放火烧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击毙他的随从37人。守备王炀率士卒二十多人冲入，背负马堂而出，马堂的手下反告他肇事，将他逮捕。王炀最后死于狱中。官府追拿参与事变的人，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认发难者，英勇就戮。临清人民曾建立祠堂来纪念他。

万历二十七年（1599），太监杨荣往云南采矿。他在云南虐待诸生，结下了第一层怨；诬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赵州知州甘学书等，将二人下诏入狱，结下了第二层怨；要丽江土知府退出他所管辖的地盘，以便开矿，结下了第三层怨。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民众聚众起事，烧毁厂房，杀死税监衙门驻腾越代理人张安民。这是一个警告信号。但杨荣有恃无恐，继续作恶，杖毙民众。因为卫所军官不那么听话，他把一个指挥使戴枷示众，把另一个指挥使关押起来，并扬言要把卫所军官全部逮捕，使人人自危。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放火烧房。在混乱中杀死杨荣，将其尸首投入大火。杨荣随从两百多人丧命。在诸多民变中，税监矿使虽都像惊弓之鸟，但只有杨荣当即被杀。他初到云南时，密奏神宗，说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一经开采，每月可增加收入几十万，这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他的死，神宗深感悲戚。

孙隆是苏、杭织造太监，署衙在苏州，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受命带收该处税课。万历中期苏、杭织造不断增加征收，已是不小的负担。织造太监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织工的盘剥，已很严重；再兼税监，孙隆更成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6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关在狱中，但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清朝初期，苏州人民在苏州虎丘为他立了一块碑，题名“吴将军葛贤墓”。

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每开马市，强夺好马，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意，全家受累。他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300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该队驻扎广渠门外，京师大为震惊。大臣们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他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也是荒唐至极。神宗不但不降罪，反而存心袒护，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使得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招募死士，出塞射猎，与边将争功，扣除军士粮饷，山海关内外无不受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发生骚乱，士卒齐声呼喊："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愤怒，杀来人，聚众千余人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奔入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在边民间造成更大的动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神宗才把高淮召回。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表明"市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城市的劳动者（如机工）和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民变是市民各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

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以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部院为清高。东林党基本上站在批评执政大臣的立场，以清流自命。顾宪成去官以前，与首辅王锡爵对话，王

锡爵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鲜明地表示出他的反对派立场。所谓反对派，当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朝廷的政策。因此，东林党人的概念也扩大了，凡是批评朝廷的腐败，凡是为清流所承认的正派大臣辩护，凡是主张在官僚考察中去奸留贤，凡是在国本之争中批评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凡是在三案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作东林党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与其他地区反对朝廷政策的士大夫，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浑然一体，形成一股社会力量。顾宪成和江西吉水人邹元标、北直隶高邑人赵南星被海内幕为"三君"。

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都希望名列东林。那些行有劣迹，或被认为有劣迹的，不为东林接受的官僚，因地域而分，各立党派，彼此为援，与东林党人相对抗。这些官僚主要形成三大党派：一是山东人组成的齐党，一是湖广人组成的楚党，一是浙党。三党成员交往甚密，一意攻击东林党，今日指其乱政，明日责其擅权。但后来，在三党的关系中出现裂痕，力量削弱。

天启初年，一些东林党成员陆续被起用。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高攀龙先后任都御史，由在野派变成在朝派。天启三年（1623），赵南星等利用京察的机会，尽力罢免浙、齐、楚党成员和品行不好的官员，把东林党人及正派官员升至重要职位。有些官员，不见容于清流，便去投靠掌握大权的宦官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所取代。

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县的一名无赖，虽目不识丁，但颇有心计。少年时在赌场上不得意，家境日益贫困，他一怒之下净身入宫，改姓名为李进忠。地位改变后，他才恢复魏姓，皇帝赐名忠贤。初入宫时，他管过甲字库，结识了太监魏朝，转为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典膳。王才人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小心侍奉，得到大太监的称赞。

明朝习俗，宦官在宫中有相好的女人，可结为"对食"。魏朝与朱由校乳母客氏原为一对，但因闲暇不多，魏忠贤乘虚而入。客氏移爱于魏忠贤，感情日笃。朱由校即位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给田20顷为护坟香火资。保持和客氏的关系，不但是感情的需要，而且是在皇帝面前邀宠的重要手段。魏忠贤首先假传圣旨，把魏朝排斥到凤阳去，并在途中把他杀死。接着又除掉对手大太监王安。魏忠贤指使外朝弹劾王安，把他降至南海子净军，并派亲信在该地杀了他。

天启元年（1621）的冬天，魏忠贤升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不识字，"例不当

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地位虽在魏忠贤之上，可他一切唯魏忠贤马首是瞻。另一秉笔太监李永贞，更是魏氏死党。王、李二人颇通文义，通过他们，魏忠贤完全可以自如地处置大臣章奏。

魏忠贤还试图建立一支私人武装，杀王安后，设内标万人，全副装备。这支队伍在宫禁之内操练，鼓声震天；一次试用枪铳，不慎炸开，几乎伤及前来观看的皇帝朱由校。御史刘之凤提醒朱由校说：“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话的意思已很明白了。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提督东厂。东厂和锦衣卫是控制内朝、监视官僚系统的重要机构。万历时热衷于派遣官员向外勒取，放松了对厂卫的管理。魏忠贤任事以来，安排他的亲信田尔耕掌握锦衣卫，许显纯掌握镇抚司，屡兴大狱，打击异己。他们派出大批密探，四处活动；镇抚司狱中刑具齐备，一旦被捉入狱，则势难生还。

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通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

天启四年（1624）六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罗列魏忠贤的24大罪状，包括拟旨内批、玩弄机权、翦除异己、兴狱滥刑等内容。要求把他交刑部严讯以正国法。杨涟的奏疏掀起反对魏忠贤专权的高潮。一两个月内，弹劾章奏不下百余道。魏忠贤在惊恐之余，忙采取应对措施。十月，将赵南星、高攀龙罢免，十一月，将杨涟、左光斗等削籍。天启五年三月，伪造罪名，将反对自己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6人下狱，赵南星等15人削籍。杨涟最为魏忠贤痛恨，被施以各种酷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左光斗、魏大中也被打得体无完肤，与他同日而死。

依附魏忠贤的官僚趁势助虐，其亲信阁臣魏广微撰《缙绅便览》一书，把前阁臣叶向高、韩爌以下百余人列为奸党，而把阉党王永光、黄光缵等60多人列为正人。魏忠贤把这份名单当作用人的标准。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吏部尚书崔呈秀编《东林同志录》，按词林、部院、卿寺、台省、部属顺序，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编《天鉴录》，开列不附东林党官员的名单。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打击迫害持续数年，直到他垮台才停止。

魏忠贤的权势膨胀，致有“九千岁”的称号。权势的无限度发展，也导致了他的灭亡。天启七年，朱由校病死。因为无子，他的异母兄弟信王朱由检被推上了皇位，年号崇祯（1628—1644）。此后，朝内外重新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朱由检召魏入宫，命内侍宣读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的十大罪。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在被发配去凤阳的途中自杀。崇祯二年（1629），朱由检定逆案，尽数驱除魏忠贤党徒。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专权的最高峰，它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



由于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矿使税监的疯狂掠夺，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万历年间，明皇朝四面用兵。中期，有被称作“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的战争；万历末年以后，明朝与后金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万历三大征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要耗费巨额的钱财。据统计，明朝廷用于三项战事的白银超过了10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当辽东战争发生，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

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应付战争之需。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520万两。这宗以“辽饷”名目加征的田赋，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

崇祯十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其主要措施是，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而以每石折银八钱的比率输官，计可得银近200万两。加上民间田土溢额者，核实输赋，以充饷；按照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的银两，以充饷；全国邮驿裁省的银两，以充饷，估计共可得银280万两。这宗加派被称作“剿饷”。朱由检明确表示，这次的加派是临时性的：“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可在第二年，仍然征收了其半数。

崇祯十二年，廷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73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730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如果说万历年间的危机，是因朱翊钧“非但内者不出，且欲外者复入”，尚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速了明皇朝的灭亡。

尾声

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德川幕府时代则更为复杂，德川幕府在东亚大陆明清交替之际，曾长期支持以福建郑氏集团为首的南明势力。在公元1660年，甚至有“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的军事动作，但是德川一系的武士向来不擅长航海之道，在遭遇了日本列岛夏季常见的台风之后，还未与八旗子弟相见于战场，便白白在海难中损失了几千精锐。

这一股不为人所知的“神风”同样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不仅自诩将统帅“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北伐的郑成功，最终由于兵力不足而兵败南京。德川幕府从此视干预中国内政为危途。此后，郑氏及南明其他势力多次派代表到日本“乞师”皆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但这种视满清为“夷狄”的态度，最终还是在德川幕府直至郑氏所盘踞的台湾岛被满清帝国攻占之前，与南明始终保持着外交往来。

当然不与满清帝国正式建交，不代表德川幕府不重视中日贸易。在公元1610年前后，江户方面曾利用中国商船抵达长崎港的机会，致信福建总督以期“继前世之绝，兴当年之废，修遣使之交，求勘合之符”。不过此举很快便不了了之。因为公元1609年，萨摩藩以三千精锐发动对琉球的“闪电战”之后，日本列岛便开始利用琉球王国与明、清帝国的朝贡关系，开始了以之为“代理服务器”的中日“密贸易”。

在琉球王国处于“中日双属”的时期，通过“两年一贡”的“朝贡贸易”，中日之间依旧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互动。而为了保持这种来之不易的苟且关系，日本人也算是煞费了苦心，不仅顺从满清帝国剃发、易服的要求，更制定了一整套应对之词。但这些小伎俩还是无法瞒过擅长欺上瞒下的满清官僚，康乾时代中国官员便发现其中的蹊跷。但是沉浸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满清君皇并不在意。以为通过政治册封和朝贡贸易中的“厚往薄来”便足以保护琉球的独立。

正是满清帝国的这种不作为，最终导致以萨摩藩为代表的日本势力逐步蚕食了琉球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昔日对琉球政治和文化拥有举足重轻作用的闽南36姓逐渐式微。而琉球国主尚氏家族也日益对日本的控制逆来顺受，频繁地前往江户，参拜幕府将军，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日本列岛的大名之一。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为防止台湾郑成功与大陆人民发生联系，对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控制极严。严禁东南沿海一带商民出海贸易，对西方商船也出于同样目的，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离东南沿海的澳门一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

岸。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平定台湾抗清斗争后，东南沿海各省官吏吁请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清帝康熙认为开放海禁以后，所得税收“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因而准其所请。自是，东南沿海商民可以自行造船出海，海外贸易开始有所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榷关，开始同外国互市。清政府为鼓励外国商船进港，甚至给予减免商税的待遇。当时苏州船厂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每年建造出海大船常达千余艘。

这样，中断很长时期的中日间的通商贸易逐渐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商船驶进日本长崎港的达73艘。在这以后20年间，赴日的清商船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根据清日间商业贸易状况，特开辟宁波、南京为对日通商的主要港口。

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者不少。某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铜，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官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康熙年代清朝铜产量不多，至雍正时期，云南铜山的铜产量约年产三百数十万斤，不敷所用，所以铸铜钱及军用铜皆需进口，特别是进口日本铜。铜商从南京、宁波、厦门、漳、泉、广东等地出海，驶往日本购买黄金、白银及铜。

因之，日本金、银、铜的外流量很大。据日本宝永六年（1709）长崎奉行的报告，从正宝五年（1648）至宝永五年（1708）的60年间，外流黄金约240万两，白银约37万余贯；从宽文二年（1662）至宝永五年（1708）的46年间，铜外流量约11.45万斤。日本为限制金、银、铜的外流，对仅有的清、荷两国外商贸易额定出限额：清商为六千贯，荷兰商为三千贯。可是对进港的船只没有规定数量，所以，进港的船只数量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商进港船只数指至137艘。进港船只增多，贸易额势必超出规定的限额。虽然明文规定超过限额的商品必须运回，不得在日本出售，但实际上非法贸易大为增加。

为取缔走私贸易，日本幕府在元禄元年（1688）对清商船进港船数作了限制，每年只准70只清商船入港。后来，幕府曾一度计划将限制数减至10只，贸易额为三千贯，但受到大部分官吏的反对。因为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传统的优势，日本各个阶层全都喜爱使用。而且清商船贩运至日本的商品种类，几乎囊括中国十几个

省份的大部分畅销品。西川如见在其著作《华夷通商考》中曾列举中国15个省份进入日本市场畅销商品的名称，其中南京一地的商品有80余种，浙江有40余种，福建、广东有60余种。商品的种类大体上为丝及其纺织品、书籍、文房具、瓷器、药材、砂糖、香料、工艺品、漆等等。

幕府中的部分官员认为，如果限制过严，清商得不到足够的利润，将不再赴日贸易。这样一来，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将因无货源补充而匮乏，这会产生极大的不便。因此，幕府作了让步，在正德四年（1714）公布的《正裕商法》中，将10只增加至30只，每只商船发给一面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无信牌者不准入港。但是，实行信牌的第一年，只有9只清商船入港。因为清政府干预了这件事，将信牌没收，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方始准许持信牌赴日贸易。幕府见清商船骤减，又自动放宽限制，再增加10只，总数为40只，贸易额增至八千贯。不过，清乾隆时期海禁转厉，加之日本的铜产“量渐减，所以清商船赴日贸易船数，再没有增加，大体上保持在每年10只左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建立起全国政权的时间约晚于德川幕府半个世纪，因此，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于德川幕府第4代将军家纲执政时期。在这以前，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君臣、父子统治秩序和忠君、孝悌的封建思想，可以改变武士自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下克上”现象，促进武士遵守忠于君主和奉公守法的规范行动。所以，在入幕主政之初就开始提倡儒学。

他仿效明政府推行程朱理学的办法，罗致日本国内林罗山等一批朱子学派名儒，大力宣传朱子学。当时，日本名儒多为僧人，尤其是五山僧人。德川家康为控制儒学。特请朱子学名儒林罗山落发为僧，改名道春主持僧务，以左右僧界。德川家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带头学习《论语》《中庸》等书，且经常请些名儒学者为他讲读。在政务之余，他还过问刊刻儒学书籍等出版事业。在他带动下，历任将军都推崇朱子学派，遂使该学派逐渐形成幕府的官学。

第5代将军纲吉时期，正值清康熙帝临御秉政。康熙帝恰巧也出于巩固政权的原因，鼎力提倡程朱理学，且亲自编写《性理精义》和刊刻明成祖的《性理大全》等书。因之，朱子学派在清初也成为中国的统治学派。康熙一代，清朝进入盛世，经济和文化都有迅速发展。清日双方虽未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清朝的文化、思想对日本影响极大。日本朝野崇敬清朝，尊称为“上国”。纲吉将军为进一步推行儒学，在幕府中特设儒宫，并在日本元禄四年（1691）建立孔庙（即汤岛圣堂），亲

自在圣堂讲解《论语》，亲笔书写“大成殿”匾额悬挂殿内。又命林道春之孙风冈由榴还俗，蓄发穿儒服任“大学头”职，竭力推广朱子学。

当时，日本朝野对清朝康、乾两帝极其崇敬，对康熙尤甚，尊之为上国圣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顺治时颁布的《六谕》，从琉球传入日本。第八代将军吉宗见了极其重视，命荻生祖来附以训点、室坞巢译成日文，以《六谕衍义》书名刊刻发行，很快流行全国，甚至在明治维新前夕还再版发行。康熙的训谕《十六条》，以《圣谕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谕”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谕“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稀世仁君”。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幕府的大力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在武士阶级中尤其普遍，出现各级武士“家读户诵”前所来见的情景。自是，儒学者与僧分离，名僧即名儒的状况不见了。各学派的名儒大多为武士出身，武士几乎垄断了知识界，这是德川幕府时期的特殊现象。与此同时，儒学的忠君思想深入武士头脑，战国时期“下克上”式的叛乱几乎消除了。

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门径，不学习朱子学就难以做官。尽管如此，非朱子学派仍然不断产生。王阳明和陆象山的著作传入日本后，在被称作“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的倡导下，形成阳明学派。该学派的处境和中国一样，也被正统的朱于学派视为异瑞邪说，加以排斥。为谋求存在与发展，该学派不得不常与朱子学派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双方争论的论点往往超出学术范围，而涉及政治方面。阳明学的著名学者熊泽藩山攻击日本朱于学派过分崇拜中国，把日本看作是太伯之后，是个耻辱。与阳明学派持有同样观点的山鹿素行批评说，林道春等看不到日本国柞与天地无穷，而强吴却被越所灭这个事实，附会日本为吴太伯之后， 是“食其国而忘其邦”，犹“生乎父母而忘其父母”之人。

另一非正统学派因其倡导者为土佐的南村梅轩，故被称作南派朱子学。这一派的名儒与京都朝廷有联系，他们利用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观念，与正统官学作斗争。山崎闇斋和浅见纲斋等批评正统官学的所谓正统，不过是承认统治者的既成事实，非是日本国体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则。篡臣掌政一统天下，不能算作正统。唐高祖是隋臣，宋太祖是后周之臣，他们是乱臣篡权夺取天下，不是正统。伯夷、叔齐值得赞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使后人知大义名分不可侵犯的典范。楠木正成维护南朝大义凛然，足利尊氏建立幕府是篡权分裂行为。他们的批评涉及幕府，因此，

不断受到流放、蛰居等迫害。

水户学派是非正统朱子学派中的又一主要学派，因其组织者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御三家之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园，故称水户学派。他认为官学派林春斋等主持编纂的《本朝通鉴》一书，把天皇的始祖定为吴太伯后裔，非常不妥。他决心本孔子春秋之义，仿朱熹的《通鉴纲目》，编纂《大日本史》，以明皇统的正闰（以南朝为正统），定君臣大义名分（明确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期人心知其所向。日本明历三年（1651），他在水户设修史机构“彰考馆”，聘请名儒参加编写工作，从而形成水户学派。奠定水户学派基础的名儒有安积瞻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

水户藩主德川光园亦喜读朱子学，且颇受明末入日的朱舜水影响。朱舜水以扶明为志，其言行重视封建的君臣、节义，与德川光园的思想合拍。德川光园极为器重，曾师事之，汇聚于水户的儒者亦颇受其影响。水户学派编纂的《大日本文》，就其特笔而论，无非是列神功皇后于纪、大友皇子于本纪、定南朝为正统并用其正朔，以体现其大义名分思想。德川光园还以自身行动体现他所主张的名义思想。他因“以弟越兄”继承藩嗣，在立嗣问题上，他不立子而立兄子为嗣，以体现长幼名义。安东守约以德川光园比作管仲。管仲相齐桓尊王而霸，德川光园的尊王目的也在此。对于这点藤田幽谷税得更明确：“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这点也正是德川光园修《大日本史》的本意。由此可知：德川光园的尊王与幕府尊王攘夷时的尊王，其意义颇有不同。

江户幕府进入中期以后，正值清朝的雍、乾、嘉3代。清朝在这3代文字狱盛行，迫使中国学者脱离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经世致用”，注意现实，要求社会改革的研究作风，　转向“避世”，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大部分学者埋头书本寻章摘句，勘校考据注释，学术研究完全脱离现实，目光短浅，思想呆滞，尽管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一定贡献，但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可是，清朝的考证学风传入日本后，却意想不到地动摇了日本官学。日本反对官学的一些学者如伊藤仁斋、荻生祖来等利用考证批评并反对官学朱子学派，倡导“六经即先王之道”，企图回到儒学古典中去，从而开始了日本儒学中的复古运动。随后，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也热衷于考证。清代名儒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著作经他们的介绍，在日本广泛流行。至太田锦城时期，日本的考证学派基本形成。太田锦城受顾炎武的《日知录》、朱彝尊的《经义考》、毛奇龄的《西河

集》、赵翼的《廿二史别记》等书的影响最深。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可见其推崇之情。

日本考证学派的形成，首先对早已产生的国学发生影响。国学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著作，主要是天皇、不得意的公卿及其家臣以及与京都朝廷有联系的知识界的某些学者。最初，德川幕府并不重视国学，可是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深化，特别是受到考证学派的影响以后，反幕府的人开始视国学为“尊王”的思想武器。由于朱子学被幕府定为官学，国学者力图通过反对中国儒学，达到反幕府的目的。贺茂真渊在18世纪中叶著《古器考》《冠辞考》《国意考》等许多著作，力图从日本古籍中抹掉中国儒学的影响。他在《国意考》中说，神道是自然的道；圣人之道是人为的道，是规矩各种犯恶之道。中国的圣人皆为不仁不义者，禹名为受禅，实夺位于舜的子孙，舜也夺位于尧的子孙。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日本则不然，君脉世世相继。而且，在唐文化未输入日本以前，日本仁义满天下，输入之后，恶人产生。因此，日本人应忠于君道，即日本固 有之神道，不应崇拜儒学。另一国学者竹内式部把这种思想与现实中的天皇联系起来，强调事君乃日本人之大义，慨叹“今世不尊天子，人只知将军之贵”，并逐渐演变成“尊王贱霸”思想。从反对官学批评儒学，而演进为尊王贱霸，引起幕府的注意，对国学的著名人物开始进行迫害。

与国学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反对儒学的学派是神道学派。神道被视为日本固有之道。可是，该派也受儒学影响而不断变化。德川幕府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学派，以朱子学解释神道，认为儒学的王道即是神道。中期以后，官学受到各学派的挑战，神道的解释亦发生变化。浅见纲斋以三种神器解释神道，使神道脱离王道，演变为皇道。不过，这时的皇道只是象征性地拥护天皇，承认德川幕府握有朝政是得到天照大神的允许，要求幕府应尊敬朝廷与天皇。幕府末期平田笃胤出，神道即皇道的宣传带有尊皇倒幕的色彩。他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指定的日本君主，日本人必须效忠于天皇。他倡导一种新的学说，以驳斥提倡朱子学重视中国文化的将军。他认为：由神创造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日本一国。所以，世界事物皆源出于日本。盘古、三皇、太昊、神农、黄帝等都是日本的神，创造《易》也是日本的神，连中国的医学也是日本的大已贵神、少彦名神所创造，传入中国再反传入日本的。由此逐渐演变为尊日本贱中国的《皇国尊严论》。幕府对持这一学说的学者，照例进行迫害。

如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斗争，不论正统的官学派和反官学派的各学派，都受到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影响。但是， 由于幕府支持官学派，所以，凡是反对官学派的各派，不管其自身受儒学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反对幕府都把矛头指向了官学。尽管清代的儒学、文学、绘画、书籍、医药等各方面都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反官学派的批判，影响日本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儒学思想基础，已呈现出瓦解的前兆。

一口气读完中国战史 6

八旗狂飙

——明清百年战争史（1583–1683）

顾晓绿　郭　强 | 著



第一章　统一女真

女真，又作女贞。史载，其族源自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肃慎，他们发源于今长白山以北、东临大海的黑龙江流域，以精于弓箭制造而闻名。据传，早在舜的时代，就曾向中原王朝进献“楛矢石砮”，至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肃慎也曾派使者朝贺。因而，由于同中原王朝联系频繁，所以当时的人认为肃慎与燕、亳同为周王朝的北方领土。

到了汉代，肃慎在史书中多作挹娄，但有时仍作肃慎，当时挹娄诸部均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首领，一度受到扶余的支配。三国时期，挹娄摆脱了扶余的控制和阻隔，重新同中原王朝取得了联系。他们所贡献的除“楛矢石砮”外，又以“挹娄貂”而闻名。在晋朝之后，北朝史书又改称其为勿吉。在这一时期，扶余因常年遭受鲜卑攻击，国力渐至衰败，最终被靺鞨所灭。此后，靺鞨又先后臣服于高句丽和唐朝。

又因为靺鞨最初位于中国东北部最北的“黑水”（今黑龙江）沿岸，而得名“黑水靺鞨”。史载：黑水靺鞨，位于靺鞨诸部的最北，“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　而《金史》中则记载唐时“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由此可见，女真人的族源为肃慎、勿吉等部族，而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时。从《金史·世纪》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唐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总章元年（668），唐和新罗的联军灭亡高句丽后，在征服高句丽，安抚册封渤海、契丹、奚、靺鞨、室韦等民族的基础上，大唐在辽东先后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营州上都督府、饶乐都督府、松漠都督府、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室韦都督府等。以都护府、督都府、州、道等行政体制对辽东进行行政管理，开发建设辽东。

也就在这个时候，黑水靺鞨开始沿松花江、牡丹江南下、西进，并于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末与大唐发生军事冲突，但被武周靺鞨籍将领李多祚击败。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辽西契丹族突然叛唐，史载：“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奔之路，使其腹背受敌，处于唐和突厥的夹击之中，扭转了唐

对契丹作战最初的被动局面。同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契丹在初胜唐军后即向辽东大举进攻，据《新唐书·许绍传》载：“方围安东，胁令（许钦寂）说属城未下者。钦寂呼安东都护裴玄曰：‘贼朝夕当灭，幸谨守！’贼怒，害之。”辽东形势危在旦夕，时任辽东都督的高德武挺身而出，“以数百之兵当两万之寇”，“破逆贼孙万荣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高德武挫败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此后唐朝联合突厥，最终平定了契丹叛乱，“契丹余众不能立，遂附突厥”。

而契丹叛乱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便是渤海国的建立。史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又有“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大祚荣并不愿意卷入唐与契丹之间的战争，而是选择了东奔远迁、远离战祸之路。武后在击败契丹后，曾派军对靺鞨进行征剿，但却被大祚荣战败。由此，大祚荣得以在东北立足。这是高句丽灭亡后唐东北边疆的最大变局。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安东都护府迁治平州。以前安东府治所虽数次迁移，但都未离开辽东，这一次迁移到内地，很显然是因为辽东渤海国的崛起。渤海国建立后，唐朝在辽东仍有相当力量，而之所以没有再次征剿，主要由于大唐将主要兵力用于对突厥、契丹作战。而大祚荣虽然迫于形势通使突厥，但仍然倾向归顺唐朝，如大祚荣就以武后所赐封号“振国公”为号，并且仅满足于“保阻以自固”，对唐辽东地区并无野心，因此中宗即位后,唐与渤海的关系很快有了改观。《旧唐书》载：“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唐朝遣郎将崔訢从海路前往辽东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不过虽然如此，大祚荣对大唐在辽东的驻军还是心存忌惮，因为对渤海国而言，唐在辽东驻军是渤海的直接威胁，与唐境接壤,随时可能遭到唐军的打击。安史

之乱后，渤海国的威胁消失了，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安东都护府废止。此举使得渤海国再无威胁，大批高句丽遗民转而投附新兴的渤海地方政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而渤海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海东盛国”。

不过，黑水靺鞨虽与建立渤海国的粟末靺鞨同属于靺鞨，但时有冲突。黑水靺鞨部，由于居靺鞨的最北面，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下游两岸一带，故而发展较慢，分16部。唐玄宗时，在此大部落置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隶属于都督府，称为州，任命各部落首领为州刺史。

唐朝末年，契丹兴起于辽，渤海与之作战常常不力。此时，附属于渤海国的黑水靺鞨趁机向南扩张，并归服契丹。因契丹人称其为女真，故而逐渐弃用黑水靺鞨之称。《辽史》记载：“又有北女真、南女真、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濒海女真，黄龙府女真，曷苏馆女真，顺化国女真，回跋女真，盖各就其地名之。”辽天显元年（926），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从此之后，部分女真人随渤海人南迁，编入辽籍，称为“熟女真”；而留居故地的女真人，未入辽籍，称为“生女真”。关于“熟女真”和“生女真”的区别，有记载为“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渤海灭，复役属契丹。在南者系籍，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也”。还有观点认为生女真和熟女真的方位不是一北一南，而是一东一西。按照《大金国志》的说法是“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濒海”。此外，根据记载，完颜阿骨打所在的生女真的方位与朝鲜史所载的东女真（又称为东北女真）大致相同。

但不管怎么说，熟女真数千户居住于辽阳，主要以耕种为生，受辽国直接管辖，而主要以渔猎为生的生女真各部仍然采取首领册封的方式接受辽国的统治。而生女真则分为几十个部落，其中完颜部较大，此后完颜部逐渐强大，他们营建庐室，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一带。其子石鲁作酋长后征服了附近部落，成立了部落联盟。石鲁之子乌古乃又合并了许多部落。辽天庆三年（北宋政和三年，1113），乌古乃之孙完颜阿骨打继位为酋长。次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并以“反抗辽国的压迫”为口号而起兵，从而开始了为期十年的伐辽战争。自阿骨打率女真各部人马誓师来流水（今拉林河）以来，他先后率军在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中击败辽军。次年一月，又在“皇帝寨”（即后来的上京会宁府）称帝，国号为“大金”，史称前金，建元“收国”，是为金太祖。关于这个国号来源有人说是来自发源地

金水（也有说是为取金不腐不坏之意）。直到这个时候，辽国天祚帝至此才重视此事，并且下令亲征，但是辽军被女真军击败，同时辽朝国内发生耶律章奴与高永昌的叛乱，眼看着辽国大乱，金太祖当即以辽五京为目标，兵分两路展开金灭辽之战。



辽天庆六年（北宋政和六年，1116）五月，金军占领东京辽阳府，数年之后，又攻陷上京临潢府，从而辽朝失去一半的土地。此后，金国又与北宋使者赵良嗣等人定下“海上之盟”，联合攻打辽朝。

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北宋宣和四年，1122）金军攻下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亡沙漠。同时金军还攻下西京大同府、耶律大石等，拥立耶律淳于南京析津府，即北辽。而就在金国攻城略地的同时，北宋也派太师楚国公童贯等人多次率军20万军队北伐燕京，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结果大败而回，童贯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当宋徽宗因童贯收复燕山有功，下诏解除他的兵权而为真三公，加封他为徐、豫两国公的同时，金军已经攻下辽南京，北辽亡。至此，辽五京均被金军攻下。

金太祖死后，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即金太宗。金太宗继续讨伐大同一带的辽军。此后，金太宗为了联合西夏灭辽，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则改对金朝称藩。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二年，1125）辽天祚帝被俘，辽国亡。同年，金人以燕云十六州的张觉事件为借口，令谙班勃极烈完颜斜也为都元帅，统领金军攻打北宋京师汴京。由于李纲的顽强抵抗，金兵无法攻入，双方签订《宣和和议》。次年，金太宗再以宋人毁约为由，再派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两路攻破开封，于翌年虏宋徽宗、宋钦宗北归，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

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大宋皇位，史称南宋，后迁都临安。绍兴和议后，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后来金国几度南征都未能消灭南宋，而南宋也有过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双方以秦岭淮河为界。此时金国强大，其国以燕京为中都，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淮河，东到日本海，西临大漠。此外，金人参考汉字和契丹文字而创制了女真文。随着金朝的势力逐渐延伸，大部分女真人也随之进入中原，尽管金人尽力提倡使用女真语言文字、维持猛安谋克军事制度。然而，终因与汉人杂处，到了金朝后期，中原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

数十年之后，如同当年阿骨打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那样，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于大漠，在统一蒙古之后，开始向政局逐渐衰败的金国宣战。金国屡战屡败，尽失其北

方领土，而南宋也趁机北伐，处于在两面夹击中的金国不得不将金中都（今日的北京）迁都南下到汴京。虽然末代君主金哀宗完颜守绪曾励精图治，但积重难返，始终无法扭转败局。金天兴三年（南宋端平元年，1234），成吉思汗之子、也是其汗位的继任者窝阔台率领大军围蔡州。在此前一年，蒙古军就已经攻下汴京，迫使金哀宗逃到蔡州。在南宋派兵协同蒙古合攻蔡州之后，困守孤城的金哀宗已经彻底绝望了，城中绝粮已经三个月，这年正月初十，蒙古兵凿开西城攻入，金军奋战到天黑，蒙古兵退却。当夜金哀宗召集百官，将帝位传于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

次日，宋将孟珙率军向南门进攻，至金字楼，用云梯登楼，部将马义架云梯率先登城，万军争相涌入，在城上大战，登城的宋军杀到西门，招江海、塔察尔军入城，三方厮杀于蔡州城内。完颜承麟被乱军所杀，金哀宗自缢而死，大将完颜仲德率领众军投河自尽。此后，金国的降臣带着孟珙找到了金哀宗的尸体，尸体已经焦黑无法辨认。孟珙把尸体一分为二，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古，并分了金国皇帝的仪仗器械和玉玺等宝物，金国彻底灭亡。

金国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三京，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于是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南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

次年，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这一年，蒙古军在荆襄战场上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使得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千疮百孔。端平三年（1236）十月，蒙古军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又猛攻南宋的蕲州。从此之后，宋蒙之间的战事接连不断……

金朝灭亡后，一些女真人仍是散居于关东，分为建州、海西、野人等部，但蒙古人却在图们江北一带设开元、南京两万户府，并在女真人居住区设立许多路、府、所，管理诸支女真人。此后，蒙古大汗忽必烈建国，是为大元，在完成了对南宋的征服之后，元朝将其所属臣民依次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当时，留居中原的女真人因民族特点的消失而被统治者归入汉人行列；而生长于东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被视同蒙古人。他们被编为诸多女真万户，由朝廷设置的辽阳行省管辖，并开始广泛受蒙古语言文化影响。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改辽东路总管府为开元路，女真人皆被纳入开元路。在辽阳、沈阳等路相继成立后，开元路只管辖沈阳路以北（今辽宁省铁岭市北）的女真人，南部的女真人由沈阳、辽阳等路分别统领。对分散的、处于后进阶段的水达达等“随俗而治”。

皇庆元年（1312）前将开元路东北部地区划设水达达路，与开元路同属辽阳行省管辖。水达达路是元朝女真的主要分布地区，元王朝在其境内先后设立了许多府所。见于史籍的，除了有设立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的，用来管辖当地女真人和水达达的斡朵里、火儿阿(胡里改)、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和水达达、肇州两个屯田万户府外，还有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有征东元帅府，府治在阿姆贡河对岸的特林地方；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治所在阿纽依河与黑龙江汇合处的哈儿分地方；在今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儿千户所。此外，还置有鲸海、木答哈、牙兰千户所。

元朝通过上述机构和职官，在女真地区征收赋税、签军应役、发布禁令等，实施全面政治统治，并向女真征收的赋税是实物，有粮食、布匹、各种野兽皮张和海东青等。不过由于诸支女真人所从事的主要生产不一，故缴纳的实物也各有侧重。此外，元朝还在女真地区发布诸如屠杀之禁、酒禁、弓矢（捕猎）之禁、出产金银禁等等一系列的禁令。这些禁令绝大多数是为防止女真反抗而发布的。后来，元朝政府为了筹粮，强迫他们改渔为农，在当地实行屯田，甚至征调一部分女真人和水达达到浦岭路和肇州屯田。

由于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汉人被掠夺更为常见。将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残酷剥削汉族群众，人民揭竿而起。在泰定二年（1325），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蒙古贵族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更是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至元惠宗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依然不堪官员贪污，贵族糜烂，朝政腐败。为消除赤字，元廷加重了赋税，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滥发新“中统元宝交钞”，此举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荒灾、黄河泛滥等天灾，顿时使得帝国上下民不聊生。

至正十一年（1351）元惠宗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夫15万，军兵2万，而官吏却是趁机敲诈勒索，使得众人顿时不满。同年五月，白莲教韩山童与刘福通煽动饱受天灾与督工苛待的百姓叛元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

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

虽然帝国频频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但已然无济于事，譬如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此起彼伏的叛乱却是层出不穷，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率军围攻高邮起义军张士诚部时，因为被朝中弹劾，功亏一篑，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了。时有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便强大起来。至正十六年（1356）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先是率兵占领集庆（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迅速成为了江南一强。与此同时，在北方，察罕帖木儿统帅的元军开始对红巾军展开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红巾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蒙的张士诚。此战中，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而也就在这一年，通过鄱阳湖水战，朱元璋还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此后，他又自称吴王，率军攻下平江（苏州），灭张士诚，同年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即明太祖，建元洪武，大明王朝建立。之后，太祖皇帝趁尚占据半壁江山的元朝内讧之际，展开了北伐和西征。同年，明军迅速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彻底终结。之后，明军又消灭了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据守云南的元之梁王，天下至此初定。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以冯胜为大将军出征海西。作为故元在非蒙古地区最后的抵抗势力，这最后的抵抗势力是元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纳哈出，此人乃扎剌儿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的裔孙。元太平路万户。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太平时，将其俘获，朱元璋以其为名臣后人，待之甚厚，劝其归顺，但其坚决不肯。后朱元璋好言相抚，厚赠银两，准其北归元朝。

元亡后，元顺帝北逃，史称北元。以纳哈出手握重兵，封其为丞相，继封太尉。不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辽东大部为明所有，纳哈出领兵踞开元路，屯兵20万于金山，恃畜牧丰盛，与明军对峙。当时元顺帝早已于明洪武三年殁，不久太子又死，由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继位，纳哈出成为元末主要势力。有史料言，曾封其为开元王。明取得辽东后，明太祖数遣使招抚，其置而不答。洪武八年

（1375），入犯辽东，兵锋直达金州，为辽东都卫马云、叶旺等击败。其后屡入塞犯，皆为明军所败。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大军20万直逼金山，史称金山之役。再遣故元将乃剌吾至纳哈出处招抚。纳哈出见大势已再难更变，遂降于明。

纳哈出降明后，等于使大明打开了通往辽东之路，于是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抑北元残余势力，于是在辽东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

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朝收回高丽所据之辽东领土，并与其划界于鸭绿江，还阻止高丽对女真进行管制。高丽禑王上表抗辩，遭明太祖驳回。永乐初年，胡里改万户阿哈出、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相继入明朝见。此时，已经取代高丽的朝鲜王朝上表明廷，希望能够召回猛哥帖木儿，但成祖皇帝没有同意。后成祖设置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军民指挥使司，分别以二人为指挥使。后来，猛哥帖木儿等还随明成祖亲征阿鲁台。

朝鲜王朝之所以希望能够召回猛哥帖木儿，是因为此人与李氏朝鲜的关系不同寻常。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为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兼管鹰事，参与镇压“吾者野人”发动的叛乱。正因如此，他与“吾者野人”结下深仇大恨，在“吾者野人”强大的攻势下，其子率部迁至图们江外居住。洪武五年（1372），宿敌兀狄哈达乙麻赤再次进袭，迫使猛哥帖木儿率部众逃到图们江南岸的阿木河地区。元末，天下糜烂，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之时，辽东地区自然也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局面，由于元朝同高丽的特殊关系，故而有相当多的高丽人定居辽东，随着大元衰落，高丽甚至还曾一度控制辽东。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真万户选择内附高丽，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自然也是其一，其曾追随时为高丽大将、后来的朝鲜太祖李成桂。李成桂在立国之后，曾授猛哥帖木儿为 “上万户”，朝鲜太宗李芳远还授其上将军之职。

随着阿哈出、猛哥帖木儿等人的入明朝见，女真诸首领归附之人也越来越多。明朝遂以“众建之而分其力”的办法，陆续设置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七地面、七站、一寨。此外，大明帝国还先后将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的汤女真人（元代称为胡里改、斡朵里万户部）依据原渤海国建州的地名，设置了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总称“建州三卫”，并委任各部首领，依照旧俗，各统其属。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是，建州卫建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以胡里改部属地

设置，以胡里改部首领火儿阿万户阿哈出（赐名李承善）为指挥使。建州卫设立后，李氏朝鲜认为这是明朝扼制其向北发展，为了抵制女真人归明，关闭庆源集市贸易，引起女真人愤怨。永乐四年，女真人甚至“入庆源界抄掠”，结果被击退。数月后，阿哈出率部众西南徙至回波江流域的凤州。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毛怜卫的居民。猛哥帖木儿所统的斡朵里部人与胡里改部为婚，两部关系密切。所以猛哥帖木儿当因在“庚寅事变”中参与“寇庆源府”，畏朝鲜卷土来攻，亦于永乐九年率部众迁到凤州地面，住在从凤州通往开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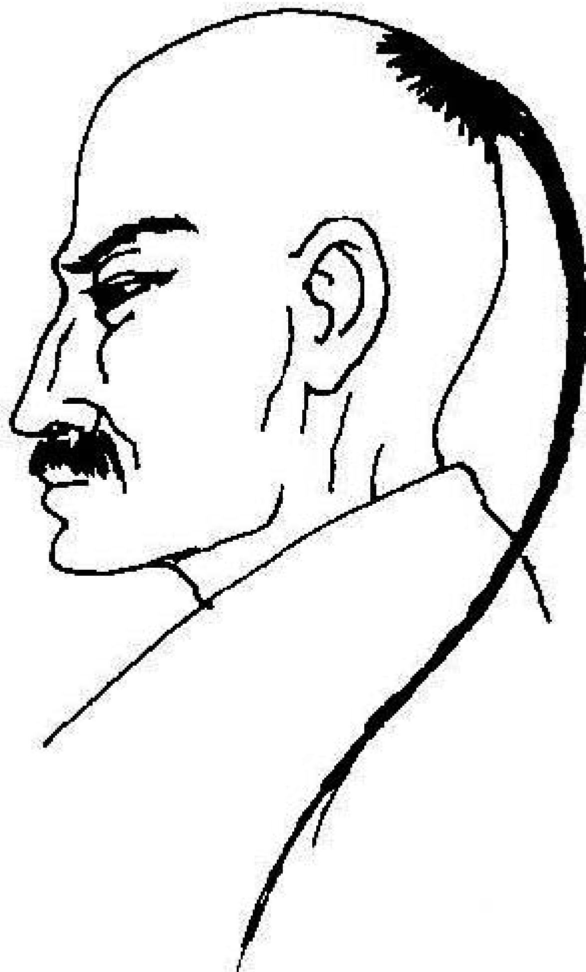
此后，成祖皇帝授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同时以依附于胡里改部的斡朵里部建立建州左卫。永乐十四年，大明帝国正式设建州左卫于凤州，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永乐二十二年，与建州卫迁往婆猪江的同时，猛哥贴木儿率部众迁回朝鲜境内阿木河旧居地。

永乐二十一年，时建州卫首领为阿哈出之孙李满住，其率“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宣德七年，猛哥帖木儿向明钦差谈及，他的“族亲在婆猪江等处”。次年，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和其长子阿古率部配合明辽东都指挥裴俊前往斡木河，去接回被忽刺温女真杨木答兀从开原掳掠的人口。冲突中，杀死“野人”头目阿答兀。同年闰八月，原为安乐州千户的杨木答兀，“纠合各处野人约八百余名人马”，袭击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及长子阿古等人均被害，次子董山被俘，房屋被烧毁，弟凡察等“俱各失所”。此外，阿古的妻子和弟弟充善也被杨木答兀掠去，后经毛怜卫指挥哈儿秃赎回。阿古之妻后生一遗腹子，改嫁建州卫的李满住。

此事发生后，朝鲜借机派兵进驻阿木河地区。凡察向大明求救，结果大明只下诏令“野人”放还董山，却不发兵问罪。凡察在归途中往会李满住，满住力劝凡察迁来同住。

董山被放回后，与叔凡察讨论今后大计，都有南迁之意，遂于正统五年，不顾朝鲜兵的阻截，率百余户迁到婆猪江流域，与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满住会合，住在三土河、婆猪江以西至冬古河（即董鄂河，今大雅儿浒河）地区。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东毛怜的部民。

凡察、董山迁到婆猪江流域后，明英宗正统七年，因为发生建州左卫“卫印之争”，明帝国为了平息纷争，析建州左卫为左、右二卫，以董山为猛哥帖木儿正嫡，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自此，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州三卫”。



建州女真的发型

三卫的首领多由世袭产生，但须经大明帝国认可后方生效，并且须按规定前往京师北京朝贡。建州三卫的统治范围大致上由东北至图们江流域、东南至鸭绿江、西至开原及辽东边墙一带，朝廷还在此之上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诸卫所，前期由海西女真人、内官亦失哈担任镇守太监经略该地区，后因长期弃置，而于宣德九年（1434）正式裁撤。辽东的女真人改属辽东都司的统辖。关于建州三卫，据朝鲜史籍在明景泰二年的记载，时有1700余户，左、右二卫合计600余户，共计2300余户，显然以建州卫人户数最多。

不过由于大明帝国“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董山的左卫很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开始发展起来的建州女真也开始不再安分，他们

与李氏朝鲜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双方摩擦不断。《明史·朝鲜传》就有记载：“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

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对明朝进攻，在土木堡击败明军，俘获亲征的明英宗，一时间举国大震。一些建州和海西的卫所趁机向辽东进攻以配合也先进犯大明帝国，当然了，也有为数不少的女真卫所遭到了也先的攻击，许多女真世袭首领因遭到也先所部劫掠而失去了世袭的凭证，他们后来只能以中书舍人的名义进行朝贡，可获得的赏赐比之前少了很多。

“土木堡之变”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大明对女真的威信开始衰落，女真诸部逐渐失去控制。一些首领甚至敢于公然向明朝挑战，劫掠辽东地区。所谓“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惑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诏谕。稍归所掠。复款关”，又有“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的记载。

而建州左卫在董山的统领下，更是屡次犯边抢掠，以至于渐渐成为明廷辽东的最大边患。成化三年（1467），明廷对建州三卫女真各部下谕招抚，命三卫部众各守地方，不许越边。董山等人在接受明廷招抚后，于同年八月，进京朝贡。史载董山等人此次入京朝贡，出语不顺，在朝廷赐宴时口出不敬，指桑骂槐，抢厨人铜牌，并索要蟒衣、玉带、金帽之类，朝廷逐一答应。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然而，当辽东传来边报“女直侵寇，依然不止” 时，宪宗皇帝大怒，下令将之押解出边，并遣返建州。董山历来桀骜不驯，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于是当被押解到广宁时，董山意欲逃跑，结果被明军所杀。

很显然，董山虽然被诛，但他的这一行为惹怒了大明帝国。九月，朝廷下令，派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同时，命令李氏朝鲜派军，全力配合明军进剿。在这场史称“成化之役”中，建州女真人蒙受了灭顶之灾，左卫的建州老营被付之一炬，庐舍无存，部众尸横遍野。右卫也遭受重大损失。

史载，在这次征讨中，受明廷调遣的朝鲜大军由主帅弼商指挥，以精兵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分道扑向建州卫所在地婆猪江两岸与吾尔府等处。朝鲜大军所过之处，焚烧村寨，捣荡屯落，遇青壮而杀，逢老幼而俘。朝鲜军大将鱼有诏率军攻破李满住父子据守的山寨后，大肆斩杀，李满住中箭后被鱼有诏所杀，其子李古纳哈也死于乱军之中。攻克李满住父子所居山寨后，鱼有诏令军士于寨中大树上，刮皮刻写了“朝鲜主将康纯、大将鱼有诏等灭建州卫兀弥府诸寨，捣荡屯落而还”的字

迹。随后押解俘获的建州卫人畜而返。朝鲜军马撤退后，明军才赶到建州卫属地，见到了鱼有诏命人刻写在树干上的字迹，将此报告于明廷。而鱼有诏因为剿杀李满住父子及部众的功绩，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嘉奖，“赐银五十两，缎绢各四疋”。

“成化之役”后，建州女真尽管元气大伤，但依然继续发展，至正德年间，女真人已大致形成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分。其中建州同海西从牡丹江流域逐渐南迁至辽东一带，并定居于此。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嗣，所以由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寻找皇位继承人，而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上推至武宗父明孝宗一辈，孝宗两名兄长皆早逝无子嗣，四弟兴王朱祐杬虽已死，但有二子，兴王长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次子朱厚熜为嗣，即明世宗。

史载，在武宗逝世前五天，杨廷和就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而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又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此后，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前往北京。

在朱厚熜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改元嘉靖。

即位不久后，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祔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结束。令人感到寻味的是，“大礼议之争”，最终是皇帝迫使拥立自己登基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致仕，而自己大权独揽。

其实，嘉靖帝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主要还是为了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当时大明帝国自从宣德时期，最高的权力就形成了三角体制，皇权之下还

有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特别是文官集团，随着内阁制度的成熟，不但话语权越来越大而且对皇权形成制约，而宦官的势力也是水涨船高，打击了杨廷和为首的文官势力，使得个皇帝能够迅速掌握权力，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嘉靖帝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使内阁权力提升，但纵观嘉靖一朝，几任内阁首辅都被皇帝牢牢地捏在手里。此外，这位天子还善于调解朝廷中的各方势力，并根据自身的利益平衡朝内党争。

继而，皇帝又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正如河南道御史刘安所说那样："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 而张居正更是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尤为近古。"

此外，他还打压宦官集团，严禁宦官干政，削弱司礼监实权，使其形成摆设，各地镇守太监也被召回裁撤。隆庆二年（1568），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所革除的担任"镇守中官"的太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言道："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此外，嘉靖帝还下诏永远废除外戚世封制，《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熜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可以说，在嘉靖帝执政的前半段，是明朝极其繁荣的时代之一，国家财政稳定，储备充足，商品经济发达，每年富余白银就多达500多万两，粮草够支用十余年，民间经济也富庶起来，东南商品经济更是蓬勃发展。

不过在嘉靖后期，正如海瑞于嘉靖四十五年上奏所说的那样，"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如当年的唐玄宗"开元之治"后一样，嘉靖帝也开始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肆兴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史载世宗好房中术秘方，多采处女之经血炼丹，方士陶仲文与佞臣顾可学、盛端明等进献媚药得以幸进。因为苛虐宫女，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

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皇帝几死于宫女之手。

此外，首辅严嵩专国20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炼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农民起义，如山东矿工起义、陈卿起义、蔡伯贯起义、浙赣矿工起义、李亚元起义、赖清规起义，边事废弛，大同兵变、辽东兵变、振武营兵变等接连不断。加之北方的鞑靼俺答汗寇边、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南倭北虏”之患让大明朝几乎是不得安宁。

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初一，查理边储户科右给事中魏元吉等，劾奏诸边臣侵冒不职。皇帝降旨：近年边粮给发数多，管粮官任意侵费，以致钱粮亏折。原任管粮郎中高光、主事刘崇文俱革职，逮京问罪；原任蓟州巡抚佥都御史马九德，保定巡抚副都御史艾希淳革职闲住；密云原任管粮主事马濂降一级调外；原任管粮郎中等官董策、曹麟、王守志、王汇征、王霁、李侨、张邦彦、丘纬、继璿、冀练、李郁、张峰、胡志和、刘鲁生等各降二级；蓟州兵备副使伊介夫、张子顺、杨胤贤等各夺俸三月。

同年，巡抚辽东都御史候汝谅因辽东大饥，议开山东登莱及天津二海道，运粮入辽东。并进呈所勘天津入辽路线：自海口发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200里。其中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坟、桃花岛均可停泊，相距不过四五十里，可免风波、盗贼之虑。请动支辽东本镇赈济银5000两，造船200艘，每艘可装运150石，委官督发至天津通河等处，招商贩运，并令彼此监督，不许夹带私货。经户部复议，除开登莱海道一事容后另议外，其余皆予以同意。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行海运，转粮入辽东。

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的赫图阿拉城。虽然努尔哈赤祖上为元朝时期的斡朵里万户、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的猛哥帖木儿，但那只是祖上的荣光。努尔哈赤出生之时，建州左卫已四分五裂，互不统属。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被明朝授予都指挥使，他与兄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弟包朗阿、宝实以及长子礼敦等凭借宗族之力，一度占据了五岭以东、苏克苏浒河以西200余里之地。觉昌安与兄弟合称“六贝勒”，一时称雄。不过由于临近地区适逢董鄂部强盛，与“六贝勒”发生摩擦不断，而“六贝勒”不敌之下，不得不遂向海西女真哈达万汗王台借兵，当时的海西女真诸部实力最强盛，而觉昌安等也与哈达万汗王台是有联姻关系的。最终，“六贝勒”与海西女真联兵重创董鄂部，但“六贝勒”亦实力大损，以至于一度不振。

努尔哈赤的父亲是觉昌安的第四子塔克世，其母为喜塔腊氏，还育有同母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和一个妹妹。喜塔腊氏在努尔哈赤十岁时去世，继母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其很刻薄。努尔哈赤19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仅获得少量家产。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捡木耳等方式为生。他常至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习得蒙古语，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努尔哈赤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自谓有谋略。据一些史集记载，努尔哈赤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侍从。

在当时的建州诸部中，当属王杲实力最强，此人自嘉靖年间起任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算起来是努尔哈赤的外曾祖父。史载王杲生来聪黠，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其精于占卜之术。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王杲偷袭抚顺，杀死守备彭文洙，并进行劫掠。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副总兵黑春统军清剿王杲，结果却被王杲设伏生擒后磔死。随后，王杲攻略辽阳、孤山、抚顺、汤站等地，先后杀死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十数员边将。同期，哈达贝勒王台逐渐势大，与王杲亦多有摩擦，后来二者盟于抚顺关下，才使得彼此的冲突告一段落。

由于王杲屡杀大明官员，于是明廷方面断绝了与其的贡市。万历二年（1574），王杲以明廷绝贡赋导致部属坐困为由纠集土默特、泰宁诸部，大举进兵辽阳、沈阳，被辽东总兵李成梁击败，被斩首一千余级。王杲不敢北逃，只得借道哈达，结果却被王台所缚，献予明廷。明神宗亲至午门城楼接受献俘。次年（1575），王杲被磔于北京。其妻子儿女27人被王台所得。

史载，也就是万历二年（1574）王杲大举犯扰辽阳、沈阳，并导致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城时，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并为李成梁收留，继而充当仆役的。也许跟着李成梁时，努尔哈赤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史载李成梁颇有将才，其镇守辽东30年，虽然因位望益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最终导致万历三十六年（1608）被劾罢，但从此人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来看，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明史》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还有“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这样的记载。

王杲虽然被杀，但其子阿台却逃脱，他回到古勒城，以求东山再起，伺机复仇。万历十年（1582）九月，为彻底断绝后患，辽东总兵李成梁以“阿台未擒，终

为祸本”为由督兵攻打阿台之古勒城，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并借机壮大本部势力，便跟随其出征古勒城。古勒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阿台力战，李成梁久攻难下。于是尼堪外兰设计，出面诱骗古勒城守军投降。他谎称只要阿台肯投降就可以免死。在阿台放松警惕之时，李成梁趁机攻克古勒城。明军进城后对古勒城进行了屠城。由于阿台之妻为努尔哈赤大伯礼敦之女，为使其免受兵灾，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在城中对阿台进行劝降，却一同被明兵杀死于乱军之中。

据传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两兄弟在败兵之间，李成梁之妻偷偷将二人放走，此后努尔哈赤等投奔叶赫部，贝勒清佳砮礼遇之，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并派兵护送其回赫图阿拉。

在归途中，努尔哈赤遇额亦都等九人，将其收入帐下。回到自己的部落后，努尔哈赤上书质询大明为何杀其父祖，对此，明廷遣使表示这是误杀，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大明帝国还同时授予努尔哈赤敕书30道、马30匹和都督敕书。于是努尔哈赤得以重新收整旧部。这期间，叶赫部给予了努尔哈赤很大的帮助。

史载，当时属于海西四部之一，由先祖为蒙古土默特氏的叶赫那拉家族所掌控。传至贝勒杨吉砮和清佳砮这代，叶赫部他们吞并、安抚邻近诸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一度称雄于女真各部，此外他们还凭借险要的地势修筑了两座城池，二城相距数里。清佳砮居西城，杨吉砮居东城，二者同为叶赫贝勒。

当初清佳砮兄弟初露锋芒之时，正逢哈达万汗王台势力强盛。王台因受宠于明，而得以称霸女真诸部。清佳砮兄弟事奉王台至诚，还将其妹温姐嫁给王台以取悦之。在得到王台这个靠山之后，清佳砮兄弟才得以借势称雄，甚至几次联合建州王杲劫掠明边，而后来大明讨伐王杲时，之所以清佳砮、杨吉砮能够逃脱制裁，只因王台的包庇。

不过对于清佳砮兄弟来说，哈达部却是与他们有杀祖之仇，他们的祖父、曾经的叶赫部首领褚孔格多次反叛明朝，正是哈达部的首领旺济外兰帮助大明征讨并杀了褚孔格，并夺了原先明廷赐给褚孔格的敕书700道和所属山寨。嘉靖三十一年（1552），旺济外兰又被叛乱的部人所杀，其子博尔坤舍为报杀父之仇，迎堂兄王台于绥哈城回来管理哈达部。王台善于用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征服邻部女真人，哈达部势力强盛，于是以哈达为国（“国”是女真各族内部称呼，对明朝不称国，其实一国就是一部落），称汗。

清佳砮兄弟始终铭记祖父褚孔格之仇，故而内心仍然怨恨王台。王台晚年时期，哈达国势渐衰，叶赫联合哈屯首领恍惚太，趁机收复故地季勒诸寨。王台长子扈尔干部下白虎赤等先后叛变哈达，归附叶赫。叶赫势力逐渐强盛，王台以此忧愤而死。王台死后，诸子内争，庶子康古鲁争位失败，投靠清佳砮，清佳砮将女儿嫁给他，以离间王台子孙使其自相残杀。

万历十一年（1583），清佳砮兄弟率领哈达叛将白虎赤，再加上暖兔、恍惚太所部万余骑，袭击孟格布禄，斩首300级、掠甲胄150件；又借得猛骨太、那木塞所部兵马，焚毁孟格布禄所属室庐、蹦毁田地庄稼。明廷一方面犒劳叶赫；另一方面诏谕罢兵，希望到此为止。清佳砮兄弟不同意，并坚持要吞并哈达才罢。于是，再度焚毁孟格布禄及其兄长所分庄园各十座，岱善所属庄园一座。随后，又以恍惚太二千铁骑开赴广顺关，攻下沙大高寨，俘虏300人，用兵要挟以获得贡敕。

万历十二年（1584），鉴于这种形势，加上哈达之要求，巡抚李松与总兵李成梁谋划诛杀清佳砮兄弟。李成梁将清佳砮兄弟召至“市圈”，假意“赐敕赏赉”，实则设有伏兵。清佳砮兄弟不知是计，只带300余骑入圈。李成梁一声令下，圈门关闭、信炮轰鸣、伏兵四起，一片厮杀，清佳砮、杨吉砮、白虎赤、清佳砮之子兀孙孛罗、杨吉砮之子哈儿哈麻及所从部下311人全部被杀。清佳砮兄弟死后，清佳砮子布寨、杨吉砮子纳林布禄共继贝勒位。

而也就在同一年五月，努尔哈赤借报祖、父之仇为名，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率兵百余人，向尼堪外兰所在图伦城发动进攻。长期以来，努尔哈赤都想要报祖、父之仇，他曾要求大明交出尼堪外兰，但有意扶植尼堪外兰为建州之主的大明却予以拒绝。当时努尔哈赤的实力远远不足以与明朝抗衡，于是他只得试图将对尼堪外兰不满之人拉拢到自己一边，他与苏克素浒河部萨尔浒城主卦喇之弟诺米纳、努尔哈赤的妹夫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瑚、沾河寨城主常书、扬书兄弟会盟，共同对抗尼堪外兰。

“兵不满百，甲仅十三”这就是当时努尔哈赤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自然没有什么人拥护他了。当他对图伦城发起进攻的时候，居然仅常书、扬书兄弟依约前来。然而当努尔哈赤带人攻至图伦城时，发现尼堪外兰早已携家属逃至甲板，努尔哈赤得胜而归。史载，此役为努尔哈赤人生中之首战。当年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板城。然而，先前背盟的萨尔浒城主诺米纳见尼堪外兰有大明做靠山，势力较强，便偷偷地给尼堪外兰泄露了消息，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抚顺附近的鹅尔浑城。史

载“阴助尼堪外兰，漏师期，尼堪外兰得遁去”。努尔哈赤再度扑空，遂收尼堪外兰部众后而还。

诺米纳的背盟和背叛，使努尔哈赤怀恨在心。因为实力不足，努尔哈赤没有发难，而是暗自定下破诺米纳、取萨尔浒之计。

时值诺米纳、鼐喀达派人来约，会攻浑河部巴尔达城。努尔哈赤佯同诺米纳等约盟，合兵攻巴尔达城。临战时，他要诺米纳先攻，诺米纳不从。这时，努尔哈赤便使用预定之计，轻而易举地除掉了诺米纳。据记载，努尔哈赤说：“尔既不攻，可将盔甲、器械与我兵攻之。”诺米纳不识其计，将器械尽付之。兵器既得，于是执诺米纳、鼐喀达杀之，遂取萨尔浒城而回。

努尔哈赤虽杀了诺米纳，但对他的部民不加伤害，让他们照旧住在萨尔浒城，并修整城栅。此后努尔哈赤势力渐强，威信日增。

次年（1585），由于担心努尔哈赤的起兵会招惹来大明朝的讨伐，对其宗族不利，努尔哈赤的大祖德世库、二祖刘阐、三祖索长阿、六祖宝实的子孙同誓于庙，预谋杀害努尔哈赤。据记载，该年正月，宝实之子康嘉、绰奇塔、觉善等共同谋划，以族人兆佳城主理岱为首，继而联合哈达，一举劫掠努尔哈赤属下的瑚齐寨。努尔哈赤得知族叔引兵来犯后，并没有直接去救援瑚齐寨，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直取理岱的兆佳城，从而迫使理岱不得不回救。攻城之际，大雪纷飞，有部属以天气加之理岱已入城回防为由劝努尔哈赤回兵，但努尔哈赤志在必得，率军继续猛攻，额亦都作战勇猛，率先登城，理岱等城陷被俘。

此外，努尔哈赤的三祖索长阿之子龙敦，也试图谋害努尔哈赤。当初正是他挑拨诺米纳背盟，而后又唆使努尔哈赤继母之弟萨木占将努尔哈赤部属噶哈善哈思瑚计杀，甚至就连努尔哈赤本人也遭到他的多次暗杀，只是未遂。考虑到自身的实力有限，努尔哈赤不愿过多树敌，故而数次隐忍。

这一年六月，努尔哈赤借口为噶哈善哈思瑚报仇，亲自统兵400，攻打萨木占、纳木占、讷申、完济汉等把守的玛尔墩城。由于玛尔墩城是一座山城，三面为峭壁，故而难以攻克。双方战至第四天，努尔哈赤趁城中缺水，而城中守军因为干渴而疲惫不堪之际，令手下大将安费扬古从峭壁攀岩而上，一举攻克玛尔墩城。此战，除讷申逃脱外，萨木占等均为努尔哈赤所杀。

同年九月，当董鄂部内乱之时，努尔哈赤又统兵500，攻其部长阿海所驻的齐吉答城，阿海闻讯后，聚兵400死守。面对坚城，努尔哈赤没有盲目进攻，而是采

用火攻之策，焚烧城楼以及城外庐舍。眼看着城池将陷，忽然天降大雪，努尔哈赤不得不班师回城。还师途中，努尔哈赤心有不甘，又向翁科洛城发起了进攻，仍采用火攻之策。激战之中，努尔哈赤还一度亲自登上房舍向城内射箭，结果却被对方的神箭手鄂尔果尼、洛科接连射中，尤其洛科之箭正中其颈部。努尔哈赤血流不止，几度昏厥。眼看主将受伤，努尔哈赤所部只能撤退。努尔哈赤伤愈后，再攻翁科洛城，城陷后俘获鄂尔果尼、洛科，众将建议将二人杀之以报一箭之仇，但努尔哈赤有感于二人之勇敢，不仅没杀，还将之纳入麾下、授以牛录额真之职。

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此战，努尔哈赤以披甲兵25、士卒50攻打哲陈部界凡城，但因对手准备充分，努尔哈赤无所斩获。当回师至界凡南部太兰冈之时，界凡、萨尔浒、东佳、巴尔达四城之主率400之众，追赶而来。玛尔墩城之战的败军之将、界凡城主讷申、巴穆尼等率先而来，结果讷申被努尔哈赤斩杀，巴穆尼则被箭矢射杀。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再率众征哲陈部，途中遇界凡等五城联军800。此战，努尔哈赤与其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兀凌噶4人率众冲突，五城之众畏于努尔哈赤一方之勇猛，竟纷纷溃逃。努尔哈赤追至吉林崖，大获全胜。

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努尔哈赤获悉仇人尼堪外兰居住在浑河部的鹅尔浑城后，率兵星夜兼程赶往该地，攻克该城后并未发现尼堪外兰。努尔哈赤登城瞭望，发现向城外逃窜之40人中有一人疑似为尼堪外兰。遂领兵去追，射杀溃卒8名，尼堪外兰趁乱逃往抚顺。在回到鹅尔浑城后，努尔哈赤得知尼堪外兰已经被抚顺的明军保护起来后，大怒，竟将城内19名汉人斩杀，其余被俘虏的6名受箭伤之汉人则被重新将箭插入伤口，并令他们去向明朝边官报信，以索要尼堪外兰。

明将见努尔哈赤逐渐势大，而尼堪外兰已毫无利用价值，于是不再对其进行庇护。此后，努尔哈赤命斋萨等40人前去取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见之欲躲，却已无退路，被斋萨等人当场斩杀。

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再攻哲陈部山寨，杀寨主阿尔，又派额亦都攻打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因涨潮无法过，额亦都以绳将士兵相互连接，鱼贯而渡。渡河后，额亦都夜袭巴尔达城，守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额亦都则率领兵士奋勇登城。此战额亦都身中创伤50多处，依然不退，最后一鼓作气攻克巴尔达城。因此战之功，额亦都获赐“巴图鲁”勇号。随后努尔哈赤领兵攻打洞城，城主扎海投降。至此，哲陈部完全被努尔哈赤吞并。

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尔汉率三部军民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声势大震。努尔哈赤厚待来投之诸部首领，以索尔果之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将长女许配给何和礼，并收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后来，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与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之时的麾下猛将额亦都、安费扬古并称“五大臣”，成为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其后，努尔哈赤再战兆佳城，斩城主宁古亲章京。同年，努尔哈赤攻克王甲城，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前后共历时五年，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

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与嘉哈河、硕里加河之间的天然地势之处建造了费阿拉山城，此城有栅城、外城、内城三重。其后，努尔哈赤宣布制定国政、法令，自称“女真国聪睿贝勒”。此时，努尔哈赤已由起兵时微不足道的“十三副遗甲”、数十人，发展为1.5万余部属的强大势力。

应该说，虽然努尔哈赤崛起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来自其自身，但李成梁的纵容也是成就努尔哈赤统一建州的重要原因。当初努尔哈赤以报父祖被杀之仇起兵，但对大明却表现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样子，使得李成梁误以为努尔哈赤可为大明所用，而且终究成不了气候，甚至只要努尔哈赤对明廷表忠，李成梁即“保奏给官”，甚至“弃地以饵之”，也因此被宋一韩、熊廷弼等廷臣所参劾。而对此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曾说过“其（努尔哈赤）志不在小，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渠多送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亮奏闻奖许。驯至桀骜云耳”。当然了，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的这几年内，李成梁把辽东重兵集中用于对付海西女真和北元势力，大败二者，使得海西女真叶赫、哈达等部连遭三次重创，叶赫贝勒杨吉砮、清佳砮均被杀， 也使得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的时候，没有什么外部干扰，最重要的是，李成梁攻打辽东蒙古诸部，连获大捷十次，斩首五六千级，但辽东明军亦损失严重，这些都为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减少了麻烦。

还有就是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统领其属下大名入侵李氏朝鲜，数月内席卷朝鲜全境。朝鲜向宗主国大明求援，大明遂派援兵入朝。在当时，努尔哈赤认为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必犯建州，于是上书明兵部尚书石星，请求出兵入朝援助，朝鲜宰臣柳成龙等认为此举会引狼入室，故而努尔哈赤的入朝请求未获允许，在万历援朝之战的这六年间，辽东兵力空虚，也客观上给努尔哈赤吞并

女真诸部提供了机会。

当初，努尔哈赤以微弱之力起家，故素来被自认为“世积威名”的海西众贝勒所轻视。但随着努尔哈赤一统建州、逐渐势大，终于引起了海西女真的不安。哈达贝勒扈尔干、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等试图以联姻结亲的方式对努尔哈赤进行拉拢。随后，以纳林布禄为首的海西诸部数次对努尔哈赤进行勒索，企图胁迫其割地以限制建州之扩张，于是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由此交恶。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叶赫纠结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之兵去劫建州户布察寨。努尔哈赤闻讯率兵前来，追至哈达领地富尔佳齐寨时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统领的哈达兵相遇。双方爆发冲突，面对努尔哈赤的弱小兵马，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之兵竟不能取胜。于是，海西贝勒贵族们自然不能容忍了。当年九月，以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为盟主，联合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泰以及其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以及锡伯、卦尔察、长白山女真朱舍里、讷殷等共九部联军三万人向建州进发。

史载，努尔哈赤获悉后，根据地形布置滚木礌石等防御工事后就寝入睡。其妻富察氏以为其恐惧乱了方寸，将其推醒。努尔哈赤表示，“人有所惧，虽寝，不成寐；我果惧，安能酣寝？前闻叶赫兵三路来侵，因无期，时以为念。既至，吾安心矣……”之后，努尔哈赤安寝如故。

次日，努尔哈赤派出武理堪前去侦查，擒获叶赫一卒。经讯问得知来犯之敌有3万之众。三倍于己的兵力使建州上下闻之色变。但努尔哈赤认为，对方人马虽众，但是首领甚多，调度杂乱不一，只要伤其头目一二人，便可将其击溃。此后，果然如此，九部联军先后围攻扎喀城、黑济格城，均不克。此后努尔哈赤派大将额亦都率领精骑数百人引诱叶赫军至古勒山以解城之围，又令建州军在古勒山做好伏击准备。布寨和纳林布禄不知是计，追击佯装败逃的额亦都来到古勒山后中伏。布寨被滚木绊倒于马下，建州士兵吴谈趁机将其杀死、纳林布禄见其兄战死，竟昏倒于地，叶赫兵因此陷入混乱之中，众人收起布寨的尸体，救起纳林布禄，夺路而逃。其他贝勒、台吉见布寨、纳林布禄一死一逃，士气涣散，也纷纷溃退。科尔沁贝勒明安的马失陷于阵，慌乱之中竟然改骑一匹无鞍裸马狼狈狂奔。随后，建州军从山上一拥而下，趁势掩杀，一举击溃九部联军，就连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也被生擒。建州军一路追击至百余里之外的辉发部境内。至天黑，努尔哈赤方收兵回城。

九部联军的惨败彻底改变了建州和海西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战努尔哈赤一战成名。史载“军威大震，远迩慑服”，大明也发来诏书，封其为左都督、龙虎将军，而努尔哈赤则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同年，努尔哈赤以古勒山大胜之余威消灭了参与九部联军的讷殷路。他命额亦都、噶盖等三将率兵攻打讷殷驻地佛多和山城，斩路长搜稳塞克什，又顺势征服了珠舍里部，再加上早前已经征服的鸭绿江部，努尔哈赤又完全将长白山女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至此，努尔哈赤起兵十年，“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

此后，努尔哈赤开始征讨最为强大的哈达部。所谓哈达部，因居所在哈达河流域而得名，其地东临辉发、西抵开原、南靠建州、北接叶赫，在海西女真诸部中方位偏南，因从广顺关入明朝进贡而被称作“南关”。哈达在万汗王台为国主时期曾一度为女真各部之霸主。而王台也曾被明朝册封为右柱国、龙虎将军，封其二子为都督佥事，又赐大红狮子纻衣一袭，深获倚重。其实长期以来，王台有意一统女真诸部，均因为明朝既定的“分而治之”之策而不受支持。史载，王台晚年昏庸，追求享乐、偏信谗言，导致部属叛离，最终他病死于努尔哈赤起兵前十个月。而王台死后，对于女真各部的影响是巨大的。

王台死后，二子争位，哈达陷入混乱，至其幼子孟格布禄即位时，哈达接连遭到明朝、叶赫的打击而走向衰落。努尔哈赤也想谋求哈达部，但他并没有出兵，而是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并优待哈达来投之众。古勒山之战后，叶赫希望一统海西，遂出兵哈达，由于抵挡不住，孟格布禄便以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人质，向努尔哈赤求援，于是努尔哈赤派费英东和噶盖率兵两千进驻哈达。叶赫见此，又不愿哈达投向建州，便设计挑唆孟格布禄擒建州来援的费英东和噶盖二将为人质，尽诛其人马，再赎回在建州做人质的三个儿子，并许以孟格布禄所求之女，以便于两家结盟。对于这个建议，孟格布禄应允了，然而，没等行事，便机密泄露，努尔哈赤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出征哈达。

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努尔哈赤统兵攻打哈达，其弟舒尔哈齐自请为先锋，率一千兵为前部，直抵城下。然而，舒尔哈齐见哈达所部的城池坚固，人马众多，按兵不战。努尔哈赤来到之后，怒道：“此来岂为城中无备耶？”话毕，亲自率兵攻城。据史料记载，城中射矢投石，建州兵死伤甚多，经过六昼夜围攻，才将哈达城攻陷，孟格布禄也被生擒。

此后，努尔哈赤将哈达所属城寨全部招服，秋毫无犯，尽徙其部众返回建州。

而孟格布禄则被带回建州，起初，努尔哈赤对其礼遇，不久即以谋逆为借口将其诛杀。

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遣使责令努尔哈赤，为何出兵哈达所部，努尔哈赤迫于情势，将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代，但仍将其软禁于建州。此后，在大明要求送吴尔古代回哈达时，他又不敢不从，只得护送吴尔古代返回哈达为贝勒。但也就在这一年，哈达爆发大饥荒，吴尔古代不支，又向明朝求粮未果，只得求援于努尔哈赤。结果粮食没有求来，反而被努尔哈赤趁机彻底吞并。至此，哈达正式灭亡。哈达的灭亡导致明朝失去其南关，此外，海西女真之地也由此打开一个缺口。《明实录》对此评价道“（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

按照记载，努尔哈赤收哈达人马编入建州户口，创建四旗，于两年后迁至赫图阿拉并修扩城池，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此后，努尔哈赤开始攻打辉发部。辉发东南两面与建州相邻、西接哈达、北与乌拉接壤。哈达灭亡后，辉发遂处于被建州三面包围之势。

史载，辉发部原居于黑龙江流域，属尼玛察部，后迁徙至松花江支流辉发河，因地得名，其统治家族本姓益克得里，后改那拉。传至王机褚时，招抚邻近诸部逐渐强大，始称国主。王机褚在辉发河畔扈尔奇山上筑城。该城有三重，凭险要地势而造，以坚固异常闻名。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汗土蛮曾经亲自率军攻打扈尔奇山城，但面对坚城，却是无功而返。王机褚死后，由于其长子先死，长子之子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导致众叛亲离，其堂兄弟和部属纷纷逃至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处避难。拜音达里遂将自己属下七员大将之子送至建州做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助其稳定局势。于是努尔哈赤派兵千人镇压叛乱者，并安抚企图叛乱的部众。不过，拜音达里害怕与建州来往过于密切得罪叶赫，并非真心想同建州结盟。于是不久，叶赫以送还其部属为条件，要求拜音达里取回人质，与建州解除同盟关系。拜音达里从之，但叶赫却没有如约归还其部众。拜音达里又转而向努尔哈赤赔罪，并求与建州结亲。亲事定下后，拜音达里又害怕叶赫怪罪，背约悔婚。拜音达里的这种摇摆于建州和叶赫之间的两面之策，终于给自己带来难以解决的麻烦。

万历三十五年（1607）九月，努尔哈赤以拜音达里两次“兵助叶赫”和“背约不娶”为由发兵攻打辉发。扈尔奇山城虽然坚固异常，但建州兵昼夜围攻，最后建州女真以惨重的损失，才得以攻入城中，拜音达里父子兵败被杀。其后建州屠其兵、迁其民而还，辉发灭亡。

就在努尔哈赤尽皆平灭各部的时候，建州却与乌拉部之间发生矛盾，以至于两者的同盟最终破裂，乌拉部首领为那拉氏，与哈达同祖。因定居于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而得名。从始祖纳齐布禄起，九传至贝勒满泰。而满泰曾参与古勒山之战，但大败而归，其弟布占泰被俘，被留居建州三年。后来，满泰被部民所杀，努尔哈赤扶植布占泰回乌拉继位。其间，布占泰之叔兴尼牙欲杀布占泰而夺位，布占泰依靠努尔哈赤的支持，方才将兴尼牙击败。长期以来，努尔哈赤为笼络布占泰，是做了不少努力的，五度与其联姻，七次结盟。然而，布占泰素有“悍勇无双”之名，并不服输，总希望东山再起，与建州、叶赫鼎足而立，于是他西联蒙古、南结叶赫，对建州形成夹击之势。按照《满文老档》记载的布占泰称汗一事，足以显示出他的野心，而他的这种野心，使得乌拉部与建州产生矛盾也在所难免。于是，在双方同盟6年后，冲突发生了。

万历三十五年（1607）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前来拜见努尔哈赤，述说其部在投奔乌拉后，屡次遭到布占泰的羞辱，希望可以归附建州。于是，努尔哈赤命令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三员大将率3000兵马即刻赶至蜚悠城收服部众。布占泰闻讯后，派其叔博克多率军万余前往阻挠。舒尔哈齐因与布占泰之姻亲关系，同部将常书、纳齐布止步于山上，按兵观望。时大雪纷飞，扈尔汉、扬古利分兵保护投奔之部民后，率200兵与乌拉军先锋在乌碣岩展开激战。随后褚英、代善各率兵500从两翼夹击，乌拉军大败，代善阵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副将常柱父子和胡里布兵败被俘。此役，建州军斩杀乌拉军3000余众，得马匹5000余、甲3000余，获得大胜。乌碣岩之战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乌拉的实力，而且也打通了建州通往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之路，但此战舒尔哈齐的按兵不动，却成为日后努尔哈赤与之决裂的导火索。

努尔哈赤曾将讨伐乌拉比喻成砍大树，不可能一刀而断。因此对付乌拉的策略是尽取其所属城郭，而孤立其都城。不久，褚英、代善等率5000兵再克乌拉之宜罕山城。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布占泰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属的虎尔哈路。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率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亲征乌拉，建州兵沿乌拉河南下，连克河西六城后，兵临乌拉城下。努尔哈赤命令建州军攻乌拉城北门，焚其粮，毁其城门。布占泰见势不妙，再度乞和。他乘独木舟至乌拉河中游向努尔哈赤叩首请罪、请求宽恕。努尔哈赤在痛斥布占泰的种种罪状后撤军返回建州。

努尔哈赤返回建州后，布占泰将怒火转移到了其两位妻子，努尔哈赤之女穆库什和努尔哈赤侄女额实泰等人身上，并将她们囚禁。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侄阿敏、大将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此战，建州军势如破竹，连下三城。对布占泰不满的贵族、乌拉孤立无援之部民均望风而降。最后仅剩布占泰率军三万驻守伏尔哈城，意图与努尔哈赤决战。双方在伏尔哈城下展开厮杀，乌拉大败，兵马十损六七，此后建州军一鼓作气直奔乌拉城，布占泰令次子达拉穆率兵驻防此处。安费扬古一面用云梯攻城、一面命士兵拿出准备好的土包抛向乌拉城下，所谓积土与墙平齐，随后建州军登城而入，布占泰见大势已去，麾下之兵已不满百，于是夺路而逃，但途中又被代善截击，于是布占泰仅以身免，单骑投叶赫而去。布占泰既走，建州兵迅速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努尔哈赤在平定乌拉之后，仅仅在乌拉城停留十天，将包括布占泰诸子在内的众乌拉降民编成万户一同带回建州，随后，他开始全面对叶赫部展开攻势。

叶赫部以叶赫河（今通河）而得名，因从镇北关入明朝贡，所以又称“北关”。叶赫东临辉发、西连蒙古、南靠哈达及明之开原、北则与乌拉相接，统治家族本姓蒙古土默特氏，灭扈伦那拉氏后改那拉氏，定居海西。叶赫属下有15部人马，以“勇猛、善骑射”著称。传至四世褚孔格为贝勒的时候，叶赫逐渐强大，因敕书数量分配之事常与哈达相互攻伐。在一次战斗中，褚孔格被哈达贝勒王忠所杀，叶赫遂与哈达结仇。到了褚孔格之孙杨吉砮、清佳砮为贝勒时，趁哈达内部混乱，对其发动袭击，报了杀祖之仇。但由于明朝支持哈达，杨吉砮、清佳砮不久即被李成梁计杀。清佳砮子布寨、杨吉砮子纳林布禄共继贝勒位。然而布寨、纳林布禄即位后继续对哈达发动进攻，又被李成梁使用炮兵攻至叶赫城中，布寨、纳林布禄乞和后作罢。此时正逢努尔哈赤刚刚崛起于建州，连遭重创的叶赫部希望在建州身上弥补损失，纠结九部联军发动古勒山之战，结果惨败，布寨被杀，纳林布禄不久亦忧愤而死。布寨之子布扬古、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继位后，一方面联合明朝、蒙古、乌拉共同对抗建州；另一方面与建州结亲修好以拖延时间恢复力量。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在吞并哈达、辉发的基础上再灭乌拉，乌拉贝勒布占泰单骑脱逃至叶赫。努尔哈赤三次向叶赫索要布占泰，均遭到拒绝，于是当年九月，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攻打叶赫。建州军连克吉当阿、兀苏、呀哈、黑儿苏等大小城寨19座，直逼叶赫东西二城。叶赫遂向明朝求援，明朝派游击马时

楠、周大歧领兵千人带火器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见叶赫有备，于是焚其庐舍，携带降民返回建州。当时，努尔哈赤尚不愿与明朝决裂，征讨叶赫前甚至曾试图寻求明朝支持，他提议将自己的儿子阿巴泰及其部属30余人送至明朝做人质，但遭到拒绝。于是，努尔哈赤暂时转向野人女真和蒙古草原方向。

当时在建州和海西女真之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还居住着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诸部。由于在崛起初期，因建州东西南北分别被李氏朝鲜、叶赫、大明、乌拉四面包围，故而努尔哈赤不便也不能轻易发动大规模长途奔袭战。此时的他仅在图们江流域对东海女真进行征讨，在迫使瓦尔喀、窝集等部臣服之后，努尔哈赤开始着重经营此处，一时间许多女真部落首领纷纷率部投靠建州。“乌碣岩之战”后，乌拉大败于努尔哈赤，等于使建州女真打开了一条从北方进入乌苏里江流域滨海地区的道路，努尔哈赤进而开始对黑龙江女真虎尔哈、萨哈连、萨尔哈察、使犬、使鹿、索伦等部进行多次征讨。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在对这些部落的征讨中，颇有斩获，而且他还对身为建州同族的野人女真十分重视，以抚为主。由于女真人生活的环境恶劣，故而部民多悍勇、健壮、耐饥寒、弓马娴熟，将招抚来的部民全部编入户口可以增强自身实力。对女真来投诸首领，努尔哈赤尽可能优待，譬如库尔喀部长郎柱率先归附努尔哈赤，其子扬古利招为额驸，后为大臣，以至于到后来，地位仅次于旗主贝勒和五大臣。此外。努尔哈赤对刚刚徙来的女真部民也在生活上给以帮助，不愿留在建州者，也发给财产令其返回，故而女真诸部仰慕而来者甚众。而对于反抗者，努尔哈赤则毫不留情地予以诛杀。于是在这种恩威并施之下，努尔哈赤渐渐控制了女真诸部。

在控制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譬如他决定创造女真人自己的文字，其实女真人在金朝时期曾依照契丹字创制女真文字，但因金国亡于元朝之后中原女真人高度汉化，而东北女真又受蒙古影响，导致女真文在明朝中后期彻底失传，以至于明末女真人“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崛起之后的努尔哈赤深感与明朝、朝鲜往来文书需要反复译写多有不便，于是指示其部下噶盖和学者额尔德尼二人创制文字来解决这一问题。起初二人以女真人早已习惯书写蒙古文为由表示不便制造新文字，努尔哈赤则以“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给予反驳，并提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后来，二人根据努尔哈赤之意创制而成并颁行，被后世称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此后再经达海于天聪年间彻底完善，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应该

说，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也为努尔哈赤开创自己的帝国奠定了基础。

其实，自从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在自己新筑费阿拉称贝勒，对部民颁行政令以来，他便一直开始谋求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但他深知实力尚不足以同大明对抗，于是接连表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而当时的大明朝已是糜烂不堪，神宗皇帝在位之初尚年幼，由李太后代为听政。李太后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首辅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外，还整饬吏治，任用贤臣，神宗皇帝在位头15年，国家收入大增，并能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史载，万历五年（1577），岁入435.94万余两，岁出349.42万余两。而皇帝亲政后，最初也是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此外，神宗还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则改革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1585）时，北京干旱，神宗更是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其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然而“万历中兴”只是帝国的回光返照，张居正死后，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神宗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10余年，最后索性30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庙、不朝。万历十七年（1589）起，神宗不再接见朝臣。

万历二十五年（1597），右副都御史谢杰上疏，称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并说“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然而皇帝并不以为然，神宗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内阁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皇帝依然不理，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120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又有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万历四十一年（1613），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一月时，更是“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只存四人，十三道只存五人”。

皇帝是“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而内阁则是“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朝政腐败，官将于边事多怀有息事宁人之心，行事敷衍欺骗，甚至有时杀良冒功，这显然也给了

努尔哈赤机会。

努尔哈赤将自己表现得极为恭顺，而大明也乐意倚为所用。譬如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十分重视努尔哈赤，当努尔哈赤以退地、镌盟、减夷、修贡等让步获得了李成梁的信任之后，李成梁居然认为此人可为我所用。譬如有木札河部首领克五十劫掠明朝城堡、杀其边将，明廷当即宣谕建州进剿，而努尔哈赤也即刻发兵杀之以献明廷。在获得了胜利之后，努尔哈赤常以战功一求官，而得李成梁等朝臣保奏后，他也的确是官运亨达，先后被封为升大都督、龙虎将军。而明廷居然认为努尔哈赤急切求官是慕化之心，譬如辽总督张国彦、顾养谦更对此乐观地表示努尔哈赤的强大对明朝有益，可以“因其势，用其强，加以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虽然有人认为纵容努尔哈赤是养虎为患，并因此数度弹劾李成梁，但显然并未获得明廷的足够重视。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成功蒙蔽，使得大明在30年来未对努尔哈赤的建州发动过一次进攻，而努尔哈赤也正是利用这一时期对女真诸部进行了蚕食。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的不臣之心也渐渐膨胀起来，当他的名号亦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至“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再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到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时，大明朝对努尔哈赤的勃勃野心依然浑然不察，甚至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努尔哈赤是“唯命是从”。

在建国之前，努尔哈赤做完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诛杀其子。其实长期以来，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之间都有争斗。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他需要强化内部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就必须搬开一切挡路石。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根据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出使建州的朝鲜使臣申忠一记载，舒尔哈齐“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银环、肤色与其兄一样”。自起兵之初，舒尔哈齐便一直是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甚至在大明官员的眼里，舒尔哈齐更是与努尔哈赤并列为建州酋首，舒尔哈齐还曾数次以建州卫都督、都指挥使的身份入京师朝贡。

按照朝鲜使臣申忠一的记载，自万历二十三年以来，舒尔哈齐的权力欲望就开始有所显露，当时努尔哈赤杀猪款待使者，舒尔哈齐则屠牛进行招待，而努尔哈赤对使者进行赏赐时，舒尔哈齐居然也要馈赠来使。此后，舒尔哈齐还对朝鲜使者力言，下次来使若赠其礼品，当与为其兄努尔哈赤所备之礼品相同。

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努尔哈赤发兵攻打哈达，舒尔哈齐为先锋，但在攻城时有退却之意，遭到努尔哈赤当众怒斥，造成二人裂痕加深。万历三十五年（1607），因舒尔哈齐在乌碣岩之战中作战不力，同部将常书、纳齐布止步于山上观望，按兵不动，努尔哈赤命将常书、纳齐布处死。舒尔哈齐因此与努尔哈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努尔哈赤做出让步，免去二将死罪，罚常书银百两，夺纳齐布属下牛录，且从此不再派遣舒尔哈齐领兵作战，实际上将其兵权削夺，舒尔哈齐因而常有怨言，认为生不如死。万历三十七年（1609），舒尔哈齐率部出走黑扯木计划自立门户，努尔哈赤发觉。他即刻派兵抓捕了舒尔哈齐及其三个儿子阿尔通阿、阿敏和札萨克图。此后，阿尔通阿、札萨克图、舒尔哈齐的部将武尔坤均被处死，而舒尔哈齐则被圈禁。两年后（1611），舒尔哈齐幽死于禁所，时年48岁。

而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在不久之后也倒霉了，褚英为努尔哈赤与元妃佟佳氏之子。万历二十九年（1598），年仅18岁的褚英首次出战，随军征安楚拉库路，此战有功，赐号洪巴图鲁。万历三十五年（1607），褚英在对乌拉部的乌碣岩之战、宜罕山城之战中接连立下大功，赐号广略贝勒，授命执掌国政。然而，由于褚英行事专断、操切，与决策层中的四大贝勒、五大臣产生了矛盾。为巩固自身权力，褚英计划削夺四大贝勒、五大臣的权力，甚至还曾经扬言，他即位后会将这些家伙们逐一诛杀。结果诸贝勒、大臣联合起来反对褚英，并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有异心，于是努尔哈赤遂开始冷落褚英。愤恨不已的褚英居然在家焚香诅咒，结果此举使得他自己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二十六日被努尔哈赤囚禁。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在建国称汗的前一年，将褚英处死，时年36岁。

通过囚弟杀子，努尔哈赤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使得他能够顺利完成此后的建国之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群臣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汗”，从此称明朝为“南朝”，正式与之分庭抗礼，但仍未大肆声张。因此，明朝、朝鲜等国确切知晓努尔哈赤黄衣称朕并记入史册，还要在三年后（1619）“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之后。

很显然，努尔哈赤的建国称汗、与明朝公开对立是其实力日益强大的体现，而这也标志着努尔哈赤与明朝相互利用至此结束，预示着30余年来，新生的后金和大明帝国这两者若隐若现的矛盾会激化为一场激烈的正面冲突。

第二章 萨尔浒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

在建国称汗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即展开对大明的攻势，而大明显然也并不太将其放于心上，这个时期，努尔哈赤一直忙于继续积蓄自己的实力，并征讨黑龙江、东海女真诸部。然而，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天命二年，1617），一场史无前例的灾荒却席卷了整个大明帝国。史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国各地水、旱、蝗灾频繁，饥荒瘟疫严重。先是，去冬无雪，入春以后久旱不雨。至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广西柳州大旱，融县尤甚，人民死者相继，鬻卖男女不下数千人。是年，除江西、北直隶、湖广、河南、山东、福建之外，陕西、山东、广东等省亦先后向朝廷报告灾情，而辽东自然也不难幸免。这一年，李氏朝鲜和辽东，以及努尔哈赤的后金境内，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尤其以后金地区更甚，一时间，饿殍遍野，民怨沸腾。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终于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南方了。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在建立后金国称汗，并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努尔哈赤开始正式与大明帝国分庭抗礼，他以所谓“七大恨”誓师告天，公开向大明帝国问罪。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不过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借口，其实早在这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就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故而才有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关于“七大恨”的内容，明清诸多史料有诸多不同版本，而且各书所记出入颇大，但大体内容主要是对于大明帝国杀其父祖的仇恨和对大明帝国插手女真事务、偏袒海西女真的不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七大恨”分别是：

第一，大明帝国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

第二，大明帝国欺压建州女真，偏袒叶赫、哈达女真；

第三，大明帝国强令努尔哈赤抵偿其所杀的越界人命，从而违反了双方划定的范围；

第四，大明帝国出兵保护叶赫，抵抗建州女真；

第五，叶赫在大明帝国支持下，背信弃义，把其部落与努尔哈赤有婚约的“老

女”东哥转嫁给了蒙古喀尔喀部；

第六，大明帝国出兵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开垦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

第七，大明帝国辽东政府派萧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而金梁辑《满洲秘档》一书中收录的《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则为：“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

不过很显然，所谓“七大恨”，实质上是努尔哈赤用以发动脱离大明帝国，公开进攻的一种借口。万历末年，辽东遭遇凶年，“流离道路，饿莩相望”，这才是努尔哈赤起兵的重点之一。但不管怎么样，“七大恨”誓师将女真人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引向了大明帝国，努尔哈赤希望通过对辽东掠夺转移后金内部由饥荒而加剧的部落矛盾。誓师后次日，努尔哈赤即率大军向明之抚顺发起了进攻。

而努尔哈赤在此时起兵反明，所能够依靠的，显然是他所建立的军民合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录额真”，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

所谓“牛录”在女真语中为“大箭”，原为女真族人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中的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也就是史载　的“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

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把“十人组牛录”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其实从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起建立黑旗军起，“牛录额真”就开始成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此后，努尔哈赤又将邻近女真部落，有挟丁口来归者，编为牛录。这种牛录的不断编设，并以容纳编制同血缘和同地缘而居的人。后来规定300人编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兵籍单位。起初，建州兵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弗皮牌）、能射四军，后来随着建州三卫的统一，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努尔哈赤另编红旗军亲领，将黑旗军交由胞弟舒尔哈齐指挥。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了一次整编，以300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管理，同时又分设白旗军，由长子褚英指挥。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已有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吞并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此时，他已经统领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于是又做出了调整，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也就是将红白黑三旗及所领牛录析设为八个旗：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镶蓝、正红、镶红三旗。正四旗旗帜为纯色四边形，龙首朝后；镶四旗旗帜为五边形，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龙首朝前。同时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这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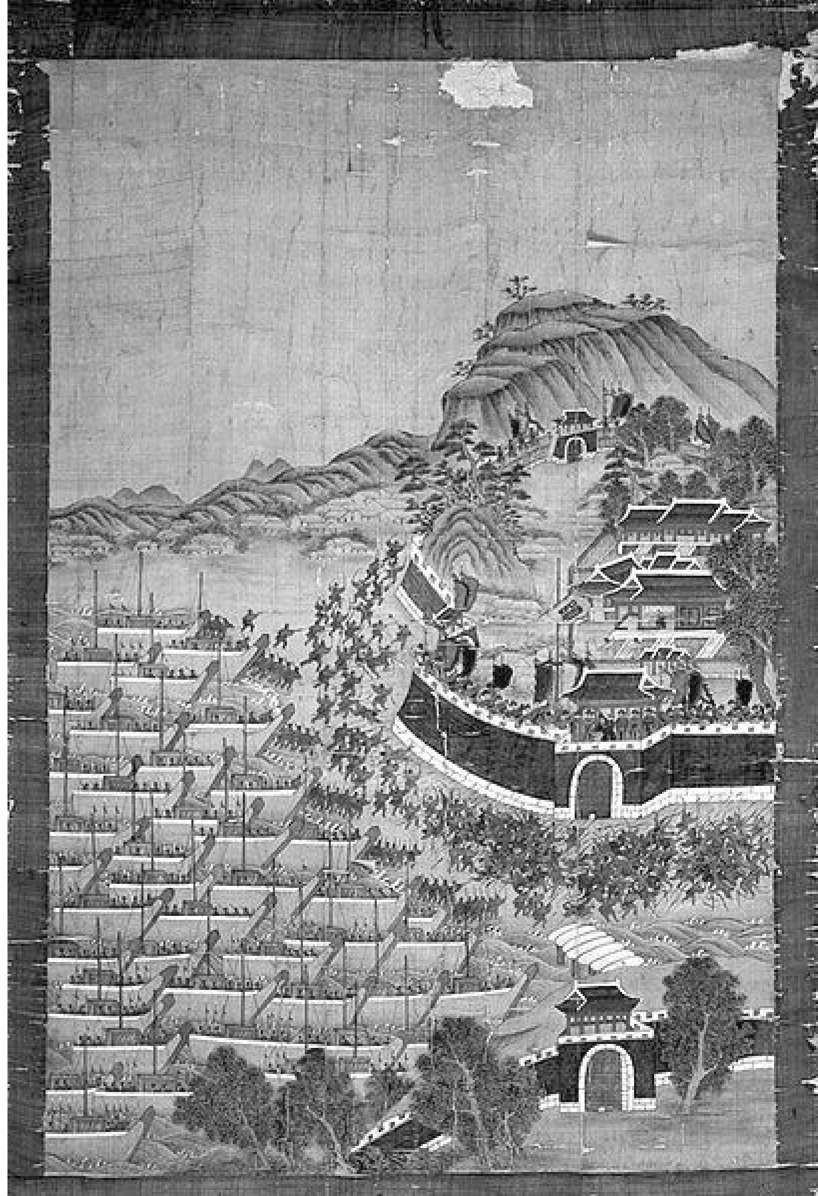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其根本还是为了能够控制女真各部，因为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故而努尔哈赤可以通过八旗及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的方法，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而此举除了便于旗主来管辖所有部民，还极大地增强了建州兵的战斗力。

按照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之时的各旗旗主是：正黄旗旗主多铎、镶黄旗旗主阿济格、正白旗旗主皇太极、镶白旗旗主杜度、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旗主阿敏、正红旗旗主代善、镶红旗旗主岳托。此外，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皇帝赐予的若干牛录。

在创建八旗制度的同时，努尔哈赤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这就是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与后金的磨刀霍霍不同，此时的大明帝国是一片糜烂，而且帝国还刚刚经历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

所谓“万历三大征”，其实就是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此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丰臣秀吉掌权的日本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然大明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因为这三场战争耗时、耗银实在太多了。



万历朝鲜战争

宁夏之役自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鲜之役更是自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至于播州之役是自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根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播州用兵，二十七年，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明史·王德完传》更是记载：“近岁宁夏用兵，费一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

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大明帝国的军费开支高达1160余万两白银。

而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外，明军还在万历十一年（1583）至三十四年（1606）进行了明缅战争。自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以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击败蒙古残余势力后，沐英被封作黔国公世镇云南，同时明廷在云南外围以西南设有六个宣慰司，即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车里宣慰司、老挝宣慰司，以统辖之。

万历年时，缅甸的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四处征战扩张，兼并了缅甸大部。万历九年(1581），缅王莽应龙死去，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他继承王位后，继续使用武力向北扩张。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缅军攻陷施甸，进攻顺宁、盏达，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于是，朝廷迅速派刘綎和邓子龙率领明军进行抵抗，明军在当地土司武装的配合下，在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大破缅军，取得攀枝花大捷。此后明军乘胜追击，邓子龙率领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而刘缀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陇川，俘虏缅甸丞相岳凤。岳凤投降后，缅甸军队一触即溃，明军一路收复了蛮莫、孟养和孟琏，孟密土司也宣布内附，阿瓦缅甸守将莽灼也前来投降。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缅军再次入侵，攻占孟密，包围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又率军击败了缅甸的入侵。自此缅甸东吁王朝的势力被赶出木邦、孟养、蛮莫等地，一时间，众多土司纷纷重新归顺大明。此后，在万历十二年九月，又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

此后，自万历十三年（1585）开始，双方就在边境频频冲突不断。

其实，当时的大明正因“国本之争”而动荡不已。所谓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其实就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自古以来便是“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的朝内众臣旗帜鲜明地分为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

神宗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原为神宗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史载，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万历九年（1581）的某日，神宗皇帝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李氏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

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从称朱常洛为“都人子”来看，皇帝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史载，神宗嫔妃众多，但唯宠郑氏。万历十年（1582）郑氏被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即朱常洵。神宗大喜，有意晋封为皇贵妃，这与对恭妃冷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明神宗万历皇帝

此等流言一出，大臣们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很显然，因为帝国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朝中大臣们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就在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

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此举更是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上疏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辞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明神宗在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中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麻烦，那就是使皇帝和群臣发生了对峙。

大臣们根据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要求立长子为太子，然而神宗却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而他的这个意图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双方僵持之下，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又令群臣忧心如焚，于是谏言纷纷。万历十八年（1590），众多大臣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15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皇帝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神宗大怒，眼看皇帝龙颜大怒，申时行不得不上疏暗中为自己辩白。此事被捅出来之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但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众大臣或被迫辞职，或被廷杖，但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声音却并没有消失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皇帝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却只以“三王并封谕”告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众多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

此后，为立储事，前后纷争达15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首辅沈一贯的劝进下，神宗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做出让步，立虚龄已20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史载，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众太监居然不给太子生火取暖，以至于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如果没有讲官郭正域怒而斥责太监，那些太监们才不会管那位太子爷是否会冻僵。

史载，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为储，因而以数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表达自己的不满，此举也就是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历史走向有着很大影响的“万历怠政”。



金台捧敕中的万历帝形象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神宗皇帝下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

洵为福王，但福王却迟迟不赴洛阳，反而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疏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最厉害。就在此时，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抓获张差。此后，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予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张差饮酒。带他到慈庆宫，着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于是，举国上下士庶一片哗然，众人都认为郑贵妃要刺杀太子。六月一日，神宗皇帝密令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不久之后，福王才离京前到洛邑就藩，至此之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而在这之前，围绕着国本之争，朝内已经掀起了两次大狱，而导致这两次大狱的根本便是所谓的《妖书》案，史载此案的最初是刑部侍郎吕坤撰写了一书，名为《闺范图说》，是古今后妃的传记，结果东厂提督太监陈万化将此书献给皇帝，郑贵妃得知之后，竟然补上了自己的传记，再次刊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认为吕坤阿谀奉承，于是上疏弹劾，但神宗没有理会此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撰《忧危竑议》，说郑贵妃欲以其子福王朱常洵夺储君之位。神宗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樊玉衡之手，士衡、玉衡俱贬，但御史赵之翰认为武英殿大学士张位是主谋，于是神宗又罢免了张位，贬谪亲近张位的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国子监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等，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五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籍悄然流传

而开，书中依然是老调重弹，说郑贵妃欲以福王夺储位，但此书内容却因为辱及天子、首辅，故而一时间朝内哗然。据载，此书为大学士朱赓所得，于是朱赓面奏神宗皇帝，呈报此事，神宗大怒，命东厂与锦衣卫侦办。此时，浙党沈一贯乘机构陷东林党沈鲤、郭正域等人，事态扩大，株连甚多，甚至就连高僧紫柏真可禅师也因与沈鲤有往来而受波及，在遭锦衣卫殴打以至重伤后，随即涅槃。此后，太子朱常洛向东厂施压，让他们不得牵连大臣，故而最后东厂竟归罪于顺天府诸生皦生光所作，于是皦生光遭到凌迟处死，是为“第二次妖书案”。

除了两次妖书案之外，当时还有“楚太子案”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向朝廷告发楚王朱华奎并非楚恭王之子，是楚恭王亲戚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华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暂将奏疏压下不表。朱华越不服，亲自上访燕京，北告御状。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进行调查。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察无实证，只有王如言的女儿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沈一贯与郭正域自是有仇恨，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郭正域愤而辞官，朱华越则被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居然又引发了“楚宗劫杠案”。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皇帝觊觎楚王家财，楚王朱华奎只好以皇杠搬运白银贰万两贡献朝廷。运送途中，被不满楚太子案的楚国宗室朱蕴钤等人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在讯问案情时，竟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打死。于是湖广右参政薛三才、按察使李焘、巡按吴楷即向朝廷报告楚国宗室作乱。沈一贯立刻调集郧阳巡抚胡襟寰兵马，准备平定楚国谋逆，一时间楚国宗室自危，幸亏李焘上奏，此为刑案，并非谋叛，朝廷方才止兵。此后，神宗皇帝下令斩杀朱蕴钤与朱蕴訇，赐死朱华堆等4人，幽禁朱华焦、朱蕴钫等45人，搞得楚国宗室人心惶然，方才作罢。

其实无论是国本之争，还是“妖书案”，又或者“楚太子案”，其根本都是朝内党争。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于是也就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按照史料的记载，东林党的形成并没有这么简单，顾宪成乃无锡人，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授户部主事。万历十五年，因为上疏申辩，词语中有触怒当权者，而被贬谪为桂阳州判官，慢慢提为处州推官。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

迁升、改调等事务。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明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史载，顾宪成回到家乡以后，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龙等讲学其中，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而与此同时，是为浙江宁波人的沈一贯则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还有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人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他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东林党争”。

史载，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朝廷几无宁日。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关于明末党争的危害，《王学质疑》提要曾说道：“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而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则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则说的更为深刻：“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就在大明帝国陷入内外交困的时候，努尔哈赤起兵也就有机可乘了。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入侵大明，以左翼四旗进攻东州、马根单，自己亲率右翼四旗直取抚顺。抚顺城位于浑河畔，是明与女真互市之所，由于努尔哈赤年轻时曾在抚顺从事贸易，因此对抚顺城的情况了如指掌，守将游击李永芳亦与努尔哈赤相识。当日，努尔哈赤派人至抚顺告知次日有一个三千人的女真大商队前来抚顺贸易。十五日，佯装商人的后金先锋部队来到了抚顺城，抚顺军民均至城外交易，这时努尔哈赤大军突至，与抚顺城内的后金军里应外合一举袭取抚顺，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战死，李永芳投降。同日，左翼四旗亦攻克东州、马根单。东州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单守备李大成被俘。

抚顺失陷的消息传至广宁，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檄广宁总兵张承胤前往救援，张

承胤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万余大军追击努尔哈赤。双方相遇，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从两翼围攻明军。正在双方激战之时，天空风沙大作，明军迎风而战，陷入不利局面，最后被后金军全歼，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皆阵亡。抚顺之役，大小战斗共历时一周，后金军不仅攻占了抚顺、东州、马根单，还劫掠了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30万，编为千户，毁抚顺城后班师。努尔哈赤本对攻打大明帝国并没有绝对信心，在战前甚至还告诉众贝勒大臣要“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然而，努尔哈赤首战大明帝国即俘获人畜30万，这刺激了其更大的野心。

抚顺之败，举朝震惊，而就在大明帝国试图采取行动的时候，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再攻取抚顺与铁岭之间的抚安等大小城堡11座。七月，后金军破鸦鹘关而入，进犯清河。

清河城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大路可直通重镇辽阳、沈阳，为辽沈之屏障，参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旆领兵一万镇守此地。努尔哈赤令装满貂、参之车在前，军士埋伏在车后突然杀出，此举让清河守军措手不及，顿时大败，援辽游击张旆亦战死。此后努尔哈赤命部下对清河进行围攻，由于清河城上布有火器，后金军攻城死伤千余人。于是努尔哈赤改变了策略，他令军士以木板作为掩护，在城下挖墙，后金军遂从缺口突入城内。虽然努尔哈赤命李永芳前去劝降邹储贤，但邹储贤见之怒骂，并率军于城上抵抗后金军，最终力竭阵亡。清河陷落之后，副将贺世贤率援军赶来，但见城已陷落，遂斩附近女真屯寨妇幼150人而还。

由于连陷抚顺、清河，努尔哈赤的野心越来越大，他将被俘获的一名汉人割去双耳，令其转告明廷，“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此举彻底惹恼了大明，大明帝国也自此才终于意识到了辽东事态的严重性，决意征调大军彻底消灭后金。

就在努尔哈赤进攻辽东的同时，这一年，他还对叶赫部实施了又一轮攻势。首先命大贝勒代善统领战将16员、兵五千人驻守扎喀关以防大明的干涉，而自己则率领倾国之师攻打叶赫部。此战，后金军连克叶赫大小城寨20余座，焚其城，俘获了大量降民、牲畜、粮食和财产，在努尔哈赤的攻势面前，叶赫再度向大明帝国求援，开原总兵马林率全城之兵前往救援。努尔哈赤为避免腹背受敌，不得不班师而回。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蒙古部落。

在蒙古方向，自明太祖以徐达为将，率部攻占元大都，迫使顺帝北逃，退居塞

北以来，史称北元的蒙古人一直盘踞在大漠草原之间。由于时北元仍有“不下百万众”之实力，故而蒙古人曾经多次反攻边地，试图重新入主中原，后经成祖多次讨伐，方才衰落。此后，瓦剌也先崛起，此人野心勃勃，颇有计谋，一度统一蒙古，土木堡之役擒明英宗，后又围攻北京、东掠女真诸部，但也先死后，蒙古再度分裂。至万历年间，蒙古已经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

其中漠南蒙古与建州相邻，诸部之一的科尔沁曾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与叶赫组织的九部联军，结果在古勒山之战大败后，科尔沁贝勒明安果断遣使与建州通好，自此双方开始互通往来。但万历三十六年（1608），科尔沁再助乌拉讨伐建州，可是见建州兵强马壮，科尔沁自知不是对手，遂撤兵请求与建州联姻。努尔哈赤不计前嫌，答应其请求，于是双方交好如初，而就在科尔沁和建州开始通好之时，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为了防止努尔哈赤在蒙古草原的扩张，居然对科尔沁部发动了袭击，此举反倒使科尔沁部彻底倒向努尔哈赤，甚至有科尔沁贵族奥巴台吉等率部众内附之事。由于科尔沁部为蒙古诸部中归附最早者，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朝后妃很多来自科尔沁。

而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时的喀尔喀部位于辽河流域，内分五部，长年互攻，冲突不断。努尔哈赤充分利用喀尔喀五部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逐部争取、优待来投贵族、部民以从中取利。五部之一的巴岳特部贝子恩德格尔是第一位内附建州的喀尔喀贵族。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恩德格尔引领喀尔喀五部使臣给努尔哈赤上尊号“恭敬汗”，从此双方往来不绝。努尔哈赤为进一步笼络恩德格尔，将舒尔哈齐第四女许配给他，使其成为额驸，这对招抚其他喀尔喀来投的贵族和部民起到了很大作用。

然而，喀尔喀部诸贝勒中实力最为强悍的介赛却很不以为然，他依然选择与大明帝国结盟，介赛曾经与大明帝国三次立誓，所以，此时他不会选择与努尔哈赤结盟。此后，在后金攻打铁岭时，介赛率军万人埋伏于铁岭城外配合明军作战，结果大败，后金军追至辽河，介赛与其二子、二弟、三婿、诸贝勒、战将、士兵等百余人被生擒，努尔哈赤在喀尔喀部同盟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随后，努尔哈赤与喀尔喀部27位贝勒、台吉会盟于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双方正式确立同盟关系。而对于被俘虏的介赛，努尔哈赤并未处死，而是将他囚禁在后金，以争取同该部结盟。两年后，喀尔喀以牲畜万头赎回介赛，努尔哈赤与介赛盟誓并互通婚姻。

至于察哈尔部，则以临近蒙古与大明帝国的边境之处而得名，察哈尔为蒙古

语“边”的音译，其汗驻帐于广宁以北。其实察哈尔部乃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后，分封诸子后所产生的。史载，达延汗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其中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而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万户。左翼三万户由达延汗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之后察哈尔部领主便成为蒙古各部之共主，世袭蒙古大汗之位。随着达延汗的去世，诸部再度陷入纷争，蒙古大汗无法对各部进行实际支配，实权仅限察哈尔部统治范围之内。

在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用兵之时执掌察哈尔部的是达延汗七世孙林丹汗，他有一统蒙古的野心，对辽东也常心怀觊觎，因此与大明、努尔哈赤均有利益冲突。随着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开始不断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到漠南蒙古地区，科尔沁、喀尔喀尽皆臣服于后金，故而林丹汗出于威胁的考虑，毅然选择和大明结盟。

史料记载，林丹汗十分蔑视努尔哈赤，他曾致书努尔哈赤，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而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满洲国主”。努尔哈赤亦作书回应，书中亦提及大元朝是被大明击败，方才退出中原的。很显然，努尔哈赤试图激起林丹汗对大明的愤怒，转而倒向努尔哈赤。然而，在林丹汗看来，自己所面临的后金的威胁相较历史宿怨更为重要，遂囚来使，坚持与努尔哈赤为敌。此后，林丹汗自恃在蒙古诸部中实力占优，常年用兵，破喀喇沁、灭土默特，并为了遏制努尔哈赤，而出兵讨伐后金的盟友科尔沁部。然而，在努尔哈赤的援助下，科尔沁部将林丹汗所部击退，以至于林丹汗无功而返。

其实，之所以林丹汗征讨科尔沁无功而返，主要原因还是察哈尔部内部很不稳定，察哈尔的敖汉、奈曼两部就与后金有往来，甚至林丹汗的孙子扎尔布、色楞后来还逃至科尔沁，并到后金去朝拜努尔哈赤。但直至努尔哈赤去世，察哈尔始终是牵制后金的一个力量，直至皇太极继位后才将其征服。

就在努尔哈赤忙着经略漠南蒙古的时候，大明帝国对于后金的征讨也开始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宣布脱离大明帝国统治，并以“七大恨”誓师，历数大明帝国对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以及向大明帝国宣战。以后便出兵偷袭辽东各堡。四月十五日，连陷抚顺、东州、马根单、抚安堡等地，东州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丹守备李大成被俘。抚顺总兵李永芳与中军赵一鹤等及5百守军乞降于后金，范文程兄弟亦投降后金，抚顺守备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

等拒降而战死殉国。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命广宁总兵张承胤、辽阳副总兵顾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军前往救援，于四月二十一日遭后金军反击而大败，明军阵亡3千多人，仅3百余人逃回。战后，帝国迅速派援辽游击将军张旆率领5千兵马支援清河。结果七月二十日，后金军攻入鸦鹘关，七月二十二日，攻占清河堡，清河副总兵邹储贤、游击张旆、守备张云程战死，清河守军达6400余人覆没。而驻扎在叆阳的参将贺世贤听闻清河有变，疾驰出塞，破后金一栅，击杀百余人。此役，后金掳掠人畜30万，获马9千匹、甲7千副。可谓是全辽震动。

抚顺、清河的失陷，使得大明帝国的中枢不得不对辽东丧师失地做出反应，帝国努力建立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系统此时面临着崩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帝国决定发动一次性大规模进攻，以图彻底消灭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1618），帝国在广宁设立辽东饷司，任命原辽东巡抚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御史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与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及以名将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谕令被勒令回乡的旧将杜松及已告老还乡的刘綎等众将官“星驰出关，以备调遣”，共同商议出征之事。由于此时大明帝国驻守辽东全镇兵力六万，除去各处城堡驿站布防的守军，能作战的只有约两万余人。加上因屡次遭后金打败，以致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所以帝国从福建、江西、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南京等地征集兵士星驰援辽，并调集旅顺等地派驻舟师，与镇江（今辽宁丹东）、宽甸兵会合。且咨文朝鲜、叶赫，合力征讨。

由于当时，卫所制名存实亡，已经转为募兵制，故而这次出兵，其实是调自全国各地，而兵士主要来自九边重镇、四川和浙江。史载，此战出动兵力为：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1万，共约3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兵精骑6千，共约2.5万人；四川、广东、山东、陕西、北直隶、南直隶，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2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4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士兵，数量各二三千不等，共约7千人。结合起来，明军总数约8.8万人，再加上海西女真叶赫部军1万人，李氏朝鲜所派1.3万兵马，总计11万多人。

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经十个月的准备，明廷从全国调来各路兵马齐聚辽阳，以曾经经略朝鲜的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总督大军。二月十一日，经略杨镐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王庭在辽阳演武场举行讨伐后金的誓师，并斩抚顺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以祭旗。誓师后，杨

镐等决议兵分四路，直捣赫图阿拉。四路分别为：

西路军，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经略标下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刘遇节、原任参将柴国栋、原任游击王浩、原任游击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汪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备御杨汝达、原任参将龚念遂、原任参将李希泌等以下宣府、大同、山东、陕西官兵等3万余人，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为主力军。

南路军，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经略标下左一营管游击事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裕光、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备御徐成名、加衔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原任游击于守志、原任游击张昌胤等以下辽东边防和京营官兵二万余人，以守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军，推官郑之范为赞理，由清河出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作为支援各路之军。

北路军，即开原路，以原任开原总兵官马林为主将，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管海州参将事游击丁碧、游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铁岭游击郑国良、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及马燃、马熠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东等官兵2万余人，暨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盟军1万余人，以开原兵备道检事潘宗颜为监军，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从靖安堡出发，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为次要主攻方向。

东路军，即宽甸路，以辽阳总兵官刘为主将，管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管备御周翼明、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同知黄宗周为赞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干为监军，与刘招孙等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官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朝鲜派出由朝鲜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中军官虞侯安汝讷、分领边裨防御使文希圣、左助防将金应河、右助防将李一元等率领1.3万人。从宽甸堡路由凉马佃出发，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作为佯攻的疑兵。

纟
廷

又以总兵官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柴国柱等部驻守辽阳，作为机动；李光

荣率军驻广宁保障后方；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蒙古各部；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杨镐本人则坐镇沈阳，居中指挥。时杨镐奏上“擒奴赏格”经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明神宗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万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千两，升指挥使；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又诏令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若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予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12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

应该说，此时大明帝国在经过十个月的准备之后，可谓是为了此役做了准备，不仅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而且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无一不想通过此战来对蛮夷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神宗自己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可实际上呢？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300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拼命搜刮，也难以凑齐。在无饷可征时，内廷府库却颇是充盈，内币积为朽蠹，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10万。

而当辽东明军以山海关总兵名将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总兵赵梦麟等2万余人为西路军；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率参将贺世贤等2万余人为南路军；以开原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游击麻岩等2万余人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率领的两千叶赫兵为北路军；以总兵官名将刘綎为主将，率都司祖天定等1万余人会同朝鲜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的1.3万余朝鲜兵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共十余万，号称47万，于二十五日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展开合围的时候，巨大的危机却还是诸将不和。“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就如同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的那样：　“臣久留经略门下，熟闻言语，兼察动静，南北诸将猜隙已成，号令每相反。窃闻中朝诸将中，勇敢善用兵推刘綎第一，而兵精不如吴惟忠，……提督依重刘。”而祝耀祖《敬陈一得备安攘疏》也记载：“自镐用事以来，威令不行，赏罚不信，昵私交而轻南将，则豪杰灰心，怯任，罪而恤典，则英雄短气。”

纟
廷

杨镐此人是万历八年（1580）进士，先后为南昌、蠡县知县，然后进入朝中当御史，因事调为大理评事。后来又升为山东参议，负责防守辽海道。他曾经和大帅董一元合力在雪夜中翻越墨山去袭击蒙古炒花部的营帐，大获全胜，迁任了副使。这期间，他开垦荒田130多顷，每年储藏粮食1.8万多石，又被提拔为参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封贡议败，朝鲜战事再起。大明帝国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箇总督蓟辽，神宗以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此时，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制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此后，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所谓“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蔚山战后不久，大明帝国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于是杨镐被革职撤回。万历三十八年，杨镐复起巡抚辽东。期间，其袭炒花于镇安，破之，因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加上时辽左多事，杨镐极力推荐李如梅，请求重新任用他做大将，但为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所劾。于是杨镐上书辩解并请求离职，神宗不加过问，于是“镐竟引去”。

此番，出兵辽东，虽然四路军企图“分进合击”，但骁勇善战的刘因为与杨镐素不和，被派往东路，孤军深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最重要的是，杨镐遣后金逃兵带书信给努尔哈赤，声称大明帝国集结天兵47万，并以发兵日期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相告，企图威吓努尔哈赤及后金上下。但此举却使明军尚未出动，其部署和师期皆被后金掌握，反使后金军早做准备，努尔哈赤从大明帝国叛将李永芳献计“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以攻为守、逐个击破，以多战少。

纟

关于李永芳，历史上的记载很详细，此人原为抚顺千户所游击。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攻克乌喇部，乌喇部贝勒布占泰逃往叶赫。努尔哈赤又征讨叶赫，叶赫部向大明帝国求援。大明遣使告诫努尔哈赤，不许他侵犯叶赫。努尔哈赤修书给大明帝国，表示叶赫背盟悔婚，藏匿布占泰，自己是不得已而用兵，并亲自前往抚顺千户所。李永芳出迎三里，将努尔哈赤引入教场。努尔哈赤将回书交给李

永芳，率军返回。这也是两人相熟的开始。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9），努尔哈赤入侵大明，围困抚顺，并致书给李永芳道："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于汝民矣。勿谓我恫吓，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李永芳看完书信后，便登上南门请降，但仍命士卒准备防御战具。后金军以云梯攻城，很快就登上城池，斩杀守备王命印。李永芳于是出城投降，并匍匐在地，拜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马上答礼，命士卒勿杀城中百姓。次日，努尔哈赤毁抚顺城，将城中百姓编为千户，迁到赫图阿拉，并按照大明帝国官制设置大小官属。李永芳被任命为三等副将，并娶贝勒阿巴泰之女为妻。抚顺是努尔哈赤打下的第一座大明帝国边城，李永芳则是第一个投降的大明帝国边将。

其实，杨镐最初本是原定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619）出师，但是因为此役大明帝国四方调兵，使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银钱，然而大明帝国虽有内帑积储数百万两，神宗皇帝与内阁等竟不肯拨发。而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又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督促杨镐尽快出兵。于是杨镐决定提前于二月二十一日出征。史载："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以为败征。"于是就在这样军心不稳之中，杨镐决定提前于二月二十一日出征。

时因天降大雪，行军困难。马林向杨镐劝谏"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而刘则以地形未谙、大雪迷路为由，提出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并且刘还要求调集其手下川军三万，可惜兵部只准许调集五千川军。杜松也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久未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未能大规模兴兵。但是杨镐皆置之不理，最后决定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师，于是斩抚顺逃将白云龙作祭旗。四路明军同时由辽阳教场分道出征。

纟
廷
纟
廷

应该说，明军兵分四路，本来的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大军合围，将之。但是，从一开始，就是杜松孤军冒进，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而刘则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700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而这个分而不合的局面也正是努尔哈赤所希望看到的，他当即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纟
廷

二月二十八日，时西路军杜松，从沈阳出发，到抚顺关稍作休息，此后便是又开始继续进军。杜松于万历年间由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万历二十二年（1594），迁廷绥参将。此人号称“杜黑子”，交锋时掳起两臂，乌黑如漆，持着金刀乱砍。守陕西时，与胡人大小百余战，战无不胜，被塞外诸胡畏之，呼为杜黑子而不名“杜太师”。

万历三十三年（1605），擢为署都督佥事，代替李如樟镇守延绥，次年套寇进犯安边、怀远，杜松大破之，改镇蓟州。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官为总兵，接替李成梁镇辽东。因为在这期间作战吃亏，一气之下焚烧粮草，被下狱处置。对此杜松感到很是惭愧，数次自毁甲胄，声称欲削发为僧。然而，朝臣虽然都可惜杜松的勇武，但因杜松的为人，却没人替他说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河套寇大举进犯，杜松被重新启用，率领轻骑捣火落赤营。斩首200余。万历四十五年（1617），因蓟、辽多事，特设总兵官镇守山海关，令杜松担任总兵。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张承廕战殁，朝廷方才诏杜松驰援辽阳。此番杜松为抢头功心切，于是星夜列炬，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二月二十九日直抵浑河岸，此时杜松得知后金约1.5万兵马正于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修筑防御，企图阻挡明军前进。因界凡城形势险要，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界凡城北，便是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皆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百余里。过了界凡之后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因此，界凡地位极度重要，于是杜松便将大军兵分二处，分2万人于萨尔浒山麓扎营，杜松亲率轻装1万人渡过浑河，进攻界凡城下以北的吉林崖。但是此时杜松只知后金军在界凡城上防御的情报，却未得知后金已经向界凡方向大规模调动军队，注下败亡之祸。

三月初一早上，杜松不听总兵赵梦麟等众将劝谏休整，反而强命渡河，其部参

将龚念遂等因辎重营渡河困难，被遗留在大军之后，屯于斡浑鄂谟，结果杜松军只能轻装渡河，留下大量火炮等重型火器。杜松军渡河间，努尔哈赤于浑河上游毁坝放水，时河水陡涨，明军被水淹死者甚多，致兵伤马毙，锐气大挫。杜松军渡河后连破两个后金小兵寨，只俘获14名后金兵。

随后杜松以全军攻打吉林崖，但午时后，后金军已经到达界凡城南的扎喀关，二贝勒代善下令进军至毗邻界凡的铁背山。此时攻打吉林崖的明军也看到大批的后金军队陆续到达，但杜松已无法改变战略。无论是自己率领的1万明军渡河到萨尔浒大营会合，还是令对岸的2万明军渡河到吉林崖山下会合，都必定在渡河时被后金军阻击，于是杜松便令继续强攻吉林崖。后金方面眼看要抵挡不住，代善命1000精兵火速增援吉林崖。明军虽有火器之利，却也一直未能攻下。时努尔哈赤率军亦赶到，并认为申时已到，天色渐晚，于是命左翼四旗兵先击萨尔浒之明军，破萨尔浒后，进攻吉林崖的明军自必动摇。后再加一旗的兵力，合共五旗3.7万骑兵，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向萨尔浒明军大营。

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璘等统率抵挡后金兵的奋力冲击，最后因后金军多，明军不能抵挡，结果萨尔浒明军大营被攻破，明军争相逃命，结果全部溃灭，王宣、赵梦麟战死。逃走的明军最后到达力阿哈时被后金军追上，亦全部被杀死。时吉林崖杜松军看见萨尔浒大营被攻破后，军心早已动摇。此时，后金军将攻打萨尔浒的兵力与同部署在吉林崖的兵力汇聚，吉林崖上的后金军亦蜂拥而下合攻杜松军。面对后金军攻势，杜松亲率官兵奋战，但是后金军已经尽占河畔、莽林、山麓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包围。战至夜晚，明军点燃火炬，从明击暗，反让后金军能够从暗击明，使明军死伤惨重。杜松被后金贝勒赖幕布射杀，参将柴国栋、游击王浩、张大纪 、游击杨钦、汪海龙和管抚顺游击事备御杨汝达也战死。明西路大军全军覆没，经略标下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刘遇节率残兵逃脱。监军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处死。

而知道此时，屯于斡浑鄂谟的龚念才决定会合北路军马林欲往救杜松。马林乃名将马芳次子，以父荫升总兵。史载，此人“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他所统帅的北路开原军从二月二十八日经三岔儿堡出发，二月二十九日得知西路杜松军一马当先，马林便急命进军，以免应援不及，被定师出失期之罪。三月初一，北路开原军抵达尚间崖，三月初二得到西路杜松军战败后，其大惊，不敢前进。于是马林不听潘宗颜等诸将的建议，一意孤行要把大军一分为三，转攻为守。

马林主营退守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挖掘三层堑壕，将火器部队列于壕外，骑兵殿后，又命部将潘宗颜屯大营数里之外，以战车相围，成掎角之势，相互呼应。同时派参将李希泌率军援助留驻于斡浑鄂谟湖的西路军杜松辎重营的龚念遂部，三军成掎角之势，严营坚守，期望能抵住后金兵的进攻和等待叶赫军到来援助。

这时，努尔哈赤在击破杜松后，正调头过来，以三倍于马林的兵力进攻，见明军亦是分兵立营，于是决定各个击破。三月初三清晨，大贝勒代善率八旗主力转锋北上，直攻尚间崖，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亲率3000精锐先攻龚营最薄弱的一隅，同时围潘宗颜营，使之不能往救。结果龚念遂营被突破。参将龚念遂、李希泌战死。其余战死者还有千总张天祚、颜天佑、王弘化和把总雷应龙、丘起凤、刘友才、于景柱、杨朝武、代运旺等等，全营5000人败殁。至午，努尔哈赤转往攻打尚间崖马林大营，后金兵直奔尚间崖，命“先据山巅，向下冲击”，马林一时惊恐，立即命令壕内的精锐步兵出壕援助，努尔哈赤见马林营内与壕外兵汇合，又命“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军前后夹击，大败马林军，夺尚间崖，当时明军急发鸟枪、放巨炮，“火未及用，刃已加颈”。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客观上来说，此战明军的火器不少，但是，兵士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

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两炮中靶。据史料记载，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向李氏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求援，调400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此战，朝鲜以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1.3万人，往援辽东。不过由于朝鲜火铳手自身水平也不高，而且训练时间有限，故而战时，在后金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

不过后金军的进攻并不顺利，位于尚间崖的马林营防守严整。努尔哈赤便命令莽古泰与阿敏率军冲向马林营。马林迅速令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游击丁碧、葛世凤等为前阵抵挡，以管铁岭游击事都司郑国良及麾下中军赵廷兰、千总麻进忠、魏相、把总姚守冠、曹文烈、赵奎等负责防守，马林在后压阵命营中明军发鸟枪、放巨炮。后金军蜂拥而上与前部明军接战，两军酣战之际，魏相、姚守冠战死，马林得知龚念遂营已破，掎角之势已失，大惧，加上后金军已杀入后营，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守备马熬、朱邦孝及千总杨一科、李鹤、把总江应聘、陈国王、齐和等先后战死。马林眼见形势不妙，遂提部下兵，策马先奔，避其锋以去。然而兵士不知，以为其已经战死，于是军心浮乱，开始四面溃散，葛世凤与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及麾下中军胡邦奇；千总阎有功、郑国忠、高良玉；把总赵镇、李之中、朱万与、陆进忠等死于阵中。而此时郑国良与曹文烈、麻岩、丁碧等于乱军中汇聚，大杀半日却未能打退后金兵。最终，麻岩与郑国良、曹文烈及麾下中军周大盛、千总程廉、千总王仲贤、千总冷载裳、千总麻实、千总麻进忠、把总打代、把总赵仲举、把总腮介哈监代、李尚仁及督阵应袭曹秉忠、万人英、胡国弼、周大受、李天复、孙冲良、伯言兔，杂流官褚道宗、王溥、梁世勋、李应杰等人和丁碧麾下中军祝世泰，千总盖禄、丁堂，红旗官魏国勋等全营皆殁，唯独丁碧死战得脱，逃回开原。大将管坐营、詹国绎，千总杜福、王国印、李日篁、张桂，把总天台、哑汗兔、猛克虎、魏思贤、库承恩、尚民雄、王应干、单秉德、马灼、杨登科、李毓药、王怀智、刘尚胤、王效忠等尽皆战死。另据马林次子马熠奏报朝廷，战死者还有马林长子马燃、马熠，百总祁煌等11人。

后金军便急往被攻打中的潘宗颜营。面对努尔哈赤率兵一面强攻、三面包围飞芬山的部署，潘宗颜与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等指挥火铳、大炮抵挡。史载：“潘宗颜，字士瓒，保安卫人。善诗赋，晓天文、兵法。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数上书当路言辽事，当路不能用。”后朝廷以潘宗颜知兵，命其督饷辽东，旋擢开原兵备佥事。此番随同马林出征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马林庸懦，不堪当

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然而镐不从。此时，潘宗颜 “奋呼冲击，胆气弥厉”。于是努尔哈赤将攻下尚间崖马林营后的兵马汇聚一起，将潘宗颜营重重包围，接连进攻。自辰至午，后金攻势猛烈，明军寡不敌众，潘宗颜也力不支，最终战死，史书记载潘宗颜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而守备江万春、黄瑷及麾下千总陈玉、王学雄；把总常因泰、何印、王琯、陈一元等也尽皆战死，窦永澄与中军李维桢、千总刁国瑞、把总康世泰等于阵中殉国。赞理为岫岩通判董尔砺与中军董引、答应官熊惟英、应袭李渐茂、王纳荐，经略督阵红旗原任守备郭之翰、监军察院督阵指挥刘兴周、招降官伊汤聘等亦战死沙场，此外，招降官管鸣宫、执旗官康民望、丁继盛等亦战死。

就这样，后金军于伤亡甚多的情况下，终于将飞芬山攻占，北路明军全部被歼，仅有马林以数骑逃回开原。战场之上，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时叶赫部首领金台吉、布扬古领兵进至中固城，“闻明军败，大惊而遁”。努尔哈赤转而对准他最为强劲的对手——刘綎。

刘綎，乃大将军都督刘显之子。万历初年，刘綎跟着父亲刘显讨伐九丝蛮。冲锋在前，率先登城抓获蛮人首领阿大。因军功，提升为云南以东守备，改任南京小教场坐营。史载，刘綎所用刀120斤，军中号为“刘大刀”。有姬妾20余人，都是燕、赵一时之选，皆善走马弹械。每出巡，诸姬戎装穿小皮靴，跨善马，为前导。四力士共举刀架继之，在其后。万历十年（1582）冬，缅甸并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求朝廷发兵援助。次年春，朝廷以刘綎为游击将军，参与平定云南。时黔国公沐昌祚等令邓子龙、赵睿等督兵云南，刘綎也在此战中成名，其与邓子龙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并招抚孟养、木邦、孟密、陇川各土司。

因平定云南之乱有功，刘提升为副总兵，允许世袭，但此后不久，便是因其为人贪财，驾御部下又不得法，而获罪被革职，以游击候调。

罗雄之乱时，巡抚刘世曾派遣刘綎和裨将刘绍桂、万鳌分路讨伐，刘连克三城，最终平定罗雄之乱。但平乱之后，有人说刘私藏财宝，故而他被“不记功劳”，幸亏刘世曾为他辩白，才得以被起用担任广西参将，移居四川。万历二十年（1592），刘被授职为五军三营参将。同年，大明帝国以大军入朝，八月，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并诏天下督抚举将才；又命李如松总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抽调了辽东精骑一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八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

兵五千及名将沈有容，江浙步兵3000，而刘则率川军5000，作为后续。

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议和。七月，明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及游击吴惟忠共7600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部，结果只留刘部防守。十二月，明廷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刘等。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不久之后，播州杨应龙反叛，杨应龙乃是播州杨氏之后，自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杨端割据播州以来，形成世袭土司政权。大明立国之后，太祖洪武五年（1372），杨氏降明，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至杨应龙时，杨氏占据播州前后历经29代，历时七百余年。

杨应龙是隆庆五年（1571）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的。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其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骠骑将军。万历十四年，还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70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其实，在万历十七年（1590）时，是为四川播州宣慰司使的杨应龙就曾公开叛乱，朝廷诏命黔蜀两省会勘，然而杨应龙赴蜀而不赴黔，后其虽然赴渝受审，依法当斩，但时倭人进犯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万历二十年（1592），四川巡抚王继光续提杨应龙赴渝严提勘结，但杨应龙抗命不出，于是朝廷下令进剿。

万历二十七年（1599），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三千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于是以朝廷以刘为都督同知，世世代代荫封千户职，替四川总兵官万鏊。并以李化龙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于重庆主持讨伐全局，贵州巡抚郭子章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十年正月，各将攻克丁山、铜鼓、严村，于是进军直捣楠木、山羊、简台处，因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故而杨应龙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重兵屯守。然而，苗兵畏惧刘，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此后，刘率军攻下娄山，兵围海龙囤。六月初六，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大军班师回朝，杨朝栋等69人被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史载“与诸将共平贼，功为多”。

此番刘率兵4万，由宽佃，副使康应乾监之，游击乔一琦别监朝鲜国都元帅姜弘立等统率的1.3万兵马并进。刘因为于万历援朝之役中与杨镐结怨，结果被派往东路，并且器械龃龉，又无大炮火器，兵弱将寡，为四路中最弱的一支，皆为刻意杨镐安排，并安排亲信二人监察刘，欲置刘于死地。若刘短留，即时夺取兵权，由杨镐亲自指挥。并且因为东路刘军孤军深入，所以全然不知西路杜松军和北路马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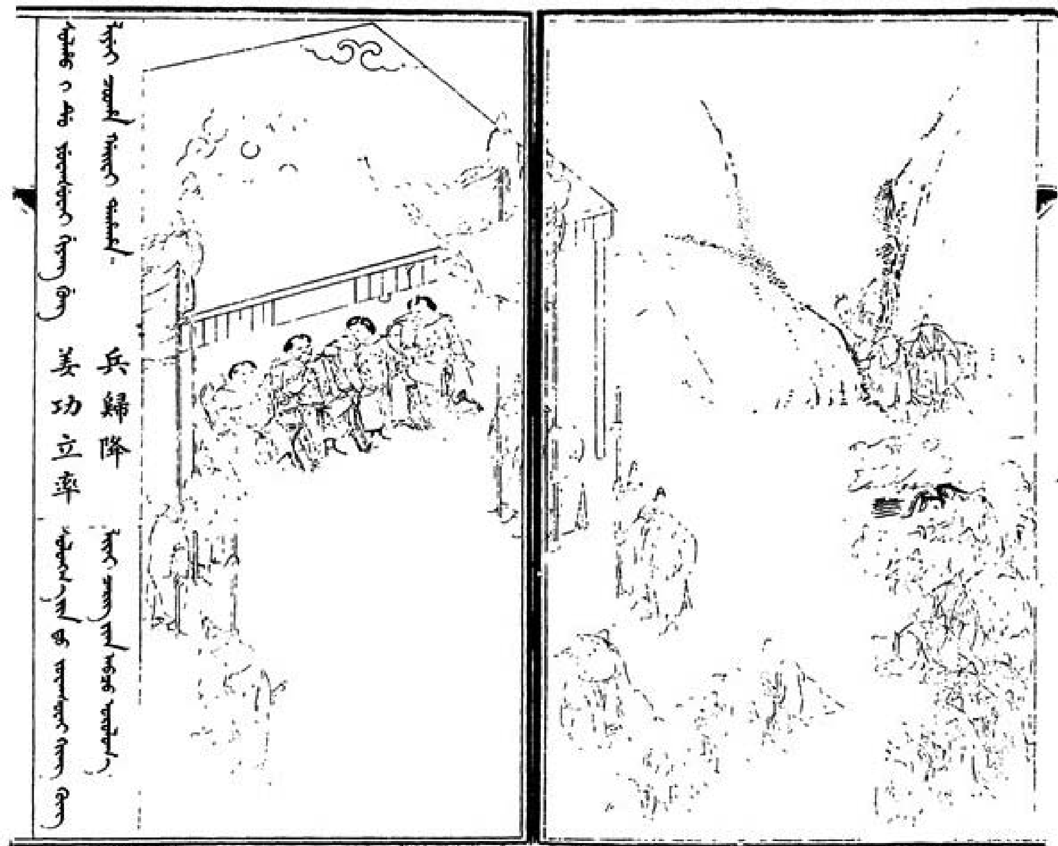
军已经败没的消息。按照计划，东路军是从东面宽甸堡进攻赫图阿拉，不过由于东路军是佯攻，因而要先于西路明军及北路明军出师，东路军是二月二十五日出发的，东大军自宽甸出塞后，过凉马佃。时风雪大作、大树塞道使得道路难通，东路军多数由南方士卒组成，未能适应辽东严酷气候，加上孤军深入，粮草也渐渐未能及时供给，以致而东路军一直行军缓慢。

据记载："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由此可见，其实刘此番并不是指挥自己所率的精锐，而是偏师，但刘这一路行军路线危险而遥远，重峦叠嶂，以至于骑兵不能布成阵势。二月二十八日，刘率军攻克牛毛寨、马家寨，深入到榛子头，结果军粮耗尽。直至三月初一军粮运达，再进军四十余里至董鄂路，后金500士兵防守董鄂路。听说刘部队到来，迎战。刘派兵重重包围后金军，后金军寡不敌众，两员裨将被阵斩，大败溃逃，明军亦有将领如刘吉龙等战死。此时，刘军继续深入300多里。终于大雪初停，天气放晴，但仍然十分寒冷，直到三月二日才渡过深河。然而，此时的刘并不知道杜松所部已经覆灭，他在整顿大军后，依然率军向前进发。过深河不久之后，刘军便与后金军遭遇，然而东路军作战十分勇猛，迅速击溃了后金军，使之死伤2000余人。三月初三。东路刘军已经距赫图阿拉约70里，将至阿布达里冈。

努尔哈赤先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诱骗刘孤军深入。刘唯恐杜松独得头功便急命轻军前进。阿布达里冈一带地形重峦叠嶂、隘路险夷，刘督令兵马单列急进。三月初四凌晨，努尔哈赤再令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4万余人，迅速前往东路迎敌。努尔哈赤则率领2万大军坐镇赫图阿拉防守，以防南路李如柏军的进攻。三月初五，皇太极占领阿布达里冈山顶，从上而下攻打，代善则攻打明军侧翼，刘败退往瓦尔喀什山前时遭达尔汉、阿敏假冒西路杜松军的后金军，刘误以为援军到达，后金兵发动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兵马大乱。刘败走至瓦尔喀什之旷野时，后金军蜂拥四起，将刘军包围，刘死战厮杀，最终战死，其义子刘招孙最是骁勇，结果身中数箭而死。管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管备御周翼明、赞理为同知黄宗周全部阵亡。

此后，后金军再进击刘余部与朝鲜军。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海盖兵备副使康应干率明军与朝鲜主帅姜弘立率朝鲜军，到达富察之野，下令军队安营。营刚扎下，后金二贝勒代善统领数万骑兵于富察之野打败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海

盖兵备副使康应干，康应干仅以只身逃脱。乔一琦则兵败，率残兵奔向朝鲜营。后金军转攻朝鲜军，左助防将金应河战死，右助防将李一元被击溃。三月初五，朝鲜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中军官虞侯安汝讷、分领边裨防御使文希圣及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战败投降。而明军将领乔一琦亦走投无路，留下遗书，投崖而死（一说自缢而死）。东路明军全军覆没。



满洲实录中姜弘立率兵归降图

关于朝鲜军的投降，其实很值得一说，当初大明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其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大明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国王光海君却是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就在光海君对大明之要求百般推诿时，而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光海君李珲为宣祖的庶二子，自幼足智多谋，其长兄临海君李珒虽为长子，但

是不为宣祖所宠爱。于是，身为庶次子的李珲自幼便被视为王位继承的合理人选。“壬辰倭乱”爆发后，宣祖仓皇出奔平壤，以时年17岁的李珲总摄国事，在这场战争中，李珲也的确表现得很是出色，更是为他继承王位攒足了政治资本。于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宣祖正式册封光海君为世子，随后依制上表大明，请求批准。然而，大明帝国礼部却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为由不许。

此后在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王国又多次上表请求易储，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大明帝国正因为“国本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故而屡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而这在朝鲜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以至于令光海君颜面尽失。从此之后，光海君开始对大明帝国暗有怨言。万历三十六年，宣祖薨，光海君继位，并上表大明帝国，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然而，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而礼部也拒绝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幸亏朝鲜使臣李好闵声称临海君患有精神疾病，自愿让位于光海君，并通过大量白银贿赂，才终使大明礼部敕使入汉阳，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虽然最终被册封为王，但大明帝国的态度对于光海君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耻大辱，以至于这位国王从此对大明心存芥蒂。

此后不得已，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1.3万，往援辽东。但是 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卒与后金军开战外，大部分朝鲜军是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史载：“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

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

客观地说，光海君倒不是无道之君，他自即位起，励精图治，对内实行改革，为稳定民生而努力。但所万万不幸的是，此时正是大明帝国灭亡之前与大清帝国崛起之前的历史大环境。萨尔浒之战前，大明帝国令朝鲜出兵助剿，但光海君认为“老

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但又不敢拒绝大明帝国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并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此后，他又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大明帝国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则“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至后来，但凡大明帝国要求朝鲜王国增兵辽东，光海君都是以各种借口搪塞，拒不出兵。乃至于到后来，宣承大明皇帝圣旨的“贺登极使”吴允谦赍敕而回、推官孟良性奉敕而来的时候，他竟是托病不出，屡次退日而“终不得迎”，很显然此举公然拒绝接旨，形同背弃大明。而在当时的李氏朝鲜，儒教思想根深蒂固，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光海君的此举虽然在本意上是挽救了朝鲜王国不被卷入到辽东的战争，但却使得自己陷入危机中。

高句丽、百济亡灭的教训，使得此后统一新罗、高丽的王朝一直都是持有、奉行着“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但有时候这种“以小事大”也会因为统治阶层所产生的误判，从而给朝鲜半岛带来政权更替的祸事。洪武二十五年，右侍中裴克廉胁迫恭愍王妃废黜“恭让王”后，李成桂在松都寿昌宫即位，取代高丽王国建立了李氏朝鲜。此后，“事大主义”成为了朝鲜王国的基本国策，乃至于朝鲜不仅视大明帝国为君父，甚至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大明帝国册封才算为合法。这种全身心投入的“以小事大”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光海君李珲对大明的态度自然是为自己惹来了灾难。

“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宣祖奔义州，向“父母之邦”求援，神宗遂派大军援朝，正是因为大明帝国的庇护，朝鲜王国才避免了亡国之运。此后，举国上下都感激于大明帝国的“再造之恩”，故而士大夫们是不能容忍出现对天朝不忠的事情。也因此，光海君所持有的“不背明，不怒金”的外交政策自然而然地引来了群臣的攻击，以至于群臣不分党派对光海君群起而攻之，甚至表示宁得罪光海君也不愿得罪大明帝国。备边司本是总领中央和地方军务、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全面事务的机构，然而以备边司为首的群臣却是不仅公然反抗光海君，甚至不顾光海君的抗议，强迫光海君上尊号：“建义守正彰道崇业”，这其中的“义”“正”“道”代表了朝鲜对大明帝国应有的道义。很显然，以备边司为首的群臣是想借此警告光海君身为大明之臣的立场。这个时候，对光海君来说，他已经是彻底地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而如果没有了这股支撑王权的力量，他被废黜的命运便也是几成定局了。

大明天启三年，在国王左右任事的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

阳城，城中的训练都监竟是倒戈相向，以至于政变兵不血刃便已达成。次日，叛乱主谋绫阳君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仁祖。对于光海君的处置，仁祖是以宣祖的继妃“仁穆大妃”的名义颁布懿旨，从而将自己的叔父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废黜，继而用石灰烧瞎双目，贬为庶人，流放于江华岛。此次政变便是在朝鲜历史上有着极为深刻影响的“仁祖反正”。



在刘綎大军覆灭之后，四路大军，也就只剩下了南路了，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余所组成的南路军，出师最晚，于三月初一由清河堡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史载，李如柏由父荫为锦衣千户。因饮酒误事，被免职。再以父荫授铁岭卫都指挥佥事，历任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等职。万历十六（1588）年被劾，解职。后充宣府参将，因疾辞官。嗣明征朝鲜，如柏署都督佥事，率师援拔平壤、夺开城有功，晋都督同知，继任贵州总兵；万历二十三年（1595）转守宁夏，晋右都督，再因病辞官。家居20余年，明末辽东危，无将可守，再起用李如柏。击退蒙古炒花部，加封将军、右军都府右都督。李如柏晚年贪生怕死，亦毫无战意，所以南路军进军援慢。

此时西路杜松军、北路马林军相继战败，李如柏大惊失色。三月四日，副参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言火速与刘会合，拯救东路刘军。李如柏没有采纳，结果东路刘军全军覆没。三月初六，经略杨镐急令南路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接令后，急命回军，后金军游哨探二十见之，登山鸣螺，大声呼噪，作大军追击状，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者千余人。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此战，大明帝国倾全国之力，前后调兵遣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结果从杜松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十余万大军被努尔哈赤彻底打垮，四路大军三路丧师，伤亡者4.58万余人、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310多人，丢失马、骡、骆驼等兽2.8万余匹，损失火器大小枪炮2万余件。此战本来明军军力上是以多战少，却因兵力分散，各路联系困难，加上将帅不和、用人不当、师期泄露、叛将通敌和欲速战速决，反而让后金军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以攻为守，集中兵力由以少战多变成以多战少，最终取得了胜利。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说，可以说此役是大明帝国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此战之后，彻底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大明帝国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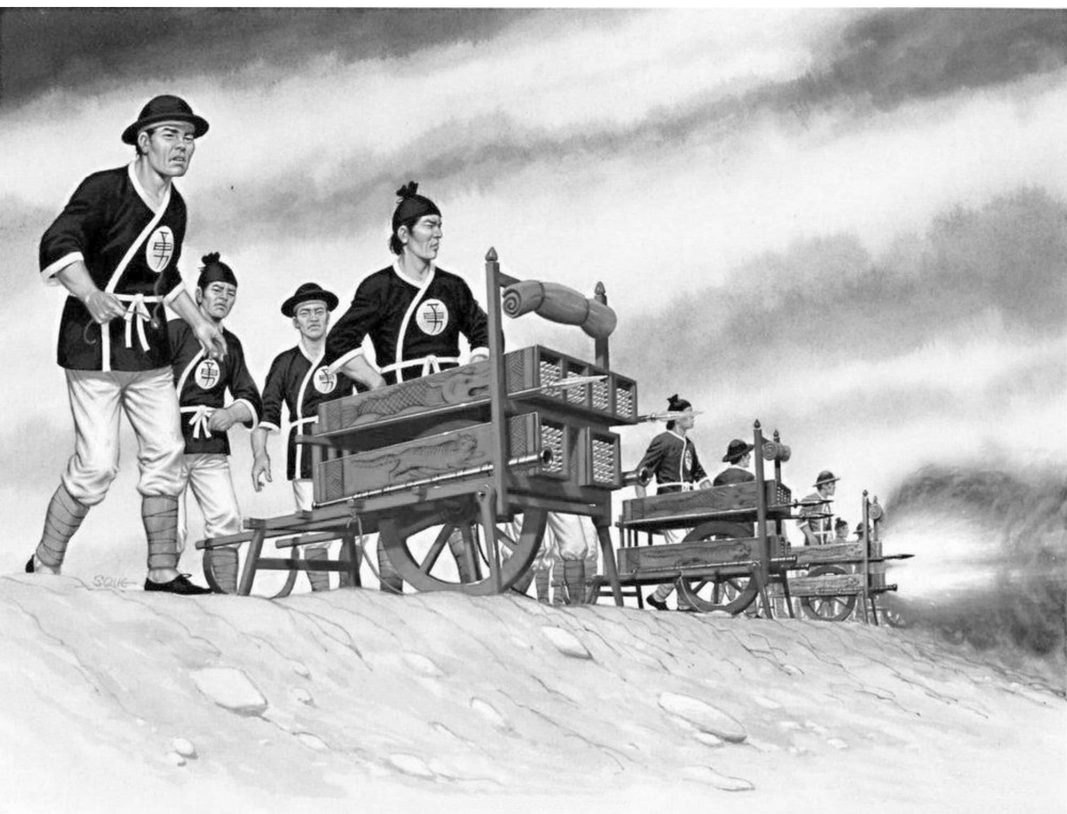
而对于臣属于大明的蒙古、李氏朝鲜、叶赫等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仁祖反正后，李氏朝鲜仁祖奉行的继续亲明的立场，直接导致了后来满清两次

毁灭性的军事报复，终不免丧权辱国，沦为满清藩属。

而蒙古则分裂成东、中、西三大部分，东部科尔沁部则结交后金，而中部由林丹汗统治与大明帝国结交共抗满清，直至被满清打败为止，西部准噶尔部等部落则一直抗争至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才被满清征服。

叶赫，则因作为大明帝国的北路军出兵参与了萨尔浒之战，而引来了后金的报复，趁着明军大败，无力再对后金发动攻势之机，努尔哈赤决定趁势发兵再征叶赫，并发誓不灭叶赫绝不还。当年八月，努尔哈赤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统率一军，谎称征讨蒙古，实则绕路奔袭布扬古驻守的叶赫西城；另一路由额亦都等假扮“蒙古兵”攻打金台石驻守的叶赫东城。努尔哈赤则亲率大军将叶赫东城团团围住，彻底切断东西二城之间联系。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叶赫东西二城均为山城，十分坚固，尤其叶赫东城有城四层、木栅一层，城内防御工事齐全。禁城中有八角楼，是金台石的家眷、财产之所在，是攻坚的重点所在。布扬古、金台石见后金兵到，出城迎敌，两军混战，叶赫不敌，布扬古、金台石遂各自退入城中坚守。而后金兵猛攻东城，先后毁其栅城和数重外城，但东城守军仍于内城死战，后金军不断用云梯猛攻内城，伤亡很大。努尔哈赤遂命将士挖其城墙，后金军冒着飞矢巨石，终于攻破内城。金台石见内城被攻陷，带妻和幼子登上八角楼。努尔哈赤让其子、也是金台石外甥的皇太极对其劝降，被金台石拒绝。金台石举火自焚，未果，被后金军缢杀。

布扬古见金台石已死、东城已陷，加之代善许以不死，遂开西城而降，但随后即被努尔哈赤以参拜不恭为由处死。大明帝国派来助战之游击马时楠等1000人也被全歼。后金对包括金台石、布扬古家眷在内的所有叶赫降民“父子兄弟不分、亲戚不离、原封不动”地带回建州。至此，努尔哈赤消灭扈伦四部的最后一个对手叶赫，将海西女真全部吞并。

第三章　决战辽东

萨尔浒大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大明帝国在辽东的经略由于攻势，不得不转为守势，而后金则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带给努尔哈赤的是更加勃勃的野心。其实，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正月时，辽东经略杨镐派遣使臣到后金和谈时，努尔哈赤所提出的谈和条件中，最为过分的只以求裂土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虽然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但“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大明王朝抗衡的决心。而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大明已经是无所畏惧了，除了公开称自己为“后金国”之外，还公然称明廷为“南朝”，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地位。

而大明帝国满朝文武得知这个消息，还是从李氏朝鲜那边传来的，在这之前，大明帝国上下居然都不知此消息。此后，又得知努尔哈赤正式称大金国皇帝，朝野上下，更是愤怒不已，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一个建州卫指挥使居然“黄衣称朕”，在满朝大臣的眼里，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虽然甚是气愤，却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萨尔浒大战使得大明已经彻底没有力量去打击后金了。

其实萨尔浒大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朝野上下面对财政危机已是一筹莫展的局面。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可神宗皇帝早就不是即位初期的那位皇帝了，数十年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以至于朝纲逐渐废弛。众臣无奈之下，在抱怨皇帝置天下于不顾，甚至只能把如何请神宗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正如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所说那样，今日廷臣见皇帝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好不容易筹措了军费，可一场大战，四路大军败北，文武将吏前后死者310余人，军士4.58万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于是朝议纷纭，众人皆弹劾杨镐，称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300多万，居然丧师失地，是为可恨。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追究杨镐责任的时候，史载，萨尔浒战败消息传来，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此后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依然留中不问。此后，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可对于出兵问题，谁都知道帝国几乎没有能力再战，又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辞，苟且支吾，相互推诿，直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此后，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10万，每年用饷银300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压根掏不出这么多钱。不久，朝

议又议定募兵18万，但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300万两，国库空虚，又哪里掏得出这么多钱。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于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200万，合计500万。其结果是什么？神宗皇帝居然只肯发币金40万，以供募集军士，甚至这位皇帝还在诏书中诉苦说：朕悉览请发内币奏文，朕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

计算一下，辽东每年饷银就需要800万，而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也就自然只能对贫民展开剥削了，于是中府会议不得不决定开始征派辽饷，所谓辽饷亦称新饷，明初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22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380万两。辽东战起，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1720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400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也就是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合计加征银两480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300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400万两。天启时，又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如此重赋，几乎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

然而，这么多饷银，却不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发放到兵士手中，用到作战的需要上。各级官僚和将领，都在军饷的收支上贪污和克扣。所以，才有了后来户部尚书毕自严称："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毕自严在萨尔浒之战时，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这是通过从登、莱海运到娘娘宫登陆，然后陆运到广宁、辽阳，每一石军粮费一金，故其对明末军饷的窘迫感触最深，也因此才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语来。

此外，萨尔浒一战，也震撼了大明帝国200年的统治基础，当初"清兵克旅顺，明人记载谓之东事起"，因为抚顺城失守，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闪失，就直接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危。于是，在考虑到辽东的驻军战斗力很弱，就如同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曾说过"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兵士"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遇到大明才决定从全国各地调遣，并且委派了"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之前，鉴于建州的突袭和辽东的军力，大明帝国内阁对辽东所达成意

见是一致的，即“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可结果呢，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辽东已经有四路大军齐集，号称47万，一战之下，努尔哈赤的建州兵在五天内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取得完胜，明军惨败，所谓“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更是人心动摇、惊恐万状，“人心恇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正如大学士方从哲所说的那样：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目，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18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一直以来，大明帝国之初还算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帝国，先有明太祖、成祖拓展疆土，其次有仁宣之治尚且称职，后来的皇帝则乏善可陈，并不热衷于帝国版图的扩大。太祖时期遂列有15“不征之国”，严禁子孙后代妄动刀兵。成祖之后，连下西洋也被禁止了，甚至几番血战夺来的安南也放弃了。随着国力的衰弱，竟频频遭北元威胁入侵，先后土木堡之败，皇帝被擒，后有瓦剌围北京城之事，而嘉靖年间有倭寇骚扰多年，帝国却无力剿除。对于辽东女真，帝国一直是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也就是对部落首领封官授爵，同时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并对其不同部落或扶植或打击，使其无法统一，继而更加无法进犯帝国了，可结果呢？最初的时候“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说不够成功，携帝国之大威力，威逼利诱之下，倒也能够制衡女真，可努尔哈赤却利用了大明帝国朝廷上下的腐败、混乱，而统一女真，趁机坐大。

萨尔浒之战前，后金东有朝鲜，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而萨尔浒大战也是大明帝国精心组织的第一次反击战，本意是汇集明帝国、朝鲜、叶赫部三方面形成之优势兵力，围歼建州都城，解除建州

之武装，断绝建州之妄想，结果是战后，朝鲜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大明，但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出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也就只能保持观望了。这样，再加上努尔哈赤对于大明帝国再也无所畏惧，所以后金开始用兵频繁，出入无常。

应该说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和大明朝命运的转折点，就如同史料所评论的那样“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大明帝国的军事部属由攻转守，且再也无力主动对后金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后金则从试探性地进攻明朝，发展为更加主动地大举进犯。同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西120里的界凡城修筑衙门、行宫，迁居界凡以准备进一步伐明。

在萨尔浒之战后，明廷虽然试图重整旗鼓再战，但却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而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努尔哈赤虽然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40多天，但见明兵不再来，于是撤兵归寨。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铁骑进兵辽沈地区。

萨尔浒之战大胜两个月后，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十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4万攻打开原。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暴涨，行进艰难。冒雨前行的努尔哈赤为了不走漏消息，于是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就在这小股人马佯装进攻沈阳，沿途杀30余人、俘20人虚张声势时，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至靖安堡，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努尔哈赤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史书上说郑之范“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由这样的官员负责城中事务，开原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在这之前，萨尔浒大战后，待罪开原的总兵官马林也在努力构筑防御，他非常清楚，凭自己的力量想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相抗衡是不可能的。他曾在五月间，多次向辽阳申请增兵，但此时辽东战场刚刚崩溃，哪里还有兵可派。于是，马林为了能守住开原，转而寄希望于蒙古。马林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24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

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已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相，又不听众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

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显然，守军的大意和守将的昏庸，为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在得知开原无雨后，努尔哈赤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当马林自恃自己与蒙古喀尔喀部贝勒介赛有盟约，而介赛也答应如后金军至会率兵相助，故而对开原并未设防时，努尔哈赤却是做了完善而又周密的攻城准备。正如《三朝辽事实录》中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努尔哈赤一边外联宰、煖二十四营，一边派人混入开原城内，以为内应。

六月十六日，后金四万大军兵临开原城下。史载，后金军突至时，开原守军毫无准备，当得知后金大兵压境时，他们的战马因无草料，还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就牧，以至于接到战报后仓促往回返，可见其防御松懈之程度。于是，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围攻开原，宰、煖各部也纷纷出兵，先抢占庆云堡，兵围镇西堡，从西部牵制明军，声援后金军。

开原有四个城门：东为阳和门，西为庆云门，南为迎恩门，北为安远门。后金军围城之后，一方面从南、北、西三面攻城，另一面则在东门进行夺门之战。关于此战，《明史·马芳传》有记载："林列众城外，分少兵登陴。大清兵设楯梯进攻，而别以精骑击破林军之营东门外者。军士争门入，遂乘势夺门，攻城兵亦踰城入。"也就是说，面对后金兵的到来，总兵马林等率军在城外列阵，仅用少部分兵士在城上防守，后金兵用楯车云梯向城上发动进攻，同时以精兵冲击列阵于东门外的马林军，明军并没抵抗多久便败下阵来，仓皇逃进城中。同时，混入城内的"奸细"，也从内部响应，趁乱行动，以配合后金兵夺门，在内有奸细，而外有猛攻的情况下，顷刻间城门便被打开，大批八旗兵涌进城中。此外，其他方向的后金军此时也得手了，他们从城墙上进入城内。后金兵入城后，分兵两路，一路对付城内的明军，一部分据城而守，击杀城外向城内逃窜的明军。由于开原城周围挖有城壕，本是用来拱卫城池的，现在反倒成了明军进城的障碍，城外明军此时前后受敌，阻于壕外而不得渡，全部被消灭，马林战死城外，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败死，之后推官郑之范受伤，从西门逃走。

城中民众早已料知城必失守，破城之时，一些人怕遭到屠戮和污辱，未待城破，事先上吊而死。据朝鲜史料记载："开原城中多节义之士，兵才及城，人争缢

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全城十多万居民，仅有千人逃出。

开原乃辽东，人口众多，物资雄厚，财产、玉帛多达“数百万”。努尔哈赤为将这些财物运送建州，不得不停留此处数日，而当后金军驻扎三天内，明军竟然无一兵一卒来援，以至于后金军最终从容分财、处理俘虏，最后焚开原城而去。

其实在开原城破以前，在沈阳有总兵官李如桢所部，贺世贤驻扎在虎皮驿。当开原城危急，急需待援的时候，李如桢却是胆怯畏战，先是拥兵在团山，又进到十方寺堡，以天雨为借口，不肯增援。这时，努尔哈赤率领兵卒在开原城内搜集钱财，饮酒欢宴，对明军是个攻击的良机。参将贺世贤急趋开原，他想率领士卒冲进城去，而部下士卒个个怯战，竟一哄而散，致使开原城被努尔哈赤从容抢掠。

努尔哈赤之所以先攻打开原并不是没有目的性的，开原是座古城，在大元帝国时，它是开元路中心所在。《元史·地理志》载：“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后乃臣服，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开元之名源于东夏，是沿袭东夏国的开元路旧制。元灭东夏后，先后设置万户府、宣抚司，最初的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依兰县附近或宁安县一带，后移至黄龙府。至元二十三年设置开元路，治于黄龙府，隶属辽阳行省。至正二年，移治于咸平府，也就是如今的开原了。

关于此处的位置重要性，如《元一统志》所称：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故城，亦东北一都会也”。所谓“三京故国”是指渤海的上京龙泉府、金代的上京会宁府和东夏的南京，而“五国故城”是指辽代五国部故城，即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至于所谓“鲸川之海”，即今俄罗斯鄂霍次克海。

大明建国后，在此地设三万卫、辽海卫、安乐州。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宰相刘伯温建议改“开元”为“开原”，既不变原名之音，又不变其开拓元创、宏大伟岸、吉祥安康之意，而这里由于西遏蒙古，北控海西，东逼建州，南屏沈阳和辽阳，故而也是一个军事要地，明时军事城堡分五个类型：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城。开原为路城，在辽东，它是仅次于辽阳和广宁的军事重镇，是明辽东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开原横亘在后金和叶赫之间，成为后金廓清辽北，统一女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而努尔哈赤如果试图辽沈，就必须解除来自开原方面的威胁。

开原被攻克以后，辽地一片混乱，沈阳、铁岭等地的军民纷逃跑，辽左众城危在旦夕，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此时，自鸭绿江东南到西北一带诸城堡，抚顺、清河、永甸、新甸、长甸、大甸、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洒马吉、散羊峪、马根丹、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儿、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等数十个城堡都被后金所攻占了。而开原是辽河以东的根本重地，开原一破，河东重镇仅仅剩下辽阳、沈阳、铁岭，而铁岭又因为是辽北的一座孤城，故而首当其冲。

铁岭隋时，境域属高句丽辖地。唐时境域南部属安东都护府，西北部属枯漠都督府，昌图曾归渤海鸭绿府、扶余府管辖。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改富州，即今铁岭城。后辽太祖在此地冶炼银子，故将富州改为银州，辽朝时期境域大部分属东京道辽阳府。金朝时期，境域南部属东京路咸平府，西部属北京路，东北部属上京路会宁府。元朝时期，境域西部属中书省会昌路，其余属开原路咸平府。明时，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由于是一座卫城，故而铁岭也是明在辽北仅次于开原的一座重要城堡，素有沈阳北门钥匙之称。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开原失守后，辽东明军应立即调兵遣将固守铁岭，经略杨镐令李如桢驻兵沈阳，南北策应。令贺世贤驻守虎皮驿，往来应援。沈阳距离铁岭120里，虎皮驿距离铁岭180里。明经、抚各官的军事意图十分明显，即准备增援铁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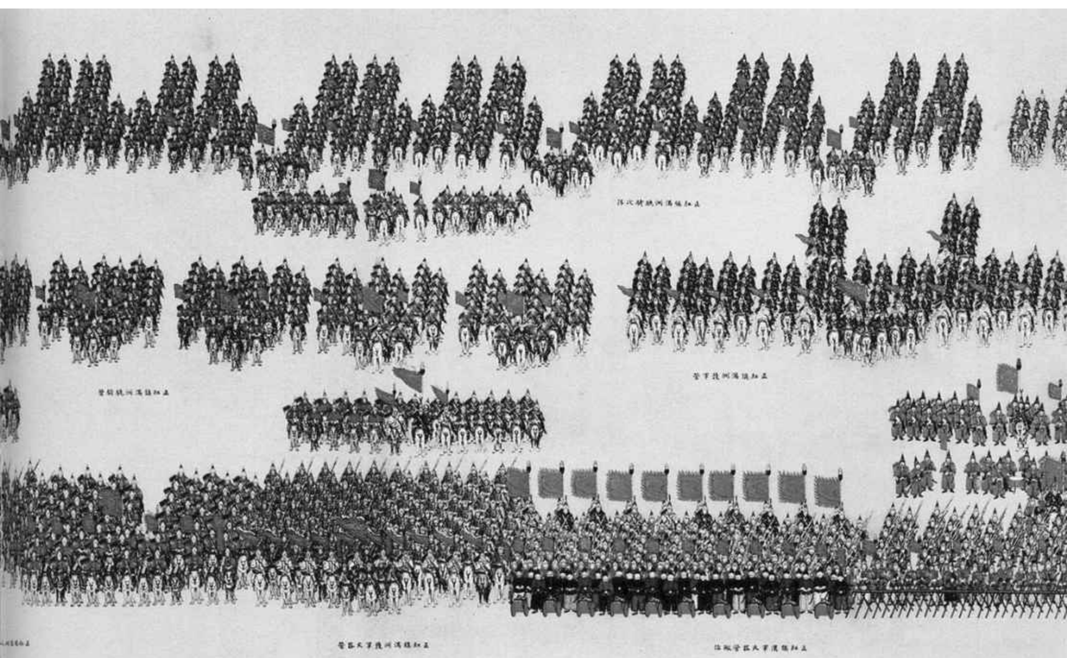
然而，此举虽然明智，但用人方面却欠考虑，如果铁岭再失，则辽北尽失，帝国在辽北的势力便荡然无存了。正是由于这种考虑，一时间，大明帝国上下对于铁岭也非常重视，辽东已危在旦夕，朝廷无镇辽将军可派。有大臣以为，李成梁久镇辽东，在辽人心中威望极高，女真人当年闻其名则胆寒，如今李成梁虽然不在了，但他的后人还在，建议用其后人镇守铁岭，以李氏旧威或许还能够让边人惮服。再者铁岭是李氏宗族坟墓所在，而李成梁的家族也在铁岭，由李氏守铁岭是最佳选择。于是经略杨镐和巡抚周永春上书朝廷，将李成梁第三子李如桢调到了辽东。

关于此事，史书中有所记载：“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荫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尝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40年。最后，军政拾遗，部议罢职，章久留不下。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抚周永春以为言。而是

时如柏兄弟独如桢在，兵部尚书黄嘉善遂徇其请，以如桢名上，帝即可之。时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也。”

不过正如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如桢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讲钧礼，朝议哗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桢始怏怏去。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铁岭故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当如柏还京，其族党部曲高赀者悉随之而西，城中为空。后镐以孤城难守，令如桢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防守”。

也就是说考虑到李如桢不过是以父荫为指挥使，官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曾掌南、北镇抚司，而且“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故而在李如桢到任不久，杨镐就将其调回沈阳，沈阳铁岭仅百余里，杨镐试图以李如桢镇守沈阳，可随时策应铁岭。



八旗兵

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他从开原得到的数百万财物中，分出十数万，送往蒙古宰、煖和炒花，引诱他们东攻辽沈，西扰广宁，以声援后金军进犯铁岭。七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贝勒大臣，统兵数万大军向铁

岭进发，大军出三岔儿堡，入老边十四五里时，明铁岭守将游击李克泰已经得到了消息，他将努尔哈赤兵进逼铁岭的消息飞报给沈阳总兵李如桢。同时把近城各个小堡的军民收入城中。

努尔哈赤兵围铁岭之后，分四面攻城。城上游击喻成名、吴贡卿、史凤鸣、李克泰等率军坚守，放火炮，发矢石，八旗兵死伤很多。铁岭兵民，“一城皆忠义”，拼死守城。天命汗派兵竖起云梯，登城毁障，虽然上守兵以火炮、鸟枪还击，矢石齐发，拼死抵抗。然而，努尔哈赤的攻势凌厉，战斗自寅时开始，辰时铁岭北城便被攻克。同时，被收买的丁碧也打开城门，史载“参将丁碧开门迎敌”，于是后金军就蜂拥而入。

八旗兵冲入城中，顿时城内一时大乱，双方进行了激烈巷战。守城署事游击李克泰、缘事游击喻成名、新兵游击吴贡卿、督防判官涂必达等，先后战死，惟有新任游击王文鼎等逾城逃跑了。城内军丁战死4000多人，居民男女被杀、被俘的近万人。

当游击喻成名等因外无援兵，内有叛徒，城陷之后，力战阵亡时，援军在哪里呢？李如桢得报后，缩首不前，根本就没有立即驰援，本来用一昼夜的时间便可到达铁岭，然而，到二十五日，他还徘徊在途中。铁岭辰时陷落，申时他才到达新兴铺，还不肯急速增援，坐待贺世贤从虎皮驿到来。正如山东巡按陈王庭参劾李如桢言：“据七月二十四日酉时，署铁岭游击李克泰以虏入三岔儿堡，紧急夷情飞报李如桢矣。闻虏距边只十四五里，设使亲提一旅，衔枚疾趋，一夜可度铁岭。虏闻援至，自不得不解铁岭之围，何乃缩朒观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时，方抵新兴铺，俟贺镇守兵至方才合营，而铁岭于是日辰时陷矣。”

铁岭失陷后，城中士卒遭到残酷的屠杀。后金屯兵三日，将所获人畜，论功分赏给三军。据记载：铁岭陷后城内军丁死亡4000余人，城乡男妇被杀掳万余人。

城陷以后，努尔哈赤乘马从容入城，住在城守道的大衙门，同时令八旗兵一部分守城，防止明军增援，一部分清理财物、俘虏。此后在得知李如桢率军来援后，他又命令整队准备迎击，可李如桢却距城15里以外扎营，不肯接近铁岭城。而当贺世贤建议向铁岭城冲击时，李如侦依然不肯。此时，蒙古宰赛贝勒正率领儿子色特希尔、喀什克图和扎鲁特部、科尔沁部贝勒巴克、巴雅尔图、色本等，统兵万余而来。

铁岭陷落后的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清晨，蒙古大军赶到铁岭城外，伏兵于高粱

地中。后金厮卒出城放马，被杀了十多个人。守城兵报入，努尔哈赤急令整兵出城，遇见大贝勒，怒而问道：“为什么不战？”大贝勒代善回答说：“这是宰赛、巴克、色本的兵，杀了恐怕后悔。”努尔哈赤愤而列举宰赛等人的罪状：“蒙古夺娶已经配给我的锦台什之女，袭击我乌扎鲁村，以铁锁逮系我使者和托，向明廷事乞赏，并发誓与明合兵，杀了他们有什么可悔的。”于是，下令八旗兵急速进战。大贝勒代善率兵向蒙古兵冲去。宰赛等兵丁缺乏严格的训练，稍一接战就纷纷溃退了。八旗兵沿着辽河岸猛追，杀了很多人。宰赛贝勒和两个儿子，扎鲁特的巴克、色本兄弟，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阿尔塞，宰赛的妹丈岱葛尔塔布囊等共150多人被俘。当宰赛等蒙古兵败后，铁岭城内外伏尸蔽野，李如祯居然率领军卒割取后金死兵首级170多余，报功而还。

铁岭陷落之后，朝中言官纷纷交章论劾李如桢，经略熊廷弼疏论其罪。李如桢以拥兵不救、失陷铁岭罪，被罢任。后言官又攻其罪，被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李如桢被免死充军。杨镐先后以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三个儿子如梅、如柏、如桢为总兵，如梅败于朝鲜岛山之役；如柏贪淫跋扈，放情酒色，羞于萨尔浒之役，后引罪自杀；如桢虽将家子，却不知兵，则辱于铁岭之役，后下狱论死。正如《明史·李成梁传》论道：“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很显然李如桢的怯阵无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努尔哈赤攻克铁岭后，明军在关外尽管还有7万多人，但对努尔哈赤的进攻阻挡不力。以至于努尔哈赤统兵一出，沿边各城军民都望风奔溃，辽东一带城堡相次陷落。而这一连串的失败，又导致了朝内的言官开始大规模的上疏问罪，鉴于经略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非但不能立功自赎，反而使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弄得辽事愈加不可收拾。八月二日，万历皇帝旨令熊廷弼出关代替杨镐经略辽东。八月十三日，押杨镐入京问罪。大明帝国从上到下，认为更换经略就可以扭转辽东局势，其实不然，萨尔浒之战所导致明金关系的转折是历史性的，开原、铁岭的再陷，不过是这种转折的继续和发展罢了。从此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宁日。

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此时他面临着一个选择，那就是向东发展，还是向西攻略的问题。在连下开原、铁岭之后，后金面临着统一辽河以东，与辽东明军进行辽沈决战的局面。不过，努尔哈赤深知明廷要抵抗八旗兵向前推进，恢复开原、铁岭两大重镇，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目的的，故而为了巩固后方，他决心统一女真内部。其实一直以来，统一女真与对大明交战是同时进行的，即当统一女真的行动遇到明

军干涉，不能继续进行时，就对明开战；只有迫使明军无力干涉，暂时扫除了统一障碍时，在积聚了人力、财力后，再积极推进女真内部的统一。

在后金建国后，努尔哈赤就开始对东海余部和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地区进行了统一工作。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七月十九日，努尔哈赤派达尔汉侍卫、硕翁科罗等率兵2000，统一萨哈连部和虎尔哈部。大军行到乌尔简河时，后金军造船200艘，水陆并进。八月十九日，到达黑龙江地区，袭取萨哈连部江北毛孔大臣所在的16乡，江南九乡和鲍吉里所在的虎尔哈部11乡，共收服36乡。十月，回军时，顺路收服阴达浑塔库喇喇、诺罗、实喇忻三路，共计四十路长归附，至十一月初七日，历时三个月，统一黑龙江至松花江一带1000多里的大片地区。

万历四十五年（天命二年，1617）正月，努尔哈赤派兵400，掠取东海岸边不肯归附的居民。三月，全部收服了东海诸岛，使鹿部全部归附，库页岛从此归入后金的版图。这是努尔哈赤对明用兵前夕，进一步收编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以东诸岛的女真各部，目的是通过统一各部，加强经济实力，所以大军归来以后，曾派出或30人或60人的大型商队，到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同时，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女真人，同时收编所谓“乌龙江达子”，一扩大兵源，加强自身的实力。

此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之后，又开始着手推动对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完成。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十月，东海虎尔哈部的纳克达，率领100多户前来投靠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以示欢迎。他把前来定居和持观望态度的人分作两队，以赐物多寡加以区别。对于来归的八大首领，每人各给阿哈十对，马十匹，耕牛十头。冬衣有豹皮镶边蟒缎皮袭、大褂、貂皮帽、皂靴、彤带。春秋衣有蟒缎无披肩朝衣、蟒袍小褂。四季穿用的衣服、布衫、裤子、被褥等。第二等人，各赐给阿哈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服各五套。第三等人，各赐给阿哈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服三套。最后一等人，各赐给阿哈一对，马一匹，牛一头，衣服一套。此外，还给予居宅、釜、席、缸、瓶、小磁瓶、碗、碟、匙、筷子、水桶、簸箕、槽、盆等家具，应有尽有。

由于努尔哈赤慷慨赐予，虎尔哈部持观望态度的人深受感动，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表示愿意留下，还托付归去的人带信给其他部落说：原来我等只想英明汗杀我们，夺我们的财产，没有料到是为了招来安集，以为羽翼。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正月二十六日，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在积极备战，抗击明四路大军进攻的同时，命令大臣穆哈连统兵1000，招服了虎尔哈

的残部。这样，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南北，西到嫩江，东至东海三部及松花江等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划入了后金的版图。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不仅加强了后金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去了后顾之忧。

此时，攻占了开原、铁岭之后，努尔哈赤迁都萨尔浒山城，为进兵辽沈做准备，并转而用兵于蒙古、叶赫，而对于大明，则仅以试探为主，没有太大的军事行动。而大明，则以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于是军势有所改观。

熊廷弼，字飞百，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武昌府江夏县人。其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却刻苦强记，奋发图强。万历二十五年，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直隶保定府推官。将被税监王虎冤枉缉拿的人员全部释放，并上撤矿疏，因其才能被擢为监察御史、兵部尚书。《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并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外出巡按辽东，正值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主张放弃宽甸所地800里，把当地6万众迁移到内地来安家。过后，评定功绩时，赵楫与李成梁居然还受到奖赏，于是引来言官不满，给事中宋一韩上疏论列了二人之罪。此事被下发给熊廷弼重新核查，在全部查清了赵楫与李成梁放弃疆土、驱民迁移之事，熊廷弼上疏弹劾他二人的罪状，并说到前任巡按大臣何尔健、康丕扬勾结、包庇赵、李二人。但他的奏章竟未被下发给朝臣讨论。此外，熊廷弼还说辽地多有闲地，每年在8万兵额中用三分人力来屯田、耕种，就可以收获粟米130万石，足以解决辽东吃饭问题。对此，神宗大喜，于是命令在边境各处推行。史载，熊廷弼在辽地几年，杜绝送礼，核查军情，审查大将小吏，绝不姑息养奸，辽地的风尚、纲纪为之大振。此外，明史里还有这么一个段子，“是年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于是辽人以为神”。

然而，也就在巡按辽东时，他虽然缮垣建堡，按劾将吏，使得军纪大振，但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并“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故而转而督学南直隶。熊廷弼在南畿为督学时，纪律严明，很有声望。后来，因为棒打生员致死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智相互在奏章中攻击。荆养智递上奏章弃职而去，熊廷弼也因听候核查回家乡去了。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之战大败，辽东攻守之势从此易位。在前辽东经略杨镐被熊廷弼逮解进京下狱，前辽东总兵李如柏被召回北京后自杀。熊廷弼当时屯兵筑城，将辽东局势扭转，于是经廷议，逐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由是人心复固”。

熊廷弼出守辽东时，首先便是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继而提出自己经略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修建700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7座、墩台100余座，还建粮仓17所，三年之内囤积粮谷30万石。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不过，就在熊廷弼还没有离开京城，开原就丢失了，对此熊廷弼上疏说：“辽左，是京城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想保住辽东的话，开原一定不能放弃。建奴没有攻下开原的时候，北关叶赫、朝鲜还足以给他们构成腹背之患，现在开原丢失，叶赫不敢不向建奴屈服，至于朝鲜，建奴若是派一个使臣去，朝鲜不敢不附从。建奴没有腹背之忧，一定倾尽全力攻打辽东诸镇，这样一来，辽、沈怎么守得住呢？如果要守住辽沈，朝廷必须抓紧时间，准备粮草，修造器械，并不要节制辽东军费……”

这份奏章递上去以后，居然得到了神宗全部允准。神宗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在神宗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此后，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刚出山海关，铁岭又失。一时间，辽沈一带人心不安。史载，熊廷弼刚到辽地时，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虎皮驿，大哭而返。于是，熊廷弼亲往巡视，从虎皮驿抵达沈阳，又冒雪夜往抚顺。总兵贺世贤用距离敌人太近来阻挠他，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想不到我会来的。”于是，打鼓奏乐进入抚顺城。

此后，熊廷弼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首，以祭奠死节的将士，同时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并上疏弹劾、罢免了总兵官李如桢，用李怀信替换之。此外，他还督促士兵打造战车，置办火器，开挖战壕，修筑城墙，做御敌守城的准备。

但他的这种消极防守，却也引来了言官谤议攻击，甚至是从未间断，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神宗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根据《明史·熊廷弼传》的记载，凡是熊廷弼向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

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此外，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愒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神宗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这位皇帝临死之前，依然对熊廷弼于辽东的方略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且还要逐一批答。


明光宗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遗诏宣布立皇贵妃郑氏为继室皇后，在神宗皇帝刚死之时，皇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同时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初一，太子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然而九月，在位不足30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

案”之中暴毙。

史载，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帝位为明光宗，拟定改元泰昌，并谥先皇为“神宗”，但没有尊封郑贵妃。郑贵妃担心新帝在为福王争储与梃击案怀恨，献给新帝八名（一说四名）美女以邀其欢心。光宗大喜，尽情享乐。或许由于纵欲过度，明光宗在八月初十日即开始生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连泻三四十次，乃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

八月二十九日起，皇帝连续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病情稍缓，精神好转，直赞李为“忠臣”；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殂，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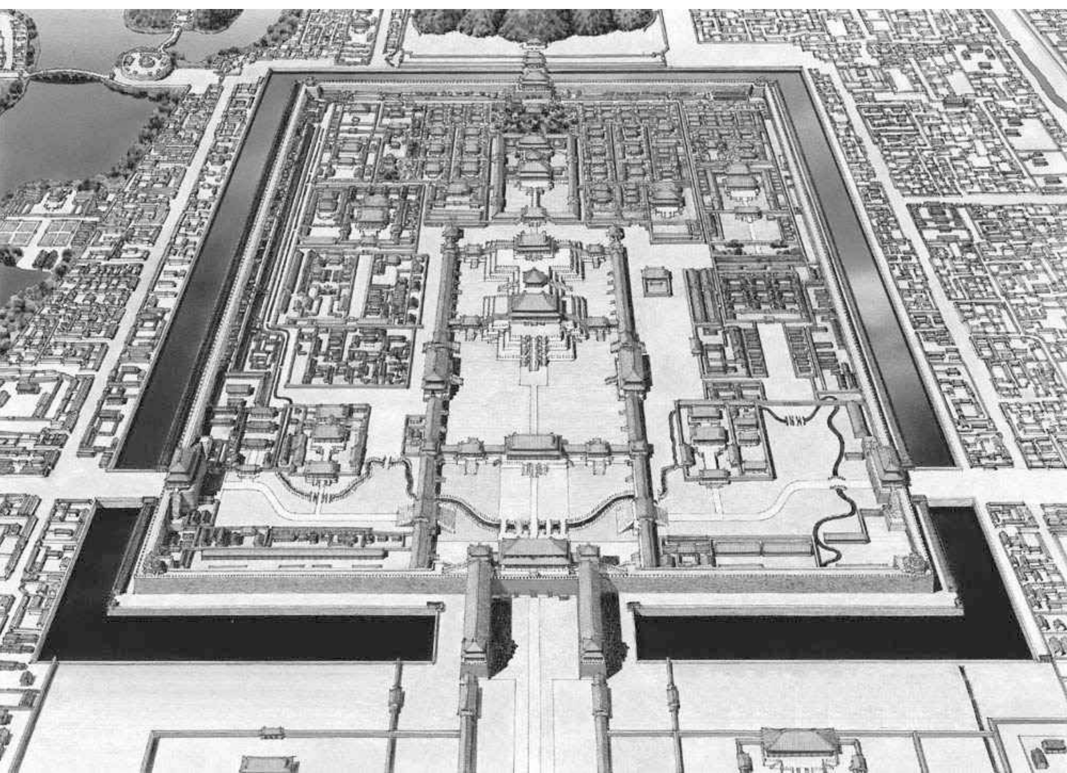
光宗猝逝，党争便起，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另，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而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借由对李可灼罚银50两、罚俸一年等动作，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阴谋论”；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于是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

史载，光宗皇帝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皇长子朱由校因为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故而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一直是被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

明光宗登基后，西李选侍带着朱由校以及亲生女儿乐安公主，一起迁入乾清宫。于是，西李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就在光宗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光宗皇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西李侍的阻拦。此后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

史载，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随即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叩拜，杨涟、刘一燝等人在商议之后决定以本月六日（1620）举行登基大典。但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寝宫居

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实一直以来，李选侍对朱由校一点也不好，后来这位皇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据史料记载，熹宗由于其父光宗皇帝不得神宗皇帝的宠爱，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神宗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故而备受李选侍凌辱，以至于最终早死，据说王才人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从而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明皇宫

当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此后，随着登基大典日期迫近，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

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于是，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逼迫李选侍移出。此外，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在逼迫之下，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乐安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到仁寿殿后给无名封宫御养老的哕鸾宫。

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史称熹宗。不过，李选侍虽已"移宫"，但事情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于是，御史贾继春上疏指责主张移宫的东林党人，"谓不由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龙体未寒，遂不能保其姬女"。 甚至反对移宫的官员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熹宗违背孝悌之道。

就这样，党争再起，两派官员争吵不已，直到熹宗朱由校出面干涉，称"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移宫案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排除异己，打击宿敌。不久阉党崛起，东林党人又遭到血腥镇压，自此大明帝国再无宁日，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妖书案，到后来的移宫案，表面上的问题都是起源于所谓的"国本之争"，但实际上却是激烈的党争，这漫长的党争一直伴随着大明走向没落、直到南明灭亡为止。

客观上说，光宗皇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他却是做了不少实事，譬如：废矿税、饷边防、补官缺等。史载，光宗登基之后，首先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所谓矿税乃是万历二十四年乙酉，神宗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而派遣太监采矿所设。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可是，开矿内监们既不懂堪舆，也不可能懂地质学，所谓的开矿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敲诈勒索运动。其常用手法是寻找当地富庶人家，随口指称其家地下有矿脉，或是其家祖坟下有矿脉，使用各种招数，总之要敲诈出一笔巨额财富出来方才罢休。于是，罢矿税起废诸事诏书刚刚颁布，朝野上下便是一遍山呼万岁。

其次是饷边防问题，光宗皇帝在登基之初，便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

为他用。

此外就是补充官缺。史载，光宗皇帝以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并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同时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33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11人一概录用。

正如《明史》所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春，努尔哈赤在得知明朝皇位更迭、党争激烈、经略换人，结合辽东大饥、守备松弛等因素，再一次对大明发动了攻势。其实，早在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八月，时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时，努尔哈赤就率兵前来攻打过辽东。此战努尔哈赤进攻蒲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虽然明军散亡700多人，但贺世贤等人也有斩敌俘敌的功劳。

九月，明光宗死，明熹宗即位。此时，杨镐的叔父杨渊认为当初是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反把他押解进京，所以联手与熊廷弼不睦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给事中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熊廷弼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根据《明史》记载：“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 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

姚宗文本是任户科给事，因守丧离职回乡。回朝以后想入补做官，而吏部的几次申请递给明光宗以后都被放置不予批准，姚宗文引以为忧。于是，写信给熊廷弼，让他为自己请求一官。熊廷弼没有随从他，姚宗文因此怨恨廷弼。后来他一路巴结，才复职于吏科，到辽东来检阅兵马，与熊廷弼议事，大多意见不一。此番自然是竭力倾轧熊廷弼了。

熹宗于是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于是朱童蒙的一句“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便使得熹宗决定诏熊廷

弼下于狱，幸亏左辅杨涟上疏挽救，才改为“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

熊廷弼被罢职，辽东经略由袁应泰，此人乃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授临漳知县，因筑长堤40余里，以防漳水泛滥而有功，后调任河内（今河南沁阳）后，组织人力穿凿太行山，引入沁水，修筑25条堰，灌溉田亩数万顷，使邻县也受益。政绩为两河（河南、河北）之冠。于是，迁工部主事，兵部武选郎中。不久，又任淮徐兵备参议。时山东遭灾，他组织人力，广设粥厂救济灾民，又动员流民们修城墙疏，浚城河，修葺孔庙，从而使灾民都能饱食。此外，又将额外税收及漕折银数万两全部用来赈济灾民，结果户部弹劾他擅自动用官库银、粮。其时，他已迁为副使，遂借病回乡。后来，袁应泰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治水。当时后金屡次兴兵攻边，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泰昌元年（1620）九月，袁应泰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泰巡抚辽东。十月，熊廷弼被罢官，袁应泰代理经略。他上疏说：“誓与辽东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不怀二心，与臣相始终。”明熹宗对他嘉奖，并赐予尚方剑，袁应泰斩杀贪将何光先，罢免大将李光荣及以下十余人，并做收复抚顺的准备。

然而，袁应泰虽精明能干，但用兵非其所长，规划也不周密，熊廷弼在边防时，执法严格，部队军纪整肃，而袁应泰失之以宽，而且更动了往日的规章制度。譬如，其在辽东扩大边防，收编叛将、叛卒，来投即纳，大将童仲揆、尤世功等以为不可，但袁应泰均为不听。此外又有时值蒙古各部遭大灾，很多灾民到关内乞讨。袁应泰说：“我若不救，他们必将投敌；我招收他们，可增加兵员。”就下令招降，于是前来归顺的很多。袁应泰将这些蒙古灾民安置在辽、沈两城，结果却因那些蒙古人暗中奸淫抢掠，使得百姓深以为苦。于是，众人议论纷纷，认为招降兵过多，可能暗中被建奴利用，也可能间杂着后金奸细，来日必为内应，带来叵测之祸。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先后进攻辽东重镇沈阳周边的奉集堡、虎皮驿、王大人屯等地，往来无定，使明军难以猜测其真正意图，为进攻沈阳做准备。三月十日，努尔哈赤突然率倾国之兵出现在沈阳城下。当时沈阳由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率兵万余把守。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贺世贤、年幼时曾做过仆人，后从军，积累功劳官至沈阳游击，后升义州参将。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清河被后金所围，副将邹储贤固守。清河城破，

邹储贤率亲丁鏖战城南，与游击张旗、守备张云程等皆殉国。6400余兵民被歼灭。贺世贤驻叆阳，闻清河有变，疾驰出塞，得首功百余级，晋升副总兵。此后，杨镐以十万余人分四路出师出击后金。贺世贤辅佐辽东总兵李如柏由清河出兵。刘深入中伏，因与杨镐素不和，向李如柏求救而败，刘遂全军覆没。随即提升都督佥事，充任总兵官，驻守虎皮驿。铁岭被围，贺世贤驰援，城已破，获得斩首百余级。泰昌元年（1620）九月连战灰山、抚安堡，斩首200多。而当时，各地久经沙场的老将都聚集在辽东地区，畏首畏尾不敢战斗，只有贺世贤多次战斗有功，同僚大多都忌妒他，将其调镇守沈阳。

此番后金兵大举围沈阳，倾其全国攻城武器而来，十一日夜半渡浑河，十二日便逼近沈阳。贺世贤及总兵尤世功带领士兵挖掘沟壑建造战壕，将大量的树木砍伐做成栅栏置于城外，壕沟内筑拦马墙，留下炮眼，排列楯车和大小火炮。环城设兵，守城之法十分详细。努尔哈赤未敢轻易攻城，先派数十骑隔着城壕进行试探，贺世贤备火药于堞间，登城望后金兵仍距离城墙约四里，便下令发炮，但未伤一骑。此后总兵尤世功率家丁出战，杀死后金四骑，取得小胜。努尔哈赤大怒，遂命战车攻城，马步兵跟进，将沈阳城围困。此后双方展开攻防之战，后金从东北角以新土填垫，绕城掩击，城上明军连发炮，炮身炽热，以至装药即喷。后金兵乘胜蜂拥过壕，急攻东门。而原投降的蒙古兵乘乱反叛，斩断城外吊桥，后金兵破门入城。

见此情景，有人劝贺世贤撤至辽阳，他说：“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出城逆战，敌以精骑四合，贺世贤且战且退，至西门时已身中四箭，贺世贤挥舞铁鞭奋力抵御，仍身中数十箭坠马而死。此外，尤世功率领一部退至西门，欲救世贤，因兵皆溃，自己孤身奋战，亦死，城外兵士7万余人皆溃败。贺世贤死后，有人怀疑其叛降，所以没有祭葬礼仪。四川副使车朴为其辩护冤情，但被无果而终。

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危急，当即命参将王世科率5000人赴援，却被敌将哈都杀之，余军尽降。此外，就在沈阳激战之时，总兵童仲揆、陈策统领由川浙之兵组成的援军万余人从辽阳北上，行至浑河得知沈阳失陷后，陈策下令班师，而裨将周敦吉等坚决请战，二者遂分兵。周敦吉、秦邦屏等率川兵在浑河桥北扎营，童仲揆、陈策等则带浙兵在桥南扎营。努尔哈赤得报后，趁川兵立足未稳击之。川兵奋力抵抗，杀死后金军两3000人，后金军再发动两拨进攻后，川兵寡不敌众，周敦吉等战

死，桥北溃兵逃至桥南浙兵大营。后金军再围攻浙兵，又击败奉集堡来援明军，杀3000余人。浙兵先用火器，再短兵相接，最后力战不敌，全军覆没，童仲揆、陈策阵亡，但后金也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代价。

在连失沈阳、奉集之后，辽阳顿时失去屏障；加之连战连败，损兵折将，辽阳城守军已不满万，局势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在攻占沈阳、歼灭两路援军仅五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发兵攻打辽东首府辽阳。然而，辽阳历史悠久，自古便是军事要地。

根据史料记载，燕昭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约公元前284至前279），燕派大将秦开奔袭东胡，使“东胡却千余里”，又进击箕氏朝鲜，“取地二千里”，然后在辽河流域设置辽东郡，同时置襄平县，郡、县治地均在襄平城（即辽阳）。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秦王政为报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之仇，举兵攻燕，秦军攻陷燕国都蓟　，“太子丹匿于衍水”（今太子河）。燕王喜听从赵国代王嘉之计，杀太子丹，将其头颅献秦王以求罢兵，秦王不予理会，继续进兵辽东。五年后，燕国终于为秦所吞并。秦始皇二十六年，全国分为30郡，辽东郡仍沿袭燕国郡制，郡府设在襄平县。

西汉沿袭秦制，辽东郡郡府仍设在襄平县。西汉末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国号称新。仍设辽东郡。

东汉初期，仍置辽东郡，郡治襄平，领十一个县，襄平为首县，而此时的辽阳不仅是边疆重镇，而且还是辽东的中心城市。

东晋末，高句丽兴起，据有辽东之地，改襄平城为辽东城。襄平一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始克辽东城，以其城为辽州。次年罢，仍称辽东城。同年，唐军攻取白岩城，以其地改为岩州。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军攻陷平壤，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后又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

此后，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神册三年（918），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辽东城，置辽阳府。

元代至元六年（1269），辽阳为东京总管府，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此后，大明立国，开始对辽东用兵，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归降，太祖下令设置辽东卫指挥司，任刘益为指挥同知。败走辽阳的元将洪保保不满，密谋刺死刘益，投奔元将纳哈出。同年明廷又建立辽东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在老鸦山寨（辽阳东）击溃元将高家奴，先后占领辽阳、沈阳等

地。洪武十九年（1386）大明在辽东废州县，立军卫制，设立辽东都司，治辽阳，辖有25卫二州。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辽阳成为了大明帝国统治辽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同时这里又是辽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据《辽东志》记载，辽阳城从洪武五年（1372）至十六年，历时十余载，在旧城址的基础上，几经修筑和扩建而成为砖石结构，周长24里多的方城。弘治年间，大明又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即所谓的“九边”，分别是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及辽东镇。辽东总兵初驻广宁，隆庆后冬季驻东宁卫（辽阳）。

漫长的历史及其在大明帝国边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辽阳城的城防规模庞大且坚固，外围沿城壕列有火器、环城又设有重炮，袁应泰在督军备战的同时，还引太子河水注入城壕，布置城防，加强守御，同时还在壕沟的内侧排列火炮，严阵以待。

泰昌二年（1620）三月十九日，后金军包围辽阳，袁应泰率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钟万良五总兵出城五里结阵，后金兵见辽阳城池坚固，兵将有所准备，多心怀沮丧，有意退兵，努尔哈赤斥责道：“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遂率左翼四旗之兵发动进攻。明军发炮应战，后金军亦使用从明军处缴获得来的火器还击，配合骑兵冲杀，明军溃败，后金军乘胜追击60里，又击败西关山来援明军，至鞍山而返。二十日，后金兵两面攻城，努尔哈赤亲率一路在东门堵塞辽阳城壕之道，使其干涸后推战车攻城；另一路，由阿敏、皇太极等领兵夺桥登云梯自东门而上，在城垛上与守军厮杀。城外明军的作战亦不利，总兵梁仲善、钟万良战死，经略袁应泰退入城内，与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固守。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合左右翼兵对辽阳城发起总攻，双方战至傍晚，城内多处起火。这是那些归降的蒙古人在作乱，此外还有辽阳望族数十家通李永芳为内应。于是，后金军里应外合，夺门而入。在辽阳城东北的镇远楼督战的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火自焚而死。巡按御史张铨拒绝了后金军高官厚禄的诱惑，被缢杀。

努尔哈赤夺取辽阳之后，数日间又连下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至此河东14卫尽为后金所有。当月，努尔哈赤即迁都辽阳。

辽、沈丢失之后，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后金所占领，一时间，大明朝举国震动，“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

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任命其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最初的时候，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然而他的这个建议却与王化贞起了冲突。

王化贞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史称其"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朝廷重新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不合，故而举荐王化贞当巡抚。在布兵上面，王、熊二人却意见分歧很大。此后，两者关系日益尖锐，乃至朝野皆知经略、巡抚不和。但由于此时后金大军已经逼近西平，故而不得不仍然以两人并行作战。

不和的原因很多，譬如此前，四方援辽的大军，王化贞全改名号为"平辽"，辽人很不愉快。熊廷弼说："辽人又没叛乱，请改为'平东'或'征东'，以快慰辽人的心。"又譬如毛文龙所取得的"镇江大捷"。

毛文龙，乃浙江布政司杭州府钱塘县人，祖籍山西布政司平阳府太平县，其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26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未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史载，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幼从学，习经生业"，但他却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 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以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万历三十六年（1608）升叆阳守备。

毛文龙在守备任上待了十几年，因"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甚至动了南归养母的念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熊廷弼经略辽东，

派毛文龙于沿边要害地带，逢水草下毒，阻止了后金入侵。万历四十八年（1620），毛文龙又擒斩有功，累功升都司，熊廷弼被姚宗文弹劾去职后，袁应泰接任，毛文龙一度被调往山海关，毛文龙因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

天启元年（1621）春，后金大举入侵，明军虽经浑河血战，终不能抵挡而战败，沈阳、辽阳先后沦陷。史载，毛文龙至30余岁时，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多年不育，40多岁时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这时，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前往后金后方活动，毛文龙集国仇家恨一身，慨然应募，被实授练兵游击。七月初，毛文龙率百余名死士出发，深入敌后，先收复了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2000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抵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城下，探知城中后金军主力已出城抄杀百姓，遂暗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100余人夜袭之，擒努尔哈赤正室佟佳氏的堂弟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叆阳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全辽震动，后金大恐。

客观上说，“镇江大捷”是明与后金战争的首胜，扭转了明军在辽东一溃千里之局面，“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消息传到京城，朝野相贺，明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兵部左侍郎王在晋更是评价说：“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而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擄，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不过，关于镇江之战也有争议，一种说法似乎是，到达城外的明军并非毛文龙部一支，还有登莱巡抚陶郎先所遣王绍勋部，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战后王绍勋争功不得，遂报告说“镇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龙只是大言哄骗陈良策为内应，信以为真的陈良策独自绑缚佟养真父子送至毛文龙船上，毛文龙畏敌如虎，坐享冒功。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不管怎么样，当王化贞得知自己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了镇江，奏上了

捷报。满朝为此大喜，立即命令登、莱、天津派出两万水师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率四万广宁兵进据河上，和蒙古军一起乘机进取，由熊廷弼在中间调度。然而，虽然朝廷的命令下来了，但辽东明军最终还是没有出兵。原因很简单，毛文龙孤军深入敌后，系辽东巡抚王化贞所遣，而辽东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互相攻击不断。镇江之战后，王化贞绕开经略衙门单独报捷，熊廷弼更加不满，遂上言："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能够把"镇江大捷"说成是"奇祸"，自然熊廷弼不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了。

而之所以熊廷弼会说是"奇祸"，理由很简单，熊廷弼当时琢磨出了个"三方并进之本谋"。所谓三方并进：即广宁、登莱、山海关三路同时进兵。后来事实证明：广宁很快就沦陷，登莱一路则问题更大，作为熊廷弼门生的登莱巡抚陶郎先不仅贪污军饷，而且还收留后金奸细佟卜年，于是登莱一路终属虚着，甚至就连熊廷弼自己也意识到："此二方（广宁、登莱）已属画饼。"不过在当时，熊廷弼却认为毛文龙"发之太早"，误了他的"三方并进之本谋"，不过他的这份上言，却惹来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的驳斥。叶首辅认为："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而兵部左侍郎王在晋对于叶向高的观点也是支持的，他说："镇江之捷，巡抚径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党熊者必欲讪其功，文龙几逮矣。叶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龙之报捷，异论稍息。"并对熊廷弼、王化贞二人于国难当头之际互相拆台提出批评："熊毕竟以此衔之，王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由于经略、巡抚所辖兵镇相互观望，"镇江大捷"后，毛文龙不仅没有获得支持，位于其后方的登莱巡抚陶郎先对朝命阳奉阴违，不发一兵一饷相援，而此时后金却先后派皇太极、阿敏等率精兵5000兵马攻打镇江。毛文龙麾下只有百多人，孤军难支，不得不携军民退入朝鲜。皇太极等追击过鸭绿江，遣使暗通义州府尹郑遵，郑遵经朝鲜国王李珲的同意，与后金联合。于是，朝鲜、后金大军合围毛文龙部于林畔，毛文龙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后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将丁文礼、吕世举等尽皆阵亡。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据点，招募难民，以老弱者屯

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天启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衔，赐尚方剑。天启四年（1624），后金首领努尔哈赤遣使东江议和，毛文龙将来人绑送京师，朝廷又升毛文龙为左都督。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数十万众；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骚扰后金，逐渐成为后金大患。对于东江镇的作用，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

然而，努尔哈赤可不管大明内部是否存在有分裂的情况，他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攻势。天命七年（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经过十个月左右的准备，侦知明"经抚不合"等虚实后，率军向广宁进发。二十日，后金军渡辽河，逼近西平堡。副总兵罗一贵率3000守军抵挡努尔哈赤六万大军的围攻。后金军围城，参将黑云鹤出城应战被杀，罗一贵继续固守待援，后金军久攻不下，伤亡达到数千。明朝诸镇起初为自保均不愿救援，熊廷弼以"平日之言安在"激王化贞，王化贞遂命总兵刘渠率镇武之兵、总兵祁秉忠率闾阳之兵、心腹骁将游击孙得功率广宁之兵共数万明军前往救援。然而，孙得功早已暗降后金，援军合兵一处与后金交战，孙得功率先出战，故意与后金兵一触即退，致使明军大乱，刘渠、祁秉忠、副总兵麻承宗等皆阵亡。祖大寿逃往觉华岛，熊廷弼虽然已离开右屯，驻军闾阳，但当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于是熊廷弼撤军而归。

三路援军大败，西平堡彻底孤立无援。最终，罗一贵寡不敌众，在严词拒绝了李永芳的劝降后自刎而死。史载：罗一贵为参将，镇守西平。大清军攻城时，一昼夜都无法攻下，中炮伤者达数千人，尸体几乎堆起来与城墙同高。后夜间架云梯也无法攻下，李永芳知道守将为罗一贵，试图招降。罗一贵在城墙上大骂道："你不知道罗一贵是好汉吗，怎么肯投降于你？"于是，也竖起招降旗帜。李永芳四面攻城，三次进攻都失败。后城中火药用尽，罗一贵拔剑自刎。

后金军攻占西平堡后，又连拔镇武、闾阳，尽断广宁犄角，但未敢轻易进攻广宁。在西平堡之役诈败的孙得功回到广宁后，散布后金军已至的谣言，城中陷入混乱，参政高邦佐阻挡也挡不住。王化贞大惊，委任孙得功镇守广宁城。孙得功控制

广宁城后，想擒王化贞以献努尔哈赤。史载，广宁守军哗变时，王化贞还在牙帐中整理文书，参将江朝栋等排闼而入，大喊“事急矣，请公速走”。王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仓皇逃命。

正月二十三日，王化贞出逃后，孙得功、守备黄进等献城，跪请努尔哈赤入广宁，后金遂兵不血刃占领广宁。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平阳桥、西兴堡、锦州、铁场、大凌河、锦安、右屯卫、团山、镇宁、镇远、镇安、镇静、镇边、大清堡、大康堡、镇武堡、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彝、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鄂拓堡、白土厂、塔山堡、中安堡、双台堡等辽西40余堡。

弃城而逃的王化贞途在大凌河遇到熊廷弼时，“化贞哭，熊廷弼既笑且愤质问王化贞：‘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羞愧难当，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却说：‘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于是，将自己所领的五千兵马交由王化贞来殿后，并把全部粮草积蓄都放火烧了。沿途饥民哀号，哭声震野”。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和韩初命一起护送难民入得关来，王化贞、高出、胡嘉栋也先后入关。至此，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正如王在晋上疏所说的那样：“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其实，广宁之败，首先败于党争，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时，因为党争，又以王化贞为巡抚。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5000人马。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正如《明史》所写的那样：“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显然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王化贞不听，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天启二年（1622）二月，王化贞、熊廷弼下狱听候审理，于是党争又起，熊廷弼以前虽为楚党，但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且与东林六君子也关系匪浅，并传言杨涟弹劾阉党的奏疏就出自熊廷弼之手。然而东林内部为“保熊斥熊”还自相内讧的时

候，王化贞却已经意识到东林党已经不可信赖，于是果断抛弃了还在为自己“重列朝班”而奔走辩护的“东林君子”们，投奔魏忠贤。魏忠贤趁机利用他揭露东林党“贪污辽东军饷”，以一举击溃东林党。



明代武士

很显然，兵败问罪，朝廷震怒时，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而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另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理后，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书冤之，反被诬以受赂，东林党人皆入大狱。其实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魏忠贤的陷害。因为这个时候，东林党人和魏忠贤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他的党徒冯铨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五更，熊廷弼被以“失陷广宁罪” 斩于西市。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主事张时雍见熊廷弼胸前挂一执袋，问是何物？熊廷弼答道：“此谢恩疏也。”张时雍冷笑道：“公不读《李斯传》乎？囚安得上书！”熊廷弼怒道：“此赵高语也。”张时雍一时无言。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此外，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17万，追抄其家产，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不堪受辱而自杀，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江夏知县王尔玉为讨好

阉党，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四十。人们无不为之叹愤，所谓“远近莫不嗟愤”也。天启七年（1627）五月，熹宗又传令都察院严限追解熊廷弼所谓“赃银”17万余两。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伏诛，工部主事徐尔一等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无果。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再上疏成功，熊廷弼得以归葬故里，谥襄愍。

至于王化贞，虽然得到了魏忠贤的百般袒护，最终还是在崇祯五年（1632）伏诛。

而当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时，在辽东，努尔哈赤在获得大片土地后，开始实行屯田制，也就是通过颁布“计丁授田令”，要求属民平时自耕自产，战时为兵。此外，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就是其一，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譬如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其二，对于降者则统一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多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其三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100户女真来投时，专遣200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也就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征战和损失。

而对于汉人的处理，努尔哈赤刚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他优待“尼勘”，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的地位，从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看，其身份接近于后金国人，亦即牛录属员。考虑到这些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努尔哈赤也没把他们编入八旗。而对据城不降、不服从命令的汉人则实施镇压、屠杀。甚至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

天启元年（1621）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他还下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

给粮汉斗四升。”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16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五，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皇帝，以听皇帝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皇帝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然而此后，对汉人政策的急转直下，后金军进入辽、沈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则按照以往，强迫剃发易服，且多被编入女真人家为仆役，或编入农庄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导致了后金的政局不稳。

天命十年（天启五，1625），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洪武二十一年（1388）时，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曾督建沈阳城。而后嘉靖二十二年（1543）时，又扩建沈城，不过至努尔哈赤迁都时，沈阳已是破败不堪，但在当时，由于人、财、物诸力的限制，努尔哈赤并没有对沈阳城做大规模的修建，只是加固了原有的城垣，并在城内靠着镇边门内，建设一个简单的“居住之宫”和诸王府。直到皇太极继位后，才大兴土木，于天聪元年（1627）开始在明代砖城基础上重修沈阳城。皇太极时，沈阳的建设主要是在原来城墙的基础上建设新城，而除了将城墙加厚、加高、加固之外，还将沈阳城门由四个增至八个，并将原来的城内十字街改建为“井”字格局，也就是四条道路将皇宫围在中间，从而形成了街道环卫皇宫的布局，而这也是后来入关之前，大清京城的初步建设。

大明帝国在短短的四年间连失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重镇，辽东驻军20位总兵，阵亡15人，可谓是边事岌岌可危。熊廷弼因广宁之败而被处死，“传首九边”；王化贞则被下狱。其实，客观上来说，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后金兵锋有多强劲，而是和大明帝国内部的党争及皇帝的怠政昏庸有着很大的关系。

泰昌元年（1620），光宗在位不足30天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明熹宗，熹宗继位之前，抚养皇帝长大的李选侍利用皇帝年

少，占据乾清宫，意图把持朝政，结果在东林党左光斗、杨涟的反对逼迫下，才使得李选侍移居他处，从而使得皇帝摆脱了李选侍的控制，是为移宫案，因东林党人的拥立之功，于是熹宗颇为重用东林党党人，内侍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此外，皇帝即位之初，就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颇为优容。东林党人担心客氏干政，建议按例赶客氏出宫。客氏与魏忠贤擅权弄政，联手打击东林党人，一时之间，厂卫横行、党争激烈，由此拉开了大明帝国走向末路的大幕。

史载，熹宗皇帝自幼便因为其父光宗不为神宗所喜，故而备受冷落，神宗驾崩时，方才有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而光宗即位后原择九月初九册立东宫，可结果是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册封典礼，光宗便于九月初一驾崩，于是熹宗连一天正式的皇太子都没有当过，便登上了大宝，成为皇帝。此外，熹宗在继位前甚至没有任何的监国辅政经验，而纵观神宗朝之后，党争不断，年轻的熹宗也无法依靠任何一位廷臣。这种情况下，本就生性好玩的熹宗于是也就自然更为信赖内廷之臣了，而这样一来，宦官干政在所难免了。

其实，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大唐帝国时期，宦官势力更是达到了可以左右皇帝废立的地步。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汉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也极大。

其实，在太祖皇帝时，鉴于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洪武末年颁布《皇明祖训》时，太祖就称“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此外，更是规定宦官不能兼任外廷大臣的文武官衔，也不能穿戴外廷大臣的冠带朝服，所任职品不能超过四品，每月俸禄仅一石大米，衣食都在内庭解决，同时还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规定各衙门不能与宦官有文书方面的交往，所谓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明熹宗朱由校

然而，惠帝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自行登基为帝，是为成祖，成

祖皇帝视宦官为心腹，而且将之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时，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往往结纳宦官来排除异己。于是明朝宦官的出使、征伐、监军、镇守、刺探臣民隐私等很多大权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宣德元年（1426）七月，宣宗于宫内设立内书院，选择小内侍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识字，并使之研读童蒙书籍和儒家经典。从此之后，宦官们大多粗通文墨，通晓古今，由此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不过，自成祖永乐到宣宗宣德年间，虽然宦官备受宠信，而且往往被皇帝委以重任，但若有作奸犯科者，则是会被直接处以极刑。譬如宣德年间，宦官袁琦让阮巨队等人出外采购物品，事发之后，袁琦被凌迟处死，阮巨队等人都被斩首。又有裴可烈等宦官，也因犯法而被诛杀。可以说，永乐、宣德年间，宦官们还是不敢过于放肆的。

然而，从英宗开始，禁制废弛，幼年即位的英宗宠信宦官王振，阉党势力开始形成。此后，宪宗时宦官汪直、武宗时宦官刘瑾都曾广树党羽，专擅朝政，这些大太监往往利用庞大的网络朋比为奸，欺压良善，构陷冤狱，阻塞言路，为祸长达百年之久，致使朝政昏暗、民生凋敝，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倾灭的悬崖。

而明代宦官之所以能够贻害如此之大，这也是和明代的内廷制度有关。明代时，内廷为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而设“十二监”，是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12监，各设掌印太监等主管，其中司礼监，居内务府12监之首。

宣宗年间，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将朝议决策分为“票拟”“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上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于是，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其实是为了让司礼监的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有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所谓“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但其实不然，　“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而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

除了司礼监权势滔天之外，有明一代，还建立了由宦官掌权的特权监察机构，

即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成祖因其“得位不正”，故而于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是为东厂，由亲信宦官掌权，从而监视锦衣卫及朝臣。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最初的时候，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然而后来，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的东厂却从锦衣卫北镇抚司手里接管了审讯的权力。此后，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但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史载，魏忠贤年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精通射箭，懂得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后为赌债所逼且见赌场上的太监出手阔绰，遂自阉入宫做宦官，改姓名叫李进忠，后其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故而谣传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其入宫之后，先是跟随太监孙暹，后进入了甲字库。不久之后，他又请求做皇长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得以巴结上了魏朝。此后在宫中结交大太监王安，得其佑庇。不久之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史载，其对皇长孙朱由校，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1620），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忠贤也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能进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他得以破例。

应该说，魏忠贤能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熹宗的乳母客氏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客氏18岁入宫成为熹宗的乳母，熹宗15岁登基之后，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其弟客光先均有封赏。天启元年（1621），熹宗下诏赐客氏香火田，叙魏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熹宗不听。天启元年二月，熹宗大婚，娶了张皇后，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熹宗恋恋不忍客氏离去，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魏忠贤和客氏深受熹宗信任，后宫中无人敢违背他们的意志。不久客氏离开宫廷，复又召入。

客氏本与魏朝是对食，后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此后魏忠贤独占客氏，逐出魏朝，并借客氏之力谋害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王安此人，“刚直而

疏”，心思不够缜密，自然为魏忠贤所害。史载，客氏淫毒凶狠，魏忠贤性猜疑残忍而且阴毒，好阿谀奉承。在谋害了王安之后，两人势力更加嚣张，常常勾结一起，擅权弄政，一时之间，厂卫横行。

当初熹宗继位之后，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东林党势力较大，众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孙承宗、袁可立等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但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令赐给客氏香火田，给魏忠贤记治理皇祖陵墓的功劳，御史毕佐周、刘兰请将客氏遣出宫外，这两件事惹恼了擅权弄政的客氏和魏忠贤。

史书中称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擅长唱歌、奏乐、下棋、蹴球，而熹宗喜欢木工，沉迷于刀锯斧凿，“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就总是随口说：“朕知道了，你好好做去罢。”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因熊廷弼一案遭到弹劾，魏忠贤趁机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出于熹宗的授意，而非魏忠贤矫旨。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以至于东林党在朝中势力几乎被一扫而空……虽然东林书院亦被拆毁，而且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但东林党根基深厚，此后的崇祯年间，东林一党再次卷土重来。



西方传教士

在消灭了东林党人之后，魏忠贤权势更盛，于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内。史载，魏忠贤极受宠信，人称“九千岁”（意谓在号称千岁的亲王之上，近于号称万岁的皇帝），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更有“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60大寿，“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

客氏与魏忠贤专权，残酷迫害异己，以至于“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层出不穷的时候，大明帝国彻底走向了末路，如《明史》所说那样，“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此时的帝国，外有后金之乱，内则民变不断。

天启元年（1621）九月，因与后金战争吃紧，命令水西、永宁两土司征兵赴辽作战。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朝廷却拒不发放军饷军粮，并扣

除饷银。四川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多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奢崇明扯起反旗，率领永宁军攻占重庆，杀徐可求，此后李继周、骆日升及其他官员相继被害，总兵黄守魁、王守忠殉职，此后奢崇明分兵攻占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死，其子安位年幼，由安位寡母奢社辉（奢崇明之妹）摄事，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之手。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举起反旗。占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一时间，四川、贵州纷纷大乱。而这起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在四川永宁及贵州水西一带起事，波及黔川全省的叛乱，便是“奢安之乱”，也称“阿哲起兵”。

天启二年（1622）二月，宋万化、安邦彦纠集众10万军围贵阳，围城达一年，城中军民40万，饿死几尽。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此后叛军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两军借助川黔边界地形，屡屡取胜，并使王三善、与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一战死、一自刎。奢安之乱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天启一朝，四川、贵州战火纷飞，直到崇祯元年（1628），才以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彻底平定叛乱。

“奢安之乱”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平息“奢安之乱”的军费开支就极为巨大，而这笔巨大的支出对于已疲于应付辽东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大明王朝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史料记载，仅天启六年，帝国就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军费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很显然，奢安之乱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辽东的战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由于滇南阿迷州彝族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得以实力大增，其随即于崇祯四年（1631）发动起事，是为“沙普之乱”。

不过，天启年间的民乱，并不仅仅只有西南的奢安之乱，还有此起彼伏的白莲教起义。



孙承宗

神宗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后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熹宗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于弘志、曹州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在郓城举旗反明后，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定年号“大成兴胜”，一时间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竟以为上西天云”。义军头带红巾，先得巨野，渡京杭运河，攻占滕县、邹县，滕县、峄县，并袭击曲阜，史载“众至数万”，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2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十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为被官军所俘，后押至京城诛杀。虽然叛乱失败，但此次举事，却是为明末民变的先声。

而在此时，大明帝国还开始与正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发生了碰撞，当时为了扩张势力范围，增加贸易金额，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希望能够在远东地区找寻到

一处可供船只补给的长期据点，最初的时候，荷兰人将目光盯在了澳门。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帝国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附近进行海上贸易。此后，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收买了中国地方官，以上岸晾晒被海水浸湿的货物为由，开始了在澳门的居留。在当时，葡人被称作为“佛郎机”或“藩鬼”，后称“藩人”“夷人”“西洋人”，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王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荷兰人多次试图侵占这里，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万历三十五年、熹宗天启二年、天启七年曾多次攻打澳门。

不过就在垂涎澳门的同时，荷兰人还把目光投向了澎湖，在万历三十年时，荷兰人建立东印度公司后，荷兰商人曾抵达澎湖，并且派人至福建请求互市。不过很显然，大明无意与荷兰进行贸易，故而以都司沈有容带领兵船50艘前去，要求荷兰人撤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再次抵达澎湖，这一次，他们直接用武力占领澎湖，并封锁了漳州出海口。于是，帝国以南居益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主持澎湖事务。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南居益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人，并乘机袭击烧毁了荷兰战船。此后，在次年二月，更是亲自乘船到金门，以战船200艘渡海出击收复澎湖。史载，福建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率领兵船至澎湖，登陆白沙岛，与荷军接战。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正如《澎湖厅志》记载的那样，红木埕城要塞“炮楼坚致如铁，巡抚南居益，遣兵攻之，贼首高文律据守不下，官军以药轰之，楼倾下海。”同年八月，明军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势穷力孤，不得不撤离占领了两年的澎湖。然而，荷兰人并没有全部撤出。史载，“独渠帅高文律等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此战，大明历时七个月，军费耗达17.7万余两，终于收复澎湖，夷首高文律（Kobenloet）解京，熹宗皇帝并“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

也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大明帝国对于辽东的经略也处于换乱之中，熊廷弼下狱之后，帝国最初是以兵部尚书王在晋继任经略。史载，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后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于是认为应该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4万人守之。

其实他的这个想法来自蓟辽总督王象乾，王象乾认为："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才有了王在晋"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根据王在晋在《题关门形势疏》中提出的"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策略，大明帝国发帑金20万两，以构筑防御。

应该说，王在晋的这套方法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搏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此外，王在晋还认为："……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又有"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之论，故而试图针对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等到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的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以抵御后金入侵。

而兵部尚书张鹤鸣也对王在晋的这套方略推崇备至，他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不过王在晋的主张，却是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200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于是"力争不能得"，袁崇焕遂"奏记于首辅叶向高"，也就是直接将意见报告提交给了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辽东的情况，拿不定主意，只能说"是未可臆度也"。

就在这个时候，内阁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也就是说孙承宗决定亲自去辽东一趟，以决定辽东防务的重点。史载，"帝大喜，特加孙承宗

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

史料中的孙承宗是“此人少时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神宗万历六年（1578），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人家中，教授子弟，并由此逐渐接触官场。万历二十一年（1593），孙承宗入国子监，次年中举人。后来，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为边城重镇，于是孙承宗利用这个时机，常向将帅士卒究问险要边情，史称其“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厄塞”，因而“晓畅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其以进士第二名，而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后入詹事府，任谕德，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即驾崩，年仅15岁的皇长子即位，是为明熹宗，孙承宗继而为帝师。这样，年近花甲的孙承宗，开始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升礼部右侍郎，此番熹宗皇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至辽东勘查，也显示了皇帝对于辽东的重视。史载，孙承宗巡视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最终接纳了袁崇焕等人的提议，而否决了王在晋的主张。他认为“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并且说“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此后，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于是皇帝将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于是，熹宗皇帝以帝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为辽东经略，所谓“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

史载，孙承宗在上疏，称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方略，也就是面对后金的攻势，首先要进行防守，“欲保京师，则必先固山海关；而欲保山海关，则必先固辽西”。此后，才能够有进攻，也就是“欲复辽东，则必先复辽西，欲复辽西，则必先固宁远”。因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

胜”。退而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进可攻略辽西，故而，“固宁远”是为了将来收复辽东做准备。

在确认了全辽战略后，辽事仍然头绪百般，急待整理。于是之后，又为了能够达到自己所提出的战略，孙承宗而作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以修山海关和宁远城为契机，对辽东明军进行兵制改革和纪律整顿。在山海关的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而练兵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后，“兵将一清”。宁远城则“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委派良将满桂和袁崇焕负责修筑，并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各城，“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在修复宁远等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拓地400里、屯田5000顷的同时，他还大力扩军备战，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所提出的“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大胆起用袁崇焕、孙元化、鹿善继、茅元仪等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譬如“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此外，他还设立六馆，招纳贤才，所谓六馆，其一，占天馆，凡通仰观风角三式者；其二，察地馆，凡通夷虏部落道里、上川扼寨、安营立寨及屯田水利者；其三，译审馆，凡识写夷字、通说夷语及情事者；其四，侦谍馆，凡精敏便利、能入虏穴谙虏来往者；其五，异才馆，凡侠骨殊才，能使外域及有剑术如荆、聂之流者；其六，大力馆，凡力能挽绳携重至千斤，或六七百斤，及能飞檐走壁、日行数百里者。如此等等，筹备良多。可以说孙承宗为长期战略做了很多的准备。于是才有了“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其实，可以看得出，孙承宗经略辽东，以练兵、修城为主，然而孙承宗的这一

措施却引来了朝内官僚的攻击，他们认为孙承宗志在守卫，无心进攻，那么“平辽”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了。其实孙承宗之战略并不仅仅是防御，而是在实施防御的同时，他采用步步为营，渐渐推进的策略，也就是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其实根据《督师记略》记载，“先是奴以数万守广宁，二万守右屯。至是知我军渐张，乃撤广宁，焚其余粮，恐我因也。”也就是因为孙承宗的积极努力，后金于广宁已不战而退。至天启五年，辽东明军自宁远又向前推进200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正如《督师记略》中所提到的那样，“公意以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辽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宽者不过数十里，狭者十余里耳。其旧镇辽阳，在河之东。然开原、铁岭一带，俱切近北鄙，地亦荒瘠。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

由此可见，孙承宗的目的并不是防御，而是志在恢复全辽，其实孙承宗何尝不明白自己所采用的“逐步推进”的战略过于保守，而且效果也不明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可是萨尔浒一战，沈、辽的丢失，使得大明帝国已经无力再承受新一轮的失败了，故而在孙承宗看来，想要恢复全辽，势必十分谨慎，得有充分准备才行。如果贸然行动，则再经历一次类似于萨尔浒似的大溃败，那么山海关防线也许也会整个就崩溃。所以，他才通过练兵、军屯、引进火器等手段，来加强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并通过宁锦防线，巩固辽西诸城，从而以辽西诸城来进可攻，退可守。绝不能如同之前那样，一旦战败，则兵溃千里，重镇尽失。

然而，就在孙承宗在辽东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积极防御的时候，他的这番“碌碌无为”却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史载，当魏忠贤企图扩张权利，于是想要攀附孙承宗，但被拒绝，于是魏忠贤因此记恨孙承宗，其以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书诋毁孙承宗。于是孙承宗被罢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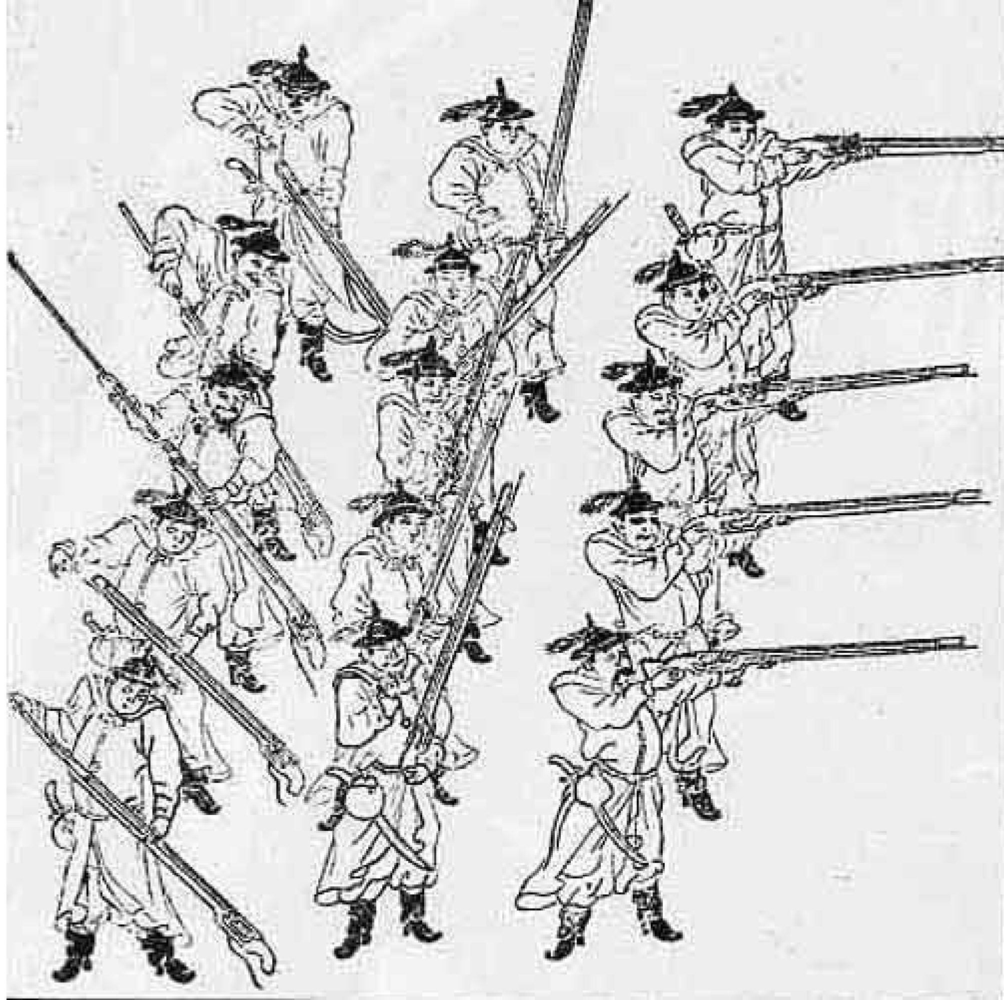
虽然，孙承宗接受袁崇焕提议修筑关宁锦防线，以护卫山海关，从而抵御来自后金的压力，使得形势一度好转，但他在经略辽东时，总体环境还是很好的，固

然，孙承宗在辽东内外压力极大，其时国内尚未爆发大规模民变，国力还能应付辽事的军费开支。而建州方面，后金当时正忙于与察哈尔部交战，并没有将进攻大明作为主要目标。此外，努尔哈赤还遇上了严重的国内问题，故而面对孙承宗的防线，不敢贸然进攻，所以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无事之局”。

努尔哈赤所面临的严重的国内问题也就是汉人问题，建州吞并了辽东，除了获得大片土地外，还多出了上百万的汉人。以女真人所新建立之政权，要良好地消化这么大数量的汉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建州兵临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曾说：“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

于是许诺，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掳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而在进攻辽西的广宁之前，努尔哈赤甚至宣扬“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承认汉人的政治地位和保护汉人的个人财产，甚至利用“贫富差距”这一矛盾来对汉人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竿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可事实上呢？自从天启三年开始，努尔哈赤收回了曾经承诺的满汉平等政策，取而代之以镇压，于是满、汉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汉人焚烧房舍、出逃建州，甚至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天启五年，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汉人叛乱事件，遭到了女真人的残酷镇压。这种局面使得汉人大量归顺女真人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于是孙承宗才得以实施“以辽人守辽土”战略。

此外，驻守皮岛（今朝鲜椵岛）大将毛文龙所部也频频出击，给努尔哈赤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明朝火枪手

天启元年（1621），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197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2000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100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使得全辽震动，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

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36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

“镇江大捷”后，毛文龙被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但后金的反扑也很迅速。史载，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丁文礼、吕世举等殉国。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据点，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六月，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大明帝国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熹宗皇帝更曾下诏书给毛文龙　“念尔海外孤军，尤关掎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的点评很到位：“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蛩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

天启三年（1623）夏，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境内的辽民，为了解救流散难民，登莱巡抚袁可立试图“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故而令毛文龙和沈有容属下的两镇兵马不时出奇兵“塞要害，焚盗粮”。毛文龙遣军四出击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王辅从凤凰城进军，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8000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以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此后又以民心可用，遂将这些

壮丁编入队伍，共计有35队。七月初二，张盘率领这支兵民合编的大军，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一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随后，又在袁可立的策应下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大明。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自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威胁，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易攻难守，不久张盘为后金所逼又退居麻洋岛，正如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的那样：“刘爱塔事泄而金州空，沈有容以兵寡不可守，而张盘入据。闻金州有人率众逼张盘于麻洋岛，此金州复而不复之实也。”

天启三年（1623）七月的“亮马佃大捷”，更是后金的一场大败。史料中这场大战的记录不是很多，根据《山中闻见录》记载：“毛文龙自满浦、昌城袭攻甜水站，以捷闻，又以兵万人攻亮马佃，夺获牛马；复合兵三万，攻牛毛寨，斩首二百三十，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时谍敌将集兵渡河，毛文龙因进兵，先后奏捷。”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载为：“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奏亮马佃之捷，又奏牛（毛）马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而《辽事实录》则记为“平辽总兵毛文龙，十月报牛毛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当年秋，巡抚袁可立决定使“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建立“恢复之功”，而此时，努尔哈赤正准备西征，以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的行动，毛文龙亲统3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当时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军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斩杀一空，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4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已经达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

就在“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札付验，一并验确”。据载，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大喜，其在奏书中称：“臣接

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而登莱巡抚袁可立亲自为毛文龙请功道：“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于是熹宗皇帝下诏“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

此后，鉴于后金“常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于皇城岛请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于是“虏遂远徙，不复逍遥海上矣”。秋收之后，金人又来大肆侵略，袁可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粮粮尽归一炬”。

接连的失败，使得建州十分恼怒，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而袁可立早有所料，“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遭到伏击的后金军大败而归，朝野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当年十月初五，总兵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大军前来征讨，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之，迫使后金军只得撤走。

天启五年（1625）正月间，接替袁可立为登莱巡抚的武之望由于不懂军事，故而上奏要在旅顺和金州之间的南关开凿运河，此奏竟得到兵部批准。于是，张盘和朱国昌因朝命难违，奉命施工，却因消息泄露，而遭到后金军围攻，张盘殉国，后金得以乘机重新占据辽南各城。毛文龙得报后，以后金军后方过长为机，即派游击林茂春、王承鸾等腰截后方，攻其不备，迫使后金军立足不稳而撤军，同时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顺等城收拢残部，进驻恢复，但登莱巡抚武之望乘后金军与东江军激战之际，竟抢先派部将张攀进驻旅顺，以争恢复之功。自此之后，辽南一直

在东江军的控制之下。

就在辽西和辽南纷纷有所进展的时候，孙承宗却被罢官了，不过孙承宗罢官的原因，除了魏忠贤等人的陷害因素之外，还与一场战斗有关，这场战斗便是柳河之役。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是这次战斗的实际指挥者。史载，马世龙，字苍渊，宁夏卫人，武举人出身，早年为宣府游击，天启二年担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历官都督佥事、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总兵官。孙承宗出镇辽东时，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关内外军马。

天启五年（1625）八月，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之言，称后金四贝勒皇太极进驻耀州，手上兵马不满300人。世龙大喜，派兵自娘娘宫渡三岔河，打算袭击耀州，并先遣鲁之甲与李承先二将率领前往。这时，由于驻觉华岛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等迟未前来接应，至二十五日舟仍不至，李、鲁二人率领800人通过七只渔船强渡三岔河，导致形迹外泄，造成柳河之役的溃败，死伤400多人，鲁之甲与李承先均战死，中军钱应科落水死。当初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为承宗所鄙，故而柳河之役，马世龙因冒进兵败之，“忠贤以承宗不附己”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670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参劾承宗。于是，马世龙被弹劾离职，孙承宗谎称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仍与喻安性同时被罢免。由高第代为经略。

高第乃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任临颍县令。临颍县志说他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后“转户曹，榷浒墅关”，此后升大同知府。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由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升为湖广右参政，不久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升陕西右布政使，后升山西左布政使。

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7000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于是在军中朝中口碑很好。天启二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正月，为兵部左侍郎。天启四年二月，高第致仕。天启五年，起复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同年五月，升任兵部尚书。此番孙承宗罢官，皇帝于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

然而，高第守辽之策却与孙承宗相左，当初高第曾力扼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先固守以图恢复的积极防御方略，此番当他到达山海关之后，立即令弃关外城

堡，尽撤关外戍兵。而他自己的守关方略是：枢辅抚镇，“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

当高第尽撤关宁锦防线于山海关之内，放弃关外400里之地，独求保关时，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当时的情势。先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等督率军民，在关外辛勤经营四年，缮城修堡，造炮制械，设营练兵，拓地开屯，劳绩显著，大见成效。此外，孙承宗在辽东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当时“东下之具已得十九”，“战兵者九万四千，守兵者一万六千有奇，杂兵者二万四千有奇”，同时，他还引入了火器和战车结合的车营，并确定了以车营为核心的战法。史载，孙承宗初到辽东时，“火器手不过数十人”，虽然有熊经略所造之迎锋车600辆，但“敝败不可用”，辽东“向习弓矢，置火器不讲至于车营，则九边英锐，无不以为耻”。此后，他积极造火器、建战车，孙承宗曾著《车营叩答合编》一书，全面介绍车营编制和车营阵法，阐述了车营的攻防战术，也就是“五修造新旧战车。合步骑以教车营”“又立十大车营，以为攻战之具”。后来发展到12车营，马步兵达9万余人，使“战辎不得不亲，马步不得不合，将卒不得不联，炮矢更番分合便捷”。而除了装备火器外，孙承宗还进行了以车营火器为主的协作训练，“其用火（火器）在用叠阵，合水、陆、步、骑，舟、车、众、寡，奇、正之用火，无一非叠阵”。并在车营中，将车兵、骑兵、步兵、弓兵、炮兵、火器兵有规律地编在一起，形成阵法。作战时候，“步队则鸟枪、郎机在前，而三眼、火箭在后，骑兵则弓箭、三眼大炮连环叠用”。



然而，此时高第命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诸城守军，并将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移到关内，放弃关外土地400里，等于是使孙承宗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当时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为辽东明军的前锋要塞，如仓皇撤防，使已兴工修筑的城堡弃毁，布置戍守的兵卒撤退，安顿垦耕的辽民重迁。

于是，辽东诸将对高第的“关外兵民尽撤”的方略十分不满，纷纷上书抗争。时任宁前道、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就曾经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袁崇焕引据金启倧的《呈照》，向辽东经略高第具揭道：“据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呈照，锦、右、大凌河三城皆前锋要冲，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反归夷虏，榆关内外更堪几次退守耶。呈详到道，据此为照。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阁部言之又让，至于无可让而止。今只择能守之人左辅守大凌河，樊应龙等守右屯，更令一将守锦州，此城大于右屯，然稍后缓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复必可。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期不得，则听之能者，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

然而，高第却凭借“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的势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宁（远）前（屯）路防备。见此情形，袁崇焕愤而拒绝撤回山海关，并表示与城共存亡，并说“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面对袁崇焕的这一态度，高第很是不以为然，他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十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不仅使得军心不振，而且还民怨沸腾，背乡离井之众，哭声震野。而对袁崇焕来说，他的处境也很艰难，豪言壮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的，他既得不到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支持，又失去其恩师大学士韩爌及大学士孙承宗的援助，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情势下，他唯有率领万余名之众孤守宁远，以抵御后金军的进犯。

天启五年十月（1625），刚在蒙古取得胜利后的努尔哈赤，得知明朝易帅，遂提前回师，大力筹措攻明准备。天启六年正月（1626），努尔哈赤亲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

当初在占领广宁后的四年间，努尔哈赤先是迁都沈阳，后又巩固其对辽东的治理，并逐一整顿内部，移民运粮，训练兵士，发展生产，镇压汉人反抗。同时重用范文程。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生于辽东沈阳卫的范文程，据传乃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史载，范文程少时喜好读书，聪明沉稳，“年十八补秀才”，19岁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占抚顺，当时范文程年仅21岁，与其兄范文采（生卒年不详）背叛故国，投降努尔哈赤。因其祖上乃范仲淹，而曾祖范鏓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故而努尔哈赤曾对诸贝勒有言：“此名臣孙也，其善遇之！” 范文程投靠努尔哈赤后，不仅随努尔哈赤征讨大明，攻取辽阳、西平等地，而且后来大清开国时的规制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

不过努尔哈赤当初之所以没有进攻辽西，除了忙于和蒙古开战，稳定内务之外，更由于孙承宗主持下的辽西防务无懈可击，故而出于没有太大把握的考虑，努尔哈赤才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一直以来，努尔哈赤都是善于待机而动，此人蛰伏不动之时，往往等待时机。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时，他趁机夺占沈、辽，这次又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撤军向关内、宁远孤守的哨报，他当即决定攻打宁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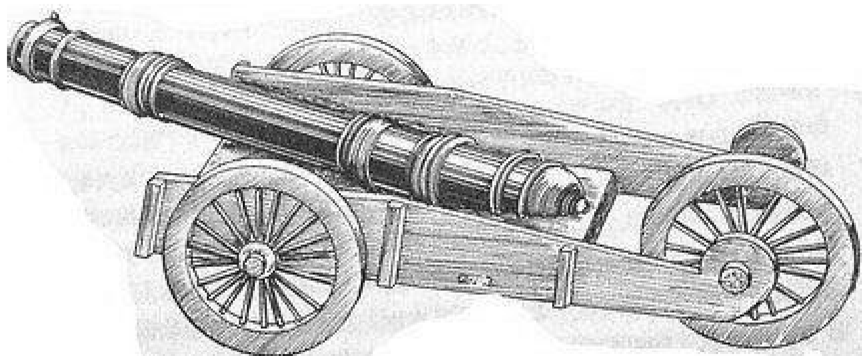
当努尔哈赤所率的后金军大举西进时，军情便被明军探得。天启六年（1626）正月初六，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果然，后金大军渡辽河，向西扑来。此后，初十，努尔哈赤从十方堡出边，前至广宁附近地方打围。十二日，回到沈阳。此后，努尔哈赤又吩咐各牛录并降将，每官预备牛车30辆、爬犁30张，每人要靰鞡三双，还要各炒米三斗。准备出征。

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领13万大军，号称20万，往攻宁远。十七日，西渡辽河，扑向宁远。

后金兵渡辽河，警报驰传北京，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而经略高第更是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于山海关，拥兵不救。所以在宁远紧急关头，“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而此时，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八座城堡，由于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故而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竟未遇什么抵抗，便进抵宁远。

得知宁远有人据守后，努尔哈赤遂派遣使者，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结果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当后金军连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兴城，直逼宁远时，宁远只有万余守军，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守将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御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又部署官兵，分城防守，划定责任：总兵满桂守东面、副将左辅守西面、参将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时又以满桂提督全城，分将画守，相互援应。而袁崇焕则坐镇于城中鼓楼，统率全局，督军迎敌。



红夷大炮

宁远居辽西走廊之中，"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宣德三年（1428）置宁远卫，嘉靖四十三年（1564），副使陈绛重修，袁崇焕此番守宁远，主要能够依靠的是所谓的"红夷大炮"，其实用如今的概念来说，所谓的红夷大炮就是前装滑膛加农炮，这种火炮也称为红衣大炮。所谓"红夷"者，红毛荷兰与葡萄牙也，故而多被认为红夷大炮是进口荷兰的，但其实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而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不过大明帝国也有仿制。

其实一直以来，大明朝对于火器和技术从来都不陌生，也不保守。永乐八年

（1410）征交趾（今越南）时，成祖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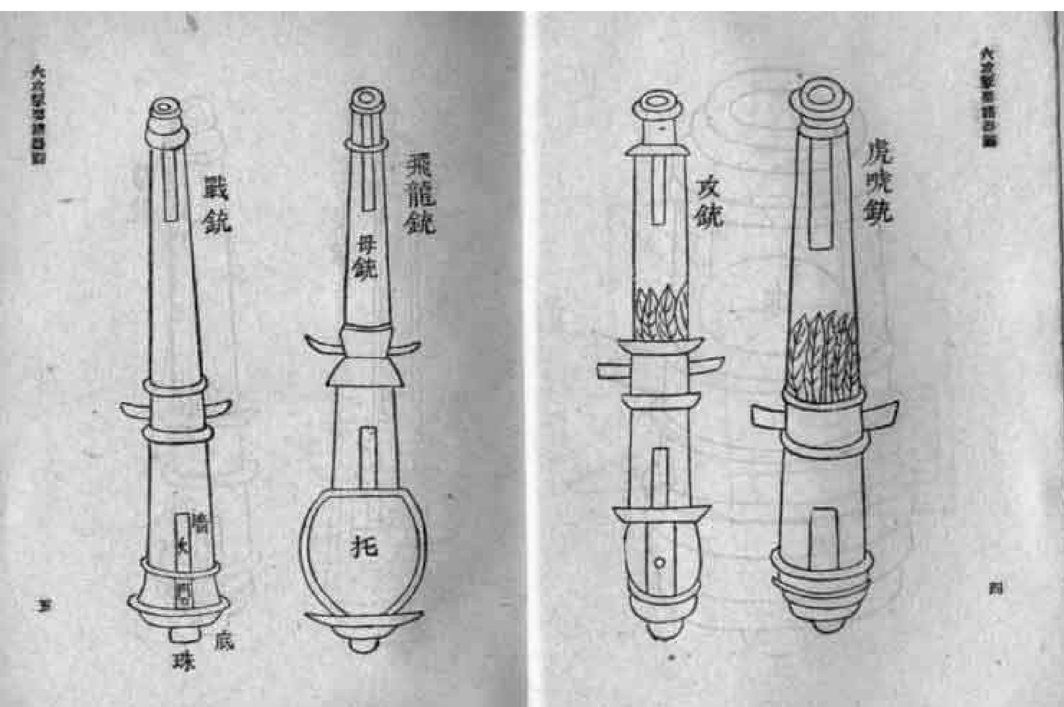
而当时颇具盛名的徐光启更是对火器的运用和研制有着相当大的造诣。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乃转务农。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光启出生，少年在龙华寺读书。万历九年（1581），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万历二十四年（1596）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利玛窦

万历二十五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次年会试他未能

考中，便回到家乡教书。此后，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并首次与利玛窦（Matteo Ricci）晤面。



明代火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入天主教会，圣名为保禄。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徐光启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1607），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因其父去世，故而回乡丁忧守制。次年，徐光启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徐光启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同时，他还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万历四十年（1612），他从耶稣会士熊三拔处（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六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初冬，因与朝中同僚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先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万历四十四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查办天主教传教士，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不久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次年萨尔浒之战后，徐光启多次上疏请求练兵，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天启元年（1621）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同年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于十二月再次辞归。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起，徐光启受命在北直隶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以来，他先后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火炮要略》）、《制火药法》等。

史载，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攻陷沈阳、辽阳，明廷震惊，熹宗要求徐光启从天津“即令回京”，襄理军务。同年五月，李之藻出任光禄寺少卿，负责研制大炮。四月十五日，“命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郎中事李之藻调度十六门城楼军器”，四月二十七日又“命铸监督军需关防给光禄寺少卿仍管工部司官事李之藻”　。天启二年，孙元化呈《备京》《防边》两策，受到朝廷重视，兵部尚书孙承宗出任蓟辽经略，用孙元化筑台制炮主张，筑宁远城，孙主其事。三月十四日（4月24日），命“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为太仆寺少卿”，此外熹宗敕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火铳。由此可见，大明帝国对于火器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时，虽然城中士卒不满两万人，但却拥有大炮、火铳等火器，此外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尽管面临紧急态势，但袁崇焕并不以为然，他除了上疏称“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还采纳诸将的议请，做了积极的守城准备。

由于彼己态势，强弱悬殊，加之前临强敌，后无援兵，宁远一座孤城，兵士不

过万余，故而绝不能实施城外野战，因此他汲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西（平）、广（宁）失守的教训决意凭城坚守，拼死固守。所谓“敌诱不出城，敌激不出战”。同时，由于宁远城设置有11座红夷大炮，故而他积极修台护铳，布设大炮，以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方略。

同时尽焚城外房舍、积刍，转移城厢商民入城，转运粮料藏觉华岛，以做到坚壁清野。此外，袁崇焕认为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故而他要做到“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于是以同知程维楧率员稽查奸细，“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并以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再有就是严明军纪，派人巡视全城，命对官兵乱自行动和城上兵下城者即杀。官兵上下，一心守城，所谓“以必一之法，则心无不一，此则崇焕励将士死守之法。其所以完城者，亦在此”。

最后，士气的问题，袁崇焕以重金赏勇，鼓励士气，并宣布“官兵有能中敌与不避艰险者，即时赏银一锭，奖励勇敢退敌者”，同时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向前屯、山海关，抓住斩首，以肃军纪。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宁远守军开始了一场为了自己生存而努力的血战……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军连续攻陷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七城。正月二十二日，袁崇焕令兵民“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静待后金兵近城池，同时偕几个幕僚至鼓楼，同朝鲜使臣翻译韩瑗等谈笑风生。次日，后金军穿过宁远城东五里处的首山与螺峰山之间隘口，抵达宁远城郊。这一天，努尔哈赤命离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布阵，并在城北扎设统帅大营，以被虏汉人前往宁远城，招降袁崇焕。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辞拒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此后，在断然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大营，以大炮轰击，“遂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不敢留此驻营，将大营移到城西。而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既拒不投降，又发炮轰击大营，遂命准备战具，次日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军开始攻打城西南角。史载后金兵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在城堞上，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皮，而祖大寿、左辅等率明军射矢、投石、发炮、放火烧攻城之兵。矢石、铁铳之下，后金兵死伤累累，虽然后金军用斧凿城，但收效甚微。反倒是守城明军“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明军“以城护炮，以炮卫城”的方略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北二面大炮，罗立指挥西、南二面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火星所及，无不糜烂”，“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史料记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危急时刻，袁崇焕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于是“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画家笔下的宁远之战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后一天血战，依然宁远城攻不能克，乃下

令收兵。

两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如此损失，使得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明兵不断发射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转攻觉华岛。觉华岛乃是辽东士兵储粮之所，粮料可达8万余石。后金军围宁远数日不克，遂分兵进攻觉华岛。其实在觉华岛，明军是设置有水师的。孙承宗经略辽东时，即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岛的防卫。不久以国宁督发水兵，以卫觉华岛。而觉华岛的水师，则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除了是守卫岛上的粮料、器械之外，还有就是配合陆师进图恢复辽东失地。此外就是策应宁远之城守，所谓“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时值隆冬，海面冰封，无险可守，明将姚抚民守军等率领官兵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15里的冰濠，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然而，天气严寒，冰濠凿开，穿而复合。姚抚民等率领官兵，“日夜穿冰，兵皆堕指”。

二十六日，后金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突然进攻觉华岛。由于前夜，后金已经将主力转移到城西南五里龙宫寺一带扎营，故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从龙宫寺进攻觉华岛。武讷格以铁骑数万进攻觉华岛，虽然明军凿冰15里为濠，列阵以车楯卫之，但由于“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加上大雪纷飞，冰濠重新冻合，故而后金骑兵，履冰驰进，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猛烈厮杀，冲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而来时，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后金军火焚城中囤积粮料，浓烟蔽岛，火光冲天。旋即转攻东山，万骑驰冲，巳时，并攻西山，一路涌杀。于是守将金冠刚死，其子金士麒与兵丁800人至觉华岛迎榇，亦与后金军作战，全部殉国，金冠既死之榇，被后金兵俱经剖割。岛上囤积粮料尽焚。后金军旋即转攻东山、西山，明将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史载：“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视前此奔溃逃窜之夫，尚有生气。金冠之子，会武举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赴岛，遣其弟奉木主以西，而率义男三百余人力战，三百人无生者。其忠孝全矣！”

觉华岛之战，明军损失惨重。经略高第塘报：觉华岛“四营尽溃，都司王锡斧、季士登、吴国勋、姚与贤，艟总王朝臣、张士奇、吴惟进及前、左、后营艟百总俱

已阵亡”。总督王之臣查报：“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而同知程维横则报：“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无一不颠越糜烂者。王鳌，新到之将，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榇，俱经剖割。囤积粮料，实已尽焚。”《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我军夺濠口入，击之，遂败其兵，尽斩之。又有二营兵，立岛中山巅。我军冲入，败其兵，亦尽歼之。焚其船二千余；并所积粮刍，高与屋等者千余所。”也就是觉华岛上7000明军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

后金军围宁远数日不克，加之此时又摧毁了觉华岛，屠杀岛上民众，焚毁粮食储备，又有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后方永宁，努尔哈赤始引兵归，二月九日返回到沈阳。

后金军即走，袁崇焕派景松和马有功疾驰山海关，向经略高第报告战况。高第急奏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支，攻觉华岛，焚掠粮货。”关于这一点，张岱《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而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则记载宁远之役“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坠者无数，贼大挫而退”。

尽管有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大头目”极可能是努尔哈赤，但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宁远之战为后金军的首败，努尔哈赤亦因此耿耿于怀。虽然于觉华岛全歼7000守军、屠戮商民、焚其船只，以泄未克宁远之恨，但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带着忿恨和遗憾，尽撤宁远之兵回师沈阳后，他还是很似怨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宁远之败时说：“帝自25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不过宁远的确是努尔哈赤征战生涯中唯一未能攻克之城。

宁远之役后，大明从“宁远被围，举国汹汹”，瞬间成了“闻报宁远捷音，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可以说，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也是“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的一个大胜仗。正如兵部尚书王永光所说的那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此后，熹宗皇帝采纳王永光的建议，不追究觉华岛惨败一事，将此一役称为“大捷”，以激励士气。此后，熹宗下诏嘉奖广宁军功劳，袁崇焕随即升任右佥都御史，而高第、杨麒因不援宁远和觉华岛而免职，以王之臣、赵率教取代。

天命十一年（熹宗天启六，1626）四月初四，心怀宁远败北之忿恨的努尔哈赤试图重振低落的士气，率军征讨喀尔喀巴林部，大获全胜。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至七月，努尔哈赤疽病突发。当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前往清河汤泉疗伤。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

天命十一年（天启六，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于途中、距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病逝，时年68岁。大妃乌拉那拉氏、庶福晋二人殉死。

对于努尔哈赤一生的评价，《清史稿》说他是：“太祖（努尔哈赤）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30余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明人（兵部尚书李化龙）则说“（建州）列帐如云，积兵如雨，日习征战，高城固垒……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努尔哈赤）也”。

而李氏朝鲜人（李民寏）则认为：“奴酋（努尔哈赤）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

不管怎么样，随着努尔哈赤的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而由于努尔哈赤生前为避免诸子争储导致权力纷争，创立八旗贝勒共议国政之制，汗位可由八个旗主互议，推选旗主之一担任，因此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此后经推举，努尔哈赤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继任后金大汗，次年改“元天”。于是，皇太极的时代开始了。

第五章　大清帝国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因袁崇焕率军坚守，而未克。同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死。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一直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所伤，郁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病死说出自《清史稿》。据记载，在天命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至“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而重伤致死出自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于宁远观战，战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也就是说，宁远兵败后，努尔哈赤整日悒悒不自得，最终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创伤的情况下，郁郁而终。

但事实上，中炮伤重而死可能性不大，因为从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来，努尔哈赤一直在忙于　“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以准备再攻宁远。此外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因毛文龙进攻鞍山，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宁远兵败对于这位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使得其整日心情郁忿，再加上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最终积劳成疾。于是在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于五日之后，八月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与前来迎接大妃乌拉那拉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时，驾崩。

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大妃乌拉那拉氏以身殉葬，年三十有七，同时殉葬的还有庶妃阿吉根、代因扎。史载，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乌拉贝勒满泰之女，万历十八年生，二十九年十一月，其叔父贝勒布占泰（卜占台）将她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前一任大福晋去世后，被立为大福晋。史载，乌拉那拉的殉葬“或曰大妃之殉焉，为太祖遗命，诸子执而逼之乃死”，也就是她很有可能是被逼自杀的。

其实殉葬制度自古以来屡见不鲜，所谓殉葬，也就是用人或器物以葬，如《墨

子·节葬下》中所说的那样“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由此可见，殉葬自古以来，屡见不鲜，《礼记·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武公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66人”，秦穆公死时候“从死者170人”。

秦汉以后，殉葬在中原已经有所收敛，很少有人殉葬，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但至辽代，人殉之风死灰复燃，《辽史·第七十一卷列传第一》有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时，皇后述律平甚至强迫一百多名大臣为其殉葬，而她自己则是：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

至金代，女真人更是颇为推崇殉葬之风，其贵族下葬虽然不用棺椁，但殉葬却是必不可少，所谓“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蒙古成吉思汗死去时，其用40名贵族女子殉葬，而蒙兀死时，沿途杀了2万人殉葬。至明代，此习俗也被延续。

太祖死时，共陪葬及殉葬40名嫔妃，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明孝陵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而成祖殉葬的嫔妃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16人，而另一种则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30余人。不过《李朝实录》的数据虽然与《大明会典》有所冲突，但却细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嫔妃集体从殉的过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帝崩，宫人殉葬者30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之后宣宗时，死也有人殉。史载 “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至英宗时，大明才断绝了人殉制度，史书中说英宗病重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殡御殉葬，凡四事，付阁巨润色”。从此以后，大明再无人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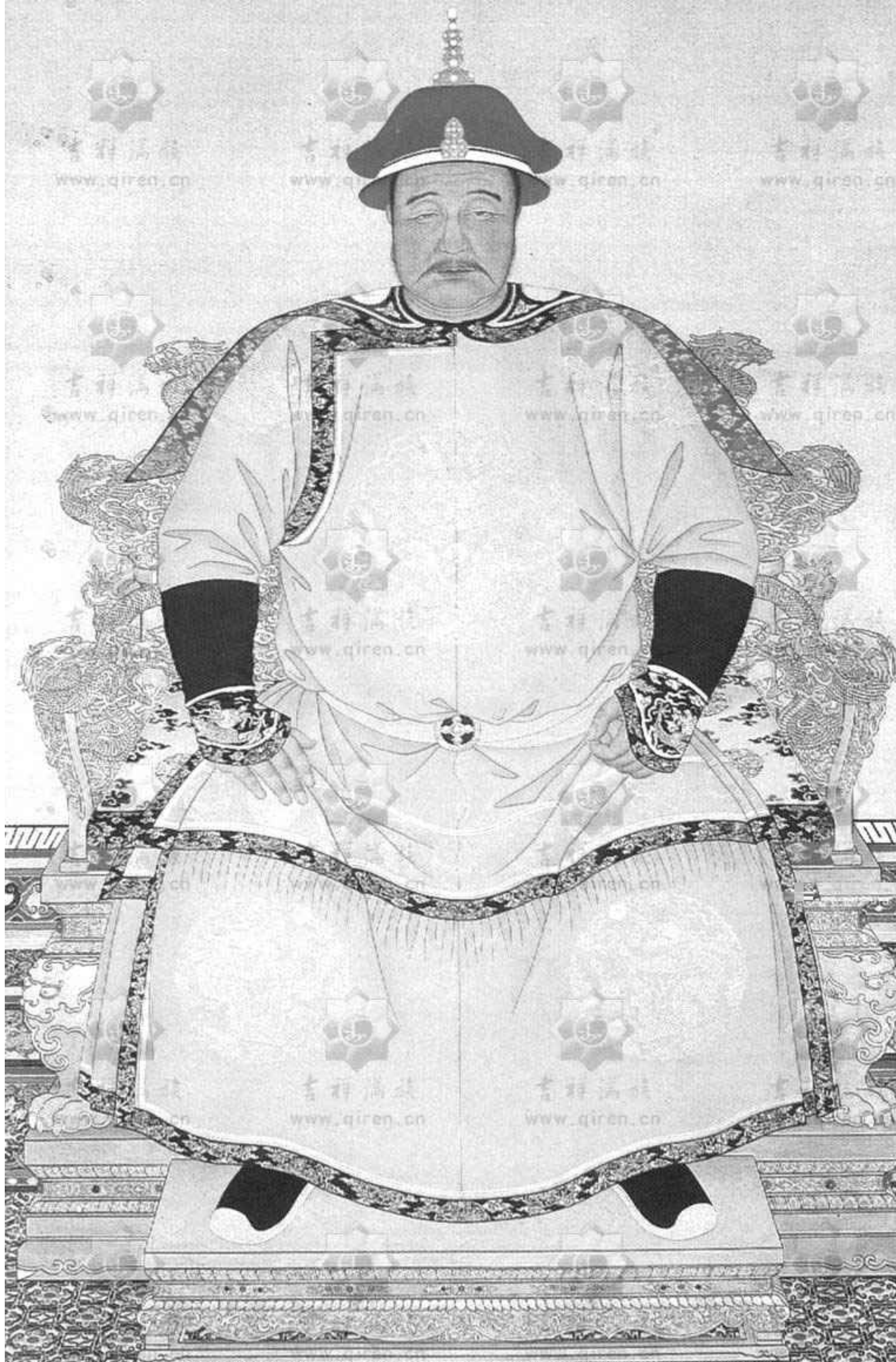
不过在辽东女真部落中，人殉习俗依然风靡，所谓满人好殉葬，上下皆然，夫死妻殉是定法。由此看来，乌拉那拉氏的殉葬也就不奇怪了。

乌拉那拉氏有三个儿子，分别是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而努尔哈赤病逝之时，身后除了这三个儿子之外，还有代善、阿拜、汤古代、莽古尔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极、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赖慕布、费扬

果，总共15个儿子。

努尔哈赤一生有16个儿子，长子乃是褚英，后金建国之前，褚英随同其父南征北战，广有战功，于是努尔哈赤因其英勇，封号曰“阿尔哈图土门”，万历四十一年（1613），褚英以嫡长子身份，又凭借多年战功，被立为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但由于“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及“四贝勒”皆与褚英不和，于是“五大臣”首告嗣储褚英，似有贰心之嫌。于是努尔哈赤开始疏远褚英，这种情况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他还扬言：“若出征之师被击败，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并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就这样，这位本有希望继承汗位的长子被以“诅咒”之罪，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处死。次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褚英被罢政以后，次子代善于天命元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称大贝勒。其在诸子中年岁居长，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统领正红旗、镶红旗二旗，史载，努尔哈赤曾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并说：“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指代善）收养。”于是代善权势显赫。然而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他却因为家中事务不和，而被废除嗣位。史载“先前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自此之后，努尔哈赤再也没有明确指定汗位的继承人，以至于其死后，汗位的继承者也就成了问题。其实，在天命七年（1622）时，努尔哈赤以其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多尔衮（一说阿济格）、多铎、岳托为八和硕贝勒（旗主贝勒），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制，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并指示在其身后应坚持实行此制。是谓“八王共治”。于是，汗位继承者也就自然是应该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产生了，当时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手握重兵，怀有夺取汗位的野心。此时，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决定拥皇太极嗣汗位。史载，代善等以“皇太极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为由，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提议，以四贝勒皇太极为汗，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申时出生的，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哲哲，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妹妹。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后金举行新年朝贺仪式，皇太极居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由于努尔哈赤创制八旗的本意是一旗一主、八家旗主共治天下，大汗之位由八家推举旗主之一出任，亦可将其罢免，于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事实上是由四大贝勒共同执政、四小贝勒议政，也就是皇太极是与大贝勒礼亲王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一同主持朝政，而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四大贝勒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身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四大贝勒第四的皇太极因其是经过议政会议诸王推举而继承汗位的，虽然当时诸王均享有很大权力，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和硕贝勒，均年长于皇太极，故而权力受到很大限制，甚至皇太极临朝时，其他三大贝勒并坐左右同受臣属朝拜。

于是皇太极开始计划结束旗主并立、事权不一的局面，他首先废除了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政事的旧制，改以诸贝勒代之，其后扩大了议政会议人选，在八旗各设总理旗务大臣，与诸王共议国政，以达到分散诸王权力的目的。此后，皇太极又颁行《离主条例》，规定“凡八旗贵族犯有私行采猎、隐匿战利品、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人等罪愆，准其属人和奴仆告讦。告讦属实，准予离主。”从而以裁抑八旗旗主的特权。此后，取消“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坐受”的仪式，改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与此同时，借故囚禁二贝勒阿敏，处罚三贝勒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中仅剩代善一人，对皇太极唯命是从，在取得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实际支配权之后，皇太极便已然打破了八旗的权力平衡，也因在出席八旗会议时，皇太极已不再是某一旗旗主之身份，而是作为最终的决策者，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他得以强化汗权。

后来皇太极为了进一步限制诸贝勒的权力，又对每一旗的护卫数实行严格限制。每一旗只可选用护卫20人。从而使得诸贝勒几无兵权。此外，他仿明制，设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两衙门（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从而集中了汗权，加强了专制统治。

与此同时，皇太极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些对汉人的政策做出了调整。在努尔

哈赤统治时期，后金曾经出台过对辖内汉民的诸多苛政，导致汉人的生存空间被缩小，大部分人被编入满洲人庄园成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忍受而出逃，但一旦被抓回会则被处决。即便后金国内的汉人官员也非自由之身，他们从属于女真人，家产不能受自己支配，身故之后甚至妻子还要归入贝勒家为奴。而这些因素都导致天命后期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矛盾激化，常有汉人用投毒、暗杀等方式进行反抗，并与辽东明军相呼应，以至于对后金国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皇太极继位后，即着手实施改变，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故而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于是此后“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此外皇太极还强调女真人、汉人“均属一体”，之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劳役，故而汉人常受欺凌，于是皇太极为每个备御只给壮丁八人，牛二头，而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这种采取汉人壮丁与满洲人分屯居住的方式，极大地使得汉人得以安定下来，同时皇太极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并采取了攻陷城池时不杀降民、为降人编独立户籍、放宽对逃人的惩治等等举措，从而使得后金内部满汉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此外，皇太极将分离于满洲八旗之外的汉人独立创建为汉军八旗，使得旗下汉人充分地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增强了八旗军的作战力。

当时的汉军八旗，兵卒主要来源是主动归附或在战争中被后金所俘获的辽东人丁，故而以汉人为主，也有少部分汉化女真人和曾入明为官的蒙古人，起初均编隶于满洲八旗之下。由于努尔哈赤时期对汉人的种种苛政，起初汉军八旗的地位并不高。直到皇太极继位后，汉军才得以重视。参加过宁远之战的皇太极对于红衣大炮的印象十分深刻，而当时，后金军中尚无大炮，攻城时难免会受到很大阻碍，于是皇太极以王天相会造炮，命其铸造“红衣炮”，并始编汉军一旗，旗纛为青色，由额驸佟养性率领这支“重兵”。汉军之所以在满语中被称为“重兵”，也正是由于归降汉人铸造、掌管火炮而得名。因此，可知汉军创制之初其实也就是掌握着火炮，而火炮对于后金军队的重要性也使得汉军地位获得了提高。

虽然皇太极继位后，还继续充分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但他却通过变革，使八旗越发充满生机，在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和完善、扩大蒙古八旗基础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对汉军八旗的发展。在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而皇太极继位后对黑龙江流域多次用兵，征讨所得来的民、地被称

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在把新满洲编入八旗之后，极大地补充了满洲八旗的兵员。譬如，他曾经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5673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此外还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42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除了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其旗色、官制与八旗满洲同，惟地位略低于八旗满洲，而高于八旗汉军。

其实从天命六年（1621）开始，蒙古旗人就开始被编入满洲八旗了。史载，“镶黄旗满洲都统国柱佐领。系勋旧佐领。国柱始祖顾尔布什，原系蒙牛夸尔夸贝子。太祖皇帝时，率部众来归，封为‘驸马’，授为三等子，将部属之众成立佐领，属于白虎赖管理……于康熙九年分为两个佐领时，将部属满洲30家、蒙古10家，分与察哈尔蒙古诺门达来之子，一等侍卫和尚管理”。不过，最初的时候，真正的蒙古八旗只编有“蒙古二旗”，称为“右营”和“左营”，后又将这两个旗的人丁划归代善、济尔哈朗等所辖的满洲八旗中。皇太极时，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察哈尔，漠南蒙古大部分归顺后，“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人数约7800人。旗色官制与“八旗满洲”同。据记载，当时蒙古壮丁共有16953人，分编为11旗，其中，古鲁思辖布、俄木布楚虎尔和耿格尔、单把四人所辖的三旗就有9123人仍然隶属于原来的八旗满洲下。

但皇太极在位时，汉军八旗的发展最快，最初时，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但旗纛统一为青色，后扩大为四旗，旗纛为纯青镶黄、纯青镶白、纯青镶红和纯青色，每旗设牛录章京18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不过，无论是汉军一旗、二旗还是四旗时期，旗下人丁的本籍均属满洲旗分之下，当时汉军的旗色只是为了对兵种加以区分。崇德七年（1642）六月，正式组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至此，汉军才开始拥有独立的旗籍。



满蒙八旗

皇太极对此颇为满意，他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正如《八旗通志·序》上说的：“太祖……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在建立了完善的满、蒙、汉八旗后，每逢行军作战，“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譬如，皇太极曾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内满洲、蒙古、汉人二十四固山各固山额真官军一半，外番蒙古兵一半往征明国。毁边关入，纵横无敌”，通燕京，下山东，克城“共八十八”，“俘人畜九十二万”。此处的“二十四固山”，即由满、蒙、汉八旗所组成。而也正是这24旗的建立，才使得皇太极能够在此后，对大明帝国的进攻中，获得一次次的胜利……

当然了，除了建立汉军八旗之外，皇太极还重用汉官，并赐以田宅等私有财产，以优礼对待。努尔哈赤在位时曾经对后金辖内的汉人生员中所谓“通明者”全部处死，仅有300人得免，却沦为旗下奴仆。皇太极继位后，对这些人进行考试，有200得中，他们均被豁免奴籍，恢复了自由身，并得到嘉奖。此后，皇太极再度开科取士，尽取而用之。此外，皇太极设立文馆，以将汉人士子选入文馆，并予以充分的信任，文馆诸人于是也就渐渐成了皇太极身边的儒臣势力，从而逐渐呈现出与以女真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当初皇太极为大汗之初，设八大臣管

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查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虽然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加强了汗权，但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于是在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下，皇太极才做出了“仿明国政体，正式设立六部”的决议，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各司其事，事不留行”，而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

此外，通过那些儒生士人的影响，皇太极才决心废除三大贝勒“值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而如果想要加强集权统治，那就必须收回权力，于是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值月之事，从而使得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此外，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也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也改变成了“按旗分，依次朝见”。

于是自皇太极掌权之后，很少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正是他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的措施，使得满汉矛盾得以缓解。史载，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重用汉人和汉官所带来的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使后金的经济得以发展。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此后，都城沈阳易名“盛京”，而诸贝勒大臣则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初未允。后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此后，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而“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

于是，天聪十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王公大臣齐集。由多尔衮奉满字表、巴达礼奉蒙字表、孔有德奉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跪于宫门，皇太极于内楼传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于是，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

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于是，皇太极决议，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实际也就是改“金”国号为“大清”，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群臣所上尊号，并授四宝，登基称帝，自此大清建立。关于将国号改为“大清”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清”之国号，或云是金的谐音，而且满人尚青，加水字边以符合“五德之说”，用“水德”免去朱明之“火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原意为“好战者”，故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或“善战之国。”

皇太极登基为帝、建立大清时，所授四宝，乃“皇帝之宝”“天子之宝”“敕命之宝”“奉天之宝”。此外，还有一块宝玺，乃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关于这块玉玺的得来，其实颇有一番曲折。自从被推选成为大汗之后，皇太极在内政改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大明的进攻，在即位后，处于在“邦家未固”时，皇太极一方面对明廷采取议和策略，同时又屡次入关，掳掠汉地大批人畜、财物，同时为解除后顾之忧，两次出兵朝鲜，黑龙江流域，同时还对漠南蒙古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当初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于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国，年号为“天命”时，曾使用过两方宝玺：其中一方为六行老满文玺，译成汉文为“天命金国汗之宝”，印文为无圈点满文楷体，而另一方则为“后金天命皇帝”印，这一点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所记载。据传光海君见到书信中盖有的此印时，曾大吃一惊，认为努尔哈赤居然敢自称皇帝，于是命各边司迅速查清，果然如此。而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在给李氏朝鲜及大明的文书上，一直钤用明朝颁发给他的“建州左卫之印”。此番另铸宝玺，显然是其公然与明朝分庭抗礼的象征。

皇太极继位后，改年号为“天聪”。他所使用的宝玺除了“天命金国汗之宝”外，还有一方四行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满文老档》中称此宝为“金印”。随后，皇太极又通过击败林丹汗的察哈尔部，而获得了所谓的“元传国玺”，而关于这方玉玺，曾有过一段传奇的经历。相传此玺曾收藏在元朝大内，后明太祖皇帝以徐达北征，元顺帝弃都携眷，北走沙漠，同时也带走了这方玉玺。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去世，宝玺从此便杳无音讯。两年后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发现他所放的羊群中有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只是不停地用蹄子刨地，牧羊人感到很奇怪，便挖开这个地方，结果就发现了这枚玉玺。不久之后，此玺被元皇室后裔博硕克图汗取走。后来博硕克

图汗被林丹汗击败，宝玺又到了林丹汗手中。

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也是蒙古最后一任的大汗，其祖父布延薛禅汗去世后，作为布延薛禅汗的长孙的林丹汗，因为其父亲莽骨速的早逝，年仅13岁的林丹汗继汗位。即位后的林丹汗，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蒙古诸部落的分裂及努尔哈赤的崛起，这两大难题，为了巩固以自己作为黄金家族后人的蒙古大汗地位，林丹汗首先在辽庆州的旧址上修建了瓦察尔图察汉城，并以此处控制着内喀尔喀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五部。然而，就在林丹汗刚刚开始经营蒙古的时候，努尔哈赤以其长子褚英领兵攻打女真乌拉部，由于乌拉部与科尔沁接壤，故而在不能抵挡建州兵的时候，乌拉部选择向科尔沁蒙古求援。面对后金的势力日益逼近蒙古地区，在此之前又有不断来自科尔沁、内喀尔喀部等各部王储的要防范后金的进犯，在林丹汗的同意之下，科尔沁部王储奥巴父子统帅科尔沁大军进抵乌拉部，与乌拉部联手击退了褚英的进犯。之后，叶赫部又受努尔哈赤的威胁，遂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又命奥巴父子领科尔沁大军驰援叶赫部。此战中，努尔哈赤的爱将布扬古阵亡。之后，林丹汗又数次与后金交手。当时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大明和蒙古同时作战。于是努尔哈赤选择至以通婚联姻为手段以笼络科尔沁、内喀尔喀部，同时削弱林丹汗的影响。

萨尔浒大战之前，林丹汗所统治下的蒙古已经强大一时，他连年进攻明朝的辽东边界，要求市赏。而大明则选择考虑希望借助林丹汗的力量牵制建州，于是同意在广宁镇与蒙古通商。很显然，在建州的威胁面前，大明与蒙古达成了统一。此后，萨尔浒大战爆发，明军一败涂地，为了进一步能够遏制努尔哈赤，大明与蒙古联合。但无论是铁岭之战，还是沈阳之战，明军与蒙古军都不占上风。

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内部发生了分裂，林丹汗即位后，他和蒙古众多部一样也信奉黄教，可当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来到蒙古后，林丹汗却为其法术所打动，于是封沙尔巴呼图克图为国师，接受其灌顶。这样一来，使得林丹汗与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发生了分歧，此后一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

皇太极登基之后，决心利用蒙古各部的这个分歧采取行动，而且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想对大明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么就必须先解决蒙古这个后方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于是，为削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策略，从而蚕食瓦解林丹汗所控制的各蒙古部落，而皇太极本人甚至也纳娶了科尔沁部寨桑之次女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为妻。在萨尔浒战役

后，内喀尔喀等五部就已经背着林丹汗与后金单独媾和。此后，科尔沁的好儿趁部又归顺后金，林丹汗率军征讨时，好儿趁向后金求援并与后金军联兵击退林丹汗。

皇太极的精心引诱以及林丹汗为急于统一蒙古而对其他各部动辄以武力相逼，使得短短的三年期间，察哈尔部外围的那些部落纷纷弃林丹汗而投往后金。在瓦解林丹汗统辖各部的策略得手之后，皇太极曾试图以那些归降的蒙古旧部劝说林丹汗归降，但被林丹汗所拒绝。于是皇太极以劝降使臣被察哈尔的多罗特部所杀害为理由，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此战役击败了林丹汗所辖的多罗特部，俘获万余人，此后他又于沈阳会盟归附的蒙古诸部，这次会盟就是为了征讨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于是归顺后金的敖汉部、奈曼部、内喀尔喀部、喀喇沁部以及科尔沁蒙古各部与后金军组成了满蒙联军，再次出兵察哈尔。此战，皇太极亲率的大军攻入察哈尔的锡尔哈锡伯图等地俘获众多人畜，只因科尔沁部的奥巴有意放纵，林丹汗与其弟和其他部下才得以逃脱。

此后又有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落、阿鲁伊苏特部、噶尔玛伊勒登等部相继归降皇太极，使得林丹汗愈发势孤。后金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决定对林丹汗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战，这次出征加上归降后金的蒙古各部落总兵力为十万之众。四月，皇太极率大军越过兴安岭，在皇太极的大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的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带着十万余众向西逃遁，渡黄河、抵鄂尔多斯。

林丹汗在西逃途中，丢人弃马，其部下有数万人马被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最后，林丹汗只得来到甘肃境内的大草滩一带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没等他东山再起，由于常年的戎马征战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两年后，林丹汗就因病而死。自其死后，其子额哲率部撤回到鄂尔多斯。在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四月，派多尔衮等人率军前往鄂尔多斯寻找额哲，并于当年四月找到了他。皇太极将察哈尔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以自己之女许嫁给额哲。次年三月，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爷会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为其上尊号博格达汗。至此，漠南蒙古各部为后金所有。

也就在天聪九年，多尔衮等率军前来察哈尔时，获得了这方所谓的“元传国玺”。据说多尔衮西征察哈尔，得知玉玺还在苏泰太后手里，便强行索取。据史书记载，此玺刻文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蛟龙为钮。皇太极闻听获得“元传国

玺”之后，大喜，以至于当多尔衮得胜班师回朝时，皇太极破例出行百里之外，到辽河以西的阳石木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接宝仪式。

很显然，获得“元传国玺”，为皇太极立国称帝提供了契机。因为相传“传国玺”始于秦，始皇帝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后汉高祖皇帝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所谓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也由此，在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下，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此后，传国玺归东汉光武皇帝，三国时，“传国玺”被曹操据有，此后天下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历经南北朝之动乱，“传国玺”为隋文帝所得，隋亡，萧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贞观四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俘萧后与隋炀帝孙杨政道，传国玺归于李唐。沿数百年，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天佑四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潞王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宣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虽然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有所谓“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耶律延禧，金辽交战时，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此外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有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而此番，皇太极从林丹汗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只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争议颇大，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瑭制的伪玺。但不管怎么样，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

皇太极得到这枚传国玺后，遂在敕谕上钤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用以说明“天命攸归”，同时将此玺的印样向朝鲜等国颁示，并在盛京八门张贴同样内容的文告，以此笼络人心，从而形成了“天下一心”的局面，继而在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下，使之接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此后，皇太极又率军亲自征讨不服从后金统治的朝鲜，试图迫使朝鲜向其臣服，削弱大明的势力，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专心进攻明朝，以便于最终能够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当初萨尔浒大战时，李氏朝鲜也发兵1万兵马至富察之野协助。此后光海君畏惧后金的实力，试图保持在大明、后金之间的中立，可其“不背明，不怒金”的政策却惹来了群臣反对。天启三年，在国王左右任事的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城中的训练都监竟倒戈相向，以至于政变兵不血刃便达成。次日，绫阳君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仁祖。对于光海君的处置，仁祖是以宣祖的继妃“仁穆大妃”的名义颁布懿旨，从而将自己的叔父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废黜，继而用石灰烧瞎其双目，贬为庶人，流放于江华岛。

“仁祖反正”后，朝鲜开始奉行反后金亲明的政策，停止了与后金的贸易，次年副元帅李适发动兵变。史载，李适本贯固城李氏，是兵曹参判李陆的后裔。宣祖在位期间，曾任明川县监，因其熟知女真之事、有将才，故而得以出任刑曹佐郎。后充泰安郡守，又调镜城判官。当时建州女真频频骚扰朝鲜边境，于是李适率兵防御，并因功而得以出任永兴府使、济州牧使、咸镜道兵马节度使。仁祖反正后，李适受到了仁祖的倚重，录为二等靖社功臣。最早，仁祖没有派他前往北方边境，而是任命他为都城的左捕盗大将。但此时李贵、金鎏等人为首的西人党开始排挤李适。大将李贵弹劾李适纵容属下多次以稽查盗贼为名，闯入大臣的住宅，执辱大臣毁家夺财。于是，当北方边境传来后金即将入侵的消息时，仁祖便派副元帅李适前去北方边境防御。西人党便制造事件，诬陷李适、郑仁荣、柳庆宗等谋反。在左赞成李贵的谗言下，仁祖将李适的儿子李栴下狱。得知此事后，李适便杀禁府都事高德祥和沈大临、宣传官金芝秀、中使金天霖等人举兵叛乱。慌乱之下，仁祖向大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求援。而毛文龙也迅速遣游击王辅点兵于蛇浦，支援仁祖，可结果李适还是攻入汉阳，并拥立兴安君李瑅为王，但不久叛乱就被都元帅张晚率兵平灭。



明军

而与李适共同叛乱的韩润、郑梅等则侥幸脱身，逃往后金，这些朝鲜人纷纷劝说努尔哈赤讨伐朝鲜，以削减大明羽翼。最初的时候，努尔哈赤是考虑南下进攻朝鲜的，但由于代善等人的反对才没有实施。皇太极称汗之后，于天聪元年（1627）正月，便是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硕讬等将，领3万大军，以姜弘立、韩润、郑梅、李英芳、朴兰英、吴信男等八名朝鲜将领为先导，大举南下。

后金军先渡鸭绿江，击败毛文龙所部明军于铁山，迫使毛文龙败退皮岛，随后于十三日包围义州，正式入侵李氏朝鲜。次日，后金军包围凌汉山城，迫近宣州、定州，威胁安州。后金派出使者劝降朝鲜守将，凌汉山城大将金搢、宣川府使奇协、郭山郡守朴惟健等皆将后金来使斩首，表示绝不投降，并驰报汉阳。

仁祖直到十七日才得到后金入侵的奏报，而此时后金兵已于十六日攻克义州，并已包围安州，而且安州也将要沦陷。于是慌乱之下，仁祖下令启用张晚为都体察使，与金起宗率军北上，同时派畿甸之军前往海西支援，又以李时白率军防御汉阳，同时还派李曙守南汉山城、以申景禛守临津、以金自点守江都，并将户曹杂物和版籍全部运往江都，以便于战事不利时，能够迅速迁都。此外又派金完率海西别胜军前往支援。

二十一日，后金兵攻破凌汉山城、定州、郭山等地，大将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惟健被俘，宣川府使奇协则不屈而死。由于后金兵强迫被俘者剃发易服，故而遭到众多朝鲜人的拒绝，也因此后金兵实施了血腥的屠城，死难军民数万人，焚毁粮草百余万。平安兵使南以兴得报后，遣人遗书于姜弘立、朴兰英，希望能够合议。

接连的败报传到汉阳，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仁祖派壬辰倭乱时的老将李元翼前去南方征募壮士，以扩军备战，同时收拾人心。二十二日，阿敏派人献书，要求和谈。但仁祖却命令张晚回书拒绝，声称誓死不从城下之盟，并向大明帝国讨求救兵。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后金兵在郑梅的引导下渡过青泉江，围攻安州。后金兵至平壤，平壤守军不战而溃。平壤以东诸城全无士气，张晚、金起宗飞书驰报。而黄州、平州兵器极其缺乏，仁祖遣申景瑗进救黄州、平州。后金兵至肃川城下，城中守军溃散，守将平安监司尹暄率军官四十余人逃往中和。仁祖急催忠清、全罗两道水军北上增援。

二十五日，安州陷，守城的平安兵使南以兴率诸将聚集中军大营，引燃火药自焚而死。而大明派来的援兵也在此战中损失惨重，都司王三桂阵亡。同日，后金骑兵长驱直入，渡大同江，直抵中和。黄州兵使丁好恕率千余人弃城而走，逃往蒜山。为了稳定军心，仁祖下令将平安监司尹暄斩首，以黄州兵使丁好恕戴罪立功。此后，阿敏以平壤为后金中军的大本营，派先锋往黄州。由于申景瑗所率的援军夜惊溃散，故而平山成为一座毫无防守之力的城池。

由于后金铁骑逼近王京汉阳，一时间，朝鲜国中震恐，虽然仁祖多次遣使求

和，但皆被后金置之不理，故而仁祖留金尚容守汉阳，自己以戎装南巡的名义逃往露梁，随后沿着阳川、金浦、通津，逃往江华岛。当得知平山、开城遭到后金兵的屠城之后，仁祖决定将都中所有民众一起迁往江华岛避难。又命南方新征得的三道精兵防卫江华岛，又派李曙将粮草辎重送往江华岛。

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与诸贝勒担忧大明和蒙古诸部会趁机袭击后金，遂命阿敏同朝鲜议和。于是阿敏驻军平山，遣使向朝鲜提出议和。正月二十九日，后金将遣使议和的消息传到江华岛，虽然朝鲜许多大臣不愿与后金议和，但仁祖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接见来使。于是，权璡亦持朝鲜求和国书前往中和，阿敏大喜，将驻屯中和的大军调回平壤。



李氏朝鲜人

二月二日，阿敏、济尔哈朗遣使赴江华岛，正式向朝鲜递交要求议和文书。据史料记载，由于议和文书为“大金国二王子，答书于朝鲜国王。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和，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 贵国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邻国相近，何惧之有？果如此议，我两国告天誓盟，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事完之后，赏格在贵国裁处，可差担当国事大臣，速决完事。 不然，途道往返，羁迟不便，毋视我为不信也”。故而使得这次合议事实上根本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因为无论是仁祖，还是李氏朝鲜的普通官员都不会接受此文书中与明朝断交的要求，在权衡一番之后，仁祖将后金使者留在江华岛，遣晋昌君姜前往阿敏军中投递求和文书，同时加强南汉山城的防卫，还派兵增援张晚所部。

由于后金使者未归，故而阿敏怀疑朝鲜不想议和。七日，阿敏遣使赴江华岛，诘问朝鲜继续派兵的意图，以及国书继续使用天启年号的缘由，威胁将拒绝不退兵。于是双方一直僵持达一个月之久。直到二月十四日，朝鲜仁祖派原昌君李玖献马百匹、虎豹皮百张、绵绸苎布四百疋、布万有五千赴后金军中，以示愿意谈判，双方才重新开始和谈。二月二十八日，后金使者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至江华岛。三月三日，朝鲜仁祖与后金使者刘兴祚等人在江华岛宣读誓文，正式和好。

据史料记载，朝鲜方面的誓文为：

“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 朝鲜国三国老、六尚书某等，今与大金国八大臣南木太、大儿汉、何世兔、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计等，宰白马、乌牛，立誓。今后同心同意，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

而后金方面的誓文为：

“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

此后，双方约定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双方订立兄弟国的盟约，而朝鲜停

止使用大明帝国的天启年号，同时遣王子李玖赴后金为人质。后金、朝鲜互不侵犯对方疆土。

但由于交涉期间，阿敏贪图平壤城的财宝，有意占据朝鲜之地自立为王，故而多次故意不承认和约，并纵军在平壤掠夺数日。李玖只好再次与阿敏盟于平壤城。而在得知和议对后金有利而阿敏又有野心的情况下，皇太极当即要求从朝鲜撤军。此后，后金大军开始撤回，仅留3000人马驻守义州。九月，在朝鲜仁祖的再三请求下，后金从义州全部撤军，释放李玖及朝鲜俘虏，双方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

此番后金大军入侵朝鲜的战争因发生在丁卯年，故而得名“丁卯战争”，又称“丁卯胡乱”。不过这次入侵之后，朝鲜被迫与后金议和，与后金结盟，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天聪二年（1628），朝鲜依据与后金的协议，开市于中江。同年，皇太极企图进攻大明帝国，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此举显然让皇太极很是不满。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派巴都礼、察哈喇等人前往朝鲜颁定贡额。仁祖仅同意贡献贡额的十分之一，推托说金银、牛角不是朝鲜的特产，拒绝献出。皇太极大为恼火，于次年致书仁祖，责其减岁币额，并窃参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朝鲜索性拒绝同后金在会宁城的互市。此后又多次拒绝互市，并在京畿、黄海、平安三道加筑白马等12城，以加强对后金的防备。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攻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玉玺投降。各贝勒与蒙古王公皆建议皇太极称帝。皇太极遣英俄尔岱告知朝鲜。朝鲜群臣皆言不可，于是朝鲜仁祖将英俄尔岱囚禁在议政府。结果英俄尔岱等人夺民间之马，破门北逃。仁祖派人追上，宣布不承认“丁卯胡乱”后的城下之盟。英俄尔岱逃回后金，于是皇太极便有遣兵入朝征讨之意。

次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时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正在盛京，虽然二人参加了登基大典，但却坚持认为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并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使皇太极非常愤怒，于是同年十一月，皇太极以朝鲜违背盟约为由，准备入侵朝鲜。此番皇太极先遣回朝鲜使臣李廓，通报仁祖，随后于腊月二日，派济尔哈朗守盛京，阿济格、阿巴泰守辽河入海口以遏明军，皇太极亲自率领清军12万入侵朝鲜。大军以多尔衮、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又以户部承政马福塔、英俄尔岱等率兵300人，装扮成商人，突袭朝鲜王都汉阳城，同时多铎、岳讬等人率数千兵马接应，而皇太极与代善率其他各路军马缓缓

南下。

腊月十日，清军主力迅速渡镇江。十二日，兵至郭山城，面对清军滚滚铁流，定州、安州尽皆投降，只有义州府尹林庆业死守白马山城抗击清军，使得清军始终无法攻陷义州。就在坚守义州的同时，林庆业还向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请求增援，但金自点等人却未派兵往增援。

腊月十三日，朝鲜仁祖得到清军入侵的消息时，都元帅金自点已经派人向仁祖告急，奏称清军攻至安州。仁祖大惊，在令沈器远负责王京汉阳的防卫的同时，还命老弱之臣尽皆前往江华岛避难。史载，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翌日，仁祖得知清军已过松都的消息，派人将宫眷、神主、王族迁往江华岛，自己则退往南汉山城。

由于仁祖车驾过崇礼门时，马福塔所率的300众突然出现在城外，于是仁祖只得一面令申景禛率兵出城防御，一面派崔鸣吉前去劳军，以拖延时间。就在马福塔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方才同意和谈时，仁祖已经出逃汉阳，并于当夜逃到南汉山城。翌日，仁祖听从金鎏的建议，准备逃到江华岛去，但由于暴雪大降、路途难行，只得固守南汉山城。

此后，仁祖遣绫峰守李偁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虽然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但皇太极还是大怒，并杀之，继而驱逐朝鲜使者，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否则大军当继续南下。

此后，仁祖亲自登上南汉山城城楼，以鼓舞士气、笼络人心，又赦免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平安兵使柳琳、义州府尹林庆业互相倾轧之罪，谕以急速进兵抗敌。又发檄各道，要求入兵增援。就在仁祖和群臣都对主战还是主和莫衷一是的时候。十九日，清军已经到达南汉山城下。于是崔鸣吉等主和派建议与大清和谈，但面对大清要求送出世子方可议和的条件时，朝鲜上下还是难以接受。

腊月二十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至松都，又遣使劝降。仁祖拒绝，并召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率军回援，令各地兵马前来勤王，又令金庆征前去南部三道召集水师，准备与清军决战。二十四日，南汉山城内开始出现粮草不足的情况。朝鲜各处守军见仁祖被围，纷纷前来勤王。但公清兵使李义培畏惧清军，驻扎竹山不进兵，而江原道营将权井吉领兵到俭丹山，遭清兵击败。此外，公清监司郑世规领兵在险川，依山布阵，遭清兵击败，全军覆没，郑世规本人仅以身免。

二十七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至临津江北岸，此时南汉山城几乎断绝了外界的音信。次日，因留都大将沈器远送来击退清军进攻的消息，故而体察使金瑬派兵出北门而战，结果遭到清兵的偷袭，大败。此后，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在黄海道的洞仙击败清兵，庆尚兵使闵栐亦率兵至忠州水桥。一时间，局面倒也陷入僵局。

但短短两天之后，崇德二年（1637）正月初一，皇太极趁江面结冰之际渡江攻汉阳，慌乱之下，沈器远弃城退驻光陵。而此时多铎也率部已攻破平壤，并与皇太极会师。此后皇太极率兵驻扎炭川，俯瞰南汉山城。仁祖听从吏曹判书崔鸣吉的建议，派洪瑞凤、金荩国、李景稷等前去求和。虽然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云云。但包围南汉山城的清军还是伐木列栅，绕城驻守，使得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

正月四日，满清大军渡汉江，驻屯汉阳东20里江岸。由于此时朝鲜各道的勤王之军陆续赶来，故而双方接连展开厮杀。七日，清兵击败全罗监司李时昉部，此后南兵使徐佑申、咸镜监司闵圣徽合兵，屯兵杨根、薇原，号称2.3万，但却不敢前进，平安道别将领800余骑至安峡，也只能远观，庆尚左兵使许完领兵到双岭，未及交锋，就军败而死，右兵使闵栐率军进击，最终力战良久，亦败死，而忠清监司郑世规进兵龙仁、险川，亦战败，此外平安道观察使洪命，与清兵大战于金化，兵败阵亡。



就在朝鲜勤王大军接连遭到重创的同时，多尔衮、豪格统帅的左翼军由长山口克昌州城，败安州、黄州兵500，宁边城兵1000，截杀援兵1.5万，并在七日与皇太极会师。此后贝勒杜度率兵送来大炮，清兵合力围攻南汉山城。十三日，仁祖遣洪瑞凤、崔鸣吉、尹晖等出城议和，遭到拒绝。十九日，再遣李弘胄、崔鸣吉、尹晖求和。

二十日，仁祖正式决定向清朝称臣，翌日，遣李弘胄出使清营，献书投降。但皇太极要求仁祖下城亲自投降，此外清军还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又致书仁祖，令其出城投降。仁祖则复书“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请降，又

说“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

就在仁祖坚决不出城时，二十二日，皇太极遣多尔衮袭破江华岛，俘虏朝鲜王妃、王子、宗室、群臣家属等众，江华岛沦陷之时，前右议政金尚容、前右承旨洪命亨、司仆寺主簿宋时荣、前司宪府掌令李时稷等人不愿成为清兵的俘虏，自杀身亡。

此后，皇太极再次要求朝鲜仁祖亲自出城投降，并威胁若是不从，城破之后便要屠城，这种情况下，世子主动要求出城做人质，并称：“泰山既垂于鸟卵之上，国步谁措于磐石之坚，事已急矣！予既有弟二人，又有一子，亦可奉宗社。予虽死于贼，尚何憾焉？”

二十三日，仁祖决定送世子李溰代他出城投降，称“予为宗社、生灵，出不得已之计矣……渠为父出去，不害于义理，而人子之至情也”。但英俄尔岱传谕，必须要仁祖亲自出城，并威胁说皇帝此时准备回到盛京去，若不答应就不要再求和了。

而就在双方僵持期间，清兵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希望通过攻城来迫使朝鲜投降。仁祖只得在二十七日答应了这个要求。次日，皇太极同意了仁祖的求和，并要求他亲自出城，同时提出“三田渡盟约”，要求朝鲜以“长子及再一子为质”。

二十九日，仁祖先缚斥和派人物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献清军。次日，仁祖与王世子李溰率侍从50余人，穿青衣亲自出城，群臣哭送于西门。史载，朝鲜仁祖出城时，英俄尔岱和马福塔已率军在城外迎接。朝鲜军民看见仁祖随清军离去，误以为清军要把仁祖绑架到盛京，尽皆痛哭失声。此后，仁祖随清军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与皇太极会面，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除明朝的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丁丑下城”。

此后，双方和议，并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国王接受清朝的册封，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成为大清的藩属国，朝鲜使用的年号由大明年号改为大清年号，此外，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做人质，以及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200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400张、青黍皮300张、胡椒10斗、腰刀26口、顺刀20口、苏木200斤、大纸千卷、小纸千500卷、五爪龙席4领、花席40领、白苎布200疋、绵绸2000疋、细麻布400疋、细布1万疋、布4000疋、米1万包。

在议和文书中，还明确规定，如果清军攻打皮岛，朝鲜则应该出兵船50艘及其

他兵马以助之。

此后，在朝鲜表示归附了大清之后，皇太极随即撤军归国。不过在撤军归国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建立一座功德碑，以颂扬大清皇帝的功绩。在满清的压力下，仁祖被迫同意了，大清皇帝功德碑于崇德四年（1639）竖立于当年皇太极受降的三田渡地区。此碑的碑文用满文、蒙古文和文言汉文写成，正面为满文和蒙古文，背面为汉文，其内容大致相同。此后，每当清朝敕使到达朝鲜，都会前往三田渡，拜谒大清皇帝功德碑。

这场被称作“丙子虏乱”的灾难中，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12天便抵达朝鲜王京城下，数十万朝鲜人被押回盛京，此外“斥和反满”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大臣也被清军索要，押赴盛京处死，枭首示众。

不过，“丙子虏乱”后，朝鲜虽然战败归降，但心里并没有服气，甚至对大清产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大明年号。此后，仁祖还建议与日本德川幕府联合，以“假道朝鲜，出送援兵”，光复大明。后来的显宗更是声称：“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盖直抵关外，有不甚难者。虏不事武备，辽沈千里，了无操弓骑马者，似当如入无人之境矣。且以天意揣之，我国岁币，虏皆置之辽沈，天意似欲使还为我国用矣。且我国被掳人，不知其几万，亦岂无内应者耶？今日事，惟患其不为而已，不患其难成。”又有“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更为激烈的还是朝鲜孝宗李淏，其甚至精心准备了北伐计划。

天启六年（1626），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此后的丙子胡乱，他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等数十万朝鲜人被清军掳到盛京。清军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但这并没有获得朝鲜人的好感，此后昭显世子等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由于父迎子不合儒教礼法，且此举是承认大清敕使代表

天子，所以朝鲜两班士大夫很是不满。回国后不久，昭显世子暴毙昌庆宫欢庆殿，因死状是“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故而疑似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可面对这个疑案，仁祖李倧居然上报大清其是“病亡”，于是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此后，大清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仁祖大王死后，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孝宗。

或许是在盛京为人质时受气的缘故，孝宗对清朝十分蔑视，坚信古训曰“胡人无百年之运”，依然向明朝尊崇。而他手下的那群两班士大夫也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故而从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遂倡议北伐。

为了挥兵北伐清朝，孝宗起用西人党的宋时烈，此外在非正式场合中，清朝的年号皆被弃而不用，而使用崇祯的年号。他还积极扩军备战，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多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此外御营厅增加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万名，但由于财政困难，其实很能实现，于是孝宗加快了朝鲜宣祖时开始的大同法。大同法将贡物统一为米谷，该制度能够加快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的同时，还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外，对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不过，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于是孝宗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结果大清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而且孝宗打算联合日本江户幕府，以攻打清朝北伐的企图也被曝出来，于是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此后，孝宗死于昌德宫大造殿，这一北伐计划也就自然未能实施。

据史料记载，朝鲜一直以来，都对大清鄙视仇恨，虽然恪守藩属朝贡制度，但却一直遥思大明。康熙四十三年，朝鲜肃宗曾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明神宗。所谓“大报”出于《礼记》，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甚至在乾隆十四年，朝鲜还以明太祖、神宗、思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氏朝鲜末年……

在平定了蒙古、朝鲜之后，皇太极开始全力以赴地对付大明，而他的首要目标

就是镇守辽东的袁崇焕。

天启六年（1626）三月，袁崇焕因功升至辽东巡抚，负责辽东及山海关等地的防御，并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史载，袁崇焕起初辞赏，后熹宗坚持原意，方才为巡抚。然而，魏忠贤见其地位上升，于是派遣其亲信太监刘应坤、纪用到宁远监军。袁崇焕上疏反对，但不被采纳。后朝廷为安抚袁崇焕，提升其为兵部右侍郎，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在此时，他的麾下却是矛盾重重，因满桂认为在宁远之战中，赵率教未能援兵来援，故而与赵率教发生矛盾，两人互相指责，因赵率教是自己的心腹，故而袁崇焕与满桂之间也产生激烈冲突。因袁崇焕上奏请求遣其镇守其他城镇，故而满桂被召还北京。而虽然当时经略王之臣极力反对，并请求朝廷命其镇守山海关。但朝廷为了缓和各方矛盾，还是命令王之臣专守关内，而关外兵马将领皆由袁崇焕派遣。之后袁崇焕自悔，请求朝廷依照王之臣建言。满桂遂被调遣镇守山海关，并持尚方宝剑、统领关内外部分大军。

此后，基于对廷臣诽谤的担心，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自己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主张：用辽人守辽土，屯田辽土以给养大军，从而减少海运，此外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行出击。此奏折得到熹宗的嘉许。此外，袁崇焕还上奏进言称明军不善于野战，只能凭借城池固守和火炮实施防御，并要求增派四万人马去修筑松山城等防御设施。此奏也得到了熹宗的批准。

于是这年冬天，袁崇焕率领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逐渐修复高第此前放弃的辽西土地。事后，袁崇焕上奏称赞这两太监的功劳，从而使得魏忠贤、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由此，袁崇焕与魏忠贤之间关系颇为紧密，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后又为魏忠贤请立生祠，这也使得他显然为东林党人所不齿。

就在天启六年时，北京发生了“王恭厂大爆炸”事件，这次事件亦称天启大爆炸、京师大爆炸、王恭厂灾、明末北京奇灾。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端午节次日巳时（上午9时），位于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了离奇爆炸事件。史载“京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室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又及，“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大木远落密云”。

而根据《天变邸抄》的描述，则为“天启丙寅五月初六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西及平则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二万余，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而震声南至河西务，东至通州，北至密云、昌平，甚至远距京城数百里的遵化、宣化、大同、山西广灵县及天津等地都发生剧烈震动。

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大木远落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个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掷出顺成门外，其后，“木、石、人复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在爆炸中，“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而且“死者皆裸”。事后，有人入京报告，西安门附近落下铁渣滓，衣物飘至西山上或东北郊，高挂树梢，昌平的州教场中，衣物、银钱、首饰、器皿也零散一地。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等人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并长班关七人不见踪影。承恩寺街上行走的轿子，事后被打坏在街心，女客和轿夫都消失不见。还有粤西会馆路口的塾师和学生一共36人，一声巨响之后，尽皆全无踪迹。更离奇的是，到京才两日的绍兴周吏目之弟于菜市口遇六人，拜揖尚未完，周某的头突然飞去，身体倒在地上，而六人却无恙。而爆炸之时，许多树被连根拔起，掉落在远处，猪马牛羊、鸡鸭狗鹅，甚至残破的头颅及手脚更时纷纷被卷入云霄，又从天空中落下。这场碎尸雨，持续一个时辰。木料、石块、人头、断肢，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纷纷从天而降。其中，尤以德胜门外落下的人臂、人腿更多。

爆炸发生之时，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餐，突然地动殿摇，起身便冲出乾清宫直奔交泰殿，情急间“内侍俱不及随，只一近侍掖之而行”，途中“建极殿槛鸳瓦飞堕”，近侍的头部遭飞瓦击碎而当场死亡，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皇贵妃任氏宫中器物纷纷坠落，而襁褓中的太子朱慈炅也因爆炸而受惊身亡。

王恭厂是工部制造盔甲、铳炮、弓矢及火药的兵工厂暨火药储存库，自永乐年起，大明帝国火器制造就有了很大发展，边事紧张时，北京城内先后设立了六处火

药厂局，凡是京营火器所需的铅子及火药都是由王恭厂预造，以备京营来领用。由此可见，王恭厂当时是作为工部制造及储存火药的火药库所在。也因此，这次离奇爆炸也普遍被看作是火药库爆炸所引起，但又有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引起之说，但不管怎么样，王恭厂灾变规模之大，甚至连蓟州城东角亦震坍坏房屋数百间，自然使得早就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的大明帝国一时间朝野震惊，中外骇然，人心惶惶了。在众人认为此灾变“乃古今未有之变也”时，众臣自然认为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纷纷上书，要求熹宗皇帝匡正时弊，重振朝纲。皇帝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诏，表示要痛加省醒，告诫大小臣工“务要竭虑洗心办事，痛加反省”，希望借此能使大明江山长治久安，万事消弭，且下旨发府库万两黄金赈灾。

也就在此后不久，努尔哈赤死。据称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派遣使者去悼念，以窥视其虚实，而皇太极则做出回应，派遣使者到袁崇焕处，双方欲议和，甚至皇太极还自降身份称臣，袁崇焕议和之初，其实大明并不所知，当奏报传来时，熹宗起初赞许其方，后改变看法认为并非良策，于是频繁下旨禁止。袁崇焕则因为要修筑防御工事而坚持己见。

可就当大明帝国朝廷议论议和之事，后金却趁机进攻了朝鲜，于是朝廷中言官认为是因议和所招致的，辽东经略王之臣更是以“宋金和议”为例弹劾袁崇焕。对此袁崇焕上疏道：“关外四城有四十里地，有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现在地少人多。必须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才能转移商民、大量屯田。如果城墙在修筑前，建奴入侵，届时势必撤退，那么此前的努力都谓之失败。现在趁建奴进攻朝鲜，于是用缓兵计为上。当建奴得知消息后，城防已成，于是关外四百里地则可固若金汤了。”对此，熹宗甚为赞许，此后虽然朝廷议论纷纷，但朝廷还是召还王之臣回京，并取消辽东经略职位不再设，同时将山海关内外兵马皆由袁崇焕调遣。而袁崇焕则趁后金转向朝鲜之时，迅速派兵修建锦州、中左、大凌，并在朝鲜受困、毛文龙告急之时，发兵救援。史载，袁崇焕在以水军援助毛文龙的同时，又派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人率领精兵9000进攻三岔河，以牵制皇太极，不过由于朝鲜此时已经与后金和议，于是诸将返回辽东。但也在此时，袁崇焕精心准备的山海关、宁远、锦州（关宁锦防线）防线也基本构建完成。

天启七年五月，朝廷命令尤世禄代替赵率教守卫锦州，尤世禄尚未抵达时，皇太极亲率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精兵，进攻辽西，攻陷明朝大凌河、小凌河两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五月十一日，后金大军直抵锦州，四

面合围后绕过锦州南下，攻克防线中的诸多堡垒，掠其物资。赵率教率部环城而守，并以缓兵计派遣使者求和，使者三次返回并未成功，而皇太极攻城愈急。巡抚袁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4000，令尤世禄、祖大寿统率，绕出后金军后，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同时朝廷命山海关的满桂移师前屯，以驻守三屯的孙祖寿移师山海关，宣府的黑云龙移师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师山海关，又派遣昌平、天津、保定兵驰援上关，并命山西、河南、山东的大军进行备战。

而与此同时，锦州城内，赵率教与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后金自五月十一激战二十八日，之后皇太极久攻不下，转而去分兵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军肃督将士登陴守战，列营濠内，用大炮轰击后金军。而驰援的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在城外与后金大军展开激战，士卒多死，仍力战不退，此战双方死伤惨重，此战满桂更是身负数箭。

见无法攻下宁远，后金遂解宁远围，增兵围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猛攻锦州，锦州城中使用大炮、火炮、火弹和矢石等武器，后金兵士卒损伤无数，然锦州终不可破。于是次日皇太极退兵，并拆毁大凌河、小凌河两个堡，史称“宁锦之战”，是为大明与后金交战的第二次大胜，此战满桂、赵率教功劳最大。

宁锦之战中，明军亦如之前宁远之战中的策略，凭坚固守，并使用红夷大炮，使得八旗军队的骑兵长处无法发挥，加之毛文龙此时率东江军直逼辽阳，后金退军被迫后撤回援。就连袁崇焕本人也承认“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宁锦之战后， 袁崇焕受到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以不救锦州为“暮气”及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等罪名，要求“从重议处”。于是袁崇焕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以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为由，又在李应荐的奏本中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准其所请，于是大明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满桂镇守宁远。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与宦官魏忠贤、王体干等去西苑深水处泛舟，却因风强，小舟翻覆，皇帝落水，虽然随即被救，但从此惊豫不堪，逐渐病重。尚书霍维华献“灵露饮”，以五谷蒸馏而成，清甜可口，但几个月后病情加剧，浑身浮肿。八月十一日，召见信王朱由检，即行驾崩，时年23岁。熹宗无子，遗诏立五弟朱由检为皇帝，是为明思宗，改元“崇祯”。

思宗朱由检登基以后，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于是，皇帝召魏忠贤至殿上，命一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忠贤面如土色，以重金托一位皇帝身边的老侍徐应元求情。徐应元劝他辞职，于是忠贤请辞获准。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于同年十一月一日，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因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行至直隶阜城的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太监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自缢而亡。此后，思宗又杀客氏，令崔呈秀自尽，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一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再加上漏网之鱼57人，共计315人，尽皆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而忠贤侄魏良卿等则俱被杀。

与此同时，崇祯帝还下诏，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东林党人，并起用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袁崇焕表示其在边关立功，唯恐朝廷人士妒功中伤。思宗请袁无须疑虑，其自有主持。此后，大学士刘鸿训上书请思宗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于是崇祯皇帝即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方便行事。此外，皇帝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



袁崇焕

然而就在袁崇焕踌躇满志，准备赴任时，却发生了“宁远兵变”。史载，由于欠饷四月，故而在崇祯元年，宁远13营的蜀、楚士卒，以张正朝、张思顺为首，歃血为盟，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众人攻入幕府，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向两人索饷。而毕自肃则表示无力支应。事实上在此之前，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由于毕自肃亲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因为财政无钱，也只能不闻不问，可也就是这层关系，使得毕自肃被众人殴打成重伤，以至于头部血流不止，几乎死亡。幸亏兵备副使郭广以身体护卫毕自肃，才保住其性命。此外，郭广为了营救毕自肃、朱梅两人，窃发官库的白银2万两，并向宁远商民借5万两，以7万两白银才赎回毕、朱二人。哗变始解。此后，郭广将毕自肃载至塔山堡调养，但毕自肃心灰意冷而引罪自杀。同年八月，袁崇焕到达辽东，为督师后，命副将何可刚将兵变首谋张正朝、张思顺等15人并斩首于集市。此外，斩杀中军吴国琦、惩罚参将彭簪古，并罢免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兵变始定。

这场兵变加强了袁崇焕权力，并改变了辽东明军的部署。事后，因为毕自肃已死，故而袁崇焕奏请崇祯帝撤销辽东巡抚职位，并罢免登莱巡抚孙国桢、取消该巡抚之职，崇祯帝均同意。尔后辽东大权由袁崇焕亲掌握，以统一事权。此后，袁崇焕又抚慰哈剌慎36家，以稳定边疆，同时以祖大寿仍镇守锦州，何可刚升任都督佥事，代替解任后的朱梅，而宁远、锦州合镇，赵率教则转屯至山海关，而袁崇焕亲自镇守宁远。此后，崇祯帝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并赏赐蟒衣、银币。

但也在这时，却发生了诛杀毛文龙之事。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时，提及其欲诛杀毛文龙。自天启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龙便在皮岛驻屯，由于毛文龙的东江镇耗费兵饷众多，故而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尚宝卿董茂忠上书弹劾请撤毛文龙，兵部商议时，袁崇焕提议派遣官员至皮岛管理兵饷核查银钱账用，却遭到毛文龙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焕不悦。

同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与毛文龙在旅顺附近的岛山相会，并商议军事。在连续三日的交涉中，毛文龙始终不接受袁崇焕主张的“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等建议，于是袁崇焕劝其归乡，而毛文龙则称自己了解辽东局势，并能解决辽东事务。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通宵部署诛杀毛文龙。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同往检阅将士，但中途袁崇焕突然发难，斥责毛文龙，虽然毛文龙抗辩，但袁崇焕还是命人除下其衣冠并捆绑，尽管毛文龙仍称自己无罪

有功，可袁崇焕还是对毛文龙判以“十二大罪状”：

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

全无战功，却报首功；

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侵盗边海钱粮；

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

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好色诲淫；

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交结近侍；

掩败为功；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从而以此12条当斩之罪，祭出尚方宝剑，并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斩杀毛文龙于帐前，一时间，众将痛哭。袁崇焕虽然诛杀了毛文龙，但虑其部属有变，于是谕示只诛杀毛文龙一人，其余免罪。此后，又祭拜了毛文龙的尸首，并拿出10万两白银，分赠毛文龙下属，并将东江军分为四部，命原皮岛副总兵陈继盛、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等分统。此后又增加兵饷至18万两白银。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袁崇焕上疏陈述毛文龙因拒绝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瞒报兵力、杀良冒功等罪恶，而决议诛杀毛文龙。虽然思宗皇帝以兵减饷增而生疑，不过仍然接受袁崇焕的提议。而其实思宗皇帝对于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杀死毛文龙，是非常不满的，因为毛文龙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宝剑，为熹宗皇帝所赐。史载，“帝骤闻，意殊骇”，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此后，袁崇焕整顿全部辽东及登莱、天津部队，共有兵士15.3万余人、马匹8.1万余。自此，辽东大权一律归袁崇焕所有。

事实上，毛文龙被诛事件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初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时，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人对其汗位虎视眈眈，尤以阿敏所辖镶蓝旗

兵力最多，有61牛录，而皇太极自己的正黄旗却只有18牛录，而其子豪格统领的镶黄旗更是只有15牛录。此外，后金若是攻击辽西，则受制于皮岛的毛文龙，虽然多次征讨，但每次都无法及远。为了解决后顾之忧，皇太极遂决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龙建立的东江镇，此举同时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实力，解除其对汗位威胁之意。

而为了避免后金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皇太极在起兵攻打东江的当天，即派使者前往宁远，与时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议和。在议和前后，袁崇焕派遣心腹徐敷奏带领数十号大船，前往东江镇，以优厚待遇诱骗生活极为艰苦的东江镇官兵加入关宁军。据袁崇焕自己奏报，以旅顺参将李鑛为首，共有4000多人从东江前往关宁。很显然，此举削弱了东江镇的实力，为后金发起“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毛文龙当时在干吗呢？自从于东江开镇之后，毛文龙便派遣了大量密探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史载“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从而使得后金“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以至于后金对毛文龙甚为痛恨。故而虽然毛文龙在皮岛期间争议很大，但他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如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对毛文龙所遣密探在后金境内的活动情况，上奏时所说的那样：“臣近有谍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此外毛文龙曾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对于大将的猜忌、杀戮，从而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反间计以离之，奴竟杀阿骨。”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官员柯汝栋、戴一位。

天启四年（1624），后金曾派人招降毛文龙。此后，在天启五年二月，因为捕获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细作，故而努尔哈赤又借机至书毛文龙招降，但毛文龙并未理睬。不过努尔哈赤仍未死心，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三次至书招降毛文龙，结果毛文龙将来书奏闻朝廷。史载，努尔哈赤因身患毒疽，而于天启六年八月间，曾出沈阳，前往狗儿岭附近的清河汤泉洗浴。毛文龙安插在沈阳城里的密探耿仲明探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飞报东江，于是毛文龙派遣了千总毛永科、石景选率领壮士150人计划于八月初十夜袭汤泉，但努尔哈赤却在八月十一日返回沈阳，结果死于途中。在此之前，后金于八月初三抓获五名毛文龙所遣奸细，并供称东江军近期没有任何行动，于是后金也随之放松了警惕。九月初二，毛文龙得知努尔哈赤已死的情况

后，即奏闻朝廷。

皇太极继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过去的做法，重用汉官，善待汉人，后金统治日渐稳固，而毛文龙则也在此时，以投降归顺后金为饵，诱捕后金官员，于是也就有了与后金的书信往来仪式。史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但事实上，毛文龙曾主动多次将与后金通书的情况奏明朝廷。如《国榷》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报“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此后又分别于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五月初六、五月十三日，简练四疏奏报与后金的通书，奏明自己“放还来鞑，引诱要人”之计，甚至直接将皇太极来书奏呈御览。

崇祯二年（1629），蒙古与女真发生严重饥荒。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认为这是偷袭女真的最佳时机，而王怀达、陈国威二人又预料到了皇太极也有可能会采取行动，但袁崇焕督师下的辽东明军却没有展开进击，不过袁崇焕虽然没能采取行动，仍上奏称后金会绕道蒙古进攻明朝。

而此时的皇太极不知从何处，知道了袁崇焕声称自己要“五年平辽”，在发现之前自己“屈尊”议和，竟受到对方如此愚弄后，皇太极写信斥责袁崇焕：“我欲和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军民将士之死伤，更出大言，则兵并非易事也。”又云：“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加上崇祯二年二月，后金的汉人副将高鸿中曾上疏皇太极：“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何如？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就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侯，从正瘢，此事可讲。若说彼此称帝，他以名分为重，定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而且皇太极认为“坐视汉人开疆拓土、修建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于是决心起大军，出兵征明，让阿敏留后。

由于蒙古诸部曾请求袁崇焕开粜互市，但思宗皇帝严令只准按口换粮，于是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联合喀喇沁，以约10万大军，绕境蒙古朵颜部地盘破长城喜峰口而入。十月二十八日，是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在宁远得警后，当即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后继。赵率教乃陕西人，《明史·赵率教传》称其是“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其高祖父赵昇，任指挥佥事，迁籍陕西靖虏卫。万历十九年（1591），率教中武进士，任甘州都司，为宁远之战后，赵率教赴锦州经营关宁锦防线北段，并在宁锦之战中坚守锦州，击退后金的进攻，而受到朝廷嘉奖。此番其率兵增援大安口，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

紧闭城门，率教无奈，纵马向西，十一月三日至遵化。十一月初四，在遵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的大军激战，所部被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包围歼灭，率教中流矢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灭，巡抚王元雅自杀。五日，遵化失陷。一时间，京师震动，北京戒严，诏令各路兵马勤王。

就在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时，袁崇焕方才率兵至山海关。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进入蓟镇。十一月初六，袁崇焕到达永平，得报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被攻陷，巡抚王元雅被杀。在得知爱将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后，袁崇焕已知情势危急，也就在这一天，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皇帝诏书，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

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达顺天府蓟州。次日，袁崇焕进入蓟州，并以关宁兵布防蓟州西部各地，而孙承宗则不以为然，他指出应该守蓟州三河一线，否则皇太极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果然，十一月十四，袁崇焕获报，后金军已经蓟州穿越而过，袁崇焕被动急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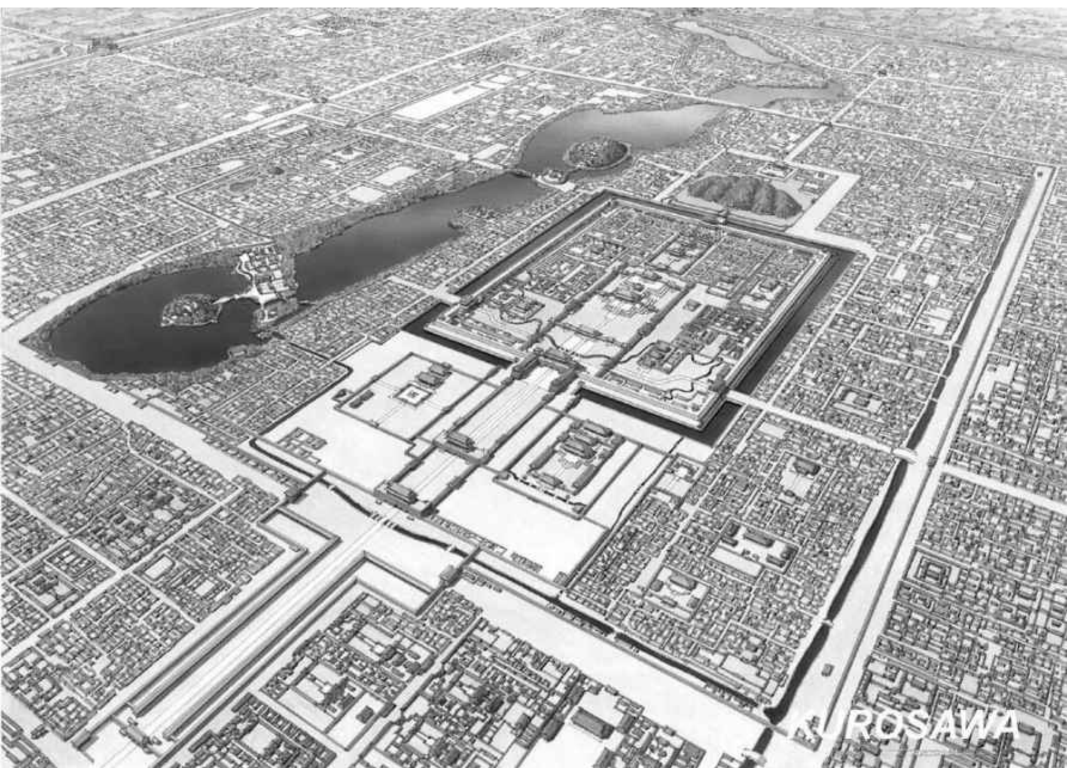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六夜，在急行军300余里后，袁崇焕所部赶在后金大军前，到达北京左安门，在广渠门外驻营。据载，此番疾行，9000骑兵有竟4000掉队，步军更是不能兼进。得知袁崇焕到来之后，思宗迅速召见大加慰劳，赐御膳和貂裘，君臣二人还就战事展开谈论。但袁崇焕以士兵疲劳为由请求入城休整时，却未得到批准。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祖大寿领关宁兵9000人和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带领的后金左翼大军、护军及蒙古兵大战于广渠门。史载，祖大寿阵于南侧，王承允阵于西南侧，袁崇焕阵于西侧，一战将后金左翼大军击溃，随后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取得左安门之捷。二十九日南海子袭营，后金军大乱，遂解京城之围。此战之中，满桂率领骑兵5000人千里勤王，其率领铁骑与清兵大战，奋战不息，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

由于先前后金军在北京郊外大举劫掠，袁崇焕兵少不能制，固守营寨，等待主力援军。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惨遭蹂躏，引起戚畹权贵的极度不满，向朝廷告状。后金军早先在得知袁崇焕入援后，散布流言：“袁督师约我来。”于是京城内议论纷纷，谣言日炽。十二月初一，崇祯召对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于平台。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满人、射伤满桂三事责问崇焕，后发锦衣卫南镇抚司监候。

根据《明季北略》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

为袁遣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遣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

袁崇焕下狱后，所部闻讯，顿时大愤，全军望城痛哭，三日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毁山海关东走，欲投降后金，朝野震惊。当关宁军东溃后，情势再度逆转。屯兵京师的满桂被拜为武经略，赐尚方宝剑，指挥前来的勤王大军。而此时，皇太极复至京城安定门，崇祯令满桂出战，满桂却以“敌劲援寡，未可轻战”婉拒之，崇祯不准。此后，皇帝多次催促，于是十五日满桂还是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十六日，被后金军以精骑四面包围，双方在安定门大战。此一战，皇太极亲自督兵，明军大败，满桂及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这时距离袁崇焕下狱仅有半个月。



明紫禁城

当初，后金军得知关宁军溃走后大喜，以书信招降一时激愤不已的袁崇焕部

下，但关宁军并无投降之意，只有用战功救出自己主帅之意。于是，当祖大寿被袁崇焕修书召回后，先是斩杀了皇太极的招降使者，随后欲以战功救袁崇焕而拼死血战，接连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迫使皇太极退回辽东，是为“己巳之变”。

而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仍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被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2000里，其余不予究问。

据称袁崇焕刑前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保辽东。”史料记载，其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认为袁通敌，恨之入骨，纷纷生吞其肉。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

此外，兵部尚书王洽也因“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而下狱，隔年四月，病死狱中。

“己巳之变”之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长城，其中两次兵临北京城下，甚至还曾经泛海至山东，迫近济南，每次入塞皆大举劫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而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清军第三次入塞，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兵无饷，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拼死奋战，最后战死。自此大明帝国可谓是气数已尽。

其实，思宗皇帝即位以来，虽然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但他已经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了。

自崇祯元年（1628）起，帝国的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根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洛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整个大明其实已经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而皇太极的不断骚扰入侵，使大明更是苦不堪言，每年的所征“三饷”开支高达2000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频频出现骚

乱哗变的情况。譬如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日，蓟门驻军由于饥饿索饷鼓噪，焚抢火药，经多方措处，始解散。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固原发民兵变，当时边兵缺饷，士兵乘民变爆发之机，一齐造反，劫夺固原州库。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互相推诿，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崇祯二年正月，固原兵攻泾阳、富平，执游击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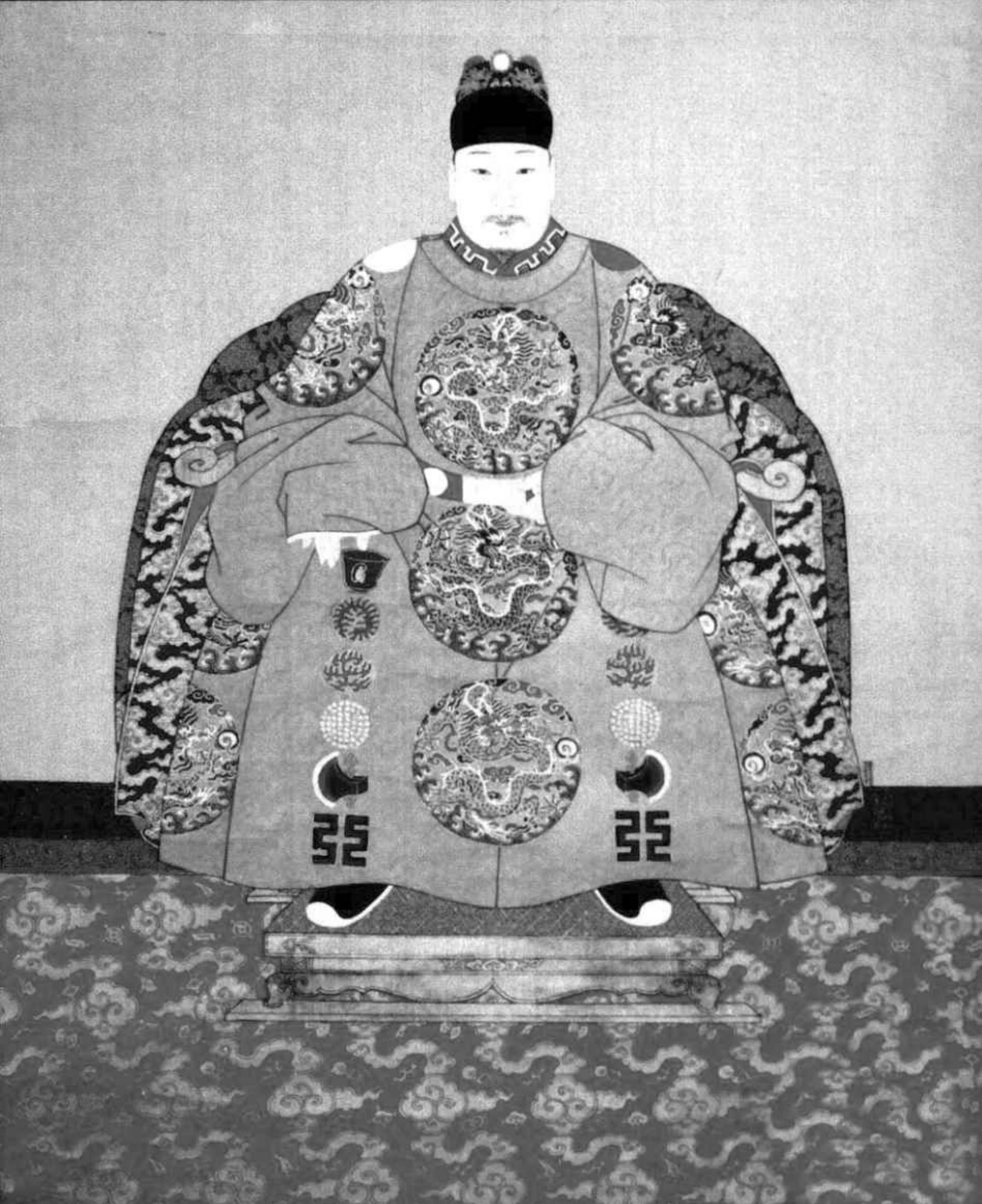
这样的局面下，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故而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

袁崇焕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此后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史载，总督中被诛者七、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而朝内更是党争不断。史载，崇祯元年十一月初三，诏会推阁员。廷臣列吏部左侍郎成基命及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名人。同时被会推者有郑以伟、李鹏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等共11人，而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以素无人望不与。遂因此酿成党争。

党争带来的后果就是崇祯帝虽然想要与后金议和，以处理民变、灾荒，但却因为朋党之争，而被反对，于是皇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虽然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可是卢象升却认为：“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于是，皇帝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最终，卢象升战死沙场。大明朝也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第六章　战松锦

天启七年（1627），熹宗驾崩，因皇帝无子嗣，故而信王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是为明思宗，次年改年号为“崇祯”。时，阉党乱政，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其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可谓是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同党，而熹宗皇帝临死前还曾专门叮嘱朱由检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熹宗开始着手于铲除阉党，整理国事，以复兴大明。



明思宗崇祯帝

据史料记载，思宗皇帝为信王是就“素稔忠贤恶”，故而深自儆备，思宗在入宫当天，竟是一夜未眠，以佩剑防身，甚至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随后，又在优待魏忠贤和客氏的同时，逐步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天启七年十月十三

日，就在思宗登基为帝两个月后，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由此也就掀开了清算阉党的大幕。

由于崔呈秀在魏忠贤将门下号称“五虎”之一，虽然杨维垣在这份试探性的奏章中只是弹劾崔呈秀，而并没有攻击“厂臣”魏忠贤，并称“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但在皇帝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后，朝野上下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皇帝清算阉党的心思。于是，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纷纷论奏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籓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

在举国上下一片请杀魏忠贤之声中，皇帝遣魏忠贤凤阳守陵，旋又传旨兵部云：“朕临御以来，深思治理，乃有逆党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象冤，姑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官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即时擒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若有疏虞，罪有所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速传示各该衙门。钦此。”

兵部闻旨，即差千户吴国安，前去扭解魏忠贤，至新店，距阜城县20里时，魏忠贤密得李永贞飞报，知自己死期已到，于是“晚至县，宿尤克简家。时有京师白书生，作挂枝儿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

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皇帝又下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同时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并在净乐堂焚尸扬灰，而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关于客氏之死，刘若愚《酌中志·客魏始末纪略》记载为：“逆媪客氏……至奉旨籍没，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内钦差乾清宫管事赵本政临局笞死，发净乐堂焚尸扬灰。”而《明季北略·卷三》则记载为：“上命太监王文政，严讯客氏，得宫人任身者八人，盖其出入掖庭，多携侍媵，谋为吕不韦、李园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国兴等，俱伏诛。”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思宗召见阁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于文华殿，谕定魏忠贤逆案。韩爌等不愿树怨

太多，仅定四五十人以上。于是崇皇帝不悦，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为目，将魏忠贤党人罗列其上。三月，韩爌等奏上逆案，崇祯亲自裁定。自魏忠贤、客氏磔死外，其余以六等定罪。而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俱斩，秋后处决；魏广微等11人与魏志德等35人，俱充军，罪名“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俱充军；顾秉谦等129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坐徒三年，赎为民；黄立极等44人革职闲。

在清算了阉党之后，皇帝又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此后皇帝又下诏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修复东林书院。然而，此举却也使得朝内党争再起。

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革职回乡，其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此后，又有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为“浙党”，再加上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以及山东齐党，此外还有宣党和昆党，如史料所载“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由于东林党人与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相互攻击，从而使得所谓“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后人评价“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又有“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之说。

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于是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从而使得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有些能力的阁臣，也就只有温体仁与周延儒，但二人品行不端。于是乎，大明朝，竟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而此时的大明是举国上下一片凋零，在内外交困之中，急需要能臣干吏来维持国家，处理政事之时，可思宗又有何人能用？

其实，自崇祯元年开始，大明帝国的内忧外患已然不堪，全国上下，灾情不

断。先是陕西、山西，后是河南，继而山东、江南，乃至于荆楚、三辅，一场全国性的大旱灾席卷而来，越来越频繁的大旱对于以农业为根本的帝国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于是民变不断，加上外有后金频频入犯，帝国已然是糜烂不堪。

崇祯元年（1628），后金练兵5万，借狐狸衬兵（狐狸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装束，此处指蒙满边界的游牧骑兵）1万，打造盔甲战车，欲于三岔河三路出兵，过宁远围屯，攻越山海、石门，兵部覆请敕边臣多方哨探，随地设防，清野固守为万全之策。思宗皇帝允从。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后金犯黄泥洼。袁崇焕令总兵官祖大寿击却之，斩180级，获马骡120匹。次年，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入大安口，参将周镇死亡；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攻打洪山口，参将张安德等败逃，张万春降。蓟州被围，十一月，京师戒严。此后，后金皇太极亲自督军攻入龙井关，以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为向导，攻克洪山口。别将攻克大安口，会于遵化。同月初四，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于遵化战死，全军覆没。巡抚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前任知县武起潜等，据城拒守，城破皆死。是为“己巳之变”。

十二月，宣大总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巡抚，闻京城戒严，都奏请率师入卫。山西巡抚耿如杞与总兵张鸿功也率5000人赴援。军队曾有令曰：“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给饷。”山西援兵既至，今日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驻地累更，三日没有给军饷，军队乃发生哗变。事发后，耿如杞、张鸿功被捕入狱。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



明军

而也就在这一年，马懋才奏：“臣乡延安府，去年全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饥民相聚为盗，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又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枕藉，臭气熏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还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而庆阳、延安以北，饥荒更甚。”灾荒之下，自然民变不断，先有王二、王大梁，后虽平定，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初八，起义军7000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2000余人。

崇祯二年十一月，袁崇焕被执下狱后，思宗复用孙承宗，孙承宗力保祖大寿，复用承宗为督师，移镇山海关，修建入海长城之“老龙头”，且于建后由内阁大学士杨嗣昌题字“宁海城”于“老龙头”城楼上，辽左得以粗安。但此时，后金兵在蹂躏京畿之后，又自通州东行，攻克香河，进逼永平。三年，正月初四，黎明，永平城破，副使郑国昌自缢于城上。知府张凤奇等皆死。接着陷滦州，知州杨濂自刎，太仆寺卿冯运泰先遁。再攻抚宁，参将黄维正力守，四日不克。转攻昌黎，还永平。此后，后金兵在攻下滦州后，分兵自抚宁向山海，离关30里列三营。山海北路副总兵官惟贤与参将陈维翰设两营拒敌。后惟贤奉马世龙命，率陈维翰及游击张奇化等往

袭遵化。城中兵出击，惟贤军先锋死战，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惟贤、张奇化皆战死，士卒死伤300余人。

二月，皇太极率后金大军主力撤回沈阳，留阿巴泰驻守明境内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为战略据点，虎眈北京。五月，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重新集结力量，值后金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领兵5000余入关与驻滦州、水平、迁安、遵化四城的阿巴泰换防之机，由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统兵围攻滦州。

阿敏在永平得知滦州被围，派大将巴都礼领兵数百赴援，并缩短战线，将迁安后金守兵撤至永平。明军将巴都礼所率援军歼灭后，遂用红夷大炮轰击滦州城，尽毁城楼。后金守将纳穆泰率众力战不支，遂于十二日夜弃城奔赴水平，途中遭明军马世龙截击，损失将士400余人。阿敏连续受挫，被迫全线撤退，返回盛京。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克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史称“遵永大捷”。

这一年河南巡按吴甡疏奏“开封、归德之间，近河诸州县，与山东、直隶接壤。原有邪妖借白莲、金禅之教，煽惑村民，勾结亡命，分布号召，在在有之。近日所获大盗，皆挟妖书，称王号，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布满三四百里之内，声称紫微星失道，谋举大事”。不过白莲教显然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一年，陕西农民起义军开始向山西发展，山西自河曲至蒲津1500里，皆与陕西为邻，且河道狭窄。于是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八日，陕西的农民起义军由神木渡河，进入山西，攻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从此起义烽火燃遍晋、陕二省。

应该说，皇帝面对陕西、山西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延绥一带连年灾荒，百姓流亡、从起义军造反者，十之有七。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奏请赈济饥民，于是崇祯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思宗皇帝遣御史吴甡带10万金赈之。吴甡至延绥，以西安推官史可法主赈事。后即命吴甡代李应期巡按陕西，史称“赈延绥饥”。不过明末的灾难和民变却是一系列的，是全国范围的。崇祯四年（1631）二月二十二日，福建起义军数千人自长赖坑突攻瑞金县。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谕民兵力守。起义军走福建古城。而在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夜，湖广长沙、常德、宝庆、岳州、衡州等府地震。常德、澧州尤甚。常德府武陵，夜半地震有声，黑气障天，井泉泛滥，地裂孔穴，浆水涌出，倒塌荣府宫殿及城垣房屋无数，压死男妇60人。澧州，震声如雷，地裂沙随水涌，房倒树拔，压死人畜无数。荆州府坏城垣十之四，民舍十之三，压死军民十余人。

也就在这一年，后金开始进攻皮岛，当初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皇太极便图谋攻占皮岛，以解除背后的隐患。崇祯三年，明将刘兴治接受了皇太极的招降，暗中准备再叛逃后金。时因其兄刘兴祚战死殉国，故而朝廷怀疑刘兴祚假死再叛投后金，而未与抚恤，刘兴治气愤不平，迁怒代署皮岛诸务的陈继盛有意不奏报。平时两人不睦，此时刘兴治遂动杀机，于是借祭祀刘兴祚，设计将陈继盛等11人杀害，继而举兵叛乱，到处杀掠。闻变之后，大明派副总兵周文郁等入岛安抚。刘兴治接受安抚，叛乱渐息。五月，朝廷任命锦州参将黄龙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佥事，镇守登莱、东江，驻皮岛。这才使得东江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是，因为刘兴治已然叛变，故而骚乱并没有停止。八月，他伙同参将李登科、游击崔耀祖、都司马良、李世安、郭天盛、守备王才、王成功等人签署了一份“盟誓”书，秘密送往沈阳。

崇祯四年（1631）二月，皇太极复信，再次表示欢迎之意，甚至“即当天地盟誓，毫无违背”。于是三月十六日，　刘兴治策划叛逃，先杀将校中不愿从其叛乱之将，参将沈世魁全家被害，仅沈本人幸免得脱。于是沈世魁与其部下合谋，候至深夜，率众杀刘兴治，叛乱得以平定。而此时，皇太极已派额驸佟养性率兵200至铁山，以拨船接应，然而后金军的行动却被明兵发现，佟养性大败而回。皇太极得知自己约降计划完全落空后，大怒，下令把刘氏家口全部屠灭。此时，有从皮岛逃至沈阳的奸细上奏称：“兴治被杀，岛中未定，若于此时以一支兵袭岛，则可全利也。”于是皇太极决心征讨皮岛。

崇祯四年正月初八，后金已经开始铸造红衣大炮，炮身上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并有铸造年月，督造官员及铸匠、铁匠的姓名。后金原本是无火器，而自此，开始铸炮。不过此番出兵皮岛，后金并没有使用火炮。是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总兵楞额礼为右翼主帅，喀克笃礼为左翼主帅，率骑兵1500人，步兵4500人，征南海岛。此后，后金军经边镇义州，进入朝鲜境内，直取宣川。六月四日，由宣川分兵四路：一路入蛇浦，一路陈于身弥岛浦口，一路陈于郭山宣沙浦，一路奔嘉定。合四路后金兵“步骑数万，凭陵冲突，遽塞沿路”。

由于后金所占四处，都在皮岛东北至东面的沿海一线，故而使得后金大军从陆上形成了对皮岛的半包围形势。但尽管对于皮岛构成了包围，可攻打皮岛，却首先要解决战船问题。后金大军向来以骑兵为主，既不会造船，也没有善于操舟的水兵，于是皇太极决定向朝鲜借船。然而仁祖李倧见到满达尔汉、董纳密带去索船的书信后，却拒绝借船给后金，并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

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满达尔汉与董纳密无可奈何，只能回国。由于借不到船，后金是只能在宣川“砍木造船”，做攻皮岛的准备，同时，沿海岸线筑墙。

由于之前后金军已经进至身弥、宣沙等岛，故而副总兵张焘率军进攻身弥岛，与后金兵展开激战。由于明军掌握大量火器，又有成批船只，习于水战，给予后金兵以重大杀伤，以至于“毙尸成绩”，被迫从身弥岛退却。接着，督军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于宣川浦。据朝鲜人目睹战况：“战舰蔽海，连日进战，炮烟四塞，声振天地。”可见战斗是何等激烈！有一后金将领，两腮中一炮丸，颐颔被打坏，用头巾裹结，载到宣川就死了。兵士死尸累累，“扶伤盈路，不可胜记。杵卤俱漂，草木浑腥”。副总兵沈世魁于十二日、十九日等数日连续进攻位于蛇浦的后金兵，浴血奋战，“神炮诸发，虏阵披靡，死伤甚众”。

此番战事，张焘率军驾船进逼沿海。史载，“战舰蔽海，连日进战，炮烟四塞，声震天地”。又有“……令西人统领公沙的西劳等，用辽船架西洋神炮，冲击正面，令各官兵尽以三眼鸟枪、骑架三板唬船，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筑墙，计用神器19次，约打死贼六七百……此海外一大捷”。

从记载来看，这次作战中，有西洋人参战。事实上，此次作战的确有葡萄牙人参加，《火攻挈要》记载，“崇祯四年，某中丞令西洋13人，救援皮岛，歼敌万余，是其猛烈无敌，著奇捷之效者此也”。但事实上，天启年间，就有西洋人参与辽东的战事。

当萨尔浒之战后，时在翰林院供职的徐光启前往通州练兵，此时，他就力主向澳门葡人购炮御敌。光宗泰昌元年，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向西商购买了红夷大炮四尊，并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后金军又占领了辽阳、沈阳。于是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朝臣们一时间纷纷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次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并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

就在广宁之战后，帝国丧失山海关外辽河以西的大片疆土时，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22门大炮，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23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由张焘解送到京。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此后，帝国先后从澳门

引进了30门大炮，其中11门部署在辽东，京城有炮18门，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人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大明帝国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从优给恤”。不过也就因为此事，朝内清流以“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为由，将那些葡萄牙炮手解散，“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并弹劾徐光启“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并称其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晌之谋”，还说什么“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此外，还因为兵部尚书崔景荣的反对，御史邱兆麟的弹劾，受到排挤的徐光启也被迫称疾归乡。

思宗皇帝即位后，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于是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上疏要求练兵，其疏有言：台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

于是崇祯元年四月，徐光启升授礼部左侍郎。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此后，在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的伴同下，一名叫贡萨握·德谢拉的澳门葡人率领的31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7门、大铜铳3门以及鹰嘴铳30门北上，而这个贡萨握·德谢拉在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疏》中被称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军入关时，他们方才行至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遵化等城入关了，刚好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差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队伍在此遭遇后金军。此时，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都打算弃城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原任大学士的乡宧冯铨等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据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后金军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崇祯三年正月，公沙的西劳等所率的铳师和大铳抵京效命，而此时，袁崇焕下狱，祖大寿愤怒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满桂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诸部也先后败没。在此情况下，大明决定支付领队公沙的西劳每年150两的薪水，每月再加15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100两，每月另给10两的伙食钱，以让这些“雇佣兵”能够为大明所用。

崇祯正月四日，所有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冲，并在京营内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随后，因辽东战情紧急，公沙的西劳和陆若

汉主动上表，称“奉旨留用，方图报答……天未远臣，愿效愚忠”，于是陆若汉等人前往山东登州，协助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孙元化对西方火器十分熟谙，他以为“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之法”。也就在这个时期，“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率众参加了皮岛之战。

皮岛之战，后金兵虽然“犹溃而复合，合而复溃，如是者再四”，但终究敌不过明军的猛烈炮火和海上用船之不便，被迫放弃进攻，“畏缩奔于80里之外，不敢复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后金自朝鲜撤兵，七月二日回到沈阳。



明军

而就在取得皮岛之战的胜利时，大明帝国却发生了两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其一是李自成崛起，还有就是宦官监军。李自成，原名李鸿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陕北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幼牧羊，后为银川驿卒。崇祯元年，李自成之舅安塞高迎祥起义，号“闯王”。崇祯二年，朝廷裁减驿站，没有了生计的李自成，逃至甘州充边兵。崇祯三年，李自成聚众起义。崇祯四年六月初，王嘉胤牺牲，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领袖。是年，七月间，王自用与老回回、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及高迎祥、张献忠等共36营、20余万人马会聚于山西。李自成从高迎祥，号为“闯将”，并与张献忠部会合。

而宦官监军则贻害更大，宦官监军其实早在东汉之时就已经有过先例，东汉恒帝延熹五年，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西）蛮起兵叛汉，进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望风而走，武陵蛮占据荆州大部。汉廷派车骑将军冯绲率兵10余万进讨，冯绲上书请设监军。

其实，所谓监军都是朝廷临时所遣，以代朝廷协理军务，督察将帅，汉武大帝时曾置监军使者，两汉、魏晋、隋代皆有，省称监军，也称监军事。又有军师、军司，亦为监军之职。唐初，袭前隋制，以御史监军。《通典》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也就是说初期的监军其实只有御史充任，而且不过是执行“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之职而已，既不是常设之职，也不参与军事。

明初以御史为监军，专掌功罪，赏罚的稽核。思宗皇帝初即位时，鉴于魏忠贤祸败之事，尽撤诸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诸廷臣陷于门户之争，兵败饷绌，而不能进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1631）九月初九，复遣中官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二十四日，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从此太监监军之风大开。可结果，却是“诸监军多侵克军款，每战先逃，戎务更坏”。

崇祯四年，辽东的局面越发糜烂，是年，辽东巡抚邱禾嘉建议筑广宁、义州、右屯三城以御后金进犯。督师孙承宗则谓“广宁道远，当先据古屯，筑大凌河城，以渐而进”。于是当年七月动工，令祖大寿、副将何可纲征发班军1.4万人筑大凌河城，并以4000兵据守其地。就在大凌河城将筑成，兵部尚书梁廷栋被罢。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邱禾嘉乃撤防兵，只留班军万人以守。后金闻此

事，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于八月初四发兵逼大凌城。掘濠树栅、四面围合，另派军截锦州大道。在后金大军兵围大凌河，以红衣大炮攻城时，孙元化急令孔有德救之，但至吴桥发生兵变，有德倒戈回山东，于是局面更加混乱。

吴桥兵变的起因是崇祯三年（1630）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皇太极率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受困城内，八月二十二日，兵部发文命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旁之双岛，与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张焘等遇飓风，迟迟未能从海路至三岔河牵制后金大军。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又命孙元化急调孔有德以800骑赶赴前线增援。十一月十四日，部队始齐集。可是，登州辽东兵却与山东兵素不和，“或相残杀，辽人怨愤”。二十七日，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吴桥县令毕自寅默许县人闭门罢市。时有一兵士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结果该士兵被“穿箭游营”。于是，众士兵气愤，击杀该家仆，事后王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先哗变。此后，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史称“吴桥兵变”。

就在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弹劾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时，坚守城池的祖大寿已经陷入危局。史载，祖大寿率城中兵马四次突围，但“全败还”。此后，孙承宗派总兵官吴襄、宋伟率兵4万相继数次增援救援，但合军赴援的宋伟、吴襄二将却是素来不和，于是在长山坡遭遇溃败。此后又夜渡小凌河，驻长山，结果又败，吴襄部率先逃遁，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副将祖大乐等32将被俘，张吉甫等则战死。

而这个时候，倒戈杀回山东的孔有德则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在城内秘密邀集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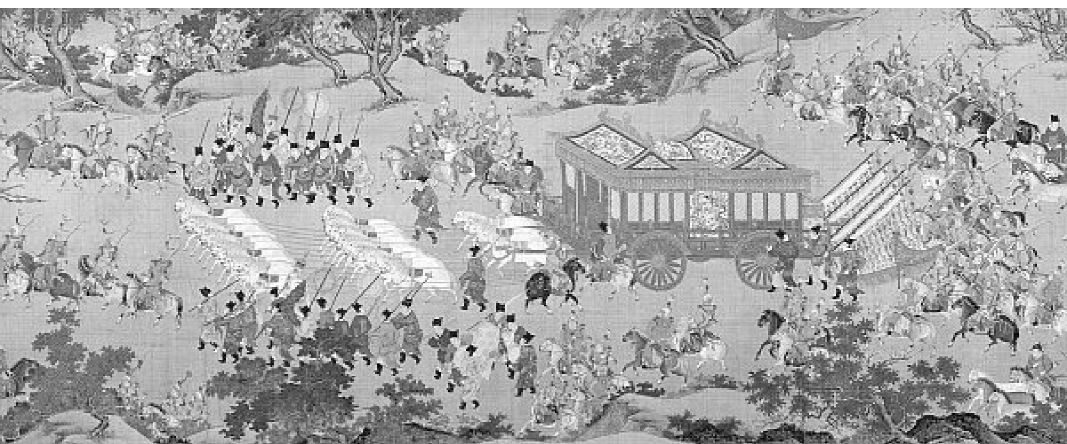
东诸将为内应，天黑以后，接应孔有德叛军攻进城里。崇祯五年（1632）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被俘，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等，12人战死、15人重伤。叛军掳获了旧兵6000人、援兵1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红衣大炮20余门，西洋炮300门。

此后，孔有德念旧，崇祯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虽然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但却因为党争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而被交付镇抚司，在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尽管徐光启上疏称如孙元化有造反之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但终无法挽回。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而战死的葡萄牙人则待遇颇为不错，统领公沙的西劳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被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额弘略等则各赠把总职衔，每名并给其家属赏银十两。其余诸人则各给行粮十两，然后都被遣送回澳门。

与此同时，被围的大凌河城已是弹尽粮绝，至三月中“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于是祖大寿粮尽而降，大寿副将何可纲不从，大寿执之，于后金诸将前杀之。可纲不变色，不出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后大寿编假奏报朝廷曰：可纲慰阁部，献身为食。但由于祖大寿投降，思宗大怒，因此罢孙承宗官。

史载，祖氏世代为辽东望族，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三兄弟皆辽东将领，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王化贞的部将，后来随孙承宗，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天启三年，主持修筑宁远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寿佐袁崇焕等守城，大败之，以功升副总兵。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再攻宁远，大寿、满桂率兵与后金兵激战。六月，清军又败走，史称“宁锦大捷”。崇祯元年，朝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赐尚方宝剑。六月，擢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后崇焕诛杀毛文龙，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南下，北京戒严，大寿从袁崇焕入卫京师。不久，崇焕下狱，又闻满桂为武经略，大寿率部毁山海关东走，朝野震惊。思宗命袁崇焕以书招回，孙承宗亦遣使抚慰，大寿得书，受其感召，全军皆哭，奋勇杀敌，连克永平、迁安、滦州，辽左乃安。此番祖大寿粮尽而降，皇太极赠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雕

鞍、白马，并使之回锦州为内应，但大寿与从子祖泽远率所属兵300多人回锦州后却没有作为内应，而是坚守锦州十余年，并多次与清军作战。


明军“出警入跸”图

崇祯五年（1632）八月，为平定孔有德叛乱，朝廷命朱大典巡抚山东，救莱州，朱大典率兵数万及关中劲旅抵德州，杀叛敌陈有时，后兵分三路，金国奇率兵从中路进昌平，总兵陈洪范率兵从南路进，参将王之富等从北路进。诸军皆带三天粮至沙河，孔有德迎战，大败而回，二十日莱州城围始解。此后，官军围登州，筑围墙以困孔有德，其城三面据山，一面临海，墙有30里长，东西俱抵海。明将分番戍守。于是，孔有德军不能出，只能开炮击官军。虽然李九成一度出城与官军战，但最终阵亡。面对围城，孔有德一度欲弃登州入海。官军龚正祥等率舟师拒于海口，时大风突起，舟破，孔有德军突至，俘龚正祥，然而孔有德依然不能出海。双方由此陷入僵局中，直到崇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参将王之富、祖宽等克登州水城。由于当时孔有德等在围城中，粮绝，但恃水城可逃，故不降。于是，王之富等夺其水城门外护墙，孔有德与耿仲明遂逃。此后官军攻水城未下，乃采用游击刘良佐之策，以火药炸城。城崩，将士涌入。副将王来聘先登，受伤而死。城破，俘千余人，自尽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山东平。

而出逃的孔有德、耿仲明此后从镇江堡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大喜，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人的投降使得

原本缺乏火炮的后金此后也开始能够数使火炮。此后在崇祯六年七月十四日，后金兵进取旅顺时，孔有德便积极为后金兵出谋划策。当时，总兵官黄龙驻守旅顺，因鸭绿江有战事，黄龙派水师往援，孔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带领后金兵袭其城。黄龙数战皆败，弹药俱尽，遂自刎。游击李惟鸾自焚其家属，力战而死。

吴桥兵变此一事件本身起因很小，但能够从一偷鸡小事酿成一场兵变，原因很多，时人称吴桥兵变爆发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其实自从崇祯五年以来，大明帝国的内部已经不仅仅只有兵变了。这一年，六月初六，黄河于孟津决口。崇祯年间，黄河多次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百姓转徙，到处丐食，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同年九月，农民军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连续攻克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朝廷乃令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地守御。十四日，李自成攻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十二月，朝廷又派贺人龙、李卑、艾万年三将进关中，助张宗衡、许鼎臣围剿农民军。兵至，张、许争三将兵为己部，而贺人龙等无所适从。农民军趁机入据磨盘山，分其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进逼太原；邢红娘、上天龙据吴城，进逼汾州；紫金梁、张献忠攻沁州、武乡，陷辽州。知州李呈章、乡官杨于楷、张友程、举人赵一亨、候标并死之。至崇祯六年二月十一日，农民军进入河北，参将杨遇春率兵追之，中伏死。义军连陷赵州、西山、顺德、真定等。又于邢台摩天岭西下，至武安，败左良玉军；守备曹鸣、主簿吴应科等皆战死。农民军在河北势力大震。

崇祯六年（1633）六月，川兵邓玘奉诏授剿农民起义军，到济源，射杀义军首领紫金梁，义军乃退至林县。杨遇春追杀之，中伏而死。义军乃用其旗，诱杀其他官军，结果川军大败，初五土司马凤仪一军也被义军击败于侯家庄。此后，在十二月初一，农民军乘胜攻陷伊阳，伊阳知县金会嘉弃城逃跑。乡官故兵部车驾司主事李中正，集家人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全部战死。卢氏生员常省身，占据险地与义军战两昼夜，力不支，令妻子自缢，然后拔剑自刎而死。

战局糜烂，焦头烂额的思宗皇帝于是在崇祯六年冬，再令保定、河南、山西诸路官军围剿农民军。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乘黄河冰冻飞渡冲出合围；连克渑池、卢氏、伊阳三县，从陕西进入河南。河南巡抚元默重兵堵截，农民军转而南下，经汝州至淅川、内乡、光化、南阳。此后，农民军由合营而分军，老回回等五

营农民军攻入湖广。崇祯七年正月初五，罗汝才等部农民军，由郧阳渡汉水，次日攻襄阳，连克平利、白河等处。十四日，南破凤县入四川。二月初五，农民军攻陷兴山，杀知县刘定国。十五日，下瞿塘。二月二十一日，又攻下夔州府、大宁，围攻太平。由于土司秦良玉率军阻断了农民军前进的道路，崇祯七年三月，入川之老回回等数营义军又自阳平关入秦州，复返陕西。

而另一路农民军则在崇祯六年冬，突破官军的合围，入河南境。攻占南阳后，起义军分军，老回回等五营攻入湖广，李自成等入汉中，张献忠率部赴信阳。至崇祯七年正月，张献忠自信阳西去商、洛地区。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攻取澄城，直逼平凉等州县。二月二十八日，张献忠等13营义军自河南商、洛西出潼关进入汉南。三月，老回回等部也由川返陕，就这样，农民起义军重又联合一起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就在皇帝为四处的民变而焦头烂额时，辽东尚可喜降清。史载，尚可喜本不是辽东人，万历四年，其祖父尚继官举家迁往辽东海州。万历三十二年（1604），随父尚学礼从军戍守边关。尚学礼官至副总兵，长期镇守辽东，乃是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天启五年（1625）尚学礼与另三位副总兵在柳河之役中战死，其兄长尚可进，亦为辽东名将。崇祯六年，于对后金的作战中战死。尚可喜从军后，效命于东江总兵毛文龙帐下。袁崇焕斩毛文龙后，黄龙为东江总兵官，尚可喜为其部下。崇祯五年，孔有德叛明，陷登州，旅顺、广鹿岛副将皆往从之。黄龙遣尚可喜抚定诸岛。时后金兵驻旅顺，尚可喜击走之，遂驻其地。不久，升为广鹿岛副将。崇祯六年七月，东江总兵黄龙兵败自杀，于是以沈世奎代之为总兵。结果，沈世奎接任后排挤原毛文龙旧部，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陷尚可喜，诬以罪。崇祯七年，沈世奎檄召尚可喜到皮岛，试图诳尚可喜至皮岛，意图诬以罪名，加以谋害。此事为尚可喜部下许尔显等人得知后，尚可喜遂有去意。于是，遣许尔显、班志富诸部下前往沈阳，与后金接洽。皇太极闻之，兴奋至极，大呼“天助我也”，并赐尚可喜部名“天助兵”。崇祯七年正月初二，尚可喜携麾下诸将、辖下五岛军资器械航海归降。皇太极出城30里相迎，赏赐珍宝无数，发还先前所俘虏的且能找到的尚可喜家族成员共计27人（彼时后金所俘100余人，尚可喜二位夫人乱中自尽）。旋即封总兵官。

崇祯七年，尚可喜降后金时，大明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到处都是灾荒，时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今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民饥而乱兴，而明

军将领又往往杀良冒功。于是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于是，给事中吴甘来请发粟以赈饥，皇帝应允，下诏发帑赈饥。可仅仅是赈灾是不够的，大明帝国并没有放松对起义军的镇压。崇祯七年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于上津。时农民军各部多入汉南，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四集，误走兴安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时天雨两旬，被困的农民军马疲食尽，李自成用顾君恩谋诈降，以重宝诱陈奇瑜左右及诸将。奇瑜许。七月，起义军从车箱峡脱围者计3.6万余人。这次机会的浪费，使得大明再无平息民变的良机。

此后，思宗皇帝以农民军聚集陕西，下令河南兵入潼、华，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湖广兵入商、洛，合剿农民军。崇祯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广兵援汉中，被农民军击败，副总兵杨正芳及部将张士达战死。皇帝震怒，将陈奇瑜下狱，而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并兼摄陕、晋、楚、豫、川五省军务，准备更大规模地围剿农民军。是年十二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陕东出终南山，进入河南，连克陈州，灵宝、汜水、荥阳等地，声势复震。思宗皇帝急令洪承畴出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农民军。

然而就在这时，后金皇太极为统一漠南蒙古，第二次西征察哈尔。是年秋七月，后金军回师，以大明边将扰其境、杀其民、匿逃人为名，于七月初八入上方堡，进围宣府。宣府守兵发炮击之，于是皇太极乃退走应州，兵掠大同，攻陷得胜堡。一时间京师震动，诏令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巡抚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门。此后，后金军分四路攻掠宣、大地区。是时沿边城堡多失守，后金军攻灵邱。灵邱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守备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战死。城破后，知县蒋秉采自缢死，其家合门殉之。一时之间，天下震惊。

此时，大明帝国此时正忙着镇压高迎祥、李自成所部，根本无力对抗后金，自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征讨还是颇有成效的。譬如李自成起义军来息县一带活动时，李若星吁请合兵向义军反击，是役义军死伤千余。此后，至崇祯十年，当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东围庐州，取含山、和州时，明军趁着农民军连营数十里攻滁州时，于正月初八，由总督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等诸道兵驰援滁州，与两军大战于城东五里桥。农民军战不利，连营俱溃，北退50里，被斩1200余级，从朱龙关至关山，积

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农民军失利后，北渡逼泗州、徐州，复转入河南。至月末，部分起义军自南山还商、雒。二月十一日，卢象升奏捷，斩676级，夺马骡400余匹。可就在捷报传来时，却传来了山西遭受连年的旱灾、虫灾的奏报，这一年，天下灾荒不断，民无粮，只得食树皮、草叶。树皮、草叶尽，乃人相食。临近山西的河南南阳，也发生饥荒。唐王朱聿键奏河南南阳饥，甚有母烹其女以食者。思宗皇帝乃下诏发3500金赈济山西、南阳，并免山西受灾州县新旧二饷，更为糟糕的是，驻守宁夏的士兵，也因兵饷无措，而发生兵变。史载，饥兵群起围攻官署，巡抚右佥都御史王楫因不能措饷，饥兵索饷无着，乃鼓噪而杀之。兵备副使丁启睿率军镇压，捕获为首者七人，立即处斩，兵变才被抚定。

崇祯十年农历四月十一，后金国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以是年为崇德元年，正式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改名盛京。众臣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登基之后，皇太极便派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统八旗兵10万攻明。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兵分三路入喜峰口、独石口，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兵败而死，明军退保昌平，清兵再侵居庸、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驰援，击斩1104人，俘获143人。此后清兵入京畿，攻陷昌平后，又相继攻下良乡、围攻顺义。顺义知县上官荩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据城守。城陷，荩与国器、时雨等皆死之。清军乘势，又攻下宝坻、定兴、安肃、大城、雄县、安州丙子胡乱等近畿州县。

天下糜烂至此，朝内党争却是不断，史载，“六月奸人张汉儒窥温体仁欲罪东林，遂入其门下，相与定密谋，乃抗章诋毁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体仁从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危甚，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上，请并坐化淳罪。上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按治，乃尽得汉儒奸状及体仁密谋，疏上，帝始知体仁有党，遂命汉儒等立枷。”

温体仁，浙江乌程人，此人算得上是思宗皇帝当政期间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了。天启二年（1622）时，温体仁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次年回部任左侍部。七年晋南京礼部尚书。崇祯三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五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史载，“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当初在思宗即位之初选择阁辅时，温体仁与礼部侍郎周延儒两人弹劾钱谦益有受贿之嫌。的确，钱谦益与东林

党人交游甚笃。他的父亲是顾宪成的同学、朋友，钱谦益15岁时就曾拜谒顾宪成，后长期就学东林书院，对顾推崇备至，称他“醇然有道”。入京后，拜孙承宗为师，自称：“余举进士，出吾师高阳公们”。还将邹元标视作“余之执友”，引缪昌期为“同志”。

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赴京，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年十一月，会推内阁大臣，候选人为成基命、钱谦益、郑以芳、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11人。而时任礼部尚书的温体仁人望较轻，并不在名单上，刚刚在袁崇焕处理锦州兵变一事中奏对获得思宗皇帝称赞的礼部侍郎周延儒，也因为“望轻”而被排除在外。

温体仁揣测思宗皇帝必然有所怀疑，于是在十一月初五上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思宗皇帝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心中怀疑，便在十一月初六召集众臣在文华殿开会。会上，温体仁“言如涌泉”，称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于是思宗皇帝认为“满朝俱是谦益一党”，由于思宗皇帝一直就厌恶朝中大臣结党，加上钱龙锡等大臣纷纷为钱谦益开脱，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言辞最为激烈，并称：“温体仁觊觎相位很久了，否则弹劾钱谦益什么时候不可以，何必要等到会推阁臣的时候？”可结果温体仁回应：“钱谦益此前在闲散衙门，我今天弹劾就是为朝廷考虑。章允儒这样说，看来他们是真的结党了。”于是皇帝感慨“要不是温体仁，朕就要被欺骗了”。遂将章允儒下诏狱，并将钱谦益“革职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因为涉嫌和钱谦益结党而被降职或免职，而11名会推候选人一并弃用，而温体仁则与周延儒入阁并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后来温体仁又排挤周延儒，并出任阁辅。

史载，温体仁善于利用思宗的性情而当政八年，并得到思宗的恩礼优渥，对于温体仁当政，御史吴履中曾评价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　　　　《明史》则将他列入奸臣传，并评价曰：“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史载，温体仁回乡后的次年，便病死。其死后，思宗赠为太傅，谥文忠，然而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后，便削其谥号。

温体仁之后，思宗皇帝重用之人是杨嗣昌，此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杨时芳为武陵名士，其父杨鹤乃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诗文俱佳。杨嗣昌晚父六年，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因处乱世，杨嗣昌及其父亲杨鹤均以督兵著世。杨鹤官至兵部右

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而杨嗣昌则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期间整饬军务。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曾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但因为国库吃紧，这项请求并没有得到批准。天启三年，其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里。崇祯元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今山海关显功祠内有杨嗣昌塑像，称赞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抵御后金入侵有功。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是年三月，帝召杨嗣昌至京师，两人谈话后，一直以来，杨嗣昌都是力主“安内方可攘外”，故而他认为只有镇压民变，才能够集中全力于辽东。史载，帝曰：“恨用卿晚。”于是六月，杨嗣昌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并主持镇压农民军起义事务。

对于飘忽不定的农民军，杨嗣昌采用“四正六隅”“十面之网”之策，以对民军各个击破。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区。而集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受命督军镇压后，嗣昌增兵14万，加饷银280万两。由熊文灿为五省军务总理，剿抚兼施。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当时张献忠率军自潜山出，连破太湖、蕲州、黄州等地。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献忠率军与明军大战于太湖之酆家店。献忠以数万兵围明军数重。又遣将统军阻击史可法等援军。时天雨，农民军从四面进攻，短兵相接，斩明将潘可大等40余人。明军大败，损兵6000余。于是，献忠率军乘胜东取和州、含山、六合等地。但至崇祯十一年春时，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在杨嗣昌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下，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崇祯十一年一月，自成等部闻洪承畴率军入川，齐聚川北。洪承畴檄川中诸道兵严守要害。农民军据险守川北，久粮乏，承畴以川师诱之，亲率陕兵设伏于梓潼。十三日，自成在梓潼被困，与承畴战不利，率余部走还陕西。崇祯十年三月，李自成率部从川入陕后，自洮州出番地，总督洪承畴令曹变蛟与贺人龙追歼。自成率军与曹变蛟所部连日苦战，转战千里。番地人稀粮乏，农民军无以得食，力不支，战死饿死者众。洮州败后，李自成率军复入塞，赴岷州及西和、礼县山中。曹变蛟率军追剿之，于是李除自成亲统的六队，混天星、过天星等先后降明。此后，洪承畴度自成必奔潼关，与孙传庭定计，设三伏于潼关南原，每50里立

一营，同时令总兵官曹变蛟追自成后。李自成军至潼关南原，伏起，大军溃败，死伤无数。此战，李自成身受重伤，妻女、辎重俱失，仅与刘宗敏等18骑突围，匿于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潜伏不出。

此后，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此后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自此，民变稍稍平定。

但也就在这一年冬天，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鲁宗文战败而死，中官郑希诏逃走，一时间，燕京震动。此后，清军长驱直入，犯保定，攻高阳。年已75岁的孙承宗率领全家子孙拒守，高阳城墙低矮，城破，一家40余口皆壮烈战死。思宗闻讯，追复其故官，给予祭葬。南明弘光帝时，追谥“文忠”。

之后，清军兵屯于牛栏山，威胁京畿，思宗皇帝和战不定，杨嗣昌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嗣昌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故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但宣大总督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于是思宗皇帝召宣、大、山西三总兵入卫京师，又三赐卢象升尚方剑令督天下援兵，并诏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诸军入卫。二十四日，京师戒严。史载，卢象升幼时潜心读书，好骑射，虽是文人，皮肤白皙，但天赋异禀，“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万历四十四年，17岁进入国子监“补博士弟子员”。天启二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卢象升能与士共甘苦，善于驭下，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史载“（象升）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

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关锦防线，沿喜峰口入袭京畿，时任知府的卢象升募兵1万人勤王，未及战，后金兵即退去。崇祯三年，提任参政，负责练兵，于北直隶大名府一带（古名天雄）以亲友、同乡的关系来招募军士，号“天雄军”。崇祯四年，因治绩优良升任按察使。崇祯六年（1633），卢象升率所练“天雄军”，镇压由山西入河北之民变。后任五省总督，负责在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剿灭民变，其与将领祖宽、左良玉多次击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部。史料中说“象升军到汝阳时，军中断粮三日，象升以身随之断粮，军无怨言，无人逃亡”。

汝阳之战，卢象升自城西攻，高迎祥几十万大军崩溃。高迎祥聚合部众20万之

众，继续逃亡，在确山再败于卢象升。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卢象升以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皆胜，斩杀民军3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会合张献忠，30万之众攻击南京，不利，退攻滁州。卢象升率军赶到，以两万之众再次击败高迎祥，并以各将领围堵，高迎祥人马散尽，退入湖广郧阳。卢象升手下祖宽所部以不熟山势为由，拒绝入山作战，于是卢象升无计可施，这才使得高迎祥得以逃脱。

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建国。六月，阿济格率清军攻入喜峰口，纵意抢掠而去。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率师进驻京畿，严明军纪，操练兵马，清军不敢进犯。此番清军三路大举南侵，北京戒严，思宗皇帝和战不定，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主张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于庆都、真定等地。然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切断卢象升粮饷，屡屡调走卢象升部生力军，致使号称“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升部只剩区区5000老弱残卒。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移兵巨鹿贾庄，已断粮七日，全凭百姓自愿捐粮掺杂冰雪为食，然无一人叛。

此后，宦官高起潜统关宁兵数万在鸡泽，距离贾庄不到50里，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去求援，高起潜置之不理。卢象升知事不妙，军中大哭，誓与清军决一死战。随拔寨而出，于蒿水桥决战清军。史载“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战后，杨廷麟及部下在战场上寻获卢象升遗体，甲下尚着麻衣白网（服父丧）。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而高起潜得知卢象升大军兵败之后，惊恐失措，欲西逃，竟率军东退20里，遇敌伏军大溃，仅只身逃逸。自请督察军情的枢辅刘宇亮至保定闻败，也仓皇退入晋州，而清军即乘胜长驱直入，分陷昌平、宝坻、平谷等地，京师震动。于是二十日，思宗皇帝下诏征总督洪承畴率军入卫，陕西巡抚孙传庭为兵部郎督侍援军同行。

卢象升战死后，杨嗣昌却一意诬陷象升临阵脱逃，并派士卒俞振龙等三人前往查看。俞振龙不畏淫威，坚持指认卢象升遗体，“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张目曰：‘天道神明，无枉忠臣。’”千总杨国栋因为不肯顺从杨嗣昌意思修改唐报，坚持称卢象升已战死，而被处极刑。卢象升遗体停尸80多日后方被家人收殓，“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大殓，神色如生”。

当洪承畴接到皇帝诏书，北上勤王时，清军已经在崇祯十二年三月初八至十一日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而皇帝却依然决心以洪承畴镇守蓟辽边境，当陕西巡抚孙传庭建议以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时，朝廷未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借口推辞，结果崇祯大怒，命将其逮捕入狱，于是剿寇策略遂功亏一篑。此后李自成、张献忠再度崛起，直至明亡。

洪承畴此人的确有才能，其早年家贫，幼时即帮助母亲兜售豆干为生，11岁即辍学。曾任云南按察使的当地学者洪启胤对其颇为同情，传授洪承畴《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孝廉，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二甲14名，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天启二年升浙江提学，又升浙江布政使参议。熹宗天启七年，升陕西督道参议。思宗崇祯时，流寇大起。时年，洪承畴37岁，韩城遭民军王左桂围攻，杨鹤调洪承畴救援，洪承畴带数百由家丁、仆人、伙夫拼凑的军队，首赴沙场，以卓越指挥解围韩城，斩杀500余人。此后两个月里，所部号称“洪兵”，连战连捷。“托塔王”王左桂降，承畴宴请，席间杀之。洪承畴好杀降卒，崇祯四年四月，令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趁机杀300余人。费密说：“陕西总督某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然而，纵观明末农民起义，多见民军假意接受招安，一旦解围，即行反叛，张献忠屡降屡叛，正是一证，可见承畴先见之明。

同年八月，延绥巡抚死于任上，洪承畴代之为巡抚，十月授陕西三边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处军务，镇压农民起义。

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仅以18骑败走商洛，于是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之后，卢象升受杨嗣昌掣肘，战死于巨鹿。思宗皇帝不得已将洪承畴从西线调来，这显然给予李自成、张献忠喘息之机。当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北上入卫京师时，思宗皇帝从枢辅杨嗣昌议，进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而此时，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已经率军饱掠后，从山东北返至天津卫，渡运河东归。三月初九，清军从青山口出关，退回辽东。是役，清军入关达半年，深入2000里，攻占1府、3州、55县，2关，杀明总督2、守备以上将吏100余人，俘获人口46万余、黄金4000余两、白银97万余两。

这一次，面对清军入侵，大明竟失陷城镇60余处，于是皇帝命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同时也因东事愈重，而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辅臣杨嗣昌定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兵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东西策应，闻警即至。可就在当年十月，清军再次进攻宁远。时宁远守将为都督同知金国凤，统军近万人，然而面对强敌，宁远守军竟然胆怯。于是金国凤悲愤，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与清兵苦战，矢尽力竭，与二子及众亲丁皆战死。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于是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率军镇压。当时义军分为三路，西路张献忠据楚蜀界、东路革里眼、南路曹威、过天星等，于是杨嗣昌驻襄阳，而令总兵官左良玉专剿张献忠，此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战于枸平关，献忠败。左良玉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杨嗣昌令左良玉别派偏将追剿，左良玉不从。时张献忠移军至九滚坪，见玛瑙山险峻，将据之。左良玉军至山下，而张献忠已占据山巅，左良玉乃分兵三路，约闻鼓而上，鏖战久之，张献忠军败。史载“大破之，斩馘3620，坠岩谷死者无算”。此战，左良玉兵斩首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义军首领16人。而张献忠虽然妻妾被擒，他自己逃入兴、归山中，但不久又入兴安、房县境内，官军畏惧山险不攻，张献忠潜伏密林中，贿山民买盐米，山民成为义军耳目，张献忠收得散士，声势复振。

不过在当时，崇祯皇帝对于此战还是很满意的，此后，张献忠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此时曹威、过天星欲渡江，为明军官兵所阻。张献忠至，与之会合。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张献忠虽累败，然气犹盛，立马江边，有不前者，辄斩之，官兵乃退，张献忠渡江后，屯驻万顷山，此时杨嗣昌才自夷陵朔舟而上。而张献忠势力已盛，连续攻下大昌、开县，北攻剑州，将入汉中。又攻绵州、泸州，至开县。杨嗣昌在重庆，召贺人龙、左良玉来援，皆不至。后罗汝才与明总兵孙应元等战于兴山之丰邑坪，被官军斩2300余级，俘500余人。罗汝才率其众逸走巫山，与张献忠队伍会合。

是年八月，杨嗣昌出师入蜀，其时监军万元吉先入蜀，令蜀将把守巴、巫等险要之地。而此时李自成则从郧、均进入河南。

此时，民变的根本还是源自腐败的朝政和频发的天灾，仅仅崇祯十三年，就有苏、松、湖等府的吴江、归安等地昼夜倾盆大雨，水势骤发，霎时汹涌，不分堤

岸，屋宇倾倒。而米价腾升，斗米至银三四钱，富家多闭粜，民食草木根皮俱尽，抛妻子死者相枕。强横之徒三五成群，鼓噪就食，街坊罢市，乡村闭户人情汹汹。这一年，天下，草木皆被吃光，官府于城门外掘坑以埋饿死者，埋且满，饥甚无食的人争到坑内割食其肉，至有父子夫妇相食者。山东沂州蝗灾则是蝗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斗麦二千。民掘草根剥树皮，父子相食，骸骨纵横，婴儿捐弃满道，人多自竖草标求售，辗转沟壑者无算。次年春疫疠继起，死亡过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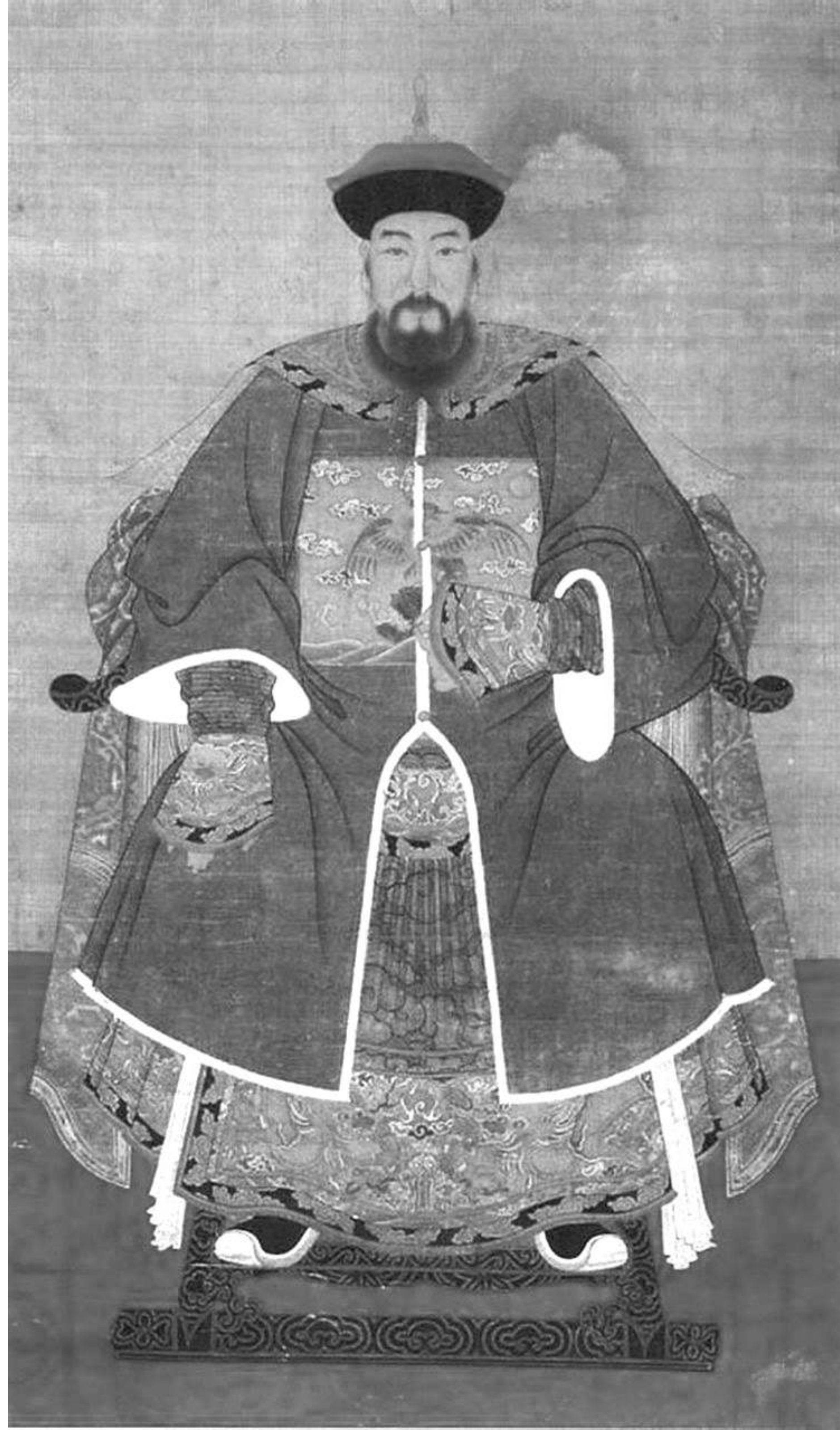
虽然在三月七日思宗皇帝下诏罢各镇内臣，告谕道："各镇内员，察饬已久。兵马、钱粮、器械等项，稍有改观，但战守防援，事权未能尽一。遂将总监、分守等内臣俱撤回京另用，凡边务一切钱粮、兵马、边防、剿御等事，着督、府、镇、道一意肩承。"而十四日，户科给事中左懋第疏陈四弊：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等。又请严禁将士剽掠、请散米钱，赈济饥民。思宗皇帝采纳其言，诏令上灾75州县所旧练三并停，中灾68州县止征练饷，下灾28州县等到秋后征饷，并令清理刑狱。此后在五月十三日、十六日，皇帝又告谕户部、都察院：直省告饥，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又有百姓茹土食菜，并无菜色，且剜肉爨骨，殣以泽量，言之堕泪。但都无法改变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境地，而且到处用兵，也急需要军费，于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帝下诏增天下关税。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一钱，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关，增五万两。不久，又增二钱。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抵增数"，自严乃上疏议"税芜湖三万，而宣课仍增一万"。后乃以度支日绌，增加关税20万两，而商人百姓日益穷困。

这样的情况下，大明又怎么可能能够镇压民变呢？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汝州。这一年二月，李自成攻开封，城坚厚五丈。义军以洞车掩护士兵挖穴，巡按高名衡婴城固守。周王恭枵拿出库金百万两，招募壮士杀敌，并做米饭以饷军。开封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杀义军2000，李仙风督将游击高谦驰救，又杀义军700人。李自成军遂退走密县。而与此同时，张献忠攻克襄阳城。当时，杨嗣昌以襄阳为军府，饷金、甲器各数十万皆聚于城内。每门设副将防守。张献忠出川后，一日夜驰300里，道上杀杨嗣昌使者，取其军符，以28骑进入襄阳城。夜半火起，居民望见火，以为满城皆贼，夺门出城，城溃。张献忠执襄王翊铭于南城楼曰："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襄王朱翊铭与贵阳王朱常法皆被杀。此后张献忠在攻

破襄阳后，又率兵东下，与罗汝才兵入河南，攻商城。当时知县盛以恒，移任开封同知，将行。张献忠军至，乃与乡官杨所修等拒守。时天下雨雪，守城士兵冻馁不能战，以恒率众射杀义军17人。后以恒受伤，被抓而死。三月间，张献忠攻随州，知州徐世淳知道张献忠军必至，集士民誓以死守。张献忠攻城，徐世淳住于南城谯楼，日夜把守，援兵未至。守城月余，援尽力穷。张献忠乃佯攻南城，潜兵自北城攻入。世淳革马巷战，死于军，城遂破。

四月十九日，朝廷以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诸军。然而丁启睿本不知兵，受重任不知所为。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荆州，湖广巡按汪承诏将船藏起，启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邓州，州人闭门骂。过内乡，同样不得入。大军只得行荒山，吃马肉。此后丁启睿闻自成军围开封，有军队70万，不敢去。张献忠在光山、固始间，兵少，丁乃与诸将相谋。诏檄左良玉，破张献忠军于麻城。此后，总兵左良玉又于信阳击败张献忠，当初张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后，转兵他处，屡破数郡，颇为得意，遂再攻信阳，结果再次被左良玉击败，降将数万。此战中，张献忠受伤，乘夜东奔。左良玉急追，会天下大雨，江溢路绝，张献忠逃走。将至英山又被左良玉副将王允成所击，所从者只余数十骑。张献忠遂投于李自成，李自成欲以其为部属，张献忠不从，在罗汝才的帮助下逃走。随后，李自成乘胜再攻开封，连续攻陷其所属许州、禹州、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临颍、长葛、新郑、汜水等十余城。李自成攻城，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而永福射李自成中目，李自成遂撤围而去。

这一年，大明天下依然是灾情不断，吴江一带，大旱不雨，飞蝗蔽天。官令捕之，日益甚。米价每石银四两，流丐满道，多枕藉死。民间以糟粮腐渣为珍味，或食树屑榆皮。各处设厂施粥，吃者日数千万。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一带，大旱，蝗虫起。当时山东等省连岁告灾，给事中左懋等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李青山遂率领民众起义，阻断漕运，明廷大震。不得已之下，朝廷只能允许潜山、宿迁、太湖、怀安、桐城、望江等各输麦代漕米，准十之六。不久，又许淮安、扬州输麦抵漕粟。



可也就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著名的松锦之战。

松锦之战，又称松锦大战，是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到明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在锦州地区进行的明朝与清朝入关前的最后总决战。明军共20万，清军共24万，以明军全军覆没，明军统帅洪承畴投降清朝告终。

崇祯十二年（1639），思宗皇帝调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加强东北边防，防卫金人。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 “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山、杏山、锦州三城势已岌岌，朝不逾夕矣。”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13万，速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速会兵于宁远。

由于洪承畴本人多谋善断，故而他深知清军厉害，而不敢冒进，只是驻扎宁远，以窥探锦州势态。并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兵多饷艰为由，主张速战速决，催承畴进军，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督促决战。张若麒不知兵，认为锦州之围可立解，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思宗皇帝亦诏令洪承畴“刻期进兵”，洪承畴不得已，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13万人，浩浩荡荡出援锦州。

崇祯十四年四月下旬，洪承畴率部至松山与杏山之间后，依然颇为犹豫，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但八总兵均怀骄横，不易服从统一号令，于是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杨国柱中箭身亡，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此时明军士气正锐，清军见到明兵如此气势，无不“大骇”。此后，双方在乳峰山战事胶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失利，几至溃败。此战后，洪承畴将吴三桂列为首功，并称：“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备尝，此番斩获功多。”不过就当，明军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厉攻势重挫清军，局势开始好转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兵多饷艰为由，催促洪承畴进

军。洪承畴拖垮清军之方略无法实施，不得已，率军进入松山，意图在松锦与之决战。

皇太极听说洪承畴为援锦州率马科、吴三桂等八大将，兵13万驻松山，而清军与之交战，又频频失利时，心急如焚，决定亲率援军趋松山。而朝鲜亦派出大量兵马和火炮支援清军，而且还有林庆业统帅水军随同清军作战。

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皇太极带病急援松山，虽然一路上皇太极鼻血不止，但依然日夜兼程行军。八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分军驻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皇太极发现明军的弱点，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于是清军陈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就地挖壕，紧紧包围在松山。史载，"断绝松山要路"，甚至"有刈薪、汲水者，辄为逻卒所杀"。

就当洪承畴与清军决战于松山、锦州之时，皇太极密令阿济格突袭塔山，趁潮落时夺取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12堆。于是洪承畴所部陷入危机，欲战则力不支，欲守而送粮之路已被截断。

在松山被围，通道被断，松山粮饷仅存三日后，于是洪承畴召集诸将，主张决战突围，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这时张若麒也反对决战，于是明军"饷乏，议回宁远就食"，再加上"初筑时，承畴不之觉，已而知为所困，然亦不能争矣，遂上书求援，凡十有八疏。内臣高起潜恐承畴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于是洪承畴无可奈何，决定明日一早分成两路突围南逃。

然而大同总兵王朴畏敌，不敢应战，首先乘夜突围逃跑，结果诸军动摇，各军不待军令，争先退走，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清军则趁势掩杀，自此诸镇皆兵溃。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只得困守松山城，丘明仰则誓与承畴同守，随后组织突围，双方战于尖山石灰窑，明军颇有攻势，但最后皆因潮涨失败。曹变蛟曾夜间突袭清军大营，皇太极亲军猝不及防，皇太极本人拔刀抵抗，遏必隆与锡翰偕同辅国公额克亲合力抵御，变蛟受伤撤离。此后，洪承畴所率兵13万，先后失亡5.3万余人，其仅率万人残兵坐困松山城。自此，锦州之围益急。而松山外援亦绝。

当松山被清军围困已久，且城中乏粮时，朝廷命顺天巡抚杨绳武救洪承畴，又派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但皆敛兵不敢出战。副将焦埏赴援，至山海关

即败。不久，“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并以其子夏舒为人质，与清军相约攻城日期，己为内应。清军至期攻之，城破。巡抚丘民仰及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城陷，洪承畴、祖大乐兵败被俘至沈阳。三月八日，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军占领锦州，在这之前，祖大寿多次击败清军，崇祯十一年还因破多铎军，被擢为少傅左总督。崇祯十四年七月，此番皇太极率师围锦州，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13万以解锦州之围，结果洪承畴兵败被俘，至此时锦州被困年余，粮尽援绝，祖大寿遂再次降清。

此后，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25余丈，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至二十九日，清军计斩杀明兵5万余人，松山、锦州、杏山三城尽没，至此松锦大战结束。此后，清兵攻克塔山，其时，兵部郎中马绍愉驻塔山等候朝廷议和之命，遣人谕清兵勿攻，清兵不听，遂攻克塔山城。城中兵民自焚，无一人降清。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最初被俘时洪承畴为表示忠于明室，宣布绝食，但不久后被劝服，投降，到了五月剃发降清。洪承畴投降以后，明朝不知道他已经变节，思宗闻之大震，设坛赐祭：洪承畴16坛，邱民仰6坛。祭到第9坛的时候，又得到军报，说洪承畴降清了，京城大哗。

史载，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范文程欲招降洪承畴，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于是洪承畴“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说：“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而《清史稿》记载了洪承畴的最后投降：“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松锦大战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 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彻底崩坏，一时间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此后又有御史郝晋弹劾吴三桂“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

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于是请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王朴被杀，此外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但依然以其镇守宁远。后又有言官弹劾陈新甲之失，虽然新甲恐惧请辞，但皇帝不许，不久，思宗皇帝又诛杀陈新甲，职方郎中张若麒下狱论死。

自松锦大战后，大明帝国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此后在辽西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而导致这场大败的原因其实在于大明帝国内部，思宗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也就在这盲目催战下，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此外，督监不和也是根本，身为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由此大败。当然了，洪承畴自身也有问题，他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故而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以至于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其便是率军孤军深入，而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又率军南逃，这种出犹豫和动摇，也是此番战败的根本。还有就是官兵尽皆畏死，面对皇太极亲自来援，最初有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的明军居然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此后突围被动，而朝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斂兵不敢出”，更是问题。

崇祯十五年，并没有随着松锦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三月，张献忠攻舒城，时舒城无县令，参将孔廷训同编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后廷训降，乃教敌以车穴城，城穿数处，守恒督民补塞之。张献忠射书令其投降，守恒烧其书于城上，张献忠大怒，率军攻城，于是城破，而在攻克舒城后，张献忠又率军从六安至庐州。知府郑履祥、通判赵兴基，经历郑元绶等人分门把守。时提学御史徐之垣到庐州会试士子。张献忠派人伪装成儒生，带儒冠以入。半夜纵火，城中大乱，城遂破。

是年七月一日，开封告急，崇祯令左良玉赴援。左良玉及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兵驻朱仙镇。左良玉见敌势盛，乃拔营而逃，襄阳诸军皆溃。左良玉军逃至半路又遇李自成伏军，左良玉军大乱，弃马骡万匹，监军佥事任栋死于

阵，左良玉则逃至襄阳。遂以朱仙镇之败总督杨文岳免职，总督丁启睿逮下狱。

七月十七日，思宗皇帝告谕吏部：近来有司不修守备，贼至辄陷，原与冲锋阵亡及持久力诎之士不同。若概赠荫，保以奖励忠劳。今后宜详加分别。除异常义烈，恤典取自上裁。其失事损身，有司六七品赠监司五品，其五品赠临司四品，方简官赠京秩。著为令。但皇帝的这番用心良苦并没有换来他所想要的结果。八月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兵变，其初，副总兵廖应登领3000人，汪正国、李自春各领千人，到处骚扰，黎民重怨。巡抚徐世荫新到任，又值刑科给事中光时亨疏伦廖应登宜正军法，邸报先到，于是兵遂发难，杀都指挥徐良寇。此后徐世荫急从南京赶到安庆，徙应登兵太湖，汪正国率军兵临桐城，方才平定叛乱。

而至九月二十四日，被围半年的开封城已经粮草皆尽。巡抚高名衡等仍固守。高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李自成军。李自成知之。移营高地，亦驱难民数万决黄河，河水自北门入贯东南门出，水声奔腾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被淹。惟周王妃、世子及巡按以下，不及2万人得以逃脱。李自成军也被淹死万余人，遂拔营而走。开封佳丽甲中州，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至是尽没于水。

至年底后，李自成攻陷襄阳，当时左良玉自朱仙镇战败后，退驻襄阳。李自成乘胜攻左良玉，至白马渡。左良玉移营于南岸，守浅洲，李自成军十万争渡，左良玉乃拔营而逃，走武昌。李自成军渡过白马渡，遂长驱进至襄阳，襄阳官吏都已逃走，李自成军遂趋宜城。

十二月八日，清军再次南下，攻兖州，兖州知府邓藩锡劝鲁王以派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否则，大事一去，悔之晚矣。以派不听，清军到，各将分门死守，力不支，城破。鲁王自尽，乐陵、阳信等郡王都死，而邓藩锡等尽皆战死。

崇祯十六年，对于大明来说，是一个灾难之年。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承天，建立政权大顺。正月二十五，张献忠攻打蕲州。三月二十五，张献忠攻入黄州。五月初，张献忠陷汉阳，武昌大震，时武昌城中空虚。三十日，张献忠攻陷武昌及旁近属邑后，乃于武昌立国。设五府六部，铸西王之宝。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宫，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赈济饥民。此后在八月初五，张献忠陷岳州。

而李自成则率军在十月初三攻克潼关后，又于十月十二日攻克西安，十月二十日，李自成改西安府曰长安，禁乡民短后衣，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6000斤，输长安。各县遣骡300，征粟千石，大其斗，榜掠巨室助饷。十一月初

四，李自成攻克延安。此后李自成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十一月十四日，李自成又遣试郡县诸生，上等任六政府从事，次任守令，又次任佐贰。二十九日，李自成攻克榆林。此后，十二月初二，张献忠攻克建昌，十二月初七攻克抚州。而十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陷平阳。十二月二十四日，东阳诸生许都起事。两天之后，李自成又攻克甘州。一时之间，大明王朝大半河山尽皆变色。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大清崇德八年（崇祯十五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

关于皇太极之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有关清代官书上记载“无疾而终”，所谓崇德八年（1643）农历八月九日，已勤于政务一天的皇太极晚上亥时，在清宁宫南炕突然死亡。但还有史料记载，崇德五年，皇太极“圣躬违和”，崇德五年农历七月到鞍山温泉疗养。崇德六年松山大战时，因前线告急，皇太极原定于崇德六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亲征，却因鼻血不止推迟三天。崇德七年，又因“圣躬违和”，在大清门外大赦人犯。崇德八年又“圣躬违和”，不但正月初一免了庆贺礼，而且再次大赦，并向各寺庙祷告，施白金。故而有人认为，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导致积劳成疾，加之宸妃之死，其悲痛不已，于是疾病一朝突发，瞬间猝死。

不管怎么说，皇太极继位之后，对于汉人的态度，才是大清强盛起来的根本。他即位之初，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此外，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几倍于满人，于是他屡下谕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又以“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来再次重申满汉一体，此外还下令禁扰汉人，所谓“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以及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从而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

史载，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天聪二年（1629）十月，兴师伐明时，

皇太极更是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清太宗常服袍褂像

但这也不等于皇太极全部偏向于汉人，譬如他要求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以至于不少汉官“祇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此外，努尔哈赤曾于天命五年（1620），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但皇太极却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而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还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并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以防止大清步金朝之后路。

对于大清来说，皇太极的猝然而死并不是什么好事，因其生前未立下遗旨，所以众宗室旗主大加争夺皇位。作为皇长子的肃亲王豪格成为众人拥立的对象。而豪格争夺皇位的主要竞争者则是皇太极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实力强大的、原由皇太极直接掌握的两黄旗的将领，主张拥立豪格继承大位。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朝廷重臣，相继造访肃王府上，表示拥戴肃王为君。而礼亲王代善也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而之所以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其根本是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是为合适人选。

而多尔衮也功劳颇大，又有多铎为首的两白旗支持，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这个时候，德高望重的、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但济尔哈朗，也倾向于拥立豪格登基，于是豪格有正黄、镶黄和镶蓝三旗的支持，再加上自己所领的正蓝旗将领的拥护，明显占据优势，但尽管豪格在诸子中论功劳和能力最有优势，可皇太极生前却并未有立豪格为嗣之意。

此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会商于崇政殿，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彼此相争，委决不下。而朝廷内所有的王爷和重臣，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多尔衮与豪格为夺皇位进行的斗争旋涡中，群臣们都在苦苦地寻求出路，惟恐出现动乱，伤及国运，最终多尔衮

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提出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于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

第七章　八旗入关

崇德八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储嗣未定，故而引发了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的皇位之争，相持不下时，多尔衮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嗣位为帝，由自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于是，在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并誓告天地后，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诏以次年为顺治。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所谓的硕讬、阿达礼“扰乱国政”案。

阿达礼、硕讬“扰乱国政”案，在朝鲜史书中有详细记载。此案发生在议立嗣君，也就是确立福临即位的两天后，史载：“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讬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讬伏诛”。这件扑朔迷离的奇案在大清初年曾轰动一时，硕讬是代善之子，当初硕讬不满父亲对自己的虐待，曾闹出投明一案来，导致代善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赖，由此失去了继承汗位的机会，而硕讬则在圈禁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出来，后来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硕讬随叔父阿敏因为放弃永平等城败归，而被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大凌河城之战后，硕讬因伤功而被封为固山贝子。但此后，他就霉运不断，屡次论罪受罚。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崩，多尔衮与豪格争夺皇位，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不过嗣君虽已定议，但诸王却人心未定，也就在这个时候，硕讬却和阿达礼到处活动，企图改由多尔衮继位。

史载，阿达礼与硕前往睿王府，告诉多尔衮：“王如坐大位，我当从王。”而硕讬则派遣亲信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都赞同我的谋划，王可自立为君。”此后二人又同往代善家，借探视足疾，私下对他说：“今立幼儿，国事可知，请速做决断。”又附在代善耳边低语：“众人已决定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王，王为何还默不做声？”

但代善却不为二人的劝说所动，并称：“既然已对天立誓，为什么又说这话？不要再改变主意！”二人见代善不从，又前往豫王多铎家，多铎闭门不见。阿达礼、硕讬吃了闭门羹，不得已返回礼王府重申来意。结果代善大怒，亲自告知多尔衮，两人把这件事公布于众。于是，阿达礼、硕讬被以“扰乱国政”罪论死。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阿达礼、硕讬背后似乎另有指使，因为皇太极暴逝时，内大臣图尔格属拥戴豪格一派，而且他与白旗诸王（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

向不和，为何会在定立福临的两天后，转而拥戴多尔衮？又有既然硕讬已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都赞同其谋划，在审讯阿达礼、硕讬时，多尔衮为什么不就此进行追查？而是在事发当晚就将二人处死。故而也就有了多尔衮是阿达礼、硕讬背后指使者的这个说法。事实上，当时的多尔衮的确是有一定的资格继承皇位的，他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从先帝之命而殉葬，但也有说法是四大贝勒逼宫，以所谓的“帝遗言”，强迫阿巴亥从先帝之命而殉葬，最终阿巴亥自缢殉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阿巴亥被逼殉死的情景：



清摄政王多尔衮

“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

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

母亲死时，多尔衮只有15岁，天聪二年（1628），年仅16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此战，多尔衮破敌于敖穆楞，故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天聪五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多尔衮掌吏部事。天聪九年（1635），多尔衮等率军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番，他不仅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还获得元传玉玺，于是在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后，群臣纷纷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大清初建，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24岁。

此后，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大明，此后松锦之战中，多尔衮更是战功赫赫，皇太极死后，帝位空缺，而多尔衮之所以最终选择奉福临为帝，其实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特别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大清内乱，才出此策。

而当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之时，关内的大明帝国却走向了末路。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这种情况下，崇祯密使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与清兵图和议。一日，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情泄露，群臣哗然，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崇祯更加愤怒。给事中马嘉植又弹劾新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大力援救，拒不听。刑部侍郎徐石麒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大明帝国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至崇祯十七年时，大明王朝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在此时，大明帝国并不是没有选择，朝内曾经有过南迁之议，也就是把京师迁往南京，徐图恢复。

自永乐十九年，成祖皇帝诏令“六部政悉移而北”后，大明正式以北京为都，并

改北京为京师。不过成祖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为顺天府，南京所在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虽然南京六部的权力远不如北京六部，而且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但是南京六部也有一定职权。主要是因为南京所在的南直隶地区辖15个府又三个直隶州，却不设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三司，故而原来三司执行的职权便由南京六部负责，这其中又以南京户部的权力最重。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而此四地所交税粮几乎占了大明帝国的一半左右，同时南京户部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及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思宗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结果，所谓不得外泄，却仅仅数日之后，这个机密就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懿安皇后（熹宗的皇后)那里，懿安皇后随后与周后（崇祯皇后周氏）谈及此事，并说这是周延儒误皇叔，宗庙陵寝在此，迁往何处？而周后则把这些话转告思宗，结果引来思宗大怒，皇帝甚至严查向内宫透露消息之人，不过由于懿安皇后一字不说，且思宗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故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此后，左中允李明睿又提起“南迁”之事。

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罢官回乡，由都察院左都御史立邦华、总督吕大器推荐，思宗召其至京师，任职左中允。史载，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思宗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请帝屏去左右，趋近御案，向皇帝进言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唯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思宗因为有上次南迁之议的教训，十分谨慎地回答：“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及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缓也。”

思宗四顾无人，遂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至于如何南迁，李明睿说“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

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思宗听了表示同意，再次叮嘱：“然，此事不可轻泄。”李明睿见皇帝有意，故而又说“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于是思宗颔首退入内宫，并命近侍在文昭阁赐宴招待李明睿。

此后，皇帝还曾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娶光宗之女安乐公主），向其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并称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并称：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10万兵士。山东的一些王府也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此外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而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结果皇帝将此疏交给内阁议论，可内阁首辅陈演却反对“南迁”，还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弹劾李明睿，称“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此番皇帝倒是强硬了一番，斥责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虽然支持“南迁”，但他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那就是遣太子“南迁”，监抚南京，以维系民众希望。

不过由于内阁首辅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而此人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于是，大臣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原本倾向于“南迁”的思宗在压力之下，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载，皇帝在召见内阁辅臣商议南迁之事时，面带怒色地说：“宪臣（指左都御史李邦华）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阁臣们看了奏本后说：“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思宗问：“二臣何人？”阁臣奏过姓名及各自主张后，思宗却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此外，对“太子南迁、延续国祚”的建议，思宗也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几十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其实，皇帝的心思变化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人就认为，此时皇帝的心态是复杂的，所谓“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事，将俟举国请而后许。诸大臣才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

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不过，虽然皇帝说“国君死社稷”，却在着手做着南迁的准备，例如，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又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300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而冯元飏早在南迁之议初起之时就向皇上力陈：寇在门庭，南北道路将梗，宜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所以此番才有思宗命他做好准备的密旨。

可是导致皇帝最终在南迁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因素还是内阁首辅的态度消极，由于陈演反对南迁态度非常坚决，所以思宗在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他，使陈演深感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思宗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而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是如此，只不过他是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两任首辅，一个坚决反对，一个不置可否，自然是令思宗感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哀伤中。史载“耸身舒足，仰叹而起”。思宗的皇后周氏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故而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于是颇为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利持之者。”

由于内阁首辅陈演、魏藻德的反对，南迁一直议而不决，至于三月初一，思宗在中左门召见陈州生员张攀，这位生员向皇上提议：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一二老成忠爱大臣辅佐。但为皇帝所否决，皇帝说“朕方责诸大臣以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是谓社稷何”。此后，三月初三，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上南迁，并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皇帝对内阁辅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尽皆请求先护送太子抚军江南，然而此言又遭到给事中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既然都拿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亡成都，太监挟持李亨前往灵武，被拥立为帝为例子，谁还能够说什么，此后思宗询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众臣一片沉默，无话可说。于是思宗皇帝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此次之后，大臣一提及南迁，思宗便勃然大怒，而也就在此时，天津巡抚冯元飏派其子冯恺章携奏章进京，并在奏章中说“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无一可待，臣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行幸留都”。然而面对皇帝“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的态度，加上户部尚书倪元璐劝说“皇上有国君死社稷

之言，群臣无以难也……上决计固守，疏必不省”，而内阁辅臣范景文、方岳贡二人则私下对其说：“天子方怒，疏上且死。”于是冯恺章在京彷徨七日，报国无门，只得饮泣返回天津。

当皇帝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时，各地的民变已经成燎原之势，而这把火在崇祯十七年时已经烧到了北京城下。至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

明末的农民起义始于天启五年（1625），当时饥民迫急，人人迁怒，欲反官豪，以求生路，各地纷纷有所暴乱，整个大明已经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样，随时可能爆炸，而真正点燃导火索的则是两年后的“王二举事”。

天启七年七月，陕西全省饥荒严重，加之疫病流行，百姓死毙愈多，“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赡”。但陕西巡抚乔应甲不但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所谓“新饷”“均输”等赋役，严令官吏督。于是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农民王二、仲光道等，聚集灾民数百人。王二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

史载，农民军手持刀械，以墨涂面，攻打官仓，散粮于饥饿的百姓。此后，王二担心被官军合围，遂退至白水县洛河以北。此时，跟随农民军的饥民日益增多，声势大振。于是农民军转战于渭北山区各县，攻镇夺寨，劫富济贫，斩杀贪官污吏。崇祯元年，又有陕北府谷农民王嘉胤集结一群饥民造反，于是王二率军与之汇合，使得农民军迅速壮大。不久，王二、王嘉胤起义军向南进入黄龙山，继续杀贪官、破监牢、开粮仓，朝廷多次派官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屡屡败于义军。

而在王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甘肃庆阳韩朝宰，武都周大旺等尽皆率领饥民起义，又有张献忠在延安米脂举事。农民军所到之处，饥民和官军逃兵纷纷加入，一时间韩城、蒲城、宜君、洛川、白水等地尽皆燃起战火。最初的时候，朝廷试图以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到了崇祯二年春，皇帝诏令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围剿农民军，督捕王二等头领。

面对所谓“流寇”，杨鹤采用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略，来逐步瓦解农民军。于是在他的这一剿抚兼施的方略下，陕西义军一度瓦解，王二被俘，并被陕西

兵备商洛道刘应遇杀害。但此后，高迎祥所部却成了大明新的威胁。

按照史料的记载，高迎祥最初是在熹宗天启年间聚众于甘肃境内起事，号称“闯王”。崇祯元年，高迎祥转战于甘肃、陕西，后转战山西、北直隶等地，当时义军纷起，不下数百。其中以王嘉胤、王自用等部最强。于是皇帝以洪承畴为三边总督以围剿。至崇祯六年，农民军一度突破明军包围，向河南、湖北、四川进军，后发展为13家流寇，共72营。但也在这一年五月，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此后高迎祥与张献忠、罗汝才等转战于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交界处，消耗很大，逐渐处于困境。崇祯七年，朝廷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围剿事宜。崇祯八年一月六日，农民军陷荥阳。高迎祥与诸将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顺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等13家流寇首领，72营大会于荥阳，研议拒敌，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

此后，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等攻略东方，同年高迎祥攻占中都凤阳，毁皇陵楼殿，焚龙兴寺，杀宦官60多人，树起“古元真龙皇帝”大纛，后回师河南，再入陕西。由于凤阳是太祖朱元璋故里，凤阳失陷消息传至北京后，思宗皇帝惊惶不已，身着素服，声泪俱下。于是，漕运总督尚书杨一鹏被逮下狱。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赐尚方宝剑，分遣贺人龙、左良玉等诸将。

李自成，米脂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少年喜好枪马棍棒，其曾在驿站担任驿卒，“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最初的时候，李自成率众转战汉中，并加入王左挂的农民军，后王佐挂被朝廷招降，他又转投奔张存孟。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农民军时，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于官府。于是崇祯六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不久之后，曹文诏率关宁铁骑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并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但由于次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帝国不得不抽调大军北上勤王，于是被围农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车箱峡，结果此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于是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

人，派50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结果“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

崇祯八年，因争夺俘虏的凤阳皇宫小太监和鼓吹乐器，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

崇祯九年时，高迎祥在南直隶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由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这时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年（1637），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实施围剿，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一时间，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墙子岭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最终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撤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自成率部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反叛，而李自成也趁机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李自成趁杨嗣昌的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根据郑廉在《豫变纪略》的记载，李自成此时于河南大赈饥民，所谓“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由于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于是其所部迅速发展到数万。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张献忠所部逃出四川，而与此同时，李自成则在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攻克洛阳，杀神宗皇帝之子福王朱常洵。

当初神宗则想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而按《皇明祖训》立储的原则，则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故而引来了“国本之争”，最后在慈圣太后的干预与大臣们的坚持之下，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此后神宗因此事而几十年不上朝，是为“万历怠政”。万历四十二年三月

二十四日，朱常洵就藩洛阳，得庄田2万顷。由于朱常洵接受了神宗大量赏赐，加上历年来横征暴敛，财宝无数，“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很显然大明王朝如此不堪，显然是有他的一份“功劳”。

史载，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朱常洵及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宫眷内官百余人自杀或被处死。此外，李自成还割朱常洵肉，与取自园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分而食之，名曰“福禄宴”，并“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此后，李自成趁明军惊魂未定之时，长途奔袭，意图攻下河南省城开封。而开封守将高名衡、陈永福、王燮、黄澍等人竭力抵抗，使得农民军受到重创，不得不于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一日夜驰300里出四川，奇袭襄阳。初五，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已病入膏肓，监军万元吉问他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此后，杨嗣昌病死沙市徐家园。

杨嗣昌死后，自此农民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兵部尚书陈新甲以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并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剿寇。此后张献忠攻破武陵，特恨杨嗣昌，掘其七世祖坟，焚其夫妇灵柩，并把其尸体斩断出血。而也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的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再次遇到了顽强抵抗，其开封百姓也与守军共同抵抗。史称“巨商巨族，各送饼千百不等”，于是在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军。

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使得开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黄河决口，十六日，洪水首先冲开曹门，然后四门皆被冲开，城中平民遇难者甚众。日后李自成部先后杀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李自成所部日益壮大。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并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孳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而李自成自身的生活简朴，史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

天下糜烂如此，思宗皇帝岂会不知。史载，皇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皇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难民和

阵亡将士以及被杀的各位亲王，思宗皇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罪己诏，同时催促督师孙传庭加紧围剿农民军。

孙传庭乃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入朝廷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崇祯八年秋，孙传庭返职，升为验封郎中，后来改任顺天府府丞。崇祯九年三月，孙传庭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史载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秦兵）。

而在当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遂意图自子午谷入，直逼西安。传庭料之，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

崇祯十一年时，李自成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与孙传庭设伏击溃，带着残部17人往陕西商洛山逃亡，李自成几乎灭亡。此时明军情势大好，可是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思宗皇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大难不死。由于孙传庭与流贼鏖战多年，屡建战功，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代任其职，但因与杨嗣昌等人不和，颇受抑制。崇祯十二年，为杨嗣昌弹劾，而被思宗皇帝下狱。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于是李自成所部得到迅速扩张，这种情况下，思宗皇帝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使之兵援汴梁。但上任不久之后，刚刚代汪乔年为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就斩杀了大将贺人龙，由此惹来一场纷争。

贺人龙是万历年间武进士，初以守备官隶属洪承畴麾下。崇祯七年十月时，贺人龙曾经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向贺人龙约降。不久，高杰降明，受封为兴平伯。崇祯十三年二月七日，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于玛瑙山。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最初，左良玉屡违节制，而贺人龙破贼有功，于是杨嗣昌私许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后来玛瑙山大捷，嗣昌告诉人龙须再等候成命，人龙以此大为不平，竟将实情告知良玉，良玉亦不满。后来两人皆不受嗣昌节制。杨嗣昌调左良玉，九檄不至，而贺人龙亦三檄不至。嗣昌其势日孤，终至覆亡。

崇祯十五年，贺人龙跟从总督汪乔年出关击流寇起义军，至襄城不战而走，城破，汪乔年为贼兵所杀。思宗皇帝大怒，密令陕西总督孙传庭杀贺人龙。于是五月，孙传庭大会诸将于西安，于固原总兵郑家栋，临洮总兵牛成虎等一众人前，命

左右擒缚贺人龙。贺大呼“冤枉”，孙传庭责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傅宗龙、汪乔年）也。”诸将莫不战栗动色。史载，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尽皆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

杀贺人龙之后，孙传庭又转战河南之地，连战连胜，李自成遂向冢头寨转移，途中大量抛弃财物，一时间明军竞相争夺，于是乱阵，“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此为“柿园之败”。柿园一役，明军损失将校70余及步骑数千，由此元气大伤，再无能力对农民军展开攻势。此战后，复社吴伟业甚至以为孙传庭阵亡，于是在写下“独身横刀，冲贼阵以殁。从骑俱散，不能得其尸”。

败归陕西的孙传庭最初是打算以大军坚守潼关，但崇祯十六年五月，思宗皇帝却在以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的同时，命其出战，虽然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但思宗皇帝不从。

最初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于是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400里，直指孟津，明军4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此后，李自成以10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史载，孙传庭死后，皇帝却认为其是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同年十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后，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8岁的幺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率大军50万东征北京。二月初二，在沙涡口造船3000，渡过黄河，攻下汾州、阳城、蒲州，隔日攻下怀庆，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5000人出战尽殁。初八，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后，李自成再次率军北上。十六日，克忻州，官民迎降，代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20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三月初一，李自成克宁武关，大明前后死将士7万余人，伤亡惨重，按照《罪惟录》所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当晚，大同总兵姜瓖

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陷宣府。史载，“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而自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以来，皇帝便是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不过因为国库空虚，故而皇帝要求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可结果只得20万两。三月初四，下诏，封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军或逃、或降。此后，担任居庸关守关太监杜之秩衔李自成命令回紫禁城向曹说降，谈判破裂。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此后，曹化淳开彰仪门投降，农民军立即进占外城。不过还有说法是，此时曹化淳并不在京师，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告老还乡，其时已乡居六年。清兵入关后，杨博、杨时茂等分别上疏弹劾曹化淳“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时，曹化淳还曾经极力上疏辩诬，后来他面对野史笔记中的“捏诬之语”时，还写下了《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一诗：“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临终前更作《被诬遗嘱》极力为自己辩诬。此外还有说法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

当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时，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又有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皇帝一剑刺死。此后，皇帝书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内臣持至阁；因命进酒，与周后、袁妃，同坐痛饮数金杯，慷慨决绝。皇帝长叹：“苦我民尔！”此后命人分送太子慈烺、永王慈炯、定王慈焕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

在安排好了这一切之后，崇祯皇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皇后顿首

道："妾事陛下十有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敢不死？"　　史载，"乃抚太子、二王恸哭，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此后，"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周后自缢后，皇帝手刃昭仁公主，至又"召长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号哭不已，皇帝叹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刀，主以手格，断左臂，闷绝于地，未死，手栗而止。'"其后命人，去传口谕要皇嫂懿安皇后和李太妃自缢。关于懿安皇后的下落，《明史》中记载，其在寝宫中上吊自杀身亡，殉国明节。但也有说法是张皇后自缢未死，被李自成的部将李岩所获。李岩知其是张皇后，想送她回太康伯家。结果，她再次自缢身死。此外，还有说法是崇祯帝派人劝懿安后自缢，"仓促不得达"。懿安后青衣蒙头，徒步入朱纯臣家，然后自杀而死。文献记载不同，莫得其详。总之，当日李自成进入皇宫时，懿安皇后从此再无下落。

此后，崇祯帝离开紫禁城。史载，出紫禁城后，思宗手执三眼铳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禁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手自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遂散遣内员，手携王丞恩，入内苑，人皆莫知。皇帝叹曰："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于是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时上逡巡久之，叹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如先朝靖难时，有程济其人者乎？已而叹息曰：想此辈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自经于亭之海棠树下。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随后王承恩也吊死于一旁。

据载，崇祯帝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曰："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凉德藐躬（也有一说薄德匪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迎刘宗敏所部军入城。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但此时崇祯帝已死，随后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于是李自成下令"礼葬"，遂将思宗皇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诸臣哭拜者30

人，拜而不哭者60人，余皆睥睨过之”。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崇祯帝自缢处

客观上说，崇祯帝并不是昏庸之君，其一生操劳，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继日地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以至于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正如《明史》评价说的那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

矣”。

甚至就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承认“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但其一生是非功过却是充满争议，崇祯帝登基十七年来，悯恤黎民疾苦，数下罪己诏，但苛捐杂税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虽然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此外，任用大臣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反复则严酷无情，果于杀戮，以至于出现崇祯朝十七年，竟然有50相。此外，自万历以来，大明积重难返，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外有辽东边事，故而虽然皇帝勤政，但大明帝国依然最终倾覆。

其实，李自成之所以能够顺利攻入北京，还与当时北京正在爆发的疫病有关。史载，“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而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六中则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又有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中写到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如此病疫之前，北京城自然是无法防守的了。

史载，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而从崇祯六年（1633）开始，疫病再次流行而开，“山西兴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随后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而在崇祯十三年，瘟疫传入京畿，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也均有大疫，所谓“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又有“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随后京师也发生了疫病，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在北京郊外的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

竟无收敛者”而在昌平州则是“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天津则是“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也就在北国大地“瘟疫流行，十室九空”的情况下，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

史载，大顺军入燕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甚至刘宗敏还制作了5000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而李自成则入紫禁城后，是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又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一说五十）两，镌有永乐字”。故而下令“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一时间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并在各地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譬如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而在绛州则是“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此外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在索饷大潮下，就连思宗皇后周氏的父亲周奎也不能幸免。史载，周奎之女在思宗皇帝为信王的时候，被选为信王正妃。思宗皇帝登基后周氏立为皇后，周奎封为嘉定伯，赐第于苏州葑门，家有女乐，然而周奎性甚吝啬。崇祯十七年，上悬令助饷，特遣司礼徐高加奎嘉定侯，多方动员之后，很不情愿地捐出2000两银子。徐高曰：“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北京陷落，周奎及全家都被大顺政府捉拿，在妻子、媳妇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和次子、侄子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之后，不得不交出70万巨款和全部家财。

就在此时，关外的清军也看到了机会，其实，早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正月时，多尔衮就曾以清帝之名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

混一区宇，富贵共之”。但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10余万人，离盛京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大明江山倾覆，于是遂采纳洪承畴“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的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蓟州南下，直趋北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李自成决心出兵山海关，以“灭吴保关”。

所谓灭吴，就是灭吴三桂。史载，吴三桂少年英挺，善骑射，其“白皙通侯最少年”，18岁时，其父吴襄带领500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被皇太极的数万大军重重包围，祖大寿与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大寿以城内兵少不肯出兵相救，三桂竟率二十多名家丁将其父吴襄救出重围。皇太极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崇祯四年八月，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弃城奔锦州，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总兵。史书载说三桂治军严谨，其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精锐骑兵1000人，分20队，50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官，吴三桂在自己的靴筒上放这20名领骑官姓名，一旦抽中谁，便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50人骑队，跟随他冲锋陷阵，可谓“无往不利”。

松锦之战时，吴三桂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直奔杏山城，皇太极闻讯感慨“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此后吴三桂率兵四万驻宁远，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京师为之震动”。初四，崇祯决定放弃关外，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于是，吴三桂率兵进关入卫京师。三月十六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三月二十抵达河北丰润，闻京师已破，思宗皇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降将唐通领兵8000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但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思宗皇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李自成闻讯，即召众人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

关于陈圆圆，史载，其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因“倾国倾城，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故而为“秦淮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周奎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遂派遣田贵妃的父亲田戚畹下江南选美，一时间，东南骚动。后来田戚畹将名妓陈圆圆、杨宛、顾秦等献给崇祯皇帝。其时战乱仍频，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进宫后被

退回田府，后田戚畹占为私有。一日吴三桂在田府遇见陈圆圆，一见倾心，于是纳圆圆为妾。此番听闻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愤怒之下，“冲冠一怒为红颜”。

是年四月十三日，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派明唐通率兵2万从山海关北一片石出长城，而自己则与大将刘宗敏率领大军6万向山海关进发，并携崇祯帝之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之父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关于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查继佐《罪惟录》卷31和《孤臣纪哭》说是“兵六万”，《明史》流贼列传称率兵2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而《甲申传信录》说10余万，此外《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清实录》中认为李自成军有“二十余万”。

史载，多尔衮在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求援的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吴三桂在求援信中称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大喜，但又恐怕吴三桂有所图谋，于是把杨坤留作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并书信一封，称：“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试图劝降吴三桂，随后多尔衮又下令大军转向，改道从连山、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清兵自四月初九出发，四月二十日，清兵抵连山，吴三桂一再催兵，并在信中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从吴三桂的这封求援信中，清兵知李自成军迫近山海关，于是日夜急行。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在山海关演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主力抵达山海关下，布阵于石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随后李自成先命令吴襄去劝降吴三桂，结果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再次示以之前与父亲划清界限之意，并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于是李自成令唐通、白广恩部近2万兵马从一片石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同时以主力6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

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一万、乡勇约3万人。史载，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而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大顺军曾一度攻破北翼城。关于此战，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曾写到“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不过虽然大顺军一度攻破北翼城，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

二十一日夜，此时多尔衮所统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此后，吴三桂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但由于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故而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故而清军兵马未动。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见情势危急，率轻骑寥寥数员冲出重围、飞奔至关城东2里的威远堡清军营垒，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但多尔衮虽然见吴三桂归顺非诈，但依然表示吴三桂必须要顺清，薙发，他才能出兵。所谓：“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无奈之下，吴三桂最终“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

之道也”。于是与多尔衮“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

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多尔衮马上下令，由图赖率军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所部，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100多骑脱走。随后清军大将和硕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罗郡王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当多尔衮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八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后，当即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清军则鳞次列阵于其后，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

于是，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而其之后是阿济格、多铎所率清军。而李自成见此情形也是大喜，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此番野战似乎对其有利。于是，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明史》记载，李自成作战通常是“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战斗一开始，吴三桂便是率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阵中，一时间“炮声如雷，矢集如雨”，由于大顺军不明情况，不知道清军意图，于是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就这样大顺军与关宁军厮杀疆场，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奋勇冲击，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

一直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的心态冷眼旁观的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发起进攻。此时大风突起，飞沙走石，扬尘蔽天，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而清军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一时间飞矢如蝗，疲惫不堪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督战，忽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又有说法是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

未尾申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溃败，刘宗敏中箭伤，大顺军死者数万。史载：“暴

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而《藜燃室记述》中则记载，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此后，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38口。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称帝，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后，离开北京，向西撤退。自此，从攻入至离开，大顺军占据北京前后仅42天。



清世祖顺治帝

同年五月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而当清军进入北京后，其朝

中在是否将首都由盛京迁北京的问题上，曾经有所争执。以阿济格等人反对迁都，而多尔衮等人则主张迁都北京。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方才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并遣辅国公屯齐喀等携奏章迎驾。

七月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十二，顺治帝驾车从盛京出发。九月十九，到达京师，从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顺治行定鼎登基礼于武英殿，告祭太庙社稷，并告祭天地：“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第八章　定鼎中原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于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率大顺军进逼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迎刘宗敏部进京，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而在这之前，崇祯帝已由太监王承恩相伴，在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



明思宗崇祯帝

京师失陷，天子殉国，朱明宗室及遗臣纷纷辗转向南。此时，曾经赫赫一时的大明帝国，如今已是破碎不堪，仅剩下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当时，清军据有山海关以外的辽东，李自成的“大顺”则据有淮河以北的大明帝国故地。此后，山海关大战，清军在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李自成放弃北京，而向陕西撤去。

这种情况下，南京的六部官员及武将谋臣们决计拥立一位朱家藩王为帝，以复兴大明，收拾破碎河山，继而挥师北上，平灭流寇，驱逐满清，收复京师。据“皇明祖训”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原则，人选自然是从崇祯帝以上追寻，崇祯皇帝虽然有七个孩子，但太子朱慈烺在农民军进北京后被俘，虽然被李自成封为宋王，但此后就不知所终；朱慈炯、朱慈照、朱慈焕也在甲申之变中下落不明；此外还有怀隐王朱慈烜、悼怀王朱慈灿、悼良王皆早殇。熹宗皇帝又无后，而光宗除了熹宗、思宗外，还有简怀王朱由、齐思王朱由楫、怀惠王朱由模、湘怀王朱由栩、惠昭王朱由樦，皆夭折。于是作为神宗长子的光宗，其一脉已无人继大位，神宗的次子朱常溆甫生即死，第三子福恭王朱常洵虽已在农民军攻洛阳时被杀，但庶长子朱由崧却还在，此外神宗还有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六子朱惠王常润、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但众王之中以朱常洵居长，于是按照继位原则，福王为第一顺位。



这位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生于福王京邸的藩王，于万历四十二年随福王朱常洵就藩于洛阳，此后又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甲辰封德昌王，后进封福王世子。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其父福王朱常洵缒城而出，藏匿于迎恩寺，后被搜出，于是被杀。而朱由崧缒城后，却得以逃脱，前往怀庆避难，崇祯十六年五月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崇祯十七年正月，农民军东征，怀庆闻警，于是继承福王之位没多久的朱由崧便是匆匆逃亡卫辉，投奔潞王朱常淓。三月初四卫辉闻警，朱由崧随潞王逃往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等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三月二十九日，京师沦陷消息传至淮安。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议立新帝，朱由崧显然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由于之前的“国本之争”而心存芥蒂，唯恐朱由崧即位后追究昔日东林党人攻讦郑贵妃（朱由崧祖母）之事，故而以立贤为名，拥立穆宗朱载

垕第四子朱翊镠之子潞王朱常淓。朱翊镠与神宗同母，都是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四年，仅两岁的朱翊镠受封潞王。此后，其居京师20年，受尽恩宠。史载，神宗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弟弟颇为宠信，曾赐其田地万顷。万历十七年，已经22岁的朱翊镠就藩卫辉府。在藩二十六年。万历四十二年孝定太后薨，丧报传到卫辉，朱翊镠悲痛不已，不久亦死，年47，谥号“简”。其死后，崇祯十七年二月二日，闯军刘芳亮攻占怀庆府，随即卫辉，潞王府危在旦夕时，二月十九日。朱常淓与福王朱由崧一同逃往淮安。此外，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主张既要立贤也要立亲，于是拥立神宗七子桂王朱常瀛。这位王爷最初封衡州，于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就藩。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后，他便携子朱由楥、朱由榔逃往广西梧州。就这样，虽然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必须要抓紧时间议立新帝，但却是对于帝位属谁而始终论战不决。

尽管福王是为第一顺位，但史可法谓其“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而东林党首钱谦益等，称其“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事实上，按照《明季南略》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从“怀庆府夜变，帝（朱由崧）同母出走东门，弃母兵间”来看，其的确不是太适合为皇帝。

然而，福王却在宦官卢九德的帮助下，得到了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以及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于是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立福王，议遂定以福王继统，告庙并修武英殿。此后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甲申，南京礼部率百司迎福王于仪征。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乙酉，朱由崧至浦口，魏国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翌日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四月三十日丁亥，南京百官迎见朱由崧于龙江关舟中，请其为监国。朱由崧身穿角巾葛衣，坐于卧榻之上，推说自己未携宫眷一人，准备避难浙东。众臣力劝，朱由崧乃同意暂留南京。

五月初一戊子，朱由崧骑马自三山门环城而东，拜谒孝陵和懿文太子陵，随后经朝阳门入东华门，谒奉先殿，出西华门，以南京内守备府为行宫。五月初二，群臣至行宫劝进，朱由崧以太子及定王、永王不知下落，且瑞王、惠王、桂王均为叔父行，应择贤迎立。诸臣再三劝进，乃依明代宗故事监国。五月初三庚寅，自大明门入大内，至武英殿行监国礼，监国于南京，是日，吴三桂引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入

北京。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壬寅，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其国号依旧为“大明”，史称“南明”。

最初的时候，弘光朝试图以“联虏平寇”为策略，谋求与清军连合，一起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上“陈恢复大计”疏，称“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于是次日，弘光帝即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5万两、漕米10万石，差官赍送。而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的敕谕由大学士王铎起草。此外，史可法也在六月间上疏道：“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又有左都御史刘宗周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由此可见，在当时南明所持有的政策便是“联虏平寇”，也就是同吴三桂合谋，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但当南明朝廷忙着作此打算的时候，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却是上疏，指出了此举不可为，他在奏疏中称“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故而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如今形势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睨长江。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而当国大臣仓皇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并说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成，噬脐何及？”

此外，还有给事中马嘉植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又有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在弘光帝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的集议后，感到当国者“求好太急”，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陈子龙说：“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并建议：“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傒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

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然而，无论是章正宸，还是陈子龙，又或者马嘉植，他们的建议并没有人听，弘光帝登上帝位，本身所依靠的就是联络四镇，而四镇既以“定策”封爵，故而已无进取之心，此时只求“借虏平寇”。当这种于一味株守江南的心态在南明小朝廷内蔓延时，大清却是廷以代明“复仇”为名，开始实施灭明之策，南明小朝廷有心于偏安江左，但清兵却是显然不给他们以机会。

而在此时，张献忠在川中登基称帝。自从十二年，再举义旗后，张献忠便是迅速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其先与罗汝才合兵，在房县西之罗猴山设伏，大败明总兵左良玉，致熊文灿被革职处死。十四年初，采取以走致敌之策，于开县黄侯城大败明总兵猛如虎，挥师出川。此后利用截获的明军文书、军符，奇袭重镇襄阳，执杀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与罗汝才分裂后，同明军战于河南信阳受挫，转入英山、霍山，与农民军首领革里眼、左金王合兵。十五年，借明降将孔廷训之力，轻取舒城，设立政权机构，任命乡绅为官。随后，遣游民、士卒乔装商贾、学士潜入庐州城。亲率轻骑半夜临城，点火为号，内外夹攻，一举破城，俘杀知府郑履祥，全歼守城明军。乘势克巢县（今巢湖市）、庐江、无为诸地。在巢湖大治舟舰，招募水手，训练水师，提高将士在南方作战能力。后与农民军首领老回回合兵，以56营之众，水、陆两路汇集皖口，佯称渡江攻南京，致江南大震，趁机北走袭破六安，继于夹山败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

移师潜山休整，遭明军偷袭，连夜入湖广。十六年，克蕲州、黄州，称西王。沿江而上，破汉阳。遣师绕道鸭蛋洲渡江，于五月二十九攻占武昌，执杀楚王朱华奎。此后，改武昌为京城，称大西王，建署命官，开科取士，免征赈民，得民众拥护。岁尾，与脱离李自成的老回回合兵荆州，兵势日众。

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率步骑水军40万溯长江而上，横陈数十里，再次入川。攻克佛图关，进围重庆，凿城墙，置火药，爆破进城。旋多路进兵，直逼成都，遣使招降未果，遂发炮轰城，挖墙纵火，于八月初九攻破成都。十一月十六，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建立中央机构、地方政权、军事组织，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

相较于建都于成都的大西，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正为入关之后的清军所追击。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而此时多尔衮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击李自成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蕲侯谷英兵败阵亡，随后五月初二，在定州清水河，李自成再次大败，果毅将军谷可成战死，副统帅左光先重伤。

这个左光先在《明史》中只有寥寥三十几个字的小传，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中，左光先传略附在唐通传之后，是这样记述的："光先，枭将也，与贼角陕西，功最多。自辽左遣还，废不用。后闻广恩从贼，亦诣贼降。"这里面的"贼"指的是李自成，"广恩"指的是先为明将、后叛变归顺李自成的白广恩。崇祯七年时，高迎祥、李自成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并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40余日，洪承畴檄传总兵左光先与贺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崇祯九年，左光先再次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明史》记载说："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但在李自成大破孙传庭，进逼西安之后，左光先选择了归降自己的老对手，史载"冬十月，自成陷潼关……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行后皆降"。

此时，李自成撤出北京时，以两员大将殿后，一个是谷可成，还有一个则是左光先，此时两员大将一阵亡、一重伤，可见大顺军的情况有多不妙了。此后，吴三桂部与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农民军的北部防线，经绥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并于潼关设重兵防守，以阻止清军西进，确保西安。

然而就在途中，丞相牛金星却谗杀大将李岩，致使大顺军军心涣散。史载，牛金星幼有教养，20余岁中秀才，天启七年（1627）中举人，为人质朴，性喜读书，通晓天官、凤角及孙、吴兵法。陂北里有田，平日设馆授徒，过着仅足衣食的生活。崇祯十三年冬，经过李岩引荐入李自成幕下，因其建议"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于是颇为李自成倚重，李自成建大顺政权时，以其为天祐殿大学士，此后其又荐举军师宋献策，然而牛金星心胸狭窄，大军破北京后，牛金星与李岩矛盾激化。

李岩，原名李信，其乃是阉党尚书李精白的养子，天启丁卯年举人。崇祯九年饥荒久旱，李信为饥民进言县令，要求停征税粮、可惜不被采纳，李信只好自己捐出200多石的米粮赈灾。反被指私散家财，买众心以谋不轨，被诬下狱。饥民因而

集众杀县令劫狱。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轻骑走河南，李信在堂弟李牟的介绍下归降李自成，李自成赐名为岩。自入闯军后，李岩就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赋，编童谣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时河南饥民如大旱之望云霓，“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一时士气大振，所向披靡。后李自成进京后，军纪大坏，不用李岩建言以安抚前明官绅，招致根基难固。定州清水河之后，谣传说河南全境皆降于明军。李自成大惊失色，同部下商议对策。李岩主动请缨，愿意亲率两万精兵，赶到中州，附近的郡县一定不敢再轻举妄动，就是有敢暴乱者，也能及早平定。结果牛金星却向闯王进言“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诛之”，于是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设酒诱而杀之，其弟弟李年同时被擒杀。军师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刘宗敏怒曰“彼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大顺军将相离心。

就在李自成败退西安的同时，崇祯十七年六月，热衷于“联虏平寇”的南明决议和大清和谈。六月初三，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三日，陈洪范入朝。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七月初五，“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 组成了北使团北上和满清和谈。

从规模上来说，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了左懋第为正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为副使外，还有其他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以及3000卫军，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这次出使所打着的旗号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但实际上却是南明谋求与吴三桂结盟，并期望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十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

但这次和谈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当年十月，使团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此后，被安排入住外国使臣进贡大清时所住宿的会同四夷馆。而当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抗议之后，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臣则避而不见。

之所以清廷会如此次态度专横，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在左懋第等人离开南京，

出发赶往北京时，多尔衮决策讨伐南明、剿灭“流寇”，一统天下。

这份计划是原明朝御史柳寅东所提出的，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于是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夺取西安，而另一路则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就当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并采取行动了。

就在清军开始南下时，左懋第面见了内院刚陵，并要求允许师团为崇祯帝举行葬礼，但南明的要求为刚陵断然地拒绝，清人明确表示，大清已得天命，故而是不会接受赎金退回辽东的。随即多尔衮招降左懋第等，不过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的左懋第，却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大概是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使团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于是左懋第得以离开北京南下。可结果陈洪范不愿南归，其得知谈判失败后，居然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称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于是多尔衮立即派出轻骑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将之截住。虽然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再被勒令投清后，左懋第再次拒绝，随后被处死，而马绍愉则降清，至于陈洪范，其“获释南归”，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之后，成为了清人在南京的密探。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清朝以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自山东首先发起攻势，以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此后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海州，并进逼宿迁，包围邳州，但为刘肇基所率南明军击败，而与此同时，多铎亲自率领的主力则在离开郑州后，向开封西面的黄河渡口孟津挺进，并以图赖率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

不过就当清廷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吴三桂、尚可喜等降清汉将，率3万兵马由北路入陕，途中又尽调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兵力达8万大军，准备先进攻陕北，然后南下西安，灭大顺，后又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率兵2万南下，收取江南，李自成并没有坐以待毙，在清廷调兵遣将之时，大顺军2万兵马于十月十二日由山西垣曲东下河南怀庆，连续攻克济源、孟县，进攻怀庆府城沁阳。摄政王多尔衮闻报，立即改变进军南京的计划，命多铎部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同阿济格夹攻西安。多铎所部清军进抵怀庆后，大顺军不敌，主动撤退。十二月，多铎部由孟津渡过黄河，连破洛阳、灵宝等地，二十二

日进抵潼关20里外立营，以等候红衣炮。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面对清军兵临潼关的状况，李自成军列阵迎战，而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顺军于关前据山列阵，清军前锋统领努山、鄂硕等于侧后包抄，护军统领图赖率骑兵百余人由正面进攻，大顺军虽顽强拼战，但仍失利。

次年正月初四，大顺军将领刘芳亮领兵千余，偷袭清营，被清军击败。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又被清军击败。初五、初六两日夜间，大顺军连袭清营，俱败。初九，清军的红衣大炮运至，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堵截清军。十一日，清军先用红衣炮轰击，接着大举进攻，相继攻入大顺军阵。大顺军仍顽强奋战，以骑兵300反击，又分兵迂回到清军阵后攻击，俱败。这时，北路清军由阿济格率领，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围榆林，占米脂，主力向西安推进。李自成面临清军两路夹攻，被迫率主力撤回西安。十二日，清护军统领尼堪等领兵占潼关，大顺潼关守将马世尧率所部7000众降。与此同时，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而李自成面对清军两路重兵合击的情况，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采取避战的方式流窜，经邓州、襄阳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但在四月间，李自成入武昌后，再为清军所击败，大将刘宗敏率部在武昌之战突围中被清军俘获。因拒不投降，被清军用弓弦勒死。

是年五月，李自成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通山县六都源口寨乡勇头目程九伯所杀，尸首不知何处。其后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关于李自成的死亡，历史上有很多记载，有自缢说，《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二年闰六月阿济格奏：“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又有战死之说，《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

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

此外，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又有《烈皇小识》卷八附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隆武元年的奏疏中说：“天意亡闯，以28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张鼐），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纯）、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

此外，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则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入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但不管怎么样，李自成的确是死了，他的大顺政权也在西安陷落后瓦解，而此时，自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三月，清军已经开始南下全面进讨南明，就在多尔衮命多铎移师南征之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

弘光帝即位后，于六月戊午追封祖母郑贵妃为孝宁太皇太后，父福恭王朱常洵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改谥孝皇帝），立庙于南京，墓园称熙陵。上嫡母邹氏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生母姚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符天笃圣皇太后。追封洛阳城陷时遇害的胞弟颖上王朱由榘为颍王，谥曰冲。六月辛酉，上崇祯帝庙号为

思宗，谥号烈皇帝。七月己丑，追复懿文太子帝号，追崇建文帝、景泰帝庙号谥号。崇祯十七年九月初三，弘光帝又下令为北京殉难诸臣上谥号，计文臣21人、勋臣2人、戚臣1人。随后又给郢国公冯国用、宋国公冯胜、济国公丁德兴、德庆侯廖永忠、长兴侯耿炳文等开国功臣追上谥号；给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陈迪、景清、卓敬、练子宁等建文朝死难诸臣，蒋钦、陆震等正德朝死谏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等天启朝死难诸臣上谥号。

但史载朱由崧生性暗弱，耽溺于酒色声妓，其登基之后，下令选淑女入宫，派宦官于南京城中四出搜巷，凡是有女之家，必以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南京城中骚动。朱由崧又下令修西宫西一路为慈禧殿，以安置继母邹太后。当年八月邹太后自河南至南京，八月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八月十六日，御用监又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越数十万两。此后又为造皇后冠，而命内臣采购猫儿眼、祖母绿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崇祯十七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皇兄吗？”弘光帝不应，继而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弘光元年（1645）正月，弘光帝又下令修南京奉先殿、午门及左右掖门，并派太监田成至杭州、嘉兴二府选淑女。

忙于享乐的弘光帝自然不会处理什么朝政了，于是政事悉委于马士英、阮大铖。

马士英，本姓李，五岁时，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收养）。万历四十七年，马士英中试己未科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崇祯三年，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升宣府巡抚，不久因贿赂权贵被太监王坤举发削职，寓居南京。马士英闲居南京时与阮大铖交厚，更因阮之力复出担任凤阳总督一职，结下了与阉党的深厚关系。

由于拥立弘光帝有功，马士英被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加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其余高杰、黄得功等人亦因为实际拥有兵权而加官晋爵，统领江北地区的军备防务。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与复社人士也因此失势，史可法乃自请督师，前往扬州统筹守务，然而高、黄、刘等武将却各自只为巩固自身势力，与史可法未能配合。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蟋蟀相公》条称：“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积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

此后，马士英又推荐了在“魏忠贤逆案”中被定罪的阮大铖任官，由此使得复社人士相当不满，借此攻击马士英为奸佞，两方争执不下，党争由此而起。阮大铖乃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年间官给事中，因与左光斗同乡，起初偏向东林党，《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水浒传中的“没遮拦”穆弘。后因东林党赵南星等人阻碍他升官，遂转而依附魏忠贤，造《百官图》攻击东林党人。崇祯二年，以阿附魏忠贤列于逆案，废居回乡。崇祯十一年，阮大铖在金陵倡立群社以图拉拢名流，此番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官至兵部尚书，自然使得复社众人不满了。

此后，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更是使得东林党人、复社众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就在这个时候，南明继续发生了三起大案。其一为“大悲案”。

所谓“大悲案”的引发者是僧人大悲，其俗家姓朱，徽州人，跟潞王朱常淓相识。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大悲来到南京水西门外，自称是明朝亲王，崇祯时封为齐王，又改封定王，并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于是下诏，将大悲下狱又传谕戎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与蔡忠“三堂会审”，严加刑讯，大悲在供词中提到东林领袖钱谦益。

崇祯十七年初，钱谦益被崇祯帝总督浙江和南直隶并控扼海道，从而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形成鼎足而立之势，但因“甲申之变”而不果。此后钱谦益谋划推举潞王继位为帝，但最终不成，福王朱由崧继位，马士英出任内阁首辅后，钱谦益惧祸，遂阿附马士英，并推荐蔡奕琛、祁逢吉、唐世济、邹之麟、陶崇道、郭昭封等人。于是马士英遂任命钱谦益任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并担任经筵讲官。

这番牵连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试图将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牵连其中，但大悲抵死不从，而马士英亦不愿牵涉过广，遂将大悲绑赴西市问斩，此事不了了之。

此后，又有太子案发生，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萁秘奏：太子朱慈烺出现在浙江。三月初一，弘光帝令太监李继周往浙江一探究竟，并将他带回安置在太平门内的兴善寺。此后弘光帝又派两名太监前去辨识，两宦官见到太子，抱头恸哭，解下衣衫为储君御寒，随即如实飞报弘光帝。弘光帝大怒：“真假未辩，何得便尔。”遂杀两太监，继而又杀李继周。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觉得太子是假，前太子讲官王铎则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此时文武百官

纷纷赶赴兴善寺，“踊跃趋谒”，朱由崧只得将太子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太子遭禁，掀起了轩然大波。此后，弘光帝命百官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终裁断为伪太子王之明，于是“南京士民”皆“哗然不平”。江防督抚袁继咸、广昌伯刘良佐等大臣上疏抗争。而宁南泊左良玉甚至起兵东下，声称“清君侧”。

当时马士英、阮大铖二人每日以卖官鬻爵、报撼私仇为事，加上朝内党争，于是南明政事萎靡，故而爆发太子案时，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当即乃举兵于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而下，马士英认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载，“四月初一，左良玉至九江，已是久病之躯。初四，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袁责以大义，良玉疾甚，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而死。其子左梦庚拘禁袁继咸，引兵东下，直通鸠州太平府，弘光元年五月十三日，左梦庚率部投降清军阿济格部。袁继咸为清兵所执，不屈，被斩杀。”

就在太子案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又有一位童氏女子逃至南京，自称为福王朱由崧之元配正妃，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结果弘光皇帝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三月初一，童氏送抵南京，皇帝拒不召见，交付锦衣卫监候，令都督冯可宗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则怒斥曰：“朕元妃黄氏，先帝时册封，不幸早逝；继妃李氏，又死于难。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知之？童氏冒诈朕妃，朕初为郡王，何东西二宫之有？且称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冯可宗因此被撤，改由屈尚忠审理，对童氏严刑拷打，不久死于狱中，此案哗然一时。

其实无论是童妃案，还是大悲案、太子案，其背后皆是马士英与复社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如清人戴名世所写的那样“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就当左良玉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而下，马士英以黄得功、阮大铖率兵

御之，南明发生内讧之时，清军却在豫王多铎率领下大举南下，攻陷归德、颍州、太和、泗州等地。此后，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而史可法时在扬州虽有督师之名，却实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中，清军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一时间，苟延残喘于江南的南明江山陷入危机之中。

自从弘光帝登基之后，史可法便是自请督师江北，外出镇守淮、阳两地，于是皇帝加封其为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后，他前往扬州统筹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督师江北的史可法设淮安、扬州、泗州、庐州四镇，也就是：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同时以扬州为一路，但此举显然是个败笔，正如张岱所说的那样："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畿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早在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就曾经上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识者惜之。"但史可法却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很显然，史可法这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弘光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正如翰林院官杨士聪所说的那样："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岂遂为虏有乎？"

其实南明不去收复失地也就算了，四镇官兵反而频频骚扰山东、河南。譬如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反而在八月底，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1000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并在曹县"杀死乡官十七家、百姓无算"。九月初三，方才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

安。不过客观上讲，在当时史可法根本无力管束四镇，黄宗羲曾经说过："马士英既借四镇以迎立，四镇遂为士英所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

弘光元年初，史可法倒是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河南，意图协助清军讨伐李自成。高杰为南明江北四镇中兵力最强者，故而最受史可法器重。但高杰性气乖张，难以节制，抢掠焚杀，素为江南士绅不喜，甚至指责高杰所部"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但其实此人却颇是忠心于史可法，而且面对肃亲王豪格"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也是断然拒绝。于是才被史可法安排驻兵泗州，此番北上，其负责开封、归德一路招讨，冒大雪，沿黄河筑墙，并约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但许定国早已暗降清廷，并送二子许尔安、许尔吉渡河为人质。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兵部尚书袁可立府第大摆筵席，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参政袁枢等接风洗尘。越其杰疑有诈，高杰却不以为意。正月十二日，高杰率300名亲兵至营中，十三日夜，许定国设宴召妓，把高杰灌醉，一刀砍下头颅，持首级北渡黄河，向豪格报功。

高杰死后，其部大乱，而黄得功又想借机吞并高部。于是闻讯大哭。"中原不可复为矣"的史可法决定亲自前往善后，其立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兴平世子，并任命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统领高杰所部，同时任命胡茂顺为中军提督，李成栋为徐州总兵。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高杰遗孀邢氏以子年幼，想让史可法收高元照为义子，史可法以其为流贼出身而拒之，然而却命高元照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弘光元年四月，左良玉率数10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时，史可法一度移军驻泗州，保护明祖陵，但马士英竟使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此后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不久呕血身亡，全军降清。于是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已然降清，泗州亦是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在豫亲王多铎的指挥下，开始进击扬州，由于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氏部属，于是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乃至于大小船只为之一空。此后，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一边组织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结果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当清军初至时，刘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

高皇帝陵侧。”并有遗书给弘光帝，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二十一日，总兵官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投降清军，史可法也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这使得城中力量更加单薄。此后，面对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副将史德威随可法有年，可法纳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俘。

此后，多铎劝降他：“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而后被杀，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死于此战。

不过关于扬州之战，《明季南略》却有不同记载，称 “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又有“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缒城潜去’之说非也。更闻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扬，见公生祠谥为‘清惠’，父老犹思慕焉。忆顺治六年仲冬，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居于扬；问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颠末。’初，扬人畏高杰淫掠，乡民避入城；后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许，遂居于城”。又，“大清或令一、二火卒侦伺，守兵获之，则皆欢呼请赏，可法赐以银牌；殊不知大清兵甚众。可法日夜待黄得功至；围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报曰：‘黄爷兵到’。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开门迎入。及进城，猝起杀人，知为大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不知所为；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终”这样的说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清军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大肆屠杀，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五天后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

集和焚烧尸体。

而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在其所著《鞑靼战纪》一书中，也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就在扬州陷落的同时，弘光帝却在南京贡院选淑女，70人中选中一人，即阮大铖的侄女。此后，杭州送来淑女50人，弘光帝选中周姓一人，王姓一人。但仅仅数日之后，传来了清军攻破扬州的消息，于是弘光帝召对大臣们寻求解决之道。马士英主张迁都贵阳，但钱谦益等力言不可，乃罢。史载，清军渡江之前，弘光帝召对讲官，有人称“胡马畏暑，必不渡江”，可结果却是弘光元年五月初八己丑，清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巡抚杨文骢逃奔苏州，靖虏伯郑鸿逵逃入东海，总兵蒋云台投降。



听闻清军渡江之后，南京闭城门。五月初十辛卯，弘光帝传旨放归所选淑女，当天午夜尤召梨园入宫演剧。翌日凌晨二漏时，弘光帝率内官四五十人骑马出通济门，莫知所踪。天亮后百官入朝，见宫女、内臣、优伶杂沓逃奔西华门外，方知弘光帝已出逃。于是南京城内大哗，马士英携邹太后出奔，百姓救北来太子出狱，扶其入宫，在武英殿即位。五月十二日癸巳，弘光帝至太平府，以按察院为行宫，寻即移驾芜湖，投奔靖国公黄得功营中。

五月十四日，尚书钱谦益令人传语，“宜速往浙中择主拥戴，以图兴复”，又写了密信给时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意在拥戴”。但五月十五日，钱谦益与大学士王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都御史唐世济等人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豫亲王多铎迎降，于是清军进入南京。

据载，当时降清诸臣向多铎献礼，甚至有人一下子拿出数万两白银的现金，但钱谦益“独致礼甚薄”，于是多铎命令钱谦益带两名清朝官员和500名骑兵清理明宫，在皇城正门的洪武门前，钱谦益忽然跪下四拜，余人都很惊讶，钱谦益解释说：“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能无痛心？”

但也就是这个钱谦益在清军兵临城下，弘光帝出狩时，面对爱妾柳如是提出的“投水殉国”建议时，却以手探水说：“水太冷了，怎么办？”于是柳如是奋身想跳入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此后钱谦益又告诉众人说：“事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耳！”同时还是这个钱谦益，在降清之后，为清人作檄文传谕四方招降，还对多铎建言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

在暂居南京之后，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五月二十二日癸卯，总兵田雄、马得功、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将其献给清军。于是豫王多铎命去锁链，以红绳捆绑。史载，五月二十五日丙午，朱由崧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头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扇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命其居于北来太子之下。宴罢，拘弘光帝于江宁县署。

南京失陷，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杭州后，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等商量请时在杭州的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邹太后（弘光帝朱

由崧嫡母）命朱常淓监国，懿旨曰：“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于是六月初八，朱常淓监称监国于杭州。次日，黄道周建议朱常淓在十日内即位称帝，但朱常淓却听从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与清军和谈。



钱谦益

弘光元年六月十一日，清军逼近杭州，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等均各自逃

命，而陈洪范回到杭州与张秉贞等劝潞王勿战，郊迎清兵，开城投降。楚王朱华堞闻讯劝说潞王："国祚悯凶，至于此极。抚膺北睇，何以为生？以殿下之贤，远近所闻，天下绝智殊力，方将凭附以起。周之孙子，能无眷然，宋人半壁，亦尝有年。况闽、粤、滇、蜀，延袤万里，犹吾故物。失今不为，时事一去，万事不复。他日求尺寸地为死所，岂可得哉？"朱常淓对曰："公休矣！吾非其才。此百姓之心已不可挽任，吾谁与为之？"朱华堞作色曰："殿下何悖！朱家子孙谢勿力，彼何望而不跂向他氏？果提三尺剑，誓与国共存亡，则孱弱可起，况乎皆衣食吾祖者耶！"朱常淓又推脱说"营兵恐不任用，钱谷必不给。吾为此，不失为知几"。朱华堞泣而告曰："今国安并数万屯西郊，方请命，而鸿达溃卒尚可集，发布政司存金，益以盐运司所贮，无烦征比。此五营额兵，出东义皆健，又招募良人，当一日至，线索在手控纵间耳。"朱常淓终不听，朱华堞拂袖而起，裂冠带掷地而去。弘光元年六月十三日，朱常淓开城降清。

而就在朱常淓监国于杭州的同时，又有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抚州的益王朱慈炲、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等监国政权先后建立，其中唐王朱聿键受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登极称帝，改元隆武，是为明绍宗。

朱聿键为明太祖第23子唐定王朱桱的后裔，系太祖九世孙。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丙申生于南阳唐王府，母妃毛氏。其祖父唐端王朱硕熿惑于嬖妾，不喜爱朱聿键的父亲世子朱器墭，把朱器墭父子一起囚禁在承奉司内，欲立爱子。后朱器墭于崇祯二年被毒死，朱硕熿讳言其事，但经守道陈奇瑜奏请，朱聿键被明廷立为唐世孙，不再被囚禁，同年朱硕熿也死。崇祯五年（1632）朱聿键继为唐王，封地南阳。崇祯帝赐其《皇明祖训》《大明会典》《四书》《五经》《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纲目》《孝经》《忠经》等书。朱聿键遂在王府内起高明楼，延请四方名士。



隆武帝

崇祯九年七月初一，朱聿键杖杀其两位叔父福山王朱器�季、安阳王朱器埈，为其父当年被毒死一事报仇。当年八月，清兵入塞，克宝坻，直逼北京，京师戒严。朱聿键上疏请勤王，不许。乃自率护军千人北上勤王。行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上奏，崇祯帝勒令其返回，后朱聿键因与农民军相遇交锋，两名太监被杀，乃班师回南阳。冬十一月下部议，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高墙。崇祯帝改封其弟朱聿𨱇为唐王。

朱聿键在高墙内被圈禁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后凤阳巡抚路振飞入高墙见之，向崇祯帝上疏陈高墙监吏凌虐宗室之状，请加恩于宗室，于是崇祯帝乃下旨杀欺凌唐王之太监石应诏。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南阳，杀朱聿𨱇。

此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年号弘光，实行大赦。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下，囚于凤阳的朱聿键也被释，并封为南阳王。南京礼部请恢复唐王故爵，弘光帝不允，并令朱聿键迁至广西平乐，但朱聿键贫病不能行。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朱聿键赴平乐途中，在苏州闻清军已破南京，遂至嘉兴避难。六月辛酉，朱聿键至杭州，遇潞王朱常淓，奏请其监国，不听；请朝陈方略，亦不允。当时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户部郎中苏观生至杭

州，与朱聿键谈及国难，泣下沾襟。此后，朱聿键由郑鸿逵护送，前往福建。途中在浙江衢州闻得潞王朱常淓已在杭州降清，于是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商议奉朱聿键为监国。六月二十八日，朱聿键在福建建宁称监国。闰六月初七，朱聿键至福州，以南安伯府为行宫。随后，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宣布从七月初一起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改行在福州府为天兴府，改布政司为行殿，建行在太庙、社稷及唐国宗庙。升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何吾驺为首辅，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朱继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樱为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黄鸣俊、李光春、苏观生等人为礼、兵各部左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上高曾祖父四代帝号，高祖唐敬王朱宇温为惠皇帝，曾祖唐顺王朱宙栐为顺皇帝，祖父唐端王朱硕熿为端皇帝，父唐裕王（追封）朱器墭为宣皇帝。四代祖妣皆追封皇后。封弟朱聿𨮁为唐王，封国南宁；升叔德安王朱器为邓王；追封弟朱聿鏻为陈王，子朱琳渼为陈王世子。遥上弘光帝尊号“圣安皇帝”。隆武元年七月，下令将嘉靖年间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殿之名恢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各衙门前加“行在”二字。

当时，在绍兴还有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小朝廷，亦自称“监国”。清军攻绍兴，朱以海派使者前来福州向朱聿键求援兵。信上称朱聿键为“皇伯叔”，而未称“陛下”，于是朱聿键怒，令杀鲁王信使。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将博雒贝勒率兵征浙、闽。七月，清兵陷金华。八月，陷建宁、过仙霞关，一路势如破竹，武毅伯施天福、武功伯陈秀、靖安伯郭熺尽皆降清，郑芝龙亦向清军投降，南明巡抚杨廷清、李暄等皆死，就在郑芝龙降清之后，隆武帝率宫嫔自延平出狩，欲逃往江西避难。八月庚申至汀州，以府署为行宫。八月二十一日，有清军83骑伪装成明军叩城，守城兵士遂开汀州丽春门。骑兵突袭行宫，杀福清伯周之藩、总兵王凉武等人。史载，“当时隆武帝正腹饥，命内官市二汤圆以进，方举箸，清兵发矢，隆武帝后背中箭，崩，年四十五。后为百姓殓葬于罗汉岭。”不过另有说法称隆武帝被俘后不食而死，或称崩于福京天兴府，或称崩于建宁。此后南明总兵姜正希乘夜袭击汀州，被清军击败，死万余人。固山额真韩岱于分水关击败南明总兵师福，入崇安县，抚定兴化、漳州、泉州三府。至十一月，福建悉平。

正当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覆亡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开始于南明联合抗清。

自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后，大顺军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而这时，清军开始将主力用于平定陕川，以图消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当初张献忠攻破成都，巡抚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皆死。其后，张献忠在成都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并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同时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此外，张献忠开科取士，选拔30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又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120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12，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19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16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15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20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然而，此时四川各地的明军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军，并杀大西官员，于是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结果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此后其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并守之。

此后，张献忠对其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于是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然而此时他却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3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顺治二年夏，清军渡江占南京，南明弘光朝廷权灭亡。十一月，清廷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其归顺大清，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此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由于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而此时，大西军主要是和明军在川中作战，南明以原大学士王

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后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史载，“起甘良臣为总督，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

与此同时，顺治三年（1646）初，清廷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人开始征剿陕川。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所部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东下。而北面的清军则在平定陕西之后，经汉中，命鳌拜急行军，偷袭贺珍，于是孙守法、王光恩、武大定、贺珍等溃败。当年七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并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于是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史载，在张献忠屠四川时，其部将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结果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当年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与刘进忠向川北进攻，鳌拜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二十七日晨，与张献忠隔太阳溪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史载此战，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中箭而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此后，豪格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茂州、荣昌、隆

昌、富顺、内江、夔州及贵州之遵义诸县。顺治五年二月，四川略定，豪格乃班师。

当初，福京天兴府陷落，阳曲王朱敏渡、松滋王朱演汉、翼城王朱弘橺、奉新王朱常涟尽皆遇害时，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和隆武朝的官员逃到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而其他南明势力则在肇庆府推举明神宗之孙、明思宗堂弟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同年十月十六日，江西赣州失守后，朱由榔政权大惊，于十月二十一日仓皇从肇庆逃往广西梧州。于是，侍郎苏观生联同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拥立朱聿为监国，以都司署为行宫。隆武二年十一月五日，41岁的朱聿，按兄终弟及的皇明祖训，继位称帝，以明年为绍武元年，是为明文宗。苏观生因拥戴有功，被任命为首辅，封建明伯，掌兵部。由于朱聿仓促称帝，登基时的龙袍与百官官服都要假借于粤剧伶人的戏服。

而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朱由榔乃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朱常瀛为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阳，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病死于梧州后，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承嗣位。可就在隆武称帝后，病重，于是朱由榔被封桂王，并在隆武被俘后，于当年十月称监国于广东肇庆。十一月初八，绍武称帝的消息传到梧州后，出逃梧州的朱由榔也于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正式称帝年号永历，是为明昭宗，史称永历帝。曾道唯、顾元镜、王应华等人尽皆入阁。但这样一来，广州和肇庆又成立了两个南明政权：也就是绍武政权、永历政权。

登基不久之后，永历帝立刻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拜见绍武帝，称其为“殿下”，并规劝其取消帝号。首辅苏观生大怒，以大不敬斩彭、陈二人，同时以令陈际泰督师攻打肇庆。十一月二十九日，永历帝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夏四敷率永历军于三水县城西，与绍武军展开内战，并将绍武军击退。于是苏观生再令广东总兵林察联同新降的海盗等数万人反击。此战，绍武军大败永历军。大捷消息传到广州，苏观生下令广州张灯结彩粉饰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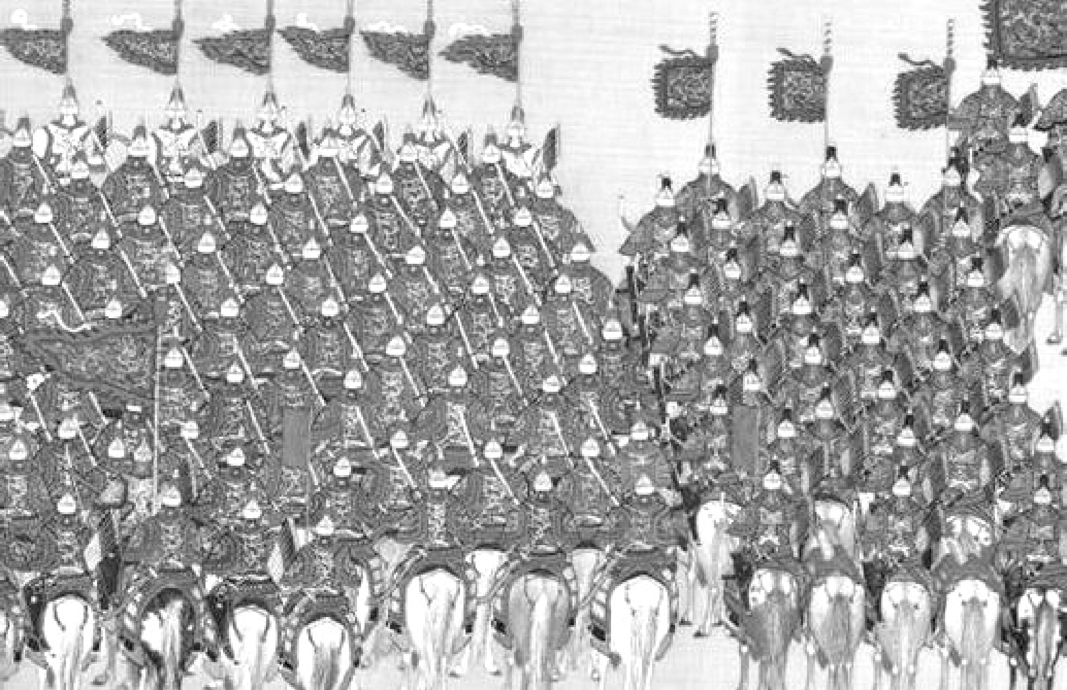
可正当绍武、永历二帝自相残杀之时，由佟养甲、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取潮州、惠州，兵临广州。十二月十五日，绍武帝幸武学，百官聚集，而此时，清兵已经偷偷兵临城下，内应脱去头上的伪装，露出辫子。有人向苏观生报告，反遭斩首。苏观生说：“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不久，清军压境的情况得到证实，于是苏观生遂率领大军初战，与清兵激战一昼夜，清兵本有撤退

之意，但内奸谢尚政旋引清兵入城，广州即陷落。苏观生见大势已去，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个大字后，自缢死亡。已易服的绍武帝，打算逃走，但被追骑赶上抓获，囚于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来饮食，绍武帝拒绝，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后自缢而殉国。此后，绍武朝的主要官员何吾驺、王应华、顾元镜等降清，而广州内的24个明朝藩王则全数被杀。

绍武政权仅存在四十余天就覆灭，于是南明唯剩永历一帝，不过此时还有揭阳的益王朱由榛、夔州的楚王朱容藩称监国。而也就在这一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四月九日，因为有人向清摄政王多尔衮出首，称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荆王欲起兵。五月甲子，弘光帝朱由崧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烇、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椒等17人被斩首于菜市口（一说弘光帝以弓弦勒毙）。

与此同时，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南明的残余势力。其中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率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此危难时刻，大顺军余部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毅然与明军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此外，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军。

与此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譬如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广西耿献忠与杨有光、姜瓖、王得仁等，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八旗军正蓝旗军阵

李成栋原为李闯军高杰下属，号“李诃子”，随高杰降明，官至总兵，守徐州。顺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成栋率所部降清。随贝勒博洛攻福建，授广东提督。至扬州，曾指挥嘉定三屠，大肆劫掠屠戮，从此“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是年十一月，授吴淞总兵。顺治四年正月，李成栋陷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奔桂林。李成栋认为自己对清廷有大功，却仅授以提督，受总督佟养甲节制，内心不快。陈子壮之妾张玉乔被李成栋纳为内宠，常思反清复明，不久自刎。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劝他反清，袁彭年知成栋不快，“稍稍以辞色挑之”。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初，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举事反清，李成栋本身亦对清廷不满，于同年四月在广州发动兵变反正，归附南明永历政权，封广昌侯，又授惠国公。李成栋反正后，颇能尊重南明朝廷。此后，李成栋集结洞蛮土著，号百万人。先后三次进攻江西赣州，其中永历二年七月，李成栋率兵三万第一次出南雄，攻赣州，救援南昌。赣州守将高进库诈降，高进库言至秋天如清军援军不至，就输款投降，成栋竟信以为真，致使战机怠误，坐视南昌受困。是年九月下旬第二次进攻赣州，被江西巡抚刘武元夜间遣死士缒城出击，又分兵东、西、南三门击败之。李成栋策马先奔，士卒争相渡河逃命，溺死者以万计，明军元气大伤。李成栋被迫撤军南安，返回广

州。

永历三年（1649）正月，李成栋第三次率军北上南雄，进攻赣州，得到金声桓、王得仁覆败的消息，声势遂挫，二月二十九日为清军所败，退入信丰城中。一日，李成栋坐城楼上，部将杜永和请退师，李命左右取酒痛饮，举觥投地说："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且筑坛欲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且朒缩返，何面目见天子耶！"三月初一，清军开始攻城。明军溃败，成栋与数骑出逃，在渡外跳江时溺死。南明朝廷封谥号为忠烈，封宁夏王。

姜瓖，据《朔州志》载，姜家世代皆明将，长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姜瓖任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顺政权。同年四月，清将恭顺侯吴顺华率兵进攻大同。六月初六，姜瓖杀大顺军守将张天琳，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后随阿济格进兵征伐山西、陕西，封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冬，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后，遂十二月初三于大同起义归南明，随后姜瓖连陷旁近府县，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其附近11城皆叛，以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遣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到达大同城下，进行围剿，同时清军又对姜瓖进行劝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但为姜瓖所拒绝。多尔衮见招降无效，于是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连同阿济格继续作战。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济格围困大同数月，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将杨振威等人于十月斩杀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叛逆的"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拆除城墙上部五尺。山西战事陆续平息。

王得仁，其是闯王李自成旧部。李自成死后，随白旺降于英亲王阿济格，移师南昌。永历二年（顺治四年，1648），大学士姜曰广诱其反清，遂与金声桓叛清。王得仁在七里街被清军击败，退回南昌，清军将领谭泰乘胜追击，七月初十包围南昌，"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王得仁派人向何腾蛟求救未果。南昌被围八月，"附郭东西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城中缺粮，一石米价高达六百两，曾有兵士试图投降，俱被杀。围城八月，清军同样损失巨大，觉罗顾纳岱战死。由于城中缺粮，兵士饥肠辘辘，几乎无力作战，此后清军登墙入城。王得仁力战不敌，后被俘杀。史载，"突围至德胜门，兵塞不能前，三

出三入，击杀数百人，被执，肢解”。临刑前，谭泰问得仁为何叛清，得仁回答：“一念之差”。

金声桓，早年是辽东人，世袭军户，隶属杨嗣昌诸营。清人陷辽东，声桓全家被俘，只身入关，成为明总兵黄龙裨将，后投左良玉军中。左良玉死，随其子左梦庚降清，任江西总兵，驻守南昌，攻拔吉安及赣州，逼杀杨廷麟，以功改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因愤清廷封赏太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胁迫其钱财，“索馈遗、索金珠至再至三”又反。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闰三月，金声桓与部将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并邀姜曰广起义，擒杀江西巡抚章于天、清江西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清军撤出湖南。金声桓力攻赣州，久攻不下。不久，清军围攻南昌，金声桓和王得仁派人向何腾蛟求救，但何腾蛟未前往救援。次年城破，正月十九日，蒙古兵登城墙，南昌失守。金声桓身中二箭，投帅府荷花池死，大学士姜曰广亦投水自尽，清军屠南昌。消息报至行在肇庆，永历帝赠榆林王，谥忠武。

接连的反叛使得清廷对于消灭南明之心也更是迫切了。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秋，清军耿仲明、尚可喜率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13家军，其中导致这一连串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譬如，永历朝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而农民军虽然出力较多，但却备受排挤打击，于是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机会。

就在此时，大西军余部孙可望，却是致书南明永历政权，愿与南明联合抗清，自从顺治三年，张献忠死于西充后，其余部便是由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所率，他们自永历元年（1647）应黔国公沐天波之约入滇平定土司叛乱后，又攻克遵义、贵阳，进屯云南，从而据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永历七年（1652），永历帝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于是孙可望移永历帝于贵州安隆，并尽收南明武大定、袁韬、诸军残部，随后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

此番北伐，以李定国统领率东路军东出湖南。李定国十岁从张献忠，史载，其能征善战，喜读《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素称“万人敌”、“小尉迟”。以宽慈著称，攻破城池未尝妄杀，遇士绅百姓必设法保全。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等四

人均为张献忠义子。崇祯十七年（1644），从张献忠破成都，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清军入川，张献忠战死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南走綦江。永历元年（1647），先入贵州，后借云南沙定洲之乱进入云南，当年与孙可望等一同称王，建立政权，可望称平东王，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次年，李定国攻破佴革龙，擒杀沙定洲，平定云南。正是李定国劝说可望："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今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于是永历三年，才有了孙可望遣使与南明永历朝廷商洽共同抗清事宜。永历四年，李定国被永历帝封为西宁王。永历六年，李定国与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随即南明出兵北伐。

其实，早在永历五年四月时，孙可望就曾派冯双礼率兵从贵州攻入湖南。明军攻克沅州后，移兵进攻辰州。结果清军在续顺公沈永忠率领下死守辰州，战事一度胶着。此番李定国率领所部进入湖南后，与冯双礼部会合，随即在五月中旬进攻靖州。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带兵8000前往救援，但清军在靖州陷入明军重重包围。双方交战，清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而明军乘胜攻克靖州、武冈州，取得了靖州大捷的胜利。

靖州大捷之后，沈永忠难以招架，其向在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求援未果后，被迫于六月初二率清军退至长沙。但面对明军攻势，在无法守住长沙的情况下，沈永忠不得不在八月初六又放弃长沙逃到岳州。此时南明朝廷在湖南的抗清局势顿时大为好转，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外，只剩下徐勇一镇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随后李定国南下广西，直趋桂林。永历六年（1652）六月，李定国率军攻克全州，击毙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取得全州大捷的胜利，继而进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但明军一鼓作气，驱使象阵大破清军，取得严关大战的胜利。史载"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当晚孔有德率部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惶惶不可终日。七月初一，孔有德又败，"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蹶，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仅孔有德一人逃回，大西军包围桂林。七月初四，李定国率领明军攻破武胜门，清军抵敌不住，全线溃败，孔有德额头中箭。孔有德自知必死，"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明朝降臣原庆国公陈邦傅、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尽皆被俘虏，仅孔有德之女孔四贞逃脱。

在取得了桂林大捷后，李定国坐镇桂林，派军南下平乐，杀死清府江道周令绪；又收复柳州，俘虏清右江道金汉蕙。定南王藩下残余清军争相逃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八月，李定国乘胜挥师进攻并收复梧州，至此，南明军队收复了广西全省。

李定国率领南明军主力先后取得靖州大捷和桂林大捷的胜利，收复湖南大部及广西全省，清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顺治帝大为震惊。永历六年（1652）七月，顺治帝派敬谨亲王尼堪统率八旗精兵南下进攻湖南。十一月十九日，尼堪率清军抵达湘潭，而明将马进忠见势则率部撤往宝庆。二十二日，清军前进至衡阳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出一部诱敌。

面对明军的后退，尼堪骄横自大，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于是下令清军兼程前进。次日凌晨，清军抵达衡阳，与李定国大军相遇。李定国事先已然埋伏重兵，故而命令诸将士稍作抵抗就全军后撤。于是尼堪率领清军“乘胜”而进，追杀二十余里，忽陷入明军重重埋伏中。此战，主帅尼堪与一等伯程尼在混战中被杀。此后，清军不敢再战，多罗贝勒屯齐率领残余清军退往长沙，不久被清廷革爵处理。

衡阳大捷后，明军尽复湖南，于是李定国使人绘孔有德、尼堪画像，“露布告捷”，一时天下震动，各地明军和义军也纷纷展开反攻，广东北部的安定伯马宝率部收复阳山、连州、连山，江西西部的刘京配合李定国麾下高永贵部收复永新、安福、永宁、龙泉。李定国率领明军取得一连串的大捷，连败清军数十万， 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甚至连顺治帝也叹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更有满清官员称此败乃是“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而对于此战，黄宗羲曾经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第九章　灯灭

南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李定国统兵北方，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湖广捷报频传，“两蹶名王”的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

而就在李定国所率东路大军西出湖广北路出四川的时候，白文选率部直扑重庆，清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李国翰见明军声势浩大，于是与四川巡抚李国英商议后，决定北撤。而明军在收复重庆后，随即派兵追击清军，在距离重庆120里的停溪，将清军包围，并用火器四面围攻，大败之，梅勒章京白含真，并迫使清永宁总兵柏永馥率领残余清军狼狈逃至保宁，明军取得了停溪大捷的胜利。

就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时，然而以国主自居的孙可望的狭隘猜忌心也愈盛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均为张献忠义子，在张献忠麾下时，虽然四人平起平坐，互不相下，但相较之下，但事实上孙可望很受张献忠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此后，张献忠破成都后，李定国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是次于孙可望的。此番李定国名声大震，孙可望觉得自己此后将难以驾驭李定国，于是在妒火中烧之下，孙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李定国。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孙可望率军至沅州，并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此消息为李定国所知，但他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去沅州，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来兴师问罪，而若是去了，则后果会是如何，实在难以想象。犹豫一番之后，李定国为顾全大局起见，还是决定前去。行至紫阳渡口，为刘文秀之子劝阻。史载，李定国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继而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同时继续筹划北伐。

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北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使得明军的实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此后，清军得知孙、李内讧，即以定远大将军屯齐率大军由永州北上宝庆。三月十五日，清军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所驻之周家铺仅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屯于山顶，且地势险要，又遇上雨天，故而双方仅列阵相峙。当天晚上，孙可望统亲军“驾前

军”由宝庆府来援。十七日，明军自山而下，攻向清军大营，而清军则分路迎击，此战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峒江，此后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不过由于此战中清军也损失惨重，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皆死，故而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都彼此难以继续进攻，战事一时陷入僵局。

而与此同时，清军另一路大军则继续尾随追击李定国部，先陷永州，迫使李定国移驻龙虎关。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明军入粤，于是李定国连破开建、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三面围攻肇庆，但由于清军拼死抵抗，围攻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来救，明军被迫撤围退军柳州。洪承畴闻其败，曾派人招降，李定国置之不理。但就在此时，平南王尚可喜所率清军却是趁明军后方空虚之时，夺取梧州和桂林。于是七月十三日，李定国率兵2万进攻桂林，但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此时孙可望却于八月，派冯双礼率兵南下，试图偷袭柳州。结果李定国早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双礼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归顺李定国。

永历八年初，监国于金门的鲁王以定西侯张名振率舟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而郑成功也遣兵直扑崇明，清廷沿海告急。如此形势下，李定国决定再度率兵东征。三月，李定国率领数万大军和13匹战象，连破廉州、雷州，并占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明军进攻高州，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一时间广东遍地反清之旗。

于是李定国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于是他致书郑成功，邀之合攻新会，并称：“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

此后，李定国又联络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合围新会。自十月十四日以来，明军开始攻城，但连攻两个月，未能克城，李定国下令罢攻，围困新会，并且建造行宫，设置官仓，向诸县征收盐米，此错误之举使得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大军来援，此时李定国大军因瘟疫传播而士气不振，此战清军以铁骑冲垮李定国左军，于是明军全线崩溃。清军追

杀20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同时率百姓数十万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18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

而就在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交战时，孙可望不仅不发一兵一卒来助，坐视李定国兵败，反而在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下令凡李定国所部经过之地，粮草尽皆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还派出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阻拦李定国返滇，在这种内外交困中，李定国退抵南宁时，大军仅剩6000众。

而就在如此大败之时，南明再起内讧。永历六年正月二十日，永历帝为孙可望迎入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后，孙可望却于贵阳征发民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设立五府六部三衙门，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文臣武将，克期到秦王府朝见。其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并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在此情况下，永历身边近臣文安侯马吉翔、庞天寿等人见风使舵，日趋亲附权倾势重的孙可望，以至于永历帝渐成孙可望掌中之玩物。由于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故而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帝在以内阁首辅吴贞毓为首的一党谋划下，试图借助大西军中忠于永历帝之众来稳定局面。在商议之后，众人计定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安西王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及卧榻之侧的马吉翔、庞天寿等人的势力，倚重人等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遣使赴广西诏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李定国接密敕后，称：“只要我李定国活一天，就不会让陛下受到屈辱，希望陛下暂时忍受，我这就去救驾，我宁可离开孙可望，也不会背叛陛下。”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结果此事为马吉翔具告孙可望。

永历八年三月，孙可望派心腹郑国举兵问罪，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后可望以“盗宝矫诏、欺群害良”拟罪赐吴贞毓自缢，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和刑科给事中张镌三人凌迟处死，其余全部斩首。此即为 “十八先生之狱”。经此一事后，孙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逼促永历迁往贵阳。

永历九年，永历帝再次派使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而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在无法经略两广的情况下，加上中书金公趾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于是李定国决

计回黔。

永历十年正月，李定国率军急赴田州，刘镇国、关有才率军败走，见此情形，孙可望派白文选迁永历帝于贵阳。但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至安龙，与永历帝相见，君臣相抱持痛哭，此后李定国密誓效命，并与南明众臣定迁皇帝于滇。

而与此同时，孙可望所部却刚刚遭受大败，周家铺大败之后，孙可望更为焦虑，他急需获得一场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正值江南的钱谦益、张煌言等人遣使而来，希望孙可望统帅明军出湖南，继而与福建郑成功所部合力并举，会攻长江。然而尽管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身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周家铺大败的阴影却使得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于是他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为出任大招讨。

当初刘文秀受封抚南王，由于艾能奇已死，故而刘文秀率明军步骑5万出川南，由叙州、重庆进围成都，杀清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此后，刘文秀率大将王复臣、张先壁等5万人马进围保宁，吴三桂处境窘迫，但刘文秀因屡胜轻敌，拒绝采纳王复臣的正确意见，轻率攻城，结果被吴三桂窥出破绽。不久，吴三桂和清朝征西将军李国翰联兵出战，一举击破张先壁军，溃兵冲乱了全军阵脚，王复臣也被包围，自杀身死，刘文秀大败，退还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下令解除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而张先璧被乱棍打死。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不仅他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愤慨不平。此番虽然孙可望决定重新起用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于是刘文秀出任大招讨后，竟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就这样，直到永历十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名臣、冯双礼等部，以马、步兵丁6万、象40余只，整装上道，东攻湖广。四月，刘文秀大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准备切断自洞庭湖西通过湖北、湖南的大道后，再收复长沙、衡阳、岳州，继而再北攻武昌。按照刘文秀的部署，其亲率大军自陆路而行，卢名臣率军从水路而出。时正值沅江涨水季节，于是明军舟舰百艘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克桃源县，俘知县李瑢。然而就在水路进展顺利之时，陆路却因为连日大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于是两路大军呼应不灵。而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后，即从衡州等地抽调大军回防长沙，同时在五月初十，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五月二十三日夜，卢名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支援，故而激战到次日，卢名臣大败，其中箭落水而死，水路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清军又加强了辰州的防务。从而使得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遂告失败，权衡之下，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

常德之役后，孙可望对刘文秀愈发不满，因而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使之返回云南昆明闲住。因而刘文秀与李定国合计，迎永历帝入滇，此后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此后，在李定国奏请下，永历帝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抚他。永历十一年五月，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扣押了白文选。此后，再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前去，临行之时，永历帝赐虎金簪给张虎，令张虎从中开导孙可望。但张虎见孙可望竟谎称道：“永历帝赐给我金簪，让我杀你。”于是孙可望大怒，决定亲率大军往攻云南，并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

但孙可望不知道其部下早已对其不满，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14万，在贵阳誓师，以“清君侧”之名出征。

九月十五日，孙可望大军抵交水，李定国、刘文秀领军5万前来，双方距离十里分别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36座；定国、文秀军约3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于是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昆明，以与王尚礼里应外合。十九日，李定国，刘文秀率军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刘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孙可

望见此大喜，以为已挫李定国锐气，当即命大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5000铁骑直冲马惟兴营，并与阵前倒戈的马惟兴合兵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一时间，孙可望所部将士大乱，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于是孙可望大败。其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此后，李定国还师昆明，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孙可望兵败之后，竟不敢据守贵阳，而是向东而去，由于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故而其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势穷之下，孙可望以"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而转投清军。

孙可望降清之后，为清廷封为义王，其感激涕零之余，称："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此后，他为图立功自效，竟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史载："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予以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

孙可望来归之后，清廷立即着手讨伐南明事务。永历十二年（1658）四月，清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其中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入黔。由于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以至使吴三桂率军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是年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于是李定国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但此后李定国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以至士气低落。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先败冯双礼于鸡公背，后陷安庆、曲靖，而北路吴三桂败白文选于七星关，而南路卓布太所部在进逼凉水井后，陷安隆。李定国闻讯，亲率3万大军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鏖兵。虽然明军初战告捷，但次日却是大败，清军攻破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次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二月吴三桂及赵布泰、尚善等率清军与李定国鏖兵磨盘山。此处"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于是"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并以窦民望为初伏，高

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大军追来，然而当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有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于是吴三桂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不得已，李定国只得下令诸军出伏，于是“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而清军也死伤大半，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18名将官战死，不得不后退30里。

与此同时，永历十三年正月初四，永历帝到达永昌，以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此后白文选战败，永历与李定国遁走腾越州，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等皆各自逃散。之后永历帝逃往缅甸，李定国则独自率军返回勐腊，遣人往车里借兵。这时定国营中人马相继病死，李定国亦病。


吴三桂

由于流亡缅甸首都瓦城的永历帝被缅甸王莽达喇收留，于是在当年九月，洪承畴奉“皇帝特谕”致书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和蛮莫宣抚司，要缅甸主动交出永历帝、沐天波和李定国。次年，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总管该省军民事务后，吴三桂上疏力主出兵缅甸。于是同年四月三十日，清廷经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后，同意吴三桂相应进剿，由户部拨给兵饷330万两。为了慎重起见，顺治帝还派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同吴三桂面商机宜。八月十八日，清廷任命内大臣、公爱

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八旗兵由北京前往云南，会同吴三桂进兵缅甸。

就在吴三桂命永昌、大理守边兵至境上“大张旗鼓，号作先锋”时，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58）五月二十二日，莽达喇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并派使者来向永历帝索取贺礼，永历君“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贺”。于是两者关系恶化。

七月初六，缅甸使者来访，当面责备南明官员“我已劳苦三载，老皇帝及大臣辈亦宜重谢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杀你们，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报恩”，说完怀恨而去。

十六日，莽白决定铲除永历随行官员，遂派人通知永历廷臣过江议事。但鉴于双方关系紧张，文武官员心怀疑惧都不敢去。十八日，缅甸使者又来说：“此行无他故，我王恐尔等立心不臧，欲尔去吃咒水盟誓。尔等亦便于贸易。不然断绝往来，并日用亦艰矣。”

永历廷臣明知其中有诈，即由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答复道：“尔宣慰司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来，是天朝上邦。你国王该在此应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今又如何行此奸计？尔去告与尔国王，就说我天朝皇帝，不过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无生之地，岂受尔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虽在势穷，量尔国王不敢无礼。任尔国兵百万，象有千条，我君臣不过随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后，自有人来与尔国王算账。”在缅方坚持下，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

十九日黎明，马吉翔等传集大小官员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准备饮咒水盟誓，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上午，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3000人团团围定。沐天波知道变生肘腋，夺刀杀缅兵9人而被击杀；靖来将军魏豹、总兵王启隆、王升也抓起柴棒还击，但皆死。此后缅兵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包括松滋王朱俨镏、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马雄飞、王维恭、蒲缨、王祖望、杨生芳、裴廷谟、邓士廉、杨在、节愍侯邬昌期、编修涂宏猷、皇亲任国玺、邓居诏、典簿齐应巽、学录潘璜，总兵王自金、陈谦、龚勋、吴承爵、张宗位、通判安朝柱，锦衣卫掌卫事任子信、金书张拱极、丁调鼎、刘相来、宋宗宰、宗宰刘广银、宋国柱等，还有司礼监李国泰、秉笔李茂芳、李崇贵、杨宗华、杨强益、吉王府官张伯宗等。只有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留守于永历帝行宫才幸免于难。

此后，缅甸军直取永历帝行宫搜取财币，贵人宫女及各官妻孥自缢者甚众。永

历帝闻讯，心生恐惧，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皇后自缢，却为侍卫总兵邓凯以“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丢失社稷已经是不忠，今丢下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而劝止。

缅兵把朱由榔、太后、皇后、太子等25人集中于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朱慈煃与妃妾，及总兵黄华宇、兵文相、熊惟宝、锦衣卫赵明鉴、王大维、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郑文远、李既白、凌云、尹騠、朱议漆、内官陈德远等百余人大多自缢而死。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在通事导引下来到，喝令缅兵：“王有令在此，不可伤皇帝及沐国公。”可是，沐天波已经在“吃咒水”时被击杀。

此后李定国、白文选得知缅甸扣住了永历帝后，遂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李定国大败缅军，提出送还永历帝即退兵的条件。但为缅方所拒。次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15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16舟有5舟被击沉。此后，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而就在当时，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

其实，早在八月二十四日时，吴三桂就以满、汉兵由昆明分两路西进。十一月初九，吴三桂所遣总兵马宁、副都统石国柱以及降将祁三升、马宝、高启隆、马惟兴等由姚关推进到木邦。此后，吴三桂又致书缅甸国王，要求交出永历君臣。史料记载中说：“伪晋王李定国先奔景线，伪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凭江为险。官兵自木邦昼夜行300余里，临江造筏将渡。白文选复奔茶山。吴三桂、爱星阿遣总兵官马宁等率偏师追之，自领大军直趋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

十二月初一，清军迫近缅甸阿瓦，缅甸国王大惊，于是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此后，永历帝被押回云南昆明，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家中。永历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康熙元年，1662年4月14日），永历帝在昆明篦子坡被清军用弓弦勒死，家属押送北京。

史载，得知永历帝被押解至云南后，李定国抵勐腊，遣官入车礼借兵。五月，

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帮助象马，恢复云南，且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刺返回，云南已集4000人，愿为掎角之势时，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于是大军不得行。是年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42岁生日，突然发病，加之此时又传来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于是“定国恸哭，全军皆白衣，并以为永历帝发丧”。其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称“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时遗命其子：“任死荒徼，勿降也！”

永历帝死，南明灭，此时清军开始着围剿“夔东十三家”。当初在崇祯十七年（1644）时，张献忠攻陷夔州，建立大西政权，又与李自成的部下郝永忠、刘体纯等40余万人结合。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战死，郝永忠、刘体纯、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袁宗弟、李来亨等联合王光兴、谭文、谭诣、谭宏等地方武装大举反清，但在次年，李赤心、高必正攻打荆州失利，于是转攻大昌、巫山。顺治五年（1648），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与李赤心、高必正等联合抗清，收复湖南大部失土。顺治六年（1649）正月，何腾蛟被俘杀，李赤心病死。此后在顺治八年（1651），高必正又被孙可望所杀。于是李来亨回到巴归，“颇以威信御众”，在湖北茅麓山与南明将领王光兴会合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有兵20余万。

自康熙元年（1662）九月起，清廷组织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李国英从夔州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初三渡过大宁河，袁宗第部战败，退出大昌县，清军再度进攻茶园坪，岐侯贺珍之子贺道宁投降清军。次年二月十五日，郝摇旗与清军交战于房县赤土坡，被击败。由李国英、董学礼、王一正等执行三面夹击，战事异常惨烈。清军一度退至彝陵。康熙二年（1663），清军攻占巫山。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刘体纯、李来亨等军抵达巫山城下。双方激战数日，死伤甚众，十一月间，郝摇旗部下总兵罗茂同向清军投降，局势彻底颠覆。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兵逼近陈家坡，刘体纯的部下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等先后降清，刘体纯见大势已去，自缢死。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军至黄草坪，郝永忠退至羊耳山，战败，与袁宗弟、洪育鳌等为清军被俘杀。郝摇旗所拥立的东安王朱盛蒗亦被斩杀，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

重庆之役后，“夔东十三家”处境日渐困难。康熙三年（664）八月五日，李来亨被围于茅麓山，粮尽无援，杀妻后自缢死。自此之后，南明势力仅剩东南一隅。

长期以来，东南沿海的抗击活动都是由郑成功所领导，其乃郑芝龙之子。郑芝龙早年乃海盗，强悍一时，所谓“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舶例入三千金，

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崇祯年间，郑芝龙为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一时间“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中原，清军定京师。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之后，大军南下，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未至一年，竟席卷大明半壁山河。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即位南京，改元弘光，是为南明，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八月，郑芝龙与其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被封安南伯及靖虏伯。次年，清军灭弘光朝，郑鸿逵、郑彩自京口退至杭州，迎唐王朱聿键入闽。是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

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郑鸿逵为定西侯，后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家官居极品。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赐国姓。这也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由来。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起，郑成功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但此时，却有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听从洪承畴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当年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八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有船五六百艘，而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及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则弃关而走，于是清兵陷仙霞岭，此后隆武帝出奔汀州。

九月十九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占福州。不久，清兵乃疾取兴化、泉 州、漳 州诸郡县。同月，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史载，当初洪承畴为泉州武荣人，与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决意北上剃发称臣时，郑成功率20余人至孔庙祭拜先师云“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而后出走金门。

郑芝龙本以为降清后得保家业，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背约，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十一月三十日，清兵进劫安平，郑成功之母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自缢而死。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于是誓言坚决抗清。

避走金门的郑成功，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不久就在南澳募集了数千人马。此后，郑成功在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顺治四年（1647）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所部攻打海澄，结果战败。八月，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清顺治五年（1648），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遂再次出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泉州。是年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

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退回海上。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明永历朝廷，于是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即册封其为“延平王”。

其实，在当时闽南、闽东局势颇为混乱，除了明、清势力此长彼消之外，还有各路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税金，宛如军阀。于是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十月，郑成功挥兵南下，此举除了扫荡闽南清军外，还将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作为粮源。经过一个多月的征战，郑成功大军南下以来，除了攻取漳浦、云霄等城之外，还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至十一月，因攻诏安不克，郑成功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当地豪强，至隔年五月之间，郑成功又次第收服了潮阳及周边众多山寨。

就在郑成功于永历四年（1650）六月率大军进抵潮州后，其因潮州守将郝尚久与自己素有嫌隙，而以郝尚久“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讨。其实，潮州守将郝尚久在当时的确立场不明，他虽然已随李成栋反清，却又曾出兵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而也曾拒绝郑成功合并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也因此，郑成功才会以“不清不明”为由，进讨于他。

面对郑成功的进攻，郝尚久不敌，遂退守府城，于是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南下，攻入广东，郝尚久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负气降清，并引清军入潮州，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且又面临粮饷接济等诸多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此时，东南沿海的鲁王朱以海的绍兴政权正处于内讧之中，朱以海是明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朱檀的九世孙，鲁王朱寿镛第五子，鲁王朱以派之弟。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破兖州，鲁王府被洗劫一空，鲁王朱以派自缢殉国，于是朱以海于崇祯十七年（1644）被明思宗封为鲁王；但是在朱以海正式受封四天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朱以海南奔，寓居浙江台州。

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之后，即命朱以海驻守台州。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南京，此后杭州陷落，于是钱肃乐、张煌言等起兵于浙东，郑遵谦、张国维等迎朱以海于绍兴。七月十八日，朱以海正式宣布监国，起用旧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张国维、朱大典和宋之普为东阁大学士，并以次年为监国鲁元年，不奉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年号。

朱以海就任监国后不久，即隆武帝就派使者来绍兴，要求朱以海退位归藩。因

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承认朱聿键的地位，朱以海不得已之下宣布退位归藩，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然而不久之后，波折又起，在张国维和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绍兴政权最终却是决定拒绝接受隆武帝的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顺治三年（1646）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朱以海部将杀害。由于绍兴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以笼络，给他们加官进爵。而朱以海则在这年四月间派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来福京以公爵封郑芝龙兄弟。于是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朱以海所遣使者总兵陈谦，此举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从而导致了后来郑芝龙降清。

然而，由于朱以海没有兵马，所以不得不倚重方国安和王之仁。不过此二人至浙东之后，却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的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并排挤孙嘉绩、熊汝霖和钱肃乐等人领导的义兵。此外，方国安和王之仁不顾朱以海反对，擅自把浙东各府县每年60余万钱粮自行分配，结果浙东各地义师因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到最后连督师大学士张国维直接掌管的亲兵营也只剩几百之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朱以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史载“时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丘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万”。

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大举南下征讨浙东。这年夏天，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涸流细。清军见水深不过马腹，遂分兵两路进击绍兴，方国安的所谓“钱塘江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九日夜，朱以海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出行前，朱以海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他的家人退往台州，但毛有伦却自作主张，改道蛟关以便入海，不料途中遭遇叛将张国柱，朱以海的家眷被押往杭州。清廷以此为要挟，派使者前往通告朱以海，要他剃发归降，却遭朱以海痛斥，其称清兵是“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

浙江沦陷之后，福建也为清兵攻破，而流亡海上的朱以海则先走石浦，后依附张名振，并至舟山。九月间，据守金、厦一带的永胜伯郑彩试图将朱以海迎入福建。不料，郑芝龙降清，并派人劝说郑彩献出朱以海，以向清廷请赏。但郑彩不愿归降，遂奉朱以海为主。

顺治四年（1647）正月，朱以海在长垣誓师，随后大军开始频频出击闽东，一时间建宁府以及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连江、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等地均被收复。同年十月，福宁州也被明军攻克。至顺治五年（1648）

时，闽东北三府一州27县全部被收复。就在此时，内讧再起。顺治五年，郑彩派人击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十分不满，郑彩又命人逼迫郑遵谦投海而死。不甘成为傀儡的朱以海任命兵部尚书钱肃乐接任大学士，负责朝政票拟。不料，却为郑彩欺压，以致钱肃乐呕血而亡。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再次南下，福建建宁、福安、罗源、宁德、政安和浙江景宁、庆元、云和、松阳等州县尽皆失去。

最初的时候，在泉州和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也以尊奉死去的隆武帝为正朔，而不承认朱以海，但此时，郑成功在退回闽南之后，却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顺治七年（永历四年）中秋，郑成功刺杀郑联，虽然郑彩得知消息后，引“舟师百余艘，逃于广东南海之间”，但最后还是在上表向朱以海求救不成时，为郑成功所收编。

顺治六年（1649）九月，张名振派兵袭杀黄斌卿，并接管了黄斌卿军，迎朱以海到舟山。史载，朱以海至舟山礼葬黄斌卿，恩养他的家属，对黄斌卿旧部加以安抚，并且给予赏赐。于是舟山遂定。一时间舟山与宁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冯京第等义师遥相呼应，倒也有一番气象。此外，为复兴大明，朱以海还一度遣使前往日本寻求援助。

顺治八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于是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虽然不满朱以海，但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置其居住于金门。而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并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此后，郑成功抵广东潮州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就在郑成功率领舟师抵达南澳时，却在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险遭不测。此后，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南下后，觉得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乘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乘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以渡载清军去攻厦门。

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竟然未战先怯，只顾将财物搬运至私船之上，以便于逃亡，如此一来，也就使得清军轻松便攻破厦门。史载，清军破城之时，竟将郑家的积蓄掠夺一空，而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甚至只能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方逃过一劫。

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随即返回内陆，却与赶赴厦门的郑鸿逵相遇海面之上，虽然郑鸿逵困马得功于波涛之间，但因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

命，无奈之下，郑鸿逵只能放走马得功。此时奉诏勤王的郑成功虽然有心继续南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曾德事件”。史载，“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又有“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之说，此外还有史料记载，“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

总之，施琅杀曾德之后，郑成功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然而不久，施琅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但是没有查到。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求郑成功的叔父郑芝豹调解。郑成功不接受调解，在知道施琅逃入安平后，便派部下吴丰秘密去刺杀他。施琅事先已经获得消息，吴丰刺杀失败。郑成功在盛怒之下，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胞弟施显皆杀死。经此事件，施琅与郑成功结下大仇，乃再度降清。

施琅本是郑芝龙的部下，顺治三年，清军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郑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海澄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11.3万名”。后来李成栋奉调由闽浙入粤时，施福率施琅、梁立等及5000兵马随征，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等地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碑传记》载：“既而承当要事，从海道出粤东，战胜攻克，人以岳家军目之。”然而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琅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琅、黄廷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顺治五年，闽系将领跟从李成栋反清复明。而施琅在被遣回福建途中遭李成栋部将郝尚久的袭杀，史载，“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脱身之后，施琅投郑成功部下。此番施琅降清，对于郑成功的威胁显然是巨大的。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频频率部出击，先后在闽南小盈岭、海

澄等地大胜清军，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至当年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翌年正月，又有清海澄守将赫文兴来降。二月，郑成功统兵攻长泰，清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之，两军战于江东桥，结果陈锦大败而走，长泰也为郑成功所取。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围漳州府府城。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舟舰迎击，于崇武海面大败清军，此后继围漳州城半年之久。史载，当时城内水粮已竭，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军民尽皆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浮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更有“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此后由于清廷以固山额真金砺率军抵福建，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清军。双方激战于江东，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尽皆阵亡。此战之后，郑成功不得不率军撤退，以保海澄、厦门，而清军乘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四月，金砺统兵进犯海澄。五月初七，清军以汉兵为前锋，旗兵后续，填河攀栅蜂拥而来，企图一举登城，结果不逞。天亮之后，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此战之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然郑成功不接受。不过当年八月，双方却于泉安报恩寺内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十一月，顺治帝再度敕封，并许以一府（泉州）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



当初郑芝龙被挟持上京后，初授精骑呢哈番，这番只是为了能够劝降郑成功，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并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以招成功降。结果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拒之。此后，清廷特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等，偕同郑芝龙四子郑渡，送漳、泉、潮、惠划分郑成功安屯兵将，敕命入闽。郑成功于安平见使臣，请其诣诏。清使曰：“尔等既无剃发者，不为清臣，不能出诏。”遂回泉州。郑成功冷笑曰：“忽来忽去，吾料之已熟。”乃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他还上书郑芝龙，言表拒未投降之因：“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谷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两全之局耳。”于是清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于宁古塔。

而与此同时，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浙江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沿长江进攻，直达金山寺，威胁江宁府城，但因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而在当时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也正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于是同年十一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并力勤王破敌，大军进逼漳州时，漳州协守刘国轩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于是所属十邑俱下。此后，转攻泉属，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望风迎降。此后，又转军福州、兴化等郡。一时间，闽东、闽南尽皆归降。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不过虽然备受恩宠，但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时，都请宁靖王朱术桂等宗室在旁观礼，同时还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亲自督察官兵操练。当年九月，清廷以定远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于是在大军压境之下，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门、厦门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北上浙江、南下广东，以使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

头尾。不过就在北路舟师连战皆捷，攻入舟山时，南路舟师却是颇为不顺，他们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结果在围头海域大败。

当南征舟师返回厦门后，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其本是要处死苏茂、黄梧、杜辉，但是众将跪地求情，郑成功决定将苏茂一人斩首，以黄、杜则戴罪图赎。此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担心此后有所过失恐性命难保，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这里是“海道必由之路”，“南至定海，北至吴淞，皆一潮可到，盖江、浙之交界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陡然之间乌云滚天，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波涛汹涌，郑军舟船对面亦不相见，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翻沉损坏的很多。郑成功的六位妃嫔，第二、第三、第五个儿子都被淹死，兵将、船艘、器械损失巨大，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翌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五月十三日，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从浙江沿海出发北上。此时，郑军共有大小舰船3000余艘，兵马10余万，铁人8000。他首先攻占定海，全歼了清军定海水师，焚毁船只100余艘，基本消灭了清军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进军长江的后顾之忧。五月十九日，郑军抵达吴淞口，郑成功派人秘密联络守卫此地的清朝苏松提督马逢知。马逢知按兵不动，于是郑成功会同张煌言所部顺利进入长江。

六月初一，郑军进至江阴，清军凭城扼守。郑成功接受诸将建议，以县小不攻，率师西上。十六日进攻瓜州，阵斩清游击左云龙，破敌满汉兵马数千，截断清方用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焚毁清军江上木城三座，夺得谭家洲大炮数十门。同一天，郑军攻克瓜州，操江巡抚朱衣助投降，郑成功命援剿后镇刘猷镇守该城。

六月二十二日，郑成功又在镇江银山大破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投降。此后，郑成功命右武卫周全斌、后冲镇黄昭入城防守，降将高谦以熟悉地利留之协守，其部下兵马调随主力进攻南京。又派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戴可进仍署知府事。六月二十六日，张煌言所率舟舰已进抵南京城下。

七月初七，大军进逼江宁城北的观音门。初九，郑军船只进泊江宁城西北角的仪凤门外江边。初十，郑军大队人马上岸，在仪凤门外扎营。很快，郑军相继在江宁内外城郭的观音、金川、钟阜、仪凤、江东、神策、太平等门外扎营，共立83座营寨。在各处营寨都安设大炮，并准备了云梯、藤牌、竹筐、铁锹、凿子等攻城器械。七月初十，大军扎营于仪凤门外。而与此同时，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占据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4府3州22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辫脱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

而清廷知悉败报后，举朝皆惊。顺治帝惊怒异常，惊慌失措，扬言下令亲征。一旦南京再失，东南将不保。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初八，顺治帝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官名）赖塔等人率八旗军由北京南下，增援江南。又任命江西提督杨捷为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为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各率手下人马由江西、宁夏赶赴江宁。

最早的一批援军是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所部，其于六月二十八日率4000兵卒由崇明出发，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七月十四日进至丹阳，傍晚时分连续接到总督郎廷佐四次调兵入援南京的羽书。其知道南京危急，连夜进兵，十五日上午到达句容县，当天深夜即到达南京城下，由正阳门入城。此后，又有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300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1000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150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500名俱抵江宁，而浙闽总督赵国祚和驻防杭州昂邦章京柯魁派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甲喇章京佟浩年带领驻防杭州的披甲满洲兵500名，浙江巡抚佟国器派抚标游击刘承荫领精兵500名，也“星驰赴援”。

二十二日夜，清军由梁化凤率领部下骑兵500余名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出钟阜门，于次日黎明时分突然对郑军营垒发起冲击，大败郑成功余新所部。此后，郑成功在观音山至观音门之间集结大军，准备同清军决战。其派左先锋镇杨祖统率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掎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伏于山内，左武卫林胜、右虎卫陈魁列阵于山下迎敌，而自己则督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在观音门往来策应，后提督万礼、宣毅左镇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右提督马信、宣毅后镇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路抄蹑其后，此外还派左冲镇黄安专门负责水师。于是郑军连夜移营，备战。

二十四日，清军以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总兵梁化凤等

率领主力由陆路出战，提督管效忠等领军由水路配合，总督郎廷佐等在城留守。天亮之后，清军分路直攻观音山，山上四镇尽皆崩溃，前冲镇蓝衍阵亡，左先锋镇杨祖、后劲镇杨正、援剿右镇姚国泰领残兵而走，虽然郑成功派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登山援救，但为时已晚，清军自上而下猛扑下来，伏于山内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被围，二将领兵死战不得脱，甘辉被俘，张英阵亡。而列营于山下的林胜、陈魁两镇也全军覆没。此外，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宣6毅左镇万义泅水逃出。

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此后潘庚钟挥众力战直至阵亡。至此，攻取南京的战役完全失败，郑成功只有收集残兵，另图他策。

败后的郑成功虽然试图攻取崇明县，以经营长江，但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可以说南京之战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重要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反清大业受到重大挫折。此后郑成功决定听从何斌之建议，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台湾岛，以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南修筑有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郑成功先礼后兵，以两次写信给揆一，令其投降，并称："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随后在四月初一，大军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上陆，以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与此同时，水师则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兵船展开海战。此战荷船"Hector"号为击沉。四天之后，在郑成功大军包围下，困守普罗民遮城的荷兰人出降。此后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

而在取得普罗民遮城作为据点之后，郑成功随即统军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但守将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投降，在强攻热兰遮城无果的情况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郑成功遂派兵士在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同时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七月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约有600之众及11艘兵船。但随着台江内海的失败，荷兰人彻底丧失了主动权，此后郑成功以火炮轰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揆一率众投降，并退出台湾。

然而，就在收复台湾不久之后，郑成功便因疟疾而死。史载，永历十五年（清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崩，皇三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以迁界令将自山东至广东沿海20里内居民，尽皆迁空，同时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还斩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菜市口）并挖郑氏祖坟，此外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遂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

据《台湾县志》记载：“当国姓公卧病的当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初三更风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初五，天明雨晴了，初八，国姓爷归天。”

当初郑成功入主热兰遮城时，严令留守厦门的诸将搬迁家眷来台，但郑泰、洪旭、黄廷等重要将领都抗命不往，乃至于“不发一船至台湾”。在台将士又因为水土不服大量病死，军心浮动，最后“人心惶惶，诸将解体”，成功旋即病死，更使得一场危机骤然爆发。

当初郑成功令世子郑经驻防厦门，但郑经却与其五弟的乳母昭娘私通。世子夫人唐氏祖父唐显悦气愤地上奏郑成功世子乱伦之事。郑成功听闻后，十分愤怒，下令洪旭等驻厦将领处死董王妃、王世子郑经、陈昭娘与庶王孙郑克臧。然而，诸将并未从王命，唯一遵从王命的周全斌还遭洪旭下狱。诸将抗命之事随后传回东都，从而使得郑氏内部分裂。郑成功病逝之后，在台诸将遂推举郑成功之弟郑袭为“护理”，以定军心。郑袭部下蔡云、李应清、曹从龙、张骥四人拉拢黄昭及萧拱宸等驻台将领，立郑袭为“东都主”。

十一月，郑经先至澎湖，与黄昭、萧拱宸等人协商不成后，率军东征。史载，郑经亲率大军于鹿耳门登陆，而驻军东都的右虎卫黄安亦率军前来与世子会师。此后，世子派人于承天府谴责黄昭、萧拱宸二人，并以正统自居，黄昭随后率军至潦港与世子军对战，起先虽占优势，但随后因其中流箭身亡，于是全军败退。黄昭死后，诸将皆降。郑经入主安平王城后，蔡云自缢，萧拱宸、张骥、李应清以及曹从龙等人于承天府遭斩首示众，族人流放，而郑袭则遭禁锢于厦门。次年郑袭畏惧被杀，半夜率领官吏224人，士卒120人渡海降清。

此后，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继续奉永历帝为正朔，保持对监军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以王礼相待。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十月十九日，清军与荷兰人联兵进攻金门、厦门，郑军不敌而弃守，退往铜山，郑经遂退往台湾。康熙四年四

月，清军再次与荷兰人合兵进攻澎湖，却遇到台风无功而返。自此，康熙帝一度放弃进攻台湾，而选择与郑氏谈判。

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1673）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是为“三藩之乱”。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三藩之乱历时八年，才被平息，随后康熙皇帝开始着手经略台湾。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下诏恢复福建水师。康熙十八年，又任命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此后郑经放弃金、厦、退往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打算趁势进攻台湾，但遭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而康熙帝也顾虑未解决西南吴世璠，遂决定暂缓。就在清廷准备平定台湾时，明郑内部却再次分裂。

郑克臧乃当初郑经与其弟乳母私通所生，由于唐王妃死前并没有为郑经产下后嗣，郑克臧因而成为元子。“三藩之乱”西征时，郑经以陈永华为东宁总制，留守东宁主持内政，后陈永华上奏表示：“元子年登十六，聪明特达，宜循‘君行则守’之典，请元子克臧监国。”于是郑经允许，遣礼官郑斌赍谕抵东宁，立郑克臧为世子、监国，并刻“监国世孙”的玺章。史载，郑克臧为人刚毅果决，颇有其祖父郑成功的风范。加上他是陈永华的女婿，所裁决的事务受到陈永华教导，故而大小事务尽皆井井有条，也因此郑克臧一度被赞为“东宁贤主”。

康熙十九年（永历三十四年，1680），郑经撤返东宁，政事仍继续委由郑克臧处理，唯偶取其批阅公文。次年（1681）正月二十八，郑经病薨于承天府。其病危时授长子郑克臧监国剑印，并托孤于刘国轩及冯锡范等人：“此子干才，颇有希望，君辅之。吾死，九泉亦瞑目也。”

然而，冯锡范与郑聪等宗亲与大臣不愿由世子郑克臧继承王位，而打算拥立其弟郑克塽（同时也是冯锡范的女婿）。于是他们以监国为李氏螟蛉子而非王室血脉（另一说为其生母陈昭娘的身份卑贱）为由，欲罢黜世子郑克臧。董太妃竟不查究竟，便下令收回郑克臧的监国印玺并罢黜其王位。冯锡范等人又派人将之绞死，是为“东宁之变”，而这场宫廷政变距郑经死亡仅两天。

关于郑克臧之死，根据《台湾通史》记载，郑克臧先被囚禁于北园别馆，后遭到郑聪等王叔命令乌鬼兵杀害。而根据《台湾外纪》记载，董太妃于听信诸公子与冯锡范的谗言后，信以为真，遂命令仪宾柯鼎传世子入北园别馆。郑克臧来到大门，护卫毛兴与沈诚被拒于门外，仅世子一人独自进入内庭。世子刚进入中堂，郑聪、郑明、郑智、郑柔等人与杀手蔡添便联合杀害了世子。世子死后，郑聪立即命

令乌鬼兵将其尸拖至旁院。此外根据《裨海纪游》及《鹿樵纪闻》之记载，其是被迫自缢的。而《闽海纪要》与《海上见闻录》则记述世子是受绞刑（缢杀）而死的。郑克臧遇害时，其正室陈妃已怀有身孕，并于绝食数日后投缳殉死。

“东宁之变”后，郑克塽被拥立为新王。继位后，克塽先是晋封宗室与政变功臣，分别赐予公、侯、伯等爵，然而大权却是落入身为外戚又兼任侍卫镇的冯锡范及武平侯刘国轩之手。于是福建总督姚启圣再请攻台，但又为万正色反对。姚启圣知道施琅仇视郑氏，遂向康熙帝推荐施琅。康熙帝亦不满万正色，于是便以施琅担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陆师提督。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清军抵达铜山岛，但此时姚启圣和施琅却在争执出兵时机，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天的北风，施琅主张利用夏天的南风，两人争议不休，最后康熙帝于十月初六裁定施琅负责平台事务。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诏，要求施琅速速进军。当时刘国轩于澎湖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屿、鸡笼屿筑城，同时在东莳、西莳、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山设置炮台，并在海边建造矮墙并配置火铳，此外还从台湾调遣乡兵以备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从铜山岛出发。十五日，郑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 遂回报刘国轩。十六日，清军进攻娘妈宫。刘国轩以林陞、江胜指挥水军，邱辉为先锋，自己在娘妈宫港口督战。此后，双方鏖兵多次，最终施琅大败刘国轩及董腾等人，使得郑军全面崩溃，江胜战死、邱辉自焚。夺取澎湖后，刘国轩随后逃回东宁。而施琅则在澎湖张榜安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并派原刘国轩副将曾蜚赴台议和。

澎湖之战战败后，东宁朝廷开始商讨接下去的对策，主要分为“再战派”与“主和派”。其中“再战派”以中书舍人郑得潇、建威镇黄良骥、水师镇萧武、中提督中镇洪拱柱等人为主，而冯锡范则力主征伐吕宋、永保国祚，然而原本听从再战派的冯锡范却听信刘国轩的主和言论，选择投降。七月初五，冯锡范命郑德潇写降表，并呈降表予清。七月十五日，冯锡范将郑克塽送交施琅。八月十三日，施琅进入台湾受降。自此，东宁亡国。

郑克塽降清不久，大明宁靖王朱术桂自杀，其本是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第十五皇子辽王朱植的后代，长阳王术雅之弟。隆武时期，受封宁靖王，南明时期先后在方国安、郑鸿逵、郑成功军中任监军。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朱术桂前往，郑经礼遇其为南明永历正统的象征。郑克塽决议降清时，其召集妾侍说：“孤不德颠沛海

外，冀保余年以见先帝先王于地下，今大势已去，孤死有日，汝辈幼艾，可自计也。”随侍在侧的五妃皆泣对曰：“王既能全节，妾等宁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请先赐尺帛，死随王所。”而后相继自缢于中堂。此后，朱术桂将五妃之灵柩安葬于南门城外魁斗山，并提笔于壁曰：“自壬午流贼陷荆州，携家南下。甲申避乱闽海，总为几茎头发，苟全微躯，远潜海外四十余年，今六十有六矣。时逢大难，得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而后加翼善冠，服四围龙袍，束玉带，佩印授。将宁靖王麖钮印送交郑克塽。史载，“郑克塽率文武至，嗟叹别之。王乃拜辞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在砚背题绝命词曰：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书罢，结帛于梁，升神，且曰：‘我去矣！’侍宦两人亦从死其旁。”

虽然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大清帝国开始进入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中，但在当时，不少大明遗臣不愿臣服于满清，流亡海外。例如朱舜水流亡日本，杨彦迪、陈上川、鄚玖流亡安南与高棉，并谋匡复旧朝。他们高举起的“反清复明”的大旗却是一直延续到大清末年。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是和当时大清的对汉人采取的政策有关，所谓清初有所谓“六大弊政”，即剃发（薙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而这其中，剃发易服带来的影响最大。

山海关之战后，清军入关，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州县官员按满人风俗，剃头留辫，但当大清定鼎北京，却发现汉人强烈反对剃发，而且降清之汉族官员剃发者亦寥寥无几，在统治尚未稳固之时，多尔衮遂以“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而取消了剃发之令。

然而此时，却有降臣孙之獬却全家主动剃发迎降，并上疏标榜“臣妻放足独先，阖家剃发效满制”，得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可孙之獬入朝后，列于满班，满臣认为他是汉人而不受；归入汉班，汉臣又因为他从满俗而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言辞激烈。就这样，在顺治二年五月，多尔衮重新下剃发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称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此令一出，天下哗然，不少汉人，尤其是江南士绅尽皆反对剃发，甚至由此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此外，虽然皇太极时就开始“满汉一体”，但其实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

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清廷特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另外内务府子弟还有景山官学等。而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有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此外，朝内官职也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甚至于满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此外，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满洲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甚至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虽然康熙一朝，皇帝颇是重用汉人，此外康熙帝还大力推行以儒学，但其实正如雍正帝所说：“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不过这种“首崇满洲”之国策，其实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却最终消失在历史中。至乾隆时，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并在使用中逐步为汉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后，大清帝国赖以以为自豪的八旗制度也随即走向衰落。此后，至咸丰年间，八旗已然不堪重用，只能依赖绿营、汉人乡勇，直至后来，大清帝国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只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汉人名臣所编练的新军，不过此时，大清也已然病入膏肓。自道光年间起，陷入内忧外困的大清帝国举国上下一片破败，乃至于状况还不如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大明。



洪承畴



清太宗常服袍褂像



清摄政王多尔衮



崇祯帝自缢处

清世祖顺治帝



明思宗崇祯帝





朝鲜画家绘的《落衣易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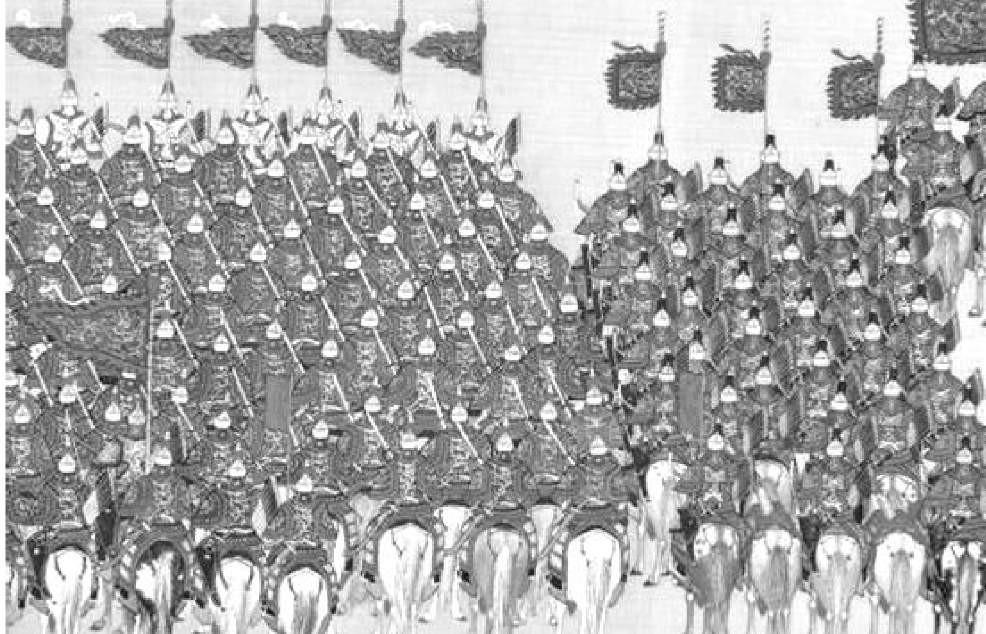


钱谦益

隆武帝



八旗军正蓝旗军阵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吴三桂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郑成功